斯大林

STALIN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著 张慕良 等/译

上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斯大林

STALIN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 张慕良 等/译

中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斯大林

STALIN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著 张慕良 等 译

下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韦尔立 伍永光 李锋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钢人”斯大林
站在权力金字塔之巅数十年
他的内心始终孤独
他的一生都力图把自己的某一弱点
变成有力量的标志
他的错误众所周知
他的功绩无可争辩



斯大林

STALIN

胜利与悲剧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著 张慕良 等译

上 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斯大林

胜利与悲剧

STALIN

[俄]德·安 沃尔科戈诺夫 著 张慕良 等 译

中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斯大林

STALIN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 张慕良 等/译

下册

胜利与悲剧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俄罗斯〕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6
ISBN 7-80173-199-9

Ⅰ.斯… Ⅱ.①沃… ②张… Ⅲ.斯大林,J.V.
(1879~1953) —生平事迹 Ⅳ.A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1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1-3109 号

斯大林:胜利与悲剧

著　　者　〔俄罗斯〕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译　　者　张慕良 等
策划编辑　国文润华
责任编辑　韦尔立　仇永光　李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世界知识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
开　　本　787×980　16 开
　　　　　84 印张　1044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73-199-9/K·022
定　　价　120.00 元(上中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对敌人，我们今天粉碎他们，过去粉碎他们，将来也同样要粉碎他们。

——约·维·斯大林

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联共总书记



作者简介：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

1928 年 3 月 22 日生于俄罗斯。

1969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70 年以前在列宁政治学院教授哲学。

从 1970 年起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

著有 28 部著作和 500 多篇论文。

代表作《斯大林》在世界各国引起很大反响。

曾荣获红星勋章、红旗勋章、“荣誉”勋章、

4 枚外国勋章和 25 枚奖章。

STALIN

第3章·选择与斗争

第4章·是专政还是个人独裁？



目录

第5章·披着领袖的“外衣”

第6章·悲剧的震中

第7章·战争前夜



第8章·悲惨的战争初期

第9章·最高统帅

第10章·迷信的鼎盛时期

第11章·恺撒主义的遗物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8–9页）。

弗·伊·列宁

代绪论

斯大林现象

斯大林生命垂危。他躺在孔策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已经无力站起身来，只是偶尔抬起左臂，像是在求人援救。领袖半睁的眼睑掩饰不住朝入口房门凝视的绝望神情。嘴唇无声地微微颤动，说不出话来。中风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是，斯大林身边没有任何人。最后，他的警卫人员在别墅窗外因久久听不到动静，感到焦急不安，才提心吊胆地走了进来。但是，他们无权立即请医生。这一情况是这位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万万意料不到的。当时需要由贝利亚亲自下命令才行。夜里人们找了他很长时间。但是他却认为，斯大林不过是在夜里饱餐之后睡熟了。直到过了10至12个小时，神色慌张的医生们才被带到生命垂危的领袖跟前。

这样的死本身就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命运的捉弄是无情的。一个临死前已经受了病魔几十小时折磨的领袖，在需要的时刻却得不到抢救。而这个人就是他，一个几乎称得上人间上帝、用几句话就能把几百万人从国土的一方打发到另一方的人！他所建立的官僚"秩序"把这位领袖本人也当作了它的人质。斯大林缓缓熄灭的意识总算还能真正认清他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现行的关系体系僵化到了何种程度。

生与死之间的无形界线是只能单向跨越的。连领袖们也无法再跨回来。斯大林未必知道，他和其他的领袖不同，面临的不仅是肉体的死亡，而且是政治上的死亡。他的逝世对同时代人来说似乎是极大的不幸。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人把几百万人丧命仅仅看作一桩官方内部统计的事。斯大林死后给后人不仅留下了一个弄清他究竟有何建树的长期课题，而且留下了关于他的命运之"谜"的激烈争论。笔者作为绪论题词的列宁语录中有"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说

法,许多人认为连这一说法也不适用于斯大林。他的死不能成为应该原谅他的理由,斯大林的一切成就、业绩和罪行都要由历史来裁决。神话破灭了,但要彻底肃清影响,只能靠事实真相。

他的全部情况只有他自己知道。斯大林不喜欢中间色调:要就是白,要就是黑。为了让后人见到的他的传记充满明亮的色调,他无疑是费过心思的。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料想到古罗马曾有过《记忆判罪法》。根据这项法律,凡是不合新即位皇帝心意的一切都必须忘掉。但是我们知道,这项法律不过是更突出地说明给人的记忆规定清规戒律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它——记忆——的存在(或消失)有其根本不同的规律。历史总是"一挥而就",写得工工整整。它没有什么草稿。已经过去的往事只能在头脑中、在思想中回忆,就像电影"倒片"那样。斯大林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为了让这部"纪录片"不留下不需要的镜头,他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情。

遗憾的是,有许多细节、事实和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无可挽回地湮灭了。而遗忘正是历史的深渊。请想一想:在我们之前世界上生活过700亿到800亿人。不管人类多么希望记住往事,连这几百亿亡灵的大部分人名都不可能再记住了(更不用说他们的身世了!)。历史的深渊是无底的。但是,并非一切都会从记忆这张巨网的网眼中"漏掉",坠入它所覆盖的遗忘的无底深渊。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不管现在活着的人对他的态度如何,他有可能永垂文明史册,只要文明还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优秀的传记作家。他总是能作出比较一致的评价。

在80年代的今天,在人们对祖国历史篇章的本来面目发生空前浓厚兴趣的时候,社会上在评价斯大林作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确实大相径庭。但是细想起来,现在对历史的关注,其焦点并不是斯大林。斯大林不过是象征着被历史打了折扣的一切。关注的中心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痛苦、我们不幸的困惑:我们今天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在当时为什么能出现和存在。如果需要用墓志铭来表示人们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我想铭文是会多种多样的。一方会镌刻大致如下的铭文:"你的错误众所周知,你的功绩无可争辩";截然相反的另一方会刻上:"你的罪行不能饶恕,你的'遗产'是沉重的包袱"。随着过去年代极其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随着能够不受限制地正视过去这种机会的到来,目前这种舆论"大相径庭"的局面会逐渐消失。这

决不会是朝着某种“中间”立场的方向发展，而会沿着尽可能弄清真相的道路前进。真理不应该是奢侈品。一旦真理成为我们思想的实质，对斯大林现象看法上的二元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人们在生前就为自己建造纪念碑的做法是徒劳的、靠不住的、不实际的。历史有权选择从“哪个角度”追念某个个人，——这种权利是绝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就已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辩证地取决于他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但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历史上的个人才在社会进步这座金字塔积满尘土的阶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历史不单纯是各个时代和时期的依次更迭。它也是陈列世界风云人物历史群像的无尽画廊。他们并不是全都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意义，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位置。的确，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看清他们，对他们作出评论。这一点之所以必须特别指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整整几十年中苏联的历史看上去就像深夜的大街，“不见人影”。许多历史人物、事件、事实和过程仿佛受到了古代《记忆判罪法》的惩治。但是这种沉默迟早会用呐喊、甚至怒吼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大家不能不感到欣喜的是，眼下一个不仅革新现在，而且“修复”、恢复过去的积极过程正在进行。因此，斯大林这个人物大概就成了激起社会对过去关注的思想和感情的震中。在我国历史著作中大概没有比他更充满矛盾的人物了。对他既有赞扬也有辱骂，褒贬之词多到足以评价历史上一大批活动家。

到未来“旅行”是艰难的、没有把握的。到过去“旅行”也并不轻松些。正如路·费尔巴哈中肯指出的那样，这件事总是像“心中的刺”，使人忐忑不安。我们审视过去那些依稀可见的人物形象，看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的人物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的命运，对于思考存在、时代和良心来说，是世界观方面永久的“养料”。在对斯大林研究开始时就已逐渐形成的结论之一就是：这个人的一生就像聚光点，照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极其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历史不会没有“曲折”。斯大林这样的人当上党的领袖、实际上也是人民的领袖，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曲折”、社会的丑恶现象，从而突出地说明新生的社会还不成熟。

党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作历史性选择的紧要关头失去了列宁,在这之后党进入了一个激烈内讧的时期。"列宁的近卫军"在某个阶段并不胜任,未能看出斯大林对党、对尚未巩固的民权制度来说是一个危险人物。其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越来越表现出创造的一面,而是越来越表现出惩治的一面。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如果不把暴力用作达到政治目的的主要工具,那就不成其为笔者试图为之写评传的斯大林了。暴力在实际上成了实现社会经济计划和纲领的决定性的手段之一。政治方针的这种转变早在20年代末就开始了,在党的"十七大"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转变带来的是痛苦的年代,当时全靠十月革命蕴藏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全靠党对列宁主义的坚贞不渝,才能使人民不致怀疑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断列宁开创的史无前例的改造世界的事业。因此,随着真理日益揭开历史的真相,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并不是偶然的。这里先摘引两段。

请看摘自《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祝贺斯大林70岁寿辰的颂词》(1949年)的一大段话。"你,斯大林同志,和列宁一起,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者和领袖,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年代,是你的组织和统帅的天才引导苏维埃人民及其英勇的红军战胜了祖国的一切敌人。斯大林同志,在你的直接领导下,为建立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为它们组成一个联盟国家——苏联,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的每一项改造,不论大小,你都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旺盛的精力、钢铁般的意志。有伟大的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指导和鼓舞苏联人民为繁荣我们光荣的祖国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劳动,这是我们的幸福,我国人民的幸福。斯大林同志,在你的领导下,苏联变成了伟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世世代代将赞颂苏联,赞颂你的名字——斯大林同志,赞颂使世界文明免遭法西斯暴徒摧残的救星……斯大林的名字是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普通人心目中最珍贵的名字。"[①]

再看另一种评价。尼·谢·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4日深夜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著名的扣人心弦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创造了'人民公敌'的概念。这个术语顺理成章地排除了证明某个人或

某一批人犯了思想错误这种必要性。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采用违反一切革命法制准则的最残酷的镇压手段,迫害任何一个在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上同斯大林意见不一致的人,迫害那些仅仅有图谋进行敌对活动嫌疑的人,还有那些曾有过不好名声的人。'人民公敌'这个概念本身在实际上排除了发生某种思想斗争的可能性,或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可能性,即使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性问题,而是实际问题。有罪的主要证据,实际上也是惟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承认犯了受到指控的罪行的'供词',而这是违反一切科学的法学原理的。后来的审查表明,这样的'供词'是靠对被告施行肉刑的办法逼出来的。

"这就导致对革命法制闻所未闻的破坏,结果使许多一向捍卫党所贯彻的路线而完全无辜的人遭难。"

这些实际上由同样一些人作出的结论和评价,仅仅过了几年就截然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一味地肉麻吹捧。我想,贺词的作者们搜索枯肠也找不出更多的最高级形容词能用来赞颂这位人间上帝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是着重指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给我国人民、给党、给人道主义理想造成的损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犯罪行为。而这说的是一个领导党、国家和人民30多年的人!当然,我们要立即补充一句,对所干这一切的责任问题要复杂得多。难道斯大林周围最亲密的人都没有责任吗?难道我国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在提供社会保护、使自己的公民免遭违法行为伤害这方面是称职的吗?广而言之,那些对别人的命运有过这样或那样影响的人是否把该做的都做到了?难道人人都相信,父亲、儿子、兄弟、妻子、邻居、同事会突然成了"人民公敌"吗?历史的英明在提示我们:真正问心无愧总是有希望的。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之后,社会上在评价斯大林及其他历史人物的活动方面开始省悟,可惜后来的进展放慢了,不仅如此,有人还开始采取措施,想让斯大林作为政治活动家起死回生。在真相没有大白、对伴随个人崇拜的一切缺乏哲学认识的情况下,对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不管是更早的还是更晚的时期,今天也不可能作出恰当的分析。历史不单单是治病,而且也会在难堪的坦白过程中带来痛苦。良心的裁决总是能使人心地坦荡。就在最不幸的时刻,苏联人民还是以克己忘我的精神行事的。每一代人都为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树立和保持我们的理想及希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一提起斯大林的名字,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接连的迫害,是对人性的践踏。尽管准确地说,1937年的惨剧也许是起始于1934年12月1日,谢·米·基洛夫被刺的那一天,也许是早在20年代末就初现端倪了。经斯大林同意的目无法纪的行为,犹如可怕的脓疮开始迅速成熟。不错,这一切都有过。对这一切负有罪责的人不容饶恕。但是我们也记得,就在这些年里,建起了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出现了帕帕宁、安格林娜、斯达汉诺夫、布瑟金等等这样的劳动者。正是在这些年里,苏联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达到了最高峰。因此,在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否定社会主义的实际成就和原则上的潜力,从政治的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错误的,从道德上来说是不诚实的。这一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并不是因为接受了而是由于抵制了斯大林的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在民主的条件下,这些成就会更大。当然,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或他周围一些最亲密的同事时,不应当把这些评价硬加在千百万普通人的头上,因为他们对革命理想的真理性的信念从未被任何考验动摇过。

斯大林的功绩大,还是罪行大,用这种算术方法来评价过去是不正确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任何功绩都不能说明无人性是有道理的。既然几百万人因这个人的罪过而丧命,那么还有什么"功绩"可言呢?今天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借助暴力使人民同权力异化,造成稳固的官僚制度和教条主义的共生。但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这要弄清楚权力机制变形的根源和原因。怎么会发生伟大和卑鄙"共居"、邪恶能用迷彩伪装成善良这类事?为什么许多人发生了社会的蜕变?悲剧在当时是否不可避免?我们的报刊上经常提出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这反映出我们近几年来所看到的、苏联人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文化在大大提高的过程。在不少情况下,特别是在公式化地了解本国历史的青年人中间,由于各种看法和主观主义的评价彼此截然对立,出现了思想上的惶恐,这就会产生社会虚无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藐视。满足渴望认识的要求,最好的办法是弄清真相,不管它是多么令人痛苦。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特别"可怕的是产生错觉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招致灭亡"[②]。

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分析两者在社会进步

和民权制度中的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是从哲学上、政治上评述斯大林生平的根本立场。本书将仔细审慎地分析以“遗嘱”闻名的那些无比珍贵的列宁文献。斯大林在一生中不仅记住了，列宁在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他和托洛茨基是“杰出领袖”，而且也记住了列宁对他整个复杂的禀性以及乖僻性格的特点所作的坦诚而深刻、发人深省的评价。他也不能忘怀，列宁称布哈林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仔细研究斯大林的那些讲话就可以看出，总书记不止一次地，然而又是非常小心谨慎、字斟句酌、隐晦曲折地对列宁的这些评价表示了异议。例如，他心里是要反驳列宁，于是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喜欢布哈林，但是我们更喜欢真理，更喜欢党，更喜欢共产国际。从这一句话几乎可以充分看出斯大林其人：他忠于事业（他所理解的事业），但他阴险狡猾、诡计多端。列宁的结论是“斯大林太粗暴”，总书记加以曲解，说他“只是对敌人粗暴”……我在分析斯大林现象时求教列宁，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确信，列宁的思想和过去一样仍在我们前面闪闪发光。这不仅是英明深刻的真理的特性，也是有预见性的真理的特性。

近几年来在我国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历史活动家的政治传记，如恺撒、拿破仑、丘吉尔、戴高乐、毛泽东等等永垂史册的人物的传记。甚至出版了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尽管国外出了好几十本书是写他的。国内发表的许多文学和历史作品谈到这个人活动的某些侧面和方面，正在填补这个空白。这些作品的出现，其效果犹如久旱逢甘露。毫无疑问，以后会出现历史学家写的关于斯大林以及关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等党和国家活动家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我鼓足勇气可能做到的只是为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画像勾勒出哲学的素描。我要强调：这不是传记，而是画像。这样就有可能也有权利依据大量文献和证据，不仅对斯大林内心世界的“隐秘”，而且对决定“领袖”行为的种种情况，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我确信，斯大林现象不仅仅是偶然现象。它的出现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的。

有关斯大林个人的热烈争论并未沉寂下来。有如此大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按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斯大林的生命结束并不久，还不到40年，这就是说，他的命运同现在活着的人、同他们的长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从“斯大林”时代过来的，因

为每个活着的人都被永远禁锢在他那个时代的大桡战船上了。我国历史未愈的伤口还将长久地使人感到可怕和难以解释清楚。

对斯大林的生活篇章兴趣不减的另一原因,就是想重新认识社会的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历史真实、道德理想。斯大林统治年代再次表明,教条主义思维会建起虚幻的哲学殿堂,在其中一切都必须起"永恒的"作用。其实,除了变化大概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性是危险的,它会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教条主义把一切人间欢乐推移到"明天",明天又推移到"后天"。我国社会革命性的革新首先触动的是社会意识。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成了批判和否定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两者在我们看来很大程度上都同斯大林独裁领导的年代有关。

最后,对这个站在权力金字塔之巅30多年的人物的生平一直这样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原因不止这些)。斯大林不是像列宁那样就在人们身边、人们中间,而是高居人们之上。尽管吹捧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画像、塑像和著作不计其数,但是苏联人实际上对斯大林一无所知。战后出版的传略没有作者,而只有该书扉页所说的编者:格·费·亚历山德罗夫、马·博·米丁、彼·尼·波斯别洛夫等。这本由斯大林本人审订的传记概述了一个人的英雄业绩,但是这个人自己并未参与。

不错,斯大林的一些同时代人曾尝试撰写斯大林的政治评传。1936年出版了昂利·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一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随便看书中的哪一段,哪怕是不长的一段,就可以作出判断。例如,有这样一段话:"他的历史就是对一连串重大困难的一连串胜利。从1917年起,没有哪一年他没有作出可以使任何人万世流芳的业绩。这是一位铁人。他的姓就描绘出了他的形象:斯大林——钢。"[③]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院士在1939年出版了《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他在书中正确地指出,写斯大林,就是讲述党在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斗争的全部周折。但是这本小册子的基调不仅是过分夸张,而且也有令人吃惊的对神明的亵渎。例如下面这段话就是证明:"各族的歌手在民歌中把斯大林同志比作热爱自己花园的精心的园丁,而这个花园就是人类。在我们这里最可宝贵的是人,是干部。关心人,关心干部,关心活着的人——人民珍视的正是斯大林的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同志学习。"[④]卡尔·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1934年)这本书中有一篇长

文章是写斯大林的，文中一个劲儿地赞美这个救世主。顺便提一下，拉狄克强忍屈辱为这个"领袖"歌功颂德，也未能使《群像》的作者逃脱不幸的命运。这类著作也和那些关于斯大林的虚意应酬的"回忆录"集子一样，学术价值不大。它们大多只是更加显露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培植起来的忠君媚上这类关系的丑恶性质。

人的生命像北方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它或许也像一堆篝火：小小的火花变为欢快跳动的火苗、熊熊的烈焰，然后是缓缓燃烧、微微闪光，变为暗红的木炭、冷却的灰烬……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迟早总有一死。这是在某个时候总会到来的黑夜，永久的黑夜，那就永远再也不会有白天了。这个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同样无情的。斯大林也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让后人在他死后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想起他。很遗憾，由于不无斯大林的参与及其战友们的帮助，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有许多"空白"，而且有许多地方在编年史中被歪曲了，甚至干脆从编年史中被撕掉了。这是笔者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困难。

另一个是更一般性的困难。问题在于，每个具体人的意识都是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一个巨大的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它随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我们永远弄不清楚任何一个去了另一世界的人的全部情况，但是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却是无限的。能说明斯大林的思想和考虑的，与其说是他的著作、书信、记录和决议，不如说是体现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即他的成就、业绩，使我们感到难过的是，还有他的罪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的隐秘就不那么"神秘"了，只要我们知道它们的"养料"是什么，表现形式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我们周围的这个有人类生存的、多彩的、多弦的、多灾多难的世界，是解开包括斯大林这样的人在内的任何人的意识隐秘的主要钥匙。尽管对斯大林的行为作科学分析的逻辑在说明他的某些行动时有时也会把人引进死胡同。

例如，斯大林知道列宁对布哈林态度热情。斯大林本人多年来一直同他及其家属保持私人的友好关系。布哈林帮助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斯大林不可能看不出，加在布哈林头上的罪名，譬如充当间谍、搞阴谋等等罪名，看上去就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布哈林有很高的学术修养，能做到重视论据。他一经认识

到自己那个否定强行加速社会主义发展的纲领同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的现实有些脱节(因为历史不容许我国"慢悠悠走"),他就承认必须适当加快速度。不仅承认,而且积极参加执行党的方针。但是,这并未妨碍斯大林在事实上批准除掉这位非常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亲密的党内同志……这种事怎么能说得清楚、理解得了呢?! 更准确地说,可以说得清楚,却难以理解。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在准备写这本关于斯大林的哲学和生平的概论时,不知为什么我不知不觉地对有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尤利乌斯·恺撒、奥利弗·克伦威尔、伊凡雷帝、彼得一世等人的著作发生了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领袖、独裁者、统治者以及其他专制型执政者的心理状态。尽管我懂得在这方面作任何历史类比是担风险的,也许是根本不科学的,但我还是想先发表一点看法。对拥有无限权力又不受民主监督的人来说,自以为一贯正确、自恃高明、自认为无所不能、对自己的才能估计过高是习以为常的。这些人即使生活在人们中间,通常也是极端孤独的。现已查明,斯大林极少同什么人一对一地谈话(参加谈话的通常有莫洛托夫或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尽管如此,他内心里始终是孤独的。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同自己比较,不能同任何人真正地辩论,向任何人证明,向任何人表白……一人高高在上的处境、在现实中凝成的无限权力,使他的感情枯竭,把他的智能变成了冷漠的计算机。每采取一个步骤就立即成了"历史性的"、"决定命运的"、"关键性的"步骤,从而渐渐地扼杀了一个人的人性……

他一生中都在力图(而且不无成效!)把自己的某一弱点变成有力量的标志。早在革命时期,在需要去工厂、去团队、去街头参加群众大会,总之需要到群众中去的时候,斯大林就产生一种心里不踏实和惶恐的感觉,后来他逐渐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感情。斯大林不喜欢,大概也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自如地讲话。他的讲话简单明了,但是缺乏丰富的想象力,缺乏警句名言和打动人心的演讲技巧。口音过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使他的讲话干巴巴。难怪斯大林在群众大会、在会见群众的场合、在游行示威时讲话的次数,比列宁周围的其他人都少。他比较喜欢起草命令、指示,写些文章、短评,在报上就某些政治事件发表一点评论。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作结论时一板一眼,而且总是那样绝对。在他写的报纸稿件中不是一片光明,就是一片黑暗。他不承认还有

他者。拉丁语般的明确性是他那些平铺直叙的文章引人注意的特征。

后来斯大林也习惯走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讲台了。不过那时他的地位已经不同，人们是在肃静地聆听他那声音不大、慢条斯理的讲话，而这种宁静随时都会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接着而来的全场欢呼声撕破。但那些讲话更像万能的祭司主持宗教仪式。斯大林把自己尽量避免直接同群众接触这种态度变成惯例：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不去工厂，不去集体农庄，不去各共和国，也不去前线。在金字塔尖偶尔传出“领袖”的声音。在金字塔脚下千百万人带着对神的敬畏聆听他的声音。“领袖”把自己的不爱交往和孤僻变成了偶像和超凡者的标志。要了解斯大林就必须时时注意，他是一位颠倒黑白的大师，可以用错误、缺点、罪行以及他的性格中的不祥特征冒充为成绩、成就、远见卓识、对人的经常关怀……

我的分析和结论依据的是列宁的著作、党的文件，以及许多档案馆的材料。这些档案馆是：中央党务档案馆、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苏联国防部国家档案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档案馆，以及一些博物馆的档案室等等。例如，在接触到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活动时，我在苏联国防部档案馆看了许多从未公布过的很有意思、很独特的文件。一看斯大林在军事文件上的批语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宣布过的事情的。例如，斯大林看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德·格·巴甫洛夫将军、B·E·克利莫夫斯基将军、A·T·格里戈里耶夫将军、A·A·科罗勃科夫将军一案的判决书草稿，其中指控这些人进行“反苏阴谋活动并蓄意破坏对西方面军的管理……”“领袖” 看到这里就不再看下去了，而只是甩下一句话：

“别胡说八道……”

于是有人立即划掉了“反苏阴谋活动”、“阴谋分子的目的”、“敌对活动”等字样，改写成：“表现出胆小怕事、不行使权力、指挥不当，致使对军队的管理遭到破坏……”尽管这样的指控仍然是不公正的，但在1941年7月22日还是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当时“领袖”眼看国家和他斯大林本人受到灭亡的威胁，只是不愿再“玩”“阴谋分子”的老把戏罢了。

斯大林的批示通常都是用红铅笔或蓝铅笔的，运笔洒脱，字迹清

楚。望着这些保持得很好的行行批示，不由地会思索：这个人的非理性、残忍和阴险，其深刻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也许在于他早年大量吸取的宗教教条的养料？也许在于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的才智不足？而这一点他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上听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的精彩发言时就感觉到了。也许，这种非理性的根源在于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形成的冷酷无情的性格。要知道，他在十月革命前的全部经历可以概括为7次被捕、5次逃跑。他从19岁起没有干别的，就是东藏西躲、执行党委交下的任务、一次次被捕、改名换姓、弄假身份证、经常改换住地……在监狱关押不久就逃跑，再次躲藏起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出国。

《真理报》30多年的材料、《布尔什维克》、《政治工作者》及其他期刊（其中有许多只是在20年代出版）的材料，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大家知道，国外有许多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一部分著作，例如朱泽贝·博夫、路易·阿拉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基本上是从接近客观的立场写的。还有几十种新版和再版的书性质就不同了，其目的是"借助斯大林"来诋毁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斯大林自己未必理解这一点，但他自己的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实践活动却比伊萨克·多伊彻、罗伯特·泰克、莱奥纳德·沙皮罗、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苏联问题专家的著作危险得多。会晤过斯大林的外国国务活动家——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佐证，以及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侨居国外期间出版的有些小册子，也都引起我一定的兴趣。

我阅读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政治思想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著作。他们都曾经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他们中谁也不认为自己是斯大林"提拔"的，接任他们的职位的一批新的活动家，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等人，后来并不隐讳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是按照古代独裁者的法则行事的：自己提拔的人比较忠诚，而且不会觊觎最高领导的角色。

20年代初，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党内的知名度比斯大林高。例如，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间的名气简直无法相比。就

是这个托洛茨基，他作为十月革命公认的领袖之一、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作为知名的理论家（到1927年已经出版他的文集21卷！）载入了史册。这个果敢的政治家并无多少文学才华，他在写自己的著作时常常在历史的镜子面前炫耀自己，试图证明他谋求党的领袖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也许，他更爱革命中的自己，而不是革命本身。我看了他的几卷通信集很感吃惊：托洛茨基早在国内战争年代就在关心应该给历史留下哪些关于他的记载。吹捧托洛茨基的信件、他在无数次讲话时接到的字条、他接见过的外交官名单、报刊上对他的行踪和活动的反映——这一切都细心地装订成册，保存了下来。托洛茨基深信——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列宁死后党的领袖地位会转让给他。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直接或间接批评得最多的对象。不错，他主要的反斯大林的著作是在被驱逐出苏联之后写的。托洛茨基有一句著名的评语，说斯大林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同时，托洛茨基几乎毫不隐讳地自命为智力超群的天才（这里使我想起墨索里尼的一句“永垂”史册的话：“说来也怪，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比我聪明的人！”），他经常使用这类说法，竭力贬低自己的对手。例如，他说1924年那时的季诺维也夫是“惹人讨厌的庸才”，称王德威尔得*是“出色的庸才”，策列铁里**是“有天分又诚实的庸才”，如此等等。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以后，他只留下了一种永恒的极深的癖好，那就是憎恨斯大林，直到他生命结束。这一点在他未写完的最后一本著作《斯大林评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错，托洛茨基曾一口咬定，说个人动机在这本书中不起作用。“我们

* 埃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右派社会党人，第二国际领袖之一。

** 伊·格·策列铁里（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

楚。望着这些保持得很好的行行批示，不由地会思索：这个人的非理性、残忍和阴险，其深刻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也许在于他早年大量吸取的宗教教条的养料？也许在于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的才智不足？而这一点他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上听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的精彩发言时就感觉到了。也许，这种非理性的根源在于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形成的冷酷无情的性格。要知道，他在十月革命前的全部经历可以概括为7次被捕、5次逃跑。他从19岁起没有干别的，就是东藏西躲、执行党委交下的任务、一次次被捕、改名换姓、弄假身份证、经常改换住地……在监狱关押不久就逃跑，再次躲藏起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出国。

《真理报》30多年的材料、《布尔什维克》、《政治工作者》及其他期刊(其中有许多只是在20年代出版)的材料，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大家知道，国外有许多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一部分著作，例如朱泽贝·博夫、路易·阿拉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基本上是从接近客观的立场写的。还有几十种新版和再版的书性质就不同了，其目的是"借助斯大林"来诋毁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斯大林自己未必理解这一点，但他自己的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实践活动却比伊萨克·多伊彻、罗伯特·泰克、莱奥纳德·沙皮罗、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苏联问题专家的著作危险得多。会晤过斯大林的外国国务活动家——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佐证，以及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侨居国外期间出版的有些小册子，也都引起我一定的兴趣。

我阅读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政治思想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著作。他们都曾经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他们中谁也不认为自己是斯大林"提拔"的，接任他们的职位的一批新的活动家，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等人，后来并不隐讳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是按照古代独裁者的法则行事的：自己提拔的人比较忠诚，而且不会觊觎最高领导的角色。

20年代初，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党内的知名度比斯大林高。例如，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间的名气简直无法相比。就

合唱中的个别的声音也是重要的。依靠他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历史的回顾,听到早已作古者的声音,了解各种强烈欲望的斗争的动机……

历史的余音……萦绕在我们中间,萦绕在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记忆之中,有时就在从已经过去、已经熄灭、已经隐没的事情中获得的一点点新资料之中。这是来自过去的信息,而过去是不愿永远被埋没、永远消失在遥远的无边无际之中的。也许,甚至可以说这是并未结束的过去。换句话说,这是暂时还没有得到确凿完满答案的一个时代的现实,一个时代的现象。并未结束的过去既可用于某一个人,也可用于还没有彻底了解自己的胜利和悲剧的真正历史的全体人民。

我给本书起了这样的书名,意在说明在**历史上一个人的胜利如何变成了全体人民的悲剧**。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作报告时对重点的强调很独特。他指出:"我们不能说他的行为是精神失常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悲剧之所在!"我认为这样强调并不完全准确。赫鲁晓夫的这种评价是在为斯大林开脱。"领袖"在世上最喜欢的是个人权力。为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才采取骇人听闻的镇压手段,但是他**没有看出**这是一场悲剧。

斯大林很快就习惯于把暴力当作无限权力不可或缺的标志。更可能的是,他在30年代末开足马力的镇压机器不仅夺走了下层工作人员的想象力,而且也夺走了他本人的想象力,而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测。很可能,逐渐把暴力当作万能手段的演变过程经历了若干阶段。起先是同真正的敌人作斗争,而这样的敌人显然是存在的;然后是消灭个人的对手;再往后则是暴力的可怕惯性力在发生作用;最后,暴力开始被视为忠于领袖和保持正统的标志。来自国外的威胁和阴影造成了被"无形包围"的气氛。这种独特的社会意识状态在1937年达到了顶点,它是强力高于法律、真正的民权制度被对强力的崇拜所偷换的直接结果。

斯大林把社会看作一座住人的玻璃大厦,人人都受他的主宰……揭发"破坏活动"、患间谍恐怖症、同"两面派"这架风车搏斗,成了保持正统、盲目信仰和忠于领袖的可耻标记。举例来说,难道能设想在列宁死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1924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三大所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竟有6人(除斯大林本人外的全体委员!)都

早就分道扬镳了，而且走得很远，因此在我的眼里，他不过是对我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历史势力的工具，以致我个人对他的感情同我对希特勒或日本天皇的感情没有多大区别。至于个人怨恨，那早已烧成灰烬了。”[5]不管怎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托洛茨基那样，针对斯大林写了那么多尖酸刻薄、讽刺挖苦、肆意侮辱的话。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做了那么多揭露斯大林的事情。

斯大林自然也以同样的憎恨来回报托洛茨基，这在国内战争保卫察里津战斗期间两人的交锋中就初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1924年1月24日这个不幸的日子降临时，斯大林给南方发去一份电报，内容如下：“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去世。死亡系呼吸器官麻痹所致。葬礼于1月26日星期六举行。**斯大林**。”[6]斯大林在签署这份电报时大概在想，正是现在他面临着一场同托洛茨基争夺领袖地位的残酷无情的斗争。但是斯大林是否知道，他并没有料想到，即使击败了托洛茨基，他同托洛茨基的瓜葛也不会就此“了结”？正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作风、采用暴力、“拧紧螺丝钉”等方法将成为斯大林手中的武器。后来的悲剧的根源之一不正是在这里吗？托洛茨基在1940年8月被刺以前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在总书记的画像上留下了鲜明的笔触。为了更深地了解斯大林的内心世界，我研究了这两个前“杰出领袖”斗争中的各次冲突，因为总书记始终认为托洛茨基是他个人的主要敌人。

我得到了许多会见过斯大林或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各种事件漩涡的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事件都是由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的决定引起的。

我同许多人谈过话，其中有一些斯大林周围的人，有过去联共(布)中央、若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有知名的苏联军事首长、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有在不同环境下同总书记偶然相逢的人，有因“领袖”的决定或行为而使生活往往发生最悲惨变化的人。所有这些谈话给了我很多帮助。在《文学报》和《真理报》发表了我写的几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以后，我收到了将近3000封来信，许多来信人命运多舛，遭遇往往极为悲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一些档案馆工作，收集关于斯大林生平的文献。我会见过许多人，只要对弄清新事实、传记新资料能有所帮助的人，我都去寻访。即使是历史大

考虑到这些功勋卓著的人写见证的时代背景，当时关于斯大林的许多情况还不知道，在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不久，对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事实上已不许作充分的和坦率的分析。军人们，特别是高层指挥人员，亲身饱尝了斯大林无情的和不公正的铁腕的滋味。但是，除亚·瓦·戈尔巴托夫和还有几个军事首长在书中“得以”写出自己的遭遇外，其他人却没有机会充分讲出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关于斯大林进行的镇压以及他的错误和失策问题事实上成了禁区。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随着战争的爆发，斯大林迫不得已收敛了在国内的暴力行为。这些统帅和军事首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涉及的主要是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活动，而斯大林在争取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是能表现出政治毅力的。看来，许多军人只从正面揭示斯大林的面目，原因就在这里。至于无视法纪造成的个人遭遇的许多不幸，似乎都留在“画面之外”了。要知道，在战争前夕遭到清洗血腥镇压的好几万军人除了极少的例外都已牺牲，不可能给后人留下任何话。今天我们知道，战争初期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对许多军人采取残酷的惩治手段，企图把重大失利的责任转嫁给他们。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过去，对苏联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的长期忍耐精神会不禁感到奇怪、感到惊讶、感到诧异。这种神圣的耐心，根源在哪里？是在于金帐汗国残酷无情的骑上长达250年的统治？是在于争取本国独立和自由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是在于世世代代都必须同严寒和广袤无垠的原野作斗争？也许是这样。不过我认为，长期忍耐的精神反映了历

金帐汗国

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建立的封建国家。因汗国统治者的帐顶为金色，故名。亦称钦察汗国。为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汗(1235-1255年在位)创建。

该汗国是个军事和行政联合体，缺乏内在的经济联系。封建国家向被征服的各族农民、牧民和手工业者征收繁重的租税和差役。土地和牲畜大多为蒙古贵族占有。乌兹别克汗统治时期(1313-1342)国势最盛。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贵族力量的增强和战争的频繁，中央政权日益削弱。各族人民反抗蒙古统治的斗争，动摇了汗国的基础。1380年，在库利科夫战役中罗斯联军取得胜利，使金帐汗国更加衰败。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因内讧解体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木汗国、西伯利亚汗国。1480年俄罗斯人民摆脱蒙古贵族统治后获得独立，15世纪末，统一的金帐汗国已不复存在。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于16世纪下半叶被俄国吞并。

史经验的英明、对自己的正义的信念、对历史传统的忠贞。而主要的是对1917年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坚信不移。但是,对一个治理过国家的人大唱近乎宗教仪式上的赞美诗,就不能不贬低人民,尽管人民懂得这一点较晚。选录了集体通过的给斯大林的那些歌功颂德、充满荒唐溢美之词的贺词及贺信的"纪念集",可算是贬低人民的绝妙见证。该集子中用了这样一些词:"慈父"、"太阳"、"英明领袖"、"不朽的天才"、"伟大的舵手"、"百折不挠的统帅"……官僚脑袋在发明形容词方面很灵,却不顾这些形容词是对人民尊严的公然侮辱。

说来非常轻松,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中世纪"。但我深信,如果列宁死后没有形成民权制度的空缺,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本来可以避免由于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的过错在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出现的那些严重的弊病。悲剧不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今天谈论可能有的选择,比起在离今已经很遥远的年代作出选择要简单多了。分析各种情况比较容易。要对付这些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让·饶勒斯说过:"历史学家总是有权提出与过去的命运不同的假设。他有权说'这是人们的错误,这是党的错误',并且有权设想,如果没有这些错误,事态就会是另一种样子。"[8]历史上可能的不同选择确实有过。

从现在的高度来设想,在连反对派也敬仰的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有领导党的现实可能性。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果党由托洛茨基来掌舵,那么党很可能会同样受到严峻的考验,因为托洛茨基就是社会暴力的鼓吹者。何况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明确而科学的纲领。而布哈林有这样的纲领,有自己对全党目标的设想。布哈林作为个人非常受人欢迎,有很高的才智,待人温和,有人情味。但是他在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加速增长经济实力的历史必要性。而当时在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本来就存在着要让苏联生存不下去的现实威胁,帝国主义一分一秒也没有放弃消灭苏维埃的念头。不过布哈林反对的是斯大林那种加速的方法。

当时当然还有鲁祖塔克、伏龙芝、李可夫……在列宁逝世以后,在30年代初之前,斯大林在革命领袖们中间享有一种名声:他是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针最刚强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至于他对这一方针如何理解,那是另一回事。是的,斯大林并不具备接替列宁的条件。但当时谁也不具备这种条件。斯大林当然没有列宁那种天

才的精神力量、普列汉诺夫那种理论造诣、卢那察尔斯基那种文化素养。在才智和道德方面，斯大林不如许多革命领袖，也可能不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但是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时候，斯大林执著追求的精神、他的政治坚定性、他的阴险狡诈起了很大作用。用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话来说，他“虽然有自己的种种缺点”，但是他也有别人所没有的某种长处。斯大林能够尽量利用党的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看出这个机构是理想的权力工具。而当时远非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知道列宁针对斯大林所发出的警告。

在党的“十三大”代表知道了列宁的评价以后，斯大林把自己不良的个人品质暂时“封锁起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内大多数人对他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领袖的机会就不多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许多人起初完全低估了斯大林，低估了他的奸诈狡猾、执著追求和阴险毒辣。当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尽管如此，斯大林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非常娴熟地扮演了多种角色：谦逊的领导人、捍卫党的理想的纯洁性的战士，后来又是“领袖”、“人民的慈父”、伟大的统帅、伟大的理论家、艺术鉴赏家、有先见之明的伟人。但是斯大林特别卖力的是扮演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的角色。这一切逐渐使斯大林在人民中间、在党内有了名望。

但是问题归根到底不在于个人，而首先在于列宁开始建立的民主的潜力未能保持下来。事过几十年之后，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在历史倒转的情况下有可能被选中代替斯大林的人。而最有可能、最有效的选择应该是选择**一批列宁主义者**，即有责任按列宁的旨意办事的党的领导核心。但是“列宁的近卫军”的集体思想和集体意志却表现出莫名其妙的迷惘和缺乏远见。如果当时建立了民主的、社会保护的“安全装置”，特别是真正的集体领导这类制度，那么领袖是否杰出的问题就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例如，如果党章规定并在实际上坚持总书记及其他选举产生的人员任职的明确期限，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是可以避免的。不然，国家的命运就过分地依赖于由谁当权这种历史选择了。

斯大林为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做了不少事情(但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设想的完全不同)，表面上并没有“转向”任何反对派，但是他经不住权力的考验，并且在事实上背离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这里用得上普卢塔克的一句话，他说：“命运用重大的事迹抬高

卑鄙的小人,也就是在揭露他的渺小……"[9]这一点也反映在常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现象中。这个概念是否合适可以争论,但绝对无法回避--个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个概念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民权制度的民主原则发生了变形,而没有这些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就不仅失去了它的效率,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在我看来,斯大林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遭到歪曲的同义词。这种歪曲的主要表现是:劳动者同权力异化;培植了各种各样的官僚;在社会意识中树立了教条主义的刻板公式。民权制度被偷换成个人专权,结果就出现了特殊类型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最终造成人们对社会的冷漠,缩小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实意义,扼杀运动的活力。斯大林巨大的、却是令人痛苦的阴影落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要彻底摆脱官僚制度和教条主义的"日食"决不是简单的事情。

从斯大林对全人类的道德价值观的态度来看,斯大林个人在人民的丰功伟绩的衬映下显得特别"渺小"。斯大林不仅是对政治对手残酷无情。在他看来,凡是与他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都是机会主义的。谁不同他站在一起,谁就只能被看作敌人。斯大林的责任观念,一种被认为是绝对尽职表现的责任观念,始终压倒了人权观念。期待历史的警报或预见本身来提醒党注意即将到来的危险,这是没有用的。这是相应的机关、首先是斯大林周围那一班人本来应该做到的。

但是很可惜!这一点没有做到。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培植的官僚制度的赘瘤比民主的价值观发展得快。斯大林的主要创造是他造就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阶层,即贯彻他的方法、行动步骤和意图的主要支柱。只要官僚据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还起作用(或还将起作用!),无论过去或将来都会有斯大林及其"强硬手腕"的崇拜者。斯大林不仅仅是历史。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方式,是确定哪种价值观优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价值观的一种方法。当然,今天把一切罪孽、错误和缺点归咎于斯大林及其遗毒,那是很简单的。这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如果回想一下,那就可以知道,社会的主要病症——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屈从权势——是在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年代"落下"的。

能留名后世的人不多。斯大林是其中之一。关于他在我国历史上

的作用的争论在长时期内还不会沉寂，伴随这些争论的会有许多形容词，既有表示憎恶的，也有表示敬仰的；既有表示痛心的，也有表示永远困惑不解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从斯大林的命运中再次看到，归根到底伟大思想的权力大于人的权力。不管这些人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巨擘。即使是法老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他们的木乃伊正是"永恒者"彻底失败的见证。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时间有时在悄悄流逝，有时在战争和革命的炮火声中，有时在滔滔不绝的讲话和接连的社会抽搐中流逝。为杰出人物、英雄、文明先驱建造的最雄伟的纪念碑，在时间长河水流的冲刷下，也会被侵蚀以至冲垮。哲学的纪念碑、文化的"碑碣"却要牢固得多。《伊利昂记》、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康德的格言集、《伊戈尔远征记》是巍然不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表达得最充分的社会公正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就属于永不过时的价值观之列。斯大林滥用权力造成的一幕幕惨剧没有能使社会主义理想完全失去吸引力。

撰写斯大林评传的尝试不单纯是回到并不遥远的过去作一次游览。我们不能忘记，本书探讨的那些历史过程，从时间上说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仍在影响着而且会长久地影响着现在和将来。而这种影响往往比有些人估计的要大得多。我在写这本评传时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讲述这个人的真实情况。

人们的裁决可能变幻无常。历史的裁决是永恒的。



第1章

十月的火光

只有讲良心的地方，才会有革命。

——让·饶勒斯

（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到

1917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朱加施维里)37岁。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库列伊卡村这个紧靠北极圈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有充分的时间和精神食粮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1905年12月,在塔墨尔福斯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会上争论得很热烈,休息时却有说有笑……这一点使斯大林一直感到惊奇。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举行的两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斯大林第一次开始学习政治斗争艺术,学习寻求妥协艺术,学习如何做到在原则上不作让步……

他出国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在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名状的烦人的沉重感。他在机智的交谈者中间常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多余的人。斯大林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那样快速敏捷地与人交锋。只要跟这些人呆在一起,这位高加索人就老有一种内心受到刺痛和精神上受到伤害的感觉。从那时起,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倾向:老是厌恶侨民、异国情趣和知识分子,厌恶下等咖啡馆里无休止的争论、蹩脚旅馆里烟雾腾腾的小房间、关于各种哲学学派和经济学说的高谈阔论……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整个经历,可以概括为7次被捕和5次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逃跑。但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未来的"领袖"不喜欢当众提起。他后来从不讲述为给党筹集经费自己怎样参加武装抢劫,从不讲述在巴库期间自己怎样一度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同孟什维克联合",从不讲述自己最初几次不高明的写作尝试。有一次,那是在暴风雪



年轻时期的斯大林

摇撼着小木屋的时候，斯大林回忆起了早期写的他很喜爱并得以在《伊维利亚报》*上发表的一首诗。当时这位宗教中学学生十六七岁。这首描写他的山乡的诗勾起了他强烈的思念，使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希望。斯大林有非凡的记忆力，他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当皎洁的月光
蓦然洒向大地，
淡淡的清辉投到
那遥远的天际；
当苍翠的树丛里
夜莺在呖呖啭啼，
悠扬的萨拉穆里**
袅袅余音回肠荡气；
当安静片刻之后，
山泉重又叮咚而去，
长夜里微风徐徐，
把黑树林骤然惊起；
当逃亡者在敌人追逐下
重返多难的故地，
当沉沉黑夜过去，
重又见到阳光熹微；——
愁云这时终于消散，
敞开了抑郁的心扉，
强烈的希望再一次
在我的心中燃起，
诗人心情激动万分；
诗人心潮澎湃不已，
因为我知道，这希望
是多么纯洁，多么美好！

*格鲁吉亚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文艺和政治性报纸，1877—1906年在梯弗里斯出版。
——译者



少年时代的斯大林

**萨拉穆里是一种芦笛。

格鲁吉亚是希腊神话中发现金羊毛的宝地，曾先后被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占领。1801年由俄罗斯人统治。1922年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它境内总面积的40%为森林所覆盖。地形主要有山顶积雪的群山、河流以及山谷。



位于格鲁吉亚哥里城的斯大林的出生地

当他自己也意想不到地像念祈祷文一样轻声念着他少年时代的诗篇时，简陋小屋的女主人通过开着的门朝忧郁的房客惊奇地望了两眼。房客坐在摇曳的烛光下，面前摊着一本书，两眼望着结了一层冰的望不出去的窗户。还在非常年少的时候，斯大林已不仅完全扔掉了自己那些幼稚的诗篇，而且完全扔掉了许多被知识分子称为温情主义的东西。即使对母亲，斯大林也极少写信。严酷的童年，地下工作者的生涯——不停地逃跑，使他变得冷酷、无情和多疑。

斯大林善于排解使他不宁的思绪和回忆。但是在他妻子卡托已经死去差不多10年之后，一个因受伤寒折磨而面孔变得难看的女人的形象却总在他眼前时隐时现……他回忆起了1906年6月宗教中学同班同学赫利斯托福尔·特欣沃列利怎样在圣大卫教堂里给他们举行秘密婚礼。卡托(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曾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每当丈夫回到家，她总是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钟情地、一往情深地望着他。丈夫时而回家，时而又出走很长时间。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短暂的。无情的伤寒从斯大林身边夺走了可能是他真正爱过的惟一的人。在一张举行葬礼的照片上，头发蓬松、身材不高、面容清瘦的斯大林伫立在灵柩前面，悲痛欲绝。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卡托(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童年时代就已播下的冷酷和无情的种子，后来根子扎得愈来愈深。地下活动把他锻炼得非常倔强。从19岁起他就专门从事地下活动：经常东藏西躲，执行党委交下的任务，一次次被捕，改变住址和姓名，弄假身份证。在牢里关押不久又越狱逃跑，重新躲藏起来。

现实生活教会了斯大林许多东西，而且不是最后才教会他使用权谋和心计，教会他等待时机的本领。还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得很明显的孤僻和冷酷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残酷无情的性格。但是后



1907 年，悲痛欲绝的斯大林(右一)在亡妻叶·斯瓦尼泽的葬礼上

来，斯大林学会了装成一个神态安详，甚至让人感到和蔼可亲、带着一副诚挚眼神的人。

为什么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成了革命者？也许是因为早年在哥里城宗教小学和梯弗里斯城宗教中学上学时接触了一点精神食粮？谁知道会不会是这位宗教中学学生无意中看了卢梭、尼采和洛克的大作，开始思考为什么他那当鞋匠的父亲总是给穷人补鞋？要不就是对神学的禁锢不满使他结识了一些有造反性格的人？或许是偶然落到他手上的、已经翻烂了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入门》使他更清楚地认识了世界？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据实回答。但是当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他不是稀里糊涂但却义无返顾地弃教从俗，离经叛道，那么格鲁吉亚的一个村庄就会得到一位年轻的个子不高的东正教神甫，一位教会牧师。那时他就会同整个世界隔绝而永远过着单调的生活，这不仅因为四周有巍峨的群山，而且因为他只能为贫穷的教民和一大群自己的孩子庸庸碌碌地操劳，只能沉溺于对喧嚣的梯弗里斯的向往。这位贫民的儿子能否知道，由于命运的摆布和情况的巧合，他在一个历史阶段对一个伟大民族所起的作用要比一个教会牧师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呢？

正面和侧面

十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那不高的个子已经投下了引人注目的身影。这身影逐渐地生长，30年代时长得又高又大，到了晚年已成为巨人。

1917年以前谁能预料到，这位不起眼的地下工作者在1922年后会风驰电掣般地登上权力的顶峰？在列宁的战友们排得又紧又密的队伍中，斯大林就像是在拨开众人，很快从后面挤出来，走进了领头一班人的行列，后来又成了这一班人的带头人。人们尤其不可能想到，在列宁去世以后，这一班人，这个由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领导核心，会迅速由大化小。斯大林的地位越高，在他旁边，曾经跟列宁一起点燃革命火炬的人，也就剩得越少。

在革命以前，警察局的各个分局大概对此人都比较熟悉。宪兵局每次跟朱加施维里打交道，都要认真地给他照正面像和侧面像。例如，巴库省宪兵局的案卷中就有这位孱弱的没有刮脸的年轻人用这两种



革命前，斯大林作为"国事犯"在宪兵局的留档照片

姿势照的像。而这位年轻人20年后却成了列宁党的总书记。

宪兵队看守犯人的本事不大,但描写“国事犯”的模样却非常在行。一些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作了如下的介绍:朱加施维里“面容清瘦”,头发“又浓又黑”,“没有络腮胡子,有稀疏的小胡子”,“麻脸,有瘢痕”,头形“长圆”,前额“直而狭”,眉呈“弓形”,眼睛“塌陷,褐黄色”,鼻梁“直”,身高“2俄尺4俄寸半”,身材“中等”,下巴“尖形”,说话声音“轻”,“左耳有颗痣”,上肢——“其中之一即左臂干瘦”,左脚“第二和第三趾是连趾”,此外还有一二十种其他的特征。当朱加施维里-斯大林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他手下那些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也不会注意得这样细。须知,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哪一个政治犯能像斯大林那样五次逃跑成功。对于后来确定他(斯大林)的那些为数众多、成千上万潜在的敌人的命运来说,“人民公敌”哪只耳朵有痣以及身高几俄尺几俄寸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那时候的标准和比例尺已经不一样了。

我想,读者更感兴趣的,还不是未来的“领袖”在身体上和外形上可以从正面和侧面加以审视的特征,而是他到17岁时就具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气质。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斯大林并不是从小就是“坏蛋”,像现在有些人有时认为的那样。但是应当追述一下他的童年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成熟的斯大林的性格。

关于朱加施维里的童年时代,人们知之甚少。斯大林本人不喜欢提到这个时期。他的童年是郁郁寡欢的。叶卡捷琳娜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贫苦农民,后来是哥里的平民,生活极其困苦。三个儿子当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只剩下了索索(约瑟夫)。但是他在五岁左右也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所以宪兵队后来在“特征”一栏里每次都写着:“麻脸,有瘢



斯大林和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

痕。"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И·伊列马施维里认识朱加施维里一家。据他所写，斯大林的父亲，一个修鞋匠，喝酒喝得很厉害。母亲和索索常遭毒打。喝醉酒的父亲在睡觉之前，对这个显然不喜欢父亲的任性的孩子老想打耳光。还在当时，索索就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跟喝醉酒的父亲照面。平白无故地挨打使孩子变得更倔强了。母亲则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儿子身上。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和花了很大力量，才安排儿子上了宗教小学，后来又上了宗教中学。家庭长期不和。很快，母亲就和父亲彻底分手了。父亲迁到梯弗里斯，无声无息地死在一个小客栈里，由公家安葬了。

约·朱加施维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永远离开了故居。据查，从1903年起，他一共见过母亲四五次。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第一次去莫斯科儿子那里正是斯大林当上总书记那一年。斯大林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是1935年。儿子是否想过，正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妇女一心想把他"推"出贫困，才使他有了可以利用的第一次机会呢？斯大林的母亲活到了很高的年龄，这次见面过了两年，直到悲惨的1937年的7月，才悄然死去。



操劳一生的斯大林的母亲于1937年7月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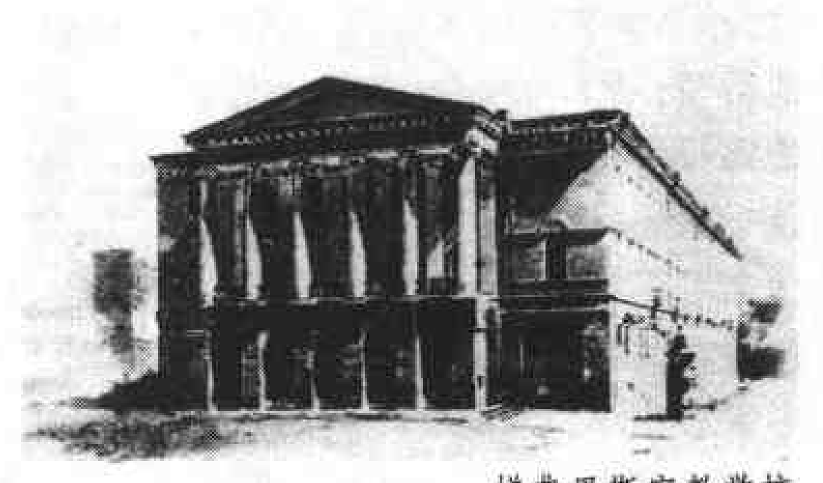
1931年12月，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同斯大林谈话时问道："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也许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吧？"

"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①

我们所知道的约·朱加施维里早年的全部情况使我们有根据推测，"领袖"对德国作家所说的关于父母的那些话只适用于他的母亲。路德维希当初写过墨索里尼、威廉皇帝和马萨里克的传略，他企图借助一小时的谈话深入这位"神秘的苏联独裁者"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他未见得能办到。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谈自己早年的情况。

在透过精神上的"正面和侧面"审视斯大林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学校学习时，这个孩子表现出天分很高，记忆力非凡。索索掌握

经文比别人快。新旧约全书起初曾激起这位宗教中学学生真正的兴趣。他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长时间学习神学这部教条和道德原则的总汇，


梯弗里斯宗教学校

很快就使朱加施维里厌烦了。当时，在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的意识中，竟形成了一些对他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特点，而这是他本人也没有觉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学校学习总共有10年出头的时间)。除去10年宗教学校的生活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呆了10年。遭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处境，强化了年轻的革命者虽不外露但却极为坚定的倔强性格，加剧了他对命运的不满。先被接受后被摒弃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会遗弃者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这一切无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迹。在宗教中学的独居小屋和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的成长过程中的头15年，归根到底不能不影响到这位职业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维方式上，上述影响在几个特点上都有所表现。

*柯巴是格鲁吉亚作家阿·卡兹别吉描写山区农民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中篇小说《弑父者》中的主人公。

特点之一是对任何知识都想加以整理分类，把它们分成许多智力“小格子”，这也正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教义问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照例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这样的人头脑“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同不

能认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关。朱加施维里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纳不了的东西，索索都视为异端邪说，后来又视为机会主义。但是，既然他对自己信奉的理论上的种种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怀疑，他也就不认为需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和意愿。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背离过（按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虽然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对理想和有价值的东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于次要地位，那还会是好事吗？宗教食粮和社会地位促使朱加施维里养成了一种虽不外露但却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夸大自"我"在编织周围世界中的作用的习性。


还叫朱加施维里时的斯大林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库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对柯巴说："你有坚强的意志。"赞语给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维里决定用革命的笔名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固定下来，于是给自己挑选了"钢铁"那样的姓氏。从1912年起，朱加施维里就已经在写文章时署名"斯大林"*。不过，不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坚定性表示出来。例如，远不具有朱加施维里那样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罗森费尔德也决定用"加米涅夫"**这一笔名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后来历史表明，"石头"碰不过"钢铁"。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无懈可击、自己作为地区领袖的地位。坚持信念（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坚实基础），这在斯大林身上是

* 俄语"斯大林"一词由"钢铁"一词变来。
——译者

* * 俄语"加米涅夫"一词由"石头"一词变来。
——译者

一贯的。

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30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诸如此类的内容。

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明显。

斯大林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他一生对之都很亲热的朋友。政治上算计，感情上淡漠，道德上无同情心，这些使他不可能获得朋友和把朋友关系保持下去。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记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的“同学”。有事实为证。

战争期间，有一次斯大林无意中看见他的助手A·H·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保险柜里有好多钱。

“这是什么钱？”斯大林不解地问，同时带着怀疑的口气，眼睛不看那一叠叠纸币，而是盯着自己的助手。

“这是您当代表的钱，是好多年积攒下来的。只是给您交党费时才用它。”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斯大林不作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吩咐给彼得·科帕纳泽、格里戈里·格卢尔吉泽和米哈伊尔·泽拉泽三人寄了很大一笔钱。斯大林在一张纸上亲笔写道：

1.给我的朋友彼嘉40000卢布，

2.给格里沙30000卢布，

3.给泽拉泽30000卢布。

索索

1944年5月9日

同一天，斯大林还用格鲁吉亚文匆匆写了一封短信：

格里沙：

请收下我一点微薄的馈赠。

你的索索

1944年5月9日[2]

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些类似的便函。在60多岁的时候，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仁爱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起的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学习时的朋友。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



斯大林（后排中）9岁时与在宗教小学学习的同学合影

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

B·Γ·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1947年1月16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6000卢布。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

祝您身体健康。

约·斯大林[3]

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

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1901至1917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



1903年在狱中服刑的斯大林（后排中）


斯大林在 1911 年

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1907年11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1914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4]。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对"什么是民族"作了这样的解释："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

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

(1913年1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写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1908年和1910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6]。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7]“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

甚至个别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报告。例如1948年6月30日,内务部长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汇报:

苏联内务部报告：今年6月23日，苏联内务部北方铁路工程局附属鄂毕河劳改营有一批犯人共33人解除了看守他们的两个士兵的武装，抢了两支冲锋枪和40发子弹，然后沿鄂毕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

截至6月29日，逃犯已有4人被击毙，12人被抓获，其余的人在追捕中……

C·克鲁格洛夫[8]

斯大林命令有关负责人员前往出事地点，设法把其余的逃犯抓回来，要求在“行动”结束后必须向他报告。他的惩罚机关是沙皇宪兵局根本无法比拟的。

未来的“领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报纸时，不能不感到即将发生重大事变。但当世界大厮杀爆发的时候，这位移民流放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后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人们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经不想从流放地逃跑了（虽然起初有过这种打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期间他在地下状态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他不愿意在动员期间被征召入伍。实际上，当1917年2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会想让他入“伍”的时候，发现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干瘦，一只脚有缺陷），认为他根本不适于服兵役。

这四年流放期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的暗流在社会的河床里逐渐上涨，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不满，斯大林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已经到了这份年纪的他，对自己在20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无成感到了绝望？或者，斯大林预感到他很快即将进入生活和斗争中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专制制度能够推翻的想法？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知道。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斯大林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讲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时间消极无为，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党中央委员的样子。在流放地，斯潘达良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实际领袖，流放者都集结在他们两人周围。斯大林孤独自处，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斯潘达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苏连·斯潘达良命运不佳，没能看到革命的火光：1916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长时间情绪消沉的时期，是他作出个人抉择的时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期。他那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儿子该长高了，而他暂时还没有给过他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任何东西。母亲的情况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40，而个人前途还很渺茫。斯大林没有任何专长，他什么也不会干，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活。顺便说一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30年的这个人不曾有过任何职业，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点神甫这种职业的话。如果说，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毕业于实科中学，大学没有毕业的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是某机构一个勤恳工作的事务秘书，而卡冈诺维奇是一个手艺不坏的鞋匠，那么斯大林连他父亲当的鞋匠也不是。警察当局在调查表中"会不会手艺(职业)"这一栏里给他划上一道杠，要不就填"办事员"。斯大林本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职业种类和社会出身的问题都感到为难。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调查表上(他以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对"属于何种社会集团(工人、农民、职员)？"这个问题，斯大林就不敢具体回答，而把这一栏空起来⑨。

未来的总书记虽是职业革命者，对工人、农民和职员生活的了解还不如一个流放犯或囚犯。可能，这在当时的活动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他个人一直也没有改变的一个特点：斯大林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似乎了解得很多，但都是……道听途说，很肤浅。诚然，总有一天，他会"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图鲁汉斯克时期长时间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对他的很长一段生活进行"反思"。一切情况表明，斯大林要脱离革命道路已经晚了。关于彼得格勒反战情绪高涨和革命运动出现新高潮的消息使斯大林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位移民流放者恢复了往日的"战斗"姿态。

诚然，关于斯大林这一段经历也有另一种证明材料。例如，老布尔什维克维拉·施韦泽1939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断言，斯大林从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就表现积极，当时就专门发了一封信谴责"护国主义"。据该书作者说，斯大林很快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但是这封信不仅没有保存下来，而且在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受苦受难的人们当中谁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和听说过。维拉·施韦泽曾如实地描写过流放者的生活，她在进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时期这样介绍斯大林未必是出于自愿。例如，她

写道:"列宁的提纲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注)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还在当时,斯大林跟同志们谈话时就曾告诫说加米涅夫不可信赖,说他"会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罗莎·卢森堡的一部著作译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终在"紧张地工作","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20]。这种证明材料的吹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但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客观介绍斯大林的著述,这是勿庸置疑的。

翻阅一下档案材料,分析一下当时呆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后,那里能凑"一大帮",其中有戈洛晓金、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良、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和证明材料,你就会得出结论:十月革命前夕的四年是斯大林一生中最没有作为的时期。极地的狂风和西伯利亚的严寒,好像把斯大林身上支配社会活动积极性的智力神经冻结在雪原上了。设想一下一个一头乱发、长期睡硬板床、在无休无止的暴风雪发出的怒吼声中想着自己什么事情的人,几年以后竟会领导一个泱泱大国的强大的党,好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斯大林期待着,记下一个个重大事件,考虑着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回忆风云变幻的往事时,谁知道他脑海里会闪过哪些镜头呢:塔墨尔福斯,巴统监狱,沃洛格达,阿利卢耶夫的住宅,抑或是那么多年没有见到的小儿子?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转化为行动、行为、建树,就像是不停地变幻的云彩,它的虚无缥缈性是不可捉摸的和无法再现的。这几年里,未来的"领袖"每当把压在身上的狗皮袄使劲裹严准备入睡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在利用今天知道的情况从正面和侧面审视革命前夕的斯大林时,不能不提到未来的总书记长期保持的、经久不衰的所谓"抢劫者"的名声。

本世纪初,在工人运动的一些激进派中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革命运动",抢劫是"可以容许"的。唐恩、马尔托夫、苏瓦林以及斯大林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的证明信件都指出,"高加索战斗队员朱加施维里"参加过几次抢劫,如果不是直接参加,那也是组织者之一。例如,马尔托夫就断言,1907年在梯弗里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一次以大胆行为而闻名的袭击,"绝不会没有斯大林"。当时"抢劫了"将近30万卢布。马尔托夫曾就此在他莫斯科那家报纸上写道:"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

当；对于这一点，那位曾因同抢劫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的斯大林君也很清楚。"[11]

大家知道，斯大林曾坚持要追究马尔托夫的责任，说他进行了污蔑。但是，当他就马尔托夫的声明发表讲话时，却把重点放在他从未被开除出党组织这一点上，而回避他直接参加过抢劫活动的问题。斯大林同艾·路德维希谈话时，也间接证实了他参加过抢劫。艾·路德维希在提问时曾经问他：

"在您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您对斯捷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兴趣？您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和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兴趣的。"[12]

接下去谈论这些农民领袖时，斯大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强盗性"事迹，有意不对这个问题具体作答。参加革命活动多年（虽然只在一个地区），头上还罩着富有浪漫色彩的"抢劫者"的光环，经受过羁押站、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的考验，所有这些为斯大林逐渐树立了"战斗队员"、实际工作者、实干家的名声。这样的评价多半更接近实际，但是要考虑到他在最后一次流放期间表现消极。

当然，斯大林能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列宁在1903年12月写给斯大林的第一封信

鲍洛特尼柯夫起义

逃亡农奴鲍洛特尼柯夫，于1606年夏发动了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制度的起义。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起义终被镇压下去。但这次起义却成为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17世纪初农民战争的高潮。

拉辛起义

哥萨克下级军官拉辛，作为领导者于1670年发起了俄国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1671年4月拉辛被富裕的顿河哥萨克出卖，6月6日在莫斯科被沙皇处以极刑，壮烈牺牲。其部下继续斗争，但不久相继被镇压。尽管如此，此次起义却沉重地打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

拉辛（骑马者）率领起义军征战伏尔加河流域




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起义

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于1773年发动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战争历时一年多，1774年9月25日，普加乔夫被叛徒出卖，1775年1月21日在莫斯科沼泽广场就义。这次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动摇了农奴制国家的基础。


位于波兰的克拉科夫市

，这封信是发往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的，当时斯大林正在那里流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仔细地了解来自民族地区的革命者的情况，他从党报党刊上一些短小通告中和同志们的介绍中注意到了约·朱加施维里。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朱加施维里说明了党的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斯大林第一次公开提到这封信，是在1924年1月底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举行的一次悼念列宁的晚会上。斯大林用低沉的、毫无表情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13]

斯大林不能抱怨列宁对他不关心。革命前夕当他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曾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安排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逃跑的问题[14]。在此以前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往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给斯大林寄了120法郎[15]。斯大林从流放地寄了一封信，提出可否把那篇论《民族文化自治》的文章和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合在一起另外出一本文集的问题[16]，列宁对这封信也很重视。

1917年以前，斯大林同列宁有过几次会见。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克拉科夫。在这以前，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期间和伦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列宁也有过接触。但是，后来斯大林对这几次会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在1931年他就说："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1906年、1907年、1912年和1913年）……"[17]结果成了斯大林不是去出席代表大会和工作会议，而是"去看列宁"。这种篡改个人经历中重大事实的做法，后来曾为"两个领袖"的观念、为制造斯大林还在革命以前就同列宁有特殊关系的神话"服务"。诚然，斯大林在证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系亲密时，表现了他一贯的谨慎态度。下面是一个例子。

战前不久，波斯克列贝舍夫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有一个问题请您征得同意，就是能否在报刊上发一个关于"列宁重大纪念日革命陈列馆"的消息。

塔斯社主要负责人

Я·哈温松

1940年1月5日

随信附有有待"征得同意"的一份文件。

致弗·伊·列宁　克鲁普斯卡娅转　发往克拉科夫

1912年3月7日

运到了将近两普特书刊。我们分文没有。请通知有关方面，让他们另外派人，或者寄钱来……

致同志的敬礼

契日科夫

斯大林在文件上批示说：

契日科夫的信不是我的信，虽然我曾一度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

约·斯大林[18]

斯大林本来可以补充说：他不仅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而且用过伊万诺维奇、乔普尔、吉拉施维里。但是在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有人让把契日科夫这个姓"给"别的什么人用过，一是斯大林算计了一下，这样的信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领袖"不愿意回到过去，哪怕是暂时，哪怕是在脑海里，即使问题同列宁有关。

从革命前搞地下工作的技巧中，斯大林学到了不少看人说话的本事。他在政治局是一副面孔，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另一副面孔，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谈话又是一副面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觉察出他的这些变化，但这是客观存在。斯大林在小范围内会比他"当着老百姓的面时"表现得粗鲁。这一点，跟总书记长期共事的人可以作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扮演自己的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角色，不管演得好不好，不管对这一点理解不理解。许多人扮演劳动者、母亲、父亲、教师、儿子、女儿这些角色很自然。感情最真挚的"演员"是孩子。但是，在社会等级上层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扮演的就是自己。他们有时演得虚假，有时演得自然，但……都是在演自己。也许这是因为站得最高的人许多人都看得见，甚至还注意得很细。而一个人能不能支配其他的人，往往不仅取决于能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他给人的印象，他的"外观"，他有没有领导者的魅力。在库列伊卡时，斯大林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是后来才懂得这一切的。何况在革命以前，很少有谁会去仔细端详斯大林。斯大林相貌并不感人，说话声音很低，态度温和，无论是谁也看不出这是未来的独裁者。


斯大林在 1915 年

在巴库、库塔伊西和梯弗里斯的工作表明柯巴的组织能力不错。但是早在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地下工作者就已发现，斯大林把党组织看作是实现这些或那些决定的机构和机器。布尔什维克阿·萨·叶努基泽、普·阿·贾帕里泽和斯·格·邵武勉在工人中间都比朱加施维里有名气。朱加施维里在马克思主义修养和地下工作经验方面并不比他们

逊色，但在个人声望方面却明显落后于这些公认的外高加索领袖。当时他还没有一个机构(后来才有)坚持不懈地为他树立这种声望。

斯大林的流放生活行将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的末日也将来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预测到，存在了多少世纪的专制制度大厦过不了一年即将倒塌，它将成为新与旧、革命与保守这两种原则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个人——在俄国，人们对他的正面和侧面暂时还很不熟悉的一个人，也将起到自己的作用。

二月序幕

未来会给“信号”吗？谁能说呢？也许只有在传奇、神话、神祇和预言中才可能有这样的事。传到库列伊卡那少得可怜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想象，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有力的撞击，思绪激烈翻腾。斯大林不知怎的一下子感到美好的前景从天边移到了眼前，而过去这种前景在他面前只是一种模糊的希望的轮廓。要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改变流放者的处境。在平常日子里，他们注定只能苟且度日。既没有职业，又无家可归。而对一个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哪里都不需要他。革命的冲击震撼了斯大林。它，这希望，愈来愈强烈，把失望、怀疑和动摇深深地埋进寒冷的雪原。也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希望，一旦希望泯灭，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事情要做了。

可能，在新的一年即1917年前夕，斯大林感到，他很快又将出现在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了。四年前就是在那里，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大厅举行音乐晚会，他竟那样荒谬可笑地在晚会上被暗探局抓获了。现在流放者们渴望自由，到风暴即将来临的地方去。

这位忧郁的格鲁吉亚人虽然从1912年起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上以增补方式当上了中央委员，但是在流放者中间，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有声望的人物。诚然，他同加米涅夫相当接近。在修



1915年，一批流放者中的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后排右四）、斯维尔德洛夫（前排右一）、斯大林（后排左三）、彼得罗夫斯基（前排右二）

道院村拍的一张照片上，斯大林就挨着他，自己未来的盟友，后来的对手。从性格上看，斯大林一向孤僻而难以接近。恐怕找不出哪一个人愿意对他敞开自己的心扉，跟他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他跟那一群形形色色的流放者合不到一块，他们都有自己的期待，喜欢讨论从外面来的信件和消息，操心家里的事，经常争论各种问题，构想没有阶级而绝对公正的社会和神圣的平等……他跟当时人们所说的“贵族习气”格格不入；十月革命后，他有一次称自己是“干革命的壮工”，这不是偶然的。在当时了解他的人的心目中，斯大林看起来是个“战斗队员”，从事地下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但缺乏奔放的想象力。

大概，描写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介绍巴黎公社的作品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喜爱的读物。7月14日，巴士底狱、凡尔赛、《人权宣言》、雅各宾党人、科尔得利俱乐部、国民公会、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上断头台、专政、罗伯斯庇尔、丹东、热月9日……在冬季的漫漫长夜中，在微弱的烛光下，斯大林贪婪地、一页接一页地读着安·奥拉尔著的《法国革命政治史》。书已经翻得破烂不堪了，是斯维尔德洛夫给他看的。斯大林仔细回味着早已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人物、气氛和白热化的激情，他第一次了解了“那次”革命的奥秘。在此以

前，他几乎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法国革命的作品。那次革命在他心目中忽而是个残酷无情的复仇女神，忽而又是横扫一切、令人可畏的社会狂飙。斯大林几乎是亲身感受到了罗伯斯庇尔在发现阴谋时仍犹豫不决的悲惨后果。不，如果是他，那他决不会迟疑动摇……

当库列伊卡就像把人冻结在该地一样牢牢控制着流放者的时候，俄国正酝酿着空前未有的事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神收获自己的血腥果实已经30个月了。斯大林远离遍布血污的战壕、使用毒气的进攻、挂在带刺铁丝网上穿着灰军服的士兵们那冻僵了的尸体……但是他从难得得到的消息中知道，国内的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发生了饥荒，人民群众的不满迅速增长。战争使俄罗斯帝国的危机尖锐到了极点。革命的爆发成熟了。

资产阶级为了谋求出路，企望在君主制范围内搞王车换位，试图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内阁的频繁更迭只是使现有的统治更难以维持。三年战争期间换了四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几十个其他的政府部门领导人。可是前线的情况愈来愈坏。军队指挥的水平如何，从下面一个例子可以想见。陆军大臣阿·安·波利瓦诺夫将军从前线致电皇宫说：“我寄希望于无法穿越的地区，难以拔脚的泥泞和神圣罗斯的庇护者、上帝的侍者尼古拉的恩典。”

尼古拉二世虽然极其平庸无能，却长期使用而且颇会使用看风使舵的策略，不断谋求妥协，不惜对资产阶级作局部性让步，只要能保

俄国二月革命背景

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发生于1917年俄历2月（公历3月）而得名。20世纪初，俄国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国内仍保留着大量农奴制残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崩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此时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各国人民掉转枪口，反对本国反动政府。1917年初，俄国革命运动急剧发展。资产阶级也感到沙皇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企图发动宫廷政变。

尼古拉二世
（1868—1918）
末代沙皇

其统治期为1894-1917年。1917年3月15日，他被迫退位，次年7月17日，他连同亲属在叶卡捷琳堡被处决。

尼古拉二世一家



住君主制就行。但是君主制的气数已尽。最后一届杜马主席、十月党人领袖米·弗·罗将柯在专制制度垮台前三星期曾对沙皇说："陛下，在您身边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也没有了，所有的优秀人才都已被革除，或者自己离职，现在剩下的全是名声不好的人。"杜马主席规劝沙皇、恳求沙皇"恩赐人民一部宪法"，以求保住帝位[19]。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挽救他了。

列宁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局势，在遥远的瑞士细心倾听了即将来临的革命发出的、像在地震时一样愈来愈响的轰隆声。他指出，革命又要来临了。二月序幕的首要标志就是专制制度的垮台。流放者们包括斯大林在内，相信专制制度有可能垮台，但没有想到它会垮得这样快。斯大林研究了1905年革命的教训，回想了不久前刚看过的那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作品的细节。他明白：最近必将发生的事件，会证明他们作为职业革命者存在本身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最有名的反革命人物之一、曾经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瓦·维·舒利金，在他著名的回忆录《重大纪念日》中回忆了沙皇退位的详细情景。按照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委托，他同亚·伊·古契柯夫一起，于1917年3月2日到达普斯科夫接受沙皇退位。当时他们指望还能保住君主制。舒利金写道："皇帝像往常一样地镇静。在古契柯夫发表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演说之后，尼古拉用单调的嗓音，毫不表露自己的感情，冷冷地宣告：

"我接受退位的决定。今天3点钟以前，我原以为我可以让位给我的儿子阿列克谢……但是现在我改变决定，让位给弟弟米哈伊尔……"

现在我们要作一段插叙。

这期间，一批来自修道院村和库列伊卡的流放者已经呆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坎斯克、阿钦斯克了。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阿钦斯克。人们听到尼古拉让位给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拒绝接受王位的消息时都欣喜若狂。在颂扬米哈伊尔"豁达大度和具有公民觉悟"的贺电上，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加米涅夫也签了名。九年之后，这件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被揭了出来。斯大林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加米涅夫的"保皇主义弱点"。他的发言使人清楚地看到了1917年二三月这个遥远时期发生的一些情况。

"事情发生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阿钦斯克这个城市，" 斯大林开

始讲，情绪异常激动，“当时我作为流放者和加米涅夫同志到了那里。是一次宴会还是群众大会我记不清楚了，就是在这次会上，几位公民跟加米涅夫同志一起，致电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加米涅夫在自己的座位上叫起来：“你得承认是撒谎，你得承认是撒谎！”）住嘴，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又叫：“你承不承认是撒谎？”）。加米涅夫，你住嘴，要不情况会更糟（主持会议的恩·台尔曼制止加米涅夫）。给罗曼诺夫这个俄国第一号公民的电报，是几个商人和加米涅夫同志一起拍发的。我是第二天从加米涅夫同志本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他来找我，说他干了一件蠢事（加米涅夫又在座位上叫喊：“撒谎，我从来没有、根本没有跟你说过这样的话。”）。这封电报，除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外，各家报纸都发表了。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4月间，我们党开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一个问题：像加米涅夫这样的人，由于这封电报，决不能选进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开了两次非公开会议，会上列宁主张保留加米涅夫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费了好大劲才给他保住了。只有列宁能救加米涅夫。我当时也主张保留。

“第三件事。《真理报》当时支持加米涅夫同志发表的辩驳词，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加米涅夫和保护党不受敌人的打击。因此，你们看见，加米涅夫才敢于撒谎，欺骗共产国际。

“再说两句。既然加米涅夫同志企图在这里反驳——已经不那么理直气壮——明明是事实的东西，那就请允许我找4月代表会议参加者中间曾为了这封电报而坚持要把加米涅夫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那些人签名作证（托洛茨基在座位上喊：“就是缺少列宁的签名。”）。托洛茨基同志，您最好住嘴！（托洛茨基又喊：“别吓唬人，别吓唬人……”）您反对真理，那您一定害怕真理。（托洛茨基在座位上喊：“这是斯大林式的真理，这是粗暴无礼！”）我一定要征集签名，因为加米涅夫在电报上署了名……”[2]

我们刚才回顾了往事。但是这里介绍的争论涉及1917年初的事件。即使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加米涅夫，当时也把“米哈伊尔的豁达大度”看作革命取得成就的标志。对那遥远的时代我们今天当然“一切都很清楚”。可是当时，沙皇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手腕却能使一些党中央委员陷入困境……


彼得保罗大教堂

罗曼诺夫王朝

俄罗斯封建王朝，统治期长达三百余年(1613–1917年)，共历16位皇帝。

1613年1月，在国民代表会议上，罗斯托夫总主教菲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举为沙皇，是为罗曼诺夫王朝之始。

其统治是建立在维护农奴主—地主利益、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基础之上的。对内实行绝对君主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1905年，革命给沙皇制度以沉重打击。1917年二月革命将罗曼诺夫王朝推翻。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舒利金的回忆录。他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来描述沙皇退位的情景：

"当时，我好像听到了有300年历史的王权标志落到肮脏的马路上时发出的哀鸣。彼得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刺破天空。夕阳的余辉呈血红色。"

"一连几天，"舒利金继续说，"我都参加了两位国君(还指米哈伊尔)退位的仪式。当时有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大家都上了断头台。在国家杜马委员会一些委员的会议上，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请求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位样子很年轻、高高的身材、瘦瘦的个子的大公接受帝位……

"经过在隔壁房间里半小时的反复考虑，大公走进来，在屋子中间停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帝位，因为……'

"他没有说下去，因为……他哭了。罗曼诺夫王朝的谱系就这样传奇般地中断了。"

舒利金伴随着短命的沙皇啜泣。他还恶毒地挖苦了几句：

"俄国现在既非君主国，又非共和国……国家是个什么体制叫不上来。反正是从蹂躏犹太人的大暴行开始，以300年王朝的崩溃告终……"[21]

舒利金的激动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怀念。"失势的人们"还会做大量工作，使克拉斯诺夫、科尔尼洛夫、弗兰格尔得以崭露头角，使"志愿军"*和无数干涉军得以横行俄国。安·伊·邓尼金在他的《俄国内乱集》中回忆说：像克雷莫夫将军这样一些保皇派曾建议"用武力

* 1918—1920年在南俄建立的反革命武装组织。——译者

和屠杀对彼得格勒进行清洗”。邓尼金感叹说,遗憾的是没有及时听从这样的忠告,因为“我们过久地倾听复活节里的钟声,而不是马上敲起警钟”[22]。但是1917年2月的最后两天使“失势的人们”阻止革命的一切希望全部成为泡影。哈巴洛夫将军对那些受了布尔什维克宣传的部队已完全失去控制。2月27日深夜,最后一届沙皇政府的大臣们成了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囚犯。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胜利了。这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序幕。

在遥远的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政治流放者在得到正式证件之前就已做好动身准备,要去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敖德萨、梯弗里斯、巴库和其他革命中心。如果历史能像鸟儿飞得那样高,它凭借自己明智的眼睛就能看到,在“被压迫者的节日”里,那些献身革命的人正从广袤的俄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已经熊熊燃起解放火炬的地方。斯大林和一批跟他一样的流放者一起,弄到了三等车厢的车票。他贪婪地望着车窗上一掠而过的西伯利亚广阔无垠的积雪地带。他当时不可能知道,在10多年之后他来到这里时,已经不是默默无闻的“干革命的壮工”,而是一个羽毛正在迅速丰满起来的党的领袖。斯大林跳下火车到站上弄开水时,也不可能预见到,在这块土地上,过了一年至一年半之后,就像过去在布列塔尼、土伦和旺代一样,爆发了流血的暴动。斯大林还不知道到彼得格勒后他会怎样,他将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会遇见党的哪一位领导人。沮丧和烦恼现在都留在冰封的叶尼塞河岸上了。很快,社会和政治事变的漩涡就将把斯大林整个吞没,起初把他淹在革命的浪花和飞沫下面,后来又突然把他抛到革命的中心。

在快到乌拉尔山的时候和往后的各个车站上,流放者们(几乎每一列火车上都有)都在火车站受到喧闹的人群的欢迎。群众大会上响起了《马赛曲》的歌声,人们不停地发表演说,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欢快。口若悬河的加米涅夫、精力充沛的斯维尔德洛夫以及他们的其他旅伴纷纷讲话。斯大林默默看着这意想不到的愉快场面。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不久以前刚读过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讲的一句话:“除非全民行动起来,否则自由就会灭亡。”[23]会行动起来吗?斯大林暂时还不能回答。他希望到彼得格勒后能判明局势。

这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浪潮极为高涨。小资产阶级忽而归附“左倾”资本家,忽而归附无产阶级,使国家体制这只小船颠簸得

国家杜马

沙皇俄国的国家代议机构。杜马是俄文音译,意为"议会"。

自1906年3月至1917年初,历经四届的国家杜马于1917年3月10日受沙皇命令关闭。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俄国临时政府。1917年10月19日,临时政府正式解散国家杜马。

立宪民主党

俄国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政党,又称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以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组织地方自治局立宪派分子同盟和"解放社"为核心,在莫斯科成立。成员少数是地主和资本家,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人物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米留可夫等。立宪民主党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力图保存沙皇制度。后因该党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策划反革命叛乱,阴谋被粉碎后,立宪民主党上层人物大部分逃往国外,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24年该党内部分裂后消亡。

愈来愈厉害。改良主义情绪在增长。表面看来,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专制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列宁写道:"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20]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来回摆动的巨大社会钟摆,反映出有两个专政同时并存。这是当前时局的一个很独特的特点,一个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标准模式容纳不了的特点。这种罕见的特点的政治表现就是存在着**两个政权**。在同一个塔夫利达宫,两个政权机关都在热火朝天地开会。塔夫利达宫的一侧,用米留可夫的说法,是"政权手中的玩物"——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里是"左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居领导地位。塔夫利达宫的另一侧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这个革命政权机关。领导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和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占少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因为孟什维克在2月以前处于合法地位,他们加紧利用了自己的有利条件。而且他们的队伍中还有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和理论家。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当时还侨居国外;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穆拉诺夫、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斯塔索娃以及党的领导的其他成员都在流放、蹲监狱和服苦役,只是刚刚开始回来。

苏维埃的孟什维克成员串通杜马代表同意把国家行政权力交给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策列铁里和克伦斯基用各种方式唱一个调子,说"新的革命政府将在苏维埃监督

下进行工作”，说这是“历史的意志”。在蛊惑宣传、变革时期的热情以及革命词句的影响下，群众在思想上转而支持临时政府了。斯大林以及其他许多人则随波逐流。

克伦斯基在尽一切努力使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同时，还想保护王朝的代表人物“以防万一”。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写的一篇文章《尼古拉二世前往托博尔斯克》中，这位转眼之间被历史事变推上资产阶级轨迹顶峰的历史宠儿写道：“临时政府顶住各种流言蜚语，不仅能够而且决心在3月初就把沙皇一家送往国外。我本人在3月7日(20日)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回答‘杀死沙皇，处死沙皇’的狂叫时就曾说过：‘只要我们掌权，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发生。临时政府负责沙皇和他一家的人身安全。这项义务我们要履行到底。沙皇和他一家将被送到国外，送到英国。我本人要把他们送到摩尔曼斯克。’”

“我的声明，”克伦斯基写道，“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人士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已经到了夏天，把沙皇一家仍然留在沙皇村已经完全不能容忍了，我们临时政府却接到一份口气强硬的正式声明(英国方面的声明。——本书作者注)，说在战争结束以前，前任君主和他一家不得进入不列颠帝国的国界。”[20]于是就把沙皇及其全家送到了托博尔斯克。临时政府在顺便解决这种“任务”时，打算不惜一切代价使革命就范。资产阶级在竭力把政权保持在手里的同时，据同一个克伦斯基讲，准备让“人民说个够”。

革命在这个时候，正如列宁所说，已结束了自己的第一阶段。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麻痹

布尔什维克

俄文音译，意为多数派，是苏联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

布尔什维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而自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亦称为布尔什维主义。1912年1月孟什维克被清除出党后，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名称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括号标明“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该党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该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双重名称，改称苏联共产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共产党都以俄共为榜样，布尔什维克又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义语。

孟什维克

俄文音译，意为少数派，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

后来孟什维克在组织和策略问题、土地纲领等方面的机会主义思想更加系统化，发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其观点称为孟什维克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尔托夫、策列铁里、波特列索夫等。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由于它坚持机会主义立场，并从事敌视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于1912年1月被取缔。

社会革命党

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由若干分散的旧民粹派小组和团体初步联合而成，1905年12月召开社会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和党章，正式宣告成立。首领为切尔诺夫、克伦斯基等。

该党自命为社会主义政党，反对专制制度，主张在联邦制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实现土地社会化，即把土地变为全民的财产并交给农民平均使用，在策略上，继承民粹派的个人恐怖手段。该党派于国内战争结束后被取缔。

了人们的警惕性。从形式上看，好像全部政权属于掌握着旧国家机构的临时政府，而旁边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吭哧吭哧干着各种革命杂活。两个专政同时并存；暂时哪一方也不掌握全部政权，哪一方也取消不了对方的职能。但是两个政权并存这种使人看不清是什么社会的状况并不能阻止群众的革命性创造。例如1917年3月2日，《消息报》公布了有名的第1号命令。命令宣告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原则：部队里的委员会经选举产生，废除军衔军阶，只有经苏维埃批准才能支持当局的命令，必须严守革命纪律，在公民权利上官兵平等。斯大林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风云变幻的事态发展。在这种事态发展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前途如何，看来仍很渺茫。

这一切，我再说一遍，都发生在许多革命者到达彼得格勒之前。列宁还只是开始准备冲破障碍进入动乱的俄国，托洛茨基到达涅瓦河畔的这个城市是5月初，那时他还没有最后明确自己的去向，是跟孟什维克合作还是跟布尔什维克合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优势。靠了他们的帮助，由“10个资本家和6个社会党人”组成的政府才开始厚着脸皮粉墨登场。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和斯柯别列夫之流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千万别让“革命的劲头失去控制”。

对于政治局势中的所有这些特点和细微之处，斯大林暂时还很生疏。他用他那“塌陷的褐黄色的”眼睛盯着车窗，目送着那些一掠而过的、分布在一个农民国家广大平原上的极其贫困的村落。斯大林“来参加革命”了。在哪里落脚倒不成问题，——自然是到阿利卢耶夫家。在过

去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如果说还有谁定期给他写信的话，那大概只有谢尔盖·雅柯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他未来的岳丈。阿利卢耶夫是布尔什维克。他载入我们的史册，首先是因为在1917年7月那些紧张的日子里，他曾把列宁隐藏在自己家里，避开了临时政府的追捕。

革命不是由政党实现的。列宁在3月间写道："不是国家杜马(地主和富人的杜马)，**而是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⑳]但领导这些起义者的必定是他们的政党。列宁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俄国。在俄国，按照他的理解，仅仅跟专制制度的遗骸诀别是不够的。必须前进。一定要前进！

在列宁回来之前，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个机构在3月间增补了一些新人，其中就有斯大林。俄国局批准了《真理报》编辑部的人选，斯大林也在内。无产阶级报纸的重新出版具有巨大的动员意义。

斯大林在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中表现怎样？他的真正作用是什么？他在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是领袖，倒数第一，还是配角？分析一下党的文献、其他材料和一些当事人的证明材料，就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真理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苏联最有权威的俄文对开日报。在莫斯科出版。根据1912年1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第6次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于同年5月5日在圣彼得堡创刊。当时作为合法的工人报纸出现，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列宁直接参与了创办工作，又是该报的思想领导人和主要的政论撰稿人。该报出版期间曾8次被沙皇政府勒令停刊，遭到190次追查；并改用《工人真理报》、《劳动真理报》、《真理之路》等名称出版，共发行645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7月8日又被沙皇政府查封。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3月18日复刊，正式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长期以来，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说明是捏造出来的，假的。《斯大林传略》一书断言："在这个重要时期，斯大林团结全党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起领导了布尔什维克中



《真理报》社址

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市委会的工作。布尔什维克从斯大林的文章中得到了进行工作的重大原则指示。”[27]这里把斯大林说成革命的领袖，好像在这个时期他代替了列宁。各种史料证明，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根据，跟事实相距甚远。斯大林根本没有作过什么“原则性指示”。到达彼得格勒后，他成了众多的党务工作人员中的一个。在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在相当一批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务的人员名单中，斯大林的名字极为罕见。不错，斯大林进了一些高层政治机关，但是这几个月里，无论在哪个机关的工作中，他都没有突出表现。除了小范围里的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他。这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民族地区的一个代表”。他根本没有声望。事实就是这样。

一回来后很快就成了有名人物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他著的《二月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这一时期的活动作了介绍。他指出：“到3月中旬，在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把党的正式政策的方向盘急剧向右转了以后，党内的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托洛茨基发议论说：加米涅夫有好多年跟列宁一起侨居国外，那里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主要基地，因而他成长为一位政论家和演说家；而斯大林这位缺少应有的“理论视野、缺少广泛的政治兴趣和不懂外语”的所谓“实际工作者”，则“跟俄国本土分不开”。“加米涅夫一斯大林这个派别日益成为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左翼，日益学会在议会和幕后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技巧。”[28]托洛茨基在书中指责斯大林陷人护国主义立场，这不一定符合事实。但是，从托洛茨基的议论中，不能不捕捉到一些正确的论调，如说斯大林在10月前的思想缺少胆识，有时导致狭隘的、眼光短浅的实用主义。



1917年时的斯大林（右一）和托洛茨基（左二）

二月革命的到来并非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尽管有很长一个时期情绪消沉，他仍然相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完全是出于信念，因为

对他来说,真理跟对真理的信仰分不开。如果真理没有披上信仰这件外衣,那斯大林就会认为不是十足的真理。这里面也许没有什么消极的东西,但总是潜伏着产生教条主义思想方式的危险。对纲领、方针、决定、"路线"的信念,总是帮助斯大林保持坚定不移,始终确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发生不发生革命并不取决于他。但革命定会发生这一点他从不怀疑。1917年3月初,当斯大林从阿钦斯克到彼得格勒坐在寒冷的车厢里打战的时候,他把专制制度的覆灭看作革命的必然。大概他相信这一历史事件会在他有生之年发生。但是他意外地感到,在他毕生从事的事业中,也像在他个人的命运中一样,不仅有历史机遇,而且有某种别的东西。

扮演次要角色

3月12日,斯大林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同车到达,但是谁都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欢迎。彼得格勒正忙于自己的革命事务。未来的"领袖"不声不响地回来,符合他的实际地位。斯大林提起自己那只小小的胶合板箱子,直奔阿利卢耶夫家。他被当作家里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这一天,他遇见了一些中央委员。晚上,他进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在经过了库列伊卡那一段安静的生活之后,斯大林怎么也习惯不了忙乱的革命事务。实际上从3月中旬起,《真理报》就由加米涅夫、穆拉诺夫和斯大林主持了。在他们接手工作的头几天,报纸就出了一连串明显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偏差"。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独立思维的能力不强,立场不明确,看不清十月前风暴的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他习惯于执行指示和贯彻"路线"。可是这里需要他自己作出决断。起初,这种"偏差"表现在斯大林赞成发表加米涅夫写的《临时政府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文上。加米涅夫公然断言:党应当支持临时政府,因为它"真正在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这显然同列宁的方针相抵触。

紧接着第二天,以"快手"著称的加米涅夫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

要秘密外交》的文章。该文实际上采取"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加米涅夫写道:既然德国军队进行战争,革命的人民就要"坚定岗位,以枪弹对枪弹,以炮弹对炮弹。这是天经地义"[29]。斯大林当时没有反击加米涅夫的这类半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他还弄不清楚重大政策的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在加米涅夫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斯大林自己在《论战争》一文中犯了政治错误。文章整个说来是从反战立场出发的,但仍然违背了列宁的方针。斯大林认为,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30]。


斯大林在1917年

说句公道话,后来,1924年,斯大林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讲话时,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说明自己在和平问题上对待临时政府的立场时说:"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31]他还说,当时全党都采取这种立场,虽然有些党组织持正确的观点。我们先在这里交代一句,如果说在20年代,斯大林在个别时候还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失算和错误,那么后来,随着他成为"绝对正确的"人之后,就再也谈不上承认错误了。

中央局在《论战争》一文发表一星期后通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时,多少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决议保持了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开始和平谈判的思想。当列宁不在的时候,加米涅夫在《真理报》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成了过渡阶段真正的"主角"。护国主义即半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在3月间显著增强,不无他的努力。斯大林由于自己的影响和威信有限而无法与他对抗。即使在列宁和其他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不在的情况下,当需要把走出地下状态的党大力团结起来的时候,斯大林也显不出一个领袖的本事来。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施略普尼柯夫在党前进过程中需要明确政治方向和规定策略路线的复杂环境

下，显得更为出众。

我想，斯大林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列宁竟会宣告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3月间的革命大演习已经使斯大林眼花缭乱，在他看来，这已经是既定目的。在3月间的这些日子里，人们痛感列宁不在。凭借中等水平的才智和革命激情要完成一些最高任务是不可能的。而来自库列伊卡的斯大林又无法超出这一水平。在这期间，孟什维克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小有名气的尼·尼·苏汉诺夫（吉姆美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一个暗淡的、没有光泽的斑点。"俄国局的其他成员，如彼·安·扎卢茨基、维·米·莫洛托夫、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米·伊·加里宁、米·斯·奥里明斯基等人，也不能在一系列问题上始终贯彻执行列宁在《远方来信》中阐述的方针。当时感到，斯大林、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并没有彻底摆脱护国主义幻想和对临时政府的信任，他们认为，获得了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胜利差不多就是胜利到头了。

斯大林在10月前出现这些动摇不是没有原因的。斯大林没有自己的一套实现伟大思想的构想。在二月革命中和十月冲击的日子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弱点：理论基础"差"，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活动的能力低，不善于（暂时还不善于）把政治口号转变成具体的纲领性方针。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曾指责过斯大林回避斗争、寻求捷径、害怕同政治敌人对抗。此人从不缺乏毅力。但是细心观察斯大林政治命运的人会发现：在他这个职业革命者身上当时就有一个虽然不是惟一的但却非常致命的弱点。这个弱点他自己也清楚。

当需要去车间、去工厂、去部队、去街头参加群众大会的时候，如我们前面指出过的，斯大林就产生一种心里不踏实和惶恐的感觉；诚然，他后来学会了掩盖自己的感情。他从来不像其他许多革命者那样喜欢到群众中间去。看来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中发表讲话，也不善于自如地发表讲话。有一份20年代初的证明材料，上面引了工人И·科布泽夫1917年4月在瓦西里耶夫岛群众大会上听了斯大林讲话之后所作的评价："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简单明了；可就是记不住他讲的东西。"难怪斯大林在群众大会上、在会见群众的场合、在游行示威时，讲话的次数比列宁周围的其他人都少。

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到来的时候，当卢那察尔斯基、沃洛达尔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一些出色的演说家来到群众大会和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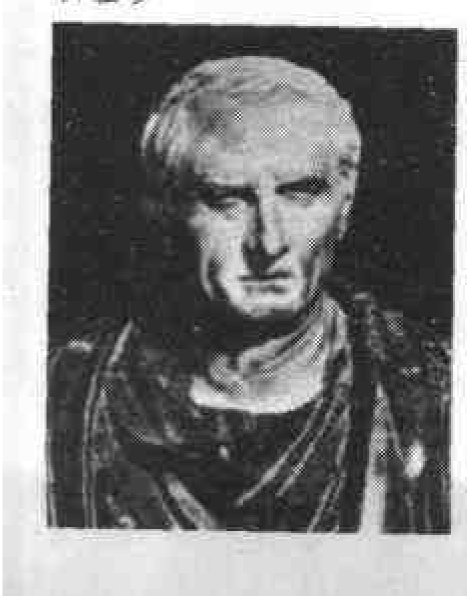
斯大林在演讲

会议的时候，他对群众讲话就特别困难。托洛茨基“选中了”“莫杰恩”杂技场作为自己发表演说的固定场所，那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托洛茨基常常是被高高托起越过人们的头顶举到演讲台。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托洛茨基有时把讲演的内容摆在第二位，而着重于用感情影响听众的意识。苏汉诺夫在他的札记中写道：托洛茨基在到达彼得格勒后的头几个星期内，在“莫杰恩”杂技场一结束例行的讲演，就飞速驱车前往奥布霍夫工厂，从那里再去制管厂，接着再去普梯洛夫工厂，然后去波罗的海工厂，从练马场出来又去兵营；就好像他是同时在各个地点讲话。斯大林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同这位革命的西塞罗*“较量”。托洛茨基醉心于自己声望的提高，他恐怕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打动人心。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听托洛茨基讲演时，一向对此人抱有一种近乎忌妒的恶感。托洛茨基能把大家的视线集中到自己身上，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斯大林跟他不一样。特别是在十月事变之前，托格茨基根本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

同公开发表讲话相比，斯大林宁愿写文章、评论，就这样那样的政治事件给报纸写时评。从流放地回来后，从1917年3月中旬起到10月止，斯大林在《真理报》、《无产者报》、《士兵真理报》、《无产阶级事业报》、《工人和士兵报》、《工人报》、《工人之路报》等等报纸上发表



西塞罗



* 西塞罗是古罗马的著名演说家。

——译者

了60多篇文章和短评！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作结论时，我再说一遍，一板一眼地，而且总是那样绝对。他摒弃了宗教教条的内容，却喜欢它们那种古拉丁人式的简易逻辑。看来，他的著作写得极其朴实，其中没有费解的术语、复杂的定义和晦涩的逻辑，并不是偶然的。他那些平铺直叙的文章，大多数都是阐明一些普通的道理，如果文章作者不是斯大林，这些道理在几十年后再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斯大林更为称心的是在"总部"、管理机关、中央局、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工作。还在3月间，中央局在他现有的任务之外又给他加了一项任务：派他参加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几乎每天开会，讨论革命实践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停地委托它的这个或那个成员去执行新的任务。这样，斯大林参加了同外高加索以及俄国其他地区的党组织建立正规联系的工作。

这时候，许多省份已开始成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组织。中央反对这种做法，虽然客观地说，我们那种认为成立联合组织不能容许的传统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联合起来能加强革命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力量，而后来是加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力量，那么这显然可以看作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实行政治妥协的一种做法。而斯大林却大刀阔斧地摧毁、取缔这样的联合组织。是不是应当尝试一下加强布尔什维克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如果妥协办法危及理想、纲领性方针和具体的成果，那么取缔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集中全力对付孟什维克，特别是对付社会革命党人，我认为在有些时候是得不偿失的。后来，这种做法成了一种可悲的传统。例如，法西斯主义在30年代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们了，可是我们还把社会民主党人差不多看成"主要敌人"。

列宁急于回到俄国，但这事办起来非常复杂。在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麻烦作了细致的研究之后，列宁同一批俄国侨民，其中包括格·叶·季诺维也夫(Г·=Е·А·阿普费尔包姆)，离开瑞士取道德国和瑞典前往俄国。4月3日晚上9点，列宁已经在白岛车站(俄国境内第一站)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一些工人代表团的欢迎了。在欢迎者当中，有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泰、约·维·斯大林、玛·伊·乌里扬诺娃、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回忆说：他刚走进车厢包房，同列

宁亲切地互致了问候，一下子就被列宁问得不知所措：

“您在《真理报》上都写了些什么呀？我们设法搞到了几份，看了之后都狠狠地骂您……”

在从白岛到彼得格勒的途中，列宁跟欢迎他的同志们交谈了党内状况，同时对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作了严肃的批评，说他在文章中实际上是支持临时政府，而在对战争的看法上不止一次滑到护国主义立场[⑧]。

欢迎列宁的场面在我们的报刊上作了非常广泛的报道，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革命、人民和党欢迎自己公认的领袖。他不是神仙，不是术士，不是政治使徒，而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一个拥有巨大精神力量、在革命群众中享有绝对道德威望的领袖。援引一下列宁在思想上的对手苏汉诺夫对欢迎列宁的情景的介绍是颇有意思的。欢迎列宁时曾经在场的苏汉诺夫，在他那本1922至1923年出版的、整个说来不大吸引人的《革命札记》中，对欢迎的情景描绘如下：

“在芬兰车站，列宁走进了，或者可以说是跑进了所谓的‘沙皇候车室’，他头戴一顶圆帽，脸冻得通红，手上拿着一把非常贵重的鲜花。跑到候车室中间，他在齐赫泽面前一下子站住了，好像碰到了非常意外的障碍似的。这时，跟往常一样阴沉着脸的齐赫泽宣读了‘欢迎’词，他不仅在精神和用词上，而且在语调上，都是在教训人。他说：‘列宁同志，我们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整个革命在俄国欢迎您……但是我们认为，革命民主派今天的主要任务（这是齐赫泽欢迎词的“要害”，主旨。——本书作者注）是保护我们的革命，使其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侵害……我们希望您能同我们一道遵循这一目的。’齐赫泽谈完以后就不作声了。面对这一意外事件，我感到不知所措……

“但是列宁看来胸有成竹。他若无其事，好像这里发生的一切跟他毫无关系。他环顾四周，仔细打量着周围的人以至‘沙皇候车室’的天花板，整理着手上的花束（这花束跟他的整个形象很不协调），然后完全背对着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回答说：‘亲爱的同志们，陆海军士兵和工人们，我幸运地祝贺以你们为代表的胜利的俄国革命，祝贺你们这支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先头部队……各国人民响应我们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号召，把枪口调过头对着剥削自己的资本家的时刻快到了……你们所完成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万岁！’”⑬

我引用苏汉诺夫这一长段回忆，是因为即使这个在思想上同列宁分歧很大的人，也不能不惊叹地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政治上多谋善断，智力超群。斯大林在这里，在车站上，就已经感到，列宁所作的国际主义的讲话使他看清了自己身上具有护国主义性质的幼稚的动摇，看清了自己怎样错误地指望临时政府去争取和平。列宁上的课他当时还能明白。可惜若干年后，由于思想意识蜕化，在他特别需要列宁的开导时，他已经听不进去了。

斯大林后来回忆说，就在4月3日晚上，他感到“许多问题变得清楚多了”。列宁虽然来自“远方”，对当前时局的历史特点却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就好像他一直都在这里，在事变的中心。第二天，斯大林在塔夫利达宫听列宁讲话，听他宣讲他那著名的、后来作为《四月提纲》载入史册的十点纲要时，一再为列宁才智的巨大威力感到惊讶。提纲无情地批判了“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证明了等待方针即消极方针的危害。

但是对列宁的战友来说，公认的领袖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的环境非常特殊，而列宁的提纲又非常新颖和大胆，以至于党内许多领导工作者都没有思想准备，不能接受列宁的纲领。有人就说，列宁住在国外，脱离俄国的实际，陷入了极端激进主义。斯大林在3月间一次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过一次谨慎的报告，现在列宁的结论听起来简直就是对他的责备。苏汉诺夫后来写道，在列宁讲话以后，“许多人都头晕目眩”。在4月4日列宁第一次宣读自己提纲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发言捍卫列宁提纲的只有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不同意列宁的看法、对列宁的结论提出批评和怀疑的大有人在，而不像过去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革命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列宁自己一直坚持的看法。例如1919年5月，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给中央送来一封措词尖锐的信，不同意列宁对南方战线某一地段战争形势的估计。这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是正常现象。列宁委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专家们作出权威性的结论。

斯大林暗暗叹服列宁在精神上的威力，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尊敬，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理解列宁思想的新颖之处。顺便说一

句,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同是这个天才的《四月提纲》,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之前就没有得到彼得格勒委员会多数的支持。列宁曾不止一次处于少数地位,但他并不因此而悲观,同样,当多数在他一边时(这种情况当然更为常见),他也不强调自己的胜利。列宁向来服从真理。同机械形成的、没有自己的主张的多数相比,那种能让不同的立场、观点以及新颖独到的解决办法都亮出来都摆出来的局面也许更为可贵。如果我认为自己有理,那么处于少数并不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说:"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单枪匹马,1个对110个[10]。"

列宁回来以后,《真理报》也发生了变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成了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办时期人们从该报可以明显听到的妥协主义、护国主义论调,现在消失了。斯大林也继续在《真理报》工作;诚然,他发表的东西同过去一样,仍是一些短评,以及就当前政治问题写的时评和报道。

列宁的提纲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日至29日)上成了会议的决定的基础。当时第一次公布,这次会议的151名代表代表着8万名党员。而这个区区少数(同俄国亿万居民相比)在最近几个月将要"震撼世界"。列宁在代表会议上辩证地、深刻地回答了俄国革命提出的问题: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问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苏维埃的作用和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代表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加米涅夫批评列宁,说他对已经出现的有利条件估计不足,因此需要同临时政府结成联盟[5]。斯米多维奇、李可夫、皮达可夫、米柳亭、巴格达季耶夫都表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总有一天,所有这些发言会被斯大林定为"叛卖性的"、"敌对性的"、"反革命性的"发言。它们一定会被列入"罪行"录。在布勃诺夫发言谈了"自上"和"自下"监督临时政府的方式以后,斯大林发言支持列宁的提纲。但是,他的发言由于论证不充分而软弱无力和难以服人。大家知道,论据是思想的支柱。但是在拒绝布勃诺夫的修正意见时,斯大林又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他就民族问题作的报告倒是更有分量。这个报告贯穿着一个精神:"把同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6]对多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来

说,最正确的道路是建立统一的党。因此,斯大林说,崩得关于所谓"文化自治"的建议是非族际主义的。斯大林认真负责地但并不出色地扮演了自己作为"坚定的实际工作者"的角色。但是整个说来,斯大林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力求保持"中庸之道"。他明白,在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这是最合适的立场。

看一看当时的文件——中央的决定、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革命机关的电文就会发现,斯大林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他直到1917年5月才结束侨居生活回到俄国)、布哈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以及党的其他活动家不同,在这些材料中,他被提到的次数极少。跟列宁当然就更不能比了,因为列宁无论呆在什么地方,都始终处于革命的中心。《斯大林全集》和《斯大林传略》令人厌烦地反复宣扬一个基本思想:斯大林总是同列宁在一起。例如《全集》第3卷公然断言:"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主持全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的工作","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建立了以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为首的由7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来领导起义","10月24日至25日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领导十月武装起义"[30]。这类说法,而且是在不止一个10年中用以"教导"千百万群众的说法,同事实相去甚远。

重新回过来看看提到过斯大林的会议记录、速记记录、日志和备忘录,就会得出结论:斯大林在革命史上并不是一个杰出人物、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火热的政治家和组织者,而是党的机构的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工作人员。例如,十月革命史委员会在1924年编写的大事记中,斯大林在4个月(1917年6月至9月)时间里一共被提到9次,而提到其他人时,例如萨文科夫就有40多次,斯柯别列夫有50多次,托洛茨基有80多次。人们可以反驳说,用这种"统计"数字的方法来评价政治活跃程度是不妥当的。当然可以这样反驳。但是,这种方法仍能反映出透过舆论可以窥见的个人作用的某种限度。不错,斯大林当时是中央委员,在《真理报》工作,在其他许多机关、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工作。但是,除了把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开列出来,对他具体干了些什么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介绍。其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是斯大林**创造性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能力不强。他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不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难怪在布尔什维克的三月会议上,斯大林除了告诫"不要强行加速事变

进程"之外,提不出任何重大的思想、有独创性的决策和新的解决办法,虽然身为中央委员,却不能在列宁不在的时候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领导者发挥作用。列宁一向代表人民的利益,在解决当前的任务时总是考虑到未来。斯大林则远离人民,他同人民交往都是通过机构,通过它的工作人员。列宁找各种机会同人民的代表交往、对话;斯大林只限于跟一些组织和委员会的代表接触。

当然,斯大林在1917年处于次要地位不仅是由于他在社会活动上态度消极,而且是由于他所扮演的执行者的性质,而他扮演这一角色又有明显的条件。斯大林在1917年大转变、大动荡的几个月里没能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许多当时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比他表现出色。有人认为斯大林当时毁于他的自负心态,这种看法不大可信。诚然,斯大林在3月间出现的妥协偏差和他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立场的摇摆并非偶然,曾多次表现出来。但他经常扮演次要角色这一点,却帮助他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间缓慢地,但是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树立起了稳定的政治威信。在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斯大林被重新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

武装起义

列宁到来之后,斯大林的作用开始变得更明确了:他经常执行党的领导委托的各项任务。斯大林在幕后活动,很少在革命群众中露面。对于担任保密问题方面的领导,同各委员会建立联系,处理准备武装起义各阶段的日常事务,他倒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历史的屏幕上,还看不见他的并不高大的形象。

6月3日至24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非布尔什维克的机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孟什维克123人(包括16名候补委员),社会革命党人119人(包括18名候补委员),而布尔什维克仅57人(包括22名候补委员)[38]。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波德沃伊斯

基、邵武勉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妥协性的。在7月和平游行示威遭到临时政府镇压之后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情况很清楚，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了。后来列宁写道："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7月4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7月4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9]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与调动士兵去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临时政府相勾结，他们已经"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到了。

斯大林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安排列宁转入地下。有一段时间列宁住在阿利卢耶夫的家里。7月初，在这里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了列宁、诺根、奥尔忠尼启则、斯塔索娃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斯大林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就如何对待当局要求"出庭受审"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大家都知道列宁在这次会议前曾经表示："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10]对这个问题意见很不一致。起初许多人表示赞成出庭受审，不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要作出明确的保证。但是米·伊·李伯尔和尼·安·阿尼西莫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声称"他们不能作任何保证"。当报刊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恶毒攻击时，情况就逐渐明朗了，反动势力正在策划对领袖的迫害。经过长时间地讨论，大家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出庭受审并且离开彼得格勒[11]暂时隐藏起来。起初斯大林的立场并不明确，但后来他坚决反对出庭受审。斯大林用他那特有的果断口吻明确地说：

"士官生不可能把人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要打死。必须把列宁同志可靠地掩护起来……"

这些话可以找到很多根据。原国家杜马成员B·H·波洛夫佐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一个被派去泰里约基逮捕列宁的军官问他：

"'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抓活的还是大卸几块都行？'

"我笑着对他说，凡是被缉捕的人总要设法脱逃的……"

斯大林负责把列宁护送到安全地点。毫无疑问，这是考虑到斯大

林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在几个可靠的人的帮助下周密地考虑和拟定了列宁撤离彼得格勒的计划。

在这些局势极其危险、社会关系十分紧张的日子里，在斯大林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认识了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娜捷施达，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斯大林比娜捷施达大22岁。从19世纪90年代末斯大林来到巴库后就认识了阿利卢耶夫一家。顺便说一下，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给友人的20封信》中说，1903年斯大林救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当时才两岁的娜嘉从海边掉下水里，是斯大林把她救起来的。对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来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浪漫情调，还带点神秘色彩。

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回到家里，发现屋里有许多陌生人。人们开始仔细地盘问她外面的情况。姑娘激动地讲述着，外面如何传说七月起义的肇事者正是“威廉皇帝的奸细”，他们已经乘潜艇逃往德国，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列宁。当小阿利卢耶娃知道了她讲述的马路新闻的主人公就在他们家里时，感到非常不安……



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初识斯大林时，年仅13岁。后来她成为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

集合在这里的人不再追问满脸通红的姑娘，而开始对讨论的问题进行归纳：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建议不出庭受审是正确的，因为有人正在策划对列宁的迫害。大家决定，列宁必须化装更衣，先到谢斯特罗列茨克，然后去芬兰。列宁当年隐匿的住宅的主人阿利卢耶夫后来回忆说：

“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去海滨车站。工人叶梅利亚诺夫走在前面，他是1904年的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跟在他后面，离得不远，我和斯大林走在最后。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三个旅客进了最后一节车厢。我和斯大林等着火车平安开走，才转身回来。”

谢尔盖·雅柯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本人的这些回忆有一点写得不够准确。送行的人中没有季诺维也夫，因为当时他自己也处于地下状态。列宁化装后，护送他的除了阿利卢耶夫外，还有一个叫维·伊·佐夫的工人和斯大林。

从那以后斯大林就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的中间环节之一。认为列宁信赖斯大林，给他作必要的指示，提意见，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例如，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多次见过列宁[⑮]。当然，关于这些会见没有任何速记记录，然而列宁的思想和意愿在代表大会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中是有反映的。列宁感到欣慰的是，出席会议的代表已经代表着将近24万名党员。党的队伍在四个月内扩大了两倍。革命领袖认为这一事实是对既定方针的正确性的重要证明。列宁的《政治形势》、《论口号》、《答复》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奠定了基础。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肯定了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定是正确的。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的路线得到了代表大会的确认。

从那时起，尽管斯大林很忙，但他开始经常去阿利卢耶夫家；斯大林虽然冷漠无情，但是对他那纯洁天真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未来的妻子却是一往情深。娜捷施达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她心目中的“老地下工作者”。

在政治舞台上他像过去一样几乎不引起人们注意。当时党一半处于地下状态。按照列宁的指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担任必要的工作。斯大林在群众中仍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作用提高了。

与此同时，各种事件犹如秋风刮起的落叶，纷至沓来，把国家推向十月革命的前夜。这些事件，有的滑稽可笑，有的是悲剧性的，有的普通平常，也有的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我对它们不去评说，也不作解释，而是将它们罗列出来，便于读者领略那些日子的政治特色。让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一时期彼得格勒各报是怎样报道的，档案中又是怎样记载的。

7月2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171人填写了登记表，其中110人被监禁累计245年，10人服苦役累计41年，24人被强制迁徙累计73年，55人被流放累计127年。150人遭逮捕累计54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自左至右)依次是：洛莫夫、奥里明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尤列涅夫

次，27人侨居国外累计89年。奥里明斯基受组织局的委托主持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8月8日。基利尔大公在自己住宅的屋顶上插上一面红旗，而当时已经下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他已开始读《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

8月24日。克伦斯基拜访前沙皇，让他和他身边的人员做好"撤到安全地方"的准备。尼古拉说："我不担心。我相信您……"

8月28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发电报给莫斯科军区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称："在当前的严峻时刻，为避免发生内战，避免在首都大街上发生流血事件，我命令你们听从我的指挥，今后也要执行我的命令。"最高司令官回答说："读了您关于不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感到十分惊讶。内战就是您挑起的，我已经对你说过，这将是俄国的毁灭。可以而且必须改变政策，但是不能在战线被突破的时候破坏人民的最后的力量。我不能像换手套一样改变誓言……"

9月20日。《消息报》报道：在芬兰逮捕的维

* 法国小说家都德(1840—1897)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漫画的手法讽刺了资产阶级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

——译者

《消息报》

全称《苏联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版的俄文对开日报。1917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该报当时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十月革命后归布尔什维克领导。1923年7月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

鲁博娃、巴德马耶夫、马纳谢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关押在斯维亚堡要塞。水兵坚决反对释放并决定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之前把他们关在斯维亚堡要塞。

10月4日。整个厄塞尔岛(在里加湾内)被德国人占领。他们的武装力量正在向蒙岛发起进攻。俄国舰队在同拥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武装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后损失了"光荣"号舰,而转移到蒙海峡。

10月10日。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列宁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会议是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他的妻子是布尔什维克。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列宁指出:"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权力转移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6]

10月14日。《新生活报》报道:彼得格勒每天需要粮食48000普特。10月11日运到谷物18000普特,12日运到12000普特,13日勉强凑足4000普特。彼得格勒市杜马委托市长号召市民保持平静。决定召开杜马的专门会议讨论粮食问题。

10月16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有党的其他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洛莫夫。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博基报告了各区的准备情况和情绪:"暂时还没有战斗情绪,但是正在进行战斗准备。一旦开始行动,群众是会支持的。"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列决议案:"会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赞成决议的19票,2票反对。选出了实际组织筹划起义的总部,成员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

10月20日。《工人之路报》报道说:"俄国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查苏利奇以及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们担心这些'泰斗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睡不着觉。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那有什么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离开革命的

死人……"[84]

10月24日。晚上列宁从维堡区转移到斯莫尔尼宫,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天夜里一队士官生赶到芬兰大街6号搜捕《工人之路报》的编辑部成员和列宁,但被赤卫队解除了武装并押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就在当天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全会。加米涅夫提议,非经专门决定,中央委员会成员今天一律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托洛茨基认为有必要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指挥部并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提议,一旦斯莫尔尼宫遭到破坏,应该在"阿芙乐尔"号上建立据点。斯大林没有参加会议……[85]



十月革命起义宣传画:革命的柯朗施塔得水兵奋起抗争,"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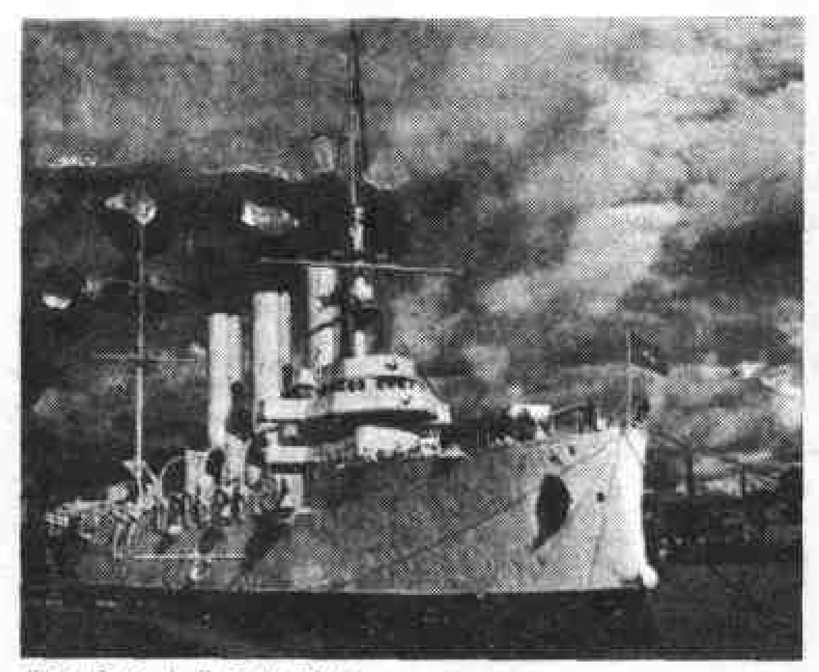
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25日凌晨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下令攻打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10月25日。党的历史大事记是按小时来编写的,按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小时……占领尼古拉车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近尼古拉耶夫桥。巴甫洛夫团在米利翁街,冬宫附近布置岗哨,盘问所有的人,把被逮捕的人押送到斯莫尔尼学校。国家银行未经战斗被一队水兵占领……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拒绝支持临时政府。司令部和冬宫的电话被切断……华沙车站被占领。"十字"监狱的政治犯被释放……伊兹迈洛夫团的分队占领玛丽亚宫并要求预备议

十月武装起义中攻打冬宫的队伍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会的成员打扫房屋。巴甫洛夫团占领涅瓦大街。

14点35分在托洛茨基的主持下召开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紧急会议。托洛茨基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再存在，预备议会被解散，被监禁的人已释放，关于旧政权崩溃的无线电报已发到作战部队。冬宫的命运必须在最近几个小时内决定。然后，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列宁在一片欢呼声中发表讲话……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

大家知道，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由几位中央委员组成的军事革命中心（由五人组成，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动员革命力量进行决定性的冲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负责的。10月24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历史性的信件中要求党的领导：

“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⑯]

今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列宁的号召有着良好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首批成果在10月25日晚上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巩固。被选人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克良斯基、诺根、克雷连柯、柯伦泰、李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梁赞诺夫、穆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斯图契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卡雷夫斯卡娅、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扎克斯、卡列林、古特曼。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中简直看不见

斯大林的踪影。他守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列宁有关日常工作的指示，向各委员会传达指令，参加起草要刊印的材料。我所查阅过的有关这些历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

马尔托夫试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必须和平解决危机的决议案；社会革命党人亨德尔曼代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持要通过一项谴责“夺取政权”的决议案（但是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中赞成这项决议案的也只有60票，反对的有93票），崩得像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也反对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锡安工人”*离开了代表大会。其实，夜里两点钟就占领了冬宫。（原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基什金、帕尔钦斯基、鲁滕贝格、别尔纳茨基、韦尔杰列夫斯基、马尼科夫斯基、萨拉兹金、马斯洛夫以及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命令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特鲁别茨科伊棱堡的其他人，对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他们的名字已经陌生了。）而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继续进行，直到天明……

约翰·里德这样描绘了代表大会的气氛：“我们穿过挤在门口的喧哗的人群来到大会议厅。在长凳上、椅子上、过道里、窗台上，甚至在主席团就坐的平台边上都坐满了全体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他们在巨大的白色枝形吊灯的照耀下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人们等待着主席的铃声，时而死一般地肃静，时而喧嚷得震耳欲聋。室内没有暖气，但是由于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而显得很热。绵绵不断向上升起的闷人的蓝色烟雾在浑浊的空气中缭绕。”[6]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

* “锡安工人”——犹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它们企图使社会主义思想同锡安主义兼存并蓄。

和平法令

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布的第一个重要对外政策法令，由列宁亲自起草。和平法令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布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反对并退出正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号召各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支持被压迫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土地法令

苏维埃俄国解决土地问题的法令。宣布实行土地、森林、矿藏、水流等资源国有化。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和出典土地。所有的土地和地下的宝藏都是全民的财产。土地平均使用，按劳动定额和消费定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土地法令消灭了俄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使苏维埃得到劳动农民的广泛支持。

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委员会中已经占了62个席位,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没有取得一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米柳亭认为必须同其他党派分掌政权。妥协派提出的成立社会党人联合政府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政府。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托洛茨基、越飞、索柯里尼柯夫、穆拉诺夫都站在列宁一边。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表现得怎样呢?他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尽管他经常加人,几乎总是加入各个不同的领导机构,为什么在革命大事记中极少看到斯大林的名字呢?



十月革命时期的斯大林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证明材料。请看《斯大林传略》是这样评价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在这本书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他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各地区布尔什维克报纸上都转载过他的指示文章。斯大林常常召见各地区组织的代表,亲自训示指导,并为各地区定出战斗任务。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⑲]确实只有这一些。这是明显的有意赞扬:只有列宁和他斯大林。他只是通过"召见"和"下指示"来领导工作,而这却是30年代才有的做法和说法。传略的作者们很难说出一点具体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在革命高潮的日子里什么也没有"领导过",什么也没有"指导过",也没有给谁"下过指示",而只是执行列宁日常的指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斯大林继续撰写一些阐述党的决定的文章。10月24日,当克伦斯基下令查封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报》时,斯大林同赤卫队员一道参加了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战斗。于是就在当天,10月24日的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文章,在这篇完全与时代精神不符的平淡乏味的文章中他还在谈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实际上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0月11日发表的《论时局》相呼应的，而这两个惊慌失措的人在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我们举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并且说资产阶级在这种威胁下就不可能破坏立宪会议。斯大林在起义前夕也认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同时，他的确也论证了“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一柯诺瓦洛夫*政府”[9]。

*尼·米·基什金、亚·伊·柯诺瓦洛夫——临时政府部长。

斯大林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然而，尽管斯大林进人了决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问题的党的领导“层”，但是在1917年他并未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任何独到的见解。他属于第二或第三领导梯队，因此后来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杰出作用的一切颂扬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作用是杜撰出来的。

1917年，苏维埃俄国第一届政府正式成立

斯大林尽管进人了几乎所有的革命机构，但是几乎没有负责任何具体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细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许多东西。托

洛茨基的干劲、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诺维也夫易冲动的性格都使他惊叹。斯大林曾几次见过普列汉诺夫，并且对他相当尊敬。普列汉诺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这种激烈的语句使斯大林大为震惊。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没有到此止步。普列汉诺夫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梦呓"，他谴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又谴责了布列斯特和约。普列汉诺夫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而陷入庸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他到芬兰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对它。他的政治原则都是道义上的原则。

1918年6月4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莫斯科工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席会议上，为已故的普列汉诺夫默哀1分钟。斯大林感到惊奇。他认为，一个公开表示不赞同他的事业的人就永远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个大会上致悼词和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举。……对斯大林来说，革命只是斗争。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敌人。如果斯大林还没下决心支持一方面，那么他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只能使他观望，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斯大林在内心深处把向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致哀称为与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是"意


1920年间的斯大林

章也是这样。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后来，特别是在30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

1924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

“10月25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60]。

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1924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斯大林在1924年11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1928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斯大林接着说：“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列宁在提出选举实际领导起义的总部时，没有推荐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看来，‘鼓舞者’、‘主要人物’、‘起义的惟一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被选入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样一致起来呢？”[61]斯大

志不坚定"的表现。党内的同志还会有机会确信这位未来的"领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的。

十月武装起义过去三年后，1920年11月7日一批当年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参加纪念晚会。斯大林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参加。许多人都来了，有托洛茨基、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波德沃伊斯基、科兹明等。人们多次回忆起列宁，也谈到托洛茨基，提起过加米涅夫、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马尔金、拉齐米尔、契切林、瓦尔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缔造者。速记记录还保存着：人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无论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还是谈到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水兵群众中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尽管未来的总书记实际上曾在一切高层机构中任职。要知道几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许多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都奔向"阿芙乐尔"号，都拦截过克伦斯基调来的脚踏车兵大队，组织夺取银行、电报局和车站。对大家来说，斯大林还是一个执行革命机构委托的个别任务的不显眼的配角。他实际上不具备从事创造性革命活动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来证明自己。

未来的"专制君主"对自己的"不显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恼。到了30年代只有当别人从"两个领袖"创业的角度来谈十月革命时，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畅。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历史性的清洗"和纠正；后来到了1937至1939年那个悲惨时期，他们的肉体也被消灭了。到了40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装起义和积极领导者已屈指可数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为领袖撰写新的"十月革命传略"的人还活着。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作用越夸大，革命老战士就越少。

托洛茨基在1929年以后把斯大林当作自己进行别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对象，当然，关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他写得相当尖刻。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说，1917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一贯一言不发。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通常是跟着列宁开辟的正式轨道亦步亦趋。"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主动精神。他没有提出过任何独立的建议。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59]

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

林在这里又进行了歪曲。领导起义进程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实际的总部。

我们看到,党的两位著名活动家在革命几年之后都企图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贬低、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个人论敌的贡献。尽管在十月革命时期还不可能出现后来称为办公室领导的现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作用也仅仅限于草拟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机构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还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过战斗行动,组织过武装队伍,深入部队、舰队和工厂去发动群众完成具体的策略任务和作战任务。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处于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他只充当配角。革命时期非常宝贵的智力素质、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热情和冲天干劲等等品质斯大林都不具备。处在革命之中、处在革命的震中的从来都是列宁。托洛茨基低多了。再下面才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大军。而在这个大军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两个领袖"的情况不曾有过。如果在1917年我们对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几十个布尔什维克说,15年之后"官方历史"将记述革命是由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他们是无法设想的,甚至认为连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然而,十分遗憾,历史,历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转的。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斯大林事后成了"英雄"。

尽管斯大林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是党员,从1912年开始任中央委员,这个那个苏维埃、委员会、编辑部的成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这一切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官僚的)地位。斯大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会议,这仅仅证明他进入最高层领导集团。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了解、研究范围广泛的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机关工作的机制,积累政治经验。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宁的好评,即认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仅像一个普通执行者应当具备的那样,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还善于搞妥协折衷,随机应变,在不断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环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和看风使舵的中派分子。

获得生存的机会

俄国在十月革命时期决堤了。社会的洪流将自己道路上的东西一扫而空。苏维埃俄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年中的最重要的月份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极其轰轰烈烈、胜利辉煌的时期。在1917年前夕还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党，几个月工夫就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然而"蜜月"太短促了。看来那些被搁在一边的问题，在那难忘的一年年底提上了日程，变得十分可怕，危险万分。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时候答应给人民土地、粮食与和平。他们已经开始给土地了，有了土地，粮食也就有了希望。然而和平不光取决于布尔什维克；一个巴掌拍不响，同样，单方面也不可能争取到和平。要缔结公正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的和约就更不容易了……当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大军已经在蹂躏俄国西部土地的时候，如何取得和平呢？

没有一个人对当时矛盾复杂的时局的了解能像列宁那样敏锐。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仅仅几天就向被委派率代表团去同德军司令部进行谈判的阿·阿·越飞作了指示。

起初看来，进展很顺利，因为1917年12月2日就签订了到1918年1月1日为止的暂时停战协定。不久便开始了和谈。派来增援越飞的有加米涅夫和其他几个布尔什维克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但是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柏林的

哈布斯堡王朝

指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时期。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其主要分支在奥地利，亦称奥地利家族。远祖系日耳曼人中的一支。11世纪初，由于该家族的主教斯特拉斯堡的维尔纳建立了哈布斯堡，其家族即以哈布斯堡为名。统治时期从1282年起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统治地域最广泛的封建家族。

霍亨索伦王朝

指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时期。霍亨索伦家族是德意志的主要统治家族。其始祖布尔夏德一世约在1100年受封为索伦伯爵。领地在今上内卡河、施瓦本山和上多瑙河之间。16世纪中叶，该家族在索伦前冠以"霍亨"字样，取其高贵之意，从此称为霍亨索伦家族。该家族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家族。

沙文主义势力占了上风，并且一心想要捞到最大的好处。他们已经了解到，俄国的战壕有一半是空的，苏维埃代表团的背后只留下原来的力量的影子。德国人提出了兼并性的、使俄国可能丧失广大领土的和约条件。

革命领袖高瞻远瞩，意志坚定。如果我们不缔结和约(即便是苛刻的、不公正的)，那么“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受到最初的几次挫折以后，甚至过不了几个月，只要过几个星期，大概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53]看来这里谈的是有关革命前途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和约问题的会议上，列宁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发生了冲突。表决的结果是：反对缔结和约的，即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起初得到多数赞成。

“左派”共产主义者，这里首先应该包括布哈林、布勃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拉狄克、奥辛斯基、洛莫夫等人，他们建议把重点放在发动欧洲的革命运动上。皮达可夫说，在欧洲如不立即举行革命，我们的革命将遭到毁灭。“左派”认为，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能够“推动”无产阶级采取反对自己政府的革命行动。应该说，“左派”把出现在欧洲许多国家中的革命征兆当作了大陆上燃起的烈火——世界革命爆发的开端。

我们知道，下一阶段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率领苏维埃代表团的托洛茨基，不顾中央委员会中的力量对比在他动身时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和平的变化，竟采取了突然的行动。1918年2月10日，对局部性问题的讨论进行不久，托洛茨基突然宣布中断和谈。他说：“我们的庄稼汉士兵应该回家务农，以便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农民的土地。我们的工人士兵应该回到工厂，不是在那里生产用于破坏的工具，而是生产用于建设的工具……我们退出战争……我们发出了全面复员我国军队的命令……”托洛茨基继续说：“根据上述声明，我递交如下业已签署的书面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的政府和人民以及中立国的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兼并性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

同时向全线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1918年2月10日

俄国和平代表团主席、

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代表团成员：**弗·卡列林、阿·越飞**

米·波克罗夫斯基

阿·比岑科

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梅德维捷夫**[69]

三天以后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企图证明他的决定能使西欧的工人运动"走向革命的道路"，证明"不战不和"的口号甚至将得到德国士兵的支持。但是这一臭名昭著的口号却为侵略者大举入侵俄国开辟了道路。在历史上直到今天这句话的发明权都是记在托洛茨基账上的。然而早在1917年4月，驻彼得格勒的法国大使巴列奥略在向巴黎报告时对盟国俄国的军事力量作的评价是："俄国在革命的现阶段既不可能缔结和约，也不可能打仗。"[70]很难说，托洛茨基是否了解法国大使"首先作出"的这种评价。

几天后德军开始了全线进攻。不久德国人的铁蹄践踏了德文斯克、文登、明斯克、普斯科夫以及俄国其他数十个城市和村庄的土地……中央委员会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终于以7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按德国条件签订和约的决定……

按契切林的说法，德国"用手枪顶着革命的俄国的额头"，签署了掠夺性的和约。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库尔兰、卡尔斯、巴统以及波罗的海诸岛……脱离了我国。但是对党来说，还必须在一星期后，即在3月举行的党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捍卫这一和约。

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多半是消极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同意这种或那种立场，而纯粹是因为他对这一整个复杂的、难以处理的问题不够了解。例如2月23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为了给自己的同志施加压力威胁说（在紧急情况下！），如他提出的关于签订和约的建议遭到否决，他将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这

时斯大林吃了一惊，开始犹豫起来。不错，他当时还提出一个问题："辞职"是否"意味着事实上退党"？对此，列宁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斯大林偶尔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特别是当"革命的荣誉高于革命的毁灭"的呼声四起时，他也就茫然若失了。洛莫夫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要害怕列宁辞职，要以革命为重。"乌里茨基说，即使签订了这个"可耻的和约，我们也无法拯救苏维埃政权"。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斯大林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议论的影响下，突然采取了不明确的、观望的立场，他说："可以不签订和约。"列宁对这个意见的回答是："斯大林说可以不签订和约，那是不对的。必须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三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这些条件动摇不了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也不犹豫。我提出最后通牒不是为了撤回它。我不愿听革命空谈。"[56]列宁毫不留情地、抓住要害准确无误地驳斥了论敌的论据。当列宁对所有这些左倾的和二元论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后，斯大林不知怎么立即"平静下来"并且紧跟在领袖的后面。这样，投票时他支持了列宁。

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激烈斗争中，列宁证明，之所以作出沉痛的选择，是因为生命攸关。斯大林经过内心的矛盾斗争，鼓起勇气跟着列宁走到底。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他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说："我在中央委员会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弃权了，原因有二。第一，我不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能够决定我国革命的命运……至于哪方面成功的希望大一些：是这方面还是那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较大的希望不在列宁同志那一边……在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主张立即签订和约，这就是季诺维也夫。"而谈到那些坚持缔结和约的人时，托洛茨基说：这条道路有着"某些现实的希望。但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生命是拯救了，但生命的意义却失去了"[57]。

国家和人民已经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因此对任何喘息的可能大多数人都看作是获得生存的机会。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不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而且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在解决诸如战争与和平如此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高瞻远瞩和智慧力量，在历史上这样的先例是不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共产主义者、空谈家、还有那些片面简单

地理解革命荣誉实质的人，他们攻击列宁搞“投降主义”、“偏离轨道”、“无条件地投降帝国主义”等等，但是这些责难吓不倒列宁。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同列宁站在一起的有季诺维也夫、斯塔索娃、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和加米涅夫等。在决定性的时刻斯大林是投票赞成列宁的。

旺代暴动

1793—1796年间，法国旺代省发生了农民的反革命暴乱。农民在暴乱中高呼口号“还我国王”、“国王和上帝万岁”。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资产阶级，率领他们的领袖是教区牧师。

俄国的旺代

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在发表演说时常常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找一些类比和例子。1918年初，十月起义胜利后不到半年，他们不禁想起了旺代——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和卢瓦尔之间的广大地区。1793年6月，旺代举行暴动了。新事物从来就不是一下子能被所有的人接受的，对受到龟缩在角落里的富有者和狂热僧侣的挑唆的不识字的庄稼汉来说，革命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吞食一切天经地义的习惯了的东西的神秘怪物。血腥的内讧席卷了布列塔尼、诺曼底、普瓦图、波尔多、利摩日。旺代成了外省反革命的震中。彼·阿·克鲁泡特金指出，“旺代变成了共和国化脓的伤口”[9]，成为由外国干涉而变本加厉的残酷国内战争的象征。在苏维埃俄国，自己的旺代成熟了。



克鲁泡特金(1842—1921)

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活动家

他指出现实社会存在两大弊病：一是国家，一是私有财产。他主张用“共产”取代私有财产，用自由联合取代国家，建立一个共产共有、经济平等、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克鲁泡特金凭借他丰富的生物、地理和历史知识解释人类互助本性，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他倡导的互助精神和自由意志以及“做你要做的事，按你的意愿行动”的口号，至今仍被无政府主义者奉为圭臬。

喘息的时间不长。1918年3至4月就已经开始了外国军事干涉，外国军事干涉复活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复仇希望。到处都有白卫军官、哥萨克、富农、民族主义分子的叛乱和反革命

活动。遭到四年战争破坏的国家不只是掉进了火圈，它自己全身都是战火。共和国没有边界了，全都成了前线。

巴黎、伦敦、柏林、东京、华盛顿和世界几十个其他国家的首都都确信：俄国处于濒死状态。在这个时期，掀起了一次最大的流亡浪潮。资产者、地主、厂主、教授、相当大一部分创作知识分子、大官吏纷纷离开了俄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自己的文章、声明、呼吁书中，不仅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扬扬得意的流氓无赖"夺取政权以后给国家带来的恐怖，而且预言苏维埃很快就要完蛋。加里宁过了几年谈到白卫分子的《日报》上发表的东西时，在《消息报》上写道："现在你们是承受国内战争的不幸的牺牲品，但是，你们的不幸不管对你们来说有多大，那只不过是1914至1917年人民苦难的海洋中的一小滴。你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你们用爱国主义的号叫声掩盖了人民的痛苦……"[59]

苏维埃政权的末日看来为期不远了，何况开始了对政治委员的大暗杀。在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人列昂尼德·凯涅吉谢尔枪杀了莫伊塞·乌里茨基；7月，拉脱维亚步兵队的著名政治委员谢苗·纳希姆松被白卫分子杀害；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大·佩尔申在塔什干被叛乱者打死。1918年5月，顿河的著名布尔什维克费多尔·波德捷尔科夫和米哈伊尔·克里沃什雷科夫被白卫哥萨克绞死。转向革命方面并成了西伯利亚司令部总参谋长的前沙皇军队中将亚历山大·陶别落入白卫军之手并被虐杀。但是，1918年反革命进行的最沉重的打击是在莫斯科。列宁在向米赫里逊工厂的工人们发表讲话以后，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向列宁开了枪。



列宁总是忽略安全问题。1918年他于遇刺前在红场上与工人亲切交谈

血腥的地界把俄国弄得四分五裂。国内战争的旺代席卷了多灾多难的俄国，兄弟可以去打兄弟，父亲同自己的儿子厮

杀。让·饶勒斯针对1793年的旺代讲过的话，好像也是为描述俄国的国内战争而写的："多么疯狂的欲望之火在这些感觉到差不多在心口插上了尖刀的城市熊熊燃烧！多么强烈的仇恨明天将会爆发！多么严厉的镇压既用来对付敌人，也用来对付那些可疑者，说他们是敌人的同谋，用积极行动或消极怠工帮助敌人！"[6]俄国的国内战争就其残酷性和不可调和性而言，是与那种把人民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深刻阶级仇恨相适应的。通常是不抓俘虏的。白卫军用刺刀戳死医院里的红军伤员。两军交锋无仁慈可言。前线伤寒流行。在峡谷里枪杀人质。生命降价了。阶级的呼唤胜过了同情、怜悯、智慧、理性。全国淌满了同胞的血。这场战争不只是由敌对阶级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大部分居民事实上也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主要催化剂和策动者是外国武装干涉。列宁指出："造成我国国内战争并使它拖延下去的真正祸首——世界帝国主义……"[1]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军营，建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约·约·瓦采季斯被任命为武装力量总司令，接替他的是谢·谢·加米涅夫。开始用红色恐怖来回敬白色恐怖。



让·饶勒斯(1859–1914)
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在现存制度下经过政治斗争改变阶级力量对比和国家性质，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1914年他在巴黎遭暗杀。《社会主义的法国革命史》、《新军》等是其生前主要著作。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心情沉重地申明："……我们要复仇，实行红色恐怖，团结一致、无情地镇压反革命。"

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他执行中央委员会下达的任务，这些任务比较复杂和责任重大。在东方战线的右翼，到1918年中期开始起重要作用的是察里津。与其说是出于军事考虑，不如说是由于粮食困难，斯大林作为中



央粮食供应特命全权代表被派到南方,派到察里津。1918年5月31日,列宁签署了5月29日和3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任命斯大林和施略普尼柯夫为享有特殊权力的俄国南方粮食工作的共同领导人的决定[9]。在俄国的各个政治和工业中心的生命线上,冷酷无情的饥饿的绞索越拉越紧。看来,列宁已经形成了把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之一作为可靠执行者的意见。从列宁来到彼得格勒时起,他就相当频繁地不得不会见这个不多言的高加索人,后者很少提出问题,不公开对中央通过的决定表示怀疑,接受任何委任。好像他对为他准备好的不起眼的但可靠的工作人员这个角色表示满意。斯大林就这样处之泰然地接受了被派往察里津的任务。他起程到南方之前被通知,列宁对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作了补充,即命令陆军人民委员部负责工作人员谢·伊·阿拉洛夫抽调一支400人(其中一定要有100名拉脱维亚步兵)的队伍护送他——陪同斯大林成行[8]。

斯大林不得不立即解决军事任务,因为察里津陷入了哥萨克人严严实实的包围圈中。斯大林参加了地区军事委员会。在短时间内地区军事委员会得以把分散的部队统一起来,进行动员,编成几个新师、一些特种部队、一个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支队。根据斯大林的请求,列宁急电水运总管理局,责成立即绝对服从地执行人民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人民委员斯大林的一切命令和指示。



1918年,斯大林担任苏维埃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伏罗希洛夫指挥下的原第5集团军的部队从顿巴斯突进到察里津时,察里津的形势开始比较稳固了。指出如下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虽然从作战上说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的下属,但他不把自己的报告呈送给托洛茨基,而是越过总司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常常公然直接向列宁提些小问题。斯大林的大多数电报的特点是缺乏深刻的概括,缺乏政治评价,缺乏预见。这些电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经验主义的。由于中央和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察里津在短时期内

做好了被围的准备。尽管邓尼金从叛徒、前沙皇上校军事专家诺索维奇方面得到援助，对察里津的强攻并没有给白卫军带来成功。后来，察里津就像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曾经到过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我国历史上都获得了不只是传奇的意义，而且简直是神秘的意义。

斯大林不具备战役、战术知识，但在保卫察里津的大会战的危急关头，却表现出一个独裁者的派头，表现出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斯大林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形势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64]诺索维奇以及许多沙皇军队以前的其他军官的叛变，加重了斯大林本来就有的对军事专家的疑心。在粮食问题上被授予特命全权的人民委员，没有隐瞒自己对专家们的不信任。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大批军事专家被逮捕。用驳船作浮动监狱。许多人被处决。他有一些追随者。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军事问题发表的讲话中谴责了游击习气，并且毫不含糊地说：“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65]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是，甚至在30年代末，一个红军指挥员过去曾经当过沙皇军官也是加重治罪的情节。

由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察里津苏维埃主席谢·康·米宁和方面军司令员帕·巴·瑟京组成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得不协调。斯



1920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谴责游击习气

大林认为,决定,甚至无关紧要的决定,都应该只由委员会集体通过,而作为司令员的瑟京则试图按照军事逻辑行事,避免在采取决定时作无休止的“协商”和“推敲”。斯大林向莫斯科示意,瑟京不应该得到信任。瑟京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作出回答。他在这个报告中断言,米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限制他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活动,要求所有的问题,甚至小问题都要同军事委员会协商,这就使作战指挥大大复杂化了[66]。斯大林占了上风:1918年11月初瑟京从司令员的位置上被撤下来了。斯大林终于使军事专家处于经常被监督的地位。他知道,托洛茨基是支持军事专家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在那时就已经不止一次地爆发了电报战,电报战开始了彼此的深刻不和,不和变成敌意,而最终又变成仇恨。

斯大林并不难为自己到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和观察点去视察。他经常呆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地发急电,召见政委、指挥员,要求报告、汇报,以军事法庭相威胁,派人去进行监督。在国内战争的年代,斯大林就已经不止一次地采取了极端措施——命令枪毙怠工者、可疑的军事专家、他认为危害事业的人们。在察里津、彼尔姆、彼得格勒都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斯大林驻留在察里津时枪毙人的事情,谈到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67]。军事情况就是如此,事后并不总是可以正确地估计到这些或那些措施是必要的。旺代造成了大流血,国内战争也是如此。斯大林在这次战争中感觉自己比在1917年10月更有信心。他颇像茹尔·米歇尔笔下的国民公会特派员卡里厄,这个人认为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加控制地发泄残酷的激情和暴力是自然的。斯大林在国内战争那个时候就已经相信暴力万能了,他认为,暴力对待敌人永远是正确的。

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的工作作风。最敏锐的指挥员们在那时就已经不能不感觉到,此人处事刚毅果断,很难“推动”他作出偶然决定,影响他的意图。在这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19年5月19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抱怨“对他这个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采取的不公正态度”。他指出中央对他的活动支持不力,不过他写道,“列夫·达维多维奇了解这个情况”(指托洛茨基),但这却“值得斯大林同志大声呵斥,怎么乌克兰的同志们从要阴谋转到搞行动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就间接地证实了斯大林影响前线

局势的能力。

斯大林不知道作战艺术的奥妙，主要强调纪律、无产阶级责任、革命觉悟，并且常常用"革命惩治"进行威胁。察里津一战以后，斯大林感觉到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同事们中间更加有信心了。到这个时候，在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军事领导人"中间，斯大林已经是一位足够有名的人了。诚然，他在前线呆过，执行过列宁的任务，但什么样的特殊"军事天才"也没有表现出来。估计战局，作出关于力量对比的结论，提出独特的战略思想——没有任何可信的客观证据证实他有"高度才能"。而"强制"作风，后来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命令作风，可以说其创造者首先就是他——斯大林。斯大林的作战方针是极其简单化的，甚至可以说是粗浅的。这里举一个他通常在前线下指示的例子。在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同第1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1919年10月经直通电话谈话时，奥尔忠尼启则报告说，集团军准备回师打下克罗梅市。需要增援部队。斯大林回答道：

"我们最近一次指示的意思是，使你们有可能把这些团队集合成一个集群，并且把邓尼金的最好的团队消灭掉。我重说一遍——消灭掉，因为谈的是消灭。敌人占领克罗梅——小事一桩，总是可以纠正的，而基本任务是不要一个一个地放出突击群团队，而要用一个连成一片的集群，在一个一定的方面打击敌人。"[68]

经常使人感到，在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指示中有一种强大压力，这不能说是领导人的军事艺术。虽然在30年代以及以后，关于斯大林作为统帅的指挥艺术，写了不少书和答辩论文。伏罗希洛夫关于斯大林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统帅"的著作特别富有吹捧的味道。而要知道，斯大林当时并不是军事领导人，而是中央的政治代表、全权代表，在许多场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对于国内战争的胜利，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作出的贡献不是少于而是多于斯大林。这首先是托洛茨基、古谢夫、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布勃诺夫、达尼舍夫斯基……

无论在哪里，斯大林个人参加国内战争不仅因他履行了自己担任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这两个人民委员部委员的职责而受到表彰，而且在政治、宣传，尤其在军事方面引人注目。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列宁常常利用斯大林作为中央特命全权代表，派



国内战争的宣传画，题为：战胜反动的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部队

去进行检查、核实、纠偏、收集详细情报。例如，1918年6月列宁电告斯大林，政府关于凿沉黑海舰队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罪人将不受法律保护。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建议把能够执行这个命令的有威信的工作人员派往新罗西斯克[69]。列宁这个月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回答了关于黑海舰队命运的问题，他在说明形势时补充说："人民委员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很快就要来莫斯科，他们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70]

列宁在斯大林开赴前线之前经常作指示和开导，认为他不只是中央委员，而且是多民族国家的代表之一，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列宁在准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保卫阿塞拜疆的决定草案时亲笔写道：委托斯大林通过组织局"从各方面物色尽量多的穆斯林共产党员去阿塞拜疆工作"[71]。

在国内战争的某些"篇章"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扮演了政治领导人的角色。例如，在反革命第一次试图借助于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叛乱消灭苏维埃政权时，斯大林受列宁的委托会同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波德沃伊斯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一起参加了保卫彼得格勒的组织工作和动员力量粉碎叛乱分子。根据列宁的建议，斯大林执行了具体任务：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入战斗准备，构筑防御线，在各工厂建立赤卫队。

在这里很多人已经有可能相信斯大林是坚毅顽强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以不容异议的声音口授指示，下达命令。但是同时，有眼力的党员已经看出了他不仅坚毅顽强，而且爱报复、爱记仇。1918年12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一起指责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伊·奥库洛夫破坏组织。由于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列宁作出决定："鉴于伏罗希洛夫和奥库洛夫的关系极端紧张，我们认为由另外的人来接替奥库洛夫是必要的。"[22]列宁在这种情况下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而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却讲了为奥库洛夫辩护的话："伏罗希洛夫同志竟然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破坏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骇人听闻。奥库洛夫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奥库洛夫多次报告说，那里还有游击习气。"[23]1919年6月在彼得格勒，斯大林同奥库洛夫又发生争吵，奥库洛夫要求彼得格勒军区服从西方面军的指挥。由于俄共(布)中央和国防委员会驻彼得格勒特命全权代表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列宁委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以列宁的名义发一个电报：召回奥库洛夫，"使冲突不致扩大"[24]。但是结果斯大林在30年代末仍然记着奥库洛夫的仇。

大概，在国内战争中列宁还是从消灭杜鹤宁叛乱的时候起开始重用斯大林的。1917年11月9日，列宁来到同杜鹤宁大本营联系的直通电报机旁，同列宁站在一起的有斯大林和克雷连柯。保皇党人杜鹤宁不理睬苏维埃政府的命令。那时，就在这里开了个短会以后，列宁在直通电报里向大本营传达了简短命令：撤掉杜鹤宁军队总司令的职务，任命军事人民委员准尉尼·瓦·克雷连柯取代他。过了一天，新任总司令在一支500名战士队伍的护送下来到大本营。尽管克雷连柯和其他人试图防止施用私刑，杜鹤宁还是被打死了。

列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利用斯大林去调查前线某些地区失败和发生惨剧的原因。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无组织性不仅表现了部队在许多战场上的行动特点，而且有时表现了某些革命同路人、伪装起来的保皇党和白卫军直接叛变行为的特点。1918年12月，第3集团军在彼尔姆地区遭到巨大失利，这就造成了使高尔察克同北部反革命势力和侵占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大部领土的一部分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会师的严重威胁，这时俄共(布)中央派出了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到维亚特卡。责成特别委员会分析失

败的原因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扭转局势。全权使者们毫不拖延地采取了断然行动。一批承认对失败负有责任的人被交付军事法庭。差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被撤销部队领导职务。特别强调加强对红军战士的政治工作、巩固纪律、改善供给。从来就对来自军事专家的指挥员存有疑心的斯大林，利用某些前军官叛变的真正事实，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断然行动。

由于采取了措施，第3集团军（会同第2集团军）在1月反攻中才得以挽回局势。斯大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采取了措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恢复。在集团军后方，清洗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正在认真进行。已经在维亚特卡和各县城组织革命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进行了清洗并补充了新的工作人员……"[8]

斯大林的评价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很武断的。这里举个例子，看他是如何评价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斯大林写道："第3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是由两个委员组成的。其中一个委员（拉舍维奇）指挥作战。至于另一个委员（特里丰诺夫），始终没有能够弄清楚他的职务和作用：他不监督供给工作，也不监督军队政治教育机关，似乎根本什么也不做。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因坚决果断和意志坚定而获斯大林尊重的捷尔任斯基

在报告的结论中，斯大林没有点出托洛茨基的名字，却毫不掩饰地谈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某些领导人"不起什么作用，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仅仅下达"一般的指示"。但是不得不纠正斯大林的过火行为。根据他的指示，一大批工作人员被送交军事法庭。中央的一次会议（1919年2月5日）讨论了全权代表们的报告，决定："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在第3集团军逮捕的所有的人都转交给相应的机关处理……"在这次外出中，斯大林更多地了解了捷尔任

斯基,而且看来似乎对他非常尊重,尊重他办事可靠,坚决果断。因为他最重视坚决果断和意志坚定:斯大林本人就从来也不曾缺少这些品质。

有时他的坚决果断也表现在对中央的坚决要求上。1920年6月3日他在从前线写给列宁的信中要求尽快肃清克里木战线。斯大林写道,必须"要么同弗兰格尔真正休战,从而有可能从克里木战线抽出一两个师,要么抛弃同弗兰格尔的任何谈判,不等弗兰格尔加强自己,现在就打击他,而且歼灭他,为波兰战线腾出力量。现在的情况由于不能明确回答克里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能忍受了"[26]。列宁直接在这封信上给托洛茨基写道:"这显然是空想。要付出的牺牲不是太大了吗?我们将使无数的士兵丧失生命。应当反反复复地考虑和斟酌。我建议这样答复斯大林:'您的进攻克里木的建议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情况,极慎重地加以考虑。请等待我们的答复。**列宁 托洛茨基**。'"[27]

托洛茨基在回信上说,斯大林直接上书列宁,破坏了既定程序(按照他的意见,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亚·伊·叶戈罗夫本应报告这个情况),列宁接到托洛茨基的这封回信后添写了下面的话:"这里面大概有点任性。但是要尽快讨论。有哪些非常措施?"[28]

尽管列宁试图调解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却是冷冰冰的,互有戒心。未来的总书记过分敏感地感受到托洛茨基威望的提高,认为他得到这种威望是不配的。在难得来到莫斯科的期间,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人们给他看了几封内容相似的电报。我们举出其中的一封:

>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
>
> 值此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坦波夫省左西莫夫乡科切托夫卡村的公民们决定改换村名,用您的名字命名——托洛茨基村。我们请求允许我们用我们红军的亲爱的领袖和鼓舞者的名字来为我们村命名。
>
>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C·涅恰耶夫**

顺便说一句,还在国内战争时期,在苏维埃俄国第一批改名的城市(现在的加契纳和恰帕耶夫斯克)中就开始用托洛茨克这个名字了。

在列宁的军事通信中多次碰到对斯大林的心胸狭窄和因小事而争吵表示惊讶的话。例如，对列宁关于必须援助高加索战线的一封电报，斯大林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把对高加索的关注首先加在我身上……对加强高加索战线的关注应完全加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身上，而不是斯大林身上。据我了解，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都非常健康，斯大林的工作却如此超负荷。"[79]斯大林表示不满，并且提醒列宁，他的"工作却如此超负荷"。列宁的回答是坚决的和言简意赅的：

> 把加快从西南战线转到增强高加索战线的关注加在您身上。应该千方百计帮助，而不应该为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争吵不休。
>
> 列　宁
>
> 1920年2月20日[80]

但是稍后在斯大林报告中任性的调子是非常清晰可闻的。同年8月4日，列宁打电报询问斯大林：

> 明天晚上6时召开中央全会。您要力求做到在此以前送来您关于布琼尼那里和弗兰格尔战线停滞的性质以及关于这两条战线上我们的军事前景的结论。极重要的政治决定可能取决于您的结论。
>
> 列　宁

斯大林不知所措。一方面，看来他不想为可能作的"极重要的政治决定"承担责任，而另一方面，他从来就不具备预测的才能。他在电报上回答说，"战争是一种竞赛，估计到一切是不可能的"，而对列宁建议的实质他回答说：

>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您需要我的意见，因此我不能把您所要求的结论转达给您，我只限于通报一些不加说明的单纯的事实。
>
> 斯大林[81]

是的，这就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但是，在对斯大林的要求比他本人所想的要多的时候，在他的回答和行为中就令人明显地感觉到有与列宁还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如此敏锐地察觉到的任性搅和在一起的委屈和疑惑。

我要作一段插叙。在档案馆里保存了大量给托洛茨基的信件。阿·阿·越飞，托洛茨基老早的拥护者和志同道合者，给他写的信特别多。在一封写给托洛茨基的很长的信（有20多页）中，越飞实际上是请求推荐他到可能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这个有权威的岗位上去。越飞写道："如果说为了事业可以把斯大林从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的岗位上撤下来，因为他将在任何岗位都有用，而在工农检查院却不工作，那么，毕竟不能把契切林从外交人民委员的岗位上撤下来，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更有用……"[48]很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将在"任何岗位都有用"：因为"不工作"？或者说，越飞考虑的是人民委员的潜在可能性？

越飞也给列宁写过信。他收到过这样内容的答复：

> 第一，您重复（不止一次）说，"中央——就是我"，您这就错了。只有在非常激动和疲劳过度的情况下才能写出这种话来……
>
> 第二，……那么事情又怎么解释呢？只能用您**机遇不好**来解释。我在很多工作人员身上看到这种情况。斯大林就是一个例子。他当然是可以为自己争辩一番的。但是"机遇"使他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

阿道尔夫·阿勃拉姆·越飞
(1883–1927)
苏俄早期外交家

曾任国际法教授。1917年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武装起义，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率领苏俄代表团参加苏德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主持对德媾和事宜。后任苏俄驻柏林代表。1917–1919年成为俄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1年7月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1924–1925年出使奥地利、加拿大。1925年参加俄共（布）党内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在工农联盟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等问题上与斯大林有分歧。

1926年"新反对派"受到批判，后与托洛茨基派合并。1927年11月17日因为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而自杀身亡。1987年恢复名誉。

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紧紧握手！

您的列 宁[8]

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也和中央的许多其他同志一样，不止一次地作为中央的全权代表、特命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线。例如，1919年春天，在彼得格勒地区形成了严峻的局势。尤登尼奇、协约国部队计划在短时期内占领革命的策源地。第7集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负责保卫彼得格勒。反革命的优势兵力逼近红谢洛、加契纳。红军的总指挥部把其他战线的精锐部队调往彼得格勒附近。斯大林带着特命全权代表的委任状不是经常呆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就是呆在防线部队司令部。和历来一样，他的工作方法是独裁专制的：把不胜任的人撤掉，把他认为对既成局面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庭，调整供给，"彻底搜查"管理机关。在西方面军司令部，也像在防御彼得格勒的第7集团军中一样，曾破获一起阴谋；阴谋者自然都被枪决了。有些人在召开群众大会时还表示满不在乎，后来态度逐渐转变，开始集中精力干事，有了革命决心。根据《保卫彼得格勒》号召书，城防领导人列梅佐夫、托马舍维奇、波泽尔恩、沙托夫、彼得斯、刚来的斯大林、其他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反击反革命。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也和托洛茨基一样，曾荣膺红旗勋章。



红旗勋章，设立于1918年9月16日。1924年8月1日，设立全苏统一的红旗勋章，将其上面的俄文PCΦCP（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

以前，事情总是被描绘成这样：斯大林被派到哪里，那里的情况就发生好转。这远非如此。我们还要补充一句，斯大林照例是作为小组成员去的，任务是把列宁和中央的方针付诸实现。老实讲，在军事方面，他的功绩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1918年起，党的领导核心的同志

们都承认;这不只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执行者,而且是一个采取惩罚的“非常措施”的专家。人们也都知道,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开始流露出自我吹嘘的调子了。斯大林在从彼得格勒打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

“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为这种所谓科学悲叹……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19]

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

——斯大林



斯大林例行出差回来以后,他便被用来在中央机关处理日常事务。从前线来的一系列电报证明,斯大林在那时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实际权力。例如,1921年11月15日托洛茨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坚决彻底地妥善解决高加索民族旅和军需库的问题。”托洛茨基接着向斯大林谈到必须通过政治局作出这方面的三项决定的问题。这是托洛茨基给斯大林的少有的电报之一。他们好像力求彼此互不“察觉”。相互不友好,在他们相识之后很快就产生了;斯大林心里仍然认为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他不喜欢托洛茨基的自以为是,不喜欢他的口才、威信、“表现自己”的本领。使斯大林愤慨的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乘专列到前线巡视时，有一辆装甲列车,有时是两列装甲列车以及一个全副身着皮装的青年红军特别大队护送。托洛茨基使自己置身于这种舒适环境之中,对斯大林来说却是带有挑衅性的。但是在灵魂深处,斯大林忌妒(并且同时仇恨)主席的口才、他的干劲、声望。

托洛茨基公开声称："没有镇压就不能建设军队。在指挥的武库里没有死刑，就不能引导人民群众去效命疆场。"[6]当时斯大林并没有谴责这条路线，他从心眼里是同意这条路线的。在紧急情势下，他自己也采用这些措施，而且不仅仅是他。1920年5月12日，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报告：

>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
>
> 在第14集团军战线，在波兰人进攻时部队中发生了可耻的逃跑事件。已下令每10名逃跑者中枪毙1名。
>
> **别尔津**[6]

国内战争中的旺代，对敌人也好，对自己也好，都是残酷的。正如曾任北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的诺索维奇（他后来叛逃到白卫军那里去了）所回忆的，斯大林如果深信他面前的是敌人，他是从来不动摇的。例如，在察里津，就曾经逮捕过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几名被控告犯有参加反革命组织罪的前军官。斯大林的决议是简短的："枪毙。"这些人不经任何审讯就立即被枪决了。斯大林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深信，惩罚行动"万能"、不会出故障，因为它能够保证必需的政治"结果"。

在1918年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会议上，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还讨论了斯大林关于第10集团军在供给工作中怠工事件的信。斯大林坚决要求把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们送交军事法庭审讯。然而，斯维尔德洛夫主持的中央会议却作出决定："对任何人都不追究法律责任，责成阿瓦涅索夫同志进行调查，并把结果报告中央。"斯大林的一味要求未被接受。

斯大林感觉到了力量，感觉到了有能力对虽然是局部意义的但却是相当引人注目的重要事态和正在发生的过程发生影响，他在许多场合开始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就是这种性格在未来成了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例如，斯大林作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在对邓尼金部队的主要打击方向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争论中斯大林非常尖刻，粗暴，不容异见。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不只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同时要贬低自己的论敌。

军援助了。当然，战略失算应归罪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方面军司令部。但是，还在8月5日，斯大林就已同意关于把3个集团军转交西方面军的建议！而在决定性的时刻他又妨碍了事情的进展，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斯大林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实现莫斯科批准的自己的建议。他和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其他负责人一样，对巨大的失利有同等的罪过。但是，自然，斯大林并没有想承认自己的失误。在他身上那时就已经诞生了"一贯正确"的素质。

列宁再一次指出，在评价任何情势时，任何时候也不能背离真相。列宁在分析失利的根源时说："当我们逼近华沙时，我们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潮的鼓舞下，感到自己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战争虽然使我们几乎有可能把波兰彻底击溃，但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军事编年史家在强调斯大林在南方面军、东方面军、西北方面军的"转折"事业中的"特殊"功绩时，却从来没有提起过他在波兰战役中的作用。他在那里是不能从积极方面表现自己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只搞孤家寡人，不保证社会发展、军事学术的客观规律得以实现的相应条件，那么这些规律是"起不了作用"的。

如果把斯大林在未来还干了可怕的、不可饶恕的事情都统统舍弃掉，并且不认为他是天生的"坏蛋"，那就可以肯定，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是，这是"全权代表"即受委托的人的功劳。正像人们后来所写的，斯大林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性的贡献"。同时决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斯大林从革命一开始就进入党的最高机关；起先是进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然后是进入政治局和组织局。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特别是到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的地位巩固了，他成了党的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

对斯大林这个时期的活动的仔细分析表明，他比许多党的领袖略逊一筹。作为理论家，他顶多是个通俗化者，他没有雄辩家的艺术才能，而在历史性的革命动荡时期这种艺术才能是很重要的；谁也不能在谈到他时说，这是一个"推心置腹的"、"善良的"人。斯大林明显地缺少被视为美德的那些道德品质。但是，他有某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革命和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保护了”叶戈罗夫，多半是因为关于撤换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出自托洛茨基。至于“坐失克里木”的人，这里当然也有斯大林的份……斯大林在1920年就居然能够武断地宣称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绊脚……”。斯大林的道德缺陷老早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标志。随着他的地位的巩固，这种缺陷在未来变得越来越危险和越来越带有不祥之兆。循着这种演变，你会产生一个想法，斯大林到底讲不讲良心？

从国内战争时期起，斯大林就不仅非常了解叶戈罗夫，而且非常了解革命所诞生的许多其他苏联统帅——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在同资产阶级—地主的波兰的斗争中取得第一批重大胜利以后，大家知道，1920年红军部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往后，差不多过了20年，斯大林把“由于受背叛性意图的指使而造成的不能容忍的迟缓”的罪名加在了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事首长身上。他也不想一想，他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前线部队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都完全负有责任。

1920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把西南方面军的克里木地段划分为独立的南方面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建议，把第12集团军、第14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转交西方面军。尽快实现转交是不可能的。而8月13日，叶戈罗夫和斯大林报告总司令说，方面军的各集团军都已经在利沃夫—俄罗斯拉瓦地区投入战斗，“在这种条件下各集团军要实现基本任务的改变，那是不可能的”[9]。



1920年，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叶戈罗夫和斯大林

而当总司令加米涅夫把关于转交第12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的新指示送交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时候，斯大林拒绝在关于把这两个集团军转交西方面军的指示上签署。在上面签署的只有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在进行这些争吵、联系、商量的时候，时间浪费掉了。骑兵第1集团军只是在8月20日才开始从利沃夫方面退出，它已来不及给予西方面

原书缺页

的其他领袖们所没有的另外的东西。斯大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表现出具有罕见的明确的目的性和对具体思想的执著性。在达到领导提出的目标时，他的意志、顽强、毅力、决心给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留下了印象。不能不看到，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战争的年代形成的。他感觉到了权力，懂得了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制；他相信，压力、顽强、强制在紧急关头能够提供预期的结果。

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不少同志是知识分子，或者正像有一回(已经是20年代末了)斯大林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说出的那样，"是著作家"。斯大林从来没有当众发挥过这个主题，这首先是因为列宁也是"知识分子"，也是"著作家"，也是"流亡者"。但是，这个人的天才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斯大林后来在提出永远"与列宁在一起"的"第二领袖"的概念时，从来也不容许对党和革命的真正的、无可争辩的领袖进行任何直接的人身攻击。当列宁批评斯大林时(关于"自治化"、对外贸易垄断制、前线事务，以及其他问题)，此人通常默默同意列宁的论据。列宁对斯大林的精神的、智力的支配权是显而易见的。

谁会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不治之症竟然来得这样早，斯大林作为党的或苏维埃的一个岗位上的"第二或第三"梯队领导人的形成过程会怎样继续发展呢?！谁知道呢？我再把这一点重复一次：研究者有权把假设同既成的命运加以对照。虽然对于我们所有现在已经对此人有所了解的人来说，一想起斯大林这个领导人(不管是第几梯队领导人)就不由得感到痛苦和反感。

那个曾经代表列宁近卫军的敏锐的"智力阶层"，在决定性关头水平不高，居然让一个具有独裁者恺撒气质的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但是在紧要关头却不能实现我国革命的惟一领袖的最后意志。这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呢？为什么就没有实现另一种抉择呢？关于这一点，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还将长期争论下去。而时间的长河则继续送来只供我们分析的种种事态。过去——不是幽灵的舞台：那儿占优势的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而是不可逆转的势头。



1922 年建成了苏联,这本来是个牢不可破的联盟



第2章

领袖的警告

最难得的勇气是思想上的勇气。

——阿·法朗士

（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

每个人都站在个人命运的门口。这扇门的里面是什么，他怎么进入，迈进门槛之后等待他的是什么，届时生活的安排又将怎样，这一切谁也没有确实的把握。这里没有命中注定的事，然而毕竟……谁在国内战争结束时能够想到，在列宁的战友、一辈杰出的革命家中间，也包括这样一个人，此人并不比别人多才、高明和突出，但却成了列宁的接班人呢？斯大林本人在列宁在世时能想象到恰恰是他将成为党的领袖，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国以及全民的领袖吗？谁在当时能够设想，客观和主观情况、未付诸实施的决定和历史的偶然性汇集在一起会把斯大林推向一个大国权力的顶峰呢？大概是不可能的。列宁健在时，斯大林本人更多的也只是考虑不要被排除在列宁的高才智高道德水准的整个战友队伍之外。

在任何历史转折、群众性动荡和革命大变动的时代，人们的遭遇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期望，有悲伤，有欢乐，有失望，而生活就在这种复杂的情景中不断向前发展着。在人民群众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情况下，首脑人物、领导人和领袖总是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有列宁这样的大家公认的领袖领导着革命，就造成了一种情况：人们都抱有就当时来说是最强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存在着防止出现荒谬的偶然事件的特殊保障。我想，今后也会是这样。

列宁很少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本是一位健壮的人，能够承受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负担。试想一下吧，列宁仅仅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就写出了（亲自执笔，没用当今必不可少的助手和笔杆子）那么多的天才著作！组织任务是很繁重的。看一看列宁年谱就能对巨大的工作量有一个概念。而且这一切是在他对革命的命运、对革命的现在和未来的命运担负重大责任的情况下完成的！列宁健在时，他的战友问题，周围一班人的问题，还从来没有作为可能的接班人、可能代他起作用的"继承人"的问题来提过。然而，1921年底刚一出现常人无法忍受的过度疲劳的最初征候，继而又是患病的最初征候，就有越来

越多的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都有谁在列宁身边……托洛茨基的妻子H·И·谢多娃回忆说:“关于列宁生病的最初消息大家是悄悄传播的。似乎没有任何人想到过列宁会生病。许多人都知道,列宁非常关心他人的健康,而他本人似乎很难生病。由于沉重的工作负担导致心脏过度疲劳,几乎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患有心脏衰弱症。医生们抱怨说,几乎所有人的发动机都运转不规律。格季耶教授说:‘只有两个完好的心脏,那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托洛茨基的心脏。’”[①]

令人悲痛的事情过后,费尔斯特、奥西波夫、阿布里科索夫、费尔贝格、魏斯布罗德、焦申等教授和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谈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开始患病的时间是1921年底,准确时间难以判定,因为按全部病历资料来看,疾病是缓慢发展起来的,是在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逐步损害了他的健壮的肌体,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对自己的疾病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1922年3月,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检查身体的医生们不论在神经系统方面,还是在内脏方面都没有发现任何肌体病患。鉴于他剧烈头痛和极度疲劳,建议休养几个月,于是他搬到哥尔克村。但是,过了不久,在5月初,发现了脑部疾患的初步症状。第一次发病的现象是身体虚弱,丧失说话能力,右臂和右腿活动困难……由于健壮的肌休和身边人员的精心护理,7月病情大为好转,8月和9月病情更加稳定,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0月间恢复了工作,但工作量较前减少。11月,他作了三次长篇纲领性的讲话。”[②]


列宁在哥尔克村休养

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列宁当时还算年轻。但列宁于1917年4月回到俄国以来实际上没有休息过。他每天工作14到16个小时。据他的秘书说,已经得病以后,他不知怎地觉察到这些年里他只“休息过”两次。第一次是躲避临时政府的密探,隐匿在拉兹利夫(然而我们倒是了解,他在这段时间完成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天才著作);第二次是承蒙范妮·卡普兰的“关照”——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枪行刺。真正的天

才们的命运看来就是如此:他们比其他的人更快地耗尽精力。他们就像同时从两端点燃的蜡烛:在工作岗位上要履行艰巨的正式的日常职责;而在家里,在家庭成员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卸掉他对社会、国家和党所负的重大责任。

列宁在感受到重病即将袭来之时意识到,他不在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某种能够造成党的领导分裂的情况。我想,早在1921年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试图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战友。或许当时首次产生了立"遗嘱"的想法?1922年11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仿佛预感到大病又将发作,当他把看过的书籍交给图书管理员舒·姆·马努恰里扬茨时,坚持把恩格斯的著作《政治遗嘱(未发表的书信集)》给他留下。他在封面上写道:

留下,放到书架上。

列　宁

1922年11月30日[3]

时间过了不到一个月,列宁大病初愈便于12月25日深夜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三部分。正是这封信证明,尽管这位天才面临成堆的日常问题,但他一直关心着以后的事情,**身后**的事情。未来的列车总是处在就要进站的状态,不能让它停下来。列宁曾是没有法定地位的领袖,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由于他的非凡的才智和道德品质。他的左右都是哪些人?为什么这些人登上了革命的顶峰?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在列宁的战友中,斯大林如何?下面我们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战友们

和平转向战争总是困难的。但是战争转向和平也不简单。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维埃俄国所出现的形势下尤其如此。"崩

溃”、“荒芜”、“饥荒”这些字眼尚不能完全表达20年代初期社会的动荡、变形和遭到破坏的程度。俄国是处于敌对国家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巨大的革命岛屿。在国内，国家在许多省和县频繁发生的暴动和对新秩序的暗中反抗中震荡。大概谁也不像列宁那样明白，新政权遇到了国家命运所系的重大问题。革命胜利了，坚持住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个政权目前给予和能够给予工人和农民的实在太少。已经宣布的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和受教育权，“战时共产主义”保证不了。为了避免贫穷共产主义可能造成的崩溃的后果，需要有强有力的、大胆的思想和措施。当时只有党才能实行这些思想和措施。党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核心力量，围绕着它，生活的脉搏继续激烈地跳动着。在1921年初，2万多个支部包括了73万名共产党员。将近四分之一的党员参加了红军。

国家的真正领导核心是列宁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不多。例如“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共有委员25人和候补委员15人。“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略多一些，有委员27人和候补委员19人，这是列宁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中央全会通常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内有领导核心，主要由莫斯科的同志组成，他们负责日常工作的大部分：处理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问题，同党内的少数民族队伍建立密切的关系和确定对“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方针，贯彻新经济政策，等等。同时，这个(按现在的说法是“非正式的”、“不是按制度建立的”)核心的某些成员本身往往属于某一集团、某种“纲领”和某一

战时共产主义

亦称军事共产主义，是苏俄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为了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战胜敌人，苏维埃政府被迫实行一些临时性政策，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它对战胜国内外敌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但是，它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尝试则未能奏效。1921年，苏俄政府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民主集中派”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920年。它的领导人是过去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新斯基、季·弗·萨普龙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等人。“民主集中派”反对对企业实行一长制的领导，主张实行无限制的集体领导制，把“地方政权”同中央政权机关对立起来，要求党内有派别集团活动的自由。

**“工人反对派”是俄国共产党(布)内的一个派别(1920—1921年)。它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建议由工会领导国民经济。参加这个派别的有施略普尼柯夫、弗拉基米罗夫、柯伦泰、卢托维诺夫、梅德维捷夫等。

派别……一切都是生疏的:党成了执政党,党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构成党的领导核心的那些工作者的政治立场、道德品质和业务能力起着巨大作用。

列宁是战后各次党代表大会——第十、十一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尽管列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惟一以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他的威望、榜样、经验、理论著作、全部行动方针,就其对党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的精神上的影响来看,是别人无法比拟的。列宁生病以后,大家对这一点的感觉尤为突出。

1923年4月17日,斯大林在党的"十二大"作组织报告时强调指出:"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至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④]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就是这样说的。报告的这一部分的全部内容都贯串着列宁关于经常更新领导核心的思想。15年以后,斯大林观点的演变使他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虽然即使在1937至1938年他讲的往往还是正确的。当然,他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但是当时,即在20年代初期,他的言行不一还不明显。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发展了关于党的(实质上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的)领导核心的思想,他这样论述自己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培养党的领导人是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很多年,5年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比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要容易得多。"[⑤]

看来可以同意斯大林关于必须经常更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结论。然而按现今的标准来看,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成员当时是多么年轻啊!列宁刚过50岁就成了最"老"的一员!战友们有时相互称列宁为老头子就不是偶然的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40岁的革命家。早就

被古希腊人称作高峰期的这种年龄是一生中成就最大的幸运时刻,因为人们认为正是到40岁时才能做到脑力和体力协调自如,才是一个人的鼎盛时期。

在考察列宁的某些战友形象的特点之前,我们要对全体战友毫无例外地加以指责,尽管这些指责是过迟的而且现在已经没有意义。指责是简短的:战友们没有保护列宁的健康。他们热爱他,珍视他,敬重他,但是……没有保护他的健康。看看列宁日常所做的工作吧。当然一切主要的重要的问题都要经过他的手。但他同时还要处理许许多多当时就被人们叫作"小事"、"杂活"和"生活琐事"的事务。列宁要处理往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运送燃料的问题,给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莫·阿尼克斯特写信谈矿工服装的补给,处理发电机制造问题,起草数十种日常文件、决定和通商条约,解决口粮分配问题;应同志们的请求写书评,听取关于煤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工作问题的汇报,帮助整顿新列斯纳工厂的工作;弄清工程师彼·阿·科兹明在给他的信中提出的使用风力发动机解决农村照明的问题……

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列宁解决这些问题,已作为高级领导人工作深入、具体和亲自动手的惊人的典范永垂史册。所有这些工作的意义是不容怀疑的,因为跟列宁同时代的一些人看到了伊里奇处理这些工作的重大意义。列宁逝世不久,尤·拉林在《经济生活报》上撰文说:"列宁处理了很多'小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他才能个别地培养和提高每一个有关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自身的业务教会他们管理的艺术。这些'杂活'占用了和消耗了他的精力,对这一点他并不比别人了解得差,但是他也非常了解用这种办法去培养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治国人才这项工作的重要历史意义。"[6]这位跟列宁同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看的。可能他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领袖对未来俄国的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一个提得过迟的、我们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战友们不设法使列宁从处理这许许多多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呢?那位托洛茨基经常外出钓鱼和打猎,到莫斯科郊外去休养,请假去著书立说。而且列宁逝世时,他正好在疗养地疗养。斯大林不遗余力地工作,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却没有设法从根本上让革命的天才摆脱大量日常的而且往往是老一套的事务。有时甚至还变本加厉。例如,列宁患病还没有痊愈,斯大林却在1922年

7月28日建议他接受记者的采访。列宁不得不加以拒绝。虽然后来，当1922年12月中央全会作出专门决定责成斯大林亲自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7]时，斯大林认为他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制度而对她施加威胁是可以的……

可以相当准确地说，由列宁的战友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后的初期包括下列同志：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伏龙芝。可能还要算上莫洛托夫、皮达可夫、彼得罗夫斯基、托姆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当然，这些人的革命经历和教育程度都极不相同，个人的好恶也各异。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中将近半数多年侨居国外，参加过许许多多由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纯属人文学科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组织举行的各类会议。斯大林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在前一章曾经指出，斯大林的成长经历了一条奇特的道路。天生的聪慧、机灵、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有其并不令人欣赏的"渊源"。20年的宗教学校的学习和流放生活，缺乏无产阶级的锻炼，没有任何一种职业，这些把斯大林塑造成为**一种思想主张的贯彻执行者**。在列宁周围的一班人中间，斯大林比谁都更早地理解和感觉到一个机构的作用和力量。列宁班子里的大多数人对那谁都可以利用的权力机构的作用显然估计不足。斯大林对领导核心的每个成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态度。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些人"富有领导经验"，他们每个人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


一贯旁若无人的托洛茨基

例如，如我前面说过的，在托洛茨基口若悬河、旁若无人、鼻子朝天的时候，斯大林起初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后来他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位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人。托洛茨基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表现突出"，讲话的本领给他帮了大忙，使他一时名声大噪，有了拥护者。有人认为他不仅是"第二号"人物，而且是未来党的领袖。托洛茨基这个人的最大长处不在于有组织天才，而在于有口才和敏锐的、常常令人难以置信的

思维能力。有了这样的素质，他就能够领着人们跟自己走，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鼓舞他们的士气，同时巧妙地提高自己的声誉。但是，当成天过着单调平凡的生活的时期来临时，这位"红军的领袖"很快就"褪了色"，没有了生气。甚至某些正确的主张和构想，他却以挑衅的方式提出来，因而愈来愈失去拥护者。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主要是喊口号，上讲坛，风度翩翩，而不是做平凡的工作。未来的总书记大概比许多人更早看清了这个人的长处和华而不实之处。斯大林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声望很高，起初想同他建立一种纵然不是友好的关系，那也是正常的关系。有一次斯大林没有受到邀请便到莫斯科郊区的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去为托洛茨基祝寿。但会面是冷淡的。两人都深感格格不入。大家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试图在列宁的帮助下同托洛茨基建立较为密切的甚至是较为友好的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8年10月22日给托洛茨基的电报就证明这一点。电报中谈到列宁同斯大林的谈话，这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察里津形势的估计，以及他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更积极地进行合作的愿望。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电报的结尾写道：

>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所有这些意见告诉您，请您仔细考虑并答复：第一，您是否同意亲自向斯大林解释一下，他为此同意去您那里；第二，您是否认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有可能消除从前的摩擦并处好共事关系。这是斯大林所希望的。
>
> 至于我，则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处好与斯大林的共事关系。[8]

但这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托洛茨基毫不掩饰对这个人的高傲态度，在他看来，这个人的才智比他低得多。托洛茨基本人是这样描写斯大林的："他那严重的、怀有嫉妒心的高傲态度使他不能不随时随地感到自己的才智和道德水准是第二流的。看来他想同我接近。只是到后来我才弄清楚，他想建立一种亲昵的关系。但是他的一些特点使我对他产生反感，这些特点后来在他情绪沮丧的时刻能使他产生力量。这些特点就是土包子的狭隘的利益观、经验主义、性格粗暴和恬不知耻，马克思主义使他摆脱了许多偏见，但是没能使他用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上接受了的世界观去代替这些偏见。"[9]斯大林在几次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托洛茨基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作用，然而这丝毫也没有改变

后者对斯大林的冷漠态度。

在1923年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革命人物剪影》中，在拉狄克的《群像和檄文》中，在杜杰利、奥拉赫拉什维利、波德沃伊斯基、罗沙利、邦契-布鲁耶维奇、斯列普科夫和列文的著作和文章中，都对中央委员会领导核心成员作了有趣的评述。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揭示了列宁的战友的面貌，揭示了追随列宁参加革命、在革命中坚持过来并着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的形象。

在这一辈人中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居于显赫的地位。他们以独特的"二重唱"身份载人史册。他们观点接近，几乎从未发生争论，通常都持相同的立场。在党内长期担任显要职位的季诺维也夫一直是这辆两驾马车的辕马。在季诺维也夫的火热的政治生涯中有过飞黄腾达，也有过一落千丈。季诺维也夫早在1901年就入了党，多年侨居国外从事著述。大家都知道，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不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都因为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反对准备进行的武装起义而严重败坏了自己的革命声誉。列宁后来写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



在党内长期担任显要职位的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将近七年，这是他政治活动的鼎盛时期。许多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曾经积极设法想把这些文章用文集、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甚至想出版全集。下面就是季诺维也夫文体的例子："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以个别部队为代表，还要不止一次两次地迷失方向，还要浴血奋战以探索新的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中溃不成军的、备受第二国际冒牌领袖折磨和欺骗的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摆脱无路可走的恐惧感……"

季诺维也夫不论在国外侨居期间还是在革命以后长期同列宁过从甚密，从而磨炼出了自己的许多优秀品质。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革命人物剪影》一书中对季诺维也夫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所依靠的支柱之一，他正是"主要构成党的政治核心



20年代初,(自左至右)斯大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暂时还在一起

的那四五个人"中的一员。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大家都认为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最亲密助手和代理人"[19]。

季诺维也夫在党内名气很大,激昂慷慨如火山喷发,但是他的情绪却时常低落。时而乐观异常,时而垂头丧气,甚至意志消沉,或陷于"冷漠的"歇斯底里。他需要经常给以鼓舞,"上上发条"。长期以来,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故作宽容,甚至傲慢。20年代初期,季诺维也夫曾在什么地方几次取笑斯大林的文章笔法平淡,同义词反复和语言乏味——诚然,他并无恶意。他本人文笔甚好,语言流畅,具有格言式风格。在他的大量文章中,有些文章内容是很充实的。《捍卫列宁主义的最初战斗片段》一文就是例子。季诺维也夫在这篇文章中委婉地、有根有据地指出,托洛茨基谋求在党内居于特殊地位的要求是站不住脚的。

季诺维也夫担任彼得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时,曾想显示自己意志坚强,甚至想摆出独裁者的气派,尽管在尤登尼奇逼近革命的摇篮时他已经明显地张皇失措。当时来到彼得格勒的斯大林马上觉察到了他的这种表现,并暗地里认为季诺维也夫是个"没有骨气的可怜虫"却又常常表现出虚荣心和强烈的功名心。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季诺维

也夫和加米涅夫尽力保持一种近乎友好的关系。1922年11月初，列宁召集了一次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参加的小型会议，使人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三驾马车非常团结、友好和一致。但是这种看法只保持了很短时间，因为三个人除有共同的打算之外，每个人都把个人的非分的打算摆在很重要的地位。有谁能知道，正是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季诺维也夫两次被开除出党，后来又恢复党籍，而第三次即1934年那次被开除预示着末日就要到来。其实"二重唱"的另一位——加米涅夫也正面临同样的命运。

人们认为季诺维也夫是党内的优秀演说家之一。他受命在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即政治报告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是赞成当时的政治领导有一个核心的人士之一。他在1925年举行的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在病中……我们不得不第一次举行没有他参加的代表大会（指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本书作者注）。你们知道，曾经议论过我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的领导核心，十二次代表大会默认在列宁没有痊愈以前这个领导核心将继续领导我们党，当然这要得到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充分支持。"[11]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季诺维也夫（还有加米涅夫）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资格，当时他认为这种情况长不了。在新的一年即1927年的除夕，他同加米涅夫一起带着白兰地和香槟酒突然来到斯大林的住所，好在他们的住所相距不远。看来他们是"和解"了。相互之间称呼"你"，共同回忆往事和朋友，但根本不谈"正事"。柯巴很好客，热情地接待老"朋友"，谈得很随便、很真诚，好像不是他在去年7月和10月设法让他们离开政治局。"二重唱"的两位演员离开时欢欣鼓舞，然而斯大林



1927年时的斯大林

早已下了决心：这两位对他十分了解的人，总书记再不需要了。

还有一次是他们一起来找（不，是叫他们来的）斯大林。1936年，他们二人都已进了监狱，他们给“领袖”写了信。“领袖”马上有了反应。列宁过去的战友、从前的政治局委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后有理由指望登上党和国家高级职位的两个人来到过去他们很看不起的那个人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除了斯大林还有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他们道了问候。斯大林没有回答，也没有请他们坐下。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提出以下交易：他们的罪行证据确凿，下一次开庭可以判处“极刑”。但是，他没有忘记他们过去的功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听了这番话可能心里有些打颤）。如果在审讯中他们把一切都承认下来，特别是承认托洛茨基直接领导他们的破坏活动，他就挽救他们免于一死……尽力挽救他们。然后再争取释放他们。下决心吧。为了事业需要这样做……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更为顺从和软弱的季诺维也夫低声说道：“好吧，我们同意。”他习惯于替加米涅夫下决心。两个月以后，他们被枪决。

一个被关押过的人于1947年在西伯利亚向我介绍了情况。这个人名叫鲍里斯·谢苗诺维奇。1937年，在我和母亲、兄弟、姐姐住的村庄里很快建起了一座集中营。某些被关押的人解除了“看管”，就是说，有时他们可以离开营区。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修皮鞋，到我家来过两三次，修理我和兄弟的旧厚油布高筒靴。他本人1938年蹲监狱以前曾在“机关”工作，即在关押斯大林过去这两位战友的那所监狱工作。他曾押解他们最后一次同“领袖”会面。当一天夜里人们来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不同的。本来他们两人（第几次了！）给斯大林写信是请求宽恕，而且显然指望斯大林会发善心（的确是许诺过！），然而现在他们感到，一切都到此完结了。加米涅夫一声不响地在走廊上走着，神经质地把两手握在一起。季诺维也夫则是歇斯底里大发作，人们把他带走了。不到一个小时，中央委员会昔日核心中的这两位便跨越了死亡线。过去他们巩固了柯巴的地位，这一点谁也比不了他们。“效力”的报偿是送了自己的命。

我提醒读者注意，斯大林是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流放时熟悉加米涅夫的。正是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斯大林当时就发现他学识渊博，容易头脑发热，例如他能够很快作出某种决断，但又同样

快地予以推翻。加米涅夫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手,经常主持中央全会、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多次主持党代表大会,这一情况对于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态度有很大影响。列宁在世时,通常都是加米涅夫主持政治局会议。


学识渊博、敢说敢干的加米涅夫

虽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杰出的演说家和政论家,但是他们缺乏坚实的“主心骨”,在紧急时刻和转折关头模棱两可,把个人的目的、野心和威望摆在首位而耍弄手腕。遗憾的是,不管他们是否情愿,他们把同斯大林的斗争转移到党的机构的领域来,而当时他们在这个领域获胜的机会很小。另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尽管这两位领导人才能出众,具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但是斯大林很快就把他们的内心“虚弱”和不彻底性“品透了”。

列宁了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弱点,但仍积极依靠他们,特别是加米涅夫,他曾多次完成列宁本人交办的许多事项。大家都知道:加米涅夫善于办交涉,善于处理党内的各种微妙事务。加米涅夫没有季诺维也夫的知名度高,但他更扎实,知识也更渊博。他有自己的主张,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概括能力,敢说敢干。1925年12月21日(正好是斯大林的生日)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所讲的如下一段话已载入史册:

他说:“**我们反对创立‘领袖’**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实际上统管政治和组织从而凌驾于政治机关之上。**我们主张把我们的高层领导内部组织好,使政治局真正掌握全权,把我们党的全体政治家团结起来,**同时要有一个**隶属于它并具体执行它的决定的书记处**……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一个能够把原有的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正因为我同斯大林同志本人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正因为我同忠于列宁主义的一些同志多次谈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再说一次:**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这段话的开头是我这样说的:我们反对一长专权的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12]

这一段话讲得很有勇气。而且,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刚刚露头的当时,这是公开对它提出反对的言论中最有见地的警告。单凭这一点,加米涅夫就值得尊敬。列宁教育党要敢于想问题,他算是领会了,似乎比别人领会得更好。但是,被加米涅夫称作"忠于列宁主义的一些同志"当时为什么不支持这位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人提出的清醒的、有先见之明的建议呢?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忠于列宁主义的同志"有过错,他们对形势的估计缺乏远见,而且加米涅夫本人也有过错。他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时而靠拢托洛茨基,时而又避开他,这种无原则的摇摆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接近实际):他这样做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野心。加米涅夫注定不能成为能够"阻挡"斯大林的人物。结果不仅没有削弱斯大林,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因为加米涅夫"攻击了"总书记,成了"反对派"。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尽管加米涅夫是托洛茨基的妹夫,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亲密。整个问题在于,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都想争当党的领袖,特别是在发现领袖的健康状况危险时更是如此。托洛茨基著有轰动一时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他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描绘成革命中的丑角。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要求把《教训》的作者开除出政治局,清除出党。但是斯大林当时还不完全是30年代的斯大林。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中央委员会只是撤销托洛茨基陆军人民委员的职务时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

斯大林的这些话赢得了代表大会的掌声。三四分钟以后他继续作结论性的发言。他在谈到禁止出版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时说:"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是的,我们禁止出版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并且今后也要禁止这类的东西。"[13]这些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代表们喜欢斯大林的坚决果断。他们是否知道,时隔不久,斯大林竟成了使用"割除方法"的老手,而他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竟走上了不顾法纪而设置的断头台呢?

这里先谈一谈……加米涅夫被清除出领导班子，担任了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雅哥达作例行报告时斯大林插话说：

"要看住加米涅夫……我认为他同留京有联系。他不是那种很快就投降的人。我了解他有20多年了。他是敌人……"

雅哥达果然"看住了"。1934年加米涅夫被捕，1935年进行审判，判刑5年。同年又重新审判，刑期延长到10年。1936年底彻底了结了这段公案。

加米涅夫被枪决后不久，斯大林拿到一本书名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作者就是柯巴的这位被枪决的同事。斯大林长时间地翻看这本书（这是首批出版的《名人传》丛书中的一部），认真地看了目录和若干页正文。他回想起1917年2月从阿钦斯克前往彼得格勒的途中他同加米涅夫在火车上冻得直发抖的时候，加米涅夫如何谈到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以及他们对列宁的敌视，如何谈到他今后的打算。当时加米涅夫沉浸在一种胜利之后的喜悦中。斯大林把书放到桌子上，他想到"浮生若梦"。现在一切问题对加米涅夫都失去了意义，而有多少问题要他去解决啊！不过这一切都是十多年以后的事。

斯大林认为，为了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目前他还需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认为托洛茨基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也是党的主要敌人。

斯大林很快表现出他是一位不错的行政首长。他履行自己的职责，首先认真考察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里其他一些有威望的同志。他自己划了一条线，把他暗自称为"著作家"的那些人都算作领导核心中最有影响的人。他把过去侨居国外的人称为"著作家"。他不能不暗自承认，所有这些人都具有较高的才华，理论素养好，学识渊博。这使斯大林很恼火："当初我们在这里为革命作准备，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作……"

有一次他几乎是赤裸裸地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同志被批准担任中央委员会驻某个省委的特派员，当时发现他只是粗通文墨。但是斯大林在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表态说：

"他没有到过国外，上哪里去学本事呢！……他能胜任。"

在列宁周围一班人中间是不乏优秀人才的。斯大林很快发现，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虽然不能单独算作一种类型，但都很会处理经

济学问题、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他们是优秀的经济学家,"专家治国论者"。遗憾的是后来,在30年代,甚至在伟大卫国战争后的整整几十年间,在最高决策集团中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即"专家治国论者"的位置。取代他们的照例都是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类型的行政官僚。话说回来,在靠指示命令办事的时代,像沃兹涅先斯基这样的大经济学家根本就不需要,因为许多事情不是按经济规律而是违背经济规律去做的。

这三个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布哈林。人们早在他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第一部书《食利者政治经济学》中就感到他对经济关系的形成过程有深刻的研究。1920年《经济学》第1卷问世,布哈林在这本书中打算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由于卷入斗争的漩涡和形势多变的激流,布哈林一直没有写出第2卷。他在《经济学》一书中确认,"资本主义不是人们建立的,而是它自己形成的。社会主义作为有组织的体系,要由我们来建立。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体系的各个要素之间寻求平衡。"仅仅掌握了粗浅的起码的经济学知识的斯大林仔细研究了布哈林的思想。


和善的知识分子布哈林

当时在他们的关系中还没有出现特别的麻烦,因为布哈林是一位随和的"和善的知识分子"。有时候人们觉得,斯大林和布哈林是亲密的朋友,而且在克里姆林宫里是邻居。未来的总书记很快就了解,布哈林没有非分之想。对于政治局个别委员之间开始出现的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和种种摩擦,他不理解,也很讨厌。在"三人联盟"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中,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力不采取明确的立场,这并不是偶然的。托洛茨基后来把他在争论中的发言和讲话称作"令人奇怪的和事佬姿态"。我认为还没有上台的那位领袖是不正确的,因为布哈林看得高于一切的是列宁的威信(尽管他经常同列宁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政治局的集体意见。


性格直率的李可夫

斯大林对李可夫一直持戒备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列宁逝世后他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极其直爽坦率。正因为如此,他有时没能处好同事关系。例如大家知道,有一次,斯米尔加向俄共(布)中央提出意见,说他在工作上无法同李可夫配合……请求解除他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燃料总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列宁看过斯米尔加的信以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张便条,建议暂不解除斯米尔加的职务。看来他认为党员之间的关系能够搞好而且必须搞好。

李可夫通常都是把心里想的当面说出来。他写东西也是这样。1922年他写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对下一步工作的结论》一文。从实质上说,他的文章是拥护新经济政策,反对用指令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第聂伯河国家建设工程局、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一些重要的"奠基工程"都是同李可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李可夫后来试图说服斯大林及其拥护者,社会主义应当完善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不要限制直接生产者的经营独立性。唉!真像是用不同的语言对话……

在20年代末期,斯大林在政治上已很有分量,有一次在讨论将要下达的关于集体化的几个指示之后,李可夫当面刺了斯大林一句:"您的政策缺乏经济味道!"总书记泰然处之,但并未忘记刺他的话。

斯大林是什么也不会忘记的,因为他那冷静的计算机似的记忆已经把数以千计的姓名、事实和事件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储存单元上了。他也没有忘记,列宁十分器重李可夫,在领袖的全集中李可夫的名字略少于斯大林。李可夫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从1926年起又领导劳动国防委员会和科学与促进学术思想发展委员会。斯大林没有忘记,1922年3月,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曾说什么不许再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上去,还对攻击新经济政策的人进行

严厉的批评，称这类攻击是“极其有害的和危险的”，要求在农村中不要采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认为在农村中，用他的话说，需要遵守“革命法制”。时隔多年以后，李可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发言，对诬陷他搞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的骇人听闻的责难进行了反驳。李可夫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曾任内务人民委员。然而上任几天以后，他提出辞职，以抗议整个政府是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不是联合政府。斯大林幸灾乐祸地冷笑说：“他一直是这样的人。”

布哈林和李可夫不知为什么特别为俄国农民的命运担忧，可是托洛茨基（而斯大林暗中也同意他的看法）却认为“这是用来进行革命改造的材料”。不能不看到，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人民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他们外出不带警卫，非常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普通人对领导人的这些品质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斯大林则把这些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叫作“讨好人民”。甚至正派人的正常行为在他眼里都是可疑的。

斯大林对托姆斯基（叶弗列莫夫）一直抱着同样的不信任态度。这位三次革命的参加者、著名的工会工作者善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对这位“李可夫的朋友”容忍了很长一个时期，后来他把卡冈诺维奇和什维尔尼克拉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由他们把主席团的这位主席“排挤出”主席团。1936年8月22日，托姆斯基在博尔舍沃别墅自杀身亡。这时斯大林说道：

“他的自杀就是他对党有罪的证明……”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一切都恰好相反，那是对“领袖”专权进行抗议的一种极端形式。

捷尔任斯基在党的领导核心内地位显赫。布哈林称捷尔任斯基是“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他是最老的党员以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拉狄克后来评价捷尔任斯基的作用时说：“我们的敌人编出了关于肃反委员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和捷尔任斯基无所不在的一大篇传奇。他们把肃反委员会说成是覆盖全国，把触角伸向内部营垒的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不懂得捷尔任斯基的力量何在。而捷尔任斯基的力量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就在于工人群众和贫民的充分信任。”[19]斯大林同捷尔任斯基关系不错，特别是在国内战争年代多次一起去了前线之后。不轻易给别人作出高度评价的斯大林在捷尔任斯基过早逝世之后说：“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在工作中燃烧

尽了。”


天生的英才伏龙芝

伏龙芝是一位外表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却很有魅力的人物。经历过监狱和流放的苦难岁月的斯大林很尊重阿尔谢宁（直到革命以后一些老同志有时还这样称呼伏龙芝）。大家都知道，伏龙芝于1907年两次被判处死刑，有好多个星期被关在死囚牢房里，后来有好几年服苦役。为了取得东方战线、土耳其斯坦战线和南方战线的胜利，伏龙芝完成了多么繁重的工作，这在当时是很少有人了解详细情况的。本人就有非凡的魄力的斯大林，对这位具有充分体现政治意志和军事意志能力的无产阶级统帅镇定自若的领导风度也感到惊讶。在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短时间内，伏龙芝以其才智的深度，对军事学说、武装力量改革、现代战争中战役学问题的新观点使所有的人为之折服。

伏龙芝患有胃溃疡，他宁愿采用保守疗法，因为严重症状已经消失。但是，会诊再次作出结论，“需要做手术”。一系列的证据（见И·K·汉堡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书，Б·皮利尼亚克的《熠熠生辉的月亮》等）表明，斯大林和米高扬去过医院，同罗扎诺夫教授谈过话并坚持做手术。手术前不久伏龙芝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便笺：“我现在感到自己非常健康，不要说做手术，就连做手术的想法也是有点可笑的。但是两次会诊都决定要做手术。”[15]

对伏龙芝逝世后的一切猜测很难下断语；是否有人做了“手脚”或者是劫数难逃？伏龙芝逝世后，许多医生发表意见，认为这种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很简单的手术是不必要的。斯大林在伏龙芝的葬礼上说：“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必然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年轻同志站起来接替老一辈却不是这样容易，也决不是这样简单。”[16]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具有一种秘而不宣、只有斯大林本人才知道的含义。用不着去猜测。我们没有证据去作出肯定的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伏龙芝不是这样荒谬地（还是神秘地？）死去，那么这位天生的英才就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卓越的作用；斯大林相当早

的时候就从列宁对待伏龙芝的态度上感觉到了这一点。伏龙芝所做的一切都带有他那非凡的独特的智慧的印记。

斯维尔德洛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大组织家。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斯维尔德洛夫丝毫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想法，他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执行者。“他对一切都持正统的观念，他只是反映共同的意志和共同的指示。他只是传达中央的，有时是列宁本人的指示，个人从来不下指示。”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他如果讲话，那他讲的东西就像官方报纸的社论。但是他洞察党内形势的细微变化，具有卓越的组织才干，在这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与他媲美。甚至可以说，在作出决定设立书记处的第一把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前，斯维尔德洛夫就已经在履行这一职责了。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中央的会议是讲求实际，说话不多，斯大林很喜欢这种作风。记得1918年3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日程上列了许多问题：乌克兰的形势，关于“左派”的宣言，关于《真理报》后撤，组织对军人的监督，克雷连柯的声明，德宾科案件……当时全国都乱成了一团。斯维尔德洛夫拿出黑色漆布面笔记本用来作会议记录，他看了看出席会议的人〔会议室内有列宁、季诺维也夫、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索柯里尼柯夫、捷尔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按部就班地请大家谈实质问题……[12]斯维尔德洛夫过早地逝世之后，列宁给予极好的评价：这样的人是难以代替的，要有一批工作人员才能代替他们。



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执行者斯维尔德洛夫

鲁宾逊式的人物只有小说里才有。一个人是在跟同志、志同道合的人和竞争对手相处的中间形成自己的这种或那种品质的。斯大林步入列宁的战友和学生的行列时，本应从同领袖及其周围一班人的交往中领悟到不少宝贵的永远是重要的东西。但是一个成熟的人的品质决不是全都能够改变的。早年形成的许多特点——不露心境，冷酷地算计，残酷，谨言慎行，感情贫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减弱，反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斯大林身上，人们早就开始

看到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作"或然论"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实质是，当一个人有了某种从道德上讲不体面的行为时，自己就尽量找一些特殊的理由在内心里给这种行为辩解，把它说成是善举。斯大林在确信大家公认的领袖病情严重时就曾一步一步地开始了一场大的"表演"，想要最大限度地巩固他在领导层的地位。最初他企图向自己证明，为了"保卫列宁主义"，这样做是必要的。后来，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在道义上都是正确的，是为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总之"或然论"的原则在斯大林的政治武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斯大林认为，人们想必懂得：他将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或然论

耆那教的推理和判断的逻辑形式，特别用于论证耆那教的"非一端论"哲学，也称或许说。或然论的逻辑功用就在于为非一端论的论证服务：事物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或许"是"，在另一种特定情况下或许"非"，在第三种情况下或许"又是又非"，在第四种情况下或许是"不可说明"，并由此扩展到七个形式，称为"七支论法"。此法的核心是要说明哲学根本问题的两种观点并非绝对的相互无关，而是相对的彼此有关。因此，不能执一说以排斥另一说，或者反之。只有采用综合、调和的方法来观察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如实反映真理的全貌。耆那教的或然论包含着若干辩证法的因素，但也掺杂着怀疑论、诡辩论和调和论的成分。

我认为，在列宁周围一班人中间，许多人很长时间也没能"品透"斯大林。一些人认为，他不过是执行者。另一些人认为，他是党内少数民族队伍的不错的代表。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常的庸才，任何制度的领导圈子里总是有不少这样的人。是的，列宁的战友们低估了斯大林，而斯大林却把大家，甚至把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柯秀尔以及其他许多按照他的想法成了"人民的敌人"的人都"品透了"。要知道，是他"发现了"在国内战争期间领导红军的差不多都是"人民的敌人"，如托洛茨基、布留赫尔、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德宾科、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米尔加、穆拉洛夫以及成百成千个其他的"叛徒"。列宁没有想到，而斯大林却敏锐地"看出了""工业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破坏分子"，如皮达可夫、捷连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利夫希茨、格林科、列别季、谢苗诺夫以

对敌人，我们今天粉碎他们，过去粉碎他们，将来也同样要粉碎他们。

——斯大林

及数以千计的其他人。只有斯大林才能够"辨认出",苏联外事部门的领导人同样是清一色的"间谍",如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卡拉汉、博戈莫洛夫、拉斯科尔尼科夫……而被斯大林从国家的各个领域实际"揭露出来"的其他"两面派"又有多少啊！一个很普通的"庸才"未必会有这样的能耐！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算是看错了。罗伯斯庇尔于1794年2月5日在国民公会发言时宣称:"我们政策的第一条准则应当是,管理人民要用理智,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18]罗伯斯庇尔的方法是何等二元化和何等区别对待的方法啊！斯大林把政策准则一元化了:不论是管理前一种人还是管理后一种人都用一种方法——暴力。我想,在列宁周围的战友中,无论是谁,即使做恶梦也不会想象到在他们中间会出现这样一位怪物。不是出在其他地方,而就出在领导班子中间。

我再说一遍: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是"杰出的庸才"当然是说错了。单凭一条论据就足以驳倒他,这就是庸才不会有明显的敌人。而斯大林的明显的敌人是够多的,这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快就会了解。斯大林是非常狡猾和阴险的政治家,他能把自己变成列宁主义的惟一解释者和"捍卫者"。他利用了列宁周围的一班人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斯大林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不明显的,在国内战争中的表现稍微积极一些;他感到,列宁周围的一班人可能在许多方面比他强,但在某一方面不如他。如果他知道黑格尔其人,那他不妨默诵一下这句话:"人是自己命运和自己使命的主人。"[19]



总书记

历史的进程有一个特点。它是不可逆转的。时间不能"倒"流。这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办得到。马可·奥勒留写道:"像海边的沙子被一层层覆盖起来一样,生活中新旧交替得非常快。"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生活了六年多一点。但是在这几年中充满了如此之多的成就、希望和失望！列宁已经描绘出了未来的轮廓,勾画了前进的路线。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莫洛托夫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的报告。莫洛托夫在介绍了党内生活的现状之后，指出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负担过重。"一年中经过中央委员会办手续的有22500名党的工作者，即一天有60名左右。"莫洛托夫提出了简化干部"调动手续"、搞好应有的统计、把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组织得更好等问题。报告强调，过去一年中"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次数也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问题增多了，几乎多了50%"，代表会议及其他全党性会议的数量也增多了。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们对中央机关的工作表示不满。例如，奥新斯基就指责政治局，说党的最高机关除了研究问题外还干了许多"杂活"，比如"给不给农业人民委员部'大贵族庄院'，把印刷厂给这个机关还是那个机关"[21]？为了改进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代表们建议中央委员会设立三个局：政治局、组织局和经济局。

看了十月革命后召开的头几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不由得会对会议的开放性、表达意见上真正的公开性惊叹不已。开展批评像需要空气那样自然。没有去歌颂、奉承、吹拍。谁也不去为统一而制造统一。有领袖，但没有对他们的迷信。例如，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尽管列宁的报告的论点和结论获得了一致的高度评价，但许多代表对这个报告提出了批评，其中有斯克雷普尼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新斯基……例如，梁赞诺夫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时引得哄堂大笑，他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特殊的机关。据说，英国的议会无所不能；它只是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可要强得多，它已经把不止一个十分革命的男子汉变成了胆小怕事的娘儿们，这样的娘儿们现在多得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只要党和党员对以党的名义贯彻的一切措施不进行集体讨论，只要对党员来说这些措施是突如其来的，那么我们这里就会出现列宁同志所说的那种惊慌失措的情绪。"[22]

对涉及党内生活的一切问题进行坦率的、公开的讨论，在当时是一条不容违背的准则。顺便提一下，后来，到了30年代，以前所作的批评性的发言都被说成是"有破坏意图的"发言。以后的好几十年中只能"一致赞同"、"支持"、赞美……列宁在世时举行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是党内民主、思想上的和衷共济、最出色的公开性的真

正的教科书。

早在1920年，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实践表明，为了组织书记处的工作，需要专门抽出一个人来管。1920年4月5日，俄共(布)中央在举行全会时讨论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决定：

“1.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三同志为书记。关于任命一个责任书记的问题先不作决定。由书记们不断总结经验，过一段时间就此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

“2.除三位书记外，派李可夫和斯大林两同志参加组织局。”[②]

看了往往写在学生用的横格本单页纸上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就可以明白，关于“任命一个责任书记”的问题提出的时间不是1922年，而是要早得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已经从几个书记中专门抽出了一个人。以前也选举过责任书记，斯塔索娃、克列斯廷斯基、莫洛托夫都担任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责任书记升格为总书记。这是谁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来自什么地方？根据现有的材料，这个建议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提出的。列宁知道要采取这项新措施，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4月3日举行全会，根据代表们的愿望选出了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全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选为第一任总书记。于是，斯大林一下子担任了三个党内的要职：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与此同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也被选为书记。今天，历史学家、哲学家、一切关心我国历史的人们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担任总书记呢？是谁提他当候选人的？列宁在这一件事上是怎样参与的？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是否意味着授予他特殊的权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不仅要直接研究列宁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历史，而且要直接研究后来的灾难的形成过程。让我们来看一看立论公允的文件吧。

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托姆斯基、李可夫、安德列耶夫、斯米尔诺夫、伏龙芝、丘巴尔、古比雪夫、索柯里尼柯夫、莫洛托夫、科罗特科夫。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候补委员基洛夫、基谢廖夫、克里沃夫、皮达可夫、曼努伊尔斯基、列别季、苏利莫夫、布勃诺夫、巴达耶夫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索尔茨。

会议听取了有关几个问题的报告并作出了相应决议。第一项是"确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关于主席问题,会议决定:

"一致确认已形成的惯例,中央委员会不设主席。中央委员会惟一的专职人员是书记;主席则由每次会议选举产生。"

接着会议讨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要标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三同志已内定为书记。加米涅夫作了解释(全会记录在案),他说:"在选举期间,他曾声明(得到了代表大会的一致赞同),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某些代表表达的愿望。"[23]这一"愿望"首先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暗地里也是斯大林的。

虽然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的只是中央委员,但人们有根据认为,加米涅夫为了保证未来的几位书记能被选上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加米涅夫已经知道将要研究设立总书记这一新职位的问题,不能不认为他这样做是要把既定的人选选进书记处。说穿了,加米涅夫是想使中央机关的领导人成为"自己的"人。当时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十分融洽。未来的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曾担任列宁在人民委员会里的副手的加米涅夫的特殊地位。当时他的地位确实要比党内别的人来得高。有许多间接的证据表明,加米涅夫竭力让斯大林担任新设立的职务,斯大林显然是知情和同意的。斯大林喜欢做机关工作,他比别人先感到这种工作能提供种种机会。

中央全会的记录接着说:

"确定设立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两同志为书记。"

接下去的记录中有列宁亲笔写的一段话:

通过列宁的以下建议:

中央委员会责成书记处严格规定和遵守正式接待时间的安排,并予以公布;同时,除确属原则性的领导工作外,书记们不应把什么工作都揽到自己身上,可将这样的工作交给自己的助手和

事务秘书,这应成为一个制度。

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中央委员会责成组织局和政治局在两周内提出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人选名单,以使斯大林同志在一个月内可以完全摆脱工农检查院的工作……[28]

第二天,即4月4日,《真理报》刊载了一个通告:

俄共各级组织和党员注意。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确定了俄共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斯大林同志(总书记),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

中央书记处规定了以下的在中央委员会接待的办法:每天中午12时至3时——星期一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星期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星期三古比雪夫和莫洛托夫,星期四古比雪夫,星期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星期六斯大林和古比雪夫。

中央委员会地址是:沃兹德维任卡5号。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就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选出了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李可夫,还选出了3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布哈林[29]。组成了组织局。总书记的人选只提出了一个(是加米涅夫提出的)。谁都没有表示异议。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必须改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强调要特别注意改善组织工作。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意见,可惜的是,这些意见当时也好,后来在斯大林时期也好,都未被人充分注意。其中的一条意见是需要有文化,办事要井井有条。列宁说,许多负责的共产党员干部的管理文化低得可怜,微不足道。他指出,就方法论来说,管理的准则之一是要善于抓住问题的整个链条中的主要环节。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说,今天这样的主要环节就是选拔所需的人才。

革命胜利之后，由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几个同志立刻行使书记的、事务性的职能。在他去世之后，大家马上感觉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常事务打乱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设立了责任书记；由1898年入党的斯塔索娃担任。后来代替她的是克列斯廷斯基，他同时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且他还担任俄罗斯联邦的财政人民委员）。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选举了两个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列·彼·谢里布里亚科夫——来协助克列斯廷斯基工作。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选出莫洛托夫、米哈伊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取代他们担任书记。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之后经常不满意书记处的工作，因为书记处行动迟缓、墨守成规、常犯错误。例如，1921年11月19日，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便条中就对莫洛托夫起草的组织局关于司法侦查机关对待共产党员的过错的态度的决定表示不满。列宁写道：

莫洛托夫同志：

我将这个问题转交政治局。

一般说来，这类问题由组织局决定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纯粹**是政治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应另行处理。[25]

可以说，设立党内的新职务是出于整顿书记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参谋部”的工作需要。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总书记的职位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性的、起决定作用的职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第一任总书记想必就会由列宁担任。

在斯大林开始担任总书记的同时，医生们坚持要列宁认真进行治疗。正是在4月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列宁必须长期休养和去山区呼吸新鲜空气。他们断言去高加索旅行很有好处。列宁同意了，甚至给当时在高加索工作的约·斯·温什利赫特和奥尔忠尼启则写了几封信。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封，是1922年4月9日发出的：

谢尔戈同志：

鉴于卡莫提出了请求，因此我还要补充说一说：我应当**单独**居住。这是病人的生活方式。我连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都几乎受不

了（有一次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到我这里来过之后，**病情就恶化了！**）。要么是几所单独的小屋子，要么只有一幢大房子，但里面可以绝对隔开。这一点应当考虑到。来访不接待……

您的**列　宁**[②]

但可惜的是，治疗计划不得不推迟了。列宁在继续工作。他想整顿好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克服它的保守作风和官僚主义。

政治局根据列宁的建议每周开一次会，但是日常工作每天都得做。书记处准备政治局开会用的材料，组织贯彻实施政治局的各项决定，完成政治局委员交办的事项。书记处不直接处理经济问题、国防问题、国家机关问题和教育问题。它在管理党机构的整个机器中起的主要是经办事务的作用。由于当时主要部门都由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来领导，而他们往往对事务性工作不太注意，才决定由一名政治局委员来担任新设的总书记职务，负责书记处的整个工作。我再重复一遍：由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具体建议是加米涅夫提出的。选举总书记的那次中央全会也是由他主持的。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这些问题事先已和列宁谈妥(用现在的说法)。

斯大林有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的条件呢？表面上看来是有的。请看：斯大林1898年入党，1912年起担任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担任过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他身兼两个政府职务，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他代表中央委员会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我还没有举出斯大林在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前所担任的全部职务。

毫无疑问，这一切不仅表明承认斯大林对已经开始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事业有贡献，而且表明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熟悉政治管理和国家管理的机器，喜欢做机关工作。当时的许多著名革命家都把行政管理工作看作负担，或者说都不十分愿意干这项工作，而斯大林爱好管理工作却是许多人有目共睹的。总的说来，提升斯大林担任新职当时并不是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多数领导人仍然认为这个职务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岗位。而当列宁健在时，情况确实就是如此。当时还没有出

现党的领袖、国家的领袖的问题。当时有领袖。列宁就是公认的领袖。对于党、对于人民来说，担任了新职务的斯大林不太为人所知，他仍然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而在领导层中，从这个时候起，他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就显示得越来越鲜明了。

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充分刻画出斯大林的性格。此人善于深深地隐藏自己的感情，甚至见过他发怒的人也不多。他能在作出极其残酷的决定时镇定自若。后来，他周围的人把这一点看作是具有雄才大略、能够高瞻远瞩的标志。难道所有的人在这个乱作一团的世界上都有保持镇静的本领吗？斯大林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怜悯。那么亲子之爱呢？对子女一辈、孙子一辈的爱呢？未必就有。在所有的孙子孙女中，只有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孩子和长子雅可夫的女儿和儿子他见过几面。个人的生活根本不管，只有工作、工作和工作。作决定，开会，下指示，发表讲话……

周围的世界对于斯大林只有黑白两色。无比丰富的外部世界犹如七色彩虹，他却用一个尺度去衡量：凡是不符合“路线”的，就是敌对的东西。他不承认有中间色彩。从实质上说，他喜欢非此即彼的逻辑，喜欢围着“是”与“非”这两个范畴转。绝对性和单义性。可是生活本来是无比丰富多彩的，因为在善与恶之间有着许多激动人心的飘忽不定、朦胧不清、介乎中间状态、闪现着缤纷色彩的东西……这些斯大林都理解不了。他的便条、讲话、报告都不拖泥带水，都是电报文体。这一点当时不少人却很喜欢，认为他是干实事的人，忠于职守的人。他决不对人表示温情，他不喜欢“人道主义”这个字眼。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当时谁也没有透彻地了解……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家都看到，斯大林把党的纪律、对党的职责和俄共(布)的总路线看得高于一切。

在1922年一年中以及1923年初，当病魔还没有使列宁完全丧失书写和口授能力的时候，他给斯大林写了几十张便条、文件草稿和信件。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对许多问题的组织解决办法和政治解决办法感到担心。在斯大林被选为总书记九个(！)月之后，列宁得出结论，这个人选不当，应当把斯大林调任他职。这决不是偶然的。列宁确信这一点，是因为斯大林在列宁还健在的时候作为总书记采取了一系列轻率的措施。

例如，斯大林决定支持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哈林关于取消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的建议就是错误的。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便条中斩钉截铁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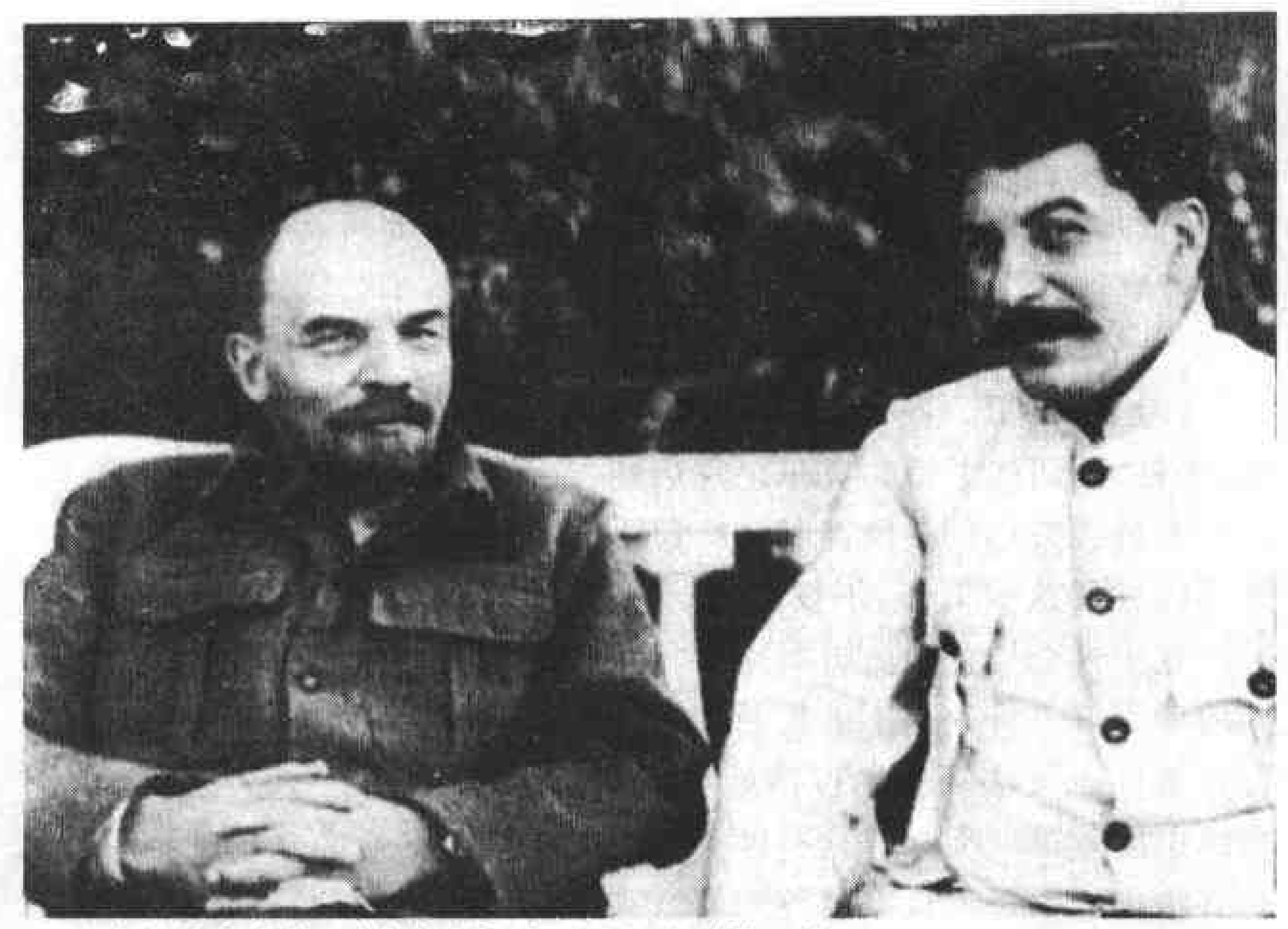
> 斯大林同志：……我建议用向政治局委员**征询的方式**通过下述指令："中央委员会确认对外贸易垄断，并决定一律停止研究和筹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合并事宜。各人民委员应秘密签字"，原件退斯大林，不得复制。
>
> 列　宁
>
> 5月15日[28]

9月，当列宁第一次大病之后正在恢复健康时，斯大林提出了"自治化"的思想，也就是各民族共和国通过加入俄罗斯联邦而联合起来的主张。实际上这个方针不是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是要建立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让其他的民族构成体根据自治的原则加入这个共和国。斯大林已经使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处理这一问题的委员会通过了他的建议。列宁在给加米涅夫并转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立刻对此作出反应：

> 加米涅夫同志：您大概已从斯大林那里收到了他的委员会关于各独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决议。……
>
> 依我看，问题极端重要。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您曾经打算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已经作过一些研究，您要好好考虑一下；季诺维也夫也一样……[29]

列宁在哥尔克养病期间，大概谁也没有斯大林去得多。有时是列宁自己请斯大林去汇报日常工作的情况，更多的是总书记主动去的。列宁在许多次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相关工作的情况、中央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关心捷尔任斯基、瞿鲁巴以及其他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的健康状况。例如，我们知道，列宁还仔细考虑过斯大林本人的健康状况，并事先和给斯大林看病的弗·亚·奥布赫医生通过电话。

在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思想并采取了轻率的步骤后，列宁于9月



1921 年在哥尔克村,列宁与斯大林两位领袖并排而坐

26日请总书记去哥尔克,同他谈了3个来小时[①]。列宁强调指出,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来不得一点急躁。列宁提出了建立联盟国家的一个全新的原则:各独立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自愿联合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每一个共和国仍保持完全的平等权利。斯大林从不公开和列宁争论,通常接受列宁讲的道理。当然,有时候人们根据20年代的材料指出,斯大林曾把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说成是"自由主义的"立场[②]。

同总书记经常进行的谈话,不单是患病的领袖了解情况、提出忠告和建议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是在对这位中央机关领导人进行教育和了解。我想,列宁通过同斯大林的许多次会见和谈话是能更好地了解此人的优缺点的。因此,列宁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所作的对总书记的评价和关于怎么办的建议是他作了深刻分析和反复思考的结果。民族问题,斯大林想用自己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使列宁不仅发现了此人的一些新的政治品质,而且首先发现了他的一些道德品质。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中认为斯大林的"自治化"思想是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表现。列宁似乎在作总结,他概

括了总书记在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基本特征：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32]

在这封信里，奥尔忠尼启则也因为他率领委员会去高加索期间“动手打人”而挨了批。奥尔忠尼启则接受了政治局下达的任务，带领一个委员会去解决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层中产生的冲突。奥尔忠尼启则不能胜任这一工作，不仅如此，他在了解情况时动手打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姆季瓦尼。列宁十分明确地写道：“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33]斯大林在这一冲突中没有采取原则性的立场，因此列宁公开指出总书记不仅“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他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有“愤恨”情绪。

列宁后来还不止一次谈到过这件事，《列宁值班秘书日志》证明了这一点。莉·亚·福季耶娃在其中记录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索取有关“事件”的补充材料。斯大林拒绝提供材料，说什么必须防止病人不必要的激动。但是，列宁坚持自己的要求。在列宁的病再次加剧，以致丧失说话能力之前五天，即1923年3月5日，他打电话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34]

就在这一天，列宁还口授了一封信，是给斯大林的。表面上看，这封信带有私人信件的性质，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12月，列宁给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几封对党的命运十分重要的信。在一次口授之后，大概是在口授了给托洛茨基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信之后，12月22日深夜，列宁的健康恶化——右

臂和右腿瘫痪。这事马上向政治局委员们报告了。斯大林第二天就在电话上极其粗暴无礼地斥责克鲁普斯卡娅“破坏了患病的领袖的生活制度”。他的行为极端放肆粗暴。克鲁普斯卡娅对总书记的无礼感到震惊之余，当天就给加米涅夫写信说：


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一起

“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克鲁普斯卡娅请求保护她，“不要让别人粗暴干涉私人生活，无端辱骂和威胁”她。克鲁普斯卡娅接着写道：“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娜·克鲁普斯卡娅。[55]”

斯大林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注意不让”领袖激动。但是可以认为，断绝列宁的消息来源，限制他对党的事务的影响，是斯大林在列宁患病期间巩固自己地位的计划的一部分。

加米涅夫把克鲁普斯卡娅的信的内容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没有作一点争辩，就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道歉信，说明他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伊里奇的关心。总书记在这里说了多少真心话，这很难断言。须知他对待道德准则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对他有利，他可以违反任何一条道德准则。不管怎么说，过了两个多月，1923年3月5日，列宁才从克鲁普斯卡娅那里知道了斯大林对待他的妻子的狂妄态度。领袖从总书记的这一行为中看到的不仅是私人关系，而且是更严重的东西。于是列宁在同妻子谈话之后不久就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去，就俄共(布)中央全会即将讨论“格鲁吉亚问题”一事向她口授了一

封给托洛茨基的信，请她用电话向托洛茨基传达信的内容，并尽快把托洛茨基的答复告诉列宁。接着又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5日[8]

列宁一点不顾情面。党内谁都不知道，他早在1922年12月和1923年1月就写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对党的领导成员的个人品质都作了评价，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因此他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只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对他同斯大林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列宁最终得出结论，他认为，斯大林在道德上的缺陷是很糟糕的，在普通同志的交往中对这种缺陷只能加以容忍，而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列宁预见到了斯大林性格中一些违反道德的品质对于政治、对于党的领导的整个事业的危险性。遗憾的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道德上的评价同阶级上、政治上的评价相比，根本不占什么地位。

但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列宁口授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文献，其中提到了斯大林。

致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

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在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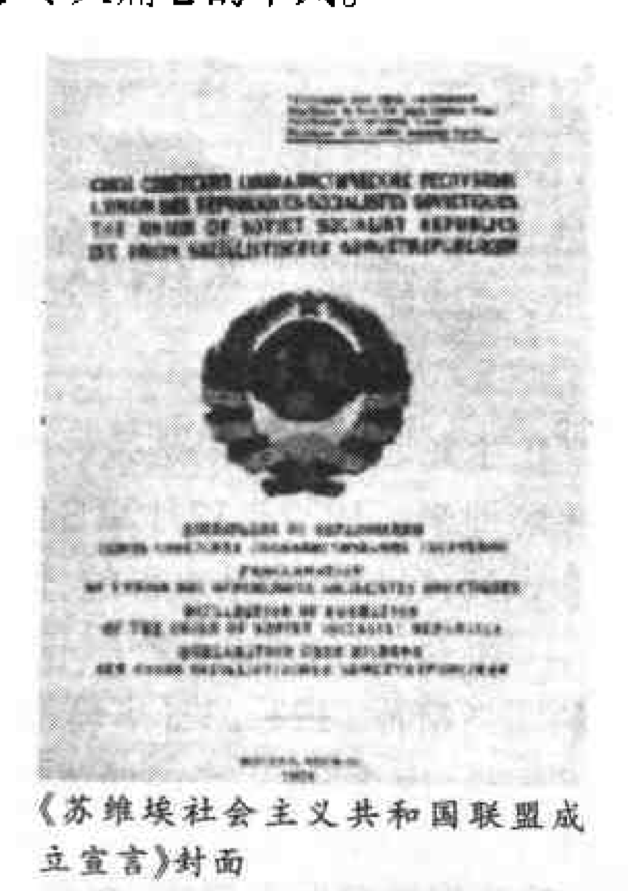
致以敬意！

列 宁

1923年3月6日[37]

十分不幸的是，列宁没有准备好信件和发言稿。过了四天，又一次中风使他不仅丧失了书写能力，而且丧失了口授能力。但是我们有一切根据作出推断，而且列宁在3月5日和6日口授的最后三封信也足以说明：斯大林在“格鲁吉亚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使列宁更加确信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要列宁确信中央委员会在1922年4月初所作的（在加米涅夫的大力促成下和斯大林本人的明显关注下作出的）选择大错特错并对此感到失望，是不容易的。大家当时都错了，包括他在内。但是还有可能纠正错误。不能容许，领导中央机关的竟是一个十分不道德的、对事业有着潜在危险的人。既然斯大林对于列宁最亲近的人都敢于粗暴无礼、口是心非、气势汹汹，那么他对其他的人会怎么样呢？列宁正是在3月上旬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也许决不是偶然的。我没有根据可以绝对肯定，“格鲁吉亚事件”或同斯大林的冲突在关键时刻加速了列宁病情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正是在3月份这几天各种情况的凑合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致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列宁重病缠身，这样的精神上的刺激更快地引发了令人痛心的中风。

这里我们只补充一点：列宁在民族关系方面为之斗争的主张实现了。斯大林的自治化思想被否定了。1922年12月30日开幕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中的思想作了报告（虽然列宁的这封信过了34年才问世！）。在斯大林的报告以及由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宣读的关于苏联成立的宣言中，核心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各民族始终不渝的友谊、阶级团结、对革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封面

理想的忠诚。斯大林重复列宁的思想(但是他并不说明这是列宁的思想)说,在现阶段,新成立的联盟的特殊任务是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列宁虽在病中,但他竟能以异常顽强的精神捍卫在一个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民族的大国中最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斯大林未必想要采用其他的解决办法;在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时,他实在缺乏洞察力和理论智慧。

国外许多为斯大林写传的人,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之流,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斯大林对列宁的死负有责任。托洛茨基的看法大致相同,他在回忆录中断言,完全是疾病使得列宁不能"在政治上摧毁斯大林"。他写道,总书记的专横任性经常使得患病的领袖忍无可忍,从而使得病情加剧。我没有具体材料可以说明列宁有"摧毁"总书记的意图。要是列宁还活着,他的意志必然会实现,这是毫无疑问的。1922年4月2日把斯大林选为总书记之后只过了九个月,即1923年1月4日,列宁就坚决地得出了必须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结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和他晚年的其他一些文章和书信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列宁"遗嘱")对于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有着关键性的、方法论上的意义。

《给代表大会的信》

生死之间的界限是微妙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单向跨越,不能再跨回来。1922年12月22日深夜列宁的病情急剧恶化,这使他明确地意识到,思想可以是永恒的,但人是会死亡的。

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但他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生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刚强精神。12月23日早晨,他请求医生允许他(总共5分钟时间)口授几句话,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焦急不安"。他坚持着,请求着,要求着,终于得到许可。列宁开始口授他那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那是一


赫尔岑(1812–1870)

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革命活动家

赫尔岑的文学创作贯穿着反农奴制的主题，形式多样，独具一格，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列宁指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由于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无法进行社会活动，1847年他携家赴法国，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

流亡国外期间，赫尔岑主要以政论、随笔、回忆录、书信等形式进行创作。他以犀利的笔锋抨击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以独特的文体家著称。

列宁说赫尔岑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他的许多著作在俄国长期被禁，到1905年后才准印行。

些极有气魄的想法。

正当所有的人都在担心会不会再次发病，会不会再次中风的时候，列宁在考虑着未来。说不定他想起了狄德罗在给法尔科内的信中说过的一句话："可能您一开始是为了自己；但是做的结果完全是为了他人。"的确，伟大的列宁奋斗一生的结果就是为了他人。他的信是明哲的临别赠言和警告。他感到了一种危险，他预见到那位一心想成为中心人物的领导人会毁掉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人一离世，广阔无垠的世界也就消失。这位天才在准备口授自己最后几篇不朽的文章和书信时心里在想什么呢？莫非他在想，原来的期望和预料都落空，十月革命的烈火并未延烧到欧洲其他国家，"东方的革命突破"并未实现？而现在，这个没有成为世界革命导火线的俄国，正面临着在一国范围内巩固阵地、保卫自己的任务？或许他在想，只是现在，在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才碰到了那么多的、极其复杂的难题？可能他想了这个问题。可能也想了其他问题。可能他在想，生活是残酷的，新社会建设刚刚开始就使他停步？或者他想起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带头人普列汉诺夫对他说过的话：

"在你的新观点中我听到一种陈旧的东西！"

"为什么？"

"平民革命的时代没有到来……"[9]

是的，普列汉诺夫脱离了革命，脱离了……然而看来，他仍然载入了科学社会主义史册，与考茨基、拉法格、盖得、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齐名。永远地。大概还同赫尔岑齐名。

说起来，赫尔岑……关于新事物和旧事物，他讲得何等精彩：

“新事物要通过辛勤劳动来创造，而旧事物凭借顽固的习惯势力继续存在，死守着阵地。新事物需要人去探究；它需要人去深入钻研，作出牺牲；旧事物不需要分析，它是现成的，在人们眼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对新事物持不信任态度，因为它的面孔很生，而人们对旧事物那衰老的面孔已经十分习惯，觉得它老是那副样子。”[39]讲得多么精彩啊！思想是何等丰富啊！

也许，那时他想起了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在国外，人们曾一度把列宁、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说成是“三位一体”……在马尔托夫那极其枯燥乏味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种高精度的甚至细致入微的思维能力，能够剖析清楚对手所说的一切，并把对手的每一个漏洞和每一点细小的偏差无一例外都利用上。看来他是一位哲学上的印象派的歌手，经常为不停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为无休止地动摇犹豫而感到满足。这是一个个人素养的高低并不依赖于巩固的社会观和世界观的例子。列宁最后一次考虑同马尔托夫联合大概是在1917年6月，然而，一向右倾的马尔托夫，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甘愿得不到任何人承认，永远作为一个多少有些刻薄、多少有些清高、但一贯软弱无力的反对派而苟且度日。”[40]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这样在革命中偏居末位了！大约两年前，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在有待讨论的一长串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1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准许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出境一事给人民委员会的信。

“决定：同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41]

马尔托夫流亡异国他乡了。看来托洛茨基说得对。早在1922年4月托洛茨基就在自己的文选第8卷《政治人物剪影》中对马尔托夫作了准确的、一针见血的评述。托洛茨基像往常一样口气坚决但不无雅趣地写道：

“马尔托夫无疑是革命运动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著作家，机敏的政治家，目光敏锐的智者，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然而马尔托夫却作为一个极大的负号载人工人革命史册。他有思想但缺乏勇气，他有洞察力但缺乏意志……这一点曾致他于死地……马尔托夫的这种缺乏意志力的思想使他把自己的全部分析能力始终用

来从理论上论证阻力最小的路线。现在和将来都未必找得出另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会以他那样的才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偏离马克思主义和公然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辩解。我们可以绝非讽刺地把马尔托夫称为这方面的巨匠。……异乎寻常地、简直像猫抓东西缠住不放——顽强地优柔寡断，固执地犹豫不决，使他长年累月地处于一种矛盾重重、进退维谷的境地。"[42]这是一个用词严厉但实质上正确的评价……

然而，革命不仅有后座，而且有前卫，有前线，有"司令部"。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司令部"。列宁的生命危在旦夕；随时可能一去不复返。而在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笼罩着焦虑不安的气氛。需要变革，需要团结一致，需要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确立民主原则。列宁的意见受到重视，他应当把意见讲出来。列宁再次要求允许他口授。他的计划是宏伟的：他不仅打算谈加强党的领导的办法，而且还想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问题口授他的设想。

列宁晚年的一些著作的命运是富有戏剧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瞒着党写的，上面盖了一件斯大林之谜的白色尸衣。一些写得极其深刻的著作如《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给代表大会的信》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列宁的记述，只是在1956年，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问世。而《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给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一文最初只想打印……一份，为的是给列宁看。然而，即使在发表(经过删节)之后，政治局和组织局还给各个省委专门发了一封信，说此文是列宁病榻日记中的几页，是由于他不用脑子就受不了才允许他写的……这封很不妥当的信是安德列耶夫、布哈林、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于1923年1月27日签署的。

列宁在意识到了独裁主义的危险之后所作的探索并没有被斯大林所理解，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不理解。列宁在才智上大大高于自己的战友们，以致他们经常都好像不能理解他的见解。列宁远远走在前面。战友们显然跟不上他的思想，没有充分重视他的远见卓识。

贯串着晚年的所有著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极其乐观的：俄国的社会主义有前途。所有重要问题，诸如实现工业化、按自愿的合作化原则对农业进行改造、使文化成为全民的财富以及国家管理机构的建设问

题,都是在实行真正的民权制度和坚决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化的前提下进行探讨的。上述建设新社会的构想也需要有能为它的实现而斗争的新人。这就是现在需要列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仔细研究列宁晚期的书信、批注、文章使我们有理由说,列宁比其他人更早地看到了独裁统治的危险性。安·葛兰西在论述极权主义根源时,有一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当对抗双方互相把力量消耗殆尽的时候,第三势力可能乘机而人,把相互竞争的两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63]。然而我认为,这里的几方不单单是指具体的几个集团,而是指这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党——确切些说就是列宁所说的"人数极少、可以称之为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阶层所具有的巨大的绝对的权威"[64]。只有在列宁提出的非常英明的社会妥协的基础上,即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逐步地自愿地合作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走其他任何道路都会导致同农民的冲突,导致侵犯自由,导致极权统治方法的确立,而实行极权统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极权人物。斯大林同列宁周围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一样,没有能够理解列宁的话:我们的党同全国人口比起来,"人数很少";新经济政策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65]。

布尔什维克是城市无产阶级的产物。同农民的联盟,如果当时还不可能做到权利平等的话,那也应以农民能够拥有土地和进行自由买卖为出发点。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只有自愿的合作化才能使农民向社会主义靠拢,面两种力量的联盟必须通过新经济政策才能巩固。



安·葛兰西(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葛兰西的理论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史、美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他特别重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推动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从自发性走向自觉性的历史。在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指出使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达到一致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一个主要区别。在探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时,他提出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掌握领导权的观点,并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的分析,提出了西方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特点。他的著作对于培养意大利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起了重要作用。

甚至在党的那个“人数极少的阶层”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了领袖意图的深刻性以及人民走其他任何道路会遇到的危险的严重性。走另一条道路必然要使用暴力和直接导致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不幸的是这一切果然发生了。

列宁尽管病情严重，但时间抓得很紧。命运不可能给他充分考虑未来的时间。

诚然，有一次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那是1922年秋，列宁竟然能够参加繁忙的活动了！莫非他能战胜疾病?！

布哈林回忆说，看到列宁又归队了，周围的人感到何等幸福啊！“当列宁走上讲台时，我们的心都收紧了，因为大家都看到列宁讲话费了好大的力气。他终于讲完了。我跑到他跟前，手伸到皮背心下面拥抱他，他累得浑身是汗，衬衣都湿透了，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淌，眼窝顿时陷下去，但是目光里流露出愉快的神色：这是生活在呐喊，这是伊里奇的强劲的心灵在歌颂工作！

“蔡特金高兴异常，眼中噙着泪水（这是列宁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本书作者注）跑到伊里奇面前，吻着这位老人的手。难为情的、心情十分激动的伊里奇不自然地吻了一下克拉拉的手。然而，谁也不知道，疾病已经侵蚀了伊里奇的脑子，可怕的、悲惨的结局快到了……”[8]

显然他是有感觉的，因此……列宁坚持着，请求着。12月24日晨，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讨论了形势：他们无权迫使领袖不说话。但是必须持谨慎态度，必须防备万一，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安静。他们决定：

“第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可以口授5到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互相通信的性质。对于这些便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等待答复。禁止会客。

“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以免给他提供素材使他老想问题和焦急不安。”

列宁患病期间身边有值班秘书。他口授了给政治局的便条，曾请求用电话转告同志们一些事情，索要了各种资料、文件。通常在他身边轮流值班的有娜·谢·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子）、玛·阿·沃

洛季切娃、玛·伊·格利亚谢尔、舒·姆·马努恰里扬茨、莉·亚·福季耶娃、C·A·弗拉克谢尔曼。12月23日，列宁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值班的是沃洛季切娃。她在日记中简洁地记载道：

> 口授了4分钟。觉得身体不好。医生来过。口授前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口授得很快，但他的病状仍感觉得出来。[57]

列宁望着窗外，望着隐没在白茫茫的林海中的远方说：

"给代表大会的信……"

是啊，明年即1923年的4月应当召开党的例行的代表大会，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如果列宁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未能痊愈，就让人向代表们宣读这封信。语句是经过推敲和周密考虑的，因为早已酝酿成熟。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们在这里插上几句。列宁口气很坚决："……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乍一看时，思想上"愣住了"，因为这里谈到"政治制度"要作变动……但看了几句以后，读者开始懂得，列宁在谈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党内民主，社会中的民权制度，两者实现的道路。我们伟大的思想家高瞻远瞩，认为民主制度是新制度赖以存在的重要杠杆、工具和手段。下面我们继续引用"给代表大会的信"：

>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
>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遇到很大的危险。
>
>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至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
>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

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 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 记录[8]

列宁的想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些变动的主要精神是保证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民主化。这方面的第一步就是在党的司令部中增加革命的主力——工人的人数。应当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1至2倍。增加代表的人数,更加彻底地更新成员,更加靠近群众,减少那种因一些小集团闹冲突面使全党的前途过分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列宁还警告说:在可以见到的最近将来,国际形势会尖锐化,必须抓紧时间!顺便谈谈,甚至像布哈林这样的一些党的杰出活动家也没有理解这一警告,他们后来就对较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持反对态度。列宁看得是多么远啊!要知道,当时他看到的看来还只是俄国桦树林树冠的外貌!

我认为,评价列宁的天才时不应当忘记,他的战友们不能充分理解他,这种情况经常有,太经常了。或者说,他们即使理解了,但也没有充分支持。我们想起了1917年10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新经济政策战略、关于增加工人名额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这看来不是列宁周围一班人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列宁所看到的,战友们并没有看到。列宁最后一次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是在他逝世以后:他的许多严厉的警告没有受到重视。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前,甚至在列宁处于少数的时候,他的论据、热情和意志的力量足以引导整个革命船队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现在他不在了。他永远不会知道,在对斯大林怎么办的问题上,他最后表达的意志根本不会得到贯彻。

我们回过来看那封《信》。

1922年12月24日: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

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直到现在，一些研究工作者对托洛茨基在当时的政治分量估计不足。“危险的一大半”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列宁看到托洛茨基比总书记声望高，但是他确信总书记有很厉害的本事。这两位当时的中心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演变成一场冲突、从而使党发生分裂的危险。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49]

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包括些什么呢？总书记负责解决所有的日常问题，往往是对党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这种权力主要表现在挑选、提拔中央和地方的党员干部上。有成千上万个工作人员……只要配备了所需要的党员干部，就能为你提供有利的政治条件，——这一点最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何况斯大林把机构同党混为一谈。这在许多情况下都已被人们看出来。列宁比其他人更早看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50]

或许列宁在口述下一句话之前反复琢磨时曾经想到：“要是这个人的革命主心骨更硬一些，他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全国性的领导人！”列宁暗暗地笑起来，他可能记起了托洛茨基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红军的报告。托洛茨基已经把情况分析完了，他本应就改进军队建设的方法提出结论，但却大谈“士兵的基础性军事文化教育”。在全场一片活跃的气氛中，托洛茨基大声疾呼：“让我们努力做到使士

兵身上不长虱子。这是艰巨而重大的教育任务，因为这需要我们用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坚定不移的精神，通过具体示范，反复地帮助群众去掉不讲卫生的习惯，而他们就是在这种习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要知道，满身虱子的士兵就不是士兵，而是半个士兵……什么是文盲？文盲就是精神上长虱子。我们必须大约在5月1日以前扫除文盲，然后再接再厉，把这项工作做下去。"[51]列宁很欣赏他的"文盲就是精神上长虱子"这句话。托洛茨基能够毫不费力地创造一些精彩的警句。在托洛茨基身上，经常是政论家压倒政治家，自我陶醉压倒清醒的头脑，哗众取宠之心压倒起码的谦虚。不，这些东西跟斯大林一点也不沾边……两个人都非常自负……。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和对托洛茨基的评论，明确说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
>
>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
>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52]

列宁口授后，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记中写道："第二天（12月24日）6时至8时之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要求把他口授的一切当作绝密文件保存在有专人负责的专门地方……"[53]遗憾的是，担任人民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并给列宁的口授作过记录的福季耶娃不顾领袖的指示很快将12月的记录通报给了

斯大林(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因此,列宁的"……信"对党的领导来说已经不是出乎意外的了。

第二天,列宁继续口授他那独一无二的文献,这份文献将引起千百万人的猜测,但……是过了许多年。

12月25日。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列 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 记录[24]

12月26日,列宁继续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阐发他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思想。他认为,这是改进工作和改善国家机关的保证。列宁写道:"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25]同时,列宁还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即扩大中央委员会应该不仅依靠工人来实现,而且依靠农民来实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他们也必须出席政治局的会议。但是,他在口授这些思想时像以前那样回过头来谈具体的人。

列宁在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了十分简洁的评价以后,继续考虑一个问题:在他身后谁可能成为领袖?他十分清楚,在他不在的情况下,总书记的职位会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掌握着"无限的权力"的岗位。他是公认的事实上的领袖,这不是由于职务,而是由于才智和品德。疾病迫使他不再对中央委员会进行直接的领导。政治局的委员中自然就有一位委员走上第一线。斯大林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主管全部书记处工作即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很清楚,如果发生不可挽救的情况(而列宁完全设想到了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准备《遗嘱》了),斯大林将试图巩固他这个潜在领袖的地位。但是,托洛茨基也可能这样做……那时就会争夺,就可能出现分裂……需要有更具体的防范良策。过了几天,已经是1923年1月了,列宁口授了一个事关大局的意见,

作为“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 宁

1923年1月4日

莉·福 记录[56]

这是一个著名的补充。关键问题讲得十分明确：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到别的岗位上。对他，对斯大林，在政治上目前不抱大的期望。他也许忠实于重大的思想，虽然他对这一思想好像理解得不正确。同时，斯大林的政治声誉暂时还没有被玷污。但是，道德和政治始终是相辅而行的。如果两者的关系不和谐，那么不是导致政客手腕，就是导致独裁作风。列宁的补充是对未来的高度关切，但是没有个人的恶感。列宁善于站得比个人恶感更高。阿·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在他对对手的态度中，感觉不到任何狠毒之心，但他却是很厉害的政治对手……在政治斗争中，他使用了除肮脏的武器之外的一切武器。”[57]列宁的明察秋毫的思想从斯大林性格上存在的道德缺陷中看到了一种将来可能发展成为许多灾祸的根源的东西。伟大的先知先觉者的最不祥的推测果然应验了。

但是，托洛茨基也令人担心。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这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他在政治上也有毛病。托洛茨基长时期主张“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托洛茨基有野心在全党是出了名的，左倾极端主义已经使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同整个中央发生对抗。托洛茨基的波拿巴式的野心异常强烈，以致他认为，采纳1922年9月向他提出的担任人

民委员会副主席即担任列宁副手的建议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无法接受……托洛茨基指望得到特殊的地位。他几乎不掩饰他把自己看作一位天才的看法。正如给托洛茨基写传的伊·杰伊切尔所说：“列宁关于调动斯大林职位的遗嘱如果实现，托洛茨基势必会当上党的领导人。他，托洛茨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列宁所作的由于坦诚和直率而令人深为感动的对“两位杰出领袖”的评价，是党讲原则的不朽典范。顺便指出，同志式的直率始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最典型的品质，即使个人崇拜的年代也不可能使它绝迹。下面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事件以后已经很久的1942年的一个例子。

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团政治委员韦尔霍鲁博夫在上前线参加联合行动时，按照当时的惯例，在工作结束时，对那些他检查过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写了简单的鉴定。请看他对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列·伊·勃列日涅夫的评语（这个评语保存在政治工作人员、未来的总书记的人事案卷中）都说了些什么。鉴定的第一部分谈到这位旅政治委员对列宁—斯大林党的思想的忠诚，谈到他履行自己职责的决心。接着是如下几句话：“怕干粗活。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军事知识极差。许多问题是作为总务管理人员，而不是作为政治工作人员来解决的。对人不是一视同仁，喜欢安插自己偏爱的人。”总共不过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证明，昔日的列宁传统，即直截了当地、诚恳而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一传统还保持着。读者自己有可能看出，团政治委员韦尔霍鲁博夫的结论是客观呢还是主观……

我要指出，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时，没有回答谁来接替他的问题。我认为这正是领袖十分英明的地方。指名道姓说谁是“太子”，简直就像是搞“继承制”。列宁不会允许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相信党及其中央的智慧，相信它们能从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中而不仅仅是斯大林在“十二大”上提到的领导核心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我认为，在一盘棋已经下完以后，企图在历史的棋盘上把可供选择的棋子重走一遍实在是没有意义。我敢说，列宁在他的《信》中通过说明几位最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的特点已经告诉人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适于担任党的领袖。没有一个人！从他的“遗嘱”的全文来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他也没有建议在其他领导人中间物

色这个领袖。我认为，列宁赋予他的“遗嘱”的含义比乍看起来更深刻。很可能，这位革命的天才以为，“老近卫军”这个最敏锐的阶层应该、必须、有能力成为**集体**的领袖。这个集体“领袖”在创造了、建立了防止把权力交给一个人的企图的法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保障以后，能够从一二十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间随便选出一个人来担任第一把手。那时，被推选出来的领导人是很有才干还是才干稍差就不会有决定性的意义了。“起作用的”首先将是**民主制度**，它会根据宪法准则和党的准则只支持符合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的事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确保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一个机构**的利益。

但是，斯大林正是借助于“老近卫军”才得以建立起不是民主的而是官僚的制度。直到现在，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斯大林会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登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谁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追述俄国的具有专制传统的历史，必须看到人民和党的政治素养很低；不能忘记新社会缺乏民主传统，一党制对群众的社会成熟程度有特别高的要求，缺乏防止滥用权力的法律保证，苏联的阶级结构有其特点等。

在这一系列原因中，还有一个保证斯大林“不受伤害的秘密”。我认为，这一点（从个人方面来说）具有决定意义：他篡夺了代表、解释、注释列宁思想的权利。他对列宁主义的系统的“维护”终于在千百万人心目中造成了固定的印象，即斯大林始终同领袖在一起，是领袖的战友、学生、继承人。斯大林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精神现象、道德现象、心理现象。列宁立“遗嘱”时仿佛感觉到了有可能利用总书记的“无限权力”使正在产生的制度严重变形，使它成为极权官僚制的化身。

列宁明白，斯大林不应该留在党的核心里“继续前进”（恩格斯的说法）。列宁的警告的含义，只有在“领袖”后来取得“胜利”面人民进人悲剧的背景下才能充分被人理解。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两个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全会审议了关于改组和改进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提纲，这个提纲是在列宁的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列宁在另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篇文章的思想）的基础上起草的。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愿望，决定把组织问题作为代表大会的一项特别议程

加以审议。提纲指出，把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由27人扩大到40人，实行政治局定期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的制度，是适宜的。预定有中央监察委员会3名常任代表出席政治局的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这批代表应该不顾情面地进行监督，"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8]。

列宁认为，除了代表大会对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的监督以外，在共产党员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必须由专门的委员会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全会基本上同意列宁的结论，并且认为必须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建立国家监察机关和党的监察机关之间的最密切的联系。(当时谁会知道，后来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作用贬得很低，让它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在上面登记党内事务的工作，随后斯大林又干脆把这个机关取消了呢？)

虽然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已将近一年，但是他的地位从外表看一点也不突出。当中央全会的参加者们开始审议斯大林提出的《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报告提纲时，对提纲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会同意以提纲作为基础，而在决定中提出了很多原则性的意见。当时决定在修改后把提纲送列宁过目。斯大林本人起草的提纲文本证明，即使在总书记被认为"有专门研究"的问题上，他也有许多缺点。为了对提纲作最后的修改，全会成立了由斯大林、拉柯夫斯基、鲁祖塔克组成的委员会[9]。

在全会上，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托洛茨基采取了特殊的立场。用他的话说，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将使中央委员会失去"必要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到头来"就可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建议成立一个由二三十个经选举产生的人组成的"党的理事会"。按照托洛茨基的想法，这个机关可以给中央委员会发指示并且监督它的工作。实际上，托洛茨基是主张在党内实行"双重权力"、"两个中心"。中央全会没有经过多少讨论就否决了他的建议。今天我们知道，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拥护列宁的建议，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个联合机关。作为列宁"遗嘱"的文献在他生前就这样开始起作用了，诚然，远

不是全部文献。

大家知道,《给代表大会的信》打印了五份，它们分别放入几个信封中封好：一份交给列宁的秘书处，三份交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第五份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要速记员玛·阿·沃洛季切娃在信封上写明：能启封的只有列宁，而在他死后只有克鲁普斯卡娅。“在他死后”这几个字沃洛季切娃不敢打。只有信的第一部分（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给了斯大林。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数的建议是作为斯大林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组织活动的报告的一个论点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但是仍然没有提这一建议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当时在世，装有他的“遗嘱”的那些信封都没有启封。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一致选举列宁（只有他一个人是全票）为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并给领袖发出了热情的致敬信。主持代表大会会议的加米涅夫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宣读了这封致敬信。我想把致敬信全文引录如下：

> 代表大会代表党、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向自己的领袖、无产阶级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天才伊里奇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表示热烈的爱戴，您在身患重病和长期不能视事的这些日子里，仍然像往常一样用自己的品格团结着代表大会和全党。
>
> 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历史所负的责任。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成为并且确实会成为无愧于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领袖的组织。党坚信，舵手返回舵位的日子不远了。
>
> 代表大会向伊里奇的妻子和战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以及他的妹妹和朋友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致以同志般和兄弟般的同情，并请她们记住，称为俄国共产党的这个大家庭每天都同她们一起分担一切沉重的忧虑。[60]

1923年3月，又一次可怕的中风使列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直接影响党内状况，特别是干预实现自己“遗嘱”的事，已经不可能了。党的未来领袖的问题成了极其尖锐的问题。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

有一个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列宁是为哪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自己的"遗嘱"的?我们记得,"遗嘱"一开始就写道:"我很想建议在**这次**(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代表大会上……作一系列的变动。"可以认为是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但是信中哪里也没有直接点明。同时,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1923年4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十分严重,以致他未必能坚持要求把《信》传达给代表。出现了列宁指示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但是,也有证据说明,他嘱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后才拆开信封。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封《信》是写给"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既然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总书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在列宁3月发病,从而实际上失去了与人积极交往的可能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面前。

1923年3月以后,斯大林在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就两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也许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总是喜欢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开,把思想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这种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加强了思想的鲜明性、清晰性、明确性。例如,正是由于他,关于"引带"把党同人民联接起来的思想得以流行开来。他把工会称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带",按他的说法,在工会中现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第二根"引带"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认,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指富农。按照报告人的意见,第三根"引带"是青年团。在这个领域里,敌人的进攻特别顽强。接着,他按龛设神似地列举了其他"引

带"——妇女运动、学校、军队、报刊……同时,他还尽力用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形象说法来形容它们,如说报刊是"党的喉舌",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如此等等[60]。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引带"的工作内容本身谈得很少,但却大谈特谈有哪些敌对力量"在这里同我们作对"。毫无疑问,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更多的已经是采取隐蔽的、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却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显的和想象的敌人斗争、拼搏、对抗上面……

还在几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岁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设想,竟然出现使他能真正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的机会。命运是乖戾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预料,竟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这段经历也向潜在的对手们表明,掌握了机构的妙用,再加倍进行精心策划,就能大有作为。特别是如果积极地"保卫"列宁主义的话。当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顺便指出,斯大林现在的对手经常攻击他隐瞒实际情况。在20年代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公开性传统并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当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党的文件和报纸,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斯大林痛心地谈到1922年的饥荒及其后果,"非常可怕的工业萧条"、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实事求是。斯大林当时对这一切并不隐瞒。在列宁3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数越来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极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党内开始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总书记在政治局内的影响的加强。他的办法就是逐渐孤立托洛茨基,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阿·巴·巴拉绍夫对我讲:

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大家都支持季诺维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是个单数。"托洛

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缓和气氛。

巴拉绍夫继续说：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看来是协调他们的立场。于是，我们在秘书处私下里就把在斯大林那里的“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在20年代，斯大林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们分别是纳扎列江、坎涅尔、德温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诺夫……他们全都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机关里也按相应的态度行事……



“四十六人声明”

托洛茨基明显地感到党内的民主在被扼杀，在他所支持的“四十六人声明”中写道：“党内的自由讨论实际上已经消失，党的舆论窒息了……党内建立的这种制度是完全无法忍受的，他破坏着党的独立性：用一个特选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党，这种机构平时运转自如，但是在危机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失灵……”

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因为这两人都拼命想向上爬。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担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当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从客观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批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他们签发了所谓的“四十六人声明”。这批人当中甚至有一些党内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柯秀尔、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等。托洛茨基指责中央的主要论点是：“党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他重申了他所谓“工业实行硬性集中”(关闭一批大厂)、“收紧

对农民的政策"的主张,再次坚持实行"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谈谈。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时就宣称:"工人群众不能成为到处流浪的俄罗斯部族。他们应该同士兵一样,可以调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挥。这也就是劳动军事化的原则,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地谈论在经济遭到破坏和饥荒流行的条件下按新的原则建设任何工业。"[8]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采用军事方法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作为"兵营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欢谈论党内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的条件下用某种方式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中央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的声誉,首先是败坏了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的声誉。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声望却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参加会议的114人中只有两个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实际上,早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在党内开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于孤立。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于是,他企图依靠军队,在那里他还颇有威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托洛茨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1924年1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后来,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中央发起进攻,几次挑起争论,都抱有个人的目的——想当俄共(布)领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对他极端不利的时刻发起争论的,实际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败。托洛茨基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

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1923年10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10月



克里姆林宫及红场

18日乘汽车来到首都。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没有同战友们见面。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

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1917年7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4000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

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1917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

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63]

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在1918到1921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1920年11月20至21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64]。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昙花一现的英雄"托洛茨基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

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1879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6]

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

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

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

"他追求功名。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66]

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1918年10月25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旧军队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就是"不断革命论"。他自己把这一理论归纳为三个互相联系的不断革命思想,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卡尔·拉狄克
著名活动家

知识渊博,消息灵通,能够在需要时从自己的记忆中抖落出大量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或政治家的情况。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常被政治局所采纳。

拉狄克真正的天才是在办刊物、写文章方面。他虽然说话还带有很浓的外国腔,却学会了用俄文写作,而且写得十分地道。

然而,列宁始终坚持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托付给拉狄克。其主要原因在于,拉狄克缺乏踏踏实实的作风和有条不紊的工作能力,而且遇事不冷静,嘴巴又不紧,很难保住党和国家的机密。所有这一切,使得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记者来使用,让他担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的重要军官之一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凭着良心开始帮助苏维埃俄国的阿尔特法特来到我的房间，径直对我说：'我过去到这里来是出于被迫。我不相信你们。现在我要帮助你们，要以我从未有过的自觉态度，抱着坚信我在为祖国服务的信念，来尽自己的职责。'"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67]。

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68]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

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20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

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3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1924年1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1月19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

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1924年1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这种离奇事。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了政治上的评价。



列宁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图左为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图右是加米涅夫

1月19日和20日，克鲁普斯卡娅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把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念给列宁听。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回忆说，星期六她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激动起来；她对他说，这些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托洛茨基后来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许列宁认为，这个事实是分裂的前兆，一个人力量加强的开端。不难想象，列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却不能积极参与党内事务，他是多么地难过啊！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无能为力**……强劲的思维能力被无声地禁锢起来……完全可以猜测到这位天才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性。列宁明白，他的关于党的领导机关中派别斗争可能尖锐化的推测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

21日白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从列宁3月发病之日起就帮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照料生病的伊里奇的缝纫厂女工叶夫多基娅·斯米尔诺娃回忆道：

"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给他端去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他没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里躺下了。我守着热咖啡等到4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有人向我要几瓶热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经不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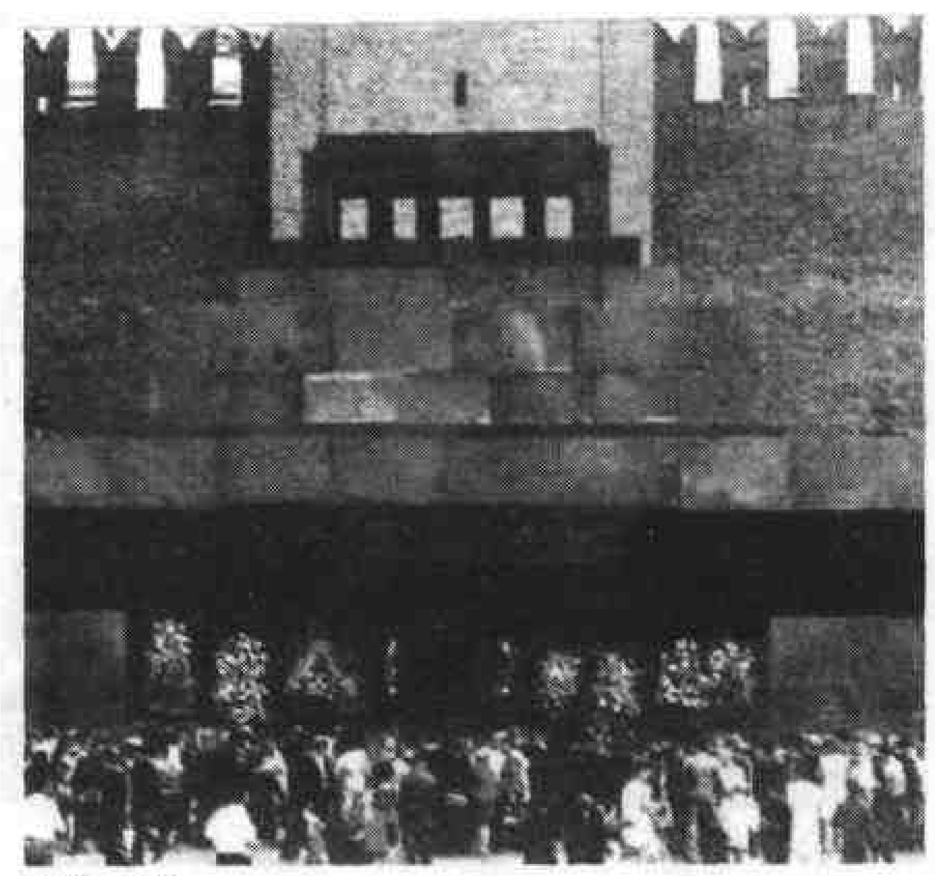
1924 年 1 月 21 日晚 6 时 50 分，列宁逝世。从此，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盏照亮世界的明灯熄灭了！

了……"

傍晚，18点50分，列宁去世了。病理解剖检查证实了医生们的诊断，即主要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脑血管硬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没有来参加葬礼，尽管他有足够的时间。1月22日他从梯弗里斯火车站通过电报给《真理报》发来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

> 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
>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
>
> 我们现在由于无比的悲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伟大恩赐生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过，向他学习过……
>
> 我们如何前进？——手拿列宁主义的信号灯……[⑩]

如果怀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诚，那是有失恭敬。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宁。


列宁陵墓

22日夜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而1月27日，装有伊里奇遗体的灵柩被安放在红场的陵墓中。1月26日开幕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永远纪念列宁的重要决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在挂着黑纱的大剧院举行。

傍晚6点20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仿佛在追悼会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发表"誓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首先讲话的是加里宁，接着讲话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直接问在场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目中所想象（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那个乐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和集体组织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强强地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的一切呢？"讲话的还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苏列夫、克拉尤什金、谢尔盖耶夫、纳里曼诺夫、兹韦列娃、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在讲话中谈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从来不害怕孤立。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次伟大的转变关头，这位肩负着领导人类大众使命的领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围不仅没有军队，而且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从来没有遗弃过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真正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的信念。"[9]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奥登堡、伏罗希洛夫、斯莫罗金、李可夫。斯大林是第四个讲话，在季诺维也夫之后。

斯大林是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讲话的（像通常一样，讲



列宁的葬礼。(自右至左)依次为:布哈林、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托姆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

稿他自己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讲话内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开。他号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劳动王国”。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某种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终都具有的东西：颂扬力量、敢于牺牲——“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打退了无数次的攻击”，“我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一定奋不顾身”[7]。斯大林代表党宣誓要维护党员称号和党的统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各兄弟共和国的联盟，要忠实于国际主义。讲话中既没有提到民权制度，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提到自由。可能它们属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只有暴力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推选加米涅夫担任。斯大林

斯大林悼列宁

(原文 1924 年 1 月 26 日发表于苏联莫斯科)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仍然留任总书记，等待党的“十三大”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去世的列宁的意愿，“十三大”应该宣读他《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那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知道这封《信》呢？不同的证明材料有不同的说法。

悲剧由来已久

有一些事件到适当的时候仍然不为历史所注意，尽管它们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尤其关系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命运。我已经说过，这封信非常可能是写给党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信并没有向代表们转达。马可·奥勒留写道：“我认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思想即使谨慎从事，反复作一些考虑，仍能直接射向目标。”列宁在他的《信》中叙述的思想虽然碰到不少障碍，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标”。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由于存在阻力，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来，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们仍将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并说明：实现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纯洁。

打印成几份并放在几个信封里的1922年12月24至25日的列宁的信和1923年1月4日的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于1924年5月18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记录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移交手续的专门记录中，克鲁普斯卡娅亲手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月23日至1月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至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记，其中有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这一札记通告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2]

在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全会听取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⑦]

这是没有列宁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他一开始就格外激动，他说："……在今天的《真理报》上，我们亲爱的工人诗人之一对于党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这个时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绘：

显然，人们心里
非常难过，
眼窝深处
呈现出哀伤。
因为代表中央……
作政治报告的……
不是……不是列宁……

"我们现在必须在没有列宁、没有灯塔、没有地球上最天才的头脑的情况下解决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⑧]

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报告谈了一连串问题：一年的总结，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时间因素，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争论的总结，民族问题、国际形势和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为仅仅是城市的政党"，谈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无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还是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实际上都没有涉及列宁在他最后一批书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样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宁的战友们的智力水平(虽然这种水平总的说来也是高的)，我再说一遍，无法使他们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用深远的眼光去看未来。要知道，列宁不是单纯地——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阐述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也表现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公式主义，即习惯于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简化，直到谁都认不出来。列宁的"遗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其中心是人，还有一些探

讨如何保证民权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列宁是在寻找道路：怎样避免工人、劳动者同他们的权力异化？怎样战胜正在产生的官僚制度？怎样使机关成为民主的、灵活的机关，怎样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怎样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列宁的打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主要之点。

非常遗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也许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列宁的天才意图。党的“十三大”审议了日常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解决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务。列宁遗嘱中发展民权制度这个中心思想没有成为代表大会的主要思想。这恐怕就是后来发生各种灾祸的主要根源。

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面即革新领导机关的问题，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事实上没有提出来。斯大林只是触及到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列宁谈到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是扩大了，尽管人选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职业革命家。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很少，应当承认，这是很不一样的。

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对列宁异常关心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独特的，确切些说，是片面的阐述。报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厂工程师即一位专家所发表的见解。这位工程师说，仅仅给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还不够，必须给人们以“人权”。工程师说：只要我们没有这种权，我们就会处于消极状态。只要不承认“人是国家最高价值”，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诚然，除了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这位专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意见。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作了如下的反应：“……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非常清楚，他们(指专家们。——本书作者注)在我们共和国看不到这种权利，就像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⑩]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他们都没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的中心应该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问题。这种无知也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说，革命以后才过了六年半。没有无产阶

级专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本顶不住国内外敌人的压力，但是忘记列宁那么关心的民主原则、民权制度，或迟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

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并未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各个代表团由专门挑选的人向他们介绍了这封《信》的内容。加米涅夫特别活跃，从这个代表团转到那个代表团。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在"念"完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建议：提请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一切就到此结束。实际上，"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传达列宁的《信》，对《信》的意义事实上就估计不足。于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没有成为确立党内生活民主准则的基础，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作出组织变动并推选新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基础。这里必须考虑到，从写这封《信》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后者在列宁逝世前不久就曾对党的方针，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过疯狂的攻击。斯大林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实际上也保护了他自己。他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代表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许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于承认托洛茨基正确……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而首先是许多代表政治素养不高的结果。后来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大多数居民，而且大多数党员在一定阶段的政治素养不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现在，他们通过革命抛弃了天上的神灵以后，却采取步骤去创造地上的神灵。他们也不知道，天上的神灵是一个象征，它主要要求象征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灵不会满足于这一点，他要求提供骇人听闻的供物。唉，像列宁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太罕见了，在历史上真是太少有了。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养都不高呀！难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索柯

里尼柯夫、伏龙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不懂得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领袖的“遗嘱”？我想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统一”口号淹没了理智和良心发出的呼声。甚至可以说，**对理智和良心占上风的时机**也没有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例如，为了抬高新领袖的地位，不仅一再削减、阉割现实的民主，把党变成权力机器，而且在看到人们要公开地、当众地抗议一个人篡夺权力的时候压制他们当中许多人本着良心发出的呼声。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问题在于，要能利用这种良心占上风的时机，就要敢于想问题……不过逆来顺受的心理通常总是更强烈。自由在人们的意识中常常处于像“灰姑娘”那样受歧视的地位。

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那封《信》以后，他曾声明要辞职。如果他的辞职被接受，可能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处在他的地位上都只应该这样行事。但是，这次辞职并不坚决。顺便指出，在20年代，斯大林曾经两次声明他要辞职。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作了组织处理。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

“我想，直到最近为止，客观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对反对派来说是一种克星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这样做只会对党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提高了，他在党内成了为统一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派别活动分子的人的化身。辞职要求再次被否决。但是，看来斯大林对这一点已经确有把握，要求辞职暗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

法。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20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个人——当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懂得这组"二重唱"的意图,并且到适当时候就装出这种"安排"使他感到满意的样子。要知道,他力争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问题即政治问题作报告,这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可以说,阻碍实现列宁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这两个政治家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事实上违背了领袖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他们在1917年反对过他,而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反对他。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喜欢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说,在革命以前整整10年的时间里(从1907年至1917年)他一直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还说什么谁也没有像他季诺维也夫那样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个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很亲近,他也不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确信自己在列宁身后会起特殊的作用。正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作出决定,不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开出来。虽然在党的"十五大"(1927年12月)上这个文件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在情况通报上发表了,但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看不到这个文件。

在处理这封《信》时表现出来的反民主作风被斯大林学到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课堂上、"班上"教他的

东西。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留给过去。但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过去可能进行报复。这两人自己不知道，他们已经播下了过去同将来的冲突的种子。在流血的收获期到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连脑袋都丢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们制服了托洛茨基，对他们就失去任何兴趣了，而十几年以后，他冷静地批准了把他们处死。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有多少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如我们所知，1925年12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

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这种见解有一定的

合理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10月(1923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

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

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第二书记莫洛托夫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20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30号上(印数1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

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

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1923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29]。

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

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30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

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的其他方面等问题。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的统一。

对列宁主张的实行广泛民主的根本立场的逐渐背离,不可能不在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所反映。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形、个人迷信反常现象和对权力的滥用,其深刻根源正是在这里。但是,十月革命的思想电荷如此不可战胜,以致一切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滤波器和绝缘器都不能把它完全消除,完全消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这一点,懂得这一点。这完全不是为了说明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永恒的。现在和未来都会逝去。看来只有过去才是永恒的。而过去常常给未来发指示。今天,未来是这样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亟需了解以前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于实现我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过去教导人们要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只要真正凭良心行事,总是会有成功的希望的。

必须正确地指出,当时正在建立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异常重视用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居民和青年一代。树立理想的"新人"形象,模仿未来个性的某种模式,成了一种流行的风尚。早在20年代,尽管官僚主义倾向已开始加剧,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改造社会的问题仍然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生活方式简朴,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不高,随时准备响应社会的各种口号,深恶痛绝市侩习气、发财贪欲,跟惟利是图完全异趣的高尚情操——这一切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更晚年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官僚主义并没有扼杀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人们有着坚强的信仰。

列宁的原则在官僚主义积淀和教条主义框框的压制下并没有完全消失。他的思想,虽然不时遭到阉割,使人不能看见全貌,但是在为选择创造新事物的途径和方法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武器。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富有戏剧性,但是国内存在着决心捍卫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力量。

黑格尔认为,命运作为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一切。神

学家们补充说，这是某种外部的力量，它知道每个人的未来，引导每个人沿着一定的小路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没有离开党的指挥桥楼转入某个人民委员部，而是违背他永远也理解不了的黑格尔的思想，把命运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测，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任总书记斯大林在历史上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谁能够说，他那不高的个头会给整个伟大事业投入如此可怕和巨大的阴影呢？

悲剧的久远的根源，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在于当时正在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已经包藏着隐患。那位掌握着无限权力的人物，那位贯彻别人的思想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抱定宗旨要把按一长制原则管理这个制度的权力夺到手，而他面前又没有障碍。列宁的警告未受到重视。"老近卫军"忙于内讧而没有承担起充当集体领袖的历史使命。已经赢得的自由模糊了对未来的认识。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哲学自传习作中所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很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即自由不是民主性的，而是贵族性的。起义群众对自由不感兴趣，他们也不需要自由；他们无法忍受自由的重负。"[72]这一看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从下一方面来看还是正确的，这就是：无论是"群众"还是"老近卫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支配已经争得的自由。未来像往常一样笼罩着一片烟雾……

过去那不可逆转的过程和秘密尚且是个谜，而未来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更难意料了。



第3章

选择与斗争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

——弗·培根

（英国哲学家、作家）

新社会诞生的痛苦过程还在继续。而生活一天天在流逝。许多人的命运和各种情况、冲突交织在一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信心失而复得。在列宁逝世前，他对功名大概没有认真想过，但列宁逝世后……很难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就已相信能够实现看来不大可能的希望。人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个谜。

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分钟（也许更少），路易·卡佩特问刽子手："拉彼鲁兹有消息吗？"（拉彼鲁兹的环球探险队已经四年多杳无音信，后来查明是永远失踪了。）人的内心深处的确神秘莫测：再过一刹那，路易十六就不复存在于人世了，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运，却是拉彼鲁兹……谁也没有打算把斯大林推上断头台，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今后的计划。他当时有这些计划吗？

斯大林的图书馆是1920年起在他克里姆林宫中小小的住宅里慢慢建立起来的，藏书大部分是革命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列宁、空想社会主义者等的著作集；托尔斯泰、迦尔洵、契诃夫、高尔基、乌斯宾斯基等人的书；还有宾什托克、宗捷



斯大林在别墅里每天需要阅读很多东西

尔、霍布森、肯沃尔季、坦希列维奇等人的现在鲜为人知的一些著作。其中的许多书并不只是这个简朴住处的摆设。书里有可能有斯大林用铅笔作的标记和划的着重线。

在拿破仑的《我的思想》中，在这位皇帝回首往事的一句话的页边上画着一道粗线："正是在洛迪*城下的晚上，我坚信自己是个非凡的人，我对取得功名、完成我以前只是幻想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①斯大林在违背列宁的意志而保住自己的总书记位置时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洛迪"呢？也许，对于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来说，这的确是高潮时刻：45岁的总书记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他绝不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同伴们差。

* 在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役中，年轻的波拿巴在洛迪城下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中的一次。


45岁时的斯大林，其政治野心已至高潮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他偶尔到祖巴洛沃自己的郊外别墅休息时想得愈来愈多了。20年代初，莫斯科近郊有几百座"失势的人们"抛弃的庄园、住宅、别墅。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逃到了国外；一部分人在血腥的内战中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些"资产阶级奢侈"的标志物干脆被没收了。这些房子中有许多用作了医院、孤儿院、仓库和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国家机关的疗养院。离乌索沃车站不远约有几十座别墅。其中一座从前属于石油企业主祖巴洛夫的别墅分给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米高扬也住在这里，稍晚一些时候住在这里的还有加马尔尼克以及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

1921年斯大林家里生下了儿子瓦西里，几年之后斯维特兰娜出世。后来，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来这里居住。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据我们所记，她比自己的丈

夫年轻22岁——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和热忱操持起简朴的家庭生活。在妻子参加工作(她先是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编辑部、继而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到工业大学学习)以前,一家人仅靠斯大林的工资,生活过得非常节省。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在翻阅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时,曾有趣地读到斯大林给斯塔索娃写的证明他收到党的会计处从他下月“薪金项下”预支25、60、75卢布的收据。这个人曾亲身体验到缺钱的滋味。

随后家里渐渐雇用了保姆和管家。当时既没有人数众多的警卫,也没有管理员、通信员以及几十个其他公职人员。这些人员是后来才有的。领袖们自己称他们为“服务员”,以区别于“仆人”这一资产阶级的称呼。

在革命后的头几年，斯大林像所有党的领导人一样，根据家庭开支和党内规定，生活过得很简单朴素。早在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起草了一份专门文件并分发给各级党的委员会，其中申明了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1920年9月)上就制定了的措施。文件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员发放奖金和实物。规定要求，要极其严格地监督党员的思想状况，“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基本劳动群众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通报说，无视这项条例，“就是破坏民主，就是瓦解党和降低共产党员威信的根源”。文件重申了列宁制定的条例:“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②]列宁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自己的稿酬上交党的会计处。

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类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的、甚至是反党情调的标志。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一直保持着禁欲主义。在他死后,除几套制服、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外,实际上没有私人物品。他不爱物品,爱权力,只爱权力!

有时星期天,如果情况允许,大家就一起聚会,常常是在斯大林家里。到这里来的有布哈林夫妇、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米高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他们常常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布琼尼的手



1927 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自左至右)分别为斯大林夫妇和伏罗希洛夫夫妇

风琴伴奏下，大家唱着俄罗斯民歌和乌克兰民歌，甚至跳舞……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来过斯大林的别墅。

饭桌上大家长时间谈论着国内形势、党内状况、当前的国内国际事务。常来这里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岳父阿利卢耶夫。他的女婿十分尊敬他。阿利卢耶夫通常只是插上几句有关"当年"的话(他是建党时期入党的，常以此而自豪)。时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大家都以"你"相称。斯大林也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丝毫下级必须对上级毕恭毕敬的迹象，更没有阿谀奉承的现象。

这些相聚的人们，在不到10年以前还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现在却由于历史形势的支配成了一个刚刚医好战争创伤、平息了内乱和暴动的大国的领导人。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随后常常提交给政治局。例如，有一次吃饭时莫洛托夫引用了一份有趣的材料：俄国有多少粮食用于私人酿酒，国库因此而损失多少钱。几天以后，1923年11月27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作出决定：

责成书记处建立一个反对私人酿酒，反对使用可卡因，反对

酗酒及赌博(包括罗托*)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副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委员——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丹尼洛夫同志、多加多夫同志、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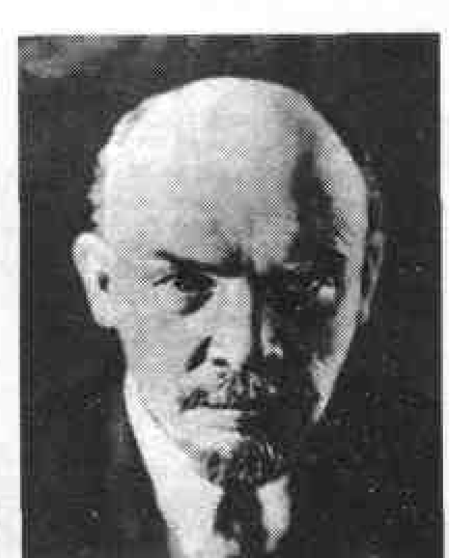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3]

* 一种抽对数字的游戏式赌博。

——译者

也是在这种小范围内讨论列宁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时,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党的领导人的医疗服务。在1924年1月31日的中央全会上,伏罗希洛夫报告了"关于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全会经过讨论后作出决定:

"请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并就必须挑选专门同志负责监督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作出决定。"[4]





纪念列宁的海报

我想,如果列宁在世,就会以另一种更广泛的方式,以关心全体人民健康其中包括领导人健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一切都是从这种"小事"开始的。过去信奉平均主义原则的"党的领导人"的这种上流人物的思维方式,导致产生各种特权现象:各种补贴("红包")、领导人坐的专列、南方别墅、众多的"服务员"。一切都渐渐开始了……

对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经常进行争论。列宁勾勒的向遥远的未来前进的虚线,好像一条抛射线,消失在某处烟雾中。前进的矢量、方向很清楚。但是怎样走,建设新社会的速度、方法、方式应是什么样,这一切都模糊不清。送走客人后,斯大林在黄昏的暮色中久久地徘徊,思考着明天。在他的脑子里,不仅对未来的责

任和担心逐渐成熟,同时虚荣心和功名心也日益加强。也许这个斗争的不确定的时期就是他的"洛迪"?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一定属于智者。通常总有一种因素在某段历史道路上占据上风。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现象,它总是与其他现象同时并存。在这种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斯大林不了解也没读过古代思想家们的著作。苏格拉底好像表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统治者应该成为哲学家。"这个思想不仅仅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是现实的。力量永远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没有智慧(虽然我们长期以来把他的计谋、手腕、诡诈误认为是智慧)。这在他选择实现伟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时起了悲剧性作用。

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群众力量获得了解放。如何引导它去实现目的、理想,达到连列宁都感到很近的顶峰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刊物上充满了老的和新的理论家的文章,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说明应如何继续前进。当时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个正确的口号,事业就会前进。

我要提一件事:1924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训》。他在该文中再次企图贬低其他革命领袖的作用,以便"从理论上"论证他追求领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14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从"年鉴编纂者"的立场转到了有偏见的检查官的立场。他证明说,在革命过程中,"中央委员会在它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正确的,而列宁在他不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写道,在革命中常常会出现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将不会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说,他托洛茨基善于抓住"洪峰"……革命"实现了",因为不

管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是否愿意，领导了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就是前孟什维克对历史的解释。

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国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欧洲各国将要如何连续不断地发生革命……”[5]他在自己的《不断革命》一书中说得更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6]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将会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国发生，红军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完成这一伟大变革。这是明显的“左倾”观点，但是，这当然不是“犯罪”，就像后来所认定的那样。撇开别的不说，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斯大林却总是与此格格不入。

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托洛茨基写道：“不言而喻，俄国不可能单独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纪元，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并因此借助先进国家的帮助达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1917年前的看法。革命后他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在想象中同斯大林辩论时，用这样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导致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我仍旧认为，我们的革命如果具有国际性……那就能够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主义。

接着他解释这些理论分歧的原因：“我们理论上的矛盾的秘密在于，您长期落后于历史进程，而现在企图超越它。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您在经济上的错误的秘密。”

托洛茨基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不断革命”论是不相容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只有靠牺牲农民经济成分的超级工业化才能为国家创造工业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斯大林对经济学的了解十分肤浅，但是他看到了国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持续了近10年的党内争论时期不仅是为确定民主社会的水平和性质而斗争、而且是为寻求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斗争的时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锐的经济眼光，他就会从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看到社

会主义概念的轮廓,这就是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自愿合作化,大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完善社会关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中的民主因素。列宁曾预言:新经济政策把许多这样的问题,如城乡结合、经济杠杆的"解放"、自由贸易、生意人素有的进取心等等结合在一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7]这些话,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

最初几年,斯大林对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特卢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鲁德内等人的经济观点很感兴趣,但是他很难领会经济术语、经济规律、经济趋势的错综复杂的实质。这个从未参加过生产、没有闻过春天耕地的气息、连基本的经济政治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最后赞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种商品不足至今还伴随着我们。诚然,斯大林是想在经济学方面弄懂一点东西的。例如,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奥·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一书。大家知道,列宁曾称赞作者叙述了"泰罗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叙述了**泰罗制的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8]斯大林也许就是因此而读这本书的吧?

然而,根据他的著作、便条、意见,而主要的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可以确信,斯大林的经济信条极为简单:国家应当强大,不,不是一般的强大,而是要非常强大。首先是竭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业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实现这一切的途径、方法、手段是最广泛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我们面临

泰罗制

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创立的一套管理理论——"科学管理",通称"泰罗制",为科学管理理论在美国和国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制定了每日比较科学的工作定额和为完成这些定额所需的标准化工具。

"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1)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效率;(2)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3)要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机器和材料,并使作业环境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4)实行刺激性的计件工资报酬制度;(5)工人和雇主两方面都必须认识到提高效率对双方都有利,都要来一次"精神革命",相互协作,为共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6)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法为科学工作法;(7)实行"职能工长制";(8)在组织机构的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泰罗在管理理论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开拓性工作,为现代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被后人尊为"科学管理之父"。

的任务愈重，困难也愈多。”《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9—10期）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愈来愈重大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会保证我们愈来愈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随着**任务的扩大，困难也将不断增多**。”这一切同后来的“阶级斗争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这一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公式何其相似！20年代中期，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还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无疑已经有了，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难道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悖吗？

斯大林在阅读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大量发言时感到，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所以有大量看法，不仅是由于其作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而且由于现实情况比布尔什维克原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正确地写道：“……从前我们是这样设想我们的事业的，我们先夺取政权，把一切东西几乎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就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至于某些小小的障碍，我们惩办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事情将远非如此。”⑨

的确，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斯大林在浏览文章、阅读报告和情况资料时感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最危险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这个名字，心里就充满厌恶情绪，这种情绪逐渐变为愤恨。几天前有人告诉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对自己的追随者发表讲话时说，“党内某些新的达官显贵”不能原谅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历史作用。当然，托洛茨基说的“达官显贵”指的就是斯大林。总书记还听到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针对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语。

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渐加强的影响不合这两位“二重唱者”的心意。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尤为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斯大林在给县委书记训练班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加米涅夫关于存在着“党专政”的意见。最后，斯大林在学员们的欢呼声中说，要知道，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公正地说：当时连布哈林也赞同“党专政”的思想。他曾在1924年中央一月全会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到两种危险：第一是来自我们机关的集中制的危险；第二是政治

民主化的危险，如果民主走到极端，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而反对派只看到一种危险——官僚主义。他们看不到官僚主义危险背后的政治民主化的危险。但这是孟什维主义。要想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持党专政。"拉狄克补充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专政党。"[10]

但是斯大林批评的只是加米涅夫。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同许多人"作战"。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按顺序进行，即所谓各有其时。当时政治上的两驾马车立即作出了反应。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批评，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指责，说他的批评是"非同志式的"，没有准确反映出"被批评者立场的实质"。斯大林立即提出辞职，这是他当上总书记后的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辞职。这次辞职也被劝阻了……是加米涅夫自己在季诺维也夫支持下劝阻的。斯大林从这件事中感到自己的对手已更加没有信心，他们依旧害怕托洛茨基。总书记再次确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维"反复无常"。单是季诺维也夫那本《列宁主义》就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季诺维也夫是再次企图为自己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为自己同列宁的分歧披上伪装和进行辩护。斯大林是不忘旧怨的人，他以后必定会利用这些事实的。后来，当他对托洛茨基实行惊人的打击时，接下去就该轮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了，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而这些事实应当暂时留着，记录在案，保存起来。下面就是记录在文件中的这些事实：

应当保护我们对临时政府和战争的立场，使之"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规定立即将这一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四月)提纲只字未提和平。因为列宁的建议——"向广大群众说明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11]

斯大林那时就已下定决心：一俟解决了托洛茨基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收拾这些"无原则的空谈家"。季诺维也夫的武断有时甚至使斯大林这个把自己的粗暴变为优点的人也感到厌恶。在1924年1月14日中央全会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争论专页》发言时，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参加争论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作了随意的评价，俨如一个

骑兵连长评价自己的部下一样。季诺维也夫自信地说:“皮达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几小时前,在谈到皮达可夫对经济问题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时,季诺维也夫还断然声明:“这不是一个修正案,而是一个纲领,它与好纲领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糟糕的纲领。仅此而已。”谈到萨普龙诺夫,季诺维也夫称他是“富有乡土气的人。他两脚站在地上,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宁主义”。奥新斯基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更多知识分子倾向的代表”。季诺维也夫甚至也没有忘记踢上托洛茨基一脚(这显然使斯大林高兴,虽然这之间没有什么有形的联系):“当年,当我们来到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得到一份《前进报》,上面载有一篇匿名文章,说列宁及其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刑事犯、抢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12]

斯大林一边听一边想: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领袖”了。好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饶舌的家伙!当然,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是两年之后,他在争论中彻底摧毁了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例如,1926年5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诺维也夫一个例行声明时,给参加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罗米那兹和季诺维也夫本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写道,他“无意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整整八条诽谤言论和一个可笑的声明”。对这些诽谤: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等等,总书记逐条作了斩钉截铁的评价,而对季诺维也夫本

皮达可夫

苏联著名党务、国务活动家

尤里·皮达可夫是最有天赋、最受人尊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二十七岁,却已有十二年的革命历史。

乌克兰革命成功之后,皮达可夫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十三军和第六军,后来又成为第十六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波兰前线作战。然而,皮达可夫的真正才干,是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来的。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了国家面临的最尖锐问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列宁把迅速扩大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重任交给了他。

列宁对皮达可夫评价极高,在著名的列宁“遗嘱”里,在最优秀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中,只提了六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皮达可夫。列宁在这份文献中对皮达可夫和布哈林作了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间)”。而且,列宁专门针对皮达可夫补充道:“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

人，则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

> 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自己17年的著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声明说，不该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教导他必须反对极左倾向。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自己是伟大人物，这当然无需证明。但是，如果要求党也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伟大人物，那就值得怀疑了。
>
> 在从1898年至1917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踪遍及俄国各个地区，但是无论是在地下活动中，还是在监狱或流放地，我们都没遇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
>
> 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党内有大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入党早得多、曾为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员。同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在20年的地下活动时期付出的劳动相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谓著作家生涯算得了什么呢？[14]

2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们已经明白，这个“杰出的庸才”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严厉、狡猾、诡诈、坚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对者都将明白这一点，而几年之后，与他共事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全都明白。

读者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作者对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斗争描述得太多了。很遗憾，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历史选择的主要问题往往被“领袖们”的野心排挤到次要地位。

列宁逝世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的斗争，由于个人竞争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化。卷入这场斗争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当然，斗争的背后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对农民的态度、工业化的途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是次要的，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但是，一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野心、个人竞争、好斗的不妥协性，使这一斗争带上了悲剧性质。结果，凡是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被看作是“敌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背叛的”等等。

斯大林一贯“捍卫”列宁，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那些反对

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捍卫”列宁,——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方针。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没有背离”列宁的观点,至少在20年代没有背离。情况并非如此。仅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上的错误方针,在党和国家内推行官僚主义管理作风等等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如果不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就会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情况当然远非如此,而在许多场合绝非如此。

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

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

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

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1924年11月19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

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

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19]

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

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15]

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1925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在其同伙的支持下声明说,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问题上已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因为同一个论点,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必须对"新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政策的行为给予回击,就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进一步行动制定出对全党的指示。在这方面,1925年4月底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会上既没有作报告,也没有在辩论时发言。会议的中心问题有:关于合作社(报告人李可夫)、关于冶金工业(捷尔任斯基)、关于农业税(瞿鲁巴)、关于党的建设(莫洛托夫)、关于革命法制(索尔茨)、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惯例(或是由于习惯?)主持了会议,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一样。但这是最后一次。此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再没有担任过这种会议的主席……看来,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东西,就是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条件下社会主义在苏联也可能取得胜利的论点。然而,代表会议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保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1925 年 4 月，暂时还是战友、参加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部分成员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拉舍维奇、伏龙芝、斯米尔诺夫、李可夫、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斯克雷普尼克、布勃诺夫、奥尔忠尼启则

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⑩]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10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

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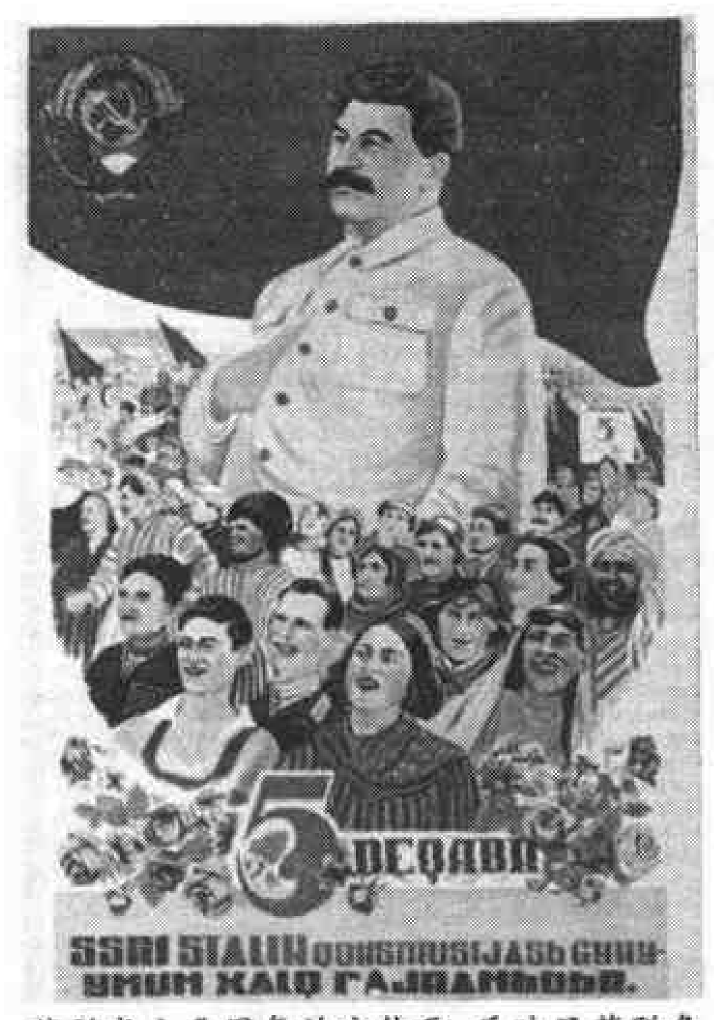
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1927年3月1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

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

> 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的呢?
>
> 英国用了整整200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走这条道路。
>
> 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50亿法郎。但这种掠夺战败国的道路对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的事业是和平政策。
>
> 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俄国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这就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条约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
>
> 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17]

第二天,《工人莫斯科报》作了报道:"掌声像炒爆豆一般。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手握烟斗、脚穿磨歪了后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万岁!联共(布)中央万岁!'人们给斯大林递上一些字条,他不时捻捻黑色的胡须,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字条。大厅里静下来了,斯大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修配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始了他同工人的谈话……"顺便指出,这是十分罕见的。斯大林更喜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演说。后来,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测的领袖总是引起许多传闻。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的。1925年农业方面已经达到而且许多指标已超过战前水平。例如,农产品总量超过战前水平的112%。这个成就是十


苏联成立5周年的宣传画，反映了苏联各族人民都拥护斯大林的领导

分显著的。作为城乡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结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3/4。出现了第一批新建筑物，这首先是发电站。而外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预言，至少需要15至20年才能达到战前水平！扫盲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学校网扩大，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家文教工作的重要决定。俄罗斯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院。那时就已经出版了像弗·伊·维尔纳茨基、尼·伊·瓦维洛夫、瓦·罗·威廉斯、尼·德·泽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阿·费·约费、阿·叶·费斯曼以及其他许多苏联科学先驱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红军顺利地转入和平状态，同时实行军事改革。特别是在1925年1月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之后，这一工作进展尤为迅速。

看来，值得提一下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着棋。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于此举可以有各种看法。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决定把他推上荣誉的负责位置，以便他们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也可能，这两驾政治马车想通过这一步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彻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击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说托洛茨基充当了“双雕”之一，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同意



汹涌的第聂伯河是欧洲第四长河。它发源于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市附近，向南流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后注入黑海，全长2200千米。第聂伯河对工业、货物运输和能源生产来说都是一条重要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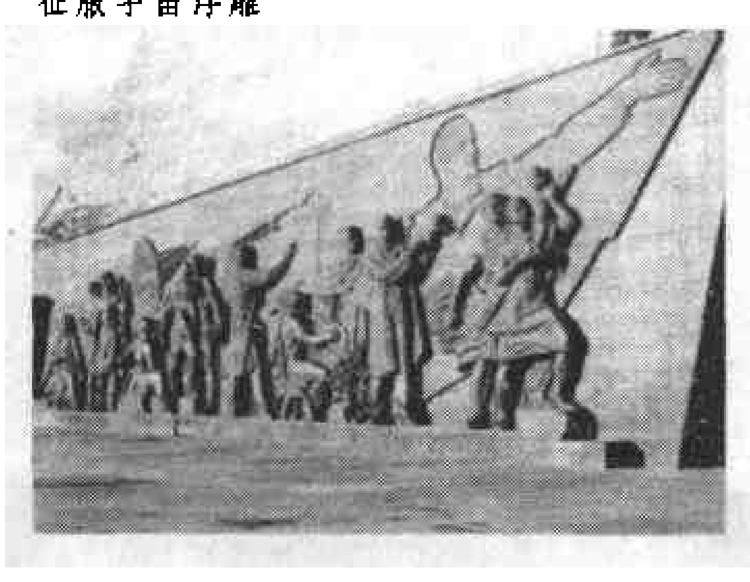
充当这一角色的。总书记当众流露出对加米涅夫这个建议的惊奇和不满情绪，这一点许多中央委员在会上都觉察出来了。加米涅夫的“倡议”遭到了多数的否决。

问题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他称病不参加会议。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这位政治家走了几着极其失策的棋，从而减轻了斯大林“各个击破敌人”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对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全会实质上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计谋”方面，总书记做到了他的反对者没能做到的事：一箭双雕，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对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有影响的三驾马车实质上分裂了——总书记用不着它了。

全国都在为迎接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次大会将成为选择国民经济工业化途径的关键时刻。但到1925年12月，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的时候，还很难相信报上写的东西将会实现。第聂伯河水平静地流着，暂时还没有被大坝截住；在土西铁路*延伸的地方，沙暴卷着铺天盖地的黄沙横行肆虐；在未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址上还是一片空地；谁也没想到，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高炉就在古老的山脚下拔地而起；谁能想到，火箭的发明者加快了宇宙飞行纪元的来临——30年代初，苏联的第一枚“ГИРД-Х”号火箭发射成功……

* 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

征服宇宙浮雕



的确，形势在逐渐好转。新经济政策给布尔什维克提

供了历史性的成功机会。实质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初级模型,它有助于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进取的动力。新经济政策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工业接近战前水平。具有远见的人们把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不单看作是全国电气化的途径,而且看作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

工业托拉斯开始按照商业原则经营,自行定价,出现了倾斜。例如,为买一块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农民要比1913年多卖2—3倍的粮食。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警报信号。发展租让企业的希望落空了:预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对外贸易额还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有150万。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目不识丁。没有钱买机床和机器。几乎没有新的大型建筑。但是,留心报纸的人们感到:国家正处于巨变前夕。看来,年轻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在这个复杂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么加速?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很多

新经济政策

苏联在1921年开始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1921年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破坏严重。同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重新建立了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巩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使1921年的危机迅速得到克服,国民经济到1925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并顺利向前发展。新经济政策在保证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成分,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一定发展。它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新经济政策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斯大林

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看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


1926年时斯大林和基洛夫在列宁格勒

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了这个职位。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进人政治局,这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批判。结论着重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方针。同时,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经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条、号召,他这样做时丝毫没有一点难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当时为数不多——不能不觉察到斯大林在进行批判分析时表现出的毫无礼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语调评论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称她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后他再次提到克鲁普斯卡娅,以煽动和侮辱的语调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声中以蛊惑性的口吻结束了他这段长篇大论。他称拉舍维奇是“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欢在谈话时没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头脑不清”,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等等[18]。看来,斯大林那时就已开始滑向这样的立场,非形式上的民主对于他也将是“空洞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可饶恕的

粗暴态度,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于列宁在世时克鲁普斯卡娅与那些难忘的信件、电话、谈话有关而对她的暗中报复。斯大林从来是什么都不饶恕的。

看来,斯大林感到他在结论中作的许多评价"过头了"、"过重了",就要弄手段,这种方法他后来还用过多次。他在解释自己对季诺维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时代哲学》的粗暴批评时说,他的粗暴只是对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而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直率。总书记逐渐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点变成了全党的美德,几乎成了革命品质。但是很遗憾,这时,在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大会代表、中央委员能够冷静、正确地评价斯大林的个性和他这种严厉斥责似的批评倾向,而到后来,这种批评将意味着判决。就像江河起源于涓涓细流一样,人的某种思想品质也是从个别行为和周围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开始形成的。

斯大林对许多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彻底批判,当然也没有放过托洛茨基。总书记感到大多数代表的情绪对他有利,就批驳了加米涅夫关于把书记处变为单纯的技术机关的建议,同时指出,他反对把个别领导成员"割除"出中央委员会。他自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认为正是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如果同志们坚持的话,他"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斯大林像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使人觉得他没有个人私心,只关心全党的利益。总书记在嘲笑、批判派别分子时,会巧妙地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加上"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一类词语。虽然斯大林已经决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该一刀两断了",但他仍然显示自己爱好和平:"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19]

应当指出,斯大林在结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实现的话,就会防止我党历史上出现最困难的时期。斯大林在代表们的掌声和明显的赞同声中说道:"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

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

"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3]

这些话无疑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些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配以实际措施和民主准则,就会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全部问题在于,正确的论点没有用关于领导轮换制、总书记和党的其他高级领袖的任期、领导人的报告制等等的章程条例固定下来。而列宁关于完善党的机关、巩固党内和社会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确立这些原则。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大会气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批评就愈来愈少了。以后,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进行批评,而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现象,必然导致停滞、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

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1907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语:"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

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3000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在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

"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

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是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

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30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70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800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

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А·И·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1939年12月22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9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

命运真是捉弄人！1949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20年代……

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都是新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20]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

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1918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3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1924年4月和5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1906-1907年,斯大林在他所写的总题为《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一组文章中,初次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辩证方法就是要把社会生活理解为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的过程,辩证法就是生活中永恒存在的破坏和创造、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的辩证法。在文章中,斯大林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要促进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的观点,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这一组文章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在20世纪初期布尔什维克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但这些文章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候写的,因而包含有一些不妥当观点。

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

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1945年第11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呢?”,“这些事实季诺维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说……”当然,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这些著作是在这些人像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还活着的时候写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斯大林却依然继续同被他下令处死和消灭的论敌争辩。斯大林所提出的论据,现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战,这些论据不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污辱性。尽管书里面不断用黑体字印出“掌声转为欢呼声”、“掌声雷动”、“全体起立,向亲爱的领袖致敬”、“震耳欲聋的乌拉

声！"——这就是有过的事，——现在却让人感觉到这本书本身就是从一场噩梦中来的。把自己的论敌消灭掉并且继续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浅的通俗读物中见到的正确的论断，也不能不令人觉得是对死者进行的污辱。

在斯大林准备用于讲课和以后用于发表的讲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偏见的俘虏，这种思想偏见是他后来加紧培育起来的。比如说，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生命的末期写出他在1924年所写的论列宁的领导作风那样的东西。在20年代中期，他能够正确地断言，列宁主义的作风就在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他写道："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22]我想，如有谁在较晚一些时期公开说出斯大林如下这样一些话，像"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23]，那么他就不得不对此痛苦地感到惋惜。在20年代，斯大林的思想虽然不够奔放和缺少光彩，但总还没有完全被好斗的教条主义紧紧地箍住。

在这里，正好可以谈一谈斯大林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个问题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说。这种结构是在宗教教条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有选择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断言，特别可以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断言，斯大林到底也没有弄清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客观和主观的相互联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他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铁定的必然性所确定了的，这种论断就显然像是宿命论了，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紧跟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就像白天紧跟着黑夜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航船上的罗盘，航船一定会驶到彼岸，但有了罗盘行驶得会更快。斯大林嘲笑那些听从"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颂同暴力搅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义。他自然会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24]他的论据，永远让人听起来要么像是肯定的断言，要么像是判决。

《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些人一连串的胜利和另一

些人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者是间谍、两面派、敌人和罪犯。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应当像他所阐发的理论那样。这恰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过的那种情况:这种态度会把思想导至“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幸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命运最终没有被斯大林所支配。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是肯定的;右倾的被粉碎,这是无疑的;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是自然的,等等。创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这些在这一章里是根本没有地盘的。

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虏。请大家自己作出判断:辩证法的3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4个阶段,唯物主义的3个基本特征,红军的3个特点,机会主义的3个基本来源,等等。不错,为了教学目的这也许是不坏的。然而,对整个理论进行“清点”,然后把它归结为几个特征和特点、几个阶段和时期,这就会使社会科学变得贫乏,使世界观变为教条主义的世界观。

从某个时期以来,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宗教仪式的因素。在他的思维中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色彩、转变过程、保留条件、新颖的思想和出奇的东西。“领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种解释: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纲领。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敌对的。庸俗化、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断性,使斯大林的观点带有一种原始的正统的性质。完全有理由断定,斯大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英明性”是没有怀疑过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一个证明是,他喜欢引用自己的话。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来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特点,那就是务实性。总书记企图把每一个理论原则(常常是极其机械地)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要求和需求联系起来。我要立即声明,并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这种具体实践的目的性。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辩证的。机械论,即行动的机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论,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

斯达汉诺夫运动

30年代在苏联出现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因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首先发起而得名。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顿巴斯伊尔明诺中心矿井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3倍多，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采煤的新纪录。斯达汉诺夫的范例，为其他部门工人所仿效，涌现出成批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形成群众性的劳动竞赛运动。联共(布)中央热烈支持并加强对运动的领导。1935年11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讲话中，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和特点。认为这一运动打破了旧的比较低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使劳动生产率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就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运动从城市发展到乡村，出现了许多农业生产的先进人物。随着运动的展开，为奖励先进工作者而逐步建立起奖金制度和额外优待制度。同时为更加合理地组织生产、制定先进的生产定额、规定劳动报酬和加强劳动纪律，建立了劳动法规。斯达汉诺夫运动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23]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

20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21卷书。1924年12月4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22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但是，他在20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

这一点。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例如，1926年10月11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26]

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27]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语言进行批评的。斯大林在反对论敌时使用的一些严肃的论据，常常要衬托上一些粗鲁的形容语。总书记总是信心十足地断定说：这里是真理，那里是谬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否则就会出现像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情况：

我们在错误面前关上了大门。
真理慌乱不安地说：我将如何进去？

随着自己威信的确立和总书记职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话作为论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但越到后来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觉到这点。例如，在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课时对列宁主义下了定义之后，斯大林便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一定义吹捧为完美无缺和包罗万象的。接着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东西，并且总是附加上这样一类的评语："这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完全来源于列宁主义"，等等。有时真是令人震惊，总书记竟然把自己的结论抬得那么高，评价得那么高。后来这竟成了一种惯例：让读者们去参阅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时，斯大林不仅闭口不谈这一思想完全属于列宁，而且还硬说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这一思想。总书记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论据来麻烦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您拿来《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第3期看看我写的一篇文章。这会便于您的工作的。"至于对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之外，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彻底打败（这里和下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我国资本家"，"反对派却说，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我们……夺取政权是多余的"。[28]这里强调的是在1926年"彻底击溃"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非常明显的。看来在当时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击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错误的论点：越是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打击"和"彻底击溃"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几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尽管斯大林理论概括的水平极为平常和一般，他却十分喜欢下定义。可以举出以下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关于列宁主义的实质、关于民族的实质、关于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倾向的实质等等定义。这些定义可能在普及列宁主义基础方面起过某种作用。但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愿意进行教条式思维的人，他简直把定义奉为了教规，他可以用整篇讲话来证明某个反对派对某个问题的不理解。

不过，看来斯大林理论"创作"中最消极的东西要算是他实际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逐渐地"论证了"——如果可以这样说

的话——“牺牲的社会主义”。总书记的这种世界观慢慢地使得他无所顾忌地实行了罕见的大规模的镇压，把暴力手段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社会方法来广泛使用。事实上，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这些观点具体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总书记逐渐脱离了列宁主义。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斯大林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这是党的领导人！在许多种社会主义，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中，斯大林创造了某种自己的东西，即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包含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包含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总之，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千百万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活的机体组织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使一切变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还不能把一个只有高度社会化程度、集体的东西高于个人的东西、一切完全由“上面”来计划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所预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人，是社会公平。这种立场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不会与权力脱离人民结合在一起，不会与半神化的领袖结合在一起。这证明，在某个阶段上，斯大林越来越脱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了公平起见，不能不指出，总书记的文章、演说、答辩、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他的助手们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总书记机关中的其他负责人所提供的证明，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负担大量的工作，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据他的专门要求每天给他挑选书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党刊的综合材料、国外报刊的综述以及最有意思的来信。

有一次他长时间地在看一封柏林的来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尔特马尔大街，11号，“维拉·尼娜”，Б·П·克雷莫夫收。这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失势者”，作家，1917年逃离俄国，但他在留心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新的俄国。斯大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上面划线。信中写道：“我现在给您写信，我把您看作现今俄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我爱俄国毕竟甚于爱任何其他国家。我在这里也许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尽管您在国内也很了解情况。”（这里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线。——

本书作者注）

“……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中，不要顾惜一切。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有军队。军队不应当打仗，但它应当存在。大家都应当了解，关于军队的有些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各种军事检阅越多越好……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增加俄国的人口和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教育。这是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今天已经清楚，现今的俄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规律；摆针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摆动，它可以永远停留在左边……不需要谎言，但需要两种真理，暂时避而不谈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们相信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时，小真理就可以让位于大真理了……不要排挤宗教，那样做倒会使它加强。要吸引私人资本。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要支持现今表现出来的俄国人的创造性，而不要吝惜资金。比如说支持文学或者芭蕾舞。应当投给其余世界一个现代俄国鲜明透亮的结晶体，这有时会比最广泛的宣传更起作用……革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9]

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斯大林把信放人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

在1924—1928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

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

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⑩]，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



雷马克(1898–1970)

德国小说家

小说《西线无战事》(1929)是雷马克的重要作品之一。继此之后，他的作品主要反映法西斯专制统治下被毁掉的德国青年一代人的遭遇，描写他们所遭到的苦难和痛苦的精神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以流亡者作为主人公。他的艺术风格与美国的海明威有相似之处，描写事物的手法具有客观、冷静和简洁的特色。

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

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到20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

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巨大社会灾难的根源。有时候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独出心裁的思想，好像涂上了"颜色"，涂上了橙黄色、紫色、紫红色、翠绿色和蔚蓝色……这就如同光线穿过雾霭、黑暗和黄昏，画出了期望中的真理的轮廓。看来，思想的世界不仅具有多种音弦，而且具有多种色彩，但必须善于发现这些色彩。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表现得色调愈加昏暗。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1924年1月14日至15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和其他发言者对在德国遭到的失败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许多人认为，在德国，革命的形势没有被利用。斯大林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正在德国的拉狄克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反对因为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对他采取惩罚措施。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七点。"斯大林最喜欢干的就是把别人的错误串成长串。我不打算把这些错误都重述一遍，我只举出被斯大林编了号的(像在清点册里那样)"第四点"。总书记继续说，拉狄克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并认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⑩]这不仅仅是天真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斯大林这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评价中的政治上的短见，使共产党人和全体民主力量

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极尖锐的问题所作的这种“肤浅的”,更确切地说,错误的阐述,说明他明显地不善于分析多方面的联系。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理论上的“不明智”。在1924年俄共(布)中央10月全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报告人是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作了长篇发言,其实,他对农村问题,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样,不很了解情况。不过他也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形势,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农村工作问题,而且是整个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更加一般的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在一些年内不会从日程中拿掉,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同当前情况下如何实行专政的问题联在一起。”[2]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试图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论方面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蕴育着未来所犯的一些巨大错误的萌芽。我们应当做的第一点,是“必须重新争取农民”;第二点是要看到“斗争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第三点是“在农村培养干部”[3]。当时是1924年,而斯大林的讲话,听起来好像是在1929年……在犯严重错误方面,他具有多么令人吃惊的“远见”和一贯性。作为列宁主义“诠释者”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我还要涉及斯大林以后年代的理论观点。不过现在,为在群众中选择和普及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不仅是科学观点,而且文学艺术也具有对人们产生社会影响的力量。

知识界的动荡

弗拉·索洛维约夫的信徒、哲学家叶·特鲁别茨科伊在《两只野兽》这篇文章中发挥了一个思想,即对俄国造成威胁的是两个极端——“反动派的黑色野兽和革命的红色野兽”。对许多文化人士来说,这两只野兽都是真正存在的。艺术和思想上的摇摆幅度极大:从公开坦率地不愿意接受革命思想(季·吉皮乌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伊·布宁)到兴高采烈地颂扬革命思想(杰·别德内依、亚·扎罗夫、约·乌特金、米·斯韦特洛夫)。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迅速确定了自己的思想立场。

路标转换派

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政治思想流派。它反映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在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思想变动。1921年7月一个俄国侨民团体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同年文集作者还同一些俄国侨民在巴黎出版了《路标转换》杂志，这就是"路标转换派"名称的由来。

1921年，苏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实行新经济政策。一些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向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转变。他们指望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苏俄国民经济将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因此也表示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创作宣传路标转换思想是为了影响和逐步控制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企图使苏维埃国家蜕化变质。路标转换派的代表人物有国际法学家、立宪民主党人克留奇尼科夫，政府家、法学家乌斯特里亚洛夫，律师、法制党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等。列宁指出：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上万的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

吉卜林有几句很好的诗，其实质思想是这样的：仍在继续的黑夜的力量被摧毁了，但是黎明决不会提前一小时来威胁它……旧势力被摧毁了，但是期望所有的艺术家都一下子开始欢迎到来的黎明，那是违反常情的。无论在伟大文学的主干大道上，还是在它的偏僻处所，都在发生隐隐的、有时是激烈的动荡。使文艺界知识分子感到苦恼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在"新的殿堂"中的地位问题、创作自由问题、如何对待过去的精神财富问题。有些作家郑重其事地认为，俄国文学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它的过去。革命风暴使许多语言大师震惊了，他们认为这场风暴不仅威胁着他们本人，而且威胁着整个文化。关于知识分子对待革命和社会主义，对待在我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极端痛苦条件下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态度，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不是一切没有接受革命的人都是革命的敌人。不是的。许多知识分子也许会满意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因为那里有议会和其他自由主义多头政治的标志。俄国知识分子的惊慌失措和思想动荡继续了好几年，然后开始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向：全盘接受十月革命的思想和全盘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想，长期的动摇和逐渐的转变。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1921年7月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路标转换》。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基本上是立宪民主党组织内的人，白党阵营内的积极活动家。他们表示认输。克留奇尼科夫、波捷欣、博布里谢夫-普希金、乌斯特里亚洛夫声明，由于"历史的无情嘲弄"，布尔什维克"成了俄国民族事业

的维护者"。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在20年代的一些言论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乌斯特里亚洛夫和作为敌人阵营瓦解象征的"路标转换派"本身。《路标转换》的作者们毫不掩饰地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乌托邦，但他们明白，"历史将要惩罚而且已经在惩罚"他们这些俄国逃亡者。在斯拉夫主义腔调粉饰下的思念家乡的主题，标志着一种更加重要的东西：一部分知识分子转而支持社会主义的俄国。这种对祖国的朦胧的向往，削弱了阶级的本能，容忍了（虽然是痛苦地）俄国的新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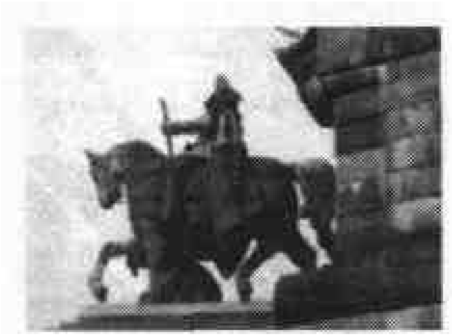
科布伦茨——处在四座缓和的中等山脉之间，位于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交界处

但是多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工作者》杂志在1922年的一篇题为《逃亡的俄国》的文章中说："伟大的十月革命有自己的'科布伦茨'*……俄国逃亡者的'爱国'功绩、生活和思维方式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甚至没有深秋时期的那种凄凉美的情调，而在法国大革命时的科布伦茨，这种美的痕迹即可以在行将死亡的封建社会的代表们身上看到。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是腐化、龌龊、荒凉、倾轧、大大小小的阴谋诡计和赫然称之为'搞政治'的阿谀奉承……"[9]

*科布伦茨是德国城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封建保皇派流亡于此，建立了军队，参加奥、普对法国的干涉。1794年法国共和国军占领科布伦茨，逃亡者销声匿迹。

——译者

最不接受十月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吉皮乌斯。她在她的《灰色的书》和《黑色记事本》中表示完全否定革命思想，她认为革命思想埋葬了俄国文化，她写道：



位于科布伦茨德国之角的威廉一世像

一切都无用，心灵已朦胧；
我们效忠于蛆虫和蚜虫；
就连俄国真理的灰烬
大地上也寻不见踪影。

吉皮乌斯把革命比作“投掷冰冷石块的、双眼无神的红发少女”。她在说明自己和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政治立场时骄傲地说：“也许只有我们在保持流亡者装束的洁白。”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国是“反基督的王国”。

甚至对这种慌乱情绪很能容忍并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动荡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也对吉皮乌斯的“呻吟”给予了狠狠的驳斥。托洛茨基写道：只要“红军战士用钉了鞋掌的靴子踏在她的纤小的脚尖上”，她的主要是宣扬神秘主义的色情的基督教的艺术一下子就会变样，“她会马上惨叫，在这种惨叫中人们可以听出一个迷恋神圣私有制思想的女巫的声音”。[6]

斯大林美学兴趣的光谱大大逊色于托洛茨基的博学，因此颓废派文学和圣像破坏运动*的传统和倾向很少激荡过他的心。斯大林对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别雷、洛斯基、奥索尔金、什梅廖夫以及其他许多在祖国的文化历史上留有这样那样遗迹的知识分子的创作，未必有什么真正的了解。他的思想是经验主义的，缺少丰富的感情，他完全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看待整个文化殿堂的。他的用语是：“有助于”、“无助于”、“妨碍”、“有害于”。即使他有艺术标准，那也是没有决定意义的。斯大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信条，最充分地表现在20年以后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令人悲痛的著名决议上。对他来说，文学和艺术永远封闭在“自由的”和“异己的”这种最简单的两极的模式之中。

*8—9世纪拜占庭的一种社会运动，在反对崇拜圣像的口号下进行，目的在于反对僧侣和寺院掌握地产，反映了当时贵族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

——译者

公正地说，虽然流亡国外的浪潮很大，可能有200万—250万人以上，但基本上是富有阶层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文艺界知识分子（马

尔克·阿尔丹诺夫、康·巴尔蒙特、彼·博博雷金、伊·布宁、达·布尔柳克、季·吉皮乌斯、亚·库普林、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伊·谢韦里亚宁、阿·托尔斯泰、萨沙·乔尔内、维·伊万诺夫、Г·伊万诺夫、В·霍达谢维奇、伊·什梅廖夫、玛·茨韦塔耶娃、弗·纳博科夫–西林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对苏俄并不是全都怀有敌对情绪。他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不少人死在了上海的贫民窟和巴黎的小客店，或者是返回了故乡。有一些人，恢复文学创作和其他创作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另一些人由于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永远沉默了；还有些人则掉进了非法行为的磨盘。

留在俄国的文艺界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很快地出现了一些艺术联合会和创作团体，如：农民作家协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山隘"派文学小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革命俄国美术家协会、"锻冶场"文学团体、左翼艺术阵线（列夫）以及其他一些创作联合会。在寒冷的俱乐部和文化宫内，就无产阶级文化、文学和政治，就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珍品可能性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文学界的动荡——有时也是知识界的动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争议的观点，——有时是错误的观点。出现了形成和确立艺术思想中创作多元化的罕见机会。当时还没有流行命令的方法，那样的方法等于使文学艺术的创作衰退。

斯大林起初很少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他没有发现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流派和倾向有什么危险，而且多数艺术家谈论的（用自己的方式）都是革命、新世界、新人和"诱人的远景"。甚至先锋派的，往往是对"急进的"创

季娜依达·吉皮乌斯
(1869–1945)
——俄罗斯诗人

白银时代诗坛又一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在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

在主题上，吉皮乌斯的诗歌大体与"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相同，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神性和兽性的交织与纠缠，等等。

由于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们的腐败，吉皮乌斯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渴望出现革命，希冀从革命和变动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属于宗教层次上的革命。但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以至于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著名作家）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开始，便一直侨居于巴黎，在自己的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为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方法”的宗派主义的迷恋，看来也不过是一些天真的、好笑的东西而已。在中央，还没有日丹诺夫式的思想和政治教条，那都是后来的事。这种创作上的多元化就像艺术自身一样是很自然的，它在短时间内就在电影、文学、绘画方面提供了一些永远收入我国精神文化宝库的作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20年代)的特点是思想解放，进行创作探索，大胆革新。艺术家们——语言、舞台、电影大师们关于创作自由谈论得很多。作家们有一种由革命产生的愿望：探索伟大的、永久的、非暂时性的事物的奥秘。关于天才谈论得很多，议论常常“超过了”限度。可是，创作的金字塔的最高顶点永远是天才，为什么语言大师不向往它呢？俄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说，“对神圣的崇拜应当让位于对天才的崇拜”，他这样说或许是对的吧？

革命使许多人的创作成熟得很快了，很显然，各种艺术流派经常进行讨论、争论和竞赛的情况是正常的，效果很好的。遗憾的是，过了几年以后，这种探索气氛，在作为精神外衣的官僚式的文体和单一思想的采石场上逐渐消失了，产生了许多像“蘑菇一样短命的”书，大部分这样的书现在没有人再记得了。在1926年的两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Л·约诺夫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和“岗位的混乱”的文章，文章批判地分析了“岗位派”中坚分子瓦尔丁和阿韦尔巴赫的观点。他们两人的观点发表在《岗位》杂志上，所以被称为“岗位派”。《布尔什维克》杂志论证了不可能存在不受社会风暴、经济动荡和阶级搏斗影响的“纯艺术”。过了一段时间，《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莱奥波德·阿韦尔巴赫对约诺夫的答复，说文化革命将会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同时发生：“看谁比谁干得好——是群众能够击溃旧文化并取得他们需要的东西，还是整个旧文化的大厦比无产阶级文化至上主义更强大。[9]

不久就宣布了关于必须用行政办法管理文化事业的提纲。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这家《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题目是《领导干部和文化革命》。社论提出，“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干部”问题是政治问题[10]。可是刚刚培养出来了“文化领导干部”，教会就开始垮台，各个独立的创作联合组织就开始消失，各种独特的个性就开始泯没。例如，整个一批“农民诗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的光辉的代表

是谢·叶赛宁。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很遗憾，布哈林也参与了对他们的侮辱，显然他那时还没有摆脱早期的激进观点。……创作的自由越来越被纳入了计划，就是说越来越小了。而脱离了自由和人的精神实质的艺术也就变成文化的代用品。

当然，用命令的方式来代替思想领导方法，是令人担心的事。政治在许多方面，过去和将来都可以发出命令；但是有些领域，政治只能协同动作；还有一些领域，"政治解剖刀"是禁用的，否则在使用过程中它会达到同预期相反的结果。



叶赛宁(1895—1925)
俄罗斯诗人

他的抒情诗感情真挚，格调清新，并擅长描绘农村大自然景色。叶赛宁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未能从根本上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期望于革命是建立乌托邦式的"农民的天堂"。他歌颂革命，却没有投身于革命的决心；他憧憬崇高的精神境界，但在个人生活中又常常受感情的盲目驱使而不能自拔。最后在精神忧郁、感情极度矛盾下自杀。

斯大林注意地观察着文学界动荡的过程。他感到，开始使社会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化革命，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整个文化珍品，特别是对文学更大的兴趣。在2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各民族共和国发生的变化尤其令人吃惊。到1925年，识字的劳动者人数同1922年相比，在格鲁吉亚增加了14倍，在哈萨克斯坦增加了4倍，在吉尔吉斯增加了3倍。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文化和识字的真正园地是城市中的工人俱乐部和农村中的阅览室。同1913年相比，定期出版物和印数增加了两倍，开始大批建立图书馆。敖德萨、埃里温、塔什干和巴库都建立了电影制片厂。更多地出版了文学书籍。

政治局不止一次地研究过创造良好条件使群众接近文艺并加强对文艺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1925年6月政治局同意了《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必须爱护接受革命的老的文化大师们，并且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强调指出了继续同路标转换派性质的倾向进行斗争的重要性。文件还指出："党应当大力根除对文学事业进行盲目

的、非内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3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党中央还在遵循列宁的这样一个遗训：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和突击，机敏和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39]。列宁的关于新文化不可能建立在不毛之地的话还没有被遗忘。遗憾的是，在30年代列宁的这些思想都被遗忘了。



富尔曼诺夫(1891-1926)
苏联俄罗斯作家

191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中、长篇小说，诗歌，特写，政论和文艺评论等，反映革命前的生活或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篇小说《红色陆战队》、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均取材于国内战争，突出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描写红军的英雄主义和新人的成长过程。

《恰巴耶夫》是他的代表作，写国内战争时期人民英雄恰巴耶夫的英勇事迹以及恰巴耶夫师成为一支有觉悟的革命军队的过程，通过对政委克雷奇科夫的描写，成功地刻画了党的领导者的形象，是早期苏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之一。

斯大林的助手们按时向总书记"报告"无产阶级作家们写了哪些新书和文章。当然他不可能全部阅读，但在他的存书(后来这些书分散存放了，这里只存有他作过标记的书)中收藏有当年简装本的各种文集和书籍，上面都有他用红蓝铅笔和普通铅笔作过的标记。顺便提一下，大部分批语和标记都是用红色铅笔写的。他的许多战友都自觉不自觉地模仿他，特别是伏罗希洛夫。根据书上的标记和他亲自写的意见判断，可以认为，斯大林读过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和《叛乱》、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伊万诺夫的中篇小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总书记特别喜欢的高尔基的书、诗人别泽缅斯基、别德内依、叶赛宁和其他著名语言大师的诗。斯大林注意到普拉托诺夫和他的中篇小说《如意》。但总的来看，对这位潜人人的灵魂深处的有才华的作家，他是不理解的。这位作家的"不眠的恶魔式的"追求引起了总书记的愤怒，有一次他还特别把这件事告诉了法捷耶夫。斯大林对西欧古典文学了解得很差，他对整个西方、对西方的"腐蚀人"的民主抱有怀疑态度。

斯大林喜欢戏剧和电影。但他是按自己的方式"喜欢"，就像地主喜欢自己的农奴剧团*

*俄国贵族的私人剧团，演员由农奴组成。
——译者

那样。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经常到大剧院*去看戏，晚上经常在克里姆林宫或别墅看新影片。由于他深居简出，戏剧和电影，特别是新闻电影成了他观察世界的特殊窗口。他对绘画不是很喜欢，而且不掩盖他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鉴赏力。艺术文化方面的问题不仅经常在政治局委员范围内讨论（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艺术鉴赏力是不高的），而且也同语言大师们一起讨论，如高尔基、别德内依、法捷耶夫，当然还有卢那察尔斯基。

在斯大林的讲话中，艺术形象出现的次数要比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党的活动家少得多。一般地讲，他引用艺术形象只是为了加强发言时的批评火力。从他这种不多的引用中，可以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1927年9月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回答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共产党员魏奥维奇时不客气地说：

"我以为魏奥维奇的批评不值得回答，"接着他说，"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德国诗人海涅的小故事。有一次海涅对一个无理取闹的批评家奥芬堡不得不这样回答：'奥芬堡这位作家，我不知道；猜想他是达林库尔一类的人，不过达林库尔我也不知道。'"然后斯大林继续说：

"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把海涅的话改动一下就可以用来回答魏奥维奇的批评把戏：'魏奥维奇这位布尔什维克，我们不知道；猜想他是阿里-巴巴一类的人，不过阿里-巴巴我们也不知道。'"⑧

但是，我再重复一句，他引用经典作品的情况是很少的，这说明总书记对世界文学和祖

*指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

——译者



卢那察尔斯基
(1875–1933)

苏联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剧作家

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宗教、建筑等许多领域，其中文艺论著所占比重最大。十月革命前，他一再阐述文艺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理论，说明艺术的阶级性以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推荐高尔基和尼克索的创作，批判颓废派和沙文主义倾向。革命后，他坚决抵制否定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思潮，积极参加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作家的政治思想立场、创作问题和文艺学的历次大论战。他的剧作常借用历史人物驻留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来表现当代的社会冲突和思想矛盾，剧本充满浪漫主义激情和对陈腐事物的揭露讽刺。

国文学杰作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

斯大林在一系列公开讲话中常常不放过机会表示他对这些那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度。总书记的意见常常是绝对的、武断的。例如在给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的信中，斯大林毫不含糊地谴责大剧院的指挥Д·戈洛万诺夫，因为他反对靠减少古典作品来机械地更新剧目。总书记立时把"戈洛万诺夫主义"说成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11]。在30年代，这样的评价会要人的脑袋。斯大林在这里还把布尔加柯夫的《逃亡》也叫作反苏维埃的现象，不错，他又补充了一段缓和的话："但是我决不会反对上演《逃亡》，只要布尔加柯夫给自己的八个梦再加上一两个梦，描写出苏联国内战争的内部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所有这些自称为'诚实的'谢拉菲姆之流和各种各样编制外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任性，而是因为他们曾经骑在人民的脖子上……"

在继续"分析"布尔加柯夫的创作时，斯大林问道：

"为什么常常上演布尔加柯夫的剧本呢？大概因为我们自己的适于上演的剧本不够。闹剧本荒的时候，甚至《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也算好剧本了。"

接着对该剧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剧本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12]

布尔加柯夫

俄国作家

以"魔幻大师"享誉世界文坛，擅以怪诞笔法嘲讽苏联当局及共产制度，风格天马行空多变化，常令现实与魔法交融，进而创造出批判黑暗社会、关怀弱势人物的奇幻世界。

他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改编于1924年他完成的第一部小说《白军》。小说以1918—1919年的基辅城为背景，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仓皇撤退，乌克兰的反共白军与红军阵营激烈战斗，白军虽坚持信念却不能不面对失败，感情真实动人。但因左派文人群起攻伐，仅陆续发表过其中片段，全书迟至1966年才出版。以此内容为基础的剧本也是一再经过修改，直至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最后胜利，才终被搬上舞台。



基辅城

斯大林的这些话再一次反映出一个老的真理:时间会给一部作品作出最后的评价。老爷式的判决过若干年之后会显得令人可笑、幼稚和肤浅。甚至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也是如此。可是在我国的历史上,有些人企图作出"最后"评价的事是多么经常啊!例如,斯大林就经常这么干,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武断:不犹豫,相信自己,蔑视艺术家理智上的深思熟虑。

总书记对他平时仿佛尊敬的人也很生硬,例如对别德内依。别德内依从1912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很快成为公认的无产阶级诗人。他所写的许多寓言、民谣、歌词、韵文小品、中篇小说、警句名言等,在广大群众中一直享有盛誉。这位人民诗人的每一行诗句所写的都是人民所关心的事,这使得他一直受到大众的欢迎。别德内依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比里尔瓦》、《从热炕上爬下来吧》、《不讲情面》)批评了因循守旧和其他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像妇女的拽地长后襟一样,从过去一直拖到现在。中央宣传部把这看作是反爱国主义的。诗人被叫到中央去"谈话"。别德内依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对这种警告发了牢骚。他很快得到了总书记的一封残酷无情的回信:

——您就突然嗤之以鼻,叫起绞索来了……

——也许中央没有权利批评您的错误?

——也许中央的决议对您没有约束力?

——也许您的诗超乎一切批评之上?

——您没有发觉您已经染上某种令人不快的所谓"自高自大"的毛病吗?

在提了这些激烈的问题之后斯大林总结说,别德内依在作品中进行的批评,是对俄国无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对苏联的诬蔑。"主要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张皇失措的知识分子的那种无谓哀鸣,惊慌地说人家要把杰米扬'孤立'起来,说'再不发表'杰米扬的作品了等等。"[13]

就是这样。生硬和专断。仅在几年以前,即1925年6月,斯大林曾亲自审订过中央关于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决议中说,应当消除"文学中的命令口吻"、"一切自命不凡的、半文盲式的、自满自足的专横跋扈作风"[14]。在20年代末,这些正确的论断已被斯大林遗忘了。文化部门中

的"领导干部"活动得更加积极了。知识分子的不安,有时是动荡,也随着秩序和行政手段而逐渐地产生了。

在此之前三四年,斯大林因为别德内依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的"正确的、符合党性的"诗而曾请人向别德内依转达自己的谢意。这首诗刊登在1926年10月7日《真理报》上,标题是《一切都有结局》。也许,为了更充分地体验一下那个复杂时期的气氛和政治色彩,需要把这首诗的哪怕一部分引来看看:

托洛茨基——快把他的肖像印在《星火》周刊上!
让大家都来一睹为快!
他骑着一匹老马矫健地飞奔,
皱巴巴的羽毛披挂全身,
宛如插满红翎的缪拉特*。
整个"机关"都随身带着,
既有反对派的将军,
又有教训人的论纲。
这样的司令部,足可征服整个星球!
可是,没有军队!
一个无产阶级的连队也没有!
工人们不甘心
跟随这样的司令部,
以牺牲党和自己为代价去残杀。
……
够了,我们的党再也不愿让人
耍弄这不可救药的政治权术!
是时候了,该结束这种
不成体统的胡作非为!

* 缪拉特(1767—1815年)是拿破仑一世的妹夫,法兰西元帅(1804年起),那不勒斯国王(1808年起),历次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
——译者

总书记满意地读了这首诗，并曾打电话给莫洛托夫以及另外什么人。大家都赞美别德内依的这篇政治讽刺作品。斯大林说："读我们反驳托洛茨基的讲话的人比读这首诗的人少。"在这点上他也许是说得对的。可是当诗人稍稍"走了调"、表示出"委屈"的时候，斯大林便完全变了样，变得冷淡，凶狠，命令人，教训人。

艺术语言大师们知道，作品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斯大林的评价，所以都常常写信给他，请他发表意见。他的意见常常是宽容的，同时必定指出作品的"弱点"。有时候他还给予表扬。例如，在给别泽缅斯基的信中，斯大林写道："《枪声》和《我们生活中的那一天》我都读过了。这两部作品中既没有任何'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反党的东西'。这两部作品，特别是《枪声》，可以认为是目前革命的无产阶级艺术的范例。"[63]

比较了解斯大林的人证实：总书记很注意那些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学者和文化人士的政治面目。他感觉到，在文艺界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革命。这样的例子不仅仅包括人数众多的流亡者。俄国大作家弗·柯罗连科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一封信使他警觉起来，那封信在这位作家死后才在巴黎发表。作家在信中表示不安：革命后俄国国内的暴力行动会阻碍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64]。斯大林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叶·扎米亚京的文章《我担心》（发表在彼得格勒一家不大的杂志《艺术之宫》上）也激怒了他。这位后来在30年代初逃亡国外的作家，当时激昂地、但实质上正确地写道："只有在文学不是由履行职责的可靠官员来写，而是由缺乏理智的人，由



别德内依(1883–1945)

苏联俄罗斯诗人

1911年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诗作。他运用各种诗歌体裁，特别是寓言，揭露地主、资本家、官僚和神父的罪行。国内战争时期是他创作的极盛时期。他的政治讽刺诗（《尤登尼奇的宣言》、《男爵封·弗兰格尔的宣言》）和抒情诗（《共产主义马赛曲》等）紧密配合现实政治斗争，广泛流传于工农士兵之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20至30年代，社会主义劳动的题材在他的创作中占着重要地位。其中《干劲》描写了普通工人忘我的劳动和高尚的品质，被斯大林誉为"珍珠"。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对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性格曾表现出不正确的理解，斯大林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卫国战争时期他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作品。他的诗歌富于思想性和战斗性，通俗易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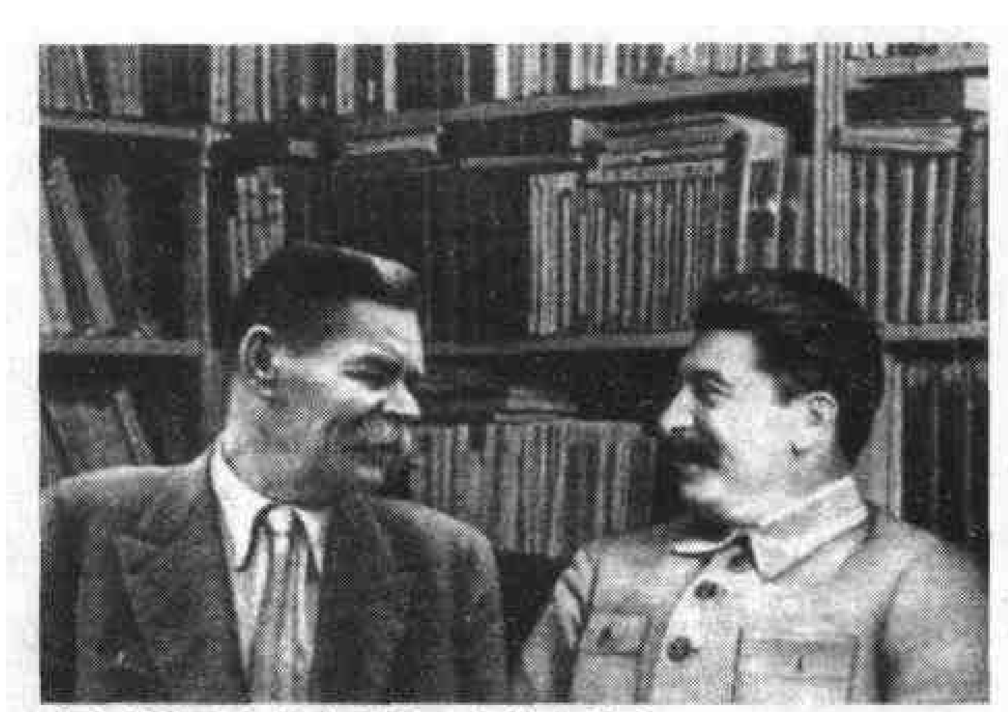
隐士、异教徒、幻想家、不安分的人、爱怀疑的人来写的地方,才会有真正的文学。我担心,只要人们还把俄国平民看作小孩子(小孩子的天真是需要保护的),我们就不会有真理的文学。”扎米亚京继续说:“我担心,只要不摆脱与旧天主教一样害怕一切异教徒语言的新天主教,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47]后来他写信给斯大林,说他不能并且拒绝在“铁窗”之内工作。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亚·波格丹诺夫所写的一本书证明了一些作家的思想情绪,他说,只有在人们当中消除掉强制,只有在社会制度中不再相信偶像、神话和模式,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创作[48]。波格丹诺夫显然是指不能容忍对待艺术创作的专制态度。这当然是太过分了。斯大林感觉到,像波格丹诺夫这样的人懂得,如果无休止地重复革命的神话,这种神话也就几乎无异于《圣经》上的道理了。要知道,斯大林后来在《简明教程》中阐述的许多神话,就是被不加分析和合理思索接受了的。当时需要的是“遏止”这些“目光敏锐的”知识分子。

斯大林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更彻底地疏通文艺思想,并借助它来引导人民群众去解决国家面临的无数问题。但在斯大林看来,影响创作人员的方法主要是行政方法,如通过决议,把不合心意的人驱逐出境,建立书报检查制度。顺便提一下,这方面他同托洛茨基是一致的,虽然他不想公开宣布这种一致。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著作(这位多产作家什么没有写过啊!)《文学与革命》中断然说道:在一个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内,需要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49]。斯大林考虑到了这个意见,认为这可以帮助艺术家作出正确的选择!如何选择?他会考虑的,但政治上的检查不会居于末位的。他难于理解,在这种选择方面起着特殊作用的也应当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应当是不可缺少的真正民主标志。但是可惜,当时这方面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

在列宁生病期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倡议和斯大林支持下,采取了一个非常行动:构成俄国文化核心和精华的160人(包括作家、教授、哲学家、诗人、历史学家)被驱逐出国境。其中有尼·亚·别尔嘉耶夫、尼·奥·洛斯基、Ф·А·斯捷彭、列·波·卡尔萨温、Ю·И·艾亨瓦尔得、М·А奥索尔金等等。1922年8月31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带有意味深长标题的文章《初次警告》,文章论述了必须同文化领域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更坚决的斗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产生和确立是伴随着斗争的,许多创作人员不理解并经历了精神上的动荡。“思想战线”的工作

人员竭力强调这一原则的实用方面，把它变成了指令，而不是帮助每个艺术家用心灵去体会这一原则在祖国革命改造中的地位。

无疑，这次驱逐是个信号。斯大林不是通过广泛的民主的途径去吸收科学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向他们做耐心的工作，而是让人们知道，他要在文化领域内也采用专政的手段。在运用权力和暴力时斯大林从来没有缺乏过决心。大概只有对高尔基，他不能让自己使用故作宽容的、甚至粗暴的腔调，像常常对待别的作家那样。几乎在责骂别德内依进行了"诬蔑"性批评的同时，总书记在给高尔基写信时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高尔基从国外给斯大林写信，关于对我们的缺点进行过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否合适表示了怀疑。斯大林深信不疑地回答作家说：


高尔基曾经与斯大林在一起热烈讨论

"我们不能没有自我批评。绝对不能，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自我批评，就必然会停滞不前，会使机关腐化，滋长官僚主义……"然后接着说："当然，自我批评会给敌人提供材料。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也会为我们的前进……提供材料（和推动力）。"[50]

我们看到，在社会生活民主化，包括文学领域的民主化问题上，斯大林善于表达很成熟的见解。不过问题在于，正确的结论和评价逐渐越来越脱离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

助手们也有时向领袖报告俄国流亡者的文学活动情况。当有人给他送来1922年柏林出版的白卫将军彼·克拉斯诺夫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从双头鹰到红旗》时，他甚至没有用手去拿，他说：

"这个混蛋，哪儿来的时间写这种东西？"

在他的参与下曾允许亚·库普林、阿·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名声较



伊·阿·布宁(1870–1953)
俄国作家

1887年开始发表诗作。1901年以诗集《落叶》获普希金奖。他主要创作中、短篇小说。189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引起批评界重视。1899年结识高尔基，并开始为高尔基主办的知识出版社撰稿。1909年当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他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1920年起侨居法国。1933年获诺贝尔奖金。1953年卒于巴黎。

布宁的小说结构松散，不重情节而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气氛、情调的渲染，仿佛是一幅描摹世态人情的风俗画。在这方面他得益于果戈理和契诃夫。离开祖国后，才力渐趋枯竭，作品主要是回忆往昔，大多以爱与死为题材。少数短篇如《暗径》和《大乌鸦》，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简练、明澈、悦耳的语言风格，思想内容上也大体保留了前期批判的锋芒。

小的诗人和作家在不同时期返回苏联。1930年，当有人告诉斯大林说伊·阿·布宁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俄国人时，总书记说：

“那他现在就完全不想回来了……他在发言时讲了些什么？”

新的获奖者布宁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了传统的讲话，报上简短地报道了“要点”，并引用了这位俄国伟大作家在宴会上说的一句话：“对艺术家来说，主要的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斯大林读了之后，沉默了一阵，陷人沉思。他对此很不理解，难道布宁在我们这里不能按照他的思想信仰来考虑和思索问题吗？如果思想自由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他斯大林会反对这种自由吗？不错，斯大林想不起来布宁写过什么，但他模糊地而且可能不会有太大错误地想到：“这位贵族作家讲的是一些死亡的秘密和神的世界。”他对布宁再没有什么更多的兴趣。不错，有一次助手们给他拿来一摞外国杂志，其中有一本《现代纪事》杂志，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布宁的描写俄国革命的短篇小说《红色将军》。但是斯大林没有时间……

斯大林对诗歌一般也很少有什么兴趣，虽然像我前面已提到的，年轻时他写过30来首幼稚的诗。革命斗争使他没有时间去理解诗歌韵律的音乐和哲学。他几乎不需要读诗。不错，有一次，还是在察里津的时候，曾经使用过普希金的一首诗作为密码的基础。用这首诗通知了莫斯科发出运粮列车的数量、它们的号码等等。

还有另外一个流亡者，即诗人B·霍达谢维奇，也被报告给了斯大林，说他有才华，“或许甚至比别德内依还有才华……”甚至把他的关

于"在异邦创作源泉已枯竭"的诗句念给了斯大林。对于霍达谢维奇、维亚切·伊万诺夫、伊·什梅廖夫、阿·列米佐夫、M·奥索尔金、П·穆拉托夫及其他逃亡者的这种毫无出路的处境，斯大林是不感兴趣的。他连自己的诗人也了解得很差。他顾不上这些。他听说过，"富农诗人"尼·克柳耶夫、C·克雷奇科夫、П·瓦西里耶夫堕落到流氓和反革命道路上去。不过，不是阿韦尔巴赫就是中央宣传部某些人曾经狠狠地"遏止"过他们。

有一次他想起1925年12月30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悼念谢·叶赛宁这位"革命的民粹主义者"的文章。报上写道：

"当代诗人中未有谁的作品能像叶赛宁的作品那样被人们广泛阅读和喜爱。"

"俄国文学失去了叶赛宁，也许就是失去了自己惟一的一位真正的抒情诗人。"

"叶赛宁不能接受和彻底理解城市……他是乡村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惨死中也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东西：列利*吊在暖气管子上。这也是一项文化成就。"斯大林不理解自杀的人们。这有点像自愿当俘虏……总之，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样的话："巴拿苏斯**应当套上笼头。"

他更感兴趣的是，在这里的，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城市里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导演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鲍·皮利尼亚克的《荒凉年份》、伊·巴别尔的《骑兵队》以及安·普拉托诺夫、维·金、阿·韦肖雷、尤·特尼扬诺夫、维·赫列布尼科夫等人的作品，使他产生有些矛盾的感情。对德·富尔曼诺夫、亚·费定、阿·托尔斯泰、列·列昂诺夫等人的清新的

* 古代斯拉夫民族的婚姻和爱情之神。
——译者

* * 希腊神话中能激起诗人灵感的飞马。
——译者



伊万诺夫(1895-1963)
苏联剧作家、小说家

他于1922年创作了中篇小说《铁甲列车14-69》,后于1927年改编成话剧,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该剧以1919年西伯利亚农民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夺取白卫军铁甲列车的革命活动为素材,塑造了一群革命战士的生动形象。

特列尼约夫(1876-1945)
苏联剧作家

1926年问世的《柳鲍芙·雅罗瓦娅》是特列尼约夫的代表作。剧本表现了柳鲍芙·雅罗瓦娅由一个普通的小学女教师成长为一个忠贞革命者的过程。剧中革命英雄主义的渲染同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相结合,事件进展迅速,节奏明快,古老的莫斯科小剧院因演出此剧而走上新阶段。

作品,他立刻便喜欢上了。斯大林正确地评价了德·维尔托夫、列·库列绍夫、谢·爱森斯坦、弗·普多夫金、弗·埃尔姆列尔的影片。听说,阿·卢那察尔斯基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康·特列尼约夫的《柳鲍芙·雅罗瓦娅》、弗·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丽·谢芙琳娜的《维莉涅娅》等剧的演出很成功。他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一起看过这些戏。令人高兴的是:像弗拉·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的大导演开始导演起苏维埃戏剧。舞台上的革命会巩固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虽然在革命中我们所扮演的也是命运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角色。

绘画和音乐方面发生的事,斯大林了解得比较差。对于"工业绘画"、先锋派画家、结构派画家、未来派和立体派画家的标新立异,他是蔑视的。支持这些他不甚懂得的(他相信别人也这样)"矫揉造作东西"的人,在他看来,是不务正业。

在艺术家们——绘画和雕塑大师、诗人和作家——中间一直都在进行热烈的争论。争论的常常不是拥护不拥护革命的问题,而是关于艺术形式、表达自由、新的创作"标准"问题……一个接一个在报纸上出现的新的创作协会和联合会,如同五彩缤纷的镶嵌画。斯大林认为,应当在这个万花筒中确立秩序。不过他的手没有伸到这里来,因为他时而要同这个反对派,时而又要同另一个反对派进行斗争。他认为,卢那察尔斯基容许了太多的"自由"。

党内需要统一,需要协同一致的、多数通过的工作方针。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斯大林越来越清楚,没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党就不能给予人民许诺过的一切。在存在可恨的沙皇、地主、资产阶级时,人民肩负斗争的重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快就到了十月革命起义十周年!不错,我们消灭了剥削,给了农民土地,工人有了管理工厂的可能,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满意?为什么事业前进得比想象的慢?或许反对派在某些方面是对的吧。

大家都在谈论官僚主义。今天《真理报》还发表了列别季同志的报告《关于改善国家机关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措施》。瞧,写得多么有力:"我们国家机关存在着什么缺点呢?主要的是:编制庞大和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低,而后面一点,应当指出,在基层苏维埃机关尤其是这样。机构臃肿,工作中平行重复,官僚主义,办事拖拉,挑选专家时不总是正确,对这些专家业务水平的考核工作做得很差;最后,对上级机关下达任务的执行情况和本机关的工作缺乏很好的监督,有时根本没有监督。"[61]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雅可夫斯基也写过……

斯大林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不错,他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想法):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立场出发,加速粉碎那些大家都非常讨厌的反对派。这方面也可以更多地向知识分子"施加压力",更彻底地把知识分子"套在"工业化和农业改造的共同事业上来,那样一来这些艺术家的思想动荡就会少些。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自由的艺术。斯大林设想,应当吸引一批老的知名的大师,同时培养自己的工农作家。反无产阶级分子在文化领域是没有什么可干的。……

斯大林更加经常感到,艺术家们的思想动荡不过是反革命邪念。不错,这比起托洛茨基所宣扬的那一套来,危险要小一些。看来,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已达到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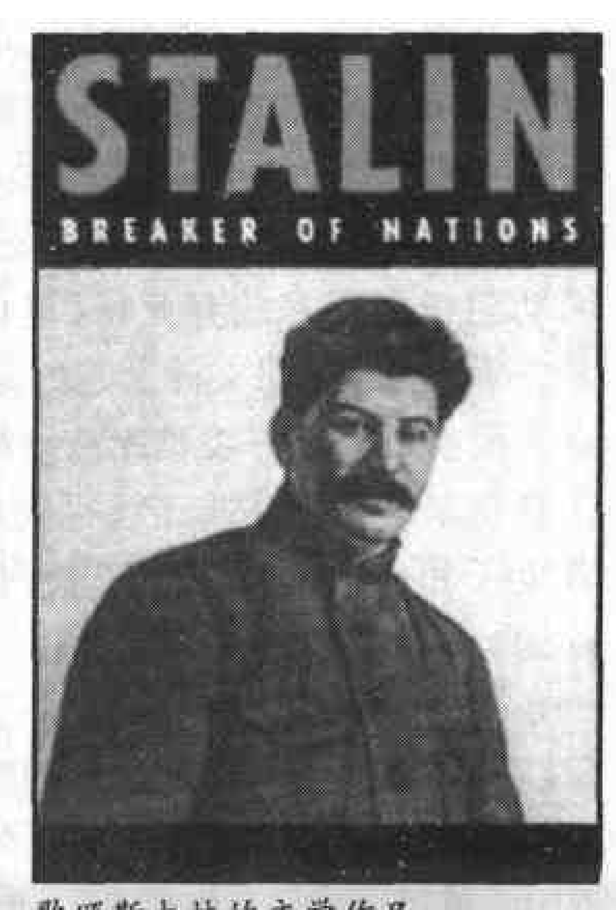
在转入分析同托洛茨基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再谈一点总括性的意见。我们谈到了文化界、知识界,以及斯大林对他们的态度,而斯大林的最大特点是他完全不尊重自由,不尊重创作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理解的自由。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只承认权力的**自由**。他认为,为了权力,为了威力,拒绝精神自由是自然的。他不考虑他会使千百万人牺牲掉个人的自由。在30年代,自由问题对他来说已不存在,只有他才有自由(虽然他也成了自己制度的俘虏)。甚至正式的国家元首也与自由没有"关系"。

20年代初，别尔嘉耶夫受到加里宁的接见，他请求从监狱中释放因"救济饥民和病患者委员会案件"被捕的作家M·奥索尔金。加里宁在听了这位俄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知道，但祖国不知道)的话之后说：

"卢那察尔斯基建议释放起不了任何作用；即使我在建议书上签署也是一样，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斯大林同志提出建议，那就不同了。"这就是说，那时加里宁就认为(也说过！)，作为国家元首的他，同斯大林相比，"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一切都说明，不自由已达到顶点。总书记的权力自由就是这样开始取得胜利的。

别尔嘉耶夫在他的《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一书中写道："统治者具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倾向：他为了自己，不仅仅要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求……所有的人服从他。这是主要的历史悲剧，是自由和必然的悲剧……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仅仅是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⑫]知识分子的思想动荡，经常出现的反抗、发泄、创作上的沉默，这些都是侵犯自由的后果。统治者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列宁所预见的那种社会主义是排除偶像崇拜的，而独裁统治却相反，它需要偶像崇拜，它要以此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斯大林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由的哲学范畴。他考虑问题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但是，从"他的时代"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人们的希望和渴求主要同未来联系在一起。是的，人应当看到前途，看到自己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但无休无止地只是考虑到"后代儿孙的幸福"来谈论人的进步和命运，那就是幻想的自由了。和谐、完美、丰富、繁荣，——把这些只放在未来，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应当在现在、现实同未来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相互关系。只有同现在活着的人联系起来，未来才有意义。这一点恰恰是斯大林不能或不想理解的那许多艺术家讲过和写过的。在



歌颂斯大林的文学作品

今后的许多年里，文学艺术主要干的事情就是歌颂他这位领袖。剩下来的只是自由的影子，等到它回来那就是长期而困难的事了。正如拜伦诗中所说：

> 你成了千百万人之中的统治者，
> 你在人们的欢腾声中得到了剑，
> 不过你生成不是第欧根尼*，
> 你倒更像是菲力浦之子，
> 但篡权的无耻之徒却忘记，
> 大千世界不能与木桶相比[9]。

*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自称世界公民，传说他住在一个大木桶里。——译者

“杰出领袖”的失败

托洛茨基喜欢旅行，喜欢尽情休息，注意身体健康，甚至在内战后最困难的年代竟然去疗养、打猎、钓鱼。他身边经常有好几个保健医生。对自己的贵族老爷习惯，他一点也不克制。1926年春天，他同妻子决定去柏林求医。政治局劝阻托洛茨基放弃此行，但他不听，到底还是去了。他的证明文件上签的是乌克兰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库兹缅科的名字。托洛茨基在车站告别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着妻子和他的前军用列车长谢尔穆克斯前往德国。



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影响、个人声望总是估计过高，因而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他所做的许多决定却有助于斯大林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我已经说过，托洛茨基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这首先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影响、对自己的个人声望估计过高。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再说一遍，常常采取一些于己极为不利

的决定:不参加列宁的葬礼,不出席中央全会和政治局的多次会议。每逢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就脱身,或是休养、旅行,或是打猎、写作。斯大林每次都最大限度地、有目的地利用他的缺席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后来有充分的时间描述自己的一生。他在自己的一本书里写道,他在柏林之行期间就得出结论,他同斯大林不可能妥协,他们两人之中必有一人要让道。但是托洛茨基仍然相信,让道的将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回忆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贴近他,他们三人得出结论,他们一起就能从总书记手中夺下主动权。托洛茨基文绉绉地写道:"我想,我们还能够阻止热月政变的翻版,对于斯大林,要强迫他实现列宁的意志。"

托洛茨基的这些思想可能是在火车上产生的,也可能是漫步在柏林街道时产生的。看来,他当时惟独没有想到17世纪的英国神甫诗人约翰·多恩的几句诗:"……请你永远不要问,钟声为谁敲响:它是为你敲响。"未来给他安排了失败者的命运。

斯大林除公开反对托洛茨基外,还不断做工作来限制托洛茨基的影响。斯大林秘书处工作人员阿·帕·巴拉绍夫证明,总书记常常在政治局开会之前召集他的拥护者,商讨削弱托洛茨基影响的措施。这些预备会议惟独没有邀请过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巴拉绍夫对我说:"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在准备一道反托洛茨基的菜。"

有一次,斯大林发现在红军战士的政治学习提纲中托洛茨基仍然被称为"工农红军领袖"。他立刻作出反应。现在还保存着斯大林1924年12月10日写给伏龙芝的便条,其中建议尽快修改这些提纲。几天之后这些提纲就作了修正。在给伏龙芝的附有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处长阿列克辛斯基的报告的便条中写道,"托洛茨基不能再作为红军领袖在政治学习中出现"。自1924年下半年起,居民点和企业不再以托洛茨基的名字命名,刊物中吹捧他的话也少了,其中也有斯大林"插手"。斯大林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逐渐降低前"工农红军领袖"的声望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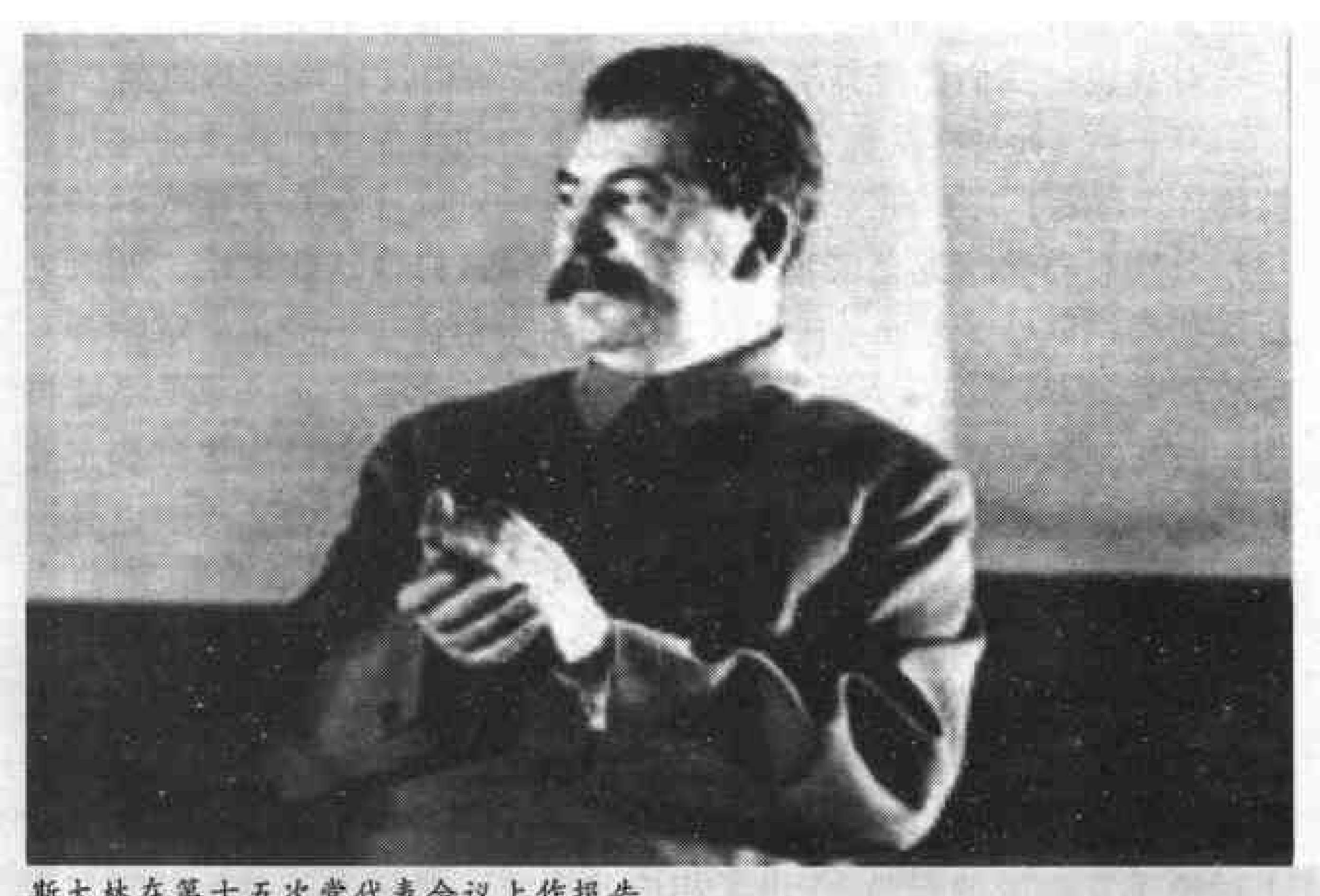
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支持的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不厌其烦地召开了好几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以及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反对派的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对托洛茨基及其盟友采

取了各种惩罚措施:警告、党内处分、清除出党的机关。然而,反对派的路线没有改变:维护党的"正确"方针的斗争与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同时进行。但是,反对派的营垒很快就出现了大缺口。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附议,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7月、托洛茨基在10月相继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加米涅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中央全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担任共产国际的工作。其他一些反对派分子也都被解除了党政职务。

在1926年10—11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作了《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报告,对反对派三人团及其战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斯大林在同年12月举行的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中再次阐述了这些思想。从这些报告的手稿可以看出,斯大林为揭露反对派进行了多么精心的准备。在一些专门的小纸片上详细开列着反对派的全部缺点和"罪行":

(1)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没有事实,只是捏造和诽谤。

(2)让托洛茨基解释一下他在十月革命前追随的是什么人:



斯大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左派孟什维克还是右派孟什维克？

(3)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

(4)难道斯大林迫害半孟什维克穆迪瓦尼吗？诽谤。

(5)加米涅夫曾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大会犯了“向左边开火”的错误，加米涅夫是左派吗？

(6)托洛茨基断言，他“已先知”列宁的四月提纲……以苍蝇比巨人！

(7) 加米涅夫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贺电。

(8)季诺维也夫坚持接受厄克特租让*的苛刻条件。

(9)季诺维也夫：“党的专政”等等。

* 莱斯利·厄克特是英国金融资本家，1923年企图与苏联签订条件苛刻的大型租让合同。人民委员会拒绝批准这个合同。



斯大林伏案起草将要宣讲的长篇报告

斯大林一丝不苟地、仔细地收集了他所知道的反对派大大小小的全部罪行（而罪行确实不少），并在他的长篇报告中不知疲倦地把一个又一个揭露出来的事实投入斗争的火堆。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连同结论）共持续了近5个小时！斯大林向反对派发起的攻势，着重点是“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总书记搜集了一大堆反对派过去的错误、动摇和无数的“行动纲领”，把反对派置于只能进行无声自卫的绝境。斯大林不是在批评，而是在用语言炮弹“打击”。同时，总书记却不知道，在他揭露他的对手的时候，他自己愈来愈成为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次要的枝节问题。总书记的正统性扼杀了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论的思想。斯大林那时就已认为任何（即

使是正直的)异己思想都不能容许。

当然,反对派领袖有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机会。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的辩护没有说服力,发言的时间又很长。例如,他们先是说服会议代表给他们一小时发言时间,然后又要求延长半小时,接着再加10分钟、15分钟……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告诉我们,除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引文以及他们自己的引文外,他们实际上提不出任何东西来反驳指责他们进行派别活动的说法。甚至以善于辞令著称的托洛茨基也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论据为他向中央、向党发动的无数次进攻辩护。他只是在结束自己那冗长而混乱不清的声明时重申:"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在托洛茨基之后发言的尤·拉林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全都面临着"革命已成长得超过一部分自己的领袖"的时刻。拉林说得很对,在反对派首领的冗长报告中只是"对引文和不同著作的不同地方的不同解释进行文字上的争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所作所为不像是政治领袖,而像是不负责任的著作家"[69]。发言的人们还指出,这些首领们只想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而不考虑社会后果。

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不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以及在报刊上进行,而且也在共产国际中进行。托洛茨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当1927年5月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斯大林决定在这里也给托洛茨基一次打击。下面一段话是我们从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演说中摘录的,这篇演说广大读者很少知道。

斯大林说:"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我想,"斯大林接着说:"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

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莫大的侮辱。”[55]

斯大林的演说实质平淡然而坚决、恶毒，它给反对派贴上了标签，把他们贬低为实际活动家。执委会准备开除托洛茨基，这一计划于当年9月27日实现。托洛茨基孤立无援，但他继续进行着毫无前途的斗争。从被驱逐出苏联以后，直到1940年，托洛茨基大概是惟一揭露、辱骂、指责斯大林的人。但是，这个孤独的声音骂得愈长久、愈凶狠，人们就看得愈明显：托洛茨基进行斗争主要的已不是为革命和革命的理想，而是为自己。他直到最后始终不肯认输，即使在他这个几乎是“天才”的人被他称为“诡诈的奥塞梯人”推出国境线时也是如此。很快，对托洛茨基来说，衡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的意义的标准只是：主要看如何能利用它们来丑化斯大林。而对总书记来说，托洛茨基直到他在墨西哥毙命时止，一直是罪恶的化身，是堕落的象征，是他个人的深仇大恨的象征。他这一生中大概只是对在1939—1941年“欺骗”和“耍弄”了他的希特勒才怀有如此刻骨的仇恨。而眼下斗争还在继续。

奥塞梯人

北高加索地区的居民，自称“伊龙人”。主要分布在苏联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部分分布在格鲁吉亚、俄罗斯联邦等地，属欧罗巴人种高加索类型，使用奥塞梯语。

奥塞梯人由北高加索当地的古代居民和外来的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等结合而成。他们于1918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9年被白军占领，1920年恢复苏维埃政权，并成立奥塞梯自治共和国。

反对派没有退却。1927年春天，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新的行动纲领，有83个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在上面签了名。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之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于1927年10月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1月被开除出党。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时，包括在75名积极的反对派活动家中的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诚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又一次悔过之

后又恢复了党籍，他们甚至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悔过发言。

应当指出，同反对派的这场斗争是在国际局势明显加剧、国内开展国民经济工业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此外还应看到，斯大林本人常常挑起这种斗争。无休止的辩论使党丢下了迫切的重要问题。联共(布)党内状况问题还多次在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讨论。在这里，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除了得到个别代表支持外，最终也没有获得必要的支持。罩在托洛茨基头上的“革命英雄”的光环完全“失去光泽”，并最后熄灭了。在党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眼里，他更多地是个空谈家和破产的领导人。

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挑起党内争论，然而事与愿违，他反而使斯大林作为党的新领袖的威望越来越高。这个结论令人难以置信，可是看来谁都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促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当轮到斯大林作报告时(就像他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一样)，代表们向他(只向他一个人)大声欢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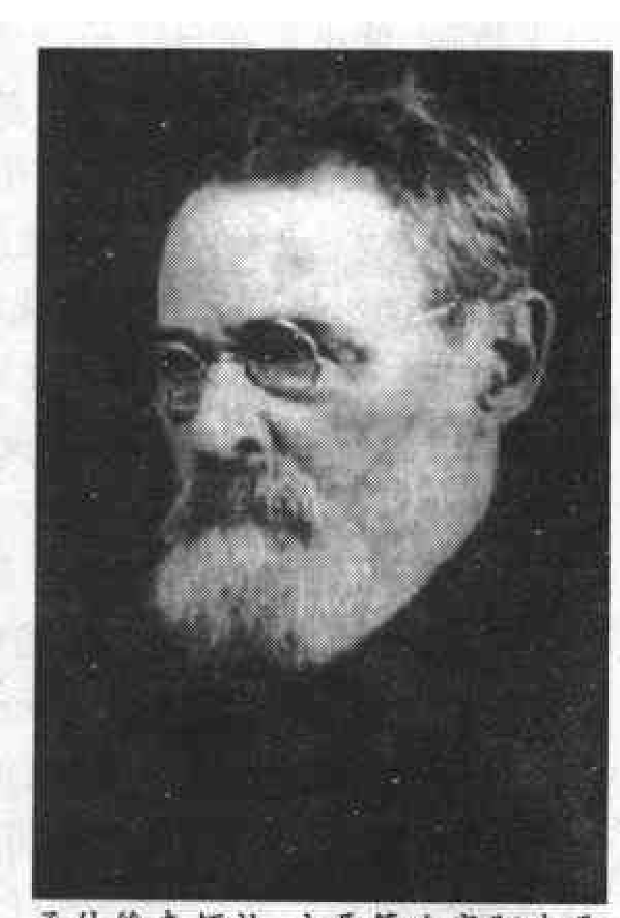
这里大概还不能指责说这是斯大林“组织的”，是准备好的“脚本”和“演出”等等。在大部分代表看来，总书记逐渐成了党的实际领袖。这种印象在反对派代表毫无说服力的发言的反衬下明显加强，反对派这时连勇气都没有了。例如，加米涅夫在引经据典为自己辩护的同时，竭力向斯大林献媚，称他的报告“内容详尽”、“引证准确”、“结论可靠”等等。托洛茨基愤恨地回忆道：“季诺维也夫及其朋友现在惟一关心的就是及时投降……他们指望即使得不到赏识，也会由于佯装同我决裂而得到赦免。”[66]

大家都清楚，托洛茨基同自己过去的反对派的联合是在集中力量反对总书记的行动纲领上实现的。斯大林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贪求功名的动机和相信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信念日益加强的斯大林，没有放过这个十分有利的机会。他从思想斗争开始，决定从政治上彻底粉碎托洛茨基。关于这一点，他在1927年10月23日为讨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问题而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就是证明。全会决定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问题。全会期间，会场中有人叫喊并给主席团递上一些字条，其实质是说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没有执行列宁的意志。斯大林已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了。

他在全会上长达一小时的演说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愤怒和毫不掩饰的仇恨。斯大林习惯地再次回顾了这位被排斥的领袖1904年以来的全部罪过。斯大林的演说不是即兴发言;他对于同人们的公开交谈,特别是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总是进行仔细准备的。斯大林看到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总战略路线是以列宁关于总书记的不良素质的警告为依据的,于是就从这里下手对托洛茨基实行打击。

"反对派想用个人因素,如斯大林的粗暴,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固执等等来'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多么廉价的解释呵!这是巫师说的鬼话,不是解释……从1904年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一直围着孟什维克转,拼命反对列宁的党。这个时期列宁的党使托洛茨基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为什么呢?这也许错在斯大林的粗暴吧?但是斯大林那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那时他在国内,离国外很远,在地下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而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斗争是在国外展开的,——这和斯大林的粗暴有什么相干呢?"[57]

总书记在保卫列宁的旗帜下进行攻击,而托洛茨基在本世纪初把列宁称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暗指他具有罗伯斯庇尔那种独裁习气。总书记以托洛茨基早期的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是献给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的为突破口,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斯大林在一片嘈杂声中洋洋得意地宣读托洛茨基的献词:"献给亲爱的老师帕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


孟什维克领袖、主要策略家阿克雪里罗得

斯大林最后总结说:"那好吧,既然这样,就滚到'亲爱的老师帕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去吧!滚去吧!不过要快一点,可敬的托洛茨基,因为'帕维尔·波里索维奇'已经衰老,可能很快就会死去,那时你就来不及见到'老师'了。"[58]

斯大林还提起1927年7—8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全会，他遗憾地说，当时他劝同志们不要立即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也许是**过于仁慈**（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犯了错误"。斯大林"过于仁慈"和他使用"仁慈"一词，的确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极其罕见的！那时的短暂软弱已成为插曲。现在他号召支持"那些要求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的同志们"[59]。

对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斯大林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60]我曾对列宁的最后几封信作过分析，因此我要再次简短说明，斯大林在1927年10月歪曲了历史真相。列宁的遗嘱是给第十二次还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此尚不清楚。《遗嘱》只是在各代表团内宣读，而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代表大会根本就没有通过决定不把信公布，更不用说一致决定了。至于说"列宁本人不愿意"，这完全是斯大林昧着良心的说法。

总书记这时感到自己的力量日益加强，感到全会参加者实际上完全支持他，就决定在自己最敏感的问题上发起进攻，以至于不惜公开进行伪造。斯大林利用了托洛茨基就列宁的《遗嘱》问题发表的一篇专门声明，这篇声明是托洛茨基在政治局的坚持（首先是斯大林的坚持）下于1925年9月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托洛茨基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当时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患病时起就再三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建议、写信等等。所有这些书信和建议，当然总是按照指定送达，通知了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然对党的决定也总是发生了应有的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无论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说，都不可能有这种《遗嘱》。关于隐瞒或违背《遗嘱》的一切论调，都是恶意的捏造，完全违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本意。"[61]

托洛茨基当时能否想到，他为了同西方流传的似乎"列宁的秘密文件是通过托洛茨基落到西方的"这一传闻划清界限，即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把自己弄得哑口无言？结果，钟声首先为他敲响。在全会看来，这位反对派领袖再次成为政治阴谋家。斯大林也没有放过这个消

灭托洛茨基的机会。

"写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现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据什么来嚼舌头,硬说党和党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呢? ……

"有人说(?! ——本书作者注),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委员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本书作者注)……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有什么办法呢? 从岗位上溜掉吗? 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

斯大林接着说道:"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2]


托洛茨基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

坐在全会会议厅里的托洛茨基这位阴谋能手和表演大师感到,斯大林这无情的、洋洋得意的长篇讲话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正如托洛茨基后来在墨西哥所写的,在听了斯大林的演说后,他在肉体上感到已被送上了断头台。托洛茨基同当时的其他革命者一样熟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大概忧郁地想起了热月9日和罗伯斯庇

尔在国民公会中说的最后几句话:"共和国灭亡了！匪徒的统治开始了！"当然,托洛茨基眼中的罗伯斯庇尔,只是他自己,差别仅仅在于,托洛茨基不能像罗伯斯庇尔那样指靠巴黎的无套裤汉即首都的平民。他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元帅"。党对他持敌对态度,对他的倾轧感到厌倦了。一切都完了。

这个战败的独裁者和党的领袖的候选人的内心对话大概是无地自容的:他托洛茨基,这个曾是芸芸众生的偶像在慌乱中思量着,怎么会低估了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塞梯人?他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他曾不得已与之联盟的季诺维也夫这个永远狡猾的家伙在最近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的几句话:

> 如果您的骨骼在我们粗大的手掌中嘎叭作响，这能怪我们吗?

这与勃洛克有什么关系？当他托洛茨基受了致命一击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对这一切是什么态度?！战败的"托洛茨基元帅"(列·克拉辛在国内战争年代曾这样讽刺地称呼他)忧思万千,当列宁还在世时,他错过了自己的机会。但是,难道他能推测出这个当时不大显眼的人会当众侮辱他吗?

在国外,托洛茨基将能读到侨民埃萨德·别亚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将这样描述"两位杰出"领袖的对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是共产党内对立的两极。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托洛茨基是一个杰出的欧洲人,一个有经验的、虚荣心很强的新闻记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没有幻想,没有个人要求,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静的、阴沉的头脑,——这两人必定要互相仇视。斯大林只要看到托洛茨基的形体就觉得讨厌,而托洛茨基仅仅看到斯大林的外貌和他那不平的麻脸就感到憎恶。"[⑩]这位侨民至死再没有补充什么。

在1927年的十月全会上,托洛茨基以党的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作了最后一次演讲。讲话语无伦次,但充满激情。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当时他曾想但却没能彻底提醒"瞎子们":"斯大林的胜利长不了,他的制度将会突然垮台。暂时的胜利者过分依靠暴力。你们可以开除我们,但是

你们防止不住我们的胜利。"托洛茨基躬着腰站在讲台上,急匆匆地念着发言稿(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常常轻蔑地把斯大林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称作"照写好的字条讲话的人"),尽力提高嗓音来盖过会场里的喧哗声。他的讲话不时被"诬蔑"、"造谣"、"胡说"的喊声所打断,有人呼喊:"打倒派别活动者!……"人们很难听清他在讲些什么。托洛茨基恨不得一口气说出所写的一切:党内的革命因素被削弱,机会的淫威、"当权集团"的建立将把国家和党导向热月政变的重演……讲话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没有明确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点,当然他的讲话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中央领导的憎恶和对斯大林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既没有得到全会参加者的响应,也没有得到有机会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的争论专页上读到托洛茨基讲话的共产党员的响应。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举行游行示威的尝试是一种挑战,这却导致了他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的亲信决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应当单独列队去游行示威。他们打出只有知情的人才能理解其反对派涵义的口号:"打倒富农、耐普曼和官僚!""打倒机会主义!""执行列宁的遗嘱!""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统一!"。他们企图打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肖像。但是斯大林已预先采取了"应有的"措施,民警驱散了这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专程去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和留在莫斯科(乘车巡视首都的市中心街道和广场)的托洛茨基认识到,跟着他们走的只是极少数人。这场游戏已彻底输了。党和工人阶级完全弃绝了反对派。托洛茨基可能会回忆起,10年前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片欢呼声中对走出会场的马尔托夫说过这么一句话:"您的位置在历史的垃圾坑里!"现在,当他在革命广场上试图向走向红场的游行队伍呼吁时,却听到了对自己的同样的话语;还有人朝托洛茨基扔石头,击碎了汽车玻璃。他明白了,斯大林正在把他推进历史的污水沟里。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联共(布)。以后的事件发展更加迅速。

这位政治家的党内升迁光怪陆离,自1917年起平步青云,而10年之后又以惨败告败。托洛茨基再次企图公开诉诸群众是在他昔日的志同道合者越飞自杀之后。越飞过去是孟什维克,1917年同托洛茨基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候补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18年起从事外交工作，是托洛茨基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反对派分子。越飞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遗书。遗书表面上是谈他受的委屈，说这次党中央拒绝他公费出国治病，但是遗书的政治实质却完全不同。越飞写道，"政治局的书报检查制度"使人不能在书中讲出那些现在"占据高位"的冒牌领袖的真相。越飞写道，我不怀疑，我的死"是一个"坚信您，列夫·达维多维奇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的"战士的抗议"。"……您在政治上向来是正确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越飞断言："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说，1905年不是他而是您正确。人在临死前是不撒谎的，因此我现在把这再给您说一遍……您的正确性获得胜利的保障正是您的毫不退让、极为直爽、毫不妥协……"遗书开始到处流传，给传播谣言的人提供了口实。根据中央决定，《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第23—24期)发表了这封遗书，同时发表了叶梅·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文章《颓废心理的哲学》，其中提供材料说，越飞曾定期地多次公费去国外治病。遗书的实质在于，越飞认为，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会成为一种推动力，它将使党觉醒并阻止它走上热月政变的道路。

许多托洛茨基分子、青年参加了越飞的葬礼，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志同道合者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是托洛茨基在苏联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和反对派的最后一次公开示威。但是，这些讲话已经产生不了被粉碎的反对派所期望的那种共鸣。他们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支持者的领袖、没有军队的统帅。

托洛茨基被打倒了，但是并没有屈服。斯大林在寻找孤立自己深恶痛绝的竞争者的方式方法。他在庆祝胜利，但他感到斗争并未结束。斯大林在一些机关的会议上指示要"注视托洛茨基分子"，"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影响"，"在政治上彻底打垮他们"。逮捕和流放开始了。三年前还相信自己最终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的托洛茨基变成了被彻底推翻的领袖。他的行动纲领尽管有一些正确思想，但掩盖不住其主要的东西：托洛茨基逐渐把自己的全部斗争归结为反斯大林的斗争。但是，总书记的地位已经巩固。许多人慢慢明白了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失去了领导党的机会。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就劝他悔过认

罪。但是,应当指出:不论人们如何谈论和描写托洛茨基,他生活在现在,却总是透过未来的棱镜来看待自己。他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甚至可以说徒务虚名的人,经常思虑历史学家在为了未来的历史判决而牺牲现在的成就的情况下将如何评价他。

托洛茨基的两个家的成员都吃尽了苦头。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妻子亚历山大·利沃芙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和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以及两个女婿),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托洛茨基早在1902年他的小女儿出世刚三个多月就离开了第一个家。起初他曾从国外给索科洛夫斯卡娅写信,可是后来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新家庭的建立,索科洛夫斯卡娅带着两个女儿,用他的话说,退到"一去不复返的地方"去了。不错,托洛茨基知道历史学家不会忘记他有前妻,1929年他在自己的第一卷回忆录中写道:"生活使我们离异,却保留着我们牢固的思想联系和友谊。"两个女儿在革命后沾了父亲的荣耀之光,但几年之后却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托洛茨基第一个家庭的命运后来很悲惨。不仅由于政治上的异端,而且由于是"敌人的家属"(30年代有一种提法:"出身不好的社会危险分子"),斯大林使这个家庭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托洛茨基和女儿在一起

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谢多娃起初也是"革命者"。有一段时间他们化名维肯季耶夫住在彼得堡。谢多娃后来一直同丈夫生活在一起,既与托洛茨基分享革命和内战年代他平步青云的荣光,也共尝在异国他乡无尽头的飘泊之苦。然而,应该指出,托洛茨基的父母非常富有,因此在1917年之前,他没有像其他俄国侨民那样受过苦。

托洛茨基第二次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列夫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是一个积极的托派分子,在父亲被驱逐后,他神秘地死于巴黎,死时还很年轻。幼子谢尔盖在托洛茨基一家还住在克里姆林宫时就离

开了家，宣称他“厌恶政治”；他没有入团，只埋头于科学研究。谢尔盖拒绝与父亲一起流亡，但是，他作为托洛茨基的儿子，后来自然逃脱不了注定的命运。1937年1月，《真理报》载文说：“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此时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谢尔盖·谢多夫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在机器制造厂锻造车间的群众大会上，工人师傅列别杰夫说：“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在我们这里当工程师，这个无愧于自己的卖身投靠法西斯的父亲的孽种企图用发生炉煤气毒死厂里大批工人。”会上还提到了季诺维也夫的侄子扎克斯、他们的“保护人”——厂长苏博京……这种指责已决定了这些人的命运。

托洛茨基一家的悲剧（所有子女最后都由于卷入他们的父亲同斯大林斗争的血腥漩涡死去了），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给这位流亡者增添了蒙难者的光环。纳塔利娅·谢多娃比她丈夫和她丈夫的“形影不离的敌人”斯大林寿长，她活到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时。

“为了名垂青史”，总书记起先也曾公开指示，“不要触动托洛茨基的亲属”，但是他们的命运都很苦。只有托洛茨基的几个远亲幸免于难。他们现在住在莫斯科，我曾有机会见到他们。当然，他们都改姓别的姓了。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政治失败具有浓厚的个人悲剧色彩。后来，在他被驱逐出苏联之后，他的家庭也遭到了这种不幸。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许多书中（他在流亡期间还写了约15本书）经常地，特别是在被害前夕，谈论个人的命运。《俄国革命史》（三卷本）、《以后会怎样？》、《被隐瞒的列宁遗嘱》、《他们和我们的教训》、《流亡日记》、《我的生平》、《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和其他一些书都带有悲剧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痕迹。人们如果不谈托洛茨基、写托洛茨基、争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简直就活不下去了。名望、声誉、荣誉对托洛茨基来说比面包更重要。他过去的志同道合者孟什维克分子常常“刺激”这位被推翻的领袖。有个叫Д·多林的人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在《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写道：

“托洛茨基竭力想使自己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写着大部头的书和小块文章，出版内部通报，用各种语言变着说法讲述同一些内容：斯大林的奸诈、背叛中国革命、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温情与喜爱。但是，人们却不受感动，时间愈久，对托洛茨基的回忆和

谈论愈少。"[60]托洛茨基读到这些话时已经是在王子群岛上了……

政治局几次讨论如何处置托洛茨基的问题。托洛茨基不单是继续激发反党情绪，而且实质上已开始激发反苏情绪。政治局终于得出结论：必须把托洛茨基逐出莫斯科。起初，这位反对派领袖被强行迁出克里姆林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及其他过去的领导人也被迁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向下次代表大会悔过。他们多次对托洛茨基说："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现在应该有勇气认输了。"这盘棋已经彻底输了，但是他们还试图抓住列车的踏板不掉下去。不久，决定将托洛茨基送往阿拉木图。根据一些材料，布哈林受命领导了放逐工作。

出发那天，这位失宠领袖的拥护者进行了抗议活动。托洛茨基拒绝自己走上汽车，他是被抬上去的，上火车时也是如此。他的大儿子不停地叫喊着："同志们，你们看哪，他们抬着托洛茨基！"请看托洛茨基的妻子是如何带着明显的渲染、夸张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个时刻的："车站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人们等待着，呼喊着：'托洛茨基万岁！'但却不见托洛茨基的影子，他在哪里呢？在指定给我们的车厢前围着沸腾的人群。年轻的朋友在车厢顶上竖起了列·达的巨幅肖像。托洛茨基来到时，人们热烈欢呼'乌拉'。火车启动了。震动了一下，又一下……火车向前移动了，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者跑到机车前面，抓住车厢，使火车停了下来，他们要求见托洛茨基。人群中在传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悄悄地把列·达押解到车厢里并阻止他同欢送者见面了。车站上的动人情景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人们同民警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探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人被逮捕。"[61]

斯大林当时在克里姆林宫里紧张地注视着放逐托洛茨基的过程。经常有人给他打电话汇报，总书记一声不响地听着，最后只简单地说："不要姑息养奸！不能作任何让步！除掉托洛茨基的助手！要迅速，不要磨蹭！"

说完之后，他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紧张地思考着什么问题。几年之后，斯大林在别墅里同他的战友们讨论完新收到的关于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最近一次演讲的情报后，他坐在桌旁说：

"当时我们犯了两个错误。应当一直把他留在阿拉木图……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放他出国……还有，怎么会允许他带走那么多文件呢？"

而所有这一切以后到30年代都会得到说明。


1928 年，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儿子流亡在阿拉木图

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继续进行政治活动。据他自己写的材料，流放期间他每月要给各地发几百封信和电报，交流情况，竭力使日益微弱的派别斗争之火不致熄灭。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同自己的战友们一直保持着秘密通信联系。他的大儿子在笔记中披露了通信范围。“1928年4—10月，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了800封政治信件……拍了约550封电报。收到1000多封长短不一的政治信件和大约700封电报……”[66]此外，还有专门传递的秘密信件。托洛茨基企图使反对派力量活跃起来，失宠领袖的作用使托洛茨基具有某些精神上的优越性。对这位反对派领袖的流放既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也没有使他放弃引发党内动荡的企图。在观察力敏锐的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成了热月灾难和未来一切不幸的化身，失宠的领袖和破产的领导人在这一点上倒是离真理不远。

一年之后，1929年1月，政治局经过长时间讨论，比较了各种方案，最后决定把托洛茨基夫妇及其长子列夫通过敖德萨逐往君士坦丁堡。托洛茨基在1929年2月12日乘“伊里奇”号轮船驶往君士坦丁堡时，决定要引起世界舆论对自己的注意。他在给土耳其总统基马尔的声明中说：

阁下，在我跨进君士坦丁堡的城门时，我有幸通知您，我来到土耳其国境决不是出于我的选择，我是被强制通过这里的。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67]

不久，破产的元帅、世界革命的“元帅”开始了自己的“旅行”。他先后到过许多国家，最后落脚于墨西哥。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斗争最积极

的十年开始了，现在他不仅反对斯大林，有时也自主不自主地反对他曾在初期积极帮助建立和捍卫过的国家。

托洛茨基的个人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最终把个人的自尊心放在首位。列宁所说的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终于又表现出来了。"两位杰出领袖"之间尖锐的个人斗争加快了结局。出众的才智和世界观上的软弱"结晶"，加上虚荣心极强的性格，把托洛茨基逐渐推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死敌阵营。个人厌恶，甚至对斯大林的仇恨常常使托洛茨基在评价那些他自己不久前还大肆宣扬的思想和价值时失去了起码的正派。

刚一到君士坦丁堡铅色的二月停泊场，托洛茨基就交给资产阶级报刊一本收入了他六篇文章的文集，题为《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的？》。其中一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可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反动的臆造，"是打着革命国际主义旗号的一种极其罪恶的大阴谋"，这种"理论"的根据是行政的而不是科学的[69]。可是仅仅在一年至一年半前，托洛茨基还试图掩饰这种说法。两星期后，斯大林从他的助手送来的早班邮件中读到这几句话后，说道："这个卑鄙的家伙终于撕下了伪装。"

托洛茨基在国外仍竭力设法企图保持"革命者的名声"。他继续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常常不惜伪造篡改、牵强附会、造谣诽谤，其目的只有一个：更痛地刺伤斯大林，伪造自己的历史，似乎列宁曾想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斯大林违背领袖的意愿，背信弃义地对此加以阻挠。不能不承认，托洛茨基先于许多人看透了斯大林，他没有向斯大林屈服。但是，在同斯大林斗争的时候，托洛茨基却附带地认为可以侮辱全体人民；他在自己的第20卷文集中竟然用挖苦的词句来对待俄国人民。在他看来，"从来没有一个俄国国务活动家不是平庸地模仿阿尔瓦公爵、梅特涅或俾斯麦的"。至于科学、哲学、社会学，"俄国献给世界的整整是个零……"我认为，这些反斯拉夫主义的但实质上是沙文主义的说法可以加深人们了解这个曾武断地认定他在历史上应当只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人的政治面貌。托洛茨基在国外自称是一个没有签证可以通行全球的人。他仍旧想扮演"第二天才"的角色。他写道："列宁是人们用加了铅封的货车经过德国接来参加革命的，而我是不由自主地用'伊里奇'号轮船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因此，我不认为对我的

放逐就是历史的最后结论。"他指望着回国，但是这已注定不能实现。一位"杰出领袖"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门之外。

总书记的"个人生活"

一个在本国同胞和自己的同志众目睽睽之下的人，能不能有"个人生活"？不过斯大林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到20年代末报纸上都很少提到他。不错，各省委每月都能收到不止一份带有"约·斯大林"字样的简洁签署的指令、指示和通令。那时人们还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公开批评他。例如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1—12期上刊登过一篇M·谢米奇的文章，他表示不同意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当时这还是正常的事情。1926年初《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刊登了弗拉·索林的反驳意见，索林不同意斯大林对他在党和阶级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评价。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的斯大林的回答，实际上对索林表示了歉意。这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十月革命以后社会前进的惯性还很大，列宁所精心培育的民主的幼芽还没有被压倒。无论是认识斯大林的人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觉得斯大林是个普通的人。这样一个普通的个人应当有自己的普通的个人生活，所谓个人生活当然是指除了公务、工作之外剩下来的个人的全部生活。对于从政治上刻画斯大林来说，这方面并不是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但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的性格。

我有机会同许多见到过和了解斯大林的人谈话，可以说都是在"家庭气氛"中谈的，其中有医生、保卫人员、书记处工作人员、作家、军事首长，以及多少与他接触过的其他一些人。我要马上说，除了极少数例外，总书记的"个人生活"仍然是工作。对他来说，不存在假日，他的作息时间很少变化，不管星期一还是星期天都是一样。晚年的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流逝的岁月、不断的工作和非凡的荣誉使斯大林开始弯下身来。他不常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去，而是连续在别墅工作。在这里举行很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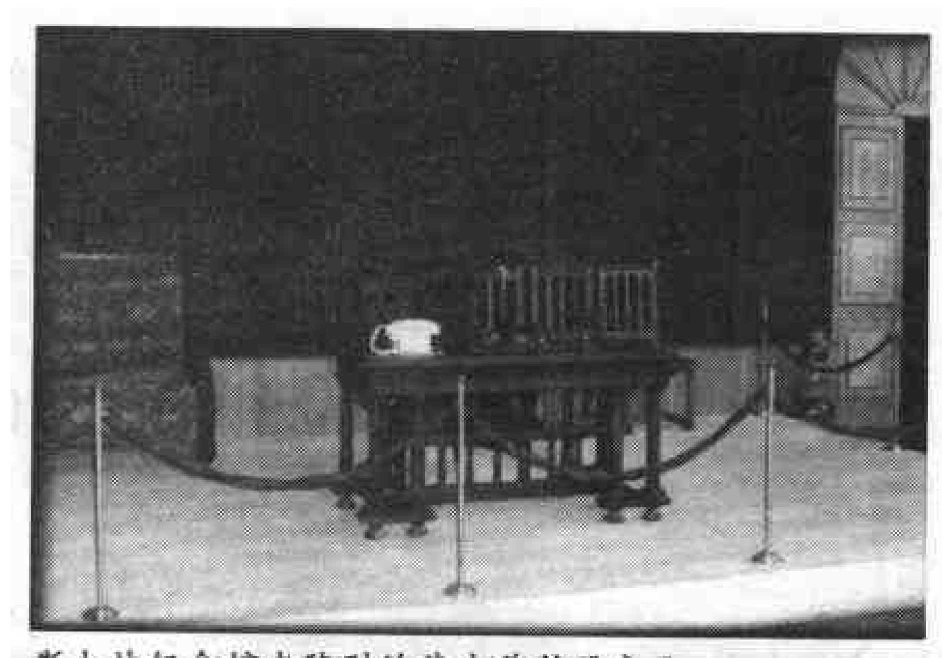
接见部长和军队的首长们，会见外国客人；在这里他偶尔到林园走走，感受一点夜间的新鲜气息。

工作起来没有假日，这种习惯是在革命后的艰苦年代中养成的。我面前有罗夫诺和居林两同志给列宁的一封便函，他们请求接见他们，谈一谈卡累利阿问题。便函由人民委员会转给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在便函上的批示写得很简洁："我可以于星期日3时30分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接见。斯大林。1922年2月4日。"在斯大林的文件库中有大量其他这样的证明（便函、命令、电话记录等等），都说明这个人没有"假日"这个概念。当然，有时候星期日斯大林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被邀请来的人过了半夜还坐在餐桌旁。不过，坐在那儿是在讨论（表面上看来是"自由"讨论）党和国家面临的无数迫切问题。

在20年代领导人生活得都很俭朴。根据列宁的命令斯大林得到一套不大的住宅，他开始时就住在那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封卢那察尔斯基1921年11月18日的信，信中建议为斯大林找到更方便的住宅。列宁看过信之后，给警卫队长阿·雅·别连基送去一个便条：

"别连基同志，对我来说这是件新鲜事。不能找到别的什么地方吗？列宁。阅后退回。"[⑩]

除这个便条之外，还有列宁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的一封短信，信中要求尽快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提供一套住房，并通过电报报告执行情况。很快就给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选好一套住房，旧时代这里是仆人住的地方。这所住房很少见到房主人，他在很晚或者深夜时才回来，并且一大早就去上班。生活是朴素的：家具是原来剩下的，地板是磨坏了的，窗子很小。20年代初，斯大林搬到祖巴洛沃的



斯大林纪念馆内陈列的其生前所用家具

别墅去了，后来在30年代初搬到了孔策沃。根据他的命令，别墅一直在翻修。在晚年，挨着那栋大房屋盖了一座不大的木房，他搬了进去。过去著名的党和国家活动家亚·尼·谢列平告诉我说："斯大林死后，人们登记总书记的财产时发现，这件工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贵重的东西，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摆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的纸印复制品。在客厅的中心部位挂了一幅玛·伊·乌里扬诺娃1922年9月在哥尔克拍的放大的照片，上面有列宁和斯大林。"（顺便提一下，这就是那张现在人们突然齐声宣布是伪造的、剪接的照片。——本书作者注）

"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斯大林睡觉时盖的是战士们用的被子。除一身元帅服之外，穿的东西中有两套普通衣服（一套是帆布服），一双绱了鞋底的毡靴和一件农民穿的皮袄……"是的，正像我已讲过的，这种清心寡欲的景象是表面的现象。"主人"在莫斯科郊区和南方拥有几所别墅，还有许多服务人员。他的任何要求都可立即得到满足。不过，斯大林要尽量做得突出自己生活上的俭朴。

关于总书记的别墅再讲几句。在办公室的一个大写字台旁边有一把沙发转椅。服务人员说，斯大林工作劳累了就把沙发椅转向窗子，很长时间默默地望着林园。斯大林不喜欢浓密的树林。斯大林的保卫人员A·T·雷宾告诉我，每逢春天总书记都亲自指出哪些树需要锯掉。现在保存有一张照片，已经有点驼背的斯大林拉着女儿的手站在那里，一个"服务"人员正按照"主人"的指示用斧子在准备砍掉的树上作记号。在暂时还立在那里但注定要被砍掉的那些树木的背景上，是"领袖"背对着镜头的身影……我们知道，斯大林喜欢"疏剪"的不仅仅是树木……


斯大林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

总书记不喜欢任何进口的东西，他对外国东西的恶感，对西欧的东西的恶感也用到


克里姆林宫

生活中来了。许多年来他都在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的俭朴”,虽然斯大林的整个一生表明,一个人的政治和精神参数同他对待生活、财富、物质的态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切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斯大林只不过是善于“突出”主要的东西,而他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权力。权力是目的,是手段,是永久的财富。给这种权力镶上日常生活的“边”,对斯大林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在1938年,给他在克里姆林宫“挑选”了另外一所住宅。这所住宅在卡扎科夫18世纪为参议院所建筑的一幢辉煌的建筑物中。斯大林的住房在二楼,占用了差不多整个一层楼。有客人的住房、保卫人员的住房,以及会客室。上面一层是办公的地方。窗子很华丽,天花板很高,楼梯很陡。不过,斯大林几乎没有在这里住过,他更喜欢近处的一所别墅。远处还有一所别墅,他也没有住过。

贝利亚作为对斯大林70寿辰的献礼,在莫斯科郊区一个水库边上盖了一所别墅,并说服“领袖”去看看。年老的“领袖”作了让步,去看了。一所漂亮的住宅隐隐地出现在高耸的松、杉林中。

“这是弄的什么圈套?”斯大林怀疑地顺口问了贝利亚一句。他连外衣也没脱,到各个房间走走,围着整个宅子转了一圈,看了看陪同他的人们,默默地上了汽车走了。他以后再也没到那里去过。在晚年要改变习惯和爱好是困难的。这些习惯和爱好仿佛是隐身的引路人把一个人引上人们走过的那些小路,同时它们本身则变成每一个人的神秘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书记的生活方式是不利于健康的。还在20年代他就愿意在夜里工作。他吸烟很多。在死前一年(或者不到一年),斯大林戒了烟,他对此感到自豪。

斯大林平时喜欢在饭前稍许喝点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他很少闲散。他没有那种他所说的“贵族习惯”:花很长时间去打猎和钓鱼。记得赫尔岑在讲到人生目的时,他认为这种目的就在于人的多方面发展;正像他对尼·普·奥格辽夫所写的那样,人要善于“全面生活”。而斯大林的生活只是“单方面的”。工作,事业,工作,事业,就其复杂性和规模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他变成了自己的职务的奴隶。

斯大林周围的人回忆说,在他偶尔去林园散步时,他们看到,他那微微驼背的身影在沥青小路上绕一两圈,然后在一个花坛或丁香树丛旁边站住不动。他好像在欣赏大自然那永具魅力的奇景,实际上是在考虑事情。每个人的联想、思想、考虑都是与什么东西有所联系的。许多人看到无际的天空和彩云,看到林中营火神奇的目光或者嗅到大海的气息时,他们便会产生对生活对良心和自己的想象。斯大林在索契时,喜欢站在岸边,倾听波浪拍岸时卵石滚动的声音。大海在他面前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奇异的生物,它既不知道痛苦,也不知道快乐,它不为过去苦恼,也不为将来操心……斯大林露出一丝微笑,瞧着这繁茂的丁香树丛,把大自然的永恒秩序同自己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较:“一切都如过眼云烟……”


刚刚阅完公文的斯大林

他刚刚阅过伏罗希洛夫送来的公文。要处理的事真是无所不有:有的要求批准免除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的军事集训,有的建议给工农红军盖新房,有的报告皮毕苏斯基*的讲话,有的传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的消息,有的报告第26骑兵团团长来信谈到与特派代表戈斯廷采夫之间的误会,还有伊林同志来信谈

* 波兰法西斯独裁者,1918—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6年起任国防部长和总理。
——译者

到有必要扩大飞艇制造业，以及正在建设的新国防项目的情况，等等。而他今天口述了多少份电报啊！最后一份他现在还逐字逐句地记得：

> 梁赞省，萨索夫斯基区书记，普罗相内耶·波利亚内村。
>
> 收到女教师施林斯卡娅拍来的一份电报。要保护一个鞑靼族学校的女教师，不使她遭受卡多姆区执行委员会特派员伊万诺夫的不必要的粗暴对待，他以没收父亲财产为名闯入住宅，并要求交出一个谁也不需要的柜子，妨碍他人安静地工作，迫使别人产生自杀的念头。
>
> 请立即加以干涉，阻止对施林斯卡娅采取任何暴力，并把结果报告中央（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
>
>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20]

每一个文件、每一份电报、每一个报告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关系到许多人的命运。明天托夫斯图哈又会悄悄送来多少这样的文件呢？每天都是这样……

逐渐地这一切工作都由助理人员、秘书、机关来办理了，但是斯大林直到生命的结束都常常喜欢亲自处理一些细小的问题，解决个别一些人的命运问题，特别是同任命、同某些人的"一意孤行"、异端思想或固执己见有关的问题。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活动中的威望越高，许多人便越热心地把很多问题报告上来"让他个人来解决"……关于拖拉机手问题，关于他们应征入伍问题，难道人民委员本人不能解决吗？在首都盖新房的问题，难道他们不能自己解决吗？一个叫施林斯卡娅的女教师的遭遇，难道一位当地的书记不能关心吗？不过在斯大林身上却隐隐地加强了一种胜利者的念头：他们不能没有我，……我能办到一切……也许所有最高领导者的命运都是这样吧！

斯大林隐隐地感到，束缚在复杂的官僚式礼节框框内的日益加强的集中化，会使他成为这种管理制度的俘虏，这可能会阻碍事业的发展，会毁掉事业。为什么还要设立各个人民委员部，它们的灵活性又到哪里去了？众多的全国性主管部门、"办事机构"，在解决什么问题？他明白这一点，但不想改变，因为如果把独揽的大权"分开"，就不成其为

独揽大权了。逐渐地,一切事情都堆在他身上了。源源而来的建议是付诸实施还是被一道否定和拒绝的大坝挡住,一切都取决于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他周围的一些人。

斯大林关心的是今天的事情,有时也回顾一下不久的过去,展望一下明天。完全像塞涅卡*致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未来和过去都在折磨着我们。我们的很多财富都对我们有害,例如,记忆可以使我们想起经受过的可怕的痛苦,而预见却可以使我们去想到未来的痛苦。谁也不会仅仅因为现在的原因而不幸。"[⑦]斯大林考虑过这些话没有?未必考虑过。他没有读过塞涅卡的书。在他的藏书里没有古代思想家的书。今天的事务把总书记紧紧地抱住不放。斯大林认为,对未来,不应当去预料,而应当去创造。这不符合他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上所确定的方针。



塞涅卡

*塞涅卡(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作家。
——译者

**卢齐利乌斯,古罗马诗人,著有风俗诗《散谈集》。
——译者

也许他为一件事情牺牲过工作,那就是电影和戏剧。从20年代末开始,每周看一两次电影逐渐成为习惯,一般是在夜里12点以后。凡是群众开始谈论的影片,都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不大的放映厅里(后来是在他的别墅里)放映过。在一次接见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时,他顺口说出了一句话:"电影院不过是电影院,然而生活却使人们接受自己的法则。"斯大林一直承认电影中只有一种功能,即教育功能,而且在整个艺术中都是这样。

从20年代起,他的妻子开始使他接近戏剧。他并不经常和她一起到莫斯科各剧院去,但在她死后,剧院,具体地说,苏联大剧院,却牢牢地进入了他的生活。我想,大剧院的多数演出他都看过许多次。斯大林的一个卫士、后

来的国家模范大剧院管理主任A·T·雷宾告诉我说，50年代初，在患中风前夕斯大林曾看过《天鹅湖》，可能那是他看过的该剧第20次或第30次演出。通常他总是一个人到剧院去。剧场关灯之后他入座。坐在包厢的紧靠角落的地方。每当看过首演之后便向演员表示谢意，他甚至常常去看彩排。雷宾是这样回忆的。显然，除了喜欢那些理论上的公设以外，斯大林的思想素养也要求他去接近音乐。电影和戏剧大概是他生活中惟一的“抒情的插笔”，他的生活完全用在了培植个人权力和独断专行地解决大量事务方面。这种只从上面由个人参加解决一切稍许重大一点问题的做法，逐渐打下了官僚主义的基础。他在讲话时下意识地责骂官僚主义，面实际上每天都在培植和顽固地加强官僚主义。

当然，个人生活总是指家庭生活。正如我已指出的，阿利卢耶娃比丈夫小22岁，实际上她是由一个中学生立刻成为了党的一位领导者的妻子的。一些文件，一些人的证明，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证明，都说明阿利卢耶娃虽然年轻，却具有完整的性格。她后来加人了党，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过，也曾学习过。她还在哥尔克村列宁那里当过值班秘书。顺便提一句，当提出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问题时，斯大林连岳父母也带去了。在克里姆林宫一所不大的宅子里两位老人同女儿和女婿一起生活了很久。

阿利卢耶娃很快就习惯了丈夫的那种无休止的开会、斗争和外出生活。看一看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文献就会知道，许多信件、命令、指示、电报不仅出自斯大林的助手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之手，如纳扎列江、托夫斯图哈、坎涅尔、梅赫利斯、德文斯基，而且出自阿利卢耶娃之手。她那昨天还是中学生的孩子般的大眼睛，贪婪地观察丈夫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没完没了的电话交谈、夜间开会、争论、摞成山一样的文件。她看到，丈夫是属于事业的，只属于



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是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女性

事业。开始时她还不明白,为什么她在他的生活中占那么小的位置。幸福的婚姻,是一个人通向另一个人的桥梁,他们在这架桥上一生不断地接触。斯大林却没有时间接触。当她指责他"你不关心家庭和孩子"时,他常常粗暴地打断她的话,有时还责骂她。阿利卢耶娃在交际方面的某些不足,由她的工作、学习和与丈夫战友们的妻子经常会晤弥补了,这些战友们的妻子是波丽娜·谢苗诺芙娜·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夫的妻子)、多拉·莫伊谢耶芙娜·哈赞(安德列耶夫的妻子)、玛丽亚·玛尔可芙娜·卡冈诺维奇、埃斯菲利·伊萨耶芙娜·古尔维奇(布哈林的第二个妻子)。

在20年代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先是在1921年生下瓦西里,过四年之后生了斯维特兰娜。后来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生的儿子雅可夫到他们这里来并住下。他只比后母小7岁,不过她喜欢这个不受父亲宠爱的青年。因为阿利卢耶娃在工作,孩子们都由保姆来照顾。无论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还是在祖巴洛沃的别墅里,总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亲属。除了岳父岳母,常来的人有阿利卢耶娃的弟兄费多尔和巴维尔、姐妹安娜和她的亲属。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亲属也常来这里。在30年代,妻子死了之后,他所不常看到的这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亲戚,明显地减少了,解体了:只有阿利卢耶娃的父母是正常地死去的,许多斯大林的亲戚都作为"人民的敌人"牺牲了。阿利卢耶娃的兄弟巴维尔曾有好几次想要同总书记谈谈许多次逮捕和镇压的错误,其中包括对亲属的逮捕和镇压,但都没有结果。不过这都发生在不幸的30年代。


阿利卢耶娃和女儿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自己不能,而且显然也不想认真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他甚至极少见到他们,那只是在有的星期天里,当他们被带到别墅去或者

在南方，才能见到他们，南方是战前总书记不止一次休息过的地方——索契、利瓦吉亚或穆哈拉特卡。这种情况并不是那么罕见，在一些历史上的大人物身边长大的孩子之所以身心不健全，就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是著名人物。孩子们很少了解他们的父亲，他没有用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据斯维特兰娜证实，瓦西里有一次对她讲了一个"秘密"，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格鲁吉亚人。"他孩子似地直接反映了父亲严重的俄罗斯化。


斯大林与次子瓦西里、女儿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的大儿子雅可夫的遭遇是最悲惨的。他与父亲很难处好关系。父亲认为他是个软弱的人，后来证明父亲的看法是错误的。斯大林不满意雅可夫选择的第一个妻子以及他选择的第二个妻子尤丽娅·伊萨可芙娜·梅利采尔。这两次婚姻给他留下两个孩子。据阿利卢耶娃回忆，雅可夫由于父亲对他的冷漠而陷人绝望，他甚至曾用枪自杀，幸好被子弹打穿受伤未死，但却病了好久。在出现这种父亲完全疏远儿子的极端表现之后，斯大林看到儿子时，只嘲笑地对着他随便说了一句：

"呵，没打中！"

所有的人，特别是阿利卢耶娃，都被斯大林的这种缺乏怜悯心的冰冷态度震惊了。不过政治上专制的君主，在家里也很难是别的样子。至于在同领导者们接触时，在接待代表团、在开会发言和与文化界人士交谈时，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这时斯大林能够迅速地变成另一副模样。我有一次在一本书中因为斯大林的这种本事而把他称作"伟大的演员"，我想我是不是无意中侮辱了这一古老而辉煌的职业？也许，为了这种迅速而蓄意改变形象的本领，可以把斯大林叫作"伟大的伪君子"吧？但是他在人前是这样，在家里却不是。在家里他就是他。

雅可夫取得父亲的同意，上完莫斯科的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在斯

大林工厂发电站工作(在用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企业内工作,一个人会有什么感觉呢?),后来他希望成为一名军人。根据斯大林助手们的安排,雅可夫·朱加施维里被吸收进工农红军炮兵学院的夜校,然后一下子就转到该炮兵学院第一系四年级学习。

在看了雅可夫·朱加施维里上尉的档案之后,我无意中(多少次了!)看到每个军官在写自传时所必须回答的一些问题。共有几十个问题,为了更全面地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精神"色彩",我从自传标准表格中摘引出两三个问题:

"曾否参加过托洛茨基派右派组织、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和其他反革命组织?在哪一年,在何地?"

"曾否脱离过党的总路线、曾否有过动摇?如有过动摇,是在什么问题上,动摇的时间有多长?"

"曾否在白军、侵略军和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部队(立宪会议派、彼得留拉分子、木沙瓦特分子、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马赫诺匪帮、安东诺夫匪帮等等)服务过,在何地、何时,担任什么职务,如何去的,什么时候去的,在哪一部分供职,多长时间?……"

当时就是这种时代……翻箱倒柜,把一切都要搞清楚的时代。人们可以随便吹毛求疵。而这种吹毛求疵可以成为致命的东西。

不过对雅可夫·朱加施维里没有吹毛求疵。但是,那时也有不少不拿自己良心作交易的人。例如,学院的军官伊万诺夫、科布里亚、季莫费耶夫、舍列梅托夫、诺维科夫(档案中没有名字的首字母)在斯大林儿子的鉴定和评语中,看来写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政治上的开展令人满意。遵守纪律,但对关于同长官关系的军事条令掌握不够。没有经过实践课训练。对战术射击训练了解得少。缺考的科目很多。国家考试得分是:及格和良。"这是为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的儿子所写的鉴定!虽然雅·朱加施维里的顶头上司建议任命他为炮兵营长并授予大尉军衔,但系主任舍列梅托夫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我同意这个鉴定,但认为,只有在指挥炮兵连队一年之后才能授予'大尉'军衔。"

在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雅可夫是个正派的、诚实的、腼腆的人,他仿佛完全被父亲的不友善的对待所"灼伤"。他很烦恼:"跳过"几个年级,学习得不大好,觉得自己对当指挥官没有信心。也许这对他在前线的遭遇,在关键时刻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不幸落入德军手中

战争刚一开始雅可夫就到了前线。据现有文献记载，他作战勇敢，直到最后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他所在的部队陷入重围，他被敌人俘虏。在德国的档案材料里有一张罕见的照片，上面一群希特勒的军官围着雅·朱加施维里大尉，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打量着斯大林的这位长子。这张照片上最有意思的是面部表情，是雅可夫的姿势：他紧握双拳，充满仇恨地看着敌人。法西斯企图利用雅可夫的被俘达到宣传目的，把印有雅可夫照片的传单到处散发，但是苏联人把这看成是伪造的。

与其说斯大林在为儿子的性命担忧，不如说是害怕儿子在集中营被摧毁意志，从而被迫与德国人共事。1985年巴塞罗那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回忆录中引用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后来这件事既没有人证实，也没有人否认。她写道，在1942年，一个专门小组被派去越过前线，其任务是搭救被俘的雅可夫·朱加施维里，当时他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专门小组中有一个西班牙人，叫何塞·帕洛·莫依索，他带了一些写有佛朗哥“蓝师”一位军官姓名的文件。但是那次行动失败了，小组人员牺牲了。[12]雅可夫的个人表现比他父亲所想象的要坚强得多。小朱加施维里也担心敌人会通过拷打、心理手段和利用特殊药物使他屈服，并让父亲和全国人民看着他成为叛徒。这个念头本身使他受不了，这比死还可怕。他在哈梅尔堡、吕布克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走过的一圈地狱，没有使他成为叛徒。但是力量耗尽了。1943年4月14日，雅可夫·朱加施维里向集中营围墙的带刺的铁丝网跑去，一名哨兵开枪打死了他。

斯大林在儿子身上犯了错误，如同他在许多人身上犯了错误一样。照斯维特兰娜的话说，她的父亲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后就曾无意中对她说过：

“德国人曾提出用雅沙*交换他们自己的人……我才不跟他们搞交易呢！不，战争就是战争。”

*雅可夫的小名。——译者

“领袖”的另一个儿子的命运也是悲惨的。父亲没能把他教育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聪明人。母亲死后，教育这个男孩的人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护卫长弗拉西克。但是，阿谀奉承、一切由我的环境，养成了一个任性而意志薄弱的人。诚然，他打仗打得不错，但也不是好到那样程度，以至于使一位刚参加战争时的大尉到1947年就成了中将。瓦西里·约瑟弗维奇·斯大林中将的档案十分雄辩地说明，“领袖”周围的一些人在干部问题上胡作非为，虽然一切都是在他的同意下干的。我只从厚厚的档案袋中简单摘录几个片断和事实：


1938 年瓦西里进入克恰航校

“20岁时，瓦·约·斯大林一下子就被授予上校军衔（1942年2月19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第01192号命令）。”

“24岁时，瓦·约·斯大林为空军少将（1946年3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一年之后成为中将。”

24 岁的空军中将瓦西里·斯大林



“虽然他还完全是个‘不成熟的’普通的飞行员，1941年却被任命为工农红军空军检查院院长。”

“1943年1月被任命为第32近卫歼击航空团团长；一年后先被任命为第3歼击航空师师长，1945年2月被任命为第286歼击航空师师长。1946年瓦·约·斯大林是军长，后来是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然后是司令员。真是神速的升迁，不过这不是建立在业绩和道义的基础上。

正如档案中他的上级所指出的，战争期间他完成了27次战斗飞行，击落一架ΦB—190型敌机；他荣获过两枚红旗勋章、一枚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一枚苏沃洛夫二级勋章和许多奖章。”

在给瓦·约·斯大林的鉴定书中，空军中将E·M·别列茨基和空军上将H·Φ·帕皮温这样写道：

“性情急躁易怒，缺乏自制力，发生过动手打部下的情况……在个人生活中有与航空师师长职位不相容的行为，在飞行人员晚会上有过不检点的举止，对一些军官态度粗暴，有过一次轻率行为：从机场乘坐拖拉机到希奥利艾市去，同内务人民委员部检查岗哨发生冲突和斗殴。健康情况差，特别是神经系统，极易生气；这影响到在最近时期的飞行业务中个人的练习不够，从而减弱了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这些缺点大大降低了他作为指挥官的威信，同他的航空师师长职位不相称。”

后来的一些鉴定也是这样的，但最后的结论都是：“希望派往学院去学习。”著名的将军谢·伊·鲁坚科和叶·雅·萨维茨基（后来都是元帅）那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使他们的下属兵团摆脱这位“轻佻的王子”。

有些好心人怀着个人目的，给了斯大林的儿子许多福利和官衔，使他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慢性酒精中毒患者。可以设想，这个正在慢慢堕落的人给他的许多妻子（至少有四个！）带来多么大的痛苦。他这个人本身是不怎么招人喜欢的。但从这个放纵的（也是不幸的！）人的例子中可以再次使人相信，滥用权力的行为会摧残周围的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专制的君主们取得了无上的统治权力，但死后却留下一些精神和肉体都十分软弱的孩子，他们在统治者尚在的时候



瓦西里和妻子加琳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在一起

就已在精神上被统治一切的不道德气氛所杀死。

有一些报告提到了瓦·约·斯大林的有损声誉的行为，之后他就失去了首都军区空军司令员的高位，并且一直滑了下去。在"领袖"死后21天，根据苏联国防部长第0726号命令，32岁的瓦·约·斯大林中将就被从军队中免职，不再有穿军装的权利……谁也不再关心他了，于是这位前空军飞行员瓦西里·约瑟弗维奇·斯大林还在年轻时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用酒精毁了自己。

关于瓦西里的事，亚·尼·谢列平给我讲过。"父亲死后，瓦西里被关进了监狱，因为人们想起了他的一些罪恶和舞弊行为。（虽然瓦·约·斯大林的女儿娜捷施达·瓦西里耶芙娜断定说没有进行过审讯。判了八年，事情算了结了。人们是想把一个到处说他父亲是被毒死的人尽快地藏匿起来。——本书作者注）赫鲁晓夫请求我到列福尔托沃去一趟，瓦西里从弗拉基米尔监狱被转到那里去了。他关在那里，在一台机床上做什么东西（'劳教'）。"谢列平接着说："有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他跪下了，哭着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再不给人找麻烦了……'我把这次见面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第二天瓦西里·斯大林被送到赫鲁晓夫面前，他又跪下，求饶，哭泣，发誓。赫鲁晓夫抱住瓦西里也哭了起来，他们谈他父亲谈了好长时间。这次见面之后，决定提前释放瓦西里。起草了一个决定，释放了。在离开时，人们坚持要他正式姓瓦西里耶夫。（战时的某些指示，最高统帅就是用这个姓签署的。——本书作者注）瓦西里·斯大林虽然软弱，但他坚决拒绝这样做。他回到家里，对女儿娜捷施达说，他想当一个'游泳池的经理'……但是老朋友们慢慢地又使瓦西里'返回'到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释放后一个月他就醉醺醺地开起了汽车，出了一次车祸。赫鲁晓夫骂了半天娘，他问道：

"'怎么办？送进监狱他会死在那儿。不送进去也是死。'

"决定流放。选好了一个地方——喀山。瓦西里在他的又一位妻子陪同下去'流放'了。住在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他有了可能回顾自己短短一生的浮沉。他在那里得到了他父亲的遗体1961年10月31日被从陵墓里移出的消息。坐牢，生病，酗酒，老'朋友们'的无情，使他变成了彻底的残废。"

“领袖”这个儿子的一生从微小处表明斯大林主义在道义上是不起作用的。他是在1962年3月19日死去的。墓碑上写的不是他活着时的姓——斯大林，也不是当局想把他变成的瓦西里耶夫，而是“献给朱加施维里的惟一的”。死者留下了七个孩子，四个自己的，三个收养的。

独裁者的一句话就可以做到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出一条大运河，盖起一座宫殿，使千百万人从“外面”搬进带刺的铁丝网里，可是这个独裁者在做父亲方面却是完全无能为力。对小儿子的这种不幸的下场，首先“领袖”自己应当负责。当写历史的人涉及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命运时，显然也会这样谴责他。他没有能够把女儿培养成为爱国者。她的命运的变化是尽人皆知的。



斯大林最喜欢女儿斯维特兰娜

显然，在她做学生的时候，斯大林喜欢她甚于喜欢儿子们。他常常给她写去使她感到温暖的便函（很难相信斯大林能够这样！），如同下面这样的：

> 向我的小女主人——谢坦卡（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致意！
>
> 你所有的信我都收到了。谢谢你写信来！我没有回信是因为太忙。过得怎么样，你的英语怎样了，身体如何？我健康，快活，像往常一样。看不到你，感到有些寂寞，但怎么办呢，我忍受着，亲吻我的小女主人。
>
> 1939年7月22日

战争使父亲和女儿分开了，而且是永远地分开了。再也没有过亲近，没有过家庭温暖。斯维特兰娜长大以后像所有她这样年龄的姑娘一样，经历着第一次感情上的迷恋。她的朋友，记者兼电影导演阿·雅·

卡普列尔被逮捕了，被判了五年，然后又判五年。阿列克谢·雅克夫列维奇从集中营写来了一封信：

>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
> 我被特别会议判了罪，说我有反苏维埃言论。我没有承认有这种言论，现在也不承认。我荣获过列宁勋章和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参加过摄制影片《她捍卫祖国》、《科托夫斯基》、《战争的一天》的工作。我只能承认我不谦虚。请允许我到前线去，我恳求您。
>
> **阿·卡普列尔**
>
> 1月27日

斯大林向贝利亚要卡普列尔的材料。人们向他报告说：

> 卡普列尔有个姐姐在法国。他同美国记者沙皮罗和柏克见过面。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但间谍情报揭穿了他……
>
> 1944年3月16日[3]

我们都记得，这样的"文件"斯大林是永远相信的。

斯维特兰娜两次嫁人都是不成功的，第三次也一样，他的丈夫是个外国人。他死在了莫斯科，由于葬礼的关系阿利卢耶娃在1966年到了国外，把死者的骨灰送回祖国。她在印度没有回来，去了西方，落人了那些利用她父亲的名声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们之手。但大概她没有表示反对。她的行动是自觉的。在这之前她是哲学副博士，40岁。她在她写的《仅仅一年》一书中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信自己正确。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潜力和能力折磨了我一生。我一直轻易地相信，我做的一切都不好，都错误。内心的束缚和拘谨妨碍了我同人们和群众的接触。我常常想躲开大家，紧紧闭上房门。这是长期过着受压抑的生活所产生的心理上的结果，是在不正常家庭中所受教育的结果，是长期生活在一个被奴役和沉默的社会里的结果。"[4]

斯维特兰娜在异邦消磨岁月，当中只有一个短时期的间断，她未必想过，她的残酷无情的姓"钢铁"的父亲(这个姓突出了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他遭受无数次逮捕的最艰难的年代，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当

驻外侨民，他也不同意过侨居生活。不过"钢铁"父亲的女儿再一次证实了一个真理：性格不能遗传，就如同信仰一样。它们是逐渐养成的。

当1984年11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恢复斯·约·阿利卢耶娃的苏联国籍和接受她的女儿O·B·皮特斯加入苏联国籍的命令时，看来这位"流浪的女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特别是斯大林的这位女儿在记者招待会上曾说："我陷入那个所谓的'自由世界'，自己并没有感到一天的自由。我落入了那些商人、律师、政客、出版商的手里，他们把我父亲的名字、我的名字和我的整个生活变成了轰动一时的商品……"

斯维特兰娜到底不能在祖国适应下来。她想生活在她所喜欢的地方。

今天很容易说这样的话：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如果阿利卢耶娃活着，"领袖"的孩子们可能不会长成这个样子。我现在掌握的材料说明，领袖的行为也是构成她死亡的间接的(不过，是间接的吗？)原因。在1932年11月8日至9日的夜间，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自杀了。采取这一悲惨步骤的直接原因看来是一次争吵，这次争吵周围的人稍有发现，那是发生在一次小型的节日晚会上。出席晚会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他们的妻子，还有总书记周围的其他一些人。斯大林再一次的粗暴举止使妻子的脆弱的性格忍受不住了。十月革命15周年蒙上了一层阴影。阿利卢耶娃回到自己的房间，开枪自杀了。管家卡罗琳娜·瓦西里耶芙娜·蒂尔早晨来叫醒阿利卢耶娃时，看到她已经死了。"瓦尔德"式手枪躺在地上。人们叫来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

有理由认为，死者留有遗书，但这我们只能猜测。世上现在和将来都永远会有一些不能被人们猜透的大大小小的秘密。我想，阿利卢耶娃之死不是偶然的。大概人身上最后死去的东西是希望。没有了希望，人也就没有了。信心和希望永远会使人的力量倍增。斯大林的妻子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当斯大林早晨得知这件事时非常震惊。不过这次他仍然忠实于自己的那条不道德的信念：他把阿利卢耶娃的行为不看成自己的罪过，而看成她对他的背叛。他显然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他的冷酷，他的缺乏温暖和关心，是多么残忍地伤害了妻子，因此在心情极度激动和沮丧

的时刻她决心走了这极端的一步。在追悼会上告别妻子之后斯大林没有去墓地。他周围的人很快又给他安排了一次婚事，对方是“领袖”的一个亲戚的亲戚。好像一切都已决定，但由于只有这位鳏夫才知道的原因，婚礼没有举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斯大林都是一个人生活，他把家里需要照顾自己的事都托给了那众多“服务人员”中的一个女管家。瓦连廷娜·瓦西里耶芙娜·伊斯托米娜担当起了经常照顾这位鳏夫的责任，在他到黑海沿岸去的时候她也陪着他。斯大林死的时候，伊斯托米娜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扑倒在已故“领袖”的怀里，大声地哭叫。显而易见，她对他要比各位战友对他更亲近些。



自杀身亡的斯大林妻子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的墓碑。这是由著名的工匠沙德尔在大理石上雕塑的肖像：柔和而安详开朗的面容，美丽的手以及外貌上那纤细的女性特征

斯大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表现出对妻子怀念的迹象。在餐厅，在他别墅的办公室，而且也在他的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都出现了阿利卢耶娃的照片。也许他在暮年良心觉醒了吧？当人们接近一个界限，再往前走就是虚无境地时，许多人就想作一些总结了。这方面最有权利的主人大凡就是良心。黑格尔给良心下的定义是“内心肯定善的过程”。我们现在知道，斯大林既没有善也没有良心。我再提出塞涅卡给卢齐利乌斯的信中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神圣的对象。”也许对于斯大林来说，有人在某些时候是神圣的？是第二个妻子吗？这很难相信……

毫无疑问，阿利卢耶娃是爱斯大林的，她

在他困难重重的岗位上竭尽一切力量帮助他。她关心丈夫,她像当时一般人惯常的做法那样,尽力不中断工作,在工业学院学习,照看孩子。她的亲戚证明,阿利卢耶娃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摧残。可能斯大林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但对事业、计划、工作、权力的迷恋,使他心里完全没有了妻子、孩子和亲属的地盘,在感情应该存在的地方是一些钢铁的心弦。他认为这是自然的。斯大林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看见一个亲属，不过问亲人们的自我感觉情况和健康情况。我已经说过,他的许多孙子他从未见到过,也没想过要见。例如,他第二个妻子的儿子瓦西里的孩子娜捷施达和亚历山大,由于高贵的亲属关系经受过不少痛苦的时刻,他们从未受到过他的注意,而作家们却对这样一个人编造神话说:“斯大林想着我们。”“想着”所有的人永远比想着具体的人简单。

他的第一个妻子的兄弟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瓦尼泽是同他很亲近的，但斯瓦尼泽被捕后斯大林甚至没有想一想，他一直从小就了解的一个人怎么能是“敌人”？在“领袖”的精神面貌的结构中有一系列的缺口和塌方。他的行为举止,他对周围的人和亲属的态度使人有理由认为，斯大林不知道什么是善行、怜悯、宽宏、同情、容忍、人道、悔悟、赎罪……这个人的一生在精神方面就是这样的，这只能根据斯大林的整个社会经历和心理状况才能理解和解释。


长大后的瓦西里、斯维特兰娜与父亲斯大林难得的一张合影

在斯大林的心灵中不可能找到和触碰到人的感情的音弦。大儿子的悲剧之所以使他不安，只是因为他担心损害他的名声。二儿子对他来说不过是个累赘。

除了责骂外他没有别的办法来阻止儿子堕落。女儿在婚姻一再失败之后，对他来说，立刻成为完全疏远的外人了。对孩子们他漠不关心，甚至对母亲他也没有关怀疼爱过……

我再说一遍，说明总书记的个人道德特征的这几页政治传记材料可能不是主要的。不过很有象征意义的是，斯大林自己就轻视道德和"道德说教"。对他来说，同道德相比，政治永远是宠儿。对于要弄清斯大林这样一个极复杂的人的个性的研究者来说，正是在这里揭开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秘密"。轻视全人类的道德价值，在他来说是很早就发生过了。他鄙视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对他来说，只有意志坚强的特性才是重要的。他的精神上的吝啬发展成极端的无情，乃至毫无怜悯之心，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命运被毁的代价。最可怕的是，斯大林在政治中也没有为道德的价值找到应有的位置。他认为，一道工作的人告发自己的同事是"人民的敌人"，那才是最高尚的行为。当贝利亚在"领袖"的同意下逮捕了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勃罗尼斯拉娃·索洛蒙诺芙娜时，不管丈夫如何恳求挽救妻子，正如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女儿加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所说，斯大林只有一个回答："这不取决于我，我无能为力。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这件事。"可笑地指控人们进行间谍活动，这已成为一种标准的公式。把这位可怜的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关了三年监狱之后枪毙了。可是要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都在斯大林身边连续工作14—16个小时，他送文件，准备材料，叫人，发布"领袖"的命令……加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逮捕是根据贝利亚的命令，而贝利亚当时甚至一直常来我们家。而且常来我们家的还有许多其他著名人物，像沙波什尼科夫、罗科索夫斯基、库兹涅佐夫、赫鲁晓夫、梅列茨科夫。斯大林本人也认识我母亲，他当然明白，指控进行间谍活动没有任何根据(母亲的一个兄弟到国外去取了一次医疗设备，这是指控的主要根据；当然，他后来也被枪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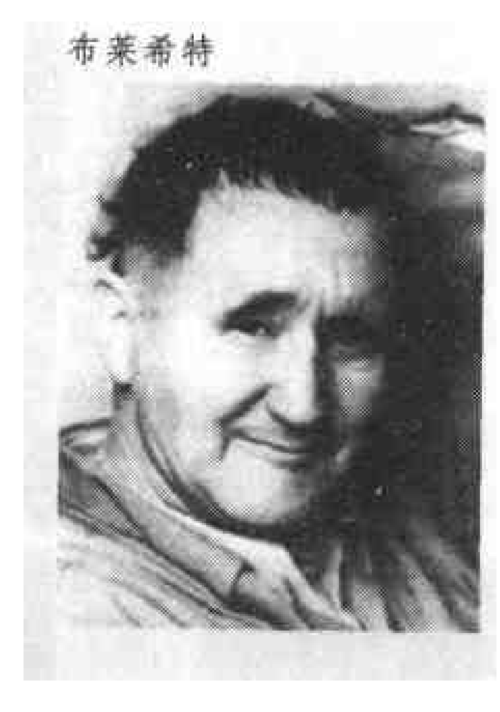
当我看到一些类似的事实时，我有一次产生了一个乍看起来很离奇的想法：斯大林逮捕亲人、亲戚、自己周围一些人的妻子，他是在考验他们的忠诚，考验他们的忠君的感情。加里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于自己家中发生的灾难都不露声色。斯大林在观察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不发怨言

看来感到满意。这种令人震惊的不道德的残酷的行为，也就是在为斯大林的极端不道德的历史作记录和为他画像。在这位伟大的伪君子的假面具后面没有任何神圣、高尚、正派的东西，他在酷似恐怖影片的生活中高超地扮演了许多角色。当斯大林温和地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这不取决于我，我无能为力。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这件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是相信了他的。而贝利亚说了什么呢，他不是一直常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家吗？他也是那么说的……这些人是在谎言、无耻和残忍中过活的。最悲惨的（这又是道德领域的问题！）是，他，斯大林的做法实际上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而问心无愧的机会永远都是存在的！甚至在难以相信的复杂情况之下……

不知为什么我们习惯于这样认为：人道主义、道德、一般人的道德准则，据说都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劝善范围的东西。可是道德的出现先于政治的、法律的、甚至宗教的意识。当人们最早产生对自觉交往的需要时，就产生了道德。离开了道德，人永远不能成其为人。贝托特·布莱希特*有一次很中肯地说：“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在这个意义上，具体的“个人生活”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个人身上的许多真正的方面。在斯大林那里，这些真正的方面是用又粗又黑的泡沫塑料吸水笔写出的。谁知道呢，也许正是在这方面潜伏着一个30年代被他的名声神圣化了的那些扭曲现象和罪行的深刻原因？也许我错了。时间会来纠正的。时间是任何传记的最好的编辑。特别是，我再重复一遍，我现

* 德国现代杰出剧作家。——译者

布莱希特



看来感到满意。这种令人震惊的不道德的残酷的行为，也就是在为斯大林的极端不道德的历史作记录和为他画像。在这位伟大的伪君子的假面具后面没有任何神圣、高尚、正派的东西，他在酷似恐怖影片的生活中高超地扮演了许多角色。当斯大林温和地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这不取决于我，我无能为力。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这件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是相信了他的。而贝利亚说了什么呢，他不是一直常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家吗？他也是那么说的……这些人是在谎言、无耻和残忍中过活的。最悲惨的（这又是道德领域的问题！）是，他，斯大林的做法实际上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而**问心无愧的机会**永远都是存在的！甚至在难以相信的复杂情况之下……

不知为什么我们习惯于这样认为：人道主义、道德、一般人的道德准则，据说都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劝善范围的东西。可是道德的出现先于政治的、法律的、甚至宗教的意识。当人们最早产生对自觉交往的需要时，就产生了道德。离开了道德，人永远不能成其为人。贝托特·布莱希特*有一次很中肯地说：“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在这个意义上，具体的“个人生活”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个人身上的许多真正的方面。在斯大林那里，这些真正的方面是用又粗又黑的泡沫塑料吸水笔写出的。谁知道呢，也许正是在这方面潜伏着一个30年代被他的名声神圣化了的那些扭曲现象和罪行的深刻原因？也许我错了。时间会来纠正的。时间是任何传记的最好的编辑。特别是，我再重复一遍，我现

* 德国现代杰出剧作家。——译者

布莱希特





第4章

是专政还是个人独裁？

啊，恶意的阿谀奉承，——在惬意的围捕中：你网中的捕获物总是满满的。

——欧里庇得斯

（古希腊悲剧诗人）

神是不计年龄的。今天谁会说:宙斯、阿弗洛狄忒、阿耳忒弥斯、帕拉斯、忒弥斯有多少岁数?显然,谁都不会说。在人们的想象中,神是永恒不变的。可这等于承认不可能的事——时间“停止不动”。也许它们之所以是神,正是因为它们凌驾于时间之上?人为了自己方便起见,把时间分成世纪、十年、年、月、日、时、分、秒……而时间是流动的,根本不注意这些瞬息即变的界线。对于不断奔驰的时间来说,这些界线没有任何意义。时间在地球上不曾有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流动的,时间也将从物质这个永恒之罐里永远这样“流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意识中,确实会有并会产生命运主宰时间的幻想。在纪念日和庆祝活动的时刻,人们最容易犯这个错误……

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满50岁。不,当时还没有人无休止地歌功颂德,还没有许许多多阿谀奉承者跪倒在“领袖”脚下,还没有把一切功劳都归到他一人身上。当时还没有出版成千页厚的一味吹捧他的宏篇巨著,还不会有数以万计的集体给他写祝贺信,还不会在所有的社论上以他的名字开头和以他的名字结束。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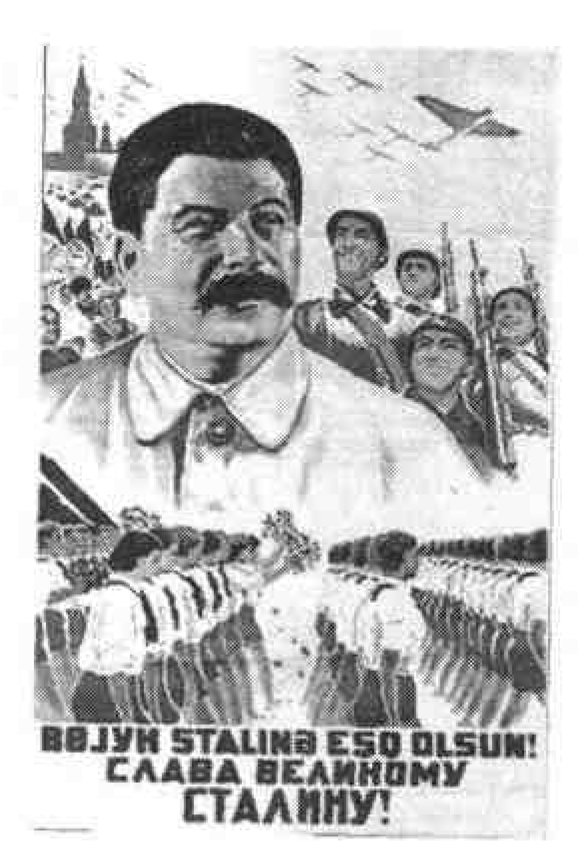
然而,《真理报》的“庆祝”专号当时已经用足足一半的篇幅来谈他了。其中有卡冈诺维奇的文章《斯大林和党》、奥尔忠尼启则的文章《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古比雪夫的文章《斯大林和国家工业化》、伏罗希洛夫的文章《斯大林和红军》、加里宁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舵手》、米高扬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党的钢铁战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文章。歌功颂德已经**开始了**。例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贺词说,它们向**最优秀的列宁主义者**(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致敬。专号用通栏黑体标题把斯大林称为“马克思和列宁的事业的忠实继承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等等。庆祝活动来得再凑巧不过了,因为庆祝活动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他身上,看到他正信心百倍地清算又一个反对派,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讲的又一种“倾向”。斯大林的声望开始



斯大林 50 寿辰 [illegible]

迅速提高。目光敏锐的人当时就已觉察到：到20年代末，即斯大林到50岁的时候，他已经格外自信，好用权势，作风武断。

我提醒一下他投身革命时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大起眼的执行者和普通工作人员，不仅善于等待时机，而且善于在完成列宁和党的任务时不吝惜自己（当然也不吝惜别人）。如今在50寿辰这一天，在接受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许许多多领导人的祝贺时，斯大林明显地感觉到，他在革命后的这12年内学会了（或者像他所说的，“已能熟练地”）主宰时间。这当然不是赫·威尔斯书中写的那个意思，而是说，他已经感觉到和理解到，应该在什么时机加速事态的发展进程，在什么时候给派别活动分子以惊人的打击，如何在工业化和刚起步的农业集体化的竞赛中利用时间因素。他觉得，他“催快了”时间的步伐。



斯大林时期的宣传画，把斯大林塑造成神人的形象，例如：人民慈父、列宁最忠实的学生和天才继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代最伟大的领袖等。斯大林这样做不是满足他的私欲，或许他已经把“巩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政权”和“巩固自己地位”划了等号。他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极度统一的社会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曾建议更加隆重地庆祝这位几乎已被所有的人承认了的“领袖”的寿辰。他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谦虚，只不过因为他对列宁的50寿辰还记忆犹新。他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每当需要作出原则性的抉择时，往往就想起了列宁对他——斯大林的评语。出自本心的抉择要求主体能够设身处地替他手下的人着想。列宁善于在思想上承认他人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战友也善于这样做。但是只有斯大林除外。甚至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设身处地替别人（例如替自己的受害者）着想，他的直线式

的思维方式不允许产生这样的矛盾冲突。然而斯大林善于克制自己，特别是在自己荣升的初期。因此，现在，值此寿辰前夕，列宁遏制住了他。暂时遏制住了他。


50寿辰时的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50寿辰那时是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举行庆祝的。诚然，受祝贺的本人没有在场。米雅斯尼科夫宣布庆祝晚会开始。加米涅夫作了长篇的但并不生动的发言，他强调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需要赞美词，而无产阶级也不习惯用言语、用庄严的颂歌来对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优秀同志表示尊敬"。接着他用很长的时间谈战争，说战争"把群众吊上了绞刑架"，还说列宁有资格被称为无产阶级大军的统帅，统帅无产阶级去战胜旧世界。高尔基讲了话，不知为什么他重复托洛茨基的一个说法，说在俄国历史上缺乏杰出人物……卢那察尔斯基的发言一如既往，新颖独特，热情奔放，他用双手比划着说，在列宁周围总是"吹拂着风，山巅的风"。无产阶级诗人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朗诵了诗篇，奥里明斯基谈到列宁的高尚的民主作风。斯大林当时觉得奥里明斯基说的如下两句话是完全不现实的："伊里奇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他的民主作风。列宁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斯大林记得，当听到"战争还没有过去，哪里谈得上民主"这两句话的时候，他很反感……难道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个主要问题?! 这时他听到米雅斯尼科夫请他——斯大林发言。他作过准备，本想找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后来突然决定在纪念列宁生日那天讲讲……列宁善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斯大林说，列宁本来赞成参加维特杜马的选举，但是后来公开向大家说他错了。斯大林用听不大


"列宁永远是我们的领袖"宣传画

清的声音念他的发言稿，说1917年也是这样，列宁在对待“预备议会”的态度上也错了，后来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斯大林在结束讲话时说：“列宁同志有时在重大问题上承认自己有缺点。这种朴实作风特别令我们敬佩。同志们，这就是我想同你们讲的一切。”听众对斯大林的5分钟发言报以稀疏的掌声，他们对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非祝贺性言辞感到有点莫名其妙，这时列宁突然进入了会场。

列宁的讲话简短、生动、易记。“首先，有两件事我自然要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今天对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让我免听祝词。”接着列宁说庆祝活动必须采用另一种祝贺方式，又谈起了党内状况。接受祝贺的人继续说，革命的成功和我们取得的胜利，使我们把今天应当解决的各个不同方面的任务暂时地搁下来了。……列宁说：“我们面临着极其繁重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比以往作出更大的努力。最后，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①]

为什么斯大林那时，在庆贺领袖生日的晚会上，决定指出列宁的“错误”？他现在已经回答不了了。要表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不是“驯服工具”？想冒尖？或者他知道，只要讲的是实情，列宁都不怕？关于这一切，只能作猜测。无论如何，提起这次发言，最初曾使斯大林本人感到尴尬。当中央党务档案馆馆长弗·阿多拉茨基请求斯大林同意把他在庆祝会上的发言收入《论列宁》文集时，斯大林拒绝了。信上的批示写得娓娓动听：

阿多拉茨基同志：

发言记录**实质上**是正确的，尽管还需要作文字修改。但我不想发表，因为谈伊里奇的错误叫人不痛快。

约·斯大林[②]

但是，后来，他那篇发言稿“作了文字修改”后收进了斯大林全集。很快他就不再感到尴尬，不再“假谦虚”，不再觉得问心有愧了。早在1925年初，他就同意莫洛托夫的建议，第一次让他的名字永垂不朽。这之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叶努基泽签署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其中提到：

察里津市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市；察里津省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省；察里津县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县；察里津乡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乡；察里津铁路站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站。[③]



黑格尔(1770–1831)
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

在国家制度方面，黑格尔主张限制王权，认为王权只是政治国家统一意志的象征，只能依法签署议会通过的决议。他对行政权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出行政权是执政权，应当掌握在为社会服务、与普遍利益相一致的等级手中。他反对封建的官职世袭制度，主张任用官吏应以才智为标准并向一切市民开放。他强调国家制度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反对机械的分权理论。他提出国家、民族要独立自主。影响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理论的终结，它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政治要求，他的整体国家观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这是1925年4月10日的事。列宁去世后才过了一年多。这是斯大林没有经受住的最早几次“良心考验”中的一次。不过，斯大林并没有由于“谦虚地”同意大批改名而感到丝毫不安。斯大林不喜欢黑格尔，因为就连他试图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目录”都没有成功。黑格尔写道，所谓良心，就是“在内心判明什么是善的过程”[④]。而在斯大林那里，人们称为良心的东西是被禁锢在内心之中的。他的良心已经永远失去了任何表现的机会。

早在1927年，各报就发表了署名“约·斯大林”的《给斯大林格勒〈斗争报〉的贺电》。很快这就成了一种规范。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当一个人拿着一份报纸（例如1927年3月3日的《真理报》），看到上面登着斯大林在斯大林十月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的时候，这个人会有何感受。你活着，而你的名字已经用来给一些州、市、区、企业、公园、报纸、军舰、文化宫命名了？这难道不是在追求永垂不朽么？

这就是幻想命运主宰时间的表现！你活着，但是你已经永垂不朽！斯大林已经知道，他将名垂千古。但是永垂不朽还不是永恒！

……这就是由于情况的巧合而成为一个泱泱农民大国的领袖的人。

农民的命运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1866–1946)
英国作家

少年时代的威尔斯是一个狂热的读书迷，长大后曾进入科学师范学校攻读生物学，老师赫胥黎是众所周知的"科学进化论"的强烈鼓吹者；后来威尔斯又进入一家新闻学院，毕业后成为记者，专门撰写有关科学方面的文章，并写过许多非小说类的科幻文章。在威尔斯的早期作品中比较注重进化论，十分重视人与一些奇异生物之间的斗争，同时充满了对现实社会中的伪善和不公平的痛恨，并具有很强的幻想性，为后来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星际战争》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赫伯特·威尔斯在自己写的文绉绉的政论体裁的访问记中描绘了"黑暗中"的俄罗斯，他没有夸大。俄罗斯给他的"印象是不可挽救的大破产"。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坐落着千千万万个村庄，一到晚上，这些村庄就陷入了永世的黑暗之中。就像100年、200年、300年前一样……

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农民中间有深刻的渊源。当记忆中出现童年时期的太阳黑斑时，你就会真的看到、感觉到、觉察到化雪的气味，落在栅栏上的红脖灰雀，河面上变黑了的冰层，南边那隐隐约约、起伏不平的萨彦岭山脉，村子里道路上雪橇滑木的吱吱声，还有早已去世的那些人的面孔……

对于自己的祖辈，我们至多只知道祖父和祖母。请试一试叫出你们的曾祖母和曾祖父的名字和父名吧？大概差不多都不记得了。时间使它们永远消失了。甚至想在脑海里重温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也越来越困难了。有时候想让自己祖上一辈的人都围坐在一张祖传的长桌旁。发黑的圣像就会看见坐在长凳上的农民。留着胡子的庄稼汉穿着粗麻布衬衣，他们都有一双毕生都在努力干活的人的粗糙的手掌，他们的妻子有一对善良而温顺的眼睛，40岁已成了老太婆，常常直接在田塍上生孩子；孩子们很多都是浅黄头发（只有一半能从婴儿

长成儿童)。在桌子旁边必定坐有一两位佩戴"乔治十字勋章",经历了土耳其战争、日本战争和德国战争的老人。把东正教、劳动、家庭和祖国看得高于一切的村社道德支配着这些不识字的人。也许在桌旁还可以看到一位一笔一划地写着"田地"两字的读书人。总之,庄稼汉、村妇、农民……他们今天留下来的仅仅是我们记忆里的东西,看来还在我们中间某些人身上留下了农民的习性:勤劳、节俭、轻信、乐于同全村人一起为某一家"帮忙"。

30年代初,我国同胞绝大部分都还生活在这个农民世界里。恰恰在这个世界里开展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就像一场得到上面批准的大血战。

诚然,农村中最初的激战是在把地主土地、皇室土地和寺院土地收归国有的过程中进行的。1918年中期成立的贫农委员会发动了向富农的进攻。富农的土地有半数以上被剥夺。被没收的机器和牲畜分给了中农和贫农。富农阶层人数减少了。农村中农化了。新经济政策给农村带来了在缴纳"固定税额"之后进行贸易的机会。还在列宁生前即1923年年底时,苏维埃俄罗斯就卖给其他国家约1.3亿普特小麦。那时候,购买粮食的想法本身看起来是一种很奇怪的、亵渎神明的想法……可是出售粮食是自然的想法和做法。

在恢复时期,国家的谷物经济略有提高,虽然还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谷物生产量整个说来是增长了,但国家得到的商品谷物却明显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收购价格低,没有给农村提供商品。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刚刚迈步。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对贫苦农户和中等农户的支持。当然,新经济政策也使富农农户活跃起来,促进了它们的发展。但是,它们对国家并无危害,国家政权的基础仍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理想理解为过穷日子和不愿富裕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只反对靠剥削他人劳动而致富。相当大的一部分富农是靠自己的劳动发家的。

列宁预见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会非常困难。但他相信用电力、拖拉机和书本进行的宣传!这位伟大的预言家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农民广泛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5]列宁在他晚期的一本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论点:"现在我们有理由说,

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6]不言而喻,在列宁的农业合作化计划中,实现这个计划的许多细节、阶段、特点都没有得到发挥。当然,这在1923年也不可能做到。

赋税的降低使中农和富农有可能多剩下一些农产品,首先是粮食。整个说来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但是,在这同时,国内商品奇缺的现象更严重了。因此很明显,农民不急于出卖粮食;他们需要的不是纸币,而是机器和其他工业品。而这些东西的价格都很高。城市的供应出现了困难。到1927年已经显露了粮食危机。富农和中农把持着粮食,等着卖高价和换取必需的商品。

反对派试图利用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日益增长的困难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责领导对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估计不足,实质上是要求对富农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还在更早的时候就从富农和中农手中强行没收1.5亿—2亿普特的粮食以补正常供应之不足。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准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明智地拒绝采纳这个办法。斯大林在给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讲了同样的意思:"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有效的。我们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7]谁不同意这样的结论呢?这些话难道不正确吗?何况又是斯大林说的!

但是问题在于:斯大林常常言行不一。而且不仅仅如此。他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实在太差。终其一生,他视察农业地区实际上只有一次。那是在1928年,他为了粮食收购的事去西伯利亚。从那时起到去世为止,斯大林再没有去过农村。对农业的了解脱离实际,这一点在后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表现在他个人独断作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非常错误的决定上。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采取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提高了一些消除国内粮食困难的切实的建议。例如,米高扬在发言时谈到,大批商品滞留城市,没有运到农村,而农村对商品的需求极大。"为了大大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的状况,必须实行坚决的转变。为此就应当把商品从城市调

拨到农村，即使城市市场上商品暂时（几个月）脱销也在所不惜，以期从农民那里得到粮食。假如我们不实行这种转变，我们就会遇到影响整个经济的特大困难”。[8]

可以设想，为了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解决农村的迫切问题，现在不仅要指靠政治手段，而且也要指靠经济手段。这也就是列宁的合作制计划。他认为：正是“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要知道，这是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困难的一点！主要问题在于：在实现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民合作化纲领时，不能单纯使用下命令下指示的强制方法，而应当考虑到经济规律，善于利用经济杠杆。

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书记莫洛托夫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报告，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例如报告强调指出：“使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一条缓慢的道路，一条漫长的道路。为了从个体经济过渡到公有（集体）经济，需要不少年。”报告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不容许使用暴力。莫洛托夫继续说：“有人现在向我们建议实行这种强制借用、强制没收的政策，哪怕是从10%的农户手中，也就是说，不仅从富农手中，而且从部分中农手中借用、没收1.5亿—2亿普特的粮食，不管这一建议充满了多么善良的愿望，提出这个建议的人都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工农联盟的敌人……”在报告人讲了这些话之后，斯大林大声插话：

“说得对！”

在报告的过程中，他还不止一次地用这样的喊声来支持莫洛托夫[9]。

看来，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在合作化中广泛利用经济方法的路线，一条遵守自愿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的路线。在就莫洛托夫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直接指出，经验证明，“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完全正确，绝对正确。按照这一计划，正是通过合作社，社会主义工业将引导小农经济走向社会主义……”[10]此外，代表大会坚决谴责了想在农民问题上强行采取行政命令方法的做法。

因此，斯大林和同一位莫洛托夫决定在农村不单单要加速合作化的进程，而且首先要加速集体化的进程，这看起来就格外令人奇怪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斯大林就日益频繁地表示必须在工业

化和集体化方面"加快速度"。他很喜欢后来的院士斯·古·斯特卢米林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斯特卢米林概括了一条搞"指令性"经济的信条：我们的任务不在于研究经济，而在于改造经济；任何规律都不能束缚我们；没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击的堡垒；速度问题是人决定的……[①]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引用、借用他喜爱的这几句话，用它们来降服听众和读者。这几句话再好不过地反映了他本人的心愿。斯大林实质上在迅速改变方针，开始采取非常措施。而这也就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市场模式的进攻。

1927年12月底(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和1928年1月，斯大林就签署了一些严酷的指示下达给各个省，要求加紧压榨富农，开始直接进行集体化的工作。斯大林这样做可能是为粮食困难所迫。但是，试图通过人为地加速公有化过程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却是对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大背离。



1927年进行的消灭私营商业运动

我想，斯大林决定加快速度，大张旗鼓地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不能不博得党内大部分人对他的好感。左倾激进情绪在革命以后仍然牢牢地存在于大批共产党员中间；人们想一举解决那些需要慎重对待、冷静对待的多少年来就存在的老问题。

斯大林本来天性慎重。在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他仍然铤而走险了——使几百万农户全盘集体化，虽然他知道广大的半文盲的庄稼汉对此还没有准备。斯大林解决农民问题的空想主义教条主义观点，实质上是他想把农业生产者变为农业机器上没有思想的"小螺丝钉"这种意图的表现。要实现这一意图，必须使农民同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异化。实质上，斯大林决定改变农民作为自由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把农民变为无权的劳动者。为此，他不得不把非常措施变成生活"常规"。中央7月全会(1928年)支持了斯大林。党同意了把强制作为制度……

代替经济规律的是行政命令加经济方法，它们逐渐“扼杀了”新经济政策，“扼杀了”农民的物质利益、进取精神和勤劳作风。某些过去接近托洛茨基的被贬黜的左派也赞同在农村采取“果断措施”，支持斯大林的做法。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科、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呈递了悔过声明，并且恢复了党籍。皮达可夫当了国家银行主席，后来担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但是，他也好，他的“同伙”也好，在1937年都吃尽了苦头。斯大林没有原谅任何一个人过去的“自由思想”。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使85%的农户参加合作社，其中采取集体农庄形式的达20%。但是，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都作出决定把这个期限缩短到一年！在对待富农的态度上以及在整个集体化问题上实行广泛使用暴力的方针，实际上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这就是斯大林本人所干的事情。

斯大林于1928年1月来到西伯利亚，他在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要对富农变本加厉地施加压力，这次出行很像一个司令官巡视他的卫戍部队。每到一站，斯大林都要把当地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找来，听取他们的简短汇报并作出一成不变的结论：

“工作差劲！都不干事，对富农放任自流。要看一看是不是你们中间有富农的代理人……我们不能这样长期容忍这种不成体统的状况。”

在恼怒的申斥之后，接着是具体的建议：

“看看富农家里吧，”总书记说道，“那里谷仓和木板棚都堆满了粮食，没有地方放了就把粮食堆在屋檐下，每户富农都存有5—6万普特的余粮……”

斯大林每次讲话的结尾都一样：

> 我建议：
>
> （甲）要富农立即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
>
> （乙）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就依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按低廉的国家价格……分配给贫农和力

量单薄的中农。

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12]。

这种靠高压行事的作风广泛传播开来并得到了鼓励。斯大林的文章《大转变的一年》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论证了某些头脑发热的行政领导人喊出的口号——“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人们在情绪上和社会意识中发生的某些变化——赞成搞合作社（不一定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仅仅是合作社的形式之一），被总书记理解为中农普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接着又是一批口气坚决的指令和指示……

斯大林在自己50寿辰之后过了一星期，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他的讲话意义重大，因为他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就宣称：“……我们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开始了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转变**。”[13]这是一项给几百万人造成极其悲惨的结局的致命的决定。

1937年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认为是在我国施行暴力、胡作非为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社会的知识阶层，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对这一点写得这么多，恰恰把这一年变成了社会注意的震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遭到“铁蹄”践踏的人要多得多，其中或许也有不少真正的仇人，但多得多的是无辜者——中农及其全家，他们不过是固执的农民，但被算成了富农。历史学家已开始分析这一过程的细节。小农户的合作化可能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但是，在这种经济变革中，大规模的暴力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可以不怕犯错误地说一句：不，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合作化过程应当是自愿的！

按照斯大林的坚决要求，为了便于没收富农财产，编制了“确定”富农参数的文件：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可以使一个农民成为富农。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里使用的不是社会标准，而是财产标准，至少对于确定阶级来说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样做就为把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分划为没收财产对象造成了广泛的可能性。

暴力猖狂肆虐。农民群众经受了20世纪最大的震荡。最勤奋、最能

干、最节俭、最有进取心的劳动者遭受苦难。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对新政权怀有极大戒心。但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把他们全都算作社会主义的敌人，要使他们“不能为害”。



全苏社会主义成就展览馆门口的雕塑名作——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

1930年1月一个专门委员会代中央起草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定草案。斯大林(亲笔！)把委员会建议的期限缩短了一半。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的论证，没有估计到正反两方面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固执地要求：快，快，快！省委员会和乡里都忙于写汇报、报告、快报。特派员满天飞。一些人专门以“拖拉机、煤油、盐、火柴、肥皂”为诱饵：“快登记加入集体农庄吧！越快就能越早得到这些东西。”另一些人做得更绝：“谁不愿加入集体农庄，那他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狂热，冲突，伤害和杀死党的工作人员和集体农庄积极分子，无数的申诉便告到莫斯科，无数人要求伸张正义……这就是农民所经历的戏剧性的、随后又是悲剧性的那些事态的外观。实行合作化的客观需要开始时是通过各种自愿的形式逐步具体化的，后来被一整套带有行政、政治和法的性质的严厉的措施“加固”了。



宣传集体农庄的海报

违法乱纪的事情司空见惯。俄语中出现了“没收富农财产”一词。成为没收对象的有100多万农户（不仅仅是富农）。根据一些计算，在大规模集体化开始的时刻，国内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即将近90万。几十万农户在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贵重物品、不动产被没收以后(全家)迁到遥远的地方。恐怕永远也说

题为“在集体农庄务农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宣传画



不清遭到这种胡作非为的风暴袭击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是采取经济措施限制富农在农村中的影响,而是使用最无情的手段消灭富农。从一些资料看,1929年被赶到西伯利亚、北极地带的富农在15万户以上,1930年——24万户,1931年——在28.5万户以上。但是,没收富农财产的活动不仅1928年搞过,而且1931年……以后也在搞。根据我们的计算,遭到没收财产的男女老少有850万—900万人,其中大部分脱离了他们久居之地,抛下了祖坟、家园、全部简朴的农民家当……许多人由于反抗而被枪毙,不少人死在去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带的路途中。在社会暴力的惯性、有时是物质利益的惯性的作用下,许多地方的中农也遭到没收财产的洗劫。据我们计算,总共大约有6%—8%的农户被吸进了形式不同的没收财产的漩涡。

当然,数十万富农经历这一过程时并不是服服贴贴的。我想,应该运用经过周密考虑的行政方法来对付那些公然进行反苏维埃斗争的富农。但是,可以通过差别课税、规定生产任务和义务的办法把大部分富农导入公有化和合作化的过程。当时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杜绝了富农参加共同的过程的可能性,他们面对着悲惨的抉择:要么斗争,要么等待厄运——没收财产和流放。在解决涉及成百万人的问题时仓促行事,毫不留情,从而导致了悲剧。

引用一下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和丘吉尔谈话时就富农问题所讲的一段话,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谈判结束了。斯大林邀请英国首相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所吃晚饭。在长时间的谈话当中,莫洛托夫和翻译坐在桌旁。在丘吉尔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首相问斯大林:

“这场战争的重负,也像你们实行的集体化政策一样,对你们自己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是吗?”

丘吉尔写道,“这个话题立即



斯大林和丘吉尔在一起

使斯大林活跃起来。"

"集体化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斯大林说。

"我始终认为,你们搞集体化很艰难。因为你们要对付的不是几万个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民……"

"是1000万人,"斯大林抬起双手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持续四年之久。为了摆脱周期性的饥荒,俄国必须用拖拉机耕地。我们是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许多农民同意跟我们走。有些农民很固执,我们在北极地带给了土地,让他们按个体经营原则耕种。但他们大部分人(指富农。——本书作者注)太不得人心,雇农自己把他们消灭了……"[19]

我保留了丘吉尔的用语:"贵族"、"地主"、"得人心"等等。大家知道,1000万这个数字随着丘吉尔的好运气在报刊上流传开来。我的数字略少一些,当然这决不会缩小这场人类悲剧的规模。这是斯大林在自己的国家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血腥恐怖活动。

集体化的年代实际上标志着农民命运的决定性转折及其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历史上本来有过按自愿原则进行合作化和广泛实行新经济政策原则、市场原则的良好时机,但是被放过去了。非常的、强制的方法在当时正在形成的、距离列宁的理想越来越远的制度中成了起决定作用的方法。

而集体化仍在进行。寄到莫斯科的几万封写给斯大林的信,满纸抱怨、痛苦、疑惑、恐惧、仇恨。胡作非为这台无人看管的机器继续折磨着人的命运。直到1930年3月2日,斯大林不可能不感受到农民的道德抗议和社会反抗的气势了,他才终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文章的第二段今天读起来,像是对社会暴力的不祥颂歌:"截至今年2月20日,苏联全国50%的农户已经集体化了,这是事实。这就是说,截至1930年2月20日,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集体化五年计划的一倍以上。"

百分比、计划数字、计划"超额完成"一倍……难道斯大林从来不考虑,所有这些数字(还有其他许多数字!)代表着人的命运?!要知道,他并没有引用其他统计资料:多少人被流放,多少人被没收财产,多少人被消灭、被断送性命……常常有人说,这样大规模的改造过程,不可能没有痛苦、平平稳稳、没有错误。要知道,集体化涉及我国总人口的差不多4/5! 但是,谁给斯大林权力让他取消普通人进行选择的自由,

由他来包办呢?!而列宁曾经警告过:"不许发号施令!"他斯大林自己所作的"要制服富农,必须采取经济方面的措施,必须根据苏维埃法制办事!"的声明和保证,也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句话,任何决定、结论、原则,只要在某一时刻不符合斯大林的计划,就都被认为是莫须有的东西,——这对斯大林来说已习以为常了。

在斯大林的文章中就是这样作出如下一个结论的(好像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进行了全民投票似的!):无论共耕社还是公社,今天都不符合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只有集体农庄够标准!斯大林这个后来再没有到过哪一个村子去的"大地主"竟然断定,只有农业劳动组合这一形式才可以接受。后来,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斯大林"完全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农业的"。当然,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但很难想象,一个领导人只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就能正确判断任何问题。整个来说,斯大林最可悲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在这里,在文章里,他写道,"搞过火行为"、"胜利冲昏头脑"、"官僚式地发号施令"的人,原来只是在地方上:在省里、乡里、劳动组合里!斯大林本人对无数的反常行为、过火行为和胡作非为当然丝毫"没有责任"。而他那些直接的指示、指令、控制数字、"迂回包围"的竞赛等等呢?总书记一如既往,认为这一切都不算数了。

在《胜利冲昏头脑》之后,农民的信件又大批涌向斯大林。他不得不再次说明党在集体化问题上的立场,有时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概括来贬低通过逐步合作化来改造农业的思想本身。总书记在对集体农庄庄员的答复中写道:

"有些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这当然是胡说。这是中央所采取的**深入探查**(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的办法。"

他接着写道:

"要使狂奔疾驰的人悬崖勒马转上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15]

值得注意的是,在触及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时,斯大林喜欢使用军事术语,如"探查"、"前线"、"进攻"、"退却"、"兵力部署"、"使后方机关跟上来"、"使预备队靠近"、"彻底消灭敌人"……当然,这里指的是"消灭富农阶级"。尽管这样,还是作出了高姿态,承认有大批的人在"狂奔疾驰"。斯大林好像是在概括自己对农村改造的实质和方法

的理解似的，他在1929年12月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说：为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16]实际上这就是下命令把农民这一社会集团整个消灭掉，无须中央全会讨论，无须深入论证所有的后果。顺便说一下，10年后，《布尔什维克》杂志就斯大林这篇"土地政策"讲话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其中讲到：

"布尔什维克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作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令人惊叹的样板……全盘集体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这是斯大林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民经济的纲领的辉煌胜利。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在这个具有最伟大的理论力量的文件中，阐述了上述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民经济的战斗纲领……"[17]

在莫洛托夫主持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的基础上，1930年1月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通过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的措施"的决定。党的这个指令加剧了农村的紧张局势，因为根据这一决定，富农进入集体农庄的道路被堵死了。这一部分农民的处境是悲惨的和走投无路的。对富农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财产全部没收，把被剥夺者全家流放到边远地区。富农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相应地更厉害了，有时还采取了很大的规模。对富裕农民胡作非为的结果，激起了他们声势浩大的对当局的抗议、造反和武装行动。

"培植"集体经济形式时，还辅之以吓唬、威胁、惩罚、许诺等手法。本来，十月革命为实现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创造了牢固的客观前提：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了工人阶级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同盟者；结束了对农民的剥削。新的苏维埃政权毕竟也是他们农民的政权！但是，托洛茨基当初宣扬的强迫、暴力、行政命令的方法，现在却被斯大林充分地利用起来了。谷物经济一下子就停止了增长，接着畜牧业也出现同样情况。而主要的还是农民的进取精神一下子被"扼杀"了；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个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后果非常严重。许多地区开始大批屠宰牲畜：牲畜头数到1933年时比1928年减少一半，甚至减少2/3。为了阻止腌肉，对食盐的销售严加限制。播种面积缩减了……几十万个家庭流离失所。

农村发生的事情都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总书记对这些消息、情报

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同多愁善感根本无缘。他的感情之弦藏得很深很深，以至未必能够把它们拨动。他**确信，必须这样做**。

有一次，在斯大林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几乎开始发生动摇的少有时刻，他想起了老造反者巴枯宁的话（内心深处还对他怀有敬意）："意志是万能的，对意志来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斯大林知道，他那在演说、文章、诗歌中出现的名字，首先体现的往往是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性格、坚强的手腕。斯大林确实把人的意志看得比人的一切精神"品德"都高。他认为，只要目的是崇高的，为了达到目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不择手段。他相信，农民不过是不理解为他们所作的安排和向他们提供的帮助。总书记没有想到，他强令推行的纲领，往往不过是"可怕的善行"。他觉得反对这一纲领的人，不单纯是有点傻的人，首先是不能看到在农村中实行强攻的全部优越性的政治家。至于遭到"进攻"的人身上穿的是农家自产的土布衬衣，脚上经常穿着草鞋，一个大字不识，有自己的习惯和牵挂，被牢牢地拴在自己的份地上，——至于这一切，总书记并不操心。庄稼汉是达到崇高目的的**手段**。而目的高于一切。

这个时期，特别是从1928年初（1月14日—2月6日斯大林到西伯利亚）起，政治局内一直在暗暗地进行斗争。对于斯大林的方针，布哈林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支持下，先是小心翼翼地、后来则越来越坚决地进行抵制。这还不是"右倾分子"集团，像后来很快定性的那样。只不过这些领导人有自己的看法，主张对农民问题采取温和一些、谨慎一些的态度。他们对待所谓"沙赫特事件"的态度也较为冷静，而斯大林根据这一事件尖锐地提出了"尽快地取代、监督"国家从旧制度接收下来的专家的问题。


1928年，"沙赫特"案件在审理中

斯大林和布哈林开始在发言中不指名地相互批评（影射）。例如，1928年5月28日斯大林

在红色教授学院发表的讲话就是如此。而布哈林不久前在这里被提名并成了最高领导人中惟一的院士，他在这里享有极高的声誉。**总书记**就是想在这里指责布哈林的立场有问题，说他在农民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解决上是“富农的保护人”。在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中，斯大林几次对布哈林进行了影射攻击，大家都清楚他指的是谁。

斯大林念讲稿说：“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依靠……富农阶级，又依靠……工人阶级。”

斯大林接着又说：

“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40]

布哈林比谁都更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加紧集体农庄建设。从集体经济中更容易拿到粮食！斯大林的算盘没有打错，因为农业生产纳人指挥系统后，让它再重新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上去实际上就容易了。请看一些数字。1928年（集体化初期）谷物总收获量45亿普特，农民售给国家总共6.8亿普特。1932年（总收获量达43亿普特）国家却得到13亿普特！谷物总收获量大体相同，而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商品粮却能翻一番。然而这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北高加索、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无情的饥荒时期来临了。今天没有确凿可靠的关于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饿死的人数目很大。可能只略少于清算富农时期的数字。这也是总书记的“农业革命”的代价。

出现饥荒不仅是由于主要农业地区遭了旱灾，而且是由于农民经济在集体化进程中遭到破坏、农产品被强制没收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不平衡。城市人口每年增加200万—250万人；吃饭的人数增加了。在收购价格很低的情况下，集体农民自然不能保证供给国家粮食。打从集体农庄生产存在之初起，照顾农民物质利益的原则就已荡然无存了。况且国家继续进口粮食。需要外汇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技术。斯大林又是催促，又是坚持。他的指示自然都执行了。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乌克兰，尽管闹饥荒，粮食却被搜刮空了。工业化的代价是痛苦的、悲



“确保实现工业化，一切以重工业为重”的宣传海报

惨的。所谓工业化，不仅是说工人阶级要忘我地劳动，而且是说农民要无穷无尽地作出牺牲。

饥荒促使人们盗窃粮食。根据斯大林1932年8月7日的倡议，通过了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律。总书记在审订这个法律时亲笔加了一句话：“侵害公有制的人应当被看作人民公敌……”[19]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按规定都要枪毙或判10年劳改。“麦穗”法——当时农村的叫法——残酷无情地惩治了成千上万的饥民。斯大林要求无条件地执行这项法律，到1933年初，就已经有5万多人被判罪。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全国饥荒的情况不在报刊上提及，可是饥荒却囊括了人口总数达2500万—3000万的地区。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后果尤其严重。歉收是大面积的，但是向国家提供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计划照旧不变。而且，新的集体农庄脚跟还未站稳，交售粮食的任务却增加了。任务完不成被说成是消极怠工，是“破坏党在农村的政策”。人心惶惶的气氛笼罩了成千上万个村庄。农民的消极抵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的一种就是不出工。

饥荒和无权导致集体农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违抗，好让饥民能有一点吃的。对这些过程的描述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家报纸报道说：“从北高加索地区传来消息，说有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粮食收购上表

现出损公利私的富农倾向。在胡屯集体农庄,尽管没有完成1000公担的计划,管理委员会却安排粮食脱粒分给庄员。"

斯大林1933年2月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根本不谈饥荒,只是含糊其辞地提了一下农村存在着"困难"。总书记提到集体农庄庄员面前的主要任务是非常明确的:"现在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诚实地劳动,按劳动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爱护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马匹,完成你们的工农国家所给予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庄,把钻进集体农庄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驱逐出去。"[20]至于帮助缺粮户的事,一个字也没有提。

农村的社会主义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国家的威力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换来的。当然,从国外购买工业设备,改善迅速增长的城市的供给,建立国家储备,这些都需要粮食。但是,决不能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靠命令和指示办事的方法从此彻底取代了经济的方法。不仅富农被消灭了,就连一般的个体农民也被排挤。这一切都是靠暴力做到的。1934年斯大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就讲了这样的意思:

"必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让个体农民即拥有宅旁个人园地的农民日子过得差些,要使他们比集体农庄庄员具有更少的有利条件……必须增加捐税负担……"[21]

这种越来越重的负担不仅压到了"个体农民"上,而且压到了集体农庄庄员头上,使他们成了某种无权的阶层,而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同土地和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异化的新型农民便形成了。人们丧失了支配自由的权利。困惑莫解、张皇失措让位给漠不关心。但这都是后来的事,恰恰也是布哈林很担心的事。

斯大林当时在红色教授学院肆意歪曲布哈林的立场,把布哈林说成是"富农的保护人"和不懂得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实质的人,从而第一次"向人们"亮出了他同布哈林的分歧。

布哈林也在自己的公开发言中不指名地谈到在经济中不容许采用行政命令的做法。政治局的主要理论家一贯坚持的思想是:没有繁荣的农业,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工业化规划;在集体农庄建设中,强制、征用、暴力是不容许的。在1928年初,斗争的结局还不明朗。最初一心一意支持斯大林的只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而支持布哈林的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加里宁、米高扬和鲁祖塔克是动摇的,他们力图使政治局

的这两位最有影响的委员和解。谁的路线——是斯大林的路线还是布哈林的路线——占上风，当时实际上取决于这个"中央"核心。但是，像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利用机构即搞幕后活动方面更有经验和更加巧妙。结果，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4月全会、7月全会和后来的11月全会，对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提出的两难抉择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斯大林不仅"推动了"改造，他用暴力摧毁了一切旧东西。斯大林不能不懂得，实行他的农业集体化方针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则。代替固定税率的是义务交售制，而不是出售粮食。而这种做法维持了很久，长达几十年。

布哈林则提出农村改造走进化的道路，即在改造的进程中让合作这种公有化的经济成分以榜样的力量在经济上逐渐排挤个体经济。他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正确，尤其是在确定改造的历史前景和改造的速度时，把过程拖长到许多年之久。历史没有留给国家这么多时间。但是不管怎样，布哈林反对邪恶势力，不让它对苏维埃国家几百万公民——农民取得胜利，无论从道义方面考虑还是从政治方面考虑，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斯大林没有支持布哈林。这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啊！我再说一遍：在农村的改造进程中，无疑是可以避免恐怖手段和悲剧的，而这种恐怖手段和悲剧并不亚于、而且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在暴力的规模及其后果方面超过了1937—1938年的镇压。当然，这两种情况下的暴力都是严重的罪行。但是，"消灭富农阶级"的行动取得成功，使斯大林产生了信心，使他感觉到了自己实行独裁时的能力，并决心把所有曾经反对过他或者可能反对他的人彻底消灭掉。

顺便说一下，布哈林计划的许多因素都是合理的。例如，把进一步实现新经济政策跟农业的自愿合作化统一起来。

再说一点，斯大林集体化的后果影响到了以后几十年，尽管进行了许多改革和作了许多决定、决议来改善农业的状况。

是的，斯大林完成了一次暴力"农业革命"，使农业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几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血腥实验并没有使国家松一口气。实际上农村在许多年里又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虽然对这一点从来不提。斯大林在无数次会议上大肆渲染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实际上的余粮收集制，即无偿地收缴粮食已成为合法行为。自由贸易迅速凋零，因为集体农庄没有商品粮。而斯

大林还在继续设法对沉寂下来的农村更严厉地实行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的现状，开了多少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多少项决定啊！可是每况愈下。集体农庄庄员同土地、生产资料、分配、管理相异化的情况愈演愈烈。农村中的气氛变了，人们都心怀恐惧，对周围漠不关心。大家都对集体农庄发号施令，甚至谁都不记得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性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农民。

新经济政策就这样“死亡”了。政治局领导层中的温和路线就这样中断了。党内集体领导的实际消亡的长期过程就这样开始了。斯大林要个人决定一切问题的露骨意图就这样占了上风。

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吸引力开始降低了。社会主义的仇敌直到今天都在利用我们的农民问题，想给我们以沉重打击。不用说，斯大林为把曾经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搞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分量的论据。例如，罗伯特·康奎斯特为了推荐自己的《灾难的丰收》一书，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在1929—1932年这一时期，斯大林通过消灭富农和强行集体化给了农民双重打击。”[②]

在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当大多数革命领袖都没有看出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候，圣·茹斯特却感觉到即将来临的危机的暗流，他毫不客气地说：“革命到顶了……” 斯大林敢于史无前例地使用暴力对付本国人民，这样他就把一个巨大的社会集团的血管给割断了，而这个社会集团从革命中得到这么多好处，但是由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却未能享受革命的成果。农民田野上的革命在斯大林行政命令体制的粗暴压制下“到顶了”。

从1928年年底起，开始了斯大林一生中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清除领导层的所有直接对手，而且开始了被我们通常称为“个人迷信”的那一切。清除布哈林是这一过程中一个明显的路标。

2 布哈林的正剧

写斯大林的政治评传，如果不介绍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战友、唯唯诺诺者和对手，我认为就会写得不全面。为了展示斯大林性格

的另一个侧面，我谈一谈20年代上演的布哈林的正剧。这个人的悲剧还在后头。

长期以来，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关系是亲密友好的。有时甚至好像是牢不可破的友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从1927年起，布哈林在斯大林的执意要求下住进了克里姆林宫，而在总书记的妻子死后，他们互换了住宅。斯大林解释这样做是想解脱一下，因为他经常想起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死去的那个不幸的日子。**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人，他虔诚地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友谊，在同斯大林相处中一直都非常正派、真诚。他们总是用"你"相称。斯大林管布哈林叫尼古拉，而后者通常称呼总书记柯巴。在1924—1928年这个时期，斯大林总是注意听取布哈林的意见，不止一次地公开强调"列宁高度评价他的理论头脑"，强调党珍视这位天生的英才。对于布哈林来说，私人友谊是一种具有崇高精神的、甚至于神圣的情谊，他不可能轻易地把它抛弃，像斯大林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那样翻脸不认人。

斯大林在全会上讲话时一开始就讲他同布哈林的关系：

"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他已经触及了！——本书作者注），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演说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念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钱都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②]

斯大林实际上是套用了马克思讲到丹东时所说的话，试图使政治局、中央相信，布哈林虽然处在山岳派之巅，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泥潭派领袖。

一切好像都是正确的：事业的利益高于私人关系。但是，斯大林的话里仍然多少有些令人憎恶的、简直是卑鄙透顶的东西：一提友谊就"一个破钱"都不值，我们"不是私人友谊团体"……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布哈林又听斯大林讲了一堂权术课。原来，他的友谊、意见，对斯大林来说，最终不过是"小事"。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

正像曾经在斯大林的秘书处工作过的巴拉绍夫告诉我的，每当向政治局委员们征求了意见把表决结果送来的时候，正在看文件的总书记常常是头都不抬劈头就问：

“布哈林怎么样，‘赞成’？”

巴拉绍夫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意见对于斯大林决定自己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态度至关重要。

那么布哈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什么列宁的所有那些在他逝世后还留在党的岗位上的战友中，很多人都对布哈林保留着极其温馨但又带有明显的苦涩味的回忆呢？为什么列宁称他是“全党喜欢的人物”，而斯大林却终于消灭了这位杰出的活动家呢？

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曾经达到七级官阶（七等文官称号）的学校教师的家庭。布哈林的命运再一次证实，十月革命的大多数领袖不是无产阶级出身。这有客观原因：不掌握世界文化的成果，就不可能成为领袖。那时候，主要是出身于比较富裕的阶层的人能够掌握世界文化，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它，制定出运用它的方法。

1906年布哈林入了党。关于未来理论家的早年，他在那个年代的朋友伊里亚·爱伦堡还保留着引人入胜的回忆。法律系经济专业的学生布哈林，在工人和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在那个年代，不仅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大会上，而且在莫斯科河南岸区的企业里，都常常可以看到他那活泼而瘦小的身影，留着稀疏的胡子，高高的额上是棕红色的头发。1910年被逮捕以后，他逃出了奥涅加这个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小城镇，很快到了国外。布哈林只是在革命之后才返回俄国。

在国外的六年对于他来说是大有收获的。在国外他认识了列宁。列宁对布哈林不仅总是很和蔼，而且打心眼里喜欢他，但这并不妨碍他同布哈林进行激烈的争论。初出茅庐的理论家一钻进图书馆就不出来，很快掌握了德语、法语和英语。在这里，布哈林准备好了两大部理论著作的手稿：《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布哈林在描述落人暴君之手的国家时借用了杰克·伦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他预言这样的独裁者将用自己的“铁蹄”践踏人们的尊严。这是对个人专权、对军国主义势力（对它们说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提出的抽象的、但颇有预见的警告。

在纽约，布哈林结识了托洛茨基。尽管常常发生理论上和政治上

的分歧，他们之间差不多有10年保持着极其亲切的私人关系。也是在纽约，布哈林听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回俄国的道路是漫长的；在日本他曾经被捕，后来已经回到祖国，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了，又遭到监禁（因为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只是在1917年5月才好不容易到了莫斯科。

布哈林很快就成了《真理报》的主编，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差不多呆了12年，中间只有一小段时间不在。作为党的主要报纸的编辑，他积极参加了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党的宣传。

他不会要阴谋诡计，不会装模作样，不会“玩弄外交手腕”。例如，在1918年，在为同德国签订和约而斗争的、充满矛盾冲突的几个星期里，布哈林事实上成了反对列宁的首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布哈林领导了形形色色的反对布列斯特和约、鼓吹革命战争的“左派”集团。

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的癖好不是偶然的。在国内战争年代，他就是最激进的“左派”路线的化身。布哈林恰恰也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思想家之一。

在《过渡时期经济学》这部著作中，布哈林实质上是在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布哈林把在经济领域中使用暴力、靠法令办事的因素叫作“革命费”。缴这笔“费用”实质上是“革命规律”。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一开始是破坏经济的，但后来就高速建立经济了。不管布哈林愿意不愿意，他就是“战时共产主义”的讴歌者之一。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他的观点最充分地反映在广为人知的《共产主义ABC》这部著作中。这部著作是在另一位有才能的年轻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帮助下写成的。顺便说一下，在20年代初，斯大林非常看重这部共产主义者的“教义问答”。《ABC》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其中阐述了关于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作用、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等等问题的基本原理。《ABC》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再版了近20次之多，发行到了国外。由于这本通俗小册子是从非常激进的、左派的立场阐述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的，布哈林在党内和国内的知名度不亚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西方，人们根据这本书很长时间都把布哈林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献身者”。

这样看也是有道理的。例如，布哈林在1924年出版的理论文集《进攻》中就提出如下的看法。即将来临的世界大革命是“胜利的无产阶级

所进行的防御战和进攻战。进行防御战是为了击退进攻的帝国主义者，进行进攻战是为了彻底歼灭退却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将席卷一国又一国。“‘国际联盟’也好，社会党叛徒匪帮按国际联盟的调子胡诌的其他胡说八道……”也好，都阻碍不了[20]。在革命、国内战争中，布哈林是准备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革命激进派（也可以说是浪漫派）的典型。凭这一点就要治罪吗？显然不能。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许多思想，在变成习以为常的思想以前，只是在时代的峰顶久久回荡，而不进入平凡的存在之谷。例如，在那个时候，任何超国家的、超民族的、全人类的思想一概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要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许多东西，也会使许多人而不只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可怕的境地。在所有的人看来，布哈林就恰恰是这样一个人。

因此，几年之后在布哈林的思想倾向中所发生的迅速转变就更加令人吃惊。他不隐瞒，他的观点的演变是在列宁，首先是在列宁晚年著作的影响下发生的。同时布哈林得以比党内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更为深刻地吃透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列宁病中，布哈林经常看望他，并且常常长时间地单独同他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迫切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过，对这一切，今天只能猜想和推测。然而，不管怎样，从1922—1923年起，布哈林已属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温和的一翼，社会经济问题成了他注意的重点。

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谈一谈，是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很遗憾，担任党和国家高级职务的往往是一些对经济、经济规律了解得很差、很粗浅、很庸俗的人（斯大林就是一个最光辉的例子）。人们常常认为，只要会发号施令（有时甚至只要会签署号令），会喊“经济就应该是经济”这一类口号，会今天给明天、而明天又给后天没完没了地拟定计划，不讲实际效益，也不总结执行情况，——只要会这一套本事，就被认为可以去支配千百万人们的命运了。总书记和他周围一班人的“履历表”提醒人们：对于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光从思想上相信某个“纲领”正确并真诚地愿意实现这个纲领是不够的。需要的不只是在相关工作上内行，而是某种更高的东西；即使不要求有天才，那也一定要有才干。今天，翻阅一下布哈林的大量著作（整整50年它们被打成苏联人民不能看的“禁书”），我们就能看到，他是一个新类型即列宁类型的领导人：一个有坚强的信念、有学识和有才干的人。

如果说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布尔什维主义蜕化”的第一个征兆，那么，相反，布哈林则认为新经济政策提供了大好的历史时机，它使人既能利用社会主义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的新的有利条件，又拥有旧的被摒弃的经济结构所具有的能让企业主施展才能的那种潜力。同一件东西，一位革命“领袖”认为是“热月政变的特洛伊木马”，另一位在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更有才干的领袖却认定是“社会改造过程中的补充杠杆”。布哈林1924年4月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小资产阶级经济刺激因素的发展导入所需要的轨道，使它能随着私人积累的增长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我们经济的巩固……将来我们的工厂开工越充分，我们的生产就会更加成为群众性的，城市就会用更大的力量来领导农村，工人阶级就会更加**宽容**（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同时就会更加牢靠地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②]



有学识、有才干的新型领导人布哈林

有一回，在1925年初的某个场合，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这次谈话的实质简言之就是，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而布哈林则为这个政策的实质本身进行辩护。布哈林在自己的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指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等。谈话时间很长。那时布哈林已经感觉到，斯大林不懂得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对这次对话深感沮丧的布哈林，决定在报刊上阐述自己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久，《布尔什维克》杂志就发表了他的一篇写得很深刻、直到今天也

没有丧失现实意义的文章:《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他也利用了自己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的结论。我们援引文章中的两段话：

> 列宁在论粮食税的小册子里就曾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正确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系列经济成分从前由于受到战时共产主义的限制而不能互相促进,现在已能互相促进,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
> 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对我们的危险要小一些。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发展经济周转。和私商作斗争的办法不是用脚踩他和关闭他的店铺,而是自己努力生产,东西比他卖得更便宜、更好和质量更高。[26]

斯大林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划出这几段话，虽然他在这篇文章上做满了记号。总书记很难理解：怎么可以给予私有经济成分以自由呢？难道这不是在破坏专政吗？经济思维上的狭隘性和浅薄性终于使斯大林选择了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体制来领导着国民经济，同时拒绝利用新经济政策提供的巨大潜力。斯大林听了、读了布哈林的文章，暂时没有表示什么异议，但是在心灵深处对这位理论家的“经济投降主义”却越来越感到气愤。

布哈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在不断指出,他的观点所根据的是列宁的著作,首先是晚年的即逝世前写的有历史意义的《遗嘱》中的五篇文章。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他的威信首先决定于这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决定于他那惊人的富有人情味的宽厚,决定于他那不同凡响的平易近人。在这方面,他正好同斯大林完全相反。

布哈林长期置身于派别、集团、反对派的斗争之外。难怪季诺维也夫在一次想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事先得到布哈林的支持而没有成功之后,轻蔑地称布哈林是“和事老”。布哈林在1928年以前对所有的人都赤诚相待,他力求超脱于派别斗争之上。他认为,主要的是要看准国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886—1937)
苏联经济学家

20世纪20年代"左"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一贯主张采取"左"的政策，他的著作都是为"左"的政策进行论证的。代表作《新经济家》则集中体现了他的经济观点。

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就是贯穿了反映社会主义计划性的原始积累规律同反映市场自发性的价值规律之间的斗争。原始积累规律的作用逐渐扩大，价值规模就逐渐消亡。过渡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意味着原始积累规律彻底战胜价值规律。

在农业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他主张建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公社。

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基本趋势和对国家进行深刻改造的道路。在这里，他不得不坚决反对强加于党的领导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规律"。这个"规律"的实质就是：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实行超工业化，只有在最大限度地"榨出"农民的资金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说句公道话，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是反对向农民使用暴力的，但是他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上必须广泛"进行"不等价交换。

布哈林坚定地认为，"城市不应该掠夺农村"，政治结合只有加上经济结合，才能加快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换句话说，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家赞成城乡之间的更为和谐的关系，诚然，容许向榨取农民的资金方面有一定的倾斜(在初期阶段)。换句话说，布哈林认为，工业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是从农业部门吸吮资金时应该做得温和适度。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同志们赞成过量地吸吮资金，赞成这种经济上不合理而政治上不容许的加紧压榨农民的做法。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在于我们拒绝吸吮农民资金；但是，我们更加清醒得多地考虑到应该考虑到的东西，考虑到经济上和政治上怎样才合理[8]。"这些结论起先并没有引起斯大林的异议。

甚至布哈林在1925年提出的下述论点，也没有引起总书记的怀疑：

> 可能会有一些怪人主张向农民资产阶级宣布"巴托罗缪之夜"*，他们会证明，这完全符合阶级路线，因而完全可行。但有一点很糟糕：这会是极端愚蠢的做法。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得不

* 指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至24日夜间即圣巴托罗缪节前夕的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
——译者

到任何好处，而失去的东西却很多。我们宁愿让资产阶级农民发展他们的经济，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将比从中农那里取得多得多的东西。[23]

布哈林认为，在农民的合作化过程中（这一点值得特别加以强调），有可能限制"资产阶级农民"的影响，但不是用行政方法限制，而是用经济方法限制。从实质上看，这是把列宁的农民合作化计划具体化，但是不搞暴力、征收、强迫和威胁。

但是到了1928年，特别是1929年和往后，布哈林关于农民合作化的思想却被斯大林看作不只是对列宁主义的背离，而简直就是"右倾势力的敌对性破坏性计划"，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的机会主义异端邪说。

布哈林试图证明，在苏维埃俄国没有留下会对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严重威胁的雄厚的有组织的敌对政治势力。布哈林颇有预见地警告说，对农民使用暴力将带来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历史证实了他是对的。但是，布哈林忽略了两件事情，第一，慢慢地搞合作化，打算用上几十年，这会使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第二，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能是农村。我想，最佳方案是折衷。至于布哈林观点的人道方面，那么它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布哈林的尊敬，因为它充满崇高的伦理精神，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职能有正确的列宁主义的理解。

1925—1927年间，斯大林和布哈林是党内最有威望的活动家。而且布哈林事实上帮助了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斗争。虽然同时他力求保持同他们的忠诚关系。由于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解决当前问题和战略问题时的分量明显地增大了。不久以前，当反对派分子攻击布哈林时，斯大林还气冲冲地回答他们说：

"你们要布哈林的血吗?！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你们要放明白。"

不仅捍卫布哈林这件事本身值得注意，而且扯到"血"上面去也值得注意。当时这在许多人看来都是偶然的……

在政治局里，它的两位主要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为补充的。斯大林解决所有的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布哈林则探讨和阐述党的

政策的理论原则。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1928年初以前，斯大林在许多方面是指靠布哈林来解决经济问题的，甚至是按照他的观点行事的。通过这个事实，我要再一次指出斯大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借用其他活动家的某些观点，经过改头换面后把它们变成他个人的东西。我们知道，斯大林就接过了许多由托洛茨基提出的行政命令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用布哈林的观点丰富了自己对农业问题的理解。但是怎么解释，从1928年起，斯大林开始不再理睬布哈林呢？为什么在此以前还赞同布哈林观点的总书记突然间认为这些观点"右倾"呢？为什么他们的私人友谊很快就变成了长期的恶感呢？

我想，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布哈林作为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令人倾倒的领导人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日益增长的声望使斯大林感到不安。布哈林在党内的威信那时并不亚于斯大林的威信。布哈林的一篇谈列宁的文章使斯大林神经紧张起来，布哈林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由于我们没有了列宁，就一个权威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有的只能是**集体**权威。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是绝对没有过错的。我能绝对百分之百地理解列宁的学说。每一个人都在尝试，但是谁要说他自认为能百分之百，他就是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从这些话里斯大林仿佛听到了对自己的攻击，因为总书记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说时，他就是以讲解**整个**列宁学说的姿态出现的……难道这还不清楚吗？后来怎么就一个权威也没有了呢？那总书记的权威呢？使斯大林感到不安的是，布哈林手下出了不少有才干的学生（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马雷茨基、策伊特林、扎伊采夫、戈尔登贝格、彼得罗夫斯基等人），他们已开始在报刊、高等学校、党的机关崭露头角。例如，斯列普科夫和阿斯特罗夫成了《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马雷茨基和策伊特林在《真理报》工作，戈尔登贝格在《列宁格勒真理报》工作，扎伊采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等等。布哈林对党内和国内的意识形态过程的政治上理论上的影响日益加强，也使斯大林惴惴不安。

另一个原因在于总书记唯意志论的性格特征。集体化是农业中一场真正的革命，不过它是上面强制推行的革命。但这场革命整个说来开始得比人们预期的、比布哈林设想的都要顺利，都要好。各地的汇报、简报、报告和机关情报渐渐使斯大林确信，只要适当地逼一逼，原来关于集体化的规划可以彻底修改。而最主要的是：斯大林认为，走这

条道路可望很快克服粮食危机。而危机眼下正在增长。斯大林越来越频繁地在小范围里吹风：

“如不坚决转变，我们在农村就不会有粮食。”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欣然同意。把农业改造的期限缩短1/2至2/3的想法慢慢地但坚定不移地在斯大林脑子里酝酿成熟了。当逼来逼去引起了农民特别是富农的无声的但广泛的反抗的时候，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用纯粹行政的、政治的手段加速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

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还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我再说一遍，全力支持斯大林的是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支持布哈林的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布哈林的拥护者也赞成集体化和赞成“向富农进攻”，但不搞剥夺和使用暴力。归根结底他们相信，用经济方法来压，能够奏效。加里宁、鲁祖塔克、米高扬、古比雪夫动摇不定。说不定，如果他们弄清情况后都支持布哈林的路线，那么许多事情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要知道，布哈林既不反对工业化，也不反对集体化，他不同意的首先是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些有历史意义的任务的做法。而这不是小事；这里谈的是人。布哈林说，归根结底，一切改造都应该**为人、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相反！但是，那些对于是否采用最佳解决办法（而不一定是激进解决办法！）起着决定作用的政治局委员们的理智良心，却并不像布哈林的理智良心那样高明。又一个讲良心的机会被放过去了。正如恺撒在同庞培的一次会战之后所说的：“今天的胜利本来是属于对手的，假如在对手那边有谁会打胜仗的话。”[②]就连当时对政治局内的斗争持旁观态度的托洛茨基也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右倾分子能够俘获斯大林。”他指的是他们掌握着政府首脑的职位，担任着工会的领导，在理论方面处于领袖地位。机会确实存在……虽然，这毋宁说是一种想把愿望当现实的意向。不稳定的平衡持续时间不长，虽然有一段时间许多人确实感到布哈林的温和路线会占上风。但是，斯大林当时就已经是善于把自己的决定贯彻到底的无人可比的老手了。

曾经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李可夫和几乎是苏联工会连选连任的领导人的托姆斯基，都不认为斯大林是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他们支持布哈林并不是出于个人考虑，而如通常所说是根据信念。斯大林试图对他们的观点施加影响，但没有成功。有一回皮达可夫

> 实际工作是没有爱说“废话”的人的位置的。
> ——斯大林

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叫作“坚定不移的新经济政策分子”。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全部不幸在于，反斯大林的斗争是在办公室里、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进行的。此外，布哈林和他的拥护者还有很大可能被人视为“派别活动分子”。而深信斯大林的农业方针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布哈林，又想不出办法怎样更广泛地依靠那些不接受暴力、独裁作风和“非常措施”的人。布哈林试图重新同斯大林平心静气地对话。斯大林同意了，条件是布哈林完全投降。失宠的领袖痛苦地思索着：“有时我想，我有没有权利保持沉默？这是不是缺乏勇气的表现？”[30]但真要说“是的，是缺乏勇气”，他又不敢。对斯大林起先尊重而后来蔑视的布哈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抱着这样的希望：这个人会回心转意，讲良知，讲品德，讲耐心……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希望绝对落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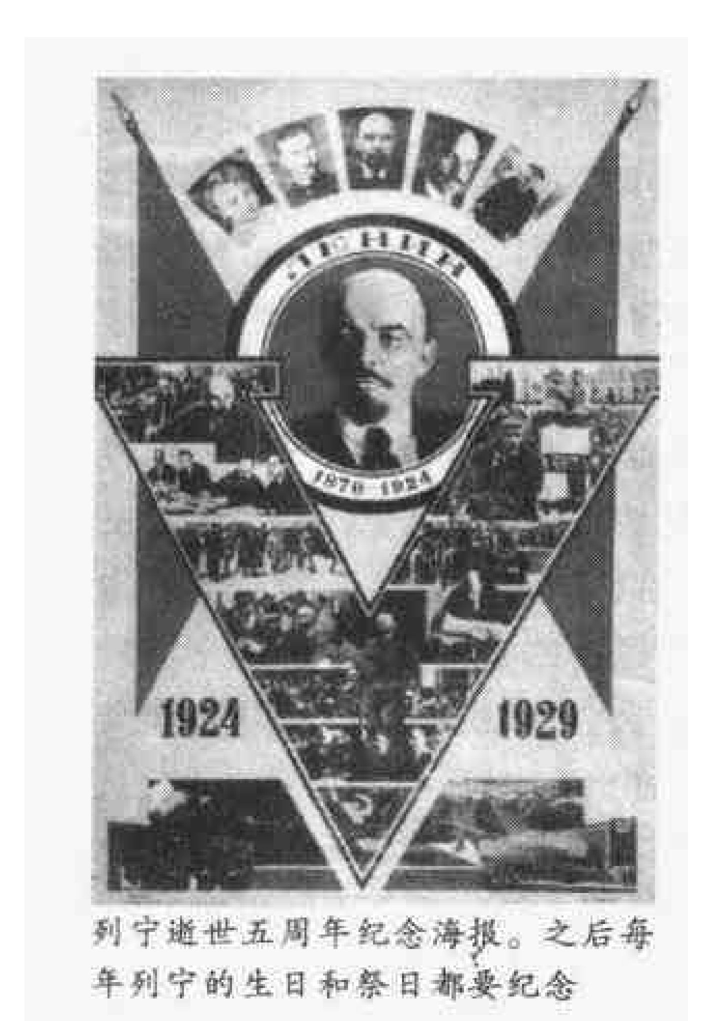
1928年9月30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布哈林的著名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以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关系急剧恶化了。在这篇文章中，固执的布哈林（列宁曾经把布哈林叫作“蜡”，而布哈林曾向斯大林证明，龟之所以这样硬，就因为它……软）再一次重申工业和农业无危机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布哈林把解决经济问题的其他各种办法一概称为“冒险主义的”办法。布哈林写道：“我们应当让那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因素发挥作用，把它们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这就要求统筹兼顾，让个人、集团、群众、社会和国家都能发挥主动性。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集中得太过分了。”

过了一星期，政治局谴责了布哈林的上述言论，而斯大林转入坚决的进攻。政治局内进

个建议，斯大林仍然抓住布哈林有“殖民地化”的思想对他不止一次地

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就是找不出折衷的办法。许多次会议都没有记录，只记了决定。这些决定证明，斯大林越来越占上风。布哈林处于少数地位。在一系列问题上李可夫让了步。托姆斯基动摇了。斯大林开始要求布哈林"中止自己的干扰集体化的路线"。在尖锐的对骂声中，布哈林一怒之下把斯大林称为"东方小暴君"。斯大林对他的攻讦没有理会，但是暗暗下定决心："我再也不需要他了。"

紧张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但是还在这以前，布哈林看到温和派的阵地在削弱，便采取了一个看来是考虑不周的步骤，于1928年7月11日突然来到加米涅夫的住所，实际上想同这位过去的"反对派"建立秘密关系，而这个"反对派"是他以前亲自帮助斯大林粉碎的。后来，布哈林又两次来到加米涅夫那里。会见是两人单独进行的。列宁的这两个过去的战友长谈了什么，看来我们永远也无法准确地知道。诚然，托洛茨基曾断言，在加米涅夫的笔记里谈到过：布哈林既暴跳如雷，又心情压抑。他没完没了地重复说，"革命完蛋了"，"斯大林是一个坏透了的阴谋家"。他已经不相信情况还能有所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在一张注明日期为1929年1月20日的秘密传单上扩散出去了。自然，对这种材料的真实性不能打保票。



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海报。之后每年列宁的生日和祭日都要纪念

布哈林的这些串连活动当然有人报告给斯大林，而在1929年4月全会上，这些串连活动成了反布哈林的最可怕的论据之一。同加米涅夫的串连没有给"温和派"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布哈林却"挣得了"一顶斯大林牌的"派别活动分子"帽子。于是布哈林决定诉诸社会舆论。在列宁逝世纪念日，即1929年1月24日，《真理报》登出了地位已经不稳的布哈林的文章《列宁的政治遗嘱》，这是他在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的追悼会上作的报告的复述。

在文章中提到列宁的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作决定的民主作风,等等。布哈林写到了最隐秘的东西:在列宁的文章中,"实行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前提是厉行节约,提高农民合作化的工作质量,这就是说,要通过最简便易行而绝对不搞任何**强制**(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的办法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许,这几句话集中表达了布哈林对当时全党关心的问题的观点。

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文章的标题提醒共产党人(他们知道而且记得):"遗嘱"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到别的职位上……这是最后一着了。尤其是布哈林在文章中痛苦地而且颇有预见地写道:"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政治上是昧不得良心的。"

我要再一次提请注意我在前面曾经谈过而在后面还要不止一次回过来谈的一个想法:真正有良心的人,要按良心办事总是有机会的。布哈林直到最后都力求利用这种机会;这要求有不小的勇气和牺牲自己、自己的前途的决心……许多人那时是多么缺少这种勇气,以后也是多么缺少这种勇气啊!良心——这是一种最精密的精神上和情感上的音叉,它能测量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公民觉悟的高低。一个工作人员可以有年轻或年老、普通或领导之分,但有一点是一样的:要表现真正的良心,就没有任何界限或先后次序。布哈林表明,他这个人始终把良心作为衡量公民觉悟的最高标准。

当然,在对布哈林的智慧和他对未来的先见之明表示折服的同时必须记住,他也像所有的人一样,有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他也是太晚才看透斯大林的。他的观点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他也出过令人遗憾的"偏差"。例如,发表在1927年1月12日《真理报》上的《恶毒的记录》一文对叶赛宁进行了完全不应有的抨击,说他的诗带有"叶赛宁式的土味儿"和"富农的野性"。文章好像是在攻击这位和另一些"农民诗人"之前发出的信号。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这一点只能表示遗憾。然而,斯大林指出的不是这些错误。总书记认为,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表现了富农世界观的实质,而他把富农"硬塞"给社会主义的方针完全是敌对性的。斯大林在脑海里和文件中搜索翻寻,想起了布哈林还有一桩罪行。在1924年中央10月全会上讨论农村工作问题的时候,布哈林出乎大家意料地提出了一个把农村"殖民地化"的建议!但是,布哈林所谓"殖民地化"是指从城市派遣3万工人下乡。尽管党在后来采用了这个建议,斯大林仍然抓住布哈林有"殖民地化"的思想对他不止一次地

进行严厉的谴责。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很清楚，所谓“殖民地化”不过是用词不当，它的本意是城市帮助农村。然而斯大林善于把小事情变成“政治问题”。

1929年审理联共(布)党内“右倾”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4月全会和11月全会，结束了由斯大林揭开序幕的粉碎“布哈林集团”的过程。斯大林在长达3小时的演说中猛烈攻击布哈林，指责他拒绝了政治局1929年2月7日向他提出的无异于要他屈服的折衷方案。而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确认在党内现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尽管在1928年1月以前，斯大林同布哈林一起工作基本上是和谐的，但总书记仍然肯定同他发生“意见分歧”有几个“阶段”，同时，斯大林大量使用一些骂人的字眼：“胡说八道”，“无稽之谈”，“布哈林的小本本”，“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巫师说鬼话”，“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夸夸其谈”，“布哈林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泥坑”，等等。

斯大林在自己的演说中给了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主要的打击。由于在列宁之后布哈林被公正地认为是党内主要的理论家，斯大林决心把他搞臭：“他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⑧]当然，在这里，斯大林不会放过引用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的机会，他特别强调列宁的评价的后一部分：“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没有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论家”。接着，斯大林又费了不少口舌来列举布哈林曾经同列宁发生过的所有分歧，并认为这都是在试图“教训我们的导师列宁”。斯大林认为，既然不久前这位“烦琐哲学的理论家”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⑨]，他那样对待列宁又何足为怪呢！斯大林就是这样来指摘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几次会见的，而这几次会见对他来说，自然都是知道的。

斯大林的长篇演说整个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在这篇演说中，除布哈林外，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遭到严厉的毁灭性的批判。顺便提一下，这篇演说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之后才在斯大林全集中发表的。布哈林和李可夫都被撤了职，但暂时还留在政治局里。既然全会的决议已分发

到一切地方党组织，全国就开始狠批"右倾分子"。《真理报》以及其他报刊系统地发表了痛斥"右倾分子"领袖的材料，而这同时也成了加速进行集体化的实际信号，使集体化不仅出现数不清的过火行为，而且用暴力破坏了农民世代相因的生活方式。自愿原则就更不去提了。布哈林在此以后仍然认为，工业产品的20%的增长额——是一个极限，过了这个极限，农业就经受不住了。正如我们知道的，斯大林则不同，认为还要把这个数字提高几倍。

1929年11月批准了党的全盘集体化的总路线，因为，按斯大林的说法，"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53]而布哈林仍然不思"悔改"，像要求他做的那样，于是在1929年11月17日他被开除出政治局。诚然，过了一个星期，由于意志薄弱，受到良心谴责、折磨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给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谴责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声明，在这场争论中党和中央是正确的。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承认自己的这些错误，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将坚决反对脱离党的总路线的一切倾向，首先是反对右的倾向。"

斯大林并不感到欢喜，因为在声明中没有直接指出他这位总书记是正确的。那么好吧。把布哈林干掉。

我想，在那时还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预见到不仅布哈林的悲剧即将来临，而且党的领导层中的整个温和派要失败。必须承认，有时我们的仇敌在一旁观察的时候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了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国外创办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第8期（1931年4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析了新经济政策的结果。这本反苏杂志强调指出，斯大林竭尽全力来"破除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幻想，破除演进的希望"。文章指出，总书记"已经不止一次地试图制服右翼共产党人，——但是由于种种内部原因，镇压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极点，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遭暴力摧残的结局被推迟了。把他们不仅最终开除出党的机关，而且最终开除出党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同情农民要求的新经济政策拥护者（虽然他们在心理上无力同专政一刀两断）已被撤职，但还没有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不过独裁者正磨刀霍霍，很快就要动手收拾他们"[54]。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不承认离开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民主党

人有眼力。莫非斯大林把这种预言看成了“暗示”？这本薄薄的杂志合订本就放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书橱里。不管怎样，斗争的逻辑，而主要是斯大林使用的方法，使得这位富有经验的分析家能够从中不仅捉摸到20、30年代之交农民悲剧的反映，而且捉摸到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和联共(布)领导层中的温和路线面临的必然结局。



恺撒
(公元前100–前44年)
古代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他集终身独裁官、执政官、大将军、大教长的大权及荣衔于一身，善于治军，足智多谋，政治上不囿陈规，是名副其实的军事独裁者。虽然他宽容政敌、尽量顾及不同阶层利益以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政策，但其独裁统治仍然引起共和派的严重不满。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被布鲁图和喀西约·龙基纳为首的阴谋分子刺杀于元老院。

布哈林“后悔了”，对自己的不彻底性感到极度痛苦。他心急如焚：怎么就不能说服政治局呢？他懂得，他不是一切都对。为了实现工业化，看来跃进是必要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当是什么样的牺牲呢？要知道，决不是人的生命……他到底也没有能够同意对农民全面采用暴力的做法。“消灭”富农，确切些说是管制富农，只能用经济的方法。布哈林的正剧还没有成为悲剧。那时在党内，大概谁也不可能料想到，30年代会成为腥风血雨的时期……一切都是在他1929年11月投降之后几乎过了10年才发生的。看来，编年史家在评论恺撒的灭亡时说得对：命运决定的东西，与其说是出乎意外的，不如说是不可逆转的。

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布哈林被捕前半年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当时刚刚审判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14名“同案人”。在这次审判中，被告人“供出了”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人，维辛斯基宣布开始对“布哈林案件”进行侦查。布哈林当时在中亚休假。他一回来就听说立了他的“案”。这位以前的“全党喜欢的人物”陷入绝望之中。他立即伏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未能找到这封信。接着他又把同样内容的信分送给政治局各委员和维辛

斯基。我面前摆着布哈林给伏罗希洛夫的两封信。为了使大家了解布哈林的正剧是怎样发展成悲剧的,我从信中摘引几段。

亲爱的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

你大概已经收到了我给政治局各委员和维辛斯基的信;我今天夜里已写信给**斯大林**同志秘书处请求把这封信发下去。信中写明了同加米涅夫卑鄙之极的指控有关的全部重要问题。(我现在给你写信还有一种似现实非现实的感觉:怎么,这是梦、幻影、疯人院、错觉?不,这是现实。)我只想(向苍天)问一句:你们全都相信吗?真的相信吗?

是的,我写过有关基洛夫的文章。顺便说一说,当我失宠被黜(活该)而又病在列宁格勒时,基洛夫来看我,坐了一整天,问寒问暖,拨出他的车皮,把我送到莫斯科。对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我对谢尔盖哪一点写得不诚实呢?请老老实实地把问题提出来。如果不诚实,你们就应该立即把我逮起来干掉:因为这样的坏蛋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们认为"不诚实",而你们自己又让我逍遥自在,那你们自己就是不值得尊敬的胆小鬼……

是的,只要我还有头脑,我就会认为从国际角度看扩大恶棍们的基础**是愚蠢的**(这意味着迎合加米涅夫这个坏蛋的愿望!他们需要表明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但是我不打算谈论这一点,请你们再想一想,我是在大政策前提下请求宽容的。

而我要的是真理:真理在我这一边。我曾经对党犯了许多过失,并且为此或者与此有关受过许多苦。但我要一次再次声明,最近这些年来,我始终是怀着极为忠诚的信念来捍卫党的政策和**柯巴**的领导的,只是我没有搞阿谀奉承。

接连三天飞翔在云端之上,真是好极了——零下8度,钻石一般的纯洁,安宁肃穆的气息。

我也许给你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要生气。也许在这种局势下你不愿意收到我的信——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为了防备万一",我要向你(你过去总是对我这样好)保证:**你完全可以问心无愧**;我没有因为你对我的态度使你受到牵连,因为我的确没有任何罪,不管别人怎样千方百计败坏我的名

声,迟早是会弄清的。

托姆斯基真可怜!他也许是"糊涂了"——我不知道。我不排除这一点。他一个人生活。如果我常到他那里走走,他也许不至于这样忧郁和糊涂。人的生活是复杂的!然而那是抒情诗。而这里是政治,是抒情味不足而严酷有余的事情。

人们打狗——这我非常高兴。通过审判案,托洛茨基已经死了,在政治上死了,这很快就会一目了然。如果战争爆发时我还活着,我将请求参加打架(这个字眼不好听),到那时请你帮我最后一次忙,在军队里哪怕安排我当一个列兵(即使加米涅夫的毒弹把我击中)。

建议你抽时间读一读罗曼·罗兰有关法国革命的剧作。

请原谅,信写得杂乱无章:现在我思绪万千,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乱跑乱窜。

拥抱你,因为我是纯洁的

尼·布哈林

1936年9月1日

伏罗希洛夫看过信后,认为有必要立即把信转交斯大林并回复布哈林,但要使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知道他是怎样回信的。为了防备万一,这位人民委员准备了政治上的无罪证明。他指示自己的助手,迅速起草了两个文件:

绝密。亲启。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卡冈诺维奇同志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安德列耶夫同志
丘巴尔同志
叶若夫同志:

遵照**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命令,随同**尼·布哈林**今年9月

1日写给你们的信(No2839C.C.)送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布哈林**的回信抄本和**尼·布哈林**的回信抄本。**附件**共3页。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副官、师长

赫梅利尼茨基

1936年9月4日

而伏罗希洛夫给自己原来的同志写的回信,则体现了当时在专制君主周围一班人中间已经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气氛。

布哈林同志:

退回你的来信,你在信中竟敢对党的领导进行卑鄙的攻击。你想通过自己的信使我相信你清白无(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可是现在你使我相信的只有一点:今后离你更远点,无论对你的案件侦查结果如何,如果你不以书面形式放弃那些加在党的领导身上的可恶的形容词,那我将把你看成坏蛋。

克·伏罗希洛夫

1936年9月3日

可以想象,布哈林会感到多么吃惊,尽管他内心深处明白,斯大林斩首机的屠刀早已悬在他的头顶。布哈林可能会记得,罗伯斯庇尔在热月8日即自己灭亡的前夕曾经在国民公会发出感叹:"人们在骗子的帮助下走向暴政,那些同骗子作斗争的人走向哪里呢? 走向坟墓和永生。"布哈林是否进行了斗争?请你们自己判断。读了伏罗希洛夫的杀人信之后,布哈林竟然还有力量给"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写回信。

伏罗希洛夫同志:

收到了你的**可怕的**来信。

我的信的结尾是"拥抱你"。

你的信的结尾是"坏蛋"。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呢?

每个人都有,或者确切些说,都应该有自己的个人自豪感。但是我想消除一个政治上的误解。我写的是**私人性质**的信(现在我

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是在心情沉重的情况下写的;我受到陷害,无奈之中就向大人物写信;我一想到可能发生什么情况,一想到有人真以为我有罪,我就会发疯。

于是我大喊大叫地写道:"如果你们认为 '不诚实'(例如,认为我写的有关基洛夫的文章"不诚实"),而又让我逍遥自在,那你们自己就是胆小鬼,"等等。其次:"**如果你们自己不相信**加米涅夫的编造的谎话……"等等。怎么,你以为我认为你们是胆小鬼或者把领导称为胆小鬼吗?恰恰相反,我这是说,因为谁都知道你们不是胆小鬼,所以你们不会相信我会写不诚实的文章。这从信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既然我写得杂乱无章,以致可以把这理解为攻击,那么我[不是由于对犹太人(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恐惧,而是就事情本身而论]可以三次以书面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收回所有这些话,虽然我想说的完全不是你所想的。

我认为党的领导是卓越的。就在给你的信中,我没有排除你们把我搞错的可能性,我写道:"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卓越的**人物和**优秀的**政治家也犯局部性的错误"……难道信中不是这样写的吗?这也是我对领导的真实态度。我早就承认这一点,而且将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一点。我敢说,这些年以来,我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我请求消除**这个**误解。对于上一封信,我十分抱歉,今后决不以任何书信来使你为难。我的神经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因此才写了那封信。可是我必须尽可能耐心地等候侦查结束,我相信,侦查将证明我同匪帮毫无关系。因为这是事实。

永别了。布哈林

1936年9月3日[35]

布哈林说:"永别了。"但斯大林再一次对快要被掐死的布哈林松了手。1936年9月10日《真理报》宣布,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检察机关没有发现证明犯罪事实的材料,终止本案。然而这只是暂停,斯大林决定,悲剧的下一幕由皮达可夫主演。演出的顺序是由他本人排定的。布哈林排在2月出场……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将不仅在理论上"论证"



扫清了宝座的斯大林，对于未来，目光中越发透露出果决、坚定

血腥屠杀的必要性，而且将把新的牺牲者放在斯大林的屠刀下……

斯大林已经清扫了宝座，列宁的又一位战友靠边了。“领袖”感到，他已经可以、已经有权个人独断作出最重大的决定。斯大林想，难道这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同领袖在革命中的作用矛盾吗？

关于专政和民主

《国家与革命》

本书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学说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917年8-9月藏匿在芬兰秘密写成，1918年出版。

在书中，列宁提出了其著名的论断，即“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与法将消亡。”书中阐明了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不仅清除了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加以丰富，使它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普遍规律。

在斯大林的藏书中，《列宁全集》的一卷卷书上都有斯大林亲笔作的密密麻麻的标记。这里要指出一个细节：总书记在阅读、研究列宁著作时，也可能是在查找需要的语录或思想时，对列宁论民主的思想不大感兴趣。但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却作了无数标记，尽管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我再说一遍，专政和民主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

……1917年初列宁在远离俄国的地方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著述。以著名的“蓝皮笔记”载入史册的那本笔记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在7月份临时政府企图摧毁布尔什维克党和从肉体上消灭革命领袖的那些危险的日子里，列宁在拉兹利夫继续写自己的著作。列宁根据自己的“笔记”中所作的大量的札记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原理和思想，在8—9月的几个星期中写出了自己的天才著作《国家与革命》。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又一次恭读了列宁的这部著作，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

列宁论述过渡时期国家的思想，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问道：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他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作了回答：“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我要着重强调一点：列宁把专政当作对剥削者和压迫者实行镇压的工具。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必要从阶级关系上对社会进行改造了，也没有必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了。

民主与专政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专政。我再引一段《国家与革命》中的话。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31]列宁这一段强调充分发扬民主的论述特别重要，但是总书记对它实际上并不重视。

在1917年10月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暴力。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的斗争是为了夺取胜利，站稳脚跟，求得生存。但是不知怎样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不仅在资产阶级书刊中，而且有时在马克思主义书刊中，特别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只谈专政的这个侧面。而列宁则一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建设职能、民主职能不仅极为重要，并且还要发展成为主要的惟一的职能的趋势。很遗憾，实际上斯大林至少不同意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看来，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劳动者政权中，任何时候暴力因素都是主要的。

列宁曾经说：“……不是机关……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机关。”[32]还在30年代初目光敏锐的人就能感觉到这一论断反映了实际情况。当时形成了一种官僚的专政，集体官僚的专政。而官僚又逐渐造成一个优选出来的阶层，一大批分成等级的长官。指示几乎变成了社会交往的主要手段。一切问题都在办公室里决定。各种会议——例会、代表大会、全会只是“表示同意”，“表示拥护”。民权制度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官僚机器的齿轮转得不快，但不可逆转。斯大林坐在主要控制台旁边，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窗口瞭望着他用心血培育的产儿。向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变得这么荒谬反常。

斯大林从来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民权制度的本质。翻阅一下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札记、笔记以及讲话记录就能看出：他认为民主无非是一种拥护（仅仅是拥护！）党的决定的**自由**。既然

斯大林认为他——总书记就是党的化身，那么真正的民主就表现为**同意、赞成**他的结论、决定和意图。并不是每个人一下子就看出，斯大林在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李可夫以及与他看法不一致的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清算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他们同列宁主义有分歧，而不是同他有分歧。斯大林所玩弄的最阴险的反民主的手法之一就是把他自己的立场、观点、决定与列宁的立场、观点、决定混为一谈（在一切场合！）。并不是每个人一下子就看出，由于斯大林耍了手腕，无论是谁在同他辩论和交锋中都不可能成为正确的一方，因为要想成为正确的一方，实际就是要让列宁出丑！

诚然，在一些问题（例如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上斯大林的主张是从列宁的立场出发的。但是，要知道斯大林归根到底能说会道，经他一说，他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对"后期"新经济政策所持的否定态度、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对集体化实质的错误理解以及夸大机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等等都成了对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正确解释！一次，在布哈林被赶出政治局的前夕，斯大林同他争吵时在气愤中就冒出几句：

"你们一伙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些巫医。你们谁也不理解列宁！"

"这么说，只有你一个人理解？！"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理解列宁！难道你不记得列宁训过你多少次，说你'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混乱？"

在1929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全会上，斯大林几乎也是用这几句话来"压"布哈林。斯大林的一切冗长的议论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他斯大林在捍卫列宁主义。他对民权制度和民主的理解也不例外。总书记垄断对列宁原理的解释权，这是后来发生的众多灾难的根源之一。然而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言之凿凿地证明，斯大林以对列宁遗产的惟一"捍卫者"自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搞的是教条主义。

在1933年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斯大林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和敌对阶级的残余"进行斗争的任务和成绩。明明说是"残余"，斯大林仍然号召同他们作"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却只字不提对许许多多"失势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进行改造、把他们纳入新生活的轨道的问题，虽然只有这

样做才能更快更有成效地改变他们的思想情绪和"阶级本能"。斯大林在描述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社会的阶级状况时说:"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钻进我们的工厂,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钻进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企业,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钻到那里隐藏起来,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斯大林接着说:"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当然是带着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心情,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势、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惟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于是他们就暗中活动,竭力进行危害勾当。他们放火焚烧仓库,破坏机器,组织怠工。他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组织暗害活动,而且其中有些人,包括某些大学教授,在疯狂地进行暗害活动时竟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牲畜中间散播瘟疫和炭疽热,在马匹中间散播脑膜炎等等。"[9]

对1933年初国内情况描绘出这样一幅阴暗图景,只是使正直的人们惊慌失措。到处都是敌人、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的残余,而且他们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仍然像苏维埃政权头几年那样危险。当然,有敌对情绪的、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人确实不少。这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们完全不会造成像斯大林描绘的那样可怕的威胁。而他所以这样描绘,仅仅是为了得出下面的结论:"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9]总书记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惩办职能即暴力职能上。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作了多次这样的讲话。当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意识,即既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冲天的干劲和集体主义的乐观精神,同时又开始出现猜疑、不信任周围的人而轻信关于"人民公敌"的荒谬透顶的臆造等思想苗头。假如人们的思想没有在这方面一步一步地作好准备,那么1937—1938年间不折不扣的疯狂行动就不会发生了。生活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千百万人民逐渐习惯于认为,在他们的朋友、同志中,在生产单位、大学、部队、创作集体的同事中,有敌人"躲在暗处"伺机而动……一个号召、一个口号、一项指示都



斯大林在1930年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期间

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根本区别于过去发生的任何一次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帝国主义阵线，产生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时代，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界历史进程。

能够把许多人"动员起来"，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从这里到恐怖行动仅一步之差。至少这是在为采取恐怖行动作准备。看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大林在阅读列宁在1917年11月1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时，虽然在上面作了许多标记，却避而不理会这样一段话："……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80]斯大林没有准备接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相反地，总书记认为，采取暴力手段是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固有组成部分。斯大林在1930年夏天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说："高压手段是进攻的必要因素。"[81]

而国家实际上正在大踏步地前进。1930年，工业生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180%。到集体化开始时，农产品的产量相当于战前的水平。国家正处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阶段。扫盲工作进展很快。千百万人得到了学习研究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的机会。人民意气风发，国家蒸蒸日上，尽管当时发生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一悲剧性的极为痛苦的过程，并且在国民经济、文化、科学的管理上逐渐形成了死板的官僚主义指挥体制。十月革命这一革命动力还在继续调动人们在社会意识、劳动和社会活动中的积极性。集体道德的准则逐步确立。人们认为当时正是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

发展民主原则的大好时机。但是,在列宁去世后,这些原则没有得到多少明显的发展。

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民主这个侧面,迟早都有可能"断绝"群众的创始性社会活动,把人们变成盲目的执行者,变成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然而斯大林没有抓紧"释放"社会主义的民主潜力。也许当时已经找不到人来提醒总书记注意列宁的如下教导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42]在十月起义后的第二天,列宁就说过:"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43]这句话在当时即1917年具有现实意义;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而在今天尤其重要。

斯大林多次思考过民主、专政问题。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卷卷列宁著作是藏书的主人作过多次思考的无声的见证人。专政与民主相比是占第一位的,斯大林对此没有怀疑,因为这是经典作家说的。他一般很少有怀疑的时候,如果总书记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少有人能"看得见"。他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似乎是用来塑造那些不久将耸立在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城市的广场上的不计其数的千篇一律的大理石塑像的。斯大林透过厚实的窗帘的缝隙凝视着克里姆林宫,他心里想:"布哈林一伙对专政和民主的解释多么狭隘,多么书呆子气啊! 例如,谁都明白,工人阶级的作用必须改善,必须提高! 每个农民都应该把工人看作自己的领袖!"斯大林记得,去年,即1930年10月,当他斯大林建议将工人"牢牢地固定"在自己的企业里时,他就听说下面隐约有不满情绪。要知道,是他提出"在最近两年中禁止提拔熟练工人到一切管理机关(不包括生产单位和工会组织)"。可是半年后他就察觉到这个决定在国外反革命势力中也引起了反响。一个名叫C·施瓦尔茨的逃亡在外的孟什维克在《社会主义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人阶级和专政》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写道:由于他斯大林的缘故,出现了"把工人排挤出管理机关、把工人变成劳动阶层的倾向,要求工人只是拼命干活和无条件地服从在社会结构中与工人毫不相干的专政"[44]。那些人甚至发明了"专政的纳税阶层"、"劳动阶层"这样的字眼。啊,这些革命的掘墓人!如果不是许多年前把他们打垮,那么他就进不了克里姆林宫,并且一切都

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二月革命的早产儿。

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报刊和敌视这些报刊的托洛茨基都那样拼命地攻击党的机构和专政？这些都是政权的最重要的工具，难道还不清楚吗？总书记的这些想法使他一再认为自己的观点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机构是专政的工具，而没有专政，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和民主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斯大林当时巩固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如说是官僚的专政。

斯大林常常说平等和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起码的前提。1936年斯大林在同负责编写教科书的一些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指出：

“我们的民主应该把公共利益摆在第一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比几乎等于零。只要还有懒汉，还有敌人，还存在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现象，也就是说还存在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人，那就需要进行斗争……”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比几乎等于零。”我们没有察觉这类格言的严重缺陷，并且逐渐教育人们懂得我们都是全民财产的主人这个道理。而属于大家的东西也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主人翁感就渐渐消失了。平均主义原则渐渐占了上风。一个工人尽管搞成功一项能够创造上百万利润的发明，但是可以不发给他几千奖金，惟一原因是这给一个人“太多了”。于是人们逐渐变得怕“多干活”，眼看着有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和明目张胆进行盗窃也心安理得：“怎么啦，国家还能因此变穷吗？”这就是斯大林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比几乎等于零”的论点结出的“硕果”。而斯大林的“民主”则使人们长期处于无视个人利益的状态。对人们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是强制手段、行政手段、恐吓手段以及独裁者胜利建成的体制的其他杠杆。

斯大林不“反对”民主。他之所以不反对，是因为他是像一个专制君主那样来理解民主的。要知道，许多极权人物也并不反对建立顺从的议会，并不反对搞那一套传统的做法，如进行选举、宣誓、建立徒具形式的代表机关。对斯大林来说，作为社会主义民权制度体现的民主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和被容忍，取决于它是否能巩固斯大林的个人专政。斯大林在和威尔斯谈话时，谈来谈去主要就是讲政权是“改革的杠杆”、新法制和新制度的杠杆。但是，他没有一次从民权制度的角度

来谈政权。没有一次！斯大林对世上任何东西都不曾像对充分的、无限制的、受到千百万人"拥戴"的权力那样偏爱。在这方面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世界上从来没有，看来也绝不会再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把人们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变为现实，即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并以此换取比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多得多的人的盲目爱戴。而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斯大林对专政和民主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后来，斯大林把"自我牺牲精神"看作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象征之一。当计划在西伯利亚、北极地带开展新项目的建设时，补偿"自然减员"的需求额都是通过"计划"来确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甚至把各地区的"容量"、把囚犯组成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特殊后备队都打进了计划。20年代末已经不再缺乏廉价和无权的（常常是被判死刑的）劳动力了。关于利用犯人的一切"倡议"，都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斯大林或者对助手随口说一声"同意"，或者在文件上大笔一挥，签上个字。这意味着，负责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利用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人民公敌"的主管部门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批准。

我在这里先交代一下：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不止一次说明，下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组织的建设任务过重，"人力"不足[45]。斯大林"作了答复"。

1938年8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开会讨论提前释放劳动表现好的犯人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

"可不可以这么办，让这些人继续留在劳改营？否则，我们放了他们，他们一回到家里又会走到老路上去。劳改营的气氛不同，人在里面不容易变坏。我们认购公债不是自愿和强制相结合吗？那就让我们留人也采用自愿和强制相结合的办法。"[46]

"领袖"的指示是清楚的。于是通过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的命令，规定"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服刑的犯人必须按法院判决服满刑期"。这就是斯大林的民主。

建立强制机器和强大的惩罚机构是民主原则削弱的后果。教条主义在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等领域迅速泛滥起来。然而我想让读者注意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民权制度，很快就导致如下的后果，即出现过高估计个人作用的苗头，吹捧个人的功绩，把斯大林描绘成神秘的救世主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本人对待别人对他个人的赞扬采取的态度（许多人还在个人迷信达到高峰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现在再摘引一段总书记在1931年12月13日同艾·路德维希的谈话。

路德维希：在国外，人们一方面听说苏联是个一切事情都必须由集体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听说一切事情都是由个人决定的。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

斯大林：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我们的工人现在决不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个人专断。

路德维希问斯大林是如何对待耶稣会士的方法的。

斯大林回答说：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监视、搞间谍活动、刺探别人的隐私和侮辱人，这里能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呢？

路德维希：您不止一次地冒生命的危险，而且遭到过危险，您受到过迫害，您参加过战斗，您的许多亲密的朋友都死了，而您还活着……您相信命运吗？

斯大林：不，不相信……这是偏见，是胡说，是神话…的残余。可能有另外一个人来担任我的职务，因为总有一个人**必须**担任这个职务……我是不相信神秘主义的[10]。

我们看到，斯大林善于作出貌似“正确”的回答。但这完全不意味着这些话反映他的信念。

人类的许多灾难，包括个人迷信性质的灾难，其深刻根源之一就在于像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弗那样的人的两面性（双重人格）。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批判领袖至上主义，同时又巩固领袖至上主义；批判耶稣会作风，同时又在实践中加以鼓励；口头上讲集体领导，实际上把它变成十足的一长制，——这对于斯大林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常规。两面性这个谎言的派生物、反真理的产物，是神化独裁者的基础之一。

在30年代初，斯大林已经大大减少了他（原来就极少的！）对各地区、企业和部队的巡视。一方面是他不懂生产，也不想深入了解有关工艺、劳动生产率以及赢利率等方面的“尘世”琐事。另一方面他经常有一种预感，似乎有人在策划加害于他。要知道他是有敌人的，无论是托

洛茨基还是“失势者”中的什么人都有可能采取极端行动。他的“机关”一直在报告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就是乌尔里希又一次送上的报告：



斯大林在各地区巡视时，同格鲁吉亚妇女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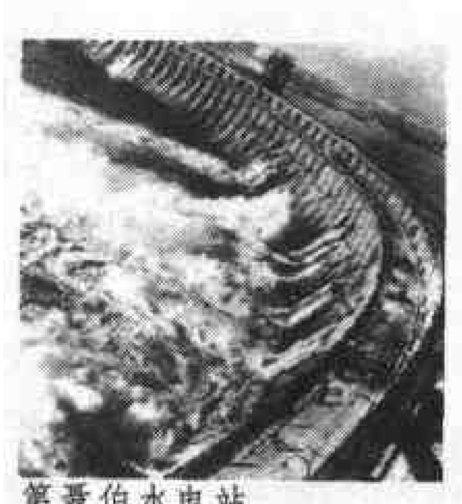
> 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维·斯大林同志
>
>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经过两天不公开的审理，今年12月16日对接受一德国国民的任务策划于1935年11月7日在红场采取恐怖行动的特务和恐怖分子集团案件作出判决。Г·И·舒尔、В·Г·弗雷曼、С·М·佩弗兹涅尔、В·О·列文斯基判处枪决……[19]

斯大林没有往下看，他想到：“有人在伺机谋害我”，而他要把这些残渣余孽连根拔掉，一定要拔掉。



地图前的斯大林

斯大林之所以很少在人群中“露面”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因此他懂得，在人前亮相愈少，愈易于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他所希望的形象。不可捉摸、神秘莫测、含而不露，同时还带有神圣、神奇、超人的色彩等等。因此他不再去参观劳动集体，而是仔细分析文件，经常看新闻片，听取多得不计其数的各种报告，面对地图（这是鲜为人知的）沉思。



第聂伯水电站

斯大林喜欢站在地图前，像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那样打量着俄国的辽阔版图。他的想象力并不丰富，但却常常在想象此时此刻千千万万人正在为落实他这个领袖的各项指示而辛勤劳动的情景。有时他用指头在地图上挨着个儿找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第聂伯水电站、白海—波

罗的海运河、库兹涅茨煤田,久久地凝望着科雷马边疆区。为了看清楚这些“边疆区”,甚至还要往右移动几步……一次,他像往常一样面对地图沉思,忽然他打电话问伏罗希洛夫:红军学不学地理?红军战士对我国地图熟不熟悉?斯大林总结说:研究祖国版图可以培养自豪感、对我们的事业和思想的忠诚……伏罗希洛夫对这种别出心裁的提问没有思想准备,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了几句,答应去弄清楚。第二天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根据伏罗希洛夫的指示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报告:

斯大林同志:

现将您询问的有关红军战士学习地理的情况报告如下:根据专门的教学大纲,地理是所有红军战士的必修课。除在一般文化教育课程中设地理课外,政治课上也要学地理。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研究地图。

今年除部队原有的地图外,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又增发22万张地图、1万本地图集、8000张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地图和1万个地球仪。

克·伏罗希洛夫

1935年6月28日[49]

斯大林满意地看完了报告,仍然坐在靠椅上,看了一下地图。尽管他离墙不近,然而他看得见斯大林格勒、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纳巴德……

列宁去世后不久出现了一种很成问题的突出领袖的做法: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学家的名字为一些市、区、企业、大学、剧院等等命名。报上报道莫斯科的斯大林化工厂、特维尔的伏罗希洛夫纺织厂、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第一和第三造纸厂、古西赫鲁斯塔利内的布哈林工厂等提前完成季度计划的消息已经成为惯例。实际上到了20年代末,我国所有的地区都有行政的、生产的、文化的单位或机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这样一来,在人们的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对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历史和未来起了突出的、有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非理性的)作用。在一切有关业务工作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能听到对领袖的赞扬,顺带还有对地方一级“领袖”的吹捧。


莫斯科市委书记赫鲁晓夫

下面举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赫鲁晓夫在1932年6月市委全会上说:“党的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正确领导、卡冈诺维奇同志为我们日常工作所作的各项指示、工人的冲天干劲是我们完成莫斯科党组织面临的各项任务的保证……”这些祈祷式的咒语成了斯大林时代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是那么富有生命力,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十年中人们都在套用。此外,这种突出领袖的做法不单是在神化领导人,而且可以说是对全体人民的侮辱,因为人民尽管是世上万物的创造者,却被变成了感恩戴德者,而不是主人翁。这自然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人们抛弃了天上的神明后,又在地上造就神明。

是的,正是在造就神明。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搞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方面最为积极卖力。他们赞美斯大林的声音最响亮。非常离奇的是,参加这个大合唱的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被贬黜的领导人。有时看了他们的讲话和文章,特别是看到季诺维也夫追悔莫及,为过去的错误鞭挞自己,并颂扬“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志高瞻远瞩和英明贤达”的时候,心里总有点不自在。甚至布哈林也作了肉麻的吹捧。有谁知道呢,可能是他们确实改变了对他们为之战斗过的一切的信念,或者不过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扼杀了理智。拉狄克比谁都卖力。斯大林有一次在一个小范围内说他是“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没有坚强的信念”。

1934年拉狄克写了一本描写斯大林的小册子,书名叫《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该书是以虚构的社会主义胜利史为内容的讲稿。作者设想在1967年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在“星际新闻学校”将开设这堂课。仅仅这一点(1967年!)就表达了拉狄克的心愿,即希望当时已担任总书记职务12年的斯大林在33年后(!)仍然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方向盘。下面我们摘引小册子的一个片断,全书的格调大致也是如此。“政治领袖在党内和在历史上占有的位置不是由选举,也不是由任命决定

的，虽然在像联共(布)这样民主的政党内必须经过这样的选举和任命才能占有领袖的位置。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在为实现党的战斗路线的斗争中、在为组织党的未来战斗的斗争中确定下来的。斯大林在列宁生前就属于党的领导层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今天他已成为党内公认的、受爱戴的领袖……”[⑩]小册子共印22.5万册，这个印数在当时就很可观，并且还多次再版。据说，在“不妥协者”中间有人用话刺拉狄克这位不久前的托洛茨基分子说：你不久前讲到斯大林时口气完全不同，这该如何理解呢？拉狄克自有办法回答：“如果像我这样的反对派生活在罗伯斯庇尔掌权的年代，那么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已被推上断头台了……”拉狄克在这里不过是说中了他在三年后得到的下场：他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加米涅夫也好，已经承认自己的思想错误并且准备执行“敬爱的领袖”的一切旨意的其他许多人也好，都没能因为歌颂了斯大林而得救。拉狄克不明白，我们周围的许多事物竟如过眼烟云，虚幻而飘缈。他想说成是永恒而不可动摇的那些东西，如“领袖”的伟大和光荣，也只有与他自己相比才是（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是！）那样。只有变化无穷这条长河才永远不会干涸。

在官方报纸歌功颂德的同时，历史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遭到篡改，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领导十月革命的是两个领袖，即列宁和与他形影不离的斯大林。阿多拉茨基在《列宁全集》的前言中就说：列宁的著作应该结合斯大林的著作一起研究，“领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集中阐述了列宁的思想，如此等等。


题为“领导十月革命的是两个领袖”宣传画

还在个人迷信达到高峰之前，已经在为斯大林写政治传略，想让他永垂不朽。在斯大林的档案资料中保存着一封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总书记的信。信中特别提到：

“今天谢尔戈动身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同您谈了(原文如此。——

本书作者注)我打算写《斯大林传》一书的事……"

信上有总书记像往常那样用铅笔写的回答：

>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反对，我认为还没有到写传的时候。
>
> **约·斯大林**
>
> 1931年8月1日[50]

"还没有到写传的时候"，这个批示很说明问题。一个人的胜利仅仅才开始。农民阶级还没有被摧毁，大批的工厂才刚刚建起来，列宁近卫军的大部分人，首先是那些很了解他10年前的情况的人还活着。当时只有几篇文章跟伏罗希洛夫为庆祝"领袖"50寿辰而写的颂词类似。关键是要循序渐进，贯彻始终，一往无前……重要的是在人们面前要永远保持谦逊的态度。这不，今天他就发现，由于没有坐到会议主席团的第一排，而是坐到第二排，下面的掌声就更热烈。人们踮着脚，想看看他那不高的个子。"写传的时候"会来的……

然而给领袖写效忠信和向领袖汇报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例如1931年4月7日，东西伯利亚边疆区奥洛维扬尼科夫斯基区察苏切伊村斯大林公社给莫斯科寄来了报告，《真理报》把它登出来了：

> 公社提出了扩大播种面积的响应计划，把原来打算的（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播种262.5公顷的指标改为播种320公顷……我们拥护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杰出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党的总路线！我们拥护四年内全面实现五年计划的号召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的方针！
>
> 受斯大林公社社员委托
>
> **克利莫夫、托克马科夫**

不久，每个企业、每个集体农庄、每个国营农场、每所大学、每个机关的每一次会议都开始通过类似的信件。社会意识开始变形。从此个人迷信的神话成为社会意识的惟一养料。宣传工作中越来越多地强调信仰，即凡是斯大林说的、表述的、提出的都是不可违反的、正确的、不需要加以证实的。换句话说，斯大林几乎成了神。神话成了整个社会生

活的基础，这些神话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简单的公设：

党和人民的领袖是最英明的人。凭着他的才智能够回答过去的一切问题，明察现在，看清未来。“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党和人们的领袖充分体现了绝对的善和对每个人的关怀，他反对恶、愚昧、背信弃义和残暴行为。这是一个留着唇髭的人，他满面笑容，抱着一个双手举着一面小红旗的小女孩……



总是能在适当的场合充分体现绝对的善与关怀的领袖斯大林

这一套神话（没有它们就搞不了个人迷信），一经配上各种效忠活动，如必须引证杰出的列宁主义者的原则指示、通过响应计划、写感谢信、搞各种有象征意义的活动等等，就越加深入人心。把斯大林捧得越高，客观上就越是贬低人民。德国作家利希滕贝格有一次说得好：“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之所以享有盛誉，从某种程度上说，向来都是因为赞扬他们的人目光短浅……”

斯大林本人是否明白，为他歌功颂德的过程是在不断地贬低党、贬低人民、贬低社会？他可曾察觉到这个方针是违反道德的？总书记采取过自觉的步骤来加强极权统治吗？对所有这些只应有一种回答：是的，他明白，他察觉到了，他采取过步骤。斯大林有时作出的某些“谦逊”姿态也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赞颂这个目的服务的。所以他支持那些令人厌倦的、没完没了的为他歌功颂德的效忠活动。当成千上万游行者高举数以百计的斯大林的同一画像行进的时候，当每天的《真理报》上都可以找到几十处提到他那“钢铁”姓名的时候，当任何一项成就的取得都要归功于他的英明、关怀和预见性的时候，斯大林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斯大林尽管没有读完宗教中学，但是他懂得迷信“工艺学”、迷信心理学和迷信的种种表现。

斯大林知道，历史上除了对领袖、神、皇帝的迷信外，还有人试图制造对其他东西的崇拜。罗伯斯庇尔和国民公会的其他代表就曾试图在人民的意识中培植对“主宰”的崇拜。在国民公会的法令中说：“人履



此时的斯大林在国内已是众心归一，权力稳固



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宣传海报。反映了各族人民都衷心拥戴这位领袖

行自己公民义务的行为，就是名副其实的崇拜主宰的行为。"这实质上是共和国新立的国教。罗伯斯庇尔手持花束和麦穗，在庆祝"对主宰的崇拜"的盛大典礼上讲话。他希望共和国的公民们在这种崇拜的帮助下都成为履行义务、珍惜荣誉的英雄。罗伯斯庇尔大错而特错了。斯大林在阅读描写罗伯斯庇尔的著作时不会不明白，罗伯斯庇尔并没有抓住要害；应该巩固自己的政权，树立对自己的崇拜，而不是去塑造全人类道德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总书记认为对道德的崇拜是自由主义者即道地的知识分子的创造，是资产阶级的臆造。

要搞个人迷信……在这个问题上不得有失误。因此，托夫斯图哈、德文斯基、坎涅尔、梅赫利斯、还有后来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每天负责审查、签署拟在报刊上发表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关于斯大林的材料和斯大林的照片。最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还要让总书记亲自过目。他不时地用铅笔加几个字，使"斯大林同志"的"出类拔萃"、"洞察秋毫"、"坚决果断"、"关怀备至"、"智勇双全"等等品质更加鲜明突出。斯大林本人早就懂得，领袖的良好外表（现在叫作"形象"）主要表现在外表的稳重、沉着和不慌不忙的庄重神态。难道在沸腾的世界的一片纷乱中这不算难得的甚至是罕见的品德吗？

有时人们在讨论发生在那个复杂时期的无数问题时，想要弄清：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第一个"号召"为总书记歌功颂德的？人们又提到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但是，我仍然认为个人迷信的现象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不是伏罗希洛夫急急忙忙地来为斯大林唱赞歌，那么总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开这个头。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几乎没有一点公开性，对最高决策集团的活动完全没有真正的来自下面的监督，过分地"保密"，——这一切导致了领袖至上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种种效忠活动。

造成迷信的"奥秘"不在于一些个人，而在于列宁去世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一过程。当时国家、党和社会的体制实际上不能实现社会保护。权力的政治机制不完善使得有可能把一个人的意见、意志、怪癖冒充为人民意志的表示。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什么体制，经验还不多；对列宁提出的警告完全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态度；长期存在的外部威胁造成了我们是个"被包围的要塞"的气氛，因而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人们总是自觉地限制民主。没有建立领导人真正都是选举产生、可以罢免、

不断更新的制度,形成了官员都是“层层任命”的做法,机关拥有无上权力,暴力被当做解决社会上各种问题的万能的手段(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斯大林的那些说法:“推行集体农庄制”、“压死敌人”、“消灭富农阶级”、“给同谋者以致命打击”),——这一切便造成了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严重变形的前提。各种神化个人的无稽之谈便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起主要作用。

当然,形成个人专权的原因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存在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的历史和传统中。在这方面斯大林的主要思想“功绩”在于,他凭借自己极其敏锐的头脑最终使得他的名字同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伟大的事业融为一体。下文自然就是:歌颂、捍卫、巩固社会主义同时就是歌颂、捍卫、巩固列宁之后真正的惟一的领袖斯大林的地位。还要指出的是:对于列宁去世后应当有一个领袖这一点,在党内实际上是没有怀疑的。斯大林比谁都更早懂得群众要求极权制的情绪,懂得迅速发展的机构在巩固窃取个人权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斯大林在组织方面的“功绩”就更加明显了:他把党变成了个人权力的工具。至于苏维埃,它从20年代末起就处于从属地位,后来只起辅助作用,有时干脆名存实亡,所以苏维埃已经丧失了实权。党本应实现对社会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但是它完全承担了国家政权的职能。这就使国家政权失去创造活力,把它变成了斯大林专政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外部因素对国内个人高度专权制的形成的影响。由于存在帝国主义进攻的实际威胁,党就掌握了长期有效的无可争辩的论据,用它来为实行集中制、限制民主、把国家变为半兵营(当然就需要有政治统帅)“辩护”。逐渐丧失自己的独立性的共产国际,利用各国共产党的威信来美化斯大林的领袖至上地位。决定与苏联合作的少数资产阶级活动家也认为同斯大林打交道比同国家化的党打交道要强。

这样一来,在那个时期一切或者几乎一切(良心除外!)都在为斯大林“出力”。同时不能不考虑到还存在着一些有利于斯大林的主观因素,如他强调忠于列宁主义、表面上“谦逊”以及他的出身等等。这一切都使斯大林有可能从容不迫地朝着他所追求的实行极权的目标前进。而最可怕的是,人民和党的绝大多数都相信,斯大林的个人专权的方针就是社会主义。当时很少人懂得绝对的权力绝对能够起腐化作用这个道理。

因此，关于是谁顺顺当当地带头搞起个人迷信的种种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主要的不幸不在于有人带头歌功颂德，而在于人们没有想过是民权制度才把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我认为可以这么说：个人迷信现象，这是权力与人民、领导者与社会的变态的社会关系。这在社会意识中表现为人民享有的**抉择自由**被取消，表现为对过去采取轻蔑态度，表现为神话般的空想主义，表现为信仰（而不是真理）主宰一切，表现为过多地注重集体利益而损害个人利益。个人迷信的出现，这首先是**自由的悲剧**：社会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以及道德自由的悲剧。自由成了迷信斯大林的主要牺牲品。但是，这里已涉及个人迷信的本质问题，即我们下面将用一章着重论述的问题。

我们看到，当斯大林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后，在他的身上便开始显露出同日后的灾难有直接联系的许多特征。列宁关于"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的论断是不幸而言中了。当时尽管国家在急风暴雨中经受了30年代初饥荒的折磨，数百万农民付出了血的代价，苦不堪言，然而国家在工业化中、在社会和精神的更新进程中仍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党的十七大成为国家生活和斯大林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对斯大林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粉碎党内"右倾分子"后，仿佛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了。总书记的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的反对派，包括布哈林，想方设法强调自己忠于斯大林，自己是"大梦初醒"，自己"完全赞同党的总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几次尝试想同斯大林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又一次去别墅同他"和解"。

许多人把降职当作个人的不幸。这一对"政治孪生兄弟"也不例外。加米涅夫才40多岁，不知怎么一下子消瘦了，头发也白了，样子像

个“年轻的老头儿”。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交谈的机会不多,每次打电话或是见面,他都要抓住适当的话题小心翼翼地提起他和斯大林在库列伊卡共同消磨的岁月,提起他、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提起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十三大以后为了让斯大林稳坐总书记的交椅而演出的一幕幕戏剧。季诺维也夫,特别是加米涅夫,一直抱着希望重新担任党内的高层领导职务。

斯大林很清楚他们的意思。他表现出宽大的保护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让两位被罢黜者感到一线希望。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两个人,虽然他之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们,但现在不仅对他没有用,而且还可能对他有危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底细知道得太多了。而总书记是不喜欢那些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官方所宣传的还多的人的。30年代初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抓农业中的“革命”,突击实现工业化,团结自己的拥护者。

工业正在加速发展。强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后来这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难。党的第十七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临近了。

斯大林的宣传机器称1934年1—2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因为斯大林本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和不一般的”。毫无疑问,到1934年时,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实现了巨大的跃进。当我查看斯大林修改过的报告草稿时,我注意到,总书记仔细修改了报告的每一页、每一段,他竭力突出



1934年,莫洛托夫(站立第一排,左三)、斯大林(左四)、伏罗希洛夫(左六)、卡冈诺维奇(左七)同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一起

的首先是成绩。他认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应该有结果。报告中整页整页都是斯大林重新抄写的。总书记要让人民和党看到,他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成功的、所向无敌的。

斯大林特别强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我国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最近几年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总书记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下列大型企业: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斯大林报告中的数字、表格、图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他有大量的材料要向代表大会报告。

对于30年代,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仅仅从它很悲惨这个角度去看,然而这些年代还是前所未见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劳动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期。现在有时我们都很难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往往只有最起码的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却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他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不仅对他们的命运,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是那几年《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斯大林看《真理报》,从来不是有选择地看,而是从头到尾地看,并且还要把一些材料用铅笔划上记号。这时他充分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主人"。

"经2万石油职工在40个群众大会上讨论并根据53个来自各地的报告和254封工人的来信作了补充的巴库石油职工的集体报告。"报告说:"经过工人和专家们的努力,在久经考验的列宁党的领导下,石油部门的五年计划已在两年半内完成。"

来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建设局的报道说:

"高炉车间的施工区诞生了完全新型的工作队,这就是挖掘机经济核算包产工作队。挖掘机实行经济核算后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实行经济核算的挖掘机创造了机器装载的世界纪录。"

来自鞑靼的简讯说:

"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粮食的收获和交售工作,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筹备召开第二次全鞑靼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和争取派出本地区代

表参加前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代表团。在全苏光荣榜上争第一，是鮭鲃集体农庄家喻户晓的口号。”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千百万为我们创造了我们今天赖以立足的一切的普通人非常天真，心地善良，对斯大林无限信任。但是不能不赞叹人们的奔放热情、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和掌握着未来的自信心。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献身精神和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无论是现在还是下个世纪，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记住这些被“领袖”通常称为“群众”、有时又称为“螺丝钉”的人，这些创造者和建设者。

与此同时，从《真理报》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当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之后，不光使我们有所警觉，而且使我们对当时我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所报道的一切事件的内幕有了深入的理解。

1933年7月中旬《真理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两同志来到列宁格勒，并在当天同基洛夫同志一起前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了解运河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之后取道白海港口索罗卡前往摩尔曼斯克。”



斯大林与叶若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港口

斯大林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之后，过了两星期公布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通航的决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对运河建设中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授奖的决定。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有八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雅哥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科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总管理局局长别尔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助理弗连克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局长拉波波

尔特,白海—波罗的海劳动感化营主任菲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总工程师菇克,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韦尔热比茨基[58]。

谢·米·基洛夫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成这样一条运河,这确实是一种英雄业绩,因此应该公正地评价我们那些领导这一事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是他们真正创造了奇迹。"[59]

确切一些应该说,创造奇迹的是数十万囚犯。这样的囚犯当时有的是。在对100多万富农和中农农户实行剥夺和对"剥削阶级的残余"进行了残酷斗争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掌握着不仅仅能够建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很大一支力量。被授予列宁勋章的那些人的职务,雄辩地说明了斯大林运河是如何开凿的,是谁开凿的。在国民经济中广泛利用囚犯的劳动(在30年代为他们提供劳动场所也是一大问题)不是什么新思想。这里要提一下,早在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发挥劳动军事化的思想时就曾提出建议,说"应该把反对国家的敌对分子大批调去参加无产阶级国家各项工程的建设"。我们看到,"杰出领袖"中这一位的意见并没有被另一位所忽视。

至于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报告中讲起来就有些为难了。不错,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和5000个国营农场。但总书记承认农业这一部门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斯大林也承认,"对农业来说,实质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最近将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60]报告人在这里也指出了畜牧业的严重情况。大概从那时起我国畜牧业的情况就没有好转过。在农业方面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十年过程中粉碎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派之后,终于无"事"可干了。总书记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不得不彻底击溃一切集团的信徒,那么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没有人要打击的了"。不过总书记在这里为了使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又自相矛盾地说,"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它们。但是斯大林很少去"打击"这些思想,而更多的是打击有这样思想的人。斯大林说,我国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但他立即又得出结论说,达到无阶级境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开展阶级斗争"[61]。

看来，由于斯大林深信暴力手段的万能作用，深信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暴力的工具，他也就无心考虑这种看法的极大危害了。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已经"实际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他号召进一步强化强制机制，加强惩罚机关。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考虑民主演讲的意义，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加强真正的民权制度的尝试都会相应地削弱他树立领袖绝对权威的可能性。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斯大林从特性说，是个专横暴虐的人，使人总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东方的远古时候的东西……难怪布哈林在1928年把斯大林叫作"成吉思汗"。

斯大林并不是不知道，在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不少人当初都曾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反对派"或具有某种倾向。所有这些人早就通过不同的方式悔了过，认了罪，在寻找机会重新得到今天权势极大、威望极高的斯大林的好感。那些"被击败的人"并不全是毫无原则、看风使舵之辈。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中，有许多人都曾真心表示悔改（往往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行"表示悔改），因为他们不甘心当党外人士，他们支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总书记特别向卡冈诺维奇提出，要首先保证这批为数不少的人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因为这些人的悔过发言将更加提高"领袖"的威信，虽然今天在权力的顶峰他已经成为惟一者。几十年后再来看这些人的发言，就可以想象出他们怎样强忍屈辱，像神魂颠倒的教徒一样鞭笞自己，以满足（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的情景。这一切许多代表都看在眼里。例如，基洛夫说：现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企图……挤进来共庆胜利，试图踏着同一乐曲的节拍前进，支持我们高涨的热情……就拿布哈林来说吧。我觉得，他好像在照着乐谱唱，可是调门不对。至于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更不用说了"[56]。

那些昨天还是政治局委员、列宁的战友和学生的人，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是怎么说的呢？

布哈林，这位过去的"全党喜欢的人物"和党的理论家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如此。——本书作者注）辩证法，彻底批判了首先是我……提出来的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57]

很难相信，说这话的会是一个其精神世界有如水晶般纯洁的人……

李可夫，这位列宁之后的第一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我要对斯大林同志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世后的最初时期所起的作用加以说明……他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在那一时期一下子就从当时的领导班子中脱颖而出。"[58]

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说话直率、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著称的人……

托姆斯基，这位我国工会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自己的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通过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一些人的攻击。"[59]

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党的原则性强和善于坚决捍卫党的原则性而闻名的人……

下面我摘引一段被击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被重新接收为党员的**季诺维也夫**的讲话，而就是他第一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个人的名字并列排在一起的。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斯大林同志领导这场斗争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丝毫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的因素。"季诺维也夫称斯大林的报告是"一篇杰作"，他长时间地巴结逢迎，说什么"领导班子的辉煌成就即这个领导班子的带头人（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的辉煌成就……"表示悔改的季诺维也夫说：当我重新被接收入党时，斯大林向我提了一条意见："党认为，过去和现在危害你的与其说是那些原则性的错误，不如说是多年来你养成的对党不襟怀坦白的毛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喊声："对，说得对！"）这位过去觊觎党的领袖地位的人接着说："我们现在看到，先进集体农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如何渴望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渴望见到斯大林同志，亲眼看看他，也许还亲手摸摸他，直接聆听他的指示，然后把这些指示传达给群众。"[60]

说这话的是一位与列宁直接交往多年、一直在向列宁学习并以列宁的战友自居的人。一种担心被彻底抛进政治垃圾堆的恐惧心理迫使季诺维也夫说出这一席低三下四的话。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

任斯基、罗米那兹以及在反对派的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这样，他们丢掉自尊、昧着良心，拼命吹捧“领袖”。

斯大林像通常一样坐在第二排，表面上不动声色地望着正在登上讲台的加米涅夫。他回想起以前加米涅夫怎样主持会议，怎样在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上不耐烦地插话，竭力把发言人朝需要的方向引导。一次（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斯大林在发言中列举“反对派”的错误，加米涅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斯大林同志！您像是在数绵羊，一、二、三……您的论据并不比这些绵羊高明……”

“如果把您也算其中的一只……”总书记马上顶回去。

加米涅夫现在会说什么呢？

加米涅夫低三下四地、强忍屈辱地用哀求的语调认错：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正如前一个时代作为列宁时代载入史册一样，这个新时代无疑也将作为斯大林时代载入史册，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全力以赴反对任何动摇这个权威的尝试……我要在这个讲台上说，我认为1925年至1933年同党和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那个加米涅夫是个政治僵尸，我要向前走，不再像《圣经》中说的那样（请原谅）老背着过去那张皮……我们的，**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⑥]

斯大林两眼半睁半闭，听着加米涅夫急匆匆地发言。当时甚至他也不知道，几乎是三年后，他会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变成肉体僵尸，真的僵尸，而不是“政治僵尸”。然而，斯大林确实知道，这是加米涅夫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不能再姑息了！

斯大林带着毫不掩饰的浓厚兴趣听着所有这些颂辞，他感到自己胜利了。他可是知道加米涅夫在同托洛茨基谈话时曾称他为“残暴的野蛮人”，而季诺维也夫在自己那个圈子里称他是“血腥的奥塞梯人”；布哈林不止一次地挖苦斯大林不懂外语；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一书的第一版中对未来的总书记竟然只字不提；而被誉为大理论家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竟在192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总书记“不学无术”……

是报复吗？不，这是卑鄙的！——这位胜利者想。要让全党信服，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在历次辩论中，在一切转折关头，只有他斯大

林始终是正确的。而且不是他来说，而是由他们，斯大林过去的论敌去说。要让大家今后都知道，他不仅具备政治魄力和组织才能（这是全党早已公认的），还要让大家知道他非常英明，洞察一切，高瞻远瞩并且**大权在握**……这次是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吗？恐怕还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吧?！假如斯大林熟悉俄国史，那他就会记得颇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参议院为褒奖亚历山大一世拯救祖国的丰功伟绩，决定加封他"恩德无量"的称号。不过亚历山大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

但是，斯大林却一直盼望新的称号、新的比喻和新的赞词。诚然，当时谁都没有想出来"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这样的赞词。人们的想象力毕竟不是始终都那么丰富……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许多说法。例如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首先称他斯大林是"天才的领袖"，季诺维也夫把斯大林列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基洛夫说明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朋友"，同时又是列宁的"忠实仆从"。朋友和忠实仆从，——这就有点荒唐了！

可能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人来体现？民主不需要执掌特殊权力的人来体现。至于阶级的专政……这一切都说明斯大林认为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说是正常现象。可是大家知道，只有独裁者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斯大林听着代表们的发言，默默地回顾了自己从"抢劫犯"到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奇特道路。他一度认为是空想的事现在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曾经认为是可能的事现在看来已经是肯定无疑的了；他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斯大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自己的特殊作用和使命已深信不疑；每次代表大会都给他增添了信心：只有他才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的这种非常不祥的错觉也是许许多多灾难的主观根源之一。

斯大林对倾盆大雨似地落在他头上的赞词如"英明的"、"天才的"、"伟大的"、"远见卓识的"、"钢铁般的"等等已经听腻了，现在特别注意听军队代表的发言。在每一位发言者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对他作了无边无际的赞美之后，斯大林由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发言对他很少恭维而感到吃惊和不快。图哈切夫斯基又把他那一套搬出来：陈述自己提

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改造的"空洞计划"。已经跟他讲了,幻想的成分太多;就是不听,现在又搬出来了……斯大林想起了30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图哈切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不满意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他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装备现代化的建议所采取的态度。这位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就我的关于改造工农红军的报告问题所写的一封信。那个附有我给您的报告的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我过去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看了上述报告后,我完全理解您对'我的'打算不切实际感到气愤的心情。但是,我应该说明,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完全与我的报告无关。我的建议不只是被表述得面目全非,而简直成了'狂人日记'。"[62]

斯大林当时看了这封信就已经懂得,与伏罗希洛夫关系紧张的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同人民委员辩论,而是在同他,同总书记辩论。这位军事领导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使他感到吃惊和不快,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好像比死抱住国内战争经验不放的人民委员看得远得多。到伏罗希洛夫发言时,斯大林知道这位已经成为点缀英雄历史的、传奇式的人物要说些什么,因为人民委员在代表大会前夕曾把自己的发言送给斯大林过目。

伏罗希洛夫竟然在自己的发言中想出了一个新的赞词:"钢铁般的斯大林"。当然,伏罗希洛夫也少不了溢美之辞:"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者更令人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哪里"[63]都吓不倒我们。人民委员说粗话使斯大林感到讨厌:一边说"英明的"、"伟大的领袖",一边又说什么"猪嘴"……

斯大林听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别列夫斯基、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感到很满意,他们说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他沉思起来,忽然想到:如果20年前他在库列伊卡村暴风雪的呼啸声中梦见这一切的话,他会怎么想呢?准是发疯了吧?"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的命运真难以预料。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忽然感到,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一切看来都不过是在履行手续:选举中央委员和两个新机构,即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

员会(代替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领导机构的人选当然事先都在政治局“交换过意见”,为“领袖”庆功的整个盛典看来正在平静地结束。由代表大会选出的计票委员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但是突然发生了意外。激动而焦急不安的卡冈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然而先得谈谈事情的由来。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过介绍(米高扬从1926年至1966年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历任党的第十次到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也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指出,“在党内形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使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产生了不安。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那些了解列宁遗嘱的同志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了。”米高扬证实(米高扬又是听斯涅戈夫、沙图诺夫斯卡娅以及原计票委员会成员安德列阿相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说的),卡冈诺维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投票“反对”基洛夫,近300人(!)即投票人数的将近1/4投票“反对”斯大林。这简直难以置信!



1926年,米高扬(左)同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在一起。他们是著名的高加索“三剑客”:米高扬具有亚美尼亚商人的特性,所以善于搞外交和内政;大权独揽的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奥尔忠尼启则是典型的格鲁吉亚男人,性格豪爽,主持了苏联的工业化

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总书记对此作何反应。但据米高扬说,很快作出决定,即留3张

“反对”斯大林的票(与“反对”基洛夫的票相等)。其余的票全部销毁。还要说明一点,按惯例在付诸表决的名单中,候选人人数和当选人数是等额的。总的来说,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多数。即使那300张反对票作数,斯大林照样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来都会被选为总书记*。宣布投票结果将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它带来的一切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大家立即会感到“领袖”的伟大完全是虚幻的。

据这些证明材料说,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在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前已经了解到实情,他们向基洛夫建议,要他同意把他推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拒绝了,并且似乎把一切都向斯大林讲了。

然而,在这个弄不清楚而又极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客观情况说明这一事件相当可信。首先,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过去属于不同名目的“反对派”的和过去曾直接反对过斯大林的。此外,许多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的工作者已经有可能亲自领教过斯大林的放肆、粗暴和独裁作风。然而,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谁都不可能公开批评斯大林,更不可能建议撤销他的高级职务。虽然可以利用表明良心的时机随时都存在。这些人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无疑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米高扬根据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成员提供的证明所作的情况介绍有一天完全被证实,那么这个介绍同时也就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件最丑恶的反党罪行的记录。我在这里还不谈(这个问题将放在另一章叙

*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后没有选举过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直到斯大林去世前,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都没有称斯大林为总书记。况且他也不需要,因为“领袖”所拥有的权力是正式宣布的党中央总书记无法享有的。

述)"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的下场多么悲惨,因为在投票表决后斯大林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

这一复杂问题还造成了另一后果:斯大林骤然改变了自己对基洛夫的态度。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现在成了他的现实的劲敌。

这样,"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除反映了国内发生的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变化外,还记录了"领袖"的独裁野心的膨胀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工具,却被斯大林当成了随心所欲地行使专政的最重要职能的有利条件。

斯大林和基洛夫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件事。叶努基泽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斯大林同志能把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围,同他们一起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从这群人中形成了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63]不能不说,在那些年里,在斯大林周围一班人中间,确实有过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就有基洛夫。虽然"周围一班人"这个说法对他未必合适,因为他先是在外高加索工作,后来在列宁格勒工作。但他毕竟同斯大林的关系密切。叶努基泽同样是同总书记私交很好的朋友,他说在斯大林周围总是聚集着"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是说过头了。遗憾的是,斯大林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纯洁无瑕的战友;有专事揣摩和执行"领袖"的意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决不违抗他的旨意的唯唯诺诺之徒。对人民和党来说不幸的是,斯大林身边还有(特别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只能称之为罪犯的人。

斯大林不是笨人。他希望自己周围有可靠的、忠心耿耿的朋友、战友,而主要的是有绝对服从命令的执行者,他一张口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愿望、意图、暗示。虽然总书记对"公众"总是竭力强调指出,建立在对个人的忠实之上的关系是不符合崇高原则的。例如,斯大林在答复党员沙屠诺夫斯基的来信时写道:

“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65]

说得很好。可惜言行不一。要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照例都是一些不会给他造成麻烦的人。这首先是指助手。他的助手有:纳扎列江、托夫斯图哈、巴扎诺夫、坎涅尔、马里因、德文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最喜欢的是两个人:托夫斯图哈和波斯克列贝舍夫。

他一张口,托夫斯图哈就知道他的意思。托夫斯图哈是个有相当理论修养的人,他善于表述思想,善于发现文件中的原则性错误。斯大林很看重他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的忘我精神。在斯大林的档案里保存了一张他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便条,上面写道:“托夫斯图哈不想去休假。案卷中有我关于托夫斯图哈同志立刻休假的建议,但他不让提付表决……”[66]斯大林接着责备他的助手把自己未能休假的事告诉了加米涅夫。伤透了心的托夫斯图哈写了一个正式报告:

> 送斯大林
>
> 抄送加米涅夫
>
> 我声明,我**从来**没有对加米涅夫同志或别的什么人说过:我想去休假,但斯大林同志不放我去。
>
> **托夫斯图哈**

加米涅夫在这张谈“具体问题”的小纸片上用铅笔半开玩笑地草草写了几句:

> 我证实,托夫斯图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给我谈过休假的事,只说过他要是早一点能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话,本来可以大大扩大他研究列宁的工作(原文如此。——本

书作者注)。我请求不要把托夫斯图哈的死归罪于我。

列·加米涅夫[17]

看来在斯大林的机构里有时干的不只是正经的"大"事。

巴扎诺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在斯大林手下干了很短一段时间。总书记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巴扎诺夫就去给政治局会议作速记记录了。但是这个人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1928年他得以逃到波斯,又从那里跑到了英国。几十年来,他起先是靠评述他所了解的事情,后来则靠编造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各种情况来挣钱糊口。

斯大林在许多年中一直把梅赫利斯放在自己的身边,他一度成了"领袖"的助手。梅赫利斯生于敖德萨,起先是孟什维克,1918年入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斯大林相识。梅赫利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真理报》担任过一些要职,当过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有些才干,但是他的头脑是赤裸裸的警察头脑,他是经常向斯大林报告有关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秘密情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请斯大林在送给他的1924年刚出版的总书记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上题词留念。斯大林在扉页上疾书了几个字:

送给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朋友
梅赫利斯同志

作者
1924年5月23日

最有趣的是,梅赫利斯拿到了亲笔题赠的书之后,从来没有打开看过:现在书页已经全部泛黄发脆,却一直没有裁开!

梅赫利斯的影响与其说是由梅赫利斯的职务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斯大林本人对他的态度决定的。他经常到斯大林那里去,两个人长时间呆在一起。斯大林向他交办最微妙的任务。我手头有一大卷他从"领袖"派他去的各个地方寄回的亲笔写的告密材料。几百份密码电报、明码电报、书面报告,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敌人在活动","普遍存在麻痹情绪","姑息养奸","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斯大林大概最相信梅

赫利斯的话。后者善于在人们认为稍有猜疑都是可笑的地方找出“敌人”来……1937年7月，红旗歌舞团正在东部演出，斯大林这时收到一份密码电报。

> 我报告：红旗歌舞团情况严重。我的结论是，**歌舞团里有一个间谍恐怖分子集团在活动**（黑体是作者用的。——本书作者注）。就地开除19人。我正在进行侦查。该集团中有旧军官、富农子女、反苏分子。我已让特别部主任参与此事。是否让歌舞团下部队？
>
> **梅赫利斯**[63]

我认为电报末尾的问题是白提的。半个歌舞团的人都抓了起来，还放谁下部队呢？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在“领袖”庇荫下起着自己特殊的凶险作用的人。他为斯大林的猜疑提供了理想的印证。

但是，“领袖”最信任最接近的大概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了。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他称为斯大林的“忠实的仆从”。这位维亚特卡的鞋匠的儿子曾当过医士，从1922年起就在中央委员会工作，1928年起当了斯大林的助手、特别任务部的主任。战争期间斯大林让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当上了少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点是工作能力极强，很会完成任务。他的长女加丽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叶戈罗娃女士告诉我说，他父亲每天工作至少16小时。虽然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把波斯克列贝舍夫撵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后者至死仍然是主子的忠实仆人。顺便提一下，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第一个妻子是托洛茨基的远亲，这一点最终起了悲剧性的作用。

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父亲一直惋惜他没有记日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然，他思索一番后总是得出结论说，要是他真记了日记，那他早就不在人间了。

任何情报都要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给斯大林。他对党内国内各种事情的了解不比斯大林少。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因为他没有头脑，从不提出异议，任何时候都坚守岗位。但是，由于“领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殊好感，后者在权力机关的“走廊”里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他的正式地位。

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天性并不严厉，人们却对他巴结奉承；因为

事情办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第一助手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汇报"文件"的内容,提出建议。

曾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的科瓦廖夫在整个战争时期有时一天要向斯大林报告军车运行情况三四次,他有一次把波斯克列贝舍夫称作"老黄牛"。"任何时候,只要斯大林不叫他,这位助手的有点秃顶的脑袋总是埋在公文堆里。这个人有着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可以从他那里查到关于任何一个问题的准确资料。"科瓦廖夫概括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看法说:"总而言之,他是一部百科全书。"

这几个人同斯大林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们都属于如斯大林有时所说的"服务人员"。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属于最亲密的战友的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绝对同"领袖"保持意见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

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要谈到其中的几位。例如,这三位中的一位伏罗希洛夫,在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领袖"的一切意见。早在1923年,总书记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叶先图基疗养院休养,疗养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需要斯大林亲笔写一张奇怪的证明:

> 请苏维埃和党的机关注意:
>
> 兹证明持件人叶先图基泥浴疗养院职员玛丽亚·格佩洛娃是一位值得完全信任、忠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妇女。
>
> **约·斯大林**
>
> 1923年11月15日

接着下面加了一句:"完全同意。**克·伏罗希洛夫**。"[69]

当著名的军事首长约·埃·亚基尔被捕并被判处枪决时,他给斯大林写信,保证他绝对没有犯过指控他的那些罪行。斯大林的批语很简洁——"卑鄙无耻",而伏罗希洛夫习惯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一贯绝对同意一切。他像1923年那次一样写道:

> 评语完全准确。
>
> **克·伏罗希洛夫**[70]

要知道亚基尔是伏罗希洛夫的部下、苏军的一位天才指挥员，伏罗希洛夫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的助手们一样，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但也有另外一些被认为是斯大林战友的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的一个就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他无限忠于事业，为人纯朴，富有同情心。不管他在哪里工作，那里的人们都喜欢这位容易跟人们打成一片、态度谦虚的领导人。当根据列宁的推荐把基洛夫派往阿塞拜疆工作时，他的党内鉴定写道：

“各方面都很坚定……工作有干劲……贯彻决定异常坚决。稳健沉着，政治上很能把握分寸……十分出色的撰稿人。第一流的、出色的演说家……”[①]基洛夫在外高加索工作多年，给当地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新反对派”企图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自己的据点的时候，党中央派基洛夫去列宁格勒，他被选为那里的市委书记和州委书记。研究基洛夫生平的Ю·波姆佩耶夫证明说，当基洛夫到列宁格勒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奥尔忠尼启则给州委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介绍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这位新的第一书记。


基洛夫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的捣乱使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你们把我们的基洛夫同志抢走了。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可是你们的力量却大大加强了。我一点不怀疑，你们那里会搞好的，不出两个月一切都会就绪。基洛夫是个好样的，只是除了你们他谁也不认识。相信你们会给予他友好的信任。衷心祝你们圆满成功！”

接着谢尔戈又在下面写了一个附言：

“小伙子们：请你们把基雷奇的生活安排好，不要让他吃住没有着

落。"[22]

斯大林早在1917年10月的日子里就认识基洛夫。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天性冷淡、生硬、甚至是冷酷的斯大林会喜欢上这个老是笑嘻嘻的、干劲十足的健壮的人。他们俩不止一次一起休养，两家交情也不坏，虽然双方呆的地方通常相距都很远。在斯大林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书信中，有一封在索契写的信提到了基洛夫，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说来奇怪，斯大林是从来不关心别人的健康的！）：

> 亲爱的谢尔戈：
>
> ……基洛夫在那边干什么？在用纳尔赞矿泉水治他的胃溃疡吗？要知道这样下去是会把自己整垮的。是哪一个巫医在给他'治'？……
>
> 问季娜好！
>
> 娜佳向你们大家问好！
>
> 你的**斯大林**
>
> 1925年6月30日于索契[23]

可以说，斯大林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党的工作人员表现过这样的关心，甚至是"喜爱"。他喜欢这个开朗、淳朴的人。基洛夫所到之处，人们马上都围聚在他的周围。有过一种现在人们差不多已经忘掉的说法，叫作"群体的灵魂"。基洛夫正是最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党员的、工人的、大学生的、红军战士的群体的灵魂。在难以捉摸的莫洛托夫、一脸媚相的卡冈诺维奇和时刻等着执行命令的伏罗希洛夫的陪衬下，基洛夫是真正温暖的人际关系这种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的代表。

几乎每一个独裁者都有自己的弱点，斯大林的弱点是凭直觉相信很少几个人，其中有：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莫洛托夫、基洛夫，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两三个人。这种好感很难解释。往往很难加以分析"论证"，因为这种好感完全是一种心理状态。斯大林喜欢基洛夫的微笑、他的开朗的俄罗斯人的脸膛、他的诚实和全神贯注的工作精神。有一次，当列宁格勒的这位领导人星期天上别墅来，他们一起玩打棒游戏时（斯大林和厨工霍里科夫斯基搭档，而基洛夫和弗拉西克搭档），斯大林问客人说：


不同命运的人（自右至左）：斯大林、基洛夫、米高扬在1932年

"谢尔盖，你最爱什么？"

基洛夫惊奇地看了一眼斯大林，笑着回答说：

"布尔什维克应该爱工作胜过爱妻子！"

"那你究竟爱什么？"

"大概爱思想……基洛夫一边重新摆放木棒一边回答。

斯大林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再没有追问下去，虽然他不明白，怎么可以"爱思想"呢？也许，基洛夫在说漂亮话？但是斯大林知道，基洛夫不会说假话。他还知道，基洛夫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对他发生影响。

斯大林记起了留京案件。留京在旧军队中当过准尉，20年代初斯大林就认识他了。1918年他是伊尔库茨克军区部队司令，1920年是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在20年代后五年是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红星报》编委、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留京"胡闹起来了"。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留京是当时秘密流传的长篇文章《致联共（布）全体党员》的执笔者之一。这封"信"的主要矛头指向他，说他完全是一个手里拿着反列宁主义的"笼嘴"的"独裁者"。斯大林记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求不仅把留京开除出党，而且提议判处他死刑。看来这是斯大林企图在司法审理之前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第一个实例。政治局委员们默不作声。一方面，从案件来看，留京企图建立"反革命组织"，而另一方面——因此就要判处"死刑？"！"党的上层领导"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基洛夫说话了：

"不能这么干。留京不是不可救药的人，他只是误人歧途……参与这封信的人肯定少不了……人们会对我们不理解……"

当时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留京坐了10年

牢，到1938年才彻底完了。但是斯大林没有忘记，基洛夫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必要时甚至不考虑他的意见。

斯大林只给很少几个人送过自己的书并且题词留念。基洛夫就得到了——题词写得非常亲切，完全不像是领袖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在斯大林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的扉页上，总书记用清晰刚劲的字迹写着：

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谢·米·基洛夫。

作者斯大林

1924年5月23日

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波斯特舍夫在一次例会上宣布"现在请基洛夫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爆发出欢呼声。全体起立。斯大林也站了起来。全体代表向另一个"全党喜爱的人"鼓掌。受到过大会代表这样的欢迎的，大概只有斯大林本人。基洛夫的讲话意思清楚、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不错，这篇讲话像这次大会上其他代表的几乎所有的讲话（只有很少例外）一样，充斥着对总书记的溢美之辞。基洛夫在这方面可能比其他许多代表"更过头"。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尽管表明良心的时机始终存在，有时（也许往往是）要利用它就只有"越出"通常的行为准则。这就几乎是去建立非同一般的功勋了。不管是基洛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次大会上都没有建立那样的功勋，因为在这次大会上，在代表们的眼前，在他们的帮助下，确立起来的是个人迷信。历史是不能添加也不能删减的。否则就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赝品。

我们已经知道，这次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构成了（根据今天所能作出的推断）一种独特的、使得斯大林极为吃惊和不快的高潮。他的胜利变得大为逊色了。但是斯大林不露声色。古希腊和古罗马诸神的大理石像的面部表情不可捉摸。他们的表情凝固了千百年。斯大林也善于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持镇静沉着的伪装。他早就明白，镇静沉着对周围人的影响从来都比手忙脚乱、装腔作势、摆"领导"架子来得大。斯大林在接到了"信号"，知道代表大会上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他成为独断专行的领袖之后，表面上非常平静。接下来一切完全

按计划进行。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基洛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他仍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斯大林本来计划在代表大会之后把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不这样做了。

基洛夫的工作多起来了。基洛夫作为党的书记主管重工业和森林工业。他经常要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一如既往，他到莫斯科来时，经常给他打“自动电话”，不止一次地会面，讨论日常事务和急于要办的事。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基洛夫依然是“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诚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关系变得冷淡了，官腔打得多起来了，列宁格勒的书记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甚至挨了“领袖”的训斥。也许是这样。但文献也好，了解当时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情况的人同我的谈话也好，都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材料。而更可能的是，斯大林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和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因此，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杀害这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消息就更加显得突然：

“预审材料确认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1904年生，前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职员。侦查正在继续进行。”[39]

基洛夫在遇害前两天，同列宁格勒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从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后回来，在这次全会上作出了令人高兴的重要决定：取消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大家在火车上热烈地讨论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措施。工人们和全体人民会多么高兴啊！他们还交换了看过布尔加柯夫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以后的意见，谈论了预定在12月1日召开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总之，基


基洛夫遇害的地方——斯莫尔尼宫

洛夫回来时情绪饱满，准备大干一场。

在开积极分子会议那一天，基洛夫起草好报告，于4点半乘车到斯莫尔尼宫。他在走廊里走着，和许多人打招呼，交谈几句工作。他往左一拐，走进一条窄窄的走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迎面朝他走来一个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人。在办公室门旁听到了两声枪响。人们跑来时看到基洛夫俯卧在地上，凶手手里握着枪，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

基洛夫遇害后两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乘专车赴列宁格勒。斯大林在车站上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还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一个耳光。梅德韦季及其副手扎波罗热茨后来被调到远东工作，而在1937年，当恐怖机器开足马力时，两人都被干掉了。一些材料表明，对尼古拉耶夫的第一次审讯是斯大林在一批随他来列宁格勒的人陪同下亲自进行的。从一开始，有关基洛夫遇害的许多情况都带有神秘色彩。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了这一点，他说："必须指出，基洛夫遇害的情节中有许多至今叫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的东西，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调查。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



1934 年 12 月，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在基洛夫遗体旁守灵

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甚至没有搜查过他。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受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个个安然无恙。"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工作的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1937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要知道,那个死于车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波里索夫是负责基洛夫的警卫工作的,而据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过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无论如何,这个在基洛夫必经之路上两次截住了带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根据别人的命令释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

我能看到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洛夫案件"的更确实的材料。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谋杀并不像不久后官方所说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异常残暴、阴险、奸诈,因此完全可以推测这件事是他一手制造的。间接的证明之一是,把两三个"层次"的潜在的证人都消灭了,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手笔"。

国外关于这个神秘的案件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通常都以假设和推论为依据。例如,其中就有死于美国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73]所作的结论。

尼古拉耶夫案件审理得很匆忙。过了27天公布的起诉书就断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活跃分子。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不久之后的许多悲剧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关)和要案侦查员Д·Р·舍宁。不出预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都被处决了。为什么说是"不出预料"呢?

原来在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这个践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决定说:

1.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

3.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颁布这些新指示后，许多"案件"的审理马上加快了。由于基洛夫是在列宁格勒遇害的，侦查工作把这个案件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起来，早在1934年12月，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阴谋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盖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关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证、证据一点也没有找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会后他一度重又活跃起来，当时他盘算着，"暴风雨"已经过去，可能还会时来运转。他甚至在代表大会后写了一篇题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意义》的文章，把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从报上看到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评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坏蛋们"同这个案件有牵连之后，他连魂都丢了。他明白他会得到最坏的下场。在侦查部门以及后来检察官的高压下，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承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原反党集团可以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司法"部门不需要任何论据、证据。政治审判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季诺维也夫被判10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5年，其他的人也是5年。这可以说是公开把持有与官方观点不同的政治观点跟刑事犯罪等同起来的第一例。

列宁的两个过去的战友的悲剧在继续演下去。他们虽然贪图虚荣，立场不坚定，认了错(也许不是出于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

基洛夫遇害意味着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将来到。人们相信过去的"反对派"在进行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首先，当时社会上显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盗窃分子、怀有阶级仇恨的人。其次，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和起码的公开性，形成了蒙蔽千百万人思想的理想条件。人们千百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严惩恐怖分子。在30年代人们都着了魔，一个号

召、一句口号就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一个虚幻的远景就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让他们相信有“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何况他们又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据30年代受过迫害的B·奥库洛夫说，当时国内正在制造气氛，“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主要的牺牲者是无辜的人”。报刊不断加温，不断“揭露”、报道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总部”、“阴谋”、“恐怖小组”。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喜欢讲的“惩罚机关”一下子“身价”百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数飞速增加。这些“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它们逐渐和党委平起平坐，后来又超过党委，成了太上皇。报刊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必须加强警觉性”。报刊的宣传开始大量散布对每一个人怀疑、不信任的种子。许多领导人都受到监视。我们记得，斯大林十分害怕别人害他，大力加强警卫，把自己在群众中“露面”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普通人都形成了一个概念，似乎生产单位中、集体农场里、大学里有许多暗藏的敌人。每一次挫折、灾难、损坏、事故都和反革命破坏挂起钩来。全国逐渐形成一种氛围，斯大林在进行血腥清洗时已可望得到受蒙蔽的群众的“支持”。

还在基洛夫被害之前，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决定，那些将在未来无法无天的年月里扮演凶神恶煞的人被提拔到在同党和“人民的公敌”作斗争的机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岗位上。这些人中首先有担任组织局委员、1935年初担任中央书记、清党活动（1935—1936年）组织者之一的叶若夫，过去的孟什维克、先担任苏联副总检察长、后又提任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1937—1938年那些可耻而罪恶的政治审判案都和后面那个人的名字分不开。

指令、通令、报刊都直截了当地要求寻找和揭露敌人。人们发现“原来”敌人果真不少。在怀疑、恐惧、不信任氛围的推动下，很快掀起了恐怖浪潮，并在1937—1938年把它掀到令人可怕的高度。关于被发现和揭露出来的“敌人”的无数报告不断送给中央。下面是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所保存的几份报告：

送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北方边疆区国家安全局结束了反革命恐怖

集团策划对中央委员、联共(布)北方边疆区委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弗·伊万诺夫同志采取恐怖行动这一案件的侦查。

本案被告有七名被追究责任,交付法庭审判,他们是:Н·Г·拉基京、П·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П·Н·波波夫、Г·И·列维诺夫、Н·И·伊夫列夫、А·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Н·А·科博索夫。被告中完全认罪的只有П·Н·波波夫。

拉基京等人的案件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引用1934年12月1日法律予以审理。

我们认为主要被告拉基京、П·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列维诺夫应判处枪决,其余被告应分别判处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请予指示。

安·维辛斯基,В·乌尔里希

1935年1月23日

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

Л·И·别洛济尔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她招募了舍尔比纳和捷列先科参加这一组织,要他们在1934年庆祝十月革命时在基辅对波斯特舍夫和巴利茨基两同志采取恐怖行动,经审理此案后决定判处Л·И·别洛济尔枪决。

别洛济尔在整个受审期间坚决拒绝招供,声称她不接受赦免。因此,请指示是否可以执行对已定罪的Л·И·别洛济尔的判决。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和А·В·巴利茨基同志认为可以执行判决。

В·乌尔里希

1935年2月3日

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年3月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在我主持下在列宁格勒不公开地审理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伙米利达·德拉乌列、奥丽加·德拉乌列和罗曼·库利涅尔一案。

我问米利达·德拉乌列,她想方设法要搞到去年12月1日的列

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大会(基洛夫要在会上作报告)的入场券,想要干什么。她回答说:"她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帮他干什么?"到会上根据情况而定。"因此我们断定,被告想帮助尼古拉耶夫搞恐怖行动。

三人都被判处极刑——枪决。3月10日凌晨该项判决已予执行。

请指示:是否见报。

В·乌尔里希

1935年3月11日[76]

真是闪电式的审判:9日审判,10日凌晨枪决,11日早晨给那位至高无上的祭司报告。即使从乌尔里希报告的片言只语中也可以看出,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多么浮皮潦草。不久,特别是两年以后,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我想对最后的这个"案件"再说几句。在这一悲剧发生前的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有人不断散播卑鄙的谣言,说尼古拉耶夫的前妻米利达·德拉乌列同基洛夫"关系特殊"。了解基洛夫的人都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谁需要散播这种谣言呢?不能排除有人想挑唆神经衰弱的尼古拉耶夫去谋害基洛夫。当人民委员部干部Я·阿格拉诺夫和Л·舍宁开始侦查时,尼古拉耶夫说他杀害基洛夫是为了报仇。但很快他又"供认",进行暗杀是根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集团的布置……看来,德拉乌列这个名字被策划罪行的人利用来挑动尼古拉耶夫,使他变得"更加坚决"。但后来,米利达·德拉乌列也好,奥丽加·德拉乌列也好,都有可能坏事,于是决定把她们收拾掉。说干就干……

斯大林亲自制造紧张空气。1935年中公开发表了一年前他同赫伯特·威尔斯的谈话。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行动。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重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威尔斯问:"你们那种宣传是不是陈腐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

暴力……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27]

斯大林是多么喜欢"彻底消灭"……这样的字眼啊！他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彻底消灭"反对派、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并且确实在"彻底消灭"他们。看来，他也在"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各个代表团在知道了列宁的信的内容后所表示的愿望)还在起遏制作用时，当斯大林还清楚记得列宁的警告时，他把反对派还当作**思想上**的敌人。"投降分子"(悔悟者)通常很快被恢复党籍，被委以重任，还发表他们的文章。例如，1928年6月恢复党籍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希望"党还会需要他们的经验"，——很可能就是指他们希望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报刊上不断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富农的帮凶"，他们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仍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种容忍显然不只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列宁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观点的体现。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断"摇摆"叫他十分厌烦。对他来说，专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社会一直"保持"在"国内战争"状态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动"，他们"警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纵。这位独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围一班人采用各种办法使整个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即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甚至斯大林对基洛夫的"喜欢"(事实证明他确实喜欢过他)，看来也没有阻止总书记不下手清除这位最受人欢迎的人，他的潜在的对手。当需要在起码的正派作风和"妨碍"他的权力的一切之间作出选择时，猜疑、残酷、权力欲总是在斯大林身上占了上风。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国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政治方针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1/4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料到，在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225名代表中，竟有1108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139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老的"列宁的近卫军"。他们知道的



1935 年,"领袖"听到了新闻。(自左至右)依次为:斯大林、叶若夫、伏罗希洛夫

情况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了解他的"早期"活动即他过去的底细的较年轻一代的忘我的执行者、工作者。

1935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缔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建议,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两个组织的档案被以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接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30年代末那些无法无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远在25年前犯下的"罪行"……这里是不是利用了被没收的档案呢?

当时正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步步高升的。1935年中,联共(布)中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封精装(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书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语录和对"领袖"的胡吹乱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在贝利亚的"著作"中有对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叶努基泽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尽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一贯相信告密。对此贝利亚很快就心领神会了。诚然,奥拉赫拉什维利曾试图提出抗议。他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私人

信,并附去了交《真理报》发表的澄清事实的信稿。斯大林的复信实质上否定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斯大林的信中说:

> 致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
>
> 来信收到。
>
> (1)中央并不想提出(也没有根据提出!)关于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问题。您发了火,看来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没有必要。请留在研究院继续工作。
>
> (2)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本来应该发表,但我认为,您的《信》稿写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掉《信》中一切"进行论战的色彩"、一切对历史的"纠缠"以及"坚决的抗议",直来直去地说,错误(有哪些哪些)确实是犯了,但贝利亚同志把错误说得太重,与错误的性质不符。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致敬礼!
>
> **约·斯大林**
>
> 1935年8月8日[28]

国家和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个把暴力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万能的职能的人成了独裁者。尽管人们把他叫作"亲爱的领袖"、"天才的统帅"、"英明的建筑师",任何东西都掩饰不了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独裁者实质。但这一点当时人们是不明白的。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眼下,1934年是以悲调结束的。"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接着是准备采取恐怖行动的信号。也许,与一切天文日历不一样,1937年确实是从1934年12月1日开始的?说斯大林鼓励和倡导无法无天,这毫无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却越来越明显地被独裁者的个人专权和官僚的专政所取代。未来的悲剧的种子已经生出了不祥的幼芽。悲惨的未来的列车正在进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没有被拦住。

注释索引

代绪论

①1949年12月21日《真理报》。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14页。

③昂·巴比塞《斯大林传》1936年莫斯科版第343—344页。

④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论斯大林同志》1939年莫斯科版第153页。

⑤列·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1947年纽约本森·弗蒙特版第1卷第7页。

⑥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918全宗，第3目录，第80卷宗，第591页。

⑦《黑格尔文集》1932年莫斯科版第10卷第87页。

⑧让·饶勒斯《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1983年莫斯科版第6卷第446页。

⑨《普卢塔克文集》1983年莫斯科版第429页。

第一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0--101页。

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5078、5080案卷。

③纳雷姆边疆区布尔什维克政治流放犯纪念馆第998全宗。

④克·季·斯维尔德洛娃《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60年莫斯科版第199页。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160封信。

⑥З·Г·奥尔忠尼启则《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道路》1956年莫斯科版第128—129页。

⑦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577案卷，第18—25页。

⑧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00案卷，第304页。

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4358案卷，第1页。

⑩维·施韦泽《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1940

年莫斯科版第23、25、27、34页。

⑪列·托洛茨基《斯大林》第1卷第143页。

⑫《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9—100页。

⑬《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48页。

⑭《列宁年谱》第3卷1984年三联书店版第204页。

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23851案卷，第1页。

⑯《列宁年谱》第3卷1984年三联书店版第615页。

⑰《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7页。

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233案卷，第1页。

⑲《二月革命》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9页。

⑳共产国际执委会档案馆第555全宗，第1目录，第2802案卷，第1—2页。

㉑《二月革命》第131页。

㉒《二月革命》第153页。

㉓阿·扎·曼弗雷德《法国大革命》1983年莫斯科版第321页。

㉔《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54页。

㉕《二月革命》第336—337页。

㉖《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78页。

㉗《斯大林传略》1951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45页。

㉘列·达·托洛茨基《二月革命》1931年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版第321—322、325页。

㉙1917年3月15日《真理报》。

㉚《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9页。

㉛《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9页。

㉜《列宁年谱》第4卷1984年三联书店版第78页；《革命的一年》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16页。

㉝尼·尼·苏汉诺夫《革命札记》(七卷集)1922年柏林—彼得格勒—莫斯科版第7卷第44页。

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12页。

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记录》1980年莫斯科版第80页。

㊱《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1—52页。

㊲同上，第392、399、400页。

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百科全书》。1987年莫斯科版第109页。

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7页。

㊵《列宁文稿》中文版第6卷第452页。

㊶《列宁年谱》第4卷第282页。

㊷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4全宗，第3目录，第813卷宗。

㊸《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4页。

㊹里业宾斯基《1917年的革命。大事记》(10月)，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卷第138页。

㊺同上，第172页。

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30、431页。

㊼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1957年莫斯科版第89页。

㊽《斯大林传略》第65页。

㊾《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72页。

㊿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派》1932年柏林"花岗石"出版社版第26页。

5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1932年柏林"花岗石"出版社版第11卷第60页。

52斯大林《文章和讲话》(1921—1927)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04—105页。

5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53页。

54《托洛茨基文集》第17卷，《苏维埃共和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一部，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03、106页。

55M·巴列奥略《大战期间的沙皇俄国》巴黎版第3卷第245页。

5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80—381页。

57《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23年莫斯科版第78、79、86页。

58彼·阿·克鲁泡特金《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1979年莫斯科版第355页。

591923年7月8日《消息报》。

60《饶勒斯文集》第6卷第208—209页。

6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335页。

62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6157号案卷。

63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全宗，第1目录，第3案卷，第84页。

64《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06页。

⑥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75页。

⑥⑥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0全宗,第1目录,第123案卷,第29—30页。

⑥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72页。

⑥⑧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00全宗,第9目录,第34案卷,第26—27页。

⑥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6324案卷,第1—2页。

⑦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33页。

⑦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45页。

⑦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88全宗,第1目录,第486案卷。

⑦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75页。

⑦④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10022案卷。

⑦⑤《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6页。

⑦⑥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8全宗,第289目录,第19—20页;《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1卷第428页。

⑦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398—399页。

⑦⑧同上,第401页。

⑦⑨《红军各方面军司令部指令集(1917—1922年)》1972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790页。

⑧⓪同上,第410页。

⑧①《红军各方面军司令部指令集(1917—1922年)》1972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244页。

⑧②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46案卷,第145—147页。

⑧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66—170页。

⑧④《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32页。

⑧⑤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141页。

⑧⑥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2目录,第46案卷,第200页。

⑧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

⑧⑧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46案卷,第413页。

⑧⑨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04全宗,第4目录,第484案卷,第11页。

⑨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15页。

第二章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08页。

②1924年1月23日《消息报》(摘自《在伟人的陵墓旁》,1924年莫斯科红星报社

版第63页)。

③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23315卷宗。

④《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3年莫斯科版第60—61页。

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民记录》1923年莫斯科版第61页。

⑥摘自《在伟人的陵墓旁》红星报社版第151页。

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696页。

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382页。

⑨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3—214页。

⑩卢那察尔斯基《革命人物剪影》1923年莫斯科版第31页。

⑪《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453—454页。

⑫《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74—275页。

⑬《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319页。

⑭《捷尔任斯基文集》1931年莫斯科版第141、186页。

⑮1930年10月31日《红星报》。

⑯《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7页。

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卷宗。

⑱曼弗雷德《法国大革命》第328页。

⑲《黑格尔著作集》(两卷集)1971年莫斯科版。

⑳《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莫斯科版第47、49、51、52页。

㉑同上,第69—70页。

㉒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29卷宗。

㉓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78卷宗,第1—2页。

㉔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78卷宗,第1—9页。

㉕同上,第2—9页。

㉖《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68页。

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92—393页。

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85页。

㉙《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13页。

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4全宗,第1目录,第142卷宗,

第126页;《列宁年谱》俄文版第12卷第388页。

㉛亚当·乌拉姆《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1973年纽约版第213、214页。

㉜《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

㉝同上,第351页。

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4页。

㉟《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711页。

㊱《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6页。

㊳卢那察尔斯基《革命人物剪影》第42页。

㊴赫尔岑《哲学文选》1940年莫斯科版第154页。

㊵卢那察尔斯基《革命人物剪影》第42页。

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31卷宗。

㊷《托洛茨基文集》第8卷(《政治人物剪影》)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66—67页。

㊸《葛兰西选集》(三卷集)第3卷1959年莫斯科版第185页。

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9页。

㊺同上,第301页。

㊻《布哈林选集》1988年莫斯科版第120—121页。

㊼《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3页。

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338页。

㊾《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㊿同上。

(51)《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记录。苏共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1969年莫斯科版第262页。

(5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53)同上,第463页。

(5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340页。

(55)同上,第341页。

(5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57)卢那察尔斯基《革命人物剪影》1965年莫斯科版第26页。

(5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59)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88卷宗。

(60)《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记录。苏共代表大

会和代表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第80—81页。

61《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67页。

62《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0年莫斯科版第81页。

6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38页。

64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34卷宗,第1页。

65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141页。

66《高尔基全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17卷第43页。

67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1974年纽约阿尔弗雷德·诺夫版第139—140页。

68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8、226页。

69摘自《在伟人的陵墓旁》1924年莫斯科红星报社版第27、63页。

70摘自《在伟人的陵墓旁》1924年莫斯科红星报社版第246、253页。

71同上,第248、249页。

7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58页。

73同上。

74《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4年莫斯科版第37—38页。

75《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4年莫斯科版第37—38页。

76拉狄克《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总结》1923年版第25页。

77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哲学自传习作》1949年巴黎乌姆卡报刊出版社版第251页。

第三章

①《拿破仑选集》1941年莫斯科版第62页。

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分册第43页。

③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1目录,第4870卷宗。

④同上,第2目录,第112卷宗。

⑤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5年莫斯科版第49页。

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30年柏林版第16页。

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09页。

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7页。

⑩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2目录，第103卷宗。

⑪《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事实与文件)》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7—10页。

⑫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09卷宗，第12页。

⑬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1卷宗。

⑭《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3—284、300—301页。

⑮《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09页。

⑯《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48、253页。

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2816卷宗，第3—5页。

⑱《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2、320页。

⑲《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7页。

⑳同上，第328页。

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75页。

㉒《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63页。

㉓同上，第164—165页。

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第136页。

㉕《斯大林文选》(上卷)中文版第52页。

㉖《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3页。

㉗同上，第9卷第290页。

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92、93页。

㉙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918，33987全宗，第3目录，第80卷宗，第20—24页。

㉚《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㉛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09卷宗，第32、33页。

㉜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54卷宗，第54页。

㉝同上，第67页。

㉞《政治工作者》杂志1922年第3期第38—39页。

㉟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6页。

㊱《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7—8期第107—108页。

㊲同上，1928年第9期第6页。

㊳《论党和苏维埃报刊》1954年莫斯科版第347页。

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9页。

㊵《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22—123页。

㊶《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80页。

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81—282页。

㊸《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24、27页。

㊹《论党和苏维埃报刊》第346—347页。

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75页。

㊻柯罗连科《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1922年巴黎版第61—62页。

㊼《艺术之宫》1920年彼得格勒版第1期第65页。

㊽波格丹诺夫《论无产阶级文化》192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2页。

㊾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4年莫斯科版第13页。

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2、155页。

51 1926年10月26日《真理报》。

52 别尔嘉耶夫《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1951年巴黎乌姆卡版第67页。

53《拜伦选集》1984年莫斯科版第88—89页。

54《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35、536页。

55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全宗,第1目录,第2827卷宗。

56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85页。

57《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7页。

58 同上,第176、177页。

59《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5、166页。

60 同上,第149页。

61《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6期第68页。

6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51—153页。

63 埃·别亚《斯大林》1932年里加"雕鸮"出版社版第234页。这位侨民至死再没有补充什么。

64《社会主义通报》杂志1931年第8(总第245)期第8页。

65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86页。

66 同上,第305页。

67 托洛茨基《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的?(给资产阶级报刊写的六篇文章)》1929年巴黎版第9页。

⑱托洛茨基《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的?(给资产阶级报刊写的六篇文章)》1929年巴黎版第60页。

⑲《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18页。

⑳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2098卷宗。

㉑塞涅卡《给卢齐利乌斯的信》1986年莫斯科版第40页。

㉒《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回忆录》1985年巴塞罗那版第530—531页。

㉓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041全宗,第1目录,第2181卷宗。

㉔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8年普林斯顿版第158页。

㉕别尔嘉耶夫《神的和人的存在主义的辩证法》1952年巴黎版第132页。

第四章

①《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1920年莫斯科版第1、15、23、27、28、31页。

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112卷宗。

③《工农政府法令汇编》1925年莫斯科版第313页。

④《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150页。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4页。

⑥同上,第367—368页。

⑦《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页。

⑧《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976页。

⑨同上,第1057、1091页。

⑩《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308页。

⑪《计划经济》1927年第7号第11页。

⑫《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5、7页。

⑬《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6—157页。

⑭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195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卷第493页。

⑮《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7页。

⑯同上,第132页。

⑰《布尔什维克》杂志1940年第1期第2页。

⑱《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6、78页。

⑲《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44页。

⑳《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9页。

㉑《苏联历史——从古代到现代》1966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1部第189—190页。

㉒康奎斯特《灾难的丰收》1986年伦敦版。
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页。
㉔布哈林《进攻》文集1924年莫斯科版第98、99页。
㉕《布哈林选集》1988年莫斯科版第133页。
㉖《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第6、14页。
㉗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74年纽约版第182页。
㉘《布哈林选集》1988年莫斯科版第137页。
㉙《普卢塔克文集》1983年莫斯科版第259页。
㉚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74年纽约版第337页。
㉛《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1页。
㉜同上,第62、72页。
㉝《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页。
㉞《社会主义通报》1931年第8(245)号。
㉟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891卷宗,第25—31页。
㊱《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
㊲同上,第43卷第325页。
㊳《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7、188页。
㊴同上,第189页。
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9页。
㊶《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8页。
㊷《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
㊸同上,第33卷第20页。
㊹《社会主义通报》杂志1931年第8(245)号。
㊺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92全宗,第2目录,第6卷宗,第78—81页。
㊻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67目录,第(一)1卷宗,第5页。
㊼《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5、98、101、106页。
㊽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9卷宗,第26页。
㊾苏军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773卷宗,第102页。
㊿拉狄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1934年莫斯科版第20页。
51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5088卷宗。
521933年8月5日《真理报》。
53《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255页。

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18页。

㊺《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28页。

㊻《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253页。

㊼同上,第125页。

㊽同上,第211页。

㊾《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250页。

㊿同上,第493、496、497页。

61《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521页。

62苏军国家档案馆第918/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55卷宗,第88页。

63《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235页。

64《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第115页。

65《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19页。

66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5228卷宗,第1页。

67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5228卷宗,第2页。

68总参谋部档案馆第16目录,第17架,第9层。

69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2548卷宗。

70《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卷1962年莫斯科版第403页。

71波姆佩耶夫《多么想生活再生活(关于基洛夫的纪实性中篇小说)》,1987年莫斯科版第8页。

72同上,第18页。

73于索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334卷宗。

741934年12月3日《真理报》。

75《社会主义通报》1956年第12期。

76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9卷宗。

77《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18、19、21页。

78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179卷宗。



第5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否定假造的神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任务；应该在它们的假面具下面找出它们存在的原因。

——亚·赫尔岑

（俄国作家、哲学家、革命活动家）

世界文化大师之一普卢塔克在自己的《列传》一书中对罗马国家的奠基人罗慕路斯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希望自己的权力牢固，并且日益骄傲起来，就把人民政体变成了令人痛恨的君主政体，这个政体从建立之时起就单单因皇帝的服装而引起不满。他开始穿红色衬衫和紫红色外衣，而且坐在有靠背的宝座上处理公务。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因能够迅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指示而被称作赛勒利斯。另一些人走在他的前面，用棍棒驱赶人群。他们束着皮带，以便能够立即捆住要他们抓起来的任何一个人。"[①]普卢塔克未必知道，他描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被客观形势推上权力的顶峰，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时，他就把人民变成群氓，自己也变得不再像他自己。历史证明，人在权力的魅力前面是软弱的。除极少数例外，长久地、无限期地穿着"紫红色外衣"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不仅对人民的态度，而且首先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我没有将普卢塔克的话同斯大林逐字"对照"：他表面上没有改变政权形式，没有穿"红色衬衫"，也没有坐在象征着王位的宝座上，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到了30年代中期，他对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看来，他记得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话。当时，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他将普列汉诺夫作为第五位思想家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名字后面。他在普列汉诺夫文集中写满了各种标记。大概，总书记在1930年12月去会见红色教授学院哲学和自然科学教研室党支部委员会成员之前又翻阅过普列汉诺夫著作吧？很可能。不过有一点确实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曾指示"要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他除了其他指示外还指出："要揭露普列汉诺夫，要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一直藐视列宁……"[②]

我想，斯大林是知道普列汉诺夫下面这句话的："伟大的人物就是创始人，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并且希望比别人强。"现在要"揭露"的这个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斯大林所喜欢的。然而，普列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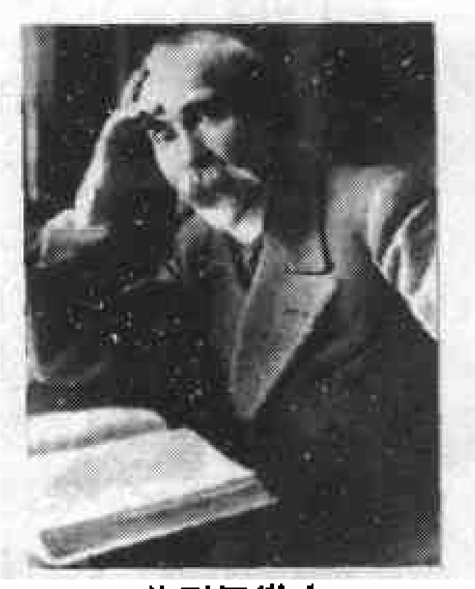
诺夫接下来说，领袖不可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③]，这段话斯大林未必喜欢。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国惟一的领袖。

如果在20年代“领袖”这个词也曾相当广泛地用在其他人身上（如“红军领袖托洛茨基”、“革命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红色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国际领袖”、“共产主义青年团领袖”等等)，那么，这时就只能用来称呼他斯大林了。我想起，列宁也用过“领袖”这个词，但主要不是表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而是表示政治品质。正如分析列宁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列宁来说，领袖——首先是阶级、社会集团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不允许与权力人格化有关的任何崇拜和神话现象存在。早在1900年写作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伟大的思想家就强调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在此一年前，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运动时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工人先进分子”。在列宁看来，领袖是能够忘我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劳动者先进代表。列宁写道：“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像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⑤]可见，列宁讲的很多领袖是无产阶级先进领导人的同义词。

斯大林及其他周围的人的行为逻辑就是



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
(1856–1918)

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881年底，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883年，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创立了“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译成俄文出版。普列汉诺夫的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唯物主义史论丛》等。



在斯大林时期的宣传画中，斯大林的形象都是作为列宁最忠实的学生和天才的继承人出现



表现斯大林与列宁在1917年的宣传海报



伊·泰纳(1828–1893)

19世纪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他自幼博闻强记。最初专攻哲学,后来转向文艺评论方面发展,他的文学理论受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形成。在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研究》。

为了探索法国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他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当代法国的起源》。在这部史学著作中,泰纳把法国遭受浩劫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上的动荡不宁。他的意思主要是指人民的革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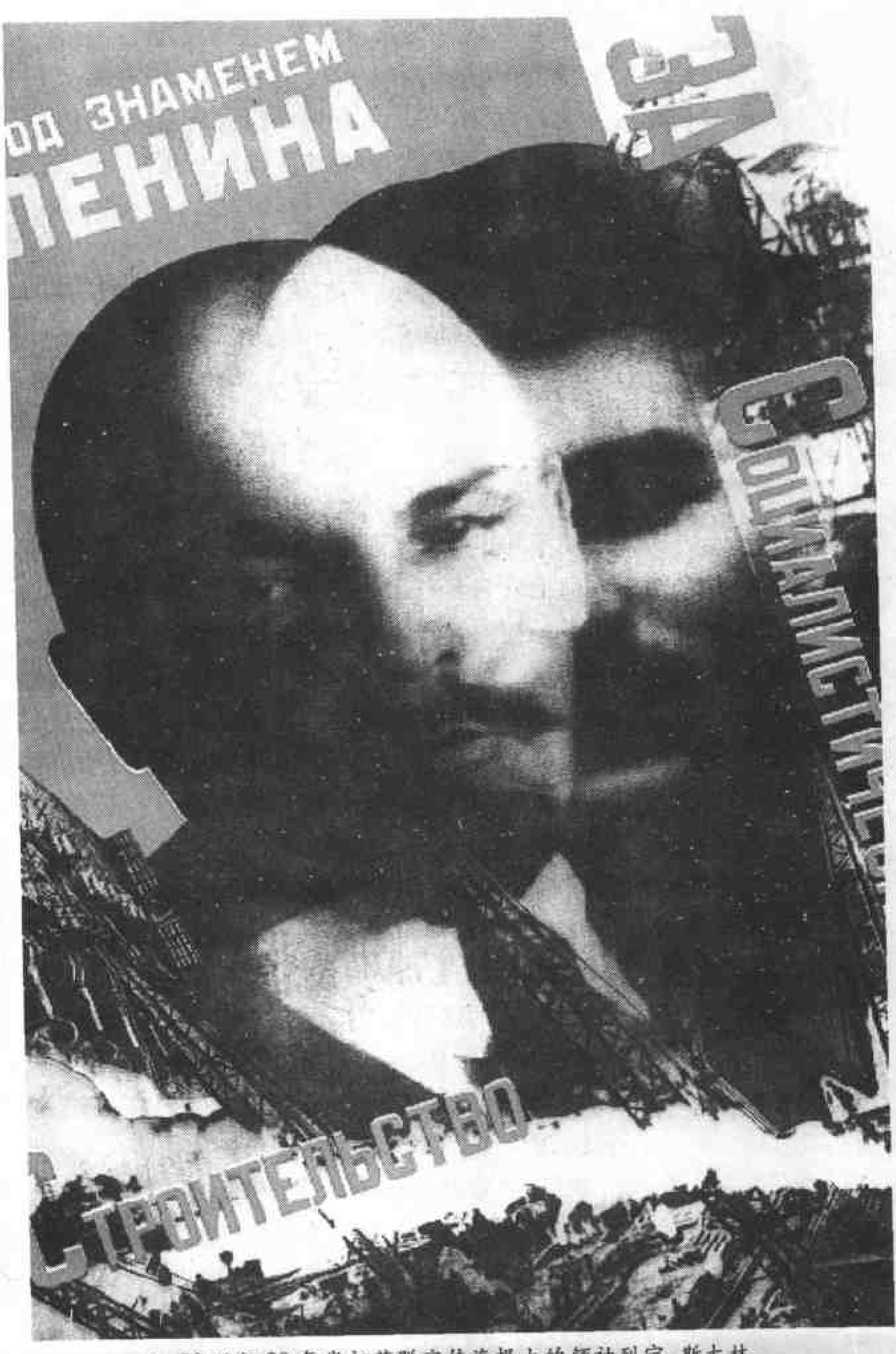
要在党内和国家内建立一种能够确立"统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体系。("统治人物"这个用语,我是从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对19世纪法国哲学家伊·泰纳的著作进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来的。[6])



"统治人物"

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30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宣传海报上的领袖列宁、斯大林



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大林与米高扬等领导者，那时他已经开始把自己视为很多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国惟一的领袖

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7]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1931年12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70个委员。在这70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8]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6次代表大会、5次代表会议和43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20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2次党代表大会、1次代表会议、22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13年！有些年——1941、1942、1943、1945、1946、1948、1950、1951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



1933 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与莫斯科市民



1929年12月21日，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塑像下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左二）、加里宁（右三）、奥尔忠尼启则（左一）、基洛夫（右一）等人庆祝自己50岁生日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

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1931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1925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

列宁早在1905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9]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20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

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

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30]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

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1938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

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

"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

"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11]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12]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30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

"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



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指令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斯大林的战友同斯大林从来没有原则性分歧，这使他有时也感到厌烦

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1936年4月7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13]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30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30年代和40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

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加米涅夫(1883-1936)

俄共早期领导者

出身铁路工人家庭，他从中学时代开始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斯大林共同担任《真理报》的编辑任务。1925年1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工业化的总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了“新的反对派”。1936年与季诺维也夫受到审判并被枪决。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1882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16]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4300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

"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35]

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

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简单、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1938年10月1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



1938年的苏共党史的中心是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

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也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的东西都说到了。"[36]斯大林一点也没有他喜欢讲的谦虚精神，对自己的著作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从这时起，他已经深信自己不仅是惟一的英明领袖，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这就是在

党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实行专权和一长制后必然造成的结果。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
（约70–160）
古罗马作家

出身于骑士阶层，曾当过律师，同小普林尼和塔尼陀等人友情甚笃。他的著述甚丰，包括历史、文学、语言、民俗学等各个方面，主要著作为《十二恺撒传》，书中记述了从恺撒到多米提安12个罗马皇帝的生平，记录了每个皇帝的出身、性格、生活习惯以及宫廷琐闻逸事，是罗马帝国早期历史重要资料。



罗马皇帝提比略（公元前42–37年）和阿格丽平娜。提比略在位时间为公元14–37年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描述罗马皇帝提比略生平时要人们相信，独裁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未来，他"早就预见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怎样的仇恨和耻辱"。[17]而斯大林却没有想过这些。他的档案——笔记、决议、信件、照片、新闻影片、讲话速记记录都证实，"领袖"相信他自己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直至他逝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提比略那样的远见，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名望"，想使之千秋万代永存。在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领袖的专制"地位逐渐在众多的个人崇拜活动和"仪式"中巩固下来。例如，设立了斯大林奖学金、斯大林奖金。（1925年8月在斯大林参加下通过的关于设立列宁奖金的政府决议简直被忘却了）由斯大林亲自审订的国歌也反映了他在祖国命运中的作用：

>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
> 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谢·米哈尔科夫和格·埃尔-列吉斯坦根据领袖的指示创作了国歌歌词，把它送交斯大林。斯大林认真审阅，作了修改。在斯大林档案中保存着这些"笔迹"。

斯大林将"各自由民族的崇高联盟"一句改成"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

第二段四行词作了较多的修改。这段诗最初是这样的：

> 暴雨过后自由的阳光照耀我们，

列宁为我们照亮未来的道路，
人民的代表斯大林教育我们，
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

经斯大林用铅笔改动后的歌词第二、三行词就变成了：

伟大的列宁为我们照亮道路，
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

斯大林有点不喜欢“人民的代表”这句话。虽然，如果想想就知道了，人民确实没有选举过他。他成了广大人民的首领、领袖、独裁者，但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仅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立即就同意了斯大林对歌词的这一重大修改，而且1943年10月28日晚上在斯大林住处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谢尔巴科夫也赞成斯大林的修改意见。所以，斯大林不只是“批准”国歌歌词。例如，作者提出的副歌：

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蒸蒸日上，
让我们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
让光荣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保护着你——

斯大林马上就删去了这一段，甚至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大概，他不满意“世界和平”的提法[18]吧？

国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党，但是关于领袖的词却是那么必需……在苏联人民心目中逐渐确立了一个思想——斯大林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体人民的领袖。1949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就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公开表达了这一思想：“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他热爱人民。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具有领导各族人民进
行斗争的智慧。[19]

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注释者之一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写的《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领袖》。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从19世纪90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宁在一起，总是同列宁在一起，总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20]不过，在这本唱赞歌的书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强调"斯大林对敌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确。"领袖"对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人都毫不留情。

斯大林读这类"作品"时，愈来愈坚信，他不会很快达到命运的顶峰，"赞美"看来是无止境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像赞美他那样赞美过任何一个俄国沙皇！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扮演着绝对正确、洞察一切、权力无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对"领袖"的胜利吹捧得越厉害，人民悲剧的根子就在社会土壤中扎得越深。

在指出所有这些把"领袖"作用绝对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它们也起了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虽然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今天我们知道，人民的团结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但是当时，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特别注意树立对领袖、对领袖的智慧和绝对正确的信仰，这样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尽管30年代末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国家发展中存在极权主义倾向和"领袖"的独裁作用，但社会及其社会基础还是很牢固的。

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几十年后，虽然公布了大量关于他、关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罪行的材料，还有很多人由于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道德方面的习惯而继续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缔造者、"铁腕式"的英明领袖。我想，这种怀念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秘密"不仅同时间的、年龄的状况（"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偶像）有关，而且首先由于从总书记开始通过宣传、教育、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长期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这样一种信念。因此，对斯大林的"忠诚"



领袖与儿童



斯大林个人品质在个人崇拜现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于是斯大林成了人民的慈父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那个联系着青春时代的思想的忠诚。过去为这个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献,现在却突然发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象征原来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毕竟是神……

问题不仅仅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个人不可能如此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即使是借助于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影响也不可能。社会实践本身,对一个人进行吹捧的战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关系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领袖的权威才能在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这种体系中,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为加强领袖的权威“效劳”。当然,特别积极“工作”的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是权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换句话说,在“领袖和政党”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偏差不能只归罪于一个人。看来,问题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将党、人民、群众的权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机制。当然,口头上这样讲了,但是同实际脱节、同社会实践脱节。正因为这样,在领袖和人民权威对比关系中出现了变形,为此人民和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给个人崇拜的产生、性质下定义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强调这个人——个人崇拜体现者的主观品质。毫无疑问,主观品质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体的个人的反面品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政权的政治机制。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个人身上,那么,当这个人离去、逝世后,对这个体系、这个机制就无需作任何改变,因为崇拜现象的体现者已经不在了!然而,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对“统治人物”崇拜,把领袖权威神化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的“乳汁”的滋养。不建立可靠的民主机制、保障和保护措施,个性的变形就可以表现为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或者表现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精神停滞的可笑的自我吹捧和华而不实。

由于人们已经过多地(这也是对的!)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品质在个人崇拜现象中的重大作用,我现在打算突出描写能够反映他智力特点的一些方面。大概,这是像斯大林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形象中最少研究的一个方面。

斯大林的智力

古罗马神话留给我们一个弥涅尔瓦的形象——智慧女神。古人把她描绘成一个从朱庇特脑袋里出来的身着戎装的苗条妇女：头戴盔甲，一手拿梭镖，一手拿盾牌。在女神的脚边立着一只猫头鹰——神鹰，无声的奔放的想象力的化身。按照远古人的迷信说法，想象力总是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历史之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弥涅尔瓦的猫头鹰只在夜间飞出来”，[①]他把这句话解释成意识必然落后于现实存在。

我在试图说明斯大林智力特征之前，先谈谈这个概念的含义。心理学家们常常把智力当作智能；哲学家们则把智力看作思维过程；在各种科学文章中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的思维能力、智慧、创造因素、认识能力等等。这基本上反映了智力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人的个人意识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理性（理论）部分和感性（感觉）部分。如果智力概念同个人意识的内容完全吻合，那么个人意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依我看，智力是对人的创造思维活动能力的概括评价。智力不是个人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独立成分，而是以能积极合理地反映现实的形式出现的人类心理的整体表现。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属性。马克思写道：如果失去了理智方面，“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看来，可以说，智力无非是表示一个人能够创造性地掌握现实的理性认识水平。“掌握”周围世界是依靠达到理性思维（“健全的理性”）、智慧（最高思维能力）和直观水平的智力来实现的。在基本特征相同的基础上，每个人的智力又是独一无二的、不重复的、有自己特点的。

近年来，大概由于对斯大林、对他的生平、活动反面报道越来越多，形成一种印象，好像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并不比平常人高。有时说的

更绝对，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是"杰出的庸人"这个评价实质上是正确的。未必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出色智慧的人能够从1912年起就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列宁会称他为"杰出的领袖"之一，能够在20年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中，在同那些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他的人的残酷斗争中成为胜利者。

全部问题在于，当我们评价斯大林个人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首先(这是很自然的)提出他的犯罪行为、阴谋诡计和对他认为是敌人的人的残酷无情。所有这些都只是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智力，而更多的则是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大林超群的智力(我想，他具有这样的智力)似乎带有很多反人道主义的特征。斯大林的智力由于同罪恶表现有着有机联系而在整个人类道德方面失去了价值。如果可以扼要说明斯大林的智力特点，那么，说他具有"超群的罪恶的智慧"，似乎比较符合事实。我认为，道德缺陷本身就是智力不健全。这是智力在道德方面的衰落，也就是说，不见善良之光闪烁。甚至可以说，在人性结构中，道德上的缺陷能够将很高的智力降低到只能发挥计算机即逻辑机械的功能，降低到合理的但却残酷无情的机器的水平。

革命前斯大林在同论敌进行斗智的辩论中经常被弄得很难堪，有时甚至受到侮辱，他不甘心在这些辩论中充当不说话的小角色，努力尽可能扩大自己政治理论知识的范围。尽管工作异常繁忙(这的确是真的)，斯大林仍然为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斯大林个人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尽管很长，我还是把它全文引用。

1925年5月斯大林委托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一个像样的个人图书馆。托夫斯图哈犹豫了一下，问道：

"图书馆中都要哪些书？"

斯大林正准备口述，突然又停了，坐到桌旁，当着助手的面，几乎不加思考地用了10—15分钟时间，在笔记本的一张纸上用普通铅笔写着：

给图书馆馆员的便条。我的建议(和请求)。

1.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

(1)哲学；
(2)心理学；
(3)社会学；
(4)政治经济学；
(5)金融；
(6)工业；
(7)农业；
(8)合作社；
(9)俄国历史；
(10)其他国的历史；
(11)外交；
(12)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13)军事；
(14)民族问题；
(15)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
(16)工人状况；
(17)农民状况；
(18)共青团(所有关于共青团的单独的出版物)；
(19)其他国家的革命史；
(20)关于1905年；
(21)关于1917年二月革命；
(22)关于1917年十月革命；
(23)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24)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
(25)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
(26)工会；
(27)小说；
(28)文艺批评；
(29)政治杂志；
(30)自然科学杂志；
(31)各种字典；

(32)回忆录；

2.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拿出(单放)：

(1)列宁的书(单放)

(2)马克思的书(——)

(3)恩格斯的书(——)

(4)考茨基的书(——)

(5)普列汉诺夫的书(——)

(6)托洛茨基的书(——)

(7)布哈林的书(——)

(8)季诺维也夫的书(——)

(9)加米涅夫的书(——)

(10)拉法格的书(——)

(11)卢森堡的书(——)

(12)拉狄克的书(——)

3.所有其他书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

约·斯大林

1925年5月29日[23]

考虑到，这实际上是匆忙写成，而且注意到当时“书的文明”水平，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观点具有一定的广度。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历史、首先同政治活动和同反对派斗争有关的某些具体知识领域。人名很少，在名单中除列宁以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以及他与之辩论过和将要与之辩论的人。名单中没有思想巨匠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卢梭、笛卡儿、狄德罗以及很多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

我已经讲过，对已经熄灭的理智及其隐私是很难加以推断的。但是，具体表现在行动和行为中的能够判断智力“秘密”和特点的事情和思想保留下来了。在研究斯大林的过程中，他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斯大林本人的“痕迹”为思考提供了很多素材。在克里姆林宫图书馆、在孔策沃住宅中的很多书的页边上都有着重号、记号、批注。在很多书中都有“约·维·斯大林图书馆第×号”的藏书签。请注意，在第一版《列宁全


1921年列宁在第三国际会议上发言


列夫·托洛茨基
(1879—1940)

苏联时期著名政治家

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第四国际领导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所谓"托派分子"首领。

由于和斯大林政见不合，受到迫害，被苏共宣布为叛徒、卖国贼，最终亡命天涯：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40年被暗杀于墨西哥城。

集》所有卷次的页边上都标满了着重号、钩号和惊叹号。有些文章斯大林大概看了不止一次，因为文章的有些句子他不仅用红笔，而且用蓝笔和普通铅笔多次划过。斯大林最感兴趣的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自己的同时代人中，斯大林最经常读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书。例如，1932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小册子《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全书被"领袖"用红铅笔划满了，特别是布哈林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点。1921年柏林出版的斯摩棱斯基的书《托洛茨基》，上面所有以批评态度评价斯大林不可调和的论敌的地方都划了着重线："托洛茨基爱挖苦人，不能容忍"，"这是一种好发号施令的性格"，"政治上的贪权者"，"托洛茨基是天才的政治冒险家"等等[28]。斯大林竭力去寻找反对自己对手的论据。看得出，斯大林从1920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恐怖分子和共产主义》中找到了很多同托洛茨基斗争的论据。他还仔细研究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加米涅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布勃诺夫的《共产党在俄国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一书、纳尔夫斯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卢森堡主义斗争的历史》一书、扬·斯泰恩的《论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一书等等。所有涉及"斗争"的书他都很关心。

斯大林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是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И·别利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珀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

朝》文集等书他都认真研究过。30年代和40年代在他的图书馆中收集有中学和大学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并且所有书上都有他的批注[28]。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方式描述祖国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社会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助手们从定期刊物上、"厚厚的"杂志中将所有他们认为有趣的资料报告给斯大林。"领袖"在处理公文的间隙，有时抽出30—40分钟时间，读读文学新作品，翻阅杂志中的文章。有时读完后按电铃，助手进来，斯大林让他打电话给某个作家、某创作协会领导人转达他的要求和意见。有时他也亲自动笔。他翻阅完考涅楚克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立即写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

我读了您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是一本艺术上完整的、使人开心的、非常开心的书。我只是担心，这本书太使人开心了；有一种危险：在喜剧中使人过分开心会使读者或观众忽略剧的内容。

随告：我在第68页上加了几句话。这样做是为了更清楚。

敬礼！

约·斯大林

下面是斯大林增补的几句话：

1."今后将不是根据牲畜的数量、而是根据集体农庄土地公顷数征税……"

2."不论集体农庄牲畜繁殖多少，税额数不变……"[29]

斯大林的实用主义头脑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他没有放过机会借考涅楚克之口说明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个决定，还说，并不全都喜欢……

读完埃尔德曼的剧本《自杀》之后，他写信给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尊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我对剧本《自杀》(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评价不高。我最亲近的同志们认为，该剧本内容浮浅，甚至有害……我并不排

除剧院会达到目的。文化和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会帮助你办这件事的。会有一些懂艺术的人。我在这方面只是一知半解。

敬礼!

约·斯大林

1931年11月9日[27]

斯大林努力在创作界扮演"自由主义者"角色,同时故作姿态,说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然而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剧本,而且对书、电影、音乐、建筑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绝对。国家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使他即使不是知道所有知识,也应该知道很多,这确实使斯大林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知半解者"。有时他的一知半解是为了证明领袖的"无所不知"。

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书籍也很注意。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写的东西都给他翻译出来(一份)。斯大林也浏览侨民的出版物。1935年12月中央委员会报刊出版部主任Б·塔尔通知政治局委员:

"请告知,在下列1936年白俄侨民的出版物中您订阅哪些:

1.《最近消息》

2.《复兴》杂志

3.《社会主义通报》

4.《俄罗斯旗帜》

5.《普罗柯波维奇经济办公室公报》

6.《哈尔滨时报》

7.《新俄罗斯言论报》

8.《现代纪事》杂志

9.《俄罗斯画报》"[28]

斯大林看了这个目录后,对助手说:"全部,全部都订!"

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专门橱柜里存放着很多白俄的"反动"书籍。他确实保存了托洛茨基的全部书籍,并在书中夹着大量书签,划了着重号。托洛茨基发表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答记者问、声明等马上翻译出来并报告给斯大林。需要指出的是,他十分细心地注视着他的敌人在国外写的全部东西。

斯大林对反宗教书籍的态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废纸"。不管怎么说,宗教教育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斯大林的书面和口头发

言中经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让我们回忆一下1941年7月3日他在电台发表的动人演说，当时他用"兄弟姐妹们！"这样一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寻常的词句来称呼人民。1929年在庆祝完自己的50大寿之后，斯大林亲笔给《真理报》写了一个便条，以《圣经》中的口吻对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你们的祝贺和问候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和问候，因为是**党按照自己的模式**（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生育和培养了我。"[29]1942年8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谈论时谈到劳合-乔治——国内战争时期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对目前来说已遥远的年代的回忆作总结，他说："所有这些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是属于上帝的。"[30]

当然，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有其宗教根源，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义的辩护士。他能花费数小时在经典作家那儿寻找需要的词句和说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样，来"不容辩驳地训斥"并战胜自己的论敌。例如，在1929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全会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了解列宁"。这样做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是众所周知的。

布哈林在全会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合理意见：把资金过多地从农业投向工业，这对农民来说，将是"一项负担不了的贡款"。斯大林马上暗暗记下了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关于"贡款"的话，晚上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的图书馆翻了很长时间列宁著作。翻了一阵，找到了。他马上觉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于死命"的论据。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时声明："……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环顾一下大厅，"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以胜利者的口吻补充道："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

斯大林在这里援引了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实，列宁完全是在不同

的上下文中使用“贡款”一词的。当下边有人喊“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时，斯大林立即进行反驳：

“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30]

斯大林并不在意他已经把争论变得无内容了：只争论列宁是否讲过“贡款”一词，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他已经认为是次要的了。

斯大林通过参加大量辩论，“磨炼”了自己的论战头脑。是的，他总是采用同一种办法，即总要把对手置于窘境，而他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宁的“捍卫者”；他武断地认为，只有他能够正确地、准确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几乎针对对手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宁的引文、语录，有时这些话完全是针对别的问题讲的。斯大林早就发现，用列宁引文作的铠甲可以使他实际上无懈可击。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问题（这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对斯大林说：

“对于您来说，列宁的引文是您绝对正确的护身符。但是应该看到引文的实质！”

“难道作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的想法不好吗？”斯大林立刻应付过去了。

斯大林的直率、攻势、好战、粗暴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时甚至精彩的论据得不到听众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与“捍卫列宁”、党的总方针、中央的统一等等相联系的有点粗暴的、浮浅的、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指责性演说却会迅速被人们理解。他的头脑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关心体裁的“优美”，也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爱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样善于作知识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样注重科学的论据。斯大林在无数次争论和辩论中所以能战胜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修正列宁主义”，而他是“捍卫”列宁主义的。这种解释从30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释了。

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欢把一切都摆在一个个小格

子里,喜欢"反复咀嚼",解释得非常通俗。如果论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会非常严厉地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烦琐哲学"。他的报告、讲话、决定总是严格限制在列举现象、讲明特点、划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确任务的范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而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点"和"界限"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实现,但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斯大林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深人地分析、揭示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自己写的《十二恺撒传》中指出,虽然尼禄童年时就学过"贵族科学",但他拒绝掌握哲学,认为"这对未来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障碍"。斯大林未必这样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无法在哲学方面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不能掌握辩证法,"领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想扩大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根据红色教授学院领导的推荐,斯大林邀请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老布尔什维克扬·斯泰恩来给他讲授"辩证法课"。斯泰恩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后来是中央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多次当选党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独到的见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学老师",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包括研究德国经典作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拉德莱的著作。斯泰恩每周两次按规定时间到斯大林住处,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泰恩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平静地继续讲道:"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头脚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把一些唯物主义原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但这实质上从总体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着地的,应该让它用脚着地,

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内核……”斯大林已经开始急躁了，他严厉地问道：“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意义?”

斯泰恩又继续耐心地加以解释，力图把“领袖”理解不了的哲学的深奥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斯大林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一点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但是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尽管斯泰恩想尽一切办法，斯大林还是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对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进行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学生”对“老师”只有一种恶感。斯泰恩同卡列夫、卢波尔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们一样，被宣布为理论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于1937年被捕并死去了。看来，等待着20年代末同布哈林关系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会是同样的命运。但是，斯大林只是长期让这位大学者戴一顶“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帽子，不让他从事积极的社会和科研工作。

德波林(1881-1963)
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担任编辑和哲学教学工作。1926年至1930年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他的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入门》等。

1930年10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会议实质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主义阶段的估计不足”。德波林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是米柳亭、米丁、麦罗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出来“揭发”他，同时也“揭发”斯泰恩、卡列夫、卢波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估计不足”。主席团会议结束后，风波并未平息。科学家们不能容忍把警察方式运用到科学中来。看来，哲学是斯大林“科学学”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同年12

月，总书记作了一个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报告。形式上这是已经提到的在德波林任院长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斯大林发言是很严厉、很坚决的。这个发言非常雄辩地证明斯大林哲学思维水平、他的智力合理性水平以及起码的分寸：

“必须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必须摧毁德波林集团所写的全部著作。可以把斯泰恩、卡列夫驱逐出去。斯泰恩神气得很，可他是卡列夫的学生。斯泰恩是一个十足的懒汉。他只会讲话。卡列夫装腔作势，徒有虚名。我认为，德波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但必须把他留在编辑部(这里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本书作者注)，以便有人供我们攻击。编辑部内部将有两条战线，但我们将是多数……”

发言结束后，接二连三地向报告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是否可以把理论界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

“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斯大林教导说。

“‘左派’是怎么回事？‘右派’已经谈到了……”

“在左倾的掩护下搞形式主义，”总书记评论说，“把自己的材料浇上些左的调味汁。青年人喜欢左倾。而这些先生们都是好厨师。”

“学院在哲学方面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又一个新问题。

“主要问题是打击。四处出击，向没有出击过的地方出击。对德波林分子来说，黑格尔是一尊圣像。应该揭露普列汉诺夫。他一直藐视列宁。恩格斯并非全都正确。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就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32]

这就是斯大林对哲学家的“教导”，可是他对哲学几乎分辨不清。主要是“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专门章节中作了阐述。他用简略的、零碎的语句把全部哲学分成几个基本特征，就像士兵排队一样，如此而已！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斯大林却把它叫作辩证法。如果用来扫盲，在有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个《哲学基础知识课本》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后，谁也不敢写这个题目了。哲学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只能进行注释、解释、吹捧……斯大林时代是哲学思想停滞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哲学吗？斯大林参加“哲学辩论”这一举

动是对他智力的合理性程度的写照。

众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特别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力。斯大林的头脑对世界、现实的反映当然不是明净如镜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反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根据政治观点、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阶级性来研究、分析所有社会过程。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对哲学家们的讲话。斯大林作完报告回答问题时，就已经想好了：必须将自己的指示用特别决议的形式迫使这些哲学家们接受。下一个月，中央果然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专门决议。联合在出版物周围的德波林的拥护者们被说成“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

斯大林的头脑、他的思维可以说逐渐具有一种“命令”性质。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头脑不会因“磨损”而衰老，只会因思想懒惰、不努力工作而“生锈”。这完全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

> 这个人把上帝的理智给予了我们，
> 不是为了让它白白地发霉。

A·П·巴拉绍夫对我讲，斯大林每天要处理大量工作：报告、情报、各种材料、电报、密码电报、信件，几乎在每个文件上都要写下批示和指示，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往往被看作是最后决定。每天读完厚厚的一叠写给他的信件，匆匆写完言简意赅的批语：“请代为致谢”、“请帮助某人”、“简直是胡说八道”，他经常从信件中拣出一二封信来作详细答复。

例如，列宁格勒什内尔的信。老布尔什维克询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询问政治局里有无各种倾向……

斯大林从大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 什内尔同志！
>
> 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右倾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力量。“左的”倾向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他们决心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其幻想的工业化计划。

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也没有左倾。

致共产主义敬礼

约·斯大林

1928年10月27日[33]

又如30年代的一个文件。在斯达汉诺夫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他和格兰特向政府提出关于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六天脱产一至二天参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的问题。许多人支持这项建议，认为这是革命化的新建议。这都在各报上发表了。

斯大林审阅了文件，简短地写道：

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此事并不重要。

约·斯大林[34]

在斯大林的智力中，很难看出他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他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公设、固定的概念来做事情。同时，斯大林也能进行直觉思维，当作出一些结论和决定时，他好像是在跨越几个认识阶段、阶梯。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出思想的"过程"，只突出地表现了思维的结果、结论、推测、猜疑。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智力似乎越过了逻辑推理，一下子"得出了"结果、概要。当然，毫无根据的猜疑常常是由于意识中缺少某些道德成分所造成的。斯大林正是这样。他能够看着自己任何一个战友说："你为什么总躲避我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过分的多疑主要不是直觉思维的表现，因为斯大林的推测没有现实根据，而是观点有严重缺陷的表现：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智力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其肖像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我们知道，知识使人成为内行，感情使人高尚。意志则能使信念、智力构思具体体现在行动中。意志就如同大脑的"筋肉"，这是智力的动力。在生活中常见的是，自己软弱就如同别人有力量一样可怕。坚强的意志会使智力变得积极、活跃、有目的性。一般说来，军事长官、统帅都具有这种智力。正是这些人最先指出斯大林具有非凡



华西列夫斯基
(1895–1977)
苏联元帅、军事家

1919年参加红军。1940年5月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参与制订苏军在北方向、西方向和西北方向战略展开的作战计划。苏德战争期间，1941年8月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主持制订一系列重大战役计划。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他直接指导和协调参战部队抗击敌军进攻，并主持制订反攻计划，为彻底击溃进攻之敌作出了贡献。1943年2月晋升为苏联元帅。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战后任苏军总参谋长和武装力量部副部长，领导军队改组和加强部队军事训练等工作。获列宁勋章8枚。著有回忆录《毕生的事业》。

的智力，这不是偶然的。

我将用单独的一章来描写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但现在评价他的智力时，我只是从苏联杰出的统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许多战争期间同斯大林共同工作过的人那里引一些证据。朱可夫元帅指出，斯大林具有"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天生的分析头脑、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接着，这位最著名的苏联统帅写道，斯大林"读了许多书，是一位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他才能在一天中审阅和掌握那样多的各种材料……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他具有坚强的意志、不外露但爱冲动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他很冷静，通情达理，有时又突然大发雷霆。这时，他往往缺乏客观性，他的眼睛在不停地变化，脸色越来越苍白，目光变得严厉可怕"。[⑮]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谈到斯大林的许多性格特点时，特别强调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没碰到过有谁像他那样记得那么多事情。斯大林不仅知道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这就有100多人)，而且还知道一些军、师的指挥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能记住战略后备力量的组成，能够随时说出某个编制"。[⑯]

再谈一个反映斯大林智力特点的例证，这是丘吉尔提供的。英国首相写道，当我讲完"胜利"计划时，斯大林却立即指出了这一计划的战略长处。"这个很好的声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俄国独裁者迅速彻底地掌握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新鲜的问题。在生命力很强的人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理解我们用几个月时间研讨出来的方案。他闪电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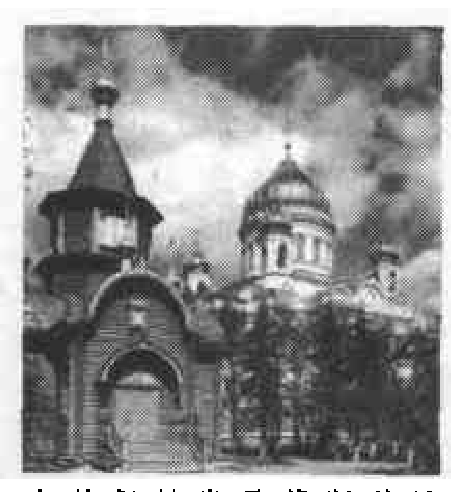
地对一切都作了自己的评价。”[57]

我引用了几个在战争期间同斯大林经常接触的人的证明。他们的论断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人的智力特点。很难否定斯大林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坚定的目的性和坚强的意志。我想,不仅是偶然的机会和各种情况的巧合使他在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年代成了列宁的战友。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一般都能够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表现出他那些最强的特点——意志和目的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特点才能在当时被发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本人才相信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斯大林时,很多内幕他们还不知道,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很多事当时还不能讲。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斯大林智力中的另一个特点:他没有掌握作出长期预测的能力。对于尚未认识、尚不了解的东西,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一点党内同志早就觉察到了。20年代中期,联共(布)图拉州委会书记伊万·卡巴诺夫(后被镇压)有一次说:“斯大林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杰出的组织家,但他的头脑是不擅长分析的,是公式化的。他能够出色地分析过去的问题,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清楚的。但他却不能对前途作出预测。他还不习惯这样做。”这种观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正确的。

斯大林的智力在很多方面是非凡的,但绝不是“天才的”,甚至也不是“杰出的”,在估计本人的潜力时,他的智力缺少合理的“制动器”。斯大林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都可以武断地进行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可以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作出决定性的结论。这些多方面的议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浮浅,可是它们立即被那些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

举这样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根据一些为追求虚荣不惜破坏古物的建筑学家的建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推荐的建造苏维埃宫(根据1922年通过的决议)的地点,恰好是著名的大基督教堂所在地。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得最充分:总书记无法估计俄罗斯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早在向斯大林报告之前,建筑学会就曾在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苏维埃宫的建设地点。当时提出三块地方:中国城、猎人市场和矗立着俄罗



大基督教堂是莫斯科最宏伟的教堂，位于莫斯科河河畔，离克里姆林宫不远。1812年为纪念打败拿破仑而建造，于1931年12月5日在反对宗教的狂热中被炸毁。斯大林曾准备建造同样壮观的纪念性建筑——苏维埃宫，但没有实现，1997年9月大教堂重建完工



苏维埃宫设计图。梦想中的列宁墓-苏维埃宫被称为共产主义巴比伦塔

斯引以为骄傲的宏伟的大基督教堂的地方。参加投票表决的有建设局局长克留柯夫、约凡、克拉辛、拉甫罗夫、波波夫、别谢达、克鲁季科夫、莫尔德维诺夫、奥尔洛夫，以及应邀的舒谢夫、柳德维克、巴尔辛、波扎尔利茨基（文件中没有这些人的全称）。靠人民的捐献建造了这个基督教堂，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问问人民。1931年12月5日，这座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建造起来的教堂被毁掉了。当响起爆炸声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工作的斯大林颤抖了一下。他不安地问助手：

"这是什么声音？哪里在爆炸？"

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根据您批准的关于确定苏维埃宫建设地点的七月决议，现在正在拆除基督教堂。斯大林放心了。在持续一小时的爆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理会这件事，又专心地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集体化进程的报告。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个民族圣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建造的。参加教堂内部装修和雕塑的有韦列夏金、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马扎诺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师。由于无神论和建筑方面的考虑，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记载着教堂被炸的罕见的、绝无仅有的镜头，反映了心灵上的伤痛。看了电影，使我们又想起了1931年那个寒冷的12月。炸掉的不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过去。在过去的东西中，斯大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够肯定他的东西。

被批准的大厦建设方案的作者，建筑学院士Б·约凡是这样描述准备拆除的教堂外貌和斯大林的意见的："1931年，基督教堂还矗立在莫斯科河畔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它庞大、笨

重，镀金的顶部闪烁着光辉，既像圆柱形大甜面包，又像俄罗斯茶炉，那公式化的、冷漠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风格压迫着它周围的房屋和人们的意识，代表着俄国无能的专制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师们，是他们建造了这个地主一商人的神庙……无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向这座象征着旧莫斯科王公贵族势力和情趣的笨拙的建筑物举起了手。"院士还兴致勃勃地描述了斯大林对大厦模型方案提出的"天才意见"。他"大胆"建议大厦高度超过400米。斯大林建议建筑物顶部的列宁塑像高达100米。总之，贪大求全始终是总书记的天性：大礼堂——一定要有21000个座位。主席团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低？要知道领袖要坐在那里的！高些，再高些！不要装吊灯：要靠反射光照明。大厦的主要格调应该反映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誓言的六个部分……斯大林明确示意，这不是普通的苏维埃宫，这是一座使他这个领袖永世流芳的宫殿。这座宏伟的公共建筑要表现出"亿万人民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取得胜利的思想"。[39]

"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大厦的轮廓、饰面、灯光、圆柱的高度、雕塑群的内容、镶嵌图案、比例以及其他专业化很强的问题，都要由一个人决定，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天才"，对建筑领域的问题作决定性的结论是正常现象。

每当谈到历史、文化、艺术时，政治总是第一位的。由于智力方面严重的实用主义，斯大林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珍品同永恒、时代、时间加以对照。例如，赫鲁晓夫在1937年2至3月全会上声明："我们在改造莫斯科时，不应害怕砍掉树木、拆除教堂或某个寺庙。"[40]他的这个声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他的智力只能把文化珍品看作某种次要的东西。"领袖"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最高审判员和鉴赏家。作品、创作的命运如何、大师或整个集体的构思是否能够实现，往往取决于斯大林的一句话。

斯大林的智力在具体问题上没有"涂上"人道主义、博爱的高尚色彩。而且，他的智力表现得非常不道德。请读者自己评价一下。1946年7月贝利亚报告斯大林，战争期间内务部劳改营"积聚"了10万多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犯人，他们的生活费用占用了大量物资。内务部建议释放这些无法医治的病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斯大林补充道：最危险的罪犯——已经判处服苦役的敌人要除外[41]。对"领袖"来说，这些不



斯大林时期，集会中高举领袖斯大林画像的游行队伍

幸的人如何死去，不是无所谓的。

斯大林的智力中不具有求知欲、好奇、怀疑的能力。这些感觉也可以象征性地称作"智力"感觉，它们始终伴随着人的创作思维表现过程。列宁指出，没有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1]。他所讲的正是感觉的这一方面。斯大林善于"隐藏"直接的感觉。他的智力是冷酷的，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这正是所有那些把"伟大领袖"神化的那些人的悲剧的根源之一。


福伊希特万格
(1884–1958)

德国作家

青年时期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1933年希特勒当政，正在美国讲学的他，被剥夺了公民权。1933年至1940年，被迫流亡法国。1937年访问苏联。他以写历史小说见长，多以欧美资产阶级和文化名人斗争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富有戏剧性情节，议论较少，语言简练，笔调幽默。

恺撒主义的象征物

1937年初，德国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访问了莫斯科。他不虚此行，写了一本颂扬的书：《1937年的莫斯科（就莫斯科之行告友人）》。福伊希特万格并不隐瞒他是作为"同情者"启程的。在苏联逗留期间，他对我们国家愈加同情。但福伊希特万格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苏联人生活中的地位，而这方面的论述几乎占了他的书的大部分篇幅。"外国人在苏联旅行，首先看到的是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拜和极端迷信。大街小巷，不分场合，随处可见斯大林的巨幅雕像和画像。所听到的讲话，不仅政治性的讲话，甚至有关任何科学和文艺的报告，都充满了对斯大林的颂扬，而且这种神化往往采取枯燥无味的形式。"[12]

福伊希特万格在会见斯大林时当面把这一切告诉了他，斯大林听后只是狡黠地微微一



斯大林时期的宣传画把斯大林塑成神人的形象，例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代最伟大的领袖等



在个人崇拜宣传中，苏联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斯大林的巨幅画象，充满了对斯大林的颂扬

笑,并耸耸肩说,工人和农民"忙于其他的事,不可能养成高雅的格调;他顺便就自己那张留着小胡子的肖像开了几句玩笑,这幅经常在他眼前闪现的肖像被放大了许多倍,印制了**千千万万张**(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43]福伊希特万格企图弄清这种大规模的盲目崇拜现象的根源和先决条件,但他的解释并不比斯大林的解释进步多少。这位作家断言,对领袖的崇拜"与经济建设成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与这些成就同时增长起来的。人民感谢斯大林,因为他使人民有了面包和肉,使人民安居乐业,使人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还因为他建立了一支足以保卫这幸福的新生活的军队。人民的生活条件尤疑得到了改善,他们需要有一个人作为自己表达感激之情的对象,为此人民选择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抽象的'共产主义',而是斯大林这个具体的人……可见,无限景仰的对象不是斯大林本人,而是显然取得很大成就的经济建设的代表"。[44]

这种朴素的解释极为斯大林所赏识,因此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福伊希特万格的这本书在1937年当年年底就被迅速译出,并在莫斯科大量出版。大概,这是斯大林在世时我国出版的惟一一本承认存在个人迷信、领袖至上主义、恺撒主义并对此作了某种论证的著作。似乎面包和肉不是人民自己生产的,军队不是由人民供养的,安居乐业的局面不是由人民维护的,似乎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一个人活动的结果。这个公式是很有用的:原来,"景仰"的对象与其说是斯大林这个人,不如说是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代表"。实际上在福伊希特万格看来,斯大林就是社会主义理想和现实的化身,因此,这位作家认为,人民应当向斯大林表达"感激之情"。顺便说一句,这种领袖至上主义的忠君思想的生命力相当强。今天仍然有不少的人信奉它。

自从《文学报》和《真理报》发表了我的书的个别片段以后,我收到了几千封来信。有一部分写信人,大概有十分之一,提出了这样的论据:"斯大林建成了社会主义,因此人民尊敬领袖";"虽然人们当时成了'螺丝钉',但却安居乐业";"斯大林并没有要人们颂扬他,这是人民对领袖的尊敬,是为了感激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斯大林在世时物价不断下降,这怎么能不感激他呢"?等等。这些都是从来信中一字不差地摘录下来的。看来,今天仍然不乏景仰"领袖"之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发表了保留意见:"干大事业难免犯错误,而且犯错误的也不是斯


对斯大林的神话往往采取枯燥无味的形式

恺撒主义

在许多时候和情况下，个人的思考与努力变得也能够超越角色、程度和制度施加的限制，并使后者具有个人独有的风格与特色，一些具有特别强大支配力和灵活手腕的政治家甚至使自己凌驾议会制度和其他制衡手段之上，形成"民主体制下的独裁方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曾把这种现象称作"恺撒主义"。

大林一个人"；"斯大林当时采取镇压措施是迫不得已的"；"贝利亚和叶若夫欺骗了斯大林——破坏法纪的不是他"；"现在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很容易，因为他已无法答辩了"。这些话也是从来信中摘录下来的。我不想得罪写这些话的人，但我认为，他们这样信任"领袖"主要是因为对真相知之甚少，不了解这个人及其亲信的真实活动情况，思想里存留着长期以来灌输的观念的积垢。

但我想在这里谈谈另一个问题：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是对人民的侮辱，甚至是对人民尊严的损害。可以把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称作20世纪的恺撒主义。恺撒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始自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当尤利乌斯·恺撒还只是执政官和所谓的人民的公仆时，就已经把全部最高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恺撒虽然保留了原有的共和政体，口头上承认它的民主权力，但却把人民会议变成了他进行统治的驯服工具。人民会议被贬低为只是赞同领袖意志的机关。恺撒培植了新的阶层（贵族阶层），即古代官僚制度的变种，这个阶层成了他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

当然，我根本不想作直接的类比，但作间接类比还是可以的。在20世纪的条件下，恺撒主义就是保留了国家民主的外部象征物的独裁专政。当然，这并不是受于"天命"的正统的（君主制）政权。当代任何一个恺撒，哪怕只是听到这样的暗示，也会感到是受了委屈。但用"恺撒主义"这个术语来表达那种表面上保留着人民政权的特征、实际上由个别人窃据政权的现象是再恰当不过了。换句话说，这并不是类比问题，而是政治原

则问题。恺撒主义、领袖至上主义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其形成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不弄清恺撒主义、领袖至上主义的根源，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那样残酷无情，那样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的人类准则，还大受人民的欢迎。现在还有许多上了年纪的人，甚至包括一些饱受个人迷信之害的人，对早已故去的"领袖"仍怀有很大的好感。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党和国家生活中民主思想薄弱是产生领袖至上主义的深刻根源。一个在沙皇的皇冠荫蔽下度过了几百年的国家，很遗憾，不可能在革命后的几年内像抛弃别的专制垃圾那样轻而易举地抛弃旧的思维方式的重负。沙皇、王朝、沙皇象征物在国内已被扫除，但那种把强者、把最高统治者奉若神明的思维方式却遗留下来了。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民族是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它最能激起对其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的强烈的恨。

——别尔嘉耶夫

别尔嘉耶夫1918年在他那部观点独特而深刻的著作《俄国的命运》中写道："俄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俄国，野蛮和愚昧比比皆是，不开化的、混沌状态的东方自发势力异常活跃。俄国的落后必须用创造的积极性、文化的发展来克服……自立于世界的将是未来的、新生的俄国，而不是旧的、落后的俄国。"[45]这种"落后"不可能不对革命后的许多社会过程产生影响。列宁逝世以后，民主愈来愈少，这种影响尤其明显。

民主愈来愈少的一个表现是，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党内生活中的**开放性**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公开性都被取消。20年代这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令人满意。那时在报刊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批评成为日常生活的当然组成部分。例如，《真理报》曾报道说，联共

“明斯克广播电台播出了反苏节目。1月23日是转播托洛茨基集团首要分子出庭受审情况的日子。播完起诉书和报告上午开庭情况后，电台开始播送音乐节目，其中包括肖邦著名的降调奏鸣曲。这不是偶然的。其手法很巧妙：不是简单地播放哀乐，因为那样做太露骨了，而是播放降调奏鸣曲。并非人人都知道这首奏鸣曲中包括有这首乐曲。这不是偶然的。”[67]

这种对“人民的敌人”的“高度警惕性”，首先是由于处处存在阴谋、破坏活动的气氛所造成的压力产生的。对于那些依附斯大林的人来说，表现出类似的“警惕性”，已成了保官和护命……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会书记卡巴科夫则从另一个方面发现了破坏行为。他在会上说：“我们发现，有个小摊用的包装纸上印有托姆斯基（全会召开前不久自杀，并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本书作者注）的报告。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商业机构购买了大量的此类文献。谁能保证这类文献只是用来作包装纸呢？！”[68]卡巴科夫“尖锐地”问道。不久，他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米·帕·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这位红色工会领袖曾领导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斯大林指责他使用了“不民主的管理方法”和犯了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过”。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上托姆斯基失去主席职位。他所信任的助手也被除掉了

把真相“塞入”斯大林公式的框框，为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的确立创造了精神条件。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一切“反对人民”的人，才会有“阴暗面”、“污点”、“阴谋诡计”和“阴险计划”。而发现和粉碎所有这些“牛鬼蛇神”的人，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敏锐洞察力和无穷的智慧的伟大人物。

斯大林虽然不是紫袍加身的帝王，而是身穿朴素的红军大衣的领袖，但他也不能不对人们的情绪、意识加以控制。他意识到，应当加强

对万能领袖的信任,激发人的热情,广泛宣传取得的成就,把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敌人和破坏分子的阴谋诡计"。这种做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们充满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人们真心要求对叛徒处以死刑,严惩不贷。甚至连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也写道:"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来的皮达可夫及其同伙在莫斯科受审时,我们毫无迟疑地要求枪毙他们。甚至我们村里那些从不过问政治的妇女,在听到报上写的事情以后,也义愤填膺。男女老幼都要求消灭这些匪帮[49]。"

成长起了新的一代,他们的基本信念就是深信"伟大领袖"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很少有人想到,产生这种信任是由于不了解真相。只是在今天我们才了解了真相。今天,实际上几乎所有在政治上反对斯大林的人都恢复了名誉,在这种情况下,对整个党内生活和过去年代的斗争也要重新认识。当时斗争的焦点是争夺领袖地位,确定建设新生活的途径和方法。有些人确有错误。许多人的观点同党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像斯大林所说的那种敌人是非常少的。然而,在斯大林看来,异端邪说是最可恨的一种敌对行动。对真相不了解或了解不够,为斯大林加速采取恺撒主义措施创造了先决条件。稍有怀疑,仅仅怀疑,就可能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指控。例如,1938年8月4日,伏罗希洛夫向斯大林呈送了米·科利佐夫的一篇文章,并附了有下述内容的一张便条:

> 斯大林同志:
>
> 今送上科利佐夫同志早就答应写的一篇文章。请过目并指示,可否和应否刊登。这篇文章我不喜欢。
>
> **克·伏罗希洛夫[50]**

斯大林并没有在便条上作出批示,然而,他指示要认真"查清科利佐夫问题",当时对科利佐夫已经在进行监视。就这一句话导致了这位著名记者和作家的悲剧结局……即使恺撒也没有表现得如此气势汹汹地不能容忍和残酷。

顺便说一下,斯大林一般很少作批示。我大概翻阅了好几千份呈送他的文件:有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文件,有关于播种进度、

整个民族的强制迁出、判决执行情况、领导班子调动、军工厂建设等文件;有译好的侦察机关电报,有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译文,有写给"领袖"个人的信件,有发明家和纯粹满脑子狂妄思想的人送给他的各种"设计方案",还有许多其他文件。据我统计,斯大林每天审阅100—200份文件。这些文件篇幅各不相同,少的仅一页,多的整整一大本。在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简单地签个名:"**约·斯**"或"**约·斯大林**"。波斯克列贝舍夫在呈送公文之前,先在公文上贴上一小块方形白纸片,上面写有解决问题的可行建议和文件办理人的姓名。斯大林如果同意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在这块小纸片上签个名,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张纸片将决定他们今后的命运。有时斯大林把公文交给自己的助手,把单独摞成一叠的文件交给他,并简单地说一句"我同意"。这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在文件上作批示,但并不反对解决问题的建议。斯大林很少作长篇批示,而且他的批示既不俏皮,也不新颖。还不如罗·雅·马利诺夫斯基那些令人惊讶的批示。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战后不久有一个上校(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名)写信给国防部长,说冬天可以从上校戴的帽子(毛皮高帽)上把上校同其他军官区分开。但到了夏季,不管是不是上校,一律戴大沿帽。应当在这方面使上校同其他人有所"区别"……马利诺夫斯基的批示简明扼要:

"作为例外,允许这位上校在夏季戴毛皮高帽。"

有一次,梅赫利斯在斯大林同他的谈话快结束时,递给他几页印好的文字。

"这是什么?"

"有个历史学家给我讲述了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如何对自己的部下作评价的事情。真是滑稽有趣。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为了放松一下,请您务必看一看。"梅赫利斯满脸堆笑地说。

斯大林等他宠爱的人刚一离开,马上就翻阅起来,读了三四页后,一反常态,独自在办公室里哈哈大笑起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带着公文夹按时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在"主人"没有把这几页文字让他看时,他不知所措,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德拉戈米罗夫将军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学者,19世纪末期的一段时间里,他曾任基辅军区司令官。每年,送他批准的下属将军的鉴定书大约有30来份。德拉戈米罗夫这位曾用警句式的文

体、生动形象的语言写成许多著作的将军，在写鉴定书这种死板的公文时也忠于自己的风格。请看这位司令官亲笔写的鉴定中的一些结论。多纳托维奇中将："虽曾是匹好马，但已筋疲力尽。"普拉克辛中将："出色的师长，如果上帝保佑，将会成为出色的军长。"泽格列尔中将："工作努力，但身体虚弱。心有余而力不足。"扎斯中将："温和，说得重些是软弱。智力平平。"奥特费诺夫斯基少将："老态龙钟，早该退休。"沃伊诺夫少将："顽强，温和，讨人喜欢，知道分寸。业务娴熟，热情不减当年。"贝尔格尔少将："平时无用，战时有害。"

德拉戈米罗夫
(1830–1905)
俄国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步兵上将

他1856年毕业于总参学院。1849年开始服兵役。1860年任总参学院战术教研室教员。1889年任基辅军区司令。五十年代起着手研究军事教育学问题。他认为精神因素在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要求按实战需要训练士兵，反对严酷粗野的练兵方法。他建议培养士兵履行自己职责的自觉性，强调军官以身作则。他撰写了关于军事史、战术、军队训练和教育方面的著作。

斯大林笑够了，又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的长条地毯上踱了踱步，然后坐到办公桌前，在下一份文件上写上："约·斯"……既不幽默，也不诙谐……

斯大林的恺撒主义、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是在权力日益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分析斯大林作过批示的文件使我们确信，一些问题往往在国家和政府的高级权力机关审议之前，一切就都预先决定好了。斯大林的批示日后完全可以作为命令、决定和指示下达。与此同时，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看法：凡是事情解决得好，有创造性，富于革新精神，就归功于"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凡是延期或完不成计划，玩忽职守，官僚主义，因循守旧，缺点错误，都归咎于托洛茨基分子、两面派、破坏者、间谍、危害分子等的"阴谋诡计"。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真理"，使许多人形成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即认为"领袖"、新恺撒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应当占有决定性地位。



斯大林是按照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

成道路的观念行动的，观念在许多方面是极其错误的。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轮廓的认识，和列宁及其许多战友都不同。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不理解列宁的思想，不是的。他的看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早已在这一思想的中心为自己这位“终身领袖”划出了位置。这就是现代恺撒主义！这种被暴力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形象，尽管保留着许多新社会的外部象征物，但离列宁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领导这种社会主义的“领袖”虽然不握有帝王权杖，但任何一个君主都无法与他的无限权力相比。权力集中的结果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变成一个人。这就形成了恺撒主义——个人专权即一个人的专政。

斯大林偶尔也作出一些“表示”和“姿态”，发出一些“信号”，想借此使党和群众相信他是反对颂扬、赞美和崇拜他的。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些“抗议”是精心做给“公众”看的。例如，在他的档案中保存有这样一封信：

> 安德列耶夫同志（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和斯米尔诺娃同志（《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的作者）：
>
> 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本书。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回答……说：人民创造英雄……
>
> 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
> **约·斯大林**
>
> 1938年2月16日[51]

这封字迹非常清楚的信的用意在于让人们更加颂扬斯大林。现在谁还能说他不懂得谦虚呢？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领袖”从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斯大林的童年同他现在所达到的、使他忘乎所以的地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何必让人们知道，他过去也是和大家一样的

人呢？让人们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人就行了。

斯大林最喜欢听别人说他谦虚的话。在1937年2至3月中央全会上，梅赫利斯在发言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早在1930年，斯大林同志就给我往《真理报》写过一封信。现在，我冒昧地未经他允许宣读一下这封信。

> 梅赫利斯同志！
>
> 随函附上一篇关于一个集体农庄的很有教益的故事，请予以刊登。我在信中删去了"党的领袖"、"党的领导人"这些称呼"斯大林"的词句。我认为，这些赞颂之词除了危害之外，不会带来（也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请在付印时删去这些修饰语。
>
>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
> **约·斯大林**[②]

这些"反驳"只不过是为了大肆渲染"斯大林同志特别谦虚"、没有任何虚荣心这一类天方夜谭。斯大林知道，梅赫利斯会"很好地"理解和适当利用他的信的。顺便说一下，梅赫利斯在全会上正是利用这封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愈演愈烈也同下述情况有关，即到悲惨的1937年，斯大林领导国家已整整15年。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列宁没有来得及制定领导干部定期轮换、交替的具体办法。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虽然说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中包含有经常更新中央国家政权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深刻思想，但斯大林根本没有"发现"这些思想。20年代，总书记煽起的接二连三的党内纷争使党不得安宁，使党未能按照列宁的理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几乎没有谈过这一点。然而很明显，如果党内的民主原则和传统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果对出现恺撒主义倾向的危险有较深刻的认识，那么党内就不可能（而且也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斯大林没有失掉时机。他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巩固。他把最危险的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赶下了政治舞台，而他在30年代中期确立了个人专权之后，自然不想再去建立或调整领导人轮换掌权的民主机制了。这样，甚至连总书记任职期限的问题都不会再有人提出了。

今天，人们著书立说、议论纷纷：如果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执行

列宁的意愿,我们祖国的历史怎么也不会发展到这一地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意见。历史是不能预先设计的。我们能够对2000年进行科学的预测,也能够设想更长远的前景,但预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谁都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因此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是必然的,因而也是合乎规律的。事实上这仅仅是多种可实现的可能性中的一种。斯大林执掌政权,这是历史的现实,但并不是必然的。有什么必要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作种种猜测呢?但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回首往事,并像克柳切夫斯基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总想寻找他们曾被"绊了一下"的地方。我们总想了解以往犯错误、失算、失策的根源和形成过程。由于这些错误在历史上常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在党章中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期限作出具体规定,那么,就几乎肯定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这种荒谬现象。当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第一把手的任职时间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惟一条件和保障。

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有的说什么:"如果没有斯大林,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下来?""谁能说明,如果没有斯大林,战争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的说:"在社会主义面临生死存亡的困难时刻,需要像斯大林这样的强者。"这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是具体的个人提出来的,不过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姓名。然而,有一个人的姓名可以顺便提一下,这就是切列波韦茨的莫洛佐夫。他给"沃尔科戈诺夫公民"写了一封充满恶意的信,信中说,他在斯大林时代也曾因流氓罪坐过牢,但他没有见过无辜入狱的情况:"没有人无缘无故坐牢。我们监房值日的是一个姓帕普金的政治犯。他因打碎选区的窗户被判10年徒刑。现在你们会说判得太重了,但在那时可以说判得恰如其分,因为当时国内的敌人太多了。现在敌人也不少……斯大林是真正的民族之父,是真正的统帅,是真正的领导人和领袖……"

这就是他的信的基本内容。同他争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与此有关的一个想法不能不谈。这些人对斯大林、对斯大林时期、对"社会制度"的态度不是偶然的。早已逝世的领袖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赞扬,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人们对贪污腐化风行、缺少精神支柱、具有两面性的停滞年代作出的特殊反应。目前改革出现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片面宣传、做表面文章而缺少具体成果。在许多人民主修养低下的

情况下，公开性以及其他现实的自由和权利，同义务、事业、改革的创造方面结合得很差。改革和“秩序”的相互联系这一主题并不像有些人理解得那样保守。没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责任感，民主的成果会很快失去意义。我认为，莫洛佐夫写这封信同其他写信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情况有关。

我国人民中从来不乏有才能的人和贤明之士。如果采用民主方式选举最高层领导人，那就一定会选出不辜负历史使命的人来。这些人中不仅像通常那样有党的工作者，而且有大学者和生产的组织者。可以毫无顾忌地说，我们羞羞答答地称为“主观主义”表现、称为“停滞”年代的东西，严格地说不是别的，正是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现代恺撒主义影响的产物。



日丹诺夫曾经是斯大林最宠爱的理论家。在基洛夫遇刺后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战后他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开展了一系列整肃文艺的运动。他于1949年很年轻时就去世了

正是形式民主导致早在30年代党就成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主要工具。日丹诺夫在1937年2至3月全会上小心翼翼地提出党的机关“不宜代替”经济机关，对此，斯大林在总结《关于使各级党的组织作好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准备工作》的报告的讨论情况时，再次明确而严厉地强调指出：

“决不能把政治同经济活动分开。党的组织应当一如既往地认真抓经济的问题。”[53]

斯大林的话意味着党组织直接、公开代行苏维埃的职能，意味着苏维埃下降为党的权力的次要附属品。

迷信和人民，迷信和社会主义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过去，正是这些因素的共生给斯大林的恺撒主义提供了荒谬的表现形式。对于恺撒主义来说，永远都需要大家同样贫穷、

思想单一、无思无虑，而极其重要的是要随时准备响应口号和号召，善于向上级机关“告密”和“报告情况”。顺便说一下，我的档案中保存着几十封信（不，不是写给我的），这些信件是写给上级机关的，写信人要求“禁止”我写斯大林，要求“惩罚”我、“制止”我、“罢免”我等等。除了怜悯，这些人在今天不会得到任何东西。但在过去，这样的“信号”把成千上万个正直的人送进了坟墓，要知道，没有告密行为，恺撒主义就不能存在。

恺撒主义培植的不是保障民主政治，而是保障“个人统治”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在宪法和党章中对总书记的权力、对他与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都没有作出规定。所有这一切，正像斯大林盼望的那样，促使党国家化，把党变成了权力机构、权力机制，而不是拥护某种价值和思想体系的人们的社会联合体。真正的民主是发展苏维埃议会制、提高苏维埃的作用，建立执行机关的报告制度、干部由选举产生并实行轮换，——这是杜绝个人专权的主要保证。今天，在我国进行积极改革的条件下（虽然改革进行得很困难），有许多人认为，在我们认识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之后，个人迷信已不可能再发生了。我认为不是这样。个人迷信可以有各种形式和表现。绝不会只有一种形式，即斯大林时代的恺撒主义的、独裁的形式。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甚至可能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如果我们不建立明确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保证体系的话。这既要采取重大的措施，使人们对选举过程、推荐高级领导干部施以最广泛影响；也要注意“小事”，在任命部长、部长助理、专员时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因为这些人在作出决定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每一项决定都应有具体的起草人，并应使人们了解他们。我认为，那个曾首先提议把卡马河畔切尔内市这个富有诗意的、美丽的名称改为勃列日涅夫市的人，“理应”由人民对他进行评说。类似的没有头脑的糊涂建议得到实现的不知有多少，而这些建议的真正提出者却永远不为人们所注意。不能像恺撒时代那样：一切好的、成功的决定都归功于他，而一切不好的、不成功的决定则随便推到一个人身上，但就是不能让领袖承担。

斯大林知道，一旦权力分散、国家机关的作用得到加强、社会组织的意义得到提高，那么或迟或早必然会使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产生思想和政治危机。对于斯大林来说，必须用原始教条主义的紧箍咒

把社会意识箍住，让它主要从他的著作中获取食粮。社会意识是文化的一个极重要成分，而那个时代编撰的各种神话给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主要的一个神话是“战无不胜的领袖一贯正确、英明伟大、洞察秋毫”，战无不胜的领袖是当时正式出版物对他的称呼。人们对他们读到的东西，例如下面的话深信不疑：“斯大林身穿灰色军大衣，在他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的陪同下，站在列宁墓上。他那安详的目光沉思地注视着信心十足地列队走过列宁墓的未来战胜资本主义世界的数十万无产者大军……



用深红色大理石建成的列宁墓

1938年5月1日，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斯大林在他的战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的陪同下，来到列宁墓

涌向我们领袖那稳如礁石一般雄伟的身躯的是爱和信任的浪潮，人们深信，在列宁墓上站着的是未来胜利的世界革命的司令部。”[54]这段文字写于1934年，出自卡·拉狄克的手笔。

是的，人民相信这些话。人们满怀希望潜心阅读着斯大林的已不多见的文章和讲话，习惯性地目视着那数不清的肖像。人们从学生时代起就知道：“斯大林想着我们。”这不单单是“教育”青年的。接连不断地对意识进行心理“按摩”导致了干部的退化。从此以后，得到重视的仅仅是那些对最荒谬的公设、结论、决定（只要它们冠以斯大林的神圣名字）也举双手赞同的工作人员。米高扬1937年在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20周年的报告中说：“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就像叶若夫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55]这话米高扬自己也未必相信。但所有的干部都必须这样说，哪怕他只是一个微

不足道的小干部。而且连小干部也不是的人也这样说。大多数人都相信这种赌咒发誓，即使不相信的人也会这样说。当时，很少有人想利用那难得的、稍纵即逝的机会讲真话，对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恺撒主义发表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国家存在着，建设着，发展着，但向人民灌输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领袖”。正像叶·叶夫图申科在《恐怖》一诗中描写的那样：

他们让人渐渐地变得驯顺，
他们给一切都盖上了印。
哪儿应该沉默——就让你叫喊，
哪儿应该叫喊——就让你沉默。

为逝去的人画像是一件困难的事。个人的影像就像历史屏幕上的阴影。文件、书信、照片以及亲身了解斯大林的人的回忆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今天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听着他们那低沉的诉说，如同用颠倒的望远镜在瞭望……一切看上去不是简单地变小了，而是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变得很遥远了。每一个有关“伟大领袖”的这类故事，都必然要涉及一些曾经在他的阴影下活动的人。他们生前很少为人所知。这不仅是因为一些战友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只是昙花一现（例如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亚·乌格拉诺夫、谢·伊·瑟尔佐夫、弗·雅·丘巴尔、卡·雅·鲍曼、罗·英·埃赫等等），还因为领袖喜欢保密。在我国，还从来没有像在个人专权时代这样保守“秘密”的。除了百科全书中的寥寥数语，人民当时对于斯大林最密切的亲信的情况无从知晓。

在“领袖”的阴影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10年前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组成党的领导核心的那些人中，留在政治局内的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了。其他的人被内讧的风暴从政治舞台上一扫而光，这些人斯大林



斯大林在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和与会的妇女代表握手

看着就觉得别扭和不舒服。这些人了解斯大林的一切:坚定和动摇,坚毅和茫然,伟大和渺小。他们知道，革命中只有一个领袖，这就是列宁,斯大林充其量是个三四等的角色。他们还知道,除了意志,斯大林几乎在一切方面都逊色于许多人。当时在小小的指挥桥楼上,斯大林的处境很困难,同他站在一起的有认为他是“庸才”的托洛茨基,有称总书记为“东方暴君”的布哈林,有除了列宁以外从来没有景仰过任何人的李可夫,有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列宁的当然的继承人的季诺维也夫,有想法几乎与其最亲密的朋友一样的加米涅夫。斯大林很快就感到他不需要这些人，这不仅因为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些人时常从一种“反对派立场”转到另一种“倾向”，而且因为他们不能而且也不愿意把斯大林“看作”领袖。一次,斯大林在读《波拿巴选集》时,目光停在了这样几行文字上:1794年占领土伦后,拿破仑的上司杜戈米埃呈请提升这位勇敢的军官为准将,他在给公安委员的呈文中说:“请奖赏和提拔这个年轻人,因为即使你们不这样做,他也会脱颖而出。”[6]斯大林要“脱颖而出”,周围必须换上另一班人。他需要的是另一些战友。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列宁墓观礼台上、在各种会议的主席团中、在政治局的会议桌旁，斯大林身边出现了一批新人: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以及米高扬、彼得罗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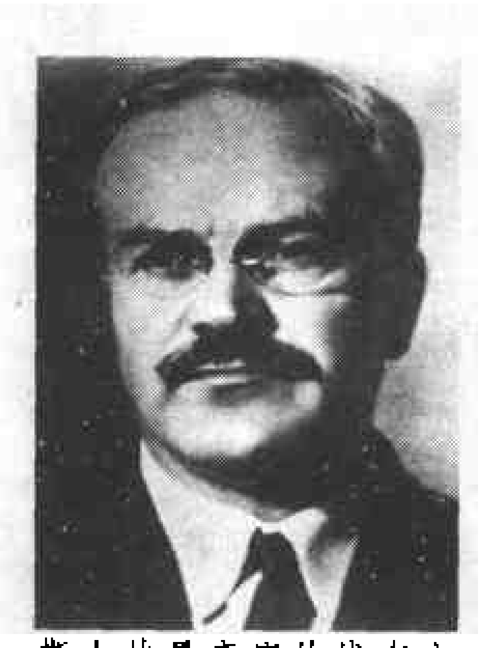
在列宁墓的检阅台上(局部):(前排自左至右)基洛夫、季可夫、布哈林、加里宁、斯大林、施米特、托姆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特舍夫等人

基、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后来还有日丹诺夫、埃赫。他很快从这些人中遴选了“核心”——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然而，不久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也出现了许多空缺：基洛夫惨遭暗杀，古比雪夫不久就逝世了，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柯秀尔、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被开除出政治局，并成了镇压的牺牲品……6位政治局委员和1位候补委员在1937—1939年亲眼目睹了这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不单单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所有这些人，特别是有“三巨头”保驾的斯大林，都直接与这出悲剧有干系。他们中谁也没有勇气向“领袖”诵读——不，是喊出——歌德《浮士德》中的这样几句诗：

从这座高殿上面向全国遥望，
就会觉得像在做恶梦一样，
罪恶加罪恶不断扩散，
非法的压制却在合法地开展，
这种景象到处在帝国呈现……

然而这不是帝国，而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夺得了政权并……把它托付给了“伟大领袖”。在斯大林周围

的人中，谁都没有阻止或想要制止违反法纪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试图利用自己得到的机会讲真话。那么斯大林周围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可不可以把他们看作“领袖”在黄昏时分投下的影子呢？



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1986年的春天，在莫斯科近郊的茹科夫卡，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人沿着别墅区小路缓缓地散步，他前额突出，总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老头不时用拐杖敲着地面，用他那昏花的褐色眼睛细细打量着偶尔经过的行人。破旧的拉锦绒大衣，穿走了形的老头鞋，无神的目光，都说明这位散步者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但未必有谁能想到，这个已达96岁高龄的人，正是过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这位老寿星早在列宁在世时就担任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历史上曾多次对莫洛托夫在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例如，列宁曾说，他“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制造“最可耻而又最愚蠢的官僚主义”[50]），但他毕竟是几十年前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莫希干人*之一。这本身就是极为罕见的事情：80年代中期还能看到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多次会见过莫洛托夫的诗人Ф·丘耶夫，保存有不少有关斯大林这位最亲密的战友的文字材料。“他是一个谦虚、认真、节俭的人。他不让任何东西白白浪费掉，不许在无人呆的房间里白白亮着灯。当他1986年11月8日去世时，”丘耶夫写道，“人们打开了他的遗嘱，信封里装有一个存折——500卢布的丧葬费……”



是的，这个人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李可

* 莫希干人一语源出美国作家詹·费·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小说描写北美印第安土著中的莫希干人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和欺骗下最终灭绝的故事。后来人们常用“最后的莫希干人”来比喻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组织、派别的最后的代表人物。

——译者

夫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工作过。他曾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过不止一小时的谈判；丘吉尔、罗斯福和杜鲁门都知道他。他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苏联人至今还记着莫洛托夫（而不是斯大林！）1941年6月22日中午发表的铿锵有力的讲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击败。胜利将属于我们。"（今天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斯大林在战争惨剧爆发时惊慌失措。直到最后时刻，他内心深处仍怀有一线希望：战争可以避免，至少——推迟战争的爆发。不相信直觉只相信事实的斯大林，成了虚无缥缈的推测——确切地说，个人愿望——的俘虏。震动是如此之大，以致他拒绝发表告人民书，而把这件事托付给自己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不论政治局委员怎样劝说，他都未做这件事。他不能摆脱压抑和沮丧情绪而恢复常态。直到他认为有可能击退进犯之敌时，才决定发表演说。但对临头的是一场什么灾难，他仍未作出推测！）

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莫洛托夫成了"领袖"的名副其实的影子。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一起：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列宁墓观礼台上，在报纸的报道中，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甚至《真理报》在发表莫洛托夫的讲话时，还按惯例并排刊登了斯大林的大幅照片……

这位居住在莫斯科格拉诺大斯基大街住宅和茹科夫卡公家别墅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想些什么呢？这个遗留下来的昔日强人在回忆什么呢？可能是自己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吧？莫洛托夫专于组织问题。也许他想的是1930年12月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吧？当时李可夫被撤销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斯大林亲自提议他作为候选人。莫洛托夫在会上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列宁的优秀学生的直接领导下，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锻炼做布尔什维克工作，这是我引以自豪的"。

应当指出，斯大林逝世几十年以后他也没有变样。他在逝世前不久向丘耶夫谈到了斯大林："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会怎样。"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认为斯大林是天才，他确信，图哈切夫斯基是图谋不轨的"右派"——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军事力量。他认为，"1937年我们得以清除了战争时期的'第五纵队'"。当然，莫洛托夫也承认，"错误也是有的，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杀，但要保住成果，就不能优柔寡断"。这个经历过种种历史风云的人的思维似乎停滞了。这

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巧妙拟态：试图利用最后的机会向后代作一番表白吧？这个驯服、努力、坚决、巧妙地执行斯大林意志的人，对于法制被扭曲、对于暴力成为决定性的掌权手段，负有重大的责任。

在联共(布)1937年那次可悲的、著名的2至3月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作了题为《关于日本—德国—托洛茨基间谍的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的教训》的报告。报告的全部内容就像是号召进行社会大洗劫："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58]

他果真没有"动摇"。同年6月，有一个告密者（要知道，"完成这件事情"的号召不是说空话）写信给斯大林，说人民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人员、老布尔什维克格·伊·洛莫夫似乎同李可夫和布哈林关系密切。斯大林草草地写了几个字：

送莫洛托夫同志，怎么办？

答复迅速而简要：

立即逮捕洛莫夫这个恶棍。

维·莫洛托夫[59]

一个人的命运被决定了。逮捕，审讯，判决，枪毙。一个1903年入党的党员，历史性的4月代表会议的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成千上万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样，被大笔一挥划成了"人民的敌人"。正是莫洛托夫直接批准逮捕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卡巴科夫、轻工业人民委员乌汉诺夫、远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克鲁托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同志。在莫洛托夫的直接参与下，他所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28个人民委员中，有一多半都被镇压。

莫洛托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1948年3月，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昂诺夫请求他：帮助找个地方以安置2400名残疾人和年老的

特殊移民(曾服流刑者)。莫洛托夫的答复简明扼要：

责成苏联内务部将2400名残疾人和年老的特殊移民安置在劳改所。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维·莫洛托夫[60]

你们瞧,把这些不幸的人往劳改营一塞,问题就算解决了……

对于斯大林来说,这个对"领袖"的意图一点就通并具有巨大的工作能力的人是非常有用的。斯大林不止一次当着其他政治局委员夸奖莫洛托夫勤勉。当莫洛托夫1940年3月满50岁时,斯大林命令将彼尔姆改称莫洛托夫市,尽管当时我国的版图上叫这个名称的城市、村镇、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已不下10个……

30年代,斯大林的身边没有一个理论家。最大的"理论家"自然是他自己。但有时他也故作大度,让他的一些战友首先是莫洛托夫表现一下他们的理论才华。阿多拉茨基在一封信中请求斯大林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筹备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撰写一篇关于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的文章。斯大林在信上批示：

阿多拉茨基同志：

我实在太忙了,无法满足您的请求。请您找莫洛托夫试试看：他正在休假,也许他可以抽出时间。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当然,莫洛托夫也不是理论家,但同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及其他一些人相比,他又略高一筹。在布哈林死后,"领袖"本人成了"思想"的"解释者"和"发现者"。难怪30—4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现少得可怜,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背景下,连莫洛托夫都自认为"理论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心平气和、极其克制、不动声色、彬彬有礼的背后,隐藏着坚强而严厉的性格,这一性格同其主人从来没有分离过。不止一次会见过

莫洛托夫的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莫洛托夫作了这样的评价:"他那圆形炮弹似的脑袋,小黑胡和机灵的眼睛,表情刚毅的脸,机智的言谈话语和镇定自若的举止风度,最贴切地表现出了他的品质和灵活性……他那像西伯利亚冬天一样的微笑,他那字斟句酌而且常常富于哲理的话语,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风度,使他成了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上推行苏联政策的最完美的工具。"[⑩]这些话出自一个政治敌人之口,他发现莫洛托夫有一种忠于自己事业的狂热精神。在对内政策方面莫洛托夫也是这样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大概是"领袖"阴影下最有影响和最无保留地执行"领袖"意志的人了。没有一些这样的执行者,近似迷信的领袖至上主义、现代恺撒主义未必能够存在。

斯大林的另一个战友——**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在勤奋方面比莫洛托夫毫不逊色。他也是个老寿星。至少,1988年11月他在莫斯科伏龙芝河岸街的住宅内庆贺了自己的95岁寿辰,也许他还想活到100岁,这是莫洛托夫未能达到的。

战后曾在沃兹涅先斯基身边工作过的谢·伊·肖明告诉我说:

> 有一次,我带着一些公文去找卡冈诺维奇(他当时还领导着军事工业委员会),当时我穿着一双新靴子。卡冈诺维奇接过公文,打量着我,后来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靴子上。
>
> "脱下来!"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命令道。
>
> "为什么?"我欲言又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 "快点儿脱下来……"卡冈诺维奇不想解释。
>
> 然后,人民委员把我还未穿合脚的靴子拿在手中,翻过来掉过去看个不停,并用手摸了摸靴筒,最后把靴子扔在我的面前,满意地下了结论:
>
> "好靴子。"接着又补充说:"我过去也是个鞋匠……"

天晓得,如果他永远当个鞋匠,他就会保持好名声。当然,如果那样,未必有人会想到他。但他早在1911年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不是职业选择,而是政治选择,追随他的哥哥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他来到莫斯科,在全俄红军建军委员会工作,这期间认识了斯大林。1920年卡冈诺维奇被派往土耳其斯坦。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把卡冈诺维

奇从中亚细亚召回,任命他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这个文化水平不高,但坚毅无比和善于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在党内在政界迅速崛起,平步青云。

斯大林欣赏卡冈诺维奇,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超人的工作能力;在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他常常不等弄清楚谈论的问题就说:“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绝对执行命令。这表现在他随时准备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何任务。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后,有一次斯大林在政治局开会前问卡冈诺维奇:

“拉扎尔,听说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的哥哥,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05年就是布尔什维克。——本书作者注)同‘右派’有来往,你知道吗?有确切材料……”斯大林以审视的目光看着这位人民委员。

“应当依法处理他。”卡冈诺维奇声音颤抖地挤出了这几个字。

会后卡冈诺维奇把上述谈话内容打电话告诉了他的哥哥,结果使这件事提前了结。他的哥哥没等逮捕,当天就开枪自杀了。

斯大林就器重这样的人。人们必须不断证实自己对他的忠诚,而且不能用小事、用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来证实。难道卡冈诺维奇,比如说,在1937年马拉松式的中央2至3月全会上没有证实自己的忠诚吗?当惩罚机器刚刚进行调试,准备在党内、在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农民和军人中“间苗”时,卡冈诺维奇已经战功卓著了。“斯大林的”铁路“人民委员”在长达两小时的报告中讲述了他所取得的最初的“试验”成果:

“我们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铁路政治机关中揭发出了220个人。运输部门开除了485个前宪兵、220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572个托洛茨基分子、1415个白卫军官、285个破坏分子、443个间谍。所有这些人都与反革命运动有过联系。”[62]

不难想象,卡冈诺维奇所说的铁路部门“开除了”“间谍和破坏分子”意味着什么。斯大林打心眼里满意卡冈诺维奇在向全会眉飞色舞地报告工作时所作的分析:“我们面对的是一伙寡廉鲜耻的间谍特务匪帮。他们破坏铁路的手段尤为狡诈。谢列布里亚科夫、阿诺尔多夫、利夫希茨在运输能力方面推行低标准,策划颠覆列车,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破坏活动尤为猖獗的是库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京、奈施塔特、莫尔希欣、贝克尔、克龙茨、布列乌斯——他们极力阻挠使

用'ФД'型机车。莫斯科—顿巴斯铁路是用破坏手段修建的；皮亚托夫在修建土西铁路时采用了破坏手段；姆拉奇科夫斯基在修建卡拉干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时采用了破坏手段；巴尔斯基和艾德尔曼在修建埃赫—索库尔铁路时采用了破坏手段……"尽管当时报纸报道了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开展革新活动和克里沃诺斯运动的情况，但卡冈诺维奇却继续进行煽动：

"铁路建设管理局局长舍尔梅尔戈进行破坏活动。斯大林同志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他是一个坏蛋，是敌对分子。'斯大林同志直言不讳地警告我们对他要提防，并建议对他进行监视和审查……"

"形迹可疑的人，"米高扬顺口插了一句。

"谢列布里亚科夫这个坏蛋，"卡冈诺维奇接着说，"非常注意防御枢纽部，并已确定了他的破坏目标……"[63]

卡冈诺维奇整个报告的内容就是：对许多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责骂，说有大批坏分子在专门进行破坏：搞爆炸，阻断交通，设计时作手脚，破坏运输。斯大林对卡冈诺维奇向全会作报告时表现出的幽默不能不表示欣赏，卡冈诺维奇说：

"叶姆沙诺夫这个坏蛋从1934年起任莫斯科—顿涅茨铁路管理局局长。他被撤职后便没有得到其他工作，于是径直到叶若夫同志那里，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落户去了。我一再警告阿诺尔多夫……大家都说了，也没有留住他。现在，叶若夫同志把他留住了，保护起来了……"[64]卡冈诺维奇越说越激动。

卡冈诺维奇虽然不学无术，但他和斯大林的所有战友一样，也想为自己树立某种理论声望。中央曾作出一项决定，要求各机关、企业和部门的领导人亲自辅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原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工作人员、战争时期曾任交通人民委员的И·В·科瓦廖夫告诉我说：

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召集一批领导干部办了个讲习班。不久他叫我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进行自发活动只能培养工联主义的意识……卡冈诺维奇呆呆地看着我，看着看着，突然说道：

"别胡扯了，什么'工联主义的意识'！无产阶级能培养一切！

包括无产阶级的意识！”

大家听了彼此使了使眼色。不管我怎样引证列宁的话向卡冈诺维奇解释，必须把科学理论灌输到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去，他都理解不了。卡冈诺维奇怀疑地看着我，不久就草草宣布了讲习班结束，以后他再也没有搞过这种力不从心的活动……

卡冈诺维奇经常（受“领袖”之托）到一些州去“整顿秩序”，这使他渐渐有了“威信”。他到过车里雅宾斯克、伊万诺沃、雅罗斯拉夫尔和其他一些州，他的到来使这些州的党组织遭受了一次大洗劫：当地的许多工作人员被撤职，对他们“立案”审查，结局往往是悲惨的。斯大林很满意“铁人拉扎尔”，他不止一次这样称呼卡冈诺维奇。他很需要这样的“战友”：绝对服从，狂热忠诚，对领袖的意图一点就通。

卡冈诺维奇在各地决定人们的命运时，同谁都不商量，而只是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实地进行认真的考察，就地解决……不要姑息……”许多文件无情地证实，往往侦查尚未结束，卡冈诺维奇就亲手起草和审订判决书，对准备好的材料任意修改，好像所谓的“恐怖行动”是反对他这个人民委员的。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卡冈诺维奇在经历了从莫斯科到土耳其斯坦、然后又从那里返回莫斯科这段不寻常的道路之后，很快就当上了中央的主管任命重要职务的部长。早在1926年，卡冈诺维奇就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33岁。斯大林很快就发现卡冈诺维奇努力、冷酷、驯顺。当乌克兰出现复杂局势时，经总书记推荐，卡冈诺维奇被派去领导该共和国的党组织。那时他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的关系就不正常，这最终给丘巴尔的命运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影响。卡冈诺维奇同乌共（布）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冲突始终没有停止过。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就任党的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30年代头五年，卡冈诺维奇的影响特别大。这位交通人民委员多次前往集体化进展困难的地区，经过他的“袭击”，事情马上有了飞速发展。斯大林很少过问“铁人拉扎尔”使用的方法。生性残忍、愚蠢透顶的卡冈诺维奇，不但是个典型的而且可以说是个正统的行政官僚机

构代表，他做任何事情都毫不考虑社会效果。由于他的北高加索之行，“被扫地出门的富农”涌向北方的队伍急剧扩大；在莫斯科州，谁不执行他的指示，马上就会被撤职；根据他的不学无术的结论，有几部歌剧被禁止在莫斯科上演；作为中央清党工作委员会主席，他在清党工作中毫不留情；正是他被认为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所发生的一起莫名其妙的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借口改造莫斯科而毁坏该市许多历史文物，包括著名的基督教堂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总而言之，卡冈诺维奇在各方面都不甘落后。斯大林对这位战友的无限努力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将刚刚设立的列宁勋章授予了他，他是第一批受勋者中的一个。

卡冈诺维奇同斯大林及其周围其他的人一起，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贯广泛推行和使用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最主要是强制性的手段，在我国历史面前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长寿使他可以延长追悼的筵席。卡冈诺维奇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他在乌克兰的强制性领导；“战胜”波斯特舍夫和丘巴尔；斯大林的垂青，30年代，在“领袖”巡视南方时他甚至多次代理其职务；与赫鲁晓夫的友谊；在莫斯科“改建”中的贡献，其结果是拆除了苏哈列夫塔，破坏了受难修道院，拆除了伊维尔斯门和其他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建筑……如果他良心能有所发现，就会重新体验到过去所做的一切，并会为此感到痛苦。而如果良心在几十年前就已泯灭，那么回忆只能在他的意识中像无声黑白电影那样闪现往事。有这种命运的人长寿无异于一种惩罚。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切都永远是不可逆转的，除了人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往事的评价。

在“领袖”30年代的亲密战友中，还包括**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早在生前他的名字就已具有传奇色彩。在过去那遥远的年代，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们曾满怀激情地放声高唱：

斯大林同志
派我们去战斗
最优秀的元帅
带领我们冲锋陷阵……

伏罗希洛夫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早在1906年，他作为代表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认识了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革命家。伏罗希洛夫曾多次被流放和逮捕，二月革命时他正在彼得格勒。在国内战争的年代，伏罗希洛夫转战于各个战场，尤其是——像通常所认为那样——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使他名扬四方，也巩固了他与斯大林的友谊。后来，伏罗希洛夫之所以享有“国内战争的英雄”的美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崇高的保护。当然，未来的国防人民委员作战很勇敢，但缺少智谋，迁就游击习气。例如，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曾谈到：



伏罗希洛夫
(1881–1969)

苏联元帅、苏军统帅

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参与指挥察里津保卫战，指挥有方。苏德战争期间功勋卓著，荣膺两次苏联英雄和一次劳动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8枚。著作有《苏联国防》等。

“伏罗希洛夫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游击习气的可怕痕迹是存在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6万人。这太糟糕了……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要传布到广大群众中去，但是，说没有军事专家我们也对付过来了，这哪里是保卫党的路线……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6]

伏罗希洛夫的军事生涯开始于第一骑兵集团军，当时他担任该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转战于北高加索、克里木，同马赫诺的队伍作过战，参与了粉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战斗。由于伏罗希洛夫在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他被授予两枚红旗勋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伏罗希洛夫连续当选各届中央委员，自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在伏龙芝死后担任海军人民委员，在此期间，对红军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项事业所以取得成就，还由于当时在



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在1935年。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该人民委员部，在各军事学院和许多军区，有许多富于创造性思维的军官和军事理论家，他们中既有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人，也有旧军队的军官。其中有：写有《军队的大脑》这一精深著作的沙波什尼科夫，著有《当代战略问题》一书的图哈切夫斯基，还有卡利诺夫斯基、韦利奇科、维尔霍夫斯基、扎伊翁奇科夫斯基、诺维茨基、斯韦钦、埃德曼、亚基尔，以及其他许多人。

早在20年代末，就出版了关于伏罗希洛夫的传记、书籍和大量文章，如《世界革命大军的领袖》、《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们听从您的命令》、《布尔什维克的统帅》、《来自机床旁的总司令》。当时还设立了"伏罗希洛夫射手"的称号；为了表示对伏罗希洛夫的崇敬之情，一种重型坦克曾以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称作"KB"（当然，还有更先进、更有威力的坦克"ИС"——"约瑟夫·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确实在人民中享有荣誉。斯大林对此怎样看呢？泰然自若。他对此很少予以注意，因为30年代人们在赞颂伏罗希洛夫时，总是说这位人民委员是"执行领袖意志"的人，是"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红军元帅"、"斯大林的人民委员" 等等。斯大林比谁都了解伏罗希洛夫，也知道他的价值。大家都认为他们俩是朋友。但真正的友谊是不应当讲报恩的。而伏罗希洛夫却总是认为自己应"报答"斯大林给予他的荣誉、职务、奖赏和地位。

早在30年代，伏罗希洛夫就是一个根本不动脑筋、没有自己的看法的执行者。他没有卡冈诺维奇那样超人的工作能力，没有莫洛托夫那样的智慧与计谋，也没有米高扬那样的小心与谨慎，他在很多方面都逊色于其他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认为，他需要的是伏罗希洛夫这位"红军领袖"传奇般的名声。斯大林相信，这位人民委员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他。斯大林没有看错：当他制造的血腥炼狱打开大门时，伏罗希洛夫毫不犹豫地同"领袖"一起点燃了镇压之火，使三位苏联元帅和千百个红军指挥员惨遭不幸。在1937年2至3月中央全会上，伏罗希洛夫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名道姓地历数了许多混入工农红军的"人民的敌人"以后，决心用事例来说明不光是"上层"有托洛茨基破坏分子。这位人民委员宣读了被捕的库兹米切夫少校的一封信：

国防人民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被指控为一个策划谋害您的反革命恐怖集团的成员。不错，我在1926—1928年曾加入托洛茨基组织。从1929年起，我就决心立功赎罪。我一直认为，您不但是红军的领袖，而且也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我获得过两枚红旗勋章。怎么能把我列入法西斯杀人匪帮之列呢？

显然，我将要被枪决。也许几年以后，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会说，他们不该诬蔑一个忠诚的人，而一旦真相大白，我请求您为我的家庭恢复名誉。请原谅，信写得很潦草，他们就给我这点儿纸。

库兹米切夫

1936年8月21日

伏罗希洛夫读罢信扫视了一下会场，装腔作势地结束了他的讲话：

"可是在10天之后他供认：他们企图在演习期间在白采尔科维地区采取恐怖行动……"[66]

伏罗希洛夫知道，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口供。他在向全会报告工作时说（当然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他经常"同叶若夫谈论应当把哪些人从红军队伍中驱逐出去"。有时"我也保一些人。确实，现在很可能卷入令人不快的事件中：你保他，而他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敌人、法西斯分子……"显然，伏罗希洛夫对待亚基尔的信的态度，就是受这种想法支配的。亚基尔在枪决前夕曾写信给他：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请求您念我过去多年为红军忠诚工作，托人关照一下我的家属，并给他们这些无依无靠、毫无过错的人帮助。我也向尼·伊·叶若夫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亚基尔

1937年6月9日

伏罗希洛夫读罢便函，大笔一挥写道：

我根本不相信不忠诚的人的忠诚。

克·伏罗希洛夫

1937年6月10日[67]



30年代在苏联被人们赞颂的领袖斯大林和执行领袖意志的红军元帅伏罗希洛夫



总书记斯大林和"工人阶级自己的统帅"伏罗希洛夫,从国内战争起一直是亲密战友

我面前放着厚厚的几大本由伏罗希洛夫签署或他作了批示的文件。我拿过一大本书信，这是一些指挥员在受审或处决前写给这位人民委员的，他们在信中请求、哀求、呼吁他给以帮助。写信的有：戈里亚切夫、克里沃舍耶夫、西多罗夫、哈哈尼扬、布克什特诺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克拉索夫斯基。请看前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叶弗列莫夫的信（他也给斯大林和米高扬写了类似的信）：

同志们，我有充分的材料可以驳倒法西斯分子德宾科和列万多夫斯基对我的诽谤，然而1938年4月18日我在政治局，说来惭愧和痛心，由于思想不集中，以至于忘记列举我无罪和忠于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证据……部队司令德宾科的辩解中有些话不足为信。他学习结束后肯定是精神失常了，否则我无法理解——因为这是1934年的事！德宾科的供词说，他"吸收了"我……并要我吸收指挥人员……

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共产党员，四人是工农红军指挥员。儿子17岁，共青团员。母亲和姐妹及其12个孩子现都在奥廖尔州"社会主义之路"集体农庄。叔叔1905年因参加海军起义被绞死，父亲被富农杀害。我本人是莫斯科工人，参加了在中国的战争，受过伤。获得过一枚列宁勋章、三枚红旗勋章、一枚劳动红旗勋章……请求您尽快结束我的不安和痛苦。

永远忠于您的米哈伊尔·叶弗列莫夫"[68]

同其他千百封信一样，这封信也是毫无结果。当然，布克什特诺维奇、克拉索夫斯基和叶弗列莫夫当时还算走运。他们都幸免于难。但这并不是因为伏罗希洛夫的干预。不仅他，而且其他任何人都不想制止或减缓镇压机器的运转。不仅如此，伏罗希洛夫在答复各地的请示时，总是轻易就批准逮捕、处罚和枪决，毫无恻隐之心。下面从不胜枚举的类似答复（1937年和1938年）中引录几份电文：

"哈巴罗夫斯克。布柳赫尔。答88号。审判。克·伏罗希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戈尔巴乔夫。答39号。准予逮捕。**克·伏罗希洛夫。**"

“极地。北极区舰队司令。答212号。审判并给予应有的惩罚。**伏罗希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盖利特。找到、逮捕并严加审判。**伏罗希洛夫。**”

“列宁格勒。德宾科、马格尔。答16758号。准予逮捕和审判。**伏罗希洛夫。**”

“第比利斯。古比雪夫、阿普谢。答344号。审判并枪决。**伏罗希洛夫。**”[69]

盖·斯维托尼乌斯在其《论语法学家和演说家》一书中曾说，诺瓦里亚的阿尔布齐乌斯由于奋不顾身地为那些不公正地指控为杀人犯的人进行辩护而远近驰名。有一次，当他为一位被告辩护时，竟当着皮宗的面“为意大利的命运而放声大哭……”伏罗希洛夫比阿尔布齐乌斯差远了：他不仅不为无辜者辩护，而且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4—5月间，伏罗希洛夫一封接一封地给斯大林发了许多如下内容的便函：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斯大林同志：

请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中清除下列人员：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

罗·彼·埃德曼，

P·B·隆格夫，

H·A·叶菲莫夫，

Э·Φ·安波格。

同时把他们清除出工农红军。

克·伏罗希洛夫

1937年5月25日[70]

伏罗希洛夫署上名后，把“清除”一词划掉，代之以“开除”一词。当

然他很清楚,准备把这些人"开除"到哪里去。随后几天他又给斯大林发出了类似的便函,只是上面的人名变了,其中有:戈尔巴乔夫、卡赞斯基、科尔克、库佳科夫、费尔德曼、拉宾、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格尔曼诺维奇、桑古尔斯基、奥吉列伊……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领导下的全体成员实际上都成了"特务"、"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看来这并未使人民委员感到不安。主要的是不违背、而要赞同、"支持斯大林同志的路线"。最接近斯大林的"三巨头"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人。诚然,伏罗希洛夫与其他人不同,他不是全靠领袖阴影的庇护——他的一生在人民心目中地位高于其他人,然而这决不说明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举动。

几位战友同"领袖"是完全一致的。所有这些人,特别是贝利亚,无疑对斯大林颠倒黑白的行径和犯下的罪行负有责任。而那些一味附和、赞同、投票通过、赞扬斯大林的英明决定的人也负有责任。他们的错误程度各不相同。历史将作出判决:谁的错误多一些,谁的错误少一些。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其他一些活动家,实际上都没有想过要限制独裁者的个人专权。

我所涉及的不是斯大林的全部亲信,只是他最密切的几个亲信。有关另外几个执行"领袖"意志的人的情况,将在其他章节中向读者介绍。现在我要谈谈另一个人,他的幽灵老是搅扰斯大林。

托洛茨基的幽灵

当然,这个幽灵就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比他在国内时还恨他。总书记想起来就后悔,真不该同意驱逐托洛茨基的建议。他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害怕托洛茨基。但斯大林现在却怕起这个幽灵来。他愈是想到怎么也解决不了的莱巴·达维多维奇"问题",以及以前绞尽脑汁对付托洛茨基的情景,就愈是充满愤恨。有一次斯大林克制不住,险些当众将此和盘托出。

在我已经在前面提到的同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斯大林在谈到威望时突然说到：

"托洛茨基也曾享有很高的威望……结果怎样呢？一旦他离开了工人，工人就把他忘记了。"

"完全忘记了吗？"路德维希再次问道。

"有时也想起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想起他。"

"是所有人都怀着憎恶的心情吗？"

"说到我们的工人，他们是怀着憎恶、愤怒和仇恨的心情想起托洛茨基的。"[7]

斯大林的话很虚伪：也许有许多工人想起托洛茨基时不会有好言好语，但"怀着憎恶、愤怒和仇恨的心情"想起托洛茨基的首先是他自己。斯大林怀着这样的心情想起"杰出领袖之一"是有许多原因的。当他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日丹诺夫讲话时，经常产生一个想法：托洛茨基比这些人要精明强干得多！整整高出一个等级！他在心里把自己的其余几位战友掂量再三，他懊恼地确信：不论是在思维水平方面，还是在组织能力方面，不论是在演说家的才能方面，还是在政论家的技巧方面，他们都无法与托洛茨基相比。而斯大林自己的聪明才干也比不上托洛茨基。虽然斯大林总想摆脱这种想法，但他在心里有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我怎么把这样一个敌人放走了呢？"——斯大林几乎是哀叹道。有一次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承认，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

促使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不断升级的另一个原因（他甚至对自己也不能承认这一点）是，斯大林在实践中经常采用被驱逐的敌人想出的办法。总书记还记得，在围绕新经济政策进行斗争时，托洛茨基有一次在政治局宣称："工人阶级只有作出巨大的牺牲，鼓足干劲，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精力，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后来他在1922年10月举行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这一思想。这个被打败的对手当时不厌其烦地一再说，没有"工人大军"，不实行"劳动军事化"，不"彻底克制自己的要求"，革命就永远不可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托洛茨基文集》第15卷几乎都是论述"劳动军事化"的。托洛茨基1920年1月12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向特别重要的工程派遣"突击营，让他们以自身的榜样和惩罚手段提高生产

率”。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在突击部门实行战时状态……应当在那里用军事手段推行劳动义务制……”[72]这些就是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一些人在20年代初所鼓吹的兵营共产主义的经典常识。他后来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这些思想。



十月革命时期,在火车上进行宣传的托洛茨基

斯大林始终欣赏这种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精力”的思想。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在普林杰沃群岛,在法国和挪威)多次写到斯大林的“模仿作风”,看来这是暗指斯大林不仅有编撰爱好,而且在社会方法学中爱借用他人的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后,当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检阅部队

然而,斯大林之所以经常感到托洛茨基幽灵的困扰,其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第四国际,而且一有机会就把他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是无法忍受的。这个经常出现的幽灵为失败而复仇的劲头,是斯大林自己也未能料到的。他常常感到,他们之间的斗争表面上似乎在1929年2月10日凌晨当“伊里奇”号轮船载着托洛茨基悄然驶离敖德萨港的那一时刻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只是刚刚开始。



托洛茨基在写作

两个被许多条国境线所隔开的“杰出领袖”,各自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一个是建立了使许多专制政权都黯然失色的少有的个人专权的“不可一世”的领袖,他竭尽全力要党和人民相信托洛茨基是叛徒和法西斯帮凶,要他们永远憎恨托洛茨基。

另一个是“被推翻的领袖”,他充分施展自己能言善辩的本领,证明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丘之貉”。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虽然只得到一些国家内为数不多的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但他

善于对舆论施加影响。他的讲话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像从前一样，斯大林仍然是他的主要攻击对象。他嘲讽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托洛茨基了解很多情况。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这个未来的流亡者同列宁的关系比斯大林同列宁的关系更为密切。列宁多次为托洛茨基辩护，称赞他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斯大林还记得，当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过得去时，他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左倾思想——向华沙进军，以便在欧洲早些点燃革命的烈火，并组织对亚洲的远征——基本上是持赞同态度的。托洛茨基不知怎么硬要人们相信，亚洲比欧洲革命。据说，如果在南乌拉尔建立革命基地，那么旨在加速革命进程的亚洲远征就会变为现实。那时中国和印度的革命必然会取得胜利。斯大林对此并未表示异议。托洛茨基有不少反常、古怪的左倾思想，例如他试图超越时代，他所思考的已经超出了俄国的范围，他对世界革命充满了幻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在20年代所制订的许多长期计划都是有关世界革命的。但斯大林明白，公开谈论托洛茨基的这些"罪恶"，无异于玷污自己的名誉；因为如今他成了十月革命事业的"继承人"。

尤其刺痛斯大林并使他不安的是，托洛茨基说自己的言论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代表现时仍在苏联的沉默不语的支持者和所有停止活动的反对派。读着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致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公开信》、《斯大林的热月政变》，"领袖"几乎失去克制。他真是瞎了眼！难道他1924年11月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不对吗？当年他在向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发表讲话时，曾说托洛茨基是一个在革命事业处于高潮时积极活动，一旦革命失败就惊慌失措、"畏缩后退"的人[3]。托洛茨基似乎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但他没有屈服，他还在斗争！失算的想法不停地折磨着斯大林：为什么要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呢？如今他不得不为这个轻率的举动付出代价。托洛茨基手下的人正在策划反对他的阴谋，组织破坏活动，进行间谍活动，拼凑地下组织，而我们已有好几年无所事事！

斯大林在1937年2至3月中央全会上作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时，按照自己的习惯突出了"主要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如同向小学生提问似的向听众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托洛

茨基主义呢？他自己回答说："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伙破坏分子组成的寡廉鲜耻的匪帮。7—8年前它曾是一个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成了一伙法西斯破坏分子组成的匪帮。"接下去他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否认他们有政纲。他们是在扯谎。而皮达可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在1937年的诉讼案中却不否认有政纲。使资本主义复辟，分割苏联的领土（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地区割让给日本人）；在敌人侵犯时进行破坏活动，实行恐怖手段。所有这些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79]就这样，斯大林用托洛茨基主义这根绳子把他的所有敌人——被打败的和潜在的——统统捆到了一起。

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无疑应当更确切一些。我已经论述过他的极其复杂和充满矛盾的精神和道德品质。托洛茨基有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这个斯大林的魔鬼相信、确信，他是天才，而且几乎不掩饰这一点。他自命不凡的原因就在这里。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认为，即使托洛茨基战胜了斯大林，我国人民遇到的仍然会是充满恺撒主义色彩的专制政权，对此我不敢苟同，但是也许这些人是正确的。不过，鉴于托洛茨基高度的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可以断定，他未必会犯斯大林所犯下的那些罪行。

不管怎样，真理应当高于一切：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托洛茨基就其所起的作用来说是仅次于列宁的党内第二号领袖。我们还记得列宁对这位"杰出领袖"的评价。谁也不知道，如果列宁活着，托洛茨基后来会怎样，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净是推测，我认为，研究者有权假设。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托洛茨基在积极从事党的活动的年代（1917—1924年），也许再晚一些，不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的敌人。我决不是要掩盖托洛茨基在其悲剧性的晚年有时所干下的反苏勾当。导致他走上这条思想和政治绝路的是同斯大林斗争的逻辑。

也许，托洛茨基在被驱逐出境之后所进行的反苏宣传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危害。然而，也不能不给托洛茨基应有的评价：在斯大林的专制面前，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垮掉。他是首先察觉斯大林在策划热月政变的人之一，而且遗憾的是，许多事都被他言中了。

还有一个客观情况使我能够说，至少在十月革命期间和20年代前

五年，托洛茨基和革命是步调一致的。他直到临终对列宁都是尊敬的，请看卢那察尔斯基是怎样写的："托洛茨基是个刻薄和专制的人。惟独在同列宁的关系方面，自从他们联合起来之后，他表现出了感人的、恭敬温和的态度，托洛茨基以真正的伟人应有的谦虚态度承认：列宁比他强。"[⑦]但是……我已多次指出：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爱自己胜过爱革命本身。他的悲剧的根源与其说是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不如说是同斯大林的斗争和权力之争。未能爬上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给托洛茨基带来了终生的痛苦，这使他把个人的利益摆在了首位。也许，我的意见会引起一些人"公正的"愤怒。我想时间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30年代来自托洛茨基的实际危险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政治和社会进程是否存在某种影响呢？弄清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是造成党和人民的可怕悲剧的借口。

当斯大林在加强其个人专权时，托洛茨基却在浪迹天涯。从马尔马拉海的王子群岛到法国、挪威，最后落脚墨西哥，这就是被驱逐出境的反对派领袖所走过的旅程。起初托洛茨基对很快返回苏联抱有希望，他相信斯大林支持不了多久。他觉得，斯大林智力上的缺陷、缺少文化、粗暴和狡诈表现得极其明显，它们本身足以激起人们的反对，产生愈来愈多的反对总书记的人。托洛茨基又一次失算了。"被推翻的天才"相信，他的极高的声望将会使那些敌视斯大林的力量集结在他的周围。在马尔马拉海中的一座叫比尤克·阿达的孤零零的小岛上，托洛茨基徘徊在棕色漂砾之间，思索着人的稀奇古怪的命运。这座小岛曾是监禁拜占庭显贵要人的地方，而如今，这位流亡者想到，来到这里的却是一位"俄国革命的建筑师"。这句话摘自托洛茨基在岛上一座荒废的别墅中所写的日记，它再次证实斯大林的这位主要对手是何等地自命不凡。

资产阶级报刊起初对驱逐托洛茨基出境怀有戒心。一段时间内，报纸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斯大林是故意把俄国革命昔日的领袖之一驱逐出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德国、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甚至对斯大林的这项指望燃起世界革命之火的"魔鬼"计划的"细节"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这些报纸称托洛茨基是"革命的炸药"，因此各资产阶级政府拒绝向这位流亡者提供政治避难。然而，西方政界人士逐渐感到，虽然托洛茨基仍像过去一样继续大

骂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庸俗行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但他的仇恨对象首先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制度，有意无意地也连带恨上了自己的祖国。然而不管怎样，托洛茨基从来都不是“间谍”、“恐怖分子”、“法西斯代理人”。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的捏造，因为他需要地狱之火，以便为他犯下的罪行辩护。

这位被贬黜的领袖在他那些从世界各国前来王子群岛朝觐的追随者的帮助下，同许多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制度及斯大林本人的小团体建立了相当广泛的联系。在它们的帮助下，托洛茨基很快搞出了一个用几种文字出版的小型杂志《反对派公报》。有时，特别是1935年以前，托洛茨基还能把少量的《公报》运进苏联。显然，托洛茨基企图同在苏联的老战友和志同道合者建立联系。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杰伊切尔也谈到了这一点。例如，他在第3卷中写道，托洛茨基通过德国驻莫斯科记者索博雷比齐库斯获得了来自俄国的重要情报，为他写书撰文收集了参考资料和统计数据。托洛茨基同其在苏联的支持者的相当一部分往来信件，是由索博雷比齐库斯兄弟二人传递的，传递的东西有：密码、用特殊墨水写的书信、邮政信箱号码等等。尽管托洛茨基的这些通信手段相当薄弱，但毕竟使他在1935年以前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某些情报，并把自己的信件通过秘密渠道寄往苏联。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与许多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制度及斯大林本人的小团体建立广泛联系。在它们的帮助下，他编辑了一份用几种文字出版的小型杂志《反对派公报》

托洛茨基运出了大约30箱个人档案材料和书籍。斯大林后来把这归咎于负责驱逐出境的“机关”的“目光短浅”。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度过了漫长的四年，这是等待的四年，是选择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式的四年。托洛茨基对自己将被召回莫斯科所抱的信心逐渐破灭；他愈来愈认为，他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漂泊”——继续同斯大林作斗争。但这一斗争将采用什么方式和手段，眼下他还不清楚。他还没有彻底明白，他的第三次侨居将是最后一次，他已经永远不能再踏上祖国的土

地了。

晚上，托洛茨基坐在他那间窗子朝着大海的布置成书房的小屋里，在海浪击岸声中翻阅着自己的文集。总的来说，在他的全部著述中写得最好的（他本人这样认为），是他同斯大林决裂之后写成的《俄国革命史》一书。但该书的主要不足之处是托洛茨基赤裸裸的自我中心主义。他翻阅着书，自己对自己的写作速度之快也感到惊讶。请看他的文集第8卷《政治家剪影》。没有谁不被他写到（而且写得很有趣！）：阿德勒、考茨基、倍倍尔、饶勒斯、瓦扬、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拉柯夫斯基、柯拉罗夫、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维特、阿捷夫、尼古拉二世、苏霍姆利诺夫、米留可夫、皮罗戈夫、赫尔岑、司徒卢威、斯维尔德洛夫、利特肯斯、诺根、米雅斯尼科夫、斯克良斯基、伏龙芝，以及其他许多许多人。对于列宁，他没有专门写过，但在讲述他人时常常提到列宁[76]。再请看基本上是论述布列斯特和约的那一大卷书。他的目光扫过这样几行文字："党代表大会这一党的最高机关，以间接方式否决了我和其他人所推行的政策……因而我辞去了迄今为止我们党赋予我的所有重要职务。"[77]这是多么久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事啊！

托洛茨基的思路又飞回了那遥远的年代。书页簌簌地往下翻着……那里面没有斯大林的位置。好像有一卷论述文化的书间接提到了他。托洛茨基无意中翻开了这样一页："官僚主义和莫尔恰林习气*。"他怀着好奇心读着自己几年前写的东西："……一切违背革命专政利益的东西都应被无情地扫除。但这并不是说，


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字仪式

《布列斯特和约》

全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依约，苏俄丧失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共计约占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向德交付60亿马克赔款。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在大战中的失败宣布废除该和约。

*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

——译者

我们就不应当有自己的民主,无产阶级的、丰富多彩的、朝气蓬勃的民主。我们应当建立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劳动群众享有愈来愈多的真正的、革命的民主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哪里有官僚主义,哪里就必然会产生莫尔恰林现象……莫尔恰林现象的主要原则是:讨好。讨好谁?讨好主人……"[70]托洛茨基叹了口气,陷入了顾影自怜的状态,他想:如今所有这些都已失去了现实意义……斯大林所关心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有另外的动机,另外的当务之急。托洛茨基别无选择,只有同斯大林斗争、斗争、再斗争。未必是同制度,首先是同个人……大海发出了响亮的叹息声,似乎是对此表示赞同。

杰伊切尔在托洛茨基死后获准利用他的不公开的个人档案材料,他写道,托洛茨基早在彻底失败和被驱逐出境之前,就同季诺维也夫以及施略普尼柯夫试图把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成立小集团。法国托派首领为阿尔弗雷德·罗斯梅、波里斯·苏瓦林、比埃尔·莫纳特;德国托派首领为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季诺维也夫原先的战友);在西班牙,同情托洛茨基的安德列斯·宁领导着一个小集团;在比利时,被清除出共产党的范·奥费斯特拉坦和勒索伊尔也支持托洛茨基。上海、罗马、斯德哥尔摩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和首都也出现了托派小集团。托洛茨基指望这些七零八落的小集团能形成反斯大林的新运动。

然而,托洛茨基既没有像样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像样的纲领。要知道,反斯大林主义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的有吸引力的行动纲领的。于是他开始重弹"不断革命"的老调,力图证明"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民族社会主义"。他的"纲领"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组成部分就是狂热地反斯大林主义。然而透过其各种表现,人们看到的首先是对斯大林的个人仇恨,是自己的奢望未能实现而产生的个人恩怨,是失去在俄国的亲人的个人痛苦。托洛茨基指望他的赤裸裸的反斯大林主义能得到各国共产党的广泛响应。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看来,苏联在经济发展、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在西方,人们还不了解他的性格,轰动一时的莫斯科政治诉讼案还未开场,能够描绘出斯大林肖像的颜色还未调配好。托洛茨基企图鼓动从外部对苏联、对斯大林

及其政策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显然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托洛茨基"发动"其在苏联的原支持者直接反对斯大林的做法，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托洛茨基通过自己的文章、公报、讲话、答记者问，不管这是否符合他的本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反对派在壮大，其志同道合者的数量在增加，"反斯大林的力量正在团结起来"。遗憾的是，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满腹狐疑的斯大林却对这些夸大其词的声明中的很多情况信以为真。有些声明很可能激怒了斯大林，结果起了一种悲剧性的作用。

斯大林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无可奈何：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从篇名上就已是针对他的，如《斯大林伪造学派》、《斯大林的罪恶》、《斯大林的政治传记》。托洛茨基未写完就死去了的最后一部著作，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著作在数十个国家出版发行。确实，斯大林在世界舆论中的形象，不是由福伊希特万格和巴比塞的书，而首先是由托洛茨基的著作塑造的。打开托洛茨基的书，一个可怕的亚洲式暴君跃然纸上：阴险、残忍、狂热、愚昧、睚眦必报。对此这个流亡者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对于托洛茨基，斯大林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他把任何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都看作托洛茨基的一部分，要求"对他们决不宽恕"。

1936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时写了《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在书中，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发给他签证的人，实质上是号召共产党人——他过去的同胞们发动政变。不错，他把这个政变称作"政治革命"，说这一革命应当由他的拥护者，由被粉碎的原反对派成员，由原



巴比塞(1873–1935)

法国作家

16岁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并参加象征派诗歌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1915年末至1916年上半年写成长篇小说《炮火》，它的副标题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描写一个步兵班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备受苦难和牺牲，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得出必须以革命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根除战争的结论。《炮火》于1917年获得龚古尔奖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巴比塞坚决捍卫苏维埃共和国。1923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35年，巴比塞在访问苏联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因病去世。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成员来完成。对斯大林的盲目仇恨，毫无出路和前途无望的处境，使托洛茨基不能对苏联的政治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顺便说一句，我已指出，托洛茨基从来都不是一个强的政治家。

托洛茨基认为，《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不仅写了“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而且包含有他对苏联社会发展的长期预测。看来，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未来学家，因为他相信会发生反对斯大林的“政治革命”，只是建立在他强烈地盼望“领袖”失败的基础之上。还有，他的预测中甚至暴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如果德国发动侵苏战争，那么斯大林未必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很难确切地断定，托洛茨基是真的希望这样，还是个人的仇恨在这个问题上也使他眼中的世界变了形。

夜里，斯大林一口气读完了《被背叛了的革命》的译本。读着这本书，斯大林怒火中烧。他酝酿良久的两“点”决定，经过深思熟虑逐渐成熟。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斯大林极少采取没有经过再三斟酌的措施。如今他认为，决定已经成熟。第一，应不惜任何代价把托洛茨基从政治舞台上消灭。他知道，杀死自己的死敌时制造任何假象都是徒劳的。所有人都会明白，暗杀是谁指使和组织的。第二，他更加确信，必须把国内所有可能反对他的专政的人，坚决彻底地消灭干净。很可能，斯大林本人也没料到，这一决定使他走得多么远。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斯大林是1937年初得到的。这本书使斯大林对所有“残渣余孽”的仇恨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使他的复仇心理更加强烈，他觉得过去一段时间对“知识分子”、“战友”和“反对派”过于优柔寡断，几乎有失身份。可以说，这本书起了悲剧性的作用。

斯大林感到，快该他下手了，到时决不能延误和动摇。此外，叶若夫经常不断地报告“原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消息。前几天，这位浑身酒味的人民委员带来了一大张托洛茨基同其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的“联络图”。“领袖”研究了一番叶若夫主管的部门的这一工作成果后，表情冷淡地送走了他，分别时连手都没握。

斯大林想起了几乎已被忘记的布柳姆金案件。是的，正是那个刺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以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当时他被判处枪决，但由于托洛茨基的干预，死刑被改判为“在保卫革

命的战斗中立功赎罪”。布柳姆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托洛茨基的总司令部工作，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后来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工作。1929年夏天，他从印度回国途经君士坦丁堡时，在王子群岛会见了托洛茨基。杰伊切尔写道，“流亡者”在长时间的交谈以后，给其在莫斯科的战友写了一封信，他还告诉布柳姆金怎样同斯大林作斗争。布柳姆金返回苏联后，很快就被逮捕：也许他在土耳其登船前往王子群岛时就已被人盯住；也许是他在莫斯科不慎向什么人透露了他会见托洛茨基一事。而最可能的是卢那察尔斯基的秘书И·A·萨茨所说的情况。布柳姆金受托洛茨基之托捎给拉狄克一包东西，并给他带了什么口信。布柳姆金走后，拉狄克连包都未启封就打电话给雅哥达，告诉了他布柳姆金来访一事，而雅哥达又告诉了斯大林。“联络员”立时就被逮捕。拉狄克得到了短期宽容。经过草草审讯，布柳姆金被枪决。命运这一次没有向这位死刑犯微笑。

斯大林想起布柳姆金不是没有原因的。说不定这些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的布柳姆金们就在他身边的某个地方呢？要知道他们毕竟杀死了米尔巴赫……他们有多少人呢？都是些什么人呢？谁能知道现实危险有多大呢？托洛茨基的魔爪伸出了多长呢？斯大林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忧虑、愤怒、恐惧、气愤和对托洛茨基的仇恨。虽然布柳姆金的死吓住了许多托洛茨基分子，但谁能担保恐惧能使托洛茨基的所有支持者失去斗争的决心呢？

这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以及他身上为数不少的坏毛病又一次（不知多少次了）起了不祥的作用。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宣布，托洛茨基主义是敌对势力的主要纲领，苏维埃国家的一切敌人正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不肯向他斯大林低头的托洛茨基的幽灵，已发展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程度。任何的失败、不成功、挫折和灾难，斯大林都认为有“托洛茨基插手”。顺便提一下，在1937—1938年的政治诉讼案中，对被告的主要指控之一就是确认他们同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接受他的指示，甚至同他有时在柏林、有时在奥斯陆会面等等。在中央2至3月及其他几次全会（1937年共开了四次全会）的报告中，最常听到的词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的间谍和杀人凶手”等等。不论讨论什么问题，会场上都笼罩着托洛茨基主义的阴影[29]。对于斯大林来说，托洛茨基成了一切祸害的化身。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托洛茨基主义即使在其影响最大的时期即20年代中期,在党内的支持者也为数不多。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只有某些信徒继续忠实于他。但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可能有几十人。充其量不过几百人。一些人觉得,托洛茨基早已不是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而是在进行某种程度上与反苏主义相似的个人之争。另一些人则在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那些得到斯大林的"宽恕"并获准返回莫斯科的人(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索斯诺夫斯基、斯米尔诺夫、博古斯拉夫斯基、拉狄克等等),都担任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斯大林允许原托洛茨基反对派从事经济、教育工作,但没让一个人返回重要的政治岗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报刊上公开表示悔过。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制度、对社会内部的稳定构成什么威胁。

当然,斯大林知道,他已从思想上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了"阉割",强迫他们放弃"左倾方针",谴责"不断革命"论,接受他所解释的列宁主义。"领袖"也知道,这些人在内心深处仍然不赞同他斯大林。他认为,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危险。因为从年轻的时候起,斯大林就形成了不外露、不真诚的性格。他认为,其他人也同样如此。但这只不过是推测而已。意识,这是人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人可以永远保持独立。然而,"想法不同"不一定就是政治上危险。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换句话说,托洛茨基主义并不具有严重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具有严重的危险。1935年以后,托洛茨基实际上失去了与苏联的任何联系(从他那一时期的文告、信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报纸、广播成了他的主要信息来源。托洛茨基从中过滤出、"搜索出"他所需要的信息,继续把自己装扮成能对苏联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进程施加影响的人。斯大林强迫自己相信这一点。他需要找一个借口,以便"一劳永逸地"消灭那些曾几何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以及将来**有可能**对他持敌视态度的人。他不能允许托洛茨基的预言得到实现,一想起这些预言斯大林心里就感到不自在,尤其是在托洛茨基最后一本书出来之后。这本书是在审判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的一月(1937年)莫斯科政治诉讼案之后的两三个月里"草草写成的"。单单那书名——《斯大林的罪恶》,就足以使人火冒三丈。

托洛茨基又一次断定,苏联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冲突中未必能站住脚。同时他认为斯大林的地位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希望的。托洛茨基的话就像不祥之兆敲击着"领袖"的心:"也许明天斯大林就可能成为统治阶层的累赘……斯大林正处于他的悲剧使命完结的前夕。他愈是强烈地感到不需要任何人,他就愈接近大家都不需要他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未必能听到对他完成的劳动的赞美之词。罪恶累累的斯大林必将下台。"[80]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托洛茨基的预测是错误的。这些话对斯大林只不过起了催促的作用。一心想消灭原反对派残余的斯大林,正好借此给托洛茨基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实现自己预言的希望彻底破灭。

读着托洛茨基的书，斯大林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位流亡者的政治性的、挑唆性的号召。托洛茨基经常散布说，斯大林出现在权力的奥林匹斯山上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耻辱。这些话尤其刺伤了"领袖"的心。在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斯大林看到了这样的话："从列宁的到来（1917年4月到达彼得格勒。——本书作者注）具有巨大意义这一点当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领袖的造就不是偶然的，他们是逐渐选择出来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他们是不能随意替换的，机械地使他们离开斗争会给党带来巨大的创伤，并很可能使党在长时期内陷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毫不掩饰地说，公认的领袖列宁的"离开"、去世，没有把斯大林而恰恰是把他托洛茨基推上了领袖地位："现在除我之外，谁都不能完成用革命手段武装新一代的使命……"[81]

在那个披着领袖"外衣"的人的周围,老是有一个幽灵在游荡。尽管这个幽灵眼下还是个大活人,并且远离莫斯科。对于斯大林来说,托洛茨基已成了"永恒的"恶的化身。也许斯大林一想起这个幽灵就记起了本世纪初的伦敦党代表大会吧?当时他是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头发鬈曲,动作敏捷,戴着夹鼻眼镜,讲话华而不实,姿态做作。他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注意。托洛茨基的目光几次停在这个姓朱加施维里的阴沉的高加索人身上。当时托洛茨基是主角,而斯大林却像一个默不作声的幽灵。年轻的莱巴能否想到,这个来自高加索、作为战斗队代表的神秘人物,成了伴随他终生的敌人。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生命的完结使斯大林感到快慰。

胜利者的声誉

历史上充满了将个别人物奉若神明的事例。在苏联历史学家C·乌特琴科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著作中引用了这样一些颂扬他的细节："元老院规定为庆祝胜利举行为期50天的感恩祈祷。元老院准许恺撒在观看一切演出时身着胜利者的服装、头戴桂冠并穿上据传说是阿尔巴皇帝曾经穿过的红色高筒靴。元老院和人民决定在帕拉廷由国家出资给恺撒修建宅邸，并决定宣布他的胜利日为节日。在举行演出和仪式时，人们用豪华的轿子抬着他的象牙雕像；恺撒的雕像还矗立在克维林寺和卡庇托林的皇帝群像之中。按照斯维托尼乌斯的说法，这种尊敬已经超过人的极限……"[⑫]

30年代对斯大林的颂扬尚未达到"人的极限"。尽管利昂·福伊希特万格在他的书中写道，甚至在伦勃朗的画展上也很显眼地摆着一尊"并不美观的巨型斯大林半身像"。不过应当说，斯大林当初的的确确在人民中间享有盛誉。对于一个曾对本国人民犯下"有案可查"的累累罪行的人来说，这在今天听起来十分奇怪，甚至是亵渎神明。不过当时人们、至少是绝大数人对斯大林、对国家大事都是根据表面现象来评判的，他们往往既无可能、又无愿望去深人了解事物的本质。那是一个千方百计地确立统一思想和维持千篇一律的时代。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要学习抑扬顿挫地朗诵颂扬"伟大领袖"的赞美辞。那是一个谁也不敢不爱斯大林的时代。随着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的一切个人崇拜的反常现象和罪行、整个官僚主义机器的运行机制逐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会产生一种想法：斯大林究竟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会


1936年时的斯大林



斯大林时期，宣扬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宣传海报

享有盛誉?为什么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敬仰这位已故的神明?斯大林得以在人民中间享有盛誉,其"奥秘"何在?

我想这个现象可以用一系列原因来加以解释。原因之一是,尽管有精神上的巨大失败和肉体上的巨大牺牲,整个社会却并未衰退,而且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想,如果当初是另外一位领导人、一位列宁式的领导人担任总书记的职务,那么这些成绩当然还会更大些。尽管如此,个人崇拜的反常现象并未完全阻止社会的发展。

工业发展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下是几个数字,当然极有可能是被夸大了的数字,却仍然可以说明列宁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在工业中的完成情况:

	1913年生产	1935年生产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完成的年份
大工业总产值	1	5.6	1929—1930
电力生产(单位:亿度)	2.0	26.3	1931
石油(单位:百万吨)	10.3	25.2	1929—1930
煤(单位:百万吨)	29.2	109.6	1932
铁矿石(单位:百万吨)	9.2	26.8	1934
生铁(单位:百万吨)	4.2	12.5	1934
钢(单位:百万吨)	4.3	12.6	1933
纸(单位:千吨)	269.2	640.8	1936[83]

可见,工业方面实现了从极端落后状态向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大跃进。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亲身经历过破坏的人民,不能不对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巨大潜力和创造力感到惊讶。自然,因近似个人崇拜的领袖至上主义的确立而引起的错误与过火行为,在这方面也有影响。然而,在民族和人民的自我意识中,一种自豪的思想在反复出现:"我们无所不能!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仿佛是为了证实斯大林所谓"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变得更快乐了!"的说法,到30年代末新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工厂、道路、城市、文化宫、疗养院、医院、学校、实验室,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

农业方面的情况就要糟得多了,这方面在确定合作化的途径和方



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下了很高的重工业发展目标，工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右上图)表现了百万工人奔向518个工厂的情景；农业方面确定了合作化的途径和方针，(右下图)号召农户加入集体农庄

法时铸成了特大错误。再加上在剥夺富农过程中的种种罪恶行径，这些错误决定了农业部门在以后的数十年内要陷于很不美妙的境地。集体化前夕国内有2500万个体小农户(其中35%为贫苦农户，60%为中等农户，5%为富农)，至30年代中期已有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然而农产品却并未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决定性的增长。这里再引用一张表格。

平均每年	1909—1913	1933—1937	1939—1940
谷物总数(单位:百万吨)	65.2	72.9	77.9
肉食(按屠宰后重量计算，单位:百万吨)	3.9	2.7	4.5
羊毛(单位:千吨)	180	83	146
奶(单位:百万吨)	24.1	22.2	27.6[84]

当时曾把使用暴力作为实现集体化的主要手段，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战略失误不仅使社会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而且作为历史性的“报复”，还使农业这一生产领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无论斯大林在其历次讲话中怎样大谈特谈集体农庄建设中的巨大成就，但要说这方面业已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却是毫无根据。诚然，技术、专家、教育、文化均纷纷进入集体农庄，但业已破坏的古老结构却决非简单地以新的结构取而代之就可万事大吉的。

在人民教育方面，成绩显得较为突出。

	1913年	1928年	1941年(1月1日)
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专家总数(单位:千人)	190	521	2401
其中:			
受过高等教育者(单位:千人)	136	233	909
受过中等专业教育者(单位:千人)	54	288	1492[85]

教育普及，这已成了人民的伟大的成就。报刊、广播、电影对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千百万人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仅仅是个开端，相信明天或者后天就可出现使他们的生活、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得到改善的新前景。在取消票证和食品配给制以后，商店里不但工业品增多，而且农产品也多起来了。尽管按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当时人们生活艰苦，住房拥挤，并不富裕，社会上总的气氛却是相当乐观的。报刊、电台一再宣传：当前的、尤其是将来的一切成就，都首先是同“领袖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年轻一代从幼年时起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斯大林想着每一个人”，“如果不是斯大林，我们就成不了工业强国，我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历史是无法阻止的，因此尽管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有过失误、缺点和罪行，人民却照样在建设，创造，敢作敢为。最难于置信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成千上万祖国无辜的忠诚儿女在斯大林一手制造的残酷斗争中死于非命时，那些没有遭到此种厄运的人却在使全国、往往还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哩。

几乎就在1937年6月，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一批其他军事将领受到猝不及防和极不公正的审判的日子里，《真理报》报道说，由瓦·契卡洛夫、格·拜杜科夫和阿·别利亚科夫组成的英雄机组驾驶国产安—25型飞机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莫斯科——北极——北美的不着陆飞行。这是苏联技术和苏联人的胜利。1937年3月，《真理报》报道说斯达汉诺夫创造了新的劳动纪录。他在斯大林“中央”煤矿6小时采煤321吨。这相当于该矿区的23个采煤工的定额！斯达汉诺夫干一班活所采的煤，便超额83吨完成了全矿区一昼夜的任务[86]。但是就连这项纪录也一定要同斯大林的名字扯到一起。斯达汉诺夫在创造纪录后不久撰写的《谈谈我的生活》一书中写道：“每当我回忆起一切往事、把全部思绪集中到一起时，我总是想说：谢谢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如此抬举我这个普通工人，这是我过去从来不敢想的。现在我已经习惯于‘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样的说法，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在集会上听到我的名字。老实说，起初我对这一切都感到不可理解。而且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这个运动应该称作‘斯大林运动’才对，因为我的纪录和我的同志们的纪录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参加了志在掌握技术的斯大林进军。正是斯大林同志使我们的运动成了广泛的运动。”[87]

帕帕宁、契卡洛夫、布瑟金、维诺格拉多娃姐妹、克里沃诺斯、久卡诺夫，其他许多本行业的先驱、爱国者、革新能手、献身者，对他们的宣传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一定要通过斯大林对其中每一个人的“领导”、“参加”、“关心”这个中介。实实在在的成绩、纪录、发明、成就，一经在上下文里与斯大林的作用联系起来，就为“领袖”树立了牢固的声誉。这往往以最不寻常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已经说过，我在发表了有关斯大林的一系列文章之后曾收到数千封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党员斯·叶·普洛斯特写来的。他说，他的父亲是未来的红军高级政工人员，儿子出生时，父亲在朋友们——列宁军政学院学员的一致要求下给儿子取名叫斯大利。斯大利·叶菲莫维奇在信中说，他父亲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1937年5月15日当成“人民的敌人”被捕，于同年11月4日，即十月革命20周年前夕被处决。男孩活了下来，但他这个已经成年的人却终生用的是同害死他父亲的独裁者的姓有关的名字……每一出悲剧都有其特有的色彩、特有的面貌。


1936年，斯大林与契卡洛夫

就连揭露和消灭敌人的运动也要同斯大林的威信和声誉联系在一起。报刊上不断渲染一种思想，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破坏分子”的目标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而且首先是“想杀害斯大林同志”。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同志尽管经常遭到危险，却关心着每个犯过错误、但愿走上自新之路的人”。在1937年中央2至3月全会上，莫洛托夫举了一个“斯大林同志爱护干部”的例子，他念了“领袖”写的一封信。

彼尔姆，市委书记戈雷舍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获悉发动机厂厂长波别列日斯基及其主要工作人员因过去所犯的托洛茨基主义错误而受到迫害一事。鉴于波别列日斯基及其工作人员现已在认真工作并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充分信任，请你们务必让波别列日斯基及其工作人员免遭迫害，并在他们周围造成一种充分信任的气氛。

采取的措施望速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亲笔**

1936年12月26日[88]

“对于现在已经在各自岗位上诚实工作的原托洛茨基分子，就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莫洛托夫最后说道。甚至在镇压达到最高潮时，斯大林还要竭力借助他周围的人大造舆论，把自己说成一个极其公正、对下属关怀备至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领袖在人民中间的声誉。应当承认，当时全国上下仍然回荡着革命风暴的余波，人们对于提高警惕、必须强化同“人民的敌人”的斗争的号召是积极响应、乐于接受的，对于“揭发出来”的事实也深信不疑，并未察觉到其中有捏造和虚假的成分。

斯大林甚至对于同他“在人民面前亮相”有关的细节也十分关心。他那衣着朴实、讲话通俗的风度颇能使人产生敬仰之情。福伊希特万格指出，“斯大林肯定不是个大演说家。他讲起话来慢慢腾腾，毫无特色，嗓子略微嘶哑，有些吃力。他慢条斯理地阐发着自己的论据，诉诸那些对问题的领悟虽不算快、却较牢靠的人的健全思维……斯大林讲话时面带狡黠的、令人愉快的微笑，一边用食指打着特有的手势，这么一来，就不会像其他演说家那样使自己与听众脱节了……”[89]他极少发表讲话，对每次讲话都要仔细准备。托夫斯图哈以及后来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受命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文学作品和民间创作中为每次讲话挑选一些有趣的段落。据伏罗希洛夫秘书处工作人员安东诺夫说：“斯大林的起草报告的顾问们帮助他挑选有关问题的数字材料。这些材料往往向有关的人民委员部索取。斯大林再从中选出所需的数字。顾问们是不提供任何文字材料的。”[90]斯大林在讲话过程中有时要利用它们。他在讲话时始终爱用他早已在宗教中学里学会的一种弥撒式的调子。他喜欢在讲话中采用问答式结构，即：问题——回答，问题——解释。他常常借助叠句和有意的重复，他认为这具有魅力般的作用。应当说，这种不大引人注目、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讲话风格给参加各种会议和会见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是这种风格可以使人们相信他的英明。须知早已发现：没有什么能比人们对其领导者的超群智慧抱有信心更能提高声誉的了。

斯大林的任何一张照片，不经过“领袖”本人的事先同意、后来是不经过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事先同意便不能发表。斯大林喜欢给自己树立一种圣像般的形象：身穿士兵大衣的照片，是“无产阶级严肃性”的体现；把小孩放在膝盖上或者用手牵着，俨然是“本国人民的慈父”；身穿大元帅制服，则是“伟大的统帅和胜利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计其数的斯大林的塑像、肖像、照片才如此令人不快地千篇一律和表情呆板吧。在撰写此书时，我曾找到斯大林的大量照片。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偶然”抓拍、不摆姿势的照片。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H·C·弗拉西克和娜·谢·阿利卢耶娃拍摄的照片，但遗憾的是，照片质量太差，未必能在本书中加以复制。



斯大林树立一种圣像般的形象：身穿大元帅制服，他是“伟大的统帅和胜利者”

斯大林处心积虑地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他渐渐地促使国内形成了整整一个领导人等级，这些人站在一些比较低的权力台阶上。早在30年代初，随便翻开中央报纸合订本便可发现非正式的官阶表。当然，位于金字塔之巅的是“列宁的优秀学生”。报道中说，全场肃立欢迎领袖的到来。掌声转为欢呼声。必定要欢呼“乌拉”。人们久久不让专制者开口讲话。狂喜是发自内心的，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偶像崇拜。形容词最高级和表示赞美的修饰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报纸在提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时是这样写的：“主席团中出现了斯大林的光荣战友。”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甚至可以称呼他们的本名和父名。这里也必定有修饰语：“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斯大林类型的领导人”……

往下在讲到地位稍低的领导人（人民委员、州委书记、大机关领导


"让斯大林讲话",表现了当时苏联社会如痴如狂的偶像崇拜

人)时,修饰语就更"有分寸"了:"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优秀的肃反工作人员","有献身精神的领导人"……不过尽管这些人论官阶要低得多,他们却主持着整个共和国、州、人民委员部,而且在1934年以前经常被称为"领袖"(地区范围的)。

那些地位更低的领导人主持着将工业化、集体化的"天才"计划付诸实施的工作,他们组织人民认购建立空中舰队的公债,举行集会和游行,参加剥夺富农的运动,填写光荣榜。其中许多人如果到了30年代末仍然健在,那就算是万幸了,而且他们肯定会再升上一个台阶的。空缺将会比比皆是。在斯大林专制时代,官阶表乃是恺撒主义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民主政治愈少,官就愈多。斯大林懂得,在人民中间、尤其是在农民中间,潜在的"沙皇"传统尚未绝迹。多少世纪的闭塞和愚昧不会不留下深深的痕迹,不会不留下一种认为任何一个统治者、尤其是身在首都的统治者无所不能的非理性信仰。在农民中间,这种迷信情绪的存在不仅同斯大林有直接关系,而且也同政权有关。

常常有普通人给斯大林写信。回信都是由他那个庞大的秘书处炮制的,秘书处责成地方机关帮助解决申诉人的要求。有时候斯大林也亲自提笔写几封回信。在总书记的档案中发现了几十份这些回信的复制件。以下是其中的一份:

列宁格勒。克利姆金全家。

亲爱的同志们!

因工作太忙未及时回信,请原谅。我已满足了你们在来信中所表达的愿望。债券业已寄出:其中100卢布交国际援助革命战士

协会中央委员会支配，300卢布交农村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发起者之一的霍皮奥尔专区“革命火焰”集体农庄支配。

应孩子们的要求寄去照片一张。

敬礼！

约·斯大林

1930年4月7日[91]

后来，每封这样的信都成了区、州、边疆区的广泛宣传运动的话题，成了“领袖平易近人和关心人民”的例证。

可以肯定，斯大林不仅对如今所说的管理问题十分注意，而且亲自过问“专制的技巧”。他曾仔细地研读B·沃罗夫斯基的《论专制制度的本质》、M·亚历山德罗夫的《俄国历史上的国家、官僚制度和专制制度》、Ю·卡兹明的《统治者的命运》以及其他类似的著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对历史文献的爱好并非毫无私心，也并非一般的“读者兴趣”。他是在寻求类比、“处方”，研究权力的“工艺”、权力的心理上的细微之处。例如，斯大林懂得，他在各种庆典、克里姆林宫的大型会议上的讲话能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产生很大的影响。在1935年一年间，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的铁路工人会议（7月30日）、种植甜菜的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会议（11月10日）上讲话，在先进联合收割机手会议（12月1日）上讲话，在接见塔吉克斯坦和土耳其斯坦的先进集体农庄庄员（12月4日）、接见拖拉机手（12月20日）时发表讲话，等等。每次这样的会议都在报刊上广为报道，在新闻纪录片中得到反映。然而，随着斯大林的声誉的提高，他得出结论：应当少讲话，少“在人民面前亮相”；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同样的比例，他同人们交往的重要性却可以提高。斯大林感到“隐居”、“隐蔽”更便于传播有关领袖的官方传说、神话和虚假的套话。

一个由独裁者统治人民长达数百年的国家，是不可能仅仅靠咒语便轻而易举地“摆脱”心理积淀的。需要时间。因此，斯大林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声誉，便特别重视培养人们“对领袖的信仰”，让大家“相信他关心人”、“相信他完全正确”。斯大林总是把他的一切错误、失误和罪过归之于“破坏活动”、“办事马虎”以及官员和地方领导人的“愚钝”，归之于这些人不理解或者歪曲了他的指示。这个方针是屡试不爽

的。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他“相信了”叶若夫和后来的贝利亚，认为斯大林“许多情况不了解”，他“不知道”镇压的规模有多大。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多年进行的精心策划的思想运动的余波。这种思想运动的实质表面上看来很简单，即：人民的一切胜利、成就和成绩的取得都是多亏了斯大林；一切过火行为、滥用职权、挫折失败之所以成为可能，都是因为不听他的话的缘故。



列宾所画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

斯大林在人民中间享有盛誉的原因，还在于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不高。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不过我想从下面这个角度再来阐发一下这个思想。列宁在晚年的一篇题为《论我国革命》的文章中写道，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需要创造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⑩]。这里我想强调指出这一文化中体现人民与政权的相互关系的那个方面。斯大林刚一感觉到（他在1927年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根据，到1934年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才算彻底地感觉到）自己可能成为“长期的”领袖，便马上开始最关心如何使这个象征变得对人们具有吸引力。有关强人、独裁者、“进步的”沙皇的影片、书籍和研究著作全都用上了。除了真正革命的艺术面外，逐渐推行着实际上将个别人物的作用绝对化的作品。斯大林曾就《伊凡雷帝》一片中伊凡雷帝应是什么样的形象问题亲自给谢·爱森斯坦和尼·契尔卡索夫出过主意。

应当说，“领袖”周围的人对提高斯大林的

伊凡四世(雷帝)
(1530–1584)
俄国政治家、统帅

俄国第一个沙皇(1547年起)。伊凡四世1530年生于科洛缅斯科耶镇，大贵族执政年代(1538–1548)在宫廷受教育。当时各集团激烈争权、倾轧和谋杀，对伊凡四世性格的形成及其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开始执政后，于1549年建立重臣会议。伊凡四世的政府竭力巩固专制政权，强化国家中央集权。他在1584年死于莫斯科。伊凡四世在位期间完成了俄罗斯国家中央集权的过程，确立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他为了达到国内政治目的，采取了残酷的斗争方法。

声誉特别卖力。用萨吕斯提乌斯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在以颂扬领袖来“博得青睐”。斯大林是个疑心较重的人,在每一不小心的手势、话语、想法中他都能看出“迹象”、意思和意图。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对于他的战友们为纪念他的60寿辰、70寿辰而撰写的墨守成规、内容空洞的赞扬性文章,斯大林都要仔细分析一番。对一大堆写到他的杂志和书籍,他都要独自地一一过目。他的虚荣心是没有止境的。不过他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加以掩饰,以保持所谓他“极其谦虚”的神话。当然,尽管标题各异,这些文章却十分雷同。例如,有人给莫洛托夫起草了题为《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的文章,而给米高扬起草的文章题为《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他周围的人知道“领袖”的这个特点,便“竞相”寻找作者认为可以更好地赞美“伟大领袖”的修饰语、崇高的比喻和历史上的类比。往往“吹捧者们”不仅缺少分寸感,而且缺少健全的理智。1939年,当时根除“人民的敌人”的血腥成果还没有进行总结,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德温斯基便撰文说他是个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和仁爱”的人。在他们写的《人类的导师和朋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斯大林是心里想着列宁的形象参加革命的。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列宁,甚至在潜心思索必须解决的问题时,他的手也机械地、下意识地在纸上写着:‘列宁……导师……朋友……。’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常常从他的桌上收走写满这些单词的纸页。”[⑬]

照两位作者的想法,这样的虚情假意主要不是要影响人们的头脑,而是要影响人们的感情。我从下述事实即可断定这纯属凭空捏造的虚情假意。在档案资料(约·维·斯大林全宗)中保存有各种各样的公文和文件,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至意义不大的便条。那里保存着斯大林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同时也有诸如“安德列耶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诸同志:该结束了。把讲话压缩一下。4点以前要结束全会。约·斯大林”之类的便条。档案资料中也有斯大林下意识地信手写上一些字的纸片,但其内容与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德温斯基所写的却大相径庭。例如,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正好手边有一本小册子《论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漫不经心地听着发言,同时一直心不在焉地用铅笔在封皮上画着,我抄录了如下的字样:

“斯大林。承认。导师。论右倾危险。论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穆哈拉特卡。非正式会议。东京。导师。索科利尼科夫。‘浪潮’工人出

版社。火。辩论。莫洛托夫。”[48]

根据20年代末的打字记录稿，只能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斯大林把全副精神都用在了斗争上，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德温斯基所谓斯大林“心里想着”列宁的说法（可惜！）并未在他信手写下的纸片上得到印证。尽管类似的暗号文字我还可以再引用不少。





斯大林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斯大林的声誉同时也成了一种社会自卫的变态形式。一个不愿使别人对自己生疑的人，在其公开讲话和谈话中，是不能在有关领袖的问题上稍有“闪失”的。任何哪怕是对“领袖”作用的间接“诽谤”，都会给不谨慎小心者带来悲惨的结局。社会学家A·费多罗夫曾对我讲起，40年代末在维捷布辛纳的一个拖拉机站出了这样一件事。人们在粉刷完办公室的房间后，正打算重新把领袖像挂到墙上。这时一位从外面进来的年轻拖拉机手无意中碰倒了靠在墙边的斯大林肖像，他在设法站稳时又一脚踩到了领袖的脸上。当时房间里有几个人。接下来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事后技师狠狠地批评了拖拉机手。至于后来事情是如何发展的，我不知道，不过据费多罗夫说，三天后小伙子被抓走了，直到党的二十大以后才放回。一位区报编辑部的女打字员在打“斯大林的目光”这一词组时出了差错，多打了一个字母“Д”（“ВЗДОР”*。）从此她再也没有出错的机会。她当即消失了。

* 俄语中“目光”应作“ВЗОР”，而“ВЗДОР”系“胡说”之意。

——译者

因此，如果从当时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声誉，那么在声誉这一无形的层次中，是经常存在着恐惧心理的。并非所有的人、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那些对镇压有所了解、自己的亲友身受其害的人，他们在颂扬斯

大林时,脑子里却装着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因此,“领袖”的声誉之得以维持,不仅靠人民所取得的一定成就,靠在对“最伟大的领袖”进行有利的宣传和愚弄公众意识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且靠人们(并非总是清楚地意识到)的这一理解,即:只要对他稍有微词甚至稍有怀疑,就可能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因此,“领袖”的声誉极高与告密之风极盛这二者同时并存就不是偶然的了。告密乃是政治中人人疑神疑鬼和间谍恐怖症大肆泛滥的必然后果。

如果认为我国每个公民都无一例外地狂热爱戴“领袖”,如果认为他在每个人心目中都必定享有盛誉,那自然是不对的。不可忘记,党内有一大批革命前入党的党员,这些人常常被称作“列宁的近卫军”。这些人并不是根据斯大林主持编写的《简明教程》来了解党的历史和党的各个领导人对十月革命的实际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至少是他们的大多数都是到相当晚了才听说斯大林这个人的,因为我们记得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时期,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始终不过是个二三流角色。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大林对老共产党员才抱有特别的“偏见”。斯大林明白,这些人就算不公开反对他,暗地里也不会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去评价他的。因此,具有革命经历的人们是他所不需要的。其结果尽人皆知:老“近卫军”遭到了最惨重的损失。

斯大林看到,尽管事业在前进,许多方面却很不如意。农业在原地踏步,尽管1936年,即悲剧的震中所在年份之前的那一年曾经获得丰收。国家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革命以后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却还在号召为了将来节衣缩食,虽然“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变得更快乐了”。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大见成效之处并不太多。如果他斯大林说破坏分子应对这些困难负责,难道人民会不相信么?何况所有这些人、这些过去的反对派分子都已声名狼藉。谁看不见国民经济中、在机关中确实存在破坏活动的事实呢。难道国外没有人打算利用过去的反对派分子吗?例如白俄报纸《俄罗斯言论报》就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不仅在党内有反对派,在军内也有反对派……

他的思路、往往也包括他公开的谈论,都让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以及青云直上的马林科夫立即捕捉到了……斯大林不是恺撒,他没有穿过胜利者的服装,也没有穿过阿尔巴皇帝的那种红色高筒靴。他的荣耀地位似乎还没有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达到过“人的极

限"。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往往裹着一件士兵大衣,他心里总是感觉到潜在的不怀好意者那无形的目光。惟有将他们统统消灭,才能切实地巩固他自己的地位。需要有一次大的行动。照斯大林的想法,对暗藏的不怀好意者、潜伏的敌人和反对派分子来一次集中打击,就可以使他的经济政策中的失败和失误得到开脱,就可以消灭他的潜在敌人。战后莫洛托夫曾补充说,斯大林在消灭敌人时高瞻远瞩:他所消灭的是那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可能站到希特勒一边去的人。

斯大林认为他所盼望已久的时机来到了。从今以后,谁也不可能侵犯他的恺撒式独裁,就连暗地里、内心里也不可能有这种念头了。一场悲剧即将发生。决定已经成熟而且最后形成了,其时他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索契,在那里可以安安心心地考虑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途径。斯大林虽然读了不少写暴君的书,却还有许多他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他手边有一本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描写提比略的专制制度的书,他就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他对阿谀逢迎极端嫌恶,他不准任何一个元老为了表示欢迎或为商量国事靠近他的轿子。当一位执政官为请求宽恕要朝他下跪时,他急忙闪开,因用力过猛竟摔倒在地。即使在交谈或者冗长的讲话中听到谗言,他也要打断说话人,责骂一通并马上纠正。凡是听到有人称他'皇帝陛下',他便当即声明以后再不许这样侮辱他。还有人称他的事情为'神圣的'事情,并且说自己是'秉承他的旨意'去找元老院的;他当即纠正此人的说法,要此人改口说'根据他的忠告'而不是说'秉承他的旨意',改口说'重要的'而不是说'神圣的'。"[35]比起提比略来,斯大林真是走得太远了!不过,其实"领袖"也不会看重这个,因为他是不会让斯维托尼乌斯的作品来搞乱自己的思想的……

1936年9月25日,他同日丹诺夫(此人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书记,并很快得到斯大林的信任)从索契给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为:

"我们认为让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绝对必要,而且刻不容缓。雅哥达确定无疑地表明,显然他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了四年。对此所有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委员均有所觉察。"

信号已经发出。这是个骇人听闻和极其可怕的信号。未必有人会

料到，此后我们祖国内揭露出了多少个“间谍”、“破坏分子”、“颠覆分子”、“恐怖分子”以至普通的“两面派”。甚至可以认为，并不是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而是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可我们却在唱：“……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不久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人们热烈地拥护国家的公诉。审判尚未举行，情况还不清楚，而报刊、电台就在一唱一和、有板有眼地叫嚷：“消灭坏蛋”、“处死敌人”、“对两面派决不手软”。斯大林感到他已经得到了许多东西：他从人民手中夺走了真理，使人民成了芸芸众生，如今只有靠他来替芸芸众生思考问题了。也许这是斯大林的罪过，而他的罪过已有了一大串，这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桩。

大家还记得，“领袖”早在1933年就预言“反革命分子”会“蠢蠢欲动”。果然不错！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以个人崇拜的反常现象来贬低人民，而是会发生更大更可怕的事情。悲剧即将临头。伤口将会十分可怕。如今已经多少年过去了，伤口却怎么也不能完全结疤……

委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为



第6章

悲剧的震中

一切都可以理解——决不意味着一切都可以原谅。

——埃·凯斯特纳

（德国作家）

新的一年——1937年来到了。在莫斯科,在其他城市,在辽阔国土成千上万的村庄,到处是新年节日期间常见的那种忙乱景象:在俱乐部和紧巴巴的住宅里装饰了新年枞树,孩子们贴上自制的花条,业余文娱小组进行最后彩排,当时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学校都有这种小组。男人们备下一两瓶“莫斯科牌白酒”;在大城市的商店里也可以买到“妇女饮用”的好葡萄酒。近一两年来,商店的货架上和橱窗里出现了比较丰富的食品,这不能不使顾客感到高兴。例如,1937年元旦《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短讯《节日采购》,在这篇短讯中报道说:“各种各样的葡萄酒,从苏联香槟酒到麝香葡萄酒,几百种香肠和鱼制品,大蛋糕,甜点心,水果——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人昨天在商店里大量采购的对象,‘美食家商店’、‘食品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的几千名代理人,都忙着把各种食品送到顾客家里,以满足顾客新年盛宴的需要……”

各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区委员会,都完成了年终“结账”:需要上报。而要告诉人民的是:在去年,哈尔科夫机床制造厂投入生产,卡马纸浆造纸联合工厂隆重剪彩,索利卡姆斯克制镁厂工程开始动工,亚美尼亚的科纳卡尔水电站开始工业送电,竣工投产的还有摩尔曼斯克渔业联合工厂以及几百个其他的大大小小的生产项目。数量指标(绝非质量指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需要报告斯大林。就连1936年刚刚组建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虽然许多指标没有完成计划,也给“领袖”送去报告:“国防工业将成为国家最好的工业部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柳比莫夫的报告使斯大林感到很高兴:不仅铁路运输,而且轻工业、地方工业、商业也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说话是算数的。正是遵照他的指示,通过了把1936年变为突击年的决定: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22%,消费品生产增长23%。遵照他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社论《提高人民福利的计划》,社论中指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生活变得更愉快”——“伟大领袖”的话从来是说到做到。[①]应该让所有的人

再一次看到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国家的脉搏急促而强劲地跳动着。许多年过去了,可是从十月革命这部发电机中获得动力的革命热情,我再说一次,丝毫未减。日子过得还很穷,穿着简单朴素。"突击"旬一个接一个,生产记录不断被打破,报纸上登满了劳动突击手的名字:阿·斯达汉诺夫、亚·布瑟金、叶·维诺格拉多娃、玛·维诺格拉多娃、M·杜卡诺夫、彼·克里沃诺斯、马·马宰、A·古尔格尼泽、C·哈恰特良、O·霍贾耶夫、尼·斯梅塔宁以及其他许多人。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清贫的、艰苦的,然而整个国家都专心致志于未来。

谈论具体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共同事业完全吞没了每一个人。强劲的主旋律不允许理直气壮地提出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问题。列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由于一整套既已形成的关系而被置于绝对依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和理性的境地。一切都必须奉献给"统治人物"的思想祭坛。请看193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社论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在这个"海洋"中,也有人举着一个不大的列宁像……

1937年最初几天的报纸,不仅报道了劳动人民的有时是十分紧张的气息,而且登载了关于来自国境线外的严重威胁的警告。米·科利佐夫发自西班牙的连续报道,法西斯分子击沉苏联"共青团"号轮船的详细经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授予工农红军一批指挥官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极端困难的特殊任务"的决议。谁都知道,这指的是"西班牙的"英雄们。

这里还有扬·鲁祖塔克(他后来只活了一年多一点)的警告性的文章:"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及其匪帮,通过暗害活动搞乱我们的经济,他们想借用这些人的手杀害我们的优秀人物,杀害我国的大脑和心脏——斯大林同志……"[2]

1936年12月初,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宣布扩大苏联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仰、言



“领袖”斯大林





193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

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

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在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的《论苏联宪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词句："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全场就长时间热烈欢呼。全场起立。场内到处高喊：'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乌拉！''万岁！''红色战线！''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③]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按照自己的习惯列举了种种"特点"，他把第五个特点叫作"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他报告到这个地方，可能想起了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处决了自己原来的同志和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某些资料证明，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民主"原则，曾向这两位原来党的领袖说：

"我们的信念不允许使老党员流血，不管认为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我们党的领导人既不会忘记自己的权利，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义务。在审判中你们应当帮助国家和党，审判所针对的不是你们，而是托洛茨基。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的需要……"[④]

斯大林很善于随风转舵。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签署逮捕和枪决名单、批准惨无人道的判决方案的是"一个"斯大林，而"另一个"斯大林却站在讲台上，挥动手臂，好像砍人头似的，斩钉截铁地说，新宪法草案"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⑤]然而这个人真的是想"保障"这些权利吗？起草宪法的那些人了解这一点吗？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有阿库洛夫、布勃诺夫、布哈林、加马尔尼克、克雷连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埃德曼、乌博列维奇、亚基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党的、军事的和社会的活动家。他们在制定那部口头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民权制度的国家基本法时还不知道，与宣布的权利和保障相反，他们很快就将被残酷无情地消灭掉。在由"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情况下，任何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们。斯大林早已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律之上，从而践踏了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在受到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压制的那一点点脆弱的民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已开始"推敲"为正在准备的"托洛茨基阴谋分子"案第二次公开审判起草的长达数小时的起诉词，也就是他在1937年1月28日激昂慷慨地发表的那篇起诉词。

千千万万的苏联人都为连续不断地向着国家经济和国防的强盛"持久跃进"而真诚地感到自豪,他们在新年夜晚互相祝福。可是他们想也不会想到,新的一年将是血腥的一年。谁能想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将成为苏联人民悲剧的震中,将成为社会无耻的顶峰。但是,"领袖"的无法解释的构想,"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可耻的罪恶实质,似乎正是服从于这一点的。

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人几乎过了20年才了解了这场悲剧,并且远不是完全了解。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对"法西斯败类"、"间谍"、"恐怖分子"表示愤怒、痛恨和谴责。就连亚·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波·巴甫连科、尼·吉洪诺夫、布·亚申斯基、列·尼库林这样一些人,也在《间谍和凶手》一文[6]中诅咒那些被迫在无耻和罪恶的演出中扮演角色的人。而这次演出的总导演再一次提醒人民:早在1933年1月我就说过,在一定条件下,"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7]。请看,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在取得成就的背景下,个别的事故、火灾和惨祸(确实发生过)当然都像是"暗害活动"。难道他斯大林不是说过,暗藏的原反对派分子、参加过其他政党的人都在伺机而动吗?我们的成就越大,他们的反抗就越强烈……这就是把斗争的弦绷紧到极限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快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题为《斯大林运河》的书。36名苏联作家在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领导下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公敌"改造成"人民之友"的试验大唱赞歌。他们写道,这是"把无产阶级……苏联公众原来的敌人……大批地变成工人阶级熟练的同事、甚至变成国家必要劳动献身者的一种非常成功的试验"。而且还写了这样的话:"……加工这种原料要比加工木料、石料、金属困难得多。"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那些"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友"的"原来的暗害分子"——工程师、教授、教师和几千名其他脑力劳动者(不仅仅是富农、小偷和惯犯)。许多人有罪只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与斯大林不同,而斯大林,作者们写道,具有"组织得很好的意志,大理论家的洞察力,天才当家人的勇气,真正革命家的直觉,他对人的复杂

的品质洞察秋毫，能在培养这些复杂品质中的优良品质的同时无情地反对那些妨碍前者发展到极高度的品质……”[8]但妨碍斯大林的不仅仅是某种品质。而且是人。是许多人。多得可怕。

所有这些“余孽”在妨碍他（潜在地）最终扮演成功惟一的、独占的、人人（正是人人）喜爱的领袖的角色。难道他忘记了布哈林、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许多人曾是他的党内同志和战友吗？不，当然没有忘记。但糟糕的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过，为了“崇高的目的”，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似乎是宗教裁判所编年史中美第奇的一句话：“有一条圣训——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没有任何圣训说要宽恕我们从前的朋友。”斯大林可以笑对这句格言的天真幼稚：他既不宽恕前者，也不宽恕后者。

“人民公敌”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残暴的事情。罗马皇帝、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阿格丽平娜（小）的儿子尼禄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残暴著称。甚至塞涅卡这位哲学家和高明的演员亲自教育尼禄，也始终未能使皇帝养成高尚的品德。这位统治者为了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不惜杀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亲，逼迫塞涅卡自尽。尼禄的统治终于同死刑——残暴的顶点不能分开了。罗马大火招来的是无辜的人们被处决。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阴谋，然后就开始杜撰一个个的假阴谋，以便消灭那些最孚众望的元老和危险的竞争对手。告密受到鼓励……尼禄在喜欢把暴行当作统治手段的同时，也热爱诗歌及其他艺术。

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历史类比，更不用说不无争议的类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都孕育着滥用职权直至制造暴行的危险。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并不仅仅对公元54—68年尼禄统治时期才正确。

任何正义的目的和意愿，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这种手段不仅按性质来说是道义上的祸害，而且就后果来说也是一种社会祸害。要知道，“我们的理想，”列宁坚信这一点，“不容许对人施行暴力。”[9]而在令人痛心的、作为悲剧写入我国历史的1937年，斯大林正是广泛地诉诸暴力。这是悲剧的震中，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迫害的面很大（显然，1929—1933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厚颜无耻登峰造极。而伟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时识破它。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政权的领袖

1791年，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1792年8月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市政府和国民公会，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抗击普奥的干涉军，1793年5月起义后，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颁布1793年宪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平息吉伦特派反革命叛乱，粉碎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1794年7月27日，发生了反革命“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死时只有36岁。

是谁使“人民公敌”这个可怕的名词流传开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当然，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企图找到斯大林用来广泛采用社会暴力的某种历史的、政治的、逻辑的根据。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提到过，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图鲁汉斯克。当时给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坚定性：他们在紧要关头设法通过了简化对“革命敌人”的审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赏罗伯斯庇尔的公式：“谁穿着金丝边裤子，谁就是所有长裤汉的敌人。”谁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谁就是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罗伯斯庇尔的书的。当时他就注意到罗伯斯庇尔1794年6月10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他认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每当自由看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祖国的敌人都在制订更加狂妄的阴谋。”

斯大林从历史上寻找的不仅是类比，而且是将来为自己辩解的论据。他很喜欢罗伯斯庇尔1794年2月5日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的意见：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正是由于罗伯斯

库通，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最高领导机构——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热月政变被送上断头台。

庇尔的坚持，作为对杀害马拉、夏利埃、勒佩莱斯蒂埃·德·圣法尔若和其他雅各宾党人的回答，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国民公会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对1563人作出判决，其中只有278人宣判无罪，其余的全被判处死刑！罗伯斯庇尔甚至把丹东、德莫林、菲利波等等这样的活动家也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罗伯斯庇尔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曾珍惜过被他送去处决的人的生命。苏联的独裁者总是对暗杀行为怕得要死。所以许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58条第8款——"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翻阅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会发现（如果相信当时的诉讼程序的话），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仅仅是想过如何除掉"领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斯大林不愿重犯法国大革命的错误。他的恐怖将是无情的！

虽然"人民公敌"这个名词从前就广为流传，但斯大林在1934年之后给它充实了"具体内容"。早在1936年7月29日党中央给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强调指出，人民公敌通常表现得"温顺而和蔼"，他们千方百计"偷偷爬进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处境越困难，他们就越将采用极端手段……"[10]

1951—1953年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阿·阿·叶皮谢夫向我讲道，贝利亚喜欢在会上强调一种他认为发明权属于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敌不仅指进行暗害活动的人，而且指怀疑党的路线正确的人。而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不愿多谈自己的叶皮谢夫让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迹的时光。

"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贝利亚的贼窝。我曾多次请求放我回去做党的工作，贝利亚恶狠狠地说：

"'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吗？那就随你的便吧……'

"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敖德萨，"对话人继续说，"重新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但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务局局长来找我，建议我从明天起留在家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随时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过、对某些事情有过怀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敌。幸运的机会奇迹般地救了我：就在这时贝利亚被捕了……""人民公敌"是"挑选"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的万能公式……

我想，叶皮谢夫的这个典型说法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可是，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很多。大多数人被控告只是由于“不适用”。由此可见，“人民公敌”这个表面上由“领袖”从法国大革命领导人那里借用来的斯大林概念，同那些领导人的理解毫无共同之处。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的罗伯斯庇尔把“占有不义之财的人和残暴的贵族”看做敌人。而斯大林，我再强调一次，则把所有那些即使只是**潜在地**可能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连不同想法，甚至被怀疑存在不同想法，都被认为是敌对行为。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个人专权，但是他感觉到，许多人特别是列宁的“老近卫军”中的许多人内心里不赞成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就有足够的理由使这位疑心重重而又残酷无情的独裁者逐步酝酿出可怕的决断。

斯大林借助于意识形态机构在国内一步一步地煽起怀疑气氛，使人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

绝大多数苏联人毫无保留地相信，现在是在同那些念念不忘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进行殊死斗争。早在1937年1月，各报就发表了标题五光十色的社论：《间谍和凶手》，《出卖祖国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恶棍中的大恶棍》，《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托洛茨基匪帮》……对社会意识进行赤裸裸的“按摩”产生了效果：人们了解了那些长期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的卑鄙行为，都义愤填膺。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能够使党、使人民相信他们生活在敌人中间呢？说间谍和暗害活动猖狂至极的根据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党中央1937年2至3月全会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回答。

全会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会上听取了不少报告。首先是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报告各个党组织对按照新选举制度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准备情况和改造党的政治工作情况。已经开始得到“领袖”特别赏识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一些似乎正确的意见。例如他强调指出，“新的选举制度标志着苏维埃组织的活动中更广泛得多的公开性”。他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状况问题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虽然“引人注目的是专政的文化工作”，镇压机关在今天也和在内战时期一样需要。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报告人继续说，“当我们的人在打瞌睡

和摇摇晃晃的时候，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而在党内，用日丹诺夫的话说，情况并不简单。党的队伍松松垮垮；党内有不少敌人。接着他说："增补委员这一有害的做法扎下了根，而且已经走得很远。增补委员的做法破坏了党员参加选举自己领导机关的合法权利。"

然后这位中央书记引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材料。一些区委和市委的执行委员会，增补的执委和候补执委达59%。例如在基辅，日丹诺夫说，1934年10月19日市委一下子增补了14名委员，其中包括原来是人民公敌的阿施拉费扬、杰尼斯、先琴科、托杰尔等等。在哈尔科夫市委，第四次全市党代表会议选出的159名委员和34名候补委员，只剩下了59人，增补了61人。而市委执行委员会除了一人以外全都是增补的委员。日丹诺夫说，在哈尔科夫市列宁区，1936年4月4日提出了关于"开除一大批人"的问题。还请来了积极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出席区委全会的是10人，而要开除的是12人！"于是10人吃掉12人！(**全会参加者中间有人发出笑声**)"日丹诺夫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11]。

这不仅仅是党内反民主倾向的征兆。党内形成了不法行为合法化、允许广泛采用强制办法的气氛。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已经为从解决问题的行政方法转到对潜在的敌人直接施行暴力的方法准备好精神气候。

到全会开幕时，"统治人物"已经进行过"战斗侦察"。我指的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迫害。当时人民支持他。这些活动家有碍于斯大林，他们虽然已被贬为小职员，但是了解斯大林的很多事情。例如，了解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时曾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了解他的许多阴谋，了解他伪造党的旧文件的事(例如，斯大林"组织"弗·索林和叶·斯塔索娃"写信"，提出有必要对1918年2月2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记录进行修改)[12]；了解伏龙芝生病和去世的神秘经过以及"领袖"从不提起的其他一些可疑的往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已经关起来了，但他渴望把他们送上西天。

1936年8月15日，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示又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还没有开始，起诉书还没有宣读，报纸和广播就已经异口同声地要求："处死败类"，"对敌人毫不留情"，"把人民公敌扔进历史垃圾堆"。斯大林报复起来是决不妥协的：他从前在政治局的这两位同事被判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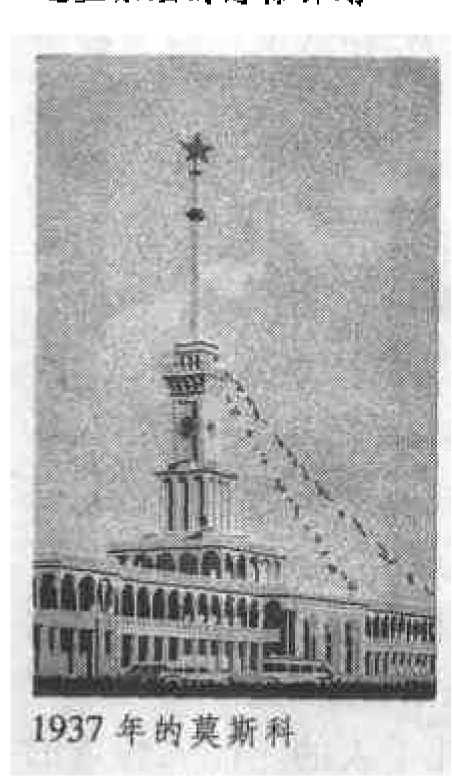
刑，执行枪决。他们最后的哀求——请求斯大林赦免的信——被置之不理。加米涅夫曾经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声称："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领袖"希望加米涅夫的声明同他本人一起死去。季诺维也夫曾说斯大林"……没有良心的血腥的奥塞梯人……""领袖"希望季诺维也夫的话同他本人一起去见上帝。历史上有许多秘密。但是连斯大林也不能够、不应当指望秘密永远不被揭露。是的，两人都曾经是"反对派"。两人都曾经为政权、为自己的发展道路观进行过斗争。常常摇摆，不坚定。但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斯大林不喜欢仅仅做到敌人已无能为害这样一个"层次"。因此，随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成千上万他"拒绝给以信任"的人一起，他们的亲属也被消灭或流放了。例如，继加米涅夫之后死去的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一个兄弟和他的妻子……斯大林不仅砍倒了大树，而且也挖掉了周围的灌木丛。在1937年，这已经变成了昼夜不停的"人砍伐"。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2至3月全会上的报告实际上只讲了一个问题——"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动、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报告没有合情合理地分析情况，把情况真正弄清，原因很简单：讨论的对象本身是幻影，是假象。讲了许多大话和咒语。同时还报告了今天听来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的初步"结果"。

莫洛托夫在报告中首先声明，他是代替奥尔忠尼启则作报告的。2月18日，在全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了。政府的公告说，他死于心脏麻痹。据认识奥尔忠尼启则亲属的一些人证明，他对乱抓间谍和乱找敌人的做法极感痛心。他曾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和激烈的谈话。但作为回答，斯大林却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的对奥尔忠尼启则本人的密告送给他，并且明白无误地暗示，"无风不起浪"。奥尔忠尼启则一定很明白，"领袖"要求他完全顺从，否则他就会像别人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场。此外，斯大林还委托奥尔忠尼启则在全会上作《关于重工业中的暗害活动》的报告。奥尔忠尼启则必须亲手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必须直接参与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恣意妄为。奥尔忠尼启则就以在当时情况下大概是惟一适当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利用了自己在心灵上得到解脱的



奥尔忠尼启则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以自杀作为抗议全会要批准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的恐怖计划



1937年的莫斯科

机会。在作出悲剧性决断的当天,叶若夫手下的人曾把审讯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里亚的记录交给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的其他几名亲属也被逮捕。可以不折不扣地说,是有人逼他走绝路。而奥尔忠尼启则也就走了绝路。

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住所,命令把"根据充分的"自杀说法印出来。据亲属证明,死者曾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看来,信的内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领袖"整掉了奥尔忠尼启则,就又收拾了一个自己身边不赞成恐怖方针的人。(把人推人死神怀抱,然后抬棺或捧着骨灰盒送葬,致悼词,慰问亲属,这已经成了斯大林常干的事。)

由于为人民委员举行葬礼,不得不把全会改期。对斯大林来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不喜欢动摇的人。而奥尔忠尼启则在意识到全会要批准整个恐怖计划之后,不但发生了动摇,而且以自杀表示了抗议。其实,在那几年这样做的还有其他许多人——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萨比宁、柳布琴科……

莫洛托夫的报告满篇都是数字,满篇都是钻人重工业的"人民公敌"的名字:阿里斯托夫、盖杰罗夫、别尔曼、诺尔金、卡尔采夫、阿尔库斯、亚佐夫斯基赫、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几十名领导人。用莫洛托夫的话说,领导这整个"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代理人沙巴什*"的是皮达可夫。莫洛托夫不仅力求说明国民经济领域中"暗害活动"在增加,而且力求说明在大力同暗害活动进行斗争,他引用了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截至1937年3月1日一些人民委员部机关中被判刑的人数:

* 沙巴什,中世纪迷信传说中的巫婆夜间集会。——译者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585人

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

交通人民委员部——137人

农业人民委员部——102人……[13]

一共讲了21个政府部门。莫洛托夫向全会报告时，始终强调所有这些暗害分子都是按照“托洛茨基总部”的指示行动的。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暗害活动的“战略”就是托洛茨基的口号：“在敏感的地方进行最沉重的打击。”

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动的事实，也许真的有过暗害活动的事实，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应当知道，在大规模设计、建设和投产新工业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情况下，常常是仓促上阵，采用“骑兵奇袭”的方法。由于技术设备差、生产和工艺文化低、纪律松弛、不懂行，难免发生事故、车祸、火灾和废品。然而这一切全都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阴谋活动”的结果。

卡冈诺维奇的报告也贯串着这种精神，他“阐述”了铁路运输部门暗害活动的教训。这里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挠采用“ФД”型机车，不允许“超过定额”（可是只要无视“极限论者”的意见，违反了定额，就发生事故和灾难），对抗斯达汉诺夫运动，破坏运输计划。卡冈诺维奇也开了一个很长的暗害分子—领导人名单：库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尔希欣、贝克尔、克龙茨、布列乌斯、巴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为了不落后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报告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没有闲聊天”，没有浪费时间，已开始“捕捉”敌人。我已经引用过卡冈诺维奇的“统计数字”。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揭发”和从运输业中“开除”（卡冈诺维奇的说法）那几千人的。使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公敌”，如原来的宪兵、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白卫军官、破坏分子和间谍，竟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铁路上来了！

叶若夫通过自己的报告更进一步渲染了似乎“敌人”无所不在的气氛。他的可怕的统计数字（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去引用）给人造成一种许多敌对组织在全国各地到处肆虐的阴森可怕的印象。

叶若夫，这个精神和肉体的侏儒，在全会开幕前夕获得了国家安

全总委员头衔。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被授过这种头衔。后来只有贝利亚得到过这种头衔。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报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开教唆和鼓励人们开展一个告发“内部敌人”的运动。叶若夫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经济工作者和领导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对某某人有怀疑，那里情况不妙，请管管这个人吧。’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更多的倒是当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反而企图保护这些人。”[14]

在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专门决定中重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敌斗争中至少耽误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应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进行血腥的清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便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15]。然而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那些凭侦探的直观作出的统计，与其说要使思维健全的全会参加者相信到处都存在暗害活动，不如说要使他们感到恐惧。需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论证。前面的报告人描绘了敌人进行活动的“景观”，而他们的实质、“本性”和猖獗的原因并不清楚。现在只能猜测，全会的参加者当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受：“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三年，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个年头，几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摆脱了”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决定采用非常措施。


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作为雅哥达的继任，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被杀害的苏联军官达三万五千多名。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数的一半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领袖”提出了这个纲领。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对“敌人”采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这项工作。需要把人们“发动起来”去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他也解决了这个任务。斯大林作了报告。根据报告措词的严谨、结构的缜密，根据他的结束语和他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重视

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连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么巨大,这种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斯大林报告的题目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从斯大林以清晰的笔迹作出的大量着重号、边注和补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么精心地准备这篇报告的。他没有"屈尊"去对敌对的工作人员进行细微的"挑拣",这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热心去干的事情。主要报告人把一切都一项一项分开。斯大林首先说明了"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现象,然后讲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后果。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来自帝国主义的危险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经常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把这种危险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说成是"一伙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布置进行活动的"。实际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了影响深远的、令人不安的理论结论: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使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16]

在20年代末和1934—1936年的一些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理论。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反常的,按内容来说是不科学的。然而斯大林是实用主义者。他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准备中的大清洗过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围的人谁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需要这样做。"领袖"早就习惯于用他所有的理论推测来为党的政治方针辩护。一方面,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断言,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现在,过了三年多,他忽然又来证明斗争在"尖锐化"。斯大林在全会上强调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从前的反对派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等待时机。斯大林列出了妨碍党最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

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

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3月5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32]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

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27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谴责忽视宣传战线的实践;

——谴责把全会变为炫耀成绩的手段的实践;

——谴责增补委员而把选举变成空洞形式的实践;

——谴责按劳动组合制分配党的力量的实践;

——谴责对党员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实践等等[33]。

骤然看来,很难不同意斯大林公设的主要内容,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宣告实际上没有对"党员个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影响,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坏联共(布)生活民主基础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通过这个要求"谴责漠不关心"的决议之前两天,已经决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而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了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间谍"和"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党内同志)的判决。经常言行不一已经成了斯大林的习惯。供大范围"使用"的东西,通常看起来都比较体面、民主、合情合理。用于小范围的东西,则严格保密。双重道德,双重标准,双重态度,在斯大林周围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这一点,从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运的过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

在赞同强化反“托洛茨基派间谍和恐怖分子”的斗争方针的1937年2至3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会开幕的时候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了起草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扬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施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亚基尔、贝利亚、埃赫、巴吉罗夫、布琼尼、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共36人）[19]。

布哈林为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准备了一封详细的、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绝承认对他的全部控告。这位失宠的理论家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企图使“领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敌”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证词”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间谍及其他类似活动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转盘”（当时他家里还保留着电话机）给斯大林打通了两三次电话。斯大林安慰他说：“尼古拉，不必慌张。我们会弄清的……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但既然索柯里尼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和其他承认了暗害活动的两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气和地弄清楚……你放心！”

“怎么竟能认为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呢！”布哈林脱口而出。

“沉住气，尼古拉、沉住气。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听筒。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动，并且帮助了这些活动。布哈林绝望了；李可夫比较冷静，他知道他们肯定会得到不久前被枪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皮达可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样的下场。只要是政治审判案，这样的帽子就会满天飞。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这种荒谬绝伦的控告。

2月26日晚和2月27日晨，波斯克列贝舍夫给布哈林来电话说，他和李可夫必须参加已经在进行的全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已经不是中央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们参加了）。除了乌博

列维奇和阿库洛夫,谁也没有同他们握手。全会设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员会的会议开始了。叶若夫还没有开始报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说:

"布哈林宣布绝食了。尼古拉,你向谁发出最后通牒呢?向中央委员会吗?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可是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

"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像过去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布哈林没有坚持住。他从斯大林的话中感到还有一线希望。不过他立即明白了,审理他的"案件"的根据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而他的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完全被说成是企图"欺骗党"。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对着的这堵墙不单纯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预谋的敌意,当时他是什么感受,现在只能猜测。委员会成员手中的材料所依据的是通过不能容许的方法从已经被判刑的人那里取得的"证据"和"供词"。

委员会主席米高扬要布哈林坦白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猛然站起来回答说:

"我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自我诽谤。"

"你们不承认,"莫洛托夫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他说,"就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写道,我们的审判是挑衅。把你们逮起来,你们就招认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人在借用党的威信恣意妄为。"布哈林继续说。

"好吧,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斯大林插进来说,"你等着瞧吧……"

完全了解伪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是敌人。斯大林感到看过布哈林书面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动摇,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来结束讨论。叶若夫建议:"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和党内开除出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枪决。"开始对叶若夫的建议进行记名表决。但是第一个表态的波斯特舍夫说,他"赞成开除和送交法庭审判,但不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

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也夫、施基里亚托夫——“赞成开除和审判，不枪决”……

斯大林看到已经不可能作出一致决定，于是像往常一样，老谋深算，走了一步独出心裁的棋。

“我建议，”他说，“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不送交法庭审判，而把这个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

斯大林知道，这同荒谬绝伦和无法无天的“开除、审判、枪决”毫无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调解人甚至是“人道主义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议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发了一线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结以后，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表态就容易了：

“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这样说的有克鲁普斯卡娅、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尔、彼得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像波斯特舍夫一样，赞成“审判，不枪决”。但是历史也不会忘记，科萨列夫和亚基尔这两位紧接着就成了不法行为牺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议后仍然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我们看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审判之前就宣布了判决；其他人讲了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似乎并未预先注定可怕的结局。主持委员会会议的米高扬没有公开表态。经过逐个征求意见，决定再一次进行表决。现在已经是一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1)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2)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个有论据的决议案。

委员会主席阿·米高扬

1937年2月27日[20]

斯大林明白，还需要再准备一次审判案。其结果如何，“领袖”是很清楚的。

会议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刚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逮捕了。从此开始了长达13个月的时期，直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悲剧终场，而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潜在地反对“领袖”个人专权的人。

需要补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的决议。它实际上成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会不单单赞成斯大林关于当前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而且上了一堂课，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决议包括三条。其简要内容如下：

(1)根据侦讯材料，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总部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暗害活动，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从而也助长了这一罪恶活动。

(2)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和对质，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斯列普科夫、莱伊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斗争，反而鼓励他们。

(3)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按内容来说是诽谤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图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供词。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就进行过反对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李可夫也是这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本书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②]。

这里已经不再称每个人为“同志”，也不再称他们为“两同志”。

但是斯大林还不能立刻收拾掉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和党太了解他们了。需要一次审判案，而要使被告“成熟”到能进行审判，还需要时间。

斯大林是非凡的政治导演和剧作家。莎士比亚曾通过哈姆莱特的口说："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他不一样，在他身上没有两难推理。他的可怕的政治性格的这个特点是需要强调指出的，因为哈姆莱特的两难推理只涉及哈姆莱特，而斯大林是在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领袖"的胜利变成了人民的可怕的悲剧。

中央全会的决定变成了强大的推动因素。还在1937年3月份，各共和国和各州就举行了党委全体会议。会上不仅传达了"领袖"的指示，而且报告了执行这些指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下面是日丹诺夫1937年3月15日在列宁格勒作的报告中的几段话：

"布哈林和李可夫原来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毫无区别。这是同一帮强盗。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行为无耻、卑鄙、丑恶得无以复加。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想从他们口中听到真话。可是他们丝毫不以人的态度对待党，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只是一味说我们无权审判他们。"接着日丹诺夫竟然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员面前把布哈林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说，布哈林绝食是演戏："夜里12点吃得饱饱的，到上午10点就宣布绝食……"[22]

日丹诺夫还必须讲讲在列宁格勒展开的揭露"敌人"的"工作"："在基洛夫铁路线和十月革命铁路线发现了8个暗害集团；在市内各工厂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军区和党的机关发现了10个集团……"在很短时间内，在所有的区委都发现了"敌人的巢穴"：维堡区——13人，瓦西里耶夫岛区——12人，基洛夫区12人……共计223名党的工作者。"请想一想党的机关是多么不纯！"

日丹诺夫继续用激烈的言辞渲染敌人在这个城市——革命摇篮肆虐的情景。"红色教授学院1933年到1936年有183名毕业生。其中32人已被逮捕。现在留在列宁格勒的130人中，3人被发现是人民公敌"，[23]这位斯大林的恐怖理论家和恐怖实践家在全场一片愤怒声中继续说道。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怒吼声。相反，由于恐惧，人们的困惑和痛苦却只能强忍在心，不敢流露出来。

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却依然存在。彼尔姆的80高龄老战士K·A·库热拉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几乎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自己年轻的时候呆在遥远的科雷马劳改营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吓醒……"

政治"审判案"闹剧

根据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后的审判"。艺术家们在圣像画《最后审判》的画面上，描绘了人们为尘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种种惩罚。强盗——上绞架，贪财的人——把滚烫的金水灌进喉咙，放荡的男人和淫荡的女人——下火焰地狱，不关心同类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狱。这些老圣像画匠也描绘了一个张皇失措的人，他张开两臂，不知往哪里走，因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却作孽多端。诽谤者因为恶语伤人吊在绞架上。在这些圣经画上也能看到残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虫"贪婪地咀嚼他们的肉。但是，看了这些老画匠的创作仍然难以理解，这些不正直的法官践踏最神圣的东西——正义时，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对于镇压原来的和潜在的"反对派"的不正直的法官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政治审判案的总导演知道他想要什么。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绝不拒绝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虽然他从来也不承认这一点。请注意，在他的图书馆里实际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很喜欢。特别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托洛茨基在这里写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阶级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发动武装起义，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当它（革命的阶级。——本书作者注）遇到武装阴谋、暗杀和叛乱时，它就要对敌人进行严厉镇压。镇压的形式或程度问题当然不是'原则'问题。用恐怖手段对付不愿退出舞台的反动阶级，可能十分有效。恫吓是强大的政治手段……"[20]当然，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15年前就已经讲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这些处方，但把它们用在了按他的话说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的时期。毫无疑问，斯大林在国内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的时候也把大规模镇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诺夫正是这样解释斯大林在2至3月全会上的报告的主旨的：

"镇压有教育作用。"[25]当然,有人会问:"镇压的含义是什么?至于斯大林怎样理解镇压的实质,这未必还有疑问。说到这里,我想离题说上几句。

我的著作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来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读者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把斯大林的镇压放到"括号外面"。他们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动,分析他的"功绩"和"建树",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镇压,即使提到也不过是把责任推到叶若夫和贝利亚等人身上。这就发生了传记中的一种独特的"脱层"现象:只承认这些人相信的事情。当我阅读"由于"斯大林面牺牲、而无辜牺牲的几千人的案卷时,我仿佛听到了他们从早已逝去的过去发出的呼声:永久的困惑、万分的忧郁、绝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让这些企图为暴君辩护的人看看这些案卷。镇压——个人独裁专权的极端表现——是登峰造极的不道德行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恶毒又狡诈,他需要在党、人民和历史面前提出"开脱自己的"论据。他本来没有这种论据。他就伪造、杜撰论据,特别是借助于政治审判案。在幕后导演这些审判案的斯大林,追求着他心中明白的目的。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之后,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所谓"17人"审判案。在这个案件中,除了皮达可夫这个被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还有16名被告。审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托洛茨基借助于这些人组织了暗害活动,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审判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以至具有坚强意志的皮达可夫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说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们可能掌权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战争以前掌权的可能性,第二个方案是在战争期间掌权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设想,据他说,通过恐怖主义的集中打击来实现第一个方案。他指的是同时对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当然首先是对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助手,采取恐怖行动。第二个方案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最大,这就是军事上的失败……"[26]接下去所讲的全都是这种调子。斯大林制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法是纠缠和欺骗;制服皮达可夫和他的"同案人"的方法则是刑讯。

还有一场演出,即所谓"21人"审判案,尤其令人痛心。在这个案件

中准备镇压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斯大林暴行的其他受难者。

斯大林想借助于这些审判案对托洛茨基原来的（主要是原来的）拥护者进行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谴责他们是进行"间谍、恐怖、杀人、放火活动"的"一伙暗害分子组成的寡廉鲜耻的匪帮"。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靶子。同托洛茨基的"决斗"还在继续。决斗不能不分胜负。难怪在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案件的起诉书中，几页纸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出现了51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他们的难友案件的起诉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总是从墨西哥暗示说，是的，"审判的是他的同道者，然而是因思想而审判的"。例如，托洛茨基几乎在他的刊物《反对派公报》的每一期上都一定要登些有关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罗森霍尔茨的东西，指出他们同斯大林"不能相容"，强调他支持他们。这位流亡者几乎是定期地发表声明，"抗议"迫害自己的"拥护者"。托洛茨基对"人民公敌"进行的所有这些辩护对斯大林来说正中下怀，给他提供了补充的"论据"。

斯大林感到战争在临近。他总有一种感觉，他在用托洛茨基的眼光观察外部世界。我再说一遍，连"领袖"自己也害怕承认这一点。他一看托洛茨基写的东西，就感到托洛茨基"说倒霉话"不是无缘无故的。托洛茨基在那篇《被出卖的革命》中写道："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临近的大战中不遭到失败吗？对公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公开地回答说：如果战争仅仅是战争，那么苏联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要强大得多……"[②]这听起来不仅像是对社会主义的判决，而且也是对他斯大林本人的判决。然而，他不愧为钢铁般的人：不能就这样了事。现在，在战争爆发之前，需要赶快把一切潜在的法西斯帮凶收拾掉！否则希特勒打进来，他会在这里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上台，斯大林这样想。我们将对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现在就把可能出现的"第五纵队"干掉。希特勒和托洛茨基在这里将找不到可依靠的力量……斯大林的思路可能就是这样，而且据Ф·丘耶夫证明，莫洛托夫去世前不久曾经证实，战争前夕斯大林的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各种可能的吉斯林分子和赖伐尔分子的社会基础。

尽管达到了普遍的高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全社会在领

袖至上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严重的错误和失败却十分之多。工业中存在许多缺点,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这都需要作出解释。对斯大林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归咎于"暗害和破坏活动"。顺从的执行者们准确地捕捉到"领袖"所指出的阶级敌人的线索,然后在每日的汇报中报告情况。请看摘自1937年10月19日汇报中的一小段:

> 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 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 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
>
> 在乌拉尔的塔博雷村,五人因破坏集体农庄被判枪决(其中有塔博雷区执委会主席A·Л·莫特列夫、区地政处主席H·Л·梅沙夫金)。
>
> 明斯克。五人因故意弄脏面粉被枪决(其中有采办处主任P·Л·丘德诺夫斯基、粮食采购站主任B·M·列夫琴科、大粮仓经理B·H·卡普兰斯基)。
>
> 萨拉托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集团把大量石油倒进伏尔加河。九人被判处枪决,其中有:石油工业总局萨拉托夫办事处主任M·H·波拉特金、裂化厂厂长B·Φ·波格丹诺夫、萨拉托夫大学教授H·A·奥尔洛夫。
>
> 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地区动力管理局系统,有人受盖世太保特务指使经常制造使工人致残的破坏事故。十人被判处枪决……[28]

类似的事情列了一大串。汇报的末尾,在"B·乌尔里希"的签名前面,有简短的附注:"所有判决均已执行。"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汇报的角上,常常写着字迹潦草的几个字:"已报告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

在1937年1月和6月、1938年3月举行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案之后,这种大规模的悲剧在1937—1938年已经是司空见惯。斯大林相信,现在人人都清楚谁在阻碍更迅速的前进,谁在"出卖"祖国,谁在准备"暗杀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谁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莫斯科的

几次政治审判案,成了在全国施行暴力、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的某种导火线。这种恐怖活动的对象,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潜在的敌人,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些纯属偶然碰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发生了火灾、爆炸、倒塌和其他各种事故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1937年末,一些地方的镇压规模看来失去了控制。在许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政府机关,告密成了求生存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得到他周围一班人赞同的第一批重大政治审判案所造成的后果。

"领袖"在批准杀人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那样冷若冰霜和残酷无情,简直令人吃惊。给他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有时是个别人,有时是一批人,有时是很长的名单。在斯大林的档案中只发现了一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领袖"发了善心的文件。

> 约·维·斯大林同志:
>
> 1936年1月18日被判处剥夺自由十年的A·C·库克林的妻子向检察长提出请求。库克林现被关在布特尔监狱。经今年1月7日医生确诊,库克林患食道癌。病情严重,无可挽救。
>
> 请予指示。
>
> **安·维辛斯基**
>
> 1936年3月22日

下面记载了决定:"斯大林同志指示乌尔里希同志提前予以释放。**安·维辛斯基**"[29]

也许1936年斯大林还'没有成熟"?我不这样认为——当事情关系到斯大林十分了解的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手发软,思想发生波动。他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从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原来的助手阿·纳扎列江;列宁原来的秘书尼·哥尔布诺夫;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的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泰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领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C·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原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列·卡拉汉;同他有过友谊关系的肃反工作员雅·阿格拉诺夫;内战时期同他一起执行过列宁委托的安·布勃诺夫;被"领袖"本人称赞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约·瓦雷

基斯……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他翻阅被判刑或被逮捕的长长的名单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本人了解这些人。关于其中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说点什么，想起点什么，讲点看法。不止一次到他办公室来过的州委书记有：约·瓦雷基斯、伊·卡巴科夫、彼·斯莫罗金、波·舍博尔达也夫、爱·普拉姆奈克、Я·索伊费尔、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别·卡尔梅柯夫、K·哈夫金……不仅他很了解而且各个共和国也了解的党的工作者有：尼·吉卡洛、苏·埃芬季也夫、M·库利也夫、M·纳里马诺夫、Г·苏丹诺夫、M·卡希阿尼、涅·拉科巴、阿·汉姜、C·努尔佩耶索夫、阿·伊克拉莫夫、费·霍贾也夫……一批学者，其中许多人同他还有过个人接触：尤·斯捷克洛夫、B·索林、M·福尔希克、伊·卢波尔、阿·加斯捷夫、尼·瓦维洛夫、格·纳德松、亚·斯韦钦……在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名单中也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鲍·皮利尼亚克、布·亚申斯基、奥·曼德尔施塔姆、阿·韦肖雷、尼·克柳耶夫、亚·亚申斯基、叶·恰连茨、Ю·陶宾、吉·塔比泽、萨·谢伊福林……当他看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名单时，他好像听到了正在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中的喧哗声，看到了库恩·贝拉、帕·拉品斯基、Ф·塔博尔、阿·瓦尔斯基、Я·安维尔特、扬·伦茨曼尼斯、O·里亚斯塔斯、Ф·博什科维奇、Ф·舒利特克、P·希塔罗夫等人的面孔。而极长的军人名单——所有这些姓名都是多么熟悉啊！成千上万的姓名……成千上万的生灵，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遭遇、希望、痛苦和激情。他们都颂扬过他，随时准备执行他的任何决定。其中许多人还来得及给他斯大林写了最后的信，他也看了许多这样的信……但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了。这个具有钢铁姓名的人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什么是同志情和荣誉感。他好像把良心也看作“怪物”，至少良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妨碍”他。他只要用铅笔在名单的一角写上个把字或者只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随口说一声“同意”，那就全都解决了。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在今明两天永远消失。此后不久，就由维辛斯基、乌尔里希同叶若夫一起直接操纵惩罚机器，他只需要知道一下可怕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不过他从童年起就有一副坚强的神经。

有材料说，斯大林曾在审判前夕几次会见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在斯大林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同这两位“司法祭司”谈话的痕迹，不过可以设想，这种谈话带有下指示的性质。集团军军事法官乌尔里希



安·维辛斯基
(1883-1954)

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

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1年起在司法部工作,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苏联副检察长、检察长,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外交部长,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述甚多,主要有《刑事诉讼教程》、《苏联法院组织》、《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国际法和国际政策问题》等。维辛斯基在1933至1938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

不知什么地方被斯大林看中了。可能是他讲话简练,他1937—1938年大量送给斯大斯的关于血腥收获的报告严谨扼要。"领袖"对这些报告的反应如何,现在只能猜测。在一些报告上有"H.CT."的署名,在另一些报告上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花字母。这些人就好像在登记成千上万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名单。但死亡失踪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许多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报告涌来的起初像潮水,后来简直像狂涛巨浪,任何人看了都会神经错乱,彻底垮掉。但是,即使在镇压最猖獗的时候,斯大林也照样去戏院,看夜间电影,接待人民委员,审订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举行午夜宴会,口授复信稿,就《真理报》或《布尔什维克》杂志某篇文章发表意见。即使假定斯大林无保留地相信恐怖活动所屠杀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敌",那也只能使人们对他的绝对的麻木不仁和残酷无情感到万分惊讶。

乌尔里希很符合斯大林关于法官的概念:法官是不能多愁善感的。斯大林看到,这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在签署几十份、几百份死刑判决书时,能够绝对保持沉着和镇静。这是斩首机上的一个活部件。

维辛斯基的外貌有所不同,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检察长1938年3月11日在布哈林审判案中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看

来给“领袖”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 我们全国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点：把那些将我们祖国出卖给敌人的叛徒和间谍，像对待恶狗一样，执行枪决！
>
> 我国人民的要求只有一点：处死这些该死的败类！
>
> 时光将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上将长满杂草和野蓬，他们将永远受到诚实的苏联人、全体苏联人民的鄙视。
>
> 而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30]

“领袖和导师”喜欢忠诚。随后维辛斯基当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当了外交部长，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斯大林特别重视的其他奖章。

1949—1953年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以其特别冗长的、毫不妥协的演说而载入外交史册。是的，那是“冷战”时期，然而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和安理会的成员知道这位外交家院士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他在这里不能像在政治审判案中那样信口开河，说什么“发臭的尸体”、“卑鄙的蟊贼”、“该死的败类”。但是，人们也都记着他那一大堆外交上的骂人话：“放荡的先生”、“下流的诽谤者”、“疯子”……他和从前一样恬不知耻。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在联合国第四次大会上维辛斯基发言20次，在第五次大会上发言26次，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22次。据外国的外交官证明，检察官的能言善辩只是引起听众的“好奇心和极大的反感”。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维辛斯基对委托他的演出的政治闹剧的意义，了解得不比审判案总导演差。在1938年3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政治审判中，公开愚弄舆论达到了顶点。罪名还是老一套：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搞间谍和破坏活动，准备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肢解国家，图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

为了保证政治审判演出成功，进行了长时间的“排练”。例如，布哈

林审判案准备了一年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摧毁被告人的意志。侦查员们拥有广泛的暴力手段来逼取必要的口供。但把这样的口供当作主要的罪证是违背基本准则的。一些人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其他人很快就屈服了。然后就进行侮辱性的"排练"。真的是排练!他们逼迫已经屈服的人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们"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是的,有时也出现暂时的"故障"。

例如,1938年3月2日法庭书记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中说,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于1921年同德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背叛性联系",同塞克特将军和哈克将军约定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德方每年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提供25万马克。当法庭庭长询问被告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克列斯廷斯基不顾原来的供词开始全部加以否认。审判厅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慌乱。宣布暂时休庭。把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这个坏蛋收拾得不够。"并且暗示:他今后不愿再听到类似情况。采取了"措施"。到第二天晚上克列斯廷斯基就已经"正常"了。

克列斯廷斯基: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

维辛斯基:那你昨天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中的挑衅。

克列斯廷斯基:昨天,被告席的气氛和从宣读起诉书中产生的、由于我的病态心理而加深的沉重印象,引起了一时的强烈的虚幻羞愧感,在这种情况影响下我不能讲真话,不能说我有罪。

维辛斯基:是无意识的吗?

克列斯廷斯基:我请求法庭记下我的声明,对于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最严重的控诉,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并承认自己对我所干的背叛和变节行为完全负责……[30]

除了几次类似的小"故障"以外,这次审判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被告都同意公诉人的起诉,一致承认骇人听闻的指控,并且心甘情愿地补充说明自己"罪行"的任何细节:法庭和被告表现了罕见的合作精神!没有任何人进行任何反驳……全都是自己控诉自己!

不过,并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虽然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有时通过直接的或隐喻的形式,有时也通过悲



1938年,"党的宠儿"布哈林受审

剧式的讽刺形式,试图使人们对于指控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也许,布哈林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放眼于未来,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我们今天。这里只引用布哈林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证明他在最悲惨的时刻仍然保持着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

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说道:

"我认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应对暗害活动负责,虽然我个人并不记得我曾发过进行暗害活动的指示……"

"检察官公民断言,我同李可夫一样,也是间谍活动的一个最大的组织者。有什么证据呢?有沙兰科维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读起诉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

"我坚决否认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关系。据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决定被暗杀的。我不知道这件事……"

"赤裸裸的斗争逻辑,伴之以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32]

布哈林最后发言中的这段话很值得注意。这已经不是认罪,简直是对审判案组织者的控诉。这些人遵循着"赤裸裸的斗争逻辑",既造成了思想的堕落,也造成了人的堕落。非常明显,这是间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尽可能地利用揭示内心认识的最后一次机会……

关于审案过程,每天由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详细报告。斯大林补充细节,提出建议。审判案的新闻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给他看,根据他的指示,报刊和广播对"演出"广泛进行报道。请来了外国记者,甚至请来了外交官。罪犯们有那样高的"觉悟",人人都感到吃惊!根本不需要技术鉴定、补充调查、法庭争辩、检察官和辩护人对话。在审判中,由检察官一人独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声为

他伴奏。连福伊希特万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倾向性的《1937年的莫斯科》一书中承认，"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互相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而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术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33]。德国作家的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场闹剧的组织者们，特别是总导演，都是卓越的无耻之徒。

除了在侦讯期间粗暴地破坏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来顺受、毫无怨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用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向他们劝说：他们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只有"认罪才能帮助彻底揭露罪犯"。这就是说：需要"自己认罪"并诽谤别人……既然进行审判的是人民和国家，那么人民和国家要什么就应当讲什么……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这个理由显然支配了许多的行动。在最后的发言中，这个理由表现为各种说法。被告格·费·格林科："我将接受最重的判决——极刑，这是罪有应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对祖国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将接受你们的任何一种最严厉的判决，这是完全应该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被告布哈林："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34]

斯大林看了这些话可以完全满意了："人民和党的敌人尽管面对着死亡似乎也没暴动，而是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他把这种"坦诚"看作是胜利，可是没有想到，在这种胜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历史上、道义上必然失败的根子。但是"领袖"也知道另一种情况。布哈林被捕后头三个月"顶住了"。他们威胁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这位失宠的院士甚至在狱中也总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来住在克里姆林宫时的邻居写过几封信）他在2至3月中央全会上的声明的主要思想："阴谋、人民公敌是存在的，但主要的敌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没有对这个警告作出反应。布哈林的信石沉大海，在审问期间他很可能想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的命运。拉萨尔爱上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姑娘，虽然她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拉萨尔

这位美男子和聪明人征服了她的心。有一天,姑娘对他说:“我们家对你怀有敌意,我们应当出走!”他安慰她:“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损害你的命运?忍耐几个月,双亲就会同意我们结婚。”拉萨尔既没有得到这种同意,也没有得到这位姑娘。不仅如此,姑娘的未婚夫在决斗中把他打死了。钟情的姑娘为拉萨尔痛哭一场,后来就嫁给了那位凶手……也许命运也给布哈林提供过这样的机会——出走?1936年2月4日,布哈林曾到国外去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材料。他当时已经感觉到,他脖子上的绞索正在收紧。柯巴是不会开玩笑的。他要开玩笑,那就是拿绞刑犯来开玩笑……他当时在巴黎是否有过不回祖国的想法?他现在是否为失去这次机会而懊悔?谁也不知道。不过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用罗伯斯庇尔的话说,他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与坟墓一起获得永生。


在“侦讯”过程中“拒不招供”的布哈林

布哈林躺在囚室的硬板床上,很可能曾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命运是如此残酷无情?正是他在某个时期曾帮助柯巴站住了脚……如果他当时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做得更坚决、更彻底,那他们大概在1927年就能够使斯大林就范。可是布哈林当时又一次(第多少次了)相信了斯大林……

布哈林在“侦讯”过程中很长时间默不作声,案子显然会旷日持久,于是斯大林准许叶若夫使用“一切手段”,不仅如此,由于他的坚持,在这之前还向各地下达了这样的说明:“从1937年起,联共(布)中央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实践中使用肉刑的方法。大家知道,所有资产阶级情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战士使用肉刑的方法,并且以最恶毒的形式使用这种方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机关对待疯狂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不共戴天的敌人要那样仁慈呢?联共(布)中央认为,对待人所共知的、臭名昭著的人民公敌,作为例外,今后应当使用肉刑的方法,应当把这种情况下使用肉刑看

作是可以允许的和正确的方法。"

实际上,这种"例外"变成了常规,只要被告在同侦查员"对话"时表现得不太顺从,立刻就采用这种方法。斯大林实际上正式批准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准则的做法。因此,当人们再一次向斯大林报告,说布哈林"拒不招供"的时候,他就建议放宽"审讯的方法"。当双管齐下,配合"肉刑的方法"而开始对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进行威胁的时候,布哈林投降了。他签字承认了侦查员杜撰的弥天大谎,谴责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领导者"、"阴谋分子"、"叛徒"、"破坏活动的组织者"等等。今天重读他的话也会令人痛心万分:"我承认自己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行,犯了可能的最严重的罪行,我组织了富农暴动,筹划了恐怖活动,参加了地下反苏组织。我还承认自己犯了筹划'宫廷政变'阴谋的罪行……"[⑮]

是的,斯大林满意了。但是,有时阅读审讯速记记录,这位独裁者仍然不能不在被告人的一些回答中感到他们在对"演出"的组织者暗中嘲笑,进行死前的最后一次讽刺挖苦:

维辛斯基:被告布哈林,你的一批同谋者在北高加索同流亡国外的白俄哥萨克集团建立了联系,这是不是事实?李可夫讲了这一点,斯列普科夫讲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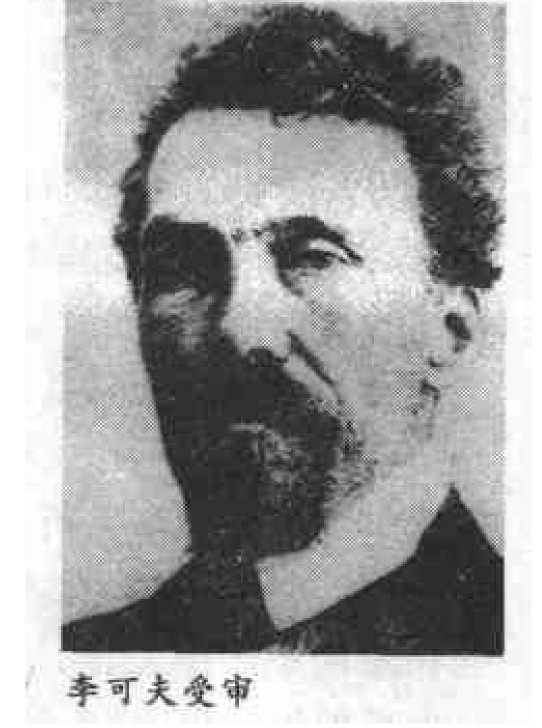
布哈林:既然李可夫讲了这一点,那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

维辛斯基:你作为阴谋者和领导者知道这样的事实吗?

布哈林:从数学概率角度看,可以以极大的概率说,这是事实。

维辛斯基:请允许我再一次问李可夫:布哈林知道这个事实吗?

李可夫:我个人以数学的概率认为,他应当知道这一点[⑯]。


李可夫受审

斯大林恶狠狠地推开速记记录,他明显地感到这些被逼到墙角的人暗中在冷嘲热讽:问他们同白俄的联系,而他们却讲"数学概率"!在每次审判会之后都提醒被告:不仅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亲人的生命,都决定于他们是否完整地和准确

地复述在侦讯中已经谈好的说法。搞“司法人质”的主意是斯大林想出来的。虽然“领袖”事先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质？被告人以及他们家庭成员的命运还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他早就想到过事情的法律方面：还在1934年7月20日就对那个第58条作了相应的补充——“关于叛徒的家庭成员”……

在准备“21人”案件时，斯大林不能允许发生“故障”；布哈林及其“同案人”应当完全“成熟起来”。况且按照“领袖”的意思，这次审判应是对全党和全国展开的大规模清洗和恐怖活动第一阶段的总结。斯大林认为审判不仅仅是消灭最危险的“敌人”的一次法律行为，而且是对全国上的一堂课，教育人们要加强阶级警惕性，对所有即使可能潜在地反对他、因而也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要毫不妥协，充满仇恨。因此毫不奇怪，他指示利用报刊、广播最广泛地报道这一案件，组织无数次群众大会要求“消灭法西斯恶棍”。

斯大林很会算计。一方面，利用这些“演出”更加巩固了他的个人专权。他认为，人民和党不能不吸取教训：任何反对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领袖”通过这些审判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社会监督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家互相监视。只有他这位公认的和惟一的“领袖”处于这种监视和告密制度之外。即使他的亲信也不能有安全感。柯秀尔、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和最高权力集团中其他领导人的命运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组织政治审判案的过程中，斯大林这位总导演躲在幕后。“领袖”很少就审判案问题发表公开的言论。绝大多数人民不了解他的真正作用。当时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是人民自己在审判“间谍”、“叛徒”和“凶手”。但是，可以想象，如果让全体人民直接审判被告人，其结果大概也是一样。当时全国还没有从革命的阶级搏斗、内战和集体化中“冷静”下来。有关“恐怖”、“暗害”、“间谍”活动的任何一条消息，都在人民中引起愤怒的反应。法西斯在西班牙进行了力量检验，德国在走向军国主义化，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反共产国际的条约，资本主义世界把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

例如，1938年3月15日《莫斯科晚报》这样写道：“历史上从未见过像反苏‘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匪帮所犯下的那种滔天罪行。匪首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间谍、暗害、破坏活动不

仅在苏联人民中,而且在整个进步人类中引起了对他们的愤怒、憎恨和鄙视。

“他们企图杀害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他们在1918年向列宁同志开枪。他们夺去了基洛夫热情洋溢的生命,杀害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他们背叛了我们的祖国。

“由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叶若夫领导的光荣的苏联侦查机关,捣毁了这帮恶棍的蛇穴!”

他们就这样把人民变成了群氓。对社会心理的“按摩”就这样产生了在荒谬的思想周围团结一致的现象。斯大林就这样操纵着千百万人的意识。

托洛茨基派暗害分子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敌人。怎能不是这样呢?在1938年3月13日结束审判的当天,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20万辆“ЗИС”牌汽车;卡拉干达提前完成了本季度的采煤计划;莫斯科人和首都的客人们第一次坐上了刚刚交工的莫斯科卡冈诺维奇地铁二期工程波克罗夫斯基半径段列车。图拉州几个先进集体农庄开始安装自来水管(赫鲁晓夫集体农庄打了一口深46米的水井)……每个共和国,每个州,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庄,都竭力以新的成绩向党和“领袖”贺喜。全社会精神振奋,以某种发狂似的激情建设新的城市和道路、工厂和大厦,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极点。人们刚刚感觉到生活已开始改善,他们为斯达汉诺夫、契卡洛夫、帕帕宁、布瑟金、斯梅塔宁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打破记录而感到自豪,可是忽然间那些家伙冒了出来,破坏了对人民来说已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

骇人听闻的审判骗局,好像是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实际反映。缺乏公开性和真正的信息性,更便于他们操纵千百万人的意识。不了解苏维埃政权头20年的实际情况,不了解30年代的精神气氛,不了解那些给许多人规定了行动方针的绝对命令,就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就不能理解那些震动了全国的悲剧性冲突。

评论过去总是比评论现在容易。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多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我们把一个人置于历史罪过的震中是公正的,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人物能够出现在那里是由于存在着一整套归根到底是由许多人创造的关系体系。法国作家让·拉布吕耶尔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无辜的受害

者——这是一切老实人的良心问题。"斯大林之所以能够篡夺权力和犯下罪行,还因为人们允许他这样做。今天看来,受害人的供词不仅仅是对"演出"组织者的永久的历史性控诉,每一代人都应吸取教训。

不,不只是现在大家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出疑问:为什么他们全都承认莫须有的罪行?就在审判期间,对西方报刊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最大的谜。向来非常注意舆论(不仅是自己国内的舆论)这个晴雨表的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根据他的指示,很快写成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他们承认了罪行》。文章中特别指出:"维辛斯基问道,为什么你们承认罪行呢?也许有外部的压力?被告们坚决否认这种推测。他们确认侦讯是以十分得体的方式进行的。根本谈不上什么逼供,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例如,被告穆拉洛夫声明,他在监禁中受到的待遇始终是'文明的和有礼貌的'……穆拉洛夫有8个月拒不招供,博古斯拉夫斯基——8天,拉狄克——3个月……他们开口了。在罪证面前。起诉是严格以事实为根据的。被告们是被沉重的确凿证据压服的……"[㊿]

说被告是被"压服"的,今天不会有人怀疑。不过不是被"罪证"压服的。正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在1988年2月5日会议上所肯定的那样,预审"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伪造证据,用不允许的方法强迫被告招供"。因此毫不奇怪,例如在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反苏联盟"案的被告"套环"中,集合了一些常常是甚至互不相识的人:党的工作者和医生,外交家和人民委员,经济工作者和共和国领导人。政治闹剧的组织者们需要证明存在着遍布苏联全国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网;需要证明,任何人如果心肠太好、丧失阶级警惕、粗心大意,都有掉进这个网的实际危险。审判案的营建师们提示人们说,"联盟"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仅"出卖祖国",准备肢解祖国,而且给德国和日本当间谍,炸毁矿山,颠覆列车,杀害杰出的苏联人士,准备暗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及其他领导人……

我已经说过,斯大林非常注意世界舆论对审判案的反应,他作了最坏的准备。当然,被告们不进行辩解,而是一致重复对他们的控诉,这种情况使所有的人都迷惑不解,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审判中的具体事实了解很少,因此只能限于"反民主"之类的抽象谴责。使斯大林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几乎每天都在西方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他的论

据、反驳和揭发材料，现在还查明，他还曾经准备进行宣传性的"反审判"。

托洛茨基在1938年《反对派公报》第65期上发表的一篇毒辣的文章，使斯大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尖刻和洞察力辛辣地揭露了审判案的欺诈性："在这种犯罪活动中，人民委员、元帅、大使、书记，总是从一个上级得到命令，这个上级不是他们的正式领袖，而是一位流亡者。托洛茨基只要使个眼色，这些革命老战士就都成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的代理人。按照托洛茨基通过塔斯社优秀记者传递的'指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人破坏国家的生产资源。根据'头号人民公敌'从挪威或墨西哥发出的命令，铁路员工破坏远东的军事运输，而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则在克里姆林宫毒死自己的病人。这是维辛斯基描绘的一幅令人惊讶的图画，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极权制度下，专政是由机关实现的。如果说占据机关中所有关键岗位的都是我的仆从，为什么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而我却过着流亡生活呢？"

斯大林看完这几行字简直气疯了。他大骂叶若夫，说他在制造案件中患了智力低下的"克汀病"。斯大林重又想到(已经是第几次了)：是不是该结束这场运动了？不，他不准备这样做。只要还有人可能即使在内心里把托洛茨基看作可以代替他的人，他就不能收兵。"领袖"似乎在一位古代思想家那里看到这样的话：半途而废的恐怖是危险的。幸存者都充满了强烈的复仇欲。

政治审判案还有一个目的。斯大林企图利用审判案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所有原来的反对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客观上都永远坚持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这就把在国外呆过的人——外交人员、文化人、生产者、学者、甚至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的大多数都"牵扯进来了"。许多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不少在共产国际或它的各种组织中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敌人"。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人，受过苏维埃政权"伤害"的人，政治上表示过怀疑的人，常常被列入"敌人"兵团。被镇压者的近亲也顺理成章地被划为"敌人"。肃反工作人员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曾经企图(虽然是间接地)对罪恶阴谋进行怠工，另外一些人则恰恰相反，如雅哥达、弗里诺夫斯基、别尔曼，他们落入敌人行列是因为过分卖力，是因为知道得太多。"过火行为"、歪曲、"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

中的暗害活动”,统统都推到这些人身上。

受迫害特别严重的是那些记得列宁和记得真正的列宁主义的人,是那些曾经同沙皇制度斗争过、因而珍视(虽然是本能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人，是那些对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可能知道些超出官方范围的东西的人。这些人真正懂得列宁的指示:“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⑱]这些人不愿享用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这种代用品。但这样的人是少数。其余的人是顺便连带地被送进镇压机器的。一些人曾在“人民公敌”属下工作过,另一些人“没有”及时“揭发”他们,还有一些人曾经在连他们自己也猜想不到的某件事上“帮助”过他们……



雅哥达,一度是斯大林的心腹而最后成为斯大林审讯中的丑角。雅哥达曾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长达15年。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最后被处死,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多疑加重了暴力的惰性。B·扎哈罗夫、M·莫齐耶夫和阿尔扎马斯车站的其他铁路员工未必懂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些观点与“企图进行恐怖、破坏活动”一起成了1937年10月31日判处他们死刑的根据。根据乌尔里希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全体被告完全承认自己有罪”。被说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谬绝伦的多疑,按时地把自己的祭品献给司法莫洛赫*!

* 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

——译者

这些审判案的一个特点，就是斯大林不仅企图消灭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而且预先使他们浑身沾满不道德、背叛、变节等污点。所有审判案都是史无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谴责的典型。这常常显得十分荒谬,显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复仇欲的驱使制造出来的。例如被告们常常令人厌烦地反复说他们是“叛徒”、“间谍”、“两面派”、“暗害分子”、“杀人凶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曾为法西斯服

务,我们组织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答应从宽处理,威胁要对家属进行镇压,在审讯中经常使用肉刑,摧毁了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们按照"司法祭司们"写的剧本扮演有损尊严的角色。总导演总是躲在幕后,由他的助手——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恬不知耻地主持"演出"。

英国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泽曾写过《旧约中的民俗学》一书,其中有一章叫《约瑟夫的杯子》,这一章的开头值得全文引出。"约瑟夫的兄弟们从巴勒斯坦来到埃及,以便在那里购买粮食备饥荒时用。当他们已经准备登上回程的时候,约瑟夫命令把他的一只银杯放进便雅悯的口袋里。兄弟们刚一离开城市,还没有走多远,约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赶他们,命令家宰控告他们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发现了丢失的杯子。家宰责备他们对他的主人忘恩负义,不该以偷走主人的宝贵杯子来回报主人对他们的款待和好意。'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德呢?'他问他们。'这不是我主人饮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吗?你们这样干是作恶了。'兄弟们被带回去,带到约瑟夫面前。约瑟夫问他们:'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
"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詹·弗雷泽写道,"约瑟夫特别以善于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发现小偷而自夸。"[39]

当斯大林把患难"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开除出去的时候,他的插话"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弄清楚"曾使他们产生了一线希望。过了一年,当这些站到了"街垒另一边"(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的说法)的人出现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面前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约瑟夫的杯子"即用来作恶和施展诡计的杯子已经盛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把它一饮而尽。

"学会重视人才……"

1935年5月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当时,干部大屠杀尚未开始。在党、国家和经济机构的领导干部梯队中,在职业军人当中,在技术和创作领域的知

识分子队伍中，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地方工作人员队伍中，很快就要出现极其严重的干部短缺现象，就像一场可怕的瘟疫的流行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一样。1939年初，斯大林向工农红军干部总管理局要了一份有关陆海军指挥人员情况的资料。他长久地默不作声地审视着这些栏目和表格，听着它们诉说人员太少年龄构成"太嫩"等情况。将近85%的指挥员还不到35岁。斯大林不慌不忙地翻阅着这份资料。莫非他想起，除了三位元帅和一大批一、二级的集团司令员外，其他一些有才能的军事首长都按照他的意志消失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被任命时都来过这儿——他的办公室……莫非他想起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1938年11月29日在自己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当时人民委员在谈到伟大的成就时报告说："在1937—1938年红军清洗过程中，我们清除了4万多人……在1938年的10个月当中我们提拔了10万多名新的指挥员。"[40]在军事委员会原有的50多名成员中只留下了10个人……"领袖"面对指挥人员的严重短缺有何感受呢？这个问题今天未必有人会说得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看到了干部"匮乏"情况之后提出要增加军事学院的数量，要开办新的军事学校。然而这样的"窟窿"并不只是在军人队伍中才有……

前交通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对我谈起：

"1937年我被任命为西部铁路局局长。我来到了明斯克。当我来到铁路局的时候，那里空空荡荡。没有人向我移交工作；我的前任鲁萨科夫被捕了并已被枪决。我找那些副局长，但一个也没找到，都被捕了……我找了一个又一个，周围寂静得可怕……犹如龙卷风刚刚刮过。尤为奇怪的是，火车依然在行驶，是谁在领导这整个巨大的运行工作呢?！我便到一个在铁路局工作的熟人家里去。令我惊讶的是，在那里我碰到了他和他那哭泣着的妻子。我没来得及问好便问：'你怎么没去上班？'

"'我正等着呢。今天已经通知了，要来抓我，这不，内衣也收拾好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纳谢德金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来接替工作的人的……他会使铁路瘫痪……'"

科瓦廖夫接着说："在查明了灾情后，我认倒霉豁出去了，于是打电话到莫斯科找斯大林（须知如果铁路不能正常运行，我也会很快被抓起来）。接电话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我向他介绍了情况。无法无天

的行为便很快停止了。况且也没有什么人可关的了。"科瓦廖夫讲完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铁路局的情况并非例外。镇压机器已经开足马力。它运转得怎样，从1937年联共(布)中央十月全会参加者的发言片断中可见一斑。下面请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党委书记索博列夫在讨论莫洛托夫关于选举运动进程的报告时是怎样说的。虽然是讨论选举问题，可谈的却是"人民公敌"。索博列夫说：

"现在我们正在揭露和消灭各种敌人：布哈林分子、李可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察克分子、破坏分子。我们现在正在边疆区痛击所有这些坏蛋。他们完全是在制造公开行动(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来反对我们……我指的是在边疆区最惯用的一种破坏方式，这就是纵火。"

库尔斯克州的佩斯卡廖夫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

"由于在我们的州检察机关和州法院的领导人员中长期有一批坏分子、危害分子和人民公敌在进行活动，因此他们把惩罚政策的重点转移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三年中全州有18000名集体农庄和村的积极分子被判刑(常常是因为马瘸了腿或者上工迟到)……"[41]

到处都在"揭露和消灭"。到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时，这些"揭露和消灭"的后果还不清楚。但当时，在听"领袖"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讲话时，准能想到他会下决心大摆血宴呢？


1935年2月，斯大林发表讲话

在寂静无声的克里姆林宫大厅中回响着斯大林那不高的嗓音。他偶而做一下手势来配合他那不紧不慢的发言。斯大林拿着稿子，却很少看它。数百名佩带着嘎吱作响的新武装带、领章上镶嵌着"方块"和"横杠"的年轻指挥员和

政治工作人员，正用他们的双眼紧紧地盯着领袖那不高而健壮的身影。

"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一件事。"中央委员会书记从容不迫地继续讲道，"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30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30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30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人的赞同下回答：'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全场活跃。）"领袖的半弯曲的食指在空中停住了，就定住在西伯利亚人这种离奇的答复上。

"我们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采取冷淡态度，不会重视人才，"斯大林继续说道，时而照旧挥动着他那强壮的胳臂，似乎要把话刹住，"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人对人的可怕态度的残余……"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19]

我从斯大林的讲话中援引了这么冗长的一段话，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方面，我们看到，"领袖"当时就承认干部不足（"十分缺乏"）。另一方面，当你了解了斯大林在后来的大规模镇压中的作用和地位时，你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他那种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两面手法和残酷无情感到吃惊。他一面准备对成千成万忠实于党和人民的共产党员进行镇压，一面又在公开地说人才和干部是"最宝贵的资本"……就算惩罚机器在某个阶段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由于可怕的惯性发生了无法无天的行为，但是，把"领袖"的伪善的说教同他个人对毁灭干部的事业所作的"贡献"作一对照，也不能不感到震惊。

我没有掌握关于1937—1938年的受害者数字的正式统计资料。也

许这样的资料现在还没有。根据现有的材料(历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党的统计报告，各地送呈的报告，司法机关档案中的资料，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的各种报告等等)，可以对被镇压者的总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顺便提一下，国防人民委员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最为精确。把这一系列资料(再说一遍，这些资料可能不全)分析一下就可看出，在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350万—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60万—80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些期刊引用的关于镇压规模的资料彼此有很大的差别。应该由权威机关同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代表一起根据档案材料对1937—1938年间斯大林造成的“结果”最终作出痛苦的结论。目前这结果还没有，各种出版物的作者们就不得不采用“推论”、“粗略估计”等等办法。我有许多文献，我觉得，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实上面所引的350万—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接近实际。这些文献证明：战争以后劳改和劳教所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而被关押者的数量在几年当中大约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因此我们认为，知道了1948或1949年间被关押者的数量，也就可以对1937—1938年间被关押者的数量有一个概念。下面就是摘自这些文献的一些片断：

斯大林同志：

遵照你的指示，我们特此提出关于建立有严格制度的劳改营和监狱以关押最危险的国事犯的决议草案……

C·克鲁格洛夫　B·阿巴库莫夫

1948年2月18日[53]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向您报告各劳改营和劳教所1947年一年的情况和工作。截至1948年1月1日，各劳改营和劳教所共有2199535名犯人在押。建立了27个新的劳改营……

苏联内务部长

C·克鲁格洛夫

1948年3月7日[54]

应当考虑到，除此之外，在诸如此类的"机构"里还关押着许多普通监狱的犯人，他们的数目是我所不知道的(但我认为，不会超过劳改营和劳教所"居民"的30%)。我再援引一份文献：

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向您报告各劳改营和劳教所1949年一年的情况和工作。截至1949年(原文如此，疑为1950年之笔误。——译者)1月1日，共有2550275名犯人在押；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占22.7%。关押10年以上者为366489人。建立了两个新的有严格制度的特别劳改营以关押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俄侨民……为犯人提供的居住面积平均为1.8平方米……

C·克鲁格洛夫

1950年1月23日[45]

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些数字不包括普通监狱的犯人。同时应当考虑到，劳改营还进了大批敌占区伪警察、法西斯走狗、战争结束时和战争结束后在我国西部地区因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武装叛乱而被判刑的人，还有从各个已解放地区驱逐出来的人以及无辜的被捕者。因此(把普通监狱也计算在内)，说被关押者的数量大约有300万—400万，看来不只是指1948—1949年间的人数。1937—1938年间被镇压的人数未必会比1948—1949年的人数多很多。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所说的"居住面积"这个客观指标，从那个苦难年代以来未必会有增加。人们"住"的是三层铺。同时指出一点是重要的，即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犯人是不断"更新"的，每天都有新的人进来，都有许多人经受不住恶劣透顶的条件而死去。还有一定比例的犯人获释。但是斯大林的惩罚系统每年未必"关"得下400万—500多万人。我再说一遍，把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可容量"同10年后的作一番比较，那么我认为，我对1937—1938年间斯大林的镇压规模的估计是接近实际的。话说回来，这个估计是可以推翻的，但只有把国家的统计数字公布出来。

至于谈到个人的责任，那么所有这些**前所未见**的镇压活动的罪魁

祸首就是斯大林。“领袖”亲自就镇压的方针和规模向叶若夫发出指示，常常还指出他认为需要“审查”的具体的人。为了避免在信函往来和电话谈话中提到“死刑”、“极刑”这些字眼，斯大林建议把这种刑罚称作“一等”刑罚。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对许多知名人士进行镇压都是斯大林亲自下指示。逮捕和枪决埃赫、鲁祖塔克、丘巴尔、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人都是斯大林批准的。在中央机构里，斯大林提出“审查”(而这意味着再糟糕没有了)的有：鼓动宣传部部长斯捷茨基、出版部部长塔尔、农业部部长雅柯夫列夫、科技部部长鲍曼、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人员扎伊采夫，还有数十名其他工作人员。对所有的人来说，“审查”的结果都是枪决。

当镇压活动达到很大规模时，斯大林批准死刑判决都是按一个个很长的名单，而在1938年，由于这项工作“太累”，他便授权法庭和军事法庭去决定，不用向他报告。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说，1937—1938年间，叶若夫向斯大林送过383份名单，开列了好几千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些名单都是斯大林“批准”的。我不认为斯大林批准的名单就是**这么多**。它们实际上比这要多。由于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因此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许多文件都失踪了。正如1988年4月初谢列平告诉我的，许多有赫鲁晓夫签名的名单都按照赫的指示由当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谢罗夫从档案中抽掉了。这些名单转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因为他下决心要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方面迈出勇敢的一步，看来他想同自己的罪行划清界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无疑都负有罪责，或者是同谋者，或者是盲目的执行者，或者是动脑筋的“随声附和者”。但是在历史面前，斯大林要对1937—1938年间的无数罪行负主要责任。

“领袖”非常关注的是他的名字不要以“极刑”核准人的身份出现。我手头有许多写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哀求赦免的信件。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但往往不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笔迹”。但是，所有写信的人都死了。我们只能推测，斯大林宁愿在口头上作出自己的决定，而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看请求赦免的信，因为写信者的命运他早就定了。正是由于斯大林在直接组织和参与罪行时





苏联 1934 年–1938 年期间，肃反运动达到顶峰。无计其数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被送到强制劳动营集中改造





在 1937 年和 1938 年中大约有 350–450 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左下图为劳改营中的犯人在劳动，右下图为监狱门口

“不公开”身份，才产生了并至今还“盛行”的一种传说：他“不知道”镇压的事。例如，老布尔什维克拉祖尔金娜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她被关在监狱时，“一次也没有责怪过斯大林，我总是为斯大林而跟别人干仗，其他一些囚犯、流放犯和劳改营犯都咒骂斯大林。我说：‘不，斯大林不可能容许党内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88]人们这样天真幼稚，完全是由于不了解实情。

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把暴力奉为生活准则。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最终在国内和党内形成了一种恣意妄为的风气，从而导致了无法无天的局面。正如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中所说的：“一个人的为所欲为鼓励并许可别的人也为所欲为。大规模逮捕人和流放成千上万的人，不经审判和正常的侦讯就枪决人，这一切造成了一种没有安全感和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局面。”

放手进行恐怖活动时，国内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直接威胁。这种情况是不幸而又可悲的。过去长期存在（如同现在也还存在一样）的外部威胁，决不可能证明镇压是正确的。自然，阶级仇恨、对新制度的不满的一些个别表现在国内确实存在。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完全没有证据说明存在着大量的危害分子和敌对分子。

斯大林完全忽视了列宁关于如何对待革命恐怖的看法。确实，曾经有一个时期，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以红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但是刚一出现新政权得以巩固的客观迹象，便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使用极端暴力来作为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任务的方法。

1920年2月2日列宁在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实行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逼出来的，因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不顾一切地派遣大批军队向我们扑来。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行动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作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逼出来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许诺过的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的。”[89]看来斯大林并不认为应该像对待“诺言”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让我们回忆一下1934年12月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根据斯

大林的倡议通过的决议:"对犯人的死刑判决……立即执行","接受关于赦免的请求是不可容许的"。没有任何律师,不经过任何正常的侦讯……被捕者立即成为"罪犯"。斯大林本人就是这样亲手建造恐怖机器的。镇压机构已经建立。第一批被推到斯大林断头台刀口下的是党内、国家和军队的一些著名活动家。

1937年召开了几次党的中央全会。在每一次全会上,除了审议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改进拖拉机农机站工作的措施这样几个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之外,还一定要审议"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成员"这样的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对党的最高机关的清洗仍在继续进行。例如,在1937年党中央的十月全会上,有2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他们当中有:捷连斯基、列别季、诺索夫、皮亚特尼茨基、哈塔耶维奇、伊克拉莫夫、克里尼茨基、瓦雷基斯、格林科、柳布琴科、叶列敏、杰里巴斯、杰姆琴科、谢列布罗夫斯基、罗森霍尔茨、普图哈、舒布里科夫等人。所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党龄很长的布尔什维克,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骨干,但都被定性为"人民公敌"[49]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每一次全会的情况都是如此……例如1937年中央委员会的十二月全会正式通过了(用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表决)下述决定:

"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中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

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50]

真难以想象,这位宗教裁判所的首席法官的想像力是如此贫乏:一半以上的中央委员都是"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罗曼诺夫王朝崩溃业已20年,他们的宪兵部门仍然还在大摇大摆地进行活动!所有这一切就像是良知丧尽,恶魔肆虐。当我浏览那些分给中央委员进行背靠背表决的发了黄的纸片时,我没有发现一次是表示不同意、反对或怀疑的。都是"赞成"、"同意"、"无条件同意"、"正确的决定"、"必要的措施"等等。在流言和恐惧的禁锢中,良心缄默不语了。

1938年底,可以用来补充这个巨大缺额的候补中央委员实际上

已经找不出来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即70%的成员都被逮捕并在1937—1938年间死去。得到这种下场的不仅是大部分中央委员，而且还有“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须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80%拥有表决权的代表都是1921年以前人党的布尔什维克！这都是一些经过列宁的培养,经受过地下工作、革命、国内战争的锻炼的人。斯大林不可能忘记,几乎三分之一的代表当时投票反对他。他们是什么人？独裁者把每个人都看作潜藏的敌人。

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干部梯队也极大地被削弱了。许多州委简直就无人领导;党的委员会的所有书记,用卡冈诺维奇的话来说,都进了叶若夫的“住所”。我们只从成千上万有幸尝过“约瑟夫的苦酒”的地方上的党务工作者中举出一些人来:A·博戈莫洛夫、T·布拉塔诺夫斯基、E·韦格尔、米·古谢伊诺夫、Б·多多巴耶夫、H·茹拉夫廖夫、C·泽格、B·叶廖缅科、尤·科绍宾斯基、Г·克鲁托夫、H·马尔戈林、Д·奥尔洛夫、H·斯捷潘尼扬、Я·波诺克、A·什皮尔曼、阿·汉姜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总括性的资料只有斯大林才会有。当他在翻阅叶若夫、乌尔里希、维辛斯基的那些令人恐怖的汇报和报告时,他在想些什么,他会“相信”国家、党、军队、国民经济都置于敌人的控制之下吗？难道他就不会想到,他那“人民公敌”的观点荒谬透顶和罪该万死到了极点吗？但是领袖有一个特点,即始终如一。一旦决定通过,斯大林向来都是竭尽全力贯彻到底。随着社会的“净化”,他将获得很多很多“流芳百世”的东西。

有一次,斯大林在同叶若夫讨论(莫洛托夫在场)又一份名单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再过10年20年,谁还会想起所有这些坏蛋呢？谁也不会。现在谁会记得伊万雷帝收拾掉的那些大贵族的名字呢？谁也不会……人民应当知道:他是在‘清除’自己的敌人。每一个人最终都获得了他应获得的东西……”

莫洛托夫好像无意识地附和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人民是理解的,他们是理解和支持的。”

尽管他们两人本应明白,人民是在缄口不言。赞扬声乃是无知、无权和沮丧的表示。

“领袖”说什么要**“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这看起来是在放肆地亵渎神明。1937年10月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若夫不知道厚颜无耻和无法无天也要有个限度。根据他的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开始准备应由军事法庭审判庭审理的人员的名单。例如，只要一个人被认定犯有间谍罪，他便立即被押送到军事法庭受审。至于说到如何对付这些“间谍”以及被“揭露”出来的间谍有多少，乌尔里希的下面这份报告可资证明：

致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拉·巴·贝利亚同志

自1936年10月1日起到1938年9月30日止这段时间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和军事法庭巡回庭在60个城市判处：

枪决　30514人

监禁　5643人

共计　36157人

B·乌尔里希

1938年10月15日

1937—1938年间，叶若夫，后来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呈报过许多份“间谍”名单，名单上事先（在审判以前）就提出了判刑种类（绝大部分是枪决）。不过，他们先都从乌尔里希那里得到报告。这里就有这样一份通报：

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苏联

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1938年9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哈巴罗夫斯克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判处：

枪决　1809人

监禁　389人

共计　2198人

B·乌尔里希[⑩]

10月份就更多了,共3588人……这还只是军事法庭所完成的"工作量"。而当时又有多少个正在"出活儿"的普通法庭呢?!喜欢谈论应当关心人、关心干部、关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斯大林,在批准这些可怕的名单时是一点也不犹豫的。

迄今为止,还有不少人想把斯大林所进行的活动当中这个最最反人性的方面同他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在实现社会经济计划和纲领方面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区别开来。即使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承认他在这个方面的"功绩",我们也没有权利,首先是没有道义上的权利饶恕斯大林,说什么:"他在犯罪的时候由衷地相信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如果说为了给国家利益打基础,竟需要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个人头,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呢?!因此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个声明是很值得争论的。他说:"我们不能认为斯大林的行为是一个疯狂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应当这么做。这也就是悲剧之所在!"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斯大林是有意识地建立个人专政制度的,他以为有了这种制度自己就有了选择各种手段的绝对自由。这里怎么谈得上赫鲁晓夫所说的"捍卫革命成果"呢?!可怕的、令人陶醉的绝对权力感支配着斯大林……我再说一遍,绝对权力绝对地起腐蚀作用,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他对党、经济部门和军队的干部放手进行的恐怖活动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彻头彻尾的破坏。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不论是柯秀尔,还是波斯特舍夫,不论是鲁祖塔克、丘巴尔,还是埃赫,都不可能是"人民公敌"。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各次政治审判案都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如果对他的活动有真正的社会监督、党的监督、国家监督,那么斯大林就不可能造成无法无天的局面,他根本就不敢这样做。完全不受惩罚和不受监督使得斯大林能够充分表现他的性格上那些最丑恶的特点。"领袖"所建立的极权制度使独裁者能够恣意妄为。斯大林的绝对自由就意味着所有听命于他的人绝对没有自由。然而为了在道德上和社会上进行伪装,"领袖"就在人们面前继续假仁假义。难道斯大林在1939年5月郑重地宣告"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本是人才"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才在他的帮助和直接参与下被消灭了?!

因此,所谓"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相信存在着人民公敌,因此便要

镇压他们”的说法不只是幼稚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这并不是斯大林的悲剧，而是人民的悲剧。人们只能认为他的行为是犯罪的行为。斯大林嘴上说的是马克思的词句，而行动上却“像帖木儿–塔梅尔兰那样‘浪费’人的生命……”[60]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毫无价值。

大规模使用暴力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跟列宁的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斯大林甚至想使社会“繁荣”，使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富足，并且无可争辩地想建立一个强大国家。但是他不愿意问问这个社会的成员：他们想用什么方法、以什么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斯大林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但尽管如此，当他突然“听说”镇压达到那样的规模时，他有时也表现出动摇。正是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联共(布)中央(1938年)一月全会要讨论各级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据“领袖”的倡议提出来的。在听取马林科夫的报告，听取巴吉罗夫、波斯特舍夫、柯秀尔、伊格纳季耶夫、季明、卡冈诺维奇、乌加洛夫、科萨列夫等人的发言时，斯大林看到对干部的镇压、无法无天的迫害和骇人听闻的屠杀达到那样的规模，不能不感到大吃一惊。例如，波斯特舍夫的发言指出，当他来到古比雪夫时他看到，经过清洗之后，党的州委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会的正常活动均告瘫痪。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委竟有30多个！斯大林、贝利亚、叶若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听后立即把过错都推到波斯特舍夫身上，尽管波斯特舍夫不久前刚刚来到古比雪夫。

查阅一下文献就会得到一种印象，即“陷害”波斯特舍夫的决定早在全会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实际上，从报告人马林科夫开始，所有的发言者都着重谈波斯特舍夫的错误。卡冈诺维奇在全会上充当了批判波斯特舍夫的主要角色，斯大林在他发言时多次插话表示赞许。卡冈诺维奇的一些论据值得引出来看看：

“我很了解波斯特舍夫。去年我受中央委派去基辅，当时他们揭露了波斯特舍夫同志在领导基辅和乌克兰党组织工作中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波斯特舍夫在基辅表明他实际上破坏了党的指示，为此中央当时就把他从基辅撤了下来(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波斯特舍夫同志对人民公敌视而不见几近犯罪。甚至所有的麻雀都在屋顶上

吱吱喳喳乱叫了,他还没有发现敌人……根据我在会下对你的观察和听你在全会上的发言,我肯定你是在和党中央耍花招。"

波斯特舍夫试图反驳,他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耍过花招。"

"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他没有看到,最近一年来我们拥有10万多名新提拔起来的人。这是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式的胜利……"[63]



被斯大林所器重的卡冈诺维奇。他有三个特点:超人的工作能力;在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绝对执行命令

卡冈诺维奇在谈到"斯大林式的胜利"时,无意中道出了由于镇压而不得不对"离职"的领导干部组织接替的规模。卡冈诺维奇之类的蠢才把无法无天的行为造成的干部严重短缺竟说成是有助于各级领导人员实行革命更新的大好形势。

雅罗斯拉夫斯基、科萨列夫、乌加洛夫的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对波斯特舍夫已经不单单是批判,而简直就是控告和审判了。看得出来,这一次就是拿他开刀。卡冈诺维奇做到了让党的领导感觉到自己对波斯特舍夫早就有恶感。全会后来的情况证明一切都是按斯大林事先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应邀来参加全会的古比雪夫州委员会第二书记伊格纳托夫最终完成了整垮波斯特舍夫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把波斯特舍夫的行为称作"反党"行为。卡冈诺维奇当即作了总结,他对波斯特舍夫说:

"你到现在还在同党中央耍花招。这是敌对路线。波斯特舍夫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已经破产了……"

波斯特舍夫站起来说:"我完全彻底地承认我在这里所作的发言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党性的。我是怎么说出这一番话来的,我连自己也不明白。我请求全会宽恕我。我不仅从来没有同敌人站在一起,而且始终是同敌人作斗争的……"

但是现在能够挽救波斯特舍夫的只有斯大林了。然而他在等到这位试图保持自己的见解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完全卑躬屈

膝之后，最终还是确定了他的命运：

"在我们这里，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或者说政治局里，怎么叫都行，已经形成一种意见：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就需要对波斯特舍夫同志采取一些措施。照我们的意见，应当撤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资格。"[53]

这一意见自然得到了一致通过。波斯特舍夫只有一个月的自由。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同年2月准备了一份关于波斯特舍夫的决定草案，它后来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这个受到斯大林的赞同并经过他审订的文件的主要内容值得引一引。波斯特舍夫被控犯有下列罪行：

1)解散35个党的区委会(它们不过是停止活动，因为在1937年的五个月当中，在古比雪夫州开除了3500名党的党籍)。(本书作者注)；

2)进行反对苏维埃机关的挑拨离间活动(在市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曾撤销了34人的代表资格)；

3)让干部参加田间劳动，拆毁公共建筑，在收获的大忙时节进行暗害活动；

4)波斯特舍夫在古比雪夫工作期间，阻碍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敌人，而把打击矛头措向正直的共产党员；

5) 波斯特舍夫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古比雪夫的助手都是人民公敌(间谍)；

6) 波斯特舍夫知道州里存在着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反革命组织……

现认定巴·彼·波斯特舍夫的所有上述行为是反党行为，是有利于人民敌人的行为。兹决定将巴·彼·波斯特舍夫开除出联共(布)党的队伍。[54]

所有剩下来的4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投票（通过背靠背征求意见的方式）赞成这个决定。斯大林的那一票还是没有被发现……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少留"痕迹"。

波斯特舍夫的命运已被决定了。随之而来的便是逮捕和枪决。斯大林的"关心干部"在"波斯特舍夫案件"这个例子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波斯特舍夫不仅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导成员，而且一般地作为一名经过列宁培养多年的党员，都使"领袖"不满意。

有时候斯大林只要听一句话，谈一次话，得到某一个情报，就可以对一个人作出最后结论。在那种年头，这也就是判决。

例如，在波斯特舍夫"视察"古比雪夫之后，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报告：

"波斯特舍夫在政治上是个危害分子。"

斯大林反问道："那干嘛还要留着他？"

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斯大林已对他后来的命运作出了安排。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发现，或者确切些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重视科萨列夫在1938年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同梅赫利斯发生了争吵。科萨列夫实际上是在批评梅赫利斯领导的工农红军政治部对共青团的工作抓得不力，他说："军队中有50万名共青团员，而每年接收入党的却只有几千人。"梅赫利斯大动肝火，当即反驳说：

"共青团中央不关心军队中的共青团。我曾建议别洛博罗多夫（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本书作者注）到军中去领导共青团，他不去。他们只想从中央进行领导……"[58]

梅赫利斯过去对科萨列夫就抱有的恶感现在肯定加剧了，很难



（左起）布尔加宁、日丹诺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在1938年一月全会上

说这种恶感没有在这位共青团领导人的命运中起过决定性作用。

全会本来提出的问题是，在审理党员个人案件时存在着一些错误，结果不知不觉地又转到旧的轨道上来了；原来所有这些“错误”、“过火行为”不过是尚未揭露出来的“敌人”的阴谋。全会作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现在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者揭露并彻底肃清钻到我们队伍里来的隐蔽的敌人的时候了……”[58]“领袖”在1937年2至3月全会上提出的观点又一次占了上风：在与人民公敌进行斗争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和错误，是尚未被揭露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暗害分子活动的结果。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1937—1938年间，人们以冷静慎重的态度对待肆无忌惮的不法行为，是为时极其短暂的。暴力恶魔战胜了起码的理智。斯大林认为，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错误在于这种暴力使用得还不够。

结果不是去分析研究过火行为和对党员命运采取冷酷无情的罪恶态度的原因，而是再一次掀起搜索“尚未被揭露的敌人”的浪潮。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州委员会书记库德里亚夫采夫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发言时向党员发问：“你们写过检举什么人的材料了吗？”这种号召提高警惕的结果是基辅党组织中几乎有一半的党员遭到告密。顺便说说，库德里亚夫采夫本人就成了首批受害者中的一个……

根据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的倡议搞出来的干部大屠杀导致了在告密之风盛行时出现了不少卑鄙无耻之徒，他们企图(而且有时还颇有成效！)在当时的局面下在党政军机关中钻营，要不干脆就算老账。中央1月(1938年)全会的决议说：“党员中有个别野心家，他们力求以开除党员、迫害党员来显示自己和抬高自己，他们力图用不分青红皂白地迫害党员的办法来防止别人指控自己警惕性不高。”[59]然而，决不能说，为了正确地确定野心家、告密者给党造成的巨大危害，最高政治领导就必须采取镇压方针。正是这一方针才是造成悲剧、变形和畸形现象的深刻根源。全会提出的“彻底肃清巧妙伪装的敌人”的方针再一次表明斯大林的“重视干部”的口号是虚伪骗人的。

撒谎犹如滚雪球。一个谎言产生另一个谎言。由于斯大林任意地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从而刮起了撒谎风，使社会失去了安全感。叶若夫机构的谎言加上法院和检察机关的谎言、报刊的谎言以及为支持“公正的判决”而发表的无数骗人的讲话，造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局面。要知道恣意妄为的现象原因何在吗？无从知晓；要请求帮助吗？无

人可找;要揭露明目张胆的恶棍吗?谁也不许可……

有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在贝利亚处储存着大量各式各样的告密材料。我举出一份来,不指明是谁写的。可能他的孩子、孙子都已长大成人了……一般说来,当我在本书中指出许多姓名并且知道所有这些人都可能有亲属的时候,我可以真心诚意地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意使他们本人受到痛苦。然而,如果我们把一切都"译成密码",那么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下面就是这封告密信:

马林科夫同志:

我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卫部队的副司令员。今天举行了授予斯大林同志"胜利"勋章的大会。然后被邀请参加大会的只有军官,没有士兵。此事颇为奇怪……大会由布罗夫金将军主持。总共只有3—4个人发言,然后大会便结束了。后来在大会结束之后才告诉我们,说部队去收割庄稼了,而政治部主任库兹涅佐夫则已调往另一个部门工作。

像授予斯大林同志胜利勋章大会这样极其重大的政治活动竟被搞得毫无特色,轻描淡写,庸俗不堪……

收信人的反应是"合乎情理的":"贝利亚同志阅处。**马林科夫**。"[59]

被斯大林扶上宝座的谎言魔王支配着几百万人的命运。斯大林罪不容诛的首要一点,就是他在国内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其时谎言成风,人们被迫俯首帖耳、缄口不语,或者对那些很多人根本不清楚其含义的决定表示支持。斯大林自认为有权给真理"定成色",有权作出全体人民必须服从的总结,有权决定人民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当时的镇压活动和不法行为完全是靠了谎言才得以存在的。人民的悲剧的社会的和认识论的根源之一也正在于此。但是人民不可能长期上当受骗;谎言过去和现在都不会有未来。斯大林不愿意考虑这个无可辩驳的真理。

1937—1938年那难以愈合的创伤不只是与"领袖"大搞暴力活动所造成的痛苦的、荒诞的、不合逻辑的现象有关。而且许多灾难也发端于此,这些灾难与许多天才的领导人、经济工作者、科学家、军人和文化活动家的丧失有联系。难道说干部奇缺的状况就不会使一些"党员中的野心家"钻进各种重要岗位和占据有利地位?1937年联共(布)中

央2至3月全会在决议中不仅写上了"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暗害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并在他们的反苏维埃活动稍一露头就加以镇压",而且还提出了"要**加强**(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69]"加强"一词的标准在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盲目地、狂热地执行"领袖"的意志。有良心的人当时在"各个机构"中都不能幸免于难。形形色色的阿巴库莫夫、克鲁格洛夫、梅尔库洛夫、叶若夫、贝利亚、科布洛夫、马穆洛夫、鲁哈德泽和其他一些"被提拔的人"一样,他们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站稳脚跟决不是由于他们个人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优点。在个人专权条件下形成的关系本身造成了一批无原则的人、阿谀奉承的人、卑躬屈膝的人。斯大林赏识逆来顺受、时刻准备紧跟"路线"的奴性,即使这条路线明摆着是错误的或者是罪恶的。

幸好,斯大林的影响没能改变真正的爱国者那些绚丽多彩的布尔什维克品质。大多数苏维埃人都忠于社会主义理想,有崇高的公民觉悟、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革命热情和对祖国的热爱,这一切没有被当时那种说谎、吹拍和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泥潭所淹没。当然,假如没有发生1937年的人民悲剧,那么人民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潜力本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

斯大林读的书不少,可惜在他的藏书中没有X·A·利奥连特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批判史》这本书。托马斯·托尔克马达这个宗教裁判所的首席法官,以"纯洁信念"把成千上万的人抛入篝火。异教徒的死亡只是促使托尔克马达去寻找一批又一批新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愿意的话,他是可以在托马斯·托尔克马达身上找到许多与自己相像的特点的。然而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的气魄与斯大林相比还差得远呢。

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

斯大林喜欢军队,喜欢军人,喜欢穿着元帅服对着大镜子照上一照。这套佩戴金光闪闪的肩章的制服显得威武端庄,很符合他的审美口味。武装力量受到他的青睐。"领袖"内心常常怀着某种自豪之情回


身着军服的斯大林

想起他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活动。也许他到各战线去的次数比谁都多（除托洛茨基外）。

斯大林本人几乎认识军队军级以上的所有领导干部。大多数元帅和集团军级干部，他还是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很熟悉的。即使现在，30年代末期，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也都由斯大林任命。"领袖"往往先听一下被推荐者的简要报告，对他仔细端详一番，稍事沉默后再谈上7—10分钟的话。他很重视未来司令员的作战经验、战场知识、在军队加强技术装备的条件下对军队建设的看法。有时候他会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些问题，像"你对德国的坦克怎么评价？""在现代条件下需不需要筑垒地域？""你对工农红军新版野战条令有些什么意见？"谈话结束时，他轻轻地握着激动万分的集团军司令员（军级指挥员或其他级指挥员）的手，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胜利，并嘱咐他们时刻坚持贯彻"党的路线"。然后再次仔细地打量对方，总想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对他至关重要的一点：此人是否忠诚于"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花很多时间跟负责研制新型技术装备和武器的人民委员、设计师、科学家交谈，亲自去参观军工新产品，有时也到试验现场去。他常常倡议召开讨论军队建设各类问题的会议，经常亲自出席。他很少发言，但总是通过即兴插话和他的意见把讨论"扭到"某个方面。例如，解决指战员的野战服和常服的供应问题和军装质量问题。

当然，斯大林关心这些问题并不只是出于他对军事的喜好。像任何一位国家级领导人一样，斯大林很懂得，一个政权的实际力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国际上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军事实力。从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的所有讲话中都可能看到，他在为法西斯危险不断增长、为西面和东面帝国主义的威胁日趋严重而忧心忡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几年里他心目中压倒一切的事情莫过于加强工农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令人忧虑的报道正是从1936年底起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条线上开始传送过来的。

斯大林同高级将领之间发生冲突的最初的征兆是德国探知的，这一

点值得注意。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局长、军级干部C·乌里茨基早在1937年4月9日*就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诚然，情报总局局长安慰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他还举出一个名叫阿图尔—尤斯特的人在《德意志汇报》上发表的文章作为佐证。那篇文章写道：今天“斯大林的专政需要非凡的支持。如果要在当前这个时候动摇军队的基础，那实在令人太惊讶了。眼下对于斯大林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之红军的绝对可靠性更重要的了”[⑩]。总书记自己似乎也正是这样想的。但正是为了“绝对的可靠性”，他开始“动摇军队的基础”了。何况从许多渠道紧接着就开始传来将军们中间正在组织反对派和策划阴谋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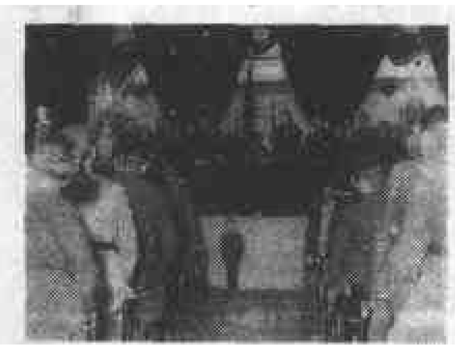
* 原文如此。此处应是1936年。
——译者



内务人民委员部

克格勃机构的前身，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7年12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历经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伯乌)、奥格普乌、恩克夫德、恩克格勃、姆格勃，直到1978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1991年退出历史舞台。

起初，叶若夫送来了一份载有罗沃斯(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材料的报告，那些材料是从巴黎弄到的，其中讲到“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这份文件极有可能是伪造的，至少也是某一个白俄侨民的杜撰；文件说，阴谋的首犯是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斯大林将这份报告转给了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并批示：“请阅。”在这份文件上没有发现他的两位战友作出反应的痕迹。很有可能是内容过于荒诞，因而对看这份报告的人，即使是对生性多疑、喜欢捕风捉影的斯大林也没有发生作用。这里应当再次说明，斯大林通常是很信赖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送呈的“公文”、“报告”和它们设立的“专案”的。这里我作一段插叙。



1938年乌尔里希、雅哥达、叶若夫参加奥格普乌及国家政治安全总部会议

30年代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处工作、后来又担任过“领袖”的警卫的A·T·雷宾

曾告诉我，有人向斯大林口头报告，说米·叶·科利佐夫跟“外国间谍机关”有“关系”。起初斯大林对这个信息没有在意。他记忆中还保留着不久前跟这位作家谈话的情景，作家给他的印象不错。可事隔一个月（有人有这个需要?！），有人给他送来一包公文，内有两份证据，是很熟悉科利佐夫的人提供的告密材料。斯大林下令查办这起捏造出来的案子。斯大林并不认为，有人会用书面报告欺骗他，使他产生错觉。他认为，只有他有权作出裁决。顺便提一句，斯大林的这个什么都相信公文的特点被叶若夫、后来又被贝利亚充分地利用了。一些告密、汇报、报告往往纯属虚构，但在斯大林的心理上却能找到相当适宜的土壤。斯大林满脑子都是“敌人”、“斗争”、“包围”、“阴谋”、“两面手法”、“暗害活动”这些范畴，所以对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许多熟知“领袖”在个人功成名就之时的特点的人都跟我讲过，说斯大林极好猜疑，就连自己身边的人如助手、亲属他都不相信。谢列平告诉我说，斯大林要求贝利亚对他的警卫人员进行特别审查，贝利亚就耍花招，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找出”一个“间谍”或者“恐怖分子”来，间或还汇报一些“可疑的”兆头、材料等等。例如，有一次，贝利亚下令把清扫工费多谢耶夫和他妻子抓起来，说他们策划“恐怖活动”，甚至窗帘布都得在离地面半公尺的地方截掉，以免那里面藏人。谁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斯大林会在哪儿睡觉，是在书房的沙发上还是在小客厅里，反正哪儿都得给他准备一套被褥。斯大林的房间，不是他召唤，除了贝利亚谁也不敢进去。斯大林在乘防弹车去自己的别墅时知道，他的每一次外出都是一次为保障他的安全而进行的作战，驾驶员米特罗欣旁边坐着贴身侍卫图科夫或者斯塔罗斯京（40年代），他们跟坐在护卫车里的人一样都随时准备好“捍卫”斯大林，以防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领袖”有凝视别人面孔的习惯。如果某人的眼神突然令他不满，那此人也就无法再留在他身边工作了。我要指出，尽管有关于有人几次想谋害斯大林的说法，但一直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任何文件，这些说法是贝利亚圈子里的人制造出来的。

一个统治者，要是经常生活在提防有人谋害他的氛围中，他就会对所有的人起疑心。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到几次袭击（最后恐怖分子终于得手）后，他的猜疑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次，他开枪打了自己的副官，因为副官当时做了一个剧烈的动作，沙皇误以为这名军



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图哈切夫斯基
(1893—1937)

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

1914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1918年参加红军，同年4月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战后在改革军队体质、改进军队装备、创建军事院校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37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不幸遇害。

官想行刺”[①]。所以，当我们触及斯大林的内心世界时，是不能不考虑到他那种非常重非常重的猜疑心的。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指出，甚至对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也怀有极度的病态性猜疑心理。也许，他完全信得过的只有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再加一个年轻女人，他的女管家瓦连京娜·瓦西里耶芙娜·伊斯托米娜。在娜·谢·阿利卢耶娃死后不久，这个女人就来到他家。一直到他生命终了之日，她始终伺候着斯大林，尽其所能地替他创造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而他这个冷酷无情的人，居然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女人对他的朴实的、然而却是真诚的关怀。总的来说，酷好猜疑是这位“统治者”的最大特点之一。

所以，斯大林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那里得到的消息一下子就加重了他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怀疑。正像卡尔登勃鲁纳过去的助手威廉·哈根(在《秘密战线》一书中)、H·维尔纳(在回忆录《帝国总理府(1933—1945)》中)以及丘吉尔等人所写的那样，斯大林“上了”柏林伪造的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和一批红军指挥员跟德国将军相“勾结”的文件的“当”。在卡纳里斯的机关里精巧地制作了图哈切夫斯基的签名，那是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访问柏林时跟德国一家公司在航空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签约时在文件上留下的真迹的仿制品。

这份伪造的文件使人以为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军界代表建立了秘密联系，以求通过暴力推翻斯大林。在柏林还演出了一场纵火和偷盗文件的闹剧，以造成这些文件到了布拉格的假象。关于这场大火，叶若夫曾多次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作了报告：

为补充我们那份德国军部失火的报告，今特将这次失火(1937年3月1日夜至2日。——本书作者注)的详细材料并盖世太保破坏委员会主任的报告副本呈上……

国家安全总政委 **叶若夫**

贝奈斯也许还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下令将这些文件送到莫斯科去的。这项情报使斯大林非常警觉，但他暂时只把文件交到叶若夫手上。对图哈切夫斯基加强了监视，并开始收集他的"材料"。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来就跟前副军事总检察长鲍·阿·维克托罗夫所叙述的一样。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领导了一个由军事检察员和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为在斯大林胡作非为的年代里遭受冤屈的人们平反。

他在札记里追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事实。维克托罗夫在翻阅1957年因破坏法纪罪被判刑的侦查员A·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案卷时特别注意到他的供词中的这样一段话："我曾在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弗里诺夫斯基(叶若夫的副手之一。——本书作者注)把我喊去，问我那里有没有什么军界大人物的案子过手。我告诉他我正在办一起原旅级干部梅德维捷夫的案件。弗里诺夫斯基给我下达任务：'应当把红军内部一个非常秘密的大阴谋揭出来，搞清这样的案子才能说明叶若夫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中央的功劳。'于是我就去执行这项任务。当然并不是马上有结果的，但我终于从梅德维捷夫口里掏出了所需要的有关工农红军中存在一起阴谋的供词。关于得到了供词的事呈报给了叶若夫。他亲自提审梅德维捷夫。梅德维捷夫向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表示，他提供的证词是杜撰的。于是叶若夫下令不管用什么方法也得叫梅德维捷夫承认原来的证词。这件事情做到了。一份用肉刑逼出来的梅德维捷夫提供的证词的笔录送上去了……"

此后不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阴谋分子"相继被捕。就在这以前，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托洛茨基在最近一期《反对派公报》中声称，"军方对斯大林独裁的不满很可能迫使他们举事"。这促使"领袖"采取坚决行动。但在作出逮捕图哈切夫斯基这位在人民中享有极大威望的军事领导人的断然决定之前，斯大林征询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的意见。莫洛托夫表示国外来的情报可信(顺便说一下，斯大林这

位过去最亲密的老战友至死都坚持这起阴谋是事实)；伏罗希洛夫不隐讳他对图哈切夫斯基长期以来抱有恶感；而叶若夫正想趁这件案子进一步发迹。因此很自然地他们都赞成逮捕"阴谋分子"。5月24日，斯大林在几经动摇后又迈出了把这场流血悲剧推向顶峰并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一步。他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发了一份供表决(用征求意见的方式)的文件，文件是这样写的：

根据对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与托洛茨基派—右倾分子(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反苏阴谋集团和参与替法西斯德国效劳的反苏间谍活动的揭发材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请就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党籍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的建议进行表决。

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约·维·斯大林[②]

全体一致表示"赞成"。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那些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非常了解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首长盲目地接受挑拨离间者的情报，对它信以为真，甚至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不顾法纪胡作非为的惯性已到了非常厉害的地步。无论是谁都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勇气来问一问："根据……的揭发材料"这句话包藏着哪些东西。参加表决的人中有些人比斯大林签发的那份建议走得更远。例如，布琼尼在那张调查表上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梅赫利斯，像在大多数这类情况下一样，写上"赞成"之后又在下面划上几道杠杠。无论是伏罗希洛夫和叶戈罗夫这两位图哈切夫斯基的老同事，还是后来谴责这一无法无天的行为的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当时都没有勇气不写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赞成"二字。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凭良心办事……而斯大林则又一次在他那张表上什么也没有写，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了！也许是他把自己完全跟政治局等同了起来，也许是想尽可能在历史上少留下一些他的阴暗的痕迹。莫不是斯大林深信他在俄国历史上将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斯大林早在国内战争时就认识图哈切夫斯基了。他知道图哈切夫斯基曾经指挥过第5集团军，水平很高。他记得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指出：

"鉴于第5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63]

斯大林顺着自己办公室的长桌踱步，一边在思索着生活竟是这样充满矛盾，只是几天以前，在作出逮捕图哈切夫斯基的决定之前，他邀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丘巴尔和米高扬去观看乌兹别克国立音乐剧院根据阿利舍尔·纳沃伊的长诗改编的《法尔哈德和希琳》。大家一致认为这出戏鲜明地反映出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清晨，斯大林打开当天的《真理报》，得意地读着苏联人新创造的一批又一批业绩。5月底，以奥·尤·施米特为首的极地考察队登上北极，并建立了漂流考察站；最近将召开第一次苏联建筑师代表大会(现在终于要建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城市和村庄了)。尽管数学这门学科对他来说特别陌生，但既然大家那样热烈地谈论伊·马·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可见他的工作确实为苏联的科学事业争得了荣誉……就连一则香皂降价15%的小消息也不能不使他感到高兴。这真像一个他所不知名的诗人正确地描述的那样："国家在前进中……" 可是有人要阻挠这一进程，企图不单单是"妨碍"，居然还要挡住由他引导的这股洪流。像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人不仅对他——斯大林，而且对整个国家都很危险。"这些豺狼成性的家伙，尽管你已让他们吃饱喝足……要叫他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贵族的血，而是无产阶级的血，硬是办不到。"现在，夜里12点，他把叶若夫喊来，让他汇报对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侦查情况。

斯大林一边听着叶若夫关于审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普特纳的情况汇报，一边在想着五个元帅中最年轻的这一位。一方面，"领袖"对于图哈切夫斯基那完美的职业素养、独具一格的战略思维和确凿无疑的理论天赋始终给予应有的评价；但另一方面，早从国内战争时期起斯大林就从心眼里对"资产阶级军事专家"抱有一种不信任感，他不大喜欢元帅对事物持有独立而大胆的见解，也知道他跟伏罗希洛夫关系紧张。他也

记得扬·加马尔尼克写给他的那封便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函中写道：

> 刚收到图哈切夫斯基写给您的一封信的抄件，信的内容是关于各军区军事委员会的事，恰好我要外出，所以无法详谈我对他提出的问题的看法。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信中同意撤销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张从各军区建制中取消军区政治部主任……
>
> 我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无论对平时还是对战时，尤其是对战时，都是绝对不正确的、有害的。
>
> **扬·加马尔尼克**

那时候斯大林是支持加马尔尼克的。他脑际又闪现出伏罗希洛夫给他看的一份图哈切夫斯基更早些时候写的书面报告。这位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在报告中给一些军事科学范畴下了定义，其中有“纵深机动”、“正面突击”、“侧翼迂回”、“遭遇战”等等。图哈切夫斯基又一次提出在广泛实施摩托化、加速军队技术改装的时代开展对“运动战”的理论研究问题。当时斯大林默默地听取了伏罗希洛夫不同意图哈切夫斯基“立论”的理由，人民委员还给图哈切夫斯基专门写了封回信。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档案馆里。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 我劝您尽快丢掉您那些书本味太浓的癖好。把您的全部知识和精力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将会即刻给党要求我们共同承担的事业带来明显的益处……
>
> 致共产主义敬礼！
>
> **克·伏罗希洛夫**[69]

国防人民委员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探索有一种病态性反应，因为这种探索会更明显地衬托出他的学问不大，在军队建设上跳不出那一套旧的保守的路子。因此，第一副人民委员在才智上大大高于他的上司的状况显然长不了。很难指望伏罗希洛夫会对图哈切夫斯基作出正确的评价，但却很容易推想到他会以很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图哈切夫斯基调任另一项较低的职务。果真不出所料，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

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可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

斯大林也不能不承认,就才智水平、理论修养、思维活力来看,图哈切夫斯基远远超过自己的上司,不过这也是常事。“领袖”认为第一把手未必一定要比自己的副手聪明。重要的是推行“路线”……伏罗希洛夫在这方面是强手,可图哈切夫斯基……叶若夫汇报的情况难以完全相信……可是托洛茨基在那本《被出卖的革命》中也暗示过……这位“无签证的公民”在奥斯陆的一次答记者问中就曾说:“红军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忠于斯大林。那里人们怀念着我。”而托洛茨基同图哈切夫斯基的私交又很深……斯大林在把自己回想起来的这些片断跟叶若夫的报告联系起来思索时,越来越相信工农红军中不仅存在着“法西斯阴谋”,而且它已成为一种可怕的现实。何况在又一次汇报时叶若夫报告说,“阴谋分子”终于“招认”了。这一下斯大林大概有一切理由记起《诗篇》第37首赞美诗(由于知道这首赞美诗,他曾赢得过很高的评价)中的一句话了:“我要说,并不是**我的敌**人战胜了我。”这里的敌人正是他的敌人,而不是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下令尽快进行秘密审讯,不得有任何延误。所有的人全部枪毙。他朝桌子那边转过脸去。只见桌上放有一本翻开着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面刊有图哈切夫斯基撰写的文章《论工农红军新版野战条令》。这篇文章还没有来得及“撤掉”,事态发展之迅速竟至于此。1937年6月初,审讯之前,在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半年之后这个委员会已经无法再开会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遭镇压了)听取了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所作的关于揭露“卑鄙的反革命军人法西斯组织”的报告。报告指出,阴谋分子的活动由来已久,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同德国军事集团有密切关系。报告确认,阴谋分子正策划杀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企图借助法西斯德国夺取政权。这次军事委员会会议有政府成员参加,会议的进行情况立即上报给了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案人”的命运早就决定了。在他们被捕以后不到两周,1937年6月11日举行了秘密审判。有关把被捕人员的案件移交法庭的消息只是到了开庭那天才见报的,而第二天就发表了判决公报。

审判进行得极其草率,而且惊人地不公正。上午9时开庭,午饭后不久宣布判决,审判便告结束。在审判席上就座的有:庭长,即办理这类案件的老手、集团军级军法官乌尔里希;两位元帅,布琼尼和布留赫尔;一

级集团军级干部沙波什尼科夫和别洛夫;二级集团军级干部阿尔克斯尼斯、德边科、卡希林和师级干部戈里亚切夫。审判是在没有辩护人、无权申诉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这是1934年12月1日的法律的规定。

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普特纳、普里马科夫、科尔克、埃德曼、费尔德曼面对自己的战友坐着。大家都是熟人。在法庭成员中未必有人相信他们面前坐着的真是"阴谋分子和间谍"。我想,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在内心深处也会萌发一线希望:组成法庭的人都是20年来在同一面旗帜下共同战斗过的,即使不肯倾听正义的呼唤,至少也会尊重一下战斗的同志情谊的传统吧……可是当时人们极少利用自己那种时刻存在着的良心发现的机会。这一次也一样,谁也不沾它的边……

本来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也应当出席这次审讯。要么作为被告,要么……作为法庭成员。请听加马尔尼克的女儿维多利亚·扬诺芙娜·科奇涅娃关于他父亲的最后几天是怎么说的吧。

"5月底,父亲病了,一会儿他觉得病很快就会痊愈,一会儿糖尿病又来折磨他。后来妈妈告诉我(当时我12岁),他知道5月27日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29日又抓了乌博列维奇、亚基尔(是在火车上直接抓的),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30日布留赫尔来看父亲。他们在远东时彼此就很熟悉,两人谈了很久。后来父亲对妈妈说,他们让他当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庭成员……父亲叫喊起来:'我怎么能这样!我明明知道他们都不是敌人……'父亲还说,布留赫尔说,要是他拒绝,他们就会把他抓起来。"

"31日,布留赫尔又来了,这次呆的时间不长。随后又来了几个人,查封了父亲的保险柜。他们说,他已被撤职,而他的副手奥夫谢皮扬和布林都已被捕。他们命令父亲呆在家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一走,我们就听到他房间里一声响……当我和妈妈冲进房里,一切都完了……"

维多利亚·扬诺芙娜沉默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想,这一枪是对斯大林让他去当审判自己的战友的法庭成员的回答,也是对无法无天行为的回答。当时父亲根本不可能作出别的回答。母亲被捕了,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判处8年徒刑。后来在劳改营里又关了10年,罪名是'帮助人民公敌'。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

的母亲,发来的通知说她于1943年死在劳改营里。我被送进幼儿园,成年后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了6年刑。随后开始流放……"

加马尔尼克一家人的命运在成千成万因冤案而受到株连的亲属中间是很典型的……

我在这里作了一段插叙,审讯几乎是闪电式的。一切都是事先定好了的。乌尔里希证明存在"军人法西斯阴谋"的主要依据是被告同德国武装力量的代表有过接触。上文已经说过,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曾率领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过柏林;亚基尔1929年在德国参谋总部训练班学习过;科尔克在那里当过武官。许多人都在外交招待会上、在演习时、在各种谈判过程中同德国代表有过接触。但所有的人(除了普里马科夫之外)都坚决否认跟德国有过什么"间谍关系"。例如,图哈切夫斯基在法庭上说:"会见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同他们谈话,都是官方性质的活动。这一切都是希特勒上台以前的事……"

被告部分承认对他们的"暗害活动"的指控,但否认是蓄意的行为,那不过是军事训练、军事项目建设、动员工作中的缺点和疏漏。支持"暗害活动"说法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必须靠裁减骑兵来加速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兵团的主张。在这里布琼尼给乌尔里希帮了大忙。由于被告不承认在预审中所作的供词,庭长就不断追问:

"你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作的供词,你们还承认不承认?"他们想逼迫被告承认审讯前编造的说法。

尤其是,如现在所查明的,对待所有这些著名的苏联军事领导人还充分使用了肉刑。

最后,还有一条罪名,就是"为使阴谋得逞,有人打算搞掉伏罗希洛夫(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普特纳、乌博列维奇都说,他们跟加马尔尼克一起想向政府提出撤换国防人民委员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不称职。他们坦率地说出的这个心愿被法庭断定为"阴谋活动"的表现。但是被告根据事情本身驳斥了认为他们是"替法西斯德国搞间谍活动和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的卑鄙的臆断。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在他们的最后陈词中都坚定地表示他们对祖国、人民、军队是忠诚的,并特别强调他们是完全忠于"斯大林同志"的。他们请求宽容他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失误。

普里马科夫的最后陈词在法庭上显得很不协调。他完全承认了官

方的指控，声称“是托洛茨基的旗帜把全体阴谋分子团结起来的，他们是忠于法西斯主义的”。普里马科夫说，他在侦讯时点出了70多人的名字，他个人知道他们都“参与了军人法西斯阴谋”。他说，阴谋分子的“头目”都有所谓“第二祖国”。如普特纳、乌博列维奇、埃德曼都有亲属在立陶宛；亚基尔有亲人在比萨拉比亚；埃德曼家有人在美国……被好几个月的拷问摧垮了的普里马科夫顺从地说了侦查人员布置他说的一切。如果说其余的人只是不到两个星期以前被捕，身上还留有足够的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普里马科夫这位驰名的国内战争英雄已经在铁窗下关了一年有余。正因为如此，这位原军级干部冷漠地毫无表情地叨咕了一遍别人在卢比扬卡街给他提示的那些荒谬绝伦的事情。

当时，只有具备某种特殊气质的侦查人员才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中工作得下去。那是一批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家伙，一批残忍的无耻之徒和暴虐者。曾经闯荡过斯大林的人间地狱的戈尔巴托夫大将回忆道：“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当年审讯我的那个恶棍姓斯托尔本斯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他能读一读我这一段话，体会一下我对他的蔑视。不过我想这一点他当时心里就很明白……至今我身边还响着斯托尔本斯基那恶狠狠的催促我的声音——当我浑身无力、周身血迹被人拖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催促我：‘签上你的名。签上！’第二轮刑讯时，我还挺住了折磨，但当第三轮开始时，我多么想赶快死了算啦！”

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中，专办特大案件的侦查员乌沙科夫（他的真姓是乌希明斯基）特别“有功”。他在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成立的平反委员会交待时写道：

“第一个被捕的是费尔德曼。他斩钉截铁地否认参加过任何阴谋活动，尤其是针对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活动……我提取了费尔德曼的个人案卷，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费尔德曼跟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指挥人员的个人关系很好……我把费尔德曼叫到办公室，把门锁上，跟他单独在一起，到5月19日傍晚他写下一个声明，说参与阴谋案的有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埃德曼等人……后来又叫我审讯图哈切夫斯基，他第二天就招了。我几乎成天不睡觉，要从他们嘴里掏出更多的事实，挖出更多的阴谋分子……即使在审判那一天，一大清早，我还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搞到了阿帕纳先科等人参与阴谋案的补

充供词。”

有一次，维辛斯基亲自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审问，他强迫他们在“我承认有罪。我不再申诉”一行字下面签名。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写了申诉，写了请求宽恕的呈文。

图哈切夫斯基的同事也都经历过别人“强有力的”开导，包括恐吓、威胁家属、滥用暴力。侦讯时还给被告暗示，只有认罪，才能保全性命……

乌尔里希和叶若夫在宣布判决以前到斯大林那儿去，向他报告案件审理过程和被告的表现。乌尔里希恭敬地把判决方案放到桌子上。斯大林连看也没看就随口说了一声“同意”。沉默片刻，他问道：

“图哈切夫斯基的最后陈词说了些什么？”

“这个坏蛋，他说他忠于祖国和斯大林同志，请求宽恕。”叶若夫急切地回答，“但他很快就露了马脚，他是在耍滑头，他并没有缴械投降……”

“法庭上情况怎么样？那些到庭的成员表现怎样？”

“表现积极的只有布琼尼……法庭成员基本上不吭声。阿尔克斯尼斯、布留赫尔，好像还有别洛夫，每人提了一两个问题……”

对法庭的组成斯大林一开始就表示怀疑，这时他当即下令仔细地“查一查”这些人。除去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之外，所有的人不久后都被捕了。而二级集团军级干部卡希林(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几天后就被抓了起来……不知怎么搞的，斯大林又想起了国内战争快结束时，有一次要在加米涅夫那里开会，与会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几位指挥员由于华沙一仗失利都不大好受，会后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员在跟斯大林告别时略带忧郁地念道：

“我的命运在高声呼喊，使我全身每一根微细的血管都变得像怒狮的筋骨一样坚硬……”

斯大林疑惑不解地望着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微微一笑，补了一句：“那是哈姆莱特见到父亲的鬼魂以后说的一番话……”军事委员会委员没有表示这些话对他有什么“恶意”。也许“命运在高声呼喊”除外。

斯大林在审讯开始前就已经知道对“阴谋分子”的判决了。他早在发出逮捕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时就知道了这个判决。对于被告最后陈

词中提出的宽恕他们的请求，斯大林未予置理，照他的话说，他不喜欢“故作多情”。6月12日夜间所有的人都被枪毙了。普里马科夫也不例外，尽管给他许过愿，说只要真心认罪，就能保全性命。

人的生命犹如从一出世就盛放在易碎的水罐中的神奇的液体。它那最玄妙的特点在于它是不间断地从罐子里流淌出来。这器皿是不透明的，只能猜度里面还剩下多少生命之汁……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案人”是一批充满活力、有自己的抱负和希望的人。但是暴君的铁蹄残暴地踩碎了他们的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的生命之罐，用他那“钢铁般的”脚掌把这些器皿变成了一堆破片……

《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一篇以《对特务和祖国的叛徒现在和将来绝不手软》为题的社论。它的使命是对审判案作出一种总结性的报道。社论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再一次粉碎了由叛徒和敌人组成的一伙匪帮。潜伏在我们光荣的红军队伍里的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一伙尽管把罪恶活动隐藏得很深，使尽了间谍的伪装伎俩，也全然无济于事……正如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命令中指出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消灭我国的苏维埃制度，颠覆我国的苏维埃政权，推翻工农政府并在苏联恢复地主和工厂主的压迫制度……图哈切夫斯基及一伙准备在我国扮演西班牙人民的可鄙的敌人佛朗哥那样的角色。”[69]

但是，惩治军事干部的悲剧并没有到此收场，那仅仅是开了个头。梅赫利斯之类的人物现在正在加紧工作。他们的每一个电话、每一封电报、每一份报告都会使许多人遭到诽谤、牺牲和痛苦。下面是梅赫利斯在那个悲惨的年代拍发的两份电报。

莫斯科国防人民委员部夏坚科

工农红军政治部库兹涅佐夫：

参谋长卢金是个极可疑的人物，他跟敌人厮混，跟亚基尔有旧。旅级干部费多罗夫处想必有很多他的材料。在我写的关于安东纽克的报告里就对卢金很注意。尽快把卢金收拾掉，这不会有错的。

梅赫利斯

7月27日

斯大林同志：

我已免了250名政工人员的职，其中大多数人已被逮捕。但清洗政治机关，尤其是基层，我还远没有搞完。我想在我还没有大体摸清军队领导班子的情况之前暂时还不能离开哈巴罗夫斯克……

梅赫利斯

7月28日[60]

继所有这些为"大体"摸清情况而进行的工作之后，军队里出现了一片更加凶险的恐怖景象。梅赫利斯和像他那样的一些人在斯大林的赞许下"铸成"了1941年的失败，这失败使祖国又有千百万生灵横遭牺牲。开列着那些受害的而不是在战场上为祖国捐躯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名单，看起来就像是一篇篇骇人听闻的祭文，一篇篇令人悲痛的、老也念不完的祭文。而悲剧仍在延续。旅级干部梅德维捷夫被处决了。他曾在严刑拷打下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叶若夫像他的前任雅哥达一样开始做灭迹的工作。参与审理图哈切夫斯基集团的特别法庭的大多数成员很快都遭了殃。他们当中有布留赫尔元帅、集团军级司令员卡希林、阿尔克斯尼斯、别洛夫、德边科……我手头就有德边科在被捕以前从列宁格勒寄给斯大林的一封信。请听听他的呼救声吧。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按照政治局和政府的决定，我似乎成了我们祖国和党的敌人。我现在成了政治上被隔离起来的活尸。可这是为什么？这是怎么搞的？难道说我知道由政府正式安排、有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正式代表陪同到中亚来的美国人是专门的间谍？在去撒马尔罕途中我没有跟美国人单独在一起呆过一秒钟。我可是不懂美国语(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人……

克伦斯基挑拨离间的声明以及刊登在白卫报刊上的报道说我是什么德国间谍。难道说我忠诚老实地为祖国和党工作20年之后克伦斯基这个白卫分子竟还用挑拨离间手法对我进行报复？这岂非咄咄怪事！

叶若夫同志手里那两份'民族'饭店服务员写的材料有一部

分内容是真的，有时候遇到熟人到饭店来看我，我是跟他们一起喝过酒。但从未有过酗酒喝醉的事情。

说我要了大使馆人员隔壁那一号房间？这真是跟荒唐透顶的挑拨离间同出一辙的无稽之谈……

我对集体化建设抱有富农情绪吗？最近九年来跟我共事的戈尔金、尤苏波夫和叶夫多基莫夫等同志完全可能散播这类胡言乱语的……

斯大林同志，我恳求您把一系列事实调查个水落石出，把我不应该蒙受的耻辱洗刷掉。

帕·德边科[67]

过了不几天，集团军级司令，1912年入党的党员，十月革命时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德边科被逮捕，"被审判"，被枪毙了。侦查他的案件的人未必知道，在他们面前的人是一个传奇人物。当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准备从加契纳进逼彼得格勒时，成功地"说服了"他们、让他们调转枪口去对付临时政府的正是这位革命的水兵德边科……

斯大林在德边科的信上只是批上了："转伏罗希洛夫阅。"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国防人民委员都不愿意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操心，可他在临死之前却还被迫"审讯过"一位苏联元帅呢。

斯大林深信反对他的"军人法西斯阴谋"即使并不实地存在，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他开始琢磨：图哈切夫斯基死后谁"能"成为这起阴谋的头子呢？今天，他看了情报总局副局长亚历山德罗夫斯基送给他的从德国截获的一份报告。其中有德国官方军界对红军领导人的评价。现在，柏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看法，他认为已失去意义。关于布留赫尔，报告不知为什么说他是"俄罗斯化的德国人"，并强调他是苏联军人中最有权势、最有威望的一个；关于叶戈罗夫，德国参谋部人员认为是具有"分析头脑"的极"厉害的军事长官"。而斯大林未必需要这样的人。像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样百依百顺、看问题一般的人他最称心。深夜，在孔策沃别墅的小路上散步时，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情。

1932年2月20日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剥夺托洛茨基和随同他一起离境的人的苏联公民资格的法令后不久，这位被驱逐出境者给全俄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对这项法令的答复。托洛茨基在信中写道:“反对派蔑视2月20日法令,正像工人蔑视在他们去工厂的路上的一方水洼。”这封信最后号召:“打倒斯大林!”在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托洛茨基在他的一次演说中声称:“即使在最高层,包括在军界领导层,也有不满斯大林和支持我的‘打倒斯大林!’口号的人。这样的人在那里不会少。”

现在,图哈切夫斯基不在了,斯大林想,还剩下四名有权势的军事领导人,四名元帅。托洛茨基不是暗示过这样的人“不少”吗……对伏罗希洛夫他不怀疑,这个人的一生,他能步步高升,都是凭借传奇,凭借个人的老本,凭借……他斯大林的青睐。布琼尼……一个勤勤恳恳的军人,但也仅此而已。是的,叶若夫报告过,说布琼尼的妻子跟某些外国人有染,那就让他去弄弄清楚吧……不,这两个人不会反对他的。可布留赫尔和叶戈罗夫呢?尽管他在国内战争时就很了解,但现在显然已经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连柏林的德国人对他们也另眼相看了。叶戈罗夫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就对他不满意。有过一封信是检举叶戈罗夫的,应当让叶若夫去把信上讲的情况核查一下。斯大林散步回来后又把寄给他的这封信仔细看了一遍。信是这样写的: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在工农红军的组织和我国武装力量的战略战役使用方面有一系列重大问题,照我看来都作了错误处理,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这会在战争最初阶段造成重大失利和大量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斯大林同志,我请求:

检查叶戈罗夫元帅担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期间的活动情况,因为实际上他应对我国武装力量的战略战役使用准备和组织体制方面所出现的错误承担责任。

我不知道叶戈罗夫同志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背景,但他作为总参谋长的实际活动却值得怀疑。

1912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

扬·日古尔

1937年11月9日[68]

写这封信的扬·马蒂索维奇·日古尔是个旅级干部，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某教研室工作。无穷无尽地要求人们提高警惕，在那些噩梦般的日子里已成为生活中正常现象的肆无忌惮的不法行为，使许多人误人了歧途。日古尔曾是沙皇军队的中尉，坚决拥护革命，积极参加国内战争，两次负伤，得过红旗勋章。可是这封信没有救了日古尔的命，就在1937年他也被捕，不久就被处决了……

斯大林命令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叶若夫，要他"注意"叶戈罗夫。

两个月之后，叶若夫"核查"并"弄清楚"了，而且又送来一份"文件"。这是叶戈罗夫以前的一个同事被迫写的，此人后来成了苏联的高级军事首长。元帅的这位战友回忆说：

"1917年11月间，我是出席在什托克莫兹戈夫举行的第1集团军代表大会的代表。会上我听了当时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亚·伊·叶戈罗夫中校的发言。他在这篇发言中称列宁同志为冒险家，是德国人派来的。总之他的讲话是要士兵们不相信列宁。"[69]


叶戈罗夫元帅被斯大林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尽管在这以前元帅的命运早已决定，但是这封信还是起到了确认叶戈罗夫"暗害分子本性"的作用。在同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讨论了"调查"结果之后，在一个小范围内作出决定，把叶戈罗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将案子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办理。另外还冒出了件牵扯到他妻子的"败坏名声"的事。

1938年2月28日至3月2日采用向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定：

关于叶戈罗夫同志。

鉴于叶戈罗夫和已被逮捕的阴谋分子别洛夫、格里亚兹诺夫、格林科、谢佳金等人当面对质的结果表明，叶戈罗夫同志政治上比之对质之前人们所想象的更加声名狼藉，并注意到叶戈罗夫与之恩爱相处的娘家姓采什科夫斯卡娅的妻子原来是一个老牌的波兰女特务(这从她本人的供词中已经昭然若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取消叶戈罗夫同志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的资格。

约·斯大林[70]

这次又是一致通过。不用说,斯大林那张调查表上又是"干干净净的"。要知道,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跟叶戈罗夫同喝过农家一个盆里的菜汤,同盖过一件士兵的大衣睡觉……可这都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如今已毫无意义了。

现在还剩下一个"可疑的"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也许他是战前时期最著名的军事首长。被捕以前,他胸前挂着四枚红旗勋章。其中一枚还是第1号红旗勋章。授与他的红星勋章中也有一枚是第1号。布留赫尔还是第一批荣膺两枚列宁勋章的人之一。

斯大林在1938年7—8月著名的哈桑湖事件时就对布留赫尔有反感,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苏联境内的两块高地:一块是无名高地,一块是扎奥焦尔纳亚高地。人民委员下令消灭侵略者!但执行这个命令时出现了障碍,红旗远东独立集团军司令员没有轻率地将号令付诸实施,而是决定精心地作好准备。他被叫到直通电话机旁跟斯大林通话。对话时间不长,但很能说明问题:

斯大林:布留赫尔,您说,为什么国防人民委员关于用空军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我国整个领土包括扎奥焦尔纳亚高地的命令不执行?

布留赫尔:我报告。飞机随时准备起飞。之所以耽误,是因为气象条件不好。我马上命令雷恰戈夫(空军司令员。——本书作者注),不顾一切让飞机升空,实施攻击……飞机现在就可以升空,但我担心如果轰炸势必会误伤我们自己的部队和朝鲜的村庄。

斯大林:布留赫尔同志,您老实说,您是不是愿意真的跟日本人作战?如果您不愿意,您就要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那样直接说出来;如果您愿意,我认为,那您就应当立即到现场去。

您怎么会怕轰炸中误伤朝鲜的老百姓,又怕空军因有雾而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我真不理解。既然我们的人一批接一批地挨日本的揍,您管他朝鲜人干什么!要是布尔什维克空军真想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有那么几层云又算得了什么!我等着您的答复。

布留赫尔:飞机将受命起飞,第一批歼击机机组将在11点20分升空,

雷恰戈夫答应13点让空军出击。我和马泽波夫1个半小时后出发，如果布良京斯基（马泽波夫和布良京斯基都是空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本书作者注）能早些走，我们将一起飞往伏罗希洛夫城。您的指示，我们马上执行，我们将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确性执行您的指示。[71]

梅赫利斯（1889－1953），在苏联卫国战期间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被斯大林派到远东去的梅赫利斯还对莫斯科的领导人煽风点火，他在汇报时对布留赫尔进行诋毁，说远东集团军的领导态度不坚决。

斯大林对布留赫尔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不久就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又无意找他谈话。有一段时间元帅就这么闲呆着；后来，1938年10月22日他就被捕了。逮捕证是叶若夫签发的，可叶若夫本人没过几个星期也去了他曾经把成千上万人送去的那个地方……



红星勋章是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0年4月6日命令设立的。授予战时和平时在国防事业中有卓越功勋的苏军官兵、部队、舰队、兵团、劳动者、劳动者集体、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1930年，布留赫尔元帅成为第一名红星勋章获得者

布留赫尔被投进镇压机器时。适逢它已减慢了运转速度。起初人们以为他能保全性命。苏联人民委员和联共（布）中央委员全的十一月决定（1938年）指出存在着粗暴破坏法制和违反实施侦查程序的情况。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掀起镇压浪潮（这个浪潮在全国翻腾了两年）之后，不能不感到它那巨大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正式报告和演说中，整个这场屠杀仍被称作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阴谋分子和暗害分子的一次伟大的胜利”。当时负责侦查布留赫尔案件的贝利亚对中央的决定置若罔闻。

声誉卓著的元帅被审讯了好几天，人们要他承认参与了“军人法西斯阴谋案”。布留赫尔表现得很刚强，对他的诬陷一概予以驳斥。说

不定，当元帅受到残酷折磨时，他回想起了自己怎样作为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成员参与（诚然，当时他一语不发）对图哈切夫斯基的不公正的审判。他当时并没有凭良心办事，去缓解一下注定必死的第一位苏联元帅的处境。而现在他本人也落入了贝利亚之手……

据曾侦查过这起案件的鲍·阿·维克托罗夫证实，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布留赫尔大约是11月5日或6日，那时元帅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无法辨认。他的脸上有一层厚厚的血污，一只眼珠被打了出来。显然，在伟大节日的前夕贝利亚的打手们想了结他们那肮脏的勾当。1938年11月9日，在贝利亚的刑讯室里又一位苏联元帅惨死于非人的折磨之下。他死了，但没有屈服，没有承认那些荒诞离奇的谎言。

在那以前，枉法的断头台上那把屠刀已经杀戮了几千名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和政工人员。他们当中有：伊·瑙·杜博沃伊、扬·卡·别尔津、米·德·韦利卡诺夫、叶·约·科夫秋赫、伊·费·费季科、约·斯·温什利赫特、A·C·布林、Г·A·奥谢皮扬、M·П·阿梅林等许许多多人。

在我面前放着好几本载有遭镇压的军事首长的人名录，包括他们的级衔、姓名、职务、受过的奖励、牺牲年月……大多数指挥员都比较年轻，这是军官中的精华，一般都经历过国内战争的考验，是他们构成了一支新型的军队。为要更深切地感受因斯大林发疯所造成的永世的悲痛，让我们任意翻开其中的一本，并记下死者的姓名，可他们并非死于跟法西斯的斗争，而是死于“领袖”的意志。这里列举的只是一两页……

卡尔梅科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军级衔。步兵第20军军长。列宁勋章和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枪决。

卡列夫，格尔曼·斯捷潘诺维奇。旅级衔。步兵第135机枪旅旅长。1937年被判处枪决。

卡辛，格里戈里·尤斯蒂诺维奇。旅级衔。步兵第45军军长。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8年被判处枪决。

基里琴柯，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旅级衔。骑兵第23师师长。列宁勋章和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克尼亚格尼茨基，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师级衔。基辅筑垒地域司令。两枚红旗勋章和一枚红星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科扎诺夫，伊万·库兹明。二级舰队级衔。黑海舰队司令员。红旗

勋章和红星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科索戈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军级衔。第4哥萨克军军长。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科汉斯基，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尼斯拉沃维奇。师级衔。第5重型轰炸航空兵军军长。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克拉斯诺夫，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师政委级衔。工农红军干部部副部长。1937年被判处枪决。

古比雪夫，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军级衔。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四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库佳科夫，伊万·谢苗诺维奇。军级衔。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副司令员。三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8年被判处枪决。

库钦斯基，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师级衔。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37年被判处枪决。

库塔捷拉泽，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师级衔。步兵军9军军长。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克鲁格，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旅级衔。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司令部处长。1937年被判处枪决。

*原文如此，此处应是白俄罗斯军区。
——译者

基列耶夫，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一级分舰队级衔。太平洋舰队司令员。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科尔克，奥古斯特·伊万诺维奇。二级集团军级衔。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37年被判处枪决。

卡林，费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军政委级

衔。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1937年被判处枪决。

卡希林,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二级集团军衔。工农红军军训部部长。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8年被判处枪决。

凯里斯,罗穆亚尔德·伊西多罗维奇。旅级衔。步兵第61师师长助理。1937年被判处枪决。

克洛奇科,伊万·加夫里洛维奇。旅级衔。总参谋部军事历史处处长。红旗勋章获得者。1937年被判处枪决。

科热夫尼科夫,亚历山大·季莫菲耶维奇。师级衔。乌拉尔军区副司令员,两枚红旗勋章获得者。1938年被判处枪决。

这本满纸悲怆的人名录我是从以字母K打头的地方翻开的,可是一翻起来就仿佛没有尽头……接下去还有许许多多以"K"打头的姓氏:卡甘、卡丹基、加尔宁、卡里宁、卡尔万、卡利普斯、坎格拉里、卡普采维奇、卡尔波夫、卡尔马柳克……老也到不了头……被悲惨地中断了的生命知多少啊!他们都是何等样的人呀!而且全是冤死。

所有这些军人以及千千万万其他军人的名单都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其他领导人经手的。需要有多么可怕的残忍心和猜疑心才会去相信那些离奇荒诞的告密材料和报告啊!

武装力量遭到的打击实在太严重了。无论是希特勒的特务机关,还是流亡国外的白卫分子,间接的也包括托洛茨基,都未必能想象到,他们那些离间种子竟找到了如此肥沃的土壤。经过上述这一整个奋力巩固个人专权体制的过程后,"领袖"已经万事俱备,可以放手采取任何行动——不折不扣的罪恶行动了。实际上所有的副国防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几乎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和集团军级干部都被处死了。根据现有的资料和我们所作的统计可以得出结论:1937—1938年间牺牲的旅级以上干部占陆海军军政干部总数的近45%。一支损失如此惨重的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会大大丧失战斗力。例如,培养一个集团军级干部就不可能像培养一个中尉那样经过六个月的速成训练就可以了,为此需要多年的服役和学习。而提拔干部的基础又被缩小到了极点。大战前夕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为战争初期和实施战争制造了极其艰难的客观条件。1937—1938年"军队大屠杀"中许多人无辜牺牲的后果便是伟大卫国战争各个战场上出现的更大伤亡。

1938年11月底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召集会议,伏罗希洛夫在报告中列举的数字十分惊人。我来把这些数字重复一遍:"1937—1938年,我们从红军中'清洗掉'4万多人。仅1938年一年提升和调动职务的就达10万多人!军队领导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原来的委员只剩10人……"不难想象各军区的情况会是什么样了!

1938年3月初,基辅军区司令员铁木辛哥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汇报了他们的巨大成绩:一年之内从军区各部队"清洗掉的敌人"将近3000人,其中被逮捕的超过1000人。军师两级的所有指挥员实际上都已"更新"。由于"消灭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军区各部队的实力增强了。[22]

难道人们没有看到这疯狂举动的严重后果吗?许多人是看到的,只不过他们保持沉默。诚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可以令人宽慰地说,即使是在那个严酷时期也还是有凭良心办事的人。我手头就有一封旅级干部C·П·科洛索夫写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信。信中写道:

> 有两个指挥员在电车上相遇。他们攀谈起来:"近来怎么样?我们那里是'一场混战';谁谁被捕了,谁谁被抓了,等等等等。"另一个说:"我现在很怕说话。要是说错了,马上就会变成人民公敌。"胆小怕事已成为正常现象……
>
> 您要是掌握1937年一年您从工农红军里开除了多少人的数字,那您就会知道令人痛心的真相。
>
> 您可能会把我说成是危言耸听者、托洛茨基分子、人民公敌,等等。我不是敌人,但我认为,这样下去我们是会走上绝路的……
>
> **科洛索夫**
>
> 1937年12月5日[23]

我不知道科洛索夫的命运怎样,但这位英勇的指挥员的信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除了斯大林之外,许多人都很清楚,军队在面临严重考验之前已经大伤元气。可是对权力的渴求,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权力的欲望(虽然只是假想的阴谋分子在威胁它)却比对祖国安

全的最起码的关怀更为强烈。事实说明,在"我"和"祖国"之间作出选择时,"统治者"考虑的是他个人。

面对着俄国历史上这令人悲痛的篇章,人们不禁要一遍又一遍地发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是为什么呢?这种残酷暴戾、无法无天、肆意猜疑的局面,这种听任许多卑鄙家伙为所欲为的局面,怎么竟能出现而且保持下去的呢?难道所发生的这一切真的证明操纵这次干部大屠杀的斯大林握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吗?他那所谓"人比任何机器都宝贵"的说法,今天听起来多么含有讽刺意味啊!

实际上,斯大林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要知道,是他首先造成了一场社会灾变,一场在我国历史上大概是最病态、最悲惨的灾变。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就会渐渐得出结论,斯大林的"力量"并不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力量"在于他建立并利用了国家和党的机构,把这个机构变成了他的意志的驯服的执行者。没有这个机构,他就根本不值得一提。依仗这个机构,他逐步培植起了一种社会关系体系,那时他的每一句话、每一项指示、每一道命令、每一个号令都会被成千上万人甚至千百万人**信以为真**,并在他们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斯大林在实现了彻底的专权之后知道,要想保持这局面,就必须进一步完善机构,包括党的机构、国家机构,以及像当时人们所说的惩罚机构。靠了这些机构,斯大林就能控制社会意识,开展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运动,剪裁历史画卷,奠定以他和他的思想为中心的"新"世界的基础,提出作为神灵启示的目标。斯大林并不怀疑,这些机构会把**人民**从体系中排挤出去,让人民仅仅充当执行者、劳动者,使他们只能去"赞同"、"支持"、钦佩"、"热爱"他这位惟一的"领袖"。用这样一种变态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不仅使社会主义的理想变得苍白无力,而且客观上削弱了它的吸引力,并最终使人们对其真理性发生动摇。因此,斯大林的"力量"在于严重地违反民主主义,在于他的方法是搞极权统治,在于他用专制的观点来看待正义、兄弟情谊、人道主义这样一些永不过时的价值观。然而,在斯大林的"力量"中从来就蕴含着个人专权和思想划一必然遭致最终失败的起因和根源。

在1937—1938年间,斯大林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构筑并加固个人崇拜的殿堂。而在斯大林的意念中,这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似乎认为,他有权这样看问题。

这里我们不能不回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他们在批判卡莱尔关于英雄和领袖有权进行统治的理论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24]。斯大林是不能没有鞭子的。可是，这根鞭子抽死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必须物色另一个执行者。必须把原先按照他的指示充当这根鞭子和使用这根鞭子的人换掉才行。

斯大林式的恶棍

1938年年初，暴力肆虐达到顶峰。斯大林不断接到关于某个工厂、铁路部门、人民委员部的干部遭到浩劫的报告。镇压的惯性在按自身的规律发生作用。每捕一次人都要揭出一些新的“同谋犯”；野心分子看见提拔有望，就越来越多地投递告密材料，有时候告密成了对亲属遭到镇压的报复……形势的发展开始出现失控的趋势。1938年夏季斯大林决定按他自己所喜爱的方式行事：撤换他的执行者，让他们对“过火行为”、“滥用职权”、“擅权”等现象负责。他决定沿用集体化时期的做法，指控执行他的意志的人犯了各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罪孽。叶若夫当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斯大林对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发现他是一个十足的卑鄙小人。可那时候报刊文章已经给叶若夫头上罩上了“天才的契卡人员”、“斯大林最忠实的学生”、“一个能够看透别人内心世界的人”的光环……就连米哈伊尔·科尔佐夫也为盲目的舆论所左右，竟在《真理报》上把这个道德上的侏儒形容为“神奇的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他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神速地解开并斩断法西斯阴谋的密网”[25]。唉！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要想真正看透一个


1938年斯大林跟他的亲信们在一起

人或者一件事，需要好几年时间，有时起码也得好几个月。更何况当时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戴着斯大林牌的有色眼镜看待一切的。

斯大林很快便弄清了叶若夫原是一个很平常的酒鬼、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灵活性和洞察力的人。“领袖”对叶若夫的极其无耻、极其凶残(这位人民委员常常亲自进行审讯)并不反感，但他无法容忍在他身边有意志薄弱的人。斯大林有一个深刻的信念，嗜酒过度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在他周围并受到他特别看重的那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赫鲁晓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等，除了对他绝对忠诚之外，还具有表现这种忠诚的坚强意志。例如，他周围的这些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亲属遭到逮捕。是的，就是他斯大林逮捕的，因为不经他准许，无论是叶若夫还是贝利亚都不敢干这样的事。如果有谁，不管是加里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其他一些跟“领袖”形影不离的什么人物，要为自己的亲属说情，那就说明此人缺乏政治意志。大家都知道斯大林不能容忍这一点。在他的概念里，所谓政治意志也就是随时准备为效忠他而牺牲一切。斯大林是一个既有坚强意志、又很残暴的人，他不能容忍有哪个“窝囊废”在他身边。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统治者”的鞭子。这里情况不一样。需要又一只“替罪羊”。这个角色斯大林让叶若夫来扮演。

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叶若夫的副手，跟平素一样，是有长远打算的。早在1938年9—10月间，尽管叶若夫当时表面上还在位，实际上贝利亚已经控制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我手头有几份经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由乌尔里希签署的揭发报告，尽管并未写明职务，但已经发给“国家安全一级政委贝利亚”了。报告签发的几个日期都在1938年10月。诚然，叶若夫1938年12月7日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后，在政治舞台上还露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成了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1月21日在为列宁逝世15周年举行的纪念会上，他坐在斯大林身旁。此后叶若夫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早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上叶若夫就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机构。他是在主持水运人民委员部的一次会议时被“抓走”的。当时闯进来两个人，把住门口。他一下就明白这下完了。斯大林要他的命！一个把不计其数的无辜者送上西天的人，到这时候却表现得极其下贱：跪在地

上乞求宽恕。"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只活了不多几个星期。众所周知,他是被枪毙的,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根据什么被指控,我未能弄清。话说回来,对成千成万的无辜蒙难者同样也有个"何时"、"何地"的问题。

1938年年底,贝利亚在斯大林"恩准"下完全投身到"工作"中去了。他的第一件事是清洗叶若夫的党羽。像弗里诺夫斯基、扎科夫斯基、别尔曼这些还在雅哥达时期就在干害人勾当的凶神恶煞都被判处枪决了。接替他们的是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戈格利泽和察纳瓦、鲁哈泽和克鲁洛夫一类效忠新主子的人,贝利亚的人。

为什么斯大林选中了拉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呢?他过去很了解他吗?为什么这个人竟会如此迅速地博得"领袖"的特殊信赖呢?这个冒险家怎么会很短时间就上到了最高几级权力台阶,当上了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元帅,甚至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呢?


斯大林、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女儿在别墅里

斯大林大约在1929—1930年间,当他在茨哈尔图博疗养时第一次与贝利亚相遇。贝利亚当时是外高加索格伯乌的头目,他负责"领袖"在疗养地的安全工作。斯大林跟他谈过几次话。尽管此人就连外表长相都十分令人生厌,但他却有转眼便能捕捉到"领袖"心愿的本事。贝利亚在其仕途之初巧妙地利用了他妻子尼娜·格格奇科里(和她的哥哥,一位革命家)认识谢·奥尔忠尼启则这一点。也许,在最初阶段这一点帮了他的忙,但不久,奥尔忠尼启则就"看透了"这个冒险家,而且对贝利亚的发迹抱着极为反感和保持戒备的态度。还有许多熟悉贝利亚的坦诚的布尔什维克也都对这个野心家持严厉否定的看法。例如全俄肃反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安全总

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三朝元老季捷·伊拉里奥诺维奇·洛尔德基帕尼泽就曾试图让莫斯科当局认清这具妖尸的面目。结果却是洛尔德基帕尼泽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被免除了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而贝利亚于1937年便把他搞掉了，因为此人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太多了。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贝利亚的飞黄腾达之路整个是由无数人的牺牲铺垫成的。

贝利亚作风“泼辣”，气派威严，处理问题果断，对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情况了解透彻，——这一切给斯大林留下了颇深的印象。的确，有人跟斯大林讲过(他已经记不清是谁了，好像是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贝利亚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国内战争时期跟木沙瓦特党人、达什纳克党人有联系。还有人告诉过他这位外高加索格伯乌的头目特别好钻营。但斯大林认为这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个优点，这样的人老是钓在你的“钩”上。你看维辛斯基，过去是孟什维克，还签发过要把列宁抓起来的逮捕证，可现在干得多起劲！还有梅赫利斯，以前也是孟什维克，可现在再也没有谁比这个人更忠于他斯大林的了。



拉·帕·贝利亚
(1899~1953)
苏联元帅

参加过卫国战争，领导研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格鲁吉亚以肃反起家，是叶诺夫的接班人，在1939年至1953年主管肃反工作，在斯大林逝世三个月后，由东德镇压反苏运动回国后，被逮捕以叛国罪被枪决。

贝利亚在1935年7月所作的报告《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给总书记留下了好印象。这个报告先在报刊上发表，后来又印成单行本。贝利亚在报告中“揭露”阿·叶努基泽伪造历史，而主要的是报告人证明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中起过特殊的非凡的作用。当然，“领袖”看到，报告中有许多地方“牵强附会”，与事实不符，添油加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更加突出他在使边疆区布尔什维克化的历史上的地位。贝利亚的

那番诚意,他那种坚定而不妥协的精神,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

斯大林没有忘记，正是他于1931年10月把贝利亚调去做党的工作(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而两三个月后又是根据他的建议贝利亚当上了第一书记。诚然,为此不得不把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奥拉赫拉什维利、雅科夫列夫、达夫达里安尼等人调离外高加索,因为他们都反对提名贝利亚。几年之内,斯大林认为贝利亚已经把外高加索治理得"井然有序"。贝利亚在1937—1938年间的几次全会上都作了很成功的即兴插话,很符合斯大林本人的想法和讲话的精神,对此"领袖"十分满意。

例如,斯大林记得(他从不叫喊记性不好)在1937年中央2至3月全会上贝利亚所作的插话。

他冲着正在发言的亚速海—黑海党组织书记叶夫多基莫夫质问道:"我们把瓦尔达尼扬撵出外高加索,你们就把他留下,怎么能这样做呢?"

接着他又问:"我们把阿西洛夫开除出党，你们为什么竟提升他呢?"

"我们执行斯大林同志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揭发出七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两名梯弗利斯市委委员。早在1936年我们就逮捕了1050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8]

当时,镇压的浪潮刚刚掀起,可贝利亚已经跑到前面去了。斯大林听的时候可能在想,虽然贝利亚搞党的工作已有几年,但始终不失一个"契卡"的本色。斯大林未必会讨厌这样一种想法:应把贝利亚看作契卡,尽管今天只能说那是一种轻慢。捷尔仁斯基也是契卡,可是在这个"革命骑士"和那个被斯大林赋予巨大权力的败类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 说句公道话,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贝利亚的真"本事"。他的任命正好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1月17日《关于拘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查的实施》的决定配合上了。要知道,三个星期后贝利亚就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

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后有一些遭受冤屈的人得到了平反。但是,同关押和枪决的总人数相比,这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表示。无论怎样把责任推给叶若夫,只要承认普遍存在无法无天的行为,无疑就会影射到斯大林。而这是中央书记不能容许的。正义首先在与国防事业有关的人们中得到恢复。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在大战即将来临之际军队业已严重削弱。

按照他的指示,从监狱和流放地放回了一部分侦查机关始终未能予以制服的指挥人员。还释放了许多科学家和设计师。其中应当提到的有康·康·罗科索夫斯基、基·阿·梅列茨科夫、亚·瓦·戈尔巴托夫、伊·弗·秋列涅夫、谢·伊·波格丹诺夫、格·尼·赫洛斯佳科夫、阿·伊·贝尔格、安·尼·图波列夫、列·达·朗道、弗·米、米亚西谢夫等人。还有许多人,像著名的谢·帕·科罗廖夫,获释的时间就晚多了(他只是到1944年才获得自由);而有些受到多年不公正的处理并经受了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的人又拖了很久,直到党的"二十大"召开才获得解放。

虽说1937—1938年间那样的疯狂劲儿国内后来没有再出现,但惩罚机关并不"清闲"。它们不受国家和党的监督,实际上只为斯大林个人忙碌,不愧是**个人暴政**的附属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附属物。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所有维护捷尔任斯基当年的传统的那些诚实而正直的人都被撵走或者搞掉了。据现有的材料,到30年代末共牺牲了23000多名曾试图阻挠那只暴力飞轮急速转动的契卡人员。

有时候,人们一谈起那些年月的滥用职权和罪恶行径,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或者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这些人个人身上。不用说,这些败类和头号罪人精神上、道德上都极端堕落,实质上是一些悖逆人性的渣滓。这是没有问题的。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像这样的人怎么竟会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担任如此高的职位呢?这里应当说,斯大林的惩罚体制既然在30年代末发展成那样,就不能不去物色"与之相匹配的"执行者。我解释一下自己的意思。内务部门脱离党、脱离人民,没有起码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就连来自上面的监督也没有,它们迟早必然会变成个人实行暴政的工具。这种蜕变是党内以致整个社会内最基本的民主原则逐渐丧失的必然结果。依靠官僚来实行的专制领导方法,永远都会导致无视法制和敢于把暴力用于不正当的目的等弊端。

有没有哪怕是个别的共产党人表现出英勇气概和公民觉悟,敢于向斯大林提出这些问题呢?斯大林对像贝利亚这样的冒险家是否什么都了解呢?据我所知,确有人试图提请斯大林注意贝利亚主义这种严重的反社会主义现象的莫大危害。但根本用不着帮助斯大林去"认清"叶若夫和贝利亚的罪行,他本来就知情。一些最令人发指的事情就是"领袖"亲自批准干的。有材料证明,他和莫洛托夫一起批准了大约400

(!)份名单,而这些人的"案件"本来只应由军事法庭审理。这些名单都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简单的批语"同意"和他们的签字。这些有时开列着好几百人姓名的名单,经斯大林大笔一挥,就都成了催命符。

斯大林和贝利亚一类执行他的意志的人,窃取了处置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和生命的大权之后,就来践踏社会主义的人道原则,尽管在口头上他们干自己的罪恶行径时正是以这些价值观的名义。我想,这里不妨回忆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说的话:他之所以受苦受难,并不是为了自己再以暴行和苦难去破坏别人未来的和谐。**任何时候**也不能说,只要目的非常伟大,为了实现目的就可以使用不正当的手段。但斯大林始终不能理解道德哲学的逻辑。

斯大林是在斗争、强烈的阶级激情、毫不妥协的处世哲理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其个性形成的某个阶段,他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质,而这些素质在他身上本来就十分稀缺。他根本不知道同情、仁慈为何物,他丝毫不理解什么叫善良。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应当学习"尊重生命"。在他看来这显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斯大林的语汇中,他的政治辞典中,充斥着"打击"、"粉碎"、"消灭"、"根除"、"取缔"等一类词汇。它们十分贴切地反映出他的气质上的根本缺陷。因此,像贝利亚这样一类视人的生命如草芥的人是不会遭到他的拒绝或异议的。

曾参与逮捕并审判贝利亚的已故元帅莫斯卡连科告诉我说,在1953年12月23日对贝利亚进行宣判时,这个败类居然跪倒在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大楼里开庭)成员的脚下。他请求赦免,低声下气地央求、哭泣,使人更加看清了此人是多么卑鄙。而斯大林竟让他操着千万人的生杀大权,这真是犯罪。但是正如恩格斯当年曾经透彻地指出的那样:"逃避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逃避自己的行动的必然后果是不可能的。"[27]

有证据(诚然,很难确凿地加以证实)说明,随着斯大林的年事渐高,贝利亚有了篡权的意图。也许斯大林对此有所察觉。因而在最后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关系明显地冷漠了。这一点许多人都对我讲过。尤其是国家安全部总管理局原局长H·C·弗拉西克中将的妻子玛丽亚·谢苗诺芙娜·弗拉西克告诉了我许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弗拉西克当斯大林的主要"警卫员"达25年以上,知道的事情很多,深受

“领袖”信任。贝利亚恨他，但斯大林不允许“碰”他。斯大林临死前几个月，贝利亚终于成功地败坏了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名声，把他们两人从斯大林周围一班人中间排挤了出去。而且弗拉西克还被捕了，被判处10年监禁和流放。他获释已是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事了。据弗拉西克的妻子说，弗拉西克回来后曾确有把握地说，贝利亚对于斯大林的死是“帮了忙”的。弗拉西克在临死前不久向妻子口述的回忆录中表达了这个坚定的看法。

正是贝利亚，在“领袖”还活着的最后一年搞掉了斯大林的几位保健医生，后来又把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一些服务人员收拾了。不管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独裁者是正常死亡还是贝利亚“帮”他死的，有一点非常可怕，那就是如果这个恶棍的阴谋得逞，我们祖国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啊?! 要知道，在当时的权力体制下，一个独裁者取代另一个独裁者是可以做到的。在民主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我们的民主当时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极权统治条件下却是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终究还是鼓起了勇气，颇具远见地制服了这个恶魔。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心里明白，贝利亚不会放过机会来收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这个恶棍只跟马林科夫保持着亲密关系)。大家都怕这个刀斧手。据莫斯卡连科元帅说，对贝利亚的审讯是在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但是党的最高领导层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听了这次审讯，给他们拉了专线。这样，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等人都能彻底了解斯大林在这个败类帮助下所干的种种暴行。不过许多事情他们本来就知道。而且他们对在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所犯下的罪行也负有责任。这一点，我再说一遍，也是不言自明的。

当时保存下来的一些文件证明，那些想唤醒斯大林的良知并制止贝利亚的暴行的人，很快都不知去向了。对于这些呼唤，斯大林置若罔闻，因为这个刽子手使他很称心。不仅如此，贝利亚已经成了斯大林形象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

在1937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卫生人民委员卡敏斯基曾试图揭示贝利亚的真面目。但是，全会刚一结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不久就死

了。老共产党员克德罗夫也想向斯大林报告贝利亚的罪恶活动,结果克德罗夫也被逮捕起来处以枪决了。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判决书是把他处决后才炮制出来的。贝利亚急于把任何了解他真面目的人搞掉。

一个按自身的工作性质本应高度忠于法律、而且只是忠于法律的人,却是十足的不法行为和专横行为的体现者。对于贝利亚来说根本不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崇拜的只有暴力。贝利亚是个暴虐狂,常常亲自进行审讯,并往往以悲惨的结局收场,这个恶棍(而斯大林知道他的内务人民委员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棍),在嗜好作恶的同时居然还喜爱音乐。有人告诉我,他收藏着一整套极为难得的古典音乐唱片,当他听——例如听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时还曾掉泪。历史上出现的这种怪事只是更充分地说明一些人心灵上的极度空虚。

斯大林虽然口头上很看重禁欲主义和清教徒生活,但他不会不知道贝利亚却是一个最下流的淫棍。此人戴一副小小的夹鼻眼镜,嘴角下沉,使他的表情变幻莫测,而他的神情冷酷得令人胆寒。那对眼睛活像穿山甲的双目,几乎从来不眨一下。贝利亚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不顾。他的私人卫队长纳多拉伊上校和副官萨尔基索夫上校常常为这个罪犯提供他看上眼的青年妇女。这些妇女只要稍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会既给她们本人、也给她们的亲人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这个恶棍生活中的这一可怕的细节,再一次揭示了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的辩证关系。这个政治上的冒险家兼道德上的败类将永远是对斯大林个人的控诉,因为正是斯大林让贝利亚一类悖逆人性的人爬到了很高的职位。

从战前时期起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战后当了局长和副人民委员的Е·П·皮托夫拉诺夫,告诉了我有关贝利亚的许多很有意思的事情。顺便说一句,皮托夫拉诺夫之所以至今还活着,完全是因为他对“人民公敌”心慈手软而被关进了大牢。照他的说法,贝利亚不仅道德绝对败坏,而且有很严重的非政治倾向。皮托夫拉诺夫说,他认为,贝利亚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政治对他来说只有跟他个人的打算挂钩时才有意义。贝利亚只看重统治人的权力。很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非常了解的贝利亚会这么长时间地身居高位。皮托夫拉诺夫认为,“领袖”通常总是把某些失败、罪过和失误的

责任都推到这些人身上，无情地把他们干掉。可贝利亚一直在位。不仅在位，而且在继续危害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看来问题还是在于，贝利亚一类的人随时准备执行斯大林的任何指示这一点很合他的心意。从主要方面即从使用权力的方法上看，贝利亚是"领袖"的缩影。

应该说，斯大林给予贝利亚的常常是最微妙的使命。"领袖"最不可调和的私敌托洛茨基最终被从肉体上消灭掉就不无贝利亚的参与。斯大林周围一班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恶棍是不讲任何原则的，因而对这位内务人民委员大家都不掩饰怕他三分。贝利亚有时为了显示他跟斯大林之间的特殊关系，便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跟他来上几句格鲁吉亚话。这种时候，所有的人都沉闷地一言不发，但心里想什么的都有：也许他们谈的就是在场的某个人的事。

大战时期，斯大林交给贝利亚那个部门修复桥梁、铺设铁路支线、开挖新的矿井等任务。这些事情自然都是靠囚犯去干，而且时间要求非常紧迫。贝利亚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只有两次，就是以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去高加索的两次出差。第一次是1942年8月，第二次是1943年3月。档案材料证实，就是在这种场合，他也以斯大林的名义把不中他意的人撤职、枪毙，让军人们心里充满恐惧。陪同他视察的人有科布洛夫、马穆洛夫、米尔施泰因、皮亚舍夫、察纳瓦、鲁哈泽、弗洛济米尔斯基、卡拉纳泽。秋列涅夫、谢尔加茨科夫、彼得罗夫和其他一些军事领导人也摊上了任务。结果，秋列涅夫等每个人不仅要对付前线上的敌人，而且还得提防大后方这个口蜜腹剑的刽子手。贝利亚给斯大林的电报通常在干部任命时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1942年9月1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

> 我认为任命秋列涅夫出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是合适的。他虽然有种种缺陷，但比布琼尼更适宜于这一职务。应当指出，由于退却，布琼尼在高加索的威信一落千丈，更不用说他的文化程度太低必然会把事情搞糟……
>
> **贝利亚**[78]

在艰难时刻，如秋列涅夫给莫斯科的报告所说的，他曾请求贝利亚允许他使用部署在高加索的编制很大的内卫部队。秋列涅夫写道：

"贝利亚只同意调拨很少一部分兵力，而且这还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70]内务人民委员的活动常常在各司令部里造成一种神经质的、猜疑的和相互告密的紧张气氛。科兹洛夫将军就曾被迫去向斯大林告特工处处长鲁哈泽的状，此人经贝利亚认可竟试图在定下战役决心时对方面军领导施加压力……但所有这些微弱的抗议在莫斯科无人置理。那个恶棍一来，军事首长们都失去了创造性考虑问题的能力，因为谁也不想成为牺牲品。当贝利亚在一大群侍从簇拥下离去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列宁格勒案件"、"明格列利亚案件"、"医生案件"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是贝利亚一手制造的罪行。他之所以是一个赫赫可畏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操纵着那台惩罚机器，而且还因为整个的古拉格系统都在他的执掌之中。当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原子弹后，斯大林命令加速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这项工作整个交给贝利亚领导。他的属下梅尔库罗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戈格利泽、梅希克、弗洛济米尔斯基都是罪恶意志的忠顺执行者。就是经过他们这些人的努力(斯大林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努力)，在囚犯集中营里"搞起"了科研实验室、工程技术实验室。被禁锢在一小方"天地"里的许多杰出科学家发挥他们的才智，紧张地探寻关系重大的解决方案，以求在极短期限内回答时代的严峻挑战。苏联的原子弹确实是在极短期限内制造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贝利亚的功劳。要是在正常的科学创造条件下让人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这个问题一定会更快得到解决。但贝利亚只相信暴力万能。而老头子克德罗夫相信正义。

当时看起来是贝利亚胜利了。但这只是看起来如此。对正义和人道主义的信念不会泯灭。对这些价值必胜的希望是不会随着人的死亡一起破灭的。如果希望破灭了，那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下面我从克德罗夫致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封信使我们听到了不可泯灭的信念在呐喊。

> 我从列福尔托沃监狱一间阴暗的囚房里向你们请求帮助。但愿你们能够听到这绝望的喊声；请不要对这呼声保持沉默；请你们来保护我；请求你们协助制止这种凄惨可怕的审讯，并指出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我是无辜而受难。请你们相信我。时间会证明我说的是事实。我并不像根据告密材料指控我的那样是沙皇保安机关的奸细，我不是间谍，我不是反苏组织的成员。我没有对党和政府犯过其他罪。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忠诚地在党的队伍里为国家的幸福和繁荣奋斗了将近40年……

我遭受的折磨已达极限。我的身体已被摧垮，我已经精力不支，眼看就要绝命。以一个被斥为祖国的卑鄙叛徒的身份死在苏联的监狱里，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真是再荒唐不过了。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悲痛欲绝！我要叫喊：不！不！这决不会！这不可能！无论是党还是苏维埃政府，还是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都决不会容许这种残忍的、无法补救的不公正。我坚信，只要冷静地客观地审理我的案子，不漫骂，不怒斥，不用酷刑，就很容易证明所有那些指控毫无根据。我深信，真理和公正的裁判必将胜利。我深信。我深信。

贝利亚是个极端残酷的人。对成百成千份申请他根本不理睬。我举大战临结束前有人寄给这位内务人民委员的一封信为例。

拉·帕·贝利亚：

我于1937年被判刑八年。我是因我丈夫В·И·格拉西莫夫(原阿塞拜疆副内务人民委员。——本书作者注)而受到惩处的。至今我不知道丈夫犯了什么罪。我跟他生活了12年，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热爱劳动、忠于党和国家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绝对无罪。我从未有过任何犯罪的念头。我从16岁起工作，直到被捕。

被捕那一天我给母亲留下两个婴儿，没有任何生活资料。孩子在成长。他们需要母亲，需要我去照料。

我恳求你们把我的案件搞清楚，让我能跟孩子们一起生活，让我能工作和教育他们。尽管这些年来我一直呆在劳改营里，我坚信真理和正义在我国一定能战胜谎言和非正义。这个信念使我有力量经受住同孩子分离的苦楚。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格拉西莫娃

寄自捷姆尼科夫劳改营

1944年2月

随信还附有阿塞拜疆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这一案件的侦查员柳比莫夫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她什么都不承认。1939年特别会议认为原判决仍然有效。”[60]

贝利亚随随便便签了个字,没有把案情搞清就同意了侦查员的结论。

这位妇女的坚定性、经受苦难的韧性和勇敢精神何等高尚!“这些年来我一直呆在劳改营里,我坚信,真理和正义在我国一定能战胜谎言和非正义……” 正是这种人民的神圣信念帮助苏联人坚持了下来。只要现在和将来祖国有像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格拉西莫娃这样的妇女,那就永远是有希望的……

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说得对:真理一定胜利。因此,归根结底,那个败类,我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恶棍之一,是注定了要覆灭的。

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列宁逝世一周年之际,1925年1月21日,《真理报》刊登了布哈林的文章《纪念伊里奇》。在分析30年代末的“悲剧震中”时,我们来看看布哈林在上述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

“列宁是否知道自己的价值?”布哈林问道,“他是否明确自己的全部作用?我一点也不怀疑,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从不在历史镜子里照自己。他太朴实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太伟大了……

“他知晓的东西极多。正因为如此,他懂得,如以别的比例尺来衡量,这还很不够。要知道,伊里奇是以数百万来计算,以数十年来计算的啊……

“所以列宁越少注意他个人,他个人就越伟大、越高大。难道有谁会怀疑‘老头’有个人偏私吗?难道有谁会设想,伊里奇除了伟大事业的利益还考虑别的什么吗?”

列宁对我们来说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道德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表率,看一看他的表率,你便会更清楚地理解30年代末人民悲剧的另

一个原因。斯大林把自己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他认为，他自己伟大了，社会主义才能伟大。他篡夺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人们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因此，他就能够为所欲为。人们在当时不可能懂得把社会主义同斯大林等同起来是多大的谬误。中央书记千方百计要显示自己的“质朴”：他经常坐在会议主席团的第二排，多次“申斥”报纸编辑对他歌功颂德，不许一本描写他童年时代的小册子出版，而主要的是他步步“紧跟”列宁。然而这一切完全是故作姿态，是为了粉饰真相而化的妆。如果说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那么斯大林虽然没有公开这样说，但是他的全部实践却是在示意人们“我即社会主义”。他周围的人相信这一点。国内许许多多的人也相信这一点。他希望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那些不相信甚或**有可能**不相信这一点的人统统应当消灭。

列宁“从不在历史镜子里照自己……”斯大林则经常想照。列宁“是以数百万来计算，以数十年来计算的……”斯大林也是以“数百万”来计算的，但是……是数百万人的牺牲；他不但不能考虑到数十年之后的事情，而且没有预见到他死后不过三年即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就会发生的事情……他从虚荣心出发奢想**成为社会主义的化身**，但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7世纪时所说的：“令人痛心的不是通过意识产生的那种谎言，而是深入意识并在意识中生根的那种谎言。”在斯大林的意识中“生根”、以后又深深印在成千上万人、成百万人头脑里的谎言已经不是一般的创伤，而是我国历史篇章上一道很深的伤痕。这个伤痕长时间被伪装、被掩盖和被粉饰，却仍在不断流血……需要经过好多年，当人们直截了当地、详尽无遗地了解了一切之后，他们才会略微平静地来翻阅昔日那些篇章。我相信这些篇章将会毫不含糊地表明：斯大林以及他所建立的行政命令体制和官僚主义惩罚机构，乃是血腥镇压的罪魁祸首。正是他和它们把人民变作消极被动的历史对象。不论斯大林为巩固国家、使其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做过些什么，不论他为粉碎法西斯的侵略做过些什么，他在30年代末所发生的事情中的罪孽是极其深重的。为此永远不能饶恕他。而且这还只是全部罪过中的一部分。变了形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还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停滞的时期和随之而来的一切。80年代中期开始的革新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要肃清斯大林主义的后

果。

1937—1938年，斯大林无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都没有公开主张要严厉进行镇压。即使是他在1937年2至3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说（后来摘要发表在《真理报》上），也主要是要求提高警惕、不要麻痹大意、要重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验性等等，虽然从他的每句话里都能感到不祥兆头。在后来由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法西斯间谍、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在苏联的破坏活动以及与之斗争的任务》这本文集中，发表了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莫洛托夫的报告、鲁宾、谢列布罗夫、哈马丹、乌拉莫夫、维辛斯基的文章以及《真理报》的社论。诸如此类的出版物简直是在灌输对间谍活动和暗害活动的恐慌心理，鼓励告密行为，造成一种使人感到压抑的气氛。斯大林当时似乎没有"介入"，处于幕后。然而，他在那里并不是观望，而是在指挥、指导和领导。他经常召见"三个侏儒"——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所谓侏儒，主要不是指身材——他们个子确实不高——而是指道德）。对所有那些最有名望和众所周知的人物的侦讯、审判和判决，都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有时由波斯克列贝舍夫以斯大林的名义传达命令。在许多关于被捕的"人民公敌"的"案件"的文件上都有斯大林的亲笔修改。例如，根据叶若夫在2至3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其中有几条就是依照斯大林的措词表述的。请看下面两条：

"（2）侦讯工作现在搞得不好。侦讯往往取决于罪犯（！——本书作者注），取决于他是否自愿地彻底坦白交代；

"（4）要建立一套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无法忍受的制度。他们现在的监所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更像强制休养所（他们可以写信、接收包裹等等）。"[⑩]

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奉命要立即消除"现存的缺点"。不难想象，斯大林所指出的"这些缺点"是如何"消除"的！

甚至在1938年11月决议以后，即当血腥的屠杀已经开始逐渐收敛下来以后，斯大林仍要求"把尚未结束的案件搞到底"。结果不但没有平心静气地进行甄别，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向他们道歉，反而让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下面便是这个时期最后一批重要报告中的一份：

致联共(共)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已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

在军事法庭审理过程中完全服罪的有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巴·彼·波斯特舍夫、亚·瓦·科萨列夫、П·A·韦尔什科夫、亚·伊·叶戈罗夫、伊·费·费季科、Л·M·哈哈尼扬、A·B·巴库林、Б·Д·别尔曼、H·Д·别尔曼、A·Л·吉林斯基、康·韦·格伊、П·A·斯米尔诺夫（前海军人民委员。——本书作者注）、M·П·斯米尔诺夫(前商业人民委员。——本书作者注)等。

一些被告在法庭上推翻了他们在预审时所作的供词，不过案件的其他材料已将其揭露无遗……

苏联最高法庭
军事法庭庭长
集团军级军法官
B·乌尔里希
1939年3月16日[⑳]

顺便说一句，名单上说亚·伊·叶戈罗夫已经“招认”并“判了罪”。这又是瞎编。他并没有“服罪”，而是死于侦讯过程中。

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能打动斯大林的心，即使看到不法行为失控也不惊愕，一时的后悔并没有使他喘不过气来，死去的人们并没有在他眼前再现，虽然也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有直接交往。他脑子里只有波斯克列贝舍夫那句他很熟悉的简短而冷酷的话：“向斯大林报告。”

“领袖”记得，1938年7月，在采用向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以后，弗拉斯·雅柯夫列维奇·丘巴尔被从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除名(他是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起进入政治局的)。丘巴尔给他——斯大林写了一个关于改善国防工业的措施的很长、很详尽的报告。斯大林仔细地看了，心里明白这些结论和建议是颇有道理的，然而他不喜欢这封信的结尾部分：

所有这些设想我都曾准备提出报告，然而事情又一次告吹了，并且又一次不是由于我的过错。我深感遗憾地并心情沉重地意识到，由于人民公敌不断地进行诽谤和施展阴谋，我不得不卸掉身上的驾具。然而，遵照你们的决定，不论需要我在何处工作，我都将时时处处忠诚地和认真负责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为苏联的繁荣、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弗·丘巴尔

1938年7月16日[80]

看来"他在耍花招"，斯大林考虑了一下便吩咐将此信交给叶若夫。要得到斯大林的"怜悯"是不可能的。从乌尔里希的报告中知道了丘巴尔以及其他一些被判罪的人已被处死之后，"领袖"平静地将军事法庭庭长的报告搁在一边。开始看米丁和波斯佩洛夫关于必须撰写《斯大林传略》一书的建议……

当思路重新回到丘巴尔身上时，他回忆起，不论是埃赫、鲁祖塔克，还是波斯特舍夫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都曾请求他出面干预和停止对他们的迫害。所有的人都发誓忠于他"斯大林同志"……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请求**呢？难道这么做适当吗？"既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把问题搞清楚并且作了判决，那么还要找斯大林同志干吗呢？"无论是思考自己还是谈论自己他都喜欢用第三人称。决不同情。决不手软……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的那些十分敏锐细致的观察和思考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斯大林的残酷本性。这位伟大的作家和心理学家指出："鲜血和权力使人陶醉：于是粗野和败德滋长起来；即令是最不正常的现象，在人的头脑和感情里也会接受下来，甚至会感到甜滋滋的。人和公民永远毁于暴君之手，要他恢复人的尊严、反省和复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81]

斯大林对他的牺牲者，对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共事的同志们的态度，如同他对使用暴力的态度一样，证明了："人和公民"早就死于斯大林这个暴君之手。他的天性中那些最卑鄙的情感和品质在20年代还有所克制，到了个人专权的环境下则膨胀起来。任何权力不受来自下面的监督都是危险的。而独裁的权力尤其如此。这再一次证实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暴政乃不公正之母。

皮托夫拉诺夫在同我的谈话中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要得到斯大林的怜悯是"走绝路"。他对请求赦免、发善心和主持公正的要求根本就不予置理。我的交谈者说道:"当我由于'对人民公敌心慈手软'而被关起来时,我对自己说,这一下全完了。在被逮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是活着走出列福尔托沃的。和我关在一个牢房的是Л·舍宁,他是个侦查员,后来是作家。我一边熬日子等着悲惨的结局,一边在冥思苦想寻找出路。终于我想出一个办法,后来事实也证明确实是个办法。我央求到了一张纸,便给斯大林写信,因为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总局的局长时曾不止一次受过他的接见。信里没有提任何请求:既不请求从宽处理,也不乞求怜悯。我只说我有一些关于改进我国反间谍工作的原则性的设想。我设法让监狱长来到囚室,对他说:这封信'上面'知道,如果您不交给指定的收件人,那您就得倒霉。"

"正如后来别人告诉我的,"皮托夫拉诺夫继续说道,"有人向斯大林报告了这封信。他打电话问我们那个部门:'皮托夫拉诺夫是因为什么坐牢的?'人们向他作了答复。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冲着话筒说道:'把他弄回去工作。看来,此人不笨。'几天以后我就突然被放出来了。这事只需要斯大林几句话。不过我明白,我利用了独裁者的心理:我没有像大家所做的那样去哀求宽恕,而是提出了一些主张和新的办法。"

在至今仍然健在的皮托夫拉诺夫身上"生效"的东西,在丘巴尔身上却没有结果。任何关于赦免和主持公道的请求都不能触动斯大林。要么是正常人的感情——同情、怜悯、仁慈——隐藏得太深了;要么斯大林的心是"铁打"的;要么他认为毫不留情是一个领袖最重要的标志……

有人向斯大林报告了生物学界的泰斗、遗传学家、植物学家和地理学家、苏联科学界引以为自豪的人物尼·伊·瓦维洛夫给中央的呈文。他获悉米·叶·科利佐夫已被捕,他高度评价后者从西班牙发回的那些才华横溢的报道。还有人向斯大林报告了谢·巴·科罗廖夫的来信,其时他正被关押在一个遥远的位于科雷马边疆区的劳改营里。这类信件有多少啊!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对他的邮件进行分析。有时给他呈上一份经过综合的资料以及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按助手们

的看法)信件。这些罕见的令人震惊的文献却丝毫没有触动斯大林。他认为,人们遭受苦难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了进步,为了前进,为了取得成就而付出的代价。也许斯大林想起了席勒的话:“每个人生来都是要受苦受难的。”既然不可避免,那就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

伟大的思想和实现伟大的思想(斯大林对此是深信不疑的)需要有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需要奉献自己的一切。没有牺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成的。既然要有那么多的牺牲,斯大林对它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依照他的指示,任何有关被镇压的牺牲者的综合资料、统计数字都不得在报刊上报道。人们是靠传闻和恐惧度日的。社会意识以往只是关注如何取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成就,现在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恐惧感。尤其是那些看到对自己有不信任的迹象,感到了有被人告密从而有遭到镇压的危险的人。须知,只要给一个人立了“案”,这个人实际上就报销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就是自由的对立面,即对自由的否定。人们之所以害怕,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过,他们怕的是成为诽谤和专横的牺牲品。那些看到自己的担忧得到了证实的人是不可能同意尼采的话的:“如果你一生都不顺利,那么可能会死得顺利?”须知人们不理解镇压的目的,所以都心怀恐惧……某人没有来上班。夜间邻居被抓走了。有人小心翼翼地对某人说:告诉他家里,她丈夫今天从工厂回不来了。要不就是突然在学校图书馆里把一页教科书给撕掉了……仿佛有一个无形的人在人间的田野上“不停地锄草”。

斯大林知道关于镇压规模的确切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并没有使他害怕。然而,1938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斯大林开始接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按战斗警报集合起来的基辅军区的两个师未能在指定时间开拔到指定地区;化学联合企业的设计搞得不能令人满意;运输机设计院未能如期完成任务……事情愈来愈清楚,问题不仅在于有“暗害分子”。出现了干部大量短缺的现象。国家、国民经济和军队被耽误了不是几个月,而是好些年。

斯大林像每次出现这种情况那样,找了一个“祸首”。这一次是叶若夫。曾经见过斯大林的苏联著名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回忆起“领袖”的话:“叶若夫这个坏蛋,他在1938年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为此我们把他枪决了。”被捕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

丘巴尔、埃赫除了其他一些罪行之外，都被加上了"残害布尔什维克干部"的罪名。这一次斯大林也企图把制造恐怖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有人向"领袖"报告，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写了信，说他们完全否认自己有罪。在推荐他们作为政治局成员的人选以前，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雅哥达、叶若夫对他们祖上"五代"都进行过调查。这都是一些忠诚可靠的人。他们在临死前给斯大林的信中以及在不公正的审判中都谈到过这一点。例如，埃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

"……如今我正落到我一生中最无地自容的地步——对党和您真的犯了严重的罪过。这个罪过就是我承认参与了反革命活动。但是情况是这样的：我受不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的拷问，尤其是乌沙科夫的拷问——他知道我那被打断的几根肋骨尚未愈合，故意在审问时给我制造剧烈的痛苦——在他们的逼迫下，我只好(以自己的供认)自欺欺人……

"我请求您、我恳求您重新审理我的案件并不是为了求得对我的宽恕，而是为了揭露这整个卑鄙无耻的挑拨离间行径。这种行径犹如一条毒蛇，利用我的软弱和我交代的罪恶的不实之词使如此众多的人受到蒙蔽。无论是您，无论是党，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我知道，由于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卑鄙下流的挑拨离间来反对我，我会死去。"

在此信的字里行间不仅可以听到濒临死亡的难于排遣的忧郁苦闷，而且可以听到抗议、微弱的希望……斯大林在看埃赫的信时不可能不知道，"挑拨离间之毒蛇"是他这个党和国家的第一号人物放出来的。"领袖"甚至不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商量，因为在他批准逮捕埃赫时，他已经对埃赫作出了判决。宗教裁判所首席法官从不改变自己的决定。

人们还给斯大林看了鲁祖塔克在法庭上的声明。这里我要着重指出，这次开庭总共只持续了20分钟。

"我向法庭提出的惟一请求，就是向联共(布)中央报告，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一个尚未被肃清的中心，该中心狡猾地制造各种案件，迫使无辜的人们承认他们没有犯过的罪行；被告没有可能证明他们没有参与过各种各样的人在逼供时招认的那些罪行。现在的侦讯方法是在逼迫人们说谎和诬告无辜者……"

鲁祖塔克请求见斯大林，而斯大林则骂了一句粗话作为对这位囚犯的请求的回答。而这竟是心地像水晶般纯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间的一位，他在沙皇监狱中就蹲过10年，如今死于斯大林的刑讯室。斯大林没有忘记，1937年5月，在被捕前夕，鲁祖塔克去过他那儿。鲁祖塔克不慌不忙地谈着斯大林感兴趣的问题。然而"领袖"并没有理会，而是试图搞清楚叶若夫发出的"信号"究竟有几分可信：从热那亚会议起，鲁祖塔克就被外国情报机关收买了。在担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以及最近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他同托洛茨基分子保持着联系……斯大林突然想起，列宁还在世时，有一次托洛茨基曾高度评价鲁祖塔克是一个外交家，博学多才，是一个掌握了几门外语的知识分子……至此，所有的疑团马上都消释了。

到了晚上，斯大林在签署苏联政府致极地勘察队英雄——北极探险队参加者的贺词时，在其他人的签名中看到了鲁祖塔克的签名。"领袖"停顿了一下，便用铅笔把这个名字勾掉了。他从一份例行的贺词中把名字勾掉了，但他没有能力把名字从历史上勾掉。第二天，1937年5月24日，斯大林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委员进行背靠背表决（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的通知。其中说道，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确凿查明，图哈切夫斯基和鲁祖塔克系德国法西斯间谍。一位优秀的苏联统帅和一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按照斯大林的意志被悲惨地捆到了一起。不同的仅仅是：图哈切夫斯基只能活两周多一点，而鲁祖塔克还能活将近一年……是斯大林本人将他们两人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送上了枉法的断头台。

独裁者为成千上万人事先安排好他们的命运是蓄意的行为。实际上叶若夫、乌尔里希、维辛斯基关于作出极残酷的判决的所有建议都无条件地得到了支持。前面我已说过，有时候斯大林只是随口说一句"同意"。然而更经常的是屈尊将自己的"笔迹"留在骇人听闻的讣告上。那些至今为止还把罪过推到叶若夫和贝利亚身上，说事情都是他们干的人实在是错了。斯大林很清楚他干了些什么。他留下的痕迹是沾满了牺牲者的鲜血的。大量的文献证明，斯大林的残酷无情是骇人听闻的。

斯大林同志：

现送上应由军事法庭按第一类人审判的被捕者名单。

叶若夫

简短的批示：

同意138人全部枪决。

约·斯，维·莫洛托夫

斯大林同志：

现送审应由法庭审判的四份名单：313名、208名、15名人民公敌的妻子、200名军事工作人员。请批准全部判处枪决。

叶若夫

1938年8月20日

批示跟往常一样：

同意。

约·斯，维·莫洛托夫

8月20日[85]

还有一些骇人听闻的"纪录"。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批准枪决3167人！[86]名单上既不讲犯什么罪，也不讲侦讯结果。实际上名单批准后，对案件作出判决往往不过是走走"形式"。诸如此类的血腥统计材料是举不胜举的。然而可以而且应当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我面前有一封快90岁的维拉·伊万诺芙娜·杰留奇娜从白采尔科维寄来的信。她的信可以成为对斯大林的惩罚机器又一次的强烈控诉。

"1937年一个可怕的深夜，有人来抓我那个当矿工的男人，他是一人干四人定额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想，这一定是搞错了。他们对我说：蠢货，不许哭闹，你男人过一小时就回来。可是这一去便是12年。回来时已成残废。我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什么没有经历过啊——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被赶出了住宅，走到哪里都背着人民公敌家属的黑锅。要不是遇上好心人，我们全家都死绝了……请把我的遭遇写在您书中的随便哪个地方。维拉·伊万诺芙娜·杰留奇娜。"

这儿还有一封莫斯科人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谢苗诺夫的来信。他

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关了15年。他的两个兄弟被枪决了,妻子则死在普通监狱里。如今他已是一位暮龄老人,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他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人再盼你,没有人再需要你。我和我的兄弟本来都可以有孩子、孙子、家庭。该死的帖木儿把一切都给毁了,糟践了。他剥夺了那些尚未出世的公民的未来。他不让他们出生,因为他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我正在孤独地度过余生并且至今也弄不明白:我们怎么没有看出‘领袖’是个恶魔,我国人民怎么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从表面看,斯大林并没有直接参与杰留奇娜和谢苗诺夫的命运安排,但这正是“从表面看”。他制造的恐怖机器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割掉”成千上万个无辜的牺牲者的。反正他们所有的人都记在这个无可争辩的血腥罪行制造者的“账号”上。

因此,有些人的说法(伊·爱伦堡早在1962年就这样说;后来过了很久其他一些人还在重复这种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们说“斯大林不知道叶若夫干的事”,“他没有提出过镇压的规模和范围”,“这是混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挑拨离间分子干的”。**斯大林什么都知道。斯大林领导了镇压。斯大林确定了暴力活动的“战略”。斯大林布置了这场暴力活动的重点。斯大林企图通过消灭恐怖活动的许多执行者来掩盖镇压活动的真正规模。**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谁也不会比斯大林这个制造人民悲剧的罪魁祸首本人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1936—1939年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充当恐怖活动工具的人过去和现在也知道得不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收到了不止一千封来信。他们的来信我一眼便能认出来。他们往往不署名。现在我只从两封信中作些摘录:

斯大林是一个卫生员,他清除了祖国的垃圾。遗憾的是他清除得不够干净,因为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糟蹋这个光辉的名字。

Ю.К.

您把民主当儿戏,您是在扮演和召唤独裁者。在俄国没有铁腕人物是从来也干不成什么好事的。斯大林把一个只有木犁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强国。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切。

没有署名

一天晚上我家中的电话铃响了。一个老人的嗓音自称是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我想这是个假名)。打电话的人直截了当地声称:“我很高兴让人枪毙,何况在1937—1938年的时候我就是干这个的。”“不准碰斯大林,”这位以前的刽子手含混不清地说,“他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我们这儿来的。”说完就放下了话筒。

这些人的意识似乎还停滞在1937年,不论流逝了多少岁月,不论刮了多少次变革之风,他们那残缺不全的“螺丝钉”世界观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人已所剩无几,他们知道得不少,然而他们认定了不公开炫耀他们参与过大恐怖的事。的确,恐怖的制造者有过不少执行者。他们多半是时代的牺牲品,然而到了80年代还有一个尖溜溜的嗓音在提醒您:“他对他曾参与其事并不遗憾。”这已经不是故作姿态,而是立场问题了。在这些人的意识中斯大林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要让他们悔过未必能够办到。他们以前把斯大林奉若神明,现在也还把他奉若神明。他们意识中的个人迷信垃圾大概还没有清除掉。请看他们写的东西:

致拉·巴·贝利亚同志的报告

现在已到了敬献给斯大林同志:“至高无上者”或“国父”称号的时候了。这一称号应由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把它固定下来。应考虑用铜、混凝土、青铜铸造宏伟的永世长存的纪念碑。应当设立斯大林勋章。

沙拉耶夫

1944年3月19日[97]

纪念碑建造了不少。只是“至高无上者”称号和勋章还没来得及……

在历史当中总有某些人想尽快忘掉的一些篇章,然而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没有必要。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部分。经历过所有这一切的主要是已经去世的那几代人。我们活得越长,比我们年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比我们年轻的人则一天比一天多。但是一想起暴政下的冤魂,我们就感到极度痛苦。他们**不是作为英雄,而是作为蒙难者倒下的**。如果卡希林或科尔克、德边科或亚基尔听从命运的支配,他们本应牺牲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可是斯大林却不让他

们这样做。了解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过程更增加了痛苦。

我们大家是从照片、从半身雕像和高大的纪念像记住斯大林的。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然而不知为什么都很快地从它们的台座上消失了。“领袖”往往被塑造成这样：他举起一只手给大家“指引”道路，面带慈祥的微笑，一对关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眯缝着。当时有谁能够想到，在这副伪装后面竟隐藏着病态般的残忍、无情和狡诈，在我国历史上也难以找出能与之相当的先例呢？不仅数百万被镇压者及其家属对此深有感受，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亲属也有同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生平的人当中，B·B·涅费多夫做了不少工作来查明“领袖”亲属的遭遇。下面便是他查明的情况：



斯大林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极度统一的社会

叶卡捷琳娜·谢苗诺芙娜·斯瓦尼泽（第一个妻子）方面被镇压的有：

1.**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瓦尼泽**，斯大林妻子的兄弟。1904年入党（党内化名是阿廖沙·斯瓦尼泽）。格鲁吉亚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以前在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以间谍活动罪被枪决。

2.**玛丽娅·阿尼西莫芙娜·斯瓦尼泽**，亚·谢·斯瓦尼泽的妻子。歌剧演唱家。1937年被捕，被判处10年监禁。死于流放地。

3.**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瓦尼泽**，亚·谢·斯瓦尼泽的儿子。作为“人民公敌”之子被捕。1956年从流放地回来。

4. **玛丽娅·谢苗诺芙娜·斯瓦尼泽**，斯大林妻子的姐妹。1927—1934年任阿·萨·叶努基泽的私人秘书。1937年被捕。死于狱中。

5.尤莉娅·伊萨科芙娜·(梅尔采尔)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儿子雅柯夫的妻子。曾被捕,1943年获释。

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阿利卢耶娃(第二个妻子)方面被镇压的有:

1.安娜·谢尔盖耶芙娜·(阿利卢耶娃)列坚斯,斯大林妻子的姐妹。1948年被捕,以"间谍活动"罪被判刑10年。1954年获释。

2.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安·谢·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外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的内务人民委员。联共(布)第十五、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8年作为"人民公敌"被捕,1941年被枪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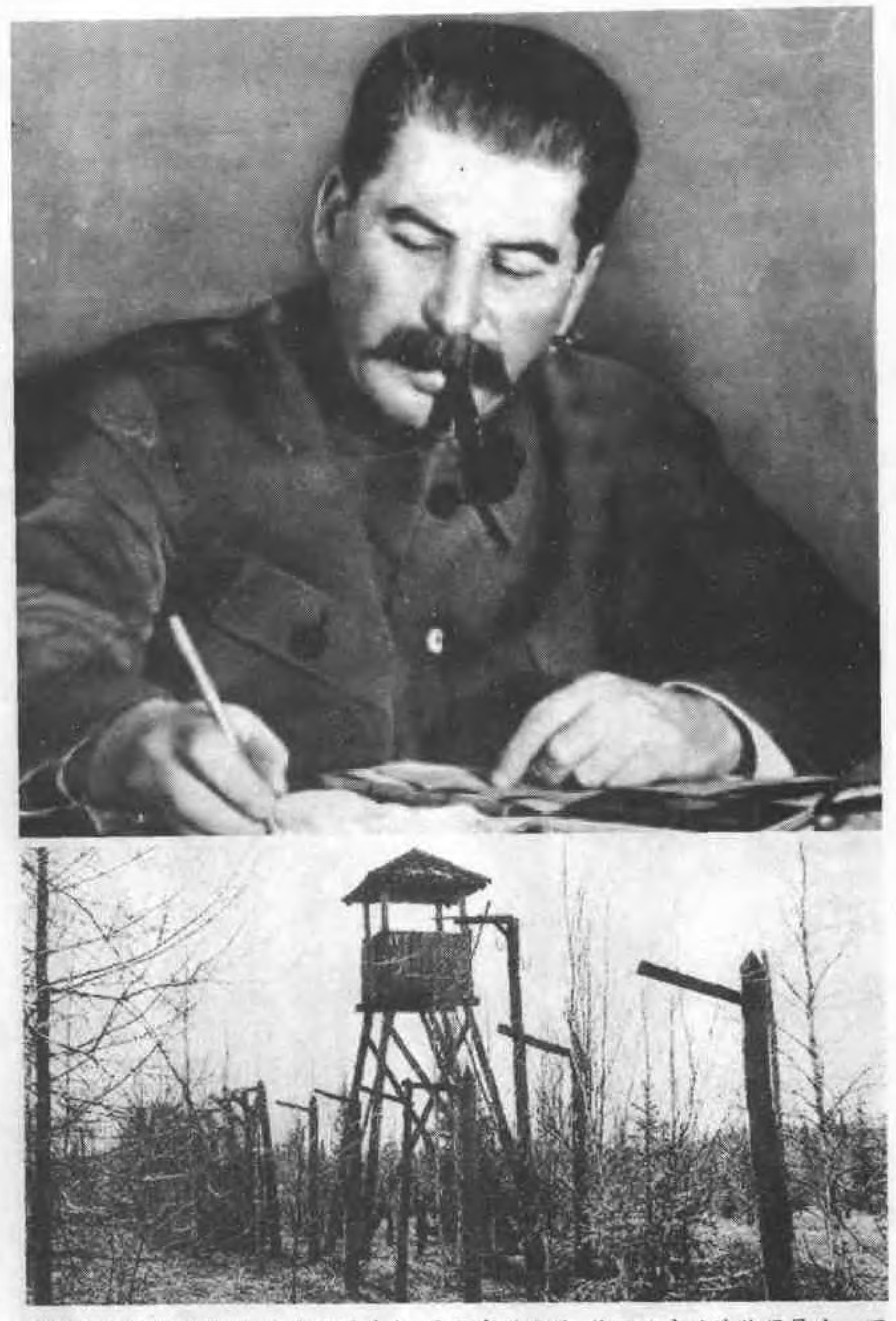
3.克谢尼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妻子的兄长帕·谢·阿利卢耶夫的妻子。1947年被捕。1954年获释。

4.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妻子的叔叔巴·雅·阿利卢耶夫的妻子。1948年被捕,以"间谍活动"罪被判刑10年。1954年获释。

5.伊万·巴甫洛维奇·阿利卢耶夫(阿尔泰斯基),巴·雅·阿利卢耶夫的儿子。1920年入党,《社会主义农业》杂志的编辑。1938年被捕,被判刑五年,依靠斯大林的岳父谢·雅·阿利卢耶夫的营救于1940年获释。

伊·巴·阿利卢耶夫的札记被保存了下来,他"以参加反革命组织罪"被判刑并在"索罗克劳改营"中服刑。伊万·巴甫洛维奇介绍了他的几位难友:旅级干部霍洛德科夫、莫斯科军区某部部长拉皮杜斯、年轻天真的小伙子彼得·日尔(他落了个"人民公敌",因为有一次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主席团里他坐在科萨列夫的旁边)。后来弄清楚,年迈的伯父谢·雅·阿利卢耶夫是冒着风险为伊·巴·阿利卢耶夫四处奔走的。他不敢向斯大林求情,于是便去找贝利亚和科布洛夫,看来这是恶棍惟一的一次对"领袖"的岳父发善心。

斯大林的残酷没有看人行事的"毛病":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自己人和外人、朋友和亲属、在中央委员会共事的同志和毫不相识的人、年轻的和年老的布尔什维克、不识字的庄稼汉和科学院院士、男人和女人,——不论是谁,只要"案件"打了"人民公敌"的印记,在斯大林的眼里都立即成了坏人。只要叶若夫或贝利亚给了"信号",说是"暗



按照斯大林的世界观，只要目的伟大，为了实现目的，就可以广泛地使用暴力。下图为古拉格劳改营岗哨



(上、中图)为服刑的犯人在工作

被流放的乌克兰妇女

害"活动或其他"反革命"活动,"领袖"便毫不犹豫地批准逮捕。在通常情况下,斯大林就不再关心这个人了。大概只有一次例外。当斯大林听说他第一个妻子的兄弟亚·斯瓦尼泽作为"德国间谍"被判处枪决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让他请求赦免。"在执行枪决前向斯瓦尼泽传达了他这位亲戚的话。被判决者问道:"我该请求什么呢?要知道我什么罪也没犯。"事情了结了。斯瓦尼泽被枪决了。

斯大林在得知他的这位童年时代的挚友和内兄的最后几句话后,只是随随便便地说道:

"瞧瞧,有多傲气,死也不求饶……"

看来,斯大林如果不是相信"需要这样做",也就不会同意逮捕自己的亲属。我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案件"都可以对斯大林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如果"有关机关"向他报告、反映或发出信号,说现在有人搞"阴谋",现在有"敌人"、"暗害分子"和"间谍",他的脑子便将诸如此类的情报变换为经验地认为确实可信的东西。他极好猜疑,但从不猜疑告密行为和告密者。到这时候全都相信。他那些不幸的亲属的遭遇就是又一个证明。

永恒的时间迟早会把我们所有的人吞没,那时我们将化为时间的颗粒,消失在无边无际之中。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只有至亲才会回忆起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将同那些曾经掠过本行星的700亿—800亿人的幽灵会合。我们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古往今来与大自然的融合便是如此发生的。然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斯大林粗暴地践踏了这个权利。剥夺生命是不可容许的罪行。剥夺几百万人的生命更是无法想象的滔天罪行。

当我翻阅这些档案时,当我会见那些距今已很久远的事件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并同他们谈话时,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这一切怎么竟能发生?为什么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大家都帮助、至少是许多人都帮助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犯罪?

我在前面已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些看法。现在再补充一点。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革命的逻辑或反革命的逻辑导致了恐怖的情况。那时,历史,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即最残酷的女神,就会拉着她的凯旋车辗过不只是在战争时期才有的堆积如山的尸体……在30年代后半期显然不存在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任何前提。当时国家虽有许多困难,

但仍处于蒸蒸日上的状况。十月革命的强大革命动力使社会能够长期地持续地迅速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吸引力所带来的第一批实际成果。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和他建立的官僚主义惩罚机构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用暴力消灭所有那些过去的"反对派"分子,所有那些可能以某种形式,哪怕是在理论上表示出不同意这位"统治者"的暴政的人。看来,人民是在无缘无故地遭难。这种情况只有在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在这个时期,斯大林身上那些最恶劣最消极的缺点充分发挥了作用。他为所有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最崇高的政治理想如果不同高尚的道德协调一致,便会成为冒牌的珍品。须知你无法对历史诉说,我们跟了这个领导人实在倒霉。既然这种倒霉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看来问题就在于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在推举、监督(首先是来自下面的监督)和替换领导人的程序中缺乏民主。要知道,列宁认为:"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⑱]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斯大林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的理解强加给了党和人民,把他那种斯大林牌号的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是跟列宁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强加给了党和人民。民主的水平愈高,它取决于领袖个人品质的程度就愈低。归根到底,民主根本就不会接受不合用的人。

斯大林及其机构使用恐怖手段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我们想到了恩格斯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怖是由一些惊慌失措的人为了自我肯定而干出来的徒劳无益的残酷行为。

按照斯大林的世界观,只要目的伟大,为了实现目的,就可以广泛地使用暴力,即建立更为"清一色的"社会——首先是在使人们的思想和想法单一化方面。但是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在于他对自己的人民,对他们的才能和渴望了解甚差。在一定时期里,镇压使得人民"缄口不言",顺从地忍受血腥的暴行。然而斯大林不可能摧毁苏维埃人对社会公正,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价值的信念。相当数量的人都怀着不敢明说而强忍在心的不满和不服。当时他们不可能找到一条适当的出路。顺便说一下,许多人直到进到了带刺的铁丝网里面才开始认真分析所发生的事情。愤怒和悲痛的种子直到许多年后才破土而出。

今天，甚至对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罪行》(1937年)一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也需要重新认识了。当然，这位流亡者首先是从个人仇恨的角度来观察斯大林并预言他不久就会垮台的。他不可能设想斯大林的罪行受到谴责的时间会比他预言的晚得多。然而，我认为还是值得复述一下他的预言：

"明天斯大林可能成为统治阶层的一个累赘……斯大林即将完成他那可悲的使命。我们愈是强烈地感到他不再需要任何人，那么任何人都不再需要他的时刻也就愈临近。而且斯大林未必能听到人们对他的劳绩的感激。斯大林将背着他所犯的全部罪行这个沉重的包袱退出舞台。"[69]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托洛茨基的这个结论。

斯大林的行为有时候看来不合理性。例如很难解释，究竟出于何种政治逻辑竟在一场大战前夕急剧地削弱军队的实力。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因干部力量遭到巨大损失而明显地变得更加困难。斯大林的血腥行为看来是无法解释的：他批准除掉他很熟悉并经常与之见面的米·科利佐夫，然而却没有触动保持自己独立见解的波·帕斯捷尔纳克。斯大林的行为是受无止境的权力欲支配的。甚至无数的亲属、挚友、战友……的鲜血也不能使他得到"满足"。斯大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先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他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

当我们痛悼数十万苏维埃人——祖国的优秀儿女死于非命时，决不能容忍斯大林使几百万人成为他的罪恶行为的消极同谋者，使他们相信"需要这样做"。斯大林设法预先得到了大批正直公民的一种支持，大规模的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领袖"造成了**暴力的社会惯性**。其后果就是告密，丧失原则，谎言和诽谤风行。斯大林的这一罪行尤为严重。谎言总是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记忆中，在人们的心理上，在文化领域。况且谎言总是企图给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结成联盟，谎言就会抵挡不住，不能得逞。良心恰恰是要求最严格的法官。良心就像是周围世界与个人之间的道德中介。多亏良心我们才知道自己道德上不完善的程度，才知道自己对待所崇拜的对象和理想的真诚程度，要欺骗自己的良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知道，如果说在那些年里良心常常保持沉默，那首先是因为周围没有真理。

全体苏联人民的悲剧震中之所以在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年代,是因为许多列宁派的共产党人、优秀的专家、杰出的天才和一些大有希望的人都在暴力的摧残下离开了人世。代替他们的人往往是仓促上阵,有时则纯属偶然,有时还是自私自利之辈,他们同他们的前辈不可能有同等的素质。但是斯大林知道,那些被提拔起来代替被镇压者的人,会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他的"路线",忠实于他的观点。新的领导人能够高升,——往往是意外的高升(往往不配),完全要归功于"领袖"。因此,他自然可以指望他们对他忠诚和尽心卖力。

在战争爆发前两年,国家似乎已经大伤元气。不,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火车还在轨道上奔驰,大学生还在学习,人们仍然在期待和坚信更加美好的明天。不过"大伤元气"不单单是因为劳改营人满为患,不知在何时何地失踪的亲人、熟人和友人没有音讯,党和军队的干部队伍人员稀少,而首先是因为伟大的思想受到凌辱。须知斯大林除制造反人民的暴行外,还犯了反思想的罪行。

不是斯大林制止了疯狂行为。这种无谓的恐怖活动已经达到极限,已经威胁到制度本身是否能继续发挥职能,而且这是在最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之前。受苦和忍耐,斗争和希望,牺牲和胜利,——这就是苏联人民的命运。



第7章 战争前夜

最大的错误是认为自己从来不犯错误……

——托·卡莱尔

(英国19世纪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

时值1939年1月的一个冬日的深夜。终日劳作不息的莫斯科城已进入梦乡。只是在各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大楼及卢比扬卡那座盒子状的大楼里，依稀可以看到放下窗帘的窗户里透出的星星点点的微弱亮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军界领导人都像往常一样地在挑灯夜战。这种工作到深夜的作息制度是逐步形成的。斯大林先前就是半夜才回家，到国际形势继续恶化时，他更是经常在办公室里呆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甚至更晚。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么夜晚几乎要算是他们主要的"工作"时间了。

斯大林在深夜12点以后很少把谁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只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这些亲信除外。他们在讨论某个问题时，往往在斯大林的提议下稍事休息，到他的孔策沃别墅去用晚餐，并且在进餐时继续讨论。斯大林通常让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偶尔插上一两句话，然后在结束时不慌不忙地作总结。有时候他的决定同大家的意见相去甚远，但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惶恐不安。他们当即表示同意。大概莫洛托夫偶尔要唱唱反调，不过也并不十分坚持己见。贝利亚比其他人猜到"领袖"的想法的时候要多一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心情。有时需要查询问题、弄清细节或是需要统计材料。斯大林马上给某位人民委员或者某位高级官员去电话，简短地询问一下。



莫斯科河



夜色中的莫斯科

孔策沃别墅

离莫斯科不远，这栋砖结构别墅是1931年建成的，斯大林在妻子死后就搬到这里住了。别墅四周是5米高的围墙，1938年又建了带监视孔的第二道围墙。别墅内有休息室和一个大餐厅，他与政治局的战友们一起常在这个餐厅"吃午饭"。他总是把这顿更像晚饭加早饭的半夜聚餐叫作"吃午饭"。

几乎从未出现过找不到所需要的人来接电话的情形。有时形成一种印象，仿佛斯大林是在以打电话的方式检查领导人是否忠于职守，这些领导人也在夜间保持办公室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以便解决突然提出的问题。到战争爆发前夕，夜间工作便成了家常便饭。

今天斯大林正在修改他将在例行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1月初中央全会决定于1939年3月10日召开代表大会。由党中央机关起草的报告原稿已经面目全非了。斯大林重新改写了好几十页。他想表达两个主要的思想。第一个思想是：世界正处在新动荡的前夜。战后的和约体系正在分崩离析。经济危机使战争危险迅速增大。一场世界大战的乌云正出现在地平线上。确切地说，"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成为事实了"，斯大林是这样想和这样写的。

"领袖"想通俗地讲述的第二个思想，就是公开地肯定社会主义的新成就。他认为，由于击溃"投降分子和暗害分子"，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了。斯大林翻了翻印有为他准备的统计数字的纸页，又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便开始奋笔疾书："我们在工业方面已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本书作者注）和发展速度。这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应当在经济上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必须建设新的工厂。必须培养新的工业干部。但是，为此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的时间。在两三年内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为此需要较长的时间。"①

斯大林疲惫地把报告放到一旁，叫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把上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和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名单拿来。昨天，助手的手边上还没有这两份名单。斯大林打开薄薄的公文夹，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大概一半以上的名字他都十分熟悉。这位他早在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就知道，那位是搞集体化时认识的，另一位则是在被任命为州委书记时跟他谈话记住的。军队代表他几乎全都认识。斯大林用手指在名单上慢慢地划着，偶尔在某个名字上停留一下。极强的记忆力使他想起了一次又一次会见、交谈和闲聊。

这是瓦·米·米哈伊洛夫，苏维埃宫建设工程的首长。他曾经同鲍·米·约凡院士一起来过一两次，听取斯大林有关建设工程的设计

和开展问题的意见。伊·叶·柳比莫夫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通常属于第一批向斯大林汇报轻工业企业超额完成计划情况的人员。“领袖”的目光久久未能从“阿·萨·叶努基泽——



斯大林在签署处决令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这行字上移开。本来是朋友嘛，可谁料到他城府有这么深……这是党中央各部部长——“全套人马”：卡·亚·鲍曼、约·阿·皮亚特尼茨基、雅·阿·雅柯夫列夫、阿·伊·斯捷茨基……人们真是变化莫测啊！就说雅柯夫·阿尔卡季耶维奇·爱泼斯坦吧，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管他叫雅柯夫列夫，他在集体化期间干得挺好，可转眼突然“摇摆起来”。斯大林记起自己曾不止一次地邀请雅柯夫列夫到家里来用餐，这可是对某人抱有特殊好感的标志。斯捷茨基是善于做作家和演员的工作的，却从未得到过斯大林的特殊信赖。这么说来，他的预感没有错：斯捷茨基是敌人……斯大林的目光死死盯在莫·李·鲁希莫维奇这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的名字上。此人他见过多次，是个顽强而勤勉的人，原来却同托洛茨基分子勾勾搭搭……这是列·伊·米尔佐扬，哈萨克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对此人很不了解，但是记得在对米尔佐扬的候选资格进行讨论后，他曾表示同意“选上”。

斯大林提起铅笔在一些原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字下划了着重线，他们是扬·埃·鲁祖塔克、斯·维·柯秀尔、弗·雅·丘巴尔、帕·彼·波斯特舍夫。好在他及时地认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他们不仅对党、而且对他都会构成威胁。脑海里浮现出他们那些要求澄清问题、宽大为怀、搞清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的信件，他们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

“已成为奸细集团的巢穴”。

斯大林在翻阅名单时，注意到大多数姓名在紧接名和父名之后都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用铅笔作的记号“B.H.”，有时还标明日期。他当即明白了，日期系指何日执行枪决或何日死亡。却没有马上弄清两个缩写字母的含意。不过当他把目光停留在雅·绍·阿格拉诺夫的名字上时，还是猜到了：“B.H.”系人民公敌*之意。是啊，雅·绍·阿格拉诺夫，他的老同事，一年前被枪毙了，也是人民公敌……眼前一一闪过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的名字：康·瓦·乌汉诺夫、Б.А.谢茵诺夫、谢·谢·洛博夫、鲍·彼·舍博尔达耶夫、伊·彼·鲁勉采夫、门·马·哈塔耶维奇、H·H·杰姆琴科、丹·叶·苏利莫夫、沙·祖·埃利亚瓦、尼·马·戈洛杰德、A·K·列帕、格·瑙·卡敏斯基、尼·尼·波波夫、伊·阿·捷连斯基、A·C·布林、尼·费·吉卡洛……斯大林想：有谁留下来了呢？但他一忆起十七大居然有近300名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也就心安理得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是呀，那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暗藏的敌人太多。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十月革命前和内战期间入党的啊。斯大林在面对名单进行思考时，也许想到：“他们没有做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准备。看来，反对派的束缚使他们深受其害。他们理解不了社会主义！”这些人永远地沉默了。对于下一次代表大会、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对于他们的最高法官是斯大林同志而不是上帝这一点，他们已经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甚至连想一想也做不到了。

* “B.H.”是俄语BPAR НАРОДА(人民公敌)的缩写。

——译者

人民公敌

1935年5月13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对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的命运极端重要的四项决议。该决议的主题便是——“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据此，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侦察了两年，然后制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该计划主要规定了"消灭"的具体程序——

1.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及其特务网，按照(1)知识分子；(2)工人；(3)农民这三个类别，对苏联的全体男性成年居民和妇女进行不公开的政治审查。

2.对这些社会类别中的每一个人，都规定了消灭对象——“人民公敌”——的百分比。

3.制订了“人民公敌”的详尽的“特征表”。

4.制订了按日历进行的计划，规定了按区、州、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消灭“人民公敌”的确切日期。

斯大林愈来愈经常地把格·马·马林科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并交给他各种最重要的任务。第二天，斯大林仿佛还在继续夜间的思考，他要对马林科夫说：

“我想，我们已经彻底地甩掉了敌人这个包袱。现在需要新生力量，党内需要新人……”

不错，党是需要新人。况且十七大后党员人数减少了33万！他出色地进行了把为数众多的“敌人”从党内清除出去的战役。毫无疑问，忠于他这位“领袖”的共产党人数如果不增加，就无法着手进行果敢的不寻常的任务：在经济上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党需要的是新的、年轻的、斯大林式的补充人员……1939年即已有100多万人被接纳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当时人们在文章和谈话中公开说党变得愈来愈“斯大林化”了。

斯大林的思绪又回到报告上来，他又加写了一段。“领袖”用倾斜度很大的清晰字体写道：“国外有些报界人物胡说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被清除出去，似乎就‘动摇了’苏维埃制度，引起了‘瓦解’。这种胡说八道只配加以耻笑。”斯大林文思泉涌，信笔写来：

“1937年判处枪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维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处枪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瓦解’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反映出来呢？”②

斯大林“夜间的”逻辑如同他本人一样，是“钢铁般”的。“领袖”对自己的反真理深信不疑。

不，斯大林并未受到懊悔的煎熬。其实，他不知懊悔为何物，正如他不知仁慈和同情为何物一样。斯大林在夜间修改报告时回首不久前的往事，他从中看到的应该不仅是正直的义愤和悲痛的责备。他不可能不感觉到危险，而他最近几年在多大的程度上削弱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无意中助长了危险。

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斯大林觉得，党内和国内所进行的血腥清洗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尽管有整整一系列客观的征兆说明党受到削弱，党的干部、技术干部和军事干部中的智力阶层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生活中行政命令方法得到了加强，斯大林仍然认为(他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两面派”的方针在历史上证明是正确的。

从1939年初开始，斯大林大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外交问题上。尽管通常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开始的，斯大林的看法却与此不同。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日本继续其在中国的侵略行动；意大利进攻了阿比西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了广泛的干涉。德国占领了奥地利，恰好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吞并了捷克，而且实际上也吞并了斯洛伐克。全球战火四起。斯大林问道：许多国家在侵略者面前节节退让，这该作何解释呢？他提出问题后，自己回答道：“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③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得知德国占领了立陶宛的克莱佩达省，得知捷



从1939年初开始斯大林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外交问题上。图为莫洛托夫、斯大林、铁托

米高扬草案

1939年1月，苏德谈判开始。苏联对外贸易委员会提出两份清单：A.1.25亿马克的机床，2840万马克军事设备，1300万马克制造合成汽油系统设备；B.机床4200万马克，化工设备1050万马克，军事设备3000万马克。这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米高扬草案”。这两份清单由米高扬在2月11日通知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贝奈斯签署了“柏林协定”

克斯洛伐克总统埃·贝奈斯签署了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亡国的“柏林协定”，他下令向柏林提出强烈抗议。在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给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的照会中，以强硬的措词对德国的行动表示谴责，并告知德国国家领导人，苏联政府“不能承认捷克被并入、而斯洛伐克也以某种形式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版图……”④


埃·贝奈斯(1884–1948)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治家、总统

1908年毕业于第戎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争取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独立的活动。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先后与法、苏签订互助条约。慕尼黑危机期间，在英法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1938年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赴美讲学。1941年在伦敦建立的流亡委员会被反法西斯同盟国承认为政府，贝奈斯任总统

在全球战火熊熊燃烧的情况下，需要确定一项既能继续实现使国家得到发展的社会经济计划、同时又能保证祖国受到可靠保卫的战略。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不干涉政策的拥护者们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危险的政治赌博”。苏联被迫参加了这场结局还很难说的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一个李维诺夫也曾数次应邀参加的通常很小的范围内，讨论了在当前形势下应该遵循什么路线的问题。欧洲各国人民阵线的“蜜月”已经结束。革命的浪潮受到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壁垒的遏制。欧洲大陆仿佛因预感到它行将遭受希特勒坦克铁蹄的蹂躏而暂时沉寂下来。西班牙内战的悲剧行将结束，共和国危在旦夕。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许多已被摧垮或者转入地下，它们正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苏联。共产国际的作用明显地削弱了。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斯大林对此应负很大的责任。

斯大林实际上把联共(布)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看作一回事，对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实行武断的操纵，从而损害了该组织的威信。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活动家的镇压行动是极为惨痛、严酷和绝对不能容忍的。恐怖政策这个令人生畏的“靶子”使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

人救援委员会都深受其害。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那些国际主义者，为躲避本国反动派的迫害而在苏联寻求避难的人们纷纷落入惩治机关的魔爪。受镇压者数不胜数。这里只举出某些在斯大林践踏法制的年代里牺牲的同志的名字。他们是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Г·列梅克、Х·埃别尔莱恩、Г·诺伊曼；波兰共产党领导成员Э·普鲁赫尼阿克、Ю·连斯基、М·科舒茨卡娅；希腊共产党总书记А·孔塔斯；伊朗共产党著名活动家А·苏丹-扎德；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М·戈尔基奇、В·乔皮奇、М·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А·绍特曼和Г·罗维奥。牺牲的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库恩·贝拉，列宁的挚友、瑞士人弗·普拉滕，匈牙利人Д·加夫罗（曾因在内战期间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而荣获两枚红旗勋章），曾被授予列宁勋章的保加利亚人Р·阿夫拉莫夫，芬兰人Э·久林格等等，不一而足。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的整治最为恬不知耻。该党全部领导人实际上已被斩尽杀绝。波兰共产党最后一名政治局委员别列夫斯基于1937年9月被捕。当让斯大林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因波兰共产党内"有波兰法西斯密探在活动"而解散该党的决定草案时，"领袖"的表态十分娓娓动听，他说："解散一事晚了两年。解散是必要的，至于登报我看就不必了。"顺便说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并未在会上讨论过，而是采用个别征求意见的表决方式通过的，19名委员中只有6名参加……

斯大林不仅削弱了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而且以自己的政治行动大大加剧了宗派主义倾向，把共产国际机关的活动降低到他所建立的官僚机器的附属物的水平。国际主义原则的扭曲变形，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推行的命令方法，镇压方法，大大削弱了共产国际在群众中的影响，客观上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嚣张气焰。

斯大林在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上仍然固执己见，实质上把它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无论如何，他是把全世界革命处于低潮首先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变节行为"。"领袖"通常是坚持自己错误的。这是其中的一个错误，但其后果特别严重，而且源远流长。让我们来对20年代略作回顾吧。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前一星期举行了中央全会。除其他问题外，

对季诺维也夫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也进行了讨论。斯大林在讨论中发言。他批评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个后来逐渐强加给共产国际的十分错误的论点，即：法西斯主义的支柱是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战斗”。斯大林在发言中实际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了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敌人[5]。也是在1924年，斯大林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看成“孪生兄弟”。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随机应变，而是多年来始终坚持同一种错误观点。斯大林早在1933年阅读德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之一弗·黑克尔特《德国发生了什么》一文手稿时就曾作过这样的批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吗？不错。”在黑克尔特写到社会民主党发生动摇并倒向法西斯主义一边时，斯大林补充说，正是因此“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人称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已经有三个年头了”[6]。斯大林的结论之极端错误和短视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不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而是让共产党去同社会民主党斗争。这一切都削弱了对法西斯主义这个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主要危险进行反击的力量。

斯大林在就国际问题同周围一班人进行商议时，大概只听莫洛托夫的意见。在“领袖”看来，莫洛托夫的论据是灵活性与坚定性的某种结合，符合实际情况。他同莫洛托夫一起制定了“党在外交领域的任务”，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任务进行了说明。这一纲领的四点是斯大林直到代表大会开会前几个小时才改写出来的，归根结底表达了两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思想：

第一，继续寻求防止战争爆发或者至少最大限度地推迟战争爆发时间的和平手段。在贯彻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计划方面作一些新的尝试。决不容许建立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遇事要慎之又慎，不受敌人挑拨。

第二，采取一切必要的甚至非常的措施来加速使国家做好防御的准备，把增强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放在首位。（后来在1941年2月的第十八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进一步增强国防潜力的问题）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上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同解决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有联系的。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我国外交机构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外交方面的潜力。他对外交人民委员感到不满意：

李维诺夫老是有他自己的见解。“五一”节刚过，贝利亚便对李维诺夫下手了。出现了很快要逮捕的迹象：把他同周围“架空”，停止让他参加高层的会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同李维诺夫的助手和亲属进行夜间“谈话”。然后是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看来就要发生最坏的事情。在人民委员部中查封了李维诺夫的文件。贝利亚手下的人翻阅了人民委员在其外交日志中所作的记录。在李维诺夫的文件中有他呈送斯大林的最后一批报告之一的一份副本，上面说：“谨送上今日同英国大使谈话记录及英方宣言草案译文……宣言只要求召开会议，这也正是我们自己的要求。现在仿佛正在形成一种除意大利和德国而外（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新的四国公约，它所造成的印象将具有某种政治意义。我不相信贝克连这样的宣言也同意签订……”[7]李维诺夫愿意并且希望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实现……李维诺夫在1939年3月底致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R·Э·苏里茨的信中通报说：“对于签署四国宣言的公开建议，我们已公开答复表示同意。”这位人民委员强调说，我们自己决定“没有波兰参加就不签字”。然而十分清楚的是，波兰的答复“相当明确地表明了其否定态度”[8]。李维诺夫认为，苏联可能与西方民主国家结成的同盟将是对付世界大战威胁的最可靠的保证。同时，恰恰是这样的同盟还可以保卫那些希特勒德国准备吞并的小国。他于1939年3月29日接见立陶宛驻苏公使巴尔特鲁沙伊季斯后在日记中写道：公使“给我带来一份德国与立陶宛关于克莱佩达省的协议副本，并且通报了谈判的详情”。里宾特洛甫对立陶宛外交部长Ю·乌尔布希斯的态度十分粗暴，他交给乌尔布希斯一份协议草案并要他立即签字。乌尔布希斯刚要提出异议，里宾特洛甫即表示：如果协议不马上签字，那么“科夫诺（即考纳斯。——本书作者注）将被夷为平地；德国人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里宾特洛甫最后同意放乌尔布希斯去科夫诺，条件是他要立即返回，把已签字的协议带回来……”[9]斯大林在同李维诺夫多次谈话后，感到此人完全不相信希特勒而且准备力争同西方民主国家达成协议。外交人民委员的立场如此确定不移，这使斯大林觉得可疑。他在同贝利亚谈话时下令对李维诺夫实行更严密的“看管”。不过由于独裁者本人的随心所欲，最坏的事情并未发生。然而李维诺夫的去职在柏林被当成了“好信号”。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Г·А·阿斯塔霍夫向莫斯科报告说：德国人认为出

现了改善德苏关系的契机。"由于李维诺夫的去职,这方面的条件更加成熟了……"[10]斯大林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他的冒失鬼,只是撤销了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而由莫洛托夫接任该职。"领袖"把国内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推举到这个部门,意在向所有的人暗示苏联是多么重视外交问题,多么重视维护和平的事业。斯大林认为30年代中期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没起作用"。但这一切都是1939年5月的事情……

1938年希特勒准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分别于3月、4月、5月、6月、8月)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寻求公开证明苏联决心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和方法。看来,连贝奈斯总统也倾向于接受这一援助。9月20日,对于布拉格提出的苏联是否有可能有决心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即将发生的入侵这一询问,莫斯科再次给予肯定的答复[11]。国防人民委员签署了一项训令,根据该训令,在基洛夫特别军区内建立起了专门的军队集群,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内预计要进行兵团的战术调动以建立相应的集群。进行了专门的训练。筑垒地域、防空系统均进入战备状态。9月底,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给西部各军区拍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凡已在工农红军中服役期满的红军战士和初级指挥人员,在未接到特殊命令前均不得令其退伍。"[12]在许多区域进行了局部动员。70多个师进入战备状态。而此时慕尼黑的暗中勾结正在进行……斯大林懂得,对"共产主义传染病"的恐惧将会胜过理智的声音。他的看法没有错。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当时的情势下未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它在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向希特勒拱手投降。法国也在事实上同意废除法捷条约。斯大林寻思,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是不要让帝国主义国家串通一气反对苏联。根据他的指示,李维诺夫和后来的莫洛托夫开始积极地摸索打破帝国主义反苏勾结的可能性。斯大林深感不安的是"慕尼黑篮子"里的货色,即1938年9月签订的英德互不侵犯宣言及类似的法德协定(1938年12月)。事实上,这两个协议使希特勒得以在东线"腾出手来"。不仅如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两个协议还可能成为反苏同盟的基础。斯大林懂得,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那对我国来说真是再糟糕不过了。

早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斯大林就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英国和法

国政府开始进行三方会谈，以便定出制止法西斯进一步侵略的措施。英国和法国同意进行这一会谈，意在向希特勒施加压力。不过它们的意图暴露得相当快。为数众多的文献资料证明，伦敦和巴黎很可能是想把希特勒的侵略引向东线，而对苏联所建议修建的“拦阻墙”毫无兴趣。李维诺夫在致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伊·米·马伊斯基的信中说：“希特勒暂时还假装不明白英、法关于在东线可以为所欲为的暗示，不过只要英、法除暗示之外再向他提个什么别的建议，他可能就会明白的。”[13]

莫洛托夫和他的副手弗·彼·波将金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英国大使Y·西茨和法国大使Π·纳德日阿尔，从他们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总的说来这些外交官并未否认同苏联达成一项旨在制止可能发生的德国侵略的军事协定的可能性。但他们显然是在回避研究具体问题。在斯皮里多尼耶夫卡大街17号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别墅里正在进行政治上的纵横捭阖。要是当时参加谈判的各方都知道他们正在坐失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良机，那该多好！因为假如1939年建立起了反法西斯同盟，那么很多事情就可能大不一样。西方各国的代表曾不止一次地问道：“李维诺夫不再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是否意味着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1939年5月11日莫洛托夫同法国驻苏临时代办Ж·派亚尔谈话时，临时代办问人民委员：

“苏联的政策会同李维诺夫在任时一样吗？”

“是的。法国和英国政府内部部长易人的情况更多，却并未引起特别的麻烦……”

“是否可以认为《消息报》上《关于国际形势》一文反映了政府的意见？”

“那是报纸的意见。《消息报》是作为地方机关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不能算做半官方刊物……”[14]

这就是莫洛托夫对苏维埃和《消息报》的态度。不过新任外交人民委员并未正式表示完全不同意李维诺夫的路线。尽管有洞察力的政治家都明白，如今德国更有可能阻止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结盟了。在互相不信任的条件下，这可以较容易地办到。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参加谈判的各方之间所存在的**信任危机**曾经起了怎样的决定命运的作用。

德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阻止苏联同英、法可能的接近。在苏英法

三方谈判开始的前夕，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设法同莫洛托夫见了面，他在见面时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主要思想："苏联和德国之间没有政治上的矛盾。有的只是调和双方利益的一切可能性。"莫洛托夫还不知道苏英法谈判会进行得怎么样，他小心谨慎、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苏联政府对德国政府改善关系的意图表示赞赏……"[15]由于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已经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就赞同了对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39年8月初，贝利亚的"班子"准备了一份有关前来莫斯科参加谈判的英国和法国军事代表团成员情况的材料。其中对德拉克斯、巴尼特、海伍德、杜缅克、瓦连、维伊奥姆及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情况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背景材料"中还谈到：德拉克斯不久前成为国王的海军副官，他拥有一枚沙皇时代的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杜缅克11月份即将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且是军队摩托化方面的专家，但从来不搞政治[16]。斯大林对这个材料不感兴趣。他马上注意到除儿名将军外，代表团中有不少初级军官，如上尉萨维什、上尉博夫尔等人。斯大林顺口对正在他办公室里的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说道：



贝利亚和斯大林(右)

"这是不严肃的。这些人不可能拥有应有的权力。伦敦和巴黎仍然想玩牌，我们倒想看看他们是否会参加在欧洲的这一场纵横捭阖。"

"不过看来谈判还需要进行。让他们把牌统统摊出来。"莫洛托夫正面看着斯大林说道。

"那好，需要就需要吧。"斯大林冷冷地结束了谈话。

在1939年8月开始的三国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成员为克·叶·伏罗希洛夫、尼·格·库兹涅佐夫、亚·德·洛克季奥诺夫、И·В·斯莫罗季诺夫、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军事谈判中，情况很快明朗化了。两个西方国家不愿把它们提供保障的范围扩大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不仅如此，它们还促进了这些国家同德国的接近。正当英法苏谈判进行之际，希特勒把他的条约强加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头上。霍尔蒂统治下的

匈牙利开始奉行一条敌视苏联的路线。在1939年1月波兰外交部长Ю·贝克同希特勒谈话时表露出来的波兰政府的立场实际上并未改变。贝克当时声称,波兰"根本不认为所谓的安全体系有什么意义",该体系已彻底破产。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同贝克会见时也强调指出:柏林希望"波兰采取更加明确的反俄立场,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未必会有共同的利益"[17]。据悉,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在秘密访问德国期间曾对希特勒说:"罗马尼亚是反对俄国的,但由于同它毗邻而不能公开表露出来。可是罗马尼亚绝对不会允许俄国军队过境,尽管常常有人断言罗马尼亚已向俄国保证允许军队过境。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18]

这就是谈判开始前夕的国际形势。苏联代表团团长克·叶·伏罗希洛夫的公文包里装有斯大林于8月4日批准的政治领导人的指示。文件名为《关于同英国和法国谈判的意见》。《意见》分析了"我国兵力可能出动"的五种情况。而且德国在该文件中被称作"主要侵略国"。国防和外交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十分详尽地计算了"视情况而定"苏联、英国和法国各应派出多少坦克、火炮、飞机、师团,提出了"封锁主要侵略国海岸线"的任务,确定了"主攻"的方向、"协调军事行动的程序"等等。苏联准备派出120个步兵师对付"主要侵略国"。《意见》强调说:"如遇主要侵略国袭击我国时,我们应要求英国和法国派出86个步兵师,于动员后第16日起坚决进攻,最积极地参加波兰战争,以及给我军提供机车车辆,让我们畅行无阻地通过维尔诺走廊和加里西亚。'主要侵略国'可能进攻苏联的情况,指的是德国有可能利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领土,也许还有罗马尼亚的领土。"[19]

然而在头几次会议上即可看出,西方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来,主要是为了讲讲一般的意见,向伦敦和巴黎报告莫斯科的"规模宏大的计划",而不是为了努力制定出一项具体有效的协议。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摆开这个政治"纸牌卦"时愈来愈坚信:西方并无诚意达成一项互相可以接受的协议。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认为必须再次向英国和法国提出一项有关同苏联签订为期5年或10年、其中也规定有军事义务的互助协议的具体建议。其实质是:在任何一个缔约国(东欧各国也在内)受到侵略时,缔约各方有义务对该国予以援助。苏联具体说明了这里指的是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哪些国家。伦敦和巴黎不作答复。斯大林一再催促,要求提醒。然而前来

莫斯科参加谈判的都是些无权作出重要决定的二流人物。同时斯大林也获悉,谈判的对手并未停止其争取同希特勒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协议的秘密活动。人们渐渐清楚了:英国和法国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以寻求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方案,而不考虑苏联的利益。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未提出对德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明确构想。从它们的代表团的立场中可以明显看出一种意图,就是让苏联在抵御可能发生的德军侵略中起主要作用,而它们自己却并不提供对反侵略的斗争作出相应贡献的一定保证。斯大林明白,这意味着集体安全思想的破产。"领袖"沉不住气了。通常是尽量以微小然而坚实的步伐走向目标的斯大林,开始像一个处于无暇思考地步的棋手那样行事了。当伏罗希洛夫于8月20日上午把海军上将德拉克斯的便条放到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彻底认为三方谈判已毫无希望。苏方曾要求德拉克斯及其法国同僚尽快对苏联建议作出答复。便条中写道: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元帅!

我必须遗憾地通知您,英国和法国代表团迄今尚未收到您要求我们向我们各自的政府发回的政治问题的答复。

鉴于我需担任下一次会议的主席,我建议于8月23日上午10时开会或提前开会,如到时已收到答复的话。

海军上将、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谨上**[29]

"得了,别演戏了!"斯大林恼怒地说道。当时他未必能料到,8月23日的代表团会议毕竟还是如期举行了。只不过完全换了一批人。

1938年斯大林迁入新居,新居仍在克里姆林宫内,位于原参政院的大楼里。斯大林在著名的马·费·卡扎科夫于1776—1787年修建的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占用了几个房间。并排着的房间分别是警卫室、客房和接待室。楼上是斯大林的办公室和其他办公用房。

1918—1922年列宁曾在此生活和工作。斯大林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从窗户不大透光的二层楼房、过去曾供仆役居住的屋子迁入这幢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来。因为他几乎从来不在克里姆林宫里过夜,总是要回到孔策沃别墅去。他早上驱车来到原参政院的大楼旁边,朝圆形屋顶望上一眼,便想起屋顶上原先竖有常胜将军格奥尔吉的壮

丽塑像，那是莫斯科古老的象征。但拿破仑于1812年下令取下格奥尔吉塑像并且运回法国。又是这个法国……似乎它在向英国人看齐。皮埃尔·赖伐尔早在1935年5月中旬就曾对他说过："只有真诚的合作才能使法苏条约产生效力。"这就是所谓的"真诚合作"！斯大林沿着陡直的楼梯往自己的办公室里走时继续想道：在英国人和法国人实际上进行抵制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祖国免受战火之害呢？是啊，什么措施呢？有一个"方案"，可是需要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去达成一项极不得人心的协议。





克里姆林宫位于莫斯科，是由许多教堂、宫殿、塔楼等组成的宏伟建筑群体，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建筑艺术。它由朱红色的齿形城墙围成三角形，宫墙四周有4座城门并矗直多座尖耸的塔楼，高矮不一，形状各异。其中宫门北角是古代兵工厂建筑，装饰着自拿破仑军队掳获而来的战利品，炮筒等；西角是历史悠久的兵器馆，收藏着珍贵的历史遗物。宫中最高的建筑是白色的伊凡一世钟楼

这些日子斯大林这个宽大的办公室里每天都在开会，与会者系某些政治局委员、外交官和军人。至1939年夏末，苏联领导人愈来愈清楚了：面对西边的法西斯德国和东边的军国主义日本，苏联是谁也指靠不上的。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仿佛得到了证实，即：英国和法国的反共和不愿奉行集体安全政策，为"反共产国际公约"成员进行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看来，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恶感、自私的打算使得伦敦和巴黎不能清醒地了解已具轮廓的现实危险。最没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公开说：让希特勒来一次反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吧。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如苏联危险。这一切注定了斯大林在1939年夏天将面临惨淡凄凉的外交形势。

苏联的可供选择的余地极其有限。但是必须作出选择。必须下决心作出选择，斯大林比其他人更早地明白这一点，不过也预见到许多国家对这一步骤会大加反对。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此时他已将思想原则抛到一边去了。这

位搞了15年以上专制的人对于作出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决定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尽管极为谨慎小心，却不怕负责任，对自己的一贯正确深信不疑。尽管也采用屡试不爽的方式：把失利的罪责推到别人身上。斯大林已习惯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决定时总是由他来最后拍板。与此同时，他在作出选择后，并非总是关心这一选择的宣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他指靠自己的班子，尤其是指靠干劲十足的日丹诺夫。

于是，当斯大林确信英法苏三方谈判不会很快取得结果（他也并不十分相信谈判会导致积极的决定）时，他便回到柏林一再建议的"德国方案"上来了。照他的意见，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认为，搞不好苏联就会面对一个可能产生最坏后果的广泛的反苏战线。在政治上陷入无暇思考问题境地的斯大林，当时已无暇顾及后代对这一步骤会说什么，以及历史将怎样评说了。战争已迫在眉睫，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推迟它的爆发。

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同柏林积极进行接触的步骤并确定了对苏联驻德全权代表的指示后，斯大林责成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副手德文斯基收集有关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社会根源的全部文献。他想深入了解一下民族社会主义这一现象。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早在十七大上他就曾说过："即使经过最精密的检查，也不能在它里面发现一点点社会主义的成分。"[21]斯大林记得，布哈林在其最后一次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把一半篇幅都用来分析德国和日本对苏联所构成的威胁的性质。他还记得布哈林那番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种宣传和虚张声势的形象化小结：在说明各自的肆无忌惮的强盗政策时，"……希特勒的说法是想把我们挤到西伯利亚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说法是想把我们从西伯利亚挤出去。所以，大概需得让我们全苏联一亿六千万人统统住到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哪一座高炉上去吧。"[22]虽说斯大林这个人连暗地里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的习惯都没有，他今天却未必会认为布哈林的这个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距离未来同法西斯主义以至而后同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怕搏斗还有七年的时间，布哈林却把即将来临的危险的轮廓勾勒得基本正确。

晚上，斯大林专心阅读德文斯基给他准备的材料。他久久地翻阅着希特勒那本《我的奋斗》一书的俄译本，用铅笔在两段话下面画了着

重线，这两段话是："我们即将结束德国人向欧洲南部和西部推进的长期过程，并把目光投向东方国家。我们即将结束搞殖民地贸易的政策，而改行征服新国家的政策。今天当我们谈及欧洲的新国家时，我们只能想到俄国及其统治下的边疆。命运本身仿佛指出了这条道路……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并非斯拉夫民族的治国才能在俄罗斯结出的果实，而不过是劣等种族中的日耳曼部分建国活动的光辉典范……我国外交政策的未来目标既不应指向西方，也不应指向东方，而应当是实行一种以获得我们德意志人民所必需的领土为主旨的东方政策。"斯大林读着这字字句句都证明着罪恶计划的文字，更加深信那个留着额发的冒险家是会不顾一切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时候？"

斯大林在仔细地研读孔拉德·海登《德国法西斯主义历史》一书时，标出了希特勒早在1922年所说的话："在右翼阵营中，犹太人拼命把所有的缺点表现得十分突出，以便尽量激怒平民出身的人；他们培养对金钱的渴求、厚颜无耻、残酷无情、令人生厌的假斯文。愈来愈多的犹太人进入了条件优裕的家庭，结果民族的领导阶层变得实质上同自己的人民格格不入。"

"这就为在左翼阵营中的工作创造了前提。犹太人在这里展开了卑劣的蛊惑宣传……通过天才地利用报刊，他们得以把群众如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致右派开始发现左派的错误就是德国工人的错误，而右派的错误在德国工人看来又仅仅是所谓资产者的错误……"斯大林对于如此狂妄的反犹太主义感到不胜惊讶，他继续往下翻阅，并用笔标出了标题：《拉比的阴谋》、《语言大师》、《神经衰弱的大师》、《能言善辩的外交》、《他的诺言》、《他的外表的秘密》……

他将要同这个与众不同的人较量。斯大林对此毫不怀疑。但是他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人物、实际上的全部政治权力和威力的化身所遇到的是元首，即极端军国主义性质和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的体现者。这是两个独裁者之间的争斗呢，还是他们的结盟？也许，托洛茨基撰文说斯大林与希特勒相似不是毫无根据的吧？"领袖"撵走这个念头，继续读海登的书："不善于控制自己的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在承诺什么，他的承诺不能认为是可信赖的对手的承诺。只要对他有利，他可以不遵守诺言，而且还继续认为自己是个正派人呢……"[23]就是这个人建议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擅长用"上帝的召唤"为自

己的行为辩护，他大概认为同斯大林签约是在同魔鬼签订协议，而他可以对这个魔鬼为所欲为吧。

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了踱步，又继续翻阅德文斯基送来的一叠书籍、小册子、文章，以及驻柏林全权代表的报告、其他外交官和侦察员的结论。例如，侦察员报告说，至1939年仲夏，德国的陆军有370万人、3195辆坦克、26000门以上的火炮和迫击炮。将近一半的部队实现了摩托化。空军有将近40万人（4000多架飞机），海军有将近16万人（主要等级的军舰107艘）。这无疑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德国有数千名反法西斯战士被处死，将近100万德国人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受着煎熬。（按照斯大林的标准这不算太多。）

设若斯大林喜欢他一直号召人们进行的自我批评的话，他完全有理由嘲笑自己关于未来战争的那一番话。他先前所作的预言，如今在1939年连他自己都觉得很天真。而当时，1934年，斯大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说道：未来的战争"对资产阶级所以将是最危险的战争，还因为战争不仅将在前线进行，而且将在敌人的后方进行。资产阶级用不着怀疑，苏联工人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无数朋友一定会从后方竭力打击本国的压迫者，因为他们向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挑起了罪恶的战争。如果资产阶级先生们在这场战争的第二天便失去了几个和他们亲近的、现在'靠上帝保佑'得以平安统治着国家的政府，那就请他们不要埋怨我们"。[29]是啊，当时"领袖"就是这样预言的，他显然错了。但斯大林不喜欢回顾历史，要是历史对他进行责备的话。

斯大林在看完侦察机关的密码文件后，久久地翻阅着英国女作家多萝西·伍德曼的《德国在武装》一书，在上面画着重线，重温那些已经读过的篇章。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一章，即《战争的思想准备》。对居民和军队进行思想灌输的规模，对斯大林很有启发。法西斯主义的号召和口号与其说是针对理性和理智，倒不如说是针对本能和民族主义感情发出的。个人迷信是正常现象，元首的整个领导层在履行职责中盲目的狂热，专门搞了一些迷信活动——这一切模糊了人民的政治意识，造就了一批不动脑筋和残酷成性的执行者。法西斯的思想工作者们制造一种心理狂乱、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和政治狂热的气氛，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斯大林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研究有关法西斯主义及其元

首的材料，他明白了，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作为折衷主义的东西，其精神基础是反共产主义，它还要依靠浪漫主义化的先辈历史、伪造的历史哲学、对粗暴力量的迷信和对雅利安"超人"的赞扬。"领袖"对德国思想工作者们如此露骨的社会犬儒主义感到不胜惊讶。他认为通常这样的思想是不公开宣传的。不错，同这种人搞妥协极其危险。然而，在没有同英法达成协议时马上就与德国交战吧，他又尚未准备好。

斯大林已准备作出决定了。同战友们交谈未必会给他提供多少东西。个人专权搞得太厉害了，以致周围一班人大多只是试图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愿望，甘愿同斯大林随声附和。客观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制定"方针"、"路线"时只得更多地指靠自己。周围一班人都尽量对他说他们认为他想听的话，而不是讲自己的想法。然而，这是斯大林本人的过错，是他窒息了创造性的原则性的集体辩论和讨论。

在这个现实的时刻，斯大林有三种解决方法，即：同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同德国签订条约，再不就陷于孤立——这是下策。当然，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上策。那样就会建立起一个不仅具有巨大物质潜力、而且拥有很大道义优势的反法西斯同盟。然而，斯大林在陷入政治上无暇思考问题的境地后，他觉得既不能等待，也不能冒险。他显然是沉不住气了。况且伦敦和巴黎始终在抱观望态度；它们并没有同苏联接近的真诚愿望。不过尽管如此，斯大林的失误首先在于他确实过高地估计了英法同法西斯德国结盟的可能性。

8月，出现了特殊的情况。三国军事代表团会议毫无进展。与此同时，莫斯科和柏林的代表之间已经就政治问题狂热地进行着接触。很少有人知道8月初伦敦也在进行英德秘密谈判。德国驻英大使Г·迪尔克森和英国首相的特使Г·威尔逊试图架通"桥梁"。事态的发展极为迅速。斯大林读着Г·А·阿斯塔霍夫8月12日自柏林发回的报告："同波兰的冲突正在加速迫近，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可能在最短期间内爆发……报界在谈及我国时表现得特别有分寸……反之，在谈及英国时则挖苦嘲笑，连最起码的礼貌也不顾……"[25]

次日，阿斯塔霍夫报告说："德国政府注意到我们同意进行改善关系的谈判，希望能尽快开始谈判……"[26]

8月15日，舒伦堡交给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其中说道："德国政府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得到双

方完全满意的解决。这里包括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波兰、东南欧等问题。"[27]柏林的厚颜无耻竟然连伪装都不要了。

8月17日，莫洛托夫接见了舒伦堡。谈话中舒伦堡说：需要在本周内开始同里宾特洛甫谈判。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他特地强调了这一点）声明："在开始关于改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的谈判之前，应当结束关于贸易和信贷协定的谈判。"[28]

8月19日，舒伦堡再次求见莫洛托夫，他在被接见时说："柏林担心德国与波兰之间发生冲突。今后的事态发展并不取决于德国。"舒伦堡坚持让里宾特洛甫立即前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莫洛托夫对于8月26日至27日前来表示同意[29]。信贷协定很快便签订了。希特勒一再催促……他不满意26日至27日这个日期。他打算这几天就对波兰开动战争机器。斯大林多少有些违反常态，竟对柏林节节退让。希特勒终于按捺不住，于8月20日亲自致电斯大林。以下是这份意义重大的电报的摘录。

致斯大林先生

莫斯科

1939年8月20日

1.我衷心欢迎新的德苏贸易协定的签订，认为它是改造德苏关系的第一步。

2.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我说来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

3. 我接受由您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转交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我认为迫切需要尽快澄清与之有关的问题……

5.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无法容忍。波兰如此对待一个大国，随时都可能爆发危机……

6.我认为，既然两国均有意在彼此间建立新关系，就不宜浪费时间。因此我再次建议您于星期二（8月22日）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至迟于星期三（8月23日）接见……

阿道夫·希特勒[30]

元首把主动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电报的最后通牒口吻是显而

易见的。斯大林读了几遍，用蓝色铅笔在“随时都可能爆发危机”一句下面和电报的最后一句话“如蒙立即答复，我将非常高兴”下面画了着重线。

戏剧性的转折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来电研究了很久，又再次听取了伏罗希洛夫关于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谈判的进程的想法，试图弄清有关柏林同巴黎和伦敦进行接触的情报的可靠性，这种接触从原则上说孕育着建立广泛的反苏联盟的危险。他们在彻底权衡了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终于作出了决定。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赌博中需要迈出关系重大的一步。这一步迈出去了。

斯大林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个来回，瞥了莫洛托夫一眼，停住脚步并口授道：

致德国总理阿·希特勒

1939年8月21日

感谢您的来信。希望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将会创造一个大大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转机。

我们两国人民需要彼此和平相处。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将为消除政治紧张状态和确立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奠定基础。

苏联政府委托我通知您，它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前来莫斯科。

约·斯大林[31]

斯大林在仓促行事。他认为他再也没有等待和选择的时间。此后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会回想起这一天——8月23日了。他在某个关头屈服于元首的压力，丧失了主动权，没有充分估计到一切后果。1937至

1938年大屠杀后军队的状况对斯大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军队的状况同时也助长了希特勒的嚣张气焰。但当时双方都各自认为自己是“赢了”。

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当天就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期限为10年（尽管舒伦堡早在8月19日就曾建议定为25年）。在条约草案讨论过程中，里宾特洛甫坚持在序言中写进“苏德关系是友好性的”这一论点。当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汇报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拒绝了德国外交部长的建议，他说：“既然纳粹政府在六年的时间里对苏联政府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苏联政府就无法问心无愧地让苏联人民相信同德国存在着友好关系。”[32]可惜，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并不是前后一贯的。一个月后，他赞同了里宾特洛甫建议写进的论点。与此同时，英法苏谈判陷于中断。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在向报界发表谈话时说：“同英国和法国的谈判陷于中断，并不是因为苏联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恰恰相反，苏联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顺便说说，是同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谈判陷于僵局的结果……”[33]



里宾特洛甫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后排，中）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8月21日，正当斯大林研究希特勒的电报（舒伦堡是8月21日15时把电报交给莫洛托夫的）

时，举行了三方谈判的最后一次代表团会议。法国代表团团长杜缅克将军向身在巴黎的达拉第报告说：

"原定今天开的会在上午举行。下午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我们就过境（通过波兰。——本书作者注）这一政治问题上所出现的障碍客客气气地交换了意见。下一次会议的日期未定，只有当我们能够作出答复时才能召开……"[34]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政府也并未同意在发生战争时让苏联军队过境。其实，这一决定已经不可能改变什么，世界政治的时针急剧地移位了。斯大林赢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希特勒则着手分阶段地实现自己的计划。据马伊斯基自伦敦报告说，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的消息在西方"政界和政府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有两种感情：惊讶，慌张，恼怒，恐惧（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今天早上的情绪已近乎惊恐……"[35]

斯大林在出人意料地同意与德国签订条约之后走得更远了。他同意签署一系列以"秘密议定书"著称的补充协议，这些协议使上述迫不得已并且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具有了纯属反面的性质。尤其显得恬不知耻的是斯大林与元首关于波兰国土命运的协议，那等于是同希特勒达成了消灭一个独立国家的协议。形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些议定书的原件谁也没有见到过。大概多年来到处传阅的是里宾特洛甫带到莫斯科去的那些文件的复制件。然而我并不怀疑，即使没有"议定书"，那么有关苏联和德国的国境线、"国家利益"的补充协议（也可能是口头协议）是存在的。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君子"协定，双方在1939年9月遵循的是上述那些附有地图的议定书。我将在关于斯大林的外交一章中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援引能够证实我的说法的文件。

当然，从今天的高度看来互不侵犯条约显得黯然失色，从道德的角度说来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要招人喜欢得多。然而，无论英国和法国都没有表现出结盟的意思，斯大林也没有显出耐心与克制。从国家利益和现实的力量配置情况出发，当时苏联再没有可以接受的选择。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未必就能制止住希特勒。德国国防军和整个国家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进攻波兰已经是注定的事情。援助波兰之所以困难，不仅由于华沙所持的立场，而且也由于苏联尚未做好战争的准备。拒绝签订条约可能导致广泛的反苏同盟的建立，而那样一来就会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规定：

1.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

2.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3.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

4.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被迫割让大片土地，但泽被划归波兰辟为自由市，通往波罗的海的"波兰走廊"将原本连成一片的德国领土分成了两块，位于"走廊"之东的东普鲁士成了远离德国本土的"孤岛"。因此德国人一直对失去但泽和"走廊"地区耿耿于怀

拿社会主义本身的命运去冒险。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是这样来估计当时的形势的："问题大体同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一样，即我国要不要做独立国，社会主义要不要在地球上存在下去。"[⑲]斯大林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意识到了这一点。苏联关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并未得到西方政治家的积极响应。然而，在懂得签订条约是迫不得已的步骤的同时，必须十分明确地说，斯大林在同希特勒的接近中大大超过了可以容许的限度，这是无法用任何理由来辩护的。

顺便说说，类似的条约英法与德国签订得更早，那是1938年的事情。而1939年夏天他们同希特勒进行了旨在建立统一的反苏同盟的秘密谈判。

今天有许多人试图证明，是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忘记了，在此之前西方几个大国已经把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克莱佩达当作牺牲品拱手送给希特勒，英国和法国也没有为拯救西班牙共和国出过什么力。

人们通常也不提到一个事实：就连波兰这个法西斯德国的下一个猎物也同德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而进攻波兰这件事本身，希特勒早在1939年4月11日就计划好了（"维斯计划"），那是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署苏德条约之前很久的事情。关于占领波兰的问题，希特勒在更早的时候，即在1939年1月22日，就曾开会进行过研究。要求归还但泽（格但斯克），不过是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而已。希特勒吞并波兰的计划，对任何人说来都不是什么秘密。苏联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知道，希特勒早

在1939年初就已经作出了进攻波兰的最后决定。1939年6月，一名苏联侦察员同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东方司司长克列伊斯特博士会面。克列伊斯特通报说："元首决不允许英法俄关于条约的谈判结局影响到他彻底解决波兰问题的决心。无论谈判的结局顺利与否，德波冲突都将由柏林来解决……德国定于8月底9月初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52] 华盛顿、伦敦、巴黎都知道进攻的时间，不过他们希望德国对波兰的占领只会加速希特勒对苏联的进犯。可见，对1939年夏末形势的分析证明：对苏联来说，缔结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步骤，是延缓战争爆发的措施。而当时爆发战争，苏联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就在当时，在哈桑湖事件之后一年，日本侵略集团在哈拉哈河初试锋芒，挑起了流血事件。

斯大林不会忘记，当1938年9月英、法、德、意的代表在慕尼黑开会时，根本没有人想起过苏联。在慕尼黑搞实用主义，同希特勒成交，不仅意味着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在可耻的协定签订后过了几天，即10月4日，法国驻莫斯科大使P·库隆德尔坦率地对协定的实质作了评价，他说："捷克斯洛伐克中立化以后，德国通向东方的道路便开通了。"在慕尼黑协定签署的当天，即9月30日，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了关于互不侵犯和进行协商的宣言。



1939年8月24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举杯祝希特勒健康

人们揭发他斯大林前后不一,向希特勒讨好献媚。可他采取同柏林签约的步骤比英国人和法国人晚了一年……慕尼黑协定刚刚签订,即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在自己人中间宣称英国首相张伯伦“今天签署了不列颠帝国的死刑判决书并使我们有可能填上执行判决的日期”。斯大林听了只是付之一笑。为了充分说明问题,这里再援引一下波兰驻伦敦大使的意见。Э·拉钦斯基写道,在英国,大家按照足球赛的习惯认为:张伯伦守住了英国队的大门,并把比赛引向了欧洲东部[39]。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有指靠自己了。他很清楚,英国和法国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也给自己同苏联结盟的可能性划了一个大问号。

斯大林当然意识到了,同伦敦和巴黎签订旨在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协定远比同希特勒签署条约更受到全体进步势力的欢迎。希特勒在小范围内是这样来评价条约的:“这是同我们必须掐死的魔鬼订立的条约。”然而有些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看来,斯大林懂得这项条约在道义和意识形态方面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例如托洛茨基就曾在墨西哥幸灾乐祸地说:“斯大林同希特勒握手言欢。假面具扔掉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成了同盟。”签订条约的决定在许多共产党内引起了混乱;人们很难想象竟能同法西斯主义者达成什么协议。对于我国政治领导人旨在赢得时间、不容许出现可能出现的反苏军事同盟、为准备回击迫近的(无论如何要发生的!)法西斯侵略创造更有利条件的战略,并不是所有苏联人都清楚的。无论斯大林还是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真正的雄才大略。阶级的偏见、错误的政治分析、互不信任以及“以巧计胜过”对方的做法搞得彼此两败俱伤。

这里再说一遍,德国即将进攻波兰一事对任何人说来都不是秘密。国防军这辆战车早在几个月前即已发动。只需动动操纵杆就行。连许多欧美报纸都这样讲。8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分别致函希特勒和波兰总统莫斯季茨基,呼吁大家坐到谈判桌上来。一天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也通过电台发出类似的呼吁。8月26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呼吁柏林慎重从事并同华沙谈判。罗马教皇两次发出和平呼吁。斯大林沉默不语……他已经深深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赌博,在赌博中他把赌注(在缺乏政治信任的情况下)押在希特勒的身上。当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到后来更是完全没有了。斯大林只得厉兵秣马,等待势在难免的

进攻。

9月1日深夜两点，斯大林尚未回别墅就有人送来发自柏林的密码信，信中报告说，8月31日晚上，据说波兰军人冲进德国小城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击毙数名德国职员并用波兰语宣读了内容包括号召进行战争的一篇东西。斯大林一看便知：希特勒在为入侵制造口实。加之一星期前斯大林接到报告，说元首曾向他的将军们宣称："我要为发动战争制造宣传上的借口，至于它是否逼真无关紧要。人们事后是不会追问胜利者是否讲了真话的。"[39]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向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进行了查询：事态正在如何发展。得到的答复是，柏林电台在播送进行曲。暂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斯大林懂得：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袭击。

清晨，斯大林被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电话铃声吵醒："国防军已入侵波兰。"斯大林不知为什么马上想起了莫洛托夫同波兰驻苏大使B·格日博夫斯基的谈话，那是莫洛托夫不久前讲给他听的。大使表示："波兰认为不可能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是由于波方实际上无法向苏联提供援助……"[40]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波兰政府根本不想用同苏联的某项协议或者对波兰安全的保证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波兰领导人同斯大林一样，也未能做到高瞻远瞩。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又一个牺牲品。后来，到了白天，波斯克列贝舍夫默默地把一份密码信放到斯大林的面前。领袖没看一眼这位忠实执行旨意的人，便匆匆把驻华沙的武官П·С·雷巴尔科和全权代表Н·И·沙罗诺夫的报告读了一遍。报告全文为：

特急

9月1日德国的轰炸机群袭击了格丁尼亚、卡托维兹、克拉科夫、华沙。对华沙的空袭被击退。第二次对华沙的空袭于8:50被击退。第三次于10:00进行，结果不明。但泽已被德军占领。西普利亚捷正在进行战斗。德军步兵已越过边界向姆拉瓦、克雷尼茨、贾尔多沃和上西里西亚推进。战斗正在进行。有关前线的详情二处无法报告。

雷巴尔科、沙罗诺夫[41]



1939年9月1日，在德国边界，德军折断界杆



1939年9月1日拂晓，德军地面部队从三个方面向波兰发动全面进攻，入侵的头辆军车上带着"双头鹰"的标志

在德国入侵波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里，斯大林翻阅着波斯克列贝舍夫给他送来的几份最新的报告（波斯克列贝舍夫什么时候睡觉呢？"主人"走了，助手仍低下谢顶的头整理文件，到"主人"来时，他随时都在其位，随时都在听候召唤，随时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目光停留在发自柏林的密码信的如下几行字上："今天，9月4日早上，希特勒前往东部战线。他越过波兰走廊的原来边界，在库尔姆附近停留下来。"

思想紧紧地扣在这个地名上：库尔姆，库尔姆……很快便想起来了。1813年8月，米·博·巴克莱·德·托利将军在库尔姆附近摧垮了Д·万多姆将军的法国军团。一种类似满意的感觉在脑子里出现了。斯大林对哲学不大精通，对政治经济学一知半解，他酷爱历史，而且对历史相当熟悉。拿破仑那次对俄国的可怕入侵不也是通过波兰开始的吗？再过上一两个星期，身着鼠皮色军服的士兵就会向苏联边界开进。出现了新的战略形势。给边境各军区早已下达了加强战斗准备的命令。根据原先制定的计划和苏德协议，苏军应准备进入波兰东部。早上需要同莫洛托夫再次回过头来分析目前的形势。

尽管波兰人表现出了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那是一场力量过分悬殊的搏斗。希特勒投入了62个师来对付波兰，其中有11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共有将近30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机械化部队的巨流从波兰国土上汹涌而过。波兰的9月灾难并非偶然。虽然面对着法西斯主义，但在波兰领导人看来苏联仍旧是特别危险的敌人。由于拒绝接受事前向它提供的援

助,波兰在几年时间内丧失了国家的独立。

随着德国入侵波兰，人们渐渐认清了,对希特勒来说这一战局超不出两三个星期。英国和法国无法援助。1939年9月17日,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说:

"谁也不知道波兰领导人现在何处*。波兰人民被他们倒霉的领导人交给命运任意摆布……苏联政府认为向自己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弟兄和白俄罗斯弟兄伸出援助之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苏联政府已吩咐红军总指挥部命令军队越过边界去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42]

* 波兰政府恰好于9月17日晚离开该国,而最高军事指挥部是次日早晨离开的。

——此系原著编者注

斯大林吩咐立即将类似内容的照会交给波兰驻莫斯科的大使。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历史这面镜子,可以看出,从全国来考虑问题,苏联采取这一步骤是有相当理由的:在苏军开进的地区，居民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德国飞机轰炸波兰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的兵团在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了边界。斯大林在研究铁木辛哥、瓦图京、普尔卡耶夫、戈尔多夫、赫鲁晓夫等人的报告时,特别仔细地阅读了梅赫利斯的报告,报告中说:

"乌克兰居民把我军当成真正的解放者来迎接……居民们欢迎我们的官兵，拿出苹果、馅饼、饮用水等等拼命往红军战士手里塞。就连先头部队也照例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许多人高兴得流下热泪……"

铁木辛哥和波里索夫报告说,同德军的接触并非总是顺利的。在利沃夫附近"我军的坦克受到德军火炮的直射。结果两辆装甲车起火,第三辆被击毁,3人牺牲,5人受伤。我军装

甲车摧毁两门德军火炮，击毙1名军官和3名士兵……”[13]。


德军入侵波兰

希特勒入侵波兰两天后，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什克瓦尔采夫向希特勒递交了国书。什克瓦尔采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我照本宣读了在莫斯科写好并经您批准的讲话。希特勒在答词中说：‘德国人民因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感到幸福。这项条约将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事业服务……战争的结果将消除1920年以来根据凡尔赛条约存在的状态。这样一修正，俄国和德国将确立战前存在的边界……’”[14]斯大林用红铅笔在最后几行字下画了粗粗的着重线。他在竭力避免战争的同时，也成了“修正”的参加者。


1940年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排左三）应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邀前往柏林，就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之事展开会谈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个十分尖锐的、同波兰对德作战失败后相当数量的波兰人被驱逐到苏联领土上有关的问题。我们的波兰朋友应该知道，我们这些经历过斯大林暴政的苏联人是坚决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违法行为的。不过我想要说的是，在西方的出版物上，有时也在波兰，出现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被驱逐者人数。我要援引一些也许是初次公布的文件。我在莫洛托夫的档案馆工作时，曾见到一份副内务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为贝利亚准备的文件。这份文件预定是向斯大林作报告用的，其中讲到：

“1939年至1941年6月期间，抵达苏联领土的原(?!——本书作者注)波兰公民有494310人。其中，在那段时间内：转交给德国人原战俘(?!)42492人*。释放并遣送至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42400人。”

*即出生于德国人所占领的西部地区的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段文字中有不少荒唐之处，如“原波兰公民”，读者还会动这样的

脑筋："转交给德国人原战俘"一栏究何所指，他们的命运如何？既然我们没有打仗，那为什么会有"战俘"？

我还要提到其他一些可以说明许多有争议问题的数字。在同一份文件中说道："到签订苏联政府与B·西科尔斯基政府的友好条约时（1941年7月30日），在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关押着389382人。其中，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1年8月12日命令大赦了389041人。1942年疏散到伊朗119865人（随安德斯的部队疏散，内有76110名军人和43755名公民）。现在苏联还有波兰人218000人。"[85]

预定给斯大林使用的这份资料，是1945年11月2日签署的。还有许多有关实际上将全体波兰人遣送回国的文件。为了把这个情况说得更充分一些，下面引用一份文件。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至10月2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内共有27010名波兰公民，均系1944—1945年间为了给红军作战部队扫清后方而在波兰领土上逮捕和拘留的。

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其中12289人应予释放并遣返波兰。其余的人于今年年底以前遣返。将会留下一定数量的因从事间谍活动、进行破坏等等而被捕的人。

拉·贝利亚

1945年11月24日[86]

我曾研究过数十份有关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被弄到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的文件，其中没有任何关于遇害和死亡的准确数字的材料。这一切都是过去斯大林粗暴违反国际法和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所造成的带普遍性的创痛。不过我在这里先提一下。

后来几个月里，面对德国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威胁，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从政治上巩固我国西部边防的新的重要决定。在那决定成败的犹豫时刻，即难以确定是继续争取与西方民主国家达成协议还是同法西斯恶魔交好的时刻，国家和领土的考虑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这里要指出，斯大林曾经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从未正式宣布的同波兰的战争（从1920年4月约·皮尔苏茨基对基辅的远征开始）似乎就要以红

军8月12日进抵华沙郊区这一胜利告终了。然而进攻力量迟迟得不到增援以及参战的后备队滞后却使红军遭到了失败。我已经指出,斯大林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份，他拒绝签署命令把第12集团军和骑兵第1军团从西南方面军的编制中分出来。斯大林也没有忘记他后来曾经干过看来是消灭罪迹的事情。这里作一段插叙。

1925年1月，总书记下令为他提供保存在基辅省档案馆的南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某些归档的案卷。

基辅。省档案馆。

请将我所挑出的斯大林档案准备好,以便在星期一即1925年2月16日凌晨3时前交出。

中央办公厅主任 **布列扎诺夫斯基**[57]

档案文件根据交接书交给了这位布列扎诺夫斯基，期限为六个月。目录中有40多份文件:信件、命令、秘密通报,通过直通电话进行的谈话记录、逮捕的决定、报告等。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后来开始的。送给斯大林的档案不知去向……六个月后,中央档案馆、基辅省档案馆(格林贝格、阿多拉茨基、约特科等人)纷纷询问中央办公厅:档案在哪里?那位曾去基辅亲自收受档案的布列扎诺夫斯基是这样写信推托的:

致中央档案馆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办公厅特此告知:中央委员会档案馆未收到任何材料。

中央办公厅主任 **布列扎诺夫斯基**

1925年10月24日[58]

布列扎诺夫斯基有一点说对了：中央委员会档案馆并未收到文件,文件直接交给了总书记。档案中很可能有涉及斯大林本人的东西。他看了档案,可档案跑哪儿去了呢?我未能在那个时期的案卷中发现这些文件。斯大林后来还不止一次地“清洗”过档案……

我所以要插这一段话，还因为斯大林后来并不掩饰他的下列看

法，即：1921年的里加和约是不公正的，根据该和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国土都划给了波兰。根据和约所确定的、比所谓的寇松线靠东得多的边界线，总是让斯大林想起将近20年前跟他有直接牵连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在谈判中曾几次小心翼翼地提到这一年代久远的伤痛。因此今天看得很清楚，同英法谈判不成功，此中还有一段内情。斯大林同德国交好，是有意收回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丧失的国土。

早在9月上旬就在基辅和白俄罗斯这两个特别军区的基础上建立了由第5、6、12、3、11、1和第4集团军组成的两个方面军。部队只有在受到攻击时才准许使用武器。仅仅发生了个别的小冲突。实际上没有抵抗。居多数的民族（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由衷地欢迎苏联军队的到来。

到9月25日，苏联军队在一星期之内推进了250至350公里，按照苏德秘密协议的规定来到了西部布格河和桑河的边界。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以后的一章中来详谈。1939年11月，这片领土正式并入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版图。1940年6月，苏联政府又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回归的问题。根据同罗马尼亚政府达成的协议，恢复了以普鲁特河和多瑙河为界河的边界，成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大林在搞大规模的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时，意识到尽管有苏德协议，希特勒是不会放弃他染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计划的。那个地区于1917至1919年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推翻了，因此斯大林认为，当前的任务应当是恢复苏维埃政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资产阶级政府知道，当地居民是看不起长期压迫这些国家人民的德国人的。1939年9月底至10月初，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经过短暂的犹豫、内部斗争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同柏林的协商后，签订了条约，根据条约红军开进了这些国家。按照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政府的要求，苏军的人数少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军队的人数。苏联军事人员只是驻防，并不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生活。不过斯大林当然明白，红军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存在本身就不能不影响到政治气氛。我想，所有这些步骤基本上都是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实现的。

在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内保存有数百份有关那个时期的事件的

文件。这是个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题目。我在这里只是援引某些文件。根据伏罗希洛夫的命令向联共(布)中央特别处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递交了工农红军代表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军队代表之间的协议原文,以供向斯大林报告。在工农红军和拉脱维亚军队之间关于在拉脱维亚领土上部署苏联军队(不超过25000人)的协议议定书上签字的有:苏方的军长博尔金和巴甫洛夫、师长阿列克谢耶夫和莫罗佐夫、旅政委莫列耶夫。代表拉脱维亚军队军事委员会签字的是加尔特马尼斯将军、海军上将斯帕杰、上校叶斯克、巴什科、格罗斯巴尔特斯、卡尔克林什[49]。苏联与立陶宛之间类似的议定书由二级集团军指挥员科瓦廖夫(及另外4名军人)以及拉什季基什(及另外13名立陶宛军官)签署[50]。苏联与爱沙尼亚议定书由二级集团军指挥员梅列茨科夫(及另外4名苏联代表)和中将列耶克(及8名爱沙尼亚军官)签署[51]。

根据议定书和补充的秘密协议,附带说明了苏军的人数和配置地点、驻扎的机场和港口、调动的路线、租借房屋和土地的费用、通讯线路等等。斯大林责成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副国防人民委员洛克季奥诺夫、副外贸人民委员斯捷潘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列夫钦科以及其他许多人通过正常的工作程序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一起决定一切财政、外交、军事和组织等方面的问题。

尽管有过一些摩擦(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达成协议的双方总的说来是遵循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有时候波罗的海沿岸的伙伴们还走得更远。例如,苏芬战争爆发后,驻里加的武官瓦西里耶夫上校向莫斯科报告说:“12月1日加尔特马尼斯将军表示,如果你们根据战时的情况需要飞机降落场,你们可以占用我国现有的全部机场,里加机场也包括在内。”[52]立陶宛政府通知莫斯科,说“成立了一个保证驻立陶宛的武装力量(指红军。——本书作者注)的食品和饲料的委员会”[53]。在爱沙尼亚军队总司令约甘·莱多涅尔将军(此人十月革命前夕曾是俄军总参谋部的中校)1939年12月初访问莫斯科期间,人们产生了一种两国和两军之间的友好关系都得到发展的印象[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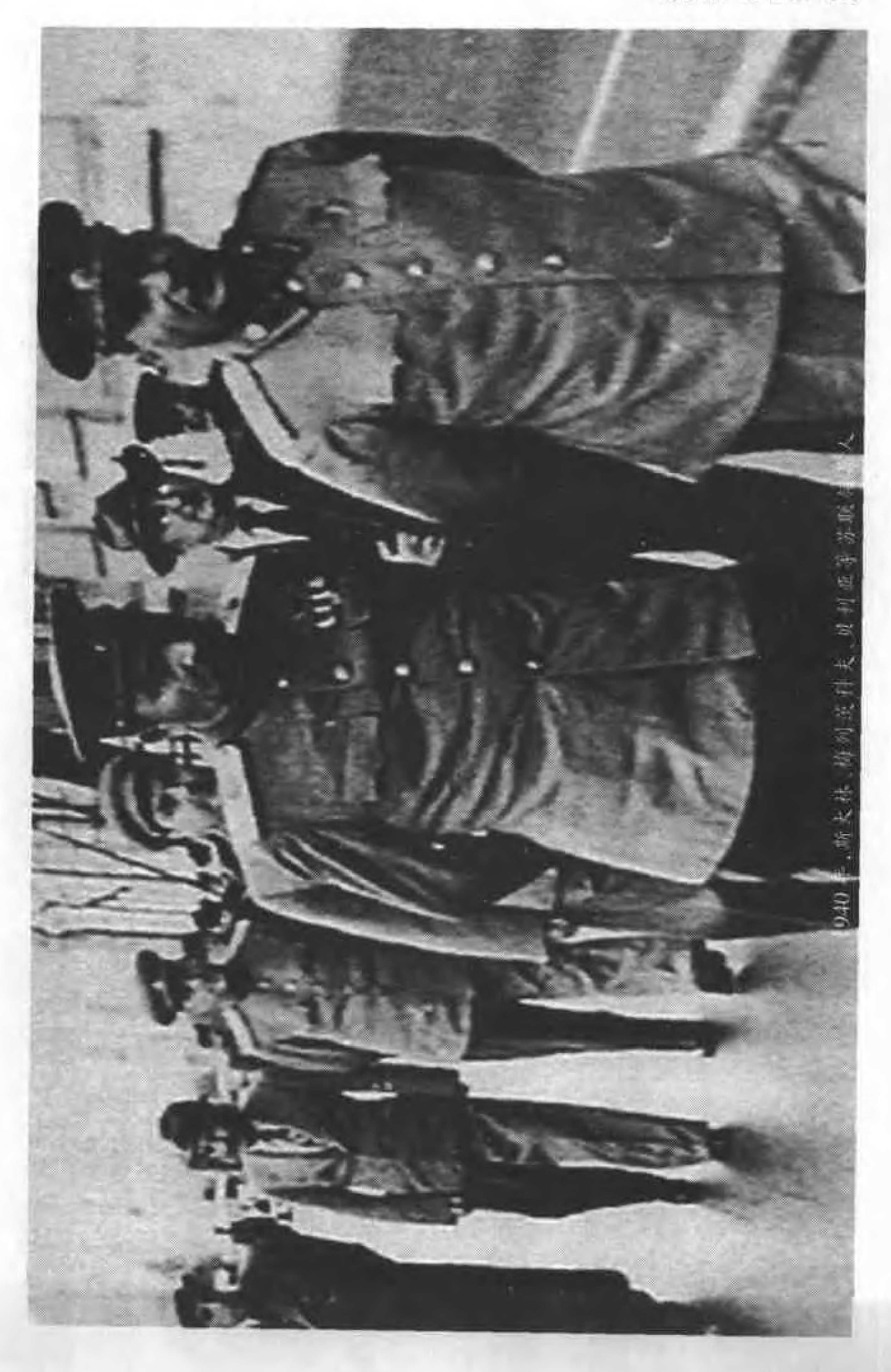
然而当法西斯主义者于1940年6月占领巴黎后,斯大林意识到:现在希特勒不入侵英国,就肯定会把目光投向东线。斯大林焦急不安地试图挽回失掉的东西,并且感到自己尚未做好准备。他采取了一个新

的步骤。6月中旬，莫斯科先是要求立陶宛政府、然后是要求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同意向这些国家派驻新的军事人员。外交照会的口气和理由是严厉的和最后通牒式的。斯大林在前几次顺利行动的鼓舞下放手大干了。他把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派到波罗的海国家去，这不是偶然的。同杰卡诺佐夫一起去立陶宛的H·波兹德尼亚科夫于1940年10月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铁木辛哥、维辛斯基报告说："立陶宛军的政治状况仍然不如意，因为……军中没有实行阶级划分，就是说，敌对分子尚未失势，他们在民族的基础上把战士们团结起来（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用这种方式进行反苏工作……"[6]不难想象，杰卡诺佐夫、日丹诺夫、维辛斯基和波兹德尼亚科夫都曾如何建议"使之失势"……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同声谴责的斯大林主义罪恶的编年史中的痛苦篇章。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形势起了变化。在各共和国的人民和共产党真诚地渴望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那些维护无产阶级国家"阶级纯洁性"的人也干起了自己的肮脏勾当。

必须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革命变革是这个地区各国人民在驻有苏联军队这个因素的影响下实现的。分析应当是辩证的，即：内外团结一致决定了局势的变化。

当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人民总的说来都处在严酷局势的前夕时，此举是个积极的现象。但问题的道德方面（坦率地说，这也是斯大林的"功劳"），说得轻一点，远非无可指摘的。"领袖"没有把人民看成自己命运的主体的习惯。他更多地是依靠压力。不过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应当承认：并不是斯大林把革命"带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来的。革命是由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也是那位杰卡诺佐夫于1940年7月初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7月7日在维尔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参加者约8万人。主要的口号是，'第十三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斯大林同志万岁！'等。集会上通过了欢迎苏联和红军的决议……举行了拉脱维亚军队业余音乐会，出席者有总统、许多政府成员、将领的代表……苏联演员要能来立陶宛就再合适不过了。请发布指示——速派米哈伊洛夫、列梅舍夫、诺尔佐夫、什皮勒、达维多娃、鲁斯拉诺娃、科佐卢波娃和有列佩申斯卡娅参加的芭



1940年，斯大林、梅列茨科夫、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

蕾舞团到立陶宛来……”[58]就连对演员也要“发布指示……”杰卡诺佐夫之流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他们可以玷辱任何纯洁的意图。1939年曾会见过斯大林的原立陶宛共和国部长Ю·乌尔布希斯在自己的书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写到这一点。

另外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没有苏联军队，法西斯主义者早在1941年6月以前就进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了。不能否认当时的情况：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绝大多数居民对这三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演变持肯定态度，1940年8月根据他们的最高政权机关的请求，三个国家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谈判和制定决议、文件草案的工作。这样一来，不容置疑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人民的意愿表示被一系列典型的斯大林式行动罩上了一层阴影。当时斯大林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巩固苏联的军事战略地位上。他不怎么考虑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用的方法。

在巩固西部边界方面初战告捷而受到鼓舞的“领袖”又把注意力转到了西北部。他感到不安的是苏芬边界太靠近列宁格勒以及芬兰明显地倾向于德国。开始了旷日持久和毫无成果的谈判，目的是迫使芬兰方面在得到相应的领土补偿的条件下将边界移至离列宁格勒较远的地方。但同芬兰外交部长瓦·唐纳的谈判没有结果。芬兰元帅卡·曼纳海姆原是沙皇将军，他要求不得向俄国人让步。这时，一向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的现实感又不灵了。在周围一班人的支持下，他决定通过政治压力甚至军事压力来达到目的。11月底，就一些无端枪击事件，包括在苏联迈尼尔镇附近发生的事件，双方开



卡·曼纳海姆
(1867–1951)
芬兰共和国总统，芬兰元帅

祖籍瑞典。出生于贵族家庭，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出任芬兰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自卫军总司令，在德军的帮助下镇压了芬兰革命。同年12月，任芬兰摄政长官。1919年7月，竞选总统失败，他退出公职。1931–1939年出任芬兰国防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任芬兰国防军最高统帅，1944年当选为芬兰共和国总统，1951年1月28日在瑞士洛桑病逝。著有《曼纳海姆元帅回忆录》。

始了相互指责。莫洛托夫交给芬兰公使A·C·伊尔纳-科斯基年一份照会，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立即将自己的军队调离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后退20至25公里……"两天后，芬兰公使受本国政府委托答复说，芬兰政府"准备开始就双方将军队从边界后撤一定距离的问题进行谈判"。十分清楚：芬兰接受了挑战。赫尔辛基也没有表现出灵活性。芬兰宣布进行动员。1939年11月28日，苏联声明废止1932年同芬兰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可见，说得轻一点，无论莫斯科还是赫尔辛基都远未利用一切手段来防止战争。

斯大林本来深信，只要他发出最后通牒特别是开始战斗行动，芬兰政府就会马上接受他的所有条件。况且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的估计又十分乐观。贝利亚的情报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1939年10月5日，这位内务人民委员曾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提供得自伦敦的侦察情报，其内容如下："英国驻芬兰公使再次通报说，曼纳海姆元帅让他转告英国政府，芬兰最近可望收到苏联提出的类似向爱沙尼亚的要求，即在芬兰岛上提供海军基地和机场。据他说，芬兰将不得不满足苏联的这些要求。"[57]斯大林坚信芬兰人很快就会投降。1939年11月30日开始了几乎长达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沙波什尼科夫曾说过，如对芬兰人估计不足将会很危险。他的警告完全得到了证实。而这时斯大林又在政治上大大地失算：他准许在莫斯科成立以奥·维·库西宁为首的所谓"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12月2日，莫洛托夫和库西宁即签订了《苏联与芬兰民主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58]。这些决定是按照典型的斯大林精神采取的。不光彩的战争使苏联在国际


1939年，斯大林同库西宁"政府"签订苏芬条约

上陷于孤立。12月14日，苏联被开除出国际联盟。在塔斯社就此事发布的消息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授意的一句话："苏联人士认为，国际联盟这一荒唐的决定引起了讥笑，它只会使倒霉的起草者大丢其丑。"[59]

但当时根本顾不上讥笑。列宁格勒军区的军队卷入了旷日持久的苦战。芬兰人巧妙地构筑防线，相当成功地顶住了进攻。最后，斯大林看到当时的形势，便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采取坚决的步骤"。在卡累利阿地峡上集中了由梅列茨科夫和格连达利指挥的两个集团军。任命铁木辛哥为前线总指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斯莫罗季诺夫为参谋长。斯大林是以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这场芬兰人所谓"冬季战争"的。我在翻阅这场不光彩的战局那卷帙浩繁的档案，看到文件上留有总司令伏罗希洛夫、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的签名时，始终有一种感觉，就是政治和军事领导者在芬兰人的强大反抗面前确实是张皇失措了，甚至到了莫斯科越过前线指挥部直接向军队发布战术性命令的地步[60]。

1940年2月11日，在为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后，开始了苏军的积极行动。力量上的压倒优势终于产生了影响。1940年2月9日由铁木辛哥、日丹诺夫和斯莫罗季诺夫签署的命令说："突破和控制'曼纳海姆防线'将给红军、给伟大苏维埃国家的英勇保卫者带来流芳百世的荣耀……为了伟大的斯大林！"[61]然而"流芳百世的荣耀"并没有得到。"曼纳海姆防线"的突破是以伤亡惨重为代价的。1940年3月初签订了苏芬和平条约。

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德国侵占波兰后不久，苏联以维护西北边境与列宁格勒安全为由，要求同芬兰交换领土，租借军事基地。芬兰政府从其自身安全和中立地位考虑，表示难以答应苏方要求。11月9日，双方谈判破裂。28日，苏联借口芬军在边境"挑衅"，单方面废除两国互不侵犯条约。29日，中断两国外交关系。30日，对芬兰宣战。这场由苏联挑起的战争，因为时值冬季，故又称"冬季战争"。

1940年3月12日，苏芬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和约，次日停战，战争宣告结束。此次战争历时70多天，苏军先败后胜，伤亡约二十万人（苏称4.8万），芬军损失六万八千余人（苏统计约三十一万）。通过战争，苏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严重损害了与芬兰国家的关系。

曼纳海姆防线

曼纳海姆元帅于1927–1939在任内改组了军队，加强了芬兰防务，并在芬苏边境的卡累利阿地峡修建了一条长达105千米的筑垒配系防线，史称"曼纳海姆防线"。

斯大林十分懊丧。全世界都看到了红军对战争的准备做得很差。还在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940年3月，他就决定撤销伏罗希洛夫的人民委员职务。在此之前，他听取了伏罗希洛夫在总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档案中保存有伏罗希洛夫题为《同芬兰作战的教训》的报告，上面可以见到斯大林在讨论前审阅时留下的许多标注和改动。这里摘引伏罗希洛夫详细的长篇报告中的几个片断。

"……应当说，无论是我——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还是列宁格勒军区总司令，起初都完全想象不到这次战争的全部特点和困难……芬兰军队组织得不错，他们针对当地条件和任务进行了武装和训练，作战机动，抵抗顽强，纪律严明。

"战斗行动一开始，中央就成立了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和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同志组成(库兹涅佐夫只在决定海军问题时参加会议)。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是大本营固定而积极的参加者，尽管他并非大本营的正式成员。大本营，确切些说是它的积极成员斯大林同志，事实上领导了所有战役和同前线有关的所有创造性组织工作。"

接下来的许多篇幅上，人民委员被迫承认红军侦察工作的不足、军队技术装备落后、兵团的组织臃肿、部队的冬季着装和伙食很差等等。"许多高级将领都不怎么行。总军事委员会不得不撤换许多高级指挥员和参谋长，因为他们对部队的领导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公认是明显有害的……红军比较迅速地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从战争一开始到胜利结束，斯大林同志负起了实际上领导战争的责任……"[69]

长达104天的战争既未给军队、也未给斯大林带来荣誉。这点伏罗希洛夫不知是否明白，但他断言"斯大林同志实际上领导了所有的战役"，就把指挥无能和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独裁者的头上。尽管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里充斥着已成惯例的颂扬"领袖"的大段文字，斯大林却感到有口难言，好不恼火。

在听取伏罗希洛夫报告的总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结束语时，斯大林讲了一番似乎很正确的话，他说：我们应当"痛斥对内战经验的崇拜，它使我们总是处于落后状态。我们涌现出了新人：阿利亚布舍夫、丘留洛夫、姆拉坚采夫、雷恰戈夫等——这些人是打仗的能手、战争的

工程师。我们的指挥人员中存在着内战参加者称霸的情况，这些人不可能让年轻干部有晋升的机会……”[69]。不错，对内战的“崇拜”应予“痛斥”。可是“内战参加者称霸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已在1937—1938年遇害。还有一些“战争的工程师”，例如雷恰戈夫，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已经参加不了未来的战争……

斯大林终于明白了作为统帅的伏罗希洛夫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战争暴露了红军的部队和兵团在组织、准备、指挥方面的严重缺点。希特勒感到又惊又喜。看来他的战略计划是建立在正确的估计之上的。用巨大代价换来的胜利等于是道义上的失败。这个道理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懂得的。他们分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而斯大林用以贯彻意图的时间要少一些。他身上又出现了近几年从未有过的犹豫不决。从这时候开始，“领袖” 不断地夸张渲染着一种思想：“只要不去招惹希特勒，他是不会进攻的。”苏联边防军击落一架深入苏联领空的越境飞机，斯大林亲自指示道歉。交战的德国得到了一个实际上非交战的盟友。柏林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如今，在这场大规模的纵横捭阖中，斯大林命定要扮演坐等挨打的一方的角色。而希特勒已即将完成东征的准备工作。

就斯大林1939年采取的步骤而进行的政治和理论争论，至今仍在继续。毫无疑问，他的所作所为，也同他确定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的途径一样，确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其中有些我还会讲到)。但是不可忘记，现在我们“审判”斯大林，对他用的是今天的标准。在那如今看来已很遥远的30年代，无论斯大林还是他周围一班人都不具有我们今天称为“新政治思维”的对世界的认识。为了正确地理解斯大林现象、他的步骤、想法、行为——往往还有罪行，就需要试着设身处地回到那个急风暴雨的、残酷而严峻的时代。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防止战争、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巩固西部边界方面所采取的许多步骤和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在这一活动中曾有重大的错误和失算。斯大林尽管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却过分相信了希特勒，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只能说是冒失的步骤，随后几年他认为最好是不去提这些问题，只有一次是例外。1945年6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中提到：“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确切些说：这些错误不仅发生在战争过程中，而且发

生在战争前夕。而且最大的原则性错误大概就是1939年9月28日签订《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划出了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并附有地图。这条边界已经不同于1939年8月23日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中规定的那条边界。它基本上是沿着纳雷夫河、布格河和桑河延伸的。

如同1939年8月那次一样,斯大林本人直接参加了莫洛托夫同里宾特洛甫9月27日至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在这次谈判的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法西斯制度之间的“友谊”。这更加使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不知所措和迷失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捆住了斯大林本人的手脚,使他无法实行加强我国防御能力的必要步骤。现在有一些证据说明,斯大林早在战前就意识到并懂得了这一步骤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如果说互不侵犯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迫采取的步骤,那么“友好”条约就是斯大林过于相信自己的分析而缺乏预见能力的结果。斯大林在他制止战争或者至少延迟战争爆发时间的努力中,超出了最后一道可以从意识形态上找到根据的界限,这引起了深远的消极后果。

尽管斯大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推迟战争的到来,却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友好”条约签订后不久就绝对地清楚了:战争已紧紧逼到我国的边界。政治上纵横捭阖的时期就要结束了。希特勒随时可能发动战争。诚然,根据苏联侦察机关的情报,由于一系列原因,他曾一再改动进攻苏联的日期。5月份就改了三次:14日、15日,后又改到20日。6月改了一次:从15日改到22日。斯大林到最后一刻都不肯相信这一点,可他看到的已经不仅是法西斯威胁的模糊轮廓,他清楚地看见了侵略成性、已做好向东方猛扑准备的庞大的希特勒战争机器。

斯大林与军队

在战前的那些年代里,军队受到全民的爱戴。在哈拉哈河上、哈桑湖畔、西班牙或者苏芬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士兵和指挥员成了民族英雄。军事院校的报考者源源不断。为了军队,人民可以不惜一切。优秀

的飞行员、坦克手、水手全国闻名。服兵役是光荣的事情。全体军人的纪律和政治觉悟不会让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感到不安。身穿军大衣的人们相信斯大林,相信党,尽管镇压后精神上的震惊尚未完全过去。多民族的军人集体靠族际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联结在一起。中央各报定期报道陆海军的优秀人物及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干部在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中的成绩。《真理报》仅在1940年8月份就发表了几篇有关陆海军的社论,即《苏联公民的神圣天职》、《加入红军的战斗行列》、《青年们,快去上军校!》。国防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在国内大受欢迎。

为了使训练准备服兵役的青年和训练全体人民的工作的内容和性质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根据斯大林的倡议,1939年9月通过了《关于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新法律。

党提出的"保卫祖国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神圣天职"的口号得到苏联人的热烈响应。人民为自己的军队感到自豪,这支军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了现代化机械化的部队,而且人人都相信它能够守卫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

然而,这场苏芬战争,尽管当时只把它作为"胜利的"战争来宣传,却引起了苏联人的困惑不解:一支让工农红军的报刊描绘得如此强大的军队,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勉强战胜一个小国的军队。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深切地感到"冬季战争"的耻辱,但是他和往常一样,是看不到自己的过错的。1940年3月,他建议伏罗希洛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国防人民委员部对工农红军在苏芬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的评价。大概从那一天起直到去世为止,斯大林对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狠狠加以批评的伏罗希洛夫一直抱着一种嘲讽的态度。但他觉得这样做还不够。一个月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召开了总军事委员会会议,议程同政治局会议一样。在这次会议上,揭露了部队战术训练、技术训练、战斗训练中以及部队的补足编制问题上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过失。斯大林的讲话并没有表现出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却隐含着对那些"对国防负责的人"的威胁。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好几个专门委员会,以便总结苏芬战争的教训和采取紧急措施扭转军队建设的现状。

斯大林虽不是职业军人,却隐隐感到伏罗希洛夫领导整个军队建设不够在行,在哈拉哈河冲突过程中和苏芬战争期间对各司令部指挥不当,跟不上战役学的飞速发展。斯大林在哈拉哈河事件之后任命朱

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之前同朱可夫的谈话中，突然很恼火地冒出一句有关伏罗希洛夫的话：

“他当时夸下海口，拍着胸脯，坚定地表示要以3倍的打击来回报。一切都挺好，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准备好了，斯大林同志。可结果……”[⑭]



铁木辛哥(1895~1970)
苏联元帅、军事家

1918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俄共(布)。1939年9月指挥乌克兰方面军进军波兰，占领西乌克兰。苏芬战争期间，指挥西北方面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1940年5月起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积极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大力促进军队建设，完善动员体制，改进武器装备。1943年3月起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协调几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组织实施了许多重大战役。两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5枚。著有《伟大的功绩》、《由莫斯科向南挺进》等。

1940年5月，根据斯大林的决定，伏罗希洛夫被解除了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诚然，他同时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任命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铁木辛哥为国防人民委员，并当即擢升他为苏联元帅。新领导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作出了建立机械化军的决定(1940年6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每个机械化军由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组成。而仅仅一年半以前，坦克军部被解散了……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自己的坚定主张，他时而依靠机械地照搬西班牙战争经验的巴甫洛夫将军和库利克将军，时而又依靠坚持认为这样的建制很重要很必需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及其副手斯莫罗季诺夫。

在斯大林的工作日程上，实际上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用于研究军事建设的具体问题：组织、技术、战略战术、干部、教育等问题。30年代末期，斯大林知道军队当中过分相信内战的经验，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指责伏罗希洛夫，于是任命了一个以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检查陆海军情况的党和政府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结论是严厉的：“人民委员部在深人研究现代战争中有效使用军队问题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大量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干部充

斥部队使得情况更加严重。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1937年至1938年陆海军遭到大规模镇压的结果。当时播种死亡的旋风不仅席卷全国，也席卷了国家的陆海军。在镇压中首当其冲的是高级指挥干部、政工人员、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根据现有的材料，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陆军中遭到镇压的为36761人，海军中为3000余人[65]。诚然，其中一部分人仅仅是被开除出工农红军。1938年至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的结果，军区司令员全部撤换，军区参谋长和副司令员更新了90%，军、师一级管理人员更新了80%，指挥员和参谋长更新了90%。血腥清洗的结果，是陆海军的知识潜力急剧下降。至1941年初，仅7.1%的指挥领导人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55.9%受过中等军事教育，24.6%受过速成教育（训练班），12.4%的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未受过军事教育。[66]

为了让谁进人"敌人"的圈子，不用费很多事。根本不用费多少事。例如，二级国家安全委员加伊曾向伏罗希洛夫对驻保加利亚武官B·T·苏霍鲁科夫作了如下的告密：

"1924年，曾在学院东方系学习的苏霍鲁科夫，在该系学员毕业后受到托洛茨基的召见，并同托洛茨基谈了话。苏霍鲁科夫为了对托洛茨基表示敬意，给儿子起名叫列夫。"[67]

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这还是1936年10月的事情。到后来的两三年，像这样"详细的"论证已经不需要了。

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越搞越来劲，就建议简化镇压的程序。维辛斯基向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提出请求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以褫夺军衔的权力，这在以前只能根据法庭的判决执行。而乌尔里希则在1938年4月"证明"必须"批准从苏联最高法院中把军事法庭独立出来，把它改组为苏联军事法庭"[68]。这两人想在每个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指挥员头上高高悬起"司法"利斧。

1939年初，斯大林索取了关于陆海军指挥人员的资料。他久久地默默审视着表格上的各个栏目，表格用区区几个数字说明陆海军指挥员的年龄太轻：将近85%的人在35岁以下。年轻代表着力量，但经验也明显地不足。而有经验的干部奇缺。斯大林不慌不忙地翻阅着报告，他也许是回忆起，除了三位元帅和一批一级集团军司令员而外，在他的批准下，像如下这样一些有才干的高级军事长官都

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是：伊·纳·杜博沃伊、米·卡·列万多夫斯基、奥·伊·科尔克、尼·季·卡希林、亚·伊·谢佳金、约·约·瓦采季斯、雅·伊·阿尔克斯尼斯、П·A·布良斯基赫、C·E·格里博夫、Я·П·盖利特、尼·弗·古比雪夫、C·H·博戈米亚格科夫、叶·约·科夫丘赫、尼·尼·佩京、C·П·乌里茨基等。

斯大林不会不记得，仅在1937年他就表示同意逮捕数十名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下设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军事长官。结果，军事委员会实际上90%的人都是"间谍"和"暗害分子"。但这丝毫也没有使斯大林感到难堪。他生活在一个由他虚构出一批又一批"敌人"的世界里。他那病态的疑心使他周围一班人也受到感染，这种疑心像可怕的浪涛一样席卷了全国。

梅赫利斯正是按照他的指示来"清洗"干部的。类似下面这样的密码电报发往各军区、军校和舰队：

莫斯科。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库兹涅佐夫。

请委派一工作组调查和研究列宁军事学院教员的情况。如尚有托尔马切夫集团成员，应予彻底清除……

梅赫利斯

1938年7月5日[9]

于是就清除了。处处如此。成百成千。尽管可怕的战争正步步逼近祖国的大门口。

1939年初，为搜寻"人民公敌"和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及其他冤死的军事首长的"同伙"而掀起的浪潮开始低落了。但直到1939年6月14日，B·乌尔里希仍在报告：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目前有大量关于右派托洛茨基组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和间谍组织成员的案件。

莫斯科军区有	800起
北高加索军区有	700起

哈尔科夫军区有　　　　500起

西伯利亚军区有　　　　400起

为了保密起见,建议在开庭时不许辩护人出庭。请指示。

集团军级军事法官 **B·乌尔里希**[20]

报告上没有斯大林的批示。不过根据其他材料可知,在军队干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斯大林曾下令再次复查这些案件以便“发现错误和诬陷”。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命令。从这时起,“剪除”陆海军干部的势头开始减弱。然而,许多军区的情况原本就已是不可收拾了。为了说明起见,这里引证一份标明日期为1938年3月的文件。

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关于军区指挥人员、领导人员和政工人员状况的决定

1.由于进行了清洗工农红军队伍中敌对分子的大量工作和从基层提拔了无限忠于列宁—斯大林党的指挥员、政工干部和领导人员,指挥干部、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现都紧紧地团结在我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并保证了政治上的坚定性,保证了提高工农红军部队战斗力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2.人民公敌在干部配置方面已经干了不少坏事。军事委员会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根除残余的敌对分子,在提拔指挥员、领导人员、政工干部时对每个人进行深入的了解,大胆提拔经过考验的、忠实的、正在成长中的干部……

基辅军区部队司令员、二级集团军司令员　**铁木辛哥**

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　**斯米尔诺夫**

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赫鲁晓夫

接下来铁木辛哥、斯米尔诺夫和赫鲁晓夫汇报说,“由于无情地根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结果”,至1938年3月25日对军区领导人员作了如下更换:

	编制人数	更换人数
军长	9	9
师长	25	24
旅长	9	5
团长	135	87
筑垒地域司令员	4	4
军参谋长	9	6
师参谋长	25	18
筑垒地域参谋长	4	3
团参谋长	135	78
军区司令部部长	24	19[①]

在军队建设中，干部是最薄弱的环节。而斯大林在除掉优秀人才之后，又重提他那个"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1937—1938年出现的军事专家严重短缺现象，至少要5至7年才能消除。后来很快发现，历史并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时间。干部方面的"窟窿"只得用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来补上。到1941年夏天，将近75%的指挥员和70%的政工干部任职都不满一年……而这就意味着军队的基本骨干——军官并不具备应有的指挥分队、部队、兵团的经验。

看来，斯大林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曾受到良心的谴责，是否曾对所干的事情感到后悔，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战前的一两年，他拼命想采取措施来消除或者至少是缓解干部奇缺的状况。

众所周知，他曾指示迅速拟定关于增加军事学院学员人数和建立新军校的建议。到下一年即1940年就成立了42所新的军事学校，军事学院的系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举办了为数众多的培训少尉的训练班。斯大林在催促……但是余下的时间太少了。高级指挥人员损失太多，无法迅速弥补。可以用六个月的时间培养出一个排长。而军区级、集团军级的司令员呢？这种级别的指挥员的形成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况且斯大林还意识到，指挥干部的奇缺现象因他们的业务水平低下、战斗素养明显落后于现代战争的要求而益发显得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在他1941年5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

礼上的讲话中都十分明显地听得出来[72]。谁能知道,这篇讲话距可怕的战争爆发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对情况作多少改变了……

斯大林对军事学院毕业学员讲得出奇地开诚布公,他讲了许多属于国家机密的东西。例如,斯大林竭力想使年轻的指挥员相信工农红军的威力,就讲到军队已进行根本的技术改造和军队人数已急剧增加。斯大林宣称,到1941年初,我军有300个师(他没有说其中1/4以上则只是处于组建阶段,几乎也有1/4以上则刚刚组建起来),其中1/3为机械化部队。

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强调了进攻行动,他说:"红军是一支现代化军队,而现代化军队就是进攻的军队。"这里再次表现出原则性的严重缺陷:对战略防御和防御性作战估计不足。尽管我国的军政领导人总是强调苏联军事学说的防御性,但是贯彻该学说时,宣布的却是进攻战略。各种条令、命令、训令、国防人民委员的讲话,而今又是斯大林本人的讲话,这一切从不同方面发挥着同一个主要思想,即:"战争将在敌国的领土上进行,胜利应以少量的鲜血去获取。"根据这一基本思想,战争前夕出版了H·什帕诺夫的《第一次打击》一书。该书准确地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和军人的情绪,一种曾在国内千方百计地加以培植的情绪。该书预言,在红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的第二天,法西斯德国国内就会爆发反对纳粹制度的起义。

为什么德国会战胜自己的对手?德国是不可战胜的吗?这里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也十分坦率地对为什么德国国防军在欧洲所向披靡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即"德国人夺走了法国和英国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我们。"德国军队并非不可战胜。现在它在侵略性口号下行进,它的自信心和自负心日益增强。而这就可能产生最坏的后果,"斯大林总结说。顺便提及,这种所谓德国人"自负"的错误看法,正如教条主义思维占统治地位时所经常发生的那样,立即得到了响应和发挥。工农红军总参谋部的一篇战役述评得出结论说,德国在1940年获胜是"由于形势对它太有利",并非没有"有利的偶然事件的参与"[73]。而《关于红军政治宣传任务》的指示则断言:"德军失去了进一步改进军事技术的兴趣。相当一部分德军已经厌战了……"[74]

在这篇讲话中,除了错误的看法之外,斯大林也说出了许多正确的想法,但要实现这些想法,我再说一遍,剩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

对军事学院的工作给予很不客气的评价，认为它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是在为"昨天的战争"培养干部。斯大林接着还说，哈桑湖和哈拉哈河的经验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当时遇到的并不是现代化的军队。应当研究西方战争的经验、苏芬战争的经验……

在军事学院例行毕业典礼前不久，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召开了总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听取了朱可夫、梅列茨科夫、秋列涅夫、巴甫洛夫、施特恩、雷恰戈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报告。作为他们对军事学术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的，是从德军行动中得出的结论，是西班牙战争、哈桑湖和哈拉哈河上的战斗、苏芬战争等的教训。斯大林饶有兴趣地听着报告，没有像往常那样用插话去打断。在报告和讨论报告的过程中，大家特别注意提高战斗准备、进行进攻战役、集中人力物力以取得战略上的成功等问题。战争的开始时期问题本身在会上实际并未得到研究。因此，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参谋长克列诺夫中将的发言极其值得注意。他指出：作战的特殊复杂性同"战争的开始时期有关。这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敌人在此期间将会怎样影响同战略展开有关的那些措施，即总动员，沿铁路运送动员物资，集中和展开军队。战争的开始时期将是至关重要的；敌人会竭尽全力不让我们按既定计划度过这个时期"[75]。

斯大林很注意梅列茨科夫的报告，报告论据充分地说明，尽管工农红军的军事思想高度发展，条令却落后于现代战争的要求[76]。这篇报告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斯大林当即指示对条令进行重新审查，此事直到战争爆发时尚未全部完成。然而，无论斯大林还是国防人民委员都没有注意到，除陆军大将秋列涅夫外，实际上谁也没有提出过组织和进行防御战役的问题[77]。大家都学进攻……尽管正式"信奉"的是防御学说。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我们已开始执行斯大林同志关于提高我军指挥干部的军事思想水平的指示，并且为创立自己的军事思想奠定了基础。[78]"不过，如果军事思想指的是教条式、概念化的结论和军事理论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作战方式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些东西红军一直是有的。因此，"开始创立自己的军事思想"的论点十分值得怀疑，在对防御行动的作用显然估计不足的情况下关于必须在今后工作中把重点只放在作好进攻行动的准备上的论点也同样值得怀疑。尽管对于现代战争的技术问题的集体理解十分重要，会上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实的形势，即：法西斯德国

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必须加强对于进行战略性防御战役的准备。

即将在战争中担任武装力量总指挥的斯大林，尽管在干坏事方面智力过人，对军事理论却只是一知半解。曾长期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也不大“重视”理论家。而理论家，包括大理论家，红军里一直是有的。这些人中间首屈一指的当是无辜遇害的图哈切夫斯基，他早在1936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在发言中未卜先知地警告说，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德国军队的突然袭击。沙波什尼科夫这位未来的苏联元帅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事理论家。他的杰出著作《军队的核心》一书至今没有失去现实意义。沙波什尼科夫是军队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一个具有远大战略眼光、高度文化素养、锐敏的理论思维的人才。他是斯大林一向十分尊敬甚至崇敬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斯大林与沙波什尼科夫


沙波什尼科夫
(1882–1945)

苏联元帅、军事理论家

1918年参加红军。1930年参加苏联共产党。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40年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直接参与计划组织和实施莫斯科会战等重大战役，具有较深的军事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参谋指挥经验，对苏联军队建设、干部培养、军事理论工作做出较大贡献。获列宁勋章3枚。根据苏军20–30年代的经验，著有《军队的核心》一书，系统阐述了总参谋部的作用与地位、未来战争的特点和现代化战争的指导等问题。

弗·基·特里安达菲洛夫、康·布·卡利诺夫斯基、Г·С·伊谢尔松、亚·安·斯韦钦都是军事学术方面的大理论家。例如斯韦钦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有独到见解的《战略》一书，该书曾作为教材多次再版，但遗憾的是并未得到我国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正确评价。今天读起这本书来，无法摆脱这样的印象，即书中的某些论点仿佛是直接针对斯大林、他周围一班人和最高军事领导者讲的。例如斯韦钦写道：“负责的政治活动家应当熟悉战略。研究战略不仅是军队的最高指挥人员所必需的……一个为军

事行动提出政治目的的政治家应当弄清楚，从战略的角度看来在现有的战略手段范围内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它(指战略。——本书作者注)注定要为政策的过失付出代价……领袖愈有天才，他就愈是被群众看成预言家……在战略上作出预言只能是招摇撞骗；即使天才也不能预见战争事实上将如何发展。但他应当勾勒出未来的情况，并根据这种情况评价战争的种种特点。"[29]

波德战争结束后不久，伊谢尔松就写出一本名为《新的斗争形式》的书，书中对战斗行动开始时期"机械化集群"的使用从战略上进行了深刻的总结。然而伏罗希洛夫继续坚持认为"红骑兵仍然是一支所向无敌和有击溃力的武装力量……"就连斯大林在给军队机械化以应有的评价的同时，到战争前一个半月还丝毫不能从根本上重新看待骑兵的作用，他说："虽然我们裁减了少量骑兵，但骑兵的作用至今仍旧非常大……"

应当指出，从30年代中期开始，在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许多军事首长的坚持下，开始出版《指挥员丛书》。这是一部共有数十卷的罕有的出版物。《指挥员丛书》包括苏联军事理论家们许多有独到见解的著作：特里安达菲洛夫著《现代军队战役规模》、安·扎伊翁奇科夫斯基著《1914—1918年世界大战》、A·沃尔佩著《正面突击》、H·列维茨基著《1904—1905年俄日战争》、H·叶夫谢耶夫著《1914年俄军在东普鲁士的八月会战》。在《丛书》范围内还出版了外国理论家的著作：费·福煦著《论作战》、弗·西科尔斯基著《未来的战争》、Г·库尔著《德国总参谋部及其在准备和进行世界大战中的作用》、Ф·黑格尔著《坦克》及其它专著。这里也有价值不高的著作，如《驯马和骑马原理》、《现代骑兵》等书。在这套《丛书》中，伏罗希洛夫所著《苏联国防》一书的突出之处是书的篇幅及其对斯大林的颂扬。人民委员在书中称斯大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位元帅，内战前线上屡建奇功的伟大元帅……"，"共产主义的元帅"，一位"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为了明天和永远的胜利……今天需要做些什么"的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写道，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必定获胜，但是要以"少量的鲜血、最少的物力消耗和我们可爱战士尽量少的生命"来取胜。说句公道话，此书并不能代表整个《指挥员丛书》的高水平。

30年代曾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指挥人员的军事理论水平，使之具

有灵活而广阔的思维。但是无法摆脱一种痛苦的念头，即数万名指挥员未能(并非出于本意)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总的说来，战争前夕工农红军的军事战略思想并不比德国的教条式指令逊色。战略思想具有进步性，但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又带有片面性和同战役学实践结合得很差的特点。如上所述，对于战略防御估计不足。军事思想先一步预料到的许多东西，只得在不远的将来通过血的经验、在战场上的可怕学习过程中去摸索。

虽然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友好"条约，斯大林仍然意识到西部边界上乌云密布。同时他又错误地确信只要希特勒在西线没有取得决定性成功，他就不敢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斗。斯大林在他的多次讲话、包括1941年5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的讲话中固执地认定，德国人获胜首先是由于执行了避免在西线和东线同时开战的正确政治战略。但是，斯大林对于德国法西斯军队如此轻而易举地连续摧垮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感到十分吃惊。他对红军能否及时地从飞速发展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缺乏信心。正因如此，斯大林研究了总参谋部为他准备的对德军行动的详细评述后，在同铁木辛哥的谈话中，建议这位新任国防人民委员重视军队的战斗训练。

斯大林当时对很多情况都还不了解。例如，他就不知道希特勒的军人对1941年初红军及其干部状况的评价。战后查明，希特勒了解1937—1938年席卷红军的镇压情况，他曾向自己的侦察机关索取关于工农红军军官质量的报告。战争爆发前一个半月，人们曾根据德国驻苏联武官克列布斯上校的报告和其他材料向元首汇报说：工农红军的军官不但数量减少，而且质量降低。"他们给人的印象比1933年还差。俄国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达到它原先的水平……"

潜在的(确切些说是现实的)敌人不无根据地认为，苏联军事结构上的许多环节事实上已整个整个地更换掉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历史上很难找到一方在殊死搏斗前夕如此自我削弱的先例。对此既不能原谅，也不能忘却。

朱可夫回忆道，1940年12月举行的大型军事演习中让他指挥"蓝军"，即扮演德方的角色。已经当上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的陆军大将巴甫洛夫则领导"红军"。朱可夫写道，结果是我指挥"蓝军"展开战斗的那几个战场，恰恰也是一年半以后实际战斗行动展开的地方。我国边



朱可夫(1896-1974)
苏联元帅、军事家

1918年参加红军。苏德战争初期,作为大本营代表,同西南方面军首长一起组织数个机械化军在布罗德市地域实施反突击,把德军坦克兵团阻滞在罗夫诺和杜布诺地区。1942年8月起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副最高统帅,积极参与制订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并在前线直接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先后协调了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作战、库尔斯克会战和第聂伯河会战的各方面军行动,指导、参与制订并监督实施这些战役的计划。因功绩卓著于1943年1月晋升为苏联元帅。

界的形状、地形、环境,这些都提示我恰好作出后来法西斯分子也作出的那些决定。演习中的调度员们人为地减缓了"蓝军"推进的速度。尽管如此,"蓝军"到第八个昼夜也推进到了巴拉诺维奇区。

朱可夫继续说,1941年1月让我在总军事委员会上报告这次战略导演的结果时,我提请领导人注意新边界沿线筑垒地域的配置体系很不利。使之后退100公里是适宜的。朱可夫接着说,这就是说,我实质上对斯大林批准的决定发表了批评意见。

这位著名的统帅回忆道,斯大林仔细地听了我的报告。他特别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蓝军"如此强大,为什么在我们导演的原始材料中塞进了如此大量的德军兵力?朱可夫回答说,这些兵力符合德国人的潜力,是建立在实际计算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曾经计算过他们在战争的开始时期为了在发动主要突击的方向上建立巨大优势而可以用来对付我们的全部兵力。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详细报告、他的论证和大胆坚持自己的观点十分欣赏。此后不久,即1941年2月,在"领袖"的推荐下,陆军大将朱可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直觉并没有错。后来证明,将朱可夫提拔到最高军事领导集团,是斯大林在任用干部上最成功的决定之一。

然而要在斯大林面前显出本领也决非易事,大概首先是因为他在军队建设、陆海军日常生活的许多问题上束缚了领导干部的独立性和首创精神。许多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自己就能解决的,却一定要

向斯大林报告。例如,伏罗希洛夫在他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汇报说,1939年6月15日,在编红军战士奇里科夫企图杀害预备役指挥员皮亚特金。事实上是在召唤人们准备动身时,两个微微有点醉意的男子汉发生了一场斗殴。照伏罗希洛夫的报告,这就成了"企图杀害"。人民委员本该把此案移送法院或是对肇事者绳之以纪律的,却去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的批示毫不留情:

两天内审完,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将此事在全团通报。

约·斯大林[8]

不过我要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也作出了与此不同的反应,同意对某些案件进行复查。例如伏罗希洛夫在几个月前曾请求斯大林释放在狱中服刑的原第一集团军空军参谋长沃洛金,并且请求宣布原先为表彰此人在哈桑湖战斗中指挥空战的成绩呈请授予列宁勋章的申请仍然有效。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心肠很软":

致伏罗希洛夫同志

同意。

约·斯大林

1939年2月11日

这些举不胜举的例子说明,斯大林认为不经审判便决定人们的命运、干些并不属于他权限之内的事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独裁者教他周围的人,教政治、国务和军事活动家们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大小问题都得以他的意志和思想为准则。于是,这里我们见到一种离奇的现象。正如培根当初所说的,一个人不受监督地统治他人,自己就失去了个人的自由。而在这里就是,斯大林从未遇到反抗,他逐渐成了自己性格的俘虏,盲目地自信和自认为一贯正确。表面上看来,这仿佛是不屈不挠和坚定不移。而事实上,无限的权力造成了一种"做不到的事情也能做到"的错觉。到战争爆发前,一种关于斯大林一贯正确的错觉简直把人们迷惑住了。但只需1941年6月的一天就足以使这种错觉化为泡影……

斯大林实施了我们所知道的防止战争的外交步骤并在这方面有过明显的政治上的过头行为，其实他内心里始终很矛盾。一方面，同德国签订的协议都已生效，他认为这些协议对德国人比对苏联更为有利。希特勒就是借助这些协议才避免了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所以他会遵守协议的规定的。这是"领袖"及其周围一班人通常的推理逻辑。

另一方面，希特勒就其本性而言是个冒险主义者(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不一定会遵循通常的逻辑。他的全部冲动性战略都建立在对短期因素的估计上，即建立在对突然性、阴谋诡计、不可预见性的估计上。因此，斯大林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希特勒的所有军事政治步骤和西线的"闪电"战的进程。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亲自弄清军队的实际战备情况和作战能力，这绝不是偶然的。

在1940年一年内，国防人民委员视察了所有的西部军区，用警报集合了几个兵团，观看了一系列训练和演习。人民委员视察莫斯科军区、西部军区和基辅军区的训练和战术作业，他在评议会上讲话，中央一级的报纸作了报道。还报道了苏联元帅布琼尼参加外高加索军区训练的情况，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参加波罗的海舰队训练的情况。早些时候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参加了大型海上航行，那次航行以他向"十月革命"号战列舰全体人员发表讲话而告终。

在这几次去外地视察过程中，暴露出相当严重的疏漏。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缺乏应有的经验，他们领会战斗训练上那些崭新的要素十分缓慢。战斗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未达到应有的质量标准。关于这点有文件为证。国防人民委员在1941年5月17日签署的《关于1941年冬季战斗训练检查结果和对夏季训练的指示》中确认："1941年冬季第30号命令的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兵团和部队并未做到。"指示中指出了全体人员、司令部以至兵种在战斗训练中的许多缺点。例如，关于空军是这样说的："红军空军的军事训练搞得不能令人满意。"[⑩]

对为数众多的档案文件和对那些事件的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所作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近两年来力求达到的不仅是红军和红海军数量上的大大增加，而且是整个军事机器质量上的改进提高。然而这种改组和完善的期限所依据的是错误的前提，即：战争可以防止，或者至少可以大大地推迟。正如西蒙诺夫在复述自己同

朱可夫谈话的记录时所写的，斯大林“自信签订条约的结果将是他愚弄希特勒。不过后来的一切恰恰与此相反”。另一方面，朱可夫回忆道：“斯大林周围的人大都赞成他战争前夕形成的那些政治估计，首先是和他一样地相信只要我们自己不受挑拨，不采取错误的步骤，那么希特勒就不敢撕毁条约并向我们进攻。”[8]

在确立这种观点中，莫洛托夫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于1940年11月访问柏林后继续坚持认为希特勒不会进攻苏联。而斯大林认为莫洛托夫在国际事务方面十分在行。关于希特勒的具体意图和进攻期限的错误政治前提，对军事建设的整个过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种军事建设是把战争可能在较为遥远的将来爆发作为出发点的。

国防武库

1940年11月中旬，《消息报》发表了两则公报：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出访德国；同德国领导人会谈。公报说，莫洛托夫同帝国元首希特勒、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及帝国元帅戈林和希特勒的党务助手赫斯在两国存在友好关系的背景下，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实际上恰恰没有半点“相互信任”。莫洛托夫11月12日抵达柏林安加尔特车站时是怀有戒心的。而且这种戒心和对“朋友”的不信任与时俱增。当莫洛托夫在人们陪同下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时，房间之大使他感到惊讶，这是像宴会厅一样宽敞而有点阴暗的房间。元首穿着青灰色的弗伦奇式军上衣，坐在办公室的一角，几乎显不出来。希特勒伸出他那又软又胖的手，两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苏联人民委员。

元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最喜欢的话题：“轴心”国正处于胜利前夕。不列颠帝国很快就要被拍卖。应当决定在“新秩序”确立之后建立什么样的世界。德国对此非常关心，元首本人希望俄国也能关心此事。这个纳粹独裁者使劲挥动着系有卐字红袖章的胳膊，厚颜无耻地大谈如何划分势力范围。莫洛托夫毫无表情地听着，始终未打断他的话。但

是，当希特勒说完后询问个子高高的苏联代表，想听听他对于德国对未来世界的设想的意见时，莫洛托夫冷淡地说，他认为讨论这样的设想没有意义。希特勒的尖鼻子翘得更高了。莫洛托夫不理会法西斯头子的沮丧，用不高的声音提出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德国军事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干什么？为什么德国军队开向芬兰……

希特勒立刻对谈判失去兴趣，建议明天再继续谈。“两个伙伴”显然说不到一起。当莫洛托夫来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时，那里笼罩着无法消除的不信任感。双方都已明白，一年前签订的条约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双方都是利用这些条约达到自己的目的。德国是想迷惑苏联，以便腾出手来。苏联是想争取时间。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赌博。各方都认为自己赢了。莫洛托夫夜里回到柏林“贝尔夫”饭店，感到希特勒的官员都不可信。他竭力用一个过去曾相信的道理安慰自己：德国人不会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从全部情形看来，他确实安慰了自己。因为莫洛托夫在访问柏林之后照旧认为，德方暂时会遵守1939年签订的苏德协定。而在斯大林的思想深处，对德国政策的不信任感却开始增长。当时他还不知道，几乎就在莫洛托夫在帝国大厦进行谈判的时候，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上将向法西斯德国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布劳希奇元帅报告了关于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巴巴罗萨”计划）的最后方案。背信弃义的帝国统治者在谈判桌上笑容满面，暗地里却在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它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希特勒在听取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关于计划已制定完毕的汇报（该计划后来在12月签署）时说：“我不会犯拿破仑的错误，我要进攻莫斯科，就会早早动手，在入冬之前拿下它。”[68]

希特勒赞成把东征开始的时间定在1941年5月15日。希特勒的“计划制定者”初步预计，这场战争为期八个星期，即不足两个月。柏林的事态发展就是这样。

而在西方各国首都人们都在猜测：苏德关系今后将如何发展？贝利亚给斯大林送来一份从巴黎得到的间谍情报，情报认为有可能签订“德苏军事协定”[69]。斯大林没有往下读，他思索着贝利亚部下所记录的法国大使纳吉亚尔的谈话内容。尤其是大使谈到了他斯大林。“领袖”对此总是特别感兴趣。纳吉亚尔对其交谈者说道：“斯大林是俄国上帝。俄国人消灭圣像是为了代之以斯大林的形象。从前基督被描绘成

头上罩着光环,如今斯大林也被说成是光芒四射……俄国人推翻沙皇是为了恢复一个更坏的沙皇。他们总是想有一个超自然的、超人类的偶像。例如,英国的工业特别发达,但这是逐渐地、正常地积累起来的。而在这里常常报道说,这个工人看20台车床,那个工人超额完成定额300%。至于每天造出来的都是毫无用处的产品,人们感到什么都缺,他们却看不到……整个说来,俄国人的状况不佳不仅是由于同芬兰的战争,而且是由于他们的制度……俄国人对我们做了卑鄙的事。斯大林在谈判中可能会对我们说:你们要求于我们的东西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他甚至会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他们自己应当保持中立,对吧?"[8]

斯大林放下文件,久久地凝视着前方,脑海中又浮现出1939年夏末和秋季的事件。对于西方把他说成和写成一个残酷无情的独裁者,他已习以为常了。对他这个坚强的领导者,敌人还能说什么呢?他打断沉思,又回到当前问题上来。

斯大林仍然相信他同莫洛托夫一起编造的神话:"德国人暂时会遵守条约",他们"不敢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虽然如此,他仍竭力加强防御准备。从许多文件(设置新的筑垒地域、更新部队技术装备、建立补充的战略储备等等的计划)看来,这些准备预计至少要2至3年才能完成。但斯大林应当知道,法国垮掉以后,希特勒实际上结束了一条战线的战争。当然,如果历史(确切说是希特勒)能给我国2至3年时间来完成上述构想,那么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斯大林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算(我在本章中还要谈到这一点),使国家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党、苏维埃机关、各人民委员部为加速解决国防任务作了很大努力。这方面的潜力是有的。我国的工业基础在30年代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工业之一,虽然在质量上还不高。在一些对国防事业起头等作用的人民委员部中,领导人都是一些坚强的组织者,他们之中有:伊·费·捷沃相、维·亚·马雷舍夫、阿·伊·沙胡林、伊·阿·利哈乔夫、德·费·乌斯季诺夫、鲍·利·万尼科夫等。

战争前夕,不得不专心解决国防问题的斯大林终于看出普通的生产指挥者都是忘我的工业领导人,他们在即将开战的几个月同各级党组织完成了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在短得惊人的期间内调整了技术兵器和武器的生产。斯大林与所有的人民委员和许多厂长有直接交往,

他经常召集他们和主要设计师一起汇报工作。万尼科夫和乌斯季诺夫证明说，斯大林能相当迅速地抓住生产过程的主要实质、趋向、工艺特点和困难。但是，斯大林一贯认为，要克服这些困难，必须作极大努力和动员全部人力。万尼科夫回忆说，在战前那些年代，国防工业在很多方面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虽然根据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职责分工，国防工业的"首长"是沃兹涅先斯基（很遗憾，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的作用目前介绍得很不够，而他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由于不是内行，斯大林在同设计师和生产者的工作中通常不是遵循现实的科学技术条件，而多是依靠"高压"、"鞭促"、甚至威胁的方法。万尼科夫写道，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斯大林说：

"设计师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把潜力全部挖出来，应当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

于是斯大林就"榨取"起来了。乌斯季诺夫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件惊人的事实，当时有一种火炮是在空前短促的期限——18天内搞出来的。"如果有快速设计纪录登记，那么Д-1型152毫米榴弹炮的设计无疑会名列榜首。1939年装备部队的76毫米大炮用了18个月设计出来，按战前标准，这已是很短的期限了。请对比一下：18个月和18天！"[⑥]人们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工作的。就是在战前，斯大林在同新型武器的设计者谈话时，也总是提出极短的、看来不现实的期限。

在解决国防问题时，斯大林的专权往往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例如，战争前夕，当时任总军机械部部长的库利克元帅建议加大坦克火炮的口径。库利克和日丹诺夫坚持要把装备中的45毫米和75毫米的坦克火炮更换为107毫米的。斯大林根据国内战争时期对这种口径的大炮的印象，立即表示同意。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那是一种野战炮，而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种具有很强穿甲力的炮。专家们——武器装备人民委员万尼科夫、厂长叶良、费拉德金小心翼翼地对斯大林、日丹诺夫、库利克提出反对意见。一切都是徒劳的。经过科学和工程技术计算的论据都没能说服斯大林。大家再次被召集到一起。万尼科夫回忆说，谈话已经不同于上一次，使人感到凶多吉少。斯大林看着与会者严厉地说：

"万尼科夫不想给坦克装备107毫米大炮……"

日丹诺夫马上附和说：

"万尼科夫总是事事唱反调，这是他的工作作风……"

再争论下去已没有益处而且相当危险。

这次谈话后，斯大林就签署了日丹诺夫起草的决议。结果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停止了小口径坦克火炮的生产。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战争很快就迫使人们废止斯大林的外行决定并恢复老式火炮的生产。但是浪费了多少时间啊！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来恢复被取消的生产项目啊！战争爆发一个月后斯大林找到了替罪羊——库利克和日丹诺夫，他斥骂、发怒……然而，他在政治局的长篇讲话中甚至忘记了这致命的错误是他直接犯下的。斯大林不会也不愿意承认错误。然而他却不能宽恕别人犯他这样的错误。

1941年2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实际上是专门讨论国防问题的。青云直上的联共(布)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在《关于工业和运输部门党组织的任务》的报告中分析了把工业转入战时轨道的可能性问题。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报告规定1941年工业产量增长17%—18%。这在当时并不显得不现实。例如，1940年国防工业的生产比1939年增长了27%！今天，我们对苏联人这种英雄主义的表现都不在意，习以为常。我们在思想上习惯于进行批评，谴责个人迷信，往往就像是从实际情况中超脱出来一样，看不见除了消极的、难以忍受的、不可饶恕的东西，还存在着一种惊人的社会现象，即苏联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献身精神。诚然，人们常常是出于恐惧。千百万劳动者常常忍受着最起码的无法再降低的生活条件，把那些今天看来是幻想的计划变成了物质实际。只要能保证祖国安全，人民甘愿作出很大牺牲。这不只是表现在口头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防拨款只占全部预算支出的5.4%，1941年则增加到43.4%[62]。国家已极度勒紧了武装带。

斯大林每星期都得到关于陆海军革新技术装备情况和进展的报告。1940年6月1日，他用红铅笔在情况报告中新型坦克KB——625辆、T-34——1225辆……的数量下画了几道着重线。新型飞机只占约20%。其他武器的情况也不佳[63]。

每一次这样的分析之后，斯大林更加严厉地迫使人民委员、设计师、厂长接受自己的意志，催促并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做到！"不完成他的指示会得到最坏的结果。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但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威胁。人们意识到，国家应当经得住日益临近的战争，为此必须完成不可能做到的事。因而他们这样做了……到希特勒发动进攻

时，工业生产了2700架新型飞机、4300辆坦克（其中将近一半是新型的）[69]。

除了在扩大军火生产方面采取的非常措施外，到处都实行了铁的纪律。对破坏劳动纪律的人都处罚得非常严，广泛采用严厉的行政和法律手段。1940—1941年，斯大林几次听取关于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1940年6月26日命令（关于改行八小时工作制、关于禁止企业职工自行离职等等）的情况汇报。旷工数量急剧减少，生产纪律得到加强。然而，斯大林每次都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要再接再厉！转告各人民委员部，在加强纪律的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只能看作是个开端！"

同时，斯大林在梅赫利斯（这时已任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和党的机关的协助下，大大严格了对领导人员的要求，对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进行经常性监督。例如，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包括马·马·李维诺夫、叶·阿·夏坚科在内的6名中央委员作为"没能履行职责的联共（布）中央委员"而降为候补委员，同时有15人（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П·С·热姆丘任娜）被解除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职务；有9人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被指责"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党代表会议的一项专门决议中对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杰尼索夫、谢尔盖耶夫、沙什科夫、伊什科夫、博加特廖夫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思改过，不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将被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并解除工作。"这些警告对其中几个人成了不祥的预告。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中央委员会中"空出的"位置基本上由军人占据，其中有朱可夫、扎波罗热茨、秋列涅夫、基尔波诺斯、尤马舍夫、阿帕纳先科和其他几人。斯大林似乎感到，在保卫祖国的准备工作中，既作出了成绩，也铸下了不少大错，因此他急于求成，忙得焦头烂额。战争前夕，他每天工作16至17个小时，他那黄色的眼珠似乎由于睡眠不足和劳累而变得的献身精神。

斯大林明白，国家对临近的考验的经受能力，取决于国家全部潜力的动员程度。虽然他没有想到也不愿相信这种考验已迫在眉睫。"为了使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在行动上完全协调一致，绝对保证它们在领导工作中的统一"，党中央在1941年5月决定由党中央书记斯大林兼任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肩负起巨大的责任和重担。斯大林是个生性残酷的人,他在解决国防任务时往往把要求的“标尺”提到最高限度,通常是达到人力的极限。从这时起,夜间工作成为他的常规。正像我们所记得的,各人民委员部、许多中央机关也都实行夜间工作制度。国家生活的节奏和速度明显改变了,它的脉搏跳动得更快更有力了。

斯大林十分关心我国国防工业部门的主要设计师们。我已经说过,他同他们大部分人有直接交往,经常在克里姆林宫讨论各种技术和组织工作问题时同他们碰头。斯大林的决定一向都是硬性的,甚至是残酷的。完成这些决定往往要作出牺牲。例如,为了改变航空工业的落后状况,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9月通过决定:在1940—1941年间新建九座飞机制造厂!同时决定改造九个旧厂。航空工业开始按照硬性进度表工作。航空人民委员每天向中央汇报飞机和发动机的产量。人们常常几天几夜不离车间、实验室、设计局。航空工业在数量上突飞猛进,但新型飞机只是在1940年下半年才开始生产。

很自然,在建立航空(及其他的)技术中的这种“加大推力”造成了严重浪费。生产出来的飞机质量常常不高。这马上导致空军中一、二等事故增多。每天汇总的军航损失数字令人沮丧。但是,斯大林认为这主要不是由于生产上的技术缺陷和工艺缺陷,不是由于飞行器本身的开发问题和不完善问题,而是由于飞行员的过错,由于暗害活动。1941年4月初,看完例行的一、二等事故汇报后,恼怒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要求起草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并向他汇报。

4月12日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了起草的命令,其中说道:

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分析了红军航空兵的一、二等事故问题,查明二等事故不仅没有减少而且由于空军飞行员和指挥员的松懈散漫而日益增多。这种松懈散漫已导致破坏飞行勤务的基本规章。由于这种松懈散漫每天在一、二等事故中平均报废2至3架飞机,每年合600至900架。仅在1941年第一季度未满就发生了71起一等事故和156起二等事故,死亡141人,毁机138架。

接着人民委员命令解除空军中将雷恰戈夫红军空军总局局长职务，把许多空军指挥员交付法庭审判。

经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修改的命令草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他还作了一段补充以突出重点：

送铁木辛哥同志

同意，但应在命令中加上讲普罗斯库罗夫同志的一段话，并把普罗斯库罗夫同志与米罗诺夫同志普罗斯库罗夫和米罗诺夫是工农红军空军局的负责人。一起交付法庭审判。这将是恰当的和公正的。

约·斯大林[9]



在世界坦克发展史上，T—34坦克居于十分显赫的地位。它是现代坦克的先驱。其装备数量之多、装备国家之多、服役期限之长，在世界各国的坦克中数一数二。

第一批T—34坦克于1940年1月建成，是哈尔科夫共产国际工厂著名设计师科什金的呕血杰作。T-34最先是БТ坦克发展计划的产物。

早期的T—34坦克战斗全重26.3吨，乘员4人，最大速度55公里/小时，装一门76.2mm加农炮，因此，也称T—34/76中型坦克。在战术技术性能上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连德军的将领也不得不承认："俄国人拥有的T—34坦克远远优于德军任何一种型号的战斗坦克"。德军在1943年研制的"黑豹"坦克，明显带有仿造T—34的痕迹

坦克、火炮、弹药的生产状况也不同寻常。设计师科什金、莫罗佐夫和库切连科在很短时间内就设计出优良的T-34中型坦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公认为最好的坦克。但是，这种坦克以及KB(重型坦克)，到战争爆发时部队仅仅装备了将近2000辆。苏联科学家在战争前夕设计了崭新的火箭炮。БМ-13火箭炮("卡秋莎")能在10秒钟内发射16发炮弹，保证了密集火力的高效率。但是，工业只是在战争爆发时才能够生产火箭弹。这种炮弹的使用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例子不仅证明了我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而且证明国家能够把千百万人动员起来。同时，人们感到潜在的或直接的严惩在威胁着他们，只要生产搞不好，就会遭到这样的惩罚。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新型武器设计者的忘

我劳动受到国家表彰。如1940年10月，托卡列夫(枪械设计师)、波利卡尔波夫(飞机设计师)、什皮塔利内(枪炮设计师)、格拉宾(火炮设计师)、雅科夫列夫(飞机设计师)、米库林(飞机发动机设计师)、克利莫夫(飞机发动机设计师)、伊万诺夫(火炮设计师)、克鲁普恰特尼科夫(火炮设计师)等大设计师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设计师的成就超过了工艺和生产能力。有些领导人的外行产生了影响，如库利克，在战争前夕，由于他的没有根据的决定，致使反坦克武器和对空武器的生产大大落后。

战争已经在叩门了，而新式武器和技术兵器的生产才刚刚展开。沃兹涅先斯基在他1948年著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时经济》一书中指出："战争来临时，苏联的军火工业正处于掌握新技术阶段，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还没有大量投入生产。"[49]许多新组建的兵团装备奇缺。这种情况在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尤为明显。

斯大林按照自己惯用的办法行事——威胁、高压、更换领导人、通过专门决定、向各地派遣工作组。1940年底，他责成伏罗希洛夫检查坦克制造厂的工作。1941年1月，这位苏联元帅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来了四个工厂的检查结果报告。

关于坦克制造业的状况

基洛夫工厂已经掌握KB坦克生产技术。该厂全年计划生产243辆，到1941年1月1日已生产243辆并交付部队验收。

哈尔科夫工厂全年计划生产500辆T-34坦克，到1941年1月1日已交付红军115辆。T-40(水陆两用)坦克已全面通过军队和试验场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T-40坦克符合红军的战术技术要求。1940年12月，列宁格勒生产了两辆T-50，现在正在进行试验[50]。

斯大林读完报告，给有关人民委员部和工厂下达了生产新型坦克装甲和生产坦克外壳、炮塔、发动机的硬性期限。他觉得问题"解决

了”。

当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会议后听到汇报说，坦克部队缺少大量技术兵器时，他起先还不相信。他要求报告详细情况。但是军人们坚持自己的说法：到1941年3月，部队要得到充分保障，尚缺12500辆中型和重型坦克、43000台牵引车、约30万辆汽车。这就是说，新组建的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只能得到30%的保障[93]。即使是特别高的生产速度，也需要3至4年才能给它们完全配齐技术兵器！航空兵兵团的状况也不佳。新式飞机(像坦克一样)很少——不超过10%—20%。

不仅仅是飞机和坦克这些技术装备差。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在战争前一个月向斯大林、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报告说：“从红军奇缺的许多武器和技术兵器来看，工业执行供应计划的情况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报告说，1941年第一季度，弹药生产完成计划的百分比是：76毫米师属加农炮炮弹为62%，122毫米榴弹炮炮弹为62%，122毫米加农炮炮弹为74%，152毫米榴弹炮炮弹为32%，82毫米火箭炮炮弹为73%……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认为大大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弹药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不力”[94]。

斯大林、政治局、各人民委员部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结果是采取非常措施：把现有的一切物质资源都用于建立新的工厂、车间、生产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苏联人的干劲。军工厂改行战时制度：由于实行三班工作，工人数量剧增，设备满负荷运行，纪律得到强化。斯大林每天傍晚都要听取一些项目投产进度执行情况的报告。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意关于减产甚至暂时停产某些武器，以便把更重要的方面突击上去的建议。例如，由于暂时缩减某些枪械和野战炮的生产，飞机和坦克的火炮生产急剧增加。我确实碰到过一些谴责这种决定的观点。不过我认为这些批评未必正确。

在战前最后几年，根据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经斯大林批准，大大增加了我国东部国防工业项目的投资额。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到1941年7月，伏尔加河以东生产的军用产品总数达12%[95]。

斯大林对农业的状况也深感不安：与工业相比，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斯大林是一个蹩脚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也应当看到，由于强迫实行集体化、对集体农庄推行和确立发号施令式的管理作风，农民的社会热情日益减退。这是生产者同自己劳动的最终结果完全异

化的结果。建立了一种极为反常的体制，农民在这种体制下实际上只能靠经营宅旁园地养活自己。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生产出来的粮食、畜产品，被国家强行收走。不是买，不是卖，而是上交。"交粮"成了集体农庄主要职能的正式用语。普通庄员通常都不参与决定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如谁当农庄主席，何时播种，播种什么，建设什么，上交多少，如何保证扩大再生产。一切都由上面决定。结果，人们逐渐对工作失去兴趣，养成了怠惰和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习气。农民就像一个强迫为国家干活的劳动者阶层。为了保证最起码的生活费用(集体农庄一般做不到这一点)，农庄庄员把越来越多的精力用在自己的宅旁园地上，其生产率大大高于集体生产的生产率。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自己周围一班人的个别谈话中流露出对农业状况的忧虑，于是经常有人对他说，集体农庄庄员用于个体经济的精力多于集体经济。据说这就是症结所在。斯大林责成安德列耶夫研究这个问题，准备在中央全会上讨论。这次全会于1939年5月底召开。安德列耶夫的报告题为《关于防止将集体农庄公共土地滥分给庄员个人经营的措施》。其基调是：必须采取新的坚决措施限制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面积，规定每个农业劳动组合成员最少必须完成的工作日数量。又是指靠行政的惩罚的、而不是经济的措施。

全会由莫洛托夫主持。全会的速记记录没有出版。但是档案中保存下来的一些摘录、插话及其他材料证明，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仍然只靠指令和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管理农业。例如，安德列耶夫在报告中举出了这样一件事实：在基辅州5.8%的劳动组合成员不在集体农庄干活，18%的农庄庄员只完成50个工作日[56]。斯大林的提问打破了会场上全神贯注聆听报告的寂静气氛：

斯大林：这些不参加集体农庄的是些什么人？问题全搞清了吗？

安德列耶夫：没有，斯大林同志，还没能全弄清。他们一部分是外出打短工的人，其余是集体农庄中的好占便宜的人和趋附逢迎、白吃白拿的人。

斯大林：有没有连一个工作日都没做的人？

安德列耶夫：有。一个工作日也没做。完全靠个体经济生活。

斯大林：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呢还是残疾人？

安德列耶夫：有外出打短工的人、老年人。但是他们的行为涣散，

瓦解了老老实实干活的农庄庄员……

接着,与会者开始讨论旨在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加紧劳动的兴趣的补充措施。但是想的不是如何使集体农庄庄员成为本集体的真正主人,把对他们的管理民主化,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恢复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思想,而是"强令"、"迫使"、"限制"、"硬压"劳动者。

波诺马连科、杰尼先科、谢金及其他与会者在发言中提议进一步减少宅旁园地面积,硬性规定最少要完成的工作日数量。来自巴什基尔的库尔巴托夫认为必须把所有集体农庄庄员从独立农庄中迁出来。来自巴库的巴吉罗夫提议把所有果园公有化。斯大林应声说道:

"应当考虑。您应当提出一些实际方案。"

"提出建议?"

"对。"

日丹诺夫马上把"领袖"的插话定为中央决议中的一条:

"责成巴吉罗夫同志就果园实际公有化问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谢尔巴科夫在发言中说,在莫斯科州诺金斯克区有32%的农户不参加集体农庄的生产,因为家中的成年人在电站和工业企业工作,而孩子和老人在集体农庄不干活。

贝利亚:他们必须干活。

斯大林:经营宅旁园地吗?

谢尔巴科夫:经营。

安德列耶夫:对他们也要实行实物交售制。

斯大林从来不懂农业的特点及其内在"动力",他像往常一样进行引导,使问题再次用强制的行政的办法得到解决。

经过共同"努力",新措施制定出来了。这些措施更加严厉,而关于经营宅旁园地的措施有的简直荒谬不堪。例如,日丹诺夫向全会提议:"有人建议采纳斯大林同志对决议第6条的修正意见:集体农庄主席如果允许农庄庄员和没有参加农庄的人在树林中私自割草,将被开除出集体农庄,并按违法罪交付法庭审判。"

无能的大地主砍掉了副业。当时常有这样的情况:相当一部分草地没有刈除,而农庄庄员甚至连在峡谷和树林中割草都遭到绝对禁止。没办法,支配着党的领导人的是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以为靠禁令

就能迫使农庄庄员积极参加集体生产。这一切只能叫作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确切些说,是对10年前开始的破坏的完成。要在一个民族成分、自然和气候条件千差万别的大国事无巨细都作出详细规定,这种做法荒谬至极。

会上几乎没有人反对。只有全会参加者库拉科夫(当时在文件中通常不写姓名的名和父名)忍不住对决议草案中的一点提出疑问:

"我必须提出一点意见,决议草案第3页规定了个体农民交粮的期限。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必须在7月上交15%的粮食。但是我们8月1日才开始收割。7月上哪里去找粮食?用什么储备上交?"

最后,经过讨论,又产生了一份文件,一份规定了详细细则的、禁令性的、必须照办的、威胁性的文件……速记记录摘录证明,就连斯大林也对发表这份文件是否适宜有点疑虑:

"如果这份东西(全会决议。——本书作者注)以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是否会给集体农庄的事业带来混乱?"

"不会。恰恰相反,人们将振作起来,"会场里响起了一些信心不足的喊声,"人民早就在盼……"

赞同"领袖"所说的一切,这种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况且"人民早就盼着"对他们的潜力作更多的"限制"……这些潜力已被一言堂和个人专权的官僚主义桎梏限制到了极点。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形势下,如果说在工业中实行硬性集中和非常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那么在农业方面情况就糟得多。

战前最后几个月,我要再说一遍,国家的劳动脉搏跳动很急促。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燃烧起来的战火,如英国的空战、"德国"暂时"禁止跳舞"、波兰成为"总督管辖区",报道"苏联国民经济的新成就"。电台和报刊广泛阐释斯大林的指示和交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即编制苏联15年总经济计划,以便解决主要任务:"在人均生产生铁、钢、燃料、电力、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方面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32]

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似乎想用新建筑工程的嘈杂声掩盖正在临近的战争脚步声。《真理报》报道了莫斯科地铁第三期工程的建设情形、各共和国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冶金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竞赛。在《不真实的影片》这一醒目的标题下,对导演斯托尔佩尔和伊万诺夫摄制

的影片《生活法则》展开了猛烈抨击，指责它宣扬“腐朽的淫乱哲学”。刊登了大串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名单：科京、阿克雪里罗得、沃尔夫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格拉西莫夫、爱森斯坦、约凡、科兹洛夫斯基……发表了赫鲁晓夫在基辅党、苏维埃、集体农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冗长报告。这位政治局委员在颂扬斯大林后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每公顷产100普特粮食的任务，我们还未完成……”

今天，读着这些发黄的、记载着遥远的过去的消息的文件，可感到日常生活节奏高度紧张，甚至在戏剧、新建筑工程或“学习外语运动”等领域也如此。即使在没有直接提到“人民领袖”的地方，也可以感到他的无情意志。没有意志的权力是虚幻的。而斯大林在世上万物中，再说一遍，最爱权力。但是，具有“钢铁”意志的“领袖”认为他的权力及其完善程度远不理想。他的指示通常都迅速、准确地得到执行，但有时质量不高。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过错在于机关——他（斯大林）行使权力的主要机构。在这几年，官僚主义制度的完善达到了新的水平。高度集中、指令盛行、纪律重于首创性、“螺丝钉”心理的胜利——这一切完全符合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

流亡者被刺

战争前夕，斯大林几次同设计师们商讨如何在质量上，哪怕在实力的某些方面，超过德国人。当时指望БМ-13火箭炮、T-34坦克及一系列其他技术装备很快就会投入生产。但是，有一次（斯大林常常抽出哪怕半小时翻阅一阵自己的书籍）他打开托洛茨基文集第9卷《战争中的欧洲》。在《战争与技术》一节中，托洛茨基早在20年代就写道：“如果说在最近50年间军国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军事技术方面的一切发明和“奥秘”）没有使战争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那么同时它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以一种特别的、不同寻常的‘手段’来保证它在短期内取得胜利。”[90]“我们做到了！”斯大林想道，他再次感到仇恨涌上心头。


托洛茨基遗体

在为加强国防潜力而斗争的最紧张时刻，从大洋彼岸传来了期待已久然而又有些突然的消息：托洛茨基被刺身亡。对这个被驱逐者的“猎捕”已经好几年了。但是，这个受到数十名警察和他的同党保护的人行动极为谨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托洛茨基“问题”。“领袖”已几次向贝利亚表示，对他手下的人优柔寡断和不善于随机应变很不满意。而现在事情完结了。俄国革命的两位“杰出领袖”(列宁的说法)的决斗，持续了近20年后结束了。列宁身边的人，如果不算莫洛托夫(不过他未必能够算作列宁的战友)，现在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了。但是，不合逻辑的是，斯大林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满足。为了同这个人作斗争，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如果这事发生在1937—1938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那两年，每一个大的“敌人”背后他都看到有托洛茨基的影子；仿佛到处都有他插手；似乎他最不祥的预言会实现。在所有的政治审判案中，首先受审的就是托洛茨基，虽然他本人并不在被告席上。在那疯狂的年代之后，在向托洛茨基的潜在拥护者实行报复之后，斯大林好像消除了对托洛茨基的仇恨，托洛茨基本人似乎已不那样危险和诡诈了。战争的阴影愈来愈浓厚，超过了遥远的流亡者的招贴画身影。

斯大林责成对消息进行核实。1940年8月22日《真理报》刊登了一条简讯：

> **托洛茨基被刺。**
>
> **塔斯社纽约8月21日电** 据美国报纸报道，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8月20日被刺。刺客自称扎克·莫尔坦·王登德赖什，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最亲近的人之一。

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得到了证实。8月24日，《真理报》再次提到托洛茨基，为的是最终了结这段公案。题为《国际间谍毙命》的社论说：

"一个受到全世界劳动者鄙视和诅咒的人，一个多年来一直反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的人走进了坟墓……托洛茨基的亲密战友(在莫斯科的审判案中。——本书作者注)承认，他们和他们的主子托洛茨基**从1921年起就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成为国际间谍**。他们在托洛茨基的率领下，竭诚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效力……

"刺死他的正是他的拥护者。杀害他的正是那些从他那里学会了进行暗杀、背叛和残暴地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托洛茨基这个凶杀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的组织者，最终成了他自己的阴谋、叛卖、变节和暴行的牺牲品。"

斯大林把文章又仔细读了一遍，微微皱起眉头，心想：把一切都归结为间谍活动，难道这些年来他的斗争对手只不过是个间谍？还有，为什么要毫不掩饰地强调是谁杀了他？好像暗杀就发生在莫斯科，我们什么都很清楚似的。怎能用几句并不高明的词句就把一切都抹掉呢……斯大林放下手中的报纸，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同托洛茨基最初的几次会面。

那是1905年在伦敦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时托洛茨基简直没有理会他。其实那并不是会面，只不过是两人偶然相遇，而他们的对立使他们的一生都涂上了相互仇恨的色彩。托洛茨基在会间休息时向一群青年和一位漂亮女子兴奋地解释着诗歌与哲学的区别，他的轻佻简直使斯大林震惊。这位长着一头蓬松浓密的黑发的人，潇洒地打着手势说："诗歌在观察一滴露珠时可以看到它夺目的光华，并通过它看到全世界。而哲学，"托洛茨基接着说，"则把一滴露珠涂抹在生活的画面上，然后为这个世界上的潮湿寻找论断和定义。"交谈者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托洛茨基，他们未必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是无可怀疑的)，这位博学者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话转述路·费尔巴哈的生动论断。



托洛茨基(右一)跟朋友们在一起

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是在斯大林两次被捕之间的1913年冬天。他们是在维也纳相遇的。斯大林受列宁之托，到那里去安排出版布尔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位“杰出领袖”的决斗持续近20年。这是两幅政治讽刺画。苏联从1921年起就把托洛茨基视为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国际间谍

什维克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文件。斯大林住在一家收费低廉的旅馆里。晚上，他拿着杯子来到小吃部倒茶水。小吃部里只有两个人在茶炊边兴奋地谈着。其中一人身材瘦削，个子不高，蓬松的黑发，蓝色的眼睛，架着一副眼镜。斯大林立刻认出这是托洛茨基，一个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的孟什维克。斯大林记得，他曾冷淡地打过招呼，就自顾自地倒满了茶。有一两分钟时间，整个房间鸦雀无声。托洛茨基仔细端详着斯大林，他还不知道这个皮肤黝黑、寡言少语的人将在他的生活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双眼微眯，默默地盯着托洛茨基，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



青年时代的托洛茨基

请看托洛茨基自己是如何描写这次相遇的。他正在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饮茶，“突然走进一个人，中等个子，身材瘦削，一张黑黑的稍带灰色的脸上带着麻点……斯科别列夫告诉他：这是高加索人朱加施维里，他刚刚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而且看来在中央有一定声望”。不知为什么，托洛茨基牢牢记住了同自己未来的对手的这次相遇和斯大林给他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普通的高加索人的外表，一张十分拘谨的脸和一双满含敌意的黄色眼睛……”托洛茨基未必能想到，20年后他会这样写到这个人：“斯大林的青云直上是在神秘莫测的政治帷幕后发生的。在某个时刻，他的身影突然从克里姆林宫的墙上走下来时，已经大权在握了。”[⑩]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历史学家如今正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再强调一遍，阻止总书记的不应是一个人，而应是中央委员会，是全党。如果逐一思考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布哈林、伏龙芝、鲁祖塔克及其他列宁派布尔什维克——我们几乎选不中一个可以胜任的集体领袖……托洛茨基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都感到痛苦的是，正是他自己的消极态度帮助斯大林顺利地“从克里姆林宫的墙上”走下来，掌握了大权……斯大林很长时间还不知道，他与托洛茨基最初几次的接触给托洛茨基留下了什么印象。在1917





托洛茨基的朋友墨西哥著名画家里维拉所画的俄国十月革命人物，在上图中托洛茨基是仅次于列宁的二号人物





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红场和红军官兵



这是一张表现俄国十月革命的明信片，画面上的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宠儿"。人们总是把他的名字同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年后的几年中，他们见面的次数非常频繁。而愈到后来，愈不愉快。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这颗"星"急速升起。

许多人把他的名字同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直接联在一起。各种集会、群众大会和报刊为革命的"宠儿"欢呼万岁，使斯大林感到厌恶。当时托洛茨基确实受到人们的颂扬……

致军事人民委员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同志

为庆祝伟大的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命名日，您负责的委员部所属的莫斯科军用药店共产党支部，通过您向英雄的社会主义的红军致意，并决定开办一个俱乐部，以我们亲爱的红军领袖列·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命名。俱乐部将在本月9日晚上6时半（在清洁池塘12号）隆重开张。

莫斯科军用药店共产党支部主席

（签名辨认不清）

斯大林记得，当托洛茨基在开会前来到会场时，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的讲话简短有力，却更加鲜明地衬托出他是一个似乎在不断分泌革命的精神流质的人……托洛茨基冷冷地向斯大林点点头，然后就同某个人（施略普尼柯夫、克列斯廷斯基、布哈林、穆拉洛夫）热烈交谈起来……

为什么斯大林此刻回忆起他同托洛茨基的关系史的开始和延续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大谈特谈这个人呢？为什么他已到了国外（这样的人何其多！）却仍然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今天是1940年，战争即将来临，而他却在想着托洛茨基……

斯大林知道，随着托洛茨基的死亡，始于本世纪初的一场斗争，其最具戏剧性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最初，是在组织问题上和纲领问题

上反对列宁，在这部乱糟糟的大合唱中，托洛茨基的嗓门常常很高。当托洛茨基同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一起在日内瓦建立孟什维克党常务局后，他在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中阐述了自己的特殊立场。托洛茨基把列宁称为“独裁者”、“篡权者”，实际上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发起进攻。

从斯大林的观点看，托洛茨基自从转到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后，在1917年前多次表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一会儿从右的方面、一会儿从左的方面攻击党。难怪1917年2月列宁在评价他这种思想上的反复无常时高声说道：“好一个托洛茨基！他总是搞他那一套——摇摆，欺诈，装成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⑩]在以后的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革命的“浪漫主义者”进入了飞黄腾达时期。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立场重新表现出来，他试图在《十月的教训》中按照自己的观点解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斯大林记得，《教训》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不过他不能找到有力的反论据来反驳托洛茨基的许多论证。

而关于反苏主义，斯大林心想，问题更加清楚。托洛茨基在同他的斗争中把自己的政治火力不仅仅是集中起来对准他。实际上十月革命后20多年来在国内建起的一切，在托洛茨基看来，不过是“热月政变”的表现形式。托洛茨基反苏主义的最充分表现是在1938年建立第四国际，它虽毫无结果，但生命力很强。甚至在即将进入90年代的今天，托洛茨基的国际仍然存在。

斯大林记得，当他得到为第四国际成立而出版的托派分子专辑时，他注意到，在开头几页刊登了三幅照片：列夫·谢多夫（托洛茨基的长子）、埃尔温·沃尔夫和鲁道夫·克列缅特。文字说明三人全成了“斯大林反革命的牺牲品”。斯大林细心通读了第四国际首领写的绪言《大胜利》、成立大会的宣言《告全世界劳动者》、首届代表大会参加者的报告。他用他惯用的蓝铅笔在一些词句下面打上了着重线，如：“眼下，苏维埃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倾向正在加强”，“十月革命的全部成果面临毁灭的危险”，号召“在苏联进行新的社会革命”，“恢复苏维埃民主（使各个工人党合法化，确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

斯大林在杂志中还圈了几段，其中一段宣称，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苏联政府的军事失利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开辟革命起义道路是最

小的灾难”。

“叛徒！”斯大林憎恨地想道。

“第四国际代表会议，”早已被当作列宁的惟一继承人的斯大林接着往下读，“向您（托洛茨基。——本书作者注）致以热烈的敬意。对我们的运动进行的、特别是对您进行的野蛮镇压，使您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使十月起义的组织者、不断革命的理论家、列宁学说的直接继承人不能对我们的讨论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60]

两位“杰出领袖”、两位“继承人”……托派分子在文中对斯大林的官僚制度的攻击很少使他激动（他未必能知道，今天这些词句读起来像是绝妙的预言，全党全民将要反复重温的预言）。他最感到不快的是还有人在什么地方把托洛茨基看作是列宁精神的体现者、列宁思想的解释者！不论我们如何看待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他的批评有时确实打中要害：“把工人阶级的国家工具变成官僚肆虐的工具”——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成就之一。

应当说，“由于”斯大林的缘故，我们直到今天还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破坏性的政治组织，而不是看作一种思想潮流。我觉得这在任何时候都不完全符合实际。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随身带走了不少文件，主要是抄件。而原件后来被查禁了，整整几十年被封存在档案馆里。翻阅一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文件（这是不久前才允许的）就可看出：其中很少证明斯大林同志同托洛茨基有私人间的通信的材料。即使有一些这样的文件，也是冷冰冰的，没有人称，没有起码的称呼。两人的不和在国内战争年代就已经很深了。请看斯大林1918年写给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的两封报告信的摘录。

致托洛茨基，抄送列宁

因时间很少，简短地写几条。

1.在宣布动员哥萨克部队这件事上我们和您全错了（我们比克拉斯诺夫晚了一步）……

6.察里津变成了军事行动的武器装备基地。像斯涅萨列夫这样委靡不振的军事指导不适用。您那里有否其他人选？

7.司令部的大门为何对法国代表团成员敞开。我声明，如果他

们(法国人)落入我的手中,我决不轻饶。

人民委员 **斯大林**

1918年7月12日于察里津[99]

既没有“您好”,也没有“再见”,如果说这是正式报告,也没有按革命形式那样来称呼。但是独特的个人风格已经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落入我的手中,我决不轻饶”。斯大林的另一份报告与第一份相似,但是已经带有最后通牒的成分。

自9月20日起,我们战线的局势发生了一些于我们不利的变化……要想补救,只能从南方战线的北部地段实行逼攻,但是这些地段疲疲沓沓,指挥员瑟京一点也不关心整个战线的情况……我们声明,如果不火速满足要求(斯大林要求弹药、装备。——本书作者注),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撤到伏尔加河左岸[100]。

从报告中仍能明显地感到对军事专家的不信任和对托洛茨基明显的不友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友好变成了仇恨。

但同时斯大林不能不承认托洛茨基在关键时刻处事果断。使他景仰的是,军事人民委员在某些人或整个部队发生动摇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在前线采取惩罚和恐怖的手段。国内战争以后,斯大林有一次翻阅了几叠早期的案卷,寻找有损托洛茨基名声的文件。他的注意力被托洛茨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几封电报所吸引。现从中摘录两封。

喀山。军事革命委员会,拉斯科尔尼科夫

伏尔加河上有许多载有白卫分子、强盗、背袋贩子的船只。必须把这帮混蛋搞得惊恐不安。为此,对抓获的几船犯罪分子就地给予严惩。请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议一议。请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托洛茨基

1918年7月15日[101]

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另一封电报说:

政治委员中有许多粗枝大叶的人。对于可疑的指挥员，给他们身边派一些强硬的政治委员，端着枪督促他们。要让官长们作出选择：胜利或是死亡。对不可靠的官长要严密监视。对于指挥人员的临阵脱逃，政治委员要以脑袋担保。请报告采取的措施。此电请予公布。

托洛茨基

1918年7月28日[109]

斯大林在这里没有找到一点谋反的迹象。他自己在前线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往往更残酷。斯大林没有察觉，一般说来，在许多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问题上，他比托洛茨基本人还更托派。

斯大林为了同托洛茨基斗争付出了极大精力，以致在得到自己的敌人的死讯后有一种空虚感、失落感。这种感觉，像他希望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满足所"填补"。斯大林在默默地念着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流派，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的健康力量上的赘瘤。"这类定义被人们引用着，背诵着，重复着。实际上，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倾向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理论家"。

的确，在得知期待已久的消息后，斯大林起初并没有感到满足。但是后来，意识到最危险、最聪明、最顽固的对手已不在人世后，斯大林从内心感到一个胜利者跨过自己的手无寸铁的敌人尸体时那种凯旋滋味……斯大林虽然从没有向自己的亲密战友吐露过，但他早就明白：只有在"跨过"现实的和潜在的敌手的尸体后，他才能真正感到是在独掌大权，感到绝对的自"我"和某种优越。为了从内心上自我辩护（他很快就不需要这种辩护了！），斯大林可能认为，如果他不消灭他们，他们就会消灭他。要掌权就要活下来。只有掌握在一个人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凡是可能对他掌握无限权力的绝对资格表示怀疑的人，就应当被消灭。因为他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化身，成为千百万人向往的理想社会的化身！怀疑他就是怀疑社会主义！）斯大林沉思着权力和被打倒的敌人，他可能认为：在"列宁时期"有可能知道他的底细的人，现在大概一个也不剩了。似乎那个核心只剩下他一人了。而权力要求只有一人！只有达到这种状况时才能尝到沉醉于权力的滋味。只

有他领会了这一点。那个已永远躺在考约阿康的白色墓碑下的人曾不断争夺这种独占权。

“领袖”想起了托洛茨基写的并刊登在托洛茨基的《反对派通报》上的最后几篇文章和文件。托洛茨基在他1938年发表的给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信中写道：“我们当前的力量与明天的任务很不相称，对此我们比我们的批评者更清楚。我们时代的严酷的悲剧性辩证法正在为我们创造条件。战争将使群众极度绝望和愤懑，除了第四国际，他们找不到别的领导。”在另一份类似的文件中，托洛茨基神秘地宣称：“在未来10年中，第四国际的纲领将会得到千百万人的支持，而这革命的千百万人能够翻天覆地。”托洛茨基如此狂热地预言第四国际的胜利，说它在新的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一定会到来，以致清醒的读者一下子就产生一种印象：托洛茨基盼望战争，因为他把自己能否重返历史政治舞台，能否摧毁斯大林主义，能否占据适合于发挥他的才智的地位都同战争联系在一起。托洛茨基宣称：“未来战争的牺牲品首先是第三国际各党，那时第四国际（当然由托洛茨基领导。——本书作者注）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托洛茨基长眠于墨西哥考约阿康的白色墓碑下

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拿起一叠《反对派通报》，从中找到1938年第65期，翻到需要的一页，便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起托洛茨基撰写的社论。（没有多少人会去重温那些辱骂和抨击自己的文章，而斯大林不是这样的。他要读，要加深仇恨。）

“什么，斯大林还躲在幕后窃笑吗？法西斯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且从……斯大林主义那里得到主要的帮助。可怕的战争威胁正在敲打苏联的大门，而斯大林却选择这个时候破坏军队和蹂躏民族（指对军人的审判。——本书作者注）。”

流亡者预言（看来，确实离真理不远），将会有“另外一场真正的审判。那时在人类语言中将找不到为这个历史上最丑恶的凶手进行辩护的言词……他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将被捣毁，或是放进博物馆，摆在

极权主义恐怖行为的展厅里。胜利的工人阶级将对所有的审判案，公开的和秘密的，重新进行审理，并在获得解放的苏联的广场上为斯大林的凶残行为和卑鄙行为的不幸受害者建造纪念碑……"斯大林合上《通报》，把它扔到书架上，沿着会议桌踱起步来：

"难道真有一天人们会相信这派胡言吗？难道托派分子及其帮凶没有公开供认自己的罪行吗？"

斯大林手中握着熄灭的烟斗，来回踱着步子，他也许在想，如果搞得彻底，托洛茨基主义"将得不到"未来。

难怪在得到托洛茨基被暗杀的消息后不久，贝利亚（不无斯大林的同意）下达了"处决劳改营里的托派积极分子"的命令。在战争爆发前夕，各劳改营还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浪潮，一股扫除最后一批被划为"托派积极分子"的犯人的浪潮。伯朝拉、沃尔库塔、科雷马、索洛夫基等地都成了继第四国际领袖被暗杀后"紧接着"又对他进行血腥报复的无声见证人。斯大林不想了解，杀死一个人并不是同他的思想作斗争的有效手段。他指望用这样的方法排除异己思想和反对派（哪怕是内心上精神上的反对派）产生的可能性。

仅仅托洛茨基的文章的标题就能使斯大林火冒三丈。例如，1939年9月2日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抨击性文章《斯大林——希特勒的军需官》，几星期后又写了一篇《双子星座：希特勒—斯大林》。斯大林读着这些文章，简直像听到了托洛茨基的声音："苏联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斯大林的所有王牌，比起希特勒所掌握的并用来反对苏联的资源和力量，简直微不足道。"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预言他会惨败，然而托洛茨基又希望"作为工人国家的苏联有可能保存下来"。

托洛茨基不愿让苏联失败，而只想让斯大林灭亡。从他关于未来战争的预言中可以感到他心慌意乱，因为流亡者知道，只有他的祖国遭到失败，才能剥夺斯大林的权力。托洛茨基的思想反映了一个极有才干和天赋、但一贯有其特殊的价值观的人的演变过程。托洛茨基有一次说，有许多著名的、甚至是杰出的革命运动领袖，大自然在赋予他们智力时十分吝啬。对于这种智力不足，这些人通常都是用刚强、毅力和干劲来弥补。看来这种论断有一部分真理。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首先是具有很高天赋（即我们今天称作智力的东西）的人。他把自己看作是他参加的那些事件的震中。革命理想对他

来说十分重要，这大概首先是因为它能使他的智力的作用显得突出。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希望未来战争尽快爆发，因为他认为战争是推翻斯大林的惟一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甚至不愿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当一个人不能或是不愿摆正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时，大概常有这种情况。甚至他的新的、革命的、实际上是空想的未来行动计划都不过是旧的“不断革命”（但是……是由他托洛茨基来领导的“革命”）论。例如，他在小册子《马克思的活的思想》的引言中预言，由于新的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将同归于尽，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促成欧洲联邦的诞生”[illegible]。托洛茨基没有明写，但是似乎在暗示人们，领导这个“联邦”的应当是提出这个思想的人。

斯大林不知何故想起了就驱逐托洛茨基出境作出决定的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在非正式交谈中，基洛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等提出了慎重的意见：或许，托洛茨基回心转意了？如果他认错呢？能否给他安排一个次要职务？要知道，这个人的威望仍然很高。斯大林不想作任何和解。他的凶狠和报复心不开“倒车”。他知道，只要托洛茨基活着，只要他在苏联，自己就安不下心。在交换意见（当时还能够这样做）之后，决定试探一下托洛茨基本人对和解的态度。从中央派了一人前往阿拉木图。一星期后收到电报：托洛茨基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并认为没有同斯大林和解的基础。总书记读完电报，得意地看了看战友们：我当初怎么说的？我本来就认定托洛茨基是没有解除武装的敌人。再也没有人对驱逐托洛茨基出境的决定提出异议了。

托洛茨基自己在1935年2月18日回忆这件事说：

在我们住在阿拉木图时，有一次来了一个苏联工程师，据说他是主动来的，是同情我的。他询问我的生活情况，感到很伤心，顺口十分谨慎地问道：

“您是否想过可以设法和解？”

很清楚，工程师是被派来打探虚实的。我回答说，和解现在根本谈不到：不是因为我不想和解，而是因为斯大林不可能和解，他不得不沿着官僚政治使他走上的那条道路走到底。

“这件事会怎样收场？”

> “流血，”我回答说，“斯大林不可能以别的方式了结这件事。”
>
> 我的访问者不由打了一个哆嗦，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回答，很快就走了。
>
> 我想这次谈话在决定把我驱逐出境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可能斯大林早就打算这样做，但在政治局里遭到了反对。现在他有了有力的证据：托洛茨基自己声明要冲突下去，直至流血。驱逐出境是惟一的出路！[40]

斯大林从来没有读过托洛茨基的这些日记，虽然他当时即1929年并不认为驱逐是个好办法。但是，当时他还不能审判（更不用说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手。

得到流亡者的死讯之后，他眼前迅速闪过了在他们两人的相互关系上从敌对发展成彼此仇恨的全过程。尽管他们所处的地位截然相反，一个是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一个是流亡者，但是后者不断地刺激、挖苦、揭露、抗议、声明……

斯大林知道，托洛茨基已着手撰写一本题目简洁的书《斯大林传》。当独裁者从每日送给他的新闻汇总中读到这一消息后，他的心发抖了。不，斯大林在1938年已经不怕托洛茨基了，他对于那些叛徒、白卫分子、托派分子和仇恨社会主义的人在资产阶级刊物上写的大量文章的反应相当平静。报纸文章的生命就像蝴蝶的命运一样。托洛茨基那本内容贫乏的小册子《斯大林的罪行》也是如此。这本书是他秘密乘坐“鲁特”号油轮由挪威前往墨西哥的海上旅行期间写的。对斯大林的罪行他考虑的时间并不长，但篇幅相当大。斯大林清楚托洛茨基的才能，知道在他的笔下可以产生非常恶毒的作品。斯大林了解托洛茨基的“发射速度”，他预料书会在1938年、1939年或今年1940年出来……也许写不出来？但他仍然催促贝利亚，对他手下人的优柔寡断流露出不满。

但是，斯大林不可能知道，当托洛茨基决定为其死敌立传时，大概就已经注定要在创作上失败。这可能是托洛茨基写得最差的一本书。除了报复、敌意和发泄，他的笔下出不了任何东西。托洛茨基费了很大精力才给自己构思的这本巨著写出七章。其中心意思是，一个凶手伪装成索索、革命者柯巴和有巨大影响的党和伟大人民的“领袖”。每一

个熟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的人，即使不读这本书，也能推想出它的内容。它是带着非常明显的仇恨写成的，虽然在许多方面是有根据的。正如拿破仑有一次讲过的："一切事物都有限度，甚至仇恨。"超越了这些限度，就必然要失掉一些东西：真理、理性和镇静。托洛茨基在他未写完的斯大林评传中失掉了自己的政论家和著作家的天才，而主要的是失掉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的天才。书中有不少对斯大林的议论是对的。但是也有不少杜撰、猜测，其目的只有一个：表明凶手如何变成超级凶手。为此，托洛茨基甚至编造斯大林"收留"资产阶级，靠资产阶级爬上权力顶峰。"凡是没有逃亡国外的从前的地主、资本家、律师、他们的子女，都参加了国家机关，有些人还入了党。"托洛茨基甚至断言，在苏联国家机关内留有"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99]

在托洛茨基(继他之后还有许多历史学家)看来，斯大林生来就是一个恶棍，从童年起就是一个精神恶魔。无须证明，这种今天也不少见的观点是违反科学的。任何人都不能先验地被认为是罪犯。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恶棍。一些反面的特征，如多疑、阴险、权欲、报复心等，并不总是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罪行的。不能用一种眼光去看1918、1924和1937年的斯大林。此中有他……但又不是他。当然，由于主客观原因和环境，斯大林在第一次"加冕礼"过了10年之后变化很大。他做了许多永远不能宽恕的事。而这个人的政治肖像的难画之处正在于，他表面上在为社会主义理想(被极度歪曲的，被庸俗化、公式化和教条式理解的理想)奋斗，是的，是在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但同时也犯了错误和严重罪行。

当然，在托洛茨基着手撰写的斯大林评传中，斯大林没有被看作一个极其矛盾的人物。因此，在西方发表的几章斯大林评传，不像托洛茨基其他几本书那样，没有多大学术和历史意义。但是，它们可以证明，托洛茨基反对的主要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这种现象。

斯大林一直没能看到托洛茨基的这部著作。不然他就会读到一些会使他火冒三丈的话。托洛茨基在遥远的考约阿康写道："我们在寻找历史上可与斯大林类比的人时，不仅应当排除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甚至应当排除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有用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或波菲里奥·迪亚斯等字眼(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我们才算比较理解斯大林。"[100]我认为，这些话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仇

恨(出于个人动机)的程度。不过,对于一个使他成为漂泊者、"没有签证的公民"并在实际上杀害了他的全部亲属的人,托洛茨基能有什么想法呢?托洛茨基本来有时间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制度,然而他却陷人了痛苦的矛盾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却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斯大林分开。托洛茨基正确地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而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他正确地认为,斯大林的主要产物就是造成了官僚化的集体主义和当作机器用的机构。托洛茨基不无根据地预言,将来官僚制度同社会首创性不可避免要发生尖锐冲突。晚年的托洛茨基看来陷人了迷惘,说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只不过是潜在的"。

托洛茨基一生坚持"不断革命"思想。他在1940年写道,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不能使资本主义崩溃,将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者描绘的历史前景。"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纲领就会变成空想。"托洛茨基所以作出悲观的预言,失败、流放和遭受迫害的年代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然而他始终不渝地认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一切艰难困苦都与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官僚主义蜕化"有关。

当然,斯大林当时有可能把新国际的首领搞臭。从事这种活动的还有驯服的共产国际,它早就谴责托洛茨基的"分裂和反苏活动"。甚至在反动势力进攻的年代(这种反动势力在人民阵线胜利后活跃起来),苏联也有不少朋友,即各种社会团体,它们把它看作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日益迫近的战争的惟一支柱。苏联在国外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宣传经常从自己的武库中搬出这样一个论据:"托洛茨基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和间谍,是对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不断变换说法的这个论点,尽管是明显的牵强附会,却仍在"起作用"。托洛茨基无论到哪里(法国、挪威、墨西哥),总是有许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他们之中不仅有共产党员、工会会员、进步组织成员,而且往往还有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们对托洛茨基的纲领的毫无结果感到失望。

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墨西哥共产党及其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强烈反对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这个被驱逐者有着老也抹不掉的"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名声。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后,许多社会团体为迫使他迁居他国而展开了不断的斗争。托洛茨基真的像他说的那

样，成了“没有签证的地球人”。

由于害怕遭暗杀，托洛茨基大大减少了到山区和墨西哥城的旅行，很少会见熟人和来访者。他家的许多朋友逐渐消失了，断绝了同托洛茨基的来往。只有罗斯梅尔夫妇(阿尔福来德和马加利塔)一直同托洛茨基夫妇来往密切，他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认识托洛茨基和纳·谢多娃的。托洛茨基像在笼子里一样在他的考约阿康折腾，寻找活跃反斯大林斗争的办法。但是毫无结果。他的声音在全世界，尤其在苏联，远不是经常都能听到的。宗派主义以及往往脱离生活的口号、漂亮话对苏联不起什么作用。



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左)与友人著名画家里维拉

托洛茨基总也忘不了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那时他有过胜利和没有实现的希望。晚上他有时就沉湎在回忆中。有一次，托洛茨基在同罗斯梅尔夫妇交谈时提出一种说法，说列宁是被斯大林毒死的。这个身在远方的流亡者不掌握任何材料，却不断地给他画的肖像涂抹着阴沉昏暗的色调。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得知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后，不愿去冒险，便加速了事变的进程[10]。但是，甚至罗斯梅尔夫妇也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托洛茨基只有一个论据，他还在《斯大林传》一书中引用了它：既然斯大林杀害了列宁的所有战友，他为什么不能毒死领袖本人呢？

斯大林并没有下令给他翻译这本书。这大概是独裁者既不希望看到、也不愿读的惟一的一本流亡者的著作。由于托洛茨基这本没写完的书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斯大林对它也就不感兴趣了。“领袖”想让历史的深渊尽快吞没他害怕的东西。

托派组织在墨西哥当局的帮助下在考约阿康这个小城镇为托洛茨基购置了一栋大房子，并把它变成一座真正的堡垒，四周建起了带岗楼的水泥高墙。房屋的门都包着铁皮，装有复杂的警报系统。托洛茨基平时至少有10名警察和保镖负责保卫。他甚至备有防弹背心，在外出时穿用。托洛茨基在这所避难所里发表声明，答记者问，他曾预言斯

大林很快就会垮台，法西斯主义可能战胜苏联。在最后的两年，托洛茨基完全投入到反对自己过去的祖国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去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电台很乐意到处传播托洛茨基那些燃烧着对斯大林的仇恨的心声。1940年4月他写了一份呼吁书《给苏联工人的信：你们受骗了》，其中实际上是在战争爆发前夕号召推翻斯大林。托洛茨基在临终前四个月写道："进行十月革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新的寄生虫。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迟迟未到来，由于俄国工人的疲惫和（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落后，特别是农民的落后，在苏维埃共和国的肌体上又产生了一个反人民的、强暴的和寄生的阶层，其首领是斯大林……"接着，托洛茨基不顾现实情况，号召举行起义反对"新阶层"。为了准备"这一起义，需要一个新的党，一个勇敢的、诚实的、革命的先进工人组织。第四国际所抱的宗旨就是在苏联建立这样一个党"。呼吁书的最后几句话反映了托洛茨基多年来的一贯立场，即仇恨斯大林和忠实于自己的世界革命：

> 打倒该隐*斯大林及其奸党！
> 打倒残暴的官僚政治！
> 劳动者的堡垒苏联万岁！
>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 致兄弟般的敬礼
>
> 列·托洛茨基
>
> 1940年4月25日[13]

斯大林读完《给苏联工人的信》，再次叫来贝利亚，恼怒地警告说，他对这一切已经厌烦


托洛茨基于1932年

托派"第四国际"成立

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于7月创办了《反对派公报》，先后在土耳其、德国、法国、挪威等国出版。托洛茨基便采取了直接建立"纯托派"团体的方针，以期进一步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国际组织。1930年以后，法国、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先后建立了一些托派组织。1933年7月，经法国达拉第政府批准，托洛茨基由土耳其迁居法国。这时，他宣布同共产国际决裂，并准备建立"第四国际"。

*《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因妒忌杀死弟亚伯。

——译者

了,他怀疑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否想了结这件事?人民委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加倍努力去消灭这个给斯大林报凶的流亡者。看来,当时曾决定充分利用许多社会团体对托派活动(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不满。正像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在《我被称为凶恶的上校》一书中写的,早在西班牙他就同朋友们决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哪怕不得不使用暴力,都要捣毁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老巢。”[13]

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活动客观上有利于(不管他愿意与否)柏林的利益,柏林密切注视着托洛茨基同各国共产党组织之间的“舌战”,不公开表露自己对当时形势的极度满意。共产国际在许多文件中反复谴责第四国际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活动是“为好战力量帮忙”。

在这种形势下托洛茨基两次遭人暗杀,其中第二次结束了他的生命。1940年5月24日清晨,身着警服的“一伙生人”解除了警卫的武装,并向托洛茨基的住所发动进攻。(西凯罗斯写道:“我们这些参加过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的人认为,实现我们制定的战役即夺取托洛茨基在考约阿康街区的所谓堡垒的时间到了。”)进攻者直接向托洛茨基和他妻子藏身的房间射击。但是他们躲到了床后面的角落里。子弹把他们刚才呆过的地方打穿了数十个窟窿。无论是托洛茨基夫妇还是他们的孙子都幸免于难。但是,此后每过一天,他们都认为是命运的恩赐。他们知道,有人正在认真地猎捕他们。托洛茨基就像牢房里的死囚一样度日,不知什么时候对他执行死刑。他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和愿望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不可能销声匿迹。同斯大林交战使他得生的希望极小。他的对手不喜欢也不会半途放弃预定的目标。

墨西哥当局的调查起初毫无结果——没有找到袭击者。美国和墨西哥的报纸报道说,人们甚至怀疑是托洛茨基自己排演了这次袭击,目的是败坏墨西哥共产党、斯大林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的名声。

前来调查的警察问托洛茨基:

“先生,您对这次暗杀有什么具体的怀疑对象吗?”

“当然,”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的流亡者答道。他俯身对着警察的耳朵,带着鬼鬼祟祟的样子戏谑地说:

“攻击的设计师就是约瑟夫·斯大林……”

其实,凶手就在托洛茨基身边。他早在1939年就成为托洛茨基家的常客,名叫扎克·默纳,比利时人,是曾任托洛茨基女秘书的美国托

派分子西尔维娅·阿格洛夫的男友。默纳从事电影制片业，他在实业界还自称是加拿大公民“弗兰克·杰克逊”。“杰克逊”先是认识了托洛茨基的朋友罗斯梅尔夫妇，这最终为他接近受到精心保护的流亡者创造了条件。1940年5月“杰克逊”终于直接认识了托洛茨基。此后他经常不定期地到考约阿康来，并在私下谈话中表明他“同情”托洛茨基的立场，为改善第四国际的财政状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不管怎样，据美国报刊后来透露，“杰克逊”取得了托洛茨基的信任。“杰克逊”不止一次谈起“一些强有力的人物”、“铁腕人物”。托洛茨基的妻子后来回忆说，托洛茨基甚至产生了怀疑，这个生意人莫不是法西斯分子？其实这是一个西班牙人，名叫拉蒙德·里奥·梅卡德尔，是执行“人民领袖”(他从来没有见过“领袖”)的意志的人之一。

有一次在8月中旬，“杰克逊”请求托洛茨基为他修改一篇无关紧要的文章。托洛茨基给他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8月20日星期二的晚上，“杰克逊”又带着修改好的文章，来到托洛茨基的书房，请他看一遍。托洛茨基正在看手稿。他刚刚写完《斯大林传》一书的《热月政变》一章。他挖苦地写道：“按照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托洛茨基的命令，政府首脑李可夫和大部分人民委员如加米涅夫、鲁祖塔克、雅柯夫列夫、罗森霍尔茨、切尔诺夫、伊万诺夫、奥新斯基等……都成了外国间谍，他们串通一气反对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苏维埃政权……”托洛茨基选择那些最厉害的词句来形容斯大林的罪行。他在这一章的末尾写道：“在这幅画下应当签上画师的名字：约瑟夫·斯大林。”[9]

“杰克逊”后来供称，他进屋后，“把风雨衣放在椅子上，从下面悄悄取出带铁尖的登山杖，闭上眼睛，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正在阅读的托洛茨基头上劈去”。“杰克逊”在法庭上供认，被害者发出“令人恐怖的刺耳惨叫，这叫声我终生难忘”。托洛茨基挣扎了一天一夜后才咽气。

托洛茨基比斯大林只大一个半月。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常常回首往事，寻找决定他命运的那个时日。找来找去总是找不到。而他的同龄人在他们多年的生死搏斗中却比较成功。托洛茨基的悲剧是内讧的悲剧。由于斯大林，这场内讧在列宁逝世后采取了如此荒谬的、可怕的形式。刻有镰刀斧头的白色墓碑，立在考约阿康他最后避难时住的院中的坟墓前，距离这位俄国革命的“杰出领袖”之一的出生地——乌克兰博布里涅茨城郊的雅诺夫卡有数千公里之遥。他的墓早已成为一个

节日旅游点。

托洛茨基的命运同我们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他的悲剧确实可怕：个人的希望破灭，所有的亲属都被斯大林授意处死，他一生中的主要思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成为幻想，最后他自己被斯大林的凶手暗杀。但托洛茨基的悲剧最终（虽然姗姗来迟）似乎具有乐观主义的色调：他的主要敌人和对峙者被历史革出教门。托洛茨基这个幻想“世界革命烈火”的堂·吉诃德将作为一个既卓越又充满矛盾、既有先见之明又徒务虚名的人而留名青史。如果说列宁是“能把明天的世界统一起来”（卢那察尔斯基语）的人，那么已经成为“杰出领袖”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则永远走不到一起，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想过没有个人胜利的思想胜利……

从被捕的“杰克逊”身上搜出一封信，他在信中自称是一个“失望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是抱着其他目的来到墨西哥的”，但在这里他终于“决定杀死这个罪人”。信中说，他不能宽恕托洛茨基“同资本主义列强首领的勾结”。舆论界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凶手究竟是个什么人？是谁指使他的？资产阶级报刊自然而然地并且不无根据地众口一词地强调说：斯大林，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共产党人。然而，“扎克·默纳”，即“杰克逊”，也就是拉蒙·梅卡德尔，在被判20年单独监禁后，日复一日直到刑满也没有推翻自己最初的供词。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在20年监禁中曾试图多少揭出一点这个人的秘密，但梅卡德尔坚持己见。

他成了早已酝酿成熟的行动的工具，参加这一行动的人有一大批，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艾廷贡领导。最后选中前西班牙共和军中尉拉蒙·梅卡德尔，他当时27岁。他不仅具有作战经验，而且坚信1937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在西班牙发动的反共和政府的起义是得到考约阿康隐士本人赞许的。梅卡德尔打仗的热情还没有“冷下来”，他把暗杀看作是高尚的革命行动。恐怖分子随身带着手枪、匕首，但却使用了登山杖，想在执行斯大林在遥远的莫斯科作出的判决之后悄悄离开。梅卡德尔没有被处死，也许是因为法庭考虑到当时正在流血的托洛茨基向抓住凶手的警卫人员说的最后几句话：

“别杀死他！让他说出是谁派他来的！”

斯大林急切地盼望托洛茨基死去。这是毫无疑义的。他无法忍受

每星期传遍全世界的墨西哥隐士的声明：

“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关系上是反动和反革命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官僚集体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

“未来的战争必将引起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被推翻……”。

斯大林不能忘记，这个被伟大的列宁称为“杰出领袖”的人仍然与他对立。即使第四国际是个死胎，但是“领袖”担心：谁知道过些年后它会成为什么样子？还有谁能在许多年里使他斯大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那么大的损害？大概再没有一个人。托洛茨基无休止地重提往事，预言新的灾难，散布对斯大林的英明的怀疑。只要托洛茨基还在世，他就是那遥远年代的代表者。那时，“两位领袖”冷漠地握手，一起听列宁讲话，进行争论，相互为敌。托洛茨基比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战友更了解斯大林。托洛茨基能够了解斯大林的内心世界、他隐秘的动机和意图。他们两人都想当第一把手。对于历史和人民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老的列宁近卫军”在失去列宁之后，只让其中的一个人离开了党的舵位，却把另一个留在了舰桥上。后来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长达15年的斗争中几乎消灭了他所有的拥护者，把失势的流亡者变成经常遭到恐怖行为打击的对象，但他摆脱不了自己逊于托洛茨基的感觉。只要这个相距遥远的流亡者在考约阿康活着，他的极权统治就不彻底。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不能不谴责斯大林在反对自己的思想敌人时使用的卑劣的恐怖手段。但是斯大林不能剥夺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对世界革命思想的忠诚。考约阿康隐士永远留在那些人的记忆中，他们对他没有成见，认为他是世界“革命烈火”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未来胜利的讴歌者。

托洛茨基死后，贝利亚得到了提升：七个月后他成为国家安全总务委员，把国家安全事务交给B·H·梅尔库洛夫，保留了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并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西方很长时间报道说，贝利亚是暗杀托洛茨基事件的主要执行者和组织者。然而，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得到直接的文字材料来肯定或否定这种说法，虽然它好像并不需要特别的证据。

托洛茨基死后，公布了他的遗嘱，其主要部分写于1940年2月27日。斯大林忍不住要读一读他的主要敌手最后一次表示的意愿。托洛茨基在遗嘱中也没有放过他。在三页遗嘱中有几行是写他的："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次驳斥斯大林及其代理人那愚蠢的、卑鄙的诬蔑，我始终保持着我的革命名声而没有一个污点。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我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达成任何幕后协议或是哪怕进行任何谈判。数千名斯大林的反对者成了这种诬陷的牺牲品。"

考约阿康隐士曾想按照列宁最后几封信的精神来写遗嘱，尝试了几次均未成功。因为列宁晚年的思想的意愿全是献给人民、党、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托洛茨基的遗嘱由几篇不长的正文和各种附笔组成，其中主要是表白自己，表白自己对事业的忠诚、自己的气节、妻子和自己的原则。托洛茨基在遗嘱中写道："如果我有机会从头开始，不言而喻，我会尽力避免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一生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死去……我现在对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非但不亚于我青年时期，而且比那时更坚强。"托洛茨基在遗嘱中甚至没提他的宠儿——第四国际……

遗嘱的相当一部分是在谈私事，是专门谈他妻子纳塔利娅·谢多娃的。遗嘱第一部分的最后几行很不寻常："娜塔莎现在从院子里走到窗户跟前，把它开得更大一些，使空气更通畅地进人我的房间。我看到围墙下碧绿的草地、围墙上的蓝天和洒满大地的阳光。生活是美好的。愿我们的后代清除掉生活中的丑恶压迫、暴力，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19]

看来，托洛茨基也曾想过自杀。遗嘱中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两人死去……"话没说完。在附笔中接着说，他和妻子不止一次讲好，与其让衰老把他们变成残废，不如自杀了好。他明白，一颗巨星只有怀有希望才能发光。"我保留自行决定自己死期的权利……"托洛茨基在遗嘱中写道。但是他的死亡时间是别人给他确定的。历史想要使托洛茨基的悲剧结束得同他预想的不同，何况参加悲剧的人有许多不单纯是反对他，而且对他抱着刻骨的仇恨。斯大林把遗嘱的最后两句话读了好几遍："然而，无论我怎样死，我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毫不动摇。这种对人及其未来的信念现在给我的这种反抗力量是任何宗教也给不了的。"





上图为托洛茨基遇害的地方，下图为托洛茨基与妻子纳塔利娅·谢多娃



托洛茨基与妻子孙女在墨西哥考约阿康家中

斯大林站起身来,手里习惯地握着熄灭了的烟斗,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地沉思着。如果他真的相信托洛茨基说的话,那他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流亡者考虑的是主张和理想,而斯大林想的只是权力。斯大林不知为什么想起圣经中的大卫有六个儿子,而托洛茨基有两个,20年代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曾多次见到他们。当时他们两家的住所离得不远……幼子谢尔盖1938年死于某个劳改营……而长子列夫1929年被驱逐,他是父亲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的得力助手。他好像是因患阑尾炎死于巴黎一家侨民诊所……托洛茨基前妻的两个女儿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斯大林对她们不感兴趣。

谢天谢地,他斯大林的儿子还活着。雅科夫和瓦西里都是军人。如果发生最可怕的事——战争,两人都要上前线。斯大林点燃了烟斗,坐到写字台前,把载有《国际间谍毙命》消息的报纸推到一旁,把标着"外交人民委员部文件"字样的一叠公文拿到面前。

秘密外交

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在俄国出版的《外交史要》一书。他翻动着已经发黄的书页,浏览着书中的标题、插图、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门,外交书记和杜马书记,俄国外交家奥尔金-纳晓金、帕宁、涅谢尔罗德、哥尔查科夫,历届的部、司,各种会议,联盟……

对于斯大林来说,所谓外交就是寻求一些办法(也可以说是某些妥协),好为实现他在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宏伟计划保障良好的外部条件。作为领袖,他要使国家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并非一件易事!这需要时间,需要和平。必须确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价!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让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李维诺夫是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当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来使苏联免遭战乱的联系、关系和均势。斯大林不喜欢正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和方法,

如：进行访问，召开会议和国际代表会议，举行高级首脑会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信联系，派遣有全权代表参加的特别使团，举行小范围谈判。绝对必要时，双方首脑可亲自直接出面，以显示某一行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来，主要的是，外交活动作为实现一国对外政策的手段，应当由少数几个人来搞。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两个部门要保证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了解实际情况，了解各种潜在的动因和动向，以便作出决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别注重搞秘密活动。他已然忘记，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经谴责过秘密外交，而且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至1918年2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陆续刊登了前外交部档案中的100多份秘密文件。斯大林本来就热衷于搞秘密活动，所以对他来说，外交也不例外。

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他能够依赖。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汪洋大海中虽是一座大岛，但是一座孤岛。除非东面的蒙古……不能让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强盗串通一气反对苏联，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难怪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就要承认它有灭亡的可能……沙皇们好办——斯大林这样想，随手把那本外交史放回原处。君主们之间容易达成协议；他们相互联姻，召开外交会议，共同反对革命……而现在面对的是扬言只要杀光几百万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就可以消灭共产主义的希特勒……

的确，斯大林曾多次想过让美国来扑灭正在燃烧的世界战火。但是，战争爆发前他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步骤来安排同美国总统的建设性接触。一方面，这表明斯大林对大洋彼岸的这个庞然大物十分不信任；另一方面，斯大林非常怀疑美国当时是否能在欧洲切实地做点事情。然而，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一封信却很感兴趣。罗斯福在1939年4月14日的信中建议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到谈判桌旁来解决一切争端。罗斯福主动表示愿意“从中斡旋”。他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在10年（或者25年）之内不进攻他在信中所提到的欧洲和近东地区的30个（！）国家[15]。的确，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倡议既怀疑，又吃惊。在同莫洛托夫一起讨论美国总统如此出人意料的举动时，斯大林说道：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指望别人哪怕是讨论一下这些建议。希特

勒决心不顾一切地蛮干下去，现在很难让他停下来。”

莫洛托夫回答：“但这一举动是高尚的。当然，和平还没有到来，也就无法估价这一举动的作用。”

他们就罗斯福的信交换了意见，决定公开表明他们对信的态度。于是立即起草了一封致罗斯福的电报，署名米·伊·加里宁（当然，他只是挂名，根本没有参与）：

总统先生：

我认为应当高兴地就您向德意两国政府发出的高尚的呼吁向您表示衷心的支持和真诚的祝贺。可以相信，您的倡议会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真诚关心保持普遍和平的各族人民心中引起最强烈的反响。

加里宁

1939年4月16日[19]

然而，在1939年6月30日罗斯福接见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乌曼斯基时，总统却只是一般地表示希望在英法苏三国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斯大林看了乌曼斯基发回的电报，电报中说：罗斯福“不肯利用他所拥有的精神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影响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便影响他们的外交方针”[20]。斯大林把乌曼斯基的电报放在桌子上，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每个人首先想的是自己。”他本人也是如此。在这个尚未意识到全球问题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又彼此隔绝的世界群体中也只能如此。在那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时代，认为全世界应该在彼此间保持紧密联系，并把全人类的问题看得高于阶级间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看来是不现实的。

要指出的是，虽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是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但这些问题往往事先已在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交谈中“研究”过了。有时他们也会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军事侦察机关的专家来研究一些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但是，大的决策都由斯大林一人来定，他只是参考外交人民委员的意见和建议，而后者的看法最初往往并不与斯大林的意见合拍。

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过，他曾多次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他的亲信

一起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朱可夫说:"我曾有机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争吵,看到莫洛托夫在一些问题上尤为固执;有时惹得斯大林提高嗓门,甚至发火,而莫洛托夫却微笑着从桌旁站起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莫洛托夫讲述的同希特勒分子领导人几次会面的情况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人民委员会主席本人只会见过里宾特洛甫。他经常在小范围内称希特勒及其周围一班人为"一群骗子"。据德国外交部法律司司长冯·豪斯证实,甚至在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也要不失时机地用无异于"欺骗"一类充满恶意的字眼来攻击德国代表团。所以,在签订条约时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进攻我们。"斯大林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证明他对战争会推迟爆发的推测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独裁者,所以他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曾几次回过来谈希特勒。

在同希特勒分子的关系上,斯大林几乎不掩饰自己在玩弄权术。莫洛托夫对Ф·丘耶夫讲过,当条约签订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起盛着香槟酒的杯子不无讽刺地说:

"为新的反共产国际分子斯大林干杯!为德国人民的领袖希特勒的健康干杯!"

当时,里宾特洛甫立刻奔向电话机(谈判是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进行的)将签订条约的情况和斯大林的话报告给在柏林的希特勒。接着,里宾特洛甫又高兴地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啊,我的大外交部长!你不知道你的功劳有多大!请代向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先生表示祝贺!"

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后转过身来,令人不易察觉地向莫洛托夫使了个狡黠的眼色。

两国首脑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斯大林认为希特勒是个冒险家,而希特勒也把斯大林看作"布尔什维克恶魔"。

斯大林的藏书中有马基雅维里的一些著作。从他在《君主论》一书的页边上所写的批注可以看出,"领袖"熟知这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的名言:"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认为,既然希特勒使用骗人伎俩,他们就可以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计划,目的只有一个:使与德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

爆发。

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斯大林的其他战友看起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有时,日丹诺夫倒还能发表一些相当独立的见解,尽管也有局限性。而总的说来,所有重大的政治决定都带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领袖”并不懂得康德的哲学,但却信奉这位德国思想家的箴言:“要勇于运用自己的智慧。”无论当时对外政策中的成功还是失利,从根本上看都受制于斯大林的政治立场、他看问题的特点以及他头脑中产生的那些念头和计划。看来,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远瞩。斯大林丧失了预断未来的能力。

在此,我必须再谈一下那些由个人作出的决定的根源。民主并不是一种陈设。要么就实行,要么就不实行。实行民主时,人民和他们的全权代表能够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不实行民主时,则由少数几个人作决定,或者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由他自己作决定。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曾经谴责过在重大的外交和内政问题上的那种专制的决策方法,但后来一切又逐渐恢复“原状”。其中许多决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

大约10年前,我国的语言中又多了一个常用词——“阿富汗”。这个美丽的山国从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起,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是我们的朋友,而现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们的灾难的代名词。和过去一样,那些作出决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责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寿终正寝仍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而我国将近15000名青年却阵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马扎里沙里夫的山谷和沙漠中。这项外行的、欠考虑的、轻率的决定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参与过这件事吗?这项决定由真正的权威的专家讨论过吗?当初预料到我们介入这个国家的事务的后果了吗?我曾多次去过阿富汗,在我国军队开进阿富汗以前也去过。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们并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剧不仅表现了政治上的轻率,而且说明在采取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没有采取民主方式。我们生活中的这一事实本身告诉人们,任何解释都开脱不了那些幕后决策者的责任。历史是不承认幕后活动的。斯大林的个人专权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说这些题外话并不是为了“刺激”什么人,而只是想提醒人们: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权(残暴的、软弱无力的,或者“仁慈的”)不仅是对人民的侮辱,而且势必产生往往是悲剧性的错误。

看来，有三次政治行动应当算作斯大林外交在战前采取的重大步骤。第一次行动是1938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补充一些细节。斯大林当时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苏联的谈判态度冷淡，他看不到谈判有成功的可能性。斯大林忍不住了，又想不出好办法。根据他的提议，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示意，有必要重新考虑柏林方面提出的关于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而几个月以前斯大林曾对柏林方面的上述建议报以沉默。希特勒当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于是双方便开始了频繁的电报"交火"。但莫斯科方面却过于小心谨慎，认为必须考虑周密。只是看到同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和杜芒克将军的代表团进行的谈判已经毫无指望，斯大林才下了决心迈出这一步。当时正同里宾特洛甫一起在奥伯尔扎尔茨堡的希特勒已经等不及了。他需要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可以使他腾出手来。而俄国人仍试图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协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希特勒当时放下架子，亲自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他于8月22日，至迟于23日，紧急接见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假惺惺地写道："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确立德国的长期政策。德国从此将恢复过去若干世纪中对我们两国都属有益的政治方针……"[19]

8月23日，两架"兀鹰"式大型运输机将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代表团运抵莫斯科。顺便说一下，由于飞行航线上的对空防御设施配合不当，飞机在大卢基地区上空曾遭遇高射炮火袭击，只是幸亏没被击落。当时曾在向德国的"兀鹰"式飞机开火的那支部队服役的利奥库莫维奇向我证实了这个事实。自然，一个由内务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庞大的调查组当天就从莫斯科飞抵该地区，他们要弄清是谁策划了这起"挑拨事件"。要是23日条约签订不成的话……而在前一天，希特勒把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召集在一起，宣布即将出兵波兰。英国人和法国人似乎对斯大林签订条约起了促进作用，虽然是斯大林本人缺乏耐心，想不出办法，没有远见。他不明白，当时更需要


斯大林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

缔约的是希特勒。条约使苏联赢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再说一遍，莫斯科的这个不得人心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而作出的。

当然，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波兰和法国的军队都已全军覆没，而英国的远征军也已被打败。这时，几乎整个欧洲都在为希特勒效力。我们是一对一地对付德国，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战斗，战斗，同时等待第二战场的开辟。西方国家不愿意在1939年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本该提早开始"工作"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才建立。

斯大林清楚地记得他同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午饭后的那次长谈。这个瘦瘦的高个子德国人向斯大林暗示，希特勒想腾出手来应付西欧可能发生的战事。斯大林一边听着德国外交部长的话，一边想着心事：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时间。国家和军队还没有作好打大仗的准备。如果这个条约能够缔结成功，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就不会形成。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当天晚上进行谈话时（谈话结束后便签订了条约），斯大林认为国家得到了三至四年的喘息时机。但是，斯大林当时就感到，在这个复杂的、动荡的世界中实行中立政策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在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苏联的许多朋友看来，这种奇怪的中立好像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单方面的。斯大林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以后能坚持住，他现在需要和平。因此斯大林便采取了"秘密条约"时代的做法。我所说的还是那些"秘密议定书"，即苏德条约的附件。我很想从几个方面再谈一谈斯大林的这一做法。

第二次重大行动是将苏联的国界继续向西推移，对于这次行动，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我认为，在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之前，为了保护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居民而作出的这个决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符合这些地区劳动人民的心愿。可悲的是，这一行动（它宣告废除1921年的苏波里加条约）是以斯大林同希特勒就未来边界和领土"调整"达成秘密协议为条件的。也许这的确是一次妥协，就像当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一样？然而，列宁是通过公开的斗争而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当时对这一协定既有人拥护，也有人反对。列宁指出：我们签订了苛刻的和约，但我们并没有"越轨，没有破坏或损害社会主义政权……"[23]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就未来的边界和各自的利益

范围而达成的协议。我很想援引一些可以证实斯大林和希特勒有秘密协议（至于他们的协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这并不重要）的文件。1939年9月10日，贝利亚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份报告：

"由于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边防部队的部署即将改变，苏联国境线上这两个军区部队的防线的长度（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已从1412公里扩大到2012公里，即扩大了600公里。"因此，贝利亚建议成立由五支边防部队组成的西部边防军区。[20] 苏联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以后，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就根据显然是双方在八月份的谈判中已经商定的秘密地图来确定。下面这份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德国驻莫斯科武官凯斯特林格将军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部：

1.请转告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我于22时30分收到本国政府的答复：经过双方谈判，德罗戈贝奇市已于今天——1939年9月24日18时十分顺利地移交工农红军所属部队。

2.同时，双方商定，桑博尔市将于9月26日清晨进行移交。我再说一遍，谈判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麻烦。整个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感到非常高兴。

3.我认为有义务告诉你们，德罗戈贝奇市内有一些大型储油罐已经燃烧10天了，这是我们从我们飞行员的报告中得知的。当地流传着一些恶毒的传闻，说这些储油罐是德国人烧的。请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换了我们也很需要这种东西。

4.关于车辆的问题（这个问题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是知道的），我们已按议定书中所说的做了。我如此急切地要转告你们的就是这些。

凯斯特林格

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副官

团政委**莫斯克温**签收[21]

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类似的文件。不过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斯大林认为应当在所有这些"细节"上达成协议。看来，还有另外一些"细节"，其中有些至今才为世人所知，例如，把几批在30年代曾遭到

镇压而且仍在侦讯中或监禁中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希特勒。在舒伦堡同莫洛托夫举行八月会晤时，这位德国大使曾几次提出关于“在苏联被捕的德国公民”以及把他们交给德国的问题[15]。在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尤其是缔结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后，希特勒是不难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的。而这样做在多数情况下是违背那些被捕者的意愿的。[16]这一切分明是列宁谴责过的那种无耻的“秘密外交”。

我已经说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民已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国家处于德国和苏联之间。长期以来，统治集团一直在看风使舵，看怎样做危害最小。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普通人的意志，他们忘不了20年前是谁扼杀了他们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情况愈来愈明显，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落入希特勒手中。

英国在三方谈判中拒绝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这无疑说明，从法西斯德国的计划来看，希特勒将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国家。经过谈判，苏联于1939年9月28日同爱沙尼亚缔结了互助条约，又于10月5日和10日先后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时维尔诺市和维尔诺边疆区已划归立陶宛)缔结了同样的条约。显然，斯大林在战



1939年10月，立陶宛外长乌尔布希斯在把维尔诺和维尔诺州归还立陶宛的条约上签字

争爆发前设法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时,并不十分关心敏感的民族问题(而且他也不善于考虑这些问题)。他的许多做法是粗暴的,甚至带有侮辱性。

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强使苏维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脱离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不可避免的德国入侵的危险时刻,苏联的帮助和1940年接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按照斯大林(也不仅是斯大林)的看法,既完全符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全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参加了苏联分别同每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就缔结互助条约而举行的各次谈判和条约签字仪式。他亲自参加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这些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斯大林外交的其他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步骤中,还应当提到苏联政府在1940年6月26日的照会中表达的对罗马尼亚的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因为比萨拉比亚是被强行夺走的,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干什么事时不带来损害甚至灾难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斯大林了。在已经归复的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以及摩尔达维亚,马上便开始"筛出敌对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商人、原白卫分子、彼特留拉分子以及一些只是"值得怀疑"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过那条人所共知的悲惨路线——翻过乌拉尔山,去西伯利亚。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我已经谈过,在我同弟弟、妹妹及母亲一直住到战争爆发的那个西伯利亚村庄里,设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大劳改营。它是在1937年用几周时间建起来的:场地很大,四周围着大栅栏,上面加了铁丝网,岗楼上站着哨兵,"犯人"一队队的,而且在不断增加。劳改营里的生活大致就绪以后,便解除了对一部分囚犯的看押,甚至允许他们在村里散步(跑是跑不了的:距铁路有100多公里远,其间都是原始森林,到处都有警卫)。母亲在一所七年制学校当校长。在校学习的是劳改营看守人员的子女。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两个囚犯被派到学校来整理旧图书。其中一个叫胡杰尔斯基,他自称是"从华沙附近"来的,另一个人的姓名我不记得了。胡杰尔斯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伴一起把图书整理得整整齐齐。母亲常给他们带些土豆、牛奶。我记得

胡杰尔斯基讲过，他所以会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有钱人。这个老头总是一个劲地向母亲解释说，他根本不是有钱人，是搞错了……可眼下竟被判了10年……冬天他已经不在了。老人没能经受住劳改营的磨难。经历了这种遭遇的人有多少啊！……

斯大林力图用经济、事务和边界等方面的协定来加固苏德中立协议的地位。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斯大林生性极好猜疑，柏林的一些举动竟未引起他的警觉。例如1941年1月，德国人拒绝签署长期的所谓"事务性协定"，将该协定的有效期仅仅限制在1941年。可是斯大林曾被告知，在缔结苏德伊戈尔克河至波罗的海一线之间边界的条约的前夕，德国官员主动作出让步，没有为每一座"山丘"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在边界问题上是经常发生的。《真理报》的社论兴高采烈地指出（而不是有所警惕），"边界条约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先例的极短时间内缔结的"。

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本来应该意识到，德国人之所以不重视边界问题，是因为这些边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临时性的。从与"巴巴罗萨计划"同时制定的"奥登堡计划"来看，帝国未来的边界应当向东大大推移。元首关于"生存空间"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然而，斯大林缺乏真正的雄才大略，不能对这样或那样类似的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他已经完全被他所作的关于德国未来的进攻时间的错误推测所左右。斯大林在把苏联的边界向西推移后，没有对随之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要知道战争，或者说斗争，一向是至少由双方参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敌对的一方必然力图使自己的对手产生错觉。

最后，在这几年里还有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进行的，即缔结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3月底，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苏日之间的第一轮谈判没有取得成效，原因是日方坚持要苏联将萨哈林岛卖给日本。斯大林参加了谈判，他长时间默默地听着日本外相的发言，而后用一句简短的话回绝了外相的要求："这不是开玩笑吗？"谈判似乎已经破裂。松冈冷淡地告辞后便动身到柏林去了。4月8日，日本外相从德国返回莫斯科，再度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从各方面情况看，条约将无法缔结，因为日本人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然而，这一次斯大林的强硬态度起了作用。松冈于4月13日，即他离开莫斯科那天，收到了来自东京的新指示，他终于收回了不合理的



* 孙科当时为国民党立法院长，受命到莫斯科同苏方交涉有关事宜，当时中国驻苏大使是杨杰。

——译者

苏日中立条约

日本于1939年5月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蒙坎事件，遇苏蒙军队沉重打击，使北进计划无法实现，遂于1940年10月30日向苏联提出以取消日本对库页岛北部的权益作为缔结中立条件。1941年4月1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条约。条约有效期为5年。核心内容有一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1945年4月5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这一条约。

要求，于是当晚苏日中立条约便签署了。这个条约使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态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日方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不过，这项条约的签订也给苏联带来不少麻烦。例如，中国政府早就明确地反对这种做法。还在1939年8月27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副外交人民委员索·阿·洛佐夫斯基曾接见中国大使孙科*（应他的请求）。中国大使坦率地说道："有两个问题使我们感到不安：(1) 据说苏联同日本之间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2)据说日本同英国之间可能会达成协议。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对我们不利。如果苏联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势必会削弱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洛佐夫斯基就这种担心作了答复：

"至于日苏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苏联曾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日方拒绝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⑱]是的，一年半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斯大林感到战争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便马上设法缓和东面的紧张局势。

在最后这五年里，苏联同日本发生了连续不断的冲突，如一些很厉害的摩擦，经常互致言辞激烈的照会，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较大的冲突有两次，一次是在哈桑湖附近，另一次在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斯大林在参加条约的谈判和签字仪式时可能会想：政治真是难以逆料。苏联曾经多少次建议日本缔结这样的条约啊！1938—1939年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显示出来的苏联军事实力使日本人明白了用

武力同我们对话是行不通的。

斯大林好奇地读着条约俄文本上两位日方全权代表的签字：

日本外相，位列三位*，一级瑞宝勋章获得者，松冈洋右。

* 国家高级官阶。

日本驻苏特命全权大使，陆军中将，位列三位，一级旭日勋章和四级金鸢勋章获得者，建川美次。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却又如此各不相同！然而事实表明，由于国家的军事实力起到了威慑作用，当时才能够在某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人类用了多么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个简单道理和必然性啊！

条约签订后，双方代表团像以往一样合影留念。然后，斯大林单独和松冈一起半拥抱着照了相。照片上，斯大林脸上露着满意的神色，因为“这是避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重要步骤”。松冈也是喜气洋洋：居然能同一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如此亲热地在一起！这位瑞宝勋章获得者在签署条约以后认为，这样日本可以在“大东亚地区”放开手脚去干了。松冈是根据早在1927年由田中义一呈报裕仁天皇的那份著名的奏折的原则行事的。奏折把分阶段占领“大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目标。斯大林是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计划的。但他在此时此刻也别无选择，因为一提到希特勒他就感到头疼。为了削弱日本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野心，和松冈拥抱一下也是可以的。

晚上，松冈乘夜车启程回国。差几分钟就要开车的时候，斯大林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亲自来到车站同松冈道别。这一举动使日本外相十分吃惊。苏联领导者同日本人一

田中奏折

2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两大政党之一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是一个狂热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者，他担任首相时，3次派兵入侵中国山东省。在任期间完成了侵华战争基本策略。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身为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并以训示的方式做了总结报告《对华政策纲领》。据说会后他写了一道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即后人称之为田中奏折——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



田中义一

一握手,并再次表示将重视已签署的条约以及同时通过的关于彼此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斯大林还抽空向为松冈送行的德国外交官员客套了几句。斯大林知道国家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只要有利于遏制战争势力,无论同什么人交谈、会面或者为其送行,他都不在乎。

尽管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但斯大林看出,战争的阴云正在密集。他明白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又不愿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一直沉迷于这两种假设,他总是反复地说:"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不要理会他人的挑拨!"柏林方面终于摸透了斯大林要赢得时间的方针,开始变得更加猖狂了。例如从1941年初开始,先后有几十架德国飞机连续不断地侵犯苏联边界,愈来愈深入苏联领空。即使飞行员遭到迫降,也总是很快就连人带飞机交给德方。有一回,那是在开战前不久,我国边防军击落了一架侵犯我国边界的德国侦察机,两名法西斯飞行员也一同丧命,斯大林下令处罚了肇事者,还往柏林发去一封电报:"斯科尔尼亚科夫:请立即拜会戈林,并就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歉意。"[26]

由于没有希特勒的帮助,墨索里尼自己未能在巴尔干站住脚,于是便向元首求援。元首以意大利军队要完全服从德国军事领导机关的指挥为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希特勒军队着手集结准备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时候,南斯拉夫向苏联提出了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于4月5日缔结。斯大林想以此告诫柏林最好不要把战争扩展到巴尔干半岛。但希特勒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侮辱斯大林。他完全不理睬"莫斯科的信号":条约签订后不几天,德国军队便进犯南斯拉夫。元首对斯大林作出的姿态根本不理会,就像不理会斯大林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那样——1941年1月17日斯大林曾提醒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说苏联把巴尔干半岛东部视为自己的安全区,它不能不关心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柏林对所有这样的外交姿态似乎都不放在眼里。

苏德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一点斯大林早在1940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的警惕性提高了。但这并未影响元首的计划。在此应当提一下,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诡诈多变,两面三刀。并非斯大林一个人喜欢搞秘密活动。马

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尝试过了。在他的行为和方法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背信弃义。元首经常采用造谣、欺骗等手段而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早就宣称良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便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喜欢到国外去。许多年来,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和索契这几个地方。莫斯科决定由莫洛托夫出访。临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贝利亚在夜里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干什么?用什么办法能使条约"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是两年?

在柏林车站,前来迎接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莱伊、希姆莱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员,莫洛托夫满耳听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视这次会面。还说,在英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国的友邦"商谈。柏林方面想给强大邻邦的领导人吃定心丸,使他们放松警惕。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左一坐者)同希特勒(中间坐者)在柏林会谈

我再提醒一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判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大谈"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灭亡"在即,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装出一副对德国的全球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坚持要求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在德国军队即将撤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另一些德军却待在芬兰不走?为什么让匈牙利参加三国条约?……元首失去了信心。他无论怎样也不能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苏德关系。谈判中,双方各唱各的调,或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着柔软的地毯脚步轻缓地走到新帝国大厦大厅门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苏联外交人民

委员的賂聘：

“我知道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斯大林。但是，它也会记住我……”

“是的，当然会记住，”莫洛托夫依旧冷淡地、毫无表情地答道。

会见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国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这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晚一些爆发。难怪，当莫洛托夫离开德国后，希特勒便下令尽快将修改后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呈报给他。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21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还不知道，元首打算“通过装甲部队迅速向纵深楔人的大胆行动，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敌军有战斗力的部队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22]。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莫洛托夫对此也毫无察觉，他认为，战争也许将要爆发，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苏方遵守苏德条约的情况。在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苏联的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论述条约意义的文章。而德国人对这个日子却无所谓。但是一个月以后，即1940年9月28日，正值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柏林为此搞了庆祝活动，然而庆祝的方式十分特别。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苏联全权代表发回的密码电报后，越发对纳粹分子的肆无忌惮感到吃惊。9月27日在新帝国大厦大厅里签署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条约。这份文件强调指出：

> 三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
> **第一条** 日本承认和尊重德国和意



希特勒与德军将领制订巴巴罗萨计划

巴巴罗萨

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21号训令即“巴巴罗萨”计划。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的入侵，成为他向东扩张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希特勒私下里对他核心圈成员说：“我们将摧毁苏联。”

希特勒的最高机密21号命令成为入侵的最后计划，他为这次行动取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以12世纪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巴巴罗萨”来命名，腓特烈一世在同斯拉夫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死于一次攻打圣地的十字军东征。

“巴巴罗萨”要求集团军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进攻。

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请来莫洛托夫一起商讨这一新情况。也许,在这种危急关头能够考验出一个领导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确的结论了。可他们还是犹豫不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过两三年。"斯大林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事态可能如何发展的模式仍没有改变。这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特点在"领袖"的每一个决定上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邀请军方人士和外交人士来集体讨论问题。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明白,一切讨论都不过是对他的意见进行猜测。他在自食着个人专权的苦果。他苦心经营的官僚系统只会迎合他的决定……据朱可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前来谈话的他的机构的两名负责人不客气地说:

"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当时的档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些人总是同"领袖"保持一致而极少提出什么意见甚至小的建议,如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尔巴科夫等。比较其他人来说,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还能常常提一些建议,哪怕是谈一点看法。由1939年3月22日中央全会选出的这一届政治局(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于1941年2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已完全成为个人专权的机构。斯大林在终于获得了无限权力(这是从人民那里夺来的)以后,便再也没有途径和办法来汲取精神"营养"了。这些人不同他争论,很少向他提建议,总是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对斯大林来说,他们不过是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仅此而已。

然而"领袖"无人可以责怪,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颜婢膝,他说什么都是一味称是,这种现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当时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回忆录证明:实际



皮·赖伐尔(1883–1945)

法国总理,民族叛徒

1903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20年退出,成为右翼政治家。1925–1939年历任公共工程、司法、劳动、外交部长等职,任总理和外长期间,曾签订《法国和苏联互助条约》,同时积极推行绥靖政策。法国沦亡后,1942年出任总理,一直左右贝当政府。1943年通过"义务劳动制",将75万法国工人强制送往德国服苦役。1945年10月15日被法国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处决。



赖伐尔与希特勒

上谁都不怀疑斯大林具有远见卓识。甚至当他在战争前夕作出的决定与实际情况相违背时,也没有人想过是斯大林错了。人们只是认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关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9]

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较少从事外交活动。因为周围的敌对国家,充满戒心的另一个世界,难以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不过,斯大林也很难同它们打交道。然而,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所与世隔绝的房子不时有这个或那个"小窗口"微微打开,使人可以张望一下苏联,打上几句官腔,或者试着同"赤色分子"谈一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是最早同斯大林谈过话的资本主义活动家之一。当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于1935年5月2日在巴黎签订后,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见了赖伐尔。"领袖"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听他自信地谈论"法国的国防政策",说法国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开信任之门。斯大林当然不会知道,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将要背上为希特勒效劳的可耻罪名的"卖国贼"。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会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埃·贝奈什。苏联领导人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贝奈什并没有着重去讲前不久缔结的苏捷互助条约,而是大谈"各民族应当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相互接近,应当加强思

想上的联系”。

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报界人士常常会给斯大林留下印象，尽管他极少接见他们。即使接见，往往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记得，美国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曾连珠炮似地向斯大林提了许多问题。而苏联领袖就如下问题所作的答复也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你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这是不能预言的。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优点。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弱点……”

由于斯大林很少会见国外的外交家和外国记者，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成了一件大事。据一些参加过会见的人介绍，斯大林在谈话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偶尔也打一下手势或眯起他那双有神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任何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会见，斯大林通常都要在谈话结束时简短地总结一下。葛罗米柯记忆中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人[⑱]。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两个月里，斯大林得到了不少消息和各种情报，说德国正在明目张胆地准备进攻苏联。侦察部门、外交官以及苏联的一些朋友都在不断地发出警告。有些消息来自美苏两国政府。1941年4月，当上了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特意写信告诉斯大林，德国军队正在大批地调往东部。斯大林仔细看了这份情报，但他以为英国首相是想让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于是便索性置之不理。

当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那些零星消息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材料的时候，苏联政府打算看一看柏林对这些事实作如何反应。作为试探，苏联决定发表一项塔斯社声明，直言不讳地指责德国没有遵守条约中的条款。斯大林本人赞成这样做。1941年6月14日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可悲的塔斯社声明，实际上是呼吁德国同苏联就双边关系问题重开谈判。顺便说一下，在这一天，希特勒同他的军界领导人最后一次开会研究如何开始具体实施“巴巴罗萨”计划……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进行谈判，那就可以把

谈判拖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今年进攻苏联的问题了。斯大林不无根据地认为:在夏季末,尤其是在秋天,希特勒是不敢发动战争的。这就意味着苏联至少将会得到7至10个月的准备反击的时间。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斯大林想的已经不是战争还能推迟多少年,而仅仅是还能推迟几个月。1942年8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同英国首相谈话时说:“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争将要爆发,但我认为我还能赢得六个月或六个月左右的时间。”[19]

塔斯社的声明谈到,英国的报刊,也不仅是英国的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附近,准备发动进攻”。声明接着指出:“尽管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仍在被不断地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还说,从苏联掌握的材料来看,“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

战后,某位苏联上层人物就发表这样一项令人奇怪的、使苏联人民受到蒙蔽的塔斯社声明进行解释时说,这是一次很平常的“外交试探”。就算是这样,是一次对潜在敌人的试探。但是,千百万苏联人、陆海军全体官兵无疑也看了这项声明!如果这次试探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不通过内部公务渠道至少向高级指挥人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各军区的领导人把问题说穿呢?著名军事首长列·米·桑达洛夫回忆说:人们对声明理解得很绝对,“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20]

这一切都是由少数几个人而且往往就是由一个人在没有对所有并发的和派生的现象进行必要分析的情况下作出决定造成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正相反:柏林根本不理睬塔斯社的声明。与此同时,习惯于对一切都坚信不疑的苏联人却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不大可能马上爆

发。看来,斯大林在战前最后几个月里过高地估计了外交的作用。当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希特勒显然在把战火烧向东方,斯大林却依然迷恋于塔斯社声明以及一份份的照会和信件,没有下决心尽快地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要斯大林放弃秘密的、讨好希特勒的外交活动而采取坚决的军事步骤,当时非常困难。

莫斯科在紧张地等待着柏林的反应。但苏联大使馆发回的密码电报说:德国官方人士对1941年6月14日的塔斯社声明根本避而不答。对于苏方曾就德军飞机侵犯苏联国界一事发出的照会,柏林官方并未作出反应。于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就这一事件约见了德国大使,并请他说明柏林对塔斯社声明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与此同时,苏联全权代表也在德国首都设法求见里宾特洛甫。一切都无济于事。柏林早已作出了选择。那个"X"日子已经临近。在可怕的入侵到来之前的最后日子里,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在幻想着能够听到柏林方面关于信守苏德条约中各项条款的保证,却不知道希特勒刚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密信,谈了他的"消灭俄国的计划"。下面我从法西斯元首这封信中摘引几段话:

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经常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给您写这封信的……至于对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我毫不怀疑它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我希望,那时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长期为我们提供粮食的共同基地。领袖,不管现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得到改善。即使到今年年底时我不得不把60或70个师留在俄国,这个数字也只不过是我目前应当经常保持在东部边境的兵力的一部分。

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本性、我的思想观念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阿道夫·希特勒

1941年6月21日

甚至到了最后时刻,德国战争机器的弹簧已经按压到了极限,马上就要作命运攸关的一跃了,斯大林仍然存着一线希望:这场可怕的冲突能够推迟(哪怕几个星期!)。然而柏林方面毫无反应。他们主意已定:摆弄外交姿态的时期已经结束。用战争对话的时期开始了。

致命的错误

战争之门随着战争的临近似乎开得越来越大了。入侵开始时门户是很大的:从北冰洋到黑海。已经没有办法把大门紧紧闭上了。斯大林到最后时刻仍然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还在一个小范围内说:

"看来,明年(即1942年。——本书作者注)5月冲突将不可避免。"

但是厄运难逃的一天越是临近,下述一点也就越来越清楚:战争迫在眉睫,而国家和军队却还远远没有作好同希特勒进行决战的准备。尽管应当指出(何况人们有时还忘记这一点),战争前夕做了不少工作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例如,按照1941年5月13日即在斯大林那里召开会议之后发到军队的总参谋部的专门训令,内地各军区的大批军团和兵团开始开往边界地区(第16、19、21、22集团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1年6月21日的决议,这些军团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组成统帅部预备队。但是,有一些军团自然未能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到达指定地区[38]。

斯大林考虑到一触即发的形势,同意军事院校的学员提前毕业。年轻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照例不休假就立即前往部队,那里非常缺乏他们这样的人。斯大林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某些大规模的行动,如征召近80万"预备人员",使边境几个军区的21个师得到了补员。遗憾的是,这些步骤仅仅是在战争爆发前的2至3周内才采取的……

国防人民委员于6月19日向部队发布命令,要求把机场、车库、基地、仓库等加以伪装,把飞机在机场上分散开来。但是命令刚刚开始执


莫斯科的防空兵

行，就……集团军野战指挥所也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开始挪出去。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无可救药地姗姗来迟。而即使是这些措施斯大林也很不乐意采取，他老是强调自己那个固执的念头，说什么所有“这些步骤会把德国军队挑动起来的”。为了得到斯大林对技术性措施的批准，铁木辛哥、朱可夫有时候不得不就某一个问题向斯大林报告两三次。人民委员会主席虽然同意这些军人的看法，不过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甚至相信，希特勒不敢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明白，真正的第二战线的西方并不存在！斯大林在多次讲话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同一个思想：德国人应该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是极不理智的。不过极不理智也可能成为现实。须知历史的发展主要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没有终极的螺旋形上升。斯大林按照显然是直线的单维的逻辑看问题，是大错特错了。然而谁也不可能产生去纠正“领袖”的想法，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一贯正确”。

斯大林在1941年6月是否明白，他同他周围一班人近几年来在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犯下了严重的失误？对这一点只能猜测。尽管后来在与丘吉尔、朱可夫的谈话中，而且在战后，正如我们所记得的，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各方面军司令员时的讲话中，他鼓起勇气概括地谈了政府所犯的错误和失算。不是他，而是政府！但是，即使在这些场合，斯大林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这首先是他本人的错误。这一点他早已不能做到了。

错误产生的根源不仅在于不正确的推测、未经证实的预报和侵略者的暗算。这一切当然存在。但是失算、错误、不可饶恕的失策的主要原因，我再强调一遍，就在于个人专权。当“一贯正确和英明的领袖”这一形象已经确立之时，很难去责怪人民委员们和总军事委员会。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个思想观点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对台戏”、“政治上幼稚”，并遭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大家

对一些政治审判案都还记忆犹新，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什么都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的立场；假如认识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雅·彼得斯，那就意味着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在国外同官方人士会晤，那自然就是"传递情报"，如此等等。

从主观上说，虽然斯大林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标，但是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认识却没有经过集体智慧的深思熟虑，不是把各种观点加以对照的结果。由于"领袖"搞个人专权、"一贯正确"、作结论武断，就不自觉地堵塞了言路，没有人向他提供客观的报道、独到的建议和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案。人们通常只向他讲他愿意听的东西。经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决定的制订和通过没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经过真正的集体讨论，这就损害和限制了权力机构的才智。

为了迎合"领袖"，人们众口一词，说"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说"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向在增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困难"会从内部动摇这些国家"。报刊这样写，电台这样广播，理论家们这样反复宣传。例如，斯大林深为器重并不止一次地与之谈话的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1941年4月17日在列宁军政学院作报告时断言，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换言之，战争将长时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个参战集团都无法战胜另一个参战集团"。瓦尔加断言，苏联的利益"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维护和平"。接着院士得出了一个纯属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但既然这不是托洛茨基说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没有反驳)："如果局势发展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战争而发生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政权被削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那么苏联就应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33]

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显然过高估计了苏联和红军的力量，使人"认得出来"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情绪——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应当说，即使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有头脑清醒、敢于讲话的人。例如1940年，列宁军政学院的一批学者起草了一篇报告《论军事思想体系》(斯大林也曾看过)。除那个时期的传统论点外，报告还大胆地阐述了一些"犯禁的"问题。报告的作者们尖锐地提出了苏芬战争失利的原因问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低下，虚假的宣传(如红军"不可战胜"的口号)，以及"不正确地阐述红军的国际主义任务"。报告强调指出："当时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说什么同苏联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居民必然会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起义,转向红军方面。"老讲"不可战胜使得人们变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轻视军事科学;在技术方面则导致落后,在军事理论方面则导致只研究一种战斗形式而偏废了其他战斗形式"。报告的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涉及技术威力的问题上,我国的宣传走上了"盲目轻信胜利的歧途"。不能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不应当把在一定条件下的退却视为耻辱,应当教会人们不仅懂得进攻的艺术,而且懂得在必要时有组织地退却。"应当"从当代现实使军事面临的新情况中更灵活更迅速地作出结论"。报告指出:"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一事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所有的俄国将军在不久之前统统被认为是笨蛋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红军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经验"不为指挥干部所知。有关这些战斗的材料弃置在总参谋部里不用"。35页篇幅的报告不仅批判地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和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是"领袖"的批示却相当简短:"存档。[9]"报告的作者们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未必会喜欢这个报告。

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战争初期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误,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个人。战争前夕政治领导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么呢? 它们表现在何处?

首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1939年9月28日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个月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看来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步骤(没有"秘密议定书"),当时本应到此为止。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法西斯主义被公正地认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最危险的队伍,是恐怖专政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在苏联人的世界观中,法西斯主义乃是阶级敌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义讲"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无原则地堕落到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主义粉饰的地步,人们很难对它作出解释。期望通过贸易协定、业务往来、经济联系等等来巩固互不侵犯

条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实际上否定自己原来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观点的做法,这就太过分了!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参加了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德国的兼并计划没有受到苏联政府方面应有的评价。例如,就在同一天签署的《苏德政府声明》中说:苏联和德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同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会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138]。但是人民有权提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容忍德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吗?处于一片废墟的波兰会同意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双边协定吗?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努力使苏联免遭战火方面走得太远了。何况这些原则性的让步并没有为条约增添什么内容。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而使苏联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受到顽固坚持自己片面论断的莫洛托夫的极大影响。外交人民委员的一系列声明纯粹是给苏联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制造思想混乱。例如,对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许的报告的论点该如何评价呢?

> 德国目前成了一个企图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139]

诸如此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方向的做法使人们莫名其妙,使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变形。此外这些论题再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视和他们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仅仅因为怀疑思想"不纯"就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去见死神或关进劳改营的独裁者,在同法西斯主义"握手言欢"时却表现出惊

人地界限不清。尽管共产国际中的许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变的原因,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影响共产国际的正式立场。1941年6月以前,共产国际一直不同意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国家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评价。批评的锋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帮凶"。"结束战争"的口号也是无的放矢。不明白怎样才能"结束",是在实际上同意希特勒占领足足半个欧洲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释。

"法西斯主义"一词曾一度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语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满意的。难怪在互不侵犯条约刚一批准后,元首于1939年9月1日就在国会中宣称:"条约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书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此所说的每一个词。"[137]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火的愿望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则性让步却不只是给我们的国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乱。更重要的是,苏联不断表示中立,无意中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国家和军队中的鼓动员处于很难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集团军一级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0246号训令中向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138]最后一句话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

"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

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

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

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

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

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5365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59]

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1939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60]。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

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

到1940年8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10月5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

"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10天再向我报告计划……"

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1940—1941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

"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

《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57个师,第二梯队有52个师,预备队则有62个师)。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

原书缺页



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夕



斯大林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的三位军事统帅

这里我应当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文件。朱可夫是一个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德国军队由于首先发动突击，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经过思考、犹豫以及同铁木辛哥交谈之后，他于1941年5月15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
>
> 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设想。
>
> 考虑到德国目前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总动员的状态，有广阔的后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们先展开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为了及时防止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让德国统帅部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要赶在敌人前面先展开军队，并且在德国军队还处于展开阶段、尚未来得及组织战线和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的时候向德国军队发起冲击……

接着朱可夫确定了第一个和下一个战略目的，这是粉碎德军战线中段和北翼的主力[59]。

这位后来非常闻名的伟大卫国战争统帅在战争开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办法：向已经作好冲刺准备的德国军队发动突击。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上很机智的建议。斯大林在文件上没有留下笔迹：那个时期，"领袖"非常谨慎和慎重。他仍然认为，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同法西斯主义搏斗。

而就在那个时候，在1941年6月初，作出了一个得到斯大林赞同的决定：再增派25个师加强西南方向。何况战争前夕，在1941年4月底，总参谋部还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通过情报系统得到的报告："德国对苏联采取行动一事已最终确定，并将很快付诸实施。进攻的作战计划规定对乌克兰发动闪电式突击，并继续向东推进……"[60]

法西斯分子企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主要突击方向、战争开始日期以及战争的战略意图等方面迷失方向。朱可夫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从广泛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警告我们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这样一些事实。但当时，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之后发现的文件所表明的，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61]

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处置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这里的不少情报时，甚至连总参谋部也远非全部都告知。例如，丘吉尔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电报，我再说一遍，斯大林就干脆认为企图尽快使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结果伦敦方面的警告在收到后过了好久才到了总参谋长的桌子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情报和报告，斯大林实际上也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

有一次，我在同前党中央书记、昔日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科学院院士波诺马廖夫谈话时，从他那里听到这么一个情况。

波诺马廖夫说："1941年春天，好像是5月底，两位从'那边'来的奥地利共产党人在某处和我见面。他们激动地谈到德国正在苏联西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谈到无数军用列车装载着坦克、大炮、汽车日以继夜地向东开来。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准备军事进攻。

"我把情报内容报告了季米特洛夫，他同斯大林专门谈了一次，过了一天季米特洛夫告诉我：

"'斯大林听了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消息很平静，并说这决不是这类信息中的第一个。但是他说他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例如，昨天他们在政治局研究了休假计划，对很大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提供了机会在夏天去休假，例如日丹诺夫将第一个去南方，可他还是边境一个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谈到这里，照季米特洛夫的说法，斯大林认为谈话就此结束了。"

波诺马廖夫发议论说："怎么才能解释这种状况呢？是对危险性估计不足？是自信？还是认为事态就是将按照他斯大林所计划的那样来发展这样一个固执的念头压倒了一切？"

诸如此类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扎哈罗夫以及其他许多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我想，朱可夫说得对：战争前夕，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穿着一个愿望——避免战争，不让战争爆发；而这又使得他相信，情况真的会这样。但是，难道红军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没有向斯大林报告过，到1941年5月初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威力将达到800万兵力、1.2万辆坦克、5.2万门火炮、近2万架飞机吗？难道还看不清楚，德国不可能使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长时间地闲呆着吗？难道"领袖"还不知道，这个庞然大军的主要力量已经集结在东部了吗？

客观地说，斯大林还收到另一类报告，如关于“德国人民不愿意打仗”，关于“德国军队中开小差的情况”，关于“国防军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等等。从柏林通过专门渠道经常发来消息说，集结在东部的德国军队进行着一些几乎是和平主义的议论：“如果德国卷入对苏战争，那她将失败”；“这场战争将使人民遭殃”；“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想回家”[39]。这种情绪可能也会有，但问题主要在另一方面，这类报告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不排除所有这些谈论“情绪”的材料也是一种巧妙的假情报。

正如朱可夫对西蒙诺夫所说的，1941年初，关于德国军队在波兰集结的消息猛然增多的时候，斯大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写道：“这种情况使我们吃惊，并且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希特勒打算跟我们打仗。”希特勒给斯大林回了一封信，也是私人信件，并且正如他在信中所强调的，是一封密函。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在波兰确实集结着大量的兵团，但是他相信他不会比斯大林走得远，他应当说明，他的军队在波兰集结不是针对苏联的，他打算严格遵守签订的条约，他以一国元首的人格担保。元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论据，据朱可夫说，斯大林看来是相信了，说是德国西部和中部的领土遭到英国的猛烈轰炸，英国人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领土，因此元首不得不将大量部队调往东部。

而德国武官克斯特林格在同苏联官方人士接触时又添油加醋，经常说什么“现在我们的部队得到解脱，让他们休整休整吧”[40]。

同时，1941年5月17日由铁木辛哥、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和总参谋长朱可夫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训令“关于1941年冬季战备的检查结果和对夏季的指示”，根本不谈西部各军区的任务，不谈提高警惕、加强装备、巩固防御，不谈如何准备反击空军的密集袭击和大量坦克的入侵。只谈“战士单兵训练中的缺陷”这样一些老一套的意见，完全没有作战性质的指示[41]。战争已迫在眉睫，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眼看就要猛烈开动向东部冲过来，而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却如此行动，似乎只要斯大林不愿意，希特勒根本就不想迈出他那不祥的可怕的一步。

而当时情报机关送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却越来越多。基辅特别军区情报处处长邦达列夫上校在1941年5月底报告说，新的坦克、炮兵和

步兵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到柳布利诺、克拉斯诺斯塔夫、扎莫希奇、格鲁别什、托马舒夫、别尔热茨等地区。情报处处长在他的结论中分析了形势,强调指出:"向与苏联接壤的边境集结军队的情况仍在继续……战区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60]西部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军区参谋部情报处处长布洛欣上校也向自己的司令部报告说:"根据一系列经过核实的情报,德国针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最近以来,特别是从5月25日以来,进行得更为紧张……"报告特别谈到,一个派到苏联国土上来的德国间谍在受审讯时说,"他最晚要在6月5日把情报带回采哈努夫城,因为有人告诉他,对苏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就要开始……"[61]这样的情报不只是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收到,而且莫斯科也收到了。

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的国防人民委员派了几个工作组去边境各军区检查坦克部队的情况。那么其他部队呢?6月16日,根据检查结果向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机械化部队司令部发去了密电:

> 通过对基辅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以及红旗敖德萨军区的坦克部队的检查查明:
>
> 1. 对战士和指挥员的训练同机械化部队战备的主要任务脱节,因此训练目的不明确。
>
> 2.火力准备处于低水平,比火力准备计划的规定落后一两个月。
>
> 3.机械化兵团内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制订得少而差。
>
> 4.摩托化部队当作步兵部队来训练。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战斗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质。
>
> 5.无线电兵的培养工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
>
> 6.炮兵部队尚未掌握从开阔的阵地直接瞄准时操作炮火的技巧,这门课根本就没有上过。
>
> 7.夜间作业当作例外进行,而且只在某些部队内进行。夜间行动的训练没有形成制度……[62]

诸如此类的不足之处整整"数落了"17条。但是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签署的训令中还是根本不谈与加强战备以反击德军必然的进攻有关的重大作战问题。他们似乎被斯大林的信心——只要他们没有做好

准备,战争就不会爆发——弄迷糊了……

而在许多方面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在作战方面、技术装备方面、动员方面。还在上述那些事件之前,斯大林就派了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去检查西部边境筑垒地域的准备工作。扎波罗热茨带了一个工作组沿着修筑了防御阵地的新边界线察看。他给斯大林的报告(同时也送给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不令人宽慰:

> 在我国西部边界的筑垒地域大部分没有战斗力。已经建成的战斗工事(地堡)没有应有的装备……筑垒地域没有必要数量的常驻的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⑳]。

斯大林将报告转给国防人民委员,要他严厉追究执行者营建筑垒地域体系动作缓慢的责任(这些地区,很遗憾,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起到它们预定应起的作用)。斯大林着急,催逼,可是到了真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又表现出惯有的谨慎态度。

据朱可夫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坚决要求,断然禁止使西部各军区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他惧怕"挑动"德国人的心理简直到了失常的地步。当然,斯大林力图不让希特勒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应当明白,德国未必会只是因为受了"挑动"才向苏联发动进攻,除非它的战略计划中有这样一条。然而,无论是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还是朱可夫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论据来证明,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这样一来,军事战略上与确定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有关的失误,由于斯大林顽固地不愿正视祖国已面临战争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在此同时,希特勒召开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会议过程中听取了将军们关于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他们向他报告说,自5月22日起德国的铁路部门实行快速运行计划,部队的集结工作将于6月19日结束,部署在维斯瓦河以西的空军第一突击兵团将于21日傍晚把基地从低空转移到靠近苏联边界的机场去。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元首对计划只提出了一个不大的改动:把进攻的开始时间从6月

22日的3时30分改为3时。

斯大林在收到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后来事实表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信息和消息的时候，没有下决心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来适应战役战略部署计划。如果能及时地、果断地并尽可能秘密地实行必要的作战措施和动员措施，那么战争初期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对斯大林这个时期的行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有足够的理由争取推迟苏联参战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针不容许发生有可能被德国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情，从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需要看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过错（确实是过错！——本书作者注）在于，他没有看到、没有悟到应该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这种政策就变得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险的。**应该勇敢地跨越这个界限**（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装力量进入一级战备，进行动员，把全国变成一个军营。看来应该把时间适当推迟，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6月份，但是可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早一些完成。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德国已经准备好向我国发动军事进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隐瞒是很困难的。惟恐西方会议论纷纷，说苏联有侵略意图——用不着担这个心。由于种种不取决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坚定地再向前迈一步。我们祖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59]也许这样做总共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谁说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军区进入战备的训令哪怕早几天发出就好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妨碍了一切。

很难不同意这些清醒的议论，但……如果这些议论在战争前夕就发表出来，那该多好！遗憾的是，斯大林周围的军政人员中谁也没有试图说服他相信华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过迟才说出的那一点点真理！朱可夫在谈到军人们在这个最严重的战略失算中应承担的那一份罪责（还不小呢！）时也说："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人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向他证明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实施。"[60]请读者注意"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个词……

一个领导人的伟大、英明、成熟看来就在于，恰恰是领袖应该使周围的人相信自己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问题的领导作风，他实际上常常简单生硬

地否定可供选择的建议和决定。斯大林在表达意志时刚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当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就是旨在迫使敌人执行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结合起来也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的刚强的理智在上述情况下表明了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既定目标:防止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愿望似乎把其余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为为了达到目标,按“领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当我们试图根据对当时一些具体事实的分析来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时,我们看到,“领袖”之所以固执,是由于他过分自信,不能承认自己所作决定的错误,非常自尊。这种往往“不受监督”的、近似于倔强的固执,最终又损害到产生固执的意志本身。结果固执在某个阶段似乎麻痹了意志,并且突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这种羁绊来束缚意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极其需要、极其重要的步骤。斯大林这个无疑是意志坚强的人,在战争前夕的最后几天,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样子。意志变成倔强,就听不进理智讲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话,这就是“盲目的倔强”,它同理智的论据发生了冲突。

对所有这一切,我再强调一遍,斯大林不具备预见的才干,不能窥见一点未来,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线那边。他继续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现在,陶醉在符合心愿的想法中。他没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则,难道他不能预见到——例如预见到——在战争前夕镇压几万名高级军队指挥员的后果?当然,可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个人的考虑,然而不管怎样,这痛苦年代的悲剧总能证明“领袖”不仅在道德上有很大缺陷,而且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有限。在分析战争前夕军事政治形势时所犯的错误,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明。

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道德、意志、理智等方面的缺点,在一个普通人、一般人身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弱点,但是在像斯大林这样一级的领导人身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战争前夕在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的失误,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最终“纠正”过来。我们习惯于说,这里再次表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却很少分析为使这种作用得到承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分析一下付出这种代价

是否明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用一章来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领导各族人民的领袖是真伟大还是假伟大。

在历史舞台上人民是主要角色。但是他们常常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他们不能对选拔"独奏者"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话。几乎所有的军事家、众多的政治家、大量的普通人在1941年春天都看到和感觉到,斯大林在分析事态发展情况时那样固执地看问题无法解释。但是谁也不能,确切些说,是谁也没有试图使"领袖"从盲目的固执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这里问题已经不仅在于没有利用良心发现的机会。有时这种机会利用起来极其困难,特别是当国家管理权只操纵在一个人手里,而通过特别重要的决定的时间却是以周计、后来是以昼夜计、最后是以小时计的时候……

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受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之托,于6月21日凌晨2时40分(离进攻开始还有一昼夜)发了一份密电:

> 速交。
>
> 送总参谋长基·阿
>
> 第一,6月20日在奥古斯图夫方向德国飞机侵犯我国边境:17时41分有6架飞机……17时43分有9架飞机……17时45分有10架飞机。根据边境部队的材料,飞机携带了炸弹。
>
> 第二,根据第3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沿着奥古斯图夫、谢伊纳路旁的边界,铁丝网白天还在,傍晚时被拆除。在这一地区的森林里,似乎可以听到地面发动机的轰鸣声。边防军加强了值勤……
>
> B·克利莫夫斯基赫[59]

其他军区也送了这样的报告。克利莫夫斯基赫是1940年7月被任命为西部特别军区参谋长的,他当时不可能知道,整整一年之后,即1941年7月,按斯大林的个人指示,他将同其他一批将军被枪决。当然,由逐渐掌握了这门业务的乌尔利希事先"办好手续"。斯大林的认识直到最后时刻都没能转变,没能相应地反映日益恶化的严酷现实。他仍然沉醉在他有"先见之明"和他的意志"万能"的幻觉中。

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爆发前最后那些时刻发生的悲剧,需要再来看看斯大林的个人特点。关于他的许多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现在应该谈的是像谨慎这样的特点。当然,在通过一般决定时,斯大林是大胆而果断的。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小心到了极点。例如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就有所表现,当时在很多问题上由于情况复杂和不明朗,他个人的首创精神表现得非常差。这一点还可以从1937—1938年间的血腥事件上观察到。现在看得很清楚,斯大林早在30年代初就想打击所有反对他搞个人专权的潜在敌人,但他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甚至当基洛夫之死给他提供了镇压借口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即就"充分"加以利用。不过,后来他不止一次公开地说:"铲除人民公敌的工作晚了四年。"斯大林善于耐心等待,一点一点地培养必要的品质、符合人际关系需要的精神状态,造成适当的气候。布哈林当初称斯大林为"伟大的配料工",这不是偶然的。"领袖"善于缓慢地、逐渐地创造、"炮制"一种局势,使所有的人坚信他迈出这一步是必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到时候了!例如,1937年联共(布)中央2至3月全会就是他在镇压年代迈出的这样的一步。

但是,在跟希特勒的关系上,他的过分谨慎到头来适得其反。实际上,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赌博中,希特勒的智谋胜过了斯大林。斯大林谨慎从事,不只是由于他理解"为时过早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由于他心里根本没有底。苏联是一对一地同资本主义世界较量。任何一步走得不小心都会引起无法弥补的后果。斯大林的思想在作出重大政治决定的时刻不可能不为这种想法所左右。

斯大林如此顽强地同"挑动"对方的可能性作斗争,以致柏林方面也察觉到了,并作出了相应的推论。他处处谨慎,对德国多次违反签订的协议缺乏应有的反应,过分的"规矩"——这就是真正促使希特勒愈来愈猖狂、认为苏联软弱可欺的原因。例如,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在6月份给西部各军区苏联部队补发了一项命令:不要对侵犯苏联边境的德国飞机使用武器。同样的训令也转发给了边防军[59]。德国人立即发觉了这一点。谨慎本是政治家必备的特质,现在却变成了犹豫不决和谨小慎微,原因就在于一味地相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防止战争。这最终导致无法弥补的后果……

战争前夕从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那里发来了几

份关于德军投诚者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德国军队将在这天夜里向苏联发动进攻。人民委员立即打电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命令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到他那里去。据朱可夫回忆,政治局全体委员已经在那里了。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在桌旁踱来踱去。当应召前来的军事首长们进来时,他对大家说:

“我们该怎么办?”

没有人应声。

“应该立即训令边境各军区所有部队进人一级战备。”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铁木辛哥终于说了话。

“把训令读一下。”斯大林说。

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拟订的训令草稿读了一遍。草稿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斯大林打断了总参谋长说:

“现在下达这样的训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应该下达一个简短的训令,指出进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各军区的部队决不要上挑衅的当,以免引起麻烦。”

当军人们回去作必要的部署时,斯大林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这是希特勒向我们挑衅……难道他敢发动战争?”

政治局委员们于2时多散去。首都最短的一夜降临了。斯大林疲惫地从自己的装甲轿车的窗口处望着寂静无人的街道。他还不知道,德国的飞机已经飞来轰炸苏联的城市和机场,法西斯的坦克兵正把坦克开到出发阵地,希特勒的将领们越来越频繁地看着自己的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正在接近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斯大林在他自己工作和休息的别墅的办公室沙发上铺好被褥刚要入睡,有人小声地敲门。敲门声令人心惊肉跳,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斯大林叫醒。也许出了最糟糕的事。难道他真的失算了?

斯大林裹紧睡衣走了出来。卫队长报告说:

“朱可夫大将有急事请您、斯大林同志接电话。”

斯大林走到电话机旁。

“喂……”

朱可夫扼要地报告了敌人飞机空袭基辅、明斯克、塞瓦斯托波尔、维尔纽斯以及其他城市的情况。总参谋长在报告之后再问一遍斯大


德军向苏联境内推进

林：

"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独裁者在电话里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他什么也没有说。令他目瞪口呆的、难以想象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上，朱可夫提的问题他没有听进去。违反他的愿望、意志和信心，希特勒下决心开战了。可能，斯大林的脑海里闪过了希特勒在他60寿辰那天发来的贺电：

> 约瑟夫·斯大林先生：
>
> 在您60寿辰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并为此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祝您健康长寿，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前程似锦……

斯大林默不作声。话筒里又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惊讶的声音：

"斯大林同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终于明白了。人间的神灵也会犯错误的，可它们的代价却大得无法计量。

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

注释索引

第五章

①普卢塔克《列传》(两卷本)1987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80 页。

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 17 全宗,第 120 目录,第 24 卷宗,第 2 页。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五卷本)1956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333 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第 336 页。

⑤同上,第 234 页。

⑥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文集》1922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128—129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104 页。

⑧《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文版第 300—301 页。

⑨《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23 页。

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78页。

⑪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33卷宗。

⑫《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82页。

⑬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2目录,第2915卷宗。

⑭《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第9期第9页。

⑮《斯大林传略》1948年莫斯科版第163页。

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120目录,第313卷宗。

⑰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1987年莫斯科版第135页。

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全宗,第1目录,第3399卷宗。

⑲《庆祝斯大林诞辰六十周年》1940 年莫斯科版第 93—102 页。

⑳雅罗斯拉夫斯基《论斯大林同志》第149页。

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04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页。

㉓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2510卷宗。

㉔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3目录,第461卷

宗,第9—21页。

㉕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全宗,第1目录,第4674卷宗,第1—3页。

㉖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2目录,第5374卷宗,第18页。

㉗同上,第1目录,第5374卷宗。

㉘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73卷宗,第36页。

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2898卷宗。

㉚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1955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488页。

㉛《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文版第152页。

㉜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120目录,第24卷宗,第1—3页。

㉝《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06—208页。

㉞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2目录,第4074卷宗,第35页。

㉟朱可夫《回忆与思考》1983年莫斯科第5版第2卷第95页。

㊱华西列夫斯基《一生的事业》1978年莫斯科第3版第501页。

㊲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478页。

㊳《庆祝斯大林诞辰六十周年》1940年莫斯科版第268—274页。

㊳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26页。

㊵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49卷宗,第108页。

㊶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17页。

㊷福伊希特万格《1937年的莫斯科(就莫斯科之行告友人)》1937年莫斯科版第58—59页。

㊸同上,第64页。

㊹同上,第59、60页。

㊺别尔嘉耶夫《俄国的命运》1918年莫斯科版第58页。

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88、89页。

㊼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12页。

㊽同上,第28页。

㊾斯达汉诺夫《谈谈我的生活》1938年莫斯科版第49页。

㊿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75卷宗,第120页。

⑤1《斯大林文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6页。

⑤2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

⑤3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1页。

⑤4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26全宗,第1目录,第113卷宗。

⑤51937年12月21日《真理报》。

⑤5《拿破仑选集》194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0页。

⑤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2卷第419页。

⑤8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

⑤9《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卷第404页。

⑥0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03卷宗,第366页。

⑥1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1954年纽约契诃夫出版社版第1卷第387—388页。

⑥2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32页。

⑥3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32页。

⑥4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24—35页。

⑥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74页。

⑥6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83页。

⑥7《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卷第403页。

⑥8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8卷宗,第251—258页。

⑥9总参谋部档案馆第165目录,第17架,第9格,第60、63、78页。

⑦0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5卷宗,第176页。

⑦1《斯大林文选》(下卷)中文版第303页。

⑦2托洛茨基《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见《托洛茨基文集》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5卷第41—51页。

⑦3《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31—332页。

⑦4《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142—144页。

⑦5卢那察尔斯基《革命人物剪影》第26页。

⑦6托洛茨基《政治人物剪影》,见《托洛茨基文集》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8卷。

⑦7托洛茨基《苏维埃共和国和资本主义世界》,见《托洛茨基文集》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7卷第1册第144页。

⑱托洛茨基《过渡时期的文化》,见《托洛茨基文集》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21卷第93—94页。

⑲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577卷宗,第633页。

⑳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罪恶》1937年苏黎世版第366—369页。

㉑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3年柏林版第1卷第342页。

㉒乌特琴科《尤利乌斯·恺撒》1976年莫斯科版第302页。

㉓《苏联七十年来的国民经济》。70周年纪念统计年鉴。1987年莫斯科版第32页。

㉔《苏联七十年来的国民经济》。70周年纪念统计年鉴。1987年莫斯科版第37页。

㉕《苏联七十年来的国民经济》,70周年纪念统计年鉴。1987年莫斯科版第3页。

㉖1937年3月6日《真理报》。

㉗斯达汉诺夫《谈谈我的生活》1938年莫斯科版第50页。

㉘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

㉙《福伊希特万格文集》第60页。

㉚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918/33987全宗,第3目录,第301卷宗,第26—27页。

㉛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2915卷宗。

㉜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1页。

㉝《庆祝斯大林诞辰六十周年》第177页。

㉞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38全宗,第3目录,第86卷宗,第16页。

㉟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第118—119页。

第六章

①1936年1月13日《真理报》。

②1937年1月1日《真理报》。

③《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文版第390页。

④阿·奥尔洛夫《审判案件》1973年纽约版第135页。

⑤《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文版第402页。

⑥1937年1月24日《真理报》。

⑦《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90—191页。

⑧《斯大林运河(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修建史)》,高尔基、

阿维尔巴赫、菲林编，1934年莫斯科版第12页。

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

⑩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1—3页。

⑪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6页。

⑫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75卷宗，第37—42页。

⑬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8—16页。

⑭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57页。

⑮同上。

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8页。

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9—11页。

⑱同上。

⑲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577卷宗，第5—15页。

⑳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577卷宗，第5—20页。

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577卷宗，第10—25页。

㉒同上，第1目录，第439卷宗，第118页。

㉓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1目录，第644卷宗，第42—89页。

㉔《托洛茨基文集》第12卷(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1925年莫斯科版第59页。

㉕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1目录，第439卷宗，第118页。

㉖《托洛茨基反苏维埃核心审判案》1937年莫斯科版第42—45页。

㉗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第216页。

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9卷宗，第10—35页。

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5卷宗,第61页。

㉚1938年3月12日《真理报》。

㉛1938年3月5日《真理报》。

㉜1938年3月13日《真理报》。

㉝福伊希特万格《1937年的莫斯科》第98页。

㉞1938年3月13日《真理报》。

㉟1938年3月13日《真理报》。

㉟1938年3月8日《真理报》。

㊲1937年1月27日《真理报》。当时官方就是这样解释荒唐可笑的供认不讳这一现象的。

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1页。

㊳弗雷泽《旧约中的民俗学》1985年莫斯科版第285页。

㊵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1983全宗,第3目录,第152卷宗,第150页。

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27卷宗。

㊷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175卷宗,第2—10页。

㊸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99卷宗,第197页。

㊹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99卷宗,第366页。

㊺同上,第269卷宗,第1卷,第57—65页。

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119页。

㊼《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10页。

㊽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24卷宗。

㊾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430卷宗。

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5卷宗,第5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93页。

52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39卷宗,第24—29页。

53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39卷宗,第24—32页。

54同上,第640卷宗,第20—45页。

55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39卷宗,第20—35页。

56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39卷宗,第20—35页。

57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33卷宗,

第2—26页。

㊽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2181卷宗。

㊾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577卷宗。

㊿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36卷宗，第270—274页。

61彼·阿·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札记》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69页。

62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5卷宗。

63B·伊万诺夫《图哈切夫斯基元帅》1985年莫斯科版第128页。

64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400卷宗，第137—139页。

65《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第12期。

66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5全宗，第176730目录，第21卷宗，第64、68页。

67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6卷宗，第207—208页。

68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6卷宗，第207—208页。

69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8卷宗，第37页。

70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40卷宗。

71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25880全宗，第3目录，第1140卷宗，第18—22页。

72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25880全宗，第4目录，第1卷宗，第2—3页。

73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8卷宗，第23—25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1页。

75 1938年3月9日《真理报》。

76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3册）。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30页。

78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178612目录，第86卷宗，第254页。

79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178612目录，第86卷宗，第306页。

80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2180卷宗，第247页。

81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577卷宗，第57页。

82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5卷宗，第46页。

83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75卷宗，第57—63页。

84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254—255页。

8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708323目录，第38卷宗，第14—16页。

86同上。

87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8180卷宗，第593页。

⑧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43—144页。

⑧⑨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罪行》第366—367页。

第七章

①《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9年莫斯科版第18页。

②《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9年莫斯科版第26页。

③《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9年莫斯科版第2页。

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献和材料(1937—1939)》,两卷集,1981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47页。

⑤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09卷宗,第32—33页。

⑥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4010卷宗,第1页。

⑦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5卷宗,第9页。

⑧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6全宗,第1目录,第19项,第206卷宗,第551页。

⑨同上,第1项,第5卷宗,第554页。

⑩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82全宗,第22目录,第93项,第7卷宗,第798页。

⑪《反对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苏联(1933—1945)》1976年莫斯科版第66页。

⑫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5全宗,第176703目录,第7卷宗,第431页。

⑬《反对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苏联(1933—1945)》第74页。

⑭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6全宗,第16目录,第27项,第1卷宗,第766页。

⑮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6全宗,第12目录,第26项,第1卷宗,第1176—1177页。

⑯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5卷宗,第66—72页。

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献和材料(1937—1939)》第2卷第10、11页。

⑱《反对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苏联(1933—1945)》第78—79页。

⑲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6全宗,第16目录,第27项,第5卷宗,第22—32页。

⑳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5卷宗,第73页。

㉑《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11页。

㉒同上,第128页。

㉓孔·海登《德国法西斯主义史》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60页。

㉔《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第12页。

㉕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11全宗,第4目录,第27项,第61卷宗,第1218页。

㉖同上,第59卷宗,第178—180页。

㉗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745全宗,第15目录,第38项,第8卷宗,第126—128页。

㉘同上,第19目录,第45项,第4卷宗,第122—125页。
㉙同上,第9卷宗,第129—132页。
㉚《1918—1945年德国对外政策档案材料》第7卷1956年巴登版第131页。
㉛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745全宗,第15目录,第38项,第8卷宗,第149页。
㉜帕·安·日林《论战争和战争史》1984年莫斯科版第145页。
㉝1939年8月27日《真理报》。
㉞《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2辑第18卷第243页。
㉟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59全宗,第1目录,第300项,第2077卷宗,第233—234页。
㊱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仍在继续》1987年莫斯科版第24页。
㊲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7卷宗,第379、381页。
㊳В·Я·西普洛斯《苏联的外交政策》1987年莫斯科版第196页。
㊴《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1984年莫斯科版第43页。
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献和资料(1937—1939)》第2卷第85—86页。
㊶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59全宗,第1目录,第296项,第2046卷宗,第266页。
㊷1939年9月18日《真理报》。
㊸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5全宗,第391目录,第175704卷宗,第96页。
㊹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7卷宗,第436—437页。
㊺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05卷宗,第3卷,第19—22页。
㊻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05卷宗,第3卷,第19—22页。
㊼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5325全宗,第1目录,第244卷宗,第2页。
㊽同上,第9页。
㊾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4全宗,第14目录,第2435卷宗,第9—13页。
㊿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58卷宗,第134—138页。
(51)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25888全宗,第13目录,第20卷宗,第6—9页。
(52)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8全宗,第3目录,第373卷宗,第130页。
(53)同上,第113页。
(54)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6卷宗,第376—380页。
(55)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全宗,第3目录,第1366卷宗,第60—62页。
(55)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366卷宗,第27—29页。
(57)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35卷宗,第99页。
(58)1939年12月3日《消息报》。

㊾1939年12月16日《消息报》。
㊿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1目录，第23卷宗，第34页。
6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11600目录，第160卷宗，第96页。
6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264211目录，第73卷宗，第67—110页。
6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264211目录，第73卷宗，第67—110页。
64《军事历史》杂志1987年第9期第50页。
6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7837全宗，第10目录，第142卷宗，第93页。
66《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干部(1941—1945)》1963年莫斯科版第12页。
67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045卷宗，第19—20页。
68同上，第993卷宗，第3—11页。
69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5全宗，第176703目录，第21卷宗，第16页。
70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第75全宗，第35目录，第319卷宗。
71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25880全宗，第4目录，第1卷宗，第2—3页。
72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全宗，第1目录，第3808卷宗。
73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305卷宗，第175—192页。
74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4卷宗，第153页。
75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4全宗，第18目录，第77卷宗，第56页。
76同上，第76卷宗，第20页。
77同上，第79卷宗，第9—10页。
78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7977全宗，第5目录，第547卷宗，第1—2页。
79A·A·斯韦钦《战略》1935年莫斯科第2版第236页。
80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75284全宗，第1目录，第119卷宗，第18页。
8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3卷宗，第85—91页。
82《军事历史》杂志1987年第9期第49页。
82帕·安·日林《论战争和战争史》第185页。
84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302卷宗，第3页。
85同上，第130卷宗，第53—56页。
86德·费·乌斯季诺夫《为了胜利》1988年莫斯科版第223页。
87A·M·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1965年莫斯科版第73页。
88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2154目录，第4卷宗，第224—233页。
89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8418全宗，第25目录，第199卷宗，第1—5、45页。
90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65目录，第179卷宗，第20—21页。
91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时经济》1948年莫斯科版第78页。
9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全宗，第11569目录，第300卷宗，第17—24页。

㉓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2154目录,第4卷宗,第224—233页。
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67全宗,第12001目录,第141卷宗,第48—53页。
㉕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1全宗,第12079目录,第45卷宗,第160—163页。
㉖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53卷宗。
㉗1941年2月22日《真理报》。
㉘《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战争中的欧洲》)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87页。
99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传》1946年纽约版第336页。
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391号文献。
⑩《第四国际》1938年9—10月第12—13期第168—218页。
⑩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2目录,第19卷宗,第27—28页。
⑩同上,第15—17页。
⑩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1目录,第11卷宗,第37页。
⑩同上,第229页。
⑩《马克思的活的思想》1937年纽约版第38页。
⑩《托洛茨基日记和信件》1986年"埃尔米塔日"出版社版第73页。
⑩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传》(下册)1985年本森·佛蒙特版第234页。
⑩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传》第413页。
⑩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传》第10—12、53、116页。
⑪《托洛茨基日记和信件》第160—162页。
⑫阿·西凯罗斯《我被称为凶恶的上校》1986年莫斯科版第220页。
⑬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传》下册第280—281页。
⑭《托洛茨基日记和信件》第164—166页。
⑮《弗兰克林·德·罗斯福的公开书信和演说集》1939年版第201—205页。
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46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417页。
⑰《苏联外交史(1917—1945)》第1卷第371—372页。
⑱《军事历史》杂志1987年第9期第49页
⑲威·夏勒《第三帝国的兴亡》1976年纽约版第383页。
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60页。
㉑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987全宗。第3目录,第1175卷宗,第33—34页。
㉒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2871全宗,第1目录,第72卷宗,第216页。
㉓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6全宗,第1目录,第26项,第1卷宗,第1179页。
㉔W·莱昂哈德《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1986年弗赖堡版第66—68、79—84页。
㉕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第011全宗,第4目录,第25项,第11卷宗,第1462—

1463页。

⑫⑥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500全宗，第12458[a]目录，第34卷宗，第17页。

⑫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500全宗，第12462目录，第7卷宗，第1—6页。

⑫⑧《军事历史》杂志1987年第9期第54页。

⑫⑨《葛罗米柯回忆录》1989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196—205页。

⑬⓪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波士顿第3卷第493页。

⑬①《列·米·桑达洛夫回忆录》1961年莫斯科版第75页。

⑬②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3408目录，第90卷宗，第200页。

⑬③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2目录，第6卷宗，第522—523页。

⑬④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2目录，第6卷宗，第526—561页。

⑬⑤1939年9月28日《消息报》。

⑬⑥1939年11月1日《真理报》。

⑬⑦1939年9月2日《真理报》。

⑬⑧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25871全宗，第2目录，第285卷宗，第8—9页。

⑬⑨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9全宗，第39目录，第72卷宗，第44、133、536页。

⑭⓪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6[a]全宗，第2951目录，第239卷宗，第10—14页。

⑭①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6[a]全宗，第2951目录，第239卷宗，第84—90页。

⑭②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6[a]全宗，第2951目录，第239卷宗，第245—279页。

⑭③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6[a]全宗，第2951目录，第239卷宗。

⑭④同上，第242卷宗，第238页。

⑭⑤朱可夫《回忆与思考》1969年莫斯科版第233页。

⑭⑥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6目录，第5卷宗，第140—146页。

⑭⑦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8全宗，第4目录，第36卷宗，第56页。

⑭⑧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3卷宗，第85—90页。

⑭⑨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27全宗，第12915目录，第16卷宗，第199—204页。

⑮⓪同上，第308—314页。

⑮①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08全宗，第2513目录，第70[a]卷宗，第424—427页。

⑮②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725588目录，第36卷宗，第214—242页。

⑮③《军事历史》杂志1978年第2期第68页。

⑮③格·康·朱可夫《文章索引》第238页。

⑮⑤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08全宗，第2513目录，第71卷宗，第34页。

⑮⑤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368卷宗，第246页。

第8章

悲惨的战争初期

为国务活动家的错误付出代价的是民族。

——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家)

斯大林吃力地琢磨着朱可夫的话的含义，而朱可夫却继续惊悸不安地对着话筒喊道：

"斯大林同志，您听见我说的了吗？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斯大林同志？喂，斯大林同志……"

肩负着难以置信的重任的这个人终于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

"您和铁木辛哥一块儿到克里姆林宫来吧。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来……"

斯大林放下话筒，在桌边站了有一分钟，他惊愕得目光呆滞，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屋角那架古老的落地钟的盘面：短针刚刚越过4点。昨天，政治局的1号命令用并不坚定的语气仿佛是向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军事委员会怯生生地发出了警报。同时命令又着重指出："我军各部队的任务是不上任何挑衅行为的当……"[①]对这个姗姗来迟、而又"语焉不详"的警报，各部队还来不及采取积极的行动。斯大林下意识地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某种可怕的，重大的，对国家、人民、自然还有他这位泱泱大国的头号人物的命运来说是悲剧性的事件开始了。尽管他非常清楚在国境线上对峙的军事力量有多大，他也想象不到战争初期具有何等的灾难性。他知道


面对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极其震惊。这位苏联最高统治者曾判断战争不会这么早爆发

红军有许多装备方面的、作战方面的和组织方面的弱点，可是他想不到，比如说，战争开始后不到一周明斯克就会失陷，德国人的坦克会展开楔形攻势，轰隆隆地不断碾过设置得很不成功的一道道防线……斯大林机械地把千百万苏联人从无数照片和画像上看熟了的弗伦奇式军上衣的钮扣一个个扣上，可他听不到远方几万门德军大炮对苏联部队的阵地、边防哨所和永久性工事轰击的隆隆炮声。在他准备上汽车的那几分钟里，德国人的炸弹正在布列斯特、博布鲁伊斯克、维尔纽斯、文茨皮尔斯、格罗德诺、科布林、基辅、明斯克、日托米尔、斯洛尼姆、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其他几十座城市里爆炸，宣告屠杀人类的战神业已降临。斯大林的轿车在两辆警卫车的伴随下，沿着莫斯科空荡荡的街道朝克里姆林宫疾驰，而这时几千辆德军坦克已经在用它们的履带蹂躏着我们祖国的大地。见过森林火灾的人都知道，疾风是多么迅猛地把一片火海刮向莽莽丛林的……入侵的战火燃烧着带来死亡的熊熊烈焰蔓延开去，吞噬着几千座城市、村庄和几百万人的生命。

希特勒怎么敢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怎么了，难道真是一个疯子？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希特勒占领巴黎之后，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一条战线，而且指望对付俄国人的东线战事也将是一场闪电战。斯大林的思想在寻找一个于他有利的借口：也许这不过是军人们面对大规模的挑衅而张皇失措吧？仅仅两三天以前，这同一个巴甫洛夫还发来一个电报（好像已经不是第一份了），请求“准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派军进攻苏联。德国此次攻击行动，违反了1939年8月所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图为德军向前推进时，炸毁了一处苏联边防阵地

战工事"[2]。他命令铁木辛哥拒绝了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的请求，因为军队开进可能会激恼德国人，而德国人似乎早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应当先问问柏林：也许这不过是检验一下力量？难道哈桑湖事件导致了对日本的战争吗？

斯大林走进专供他使用的入口，上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穿过接待室时，他对面色苍白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匆匆说道：

"请大家立刻来……"

政治局委员们和候补委员们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进来了，他们谁也不说话，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斯大林没有同进来的人打招呼，只是没有特定对象地吩咐道：

"同德国大使联系一下……"

莫洛托夫走了出去。屋子里是一片令人难受的沉默。波斯克列贝舍夫请来的人在桌边就坐，他们是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加里宁、什维尔尼克、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谢尔巴科夫。莫洛托夫回到屋里后，感到不仅是斯大林，而且全体"党的最高层"都在紧张地注视着他。外交人民委员走到自己的座位跟前，用沙哑的嗓音挤出几句话：

"大使通知我们：德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宣战了。"莫洛托夫看了一眼手里的纸片，补充说："形式上有一个标准的借口：纳粹德国决定预先防止俄国人正在准备的进攻……"

静默仿佛变得浓重而又粘滞了。斯大林在桌边坐下，看了莫洛托夫一眼，他忽然想起，半年以前就在这间屋子里，莫洛托夫从柏林回来后信心十足地报告说：

"希特勒在同英国及其盟国的斗争中寻求我们的支持。应当等待他们的对抗尖锐化。希特勒坐卧不安……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敢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我想我们有时间来巩固西部的国境线。不过要分外小心，因为我们是在和一个冒险分子打交道……"

斯大林又看了一眼莫洛托夫，不过这次是目露凶光了。"我们有时间……"这也算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斯大林感到自己被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也许，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和信心不足。"领袖"已经习惯于事态按照他的意志发展。他不想让这些唯唯诺诺的战友们看出他的弱点。大家都在等着听

他的看法和吩咐。

铁木辛哥开口了，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

“斯大林同志，您允许报告一下局势吗？”

“说吧。”

第一副参谋长瓦图京中将走进办公室来。他简要地报告了局势，其中没有多少新消息，在猛烈的炮轰和空袭之后，德军的大部队在西北方面和西面的许多地区侵入了苏联领土。许多边防小分队在第一次战斗中就遇上了庞大的德国战争机器，他们牺牲了，但没有放弃阵地。敌人的空军在不断地轰炸各个机场。总参谋部眼下也没有掌握其他更具体的材料。办公室中所有在场的人甚至没有料到后来事态的发展有多么急速而充满悲剧性。



瓦图京(1901-1944)

苏军大将

1901年12月16日出生于今别尔哥德州切普希诺镇。1920年参加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布)。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苏德战争期间，任方面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曾参与指挥列宁格勒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等战役。1944年2月29日，去前线途中遭匪徒袭击负伤，后牺牲。获列宁勋章1枚，1965年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丧魂失魄

不，斯大林在第一天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震惊。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对谁都有气——他被骗得太苦了——为前景莫测感到担心。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政治局委员们在他办公室里几乎待了一昼夜，等待着边境上传来的消息。他们只是偶尔出去打个电话，喝口茶，活动活动身体。大家都很少说话，都暗自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挫折。没有人怀疑希特勒将遭到应有的回击。党的最高级领导成员们可能议论过，边境地区的恶战会打上一两个星期。在一定时期内战争可能是阵地

战，直到红军给予侵略者毁灭性的回击为止……

马林科夫的文件夹里有一份总政治宣传部的命令草案——《近期内红军中政治宣传的任务》。这是6月中旬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交给他的(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斯大林就用集团军级政委梅赫利斯代替了扎波罗热茨)。6月20日，马林科夫应斯大林之召来到他的办公室，领受了例行任务之后，就把总政治宣传部的这份命令交给了"领袖"。这份命令是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和斯大林1941年5月5日给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讲话之后着手起草的。"领袖"明显地暗示：战争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准备"无条件地粉碎德国法西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份命令(他终于没能在战争爆发前批准它)提出的主要论点如下：

> 我国所处的新条件和孕育着不测事件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具有革命的决心和随时准备转入对敌人实行毁灭性的进攻……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应贯彻一个目的——从政治上、精神上和军事上训练全体人员，准备进行一场**正义的、进攻性的、无坚不摧的战争**……要培养全体人员对敌人的极端仇恨、同敌人搏斗的强烈愿望、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捍卫我们的祖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3]

除马林科夫外，日丹诺夫也看过这个命令草案。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命令，而在于政治领导相信我国有能力击败任何进攻并粉碎侵略者的信心。命令是按朱可夫在5月份提交斯大林的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精神拟定的。这份计划里也谈到必须"赶在敌人前面，在原波兰和东普鲁士的领土上击溃敌人主力"[4]。总参谋部和总政治宣传部认为，防御只能是短时间的：部队准备进攻，打退敌人的进犯并转入进攻……因此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一两天里，党和军队的领导根本没有灾难临头的想法。灾难仿佛早已被排除在外了。

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虽然我国最高领导从各种渠道得到过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的消息，它却并没有采取无疑应当采取的步骤：没有使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如果就1号命令的使命而言，那么它的颁发至少迟了一昼夜。斯大林以及他身边的人们并不懂得(而军人又不敢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 3 点，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日落时分，德军坦克已前进到苏联境内 50 英里处

向他详细解释：铁木辛哥压根儿就畏惧"领袖"），战备是没有伸缩余地的时间参数。一个师从接到警报到紧急动员、集中、行军并占据指定的防御阵地，所需要的时间在4至20小时之间。例如，在西部特别军区平均需要4至23小时[5]。而总参谋部在6月22日0点20分才开始发出1号命令。各军区在1点20分才接收完毕。然后司令员和司令部一起研究文件，拟出必需的命令和指示。这又用去1至1.5小时。实际上，各部队执行这项命令只剩下不到1个小时了。

许多师只是在法西斯强盗轰炸和炮击后才紧急动员起来。部队和兵团开始向指定地区开进，一般说来，它们还没有到达指定地区，就在途中遭遇了德国的坦克纵队，于是被迫在行进中投入战斗。敌人竭尽全力破坏我方的通讯联络，使指挥瘫痪。所有的人都完全没有料到，德国的快速集团在第一天结束时能深入我国领土50至60公里……二线的各路部队向边境开进时都遭到敌人空军的不断袭击。敌人的空军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制空权。迎着部队走来的是连绵不断的难民群。通讯被切断了。指挥员们不了解局势。兵团奉命开进的地区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已经取得了战术上、战役上以至战略上出其不意的效果。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敌人并没有取得政治上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由于斯大林罪恶的指挥不当，各部队就被置于连德军指挥部最冒险的意图也能够如愿以偿的境地。德国武装部队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后来写道："德军的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敌军的战斗部署从战术上说是不适应防御的。他们的部队在边境地带分散在辽阔的地域上，而且被束缚在所驻扎的地区。边境本身的防卫是薄弱的。"[6]

斯大林忐忑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并不知道德国统帅部把赌注押在德军坦克对苏联领土纵深进行的猛烈的楔形攻势上，而不顾在自己后方留下了苏联部队。许多州里的动员工作被破坏了。头一两天就有200多座燃料仓库、弹药仓库、其他军用物资仓库、以及许多军医院落入敌人手中。混乱、缺乏坚定的指挥挫伤了部队的士气。由第4集团军参谋长桑达洛夫上校签署的1941年6月24日第1号战报中说："由于不断的狂轰滥炸，步兵精神沮丧，防御并不顽强。往往要由从集团军司令员起的各兵团指挥官来制止凌乱后撤的分队，有时是整支部队，让它们掉头再上前线，但是这些措施，有时甚至要使用武器，并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⑦

而斯大林却一直在期待着令人宽慰的消息……

6月22日清晨，当提出了由谁来把希特勒德国发动进攻的消息告诉人民的问题时，大家自然都看着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连想也不想，干干脆脆地拒绝了。在历史文献中至今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像米高扬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他心灰意冷，"不知道对人民说什么好，因为一直在教育人民说不会发生战争，即使发生战争，敌人也将在他自己的领土上被粉碎等等，而现在必须承认，在战争的最初时刻我们正在遭受失败"。

我想，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决定由谁来对人民发表讲话的问题是在凌晨。当时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知道"在战争的最初时刻我们正在遭受失败"。关于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是经常向人民讲的。我们也在准备战争。可是战争的来临仍旧出人意料。斯大林在许多方面还不清楚边境上的事件将如何发展。更可能的是他在没有搞清楚局势之前，什么话也不想对人民说。在此之前，至少是在30年代，斯大林在摸不清重大步骤将对他的地位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是从不采取重大行动的。他总是排除足以动摇他的威信、动摇领袖的威信的冒险行为。

22日早晨，斯大林没有听到胜利的战报，他提心吊胆，甚至是心慌意乱，但是他还暗自保留着信心，他相信两三周之后他将惩罚希特勒的背信弃义，到那时他才在人民面前"露面"（只是四五天后，斯大林才被震惊得丧魂失魄，直到这时他才终于相信，入侵不仅对祖国，而且对他——"英明的、战无不胜的领袖"，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证明事情确

实如此的有发给各部队的两个命令,它们是分别在6月22日晨7点15分和晚9点15分在他的办公室里得到批准,并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的。

早晨,在决定由莫洛托夫向人民发表讲话、同时承认必须在14个军区辖区内宣布动员之后,斯大林还不曾意识到这场惨剧的规模有多大,他要求军人"用毁灭性的打击粉碎入侵之敌"。铁木辛哥当即布置起草在历史上以总军事委员会第2号命令著称的那份文件: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敖德萨军区军事委员会:(抄送海军人民委员)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德国空军无端袭击并轰炸了西部边界沿线我方机场及城市。

同时,德军在许多地方开炮轰击并越过我国边界。

鉴于德国对苏联采取闻所未闻的悍然进攻,我命令:

1.各部队使用一切力量及手段进攻敌军并将其歼灭在侵犯苏联边界的地区。此后,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

2.用侦察及作战航空兵确定敌方空军的集结地及其地面部队集群。以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强大打击将敌空军消灭在机场上并轰炸其地面部队的主要集团。航空兵应深入德国领土100至150公里实施打击。轰炸柯尼斯堡及梅梅尔。在未得到特别指示之前,不得袭击芬兰及罗马尼亚领土。

铁木辛哥、马林科夫、朱可夫

1941年6月22日,7时15分。

第2号[8]

这份命令不像是一份军事文件。其中有斯大林进行政治校订的痕迹。这是一份表明要对背信弃义的邻居进行惩罚这样一种政治意志和坚定意向的文件,它含有并不隐晦的希望,指望战火也许可以迅速扑灭。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未得到特别命令之前,各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斯大林在命令"轰炸敌方的主要集团"时,还不知道仅仅在第一天,单是西部特别军区的部队就损失了738

架飞机，而且其中的528架是在机场上被炸毁的。基辅特别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德国人就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仅仅在6月22日一天内就消灭了1200多架飞机！


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决策失误，苏联空军在遭到轰炸4个小时后才得到起飞的命令。开始第一天，苏联就损失了1200架飞机，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

这一天里作出了许多决定。我再说一遍：斯大林还不知道惨剧的规模有多大。最初的茫然失措和颓丧已经过去。但是他头脑里老是萦绕着一个想法：我怎么会信任希特勒的？他怎么能愚弄了我？莫洛托夫也真够可以的！这么说来，情报机关的许许多多报告，由其他渠道传来的关于德国在准备进攻和确切的进攻日期的情报都是真实的？这么说来，如果他听了巴甫洛夫的话，几天以前发出使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的指示，许多事情不是都可能会是另一种模样吗？斯大林一直觉得，战友们今天在办公室里都一定带着责备的心情想到他的失误。他甚至认为，他们对他洞察一切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简直不能忍受！一想到人们（而且不仅仅是在这里，在克里姆林宫）可能怀疑到他的英明、洞察一切的能力和一贯正确，就感到不能忍受……

根据铁木辛哥的提议，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基辅三个特别军区被分别改组成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两天以后，又成立了北方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斯大林不断要求得到边境情况和执行2号命令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他好几次当面或者打电话对铁木辛哥、朱可夫和瓦图京说：

"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边境的战斗情况清清楚楚地报告上来？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库兹涅佐夫（均系方面军司令员。——本

书作者注)都在干什么？还有总参谋部在干什么？”

瓦图京有两三次把作战地图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什么令人宽心的消息。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仔细地标出我各个集团军和军的配置地区、航空兵的基地以及预备兵团的开进方向。但是却没有主要的东西:战斗究竟在什么地方进行?敌人在何处?苏联部队的行动是什么性质的？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德国部队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指挥和通讯联络，而对西方方面军则几乎已经使之完全瘫痪了。巴甫洛夫大将在敌人人侵几小时后就丧失了对本方面军部队的指挥线索。德国侦察机几个月来几乎不受惩罚的飞行和间谍的报告使德军指挥部能十分准确地切断所有的指挥所、通讯线路、机场、仓库和部队的部署位置。侵略者的第一次打击(空军的、炮兵的、坦克的)是极有成效的。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破坏了有线通讯。而有线通讯在当时比无线通讯有更大的作用。

西北方面的情况也不妙。据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第8集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在7至8月间他将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不过只有几个星期)回忆,“没有保卫边界的任何明确的计划。部队主要是在筑垒地区修建工事,修筑机场。各部队都没有补足编制。永久性工事没有修好。当天早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的飞机就几乎全部在机场上被烧毁。例如,到6月22日15时,本应支援第8集团军的混合航空兵师只剩下5至6架飞机了……”有幸经历了整个战争的索边尼科夫(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再任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副司令员）接着痛心地指出，从战争行动开始后,“指挥所就从电话和电报上不断收到关于设置树枝鹿砦、布雷等等互相矛盾的指示，而且一些命令要求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后来另一些命令又撤销了这些措施，之后又肯定这些措施……6月22日深夜，我亲自接到军区参谋长克列诺夫中将斩钉截铁的命令——6月22日凌晨前将部队撤离边界……总的说来，可以感觉到一种神经十分紧张、不协调、不明确、害怕挑起战争的气氛……无论是部队还是集团军司令部都没有补足编制。通讯工具、运输工具数量也不够。因此集团军司令部没有作战能力”。[9]指出这一点的是从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的一名集团军司令员。而且处于这种状态的不仅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员。

而斯大林一直在等待着胜利的消息,或者至少是让人产生希望的

消息。这样的消息不见到来。只要他办公室的房门一打开，斯大林就迅速抬起头来，盯着来人的面孔。没有使人放心的战报。“领袖”坐立不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里，斯大林只喝了一杯茶。他以为是军事首长们迟迟不肯行动，犹豫不决，对早晨发往各边境军区的命令的意义认识不足。国内战争时，他常常作为党的全权代表被派往各条战线。他相信用硬性的要求、威胁及各种行政性措施对司令部及其领导人施加巨大压力是卓有成效的办法。情况不明使他感到压抑。斯大林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同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讨论铁木辛哥带来的、关于建立统帅部大本营的文件还没有结束，他就突然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命令道：

“紧急派遣大本营有权威的代表到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去。去巴甫洛夫处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和库利克，去基尔波诺斯处的是朱可夫。今天就乘飞机去。立即出发。”

他走到桌边，环顾了所有在场的人，又坚决而且似乎是用威胁的口吻说：

“立即出发。”

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斯大林觉得，必须由中央不断发出强大的推动力来激发各司令部和部队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按照他的倡议和要求，瓦图京到黄昏时拟好了总军事委员会的又一份命令（由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营是第二天才成立的）。这份命令的草稿经过斯大林仔细修改。被称为第3号命令的这份文件相当长，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几段：

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

1.敌人由苏瓦乌基突出部对奥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区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拉杰霍夫实施主要打击，在蒂尔西特、希奥利艾、谢德尔采、沃尔科维斯克方向实施辅助打击，在6月22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损失，在上述各个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与德国接壤的国境线其他地段上以及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国境全线上，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

2.现提出6月23至24日各部队的最近期任务如下：

(1)西北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应采用集中(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突击的办法包围并歼灭敌方苏瓦乌基集团,至24日黄昏时占领苏瓦乌基地区;

(2)西南方面军应以若干机械化军和全部空军,以及第5、第6集团军其他部队的集中而强大的突击包围并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及布罗德方向上进攻的敌军集团。到6月24日黄昏时占领卢布林地区……

接着命令具体规定了根本不实际的进攻任务。斯大林亲自口授的第4点说:

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境线上,我允许越过国境线以及不受国境线限制的行动。[10]

三次使用"国境线"一词的句子结构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这个命令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尽管朱可夫已经飞往基辅,斯大林仍旧命令署上他的名字。

战争的第一个昼夜快结束了。斯大林还希望从纵深开进的兵团会阻止,然后粉碎入侵的德国部队。而且到晚上10点钟时,瓦图京带来了总参谋部的战报,其中让人放心地归纳说:"红军野战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后,德军在国境线大部分地段的进攻已被击退,并蒙受损失。"[11]大家有点活跃起来了,甚至是喜气洋洋。斯大林和他办公室里所有的人还不知道,德军在许多地方一昼夜间突人苏联领土达数十公里。

从23日早晨起,斯大林还抱有的幻想开始迅速烟消云散。他两次试图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联系。但两次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都简单地回答说:"司令员下部队了。"从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处也得不到一点确切的消息。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猜测:司令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控制不了事态的悲剧性发展。

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确在一昼夜之后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我在这里引用两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拟就并签发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风格和书写法):

第5352号密码电报

6月23日20点05分

第10集团军司令员：

机械化军为何不进攻？谁的过错。立即行动起来，不要惊慌失措，而要指挥。应当有组织地打击敌人，而不是无指挥地乱跑。您应当知道每个师的位置，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及其结果……

巴甫洛夫，福米内赫[12]

这位还能任职仅仅一周的方面军司令员从司令部所获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战争爆发后的第4天才明白了：敌军的快速集团两三天后就能从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作战的方面军所属第3和第10集团军各部队处境艰难。它们受到两翼迂回，一部分甚至被敌军绕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巴甫洛夫决定退却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还留有一条50至60公里宽的走廊。但要实现这个决定却极其困难。这个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将在这场战争中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命令之一。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只持续了一周多一点时间，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这个命令：

第13、第10、第3及第4集团军司令员：

今天，即6月25至26日夜间，不晚于21点开始退却，各部应做好准备。以坦克为前卫，骑兵及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部队为后卫。

这次行军应在强有力的后卫掩护下，昼夜兼程疾进。在辽阔的战线上甩掉敌人……应在一昼夜间一举跃出60公里以上……允许各部队充分征用当地工具并征集任何数量的马拉大车……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巴甫洛夫大将**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　**波诺马连科**

西方方面军参谋长　**克利莫夫斯基赫**[13]

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却的最后路线时，并不知道部队已经没有燃料和运输工具了，它们在战斗的最初几天里被敌人夺走或是被摧毁了。各兵团零乱的退却是在德军空军握有制空权、敌军的快速集团迅速迂

回运动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宽心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事态的悲剧性发展日益加剧。

此后几天内，特别是到月底时，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了致命威胁的规模，他在一段时间里简直丧失了自制力，处于精神极其压抑的状态。文件和当时见过"领袖"的人的证词表明，6月28至30日，斯大林极为沮丧和震惊，以致不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领导者。他的精神危机是深刻的，虽然为时不算太久。而在这次危机到来之前，他曾试图采取一些措施，发布某些命令，尝试过给最高指挥机构打气。在23日早晨讨论成立武装力量统帅部大本营时，他出乎大家意料，打断了讨论，建议在大本营下设立常任顾问室。马林科夫和铁木辛哥正在起草文件，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可是并没有表示异议。斯大林迅速地口述了常任顾问的名单。我在这里准确地引用这份名单，而且是按斯大林建议的原本。

> 在大本营下设立大本营常任顾问室，成员有库利克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空军司令日加廖夫、瓦图京、防空司令沃罗诺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梅赫利斯等同志[39]。

作为政府决议发出的这份决定由波斯克列贝舍夫签署后，用电报发给各军区和方面军。是的，该室只存在了两星期，就消悄地"寿终正寝"了，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

我想，应当算作斯大林和总参谋部战前失误的还有事先不曾仔细地研究成立战时领导国家的特别机构——国防委员会，以及武装力量的最高战略领导机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问题。这两个机构是在战争已经开始之后才成立的。此外，总参谋部也被削弱了，我想提醒一句，总参谋长就接连换了三个。这些失误，还有其他的许多疏漏立刻就尖锐地显示出来了。

从各方面军司令部来的零星消息、航空侦察所得资料和大本营全权代表的报告使斯大林陷人极端的惘然若失的状态。在听取瓦图京的例行报告时，他本人感受到几乎是令人麻木的惊慌不安。瓦图京字斟句酌，低声报告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试图进行反击，但空中掩护

薄弱，行动不协调，炮火保障很差，因此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部队受到了巨大损失，继续退却。而且往往是凌乱的后撤。瓦图京补充说，处境特别艰难的是第3和第10集团军各部。它们实际上已经被包围。德军的坦克纵队已逼近明斯克。

"您说什么？逼近明斯克？！您怕是搞错了吧？！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

"不是，我没有搞错，斯大林同志，"瓦图京仍旧声音不高，用歉意的口吻回答说。"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去的代表的报告和航空侦察的材料是一致的。今天可以说，一线部队没能在国境线上阻住敌人并保证后续部队的展开。西方方面军的战线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

6月23日、24日、25日，更不消说26日，斯大林已经料到边境上的战斗失败了，可是五六天里怎么会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150至200公里？！这简直不可理解！巴甫洛夫、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是干什么的？总参谋部为什么不去指挥部队？难道真是大祸临头了吗？军人们一声不响，听着斯大林恶狠狠的、令人难堪的唠叨，等到终于得到准许时，赶紧返回自己的总参谋部去了。



德军机械化部队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快速前进。战争爆发刚刚3个星期，古德里安的坦克车就深入苏联境内413英里。此时，希特勒要在两个月内灭亡苏联的狂言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

斯大林并不知道，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司令部不断发出新的命令和指示，而这些命令和指示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不仅处境危殆的西方方面军是这样，而且其他各方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第8机械化军军长里亚贝舍夫后来回忆战争的最初几天时（在专送总参谋部的报告里）说："直到22日10时，我才接到26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让我军在桑博尔市以西集结……我们行军80公里后，在23时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区，而在22时30分又接到新的命令：23日12时前，我军应开到利沃夫以东25公里处。这天下午，已划归第6集团军的我军又奉命开到亚沃罗夫地区……我们赶到了。23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又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开进到布罗德地区，26日早晨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而在此以前，我军一昼夜半中行军300公里……6月25日，第8机械化军在布罗德地区集结。早晨转入进攻，获得局部胜利，但整个说来没有完成任务。燃料耗尽了。空中只有德军飞机。27日4时，我们接到新的命令：全军后撤，作为方面军的预备队。我们开始后撤。6时40分来了新命令：向布罗德—杜布诺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但部队已经开始后撤。10时，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军级政委H·H·瓦舒金来到军指挥所。他以枪决相威胁，要求我执行命令。但部队已被包围。后来查明，方面军司令部原定的进攻已经取消了……直到7月2日，我们以两个师的兵力据守时，才得知进攻的命令早已取消了……我们各部队分别突围出来。按照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撤退到普罗斯库罗夫地区。我们向日托米尔的方面军司令部送去报告，但该市已被敌军占领……"据里亚贝舍夫证实，由于战斗和不停的调动，"撤到第聂伯河左岸的只有不超过10%的坦克和21%的装甲车辆。后来该军即被解散……"。[15]

我简短地复述了不为不英勇的里亚贝舍夫将军伤心的故事。但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和几个星期中，最高领导和方面军领导被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吓呆了，以自己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举动增添了混乱。没完没了的调动、缺乏灵活的协同动作、失去对各兵团的指挥能力以及不了解真实情况，只能加剧部队原来已经十分危急的处境。战前的年代里军队失去了首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仅仅有苏联士兵的自我牺牲、坚毅不屈、为被敌人占去的土地甘洒热血的精神是不够的。

战前的失算、指导能力不强、害怕挑衅、许多新提拔的指挥员和司

令员训练不够,使得军队和防务都很虚弱,难以驾驭,以致很快就丧失了自信心。报纸介绍了边防军人的英勇气概、航空兵和坦克兵的功绩,报道了全国奋起抗击敌人的情景……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在前线——这是不能对人民隐瞒的——惨剧日益逼近。斯大林感到全国都在看着他这位"领袖",他和伏罗希洛夫一起曾经一再向苏联人民保证红军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的"钢铁"意志剧烈地变形了,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振作起来。有时他似乎觉得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当瓦图京在例行报告中,在地图上指出第8和第11集团军沿着不同的方向撤退时,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之间的一个130公里宽的大缺口!西方方面军的主力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击溃了。而西南方面军眼下还能屹立不动。他斯大林怎么会不听专家的意见,批驳了最可能的主要打击方向就是西方方面军的看法呢?他怎么会一时糊涂了呢?为什么人们没有说服他呢?希特勒在欧洲的所有战争中都是直扑首都,以便尽快迫使对手投降。为什么军人们没有让他注意德国人战略的这个特点呢?现在只好对部队做大规模的调整。然而时间紧迫!

斯大林烦躁不安,对人严厉,不时召见一些人,有时则独自呆在别墅或办公室里,一连几个小时不见动静。铁木辛哥人民委员同时被任命为大本营首脑,他感到这个职务十分尴尬。周围的人们也明白,实际的领导作用和全部权力反正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而他的举止却火气大得有些反常;大家都看出了他的压抑和极端忧郁。斯大林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染了总参谋部的领导。结果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没有如实地权衡正在形成的局面(直到6月25至26日才一本正经地谈到防御,谈到修筑防御地区,动用预备队。大本营给部队发出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被认为是在绝望和不了解情况下作出的姿态,是一种不择手段、不计场合而只求取得些许成功的意愿。我在这里引用大本营的几份文件,它们表明大本营干预的是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同志:

拉库夫地区敌军坦克已无油料。大本营曾命令立即对敌坦克加以包围并歼灭之。为此动用第21步兵军及第2、第44步兵军之一

部。应立即抓住敌人并击破之。为空中进行打击做好准备。

1941年6月28日[16]

为了解决战术任务而建议动用三个步兵军的兵力?! 如果考虑到这些日子里方面军的处境,那就不难看出,这份命令也同其他许多类似的命令一样,是无法执行的。

再看大本营的另一份文件。

西北方面军司令员:

人民委员曾命令由您负责不迟于今天傍晚将敌人逐出德文斯克,毁掉桥梁并牢固地占领防御阵地,不让敌军在德文斯克地区渡到西德维纳河北岸。为加强进攻部队,可使用由112步兵师调来的加强步兵团。如果KB式坦克已经到达,则至少使用一个排以加强攻击力量并扫射敌军火力点。6月28日21时报告执行情况。

1941年6月28日[17]

我们看到,大本营连使用一个坦克排的兵力都做了规定……

斯大林夜间回到近郊的别墅后,就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可是他不能入睡。他起身走过客厅、饭厅。在列宁像的上方依旧亮着一盏电灯。漆成仿橡树的深色墙壁恰好映衬着斯大林阴沉的情绪。他漫无目的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走,瞟着电话机(别墅里有三架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是在等待着,同时又害怕听到可怕的新消息。他打开值班助理的房门:里面坐着的是鲁缅采夫少将。他急忙站起身来,探询地看着斯大林。别墅主人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将军的身影,轻轻地关上门,又走回自己房里去了。

斯大林在挂着窗帘的窗缝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夜间花园的轮廓。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很久以前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未来的战争将是发动机的战争。装甲坦克部队的集中可以形成强大的突击拳头,要抗御它们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人很聪明,然而他想搞宫廷政变……如果让图哈切夫斯基处在巴甫洛夫的位置,也许很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斯大林驱开了往昔的阴影,希望一觉解千愁,但是"睡梦"难成:现实太令人胆战

心惊了。

斯大林仍旧不能平静下来。米高扬关于1941年6月最后几天里斯大林举止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回忆录里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还有他——米高扬，决定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它手里。国防委员会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

> 大家决定上他那儿去。他当时在近郊的别野里。
>
> 这时，莫洛托夫说，斯大林这样垂头丧气，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丧失了主动精神，心情很坏。沃兹涅先斯基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他说："维亚切斯拉夫，你来领头，我们跟着你。"他的意思是如果斯大林仍旧这样一蹶不振的话，那就由莫洛托夫来领导我们，我们就跟他走。我们相信我们能组织好防御，能够真正地大战一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消沉情绪。
>
> 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别墅。他正在小饭厅里，坐在圈椅上。他看着我们，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他的神色有点奇怪，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奇怪。要知道本来应当是他来召集我们的。
>
> 莫洛托夫代表大家说，应该集中权力，以便迅速地解决各种问题，尽快把全国都动员起来。这样一个机构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斯大林惊异地看了大家一眼，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好吧，"他说道[18]。

我们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外部世界和封闭的、往往是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之中。外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内心世界则要困难一些。如果能够认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某些东西，那么对他的整个为人也就更加了解了。对斯大林来说，正在逼近的这场灾难不仅是对我国每个公民能够造成的那种危害，还是斯大林以之自许的人间上帝的毁灭。"领袖"正在从比其他人更大的高度上跌落下来。对于一个相信自己是出类拔萃、有洞察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来说，脚下出现的裂隙确实是一个无底深渊。斯大林处于深刻的精神震荡之中，几乎到了麻木的地步，这样过了几天，他才开始清醒过来。

斯大林可能认为，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到他这儿来是否打算撤销他的全部职务？甚至是想逮捕他？因为最方便的就是把一切过失都“推卸给”一个人。他斯大林早就相信，任何失误和失败都应当有一头“替罪羊”。应当让人们出出气，把有过失的人痛骂一顿。但斯大林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的威望太高了，以致他们好像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斯大林甚至在“垂头丧气”(按莫洛托夫的说法)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也是伟大的。如果他们读过别尔嘉耶夫的书，他们就会想起他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能从高处跌落，所以一个人的跌落本身就表明他的伟大。”[19]这种伟大是他们自己为“领袖”塑造的，而现在则希望他仍旧留在原来的高处并领导他们。

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试图在击溃西方方面军的德军进攻的道路上投入第13、19、20、21和22集团军，加上突围出来的残部，建立一道新防线。一度丧失了自制力的斯大林忽然由冷漠消沉一变而为精神亢奋，6月29日他两次突然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他恶言恶语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各个军事领导人。


战争初期的斯大林

斯大林面容消瘦、苍白，下眼泡发肿，眼睛由于不眠而布满血丝……他终于意识到了悬在全国、以及作为“领袖”的他本人头上的巨大危险的分量。如果不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不动员一切力量，德国人几个星期之后就可能打到莫斯科。可以证明斯大林试图振作起来、控制局势的最初几个步骤对他来说也许是很普通的：他着手撤换军事首长。6月30日，联共(布)中共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导。国防委员会主席握有无限的权力。祖国而临的致命危险要求集中每一个人的努力。他就任新职后第一步就是撤掉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并任命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来接替他。同一天，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下

令各部队从西德维纳河一线后撤并占据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和谢别日筑垒地带。斯大林一接到方面军司令员这项命令的报告，立即将这位上将撤职。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少将接到斯大林的命令："恢复原先的态势；回到西德维纳河一线去。"凌乱后撤的部队接到新命令后，既无法进攻，又无法防御。敌人察觉了这种混乱，对第8和第27集团军的接合部实行突击并突破了防线……这些消息并不能增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信心，他既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以便赋予各战略指挥机构在那些悲剧性的日子里迫切需要的信心，使它们能够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

克劳塞维茨关于危险和统帅心理表现的相互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位德国思想家在《战争论》中说：将领的智慧在危险中才显露出来。"直接感觉到自己及其他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会干扰清醒的理智——这是人之常情"。但克劳塞维茨立即补充说，伟大的统帅则相反，危险反倒会使他的智慧和意志更敏锐地表现出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危险和责任感不会增加他精神的自由和积极性，相反，会使他感到沮丧，因此，如果这种感受使得判断力更加活跃，更加敏锐，那么我们看到的无疑是一个气魄宏伟的人"。[3]

今天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斯大林没有表现出这种"宏伟气魄"，而这种气魄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许许多多注明日期为6月底的大本营文件，并没有为历史记录下斯大林为坚决掌握局势面采取的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

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在仅仅一周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大约是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希特勒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不要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



至 1941 年 7 月时,德"中央"集团军群已成功包围明斯克

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顺便说说,都表现为不记仇。"[31]

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明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但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一星期白俄罗斯首都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可靠程度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

70年代后期,大约在1976年或是1977年,我参加了以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为首的视察组。我们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帅汇报对我们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汇报之后,我们有几次谈起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和他对我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里没有提到您大约20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

实？”

“什么事？您指的是什么？”元帅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1941年7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缅诺夫的事。”

莫斯卡连科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

“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加以检验的……”

“可是您认为贝利亚的话是可信的吗？”

“他关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开脱……而且处在他当时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对罪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来……”

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里谈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1957年7月2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

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1941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22]。

莫斯卡连科终于慢慢地谈起来了……元帅回想着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

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大使拒绝为这件可疑的事情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6月底至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有的是机密，也有的是捏造。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周内显然没有表现出我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在战争胜利以后长期而又不厌其烦地宣扬的那种“宏伟气魄”。真正的领袖、统帅，一般说来都正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在极端异常的环境中，在历史的危急关头表现出“宏伟气魄”的。在普通条件下当一个英雄、天才、偶像要简单得多。正如塔尔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过问题正在于库图佐夫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总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苏沃洛夫在攻占伊兹梅尔的那个夜间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俄罗斯人民在1812年非同寻常的事件来临时，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25]



1941年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投入反法西斯卫国战争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7月3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要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德国将军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说，我们已经在14天内打赢了对俄国的战争，这并不是

夸大其词。"这个德国人显然过于匆忙了: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苏德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6月29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德军能够侵占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德国用来对付苏联的170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苏德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39]。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

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是信仰"在起作用"。

后代人只会感到惊奇,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而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残酷的岁月

7至8月间,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7月10日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8月8日又改组为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这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统帅。从6月30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而从7月19日起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7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往后,在刻画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为"统帅"的性格特征时,我将经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读者,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叙述整个战争、所有战役和战斗的任务。在许多地方我甚至不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

战争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

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如果不算卡冈诺维奇在前线南部地段的短暂停留的话。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从1941年6月30日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我国的后方、德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1941年10月，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只是在1944年1月开过一次全会。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

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1941年的夏季是特别残酷的时刻。长期以来，我们的书籍和教材讲到这段时期时，都只说是"德寇闪电战的失败"、"希特勒计划的破产"、"有计划的退却"、"我军暂时失利"等等。但是没有必要把历史描绘得光辉灿烂。历史有一个很可能是根本的特点：它只承认真相，真相迟早会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历史中显得多余。在许多专著和多卷本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见不到"失败"、"惨祸"、"被包围"、"惊慌失措"等涉及我军行动的字样。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甚至是整个方面军的大败、惨败。在历尽艰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鲜血才获得的胜利到来之前，这些都发生过。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德国军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德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不过即使在这以后，他也常常给身

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里有一份1942年斯大林亲自写下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名称，大概也没有意义。看来斯大林一面发出指示，一面在思考问题，匆匆草就了这份文件，连接受文件的人也很难读懂它：

1）第40集团军——7步兵师+2坦克旅。
2）卡图科夫——去第48集团军背后。
3）米舒林留在原地。
4）莫斯托文科去第61集团军地区。
5）利久科夫在叶列茨以西地区。
6）主要任务在北方。
7）第40集团军也进攻。
文件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写的。

什捷缅科少将[29]

在听取了部队又遭到失败或者后撤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有时口授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惩罚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图京签署的，也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命令出自谁的手笔。例如，7月10日，当已经得知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能在有利的防线上站住脚，而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却借口说后方有破坏小组活动时，斯大林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

总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对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绝对的不满。

首先是至今尚未惩罚不执行你们的命令、像叛徒一样放弃阵地和没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御地区的指挥员。对胆小鬼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你们的防务将不会收到效果。

你们的歼击支队至今不见活动，它们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于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无所作为，西北方面军各部队始终在后撤。现在应当停止这种可耻的做法了……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检察官和第三处处长应立即去前线部队并就地处

置胆小鬼和叛徒……[26]

战前并没有为指挥部队的最高战略机构——大本营准备有专门设备的工作地点。无论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都没有可以抵御敌军空袭的指挥所，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初都坚持要求修建这样的指挥所。因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别墅去，和这座别墅毗邻的一幢楼里有总参谋部的好几个局。地下铁道的“基洛夫”站被从运输网中分割出来，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那里也和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样，总是在桌上铺着作战地图，上面标明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来，1941年冬天在近郊的别墅修建了一个不大的防空洞，同时还为他装备了一个通讯站，斯大林可以通过它和各个方面军通话。

斯大林注视着总参谋部准备的作战地图，他清晰地看到敌人迅猛地展开攻势的三个主要方向：西北部向列宁格勒方向、西部向莫斯科方向和西南部向基辅方向。斯大林很可能是在这时作出了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建议在上述三个方向上分别成立指挥部。总参谋部自然支持他的建议。7月10日，大本营作出决定，成立以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北方向指挥部，以铁木辛哥为司令员、以布尔加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方方向指挥部和以布琼尼为司令员、以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南方向指挥部。看来，这个决定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各个指挥部却未能认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于斯大林：最高统帅建立了这些战略指挥机构，却没有赋予它们应有的权力。命令都越过它们直接下达到部队，也不重视各指挥部、参谋部的活动。而且，建立这些指挥机构事先并无计划，因此既缺乏相应的干部，又没有最起码的设备保障。各指挥部不久就成了斯大林责怪的对象，说它们“消极而优柔寡断”。

从今天的高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除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我们知道，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6月27至30日，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

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

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我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就使敌军有机会将我军一个个兵团各个击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几乎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往西方方向。战前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深夜3点左右,斯大林在等着总参谋部来报告过去一天中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他在摊开着作战地图的长桌边慢慢地来回踱着。他并不为北部战线担心,那里只是在6月底才开始有激烈的战斗行动。西北战线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两个多星期里,部队后退了将近450公里,放弃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没有利用涅曼河和西德维纳河上易于防御的地区。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员索边尼科夫辜负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个半月后,他就被斯大林撤职了。

特别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战线的局势。斯大林全神贯注地看着战线的奇怪形状,这条战线到7月10日已经从国境线后退了(想想都叫人害怕!)450至500公里……屈辱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气愤涌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喉头:一个拥有44个师的方面军居然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他实在太过分地信任巴甫洛夫了!巴甫洛夫把他骗得好苦啊!应当今天就吩咐加紧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调查和审讯。斯大林在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未必知道战争爆发时西方方面军所属各师中有将近一半并未达到战备状态:其中有12个师只是刚刚着手动员,而正在组建的两个军根本没有坦克。

战争前夕,在分析力量对比时,斯大林非常喜欢计算师以及其他战争力量和手段的数量。但却忽略了质量方面:各部队作战装备的完备程度、部队的团结和人员的训练程度。战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组建新的兵团,尽管当时的兵团数已经超过200个。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德国武装部队。

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西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就全面瘫痪了。地图上两个粗大的蓝色箭头6月29日在明斯克以东的地方会合了,这就是说,西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了。今天斯大林得到报告,主力部队仍在组成集团或是单独突围……可是方面军所属的第3、第4和第10集团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想到这里,斯大林暗自决定,应当签署贝利亚今天送来的那份文件,文件规定设立15个新的特别集中

营，用于审查突围人员……

斯大林敏锐的记忆力记下了7月初的一天早间战报的数字：西方方面军的44个师中有24个被彻底击溃，其余20个师损失了30%—90%的人员和装备[27]。无需多说，这个主要方面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就预先决定了其他各方面军的失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思忖着——他们建议用西方方面军所辖的第13、第19、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建立一道新防线。在战争岁月悲剧性的发展演变中，斯大林（这一点是不应当否认的）逐渐懂得了战略学的基础知识。他将来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瓦图京及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帮助他弄懂了战略学的奥秘、形成某些战役的决策和意图的辩证法。不过有朝一日，人们会把一些虚假的说法当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来，说正是他斯大林给军事科学注人了崭新的观点。例如，炮兵进攻的思想、包围敌人的新方法、夺取制空权的途径、建立多梯次的灵活防御等等。连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具有军事天才。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失败，一个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战争最初几周中的失败。



6月29日，德军的装甲部队合围明斯克，苏联西方面军的主力被牢牢地包围起来并予以打击。此次战役使苏军损失30万人、2500辆坦克、1500门大炮

而眼前还是战争的残酷岁月，一切都岌岌可危。德国人占领明斯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继续查看着作战地图，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德国人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在西南方向进行主要的打击。而他却在那边配置了58个师，其中有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而且该方面军的主力也仿佛被置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之外，因而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



激烈的坦克战

的。在西南方向上部队的部署不当使德国人的坦克拳头得以直捣卢茨克和杜布诺之间防御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记得，早在6月30日大本营就批准将该方面军的部队后撤至旧国境线的筑垒地区，这就意味着后撤300至350公里。斯大林认为，总的说来，该方面军稍稍遏制了敌军的攻势，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战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损失是巨大的：将近30个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大约350德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苏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英勇顽强，三周内在苏德战场上德军损失了约15万官兵、950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后才查明的那样，中央当时得到的关于我方损失的数字是压低了的，而敌方损失数字是被大大夸张了的。下面是作战两周后向斯大林报告的数字（我保留了资料原来的写法）：

损失飞机：	敌方	至少1664架
	我方	889架
坦克：	敌方	2625辆
	我方	901辆

敌军损失兵力：击毙131.2万人。此外，在各地区的激战中，敌人蒙受重大损失，而我军由于后撤，损失无法统计。许多空投破坏分子已被歼灭，但未列入统计。

俘虏30004人，此外，俘获许多空降兵，但未列入统计。至6月29日止，我军失踪及被俘约15000人。

在波罗的海击沉5艘潜艇，在黑海击沉1艘。击沉2艘浅水重炮舰……[28]

报告是极其紊乱而又失真的。根据这些报告很难对各条战线的局势、力量对比、飞机和坦克的准确数量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而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一切是大权独揽的产物，因为当时并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的垮台，几十个兵团陷人包围——与此同时却写出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左的战报。可是斯大林却是根据这些战报行事的！他连想也不曾想到他会被人欺骗。因此大本营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根据愿望、设想、可能，而不是严格根据实际情况。

不过无论怎么说，法西斯打击的最初的威力总是明显地被削弱了。而主要的是德军统帅部没有达到希特勒提出的目标——消灭红军主力。

红军在继续战斗。它在退却，可是仍旧在战斗。斯大林审视着地图上激烈战斗的情景，逐渐得出结论：战争将是长期的。如果我们能在最近时期内坚持住，那么胜利之风就会鼓起我们的船帆。我想先提醒读者一句：在取得最初的几次重大胜利（眼下距此还很遥远）之后，斯大林身上将出现过高估计我方力量的征状，结果导致1942年不能原谅的重大错误。

……斯大林一声不响地听完朱可夫关于各条战线上形势的例行报告后，问道：

"您再说一遍，西方方面军各部队人员和装备的足额程度有多大？"

"平均是10%—30%。只有个别部队的人员、火炮和坦克达到或超过50%。是个别部队。"朱可夫又重复了一遍，"实际上西北方面军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西南方面军的局面稍好一些。特别困难的是损失了大部分反坦克炮。为了加强反坦克能力，必须采取某些措施。"

讨论完加速生产反坦克炮所必须的措施，而且和沃兹涅先斯基通过电话之后，斯大林盯着朱可夫，问道：

"为了加强我们的反坦克能力，现在，今天立即可以做的有哪些事呢？难道除了反坦克炮之外，军人们不认为有其他的反坦克手段吗？"

"那怎么会呢，斯大林同志。空军也大有用武之地。"

朱可夫解释了空军反坦克的技术能力和作战能力。斯大林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他命令立即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朱可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他就把文件带来了：

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司令员，

红军空军司令员：

战争开始以来的20天里，我空军主要是对德军机械化部队及坦克部队作战。参加对坦克作战的飞机有几百架，但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空军对坦克的战斗组织得很差。如果组织好空军对坦克的打击，则坦克部队不仅能被阻止，而且能被击破。

1.对坦克部队(纵队)的攻击应以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及强击机率领，同时投掷燃烧弹。攻击时应展开队形，以垂直于坦克纵队的方向多次反复攻击。

2.在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和强击机之后，由各式轰炸机进行攻击，投掷爆破弹及燃烧弹。攻击时以9架为一梯队，个别瞄准……[29]

为了扭转事态悲剧性的发展，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斯大林绞尽脑汁，从而逐步摆脱了在此以前他从未体验过的震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早在1941年7月5日他吩咐给各部队发的一份电报：

各方面军司令员(除外高加索方面军及远东方面军外)：

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斗中，许多高级、中级、低级指挥员和士兵——坦克兵、炮兵、飞行员等表现了罕见的英勇。抓紧向统帅大本营呈报功绩卓著人员名单，以便授予政府奖励[30]。

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茹科夫、兹多罗夫采夫、哈里东诺夫苏联英雄称号(卫国战争中的第一次)，以表彰他们在空中撞击德国

轰炸机的英勇行为的命令在报上发表后，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说：

“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法西斯恶棍是可以击败，也应当击败的！”他不等回答就挂了电话。

是的，应当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报告和报刊每天都介绍千千万万的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惜牺牲、为每一道防线而战斗的事迹……

除了纯粹的军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最近几天，他同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民兵师的问题。斯大林当时还不曾料到，这项倡议会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时竟然能组成将近60个民兵师、200个独立团，它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会起很大的作用。

7月4日，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呈报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制定保证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斯大林几乎看也不看就签了字，因为接待室里挤满了等候接见的军人。而他只能指望从各条战线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沃兹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报告说，6月3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总动员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在最短期限内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沃兹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晋见过斯大林，报告了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的撤运和安置顺序”决议的执行情况。按照计划，首先撤往东部的只是邻近国境线的企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天，军事上的失利就迫使我们彻底重新安排。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在极短的时间内(到1942年1月)能运走而且很快投产1523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1360个国防工厂。对这个事实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发扬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以赴，整个庞大的工业才得以向东迁移了几千公里，而且很快就开始恢复蒙受了损失的军用武器库。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尽管进行了大迁移，而且常常遭到轰炸，国防工业在1941年仍然生产了12000架作战飞机、6500辆坦克、近1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

……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1170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

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

今天我们知道,1941年11月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

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独裁者的地位。

前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对我这样说过:"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前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请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接着说:"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装运特别重要的物资)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

(顺便插一句,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有一次看到一份材料,是莫斯克温少将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9]。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而波斯克列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

科瓦廖夫继续回忆说:"我去向斯大林汇报的时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我当时暗自思量,这些人只能碍事。他们从来也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着听我报告,不时记下点东西。斯大林却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电话,签署文件,把波斯克列贝舍夫


卡冈诺维奇

叫来，让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们却一直坐着。一会儿看看斯大林，一会儿看看进来的人……我见到这种情景总有几十次……看来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场。也许是为了执行可能交办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有个历史的见证人……卡冈诺维奇通常是不在场的：他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又是骂人，又是高声吼叫，又是威胁。卡冈诺维奇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像其余三个人那样，在斯大林那儿坐着。斯大林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挂上电话。他自己说话很简练，要求报告人也简短明了。向他汇报要确凿，不能只说个大概齐；他会马上阴郁地压低了声音说：'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最后说："我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许多许多次，每次去都提心吊胆。总是碰上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他老是干巴巴的，让人望而生畏。他从来不说'您好'，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汇报完了，没有问题就赶快走，这才松了一口气。越快走越好！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老是这样嘱咐我。我发现，斯大林以他的权力、记忆力和智慧仿佛使每个人都感到压抑、诚惶诚恐……到他那儿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实际价值更渺小……"

我想，科瓦廖夫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对各种文件以及在斯大林那儿举行的各种会议的分析表明，就是在战争时期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胆敢同他争论，维护自己的观点。他确实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了所有的人。我再说一遍，幸好战争时期在斯大林身边有一些杰出的将领，他们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为斯大林所采纳并得到他赞许的种种建议。

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16至18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列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8小时15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

华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两同志：

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

约·斯大林

1941年8月25日[⑫]

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8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战场上的现实本身很快就会校正最高统帅的工作程序、风格和方法。

斯大林逐渐卷进了战争的残酷节奏，不过暂时多半还只是作为批准或否决总参谋部建议的人。他始终试图找到能够影响局势的某些新杠杆。所以他签署了关于加强空军反坦克作战的指示。在听取了关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坚持由大本营就这个问题给各部队发出一份专门指示：

应向现役部队全体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士兵讲清楚，在战场

上丢失武器是最严重的违背军人誓词，犯这类过失的人应受战时法律惩处。应增加编制内的武器收集队的人数，并责成其负责收集战场上遗留的所有武器……[33]

还应当指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斯大林的许多建议都带有国内战争时期的味道。例如，1941年9月，在同布琼尼用"博多机"谈过话之后，斯大林突然对骑兵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时总参谋部正在起草大本营关于战争头两个月的教训的文件，这份文件预定发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文件几乎已经准备好了。斯大林读过之后，基本上同意，但命令再加一段：

第4，我军对骑兵的作用估计尚嫌不足。按各战场目前形势，敌军后方延伸数百公里，而且穿过森林地带，根本不能保证不受到我方的大规模破坏，红军骑兵对敌军绵延的后方实施奇袭对瓦解德军的指挥和供应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现今在前线及火线前方游荡的我骑兵部队投入敌人后方，敌人就会陷于困境，而我军受到的压力就会大为减轻。大本营认为，为对敌军后方进行奇袭，只需几十个歼击型的轻骑兵师，每师3000人，携带少量辎重而无需庞大的后勤工作……[34]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领导人

这个想法似乎不无道理，然而这实际上是试图回到国内战争的经验，甚至是回到遥远的1812年卫国战争的经验上去。斯大林对军事科学的了解只有普通认识、单纯健全思维的水平，却想为我国由于他的失误和希特勒的奸诈而陷

人的险境寻找出路。在古典式摔跤里,类似的险境是指一个运动员使对手处于"搭桥"的姿势,而力图把他的双肩压到地毯上。如果做到了,就算获胜。1941年的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斯大林都在"搭桥"。当然不是他本人,而是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军队。不过由于他习惯于代表他们,所以也可以说是他被希特勒置于这种对他来说极不习惯的状态。国家的命运千钧一发,处境岌岌可危,因此斯大林把任何一种可能的手段都看成是万应灵丹,要求草拟形形色色的指示,类似上述关于组建和使用轻骑兵师的指示。

斯大林又想起了巴甫洛夫,不禁心头火起: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怎么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把什么都丢得干干净净?当初在任命巴甫洛夫为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之前,他在这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时,巴甫洛夫给他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报告条理清楚,议论老成持重,有信心……是的,他经验不足:西班牙战争之后一步登天……他怎么会让指挥部队的杠杆脱了手?他的司令部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保证部队的战备状态?斯大林已经不愿意回想,6月中旬,他和铁木辛哥收到过巴甫洛夫的两三封密码电报,恳请让军区部队进入野战阵地。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请求批准局部动员,说明必须以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却一再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巴甫洛夫怎么能这样马马虎虎地把什么都丢光了?一想到这里,斯大林就感到五内俱焚。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召人的按钮。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悄悄地进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

"除了巴甫洛夫之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还有谁?什么时候开庭?判决书草案在哪里?"他不等回话,又补充说:"把乌尔里希叫来。"

波斯克列贝舍夫依旧悄悄地走出了"主人"的办公室。斯大林继续在长桌边踱来踱去。他在转身时,扫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的著作他读得很少;《资本论》从来没有读完过,不过有一些著作他是读过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按斯大林的想法,这是关于社会的学说中的主要环节。他对恩格斯的评价并不太高。1930年他去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时候,甚至号召过批判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战友的"错误"论点。对了,按斯大林的想法,恩格斯关于俄国的战争历史写得还是不错的,对苏

沃洛夫的统帅天才评价很高，把库图佐夫看得低了一些，指出了俄国军队为解放被拿破仑奴役的欧洲而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中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不过这只是些零星的章节，而且其中也有不少错误。

还有列宁……当斯大林拿起他的著作时，总感到自己平凡，甚至庸碌。"捍卫"列宁使他得以成为独揽大权的领袖。被他消灭了的所有那些低能儿始终弄不明白，他的主要力量究竟在哪里：就在于解释列宁思想的垄断权。但是列宁也有些东西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称为自由主义……他想起一件事，不禁暗暗责怪自己一时的软弱：6月29日，他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贝利亚一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走出来，他当时意志消沉到了极点，火气头上大声甩出一句：

"列宁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莫洛托夫诧异地看了斯大林一眼，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其他人也都不做声。他本来不应当说这种话：别人可能会记下来，而且把它看成是惊慌失措……要知道，大人物随便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会被遗忘。特别是他们的软弱。

斯大林对遥远的和并不遥远的往昔的追忆被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断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桌边，把一个薄薄的卷宗放在桌上。最高统帅飞快地把送来的文件看了一遍。最上面放的是：

克里木战争

18世纪下半叶，因俄国在近东势力的迅速扩展与英、法两国在近东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而爆发的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主要以俄国的克里木半岛为战场，故名克里木战争。战争开始于1853年，止于1856年。战后交战国在巴黎举行和会，签订《巴黎和约》，俄国的势力也大为削弱。



判决书(草案)

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

由集团军级军法官乌尔里希(主席)、

师级军法官奥尔洛夫和坎德宾(委员)组成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书记员、军法官马祖尔参与下

于1941年7月×日在莫斯科市秘密审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

1.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7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大将;

2.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1895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少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63—2条及第76条规定的罪行;

3.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1889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通讯主任,少将;

4.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1897年生,原任第4集团军司令员,少将,

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80条第2款规定的罪行……

草案接着声称,预审查明:

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位,后者利用该方面军参谋长的职位,为敌人进行工作。他们出于阴谋的目的,不使所属指挥人员准备迎接战争,削弱了军区部队的战备动员,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接下去全是这个调子;斯大林跳过了这些页码,只是读了最后一页:

因此确认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63—2条及第76条所规定的罪行;格里戈里耶夫和科罗布科夫犯有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80条第2款所规定的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上述事实及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及第320条，判决如下：

1.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2.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

3.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

4.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剥夺巴甫洛夫的大将军衔，剥夺其余三人的少将军衔，判处全体四人极刑——**枪决**，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准上诉[9]。

斯大林看完判决书草案后，对站在写字台边上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我批准这个判决，不过，让乌尔里希把诸如'阴谋活动'之类的废话删掉……让他们不要拖延。不准上诉。然后用命令通知各方面军，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惩处打败仗的人是手下无情的……"

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在开庭之前就决定了。到7月22日"开庭"时，只需走走过场就行了。被告请求把他们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线：他们将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请求法庭相信：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由于极端不利的处境。他们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乌尔里希一面打哈欠，一面催促着：

"简短一点……"

当天晚上，他们就被处决了。斯大林再也没有关心过这些人。可是他不曾想到，1956年11月5日，总参谋部在仔细调查了对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里戈里耶夫和科罗布科夫的指控根据之后，会作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

涉及西部特别军区几名将军的现有文件和报告并不否认他们在动员军区备战方面的许多重大失误，但推翻了指控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里戈里耶夫、科罗布科夫及克雷奇五位将军犯有贪生怕死、无所作为、缺乏指挥能力、有意破坏对部队的指挥及不战而向敌人投降的罪行[8]。

残酷的岁月，残酷的人们……斯大林很了解巴甫洛夫，在任命时

也同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及科罗布科夫将军谈过话。他们两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许,他们在战前和战争初期有不少失误,但是这些人忠于祖国,是真正的爱国者。由于干部紧缺,他们被任命时越过了许多中间环节,直接担任高级职务,他们所受的培训不够,未能在决定性的时刻正确地组织抗击优势敌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像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都是1937年以后急速提拔上来的。他们有爱国精神、大胆、英勇,但是还缺乏经验和统帅的智慧。这只能靠日积月累。然而斯大林消灭了好几个层次的指挥人员,从而把提拔起来担任他们的职务的那些人也置于分外复杂的境地。

斯大林是首先应该对战争初期的悲剧负责的人,而他却对受他的失误之害的那些人表现了罕见的残酷。他们固然也都犯有过失,谁也不打算为他们开脱。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形势、仓促的提拔以及作为它的后果的不够懂行而造成的过失。别尔嘉耶夫在《俄国的命运》一书中写道:"战争的残酷、我们时代的残酷不单单是人们、个别人物的残酷、狠毒和铁石心肠,虽然这一切都可能是伴随而生的现象。这是历史命运的残酷,是历史运动、历史考验的残酷。人的残酷是令人憎恶的。"[③]战争本身是残酷的。然而斯大林往往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而这确实是令人憎恶的。你们不妨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日丹诺夫和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报告形势时,援引了一些事实,说明德军在进攻我方阵地时,把妇女、孩子、老人赶在前面,从而使防守部队极其为难。孩子和妇女喊着:"别开枪!","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苏军官兵茫然不知所措:怎么办呢?也不难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的感受:他们的背后是德军冲锋枪的枪口,而前面等待他们的也是死亡。斯大林迅速作出了反应。他的反应符合他的本性——极度的残酷:

听说德国鬼子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老头儿、老太婆、妇女、儿童驱赶在部队的前面……听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人认为,对待这样的代表是不能使用武器的。我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中间真有这样的人,那就应当首先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比德国法西斯还要危险。我建议: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

及其帮凶，无论是自愿的帮凶还是被迫的帮凶……照着德国人及其代表们，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使劲打吧，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

斯大林同志1941年9月21日4时口授。**沙波什尼科夫**[⑧]

战争就实质而言是残酷的，但这里却是另一种残酷：不仅是对敌人的残酷（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残酷。“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告诉他说，这是些妇女、老人、孩子，可是他却说：“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及其帮凶……”对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要用冲锋枪“狠狠地打”吗？！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更无法为之开脱的……的确，“人的残酷是令人憎恶的！”。对自己的同胞残酷、对那些被道德上的混帐东西驱赶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人们残酷，正如对那些被他自己委以重任的人残酷一样，实际上是承认自己有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自己残酷无情。而这是斯大林做不到的。



1941年9月，德军投入40个师进攻列宁格勒。图为德军在距该城15公里处的一处阵地

我想举出两个例子，它们会更使人感到，在噩梦一般的日子里斯大林对这些将军的惩治并不是单纯的感情冲动，而是30年代末他的专横的继续。在这两个例子中，被处决的将军们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战后，曾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工作过的福明少将写道：

巴甫洛夫从1940年8月起，举行过5次集团军级的野战演习、1次集团军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就地作战演习、5次军级的作战演习、1次方面军级的作战演习、1次有两个坦克军参加的无线电演习、2次师级和1次军级操练。巴甫洛夫仔细地注视着敌军的部署

情况，一再向国防人民委员提出将军区部队由纵深调至边境地区。战争爆发时，军区部队正在整编。正在组建5个坦克军、1个空降军、3个反坦克旅等等。上述各部队都还没有组建完毕，物资装备也不齐。

巴甫洛夫知道德国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所以请求允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6月20日，由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签名的密码电报通知巴甫洛夫说，他的请求已报告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不允许进驻野战工事，因为这可能招致德国人寻衅。

无论是战前还是在艰难的防御作战期间，我个人都不认为巴甫洛夫的行动中有任何破坏行为或是叛卖行为。方面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巴甫洛夫没有能力，而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突然性、我军占据筑垒地域太晚、库利克不懂行的干预……[39]

下面是桑达洛夫上将给库拉索夫大将的报告。

至于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将军，应当说，对这位在芬兰战争中曾经率领自己的一师人英勇作战的、有才能的指挥员的不公正是骇人听闻的。芬兰战争结束后，科罗布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长，后来，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接手指挥第4集团军，他是一位勇敢而积极的集团军司令。他的不足之处是他力求无条件地执行军区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

为什么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的恰恰是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却继续存在，而且同方面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的第4集团军的司令员？1941年6月底，按照摊派（请注意，是“按照摊派”。——本书作者注），西方方面军应当有一名集团军司令员交付审判，而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第4集团军司令员。第3集团军司令员和第10集团军司令员当时不知道在哪里，同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决定了科罗布科夫的命运。科罗布科夫将军受惩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员。我认为，他日后本来是可以跻身于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列的……[40]

有许许多多原本可以成长、但却未能成长起来的人。很多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也有不少将军在竭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之后，不愿沦为俘虏或是斯大林的惩治而自杀身亡。档案馆中有许多报告谈到这种情况。第17摩托机械化军军长彼得罗夫少将向铁木辛哥元帅报告说,6月23日,他的副军长科若欣自戕身亡……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科佩茨自杀……西部特别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列斯捷夫在报告中把自杀解释为“由于空军的部分失利和较大的损失而引起的胆怯心理……”[41]。当时说的（也许只是害怕被人指责为惊慌失措分子吧?），失利是“部分的”，而损失只是“较大的”……

被卷进悲剧性事件漩涡的某些将军,其命运比自杀还要悲惨。

1941年8月,国家安全机关向斯大林报告说,有两名将军自愿投降了德国人,而且为德国人效力。一个是原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另一个是原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斯大林批示:“审判。”不是所有的命令,远不是所有涉及前线事务的命令,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如果都执行了的话,那么德国人秋天就不会打到莫斯科城下了。可是像“审判”这样的命令却是肯定执行的。1941年10月,这两名将军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被缺席判处枪决,“并没收个人财产,要求剥夺所受奖励——苏联勋章”[42]。

那些愚蠢而又厚颜无耻的告密者想不到，卡恰洛夫已于1941年8月4日被敌方炮弹直接命中而牺牲。然而直到1956年以前,他还活着的家属却一直背着“叛徒”亲属的黑锅。波涅杰林的命运更为悲惨。1941年8月,他在被包围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而被俘。希特勒集中营里四年悠长的岁月并没有摧毁将军的意志,他昂然经受了苦难。他使意志颓丧的人振作起来,他坚决拒绝和德国法西斯合作。1945年获得解放并遣返后,波涅杰林被逮捕了并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了五年,虽然他早在1941年就已经被缺席判处死刑了。由于波涅杰林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申诉,他于1950年8月25再度受审,而且再次被判处枪决。波涅杰林少将两度被判死刑,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集中营中历尽苦难,最后被判决,仅仅因为他不幸在失去知觉时被俘虏了……

残酷的岁月,残酷的人们……斯大林从战争一开始,自己刚从丧魂失魄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为了挽回局面就采用了自己屡试不爽的手

段:镇压和加剧恐怖感。成千上万的人在前线牺牲了,更多的人沦为俘虏。突围出来的人和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人都要被关进"接受审查的特别集中营"。贝利亚有许多报告是谈这些"特别集中营"的职能的。经过审查之后,一部分军人被派往正在组建的新部队中去,另一些人被就地处决,或是被发送到集中营去长期监禁[83]。他们的命运分外悲惨:屈辱、丧失了名誉,不仅是他们自己,而且连累了家属。自然,这些人中间也有自觉地背叛了祖国的人,或者是由于胆怯而没有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人。我们在这里不是指他们。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对苏联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我们通常以为仅仅限于巴甫洛夫及其司令部的将军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就在这期间批准逮捕了一大批指挥员。其中有:

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第6步兵军军长;

阿鲁沙尼扬少将,第56集团军参谋长;

戈皮奇少将,工农红军通讯部部长;

戈鲁什克维奇少将,西方方面军副参谋长;

伊万诺夫中将,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预备役;

库兹明少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

列昂诺维奇少将,第18集团军参谋长;

梅利科夫少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

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第4坦克师师长;

罗曼诺夫少将,第27集团军参谋长;

谢利瓦诺夫中将,第30步兵军军长;

谢马什科少将,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

特鲁别茨科伊中将,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

齐鲁利尼科夫少将,第15步兵师师长[84]。

这份名单并未包括全部被捕者。这些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以重返前线,有些人长期被关在集中营,有些人则罹难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只是批准逮捕,不过有时他也亲自下达某些指示。例如,1942年8月25日5点15分斯大林曾口授一份电文,发往斯大林格勒,电文内容如下:

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亲收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布良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冲向奥廖尔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地段的准确情报……。[45]

斯大林不便直接怀疑扎哈罗夫和叶廖缅科,然而最高统帅显然对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少将产生了怀疑。他不懂得德军指挥官寻找我方最薄弱地段并正是在这些地段实施打击这一规律,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准确情报……"对于特科工作人员来说,收到这样的电报以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根据了,因为有最高统帅本人的指示。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不过他的运气还不坏,总算活了下来。

斯大林从未完全放弃残忍的"游戏"。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严酷的年代可以为"领袖"的残忍措施辩解。

3 艾蒿的苦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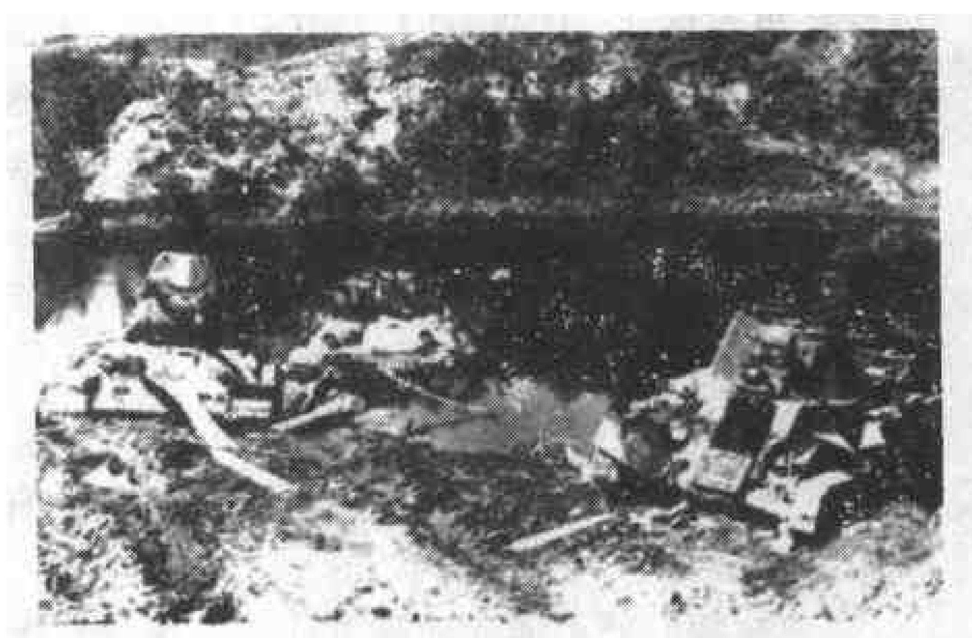
8月初,有一天斯大林像往常那样到天亮以前才在一场不安的睡梦中打了个盹儿。他的头刚一接触枕头,便立刻陷入深沉凝重的黑暗之中。斯大林有一次曾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过他很少做梦。他从不受良心折磨,眼前从不出现被他消灭的党内同志的身影,耳边也从不回响妻子和死去的亲属们昔日的声音。他天生好像带有精神绝缘体,使他的头脑不受精神痛苦、忏悔、良心谴责的干扰。在他的思想感情中已经冻结、关闭了那些能对人类道德的表现作出反应的中枢。无论如何,由于没有良心,他从不失眠。

但是今天他睡了三四个小时,却醒来好几次。不,不是幻影,不是

恶梦,不是排炮轰鸣妨碍他人睡。令他一再醒来的是一种气味,艾蒿的苦味,和他多年前在察里津城外嗅到的气味一模一样。当时他和伏罗希洛夫到阵地巡视,归途中在一座高岗旁边停留了几分钟,吃片面包。斯大林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在赤热的草原充满苦艾的气味下打起盹来。在热浪中,在无边无际灼人的天空下,他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孤立无援。他渐渐沉入梦乡,觉得自己好似一叶木片,正随苦艾的浪潮飘去……今天他又清晰地感到,甚至是尝到了过去的苦味。他立即回忆起昨夜总参谋部的报告,于是睡意全消。几乎在整个广阔的战场上,失败的苦涩味都在困扰着我军和它的最高统帅。

斯大林起床后喝了茶,但是没有去克里姆林宫,而是命令沙波什尼科夫12点到他这里来报告各条战线的情况,提出结论和建议。11点3刻总参谋长来到别墅。他走近摊在桌上的地图,仔细挑选用词,轻声地开始报告。斯大林甚至在想,“他像是在讲课”,但并未打断他。这堂“课”真可怕,带着苦艾的涩味。

沙波什尼科夫条理分明地开始报告:“可以说,战争初期我们完全输了。战斗已经在通往列宁格勒的各条大道上、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在基辅防御中枢地带展开。我军防线仍不够稳固。我们不得不在全线大致平均地配置兵力,因为不知道敌人明天会在哪里集中兵力进行下一次突击。敌人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前线不少地段缺乏第二梯队和强大的预备队,使我们的情况更加严重。德国空军握有制空权,虽然他们的损失也很大。(当时谁也不曾料到,到1941年9月30日我们会损失8166架飞机,占战争爆发时我国飞机总数的96.4%)[68]现役部队212个师中,人员装备配齐80%以上的只有90个师。”沙波什尼科夫平静而有些单调地继续报



1941年7月,红军在斯摩棱斯克周围与中路德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苏军坦克损失惨重,但同时也粉碎了希特勒的狂言

告说:“在通往列宁格勒的各条要道上的防御逐渐获得‘弹力’,德军前进的活力看来正在消失。我们恐怕得把全部舰队调进喀琅施塔得。巨大损失在所难免。”

“斯摩棱斯克战役,”总参谋长接着说,“使我们得以在最危险的西部方向挡住德军。据我方统计(他看了看笔记本),是役德军参战的有60多个师,总共约50万人。您知道,斯大林同志,为了加强防线,早在7月初就将第19、20、21、22集团军调给西方方面军。但兵力仍嫌不足,师的战斗队形常常只有一个梯队。我第29、30、24、28集团军在这个方向进行的反攻只取得部分战果,支援第20和16集团军冲出包围,撤离战场。我军的反攻破坏了德国人的一次突击。”

“那么中央方面军在这个战役中有什么作用呢?”斯大林终于插话了。

“有充分理由可以预料,德军集群的突击中心将移到这里。但方面军只有24个不满员师,单一梯队配置,这令人深感忧虑。也许我们需要在这里再组建一个方面军集群……”

斯大林了解了主要的东西:斯摩棱斯克战役,尤其是在叶利尼亚之战,表明红军甚至在敌军主力集中的主要方向也有挡住敌人的实际可能。

后来他又听到了沙波什尼科夫那从容不迫、冰冷生硬的话语:

“……在旧边界上‘咬住’敌人的打算落空了。第5和第6集团军未能在这里坚持住。目前德国人实际上已到达基辅筑垒地域的外围弧形防线,将战场一劈为二:北边是第5集团军,力图守住科罗斯坚筑垒地域;南面是主力——第6、12、26集团军。从南北两面对突破我军防线的德军两翼组织的反击只取得部分战果。到今天早晨,可以说第6和第12集团军的退路已被切断。”沙波什尼科夫痛心地明确说道。

这时斯大林不让元帅往下说了,他说:

“我为第聂伯河、基辅担心。要想点办法……”

总参谋长答道:“我们已预先下令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巩固的防线。”

“现在我们能不能和西南方面军领导通一次话?”

“如果基尔波诺斯和赫鲁晓夫没有下部队,我们就能同他们联系上,”沙波什尼科夫答道。

几分钟后“博多”电报机就打出“在机旁的是基尔波诺斯和赫鲁晓夫”的字样。让我摘录一段保存在军事档案中的对话记录：

在机旁的是**斯大林**：你们好。决不能让德国人在任何地段渡过第聂伯河到达左岸。请问你们能否防止出现这种麻烦？

其次，最好现在你们就和布琼尼、秋列涅夫一起拟订一个计划，建立一条大体上从赫尔松和卡霍夫卡开始，经克里沃罗格、克列缅丘格沿第聂伯河向北，包括第聂伯右岸的基辅地区的坚固防线。如果你们大家赞同建立这条大致确定的防线，现在就要急速着手组建，并不惜一切地守住它……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在这条防线上接收那些从前方撤退下来的疲惫的部队，让他们恢复过来，睡足了觉，用以替换新增部队。如果我处于你们的位置，就会不仅利用新到的步兵师，而且利用新到的骑兵师，让他们下马，暂时当步兵。完了。

赫鲁晓夫、基尔波诺斯：我们已采取一切措施，决不让敌人渡过第聂伯河到达左岸，也决不让敌人占领基辅。但必须为我们加强补给。斯大林同志，至今对我们的补给很差。有的师只有1500至2000人。物资也不够。请您在这方面支援我们。

您关于建立一条新防线的指示完全正确。我们将立即着手制订计划，并请您允许我们在5日(8月。——本书作者注)12时前向您报告……总司令布琼尼同志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从6日晨起从科尔孙地区向兹韦尼戈罗德卡、乌曼方向转入进攻，以支援第6和第12集团军，并同南方方面军建立联防……如果您不反对，如果进攻得手，则防线将大大地西移。完了。

斯大林：我不仅不反对，相反，完全欢迎发动进攻，以便同南方方面军联合起来，并使您提到的两个集团军冲出包围。总司令的命令完全正确。不过我还是请你们制订计划建立我建议的防线，因为在战争中不仅要寄希望于好的前景，也要估计到不好的和很坏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不致陷入窘境……[67]

可惜，斯大林的期望落空了。现在，苦艾味儿不仅在夜间，而是整天整夜笼罩着他……


1941年8月25日，基辅战役打响。由于德军的运动神速以及苏军统帅部的指挥错误，苏军60万人被俘

基辅防御战进展得很不顺利。第6和第12集团军被围部队艰苦奋战到8月7日，顽强抵抗直至全军覆没。大量人员被俘。布琼尼元帅(他昔日的传奇事迹在这场战争中也无济于事)考虑到南方方面军部队有被合围的危险，请求大本营允许将部队撤到印古尔河对岸。斯大林大怒，禁止后撤，指示建立另一防线[9]。斯大林发出大本营第00661号特别命令，派19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师前去加强西南方向的部队。这些部队刚刚组成，尚未"凝聚起来"，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不够。所以在投入战斗后许多部队在防御中并未表现出顽强斗志，混乱当中往往惊慌失措，自动放弃阵地。

斯大林在听到某一段又有些居民点被放弃的报告时，不是狂怒就是颓丧。他一反过去不草率评价人和处理人的习惯，现在则往往是一收到报告就下结论。这一次该是南方方面军司令员秋列涅夫倒霉了，其实斯大林早就熟识他。在致布琼尼总司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出：

> 方面军司令员秋列涅夫表现无能。他不会进攻，也不会撤退部队。他就这样丢掉了两个集团军，而别人在同样情况下甚至丢不了几个团。建议您立即到秋列涅夫那里，亲自判明情况，并速告防御计划……我看秋列涅夫已丧失斗志，不能领导方面军了。
>
> **斯大林**

1941年8月12日5点50分电话口授。

沙波什尼科夫[10]

最高统帅一再发出严厉的电报,下达强硬的命令,签署匆匆起草的指示,但情况却日益恶化。到8、9月间西南方向形势危急。斯大林一会儿想和这个司令员、一会儿想和那个司令员联系,但并非每一次都联系得上。有一次,在得到总参谋部关于又有几支部队未经批准擅自后撤的例行报告后,斯大林便口授了《红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

我附带说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42年7月28日第227号命令》。而绝望的第270号命令比它早颁布了差不多一年。作者是斯大林本人。由于对稳定战线、避免被歼的可能失去信心,主要由于形势危急,最高统帅又采取了他惯用的严厉惩罚措施。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命令了,因此让我将斯大林这个个人"创作"命令的蓝本摘引下来。命令开头部分列举我军指挥员、政工人员、红军战士在身陷重围时表现出坚强意志并光荣地克服重重困难的事例。如第3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中将,正是他和他部下的指挥员,政工人员领导第108和64步兵师冲出了重围。

但是,(斯大林接着往下口授)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却怕死投降,司令部和部队则冲出了包围;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第13步兵军军长基里洛夫少将也屈膝投降。这是耻辱。必须消灭怕死鬼和逃兵。

我命令:

1.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

2.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膝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的家属,应剥夺其享受的国家补贴和救济。

3.凡英勇果敢的人员,应予积极提升。

此命令应在一切连队、航空兵分队、炮兵连队中宣读[⑩]。

斯大林一口气口授完毕,停下来,对这些感情冲动的文字未作修改。而其内容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无情地枪决一切逃兵和投降的战士;凡胆敢迈出这一步者都应该明白,他的家属必将吃尽苦

头”。这是一个绝望而残酷的命令。尽管这个命令是斯大林以自己作为最高统帅的名义口授的，但在签署以后却吩咐加上莫洛托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的签名，虽然当时这些人并非全在大本营里。形势危殆，斯大林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步骤。有的地方十分起劲地执行了他的这类命令。1941年8月末斯大林得知作家斯塔夫斯基在叶利尼亚地区前线呆了10天之后写的一封信。让我从这封信里摘引几段话。

>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
> 我军许多部队英勇作战，给法西斯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坚毅果敢的乌特文科少校接手领导第19师以后，该师各团在11公里长的地段上……击溃敌第88步兵团，击退德军多次反冲锋……在叶利尼亚附近作战的部队正在战斗中学习，积累作战经验，研究敌军战术，并在痛击德军……
>
> 但在这里，第24集团军最近发生了过火行为……根据集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材料，有480至600人因逃跑、惊慌失措等罪行被枪决。同一期间有80人被提请授奖。前天到今天，集团军司令员拉库京同志和政治部主任阿布拉莫夫同志正确分析了这一过火行为……[50]

斯大林在这封涉及可怕的“过火行为”(480至600人被枪决，80人受奖)的信上只批了几个字：“转梅赫利斯同志。**约·斯**。”对“过火行为”的数字(即便可能被夸大了)和这些残酷的损失(他这是坚决批准的)，他并未感到不安。的确，战争是残酷的，形势严峻，但在斯大林的批语中丝毫不提必须依靠人们的自觉性、荣誉感、勇敢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他总是相信暴力和强制。

然而伟大卫国战争中一个最大的悲剧却日益迫近。1941年8月8日，斯大林同基尔波诺斯又一次通话：

> **布罗瓦勒**：在电报机旁的是基尔波诺斯上将。
>
> **莫斯科**：在机旁的是斯大林。
>
> **斯大林**：有情报说，方面军似乎因捍卫基辅的兵力不足，决定

轻易地将其让给敌人。这是真的吗？

基尔波诺斯：斯大林同志，您好。您得到的报告不真实。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决不放弃基辅……我和军事委员会的全部想法和意图，就是决不让基辅陷入敌手……

斯大林：很好。我紧握您的手。祝您成功。完了[52]。



基尔波诺斯(右)与他的军官在一起。基辅战役中，苏西南方面军被德军围歼，损失70万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殉职

西南方面军在顽强坚持着。反映基辅保卫者的英雄主义的书出了许多。他们是竭尽全力了。但是，我们大概永远无法表达乌克兰首府保卫者的思想和感情，他们既表现了绝大多数苏联人的爱国主义，又对导致侵略者长驱直入到达第聂伯河的一连串失败痛苦地感到困惑不解。全体苏联人民都尝到了失败的苦味。

9月15日德军第1、第2坦克兵团在洛赫维察地区合围，将西南方面军主力团团围住。第5、26、37集团军和第21、28集团军的部分部队陷入重围。在这几十个疲惫不堪的师团即将被致命的绞索勒死前四天，斯大林最后一次同基尔波诺斯通了话：

普里卢基：您好！在电报机旁的是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

莫斯科：你们好！这里是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你

们建议部队撤到你们提到的那条河（普谢尔河。——本书作者注）沿线，我觉得这是危险的。你们想必记得不久以前的事：在你们的部队从别尔季切夫和沃伦斯基新城地区撤退时，你们后面有一条更强固的屏障——第聂伯河，但尽管如此，撤退时仍然丢掉了两个集团军，敌人却渡过第聂伯河到达河东岸……所以现在的出路只有：

(1)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哪怕是借助于基辅筑垒地域和其他部队也好，协同叶廖缅科向科诺托普地区的敌军集群展开拼死的进攻……

(2)立即沿普谢尔河或附近地区建立防线，面向北面和西面布置大批炮群，并将5至6个师撤至该线。

(3)……只有在执行上述两点指示，即形成打击科诺托普的敌军集群的拳头和在沿普谢尔河建立防线以后，总之，在这之后才能开始从基辅撤退……

未经大本营允许，不得放弃基辅，不得炸毁桥梁。完了。再见。

基尔波诺斯：您的指示听明白了。完了。再见[8]。

苏联英雄基尔波诺斯上将本来已经可以说“永别了”。他已危在旦夕，再也不会收到最高统帅本人这种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指示了。当时包围圈尚未收紧，还有可能脱出这致命的绞索。9月17日晨5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请求（第15788号电报）。斯大林仍旧不许突围，只许由弗拉索夫指挥的第37集团军撤至第聂伯河东岸。情况已经十分危急。9月17日黄昏前，军事委员会不顾斯大林的要求，决定方面军部队突围。但是为时已晚。而且方面军司令员同各集团军失去了联系。分散行动的各个师团各自为战，血战10天力图向东突围。只有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可是大本营并不掌握情况，在9月22日和23日还向基尔波诺斯发出下述令人宽心的无线电报：

基尔波诺斯(西南方面军)：

更坚定沉着些。胜利有把握。你们面对的是小股敌军，将炮兵

集中在突破地段……我全部航空兵都在支援你们。我军正向罗姆内进攻……我再重复一遍：要更坚定沉着，努力作战。多向大本营报告情况。

沙波什尼科夫[54]

这是一场可怕的惨剧。有452720人，包括6万多名军官，陷入包围[55]。敌军夺取了大批武器装备。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参谋长图皮科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一道分享了千千万万官兵的命运，在最后的战斗中牺牲。不过，即使基尔波诺斯能突出重围，斯大林也未必会因这场惨剧原谅他。要知道，斯大林当然认为自己是同这场惨剧毫无关系的！

在这场几乎是伟大卫国战争中最大的悲剧里，斯大林表现的只是极端顽固，缺乏作战的敏感和对形势的洞察。假使他作为最高统帅能稍稍理解当时在明斯克、克里木、基辅、斯摩棱斯克各地的形势，那么除了顽固和僵硬以外，也许能表现出应有的战略智慧。可在1941年他一直不曾表现出这种智慧。



9月26日，德军在基辅的钟楼上敲响了欢庆胜利的大钟。史学家评论说，德军实际上敲响的是兵败莫斯科城下的丧钟

西南方面军的悲剧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咎于大本营和最高统帅。当然，方面军司令部和参谋部也未能很好地指挥他们麾下的强大兵力，如果他们领导得好，无疑是能避免如此悲惨的结局的。常常是有勇无谋，缺乏组织能力和内行领导。基辅城下的失败又使苏德战场生死决斗的天平向侵略者那边大大倾斜。

表面上斯大林保持平静，只是对1941年7月被重新任命为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说：

"要赶快把洞补上……要

快！”

沙波什尼科夫答："已经采取了措施。看来，我们可以把第21和38集团军恢复起来。我已吩咐从大本营预备队抽调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旅。我们正在组建西南方面军新司令部。领导人员要由您决定。"

"您建议由谁指挥？"

"我想，那里形势如此复杂，需要一只坚强的手和有经验的头脑。看来，没有比铁木辛哥再恰当的人选了。"

"我同意。"

"可以任命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克罗夫斯基少将为参谋长。"

"就这样吧……"

损失巨大，需要迅速补充人员。国防人民委员部部队组建和补充总局和各个军区基本上能完成任务，将人员源源不断地送上血腥残酷的战争磨盘。斯大林独自在办公室里，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索要关于损失和人员补充能力的报表。半小时后在他桌上已经摆着报表，并没有沙波什尼科夫的附笔，指出材料不充分不准确之处；形势发展实在太快了……

总参谋部这份报表谈到，现在已有39个预备步兵旅，正在训练新兵。规定新兵训练期限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下级军官为三个月。8月份为各方面军提供补充连61.3万人，从后方各种军事机关院校抽出38万人。年底前各训练中心、各后备部队可以培训并向前线提供250万人……但损失数字（无法挽回的损失和所谓伤病损失）显然被压低了……斯大林立刻感觉到了。

1941年6—7月损失	651065人
8月损失	692924人
9月损失	491023人[59]

他知道，仅基辅地区就损失了约50万人……现在这些人多数列在"失踪人员"栏内。可是这样的人员在战争第一年里有多少啊？

同看到的、想到的一切并无明显的联系，斯大林匆匆写了一张条子交给波斯克列贝舍夫。这是些粗犷而清楚的字样：

沙波什尼科夫同志：

请提供一份经过核实的从旧鲁萨地区撤退时我方损失的材料。

约·斯大林[57]

很难猜到为什么正是旧鲁萨使他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我军在那里的反突击未能奏效？也许是现在，在大本营关于固守目前防线并顽强防御的命令下达以后，他觉得不仅应该注意各主要战线，而且要注意其个别地段？斯大林后来也对个别集团军和局部地段的情况感兴趣。大概他想根据战争的这些片断更充分地了解战争的全貌。

斯大林也不想他的亲人，可是现在却不由自主地想起儿子雅可夫。8月中旬，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用专门以火漆封口的信封转给斯大林一封信。那是一张传单，上面印着雅可夫和两名德军军官谈话时的照片。下面是说明：

这是雅可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长子，第14装甲坦克师第14榴弹炮团的连长，于7月16日在维帖布斯克附近与几千名官兵同时被俘投降。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铁木辛哥和你们的政委教导你们说，布尔什维克决不投降当俘虏。但是红军战士一直在投向德军方面来。为了恫吓你们，政委向你们撒谎，说德军虐待俘虏。斯大林的亲生儿子以自己的实例证明，这是谎言。他投降当了俘虏，因为从今以后对德国军队的任何抵抗都将是无益的……[58]

儿子的命运只有一点令斯大林感到不安。他心想，尽管这样想是罪过，但雅可夫还不如死在战场更好。他软弱，万一挺不住，被摧垮了，按人家的命令在广播和传单里乱讲一通呢？这是最高统帅本人的儿子反对自己的国家和父亲啊！想到这里，他无法忍受。昨天莫洛托夫在单独和他在一起时告诉他，瑞典红十字会主席贝尔纳多特伯爵通过瑞典使馆口头询问：斯大林是否要委托他或其他什么人采取行动以解救自己的儿子？斯大林考虑了一两分钟，然后看了一眼莫洛托夫，谈起与此完全不相干的事，暗示不予回答，他说：

“在答复丘吉尔的来信时请告诉他：‘毫无疑问，苏联人在必要时

确实会毁掉列宁格勒的苏联军舰，但要为这项损失负责的不是英国，而是德国，我想，战后应由德国赔偿损失。’”[59]

莫洛托夫在笔记本里记了一点东西，没有再谈起有关雅可夫的问题。

斯大林还没有学会从把握苏德战场的全局思考问题，还不会估计军事、经济、道义、外交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战争的本性把武装斗争推到前台，压倒了其他各种对抗形式。斯大林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在当时还明显地表现出“残缺不全”。他总是不能抓住事件的总体；他认为司令员们未能很好地执行他的命令。在战前，他很善于耐心等待，必要时他会一步一步地走向目标。然而现在，在战争期间，总是要立竿见影才行。斯大林老是跟不上。他动作迟缓，常常过高估计命令、训令的力量，而这些命令和训令并非总是符合客观情况。战争初期的三个命令、其他许多决定、一系列仓促采取的、欠考虑的措施、特别是基辅战役的决策都证明：要想在这场战争中成为善于指挥全部武装力量的好领导，光靠天生的聪慧、意志力和机敏显然是不够的。

在斯大林被“训练”成一个战略家的过程中，总参谋部及其领导人——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瓦图京、安东诺夫——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只是在为那些实验、错误和失算付出血的代价以后，他才取得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必要经验。由于缺乏对形势的洞察力，不了解战争中各种隐蔽的动力，不懂得组织战略战术活动的特点，不知道指挥员和参谋部工作的具体内容，因而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只是一味地“狠抓”精神因素（看来这也是形势所迫）。每当收到失利或形势危急的报告，斯大林总是首先考虑部队的精神—政治状况，然后才研究作战情况。但历次战争经验表明，不能孤立地、对立地看待构成战斗威力的这两个成分。举个例子，当基辅地区形势危急之际，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如实向上报告：“方面军部队处境急速恶化……您可以理解的惨剧在一两天内即将发生。”[60]

像参谋长这样估计形势，并不需要有先见之明。问题在另外方面：为避免或至少缩小惨剧的规模，是否已经竭尽全力了?！从图皮科夫的电报里看不出这一点。斯大林感觉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悲剧性的紧张心理，当即口授了一封回电：

"普里卢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

抄送:西南方向总司令

图皮科夫少将向总参谋部发来第15614号电报,表现了惊慌失措。相反,形势要求各级指挥员保持极端冷静和沉着。不能惊慌失措,要采取一切措施稳住当前态势,特别要牢牢保住两翼。要迫使库兹涅佐夫和波塔波夫停止后撤。要让方面军全体人员懂得必须顽强战斗,一往无前。

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斯大林同志9月11日给您的指示……[60]

大家还不会作战。真实情况不妙,但常常不敢向上报告: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例如,1941年9月4日朱可夫同第24集团军司令员拉库京少将的谈话就很有代表性。由于把刚刚调给该集团军的坦克轻率地投入战斗而损失掉和报告情况不实,拉库京受到朱可夫的申斥:

拉库京:今天早晨我将出发调查此事,报告我只是刚刚收到……

朱可夫:您不是法院侦查员,而是司令员。您要向我提供一份给政府的书面报告。占领了谢佩列沃没有?或者这也是骗局?

拉库京:并没有占领谢佩列沃……明天我亲自弄清楚并向您报告。我不说谎。

朱可夫:最主要的是,您要让您的司令部停止撒谎,您要好好了解情况,不然你们大家全要出丑……[61]

拉库京受了部下的骗。谎报取得胜利,这是常有的事……但撒谎往往是因为怕受惩罚。拉库京后来确实弄清了情况,但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月了:10月里他在战场上牺牲了。

斯大林想方设法制止后退,让那些灰心丧气的人继续战斗,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分析一下大本营的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命令就可以看出,最高统帅在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时总是喜欢用无情的惩罚进行威胁。托洛茨基曾经断言,在战斗紧急关头要让战士作出选择——"前进可能会光荣牺牲,后退则一定会可耻地死去",他这话也

许是对的？这种思想可能钻入了斯大林的脑海里。那天晚上他亲自草拟了一份给各方面军关于反对惊慌失措的命令。我摘录如下：

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经验表明，我步兵师中有不少惊慌失措分子，甚至是敌对分子。他们一受到敌人压力便抛掉武器，大喊“我们被包围了！”，并带动其余战士逃跑。于是造成整个师溃逃，抛弃武器装备，然后再单个地走出森林。各方面军中均有类似现象……不幸的是，坚定不移的指挥员和政委并不很多……

1.每一步兵师应建立一支由可靠战士组成的拦截分队，人数不超过一个营。

2.拦截分队的任务为直接帮助指挥人员在全师建立严格的纪律，制止惊慌失措的军人逃跑，为此可以使用武器……

4.自收到此令之时起五日内应将拦截分队组建完毕。

约·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亲自口授。沙波什尼科夫　1941年9月12日23时50分。[63]

拦截分队、惩罚连、惩罚营、以枪决相威胁等措施在当时也许是被迫采取的。但是这种被迫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本人的错误和失算的产物。“坚定不移的指挥员和政委并不很多”，这首先要归罪于最高统帅自己。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斯大林下达的旨在对部队施加精神影响的电报为例：

第51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同志

黑海舰队司令员奥克佳布里斯基同志

抄送：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转致保卫敖德萨的指战员们：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求你们坚持6—7天，这期间你们将得到航空兵的支援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收电后即告收讫。

约·斯大林

1941年9月15日[64]

这类电报有时可以起到动员作用。不过在这个具体场合,尽管敖德萨的保卫者英勇顽强,守城部队仍然于10月中旬被迫撤往克里木,而克里木的形势也日趋危急。

斯大林一直在寻找提高部队士气的办法。1941年9月中旬,沙波什尼科夫在向最高统帅作例行报告时强调指出,假如一切师团都像优秀部队那样战斗,那么敌人早就被挡住了。斯大林沉默片刻,然后便命令总参谋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考虑如何表彰各优秀部队,如何对英勇作战行为进行精神鼓励。此后不久便颁布了1941年9月1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著名的第308号命令,宣告苏联近卫部队的诞生。命令中特别谈到:

> 在保卫我们的苏维埃祖国、抗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匪帮的多次战斗中,第100、127、153和161步兵师表现了英勇果敢、组织性纪律性的典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一再重创德国法西斯部队,打得敌人狼狈逃窜,闻风丧胆……
>
> 因战功卓著、组织纪律性强和秩序井然,特将上述各师命名为近卫师。自今年9月起,各该师全体指挥人员增薪一半,战士增薪一倍……[15]

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在后方,尤其是靠近前线地区,也并非一切顺利。加里宁的秘书处曾收到卢戈瓦娅的一封信,加里宁曾将这封信的抄件送给某些人。卢戈瓦娅在信中写道:

> 我想简要地描绘一下我所在的后方的情况。这里是梅利托波尔—别尔江斯克—奥西片科地区。成千上万应征入伍者从被占地区和前线地带来到此地,到处游荡,毫无目的,不守秩序,未穿军服。其中20%的人赤着脚。他们没有武器,纪律很坏……有的人走到我们妇女身边,讲了一些很坏的消息:"我们没有武器,没有军装,德军技术装备是无敌的;分粮食吧,反正是要丢掉的,把牲畜也分了吧……"群众十分不安。领导都走了,他们那些从来不干活的老婆也逃命去了,丢下我们遭殃;当领导时可来劲呢,到该保护人民的时候却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们的报纸从不报道缺点,掩

盖缺点，但这样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的……[66]

这位普通妇女准确地看出：战争初期的灾难对士气的影响最大。需要打胜仗，才能使那些丧失勇气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战争初期失败的苦艾味不断地困扰着斯大林。同时他也拼命地想从侵略者手中夺回战略主动权。敌人不断变换地点集中兵力进攻，并取得胜利。最高统帅决定也用这种办法来扭转极其不利的形势，但可惜部队对此毫无准备。例如，在9月中旬，斯大林由于特别重视列宁格勒，决心为它解围。为此他采取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步骤：任命苏联元帅库利克为拥有8个师的庞大的第54集团军的司令员。元帅当集团军司令员，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斯大林非常希望战役能取胜。但是从沃尔霍沃和从列宁格勒向姆加车站方向实施的突击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部队前进速度极慢。不过最高统帅仍旧感到欢欣鼓舞。1941年9月16日，在沙波什尼科夫用直通机同库利克谈话、向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具体作战指示以后，最高统帅走近电报机，他决定作出“奖励”的许诺：

斯大林：您有进展，我们很高兴。请您注意，如果您在明天能认真地突击姆加，突破或绕过姆加的防线，您就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两个精良的基干师，也许加上一个新的坦克旅。但如果您拖延明天的进攻，我保证您既得不到两个师，也得不到那个坦克旅。

库利克：我们要努力完成您的指示，

库利克

是二战前苏军少有的几位元帅之一，作为沙俄士兵参加过一战。1917年加入苏共，1918年参加苏军。1940年授予了他苏联英雄称号，晋升为元帅。在卫国战争中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集团军司令，负责协调军事行动。1941年他被指控放弃了刻赤和罗斯托夫，并被送交法庭处理。被撤消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从中央委员会除名，并被收回了英雄徽章和所有勋章，1942年3月军衔从元帅降为少将。1943年4月，又调任近卫第四集团军司令，因未能胜任自己的职责，9月又被撤职。1945年被开除出党，1946年被迫退伍，1947年被逮捕，1950年被枪决。

一定要得到您允诺的一切……[67]

9月20日，斯大林又一次把库利克请到直通电报机前，他对这位元帅取得重大胜利的能力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了。

斯大林：您太误事了。要夺回失去的时间。不然您还要误事，德国人会把每个村庄变成堡垒，您就永远不能和列宁格勒人会师了。

库利克：我刚从战场回来。为夺取西尼亚文诺和沃罗诺沃，激战了一整天。敌人不顾我方致命的炮火（今天我将两个火箭炮队和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发动好几次反击，但是均未奏效。

斯大林：给您新师新旅不是为了夺取姆加车站，而是为了夺取该站后扩大战果用的。您原有的力量足够夺取姆加站，夺取两次都够用的。

库利克：报告：不动用新部队，光靠原有兵力，姆加站是拿不下来的……[68]

斯大林中断了通话，心想：我干嘛在1940年授予他金星英雄奖章和元帅军衔呢？无论给他什么任务，他老是遭受失败和挫折……不过后来斯大林在危急关头又有一次想到库利克。他派库利克到酝酿着大惨剧的中心克里木，当时那里的局势恐怕无论是谁也无法挽回了。但是这一点我以后再讲。

1941年夏秋的事态和斯大林在这一时期亲自下达的各种电报、指示、命令都表明朱可夫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对的：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并不是统帅。在指挥如此大规模作战方面最高统帅缺乏专门知识和经验，他企图用压力、威胁、惩办、郑重号召等等弥补这一缺陷。在战争初期，他的作战思想，更不要说战略思想，还没有超出明智思考、实际经验和国内战争老公式的范围。

同时应该承认斯大林是有耐心的学生。但是，战争却是个可怕的老师。

灾难和希望

在1941年和1942年的部分时间里，苏德战场上发生过不少灾难性事件。我认为，任何其他国家都经受不住像西方方面军在明斯克附近和西南方面军后来在基辅城下主力遭受围歼这样极其沉重的打击。接着又在酝酿两场灾难：在克里木和列宁格勒。一场灾难“发生了”，另一场则以苏维埃人超人的毅力和难以置信的牺牲为代价得以避免。当然，只有把长期被围困、却巍然屹立的列宁城中几十万人的牺牲不算灾难，才能说灾难得以避免。


希特勒在取得了乌克兰胜利后，继续向苏联挺进

希特勒在乌克兰取得重大胜利以后确信他能在几个战略方向继续进攻。9月末，沙波什尼科夫向斯大林报告：克里木受到威胁，德军突击群的先头部队已冲进土耳其堡垒。大本营商议后决定立即下达两个命令。一个是斯大林坚持下达的，另一个是沙波什尼科夫坚持的。虽然最高统帅还记得，早在8月份，在任命库兹涅佐夫上将为第51集团军司令员时，他在特别命令中曾强调指出：“要坚守克里木半岛直到最后一兵一卒……”

新的作战文件发出去了。由于斯大林把空军视为摆脱各种困境的万应灵药（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他下的命令是：

南方方面军司令员

红军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捷潘诺夫同志

第51独立集团军司令员：

敌人以三个步兵师的兵力进攻彼列科普地峡的阵地，已冲进土耳其堡垒。最高统帅命令：航空兵第5预备集群全部出动在1941年9月26日整天轰炸进攻彼列科普的德军部队……

沙波什尼科夫受大本营委托

1941年9月26日4点20分[69]

斯大林天真地希望依靠空军阻止德军侵入克里木……另一个命令是将部队从敖德萨撤到克里木，将敖德萨防区的部队拨归第51独立集团军司令员指挥。签署了命令以后，斯大林问沙波什尼科夫：

"有多少人保卫克里木？我们有多大可能守住克里木？"

"加上敖德萨来的部队，克里木的保卫者达10万人，坦克100辆左右，大炮1000多门，飞机50架。靠这些兵力可以守住克里木。"

但斯大林没有料到，第51独立集团军司令部由于担心敌海军陆战队登陆，把兵力分散配置在整个半岛，而对最危险的北部地段的防守显然加强得不够。我要重复一句：大家还不会作战……

防御地峡的部队实际上只有四个步兵师，而且不满员。经过10天血战，德军冲进克里木。滨海集团军部队一面顽强奋战，一面撤向塞瓦斯托波尔，第51集团军（当时斯大林已将司令员库兹涅佐夫撤换，由巴托夫接任）则向刻赤半岛撤退。

克里木部队司令员列夫琴科海军中将（10月末大本营下令当地陆军统归他指挥）1941年11月6日用密码电报向斯大林报告，克里木，特别是刻赤半岛，形势极为严峻。报告时特别提到："预备队已用完，步枪和机枪也没有了，调来的补充连没有武器，向刻赤方向撤退的师每个师只有200至350人。鉴于人员太少，已将第271、276和156步兵师合并成一个156步兵师。"列夫琴科请求或者"及时补充两个师来加强刻赤方向，或者决定部队撤出刻赤"[70]。

斯大林在听取总参谋部关于第51集团军继续后撤的报告时，一再愤怒地要求：

"他们为什么后退？要知道，那里德军连坦克都没有！双方兵力差不多嘛！命令列夫琴科亲自飞往刻赤去制止撤退。告诉他们：停止撤


德军炮击从刻赤半岛撤退的苏军

退！”

11月9日，列夫琴科从塞瓦斯托波尔抵达刻赤。形势并未改善。斯大林下令同库利克元帅通话，这时库利克已被解除第54集团军司令员职务。最高统帅阴沉地、冷淡地问候了一句，便开门见山地命令库利克：

“立即飞往刻赤。帮列夫琴科判明形势。要守住刻赤，不然德军也会进入塔曼半岛。您明白吗？”

“遵命。我立刻出发。”

“好，行动吧，”斯大林冷冷地道了别。

库利克11月11日到达刻赤，发现当地军事状况严重紊乱，部队分散地在进行后卫战，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指挥。城内已经出现混乱和张惶失措的情绪。库利克试图建立起码的防御秩序，但毫无结果。库利克关于“死守战壕，决不后退”的要求不过是空谷回音。只有个别的分队死守阵地。他觉得，当时他还可能从塔曼半岛调往刻赤的两个团已无济于事，所以命令这两个团不要开往刻赤，而是加强塔曼沿岸的防御。不久之后，这件事几乎成了当时还是苏联元帅的库利克的主要罪状。

15日，即在灾难终于来临的一昼夜前，库利克还收到沙波什尼科夫转来的斯大林的一道命令：“不准放弃刻赤！”库利克用直通电报机和总参谋部的韦奇内少将通话，这样说明了局势和自己的意图：

“第51集团军的情况太严重了，只有第106步兵师充其量还有40%的战斗力，其余各师只有300条枪……目前战斗在城南郊区进行，敌军已楔入米特里达特地区。今天我要求再坚持一昼夜，天黑前撤出主要的炮兵部队，16日凌晨撤出其余的部队……我是就地判明形势并根据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指示作出决定的。在我启程到第51集团军来时，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不能让敌人渡海进入北高加索**（黑体是我加

的。——本书作者注)……"

顺便提一句。灾难发生后库利克被召到莫斯科说明情况,他提到斯大林"不能让敌人渡海进入北高加索"的指示,遭到最高统帅的一顿怒斥:

"不让敌人进入高加索是**通过保住刻赤的办法**!不是要你放弃它!"

让我接着叙述库利克向总参谋部的报告:

> 由我利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克里木各院校(指军事院校。——本书作者注)和预备部队的武器装备起来的第12步兵旅现已调往塔曼半岛北部山脊,在山脊西侧布防。第302步兵师的两个团在塔曼半岛南部山脊布防……

库利克保卫刻赤的一切行动都被看成是犯罪。斯大林决不能宽恕库利克放弃刻赤,因为他觉得库利克未竭尽全力保卫该城。

让我再回到库利克的报告上来:

> 现在只有沃依科夫工厂的一个码头可以运炮,叶尼卡尔码头只能运人员,这就是目前形势和军队状况的简要介绍。还有一件事,现在我们正在阿纳帕、诺沃罗西斯克、克里木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捕捉第51集团军的逃兵,他们有成千上万……[21]

如果每个师"只有300条枪",而"逃兵有成千上万",那当然很难指望能打胜仗。在档案文件中没有大本营正式允许放弃刻赤的痕迹。的确,在莫斯科当时大家也明白,有组织的退却是当时形势下惟一的出路。放弃刻赤是在克里木作战失利的逻辑结局。第51集团军的领导未能很好地利用塞瓦斯托波尔英雄保卫战的经验。刻赤失陷以后,塞瓦斯托波尔防区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了。

听完总参谋长关于克里木灾难的报告,斯大林怒不可遏。这一次他把库利克当"替罪羊"。刻赤是库利克官运衰落的开始。他1942年2月16日在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受审,3月降为少将。此后有半年时间指挥过第4近卫集团军,后来又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部部队组建和补充总局副

局长。但他在前线的失败，斯大林是不宽恕的。

是斯大林亲手把库利克提到军事阶梯的高位，尽管库利克既不是智力超群，又远非行家里手。斯大林把他从苏联元帅降为少将以后似乎给过他一个机会：一个月后又授予库利克中将军衔。但在战争末期，当布尔加宁收到部队组建和补充总局局长斯莫罗季诺夫上将和军委委员科列斯尼科夫少将说他“品德低下、胡言乱语、丧失工作能力和兴趣”的报告以后，斯大林又下令将库利克降为少将。一次任职（确切地说是斯大林）把库利克最终断送，那是在他被任命为伏尔加军区副司令员以后。当时司令员是戈尔多夫上将，也是被斯大林贬黜的。两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将军说话欠谨慎，不久被解职，然后被捕，1950至1951年二人均受审判并被枪决。1957年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原有军衔。

斯大林的又一名元帅的命运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看来，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库利克是个相当笨拙的将领，没有出众的军事才能。但是我认为，他在刻赤惨剧中的过错不是决定性的，或者是不明显的。他是在悲惨结局来临前五天才抵达刻赤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可以在如此短暂的几天内作出不可能做到的事。斯大林认为前元帅的行为是拒不执行他的命令。可是在战后，在冷静地分析了1941年11月刻赤事件以后，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在总参谋部的结论中写道：“对现有文件的分析研究表明，11月11日抵达刻赤协助刻赤半岛作战部队的前苏联元帅库利克，由于缺乏必要的兵力和手段，在当时业已形成的条件下已无法扭转战局并保住刻赤市。这个结论也得到了事件当事人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和巴托夫大将的肯定。”[22]

索科洛夫斯基
(1897–1968)
苏联元帅

1918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内战时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集群司令。内战后，历任军参谋长、军区参谋长、副总参谋长。苏德战争时期，历任方面军参谋长、方向参谋长、方面军副司令、司令，曾参与指挥莫斯科、斯摩棱斯克、维斯瓦河—奥得河和柏林等战役。1946–1949年任驻德集群副总司令、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并曾兼任总参谋长。1960年起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1962年主编《军事战略》。荣膺苏联英雄，获列宁勋章8枚。

最高统帅对刻赤失守并不甘心。他同意总参谋部提出的在克里木进行一次果敢的登陆战役(可能成为解放整个半岛的前奏)以支援塞瓦斯托波尔英勇保卫战的建议。撤出刻赤还不到一个月,大本营就批准了这个登陆战役的计划。

这是伟大卫国战争中最大的登陆战役。不知为什么斯大林确信能成功。也许他指望的是心理因素:难道德国将军们能料到一个多月之后苏联军队就会重新出现在刻赤半岛?而我军在惨败以后也正想在这片多石的土地上证明自己并未丧失战斗和取胜的意志。斯大林亲自监督战役计划的制订,并严格保密。

但是,这不仅是大规模的登陆战,而且最终成了大规模的失败。1941年12月26至31日,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的大批舰只运送大约4万兵员、43辆坦克、434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大量其他武器装备在刻赤半岛北部和东部、在费奥多西亚地区登陆。最初的突击力量很可观。重新恢复起来的第51集团军和第44集团军,加上第47集团军组成克里木方面军,他们向西推进了100公里,解放了刻赤、费奥多西亚。看来,只要再加把劲似乎就可以打到塞瓦斯托波尔,然后就能解放整个克里木了。但是,克里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积聚力量继续进攻时却完全忽略了防御。防御纵深不够,很不稳固。侦察、防空、伪装、预备队配置,都组织得不好。惩罚随即到来。1942年5月8日,人数和力量都比苏军差一半的德军集群沿费奥多西亚湾海岸发起突击。苏军的高枕无忧和安排不当导致了一场大悲剧。斯大林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大本营代表梅赫利斯从一开始就一再给最高统帅发电报,打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的小报告。但这一次斯大林的反应与平时不同。他知道在危急关头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为时已晚,因而严厉申斥了梅赫利斯:

“您采取对克里木方面军事务不负责任、袖手旁观的奇怪立场。这种立场倒很便当,可是腐朽透顶。您在克里木方面军那里不是旁观者,而是大本营派去的、对成功和失败负有责任的代表……您要求我们用某个兴登堡代替科兹洛夫。但您不会不知道在我们的预备队里没有兴登堡这类人。在克里木事情并不复杂,您自己能应付……”

斯大林说预备队里没有兴登堡这类人,这是对的。但是他说“在克里木事情并不复杂”,这却说错了。

假使斯大林有自我批评精神,他就应该想到,如今在各条战线上

多么缺乏像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罗夫、雅基尔、德边科、科尔克、卡希林、乌博列维奇、阿尔克斯尼斯这样的人……但是他的性格是不能也不会自我反省的。最高统帅总以为，一切失败和灾难的根子在于各司令部不执行命令，在于各级指挥员的组织工作薄弱，政工人员不善于进行动员工作。他很会也很爱列举各种缺点、失误、疏忽等等，却从未想过自己的过错。可是他的过错最大……许多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部的军官简直很少受过什么专业训练。

斯大林几次向克里木方面军司令部下命令，要求他们坚守土耳其堡垒，组织顽强防御，要指挥员亲自到前沿阵地，积极使用炮兵……但是坦率地说，方面军司令部已经不知所措。最高统帅预感到不幸，于5月11日深夜一口气口授了一份具有他的典型风格的电报：

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

抄送：克里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梅赫利斯

鉴于克里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包括梅赫利斯和科兹洛夫，已张皇失措，至今未能与距土耳其堡垒只有20至25公里的各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鉴于科兹洛夫和梅赫利斯无视大本营的命令，至今不去土耳其堡垒那里组织防御，最高统帅大本营命令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急速前往克里木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刻赤市），整顿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责令梅赫利斯和科兹洛夫停止在后方的组建工作，交由后方人员办理，令该二人立即前



布琼尼(1883–1973)

苏联元帅、骑兵统帅

1903年服役，参加过日俄战争和一战。191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内战期间，担任骑兵军长和集团军司令，采取突袭结合强大火力和深远机动的骑兵战术。内战后，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骑兵助理，军区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任方向军总司令、骑兵司令。战后，任骑兵监、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三次获苏联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8枚。著有作品《红色骑兵》、《骑兵兵团的战术基础》等。

往土耳其堡垒,接受后撤部队及装备,加以整顿,沿土耳其堡垒一线组织稳固的防线,将防线分为若干地段,由负责指挥员领导。

主要任务是:使用一切防御手段,一切部队,空军和海军的手段,决不让敌人向土耳其堡垒以东推进。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斯大林

华西列夫斯基

1942年5月11日[73]

这半张纸的电报有两个建议,却包罗万象——评价、不满、建议、命令、作战计划、任务,什么都有。但是,可惜,有时甚至最令人生畏的人的咒骂也无济于事。在痛苦的结局到来前五天,斯大林委托华西列夫斯基以最高统帅名义再向克里木方面军的领导发出一道命令:

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

科兹洛夫中将

1942年5月15日1点10分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如下:

1.不准放弃刻赤,应组织塞瓦斯托波尔式的防御战。

2.向西部作战部队增调一批果敢的指挥员,携带电台,其任务为掌握部队,组织一支突击队,消灭冲向刻赤的敌军,恢复刻赤外围的弧形防线。如情况允许,您应亲临现场。

3.指挥方面军的是您,不是梅赫利斯。他应协助您,如若不然,您应向我报告……[74]

5月15日向克里木方面军领导下达这最后的命令时,斯大林已经明白,刻赤已是半年内第二次濒临灭顶之灾。人们一再向他报告,说主力(到5月初克里木方面军已有约27万之众)能撤出来。当悲剧已经发生、刻赤枪炮爆炸声已经停息时,他便要求得到关于损失的准确材料。战报在10天以后才呈送上来。其中谈到,在德军进攻的12天里,曾在兵力上拥有很大优势的克里木方面军损失176566人、347辆坦克、3476门大炮和迫击炮、400架飞机。这是红军又一次大规模的惨败。读着战报,

斯大林怒不可遏：

“这些笨蛋！把一次成功的战役毁掉了！”

他专门派梅赫利斯去那儿，可梅赫利斯好像只会碍事；派副总参谋长韦奇内将军去，也误了事……科兹洛夫公然惊慌失措，各集团军司令员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布琼尼领导战役无能。斯大林当即同华西列夫斯基通了电话，命令迅速准备一份大本营总结克里木失败的痛苦教训的训令致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军委会。6月4日，在华西列夫斯基作例行报告时，向斯大林提供了训令草稿。斯大林沉思地读着：

……敌军开始进攻前，克里木方面军拥有1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4个坦克旅、9个加强炮兵团，而敌方只有7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2个旅……尽管如此，我克里木方面军部队仍遭败绩，由于作战失利被迫撤出刻赤湾……

接下去是一系列合理的结论，指出战役和战术的失误、失利的种种原因——防御的纵深配置薄弱，预备队使用不当，部队管理墨守成规，不善于协同作战。

方面军司令部（斯大林继续读下去）竟无法保障将命令下达到各集团军。例如，要求第51集团军将全线兵力撤至土耳其堡垒一线后面的命令，集团军司令员并未收到。战役紧急之际克里木方面军司令部和梅赫利斯同志不是亲自接触各集团军司令员，不是亲自掌握战役的进程，却在军委会长时间的、毫无意义的会议中消磨时光。科兹洛夫和梅赫利斯违背大本营的指示，未保障该指示的执行，未及时将部队撤往土耳其堡垒。撤退部队延误两天正是整个战役结局的致命伤……

后面列举了各方面军军委会在必须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时应完成的各项任务。

“这就完了？”斯大林严厉地看了一眼华西列夫斯基。

“是的，斯大林同志……”

最高统帅于是说道：“请您记下来……这些人都该提交军事法庭

审判。不过这来得及。您写吧！”

1. 解除一级集团军政委梅赫利斯同志国防副人民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军衔降为军级政委。

2. 解除陆军中将科兹洛夫同志方面军司令员之职，军衔降为少将，调次要工作岗位以观后效。

3. 解除师级政委沙马宁同志方面军军委会委员之职，军衔降为旅级政委，调次要工作岗位以观后效。

4. 解除陆军少将韦奇内同志参谋长之职，调归总参谋长安排，委以次要工作。

5. 解除陆军中将切尔尼亚克同志集团军司令员之职，军衔降为上校，调次要军事工作岗位以观后效。

6. 解除陆军少将科尔甘诺夫同志集团军司令员之职，军衔降为上校，调次要军事工作岗位以观后效。

7. 解除空军少将尼古拉英科同志方面军航空兵司令员之职，军衔降为空军上校，调次要军事工作岗位以观后效……[75]

斯大林看了华西列夫斯基一眼，问道：

“没有漏掉谁吧？其余人员由方面军总司令去惩处吧。现在让我们来签字……”

对他来说，这一切已成过去……不过几乎与此同时，间隔一两个星期，斯大林又经受了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在哈尔科夫城下的惨败。这次损失更为可怕：牺牲和被俘23万人左右，损失坦克775辆、大炮和迫击炮5000多门……*这是继1941年几次灾难之后又遭受的两次最可怕

* 1942年5月31日苏联新闻局对此是这样报道的：“不久前苏军总统帅部获悉德军司令部关于德军将于罗斯托夫战线某地段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计划。为防止和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突击，苏军统帅部在哈尔科夫方向发起进攻，但统帅部计划中并未列入夺取哈尔科夫城的任务……苏军统帅部的主要目标（防止和粉碎德军的突击）业已达到。战斗中德军至少死亡及被俘9万官兵，损失540辆坦克、不少于1500门大炮、近200架飞机。我军在作战中牺牲近5000人，失踪7万人，损失坦克300辆、大炮832门、飞机124架……”

的失败。韦利夏金在《战争的胜利结局》中表现的规模比起斯大林的这些惨剧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1942年夏，由于形势所迫，最高统帅在同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商议了日本的计划之后，决定从远东再撤出一大批兵力。在莫洛托夫告诉他说"日本已陷进东南亚"以后，斯大林立即给华西列夫斯基(从1942年6月起任总参谋长)打电话：

"请从远东撤出10至12个师。隐蔽撤出的开始日期不迟于7月11日。明天请向我报告。"

"好的，斯大林同志。"

第二天，确切地说是夜间，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向斯大林读了致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

> 调远东方面军下列步兵部队为最高统帅部所属之预备队：
> 第205步兵师——原驻哈巴罗夫斯克
> 第96步兵师——原驻古比舍夫卡、扎维塔亚
> 第204步兵师——原驻切列姆霍沃(布拉戈维申斯克)
> 第422步兵师——原驻罗津加尔托夫卡
> 第87步兵师——原驻斯帕斯克
> 第208步兵师——原驻斯拉维扬卡
> 第126步兵师——原驻拉兹多利诺耶、普齐洛夫卡
> 第98步兵师——原驻霍罗利
> 第250步兵旅——原驻比罗比占
> 第248步兵旅——原驻泽洛德沃罗夫卡、滨海地区
> 第253步兵旅——原驻施克托沃[78]

斯大林说："我同意。把命令发出去吧。"

战争之神要求牺牲。巨大的、骇人听闻的牺牲。斯大林由于自己的失算、错误和外行，"提供"了这种牺牲。在这方面我们的某些军事首长也"毫不逊色"，各种不幸的偶合也起了作用。不过，公正地说，我们牺牲数量如此之大，也是由于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比我们打得好……

最高统帅本来在1941年底开始慢慢地恢复信心，想在1942年打垮德国军队，但哈尔科夫和克里木这两次惨重失败又使他目瞪口呆。他

不知道，这还远不是他的灾难的结束。斯大林不愿意对自己承认敌人的统帅技巧比他高明。大本营那些死板的、往往是迟到的指示和命令，有时还十分幼稚肤浅，缺乏军事学术的智慧。不过让我们还是回到哈尔科夫之战来吧。

1942年3月，斯大林召集会议讨论西南方向总司令部的建议。说不清这是大本营的会议还是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出席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铁木辛哥代表西南方向总司令部提出建议：由三个方面军的力量在南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前方到尼古拉耶夫—切尔卡瑟—基辅—戈梅林一线。沙波什尼科夫提出异议：

"我们没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好限于全线实行积极防御，特别要注意中央方向。"

斯大林说："我们也不能一味防御，无所作为，坐等德国人首先打我们啊！"

朱可夫建议在西部方向实施突击，在其他方向实行积极防御。铁木辛哥坚持在南方进行大规模战役。他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支持。华西列夫斯基代表总参谋部的立场，表示不同意。意见不一。大家都等着斯大林发话。以前，他在这种会议上仅限于批准或否定现成的建议。现在却要他作出独立负责的决定。他必须作出选择，战略选择。

斯大林内心一直是个"中派"。在十月革命时期，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中，在同反对派的搏斗中，他总是力求采取一种能够迅速、方便面安全地倒向强者一边的立场。例如，在拉狄克的档案里有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论我们党内的中派主义》，其中称斯大林为中派主义信徒，称中派主义为"政治家思想上的贫困"[7]。这一次斯大林仍然忠于自己的方法论信条。他作出了一个半截子决定，允许西南方向的部队进行一次局部的进攻战役，粉碎哈尔科夫的敌人集群，紧接着解放顿巴斯。于是谁也没有异议了。在大本营里，一般说来很少有人不同意最高统帅的意见。

斯大林预料，从沃尔昌斯克以南和从巴尔温科沃前进阵地出发展开钳形攻势，会使敌军陷于绝境。但是，他没有想到，德军司令部也在准备对处于巴尔温科沃突出部的我军部队进行打击。实际上，大本营批准的进攻是从巴尔温科沃这个对于西南方向部队来说显然是个战



被白雪覆盖的哈尔科夫城，而里面正在进行着一场血腥的大厮杀

术“口袋”的地区出发的。这是十分冒险的。但战争不仅是冒险，战争还是经常的致命危险。

5月12日开始向哈尔科夫进攻。起初很顺利。头三天部队挺进纵深50公里。可是谁也未曾料到，希特勒的军队从南面向我进攻部队侧翼发起强大的突击。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矛盾的命令。根据某些资料(档案中没有这些通话的痕迹)，5月18日铁木辛哥就向斯大林请求停止进攻哈尔科夫。最高统帅拒绝了，他说：

“我们从预备队给你们调两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旅。让南方方面军顶住。德国人很快就会筋疲力尽的……”

当年任西南方面军军委委员的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的报告中有一段讲的就是哈尔科夫事件。他说，当时他从前线叫通了斯大林别墅的电话。但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坚持要同斯大林本人谈。但最高统帅虽然“离电话只有几步远”，却不拿听筒，而是通过马林科夫告诉赫鲁晓夫，只能同马林科夫谈。赫鲁晓夫对二十大代表们说：他通过马林科夫转达了方面军关于停止进攻的请求后，斯大林说：“让一切维持现状吧！”换句话说，赫鲁晓夫明确地声称：哈尔科夫惨剧正是斯大林的过错。朱可夫提出另一种说法，他认为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委会领导人也要为失败负责。朱可夫在其《回忆与思考》一书中写道，总参谋部先于方面军感觉到

了危险。5月18日，总参谋部再一次提出“应该停止哈尔科夫附近的进攻战役……5月18日晚，我同方面军军委委员赫鲁晓夫就这个问题通过话，他的看法和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看法相同：克拉马托尔斯克敌军对我的威胁被大大地夸大了，没有理由停止进攻战役。根据西南方面军军委会关于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最高统帅否定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有一种说法，说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大本营提出危险的信号，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作证，因为最高统帅谈话时我本人在场”。[79]

我看，在这件事上，这位元帅的话更接近真实。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引用自己个人的回忆，恐怕只是他在多年以后转达了他对那次败仗（当时大家都已明白，灾难迫在眉睫）的迟到的反应。朱可夫元帅不止一次强调，最高统帅的决定是根据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如果这仅仅是赫鲁晓夫健忘，倒也罢了。但是，如果这是企图在事后为自己编造历史的“不在现场”，那可就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了。至于斯大林，则是他未能对总参谋部清醒的形势分析作出正确的评价。



德军占领了哈尔科夫。而最先进入的就是这些德军坦克车

当克莱斯特坦克军团不断加强突击力量、扩大突破口时，斯大林才焦急地看清，再过一两天我军部队就可能落入巴尔温科沃的“捕鼠笼”中。最高统帅终于下令在巴尔温科沃突击地带转入顽强防御。可是为时已晚。第6和第57两个集团军，以及向克拉斯诺格勒进攻的由博布金将军指挥的兵团，全部陷入重围，并且实际上已被击溃。这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又一次最可怕的灾难。

斯大林是否明白历次失败的原因？是否认识到了自己多次的失误？是否感到自己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弱点？这很难说。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和整个大本营一样，逐渐接受了战争中血的教训。军事历史学家从现时代的高度正确地指出，哈尔科夫失败的原因太明显

了:没有建立必要的预备队来可靠地掩护进攻部队的两翼;在主要突击方向没有形成决定性的优势;没有进行两三处牵制战,致使希特勒的司令部能无所顾忌地调遣兵力;没有使用布良斯克和南方方面军的航空兵来支援进攻,并打击最危险的敌军集群。我补充一点:克莱斯特的反击竟然出人意料,说明侦察工作十分薄弱。最后,部队的指挥、通讯联络仍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一切在今天,当我们在安静的办公室自己阅读大本营的档案材料时,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在那时,在血淋淋的战争绞肉机里,一切都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模糊得多。然而正是这种时刻才能显示一个统帅真正的伟大和天才。这两点斯大林并未显示出来。不过尽管如此,苏联人民、普通苏联士兵在继续战斗,不停地战斗,他们不知道,明斯克、基辅、克里木、哈尔科夫等等许多地方的许多巨大牺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高统帅还是外行,由于这位“领袖”战前消灭了许多指挥员,而代替这些人的“速成”指挥员们很多还缺乏训练。战前这种对恺撒主义血的奉献带来战争中无法估量的牺牲,特别是在1941至1942年。


游击队虽然在作战能力上无法同正规军相比,但他们是在本乡本土作战,起到了正规军无法替代的作用

斯大林吃了克里木和哈尔科夫两大败仗的苦头以后,决定积极开展游击运动。1942年5月末,他签发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开展游击运动的第1837号决议,决议中特别指出:“为了统一对敌后游击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决定建立一个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在西南方向、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列宁格勒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各军事委员会之下都建立了游击运动方面军司令部。游击运动肩负起各种重要的政治—军事任务。参加中央司令部的有波诺马连科〔联共(布)中央〕、谢尔吉延科(内务人民委员部)、科尔涅耶夫(国防委员会侦察管理局)[9]。这是大本营采取的正确步骤,也许早就应该采取了。

斯大林自然是一直在痛苦地思考失利的原因。这也就使他在后来学到了许多东西。目前，在使南方战场多少稳定下来以后，斯大林决定向西南方面军军委会专门发一封信。

1942年6月26日夜里两点，在华西列夫斯基作完例行报告准备离开时，斯大林说道：

"您等一下。我想再谈哈尔科夫的失利。今天我询问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敌军在库皮扬斯克被遏制住没有，在奥斯科尔河建立防线的进展如何，可是我并未得到任何明白无误的报告。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学会作战呢？要知道，哈尔科夫的失败应该使司令部得到教训。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准确地执行大本营的命令呢？必须提醒他们。应该有人负责惩办那些罪有应得的人，我想向方面军领导发一封亲笔信。您看怎样？"

"我想，这是有益的。"华西列夫斯基答道。

档案中也保存了这份文件。

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

我们——国防委员会委员（这一决定也像其他许多决定一样，是斯大林独自作出的，没有同国防委员会任何一位委员商量过。——本书作者注）和总参谋部成员在莫斯科决定撤销巴格拉米扬同志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的职务。巴格拉米扬同志作为一个有责任加强联络和领导各集团军的参谋长不仅不能令大本营满意，而且作为一个有责任向大本营如实报告战况的普通报告员也不能令大本营满意。更有甚者，巴格拉米扬同志不能从西南方面军的惨败中汲取教训。由于轻率从事，西南方面军在短短三周之内不仅输掉了眼看就能获胜的哈尔科夫战役，而且还将18至20个师送给了敌人……

斯大林停下脚步，住了口，看了一眼华西列夫斯基，接着又开始在办公室踱步，终于向总参谋长问道：

"1914年同萨姆索诺夫一起打败仗的那个俄国将领，姓德国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伦南坎普夫，"华西列夫斯基回答（他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对最

高统帅“七弯八拐的”思想还不习惯)。

“对了,对了……请您接着写。”

这场惨败就其恶果而言,同伦南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在东普鲁士的惨败不相上下。事后巴格拉米扬同志本应从中汲取教训并且学到一些东西。遗憾的是,目前还未见他这样做。现在和惨败前一样,司令部同各集团军的联络依然很差,消息不灵。

兹派副总参谋长博金同志前往你部暂任参谋长,博金同志熟悉西南方面军,当可尽力以赴。巴格拉米扬同志改任第28集团军参谋长。如果巴格拉米扬同志在集团军参谋长任内有良好表现,我将提出日后给以晋升机会的问题。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巴格拉米扬同志。这里也有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的错误,首先是铁木辛哥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的错误。如果我们向全国如实通报西南方面军已经遭受惨败——损失12—20个师——并在继续遭受惨败的情况,恐怕你们就要麻烦了……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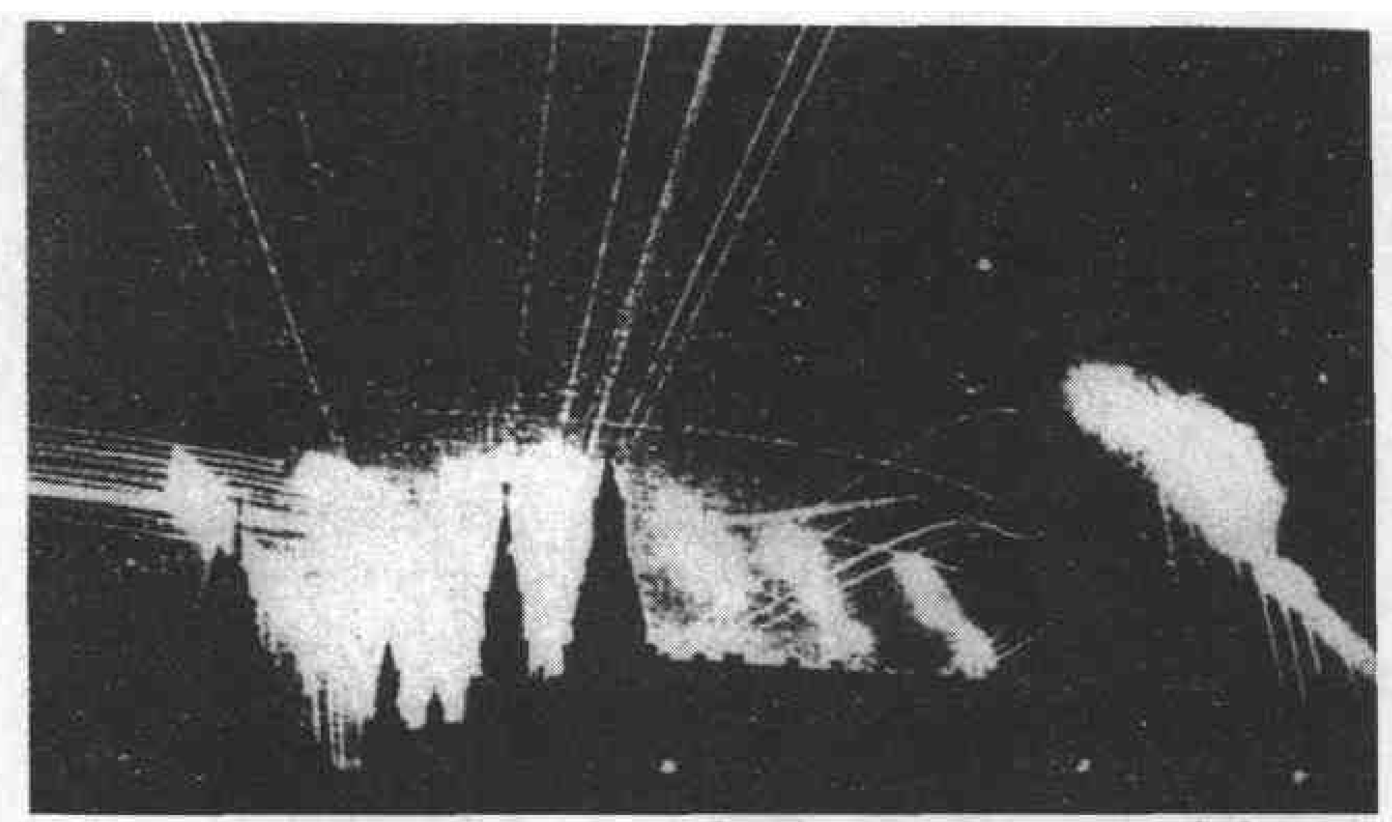
你们成功

斯大林

1942年6月26日2时[8]

斯大林放走了华西列夫斯基,疲倦地靠在圈椅上沉思起来。今年一开始的形势多好。1941年12月5日至1942年1月7日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是三个方面军密切协同完成的第一场大规模进攻战。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迫使敌人从首都城下向西后退了100至250公里!看起来,转折点已经来到了。在克里木大规模登陆成功了。齐赫文一带告捷,杰米扬斯克附近包围了庞大的敌军集群……还有……如果斯大林读过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的《神圣的朱里》,他一定会想起恺撒的话:“一切胜利所给予的都不如一次失败丢失的多。”而失败却不止一次。而且还会有……

这些失败使斯大林感到震惊。不过比起1941年10月首都危急的时候,斯大林还是显得平静。当时最高统帅无法摆脱内心的慌乱,惊恐的



1941 年 7 月 21 日夜间，德空军首次突袭莫斯科，被苏军击退。图为当夜苏军的防空火力照亮了克里姆林宫上空

预感使他十分痛苦。1941年10月2日，当他获得无线电截听到的希特勒讲话时，他可能想过：如果我们现在挺不住，那么这首先将是他斯大林的末日。最高统帅始终觉得，如果再有一次大的失利，他将不仅遭到鄙视，而且会被推翻、抛开，乃至消灭掉……希特勒在对德军讲话中说："展开最后一次巨大打击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次打击将在入冬之前消灭敌军……"

他记得，当时他一连几夜没有离开办公室，每天只在小休息室里打上两三个小时的盹，其余时间都在同总参谋部的将领们、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忙忙乱乱地作出某项决定，安排某些事情，召见某些人。他记得，当时大本营草拟过一个他觉得很高明的训令：全线转入坚决顽强的防御，修建地下工事，到处挖掘设有交通壕、铁丝网和反坦克障碍物的一道道高壁战壕[61]。现在想起这件事，他觉得真可笑，当时他似乎成了"供给"主任了：运到莫斯科的几乎每一辆坦克、每一门炮、每一辆车都要由他亲自分配。例如，1941年10月1日他甚至分配过铁丝网和其他防御工程物资[62]。

虽然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各部英勇奋战，到10月中旬，德军第3、第4两个坦克兵团还是在维亚济马地区会师了；我们的第19、第20、第24、第32集团军陷入了包围圈。


骄横的德军装甲兵在苏联境内耀武扬威地行进着，仿佛他们是百战百胜的“天下第一军”

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苏军一再面临绝境：德军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兵团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它们陷入“包围”和“铁钳”之中。包围像该诅咒的魔鬼一样紧紧追赶着红军的各个部队。由于害怕陷入包围，部队经常惊慌失措，官兵士气大大下降。1941年9月12日，斯大林向各方面军、各军、各师发出“特急”电报，电报中说：

> 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经验表明，我步兵师中有不少惊慌失措分子、甚至是敌对分子，他们一受到敌人压力就抛掉武器，开始大喊：“我们被包围了！”并带动其余战士逃跑。这类举动往往造成全师溃逃……如果这些师的师长和政委能恪尽职守，惊慌失措分子和敌对分子在该师就不会占上风[83]。

斯大林曾经担心，由于害怕被围，维亚济马地区我军也会溃散。但将士们殊死奋战，表现得无比坚定。可惜，只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斯大林当即下令：被围各部向莫扎伊斯克防线突围。一部分部队突围成功，但伤亡很大。由于维亚济马地区被围的苏联士兵奋不顾身，近30个师的敌军被阻滞了一个多星期。在此期间紧急加强了莫扎伊斯克防线。斯大林还记得，当他得知德军已进至奥斯塔什科夫、土拉、纳罗福明斯克，直接威胁莫斯科时，他没有同总参谋部商量，就口述了一个简短的命令，并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署发出：

> 部署在莫斯科西面、西南面和南面各处的莫斯科防空部队所有高射炮连除负责打击空中之敌的主要任务以外，还应准备打击并歼灭突入之敌坦克部队和有生力量[84]。

莫斯科面临着现实的威胁。10月20日，国防委员会决定在莫斯科

实行戒严。10月、11月对斯大林和全体苏联人民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两个月。敌人接连不断发动猛烈攻击，使人措手不及，得不到喘息和休整。斯大林像一个被逼到台角的拳击手，在对手雨点般打击下勉力支持着。最高统帅有时感到，只有出现奇迹，他才能得救。然而挽救他的不是奇迹，而是人民，处境十分艰难的人民奋力挺过来了。这才是莫斯科战役胜利的主要“秘密”。

斯大林还记得，这年10月，列宁格勒的情况也万分危急。列宁格勒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坚定和真正大无畏的精神。1941年11月9日，希特勒在讲演中解释德军在列宁格勒城外为何停步不前时，恬不知耻地说：“在列宁格勒城下，我们已经如期完成了包围所必需的进攻。现在我们在那里进行防御，而敌人则被迫反复试图突围，但他们将饿死在列宁格勒城里。如果敌人有足以打破我们包围的兵力，我早就下令强攻拿下列宁格勒了。但城市已被紧紧围住，城市及其居民都将落入我们手中[⑥]。”


在苏联共产党的号召下，妇女们也拿起沉重的铁锹，在莫斯科外围构筑了长达100英里的壕沟

斯大林对能否守住列宁格勒缺乏信心。1941年10月23日夜间，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之命经直通电话线口述了斯大林亲手写的一份电报：

费久宁斯基、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

鉴于你们行动迟缓，可以断定你们对列宁格勒方面军各部队的危急处境尚无足够认识。如果你们在近几日内不能突破敌军防线并同位于你们和后方之间的第54集团军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你们的部队将全部被俘。恢复这一联系不仅是为了向列宁格勒方面军各部队提供给养，而且特别是为了使列宁格勒方面军各部队有一个东撤的出路（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以免不得已放弃列宁格勒时被俘。你们要考虑到莫斯科处境危急，因此它无法

向你们增派援军。你们务必在二三日内突破敌军防线,使我军在无法固守列宁格勒时有可能东撤,否则你们就会被俘。

你们必须坚决迅速行动。要集中8个或10个师的兵力向东突围。不论是固守还是放弃列宁格勒,此举均属必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存兵力。你们必须采取坚决行动。

斯大林

10月23日3点35分

斯大林认为敌人有可能占领列宁格勒。从上述最高统帅签发的电报中,从准备炸沉波罗的海舰队的命令中都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些档案卷宗中还记载着,一小时以后华西列夫斯基经直通电话线同四天后将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第54集团军司令员霍津中将通了话:

"我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回答你们的问题。第54集团军必须全力以赴支援列宁格勒方面军各部队向东突围……请注意,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保住列宁格勒,而是救援和撤出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完了。"[86]

通往莫斯科的各个要冲也出现了危急局面。德军"中央"集群司令部接到希特勒的命令:"第4坦克兵团和第4集团军立即向莫斯科方向实施突击,目的是粉碎位于莫斯科外围的敌军兵力,牢固地占领莫斯科周围地区并严密地包围城市。为此第2坦克集团军应前出至莫斯科东南地区,其任务是以东方为掩护,先从东南方向、继而也从东方占领莫斯科。"10月间,德军在一系列地区推进了200至250公里。斯大林还记得,10月17日或18日晨,他曾把国防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军方人士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他们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谢尔巴科夫、卡冈诺维奇、华西列夫斯基、阿尔捷米耶夫。

斯大林同大家打过招呼,请大家坐下,然后立即开始发布命令:今天立即撤退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各大企业一律布雷,准备在莫斯科失守时炸毁。在莫斯科城外各条路口设置反坦克和反步兵障碍物。当时还决定,按照动员计划的规定,把政府迁往古比雪夫,把总参谋部迁往阿尔扎马斯。斯大林停了一会又补充说,他依然希望会

有良好的结局：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援军很快就会到达。这些部队已经开始登车了[67]。



9月30日，德军发起了攻占莫斯科的“台风”战役。在苏联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在距莫斯科不到30公里的地方，德军被挡住了

“绝不放弃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了”成了对每个苏联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绝对命令。经过一段短暂的慌乱之后，10月中旬莫斯科街头开始呈现出沉着坚定的气氛。首都准备战斗到底。

斯大林近郊别墅周围布置了几个高射炮连，加强了警卫。有一次斯大林清晨来到孔策沃别墅，一跨出汽车就目睹了敌人对莫斯科的空袭。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在头顶上转动的探照灯光，莫斯科上空成群结队飞机的轰鸣，生动地表明了首都今天的处境。斯大林在汽车旁一动不动地站住了。四个月以前，他能预料到自己的别墅会处于德军坦



1941年10月，德军围攻莫斯科。图为德军巨炮猛轰莫斯科城外的苏联阵地

克纵队一天的行程之内吗？一个东西掉在旁边的小路上。弗拉西克弯腰去拾，那是一块高射炮弹片。卫队长请斯大林进屋去(掩体是后来才修建的)。这大概是最高统帅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感受到近在眼前的死亡气息，但是他又站了几分钟，呼吸着十月之晨的潮湿空气。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产生了到前线去看看的想法。

10月底的一天夜里，由几辆汽车组成的一个车队沿着沃洛科拉姆斯基公路驶出莫斯科市区，再行驶几公里后转入一条乡村小路。斯大林想看看已经进入阵地的火箭装置排射，但是随行人员和卫队不同意继续前进。他们站了一会儿。斯大林听取了西方方面军一位指挥员的报告，他向西方地平线上的紫红色闪光看了很久才动身回去。在归途中斯大林的重型装甲汽车陷入了泥泞。最高统帅的司机克里夫琴科夫束手无策。但是，车队并没有耽搁。贝利亚坚持让斯大林上了另一辆汽车，"前线视察"在黎明前就此结束。

10月中旬的一天，斯大林想去别墅，贝利亚踌躇地说："斯大林同志，不能去啊！"看到"领袖"迷惑生气的目光，他又用格鲁吉亚语解释说："别墅已经布雷准备炸毁。"斯大林发火了，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贝利亚又报告说，在莫斯科近郊某站已为最高统帅准备好一辆专列，还有大本营的四架飞机也已经准备就绪，其中有一架是斯大林的专机"道格拉斯"。斯大林一言不发。他犹豫不决。但他心底深处有一种感觉，只要军队、人民知道斯大林在莫斯科，这就会给他们增添信心。斯大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留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人。他知道首都撤退工作正在全速进行，国防企业已在布雷；贝利亚提出撤退时把地铁也炸毁……应当同谢尔巴科夫谈谈……斯大林闭上眼睛，坐到圈椅上：贝利亚马上就不见了，声音也消失了。他神思恍惚地看见了紫红色的闪光，闻到了艾蒿味。他手里还拿着弗拉西克递给他的高射炮弹片，弹片是温热的……

然而我们坚持住了！德寇对莫斯科的第二次总攻也失败了！不久以后斯大林就批准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展开反攻的建议。计划的重点是由西方方面军在加里宁方面军左翼部队和西南方面军的配合下展开强大攻势，消灭敌军从南北两面威胁莫斯科的主力集团，包围和粉碎与我西方方面军对峙的敌军[8]。最后解决问题的是预备队。正如德军"中央"集群司令博克所预言的，"战斗的结局将取决于最后一

个营”。苏联统帅部这次对预备队的使用精确多了。当德军的进攻在莫斯科城下一败涂地、希特勒匪徒疲惫不堪时，它发出了开始反攻的命令。这次反攻很顺利。希特勒匪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第一次大失败。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德国统帅部已经制定了庆祝“攻克”莫斯科的仪式，这一仪式将意味着俄国人即将投降。最令人吃惊的是，苏军在敌人拥有坦克、炮兵等方面一定优势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


德寇的侵略铁蹄刚刚裹步不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决定发起反攻。具体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崭露头角的朱可夫大将

当侵略者被赶向西去时，转折点仿佛已经来到了。这次胜利的主要作用是使人们恢复了可以粉碎侵略者的信心，冲散了注定失败的气氛，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役，对这次胜利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无论作多高的估计都不为过。看来，从1941年12月起，斯大林对战争的总结局于我有利又有了信心。过去他一直把自己的疑虑埋在心底。现在这些疑虑消失了。即使在哈尔科夫附近、在克里木和维亚济马地区遭到失败的痛苦时刻，斯大林也没有怀疑过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这种希望不是没有根据的。


1941 年 12 月 6 日，在苏军反攻下，德军遭到重创，被迫从莫斯科城下撤退，其“闪击战”从此破产

莫斯科一仗不仅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消灭了敌人30多个师，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几千个居民点），而且对苏联人民、

苏联军队和领导来说也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斯大林还记得，在11月末，当德军进抵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强渡纳拉河、从南面逼近卡希拉时，他曾感到不寒而栗。大本营准备反攻，斯大林却又提出要“调换”各方面军的司令员。早在10月间他就曾派朱可夫大将去接替科涅夫上将指挥西方方面军部队(科涅夫上将则被派去指挥加里宁方面军)，在布良斯克方面军他先派扎哈罗夫少将、后来又派切列维琴科上将接替叶廖缅科上将。科斯坚科中将被调往莫斯科战役中担任右翼的西南方面军，接替铁木辛哥元帅。只有布琼尼元帅仍留任于预备队方面军。斯大林觉得，这些调动在莫斯科战役中促成了各方面军领导的最佳组合。但是，我认为，除了使法西斯“中央”集群司令博克来不及弄清苏联将领频繁调动的情报而迷惑不解，以及使这些司令员们自己只好不断“仓促上阵”而神经紧张之外，最高统帅的这些步骤没有任何其他效果。

斯大林极其灵敏而又毫无信义可言的头脑大概还悟到了一个真理：他对最后胜利的希望不仅建立在莫斯科城下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上，而且首先是建立在苏联人民经受了任何人都不堪忍受的灾难之后仍能重新振作起来的能力上。灾难没有使希望破灭。整个方面军、整个集团军、整军、整师的覆灭并没有变为无可挽回的全国性悲剧，主要就是因为希特勒无法摧垮人民的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只要斗志还没有丧失，最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的牺牲都并不意味着无法挽回的覆灭。已经过去的灾难增强了斯大林的希望。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斯大林在战争前夕的失误和战争初期对武装斗争的瞎指挥，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物质、人力、装备和领土的损失，对此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原谅自己的领导人。然而，苏联人民原谅了，因为早就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为人民准备的角色不是创造者，而只是“领袖”意志的执行者。斯大林一贯认为，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付出的代价。历史甘心让这样一个“统帅—领袖”领导一个大国，他能在战场上丧失10万、20万、30万、40万人，而不丧失对最后胜利的信心……

斯大林对数十万列宁格勒人死于饥馑这一悲惨消息的反应是奇特的。费久宁斯基大将向我叙述过斯大林在解围之后同一些列宁格勒领导人的谈话。列宁格勒人告诉斯大林，1941至1942年那个冬季列宁格勒成了一座幽灵城。已经没有人来收埋倒毙在街头的尸体了。人们



死亡对于列宁格勒人已是很平常、甚至是值得羡慕的事情了。据估计，在长达900天的围困期间，300万居民中仅饿死者就有100万人以上，死于枪弹者更是不计其数了

像影子似的顺着房子移动，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费久宁斯基说，最可怕的是，垂危的人至死神志清醒。甚至连恐惧感也消失了。人们仿佛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亡的来临。冻僵的城市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恐怖的悲剧的默默不语的见证人。

斯大林对这个叙述是这样回答的："当时死亡的不仅是列宁格勒人，各个战场、各个敌占区都在死人。在绝望中死去是可怕的，这话是对的。而饥饿就是绝望。当时我们对列宁格勒无计可施。莫斯科本身也危在旦夕。死亡和战争是一对分不开的概念。这个留着刘海发的恶棍不仅给列宁格勒造成了不幸……"

当向斯大林汇报某一次被包围、不成功的反击或战役造成的巨大损失时，最高统帅一般总是毫不动情。他可以对将领们说一两句挖苦话，例如，"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打仗呢？"或者"又是历史重演……"但他对无法挽回的损失、对成千上万牺牲了的祖国儿女从没有表示过痛惜。或者是他的感情在战前就早已"僵化"了，或者是他善于把自己的感情深藏不露，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感情。

斯大林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是一个不错的心理学家。他懂得他不能离开莫斯科。他知道新闻局发布的消息中不应当有惊慌的调子，因此他要求报刊多登载苏联军人的功绩和英勇作战的事迹。11月国庆前夕，1941年11月7日的前几天，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说：

"我们怎么安排阅兵？比往常提前一两个小时行吗？"

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以为自己听错了。阅兵？德军已兵临城下。由51个师组成的法西斯突击集团差一点拿下了首都……斯大林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困惑，继续说道：

"莫斯科的防空部队要再加强。主要将领都在前线。由布琼尼检阅部队，让阿尔捷米耶夫将军指挥。阅兵时如有德国飞机冲过防线进行



1941 年 11 月 7 日，在德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莫斯科照常举行隆重的阅兵式。一些部队在受阅后即开赴前线

轰炸，要迅速清除死者和伤员，但阅兵必须进行到底。让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纪录片，尽快拷贝后分送全国各地放映……报刊要更广泛地报道阅兵式。我将在庆祝大会上做报告，在阅兵式上讲话……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但这很冒险……很冒险！当然，在国内外将引起巨大的政治反响。"莫洛托夫若有所悟地说。

"那就这么决定了。"斯大林不再发挥下去，他转身对贝利亚说，"您去作必要的安排吧，但是除了阿尔捷米耶夫、布琼尼和几个十分可靠的人以外，不到最后时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准备阅兵的事。"

从今天的高度来看，应当说举行阅兵的决定是大胆的、有远见的。它说明斯大林的信心在逐渐增强，他善于影响全国的舆论，支配人们的情绪。尤其是在战争使许多人对它的结局产生了怀疑的时刻。在沦陷区出现了很多希特勒分子的帮凶。斯大林很明白，失利使人丧失信心。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加强人们的信心。

斯大林把官兵大批被俘的事实视为出卖、背叛和敌对情绪的表现。无一例外。与此同时，斯大林从不公开承认敌人俘虏了大量苏联军人这一无法辩驳的事实。1941年11月6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地铁马雅

可夫斯基站举行的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庆祝大会上讲话时宣布，在四个月的战争中，我们的损失是阵亡35万人，失踪37.8万人……[88]斯大林知道，"失踪"的人数实际上比这个数字大好几倍。在这项损失报告中，"失踪"一栏（没有"被俘"一栏）的数字是多义的，最高统帅从这些缩小的数字中看到的不是战争初期惨败的结果，而是人的教育方面的政治缺陷、惩办机关的工作失误、敌人的影响和昔日阶级斗争残余的再现。对这些现象的评价，斯大林既不是一个精细的心理学家，也不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和 "英明的国父"。在这方面，他仍然是1929至1933年、1937至1939年充分表现自己的那个斯大林。人的本性、人的"主心骨"是很难变的。斯大林一生都保持着存在"敌人阴谋"、"敌人包围"的观点。否则他就不是斯大林了。

俘虏和弗拉索夫现象

法西斯入侵带来了无数的不幸。其中之一就是被俘。人在战争中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往往会选择生，尽管他会因此而失去自由，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和自己的社会尊严。在这次战争中，被俘几乎等于死亡，因为绝大多数被俘军人死于德国集中营。1918年5月，苏维埃政府在致国际红十字会和各国政府书中强调，"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承认并将遵守'战争受害者公约'以及1917年10月以前俄国所承认的一切其他涉及红十字会的国际公约和协议。"但是，苏联没有批准1929年订立的新的日内瓦战俘公约[89]。自1918年以来，苏维埃国家的时代和人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至于希特勒，国际法对他来说，只不过多了一个"虚设"而已。

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之内有几百万苏联军人沦为德国俘虏。苏联至今也没有公布关于死难和被俘者的确切数字。现在查阅档案的手续已逐渐简化，但愿这些数字会得到订正，并且将阵亡和被俘的总数公布于众。下面有一章里我将谈到我自己对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损失的计算。

对苏联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力量对比"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道德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除了叛徒以外,很多人是在悲惨的情况下被俘的。这些都是战争的凄惨的受害者……

斯大林即使在揭露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之后仍长期受到崇拜,他的伟大形象其实也同苏联人民和社会至今仍不知道胜利的确切代价有关。而这个代价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在1941年以及1942年,由于一系列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失利,大量苏联军人做了法西斯的俘虏。这些人的命运无限悲惨。使他们更为悲惨的是,按照我们官方的看法,被俘就是耻辱,几乎就是背叛的同义词。虽然苏联军事条令没有关于被俘的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规定,但普遍的看法却是被俘不只是耻辱,而是事实上的背叛。有过这样一个公式:宁死不当俘虏。但战争的实际状况却往往使很多人宁肯活下来,指望逃出去,返回家园。

在战争头几个月斯大林就曾几次过问损失的规模。总参谋部、总干部部、国防人民委员会都作过汇报,但是当时似乎谁也弄不清楚。我手头有几份正式的损失报告。有死伤人数、病员人数、失踪人数等项。有马匹损失数目,大炮、迫击炮、坦克和飞机损失数目等项……但是没有被俘人数一项。有一份报告说,1941年6月和7月各条战线上失踪72776人……[49]如果加上8月和9月的统计,这个数目就增加一倍。可是我们知道,仅在基辅地区就有452720人被围。其中大部分被俘。在局部的、未经汇总的报告中,失踪人数的计算比较准确。例如,红军军事总检察长、师级军法官诺索夫1941年9月24日向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梅赫利斯报告说:

> 在布良斯克—罗斯拉夫利公路茹科夫卡车站地区的8昼夜战斗中,布良斯克方面军第50集团军第299步兵师遭到巨大损失。至今年9月12日,全师剩下不足500人,在7000名战斗人员中阵亡近500人,负伤1500人,失踪4000人……[50]

斯大林本人曾间接承认有大量"失踪者"。他在给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博金的电报中问道: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已经几天没有报告关于第28、38、57集团军和第22坦克军的情况，大本营认为这是不能允许和无法容忍的。大本营从其他渠道得知，上述各集团军的司令部已经撤过顿河，但是各司令部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均未向大本营报告这几个集团军的部队现在何处，情况如何，他们是在继续战斗，还是已经被俘。这几个集团军好像共有14个师。大本营想知道，这些师现在何处？

约·斯大林[53]

我们都记得，在战争初期，德军将领对红军个别部队和兵团进行包围或半包围的做法有不少得逞。德军坦克集群迅速楔入、分割我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军，使我军陷入孤立、被切断和不明情况的状态。集体的主要力量——互相支持、团结一致的感觉——削弱了。虽然许多指战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英勇顽强，但惊慌失措的现象并不罕见。不少指挥员为了避免被俘而自杀。他们往往是在竭尽全力抵抗之后才这样做的。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害怕被俘的耻辱或追究不执行命令的责任。例如科佩茨少将，他曾在西班牙上空英勇作战，后来担任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在战争开头几天遭到惊人的惨败之后自杀了。其他一些人也是这样做的。别尔津少将在乌曼地区被围，在无法进行抵抗的情况下也开枪自杀了。可是他却长期被列在"失踪者"名单里，并给家属带来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不信任和含糊其词。

希特勒在1941年11月扬言："我只要说出俘虏的人数，就足以大致说明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们不到半年就俘虏了360万人。我不准任何英国笨蛋说什么这还没有得到证实。德国军事机构的统计一向是准确的。"[54]希特勒得意忘形。他实际上宣告胜利近在咫尺，对他已是唾手可得的了。但他当时还没有感到，拿破仑失败的阴魂就站在他的背后，而且从战争伊始就站在他身后了。

现在西方学术界盛传着关于上次大战中苏军战俘的种种数字。一些出版物引用了德军各司令部的材料：据它们的报告，自1941年6月至1945年4月，德军共俘获516万人[55]。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个数字当然有些夸大。

我要再说一遍：看来不久以后即可提出关于双方伤亡和被俘人员

的比较确切的数字。但是，根据已知被围部队的人数、战争初期各次战役的损失数和国外的统计资料，可以初步估算出被法西斯俘虏的苏联军人数目。在战争的最初半年内，约300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我军全部被俘人数的65%。

斯大林对被俘持什么态度呢？他对大批大批军人被围和被俘的事实有什么反应呢？除了官方的口头规定，即禁止被俘，认为被俘对苏联军人来说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之外，在斯大林的想法里主要还掺进了对他们是否背叛、出卖祖国和向敌人屈膝投降的怀疑。斯大林认为，对任何一个被俘过的人都不能信任。除了隔离队以外，斯大林还亲自批准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集中营来“审查”突围归来人员。在战争头几年建立了相当多的这类集中营。档案中有不少像下面这样的斯大林的批示：

> 贝利亚同志：
>
> 我不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三个集中营来审查后撤部队的问题。
>
> **约·斯大林**
>
> 1942年8月24日3时35分
>
> 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博科夫**[96]

最高统帅特别注意失踪的高级将领的下落。例如，他曾特别指示查明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波涅杰林、弗拉索夫、叶夫列莫夫、波塔波夫、拉库京、萨莫欣和卢金的情况。关于卡恰洛夫和波涅杰林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在弗拉索夫和叶夫列莫夫失踪后，最高统帅命令贝利亚查明他们的行踪情况。日丹诺夫的档案里有一封致萨佐诺夫将军的电报：

> 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之命请立即回报你们所了解的弗拉索夫的情况，他是否还活着？你们见到过他没有？为了寻找他，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候复。
>
> **日丹诺夫**[97]

弗拉索夫没有找到，但他很快就自己露面了。后面再谈他的情况。而获悉叶夫列莫夫中将的下落却是偶然的。1943年4月末，斯摩棱斯克州捷姆金区斯洛博特卡村一位妇女报告说，她看见过几个士兵在村外"埋葬一个将军"。情况汇报到上面，上面原先怀疑这位集团军司令被俘了。经过核实后，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等于为牺牲的将军恢复了名誉。

斯大林同志：

叶夫列莫夫中将组织了一个官兵突围小组。在小乌斯季耶村地区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叶夫列莫夫中将腰部受了重伤，他不能独立行走，因而开枪自杀并被葬于斯摩棱斯克州捷姆金区斯洛博特卡村。经掘墓验尸后查明，叶夫列莫夫坐骨受重伤，因恐难免被俘而自杀。

索科洛夫斯基
布尔加宁
1943年4月30日

一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一息的苏联将军，幸而由于查明了情况，才得以一死为自己洗刷了一个政治上含糊不清的嫌疑——"失踪"。

据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向斯大林报告，1941至1942年间有不少将军"失踪"：博布金、巴察诺夫、帕多谢克、维什涅夫斯基、阿尔费里耶夫、祖斯马诺维奇、弗拉基米罗夫、诺沃哈特内依、尼基京、列别杰夫、祖耶夫、格里修克、切列平、瓦涅耶夫、波片科、拉里奥诺夫、叶戈罗夫、普罗霍罗夫、波格列博夫、费奥多罗夫、季托夫、戈尔诺夫、哈茨基列维奇、鲍里索夫、М·Д·鲍里索夫、В·Б·鲍里索夫、库兹明、彼得罗夫斯基、帕夫洛夫、马特金、马贡、卡尔马诺夫、科尔尼洛夫、沙伊穆拉托夫、里希特、鲁坚科、兹尔巴、瑟索耶夫、斯米尔诺夫、苏希伊、萨莫欣、佐托夫、科尼亚克、通科诺戈夫、库利科夫、卡尔贝舍夫、科兹洛夫等等，等等[98]。

其中大部分人看来是在突围时牺牲了。有些活下来的人和波涅杰林、卡尔贝舍夫、卢金等将军一样，在集中营受尽折磨，他们虽然备受摧残，但是并没有丧失苏联人的尊严。然而在斯大林眼里他们依然几

乎是叛徒。

在写这本书时，我了解到很多“失踪”将军的命运。这完全可以成为一部专著的题材。这里只提一些人为例。博布金少将陷入包围，于1942年5月26日被一个德国自动步枪手射杀，倒在自己儿子的尸体旁……很多将军并非“失踪”，而是阵亡，他们是：拉里奥诺夫、叶戈罗夫、费奥多罗夫、季托夫、哈茨基列维奇、A·Б·鲍里索夫、B·Б·鲍里索夫、马贡、彼得罗夫斯基、沙伊穆拉托夫、拉库金、斯米尔诺夫、米特罗法诺夫、马特金、阿利亚布舍夫、苏希依、萨福诺夫、叶戈罗夫、别尔津、瓦西里耶夫等等。例如，B·Б·鲍里索夫和哈茨基列维奇将军被德军炮弹直接击中，死在坦克中。祖斯马诺维奇、尼基京、马卡罗夫、斯塔罗斯京、舍佩托夫、普罗霍罗夫、库利科夫、巴拉诺夫、卡尔贝舍夫以及其他许多将军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被折磨致死。其他一些人的命运不同。瑟索耶夫少将1941年7月被俘，1943年逃出集中营，此后受了三年“审查”。有些人以不执行命令或背叛祖国为由而被判处枪决。只有极少数人，如里希特、马雷什金和日连科夫甘心为希特勒效劳。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在将军中这样的败类是极个别的。



被德军俘获的苏联士兵

我要再说一遍：大部分战俘是在战争开始那几个月的惨败中落入希特勒集中营的。大多数苏联将军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俘的。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苏联将军被俘的只有过几例，他们由于战术的错误、疏忽大意而落人敌人手中。每一次最高统帅都发布了严厉的命令。下面是一份命令的摘录：

各方面军和各独立集团军司令员：

11月6日第44集团军司令员霍缅科中将和该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博布科夫少将在巡察各军司令部途中迷失方向，误入敌区，在与敌人遭遇时由于霍缅科本人驾驶的汽车熄火，二人连同随身携带的全部文件被俘。

一、禁止各集团军和各军司令员不经侦察和不带警卫进行巡视。

二、军司令部及以下各级巡视部队时，除未加标记的巡视地区地图以外，不得携带任何作战文件……

四、禁止高级将领本人驾驶汽车。

约·斯大林

1943年11月7日[49]

我再说一遍，在1942年以后，这只是个别情况。如今轮到我们俘虏法西斯军队及其盟军的将军了。

斯大林在1937至1939年间组织了对社会的"全面"清洗之后，似乎可以指望再没有人会同占领者合作了。大家想必记得，几十年以后莫洛托夫还断言，斯大林在战争前夕"消灭了第五纵队"。他说，不然的话，我们怕未必能在战争中挺住。但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背离了真理。首先，1937至1938年间斯大林"铲除"的不是敌人。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虽然不仅在西方有吉斯林和赖伐尔一流的人物，苏联敌占区也出现了叛徒、附敌分子，而且为数不少。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革命胜利只有20余年。吃了苏维埃政权苦头的人还活着。许多人由于恐惧、想适应环境活下去而走上与侵略者合作的道路。特别是在1941年，有些人认为，德国人即使不是永远呆下来，也会呆得很久。最后，一切时代都有，而且将来大概也会有自甘堕落、出卖和叛变的意志薄弱以至卑鄙无耻的人。例如，在1941年12月末，贝利亚告诉马林科夫说，一个据载姓名为A·П·乌里扬诺夫的红军战士被德国人俘虏后，德国人将他冒充为大尉和两次苏联英雄通过火线派遣过来，但是他很快被揭穿了[50]。

是的，有些人并不认为祖国是一个神圣的概念。然而，比这种人不知要多多少的是那些珍惜公民和爱国者的荣誉和尊严，因而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肯为侵略者效力的人。

在这次战争中，斯大林不仅看到某些同胞单独地与法西斯合作，而且看到他们有组织地与法西斯合作。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沃尔霍夫方面军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员A·A·弗拉索夫中将的叛变。

1942年5月末，斯大林接到关于沃尔霍夫方面军第二突击集团军在米亚斯诺伊博尔地区被截断的报告，当时他表面上显得很镇静。多少个集团军都已经被截断了！他在1941年听到这类消息时还比较激动。现在，在莫斯科战役取得胜利之后，他相信，战场上的某些失利已不可能根本改变反法西斯、反希特勒同盟必将取胜的局面。斯大林知道，指挥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是经验丰富的方面军副司令员弗拉索夫。只不过三个月前，最高统帅还批准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授予他中将军衔的决议，认为他是最得力的集团军司令员之一，准备提升他指挥一个方面军。

几天后，斯大林问总参谋部的人，第二突击集团军的哪些部队突围了，全部过程究竟如何？华西列夫斯基提醒说，最高统帅1942年5月21日签发的第131号训令向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集团军的部队提出的任务是："第二突击集团军主力从西面与第59集团军从东面同时发动攻击，消灭普里尤京和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突出部之敌……然后以第59集团军、第二突击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右翼的兵力确保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米亚斯诺伊博尔、泽姆季察地区沃尔霍夫河西岸的前进基地，掩护列宁格勒铁路和公路，阻止敌人的诺夫戈罗德集群和楚多沃集群沿铁路和公路会合，恢复诺夫哥



弗拉索夫(1900–1946)
原苏军将领

A·A·弗拉索夫原是苏军将领，后被捕叛变投敌，是非德国籍纳粹战犯中的重要一员。191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联共(布)。苏德战争期间，任西方方面军第20集团军司令，参加过莫斯科会战。1942年3月，他所辖的部队在沃尔霍夫地区陷入德军包围，6月被俘后投敌。同年，他秉纳粹头子的旨意，组织了反苏组织"俄罗斯解放军"，为纳粹德国效力。1944年8月，华沙人民举行大起义后，他积极配合德军镇压起义群众，大肆屠杀和平居民，犯下严重罪行。战后逃窜到捷克地区，被美军俘虏后引渡给苏联。1946年，经苏联法庭审判之后，被依法判处绞刑。

罗德—列宁格勒铁路。"[⑩]

"好吧,可是你们怎么让德寇包围了一个集团军呢?"

"当德军一个大集群从北面向第二突击集团军压来时,我几次要求霍津把集团军各部队撤到沃尔霍夫河一线。"

"那么霍津呢?"斯大林严厉地看了一眼华西列夫斯基。

"直到5月25日方面军才发出了必要的命令,但是显然晚了。三四天以后,集团军的主要供应交通线被切断,全军陷入了包围。"华西列夫斯基接着说,"此后,我和博科夫联名于6月3日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发了一封电报:'你们消灭斯帕斯卡亚波利斯季和普里尤京地区之敌的行动极为迟缓。敌人非但未被你们消灭,反而转入积极行动,阻断了第二突击集团军的退路,因为敌人猜到了你们撤出该集团军的意图。方面军各部队在敌军战斗序列中打开缺口的尝试不见成效。其主要原因不仅是你们动作迟缓,而且是你们没有以第二突击集团军全力突击而采取了分别撤出的办法……在这件事情上拖延和犹疑不决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一切使敌人有可能在他们抢占的第二突击集团军各条退路上日益站稳脚跟。'[⑩]但是,对我们的要求,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看来至今仍未照办……"

"同弗拉索夫有联系吗?"

"没有。他最后的几次报告还是6月初来的。"华西列夫斯基答道。

"也许应该把沃尔霍夫作战集团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方面军?"

"我认为采取这个步骤是正确的:这个集团有六个集团军。应该让他们确保第二突击集团军突击重围。"

"把霍津撤掉,任命戈沃罗夫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任命梅列茨科夫大将为新组建的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正式下令。"

由于其他事情,最高统帅不久就忘记了弗拉索夫,没有再注意和想起他。诚然,当德国电台大肆渲染包围了一个"最大"的苏联集团军时,斯大林曾下令苏联新闻局编写一则特讯。苏联新闻局很快向他报告了所拟的初稿:

德国新闻局6月28日发布了希特勒大本营关于消灭所谓在沃尔霍夫河西岸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包围的沃尔霍夫方面军第二突

击集团军、第52和第59集团军的消息。但是,在该战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向交通干线突进的敌军各部受到第59集团军、第52集团军和第二突击集团军的东西夹击,大部被歼,小股残余退回原地……因此,所谓消灭了第二突击集团军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苏联新闻局

斯大林看了一眼新闻稿,沉默片刻,把它交给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不用发表任何消息。”他改变了主意。

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又下令发表关于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消息。1942年6月29日苏联新闻局报道称:

希特勒的御用文人举出了所谓俘获我军3万人的天文数字,并扬言击毙人数高出俘获人数许多倍。希特勒的又一次造谣当然不符合事实……据不完全统计,德军在这次战役中被击毙者即不下3万人……第二突击集团军各部已撤到预定地区。我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为约1万人阵亡,近1万人失踪……

很难相信,德军和我军的伤亡总都是这样的“整数”!直到今天我们才逐渐知道,由于开春过早,沃尔霍夫方面军在作战准备方面做得不好,使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丧生沼泽,而他们至今仍被列在“失踪者”名单中而蒙受不白之冤!

大约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深夜,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还留在斯大林那里,贝利亚戴着闪闪发光的小眼镜,从他总是随身携带的那只皮包中抽出几页文件放在斯大林面前。

“这是什么?”

“请看一下。看看失踪的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员是怎么出现的,”贝利亚答道。

斯大林把文件拿过去,匆匆看了一遍:

俄罗斯委员会告红军官兵、全体俄罗斯人民
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书

俄罗斯委员会的宗旨是:推翻斯大林及其集团,同德国缔结

光荣和约，建立新俄罗斯……我们号召你们站到同德国合作的俄罗斯解放军方面来……

俄罗斯委员会主席
弗拉索夫中将
俄罗斯委员会秘书
马雷什金少将[89]

接着是穿越火线的通行证、“A·A·弗拉索夫的公开信：我为什么走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和其他类似“产品”。

斯大林厌恶地将传单推开，问贝利亚：

“也许这是伪造的？我们有弗拉索夫的什么消息？证实了吗？”

“证实了。弗拉索夫对德国人很卖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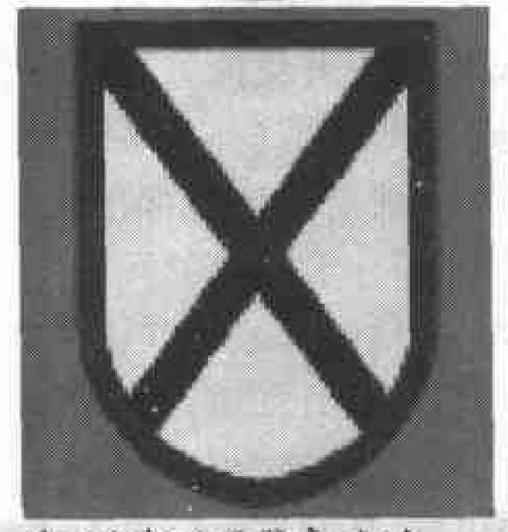
“我们在战前怎么没有看透他？”莫洛托夫插言道。

贝利亚没有回答，只是从皮包中抽出弗拉索夫的个人档案。斯大林翻开一页，目光停在这个高颧骨、戴眼镜、支楞着耳朵、目光专注的人的照片上。他生于高尔基州；父母是中农。除了老父亲与妻子以外，没有其他亲人。大概是贝利亚用红笔画的着重线：毕业于下新城神学校，1917年前在神学院学习了两年……斯大林心想，如果不是革命，他就会成为神父，而不是红军将领了……参加过国内战争。此后在军队工作，表现一直良好：他指挥的第99步兵师是基辅军区最优秀的师之一。在此以前还被特派到过中国。指挥过第4机械化军，在佩列梅什利和利沃夫地区作战表现不错，后来——斯大林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签署过任命——被提升为保卫基辅的第37集团军司令员，该集团军当时表现也很好。后又任第20集团军司令员，最后是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员……斯大林还记得，1942年4月20日沙波什尼科夫受他的委托签署了任命第二突击集团军司令员A·A·弗拉索夫“兼任”（在军事语汇中此词少用）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的命令[90]。所有的鉴定都很好。1938年他的党内鉴定中写道：“在消灭所部中破坏分子残余的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鉴定是由一些著名将领签署的，他们是基尔波诺斯、穆齐琴科、帕鲁西诺夫、戈利科夫。只有1940年11月19日的鉴定提了一条意见，就是希望他“注意爱护和照看好马匹”。处处都有“忠于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字样。1942年1月24日朱可夫大将

在弗拉索夫的作战鉴定中写道："弗拉索夫中将指挥了第20集团军的历次战役：反攻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率部向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进击和突破拉马河防线。弗拉索夫中将作战素养良好，有组织能力，完全胜任指挥集团军部队的任务。"

残酷的战争时期能得到朱可夫"完全胜任"的评语是很不容易的。但朱可夫、基尔波诺斯和戈利科夫等人怎么没有看透这个叛徒呢？这种想法本来是能够向早先习惯的方向发展下去的。但我们不妨从头考虑一下：战前还顾不上去深入了解弗拉索夫这种人，而论作战他又比很多人表现得出色。获得过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人的内心深处总会有些东西是从外面观察不到的。看来此人从未有过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他善于佯装爱国和忠于职守。他办事谨慎、一丝不苟。有些特工人员想抓弗拉索夫曾受教于神学院的问题，但后来不得不放弃了，因为"领袖"本人也在神学院学习过……斯大林起初不相信弗拉索夫在德国人那里能干出什么大事来，但此刻他明白了：在宣布成立俄罗斯解放军以后，应当还会有其他民族的组织出现。他猜对了。





俄罗斯解放军臂章、标志

柏林方面感到，他们把赌注押在闪电战上，而对苏联的威力——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和道德—政治的威力估计不足。希特勒指望，苏联在遭受了他1941年给予的那些巨大打击之后，各民族一定会四分五裂。但事实并非如此。各族人民的团结并未发生动摇。相反，它成为苏维埃国家强大生命力的一个支柱。共同的危险大大加强了苏联人民的民族团结，尽管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包括战争期间在内，都犯了严重错误。

希特勒当局早在1942年就开始在战俘营中搜罗渣滓，把他们派到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以及其他民族军团，如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斯坦、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等军团去服役。希特勒当局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但是成效很小。不

少战俘之所以参加这些军团,只是因为把这看作一条活命之路和逃归的机会;当然也有些人听信了民族主义的宣传。但整个说来,还是国际主义力量更强大。甚至穿着军装的"军团士兵"也纷纷设法穿越火线归来,尽管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在这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例如,1942年10月3日,土耳其斯坦军团士兵别尔格诺夫、哈桑诺夫和图列巴耶夫为了寻找游击队,艰苦跋涉四昼夜,终于到达苏军驻地,他们报告说,他们那个营的大部分人都想回归。同年10月8日,前苏联军人楚拉亚和卡巴卡泽二人越过第2近卫步兵师防线,请求协助格鲁吉亚军团的一个支队穿越火线[69]。

德国人对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组织的军团尤为看重。到战争前夕为止,这三个共和国的居民加入苏维埃联盟只不过一年左右。但是德军司令部基本上也只能把这些军团当作辅助兵力使用:守卫建筑物和道路,巡逻;当然,偶尔也让他们参加讨伐行动。战后,参加过军团的人都受到审判并被放逐。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领导曾请求苏联政府对这些人实行特赦。例如,1946年3月16日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拉齐斯和拉脱维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卡伦别尔津曾致函莫斯科:

> 在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暂时被占领期间,德寇曾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强迫动员,一部分居民被驱往德国服苦役,一部分人被编入德军的所谓军团……解放后这些人被判处流放北部地区六年。
>
> 对那些除在军团服役外并无其他劣迹的人,请准予返回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69]

斯大林通常总是将这一类信件交给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不过在有关投靠德寇或随德寇逃走者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

北高加索解放后,贝利亚曾向斯大林报告:

> 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把匪徒、德寇的积极帮凶、祖国的叛徒和自愿随德寇逃走者的家属作为特种移民从斯塔夫罗波尔、基斯洛沃茨克、皮亚季戈尔斯克、矿水城、叶先图基……迁往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定居。应移居者共735户、2238人。请批示。

拉·贝利亚[107]

斯大林照例"同意"。他未必不明白,母亲、姐妹和子女不能为父兄的罪行负责。但斯大林总是我行我素。

关于各个军团的活动,主要由政治机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斯大林报告。他看到,这些军队并没有什么实力,但它能引起政治共鸣。我所能了解到的一些口头指示和书面批示一样,说明了斯大林对祖国叛徒强硬的、毫不留情的态度。不过这类指示为数并不很多。

在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文件中有几份关于小股叛匪与敌人勾结进行抢劫滋扰的报告。例如,科布洛夫向贝利亚报告说:

关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反匪帮活动斗争情况

上周内(4月27日至5月3日)发生6起匪徒滋扰事件。击毙匪徒8人,其中包括2名德国空降分子。捕获匪徒46人。缴获武器37件。我方损失8人。卡亚肯特匪帮头目纳日穆金被击毙,捷米尔卡诺夫匪帮被歼灭。[108]

还有一份报告,上角有内务人民委员的批语:

送呈斯大林、莫洛托夫、安东诺夫同志。

拉·贝利亚

1944年7月20日

7月12日在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卡兹布伦村地区大片森林里进行了搜索,捕获德国空降分子法扎耶夫(原共青团员,奥赛梯人,在乌鲁赫村当过警察,1943年参加德军,领德军中士军衔)。另捕获空降分子数人。空降分子共8人,其中2人仍在搜索中。余皆被击毙或抓获。

科布洛夫[109]

克里木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报告。斯大林和贝利亚不是继续清除匪徒、占领军走狗和各种犯罪分子，却根据谢洛夫、科布洛夫、莫穆洛夫和察纳瓦等杀人魔王的建议和计划，决定从北高加索、卡尔梅克和克里木把整个整个的民族迁往东部地区。有文件证明，当时这些地方有过不少动摇分子。但是，这些民族以及我们整个祖国出了多少英雄儿女呀！例如，到战争结束时止，仅仅车臣族和印古什族就有36人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

在1944年期间，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时，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及相应法令，迁移了几十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克里木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梅斯黑金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居民。易卜拉欣贝利史学博士（根据党和国家的档案）对这一悲惨时期作了尚不多见的文献研究[9]。而当时斯大林不断收到的却是如下一类报告：

国防委员会：

遵照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43年12月28日的决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了把卡尔梅克族人迁往东部地区的行动……共有26359户、93139人乘火车前往阿尔泰边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鄂木斯克州和新西伯利亚州各安置点……

拉·贝利亚[10]

斯大林密切注视这些“行动”，就像注视战场上的行动一样。只不过这些行动没有遇到抵抗而已，因为迁移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就连贝利亚的报告也说：“在迁移行动中，在当地和途中都没有发生事端……”可是有几十万人却凄凄惨惨和胆战心惊……但是这种感情“各族人民之父”是体验不到的。在这类事情上他是慷慨的：

“嘉奖模范执行迁移命令的人员！”

他的吩咐迅即得到执行：

国防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遵照您的指示，送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参加迁移车臣族人和印古什族人行动的最卓越人员（哪方面卓越？——本书作者注）勋章和奖章的法令草案……共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1.9万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的近10万官兵参加，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除已参加迁移卡拉恰耶夫人和卡尔梅克人的工作外，还将参加即将进行的迁移巴尔卡尔人的行动。经过这三次行动，共有65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迁移到苏联东部地区[19]。

历史上可怕的一页……独断专行竟到了残酷对待一个个民族的地步。请想一想吧，斯大林实际上是指控整个民族犯了“叛国罪”！十几万大军参加迁移老人、妇女和孩子的行动。难怪在前线激战方酣的地点和军情紧急的时刻往往不能“多给”一个团或营。在这里却有十几万！这个独裁者早已不受任何道义的约束了。自诩为列宁的惟一“保卫者”和“解释者”的斯大林却不愿记起列宁的如下英明警告：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国际主义团结的发展和巩固了，‘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和对破坏这种平等感更敏感的了……”[20]我们伟大苏联的各族人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哈萨克人、犹太人、卡巴尔达人以及其他数十个大小民族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结下”不少悲惨的疙瘩，其中就有民族之间的疙瘩，明智而心平气和地解开这些疙瘩是我们今天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国际主义团结——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梦寐以求而目前依然遥远的繁荣的源泉，无论如何都不该受到伤害！

我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是想说明，对整个整个民族的“惩罚”同各民族苏联公民个人和集体背叛祖国、背叛军人义务的事实毫不相干。如果斯大林始终如一地遵循他的罪恶逻辑，那么在俄罗斯解放军成立之后，他就也该流放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所有其他民族……这当然是做不到的，由此可见斯大林那些罪恶的决定是何等荒唐。

弗拉索夫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许多原因造成的：战场上的重大失利、民族主义的残余、对特权阶级某些代表人物（及其子女）的社

会不满情绪、某些人并非自愿地被俘之后害怕遭受惩处。随着对侵略者的反击日益加强，自愿投敌的现象逐渐减少，1942年底和1943年实际上已经绝迹。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对在非俄罗斯族战士中工作的宣传员讲话时指出，以列宁格勒方面军为例，1942年8月共发生投敌事件22起，而1943年1月则仅有2起。再以后这种可耻现象就完全消失了[13]。

西方关于弗拉索夫写了不少书。例如约亚西·霍夫曼的《弗拉索夫军史》一书还特别提到(据说是根据弗拉索夫档案)，到了1943年5月，受德军指挥的有90个俄罗斯营和几乎同样多的其他民族军团[15]。数字被严重夸大了。因此，一切把这个"运动"称为"对布尔什维主义挑战"的说法是极其不足信的。实际上，弗拉索夫部队吸收的主要不是"有理想的战士"，而是刑事罪犯、民族主义者和贪生怕死的意志薄弱者。弗拉索夫企图依靠流亡的白匪军(白匪军头目克拉斯诺夫、什库罗将军和苏丹—吉列依·克鲁奇将军等人)，说明这个运动完全是乌合之众。

除了苏联社会的坚定可靠的社会一致性及其道义上政治上的团结而外，军事上的胜利对消除弗拉索夫一类现象起了巨大的作用。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根除了士气低落、惊慌失措和情绪压抑这些造成叛变的因素。不过斯大林认为，弗拉索夫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战前没有挖尽"人民的敌人"。因而对归来的战俘实行了更严厉的监督，在接近前线地带采取了一系列特别措施，对公开发表怀疑指挥失当言论的人加强了惩处。在这方面保存下来不少文件和由执行者记录的斯大林口头命令。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检查被解放地区和保卫红军后方的任务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经常向斯大林报告措施情况。波及面相当大。请看贝利亚向最高统帅报告这项工作情况的文件之一：

> 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卫作战红军后方部队在清理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和执行保卫战线后方任务中，共拘留审查了931549人，其中军人582515人，平民349034人。
>
> 从全体被拘留人员中查出并逮捕了80296人(特务、叛徒、讨伐队员、逃兵、抢劫者和其他犯罪分子)[16]。

为了制止和声讨叛变行为，1943年2月举行了一系列公开审判，对

同法西斯匪徒积极合作的前红军将军弗拉索夫、马雷什金以及其他几个叛徒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判处枪决。但就是这些审判也不是没有错误的。由斯大林签署的大本营1943年5月12日第30126号训令断定，"现在已确切查明，卡恰洛夫中将、弗拉索夫中将、波涅杰林少将和马雷什金少将叛国投敌，现正同德国人一起反对我们的祖国……"爱国者卡恰洛夫和波涅杰林被"算在"叛徒弗拉索夫和马雷什金一伙里了。直到1956年卡恰洛夫和波涅杰林才得以恢复名誉。

贝利亚及其部下不仅在我方控制地区加强审查和揭露可疑分子，而且还想查清德国人用战俘组建的伪军情况。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时一般都是只有他们二人或还有莫洛托夫在场。有一次他给最高统帅看一份审问从德国集中营逃跑到游击队中的红军少将布德霍的记录。布德霍被关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那里关押的大部分是被俘军官。他讲了很多人的详细情况，谈到弗拉索夫的私人代表日连科夫将军以及俄罗斯解放军其他官员来到集中营的情况。顺便说一下，日连科夫在战前掀起的镇压党的工作人员的浪潮中步步高升，曾任莫斯科的一个区委书记。他在任西方方面军第3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时陷入敌人包围后被俘。这个偶然跻身于党的干部行列的人没有原则和骨气，因此很快就加入了附敌分子的阵营。弗拉索夫的另一个亲信、前第19集团军参谋长马雷什金少将也是这种情况。1938年他曾受迫害，战争爆发后被释放，但最后还是投靠了弗拉索夫。很难说此人究竟是因为受过冤屈，还是出于信念而有意叛变。不过，当贝利亚报告一些受过审判而后来又被释放的将军的情况时，斯大林脱口而出：

"了解一下，当时是谁为马雷什金说情的……"

斯大林没有往下读布德霍的审讯材料：他不愿意浪费时间看这些人的材料，他认为这些人都是1937至1939年间的漏网之鱼。

斯大林心想，这些弗拉索夫分子毕竟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国家经受住了1941年最可怕的岁月。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比伟大卫国战争更凄惨的战争开端。当时所有最有权威的大军事家和政治家都认为，俄国最多能坚持三个月。苏联人民推翻了这些预言。诚然，他们那种非凡的顽强的坚毅最后都完全记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的账上了，尽管实际上正是他对这一惨痛的战争开端负有主要责任。



第9章

最高统帅

取得胜利的将军,在人们眼中是从不犯错误的……

——伏尔泰

(法国哲学家)

一切问题只有时间能够回答。就在几年以前,我们对斯大林知道得还很少。他像一座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雕像,阳光照射的一面被当作了现象的本质。而处在阴暗的一面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越是打开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就越是相信,"向阳的一面"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斯大林,却始终藏在让人民瞻仰的雕像的后面。

我知道,这种说法会使一些人感到不满甚至愤怒。30年前,它大概也会在我身上产生同样的反应。可是在我阅读了大量文件原件、材料以及见证人的证明材料之后,我越来越相信,甚至在直到最后还保留着"领袖"伟大这种幻觉的领域,也毫无天才可言。人们马上可以引证权威们的话,引证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些军事首长的话来反驳我,因为他们都写了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总的说来,对斯大林都作了正面的描写,尽管细心的读者在这里也能找到不少谨慎的保留、暗示、间接的证明,说明最高统帅并不英明。所有这些问题,我下面还要谈,现在只谈两点意见。

战争回忆录的作者们,他们虽然在前线度过了漫长的战争的1418个日日夜夜,但是对斯大林的许多事情,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以及60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起来的那一套关系体制中,真相始终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它们都经过重新调配、裁剪,发生了变形。

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甚至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的人,也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对回忆录进行审查。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写。任何一本书都要经过认真的检查;不能写1937至1939年的镇压,不能对斯大林的"统帅天才"表示怀疑,不能不提先是赫鲁晓夫后是勃列日涅夫以及往往还有他们的战友对胜利的"特殊贡献"。任何真相,如果不符合确定的模式的框框,就都要加以裁剪和改变,以至弄得面目全非。根据掌握的证据,甚至朱可夫也不得不按照上面所作的删节来压缩自己的一部分手稿。据空军主帅诺

维科夫的遗孀说，朱可夫死前不久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疗养时曾对她谈到他为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非常可惜的是，甚至不幸的是，许多著名的老战士，他们虽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回忆录，但他们有时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却不得不对有些事情吞吞吐吐或保持沉默。那时能讲真相的时代还未到来。

斯大林并非“英明的统帅”，并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长诗、研究报告、声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样。我完全不是想说他是平庸之辈。我要根据文件和证据竭力证明，这是一个拥有实际才能和坚强意志、不乏坏点子、不惜通过血腥试验的代价来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书斋型统帅。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时，常常把“胜利的代价”这样一个衡量他的“统帅才能”的极重要的标准置于“镜头”之外。今天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清楚，而且我也想在书中指明，国家和军队在1941年6月的处境，完全是那个后来成为最高统帅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远见、实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结果。通常人们会立即反驳：“你为什么要诿过于一个人，要知道当时有党，有党中央，有政治局，还有他周围的一班人。”对，有。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在实行恺撒主义的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和社会的机构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独裁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在回顾过去时这一点决不能忘记。



劫后余生的苏联村民在遍布的尸体中寻找亲人。德国占领苏联西部期间，无数的平民丧生于德军之手。

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遭到极大的牺牲时没有丧失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战争初期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遭到的毁灭性的失败，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遭

到的惨败以及这场战争中其他痛苦的篇章。由于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下面一类的话来说明一切，例如：“由于苏军行动失利，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不能永远隐瞒真相，祖国的几十万儿女首先是由于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失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给抹杀了。是的，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既然我国人民能在既有“伟大领袖”也有希特勒所造成的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支持住并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为什么还要害怕真相呢?

在这一章中我谈谈斯大林的统帅才能。在给这个战争时期占据着国家一切最高职位的人画像的时候，如果不想回答下面的问题，是会画得不完全的。这些问题是：未来的大元帅是否有统帅才能?斯大林在战争的各个时期是否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统帅?斯大林周围的军事将领在他的统帅活动中起的作用如何?为什么在最高统帅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损失比敌人大1~2倍?

拿破仑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曾经指出，统帅“应当具有同样多的性格和智慧”。但他同时又指出，一个统帅不单是需要有这些素质，还应当使这些素质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议论很有趣：他把统帅的才能比作一个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顶部是智慧。拿破仑说，真正的统帅，是意志不亚于智慧的人。如果意志胜过智慧，统帅会行动坚决，勇敢，但不总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胜过意志，可以有好的计划和意图，但是由于缺乏勇气，这些好的计划和意图将难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结合，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样的统帅更强一些呢？“是智慧高的还是意志强的？”

当然，我理解，拿破仑的这些看来原则上是正确的议论，并没有包罗一个统帅所必需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品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意志，则是毫无疑问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敏锐的、广阔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并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正像读者已经有可能相信的那样，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的意志也发生过动摇，因为一个人的沮丧、震荡、心理上的危机常常是同意志的变形(即使是暂时的变形)联在一起的。至于说到智慧，他也是很强的，不过他的智慧是教条式的，好像是“单维的”，总是对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计

过高。

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性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下面举几个例子。

1941年8月6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6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

或者再举一例。1941年8月28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450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

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3]。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已经表示出愿望,要从军队的脑颅中爬出来,进入整个国家机构的头脑之中。"[4]对于国家机构,我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大本营来说,这一真理是无可争辩的。大本营能够依靠"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紧张工作发挥作用。

斯大林和大本营

内战时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当时托洛茨基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职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写的一本小书《在沙皇大本营的250日(1915年9月25日——1916年7月2日)》送给了未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战线的列车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这本书。在这本揭露性的小书中,讲述了肩佩白色穗带的军事"官僚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拟定平庸的作战计划的情况。因此,当1941年6月23日晨铁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最高军事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时,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记的列姆克的那本小书就曾描写过旧俄国的最高统帅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最初设在巴拉诺维奇,后来设在莫吉廖夫。所有领导过大本营的人(克伦斯基除外)这时都已故去。他们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杜鹤宁……斯大林想起这个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宁的命令由克雷连柯率领的一支革命队伍占领的,想起这个克雷连柯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

是的,原来在苏维埃时期已经有过一个大本营的首脑……而现在


克里姆林宫

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却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议他担任大本营的首脑。不,让铁木辛哥干吧……

我们知道，起初,大本营由铁木辛哥主持,但从1941年7月10日起,大本营由斯大林领导,而从8月8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巴拉诺维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国人占领,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营甚至最好不要设在莫斯科近郊。战争前夕,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一两个拥有专门装备的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据点的问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斯大林采纳。1941年5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组建统帅部大本营的方案。方案中建议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专门训练,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在战争发生时需要有这样一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但是当时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谁也没有敢于再向斯大林提出这类建议。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两个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近郊别墅。远处的别墅,谢苗诺夫宫,在战前他几乎没有去过,而1941年9月,他已下令将谢苗诺夫宫改作安置伤兵的医院。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是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办公室、他的近郊别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厦或者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斯大林就是从这些地方指挥战争的。

关于大本营的工作,我认为,朱可夫在他的《回忆与思考》中比谁写得都好。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业》这本书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什捷缅科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写大本营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够说明最高统帅作为大本营主席活动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领导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须知,他还是党中央的最有权力的书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党和国家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最高职位都由一个人占据着。我已经说过,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这种权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是渐渐地,这种权力的史无前

例的集中的消极方面也愈来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党中央、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任何一项决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难以通过。我不认为，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会妨碍解决总的任务。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内战时期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们就会看到，它并没有代替党和国家的机关，而是在依靠它们进行工作。

再说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每天召集会议，有时每昼夜要召集好几次会议，并不是会议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明确断定是哪个机关在开会。这可能是有军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也可能不只是国防委员参加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本营的会议。有时斯大林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才加以明确化：

"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签发。"

"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

有时马林科夫还把讨论的总结作为政治局的决定记录在案。实际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而不管会议的决定是怎样写的。似乎斯大林对某个人形式上属某个领导机关并不大重视。对他来说，这并没有原则意义。但是这给执行者却造成了困难，他们必须"匆忙"判定，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党中央书记的、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以便把相应的指示交给相应的部门办理。通常不作任何记录或速记记录。例如，大本营的档案库里有成千上万份各种文件——报告、证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证明大本营讨论了某些战略问题的材料实际上却没有。斯大林，特别是当他从战争头几个月受到的震动中觉醒过来并振作起来之后，常常邀请大本营的两三个委员同他一起决定作战问题。从一开始，总参谋部这个大本营的主要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就养成一种习惯，他们到斯大林那里必须带上准备好的建议、结论、评价。这有助于最高统帅扮演最高仲裁者、公断人、决策者的角色。

大本营的成员们知道，在国防委员会中每一个人都负责一定的部门如弹药、粮食、飞机、运输、外事等等。大本营没有这种分工。它在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管理机构的协助下对各条战线实行日常的领导。大本营在各部队的代表机构，开始"随意地"代替大本营的参事起作用。应该说，斯大林几乎不把大本营的代表

留在莫斯科。由于他自己不爱到外地去(除了战前到南方休息),所以他不能容忍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因此,朱可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最初还有梅赫利斯,虽然他们每人都担负有某种主要职务,还是经常要到部队去。最高统帅要求他们每天向他作书面报告或打电话作口头报告。如果大本营代表的报告由于某种原因被耽搁或让人转交,就可能受到"申斥"。而斯大林在这样做时又非常粗暴,不能掌握分寸。例如,马林科夫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由于报告作得不经常,有一次就遭到了斯大林的申斥。还有一次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也作出了这样的反应。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态度一般很好,如果说斯大林也有"态度好"的时候的话。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封电报,不过它被大大简化了。我现在从大本营的档案库中把这封电报全文引出来:

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现在已经是8月17日3时30分,而您还没有把8月16日的作战总结和您对于形势的估计报送大本营。

我早就要求您,作为大本营的全权代表,必须在每一天的作战结束时给大本营送来专门的报告。您几乎每一次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一职责,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

8月16日是西南方面军重要战斗的第一天,而您是大本营派往那里的全权代表。而您竟然又忘记了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

您不能借口说时间不够,因为朱可夫元帅在前线的工作不比您少,可他还是每天都给大本营送报告来。您和朱可夫的差别在于,他有纪律,没有失去对大本营的责任感。而您缺乏纪律性,常常忘记自己对大本营的责任。

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有哪怕一次忘记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您将被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从前线召回。

约·斯大林

1943年8月17日3时30分[5]

这是最高统帅通常的作风。凡是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作为大本

营的代表被派往部队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元帅、高级军事首长，举不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遭到斯大林申斥的痛苦时刻，而这种申斥往往是不该遭受的。这一次就是华西列夫斯基送了例行的报告，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交到斯大林手里。接着就迅速作出了反应。

如果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到战线某一地段后，那里的局势没有好转，就会马上作出"结论"。例如，1942年2月，斯大林派伏罗希洛夫到沃尔霍夫战线。这位元帅，"领袖"的这位昔日的亲信，在此之前已经牢牢树立了平庸统帅的名声。伏罗希洛夫这一次也没能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当斯大林通过直通电话建议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他不知所措，便拒绝了。这使最高统帅简直无法容忍。一个多月以后，伏罗希洛夫从前线回来，斯大林口授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后来被正式作为政治局的决定。现在把这个文件引来，虽然稍有删节，也是颇有兴味的。

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现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2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工作的决定通知如下：

第一，1939至1940年同芬兰的战争，暴露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落后状态。红军中缺乏迫击炮和机关炮，对飞机和坦克缺乏精确的统计，军队缺乏必要的冬装，军队没有压缩食品。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炮兵管理总局、战斗训练管理局、空军管理局这样一些重要部门中，工作杂乱无章，军事院校办得很差……所有这些都拖延了战争，导致了不必要的牺牲。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不得不在1940年3月底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承认暴露出来的问题——自己对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不力……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解除伏罗希洛夫同志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第二，在对德战争初期，伏罗希洛夫同志被任命为西北方向总司令，主要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后来事实表明，伏罗希洛夫同志对被委托的工作不能胜任，不善于组织列宁格勒的防卫。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下令在民兵部队中选拔营级指挥官——这道命令已经根据大本营的指示被认为是一道会瓦解和削弱红军纪律的命令加以废除；组织列宁格勒的

军事防御委员会，而他自己却不参加这个委员会——这道命令也被大本营作为不正确的有害的命令加以废除，因为列宁格勒的工人可以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加入防御委员会理解为他不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醉心于建立装备很差（手枪、长矛、匕首等等）的工人大队，却忽略于组织列宁格勒的炮兵防御……由于以上原因，国防委员会不得不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从列宁格勒召回……

第三，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请求，他在2月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沃尔霍夫战线帮助战线指挥部工作并在那里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沃尔霍夫战线的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联共（布）中央希望再给伏罗希洛夫同志一次利用自己在前线的工作经验的机会，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直接负责指挥沃尔霍夫战线。但是伏罗希洛夫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不愿意对沃尔霍夫战线承担责任，尽管这条战线现在对保卫列宁格勒有决定意义；他的借口是，沃尔霍夫战线是一条困难的战线，他不想在这件工作中弄得身败名裂。

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决定：

第一，认为伏罗希洛夫同志未能完成委托他在前线担负的工作。

第二，派伏罗希洛夫同志去后方从事军事工作。

联共（布）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8]

这个决定显然是斯大林的创作，因为它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最高统帅没完没了地重复“伏罗希洛夫同志”，实际上是要说明过去的“第一元帅”毫不中用。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幸运，他没有像库利克元帅那样被革职。伏罗希洛夫还在斯大林死后重新露面，并且在1953年当上了苏联的国家元首……


伏罗希洛夫

一般说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具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惩罚、严厉的工作作风。不过，对于伏罗希洛夫来说，这个决定看来还是公正的。

要是别人,那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前线失利,报告作得不好,不仅会立即被撤职,而且会遭到逮捕以及最悲惨的后果。这里举两三个例子。

1943年2月22日,按照大本营的命令,西方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开始进攻:从苏希尼奇西南地区自北向布良斯克发动突击。但是敌人的防御很坚固,进攻受挫。在接到总参谋部2月27日的例行报告后,斯大林确信,该集团军实际上在原地踏步不动。斯大林未与任何人商量,也未进一步查明,便口授了大本营的第0045号命令,命令中说:



科涅夫(1897-1973)

苏联元帅、军事家

1897年12月28日生于洛杰伊诺村。1916年应征入俄国军队,参加一战。1918年加入俄共(布)。苏联红军第5号人物,柏林战役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7枚。著有回忆录《1945年》和《方面军司令员笔记》。

> 解除科涅夫上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因其未能完成领导方面军的任务,调其到大本营来分配工作……[7]

有时情况比这还要糟。我们知道,科涅夫后来还有从最好的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机会。许多人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 送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同志
>
> ……立即逮捕执行第44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达希乔夫少将并将其押送莫斯科。马上采取措施,对第44集团军的部队立即进行整顿,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保住费奥多西亚市……[8]

在干部问题上斯大林从不动摇。我已经指出,他的作风是不断调换司令员,对于这种调换,周围的人常常不大理解。他不知为什么认

为,这种"王车易位"能够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对斯大林,自然,谁也不敢顶嘴。同一个科涅夫不久以前被撤职后又重新得到任命,可是又不知为了什么惹得最高统帅不愉快:

> 由于另有任用,解除科涅夫上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
>
> **约·斯大林**
>
> 1943年6月23日[9]

科涅夫在战争中总共连续指挥过六个方面军……有时给人一种印象,对斯大林来说,战场好像棋盘,他喜欢经常挪动棋子。例如,叶廖缅科,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对他非常赏识,尽管常常骂他;他在战时指挥过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一新编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南方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这位后来的元帅换过10个方面军,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但是斯大林喜欢叶廖缅科有信心。最高统帅记得,在1941年8月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通过"博多机"召见他的情况。

斯大林:斯大林在电报机旁。您好!是否应该解散中部方面军,把第3集团军同第21集团军合并在一起,合并后的第21集团军归您指挥?我所以征求您的意见,是因为叶弗列莫夫的工作不能使莫斯科满意……如果您能保证打垮古德里安这个坏蛋,那么我们可以再给您派几个空军团队和几个火箭弹连队。请您回答。


叶廖缅科将军(右三)正在战场视察

叶廖缅科:您好!我回答。关于解散中部方面军,我的意见是:由于我想打垮并且一定要打垮古德里安,需要牢固地保证南线……因

> 此我请求把同第3集团军合并后的第21集团军交我指挥……至于古德里安这个坏蛋，我绝对保证努力把他打垮……[10]

虽然叶廖缅科"绝对"没有打垮古德里安，但是这位军事首长的信心却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大林习惯于夜间工作，大本营里的工作秩序也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安排的。他开始工作不早于午间12时。但是研究问题几乎要到次日早晨4、5点（中间有休息——斯大林通常在白天稍睡一会儿）。总参谋部、人民委员会、党中央、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不得不去适应最高统帅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一昼夜要向最高统帅报告两次各条战线的情况。总参谋长或他的一个副手，站在铺在桌子上的标有日内战况及其动向的地图旁边（有人曾建议把地图挂在墙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报告各条战线的情况。报告一般很简短。这时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在室内踱步，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参谋部在何处发现新的德国师团？"

"是否按照我上次的指示给霍津另外提供了'道格拉斯'飞机以便运粮？"

"我曾指示，用炮火摧毁渡桥地区的扎维多沃河上的冰块。检查过没有？"

"还在昨天我就命令科涅夫在自己的战线上发动突击（当时科涅夫在指挥加里宁方面军。——本书作者注），以便吸引住战线其他地段的敌军。执行情况如何？您知道不知道？"

报告人处于难堪的境地。他的任务本来是报告各条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幸好，他知道何处发现了新的德国兵团，知道暂时只能抽调18架"道格拉斯"飞机；关于扎维多沃河上的情况，这是个琐碎的具体问题，他一点也没有听说过。至于给科涅夫的命令，是的，这是斯大林1941年11月27日在罗加乔沃陷落后亲自给科涅夫下令要他对德军发动突击的。但是下令后只有几个小时，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执行命令吗?！报告人知道，突击还没有发动，正在准备，他只好说：

"请允许我弄清楚好吗？斯大林同志？"

"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眼色迅速发生变化，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正像朱可夫回忆的那样，这时"眼神变得严厉、阴沉。我知道，只有很少胆大的人能够经受住斯大林的愤怒并挡回这种打击"[11]。他的眼珠开始发黄，谁也不知道，报告该如何结束。斯大林认为，向他作报告的人应当准备好回答任何问题。对他自己，他认为某些问题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允许他的下属这样无知。

斯大林缺乏军事知识，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曾企图用自己的知识来"修补"最高统帅的许多半通不通的指示。他周围的军事首长认为政治家在军事上不内行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我上面说过的原因，他们都不能直说。然而，同朱可夫多次见过面的苏联军事史学家巴甫连科证实，著名的元帅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曾说斯大林"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文职人员"。

斯大林同意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制定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方法。起初他只是审查总参谋部的建议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来根据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这时沙波什尼科夫已经离开总参谋部，当了伏罗希洛夫最高军事学院的院长，但他常被邀请到斯大林这里来参加会议)，在总参谋部提出关于某一战役的意图的报告之后，对于总参谋部的这些建议，都同后方主管首长、各兵种司令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部长、红军和海军的总政治部一起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收到所有关于保证一次战役的考虑、设想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听一听参加战斗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口头或书面，视情况而定)，只有在这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方案，决定实现它的方法。最高统帅起初对于是否必须做这样庞大而繁重的工作感到没有把握，他说这是"费时而陈旧的工作方法"。沙波什尼科夫(他所起的作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和斯大林本人的导师的作用，在我看来，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绝对必须做的工作。当然，他补充说，一些战役可能需要准备几天，而另一些需要准备几个月。斯大林凭着他天生的实际的智慧懂得，沙波什尼科夫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如果说不是束手无策，也是完全缺乏准备。但是斯大林很快制定了适合于自己的拟定战役计划的行动方针，这个方针既能保持主帅的崇高声望，又能在实际上不冒丧失自己威信的风险。对大本营档案材料进行的仔细分析证明，斯大林通常从两个角度来说明自己的主

张。一是最一般的表态，例如像他在1942年1月大本营会议上做的那样："必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个主张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它反映了苏联广大群众的情绪，但不包含具体的战略意图。它没有考虑我们"毫不喘息地追赶"敌人的可能性、敌人抵抗这种意图的能力，没有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意图，但不是一个统帅的意图。

另一个角度同校正、弄准确具体计划、意图和期限有关。但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带有归纳、概括、总结的性质，所以能够产生特别的印象。虽然整个计划——计划的内容、实现的序列、协同动作问题、物质技术保障问题、任务的深度——都经过总参谋部的全面加工，但是画面的最后"润色"则属于斯大林，这样他就往往被认为是整个计划的设计人。

至于1942年1月斯大林在大本营会议上所作的"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一具体指示，它的产物就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信"。这个文件既未从军事方面、也未从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应有的研究。其中只谈了一些关于必须使用突击群作战(德国人在战争初期就用过这种方法)和关于实施炮兵进攻的想法。向军事顾问所作的说明是，必须从"所谓的炮火准备"的实践转入炮兵进攻的实践。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关于"炮兵进攻"的指示引起了不同的解释并在军队中造成了混乱。某些指挥员对"所谓的炮火准备"的说法迷惑不解。难道它被根本取消了吗？但是没有准备怎样能够进攻？什么是"炮兵进攻"？从各个战线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谁也不敢向斯大林报告，只是通过正常的工作方式作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反映在1942年底制定的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中(步兵战斗条令第42条)：炮火准备仍然需要，冲击的炮火支援仍然需要，正像用炮火保障步兵和坦克在纵深的战斗一样。换句话说，还在战前就已经为大家熟习的炮兵作战的三个阶段仍然需要。但斯大林只是在1942年初才"领会了"这一点，并把它在炮兵进攻的思想中表达出来。

当这封"指示信"润色完毕在华西列夫斯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其他几个人参加下进行讨论时，斯大林把文件拿在手里突然说：

"可是信中还缺乏主要的东西……"

大家悄悄地、有点莫明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等待明示。得到的新

的指示是：

“我建议在信中再反映一个大概是最主要的思想。”

大家都准备好作记录。斯大林沉默良久，聚精会神，对自己的指示斟酌再三，在室内走了几趟，最后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加进了“指示信”中：

> 我们的任务在于，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一鼓作气地把敌人赶回西方，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之前就把自己的后备力量消耗殆尽，那时我们将投入新的巨大后备力量，德国人再没有更多的后备力量进行增援，这样就能保证在1942年彻底击溃希特勒军队[12]。

当然，斯大林的补充对所有出席的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成员好像感觉到，斯大林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对形势的预见能力高于其他的常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思想，衷心同意它的精神，毫不考虑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但是斯大林这一次，也和在此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次一样，表现了很差的预见能力。斯大林的预测和提出的任务完全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1942年4月我们的冬季进攻结束，德军在夏季攻势中进军到伏尔加河，这就表明上述预测是错误的，它不过是空想而已。但是后来谁也没有提起过最高统帅的失误。这是战前就已经形成的做法：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只有成功、成绩。挫折、失败、失误则是没有执行“领袖”意志的结果，就是说，没有执行他的意志。这一套思维模式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

斯大林对大本营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校正、修改常常不起决定作用，但是有时却对战役进程产生了可悲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喜欢改变日期，一定要缩短作战准备、军队的机动和集中的时间。有时哪怕是一天，也要把作战开始的时间提前。

1941年9月4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按照他的指示，他将在9月8日发动突击以支援叶廖缅科。但是斯大林一定要按自己的意见办：

“7日比8日更好……就这样。”[13]

他非常固执，已到了顽固的程度，通常谁也不敢反驳他。人们怕

他。甚至善于维护自己观点的朱可夫,虽然未必赞同斯大林的想法,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在9月4日斯大林同朱可夫进行的那次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 **斯大林**:我想,你打算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进行的战役,应当只是在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之后进行。如果对斯摩棱斯克暂缓采取行动,先同叶廖缅科一起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然后抓住古德里安不放,那就更好……主要是打垮古德里安,斯摩棱斯克是跑不掉的。就这样。
>
> **朱可夫**:……如果您下令在罗斯拉夫尔方向作战,那么这件事我可以办。但是如果我先夺取叶利尼亚,那会更有利一些……[14]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大本营不仅同每个方面军,而且同每个集团军进行直接联系。最高统帅有时还通过直通电话或电报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很难抓住他要同谁进行谈话的规律。但毕竟可以发现,最经常的是斯大林要求同方面军司令员或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每当他发现大本营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或者感觉到他的谈话对人们"能起鼓舞作用"的时候,他就要进行这种谈话;他是要向司令员们暗示,最高统帅在注视他们,在担心他们,在要求他们……斯大林的指示在作战方面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很可疑的。也许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斯大林已能够提出作战性质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大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弱点,所以他同前线指挥人员进行谈话时常常带着参谋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通常委托他们进行作战方面的谈话,他自己只作"一般性的指示",提出批评意见或进行申斥,有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同时最高统帅也喜欢"显示"自己对形势了如指掌,有时独自提出一些作战方面的指示,然后再用一些专门的指示加以充实,尽管十分明显的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的建议、指示无疑更加具有专业水平和更加有益。例如,1942年6月13日,铁木辛哥向斯大林报告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由于缺乏白天作战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渡河设施。斯大林根据大本营掌握的材料是了解那里的形势的,可是他却反驳说:"我们的'伊尔-2'型强击机被认为是白天作战用的最

好的轰炸机，它们比‘容克’飞机性能好，更适于轰炸敌人的坦克、有生力量，当然也更适于轰炸敌人的渡河设施。我们的强击机能带400公斤炸弹。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你们那里有强击机，也许，你们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既然斯大林对他们那里有无白天作战用的轰炸机知道得更清楚，铁木辛哥也就不再反驳了。问题在于，斯大林到电话室来时已经查阅了关于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兵力的材料，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材料中的数字是6月1日的，而两周来的战斗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铁木辛哥，我再说一遍，没有进行反驳，只是报告说："完全明白了，我们将根据您的指示加以研究并作出决定，然后再向您报告。"



伊尔-2型强击机


伊尔-2型强击机设计者伊柳辛

铁木辛哥未必敢和斯大林顶嘴；他没有忘记另一位元帅库利克的命运，这位元帅企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斯大林的指示而被迅速降为少将，失去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在战争时期大本营向各部队发出了数千件指令、命令、指示。当然，斯大林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指示性文件进行仔细研究，但最重要的文件他都审查过，校改过，有时还退回去加工，亲笔补写一些句子或段落。

有时斯大林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亲自向各司令员和司令部口授电报。其中往往是好为人师的和教训性的内容居多（有时还带有威胁），具有作战价值的具体指示则比较少。例如，1942年5月底，斯大林被铁木辛哥关于加强他那个方面军的请求所激怒，便口授了如下一

封电报：

送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巴格拉米扬

最近四天来，大本营接连收到你们关于加强装备、从大本营的预备队中抽调新的师团和坦克兵增援你们的请求。

你们应该考虑到，大本营没有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新的师团，这些师团都是新组建的，还没有经过训练，现在把它们调上前线，意味着让敌人轻易取得胜利。

你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装备资源是有限的，要知道，除了你们方面军，我们还有其他方面军。

难道现在不是你们学会像德国人那样以少量的血的代价进行战斗的时候吗？作战应该不是依靠数量，而是依靠本领……如果你们想学会战胜敌人，而不是让敌人轻易取得胜利，那就要考虑所有这些。否则，你们从最高统帅部得到的装备也会转入敌人手中，像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

斯大林

1942年5月27日21时50分[45]

"你们应该考虑到"——这是喜欢教训所有人的斯大林的口头禅。而"学会以少量的血的代价进行战斗"的论断，在他嘴里简直像是侮辱人。在斯大林的电报中还常常使用另一种很动听的说法——"不惜牺牲"。

为了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大本营操心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以及最高统帅的工作范围，我现在只是列举一些1942年的指示，按它们在档案文件中的叫法介绍如下：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3月8日关于任命弗拉索夫中将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任命沃罗比约夫少将为第52集团军副司令员的第170136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4月9日给西方方向总司令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师团换防休整办法的第170228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4月22日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西方方向总司令关于任命和调动第4集团军、第54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第170300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5月8日给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全线构筑防线的第170366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7月31日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建立阻击队的第170542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9日给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市的第170562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13日关于任命戈尔多夫中将为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手、任命赫鲁晓夫为叶廖缅科上将所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第170566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15日给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从附近抽调第62集团军的第181、147和229步兵师的第170569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17日给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司令员、第61集团军司令员和第16集团军司令员关于从附近抽调第61集团军的第387、350步兵师和346步兵师的一部分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23日给贝利亚、秋列涅夫、恰尔克维安、博丁关于批准南高加索方面军加强各山隘防御的措施的第170580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23日给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关于组建西伯利亚斯大林志愿步兵军的第934169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24日给贝利亚关于同意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组织三个检查退却部队的阻截营的第170583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8月26日关于任命朱可夫大将为工农红军和海军副最高统帅的第170589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3日给朱可夫大将关于立即采取措施援助斯大林格勒的第170599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4日给朱可夫、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加强突击以确保斯大林格勒不致陷落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8日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批准解除洛帕廷第62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的第170603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11日给夏登科、赫鲁廖夫、雅柯夫列夫关于从各个方面军抽调兵力为坦克军的9个摩托化步兵旅补充配套的第994201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12日给朱可夫、马林科夫关于每天两次向大本营提供战报的第170609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12日给戈沃罗夫、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关于暂时停止列宁格勒方面军部队强渡涅瓦河的战斗的第170610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9月25日关于组建爱沙尼亚第8步兵军的第994205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10月9日给各战线司令员和第7独立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在作战部队中为指挥人员设置传令兵的第934235号指示。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2年10月14日给人民委员贝利亚关于确定纵深25公里为前线接近地带并从这些地带迁走一切居民的第170662号指示。

我想，这已经使读者厌倦了。但是，如果不知道斯大林一天有14至16个小时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并且不得不每天考虑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有关作战、干部、技术、侦察、军事、经济、外交、政治方面的问题，那就不能了解斯大林的活动。斯大林签署的成千上万份文件，牵动了大批人员。他习惯于操纵人们的命运，常常不考虑自己的决定的后果。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些决定，它们还能更充分地说明他的冷酷无情的性格。斯大林看到的具体的人都在他的身边，他只有看了前线拍摄的或缴获的新闻影片，才能对大批退却的战士、在渡口淹死的人、瓦砾堆上妇女和儿童的哭声、堆集如山的没有掩埋的尸体、守在死去的孩子旁边的母亲的神经失常的眼神等等有一个印象。斯大林对战争造成的无

数悲惨景象无动于衷。为了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苏联人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人的生命对他早已成为枯燥的、公式化的统计数字……请读一读斯大林亲自拟定和口授的大本营的两道可怕的命令。其中一道是1941年11月17日下达的第0428号命令。

>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
> 1.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40至60公里、道路两侧20—30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
>
> 2.每个团都要建立由20—30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16]

纵火者干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冬天的漆黑的天空。农民的阴暗的



为阻碍德军进攻,苏军在国境内放火,采取"焦土作战"

茅舍在熊熊燃烧。母亲惊恐万状地紧紧搂抱着号啕大哭的孩子。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德国人焚烧村庄是为了惩罚游击队。可是现在自己人也在烧……并列出了奖赏……“志愿者小分队”的名单……而焚烧村庄和房屋的地方并没有德国人……要在有占领者的地方纵火并不是简单的事。血红的火光中发生着一场悲剧……

战争是无情的。这些行动可能会给占领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对于很多苏联人来说，他们的住所就是最后的可怜的避难所，他们指望在那里熬过动乱的年代，等待自己的人回来，拯救孩子们！谁能说出在这道命令中什么更多些：是作战的合理性还是丧心病狂的残忍性？这个决定具有斯大林的特点。他从来不怜惜人，从来不！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同胞死亡，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现在事后争论斯大林关于在接近前线地带焚烧居民点的决定是徒劳无益的，但是这道命令是令人厌恶的。里亚申科大将对我谈过与实现这道可怕的命令有关的一个插曲。1941年底，里亚申科回忆说：我指挥一个团。我们担任防卫。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两个村庄，我现在记得叫班诺夫斯科耶和普里希布。师里下来命令：烧毁我们能够烧的一切村庄。当我在地下掩蔽部中进一步研究如何执行这道命令的细节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通信兵，不顾一切上下级关系，突然插话说：

“少校同志，这是我的村庄……那里有妻子、孩子、妹妹和她的孩子……怎么要烧毁?！要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被烧死的！”

“你怎么乱插起嘴来？我们会安排好的。”

打发走这个军士以后，我们同营长们开始考虑怎么办。记得我说这道命令是“荒谬的”，为这句话我差一点要付出血的代价。须知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是集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救了我，这才没有受到特别处人员的追究。而这两个村庄，我们得到师长扎莫尔采夫的允许，在次日早晨攻占下来……里亚申科最后说：这样，这两个村庄才幸免于火焚之灾。他说这话时好像又暂时回到了那遥远的残酷的时代。

还可以再看一份斯大林口授的文件：

送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

1942年1月11日1时50分，第170007号命令。

……在1月11日，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2日，必须攻占勒热夫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本营建议利用该地区现有的大炮、火箭炮、空军向该城猛烈轰击，即使该城受到严重破坏也在所不惜。

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报告执行情况。

约·斯大林[17]

可惜，在战争爆发前夕，当侦察机关、军人、苏联的友人报告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已准备好要对我国进行疯狂的突然袭击时，斯大林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决心。而现在却要"对勒热夫城进行猛烈轰击"了。当你读到大本营的无数文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阻止敌人、击败敌人、把敌人从祖国赶出去时，你会敏锐地感觉到，灾难的规模本来不至于这样大。而现在，斯大林为了显示自己的意志、无情、决心、统帅的坚定性，便毫不犹豫地准备由自己来烧毁、破坏、消灭由自己同胞亲手建造的一切。不错，客观情况常常使得你非这样做不可，桥梁、火车站、工厂在退却时都需要加以毁掉。但是，俄国农村的农舍未必能够成为占领者的避难所。

我想，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文件需要编成专集出版。其中反映了苏联人前所未见的献身精神、灾难给人带来的痛苦、永不熄灭的希望、成千上万人以至千百万人的悲惨遭遇以及人民对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信念。不论当我们的军队退守伏尔加河还是进军柏林时，普通的苏联人都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斯大林寄来了信件表示支持，他们怀着爱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前方，恳求把自己年幼的儿子送上前线。斯大林在大本营的千万份文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他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救世主是人民自己。文件上用蓝色铅笔留下的字迹只是证明，它的主人在整个战争中义不容辞地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献给同恶势力进行的极其壮烈的斗争，而就是这些恶势力，他曾在战争爆发前夕轻率地企图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他的智慧和意志未必能够构成拿破仑说的"正方形"。他从始至终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无情、残忍、凶狠的意志。他的教条主义的智慧存在着缺陷。常常是，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领袖" 的元帅杖所指出的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大概可以说，并非斯大林，而首先是他周围的军事领导人，最终使大本营成了集体的战略领导机关。

战争的"各章"

斯大林的防御战略

以积极的战略防御粉碎了希特勒的"闪击战"企图。希特勒为实现消灭苏联的目的，以战略空袭和战略进攻相配合，突然"闪击"苏联，实施猛烈的高速进攻，使苏联战争初期失利。德军逐渐增加兵力到620万，曾经四次突破苏联的四道战略防线，兵临莫斯科城下，突进斯大林格勒。斯大林领导苏联党政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略防御。在战略防御过程中，以组织战略防线抗击和实施三十余次方面军进攻战役相结合的作战方法，在防空战役、空中战役和游击战的配合下，消灭、消耗德军的战略力量，经过515天的连续作战，终于在1942年11月制止了敌人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战争的磨盘改变着人类的命运。漫长的四年，战争要求不断作出牺牲。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登上了最高的指挥岗位，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看得更远些，考虑得更深些。起初，他把战争的舞台想象成这样：两支军队在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域上"对阵"。他不善于抓住局势的各个主要环节，无法理解例如为什么巴甫洛夫统率下的西部战线会迅速瓦解。只是到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当有人把一些缴获的文件呈报给他的时候，他才看到，德国军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了多么巨大的兵力。而同时，苏联军队的战役布势却是平均铺开的。

斯大林是逐渐获得战略"眼光"的。例如，他从战争中领会的第一个教训还是在1941—7月获得的。当德寇占领了明斯克并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推进的时候，斯大林一度感觉到，大本营手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前线的"背后"显得一片空虚。接连不断地从我国腹地调集一些兵团来堵塞呈内弯弓形的、经常被突破的前方"隔段"上的漏洞，使敌人有可能将它们各个击破。从7月间那些可怕的日子起，斯大林领悟到为了可靠地持久地进行防御(以及为了有进攻的突击力量)，必须经常有预备队、预备队、预备队，如果没有预备队，甚至双梯队的布势也不能保证战线的弹性和不被敌人击破。

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在1941年和1942

年，斯大林都只是在应付敌人的挑战、威胁和突击。只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才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条件。到1941年底，最高统帅已经懂得，就像一本书是由统一的情节所联系起来的各个篇章所组成的一样，一场战争也包括许多具体的战役。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战后回忆道，在胜利前不久，斯大林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研究有关最后两次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当前形势以后，突然问这位大将说：

"看来这将是我们在西方的最后两次进攻战役了……现在我在想，这场战争一共有多少次战役呢？"

安东诺夫回答说："我很难一下子说出来，但是我想，大的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在内，我们已经进行了40次以上……"

安东诺夫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在1941至1945年这几年中，各条战线的武装力量在大本营的指挥下进行了将近50次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如果说战争的前10至15"章"，是由最高统帅、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口授下"写"的话，那么其余35至40次，则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的。这部关于战争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苏维埃人、士兵、指挥员、政工人员。而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编年史本身，则是由各方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本身创作的。在战争初期有五条战线。但是后来战略形势迫使大本营把战线划小（例如，在1943年7月已经有12条战线）；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是在8条战线上结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斯大林已经不加掩饰地表示确信，他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学、战术的"奥秘"。如果说他在战略方面确实是大有长进的话，那么在战役学和战术方面，他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一个涉猎者。在给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不会打仗。

"我认为，对于一个方面军的指挥部来说，由于自己玩忽职守和指挥不力而让我们的四个步兵团被敌军部队包围，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多，是应该学会正确指挥部队的时候了。"[10]

"是应该学会的时候了"——能够说这话的人无疑自己早已学会了。斯大林并不怀疑他已经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艺术，就像他已经掌握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一样。而他并不是向虚构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而是向完全具体的人物发指示。我们知道，斯大林很喜欢保

密。他在搞隐蔽战略和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1943年5月15日起，用亚历山德罗夫这个化名的是华西列夫斯基，而费多罗夫就是托尔布欣。我向读者介绍一下某些统帅在作战时的化名。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预先规定的，当然它是严格保密的。

伊·赫·巴格拉米扬——化名为赫利斯托福罗夫

谢·米·布琼尼——谢苗诺夫

尼·亚·布尔加宁——尼科林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

尼·费·瓦图京——费多罗夫、尼古拉耶夫

尼·尼·沃罗诺夫——尼古拉耶夫

克·叶·伏罗希洛夫——叶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诺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诺夫、斯捷平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顿措夫

约·维·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

读了这样"译成代号的"署名，往往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斯大林坚持要这样译成代号。诚然，即使没有真实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谁发出这类急电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许多这类电报中的一封：

>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
> 现把米哈伊洛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转告您。请告知您的意见。从米哈伊洛夫的电报中看不出第57集团军在消灭被包围的敌人的总进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谈话后才弄清楚，第57集团军将从拉基季诺、克拉夫佐沃和齐边科地区朝着戈尔纳亚波利亚纳国营农场和巴尔卡佩斯纳亚的共同方向行动……
>
>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9]

如果敌人能够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的话，典型的俄罗斯姓名未必会使他们陷入迷雾……

当时的情况是，大本营不仅把确定这条或那条战线的总任务和局部任务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规划各个战役的工作都"包揽"

到自己身上。已经成立的各方向部队——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队——的总指挥部,立刻就被置于无权地位。大本营在各总指挥部成立以后继续超越各总指挥部去领导各个方面军, 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最高统帅的各项指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斯大林需要各个总指挥部,不是为便于指挥军队,而是为了有现成的"替罪羊",为了随时都能找到狠狠批评的对象。没有大本营的同意,各个总指挥部实质上不能指挥驻在本地区的预备队、航空部队,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决定。在同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商谈时,斯大林不仅不考虑各个总指挥部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往往顺便加以批驳。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将军打直通电话时,斯大林命令道:

> 必须立即开始把第47集团军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组织好后卫, 并用空军掩护……凡是与上述命令相抵触的总指挥部命令,您都可以认为是不宜执行的……[20]

各个总指挥部及其为数不多的机关,经常不是被用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而是被用来执行大本营的指令。直到最后,斯大林始终没有确定他对各个总指挥部的原则方针。各个总指挥部成立后过了几个月便被解散了。诚然,过了一些时候有两个总指挥部又重新恢复了,但也只是存在到1942年夏天。斯大林只把这种指挥各条战线的作战环节看作是中间环节。在实行他始终坚持的这种硬性集中制的情况下,这些进行战略指挥的地区性机关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

我已经说过,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战役是防御性的。而斯大林、大本营是怎样准备并进行这些战役的呢? 我马上就要指出,1941年的大多数战略性防御战役(6至7月的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同月白俄罗斯战役,夏天乌克兰西部战役, 秋天扎波利亚里耶和卡累利阿战役,7至8月基辅战役,7至9月斯摩棱斯克战役及其他几次战役) 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我们进行这些战役是为敌人所迫,是敌人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战役的条件的,苏联军队的行动经常具有自发的性质。

在战前的年月里,组织和实施长期战略防御的问题,无论在训练和演习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适当的解决。如果战前有谁提出要研究在第聂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近郊组织

防御的可能性，也许立即就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叛变、背叛行为。甚至抽象地、原则地研究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组织战略防御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错误行动在不小程度上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提供了“保证”。

大本营和各条战线的指挥部在发出进行战略防御的指示和命令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敌人前进和削弱敌人的力量，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后来，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传家们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把进行这种灾难性退却的隐蔽意图看作是要用积极防御去“拖垮敌人”。苏联军队采取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战略防御大概只有一次——1943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欢防御，性情急躁，对防御的实质没有深刻的理解。在解决防御任务时，他力图不仅用战役手段，而且用纯粹的行政惩罚办法（类似已经提到的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和1942年7月28日第227号命令），发出一系列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在各条战线后方最危险的方向上加紧阻截的补充命令。

最高统帅并不具有组织战略防御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军队首长当时也不具有这种经验。同时必须考虑到，红军的大多数干部在1941年已经阵亡、被俘或者受伤。尽管1942年夏秋战局的形势可能更加有利（莫斯科会战给军队提供了道义上的“兴奋剂”，敌人已经不是全线进攻，而只是在西南方向发动攻势，并且他们的突击在相当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原来的“锐气”），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还不能够深刻理解防御战的特点。他很清楚，1942年夏天几次防御战役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1941年那样了。当时我国军队后撤的纵深已达850至1200公里。

斯大林认为，甚至比较重大的退却也已经不太可能了。国防人民委员在就1942年2月23日这个节日发出的命令中断言：“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衡现象也就消灭了……只要德国人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②]但是，斯大林没有考虑到，敌人的军队集结在战线的比较狭窄的地段上，集结在最高统帅没有料想到的地方，这就会重新使红军处于危急的境地，虽然不会像上一年那样危险。但是，即使是现在，敌人在战线的某些地方取得突破以后，也向前推进了500至600公里（大约比1941年少一半）。次年，德国人总共前进了二三十公里……但是，1942年夏天，我们并没有能够及时地制止和顶住德国军队的进攻势头，因

为斯大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始终坚持要同时进行哪怕是局部性的进攻战役。只是由于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才得以把敌人阻止在伏尔加河边。1942年下半年,大本营只好把100多个步兵兵团和坦克兵团、大约15个坦克军调往西南方向。这就是又没有准确而及时地确定敌人可能在哪个方向采取主要行动的后果。

1941年,斯大林断定德国军队将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他失算了。需要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到我们开始冬季攻势时,苏联有一半以上的师已位于西部方向。斯大林以及整个大本营都认为,西部方向在1942年将是主要的,虽然他认为在西部方向进行强大突击也是可能的。但是,1942年夏季战局中,敌人却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可以说,在战争第一阶段,大本营未能正确地确定1941年和1942年夏天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斯大林在这两次得出的最后结论,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都是错误的。

在大本营讨论1942年的计划后,斯大林坚决主张,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发出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指示他们采取进攻行动。信中指出:“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22]结果不得不进行完全没有准备的防御战。须知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是“保证在1942年全歼希特勒军队”。我再说一遍,从苏维埃人的共同愿望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不现实。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进行防御战役期间同各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司令员进行商谈时并不像在军队进攻时那样感到有信心。他经常委托沙波什尼科夫或华西列夫斯基,而后来是安东诺夫去进行商谈,最后他才插手,而谈的多半是同一个“主题”,即大本营是不是同意从预备队中抽调部队;通常他都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还指责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弄坏事情”。诚然,斯大林还喜欢提醒人们注意提高警惕……他就这个问题发过数以十计的指示。没有办法:这是性格的表现。现在我援引他给各防卫部队的一些指示中的几个片断。

在1942年6月22日谈话结束时,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说:“前线接近地带必须疏散,也是为了在这个地带不留下一个密探、一个可疑的人物,为了军队的后方能百分之百地干净……”[23]

同年7月22日在同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进行商谈时,斯大林对情报表示不满:“你们的情报资料不太可靠。我们截听了安东

内斯库上校的通讯。我们认为，安东内斯库的电报价值不大。你们的空中侦察资料也没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的飞行员认不出地面部队的战斗队形，他们把每一辆大篷车当成坦克，而且他们不能确定，是谁的军队在某个方向上前进。空军侦察员不止一次地骗我们，给我们提供不真实的情报。因此，我们对空军侦察员的情报持批判态度，抱有很大的保留。惟一可靠的侦察队是陆军侦察队，但是，你们恰好没有陆军侦察队，或者你们有却很差劲……"[24]不过，朱可夫在他的一篇报告中说，有个德国士兵投到我们方面来，他向陆军侦察队供称，说晚上德军第267步兵师接替了第23步兵师的防务，说他看见了党卫军部队时，斯大林又警告说："你们不能太相信战俘……"[25]他宁愿不相信几乎所有的人：战俘、侦察兵的报告、无线电截听、司令员的看法……

最高统帅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心里没有底(他善于掩饰)，越来越积极地采取最激进的办法。其中一项同必须给阵地构筑工程有关。在莫斯科方向和列宁格勒方向各有3至5个防御地区进行了构筑，搞了一些大规模的工程。斯大林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建立10个工兵集团军，它们看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1942年逐渐都被解散了。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开始头一年半到两年间，斯大林曾经探索过巩固各条战线防御的各种途径。

有时斯大林沉浸在一种老也抛不开的、往往是值得怀疑的想法中，于是他就设法实现它。我已经提到，斯大林相信轻骑兵师的巨大作用——布琼尼曾要人们相信，这些轻骑兵师能使德国军队的后方陷于瘫痪。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谨慎地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们对快速灵活的骑兵兵团的作用估计不足。我认为，它们的奇袭能够瓦解德国人指挥、通信、供给、后方……你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一点呢！"

"但是，为了掩护它们免遭敌人空军的袭击，就需要有补充力量。没有空军掩护，它们是没有防卫能力的。而且骑兵师装备笨重。"沙波什尼科夫仿佛暗自考虑。

但是，反抗是无力的。每师3000人的几个轻骑兵师开始迅速组建起来。到1942年1月1日，共计建立了94个师。曾经尝试广泛利用骑兵去袭击敌人军队的后方。其中有些尝试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但是，在德军

指挥部利用空军来对付骑兵以后，各个骑兵师由于没有可靠的防空手段和足够的突击实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1942年底，骑兵师的数量开始缩减，虽然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6个骑兵兵团在继续作战。斯大林不再坚持大规模利用骑兵，而责成思维方法过时的"红色骑士"——布琼尼去研究骑兵问题。1943年1月25日大本营第57号命令任命布琼尼为红军骑兵司令员。戈罗多维科夫上将成为他的副手。诚然，1944年5月，斯大林再次记起了骑兵：

致各方面军司令员

抄送：亚历山德罗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布琼尼同志

1943至1944年红军多次进攻战役的经验表明，凡是集中使用骑兵兵团，并用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给予增援、用空军给予支援的地方，凡是在敌人暴露的翼侧利用骑兵兵团去突击敌人后方或者追击敌人的地方……骑兵兵团总是取得良好的战斗效果。

第1、2、3、4乌克兰方面军利用第1和第6骑兵近卫军，利用第4和第6哥萨克近卫军……可以作为正确使用骑兵兵团的榜样。

第1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原西方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让第3、第6、第2、第7骑兵近卫军重新隶属于集团军，把它们用于狭隘的战术目标……可以作为不正确地使用骑兵兵团的例子。

我命令：取消各骑兵军对集团军司令员的隶属关系，今后要利用各骑兵军作为方面军指挥部扩大战果和突击敌人后方的手段……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4年5月1日24时[⑱]

斯大林期望骑兵具有进攻的实力，但是他不了解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是多么微小。产生红色骑手传说的壮烈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场战争中，骑兵只能完成次要的、辅助性的任务。像平时一样，斯大

林没有记起他本人提出的不成功的想法。唉,“快速如飞的骑兵师”并没有像最高统帅所企望的那样,使德军后方陷于瘫痪。

斯大林感到自己对进攻战役要有把握得多。他始终是没有耐性的。在计划1942年夏季的战斗行动时,斯大林不顾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告诫,倾向于在一切方向上都采取积极行动,但是并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本来,莫斯科会战就应该使最高统帅认识到,把力量集中用在某一方向是多么重要。但是,刚刚看到一点最初的战略成就,斯大林就认为,现在红军有能力在所有方向上进行同样的战斗行动。据朱可夫回忆说,斯大林不止一次断言,莫斯科会战以后,“德国军队将抵挡不住红军的突击了,只要巧妙地突破他们的防线就行了。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尽快地在各条战线上,从拉多加湖到黑海,开始发动总攻”。朱可夫叙述了最高统帅的看法:

“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作好过冬的准备,现在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

元帅回忆说,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想法:

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军这个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把他们往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以前就耗尽自己的预备队……”

他特别强调“在春天到来以前”这几个字,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解释说:

“那时我们将有新的预备队,而德国人再也没有预备队了……”[27]

政治局和大本营的成员们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虽然在进行审慎讨论的过程中,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设想的现实性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作了几次口气严厉的反驳,使得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当斯大林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的时候,是很难使他改变看法的。甚至合情合理的论据对他也不起作用。当时决定由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实施突击。今天我们知道,苏联军队在1942年夏秋战局中的几次进攻战役没有取得成功。当西北方面军无法击溃敌人的杰米扬斯克集团时,大本营感到失望了。苏军有20多个师,兵力上有明显的优势,在整个5月份试图粉碎德国军队的抵抗都未能成功。有几封斯大林给方面

军指挥部的用辞严厉的电报现在还保存着。无济于事……当时德军就是比我们打得好。第11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始终无法用反突击切断一条不大的所谓“拉穆舍沃走廊”。军队作战方式刻板，缺乏点子。斯大林的老一套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成立“集中的突击部队”，又具有极其一般的性质，对方面军不可能有所帮助。在这同时，弗拉索夫中将指挥的、处于被半包围状态的第2突击集团军牺牲惨重。斯大林责备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霍津“没有创见和不负责任”。这意味着什么后果是明显的。恰好在这时，在同斯大林谈话时，日丹诺夫报告了方面军副司令员扎波罗热茨和梅利尼科夫提供的“霍津行为不端”的信息。斯大林对着电话筒不客气地说：

“查明情况，向我报告……”

日丹诺夫要求霍津就政工人员们向他提出的指责作出解释。1942年6月3日，霍津给日丹诺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扎波罗热茨指出我生活腐化。是的，几个女报务员到过我的住宅两三次，看电影……有人指责我大量喝伏特加。我不能说我不喝酒。午饭和晚饭时，我有时喝两杯，有时喝三杯……”[28]过了两天，日丹诺夫打了电话。在作了例行的报告以后，最后他补充说：

“最好把霍津免职……他这个人办不好事。”

6月9日大本营发布命令，解除霍津中将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职务。诚然，很快斯大林又任命他为集团军司令员，不久以后，又授予他上将称号并任命他为特种部队司令员。随后，霍津又担任第33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司令员，稍后，又任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有时很难理解没完没了地调动一些将领的职务的含义。但是，斯大林紧盯着这些人的调动。有失误他是不宽恕的。1943年12月8日，同一个霍津又在大本营的命令中被点名：

霍津上将由于不尽职和对工作采取不严肃的态度，免去他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的职务，由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长另行安排工作。

约·斯大林

朱可夫[29]



马利诺夫斯基
(1898–1967)
苏联元帅

1898年11月23日生于敖德萨。1914年入伍，参加过一战。1919年参加红军。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在东方面军对白卫军作战。1920年初级军官学校毕业，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曾任骑兵团参谋长。苏德战争期间，曾任步兵军长、集团军司令，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乌克兰战役、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等重大作战行动，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1945年起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战后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57年–1967年任国防部长，为加强苏联武装力量作出贡献。获列宁勋章5枚。著作有《警惕地保卫和平》、《胜利的伟大意义》和《俄国士兵》。

有一次，已经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当胜利之风越来越鼓起斯大林声誉的船帆时，斯大林在听完了新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汇报后，突然“讲起了心里话”。

斯大林的“心里话”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困惑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最高统帅也想好好“试探一下”安东诺夫。当安东诺夫问是否可以走了的时候，斯大林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他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安东诺夫同志！您一直没有思考过吗，为什么我们在1942年的许多进攻战役都未能成功？试看，两个方面军的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打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的战役，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部队的冬季攻势。顺便说一句，须知您原来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呀？”

“是的，斯大林同志……”

“在克里木有两个集团军，可是失败了，后来是哈尔科夫……对于这些失败您将作何解释呢？只是您现在不要对我说：力量对比悬殊，设施分散，空军和坦克使用不当……”

在战前讲授过一般战术学的安东诺夫没有慌张，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失败原因的看法：

“去年，而且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老一套，缺乏点子。我们没有学会一下子在几个地段突破敌军防线，我们利用坦克兵团去扩大战果很差……”

“您一开头讲得很对，后来却讲起了细枝末节……主要问题在于，”最高统帅看了安东诺夫一眼，“我们学会防御以后，不大会进攻，现在也好不了多少。简而言之，我们还不太会

打仗……”

斯大林又看了安东诺夫一眼，意外地露出微笑，这在他说来是极其罕见的，然后轻声地说：

“走吧……”

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斯大林增强了信心，认为歼灭法西斯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942年12月底，在听取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汇报时，斯大林在谈话的最后加重语气说：“必须使战士们作好精神准备去迎接一项具体任务：1943年应该成为法西斯恶棍们的末日！您要给各政治机关发出指示，要他们做好鼓舞士气的工作。我们将大力地广泛地发动进攻。是的，就是进攻！没有进攻，单靠防御不能歼灭法西斯分子。”[③]斯大林知道，除了战士和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缺乏的进攻本领以外，必须有高昂的士气，人们必须有能力和决心表现出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当时人们往往缺乏这种意志以及进攻的本领。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指示，在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师的政治部，给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办了学习班，学习保持高昂的进攻激情的方式和方法。在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着梅赫利斯1943年1月9日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第2突击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所作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论进攻战役中的政治工作》。

斯大林的进攻战略

把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决定组织3个方面军发动斯大林格勒反攻，并迅速发展成11个方面军的总攻，使苏德战争发生了转折。又经1943年夏季几次大规模的反攻战役，斯大林抓住有利战机，于当年8月，把战略反攻导向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2000千米的正面上向德军实施了总攻。经过一系列的战略性战役，到1944年底，把德军驱逐出国境。

梅赫利斯虽然由于克里木惨败而被斯大林降职降级，但是每一段话一开头都使用了歌颂最高统帅的词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1942年初人们都这么说。——**本书作者注**），1943年应该成为全歼德国侵略者的一年。用防御我

们不可能赢得战争。正如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的《步兵战斗条令》所说，进攻对于苏联军队来说是基本的战斗类型。”

接着，梅赫利斯企图为增强士气的政治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在战场上，肉体表现为动物的本能——保存自己，害怕死亡。精神表现为祖国捍卫者的爱国感情。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发生一种下意识的、有时也是有意识的斗争。如果肉体对精神占了上风，那么我们面前就会出一个胆小鬼。反之，结果则相反”。当然，梅赫利斯特别注意到必须宣传相信斯大林的英明领导。“领导国家、领导军队的是伟大的统帅斯大林同志；他的天才，他那争取胜利的意志，他的坚定性，在同时代人中是无与伦比的”。[31]自然，梅赫利斯没有提起他提出的、1942年春天曾在克里木使用过的培养“进攻激情”的“方法”。当时，他禁止挖掘深的掩体，而对畏怯地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员不容反驳地声称：

“挖掩体是一种防御心理。在最近几天我们就要投人进攻。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在最短时间内解放克里木的任务……”

像挤在一个营寨中那样高度密集的师团，“小”得难于察觉的防御阵地，几乎被推到阵地前沿的各集团军司令部和重炮兵，这一切都成了德军实施毁灭性突击的对象。科兹洛夫和梅赫利斯由于只想着进攻，使这个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我无意考察战争的各个具体“篇章”（我将只是比较详细地谈一谈斯大林格勒会战）和最高统帅在其中的作用。我只想说，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不仅指挥员、各司令部及其指挥的部队的作战本领明显提高了，而且大本营的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斯大林能够使最高军事机关的战略活动具有更大的活力，其决定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充分的根据。

战争是严酷的导师。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牺牲、失利、惨败，另一方面是苏维埃人的前所未见的英勇精神，这些不可能不使军事首长和统帅们学会军事学术，其中许多人在战争即将爆发时或者是在战争过程中登上了军事机构的最高层。但是，战争的教训是沾满血迹的。这些教训对于斯大林也不可能不发生作用；他开始更加谨慎地、深思熟虑地、目的明确地行动。他的作风——爱强制的、生硬的、对失败者经常给予惩罚的作风——依然如故。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大林身上有些东西变了，但是独裁者、极权者的本质更加根深蒂固和完善了。他手

狠,不容反驳,看问题绝对,生性多疑——这些,在战时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是,要识破它,识破这种性质,在当时是困难的。要知道斯大林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是救世主、大救星、胜利的统帅!他在战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时期发出的指示、指令和命令的一些摘录,可能有助于人们对他在进攻战役中的行为的性质作出判断。

南方方面军

致叶廖缅科、赫鲁晓夫同志

抄送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我军占领巴泰斯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攻克巴泰斯克,我们就把北高加索的敌军封闭起来了,使德国和罗马尼亚24个师无法进入罗斯托夫、塔甘罗格、顿巴斯地区。北高加索的敌人必将被包围和被消灭,就像他们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包围并正在被消灭一样……

约·斯大林

1943年1月23日6时30分电话批准

博科夫[32]

但可惜的是,使斯大林格勒会战重演是困难的。斯大林的愿望并没有由于苏联军队的本领和潜力而增加分量。德国国防军第一坦克集团军的一部分力量突破重围经罗斯托夫进到了顿巴斯,而其余的力量退到了塔曼半岛和库班下游……

西南方面军

致费多罗夫(费·伊·托尔布欣)同志

与其采纳您提出的战役计划,不如采纳另一个只提出有限任务的但是在此刻更容易实现的计划。方面军在最近的总任务是,不允许敌人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方面后撤,依靠整个方面军的兵力设法钳制住克里木的敌顿涅茨集团,封锁穿过彼列科普和锡瓦什的通道,从而把敌顿涅茨集团同在乌克兰的其他部队隔离开来。要尽快开始这一战役。您的决定送

总参谋部备案。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
1943年2月11日4时5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33]

从电话记录稿已经可以感觉到斯大林对自己的行动有充分的信心。他轻易地拒绝了托尔布欣的计划,并且没有经过总参谋部事先研究就要他接受了自己的计划。从密码电报可以看出,托尔布欣的决定应该完全从斯大林的上述命令出发,必须送总参谋部只是为了“备案”。以前斯大林是不会独自作出类似决定的,他更多地是依靠总参谋部,而现在他已经有能力独立作出重大的决定了。这些决定有多么英明和有多少根据是另一回事,例如,对“钳制”和“封锁”克里木的德军集团的意图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斯大林曾经学习指挥战斗行动,现在力图让大家也学习。在他的倡议下,给部队发出了不止一封指示信,规定要更加积极地掌握进攻行动的经验。下面是1944年5月发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这样的文件中的一份。

所有的方面军都要对已经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战役和战斗进行分析。在同各集团军和各军的司令员、参谋长以及方面军和集团军各兵种首长进行分析时,由方面军司令员领导;在同师长、团长及相应的各兵种首长进行分析时,由集团军司令员领导。在分析时,除了指出我军战斗行动的长处以外,还要揭露组织和进行战役和


卫国战争期间,显出憔悴的斯大林

战斗时发生的缺点，特别是利用各兵种、组织它们协同动作、指挥部队时的缺点，并指出消除缺点的方法。[39]

也许就是这种学习同战斗的、流血的实践一道帮助苏联军队胜利地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

……凌晨，斯大林回到自己的别墅，半闭着眼，逐一回想那许多“通过”他的头脑、神经、意志的战役。时光飞速地流逝，但是几乎每一次战役都同他的某些回忆、成为过去的忧虑、为当前胜利而欣慰的感情相联系。的确，在1943年，特别是在1944年和胜利的1945年，有多少战役通过他的意识呀：奥廖尔战役、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顿巴斯战役、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战役、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下第聂伯罗夫斯克战役、基辅战役、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克里木解放战役、维堡—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东喀尔巴阡战役、贝尔格莱德战役、布达佩斯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维也纳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是的，即使去回想，斯大林现在也不能全部想起这些战役。有一个想法老是萦绕在他的脑际：这50次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难道仅仅是这些战役吗？）就是一幅巨大的战争画面，其中有那么多的会战和战斗，那么多的失败和胜利。这一切—“经过”他的头脑和心脏，立即使已经上了年纪的最高统帅衰老了许多。他现在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想：人民即他的千百万同胞也经历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经过了”他们的头脑和心脏，而且“经过了”他们用鲜血汇成的河道，使他们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牺牲了几百万条性命。

斯大林早已习惯于利用几百万人的性命。这是群众，而他是领袖。他坚信，历史从来如此。将来也是这样。我看了几百份由斯大林在四年战争中口授或签署的作战文件，但我似乎没有见到一份文件旨在珍惜人，不把人们投入无准备的进攻，关心保护自己的同胞……不，也许是我不对。确有这样一份完全不合斯大林本意的文件。我把它援引如下：

致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同志

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罗曼年科同志

第61集团军司令员别洛夫同志

第16集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同志

根据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第61集团军的387、350步兵师和346步兵师的一部分继续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虽然大本营作了多次指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援。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而是会用一切可能用得上的力量和手段百般设法冲进去救他们。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的部队应该比德国法西斯指挥部有更多的同志感情。但事实表明，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部队的关怀却比德军指挥部要少得多。这给苏军指挥部留下了污点……

1942年8月17日22时[5]

但是，即使在这里，斯大林呼吁关怀"自己被包围的部队"，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动机不仅是奇怪的，而且是丢人的。关怀被围困者是因为敌人表现了这种关怀……有许多方面军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对阵亡者表现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哀痛心情，对无谓的伤亡感到痛苦。但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够表现这种感情。斯大林认为，战争就其实质说是铁面无情的，既然是打仗，伤亡再大也应该。在指挥员和军队没有学会按照军事学术的规律去打仗以前，曾经有很长时间进攻战役都组织得不好，对德军阵地都实行正面的直线的进攻，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军事学术的规律的实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一条简单的公理：用最小的牺牲去实现既定的目的——胜利。

人们从斯大林的行动中看见的往往只是最终结果。而他是胜利者。这就为友善的外国作者提供了一种根据，对苏联最高统帅的统帅艺术作出非常好的评价。彼得·乌斯季诺夫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我的俄国》中写道："除了斯大林以外，也许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战争中作出同样的事情：极度的无情、灵活或矢志不移，像在人力极难驾驭的规模上顺利地进行战争所要求的那样。"[6]我不能同意主要的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果说不可能那样"无情"，是的，可能是这样。但是要说不可能那样"灵活和矢志不移"，那么俄国从来就不乏这

样的人才。这种人才产生过，虽然他们都被消灭了。

……斯大林逐一回想数十次进行过的战役时，毕竟还是更为看重其中特别称心的两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重新感到自己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也是统帅。而柏林战役则胜利结束了按紧张和残酷程度都是骇人听闻的四年战争。这是一次凯旋，在他看来，它立即“勾销了”一切失策、错误，证明无数的牺牲是正确的。

有许多胜利都是在失败之后取得的。但是，斯大林格勒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仅是卫国战争进程中而且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图为苏联空军轰炸柏林。



红军战士将苏联国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

柏林战役

苏德战争末期，苏军为攻占法西斯德国首都并给德军以最后歼灭性打击，于1945年4月16日–5月8日进行的一场进攻性战役。

斯大林格勒的光辉战例

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人们写了几十本书。我完全无意重新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次卓越战役的情景。它是广为人知的。我面前是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任务：说明最高统帅在这次转折性搏斗中的作用。

我已经说过，斯大林总是把基本力量放在苏德前线的中部。斯大林由于战前在确定敌人主要突击方向上判断错误而吃尽苦头，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当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莫斯科实际上已处在远射程炮的射程之内时，斯大林却把战略预备队的主力集中在西部方向上。但是，当1942年6月下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1942年7月17日德军开始进入顿河大河湾为起点,7月28日,德军第六军团抵达顿河。图为一德军士兵正从高处监视顿河地区

半月敌人集中大批力量开始在西南方向和南部方向上发动进攻时,人们才看清楚,正是在这里需要放置预备队。到7月初,我军防线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被突破很大一个纵深。由于德国军队进攻集团的猛烈突击和机动,苏联第21集团军和第40集团军遭到包围。

斯大林火速派华西列夫斯基到南方去。但是,华西列夫斯基发回的报告却非常不妙。在第二个星期内,德国军队把突破口扩大到300公里。在几天内,突击集团向前推进了150至170公里,从北面包围了西南方面军的主力。这时,德军接着又在坎捷米罗夫卡方向发动新的突击。斯大林在听取例行报告时研究了地图上的严峻形势,清楚地看到了西南方面军第二次(像1941年那样)遭到灾难性围困的轮廓。但是,现在他已学会了一点东西,在弄清了一些具体的军事战略问题以后,事实上并不反对让西南方面军第28、38和第9集团军以及南方方面军第37集团军的部队后撤的建议。大本营发出了火速准备斯大林格勒防御地区的指示。

斯大林本来有可能认清他缺乏预见的缺点。早在5月,在哈尔科夫

灾难发生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就建议加强西南方向和南部方向的战略预备队。斯大林没有同意。他担心的是莫斯科。现在不得不在发生尖锐战略危机的条件下紧急调动大批部队。由于许多兵团撤退的秩序紊乱,局势更加危急。不少师团和部队常常几天同上级司令部联系不上。灼热的尘土伴送着这一批批散乱的数以千计的正在退却的战士。“容克”式和“梅塞施米特”式飞机重新在空中为所欲为。有时感到到处都是一团糟,一片混乱,是1941年最糟糕的形势在重演。在一些军事档案馆中保存着斯大林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一系列严厉的电报:整顿好撤退部队的秩序,拼命死守,没有接到命令不得从上述地区退却。

下面就是其中的几封电报。

送斯大林格勒

华西列夫斯基、叶廖缅科、

马林科夫

敌人用不多的兵力就突破了你们的阵线。你们有足够的潜力去消灭冲进来的敌人。要把两个方面军的空军集中起来,对进来的敌人实行猛攻。要动用装甲列车,让它沿着斯大林格勒的环形铁路运行。要利用烟幕迷惑敌人。不仅白天而且黑夜都要同进来的敌人搏斗。要充分利用炮兵和火箭炮的力量。

洛帕廷由于没有本领和指挥能力不强第二次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陷入窘境。你们要对他进行切实的监督,并且在洛帕廷集团军背后组织第二梯队。

最主要的是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害怕肆无忌惮的敌人,要对我们的胜利保持信心。

约·斯大林

1942年8月23日16时35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37]

斯大林又感受到了自己当初在察里津的滋味。当时他也对装甲列车寄予厚望,同样号召“实行猛攻”,“不仅白天而且黑夜都要搏斗”,“充分”利用炮兵。最高统帅现在对形势显然失去了控制。他的数十封电报不是战略或战役的指示、决定,而是在向人们的意识、意志和感情

呼吁，呼吁人们尽职，加上要给予惩罚的威胁。

战后，斯大林回忆道：1941年8月和1942年8月对他来说是极其艰难的。要知道以前他很喜欢8月：索契、利瓦吉亚、穆哈拉特卡……木兰、蝉鸣、海浪的亲切低语、南方夜晚的魅力……这一切是多么久远！一切都过去了，消逝在一去不复返的渺茫的远方……谁知道，习惯于代表千百万人意志的独裁者还会想些什么？独裁者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不管有多少人围绕着他们。他们总是害怕把自己的心扉打开哪怕一点点。人们一下子就会看出他们在道义上的致命弱点：权力的重负在他们身上压倒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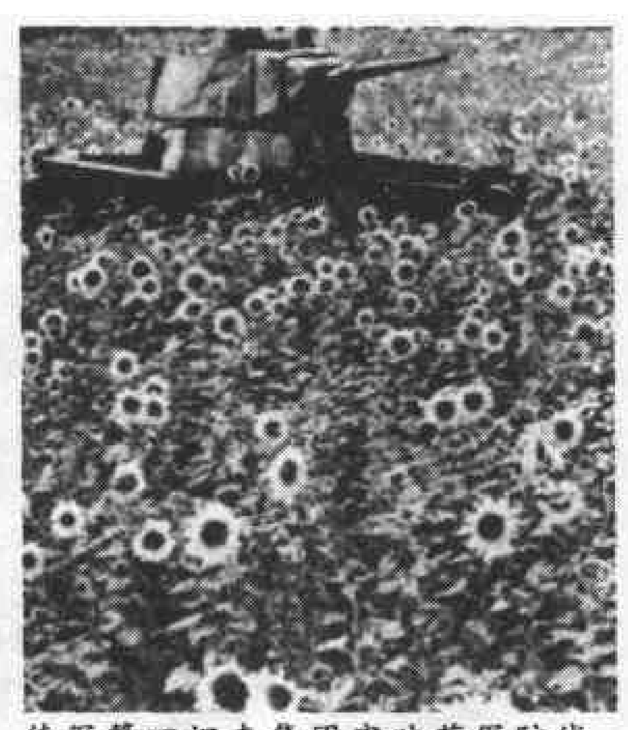
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在1942年7月和8月的那些日子里到斯大林那里去就仿佛是去受刑。最高统帅毫无掩饰地发火；他往往作出心血来潮的决定，有时就同一个问题接二连三地发出内容相似的电报。司令员们又开始被他像走马灯似地调动起来。常常要人不停地给他联系这个或那个司令部。但是，他的命令和要求都是一个样：死守！通常在谈话时斯大林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作战意见或作出决定。而部队一直在退却……于是，斯大林在听完华西列夫斯基一次例行的报告后，在摆着地图的桌子旁神经质地走来走去，突然出人意外地开口说——但不是谈作战问题：

"各个部队把1941年8月16日大本营的第270号命令都忘记了。都给忘记了！特别是各级司令部！您要起草一个给部队的新命令，基本思想是：未接到命令就退却是一种犯罪，它将受到战时最严厉的惩处……"

"什么时候把命令呈报给您？"

"就今天……文件一拟好您就来……"

1942年7月28日晚上，斯大林在彻底修改了提交给他的命令草稿后，签署了有名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命令被精心藏匿在军事档案馆里。现在这个命令已经可以看到并



德军第四坦克集团突破苏军防线，行进在顿河到伏尔加河之间辽阔的原野上，直逼斯大林格勒

在不同的出版物上发表了。我不打算把它全文复述一遍,而只是援引能反映最高统帅本人的创作、他的提法和个人措词的那些论点。

敌人不断把新的兵力调往前线,不惜遭受巨大伤亡往前冲,冲向苏联腹地,侵占新的地区,毁灭和破坏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强奸、掠夺和杀害苏联居民……南方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跟着一些惊慌失措的人后面跑,未作认真抵抗,没有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就放弃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使自己的旗帜蒙受了耻辱……

有些蠢人在前线安慰自己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向东退却,因为我们国土大,土地多,人口多,我们的粮食总是有剩余,他们想以此来为自己在前线的可耻行为辩护。但是,这种说法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它只对我们的敌人有利。

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顿巴斯和其他一些地区沦陷以后,我们的国土小得多了,因而人口、粮食、钢铁、工厂也少得多了。我们失去了7000多万人口、每年8亿多普特粮食和每年1000多万吨钢铁。现在我们无论在人力后备方面还是粮食储备方面已经不再对德军占有优势。再要退却就是断送自己,同时也断送我们的祖国……

一步也不后退!这就是现在我们应该高喊的主要口号……

斯大林几次强调了这两句。

决不能继续容忍指挥员、政治委员、政工人员以及他们的部队擅自放弃作战阵地。决不能继续容忍指挥员、政治委员、政工人员看着一些惊慌失措的人左右战场形势,看着他们带动其他战士退却并把战线暴露给敌人而坐视不管。应该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就地处死。

接着,斯大林特别详细地审订了以下几点:

(1)无条件地消除退却的情绪……

(2)无条件地撤销听任部队擅自撤离所占阵地的集团军司令

员职务并解送大本营交军事法庭审讯……

(3)在方面军中成立1至3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营(每营800人),派中级和高级指挥员和相应的政工人员前去任职……

然后,斯大林重申了他在1941年9月12日给各方面军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的意见。那是他当初口授的:

每一个步兵师要有一个由可靠战士组成的阻截队,人数不超过一个营(合每个步兵团一个连),任务是阻止惊慌失措的军人逃跑,直至开枪……[38]

现在,斯大林把原来的思想修订成这样:

在集团军中成立3至5个装备良好的阻截队(每队大约200人),把他们放在不坚定的师团后面很近的地方,责成他们在师团部队惊慌失措和慌乱撤退时把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就地枪毙……在集团军内成立5至10个(视情况而定)惩戒连(每连150至200人)……把他们放在集团军的困难地段,使他们有可能用血赎回自己对祖国的罪行……

此命令要在各个步兵连、坦克连、炮兵连、大队、小队、司令部宣读。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正好过了两天,第192师和184师的一些不久前组成的部队,没有接到命令就放弃了马约罗夫地区的阵地,退到上戈卢巴亚。斯大林认为,他的第227号命令没有贯彻到该方面军的部队。于是,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立即向大本营报告,根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第227号命令,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对没有接到命令就放弃

了克列茨卡亚的上述各师和第21集团军部队中带头撤退者、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采取了什么措施。

2.在两天内，从抵达前线的几个远东师中抽调优秀人员成立几个阻截队，每队大约200人，把他们首先放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各师后面很近的地方。各阻截队通过特别处归属于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由作战方面最有经验的特别处人员领导。

执行情况要在1942年8月3日早晨以前报告。

约·斯大林

亚·华西列夫斯基

1942年7月31日用电话向斯大林同志作了报告并得到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39]

像1941年那样，一些部队充满了惊慌失措气氛。在战前，对人员的心理素质的锻炼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何况部队中的基干军人员几乎都不在了。而大家知道，在对能否达到目的丧失了信心的高度紧张的条件下，人们遇到危险不能保持镇静，就随时可能引发难于控制的行动。人的群体感情涣散了，冷静地估计形势的能力丧失了。斯大林企图用阻截队和惩戒连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对提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在这种极其异常的条件下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读过拿破仑的《思想》一书，有一次，列宁特别标出了书中的这样一句话："在每次战斗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最勇敢的士兵在极度紧张之后也感到有逃跑的愿望。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是由于对自己的英勇精神丧失信心而产生的；但是，某种微不足道的情况、某种口实却足以使他们恢复这种信心，高超的艺术就在于创造这样的情况和口实。"[40]指挥员个人的勇敢、坚强的指挥、高度的自信、坚决的号令在这种形势下会起巨大的作用。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被战胜，他就没有遭到失败。只要斗争意志没有被摧垮，战士就有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只有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能够并且应该恢复人们对自己的英勇精神的信心。但是，斯大林同过去一样，更多地指靠强制措施、惩罚措施。同时，许多短训班对心理素质的锻炼又完全没有给予重视。斯大林认为，而且是不无根据地认为，只有新的胜利才能使人员恢复信心。可暂时又没有取得新的胜利。更严

重的是,新的灾难的阴影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逼近。

我再次提醒一下,托洛茨基是怎样看待这种形势的:"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11]斯大林实际上说了同样的意思(当然不是引用托洛茨基的话):前进,战死了光荣,而后退,虽死也可耻。

但是,斯大林并不局限于发出这类指令。当时,包括1942年在内,有大批军人陷入敌人包围,其中有些人结队或者单独突围出来。指挥员们立即被解送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营。由于1942年7至8月间出现了危急情况,斯大林走得更远了。

> 致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 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
> 斯大林格勒军区司令员
> 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
> 为了使那些曾经长时间呆在敌占区而又没有参加游击队的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能够手持武器证明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我命令:
>
> 在今年8月25日以前,成立由被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营中的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组成的强击步兵营……

接着列举了关押突围出来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特种营的名称:柳别尔齐、波多利斯克、梁赞、卡拉奇、科特卢班、斯大林格勒、别洛卡利特瓦、格奥尔吉耶夫斯克、乌戈利内、洪拉尔特种营……强击分队的人数定为每队929人。指令说:"这些营要用在前线最活跃的地段。"在由斯大林1942年8月1日签署并印有"要件"字样的这个指令中甚至规定了这样一些"细节":"马车夫、铁匠、裁缝、鞋匠、厨师、司机也从特编人员中抽人配备。"所谓"特编人员",说穿了就是"原来连以上的指挥员"[12]。这些人的过错常常只在于,由于战斗进行不顺利或者上级司令部指挥无能,他们被包围了,经过一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他们突围回到自己人这里。但是,从文件中可以看到,当原来的指挥员被用"在前线最活跃的地段"时,他们是无比幸福的。在那里,大多数人阵亡了。但是,一旦阵亡,就有希望使自己和家属不至于丧失名誉和受到惩

罚。此外,在指令中还说:参加了前线活跃地段的战斗以后,“如果鉴定上的评语很好,就可能被派往野战部队担任相应级别的指挥员和领导人”。

在最高统帅的脑海里,斯大林格勒仍然是那个遥远年代的、在他的命运中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察里津。看来,似乎是在察里津保卫战以后,列宁相信了斯大林有能力干练地解决在前线开展武装斗争后出现的问题。在察里津保卫战以后,斯大林也进一步提高了自信心。今天,斯大林格勒对他和全国人民来说,都成为能够顶住敌人新的激烈强攻的象征。

当时,事态的发展是直线上升的。7、8、9、10月标志着紧张程度的升级,1942年11月达到了顶点。但是,甚至在斯大林格勒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之际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责成总参谋部一批人员——格雷兹洛夫、捷捷什金、博伊科夫等人极其秘密地制定了一个方案,从南北两面包抄深深插进来的敌人的突击集团。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地图,上面画有后来由博伊科夫执行的一次著名战役的轮廓图初稿。但是,斯大林当时还不知道此事。被他宣布为“歼灭德国占领者年”的这一年,有演变成一场新的巨大灾难的危险。最高统帅常常一连几天不离开办公室,只在休息室里心神不安地打个盹,并且事先吩咐波斯克列贝舍夫:

“你过两个小时叫醒我……”

有一次,当波斯克列贝舍夫怜惜这个酣睡之中的极其疲惫的人,比指定时间晚半个小时叫醒他时,斯大林看了一下表,轻声地责骂他的助手说:

“原来你也是一个慈善家!让华西列夫斯基

察里津保卫战

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红军抗击哥萨克白卫军、保卫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的战役。1918年7月底,顿河地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首次进攻察里津,企图夺取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内河港口,与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乌拉尔斯克和奥伦堡的哥萨克白卫军会合,以打开进攻莫斯科的道路。保卫察里津的红军在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的领导下,运用炮兵依托筑垒阵地顽强抗击,8月发起全面反击,迫使白卫军退至顿河右岸。9月22日克拉斯诺夫纠集6万兵力再次进攻,由伏罗希洛夫任司令的红军第10集团军,在环城铁路沿线组成的炮兵群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扭转了战局。1919年1月初白卫军第三次进攻察里津,布琼尼指挥红军混成骑兵师对敌后方实施深远突击,威胁白卫军后方,稳定了南方战线。战役中,红军将大量集中使用于主要方向,正面固守与侧后突击相结合,并开始运用骑兵兵团,为城市保卫战积累了经验。

给我来电话。快！秃头慈善家……”


德军第六军团向斯大林格勒挺进

波斯克列贝舍夫那连着宽阔的秃顶的圆脸膛儿，像通常一样，没有任何表情。这位助手轻轻地应了一声，好像是说“遵命”，随即消失在门外了。

华西列夫斯基来电话了，他乘飞机从斯大林格勒来这里已经两天了。斯大林冷淡地问了声好，立即问道：第1近卫集团军、第24和第66集团军是否已投入战斗？弹药运到了吗？（斯大林格勒到9月几乎完全没有弹药了……）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到9月3日晚上的形势：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斯大林忍不住恶狠狠地打断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话：

“他们怎么不懂得，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我国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我们还能保得住南部地区？那里的人是否懂得，这不仅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不久还将失去石油?！”

华西列夫斯基等最高统帅发泄完怒火之后，镇静地但是声调有些紧张地继续说：

“斯大林格勒城下一切还能作战的力量，我们都调集到危险地段上去了。我想，保卫住城市还有可能。”

过了几分钟，斯大林又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后者已经不在了。守在电话机旁的是博科夫少将。随后斯大林发出了命令，要立即在斯大林格勒找到朱可夫（朱可夫在此以前不久，即8月26日，经大本营决定被任命为副最高统帅），把下述命令转告他。斯大林沉默了片刻，口授说：

要件

致大将朱可夫同志

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恶化了。敌人距离斯大林格勒就3俄里。如果北方集团不提供紧急援助，敌人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把斯大林

格勒拿下来。请您要求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各部队的司令员立即对敌人发动突击,支援斯大林格勒人。不容许有丝毫延误。现在延误就等于犯罪。您要把全部飞机调去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本身剩下的飞机很少。

立即报告命令已接到并报告采取的措施。

约·斯大林

1942年9月3日22时30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

朱可夫很快回电说,早晨,第24集团军、第1近卫集团军和第66集团军将开始发动攻势。正在进行准备。斯大林简短地作了反应:

致朱可夫、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

回电收到。我期待你们进一步加紧突击,务使斯大林格勒不致陷落。

约·斯大林

1942年9月4日2时25分 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43]

斯大林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求斯大林格勒方面汇报一次情况,并几次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他又把他派到那里去了)谈话。同马林科夫的谈话使他不太满意。这个军事上的庸才,看来是被斯大林派去作为"监视人"的,他只能提醒人们注意



朱可夫大将在前线

最高统帅的要求并收集关于各司令部工作的情况。马林科夫下过一两次部队，其他时间全都呆在某个司令部的专门办公室里，有时也召见政工人员、特别处领导人。军事首长们对马林科夫彬彬有礼，但是由于知道他在前线扮演的角色，从不主动同他交谈。

9月5、6和7日，朱可夫从北面组织了几次冲击。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炮兵和空军的有力增援，这几次冲击没有取得明显的积极的结果。斯大林坚持要继续进行冲击，要求更充分地利用空军（我提醒一下，这是斯大林经常提、“反复提”的一项要求）和其他手段。

致朱可夫大将

9月6日，你们将得到两个团的歼击机。一个团来自卡梅申，一个团来自沃罗涅日方面军……您应该注意，您不仅有权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把空军力量或其他任何力量调到北面去，或者相反。在集中兵力方面，您有全权随机应变。3000发H-20炮弹已运往您那里。

约·斯大林

1942年9月6日2时35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64]

朱可夫不得不很快在电话上报告说，他未能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拥有的兵力打开一条通道同城里东南方面军的部队会合。德军防线由于从斯大林格勒城郊新开过来一些部队而大大加强。用原来的兵力和同样的集团继续发动冲击将是无意义的，部队势必遭到重大伤亡。斯大林听完后要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莫斯科。



战前宁静的斯大林格勒市。该市人口近60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正是在这里，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人坐在地图跟前，同总参谋部工作人员商量以后得出结论说，必须用顽强的防御把敌人拖垮，同时逐步开始准备



演变成激烈巷战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已经没有战线可言，在长达数月的攻防战中，甚至沟渠、地窖或废墟，都成了苏、德双方争夺的阵地。图为废墟中，正给予德军迎头痛击的苏军

用各方面军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这时两位军事首长就已经决定，应该对德国集团的两翼发动主要突击，这两翼掩护着战斗力较弱的罗马尼亚部队。于是就产生了9月13日晚上他们带着去见最高统帅的那一构想。这个构想如果实现，注定要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世界军事学术史上最出色的范例之一。这是一个光辉战例。但是，它的创造者不是斯大林，而是两位迅速成长起来的军事将领。起初，斯大林对这种想法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指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守住斯大林格勒，不允许德军朝卡梅申方向继续推进。看来，斯大林或者是不重视这个大胆的构想，或者认为这个构想在目前情况下不太现实。最高统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术上面。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在斯大林身上，预见能力明显地不如分析眼前事物、目前形势的能力。斯大林并不了解，这一光辉战例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思想表现，它要求把握那种为表面的观察所看不到的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他作出一种决定多半都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里直觉没有特殊的意义。但是，斯大林逐渐理解了一个思想后，就用自己的意志、命令和指令把这一思想变成他自己的思想，把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变成“斯大林的英明决策”。

当最高统帅最初接触到自己的军事助手们(没有他们，他简直不可能表现自己的意志)的大胆而果敢的构想时，斯大林格勒刚开始残酷的巷战。德国军队攻进了城里，从这以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日

夜夜都在进行空前激烈的搏斗。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一书——这是描写上一次大战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就是专门描写苏联军人的这一英勇史诗的。起初，占领者在西南方的进攻速度是每昼夜前进几十公里，后来是几公里，9月是几百米，到了10月，前进40至50米就算很大的进展了，而到10月中旬，这样的前进速度也没有了。只是到这时，第227号命令及其名言“决不后退一步！”才不折不扣地得到了执行。虽然占领者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斗中投人了22个师及其盟军几乎相同数量的兵力，德国国防军的战争机器却在原地空转。

斯大林本来有可能喘一口气。但是，他既不容许自己、也不容许别人这样做。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成员们、各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确实日夜都在为实现最高统帅不断发出的命令而努力。斯大林相信发动一次大胆的包围敌军集团的战役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要打开通往南方的道路已经没有其他办法，这条道路已经被冲到伏尔加河的德国师团差不多切断了。正像1941年底德军准备在莫斯科的街头齐步行进那样，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注定要陷落的高加索及其石油储藏。而我国人民、我国军队又一次以空前未有的、实质上是非人力所能及的努力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从1942年7月1日到11月1日，根据大本营的决定，往斯大林格勒方向调集了72个步兵师、6个坦克军和2个机械化军、20个步兵旅和46个坦克旅。斯大林一再催促……许多部队人员装备没有配齐就动身开往斯大林格勒了。大多数师团的人员不到65%，而配备的火炮和坦克不到50%至


1942年的东线战场上疲惫不堪的德国伞兵，曾经看起来轻而易举的胜利现在转变成一场漫长的流血的失利


斯大林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将近卫第13师调过伏尔加河增援斯大林格勒，并让空军采取行动。图为第13师的战士和他们的师长罗吉姆采夫在防空洞等待出发

60%。根据最高统帅的决定，第8和第16空军集团军明显地得到了加强，11月敌人就已经丧失了制空权。

斯大林在忙于其他军事事务的同时，11月几乎每天都要过问三个方面军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即将开始的战役。总参谋部给这次战役取了一个代号，叫“天王星”。最高统帅严格要求只让极少数人知道这次战役的构想、时间、性质和先后次序，确实只有屈指可数的人知道。协调各方面军行动的任务，斯大林责成华西列夫斯基负责。

当11月19日开始反攻时，斯大林也许第一次对胜利有了充分的把握。这不是因为通过集结部队确保了人力物力上的明显优势，而首先是因为以前哪一次战役上也没有作过如此周密的准备。诚然，战役开始前一个星期，斯大林还有过疑虑：实质上空军只能做到势均力敌。而空军，我已说过，是斯大林一直特别重视的。他毫不隐讳地认为自己在空军问题上特别内行。由于实在没有把握，斯大林曾准备推迟战役的日期：

要件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如果伊万诺夫（安·伊·叶廖缅科）和费多罗夫（尼·费·瓦图京）对战役的空军准备不能令人满意的话，这场战役最后只会遭到完全失败。同德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在我们占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才能打赢战役，战胜德军……如果诺维科夫认为，现在我们的空军无法完成这些任务，那么宁可把战役推迟一些时间，再集结一些空军力量。您同诺维科夫和沃罗热伊金谈谈，把这件事向他们好好讲清楚，并把你们的共同意见告

诉我。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

1942年11月12日4时 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15]

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斯大林完全依赖朱可夫,授予他全权具体规定我军几个集团的组成、许多重要的细节和期限。最高统帅在心里感到,朱可夫更加深刻理解当前事态的性质、战争的隐蔽的内在动因。他对朱可夫抱着越来越大的期望。战役开始前四天,斯大林还给朱可夫发去一封密码电报,授权他最后确定开始反攻的日期:

要件

只限本人阅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费多罗夫(尼·费·瓦图京)和伊万诺夫(安·伊·叶廖缅科)迁居的日期,您可以自己斟酌决定,以后到了莫斯科再向我报告。如果您想让他们中某个人早一两天或晚一两天开始迁居,也授权您自己斟酌决定这个问题。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

1942年11月15日13时10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16]

朱可夫利用了这个权利: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部队转入进攻(开始"迁居"),而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迁居"。11月23日完成了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包围。



1942年11月19日,苏军开始反攻。12月下旬,苏军夺回了"红十月"工厂

通常斯大林早晨4—5点钟躺下休息。在斯大林格勒书写它的史诗的日子里,他打破了这个规矩:向他汇报情况的次数比平常多了,包括在早晨6点钟也汇报。最高统帅两眼因失

眠而发红，他走到窗前，从小窗口吸人寒冷早晨的新鲜空气，望着克里姆林宫的昏暗的大门。他在什么书上读到过，希望之星只有清晨才能看见。但是，在11月的潮湿的晨曦中，斯大林不可能看清这个希望之星，虽然他感觉到，他相信，这个星在闪烁……

斯大林逐渐学会了“读”地图。以前他也喜欢地理，并且能够久久地审视我国、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地图。现在最高统帅看的是军事地图，总参谋部人员迅速地把变化了的形势在那些军事地图上画出来。红色和蓝色的箭头，防御地带的齿状带，预备队集结地区的椭圆形，坦克纵队出动的虚线，许许多多的说明词……当23时晚上斯大林看到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62、64和57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第21集团军和顿河方面军第65、24、66集团军组成的内线包围圈的红色大圆圈时，他体验到一种喜忧参半的复杂感情。喜的是包围圈终于完成了！在什么地方呀——斯大林格勒附近！难道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他还不知道被围困的德国军队的准确数字（原来有33万多人），但是他了解，如果能彻底解决问题，那么这将是一个伟大转折的开始。而忧的是，注视着包围圈的外部战线，斯大林感觉到，德军统帅部将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德国国防军第6和第4集团军被包围的22个师。他没有忘记，尽管在杰米扬斯克附近完成了合围，但是我们毕竟还不能消灭包围圈中的希特勒集团。



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德军阵地

即使在这里，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消灭被包围的德军集团比原来预料的更复杂。建立强固的外部战线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敌人开始解救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但是到12月底他们被打退了，往西退了200至250公里。从1942年底起，战略上的主动权就掌握在红军

手中。而同保卢斯集团军还得认真地周旋一番。在每天呈报给斯大林的文件中，有一次出现了保卢斯给被围部队的命令的译文：

给集团军的命令 通知到连

近来俄国人一再企图同集团军或其所属部队进行谈判。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在进行投降谈判的过程中通过许诺来使我们的反抗意志消沉下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集团军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我们中的多数人必然会死亡，或者死于敌人的枪弹，或者在可耻的西伯利亚俘虏营死于饥饿和折磨。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谁成了俘虏，都将永远不能再见到自己的亲人！我们只有一条出路：不管饥寒交迫的情况怎样日益严重，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因此，应该抛弃任何进行谈判的尝试，拒不回答，开火把军使赶跑。

此外，我们应坚定地相信能够得救，因为得救的日子已经不远。

保卢斯上将

1942年12月24日[67]

斯大林把保卢斯的命令放在一边，可能在想：希特勒的计划就是



德军第六集团军被俘的部分军官



1942年8月，保卢斯任第6集团军司令，率25万人向斯大林格勒进军，后被俘

靠这样一些将军、军官和士兵来执行的。困兽犹斗。他们多么……有一次，已经是在莫斯科会战胜利以后，朱可夫向最高统帅讲述了1941年秋天他本人几次亲自审讯战俘的情况。当时他看到这些俘虏充满自信，坚信希特勒是正义的，这使他感到很惊讶。在年轻士兵和军官、飞行员和坦克兵身上，纳粹精神尤为强烈。但是，朱可夫说，在这里，对于德国士兵的训练、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顽强精神，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有一个情况对他们有巨大的意义，那就是：他们经历过无数胜利，几乎战胜了整个欧洲；他们接受了戈培尔的宣传，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种族和民族优越。祖先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历史，沙文主义的毒害，包括长官等级制度在内的一整套精神愚弄手段，对雅利安人的特殊使命的盲目信仰——这一切把那些穿着灰制服的人变成了他人意志的狂热执行者。希特勒喜欢重复尼采的话："让顺从成为您的高尚品质！对于一个优秀的军人来说，'你应该'听起来比'我希望'更顺耳。您看重的一切，都应当是原先已给您下了命令要您去做的事！"[49]起初只是希特勒一个人和他的上层官僚们这样说，很快，齐步走向战争的整个民族几乎都开始跟着这样说。这是在狂热地陶醉于一种错误的观念。苏联的专门宣传机关企图在被希特勒分子占领的领土上散发的几百万张传单，德国士兵们只是当他们喝下了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这杯苦酒的时候，才开始予以注意。在前线，通常不是胜利而是失败才能使人醒悟。

当最高统帅读完了译成俄文的保卢斯的命令时，无论是这位德国将领还是斯大林都还不知道，过了不到两年，1944年10月，在大难临头的日子里担任了陆军元帅的保卢斯签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件。这个文件保存在斯大林的个人案卷中。现在我从中引出一小段来：

德国同胞们！
陆军元帅冯·保卢斯

1944年10月26日

我感到，我对祖国的义务以及我作为元帅所肩负的特殊责任使我必须对自己的同仁和我国全体人民说明，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改变我们目前的、看来是走投无路的处境——同希特勒决裂并且结束战争。

希姆莱先生说，德国士兵当了俄国俘虏后会受到非人的对待，他们将在鞭子和左轮枪口的威胁下被迫进行反对自己祖国的宣传。这种说法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在苏联，战俘都受到人道的和礼貌的对待……[39]

保卢斯还不知道，他将在苏联度过漫长的10年。不过这是后来的事，而目前保卢斯的集团军还在战斗。

只是到现在，当斯大林格勒史诗即将写完的时候，当距离保卢斯、他的将军们和军队残部被俘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星期的时候，斯大林才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当前事态的重大意义。他认识到，同



1944年，保卢斯元帅(中)被俘

题不仅在于歼灭和俘虏了几十万德国士兵，解放了1942年夏天和秋天可耻地遭受占领者凌辱的大片领土；还在于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引起的巨大国际反响。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人民终于获得了不可战胜的信心，这种信心在相当大程度上震撼了、动摇了德国争取胜利的能力。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他内心发生了变化，他作为最高统帅有了自信心。但是他很快就忘记了，进行反攻这个光辉思想，这个正当他觉得又一次惨败不可避免的时刻产生出来的思想，并不是他悟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者不是他！这一思想也不仅仅是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悟出来的。总参谋部的那些质朴的、平平常常的参谋人员用自己的盘算、谋划使这一思想变得非常透彻：他们把包围深深楔人我军防线的敌人这个简单的、甚至是浅显的思想变成一个绝妙的、连细节也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诚然，战略学上大概没有很浅显的东西。我认为，用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包围德军集团的构想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出众的思想。在我看来，发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这一战略思想的高超之处，就是在防御极其艰难、很有可能招致又一次失败的最危险时刻敢于作出这一决策。当斯大林格勒上空一片火海证明参战部队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却看到了可能获胜这只凤凰鸟。我不知道，这一思想的提出者们是否也感觉到了，构想中的战役及其光辉结局会帮助全国人民看清期望中的还十分遥远的未来胜利的轮廓。这是集体悟出的成


苏联军民在市区欢庆胜利

果。

我已经指出，斯大林起初没有看出这一思想的大胆之处。不是他产生了这种灵感。但是，最高统帅能够对计划作出正确的评价，那个计划从各种观点来看都是军事学术的杰作。当在作战地图上对各种问题作了周密研究，对物资和技术装备的供应作了一连串考虑，对谢拉菲莫维奇、克列茨卡亚区和其他地方作了实地勘察以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带来了反攻规划图。斯大林最初没有去看。他已在集中精力考虑这个思想，竭力设法要相信它。在规划图的角上，最高统帅用粗重的笔迹写上："批准。**约·斯大林**。"

下面，在规划图的边上，有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签名。

当1945年以后发表了有关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一些战役的第一批辩护性出版物时，使斯大林感到惊讶和不快的是，除了他这个"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天才战略构想的创作者"以外，还提到他的副手朱可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军事委员会委员热尔托夫、基里琴科、赫鲁晓夫，集团军参谋长斯捷利马赫、马利宁、瓦连尼科夫和其他军事首长。他已经习惯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会战、解除列宁格勒封锁的战役、库尔斯克城下的反攻、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解放以及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几次战役，首先是他作为统帅的功绩。他已经永远不可能同别人分享荣誉。朱可夫以及其他几个统帅在战后失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意同他们分享荣誉。尽管谁也没有企图分享这种荣誉。不过，在只有一个"一贯正确的统帅"出场的文章、报告、演讲、电影中，有时也列举一些人，提到各方面军司令员、各军事委员会委员、各参谋长。通常提不到集团军级司令员。上一次大战的主人公——人民——只不过是"战无不胜的统帅"的光辉业绩的陪衬。尽管今天，在读了有关上一次大战的数以百计、千计的作战文件、政治文件和党的文件以后，可以有充分的把握说，斯大林所以能够扮演他的最高统帅的角色，只是因为在大本营、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舰队中有超群出众的统帅和将领。我们的国家能够在苦难、忧患、血泪之中恢复起自己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将帅潜力，这也证明它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伟大卫国战争的军事学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而斯大林能够学会利用它。

最高统帅和统帅们

战争期间，除了报告、密码电报、作战汇报、战役计划、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外交公文以外，斯大林来不及看其他任何东西。他在别墅和克里姆林宫寓所的藏书可能积满灰尘。但是有几本书他还是草草地读过了。我看到过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斯大林的一张便条，上面开列了“有关统帅艺术的书籍”。这个书目看来是根据“领袖”的指示拟定的，书目如下：

1.鲍里索夫《库图佐夫》1938年莫斯科版。

2.德拉戈米罗夫《十四年(1881—1894)》1895年圣彼得堡版。

3.克劳塞维茨《1812年》1937年莫斯科版。

4.列维茨基《拿破仑的统帅艺术》1938年莫斯科版。

5.列耶尔《几个根本问题(军事简论)》1897年圣彼得堡版。

6.梅林《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论文集》1940年莫斯科版。

7.米赫涅维奇《战略家苏沃洛夫(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授专题报告)》1900年圣彼得堡版。

8.毛奇《军事教训》1938年莫斯科版。

9.拿破仑《拿破仑选集》第1卷1941年莫斯科版。

10.奥西波夫《苏沃洛夫》1938年莫斯科版。

11.彼得鲁舍夫斯基《大元帅苏沃洛夫公爵》1900年圣彼得堡版。

12.苏沃洛夫《致胜科学》1941年莫斯科版。

13.塔尔列《拿破仑入侵俄国(1812)》1938年莫斯科版。

14.福煦《作战原理》1937年莫斯科版。

15.沙波什尼科夫《军队的大脑》1927—1929年莫斯科版。

在第1、10、12、15号前共画了四个勾号(可能是斯大林画的)。斯大林可能读过这几本书，或许也读过有关杰出统帅们的其他著作。战争一开始，斯大林便命令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肖像，这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1941年11月7日，他在



苏沃洛夫(1730-1800)
军事理论家

俄国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之一，大元帅（1799），奥军元帅（1799），1730年11月24日出生于莫斯科。在其父亲指导下研究炮兵学、筑城学和军事史。1742年11月苏沃洛夫被录用为禁卫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火枪兵。1764-1765年在部队服役，任独立支队支队长，1767年参加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红场阅兵式上向部队发表的简短演说同样也不是偶然的。他说："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9]

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谈到以往的伟大统帅们，从他们身上汲取胜利的信念。正是根据他的倡议，设立了以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纳希莫夫和乌沙科夫等人命名的统帅勋章。斯大林懂得，在战争条件下，战斗传统能把对壮士事迹的歌颂和对人民业绩的赞美溶合在一起，是激发民族自觉、荣誉和尊严的生机勃勃的源泉。值得提出的是，梅赫利斯，后来还有谢尔巴科夫，都曾向斯大林专门汇报过怎样根据他的指示出版并向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散发关于著名俄国统帅和将领的小册子。

我再说一遍，许多人，但首先是四位苏联统帅和将领，对斯大林能成为最高统帅这一点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是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以及（当然是）朱可夫。分析一下大本营数以百计的文件、最高统帅的军事公文、训令和命令以及个人的电报和报告，就能看出，上述三位苏联元帅和一位大将在战争年代同斯大林的合作最密切，接触最多，对他的思想影响最深。当然，最高统帅几乎对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都很熟悉，实际上同全体高级将领都有过多次接触。根据对档案文献和回忆录的分析，可以说斯大林对罗科索夫斯基、瓦图京、戈洛瓦诺夫、沃罗诺夫、戈沃罗

夫、赫鲁廖夫怀有好感。根据电报、信件、决议来判断，最高统帅器重科涅夫、雷巴尔科、罗特米斯特罗夫、列柳申科、费久宁斯基、扎哈罗夫、伊萨科夫、铁木辛哥和马利诺夫斯基。当然，由于性格孤僻和难于接近，斯大林很少公开表露对别人的好感。许多统帅和将领，如巴格拉米扬、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戈尔多夫、达希切夫、朱可夫、科兹洛夫、科涅夫、洛帕廷、米舒林、里亚贝舍夫、秋列涅夫、费科连科、霍津、切列维琴科、什捷缅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多次领教过他的厉害。

事实证明，战前由于职位大量空缺而被提拔起来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不能胜任高级军队领导职务的。战争对人员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留情面地淘汰了那些优柔寡断、能力不强和因偶然机会被提拔的人。然而，进行这次筛选的主要"育种家"就是斯大林本人。被斯大林认为对某次失利、失败和失误负有责任的数十名将军，不是永远销声匿迹，就是降到最低职位。1940年5月底，当政治局审查准备由人民委员会发布决定于1940年6月4日授予陆海军将官军衔（这是第一次设置的）的指挥员名单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在一千多名获得这一荣誉的人中，刚刚过了一年多，就有二百多人阵亡和被俘，而数十人将根据他的批准遭到逮捕。许多人被枪决。数百名这一级别的将领被战争夺去生命。他们是接替战争前夕被处决的那批人的新一代指挥员。不论是哪一批人都是热爱祖国的，但是斯大林评定人的标准仅仅是对个人忠诚不忠诚。真难以设想，一个人的多疑竟造成数千名将领的悲剧！好好想想看吧！要知道，如果他让这台可怕的绞肉机停止转



库图佐夫（1745–1813）

军事理论家

俄国卓越的军事家、统帅、俄国元帅（1812）。1745年9月16日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中将军事工程师家庭，1759年炮兵工程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761年晋为准尉。1762年起任雷瓦尔总督的副官，同年晋为大尉。1802年失宠，被免去军职。1813年4月28日在西里西亚去世，葬于彼得堡喀山大教堂。

动,根本就不会发生恐怖事件!

我再次着重指出,斯大林能成为一位军事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在浴血奋战的日子里,斯大林在他们的影响下学到了战役学和战略学方面的初步常识。如果说第一课程他始终只能及格,那么在战略学方面他的成绩要好一些。由于这四个人,由于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不同的时间担任过总参谋长、大本营的代表或成员,或者担任过副最高统帅,斯大林才能显出军事领导人的本事来。在他周围有这样一班杰出人物的情况下,很难显不出本事。这四个人中的每个人在军事上都各有千秋。不能不承认,斯大林能够看清这一点,并且重视这一点。而主要的是能够加以利用。这些天才将领的思维直接帮助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和表达意志。

我敢肯定,对斯大林(其实对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及其他许多人也是一样)影响最大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命运的安排使沙波什尼科夫本人没能亲自直接参加取得几次重大胜利(莫斯科会战除外),没能直接参加1943至1945年的几次进攻战役,没有活到期待已久的、历尽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伟大胜利的一天。但是,他对苏联军事战略领导层的精神影响是肯定的。在四本论述战略和军事学术的军事历史书籍中,斯大林标出了理论家和统帅沙波什尼科夫的杰出著作,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高度的军事素养、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指挥经验、高深的理论造诣和个人的巨大魅力在这位元帅和教授身上难得地结合在一起。斯大林个性很强,常常凭借武断的作风来压服一切同他打交道的人。但是,斯大林在真正了解了沙波什尼科夫之后,很快感到同这位元帅的渊博学识和逻辑思维能力相比,同他的耐心说服别人的能力相比,自己在军事方面"才疏学浅"。沙波什尼科夫不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但是,精明的、灵活的和思路广阔的头脑弥补了这一点。斯大林那凶狠的、不妥协的性格不知何故在旧的俄国军事学派的理智、毅力和修养面前折服了。斯大林对沙波什尼科夫持特殊态度是大家都了解的。朱可夫曾经多次听到最高统帅的严厉的、而且往往是无道理的责难,关于斯大林他写道:"他很尊重苏联元帅波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他只称呼他的名字和父名,同他谈话时从来不提高嗓门,甚至不同意他的报告时也是如此。沙波什尼科夫是斯大林惟一允许在他的办公室吸

烟的人。"[51]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信任军事专家的事例。其他一切军事专家早在战前就被斯大林差不多都消灭了。

沙波什尼科夫是训练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帮助斯大林懂得了积聚、调动和使用这些预备队的艺术。我记得，当沙波什尼科夫由于健康原因调离总参谋部、到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任院长时，斯大林经常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会议。沙波什尼科夫大概是斯大林不羞于向之请求解释问题、向之求教和求助的极少数人士之一。这位独裁者有个"弱点"：倾听他认为是才智出众的人的声音。尽管沙波什尼科夫对斯大林的精神影响是局部的、不充分的，但这种影响毕竟存在。斯大林周围的政治家几乎是"随声附和"和"猜测领导意图"之辈，他在他们当中显得很突出，但他却意外地遇到一位以其渊博学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沙波什尼科夫看到斯大林在军事问题上专业知识不足，这在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尤为明显，于是他一方面不触犯最高统帅的尊严，一方面则策略地、同时又坚持不懈地建议采取这些或那些措施。例如，在1941年，德国军队通常在部队和兵团的接合部突破防御。这是经常发生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沙波什尼科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件事，说明了问题之所在，等斯大林搞清这个问题以后，便给他呈上大本营给各方向总司令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第98号训令。训令中谈道：

> 兵团(部队)司令员和指挥员们忘记了，接合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军队战斗队形中最薄弱的地方。敌人不必特别费力，而且往往使用少量兵力便能突破我方部队的接合部，造成防御战斗队形中的翼侧，敌方派出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进入突破口并使我军战斗队形中的部队受到合围的威胁，使它们处境艰难……

训令接着提出了一些任务来保证接合部的防御和构成"绵密火力拦阻地带，办法就是组织在正面作战的部队和配置在纵深的部队的交叉火力……"[52]。

斯大林表示同意，但责成沙波什尼科夫签署训令。

斯大林发现，沙波什尼科夫遵循高尚的道德原则。他了解，沙波什尼科夫通常把同他交谈的人称作"亲爱的"。斯大林自己看得出来这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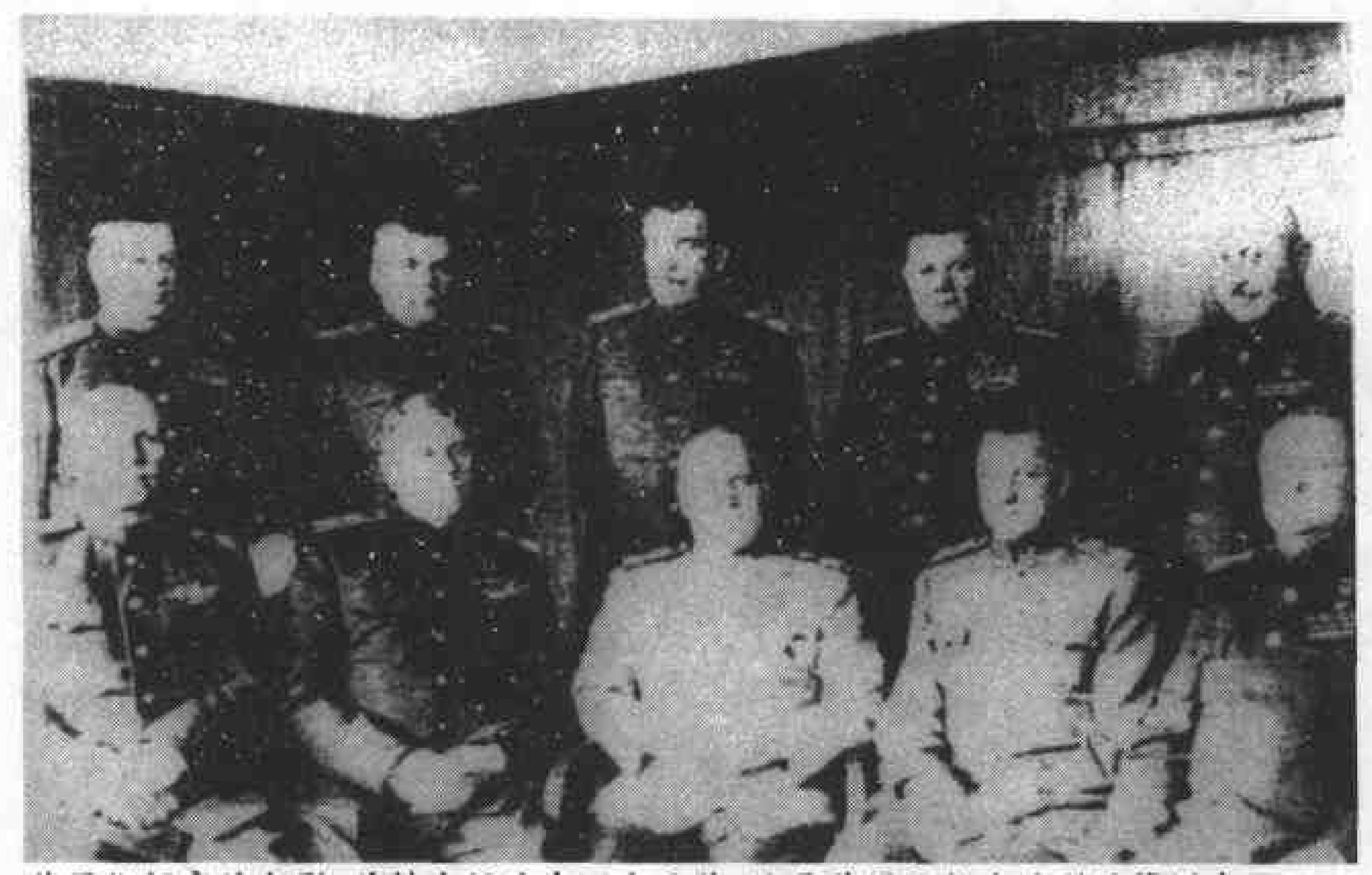
们大家今天都了解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歼灭德军、在解救列宁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其他数十个战争"篇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很明显,随着朱可夫的名气愈来愈大,特别是在战争末期,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愈益慎重。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在柏林会战中需要协调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斯大林没有把这项任务正式交给朱可夫,面是留给自己,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这位元帅被派去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最高统帅想到了未来,想到了历史,他不想同任何人共度战争的胜利结局,共同登上胜利的顶峰。

斯大林懂得,就坚定果断的性格来说,朱可夫并不比他这位最高统帅差。在战争初期的多次作战行动中,他对他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体会颇深。例如,1941年9月初,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向他请示是否可以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上布雷并在列宁格勒有失陷的危险时把军舰炸沉。斯大林表示同意。9月8日,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已经签署了有关决定。

就在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关头,朱可夫受斯大林全权委托从莫斯科飞抵列宁格勒。"这是我的委任状,"新任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一面递交最高统帅的信一面说,"我禁止炸毁军舰。军舰有40个弹药基数!"

朱可夫在1950年回忆这事说:"一般地说怎么可以在军舰上布雷呢?不错,军舰可能被毁。但是,军舰被毁只应当在战斗中、在交火中被击毁。而且当德寇随后在战线濒海地段进攻时,水兵们就曾从军舰上狠揍他们,揍得他们狼狈逃窜。那还用说!16英寸口径的火炮嘛!可以想见那是何等巨大的力量!"[59]

斯大林从日丹诺夫那里了解到,朱可夫撤销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而实际上是撤销了他这位最高统帅的号令。斯大林对日丹诺夫的汇报就没有作任何评论,因为他不能不肯定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的胆识和远见,并暗示就按朱可夫的决定去做。斯大林知道,在危急关头,朱可夫是非常严厉和不作妥协的。最高统帅对此表示赞赏,感到高兴。朱可夫同懦夫和张皇失措的人作无情的斗争,如果情况需要,能采取断然措施。例如,在同一个1941年9月,在列宁格勒防御的危急关头,朱可夫大将口授了0064号命令,命令中说:"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下令告知防守指定地区的全体指挥人员、政工人员和士兵,在没有



苏军指挥官的合影，前排中间为朱可夫元帅，他是苏军无数次胜利的策划者

如果说沙波什尼科夫帮助斯大林了解武装斗争的严密的逻辑、在防御和进攻中部队成梯次配置的意义、战略预备队在战役中的作用和地位，那么，**朱可夫**这位伟大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统帅对最高统帅的影响则是在其他方面。斯大林认为，朱可夫不仅是天才的统帅、坚决贯彻大本营决心的人，而且在他看来，在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和不作妥协方面同他也有相似之处。叶皮谢夫有一次同我交谈时恰好也谈了这种看法。

从国内战争时期起，斯大林就迷信高级权力机关向各方面军派代表的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他才经常向方面军派出大本营的代表。斯大林认为，朱可夫是他的主要代表(后来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最高统帅看来，朱可夫能够不顾一切地贯彻斯大林的决心，能够采取严厉的、有时是激烈的措施，毫不妥协。叶皮谢夫最后说，他认为朱可夫最符合斯大林的现代统帅概念。叶皮谢夫稍作停顿后补充说：当然，这一切条件看来朱可夫都具备。然而斯大林充分肯定的只是这位统帅的魄力，而对他的聪明才智，唉！那就肯定得不够了。

这一看法，从这位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过去的经历——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布拉格战役这一段战争经历——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我

们大家今天都了解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歼灭德军、在解救列宁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其他数十个战争"篇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很明显,随着朱可夫的名气愈来愈大,特别是在战争末期,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愈益慎重。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在柏林会战中需要协调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斯大林没有把这项任务正式交给朱可夫,而是留给自己,这不是偶然的事情。面这位元帅被派去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最高统帅想到了未来,想到了历史,他不想同任何人共度战争的胜利结局,共同登上胜利的顶峰。

斯大林懂得,就坚定果断的性格来说,朱可夫并不比他这位最高统帅差。在战争初期的多次作战行动中,他对他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体会颇深。例如,1941年9月初,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向他请示是否可以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上布雷并在列宁格勒有失陷的危险时把军舰炸沉。斯大林表示同意。9月8日,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已经签署了有关决定。

就在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关头,朱可夫受斯大林全权委托从莫斯科飞抵列宁格勒。"这是我的委任状,"新任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一面递交最高统帅的信一面说,"我禁止炸毁军舰。军舰有40个弹药基数!"

朱可夫在1950年回忆这事说:"一般地说怎么可以在军舰上布雷呢?不错,军舰可能被毁。但是,军舰被毁只应当在战斗中、在交火中被击毁。而且当德寇随后在战线濒海地段进攻时,水兵们就曾从军舰上狠揍他们,揍得他们狼狈逃窜。那还用说!16英寸口径的火炮嘛!可以想见那是何等巨大的力量!"[53]

斯大林从日丹诺夫那里了解到,朱可夫撤销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而实际上是撤销了他这位最高统帅的号令。斯大林对日丹诺夫的汇报就没有作任何评论,因为他不能不肯定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的胆识和远见,并暗示就按朱可夫的决定去做。斯大林知道,在危急关头,朱可夫是非常严厉和不作妥协的。最高统帅对此表示赞赏,感到高兴。朱可夫同懦夫和张皇失措的人作无情的斗争,如果情况需要,能采取断然措施。例如,在同一个1941年9月,在列宁格勒防御的危急关头,朱可夫大将口授了0064号命令,命令中说:"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下令告知防守指定地区的全体指挥人员、政工人员和士兵,在没有

接到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书面命令的情况下放弃指定地区的一切指挥员、政工人员和战士立即处以枪决。

“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听完本命令的传达后要签名，对士兵要广泛进行宣讲。”[55]

朱可夫签字以后，便让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其他委员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和霍津签字。为了做到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也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当然这不会受到所有的人的欢迎，特别是那些受到处理的人如被撤职的人、受法庭审理的人、降低军衔的人的欢迎。西蒙诺夫在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写道，在讨论参加斯大林奖金评选的卡扎凯维奇的小说《奥得河上的春天》时，斯大林指出：“书中并未真实地描述一切：书中写了罗科索夫斯基，写了科涅夫，然而，在奥得河行动的主要方面军是由朱可夫指挥的。朱可夫是有缺点的，他的某些特点前线的人们不喜欢，但是，应该说明，在作战方面他比科涅夫强，也不比罗科索夫斯基差……”[56]

斯大林不仅在战后，而且在战争过程中，特别在战争初期，不止一次地对朱可夫采取严厉的和不公正的态度。1941年7月，维亚济马地区形势危急，朱可夫建议在叶利尼亚地区实施反突击，以防德军窜到西方方面军后方。斯大林没等听完朱可夫的报告便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搞什么反突击，胡说八道；我军连如何正确地组织防御都不会，而您却建议反突击……”

“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我请求免去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去，在前线我比在这里更有用……”朱可夫回答说。

当时在场的梅赫利斯插话说：

“谁给您权利这样同斯大林同志谈话？”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任命朱可夫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尽管贝利亚和梅赫利斯想方设法在最高统帅面前损坏他的声誉，但是斯大林没有这位杰出的统帅是不行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朱可夫对斯大林来说是一根“救命棒”。当苏军统帅部指挥不当，使得敌“中央”集团军群能在1941年10月初突破防御、合围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相当大一部分部队的时候，斯大林派朱可夫去扭转危局。朱可夫回忆说，



朱可夫元帅正在布署战局，周围的苏联将帅有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什捷缅科、科涅夫、布琼尼等

斯大林指着地图痛苦地说：

“您看，科涅夫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德国人再有3至4天便能接近莫斯科。更糟的是，不论是科涅夫还是布琼尼都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在哪里，敌人在干什么。要审判科涅夫。明天我要派出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

由于采取了非常措施，朱可夫得以稳定形势。由于朱可夫，科涅夫也没有上军事法庭。朱可夫救他的办法是，让他随同自己担任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斯大林很快就明白了，不仅是朱可夫的信心、坚决和果断能使战斗行动的组织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位统帅亲临前线不知为什么很快就被部队所知晓，从而鼓舞了士气。下面是朱可夫过去的副官米纽克将军对朱可夫在别尔哥罗德的活动的回忆，当时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领导(戈利科夫和赫鲁晓夫)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他回忆道：“在令人担忧的危急时刻，朱可夫实际是亲自负起了指挥这些部队的责任。令人惊讶的是，谁也看不出朱可夫有张皇失措的表现。恰恰相反，在那一切看起来都完蛋了，大塌地陷了，因而可能陷人绝望的时刻，他却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坚决果断。危险压不倒他，反而使他更坚强，他就像压紧的弹簧，就像一只准备同暴风雨搏击的雄鹰。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发现朱可夫习惯用拳头顶紧下颏……”

最高统帅不能不感到，在朱可夫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当代型的统帅：思维灵活大胆，处理问题非常果断，在指挥人员、政工人员和士兵中很有精神魅力。

斯大林没有他“所宠爱的人”。他只不过对一些人依靠得多些，对另一些人依靠得少些。他在决定某一将领的命运时不考虑什么道义因素——熟人，老交情，过去的功劳。可能除贝利亚以外，周围一班人对他“所进的谗言”也并不总是能起作用。大家知道，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在战后曾制造了整朱可夫的案件。他们甚至利用他的像册(其中有朱可夫同美国、英国、法国将领和政治家的合影)，窃听他的电话，查阅他的个人档案，拆看信件。大元帅于1946年6月9日签署的命令中曾提到一位高级将领，说他曾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谈到“朱可夫元帅在对待政府和最高统帅方面有过不正当的和有害的行为”。说什么朱可夫失掉了谦虚的作风，“把一些重大胜利中主要成果的取得归功于自己”，把不满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57]但是独裁者没下决心惩治这位著名

统帅。斯大林虽然极好猜疑，但他的清醒的头脑足以使他控制自己。大概当时已经在准备逮捕朱可夫。斯大林曾经召集一次专门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一些高级将领外还有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其他国务活动家，会上根据被捕将领的一系列证词指责朱可夫“以主要胜利者自居”。有些将领如雷巴尔科为朱可夫说情，于是斯大林动摇了。他决定不实施准备中的逮捕，而是派他到远离中央的军区去，一开始派到敖德萨军区，后来又派到乌拉尔军区。当时最后的决定是由斯大林本人、而不是由其他任何人作出的。


斯大林次子瓦西里，二次大战中服役于苏联空军

有时听人说斯大林很严厉，但却是公正的。有一位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我谈话时谈到最高统帅的小儿子的命运；他说，斯大林不惜撤了他儿子的职。不错，是撤了职，但这样做是因为瓦西里·斯大林与其说是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不如说是败坏了父亲的声誉。斯大林不仅在战后撤过儿子的职，在战争期间也这样做过。1943年5月，贝利亚把当时担任航空兵团团长的瓦西里重新酗酒的丑闻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盛怒之下立即口授了如下的命令：

致红军空军司令员

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同志

我命令：

1.立即撤销上校瓦·约·斯大林航空兵团团长职务，在没有接到我的号令前不得让他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2.向该团和原团长上校斯大林宣布，撤销上校斯大林团长职

务的原因是他纵酒狂欢并败坏该团的风气。

3.报告执行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26日[58]

斯大林非常生气，以致口述时没有发现在一句话中竟说了四次“团”字、两次“上校”这个词……但是，一些关心的人在象征性的“撤职”后不久便报告说，瓦·约·斯大林“认识了错误”并准备“担任指挥职务”。斯大林的儿子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担任团长职务，1943年底已升任空军师长职务了……所以，所谓最高统帅办事公正，在这里恐怕谈不上，因为他更担心的是个人的声誉。

斯大林在决定干部问题时通常是不讲情面的，是说一不二的。当然，他也能改变决定，但通常是推迟一段时间，而且没有来自别人的明显影响。他作任何决定照例都不说明原因。我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是想让周围一班人、国防委员会成员和大本营成员知道，他在作出任命决定时完全从事业的利益出发，同时考虑一个人的能力和行为。例如，当遇到把彻底歼灭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敌人集团的任务交给谁这个问题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最后，斯大林本人对人选的态度决定了一切。贝利亚建议让叶廖缅科继续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认为罗科索夫斯基更合适。据朱可夫回忆，斯大林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归纳如下：

“我认为叶廖缅科不如罗科索夫斯基。部队不喜欢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威信更高。叶廖缅科在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时表现很差。他不谦虚，爱说大话。”

“这样的决定会使叶廖缅科感到太委屈。”朱可夫提出异议。

“我们不是贵族子弟中学的学生。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应该让当之无愧的人来主持工作……”[59]

斯大林曾经免除朱可夫、科涅夫、叶廖缅科、铁木辛哥、霍津、科兹洛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巴格拉米扬、戈利科夫以及其他许多将领的职务。不能说他毫无道理。免除一些军事将领的职务往往是由于非这样做不可。但是，最高统帅也经常在一些场合证实他们的一些失策、疏忽、失利是偶然发生的。然而斯大林在这样做的时候又念念不忘他

们过去的过失；例如在谈到斯大林格勒的事情时就没忘记叶廖缅科在布良斯克的失利。

斯大林知道，朱可夫为了尽力执行命令是敢于采取极端措施的。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和建议，决定于1942年夏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目的是巩固列宁格勒和尔热夫苏军的态势。战役开始了。朱可夫当时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罗科索夫斯基
(1896–1968)

苏联元帅、军事家

1896年6月13日出生于大卢基市。1914年入俄军服役，参加过一战。1918年参加苏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49年10月应邀出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获波兰元帅衔。1956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后兼总监察长)、军区司令、国防部总监组总监。两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获列宁勋章7枚。

在第3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突破德军防线期间，他下达了一项命令，为这项命令事后他会感到不光彩，甚至连回忆也不想回忆。朱可夫在给斯大林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曾详细汇报了这次战役的进程和结果，现在我从他的报告中摘引一段：

> 为了防止个别分队行动落后并同胆小鬼和张皇失措分子作斗争，在第一梯队发起冲击的每个营后面都有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专门指定的指挥员搭乘坦克进行监视。
>
> 由于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第3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部队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防御。
>
> 朱可夫
>
> 布尔加宁
>
> 1942年8月7日[⑩]

朱可夫是莫斯科防御战和歼灭首都接近地上的法西斯军队的主要人物。历史的公正性要求，保卫祖国首都的这个人应直接参加攻占敌人首都的战役。斯大林来了个王车易位，调换了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工作岗位：朱可

夫成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而罗科索夫斯基成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几乎牢牢记着大本营给他的命令，那上面规定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要攻占柏林：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准备并实施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为目的的进攻战役，最迟于战役开始后第12至15天到达易北河。

2.使用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从屈斯特林以西的奥得河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向突破地段调用5至6个突破炮兵师，使突破地段每公里火炮密度达到：76毫米以上火炮不少于250门。

3.为了保障方面军的主要集团，每个突击从北、南两面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使用2个集团军的兵力……

8.战役开始时间根据您本人得到的指示确定。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5年4月2日　第11059号[60]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战役的进程，这次战役之后，他就戴上了胜利者的桂冠。他几乎没有干预作战问题，而把它交给朱可夫和安东诺夫处理。但是早晨和晚上的报告是从汇报柏林战役准备情况开始的，后来就汇报战役进程了。朱可夫汇报说，德国人实际上在西部已停止抵抗，而在东部则进行激烈的逐尾战。斯大林按照自己的特性作出反应，以严厉的、不妥协的、坚决的口气给朱可夫发了一份电报：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

您的密码电报已收到，电报中陈述了一个德国俘虏的供词，说是不在俄国人面前退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美国军队接近德军后方也要这样做。别去理会德国俘虏的供词。希特勒在柏林地区设圈套，想让俄国人和盟国发生分歧。要用苏军攻占柏


苏联红军的火箭枪划破了黎明前黑暗的夜空，开始了最后的攻克柏林的战斗

林的办法打破这种圈套。毫不留情地打击德国人并很快到达柏林。

约·斯大林
1945年4月17日17时50分[@]

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柏林的交战。他最感兴趣的是如何俘获希特勒的问题。为了取得完全的胜利，现在对他来说他只有一点没有做到，那就是活捉法西斯的元首并送交国际法庭审判。尽管朱可夫汇报说在帝国国会大厦、在帝国总理府接近地区正在进行战斗，但想要听到的消息还没有报上来。5月2日晚终于收到以下密码电报：

斯大林同志：

现报上柏林城防司令魏德灵将军关于德军在柏林停止抵抗的命令抄件。

朱可夫
1945年5月2日

命　令

1945年4月30日元首自杀身亡。我们曾经宣誓效忠元首，但他

离开了我们……根据同苏军最高指挥部的协商,我要求立即停止作战。

炮兵将军、柏林城防司令
魏德灵[8]

斯大林把电报推到旁边,心想,这个坏蛋得逞了。他不知怎的想起了莫洛托夫曾谈到战前同希特勒的会见,想起了希特勒曾狂热地相信他会打败英国人……而在当时元首已经想到要给苏联以致命的打击。他逃避了惩罚……

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早就对会战结局充满信心并更多地考虑战后事务的斯大林愈来愈多地委托安东诺夫以他的名义和以大本营的名义签署作战文书。但是当难忘的胜利的日子到来而外交愈来愈彻底地取代作战的时候,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决定赋予朱可夫全权签署一份最主要的战争文书。如果说许多文书最后他都是间接地、通过电话批准的,那么下面这份电报却是他叫安东诺夫带到他这里来的。电文言简意赅,但是在档案馆读原件时你会潜意识地感到,在这几行电文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在电文中有一种已成为过去的悲剧的哲学,也有一种将要体验到的胜利的哲学:

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
格·康·朱可夫: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授权您签署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

最高统帅、苏联元帅 **约·斯大林**
红军总参谋长、大将 **安东诺夫**
1945年5月7日　第11083号[9]

斯大林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的动作就好像是他本人而不是朱可夫再过屈指可数的若干小时后签署等待已久的投降书一样。斯大林签署电报之后站了起来,突然紧紧握住安东诺夫的手。

查阅一下保存在军事档案馆的斯大林谈到朱可夫的大量文献,如他们之间经由直通电话交谈的记录、各种电报和信件,就会得出结论:最高统帅对他的评价高于对其他任何一位苏联元帅的评价。三次荣获

苏联英雄称号(第四次荣获这一称号是在1956年),荣获两枚“胜利”最高军功勋章,荣获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编号第一)——这一切就是对这位元帅最好的评语。当然,尽管朱可夫为人民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当时能够批准这些奖赏的只有斯大林“自己”。然而,斯大林早在1944年便感到,最好是把朱可夫的荣誉限定在“天才统帅之一”的范围内。当这位统帅的荣誉超越苏联国界时,斯大林便认定他的荣誉已经使自己相形见绌了。

例如,朱可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于1945年6月9日在柏林举行的苏联和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便使斯大林感到极不愉快。这位苏联元帅长时间地回答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详细地谈了柏林战役的准备和进行情况、同盟国的合作、红军复员的期限、如何处理战犯,谈了德国士兵优于日本士兵的看法,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关于斯大林却一句没谈!真是一句没谈!只是到招待会快结束时,《泰晤士报》记者帕克向朱可夫提出如下问题才“搭救了”他:

“斯大林元帅是否经常地积极地参与您指挥的战役?”

“斯大林元帅积极地、经常地领导苏德战场上的一切地段,其中也包括我所在的地段。”朱可夫简短地回答说。

斯大林把朱可夫的最后一句话读了几遍,对自己的副手“忘恩负义”感到很不愉快。关于这位元帅后来的命运,斯大林可能在那时已经考虑成熟了。战后不久,朱可夫便被派去担任二级军区的司令员,时间将近七年。在侮辱正直的人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巧和经验的情况下,制造一个案件说你“自高自大,搞波拿巴主义”,这并不复杂。然而朱可夫这位世界大战期间最富天才的统帅不可能知道,这次失宠贬官并不是最后一次。人们早就发现,这些坦诚、忠实和直率的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

华西列夫斯基这位伟大的

苏联统帅是在斯大林和各方面军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将领之一。战争爆发时，华西列夫斯基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1941年8月1日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42年6月至1945年2月任总参谋长，同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华西列夫斯基当了一段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后来任远东苏军总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通过他在总参谋部的工作，反映了斯大林在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的独特的工作作风。华西列夫斯基大部分时间是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在前线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小部分时间在莫斯科，直接处理总参谋部的事务。其实，斯大林通常的做法是：在进行最重要战役的准备工作时，以及前线出现危急形势时，就一定派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前往。有时，例如像斯大林格勒那一次，就派二人同时前去。到1942年12月，应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安东诺夫为后备人选。于是安东诺夫就出任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后又出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在那以前，华西列夫斯基主要都在领导大本营主要作战部门的工作。换句话说，华西列夫斯基是一位全面的统帅和将领。他既具有司令员的才干，又具有参谋人员的素养。斯大林看到，不论在防御战斗的危急形势下和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时，不论在制定战略计划和担任大本营的代表或方面军司令员时，华西列夫斯基都同样能够充满信心地进行工作。

有一次斯大林问华西列夫斯基：

“您是否从教会教育中学到一些东西？您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华西列夫斯基被这个问题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找到办法并明智地回答说：

“没有用处的知识是没有的……知识在军事生涯中总是用得着的……”

斯大林好奇地看着华西列夫斯基（当时他的情绪不错，不久前刚解放了明斯克），并且用与华西列夫斯基相同的腔调补充说：

“牧师能够教会人们的主要东西就是理解人……”接着，斯大林把话题一转，他说，元帅需要把波罗的海沿岸第2和第1方面军以及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行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过去，曾把类似的职责交给朱可夫——领导白俄罗斯第2和第1方面军以及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

战役。这不是总指挥所,但同时斯大林通过这种办法在大本营指挥各方面军的活动方面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这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创新。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从中看到最高统帅在战略运用上日渐成熟。

斯大林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一个公文夹回到他常呆的工作位置——一条长会议桌的一端。在战争年代,他实际上不坐在写字台前。这是因为斯大林一天要召开5至7次会议,如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大本营的会议,同各人民委员部、党中央委员、游击运动司令部工作人员、情报部门领导人、设计师等等开的会议。与会者坐在长桌的两旁。往往是一个会议刚刚结束,波斯克列贝舍夫便把另一批同志让进来。只是到1944年和1945年，大家都清楚歼灭占领者只是时间问题了,“传送带”才开始放慢运转速度。战前,除密码电报以外,斯大林每天可以读完5至6本书,篇幅达400至500页,而现在阅读的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件的页数不低于以上数字。这位待人冷漠、目光狠毒的人,工作能力是惊人的。这一点,华西列夫斯基也曾多次提起。

斯大林一直依赖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实际上没有离开过前线,他不用特别费劲和不必采取紧急措施便能达到预期的或良好的效果。这位元帅很少提反对意见,不像朱可夫那样固执,当然,他同最高统帅讨论作战问题时，善于委婉地然而坚持不懈地贯彻自己的主张。很难说清他在战争期间飞行了多少千公里,他总是根据斯大林的委托在各个方面军之间奔忙,只用几天回莫斯科汇报工作和接受新指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个别情况以外,实际上斯大林每天都通过电话同华西列夫斯基交谈。关于这一点,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42年春起以及在战争的后来一段时间里,只是在斯大林于1943年8月初前去会见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的日子里,以及他到德黑兰出席三国首脑会议的日子里(1943年11月末至12月2日),我才没有同他通过电话交谈。”[6]除了作战需要以外,斯大林经常要同华西列夫斯基商量问题，听取他那像论文一样的不紧不慢的、言简意赅的报告。

尽管到1945年2月为止,华西列夫斯基继续留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战争后半期基本上是同安东诺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翻阅一下大本营的档案资料,你就会注意到,从1943年底开始,大部分训令性文



安东诺夫(1896-1962),苏军大将,卫国战争中曾任第一副总参谋长

件都是斯大林同安东诺夫共同签署的,或者是安东诺夫一个人以大本营的名义签署的。

斯大林按照自己的习惯做法,长时间地观察了这位将军。这位天才的参谋,素养很高的人,很快便使最高统帅产生好感并赢得他的信任。

斯大林不喜欢经常更换身边的工作人员。1938年,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以"帮助亲属进行间谍活动"罪被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听从贝利亚一再坚持的撤换第一助手的建议。像他这样年龄的人要习惯新调来的工作人员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在这时,每天都要向他汇报前线的情况。当华西列夫斯基去部队视察时,他甚至习惯于听取分管政治业务而在作战问题上并不见长的副总参谋长博科夫向他汇报。1943年3月底的一天,他终于命令安东诺夫第一次向他汇报。汇报是简短的,但却是认真的。斯大林没有表示"试验"结果良好。冷冰冰地告了别。然而两三个月以后,由于最高统帅经常同这位麻利的、聪明的、言语不多的、看上去年轻的将军打交道,安东诺夫成了斯大林最亲密的军事助手之一。

安东诺夫被准许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并且每昼夜到他那里去两三次以后,很可能他注意到,最高统帅除了对任何一次战役都要缩短准备时间,总是要求抓紧进行,总是要求我军推进的速度要更快些、推进的范围要更广些、推进的纵深要更大些以外,极少提出什么新思想和新建议。细心的安东诺夫可能会发现,最高统帅的某些习惯似乎是在搞形式。例如,斯大林在听取安东诺夫的汇报时(有时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也在场),常常让他暂停一下,摇铃叫波斯克列贝舍夫,后者送来一杯茶。大家默不作声地看着最高统帅下一步一本正经的动

作:不慌不忙地往杯子里挤柠檬汁,然后走向写字台后面的休息室,打开同墙壁无法区别的一扇门,拿出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在大家默不作声的情况下,斯大林往茶杯里加一两勺白兰地,再把酒瓶放回酒柜,然后坐到桌子跟前,一面用勺子在茶杯中搅动,一面说道:

"请继续……"

就连这样一杯普普通通的茶也很少向在座的人让一让,它成了某种形式,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奥的"、看来只有斯大林本人才理解的含义。

安东诺夫懂得,由于他常年累月代理总参谋长,后来才正式担任这一职务,他的处境比他的前任要好。战争的最可怕、最难演的几场戏都在它的第一幕。在他来到总参谋部的时候,大本营已经形成了一种昼夜工作的制度,积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但是,由于安东诺夫是一位苛求细节(从好的意义上说)的人,他在整顿总参谋部工作方面所作的建树大概比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多。他规定了整理情报资料的明确期限,规定了侦察部门、后勤部门、各方面军和预备队部队的代表汇报的时间。他给几位副总参谋长格雷兹洛夫、洛莫夫、什捷缅科作了明确的分工。为了使总参谋部和大本营的工作在组织方面所作的改进搞得扎实,安东诺夫把个人的意见整理成三页,并决定上报最高统帅。其中规定了向最高统帅汇报情况的时间(每昼夜三次)——主要用电话汇报;总结报告报斯大林本人,指令性文件起草和批准的程序,同各指挥机关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规定。在一次夜间作完一昼夜的总结报告之后,安东诺夫请求斯大林审阅和批准大本营与总参谋部的工作条例,斯大林惊讶地默默地看着这位将军,然后聚精会神地读了文件,没说一句话便写上:"同意。**约·斯大林**。"在这同时他心想,看来这位安东诺夫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他使最高统帅本人不仅对别人的工作、而且对自己的工作都规定了条例。

原来斯大林可以在他认为方便的任何时候叫人向他作汇报。现在他自己也努力遵守规定的制度。安东诺夫设法做到了把总参谋部的两大职能——第一,为最高统帅服务,为他下决心提供所需的情报;第二,草拟指示和对各方面军的作战活动进行业务领导——同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的工作协调起来[66]。

安东诺夫这位天才的高级参谋对斯大林的影响或许并不亚于沙

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问题在于,他那很高的做参谋工作的素养、很强的组织性、对问题不论大小都考虑得很周密的特点给斯大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斯大林身边有了一位得力的工作人员,他负责把一切东西"按格子"摆好,并且做得那样出色,而主要的是很见效果。

安东诺夫的军衔晋升是相当快的。1942年他到总参谋部时是中将,1943年4月晋升上将,同年晋升为大将。但安东诺夫始终没有成为苏联元帅,尽管最高统帅对他抱有好感。贝利亚干预了这件事。这个恶人在高级军事领导层中的势力并不十分强大。贝利亚很想在战略领导层的军人中有自己的人。今天我们都知道,苏联高级将领对贝利亚一直持冷静的戒备态度,内心中对这个带小圆眼镜的人极不信任。虽然贝利亚一直想方设法把高级军事干部拉到自己方面来,值得赞扬的是没有让他的企图得逞。后来逮捕、审判和处决贝利亚的恰恰是军人,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对这个吸血鬼的态度。

贝利亚是一个非常令人厌恶的人。人们都怕他。谁也不可能对他产生好感。谁也不可能!但是贝利亚需要军队的支持。他看到"领袖"很快见老,并且早在战争末期他本来可以搞一个野心勃勃的沽名钓誉的计划,这项计划在民主只是假象的体制下没有军队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贝利亚试图同安东诺夫建立特殊关系,但却什么结果也没有。这位将军冷漠而矜持。于是贝利亚使用惯用的手法,开始逐渐败坏安东诺夫的声誉。尽管斯大林在内心深处看来不太相信这个魔鬼的谗言,然而他没有授予安东诺夫这位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元帅军衔,虽然计划在胜利时这样做。不仅如此,"领袖"于1946年再次让安东诺夫担任第一副总参谋长职务,1948年又把他"降"到更低的职位,任命他为外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总的说来,安东诺夫在我国的历史著作(在文艺作品中也是如此)中是位运气不佳的人。在为祖国建立了特殊功勋的将领的长长名单中几乎见不到他的名字。他既没有当上元帅,又没有成为英雄。然而这对历史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倒是这位天才人物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是一位模范士兵和具有很强思维能力和敏锐感觉的军界知识分子。早在战后,安东诺夫承认,他曾幻想有一天能听听他喜欢的音乐唱片——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或者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交响曲。

战争期间，唱片蒙上一层尘灰，然而心中却回荡着那些旋律。

战争过去了，斯大林坐着凯旋车，像恺撒一样登上光荣的卡皮托利丘。但是，如果说神奇的恺撒长期绞尽脑汁，考虑怎样感谢自己忠诚的军团士兵，那么斯大林对那些比其他人更多地提醒他注意每个人在伟大胜利中所起的真正作用的人却渐渐疏远起来。在战争后两年同最高统帅并列签署文件最多的人，惟一的大将，"胜利"最高勋章的获得者，终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充分肯定。最高统帅已经忘记，在1944至1945年，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在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上为他制定并提供了非常出色的思想和战略设想，以至他不必再去作什么探索，而多半只需要同意，仅仅作某些局部性的细小修改就行了。

斯大林已经忘记，他出任最高统帅时，对军事学术的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斯大林首先是借助于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报告、汇报和对这种或那种具体情况的解说，才逐步理解了军事学术的几个组成部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之间的密切关系的。

战争结束了。斯大林看重的首先是它的结局。关于胜利的代价，他只喜欢作为法西斯暴行的陪衬来谈。关于个人的失误一次也没有谈过。原来就有数不清的称号——"伟大领袖"、"英明导师"、"无与伦比的领导人"、"天才的战略家"，现在又加了一个"最伟大的统帅"。正因为如此，在给这个人一笔一笔地画像时，我要触及一下斯大林的战略思维。

是一个战略家的思维吗?

我想，有些人一看到这里打的问号立即就会表示反对，或者甚至表示愤慨。要知道，被怀疑的是数十年来一直没有受到怀疑的问题。为了证明作者的"无稽之谈"，马上就可以引证我国杰出统帅们与之相反的数十条意见来。而且这些意见按照本身的解释大概都是正确的。我再次着重指出，在杰出的苏军统帅们撰写回忆录的时代，他们只能说

准许说的话。对最高统帅的一切否定的、批评的意见都被看作是"诬蔑"。我曾经在苏军总政治部工作近20年。有一段时间,总政治部出版处曾经根据苏斯洛夫和他那个部门的重要指示审查了全部回忆录。我曾经同那些在50年代、60年代和后来审阅将领们回忆录的人谈过话。手稿在高级机关长期"兜圈子",所以作者们都清楚,什么内容可以写,什么内容不能写。首先是由于这种过滤,书中就没有出现会给我国历史"抹黑"的事实、结论、事件、统计数字、观察、思考和评价。于是历史看起来就尽如人意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追究具体的责任者,而在于懂得:著作界形成了一种依据某些条条和框框办事的制度,对任何作品都用一个尺度去衡量。不论是报刊保密检查总局还是为数众多的评论家,都不能不考虑一整套思想工作从片面看待过去的原则出发时所提出的要求。

我知道,许多将领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部编入他们的回忆录。他们撰写回忆录时常常受到外界的影响,就想方设法在书中提到那些有权势的人物,那些在战争年代往往用高倍放大镜也看不出他们的作用的人物。我就知道一些看风使舵的人怎样卖力地寻找勃列日涅夫战前服役的部队,寻找契尔年科有一次押送一列车给前线的礼品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前往的那个车站……许多好的著作"杂草丛生",因为不得不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语录,还要寻找借口为他表功。当然,像下面这样的"滑稽节目"不可能进入任何一本书。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团级政治干部、宣讲员西尼扬斯基曾于1942年8月前往第18集团军检查第227号命令的执行过程,他在给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希金的报告中写道:政治部工作人员叶梅利亚诺夫、勃列日涅夫、雷巴宁、巴希洛夫"不能保证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在情绪上和行动上(在工作上和生活上)能有相当的好转……据团级政治干部克鲁季科夫同志和正营级政治干部莫斯克温同志说,其他工作人员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无所用心,安于现状,随随便便,互相包庇,纵饮无度,如此等等"[67]。我不能肯定团级政治干部西尼扬斯基的话(报告中还谈到其他"不良行为")句句属实。我只是想强调指出,对勃列日涅夫的任何批评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时都被错误的看法所俘虏。人们往往不得不作出抉择:要么书中的一切都按"要求"去写,要么就不出版。还有,我不想得罪任何

人，但我要指出，统帅们的回忆录大多是由“文学加工家”写成的，这些人对作者本人的体验往往很不熟悉。不错，他们是在利用回忆录作者的口述资料，但归根到底是他们而不是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作者个人的体验没有了，削弱了，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巴格拉米扬谈到军事回忆录时说得好：“这些回忆录写得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给你代笔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上校。”通过“中间人”写作（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做法从来都意味着要失去一些别人无法感受到的、真正属于作者本人的体验……



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我写《是一个战略家的思维吗？》，只是想公正地看一看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领导我国人民和军队的那个人的战略思维的特点。我马上就要指出：谈到思维，在个别领域，斯大林比苏联的许多统帅具有某些优势，但也有些领域，直到战争结束他都始终没能摆脱肤浅、片面、不内行和墨守陈规的缺点。让我们还是按顺序来谈吧。

我认为，斯大林不是名副其实的统帅。所谓统帅，就是军事家。是不是统帅，与其说看担任的职务，不如说看他有没有天才、创造性思维、深远的战略眼光、作战经验和专业知识、丰富的直觉和坚强的意志。斯大林远远没有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他是一个严厉的、有魄力的、目的性强的、贪权的政治领导人，由于历史情况所使然，他才不得不干军事工作。作为一个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长处是由他的绝对权力预先决定的。但是并非仅仅这一点使他凌驾于其他军事家之上。同其他统

帅相比,他的优势在于他比他们更深刻地看到(由于他是国家的领袖)武装斗争要受制于一系列其他的、"非军事"的因素: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政治的、外交的、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因素。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比大本营的成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方面军司令员更了解国家的实力、国家工业和农业的实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具有与广泛的非军事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更全面的思维。再说一遍,这种优势是斯大林作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党的活动家的地位所决定的。统帅的即军事的这一面仅仅是许多面中的一个,这一面是这一级国务活动家必须具备的。

斯大林就其地位来说是统帅,是最高统帅。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统帅和最高统帅呢?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去。

军事历史学家常常援引拿破仑的话。他的意见被看作是经典性的。波拿巴研究了一个统帅的智慧和刚强性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智慧多而缺少刚强性格的人最不适合这一职业。最好是刚强性格多一些而智慧少一些。智慧中等但性格颇为刚强的人往往能在这门艺术中获得成功。"[8]自然,所谓智慧,不仅仅是指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能提供关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联系、属性和关系的知识,而且还指具有军事这一具体领域中的专门知识。正如苏联学者捷普洛夫在他的著作中所写的:一个统帅的智力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原始资料异常复杂而最后结果非常简单明了。开始时分析复杂的资料,结束时进行综合,提出简单而明确的原理。把复杂的事物变为简单的事物——这个简短的公式可以说明一个统帅智力活动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9]。换句话说,统帅的思维使他同时能看到整体和局部、动态和静态。真正的统帅思维就是反映在具体思维中的智能的综合(概括)能力。统帅在智慧和意志、才智和个性方面同样都应当是很强的。我们知道,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忽而是这一成分占首位,忽而是另一成分占首位。但是,智慧和意志任何时候都应当构成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统帅才能够在贯彻已定下的决心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同时又在实现目的方面表现出顽强性和坚定性。

前面已经谈过,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具有明显的教条主义思维的特征。最高统帅是按照"刻板的公式"去思维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的战略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对普遍性问题的考虑压倒了

对具体问题的考虑。不错，在综合分析中，这恰恰可能成为长处。在斯大林身上，政治家总是压倒军事家。说得确切些，是经验丰富的、严厉的政治家压倒非专业的军事家。对于一个战略家来说，毫无疑问，考虑普遍性问题总是重要的，但在斯大林身上，对普遍性问题的考虑常常挤掉了具体的问题。相反，当斯大林试图集中精力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他又放松了对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注意。例如，当苏军在哈尔科夫即将遭到惨败的日子里，根据对斯大林那段时间工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在1942年5月下旬正积极设法保证巴伦支海船队的护航，抓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工作，组织西方方面军对敌机场进行突击，给拉多加湖的区舰队抽调舰艇，为歼灭杰米扬斯克集团进一步变更部队驻地，如此等等；但却缺乏把自己、总参谋部和大本营代表的注意力集中在苏德战场当时的主要地段的战略头脑。斯大林像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一样没能立即觉察到局势有多么危险。斯大林通常都不重视总指挥所的决心和行动，这一次对西南方面军指挥部和西南方向司令部的结论和论断也没有认真加以审查。专业素养不高就无法找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环节；直觉没能及时地提示最高统帅面临的严峻危险。

在一定程度上不了解时间的现实情况，是斯大林作为统帅在思维上的一个弱点。不论是朱可夫还是华西列夫斯基都指出过这一点。斯大林一有什么想法，往往就要求立即付诸实现。他签署给方面军的训令时，往往只给几小时的时间去贯彻落实，这就使司令部和军团常常只能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行事，从而导致失利。例如，西方方面军在1942年接到过几次斯大林要求将若干兵团调动50至60公里（从战线的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的号令和命令，而完成这些机动的时间只给5至6小时！在这段时间，命令勉勉强强能传达到直接执行者。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也没能理解这样一个道理：最高统帅挥了手并不意味着团和师立即就能贯彻他的意志。斯大林在思维上有这个缺点，是因为他很不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部队的生活，指挥员的工作，执行命令和号令的程序和方法。

斯大林虽不是军人，在解决这个或那个作战问题时，却多半依靠“压力”至上，即依靠对将领和司令部施加压力，而不是靠对局势和情况的具体了解。同时，他发布号令和作出结论往往只是从常人的想法出发，而不是从战略上或战役上考虑。我已经引用了这方面的不少文

件。

斯大林于1942年6月30日申斥戈利科夫同自己的兵团失去联系，不客气地对这位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司令员说："只要您不重视无线电通信，您那里就不会有任何通信联络，您的整个方面军就会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如不认真转变，那您就会落后。这样作战是不行的……"[20]

斯大林在这里主要是以政治领导人的身份过问局势的，他要求改进对部队的领导时使用了相当露骨的威胁。强压原则在最高统帅的思想上通常都占上风……有时，他的电报仅仅确认情况糟糕面没有任何结论和号令。但是，那种口气使人感到凶多吉少。

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

国防委员会感到极不满意的是，您没有按时上报前线的情况。北高加索方面军地盘丢失的情况我们不是从您那里知道的，而是从德国人那里了解到的。我们得出的印象是，您慌了手脚，无缘无故地退却(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而且您的退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完。

约·斯大林

1942年8月10日20时45分[21]

最高统帅的这一类提醒是起动员作用的。"兴奋剂"是行之有效的：恐惧、害怕迅速受到处理——搞好了可能把将领的职务降几级，有时还会受到贝利亚手下的关照。

1943至1945年，作为战略家和统帅的斯大林在军事助手的帮助下懂得了战役法的许多重要原理。例如，最高统帅懂得了，不仅需要和能够在敌人迫使下转入防御，而且，像在1942年的某些战役中那样，需要和能够预先转入防御，而后来则是有预谋地转入防御，为实施进攻行动进行准备。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斯大林最不喜欢防御。一提起防御，就会引起最高统帅最不愉快的回忆和感受。他记得，1942年9月16日，午饭后不久，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不声不响地把潘菲洛夫将军签署的总参情报部的紧急报告放在斯大林面前，上面有无线电截听到的转播的柏林消息。

斯大林格勒已被英勇的德国军队占领。俄国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这两部分很快将陷入最后挣扎的境地……


进入郊区的德军命一位老妇离开他的隐蔽所

最高统帅把这则简短的消息反复看了几遍，心不在焉地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口，在窗口外面遥远的南方某地看来发生了一场灾难。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他曾在那里，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战斗过。当时他就坚持下来了……为什么现在人们做不到了呢？这算什么指挥员？就在几天以前，他解除了洛帕廷将军第62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帕维尔金和米舒林军长的职务……在三四年内由连长提升到军长的一批年轻军官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根本不够用，这一点他根本没有考虑。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指挥员。斯大林从来没向自己的战友和助手们谈过，对德军在南面发动新攻势的危险估计不足使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斯大林望着半拉上窗帘的窗口未被遮住的缝隙，害怕听到证实德国人的消息，这时他已在考虑下一步的仗如何打。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动摇过。他小声地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给我接通总参谋部的电话。快……”

一分钟后他向博科夫将军口授了给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的电报：

请讲明你们在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德军真的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吗？请坦率诚实地回答。盼立即答复。

约·斯大林

1942年9月16日16时45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

博科夫[72]

当时人们不会打防御战。防守常常感到非常吃力，领导的失误既

靠作出巨大的牺牲、放弃一片又一片的土地来补偿，也靠战士的无比顽强来补偿。斯大林在战争末期回顾最初一年半的情况时，犹如做了一场很长的噩梦。他曾多次绝望。没有一位边境军区司令员（后来成为方面军司令员）能胜任工作，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库利克几位元帅都一样。最终所以能阻止敌人前进，是因为丧失了大片国土，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而首先是遭受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一点要斯大林自己承认是很困难的。不是由于"英明的斯大林"战略，而是由于全国人民的献身精神。这就是为战前的错误、失算、恐怖政策和自以为是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没有人能把这一点告诉"领袖"。

对于斯大林，只有目的才永远是最重要的。他从来没有因为蒙受巨大损失而感到内疚和痛苦。他担心的惟一事情就是有多少多少个师、军和集团军被击溃。在大本营的文件中，没有一份你能从中看到斯大林在为人员伤亡惨重表示忧虑。军事学术最讲究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以最小的损失来达到既定的目的——对此斯大林很少感到兴趣。最高统帅认为，不论是胜仗还是败仗，都一定会带来哀痛的收获。在斯大林看来，伤亡，大量的伤亡，是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斯大林这样想，莫非因为他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的最高统帅？到战争结束时，武装力量约有500个步兵师，面炮兵师、坦克师和航空兵师还未计算在内。这个数字比战争前夕多一倍。当然，苏军师的人数大大低于德军师，然而斯大林不顾将领们多次建议，没有实行扩充兵团的办法。拥有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健全的人员补充体制，斯大林觉得，为了达到战略目的，完全不必考虑伤亡的大小。在训令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本身就令人感到可怕的说法：

"最高统帅部要求叶廖缅科上将和戈尔多夫中将要不惜力量，**不惜任何牺牲**……"[⑬]在最高统帅的"想象"中就是数十个师。他一向喜欢大规模。因此，他的论点"不惜任何牺牲"不仅是他的思想的道义特征，面且也是战略特征。这些特征是非常消极的。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为了达到目的，不必考虑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往往是不计数的。

同时，应当说明，斯大林同崭新的战略行动样式——方面军群战役的出现是有关系的。这是极其复杂和规模极大的，受统一的企图指导的，在目的、时间和地点上协调一致的战斗和交战的总和体。参加其中某些战役的有100至150个师以至更多一些、数万门火炮、3000至

5000辆坦克、5000至7000架飞机。大量的兵力根据总参谋部和方面军司令部的战略设想和战略意图的变化，根据对数量众多的因素和可能条件(我军的和敌军的)的分析采取行动。正是在这里，在这样一种有数个方面军参加的战役中，斯大林本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统帅。巨大的规模对他不仅意味着所使用的兵力在数量上的表现。他认为大规模是他本人战略上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的大好机会。莫斯科会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斯大林一直在一次又一次的战略组合中谋求把不同方面军所作的努力“拧成一股绳”。库尔斯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东普鲁士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满洲战役不仅符合事物的客观进程，而且也符合斯大林对一切大兵力、大规模、极大规模的爱好。面上述战役正是这样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进攻地带常常达到正面宽500—700公里，纵深300—500公里，持续时间达一个月。最高统帅像往常一样，总是急于开始，不满意进展速度，为暂时的停顿而恼火。斯大林对总参谋部提出的进攻战役的总企图很快就掌握了，有时提出一些很重要的旨在提高突击力量的细节问题。

方面军群战役

斯大林在二战中创造了一些新的现代化的战役类型。斯大林统率苏联陆海空军和防空军，在卫国战争中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役有：方面军防御战役、大城市防卫战役、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群进攻战役、三军联合进行的大规模的登陆战役、海上战役、防空战役、空中战役等。在战略性的进攻战役中，创造了合围战役实施向心突击和分割围歼的作战方法。还创造了以炮兵火力准备、火力护送、火力支援为主要形式的炮兵进攻方法，保障、支援、护送步兵、坦克部队的进攻。还创造空降作战方法，等等。这些作战方法的创造与实施，使苏联军事学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成就。

但是，最高统帅很少提出可供总参谋部提出建议时选用的重大思想。企图产生于“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斯大林通常要求加强航空兵的作用，而1942年夏开始组建坦克集团军以后，则一定要规定它们的任务，密切关注这些强大的突击兵团的使用。把大量档案文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战役的计划制订、进程、发展和结束没有明显的最高统帅的“印记”。例如，斯大林听完朱可夫关于1943年7

月9至10日在波内里地区作战的进程的报告之后，似乎是让副手自己去作最后决定："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左翼是不是已到了进入交战的时候了？"提问的语调肯定了朱可夫有权自行决定。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内，斯大林学会了比较好地分析作战问题。他经常提出在这一或那一进攻战役中对敌人集团实施合围的建议。斯大林格勒会战后，他曾不止一次听取安东诺夫的汇报，每次都好像顺便提问似地说：

"能不能在这里再给德国人安排一次斯大林格勒会战？"

他掌握的"那一套"作战行动方式并不丰富。但是，他了解了军事学术，能正确评价方面军司令员和大本营成员提出的建议。前面我已经谈过，最高统帅"酷爱"用数个方面军实施突击以合围和歼灭敌人的进攻行动方式（白俄罗斯战役和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他很赞赏组织和实施若干个具有不同间隔和不同纵深的连续战役的思想。届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一思想是"斯大林战略天才"的成果。然而，他是从总参谋部和方面军的以下建议中受到启发的，这些建议是实施若干"分割"突击并向纵深和两翼发展（奥廖尔战役）；分割敌重兵集团并各个加以歼灭（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斯大林由于战争初期判断法西斯军队的主要突击方向时有过重大失误，在苏军转入反攻和进攻时他确定苏军主要用力方向就比较慎重了。1942年到1943年间的冬季和1943年夏季，斯大林支持了军队领导关于必须在西南方向取得战略胜利的意见。但1944年夏已经看得

奥廖尔战役

1943年7月12日–8月18日，在二战的苏德战场上，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西方两军左翼实施的进攻战役，是库尔斯克会战的组成部分，战役目的是粉碎德军奥廖尔集团并肃清奥廖尔突出部残敌。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1945年1月12日–2月3日，在二战的苏德战场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左翼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右翼配合下，实施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很清楚，总参谋部关于把进攻战役的重心再次转移到西部方向的建议能够加速粉碎法西斯军队。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没有对各个战役提出过战略指导思想。但是，在1943至1945年已能对这些思想作出正确评价。斯大林听取大本营军事委员和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之后，对通常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决定表示赞同。他在战争第二、三阶段的"天才之处"看来经常表现为他理解并赞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和各方面军司令员提出的合理建议。

施加压力，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是斯大林每次行动的基本原则，但是有时他在思想上也能寻根问底地努力探索提高作战行动效率和加速歼灭希特勒军队的办法。表现之一就是，在1943至1945年，斯大林根据总参谋部的倡议，不止一次地要求各预备队集团军的领导重视：必须加强作战伪装，改进集团军、军和师三级司令部的指挥工作，尽快把指令、命令和训令传达给执行者，建立反炮兵连的特种兵团，利用航空兵兵团和坦克兵团，等等。最高统帅赞同这一系列战略性、战役性以至战术性的问题，证明他已经从战争中、从自己的专业军事助手方面学会了很多东西，开始凭直觉就能觉察到自己作出的决定的短处和长处。

同时，斯大林同过去一样十分重视调动执行者、特别是战役一级的指挥人员作战活动的积极性。这方面的决定照例都是由他一人作出的，都是激进的。

有时斯大林想到的事情表面上看来不合逻辑，但却起了显著作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41年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决定就是一例，最高统帅建议1944年夏让大批德国战俘通过莫斯科街头也同样地出人意料。

"这样做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和军队的士气，更快地歼灭法西斯分子。你们认为怎样？"

一直没说话的莫洛托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短时间的局促不安之后都争先恐后地表示同意。

"这一着很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只有您才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天才的决定！"

一周以后,7月13日,贝利亚向最高统帅报告了进行这次不同寻常的"精神"战役的计划: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根据您的指示,今年7月17日将让5.5万名俘虏走过莫斯科的街头,其中有18名将军、1200名军官。白俄罗斯第1、2、3方面军将向莫斯科发出26列军运列车。德米特里耶夫、米洛夫斯基、戈尔诺斯塔耶夫三位将军和国家安全局政委阿尔卡季耶夫已经在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瓦西里耶夫和罗曼年科负责警戒并押送到莫斯科。7月16日晚把全部战俘集中到跑马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摩托化步兵师的操场上。计划把26列军运列车的战俘编为26路纵队。行进路线:莫斯科跑马场,列宁格勒公路,高尔基大街,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然后是花园环形路:凯旋门街,卡列特街,萨莫捷奇街,苏哈列夫街,斯帕斯街,切尔诺格里亚齐街,契卡洛夫街,克里木围墙,斯摩棱斯克林荫道,再沿巴里卡德街和红色普列斯尼亚街返回莫斯科跑马场…… 上午9时出发,到16时结束。"[29](顺便说一下,行进路线和时间后来都改变了。)斯大林插话说:

"各纵队能坚持下来吗?"

"斯大林同志,能坚持下来。"

"以后怎样安排?"

"第二天清晨,从11个地点(各火车站)出发前往东部的战俘营。"

贝利亚准备往下报告计划,但斯大林不愿再听下去。"我只提出想法,大家执行就是了。难道他们自己不会全面考虑?"最高统帅不耐烦地看着战友们说。

斯大林十分重视对指战员进行精神鼓励的措施。例如,根据最高统帅的建议,1943年9月初制定了一份别致的、奖励胜利强渡江河的指挥员的标准。大本营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训令经斯大林修改后行文如下:

对强渡像波格丹诺沃地区(斯摩棱斯克州)的杰斯纳河及其下游这样的江河,以及相当于杰斯纳河这样的江河,按强渡的难易程度,授予以下奖励:

1.集团军司令员——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2.军长、师长、旅长——二级苏沃洛夫勋章。



1944 年 7 月，几十万德国士兵终于到了莫斯科，但却是作为战俘列队而来的……

3.团长、工程兵营长、工兵营长、舟桥营长——三级苏沃洛夫勋章。

对强渡像斯摩棱斯克地区的第聂伯河及其下游这样的江河，以及相当于第聂伯河这样的江河，按强渡的难易程度，授予上述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以苏联英雄称号。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3年9月9日2时[75]

像这样的训令并不是个别的。斯大林在必须克服的困难面前，经常利用精神刺激，他不无根据地认为，对优秀人物慷慨地给予奖励是培养和保持进攻部队战斗精神的极重要的因素。的确，在奖励问题上斯大林是相当认真的。例如1949年，在庆祝他的70寿辰时，马林科夫建议授予他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他已荣获两枚金星奖章：1939年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1945年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他就没有同意。他颇有远见地认为，在荣获“胜利”勋章之后就需要刹车了。据说，当人们要把法国的最高勋章授予戴高乐总统时，总统问道：“难道法国可以奖励法国吗？”斯大林刹住了不断给予的奖励。然而，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英明，而仅仅是因为他起码懂得，过量的奖励会“打击”他的威望，破坏他的威望。



1944年11月5日，加里宁把第一枚“胜利”勋章授予斯大林

而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却没能“刹车”，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有时

连起码的……也不懂。一个在非民主的国家当“第一把手”的人，可以借任何理由或者不要什么理由就嘉奖自己。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增加他的威望，而是适得其反。结果，斯大林荣获的勋章数和梅赫利斯的差不多，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少3/4到4/5。但是，斯大林对嘉奖和授予高级军衔“持慎重态度”并不表现在这一方面，而表现在他不重视政工人员、司令部工作人员和后勤军官方面。斯大林可以授予坦克集团军司令员兵种元帅军衔，但是，对于持续担任高级职务的捷列金中将（曾任莫斯科军区、莫斯科防御区、顿河方面军、中央方面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苏军驻德占领军集群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却没有授予上将军衔。有一次斯大林得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大将不顾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意见，便授予《向敌人前进》报的一批工作人员以勋章和奖章。特别处的工作人员上报了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斯大林当即口授了国防委员会1943年11月16日第00142号命令，内容如下：

1. 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员1943年10月29日关于给予方面军报纸编辑部工作人员以政府嘉奖的命令予以撤销，所发勋章和奖章一律收回。

2. 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9月24日命令中奖励《向敌人前进》报编辑卡辛上校的那一条是不合法的，应予撤销。授予卡辛的卫国战争勋章应予收回。

3.向大将叶廖缅科同志说明，政府设立勋章和奖章是为了嘉奖在同德国侵略者作战中表现出色的红军战士和军官，而不是为了不加区别地发给随便哪个人……

4.报纸编辑卡辛上校……的军衔降为中校并降职使用。

约·斯大林[28]

斯大林对“嘉奖政策”方面的错误（他认为是错误）的反映就是如此强烈。他认为，嘉奖只是为了刺激人们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了奖励人们所作出的成绩……

斯大林签署强渡维斯瓦河的训令后便让安东诺夫离开办公室，但随即把他从门口叫回来并又口授了给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和乌

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

> 大本营十分重视强渡维斯瓦河一事，要求你们通知你们方面军的全体指挥员，凡在强渡维斯瓦河作战中表现出色的战士和指挥员都可荣获勋章直至苏联英雄称号的专门嘉奖。
>
> 约·斯大林
>
> 安东诺夫
>
> 1944年7月29日24时[77]

在战争进行期间，除极个别的情况以外，统帅们没有向斯大林提出过异议。但是，在他死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具有统帅"才干"的观点出现了局部的或者全面的"修正"。我想举一个战略"异端"的例子，我相信今天知道这件事的人还不多。

苏联元帅崔可夫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帝国的末日》，以及其他著作和讲话中谈了一种想法，认为攻占柏林的时间可以不在1945年5月，而在2月。朱可夫、巴巴贾尼扬以及其他将领反对他的看法，包括在报刊上撰文反驳。崔可夫试图在《军事历史杂志》上答复对他的批评，但遭



尽管红军战士只有过时的坦克和少量的大炮，但他们拥有辽阔的俄罗斯大地，那是几乎不可战胜的。图为一队红军战士渡河

到拒绝。于是他给党中央写信。中央建议对这位“固执”的元帅进行“相应的”工作。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1966年1月17日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召集著名的苏联元帅、将军、专家们开会,“开导”崔可夫。崔可夫在发言时再次指出,“苏联军队已进军500公里,于2月在距柏林60公里处停止前进……是谁阻止我们前进?是敌人还是统帅部?为了进攻柏林,当时我们的军队是完全够用的。我们给予西部方向的敌人两个半月的喘息时间,帮助他们做好了防守柏林的准备……”

与崔可夫持不同意见的有叶皮谢夫大将、科涅夫、扎哈罗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莫斯卡连科等几位元帅以及其他与会者,他们试图向自己的同事说明,当时部队的进攻锐气已消耗殆尽,后勤没有跟上来,部队疲劳,需要补充人员和弹药……可能真理是在多数人一方。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议有某种其他精神:对斯大林的批评的“暂停”时期已经开始。与会者在探讨是否有可能提前实施柏林战役这个问题时,似乎事先已谈妥根本不联系大本营和斯大林所作的决定。甚至提出这个问题也受到严厉的指摘。叶皮谢夫在作讨论总结时宣布,崔可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科学的”,不能“给我们的历史抹黑,否则无以教育青年人”。



崔可夫在一所建筑物里观察附近的战斗情况

斯大林用了很大力量设置的教条主义思维的旧框框不仅在当年束缚着这些受人尊敬的人,而且现在也不亚于当年,仍在束缚着我们。问题完全不在于最后一次战役是否能提前开始,而在于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属于异端。斯大林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甚至级别这样高、又有战略头脑的人都无意讨论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的行动。要知道元帅们对他是很了解的,然而能跳出自己那个时代的人却不多。

现在我们再转回话题谈战争年代。斯大林的思维很贫乏，因为他对部队的前线生活、日常生活，对两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进行鏖战时互相发生碰撞的白热化地段的气息没有什么概念。当斯大林最终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愈来愈迫近的时候（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便挤出30至40分钟（多半在夜间）观看前线新闻影片。观看这类影片有时会促使他定下气魄很大的决心。这位脱离实际的统帅的思想在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之后便发生了变化，尽管他仍然保持着他所固有的特点——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多疑、不信任和心存戒备。

例如，在一部影片中有这样的镜头：在前线地带某处一个没有完全烧毁的集体农庄板棚内抓到两名没有来得及躲藏或投降的警察。斯大林当即下令给各方面军司令员发出训令（抄件送贝利亚），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大本营1942年10月14日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前线附近地带一律把居民迁出，以防"敌人的奸细和间谍混入部队驻地"。斯大林亲笔写道："要件。前线附近地带应当使敌人的间谍和奸细无法混入。现在就必须懂得，位于浅近后方的居民点是便于掩护间谍和间谍活动的场所。"[⑬]然而，训令中一句也没有说迁出是为了保障和平居民的安全（要知道这都是苏联公民！），一句也没有表示在关心他们。即使在这里，斯大林的"间谍"思维从获得解放的公民方面看到的首先还是危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想法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我曾多次指出，斯大林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这是因为：偏爱教条主义思维的头脑比较难于把握似乎"隐藏"在明天的地平线后面的倾向。我举一个例子。最高统帅曾提出任务，要使1942年成为歼灭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年，这是大错特错了。后来又提出1943年，最后又提出1944年。结果也没做到。而且他不仅提出任务，还相信这一纲领性方针能够实现。这是根据虚无缥缈的预测提出的任务。斯大林讲求实际的、固执的头脑看不清楚模糊的未来。原因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辩证法及其规律，常常没有掌握我军和敌人可靠的资料。遗憾的是，在给他的报告中往往夸大敌人遭到的损失，经常过高估计德军可能得到增援的兵力。前线这些不符合实际的统计数字使人无法如实地、清醒地判断形势和分析力量对比，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大本营和最高统帅本人作出预测的能力。但这要怪他自己。假话早已在他的独裁生活中成为主宰。斯大林曾经严厉惩处那些夸大或缩小情况的将领，甚至解除他们

的职务，但却没能根除在给他的报告中歪曲事实的现象。斯大林甚至揭露过朱可夫，说他相信未经核实的报告：

尤里耶夫同志（格·康·朱可夫）：

来电收到。您在电报中请求给您新派一个强击航空兵军团，因为据您所说乌克兰第1方面军共有98架强击机……大概您上别人的当了。

事实上您现有98架强击机正在服役，外加配置在普里卢基的第224强击师编制内的95架强击机。这就是说您共有193架完好的强击机正在服役。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分批调给您供补充各强击师用的143架强击机。这样，您的方面军将有336架完好的强击机。

伊万诺夫（斯大林）

1944年3月16日1时45分[79]

最高统帅和他的副手的数字不一致：336架飞机和98架飞机。差别太大了。很可能两个数字都不准确，但是这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统计数字对某些指挥员和司令部有好处。

如果说在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对任何汇报都相信，那么后来告急报告叫喊得再厉害他也能沉住气。从根本上说，希特勒的败局已定。时间只对盟军有利。所以，当斯大林收到未经核实的告急报告时，便严厉斥责方面军司令员，顺便也斥责大本营驻该方面军的代表：

致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员

叶廖缅科大将

（抄送：沃罗诺夫同志）

您的报告大喊大叫，说敌人派重兵——达2个坦克师——从叶泽里谢方向向斯图杰涅茨进攻，实际上毫无根据，是张皇失措的表现……今后汇报敌情，凡内容未经核实、未作充分研究而仓皇进行推论者，不得再向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呈报。

约·斯大林

1943年11月12日24时[80]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斯大林作为战略家,他的思维所依靠的是进行政治领导的知识和经验,是对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精神因素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这就使最高统帅能够视野更加开阔地观察战争过程,看到战争过程同国际形势、盟军的行动以及其他国际政治因素作用间的密切的相互联系。或许甚至可以说,斯大林具有一个被迫抓军事问题的政治家的坚强的头脑。对军事学术理论只有零碎的知识,对整个军事机制发挥作用的特点一知半解,使得最高统帅不能上升到真正战略思维的高度。

但是,他能够让"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紧张地工作以弥补他所固有的这些弱点。在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中贯彻实施的一切重大指导思想都是大本营这个"智囊"和他周围的一班军人提出的。尽管军事不是自己的专业,但斯大林能够提高到理解这些指导思想和意图,有时还能作一些重要补充。因此,秉公而论应当说,进行军事领导的"智谋"是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提供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也起了很大作用。斯大林的作用主要是表达"意志"。拥有军事独裁者无限权力的斯大林要求对大本营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种做法有时是主观片面的,常常造成不良的后果。斯大林在战争最初的一年半内匆忙作出的、过迟的或欠考虑的决定最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或许最高统帅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自己的不足,甚至感到了由于不了解前线情况,自己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不称职的统帅。由于他的一部分战友呆在前线,他的这些弱点就显得更加突出。日丹诺夫与列宁格勒有着密切的联系,亲眼看到了遭受封锁的情况,并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投身于繁忙的军务。赫鲁晓夫也没有离开前线。马林科夫始终没



列宁格勒此时与外界的惟一通道就是冰冻的拉多加湖。苏联军民倾尽全力保卫这条生命线。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在湖面上往来奔驰,运出伤员,运进粮食

有到过前沿的任何部队，但也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的掩蔽部内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斯大林于1944年4月再一次派马林科夫去了前线。在克里木遭到惨败后逐渐恢复元气的西方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梅赫利斯给斯大林寄去一封私人信件。信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斯大林于4月3日下达了一项命令，命令中说："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由它负责用4至5天时间检查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非常委员会的成员有国防委员会委员马林科夫(主席)、谢尔巴科夫上将、库兹涅佐夫中将、什捷缅科上将和希莫纳耶夫中将。"[61]现在很难说梅赫利斯信中写了些什么，他们检查了什么，作了什么结论，但委员们刚一离开，方面军司令员索科洛夫斯基大将立即降职：降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

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把马林科夫留在身边。马林科夫作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领袖"交办的各种事项，并监督航空工业。当飞机生产事宜安排就绪时，最高统帅于1943年9月批准授予马林科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立即任命他为人民委员会下属解放区经济恢复委员会的主席。斯大林决定也让卡冈诺维奇到军事工作岗位上试一试。1942年7月，斯大林派他去高加索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顺便指出，在这项命令中还任命阿·因·安东诺夫中将(后来的总参谋长)为该方面军参谋长。卡冈诺维奇在前线毫无作为。他像马林科夫一样，也感到自己是军事表演中的一个配角和斯大林安插在方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一名普通"坐探"，然而他却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斥责。当北高加索方面军在1942年8月中旬未经大本营批准便从所占领的地区后撤时，斯大林给军事委员会(布琼尼、卡冈诺维奇、科尔尼耶茨等人)发了如下一封电报：

需要考虑到，退却的地区如不加以防守是不能构成障碍的，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根据一切情况来看，您还没能使部队的军事行动出现应有的转机，而凡是指挥人员没有张皇失措的地方，部队都打得不错……苏沃洛夫说过："如果我能使敌人闻风丧胆，那我已经取得了一半胜利；这时我再把部队带上前线，彻底击溃丧了胆的敌人……"[62]

斯大林在这里似乎替苏沃洛夫瞎编了一些东西,但是最高统帅很想给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打气,因为在这个军事委员会里,他以往的亲信之一卡冈诺维奇看上去是一个被吓破胆的替上级承担责任的人。当然,有一项"前线"任务卡冈诺维奇毕竟顺利完成了。在德军向南方实施突破的那几个困难的星期里,斯大林责成他和贝利亚一起抓好法院、检察院和其他惩罚机构的工作,按照最高统帅的想法,抓好这些工作,就能迫使人们拼死防守。

斯大林经常要贝利亚解决一些前线后方的供给问题,在突围人员的劳改营"进行筛选","动员"几十万在押犯人参加与保证前线需要有关的工作和建筑工程。贝利亚参加了一些兵团和部队的组建工作。例如,1941年6月29日大本营下达命令,责成贝利亚以内务人员委员部的部队为基础组建15个师[83]。而在1942年8月和1943年3月,贝利亚两度到高加索,斯大林派他去那里帮助防守这个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从该地给斯大林送上紧急报告,内容是:他从部队中清洗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因为这些人不可靠;对布琼尼、秋列涅夫和谢尔加茨科夫的行动作了评价;报告他所作的关于任命军事干部的决定(如任命根本不懂作战问题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鲁道夫斯基中校为第47集团军副司令员),等等。根据贝利亚的请求,斯大林下达了一些有关的号令。例如1942年8月20日下达了如下号令:

致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夏坚科同志

1. 从第61步兵师清除3767名亚美尼亚人、2721名阿塞拜疆人和740名达格斯坦族人……

2.把从第61步兵师清除出来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达格斯坦族人派到外高加索方面军的后备部队去,清除后该师的缺编人员由方面军补充兵员中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补齐。

请报告执行情况……[84]

贝利亚是真正的内奸。战争期间,他同斯大林一起在民族问题上作出了不少违反列宁主义的决定,其反响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

贝利亚在北高加索方面军期间试图"开导"秋列涅夫、马斯连尼科夫、谢尔加茨科夫、彼得罗夫、什捷缅科几位将军和其他将领。但得到的回答是给斯大林发出电报和报告，请求不要让贝利亚对指挥机关"发号施令"。或许贝利亚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对长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马斯连尼科夫产生了影响。1953年专门调查这个问题的总参谋部两位将军波克罗夫斯基和普拉东诺夫的结论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关于贝利亚在1942—1943年高加索防御战期间的罪行问题》的报告中写道："为了完成高加索山脉东部的防御任务，8月8日组建了外高加索方面军北部军队集群，大概是由于贝利亚的坚持，任命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为该集群司令员，而在这之前他在加里宁方面军任集团军司令员时指挥失误……马斯连尼科夫将军无疑利用了贝利亚的保护，常常置方面军司令员的指示于不顾，并由于自己的行动耽搁了部队变更部署。"[65]我不想断言马斯连尼科夫成了贝利亚的亲信。但从马斯连尼科夫1942年给贝利亚的许多信件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马斯连尼科夫担任第39集团军司令员时，曾越过军队的首长直接向贝利亚提出请求："鉴于情况复杂而严重，并记得您曾许诺给予可能的协助……非常敬重您的**马斯连尼科夫**。1942年6月7日。"[66]马斯连尼科夫读了扎维雅洛夫和卡利亚金两位军官发表在《军事思想》杂志1952年8月号上的文章《高加索会战》后，给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部部长写信(1952年11月24日)，谈到他不同意该文对贝利亚作用的提法。信中说：


马斯连尼科夫将军

作者在第56页评价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措施时，对贝利

亚所做的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和采取的重要政治及组织措施只是一笔带过，而贝利亚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形势，尽管到1942年8月时高加索前线的形势仍极端困难。

这样评价贝利亚同志的活动就不能使人看到在贝利亚亲自直接领导下贯彻实行的所有措施的全貌。

贝利亚具有斯大林的领导作风，他身体力行，为了对外高加索方面军进行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和管理方面的领导(1942年8月—1943年1月)，他作出了表率，出色地贯彻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87]

斯大林不能没有贝利亚。他内心里看来总有些鄙视这个面部表情变幻莫测的人。但他需要他。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一个执行者和情报员。例如贝利亚曾经几次报告说，柏林早就准备对最高统帅采取恐怖行动。这位人民委员说：根据现有材料，他们要用梅塞施米特公司生产的专用飞机"阿拉多—332"运送一批有经验的恐怖分子，他们都来自弗拉索夫俄罗斯解放军；根据另一材料，德军撤退时留下了破坏分子。内务人民委员差不多每月向斯大林报告一次为保证他的安全新采取了哪些措施。斯大林早在1941年便下令把远郊别墅改作医院使用，而近郊别墅及通往别墅的道路加强了警卫力量。然而斯大林需要贝利亚也是为了其他许多事情。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不久前报告说，抽调出来参加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战役的400架歼击机，其中的140架在战役开始4至5天后便不能使用了[88]。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于是委托贝利亚查清这一问题；大概是"暗害活动"。人民委员对过去被敌人合围过的人员认真进行了审查；根据他的报告，约有一半人可以在战斗部队中重新使用，当然要有人监督。但是，当贝利亚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插手各级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事务时，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总的说来，他知道的太多了……面就性格来说，斯大林只想自己一个人掌握自己的秘密。最高统帅不喜欢把往事告诉别人，而贝利亚对他的底细比谁都知道得多。斯大林不希望(这是很久以后的事)贝利亚比他的寿命长。而现在最高统帅需要他。

贝利亚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在向斯大林汇报此行的情况时，总要借机谈谈个人对前沿、轰炸、某些"值得怀疑"的将军的"无能"的

印象。

斯大林听着这个吃得面孔油光锃亮、完成如此“紧张”的工作后根本不显得疲劳的贝利亚的夸夸其谈，再次打心眼儿里感到不愉快。斯大林于1941年10月去过前线，那次去得不顺利，当时他只到了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看到了日益靠近莫斯科的前线的慌乱情景，该处距他的一行骑马的人好不容易才走到的地点有10至15公里。此后，斯大林再没有抽时间去过前线。听贝利亚、接着是马林科夫谈了自己的“战斗洗礼”之后，斯大林下定决心到前线去，尽管是为了历史。经过极其周密的准备之后终于成行。斯大林于1943年8月初到了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他认为，在这之后他的统帅生涯中就没有弱点了。

8月1日，斯大林乘专列从孔策沃车站出发。专门选了一辆很旧的机车、几节破旧不堪的车厢。为了伪装，在不长的列车后面又挂了一节装运木柴的平车。随行人员有贝利亚、他的助手鲁缅采夫和化了装的加强警卫队。斯大林到达格扎茨克后会见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索科洛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斯大林听取了首长们的汇报，表示了一般的祝愿，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向尔热夫方向进发，去加里宁方面军看叶廖缅科。他在该地住在霍罗舍沃村一个普通农妇的小屋里，同其他农舍有相当的距离（女主人连同全部家具什物已提前搬迁）。这座不大的房舍装有雕花的檐板，挂着一块纪念牌。房舍至今还保留着，为的是纪念最高统帅在前线的“功绩”。据说，斯大林就是在这所房舍内吩咐起草了一项为纪念攻占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首次鸣放礼炮的命令。但是下部队去同指挥员和战士见面，斯大林是不愿意的。在没有发生任何戏剧性事件的情况下，在霍罗舍沃过夜之后，最高统帅便同贝利亚一起由加强警卫队保护着乘汽车返回莫斯科。他现在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因为谁也不敢认为（当然更没有人敢说！），统帅只是从新闻纪录片里、从总参谋部将军们和大本营的代表们的报告中了解前线的情况了。

或许最高统帅的确没必要到前线去？要知道，斯大林连工厂都没有去过，即使国家工业化实现了那么大的飞跃！他到农村去过一次，即使那里迅速实现了那样了不起的“来自上面的革命”！战场难道能例外吗？斯大林善于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切，了解一切。我

再说一遍，他是实行办公室领导的超级大师。因此，他之需要对前线进行"接触性"访问（实际上他离前线还很远）并不是为了了解两个方面军的情况，不是为了通过同正在准备进攻的各部队的人员的会见加深印象。不是的。所以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历史。斯大林考虑的是个人的历史声望。未来的编年史作者应当以适当的笔墨反映他的统帅活动中的这件事。在他的传记中应当增加最高统帅到作战部队进行令人振奋的访问的一页。

但是斯大林认为关于他到前线一事需要由最高统帅本人告知盟军。下面就是他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书信的两个片段。

> 斯大林致罗斯福
>
> 1943年8月8日
>
> 我刚从前线返回，所以现在才能就您7月16日的最近这次来信作复。我相信您会考虑我国的军事形势和理解迟复的原因……我不得不**经常亲自到**（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前线各地段去，不得不把前线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 斯大林致丘吉尔
>
> 1943年8月9日
>
> 我刚从前线回来便看到英国政府8月7日的来信……虽然我们近来在前线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正是现在要求苏军和军队的领导作出极大的努力并对敌人可能采取的新行动保持特别的警惕。因此，我不得不**比平时更多地**（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到部队去，到我军前线的某些地段去……[89]

不，斯大林这样写不仅仅是为了谢绝去斯卡帕湾同两国首脑会晤。为此只要提一下前线形势复杂就够了。最高统帅希望人们不要把他看作是坐办公室的统帅。

使他高兴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1943年8月19日在共同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正确评价了最高统帅在前线亲自进行直接领导的作用：

> ……我们充分理解您不得不去作战前线附近的重要原因，您


战争中人民和军队的领袖——斯大林

亲临那里对取得胜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90]。

斯大林在战争中是人民和军队的领袖。作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的刚强和矢志不移在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果考虑到他作为如此强大的国家的首脑，哪一方面都要管，那么他的统帅工作方面不是最强的方面。只是到1944年至1945年他才接近他的军事助手的统帅水平。他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知半解和外行的领导，首先表现在惨重的物力和人力的损失上。只有苏联人民才能承受这样的损失，而苏联人民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而是违背他的“天才”。说什么突然袭击、没有做好准备、希特勒背信弃义、将领们犯了错误等等，这些都不足以为斯大林辩解，而只是着重说明他在战略上短视和有缺陷。最高统帅领导着武装力量，以无法估量的损失为代价引导他们走向胜利。别尔嘉耶夫从他的宗教哲学世界观出发写道:“战争就是罪孽，但也是赎罪。”[91]可以补充一句:是无罪的人为别人赎罪。战争永远地夺去了成千上万人以至千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来不及走完命运为他们铺设的小径的

全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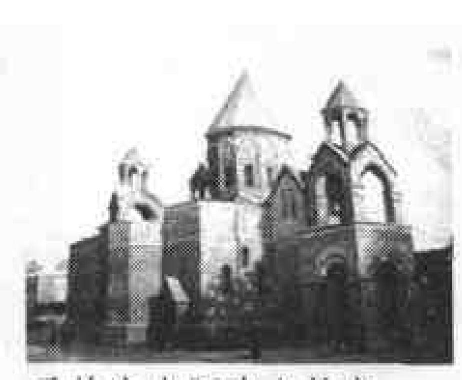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一个统帅是不是真正的天才，有没有统帅的战略思维，恰恰要看他有没有能力以最小的牺牲达到最高的目的。斯大林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天才。苏联人民为了取得胜利不得不献出两千多万人的生命。克瓦沙教授根据数学计算，根据对大量准确数据以及一些派生的情况所作的分析，最后得出的数字是：我国人民在战争年代的直接损失大约为死亡2600万至2700万人。根据我的计算（和这个数字近似），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付出过如此惊人的代价。但是，除了直接损失以外，间接损失（出生率下降等等）的数字也是很大的。我再说一遍：如此巨大的损失历史上迄今还没有过。如果把损失同斯大林的"统帅天才"加以对比，那么立即就会明显看出，把胜利的特殊功勋归于最高统帅是不妥当的。这些功勋完全是属于苏联人民的。

作为本章题词的伏尔泰的话提示我们：最终取得胜利的统帅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根本没有犯过错误。这句话用在斯大林身上是再好不过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他谈过他的"错误"。但是许多人，千百万人谈到了"一切时代和民族的"统帅的伟大。后来的苏联大元帅本人也没有怀疑自己的"天才"，他大概没有料到历史的法庭会作出不同的裁决。

战争末期，斯大林在抓军事的同时也在抓其他许多问题，而且用在其他问题上的时间越来越多。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专制独裁者必然要无休止地处理各种事务；但他对此感到满足，因为一切都由他决定，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办。早已被大家一致称为"伟人"的统帅逐渐把注意力转到其他领域。其实，其中许多事情仍然同战争有直接联系。有大事也有小事，有重要的事也有不太重要的事。例如今天，1945年3月16日，贝利亚报告说，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地带内，采纳瓦发现了罗科索夫斯基的亲属。随他们的便吧……还有个报告说，全体亚美尼亚人的格列高利教会副最高主教格奥尔格·切奥列克强早就在莫斯科等着他接见。令人感兴趣的是他需要他做什么。他是怎样写的呢？"……在卫国战争的日子里，亚美尼亚教会（包括国内外的神父和教徒）没有落在苏联其他教会的后面。它实际上证明是一贯忠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和苏维埃国家的……"这一点是清楚的。但他请求什么呢？啊，原来

是这样……他请求准许修复圣埃奇米阿津*，开办神学院、印刷所和创办《埃奇米阿津》杂志，准许修建仅存遗址的兹瓦尔特诺茨教堂，准许国外的神父到亚美尼亚来，在埃里温银行开设外汇帐户，以及其他许多事情……[28]

* 埃奇米阿津是苏联亚美尼亚城市。市内有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的许多教堂，郊区有兹瓦尔特诺茨教堂遗址。——译者


圣埃奇米阿津大教堂

没办法，一些事情还得同意。正教教会（不只是正教教会）在战争最艰难的那些月份内为支持他斯大林做了不少事情。

波斯克列贝舍夫今天往公文夹里还塞了些什么呢？"内务人民委员部林业劳改营在卫国战争年代完成了木材采伐的国家计划并保证了国防产品任务的完成……制作航空胶合板用的桦木、坑木用材、专用包装材……"请求"授予林业劳改营工作人员勋章和奖章……"那就授予吧……还有什么呢？谢罗夫（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之一。——本书作者注）关于在华沙会见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扬科夫斯基和波兰地下政党"农民党"、"劳动党"、"民主协会"、"人民民主主义者协会"、"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在决定怎样对待这些政党之前，应当同贝鲁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商量。这里还有一个国防委员会决定草案：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1个营和1个高射炮兵团来警卫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和他的政府[29]。应当同意。贝奈斯过去曾给他帮过大忙，现在也很忠诚……

斯大林一连翻阅了几十个文件：关于苏联战俘营中的战俘人数，关于回国苏联公民接待审查站（好几万人从这里直接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改营）的工作，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土匪活动猖獗的情况，关于肃反委员会的部队在科布罗夫、采纳瓦、别利琴科领导下，在白

俄罗斯西部地区"清除反苏分子和消灭武装叛匪"的行动,关于建立新的特种营来审查被释放回来的苏联军人的问题……贝利亚报告说,我国东部不少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外贝加尔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无穷无尽的报告、资料、汇报……而很快又有军人来作例行的汇报。军人之后,莫洛托夫要来。现在该轮到外交而不是枪炮说话了——理直气壮地说话了。

斯大林和盟国

希特勒几年前在柏林点燃的战争火炬眼看就该熄灭了,在柏林也是这样。从4月底到5月初,安东诺夫每天都要向斯大林汇报我们的部队同盟国接触的情况。一提起盟军……对最高统帅来说,这是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而且不仅是他)曾对它有过长久的期待、希望、失望、讨价还价、猜疑、重新燃起希望,最后终于跟它搞好了军事上的合作。除了总参谋部整理的关于同盟军接触情况的综合材料之外,安东诺夫还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大包下面送来的报告,它们来自第58近卫步兵师司令员、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部、第61集团军司令员、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第5近卫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政治部以及其他司令部和政治部。这些报告是斯大林特意要的。他想了解将军们、军官们、班长们和士兵们的情绪,弄清盟国的行动,确定将来对盟国的方针。要知道战争只是在西方行将结束。

盟国的领袖们在德黑兰、雅尔塔(很快又在波茨坦)握手言欢,从而迈出了几大步促使地球上的人们——居住在一栋正在无限的宇宙空间飞行的太空大厦上的人们——弄懂一个在取得共同胜利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才会尖锐地摆在他们面前的真理。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丘吉尔和早逝的罗斯福,看来当时都没有想到,我们的文明是稀世珍宝,而且在无限的宇宙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作出了相反的证明。在我们周围没有住人的星球,也没有类似地球的"飞船"。因

此，一部分地球人想要消灭按照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维的另一部分地球人的任何尝试，都会使这个珍贵的策源地遭到摧毁。人类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进人一个核子宇宙时代。但是当时，1945年春天，几个过去的冤家对头所结成的同盟好像很巩固、很牢靠似的。尽管斯大林的观念非常正统，他为了反法西斯同盟，牺牲了共产国际，把思想上的条条框框远远地抛在一边，不去计较丘吉尔和西方民主国家长期坚持的根深蒂固的整个反苏立场。在最紧要的转折关头，实用主义从来都是斯大林首先使用的观点。

最高统帅平常只看总参谋部的通报、前线的汇报以及大本营代表的报告。而现在，在这胜利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他已翻看了不少具有其他内容的汇报材料。请看其中的一份：

> 1945年4月25日15时30分，在东托尔加乌的桥头地区，第173近卫步兵团的全体军官同属于美国第1集团军、第5步兵军、第69步兵师的盟军巡逻队举行了会见。以美国军官罗伯逊为首的五人一行，渡过易北河前来东岸进行谈判……
>
> **鲁德尼克**[36]

* 鲁德尼克是第58近卫步兵师的参谋长。

鲁德尼克*是何许人？这个鲁德尼克和那些资本主义世界的盟军士兵接触时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是会握手言欢，还是会发生摩擦呢？

斯大林想起了，在三个星期以前，他收到了阿巴库莫夫的一封“紧要”电报。阿巴库莫夫根据波尔塔瓦空军驻地第68区“除奸部”的报

告，汇报了科瓦列夫少将的行动，这位少将说："我们同美国人合不来，在波尔塔瓦有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因此科瓦列夫下令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万一"。

*1944年，美国空军曾利用波尔塔瓦机场进行"穿梭"作战。

斯大林读完密电低声骂道：

"哪里来的一帮笨蛋？瞧，连作战计划也是这个科瓦列夫制定的……"

他在文件上斜着写了一句笔触奔放的批示：

送法拉列也夫同志（空军）

请管住科瓦列夫同志，禁止他擅自行动。

约·维·斯大林

这里还有一份汇报说："同美、英两国的军队会见时，气氛非常热烈。请看第58步兵师师长同美国第69步兵师师长莱因哈特……等几位将军会见时的情景：举杯、致词、送礼品、呼喊'乌拉'。第5近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卡特科夫汇报说，这次会见，美国人都尽力设法摘到星章、肩章、扣子……等物留作纪念。这位将军说，使苏联士兵十分惊奇的是，美国的将军和士兵难以区分，大家穿着都一样。我们的情况就好得多，是不是将军老远就能认出来了……"[⑥]



在斯大林、罗斯福的肖像和"向英勇的美国第一集团军致敬"的横幅下面，美、苏军官与红军女战士一起翩翩起舞

斯大林心里是同意苏联士兵的看法的。要知道他自己就喜欢元帅服，现在也没有舍弃它，经常要在镜子跟前照上几分钟。实行腐朽民主

制的美国人不懂得一个社会应当分出等级，三六九等，从穿着上，无论是谁都能一眼看出来……顺便说一句，这次会见，如卡特科夫所说，作家西蒙诺夫也在场。他对战争的描写不错——最高统帅暗自在心里表扬了一句。现在终于握手言欢了，可是过去为了建立合作关系花费了多少力气啊！



在战前互不信任的苏联和英国面对共同的敌人逐渐走到了一起。苏联大使发表讲话，感谢英国人民对苏联的帮助

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互不信任和怀疑应当结束了。战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做到了。元首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迫使苏联和西方国家成了盟友。斯大林记得，1941年7月12日，英国大使克里普斯和他的同事以及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是怎样来到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沙波什尼科夫、库兹涅佐夫、维辛斯基的陪同下会见了英国客人。当时斯大林无论怎样也克服不了战争爆发后产生的那种高度震惊的心态。他费了好大劲装着像平常那样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在这次正式接见半个小时之前，沙波什尼科夫还向斯大林报告说：两天前，德国第2、3坦克集群和“中央”集群第9集团军的一部在宽阔的正面上推进到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相通的地带……真是难以想象：德国人已经打到了第聂伯河畔！德国一批集团军的集中突击部队，大约有70个军团的兵力，已做好准备，要在当时已开始的斯摩棱斯克会战之后，乘胜前进，对莫斯科实施毁灭性突击……心态失衡的斯大林只是机械般地同英国人一一握手，用冷漠的眼光望着签署两国共同行动协议的莫洛托夫和克里普斯的背影。

他记得，在这事一星期之后，苏联大使迈斯基怎样在伦敦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签订类似的协议的，然后，还是在7月，还是在伦敦，苏联和波兰政府又签订了对德作战的互助协定。由于波兰



苏德战争爆发后，西方的一些政治家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抗德斗争。图为7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私人代表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

一方的坚持，协定第1条款规定："苏联政府承认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订的有关波兰领土变动的条约无效。"[⑯]同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这位美国人受总统的委托宣称："凡是同希特勒作战的人，在这场冲突中都是正义的一方，我们都打算给予援助。"[⑰]斯大林简短地陈述了希望得到技术援助的要求，并且表示希望总统理解苏联的处境。援助协定将在以后签订，但是霍普金斯的参观性访问揭开了建立合作关系的序幕。

过了一年，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同国务卿赫尔签订了有关"反侵略作战"原则的协定。斯大林早在同霍普金斯交谈时就陈述了前线的危急状况，并请求（他是很不善于这样做的，要知道斯大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从未向任何人乞求过任何东西）美国能尽快运来中等口径的高射炮、大口径的高射机枪、步枪、制造飞机用的铝材和高辛烷值汽油。斯大林紧跟着用不高的但很坚定的声调说："请把我的请求转告给总统——我们需要飞机，许多许多飞机……"早在7月，斯大林就派了一个以戈利科夫将军为首的特别使团到英国去。斯大林向这位将军作了指示，并委托沙波什尼科夫、季莫森科、米高扬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指导。戈利科夫有两大任务：促使英国人对在欧洲或北极登陆的战略感兴趣；促使英国人尽快给予军事技术援助。戈利科夫回到莫斯科并向斯大林作了半小时的汇报之后，又奉命立即前往美国。在这里斯大林特别注意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争取美国能提供大量的军火。在失败的威胁面前，斯大林在军事政治方面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思想上的对抗立即退到了第二位，成了次要的、可以忍一忍的因素。

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斯大林很快就抛开了思想上的成见，果断地去适应西方列强的愿望。可话又说回来，他是没有其他合理选择的。总的说来应当肯定，在建立反希特勒的同盟方面，斯大林起了突出的作用。从战争爆发时起，随着心态平衡的逐渐恢复，苏联领袖就开始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支持，想方设法使日本和土耳其对苏联保持中立。当然，他把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英国和美国身上。

斯大林竭力想把处于萌芽状态的合作关系一下子纳入实用领域。例如，1941年7月18日，斯大林在给丘吉尔的第一封信中就差不多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我觉得……如果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方（北极）能开辟反希特勒战场，那么苏联以及英国的军事状况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在后来所有的谈判、书信和电报里，斯大林都不断地提到第二战场。诚然，在同一封信里，也说（就好像把他在战前的手腕和行动同今天的现实割裂开来，为西方所不同意的领土变动进行辩解似的）："可以想象，如果苏联军队不是在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布列斯特、比亚威斯托克、考纳斯和维堡，而是在敖德萨、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明斯克一带和列宁格勒郊区对付德军的突击，那么德军的地位就更有利得多。"[⑩]我们知道，丘吉尔早在7月26日就已声称，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实际上不可能。斯大林由于德军在8月的行动而陷入危局后，再次给丘吉尔写了一封私人信，信中使用了一种十分坦诚、甚至连自己和盟友的脸面也不顾的语调。斯大林讲述了苏德战场上新遭到的重大战略失败之后，问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极为不利的处境呢？"接着他回答说："我认为，要改变这一处境，出路只有一条：今年就在巴尔干或法国的什么地方开辟第二战场，把德军30至40个师团从东线吸引过



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巨大牺牲都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同情。反法西斯同盟迅速形成。各种物资络绎不绝地运往苏联



1944 年 6 月 6 日，代号为“霸王”(Overlord)的登陆作战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展开。参战的盟军共 36 个师，总兵力约 288 万人，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上图为美、英和加拿大等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去，同时到今年10月初保证供给苏联3万吨铝材，每月至少支援400架飞机和500辆坦克(小型的或中型的)。

“没有这两种援助，苏联就会要么遭到失败，要么实力被大大地削弱，在很长时间内都无力支援自己的盟国……

“我知道，这封信会使阁下感到伤心。但是怎么办呢？经验已教会我正视现实，不管它多么令人不愉快，还教会我不怕讲出真情，不管它多么不合人意。”[39]

当他口授这几段话的时候，他是否想起了1939年8月他太着急了呢？要是他有耐心，而伦敦和巴黎有远见，说不定反法西斯同盟能提前两年建立起来哩……但是，斯大林从来没有表示过犹豫。他早已习惯于认为：人们应当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斯大林在自己的信中以苏联会遭到失败作为必须给予有效援助的理由。如果说由于盟国的善意，斯大林终于获得了巨额的军事技术援助(遗憾的是，对于这种援助，我国的军事历史著作长期以来都估计过低，或是明显地缩小了它的意义)，那么他为开辟第二战场所作的努力，效果却不大。我们知道，斯大林早在1941年7月就向丘吉尔提出这一建议。但是，经过了极为困难的1941年和困难的1942年，然后又经过

了并不轻松的1943年……直到1944年6月，才开始了“Overlord”战役。顺便说一句，那时斯大林曾问莫洛托夫，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当他听说是“主宰”、“霸王”时，就很反感。他认为战争命运的真正主宰正从东方走向柏林。丘吉尔本性难移，准是他的创造……当时苏联军队正在准备一系列突击，要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并向德国边界推进。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苏联有能力一对一地去摧毁希特勒德国了。

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大本营的首脑，不得不极大地关注外交问题。在这盼望已久的胜利日益逼近的时候，莫洛托夫在斯大林那里呆到很晚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斯大林同盟国代表会见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最高统帅知道，在当时的反法西斯同盟中，英美两国的行动在绝大多数场合都是配合一致的，好像是西方一支统一的力量。但同时，斯大林早在战争初期就觉察到这两个伙伴在立场上有着某种差别。斯大林为人很狡猾，他企图从罗斯福和丘吉尔所采取的具体外交步骤的背后看出他们的秘密意图，看出他们想利用当时的局势捞到的好处。盟国无止境地拖延和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使国防委员会主席十分忧虑而常常发怒。通过外交和情报机关的渠道获得了有关三次华盛顿会议（第一次在1941年12月—1942年1月，第二次在1942年6月，第三次在1943年5月）、英美两国的卡萨布兰卡会晤和魁北克会晤以及其他接触的材料，并同莫洛托夫讨论了这些情报之后，斯大林才看出，盟国只是打算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确实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才开始在欧洲采取行动。

1942年5—6月，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前往华盛顿和伦敦。人民委员会主席给外交人民委员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同盟国谈判是为了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它们应承担的一些具体任务。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诚然，英苏两国在伦敦通过的联合公报中也说：在谈判过程中，“在看法上达到了充分一致，认为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非常紧迫的任务”[⑩]。但是，很快就看清楚盟国并不打算履行自己的义务。斯大林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恼怒和不满。这从他1942年7月23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就可以觉察出来。例如该信中说：

至于……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问题，我担心这个问题已

经开始变得严重起来。根据苏德战场的目前情况来看，我应当严正声明：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把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的问题拖到1943年来解决[⑩]。

丘吉尔在收到这封电报后，据他后来自己的回忆，已经不是只写封信就算了事了。他表示愿意在苏联同斯大林进行私人会晤。斯大林表示同意。8月12日，丘吉尔在总参谋长布鲁克、副外交大臣卡多甘及其他官员陪同下来到了莫斯科。丘吉尔在回忆他从开罗飞往莫斯科的心情时写道："我在反复考虑我去这个阴森可怕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使命，因为这个国家刚诞生之时，我就始终不渝地想扼杀它，而直到希特勒出现的时候，我都一直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应当对他们说什么呢？擅长文学的韦维尔将军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写成一首诗，并在头一天晚上让我看。其中有几段四行诗，每一段的最后一行听起来就好像都是在说：'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这无疑等于把一个大冰块带给北极。"[⑩]

斯大林顾不得极其困难、危急的斯大林格勒战场和东南战场，同丘吉尔进行了许多小时的长谈。参加会谈的苏方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英方有凯尔大使和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曼。丘吉尔不得不直言不讳地说，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盟国试图开辟第二战场，那么用首相的话说，其结果很可能是盟国遭到失败。斯大林喋喋不休地反驳了半天，当然他主要是从道义上谈问题的。

"谁不愿冒险，谁就永远不会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应当一味害怕德国人。"斯大林摆道理说。

英国首相也不服输。他说："但是，欧洲的第二战场并不是惟一的第二战场。"他力图用盟国的北非作战方案来诱惑斯大林。

8月12日斯大林同丘吉尔会谈时，无论他们扯到哪里，到后来都要回到第二战场的话题上来。不愉快的前方形势促使斯大林这样做。但是，丘吉尔借哈里曼的帮助不断找出新的论据来证明1942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于是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商量之后，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步骤。在8月13日举行例行会谈时，斯大林交给了对方一份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备忘录。虽然头一天斯大林好像曾"打过退堂鼓"，认为"这件事不归他管"[⑩]。备忘录确认，盟国正式拒绝执行1942年6月12日英苏两

国公报中所规定的双方都同意的决定。丘吉尔被弄得非常难堪。当时不仅斯大林格勒,而且可以说我国整个南方都危在旦夕,处在危急状况下的斯大林认为盟国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备忘录中有一些话就是斯大林头一天对丘吉尔和哈里曼说过的话。英国首相一下子就知道了备忘录要讲的是什么东西了:

……英国政府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所有希望开辟第二战场的苏联公众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使得前线红军的处境更为困难,使得苏联统帅部的计划遭到了损害……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在1942年能够而且应当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使英国首相先生相信这一点,而美国总统的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的谈判中是完全支持首相先生的。

约·斯大林

1942年8月13日[88]

自然,丘吉尔第二天就回送了一份"备忘录",他说"同莫洛托夫先生进行的有关第二战场的谈判,既然有许多口头和书面的附加条件",就不能成为"修改俄国最高统帅部战略计划"的依据[89]。

直到1944年中期,第二战场问题在斯大林的外交活动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诚然,当胜利之风使他的风帆涨得越来越满的时候,最高统帅已经不是像战争开始时那样极度地强调这个问题的意义。例如,1942年10月,美联社记者凯森迪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求见斯大林,尽管他没有得到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接见,但却收到了一份非常简洁的书面答复:

1.在苏联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

答: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头等重要的地位。

2.盟国给予苏联的援助,其作用如何?……

答:苏联把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都吸引过来了,同苏联给予盟国的这种援助相比,盟国给予苏联的援助,其作用目前还是很少的[90]。

斯大林在反复考虑自己对待盟国的行动方针时非常明白，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伙伴，都完全是按照客观现实的绝对要求行事的。由于各种历史情况的凑合（无论是他现在的盟友还是他斯大林都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才到了一个军事阵营里。但是，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忘记。他记得威尔逊、丘吉尔、张伯伦、达拉第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活动家对苏联的看法。现在，由于盟国面临着共同的威胁，他们才不得不接近起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斯大林早在1942年就确定了他对盟国的原则立场。他认为，一个承担着反法西斯斗争主要担子的国家，完全有理由要求在联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所谓特殊，是说它有权提出关于援助的建议（含有要求的意味）。在捍卫国家利益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了一个强硬的、决不退让的政治家的气概，因而赢得了伙伴们对他的尊敬。在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的心目中，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冷酷的独裁者。他清楚这一点，但不想去改变他们对他的印象。

除了力争得到盟国尽可能多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应当说援助确实是很可观的）之外，斯大林还设法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当1942年8月的一个夜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丘吉尔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人都知道隔着几个楼区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在地，而共产国际同那些以希特勒为代表而且也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势力在阶级利益上是势不两立的。因此，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决定（形式上


1942年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姆林宫

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在有远见的分析家看来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斯大林又一次像1939年9月那样，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要交一大笔"费用"也在所不惜。是否要把真正的原因掩盖得很巧妙，他倒无所谓。1942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着重指出：盟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是进行军事政治合作的障碍。"当前的威胁，"斯大林强调说，"无条件地要求同盟国的成员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使人类不致回到野蛮时代，回到中世纪的残暴时代"。[89]这些话无疑是针对法西斯讲的。从实质上说，斯大林在报告中贯彻了这样一种思想：阶级逻辑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时期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也希望在我们今天人类能把这一结论永远肯定下来。

共产国际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这个要用一块鲜红的旗帜铺满全球的国际劳动者组织，于1943年春天自行解散了。1943年5月28日，斯大林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金的问题时着重指出："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90]

斯大林的政治实用主义使他不惜解散共产国际，也促使他调整了同东正教教会的关系。这个旧日的正教中学的学生在那以前是一直都不关怀教会的。而且按照斯大林的倡议，从1925年起不允许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选举牧首，大牧首执事谢尔吉都主教成了临时牧首代理。斯大林不允许召开地方主教会议，从而也就无法补充正教院的成员，使其长期不能发挥作用。1943年9月4日，斯大林突然邀请俄罗斯东正教事务管理委员会主持卡尔波夫来到他的别墅。在这次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参加的会谈中，他们讨论了教会在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问题。必须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止一次拿出巨额款项以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并把许多珍贵物品交给国家收藏。神职人员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巩固人民对最终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斯大林听了卡尔波夫汇报后，提议当天就接见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几小时后，谢尔吉、阿列克谢、尼古拉等这些由于得到高度重视而感到十分惊奇的都主教都已来到了斯大林的别墅。他们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赞成召开主教会议，选举牧首，开办宗教学校。十分欣

赏自己“宽宏大量”的最高统帅,也答应给予物质帮助,放宽各种限制,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贝利亚。我想斯大林是在自我欣赏:一个旧日的宗教中学学生竟然不仅能影响高级宗教人士的命运,而且能影响整个宗教界,真是不可思议。说句公道话,斯大林所作的许诺,很大一部分都已实现了。

第二天,1943年9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国家领导同教会领导举行重要会晤的消息(这是到1988年为止的惟一的一次会晤):“……都主教谢尔吉告诉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正教教会领导层打算于近期召开主教会议,选举莫斯科和全俄的牧首,并成立牧首下属的圣正教院。政府首脑斯大林同志对这一建议表示赞赏,声称政府方面不会有什么障碍。”

为什么斯大林突然想起了教会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最高统帅认为教会在战争期间起了爱国作用;第二个原因与国际事务有联系。斯大林准备年底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晤。他的目的不只是争取尽快开辟第二战场,而且要争取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当时英国教会领导人之一郝·约翰逊所领导的英国声援苏联委员会,在这方面能起不小的作用。斯大林收到这位坎伯雷特教长的几封来信之后,决定公开作出姿态,证明他对教会颇有诚意。斯大林懂得,这一信号一定会在西方引起注意,得到赞许。推动苏联领袖这样做的不是这位旧日宗教中学没有毕业的学生的虚荣心,而是他对盟国的十足实用主义的打算。

同盟国的关系在“三巨头”会晤时达到了顶点。大家都知道,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克里木会议(1945年2月4日—11日)、柏林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是各方面都不相同的几个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合作的顶峰。也许这几次会议以及整个合作本身,当时已经表明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的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会议的决定和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我只想谈几个问题,它们涉及斯大林对待会上所讨论的问题的态度。

斯大林是一个“不爱出门的人”。他准备会见盟国的首脑,但又不愿离开得太远和太久。丘吉尔和罗斯福曾提议把开罗、阿斯马拉、巴格达、巴斯拉以及其他一些在苏联以南的城市作为会晤地点。丘吉尔甚至预计斯大林会同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会晤,用英国首相的话说,在

那里可以支三个帐篷，在没有危险和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商谈。斯大林坚持在德黑兰，因为照他的话说，在那里他可以对大本营继续进行“日常的领导”。丘吉尔和罗斯福经过长时间的书信来往之后不得不同意了。当然，斯大林没有说他害怕坐飞机。在斯大林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坐飞机。他本人不喜欢冒险，不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出什么意外。“领袖”的功业即将垂成，任何不幸事件稍有可能发生(哪怕可能性很小)，都会引起斯大林的恐慌。他在起飞两天前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各拍发了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

“您从开罗的来信收到了。我准备于11月28日晚在德黑兰为您效劳。”

“……准备为您效劳……”一语出自斯大林之口，非同寻常。苏联领袖不过是想显示绅士的风度。

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想设法使第二战场问题成为注意的中心。诚然，在11月28日晚上同罗斯福会见的时候，他们谈的是苏联的天气、黎巴嫩事件、蒋介石、戴高乐、印度的情况，而不是第二战场的问题。他们甚至扯到了印度未来的政治制度，当时罗斯福出人意料地说：“最好印度也建立一个类似苏维埃那样的制度，要自下而上，而不要自上而下。可能这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根据自己的看法对这一点作了解释，他回答说：“所谓自下而上，就是走革命的道路。”[10]

斯大林是第一次在国外参加国际会议，他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伙伴。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这时丘吉尔已经不太使他感兴趣了。他跟他较量过，深感这位政治家聪明过人，诡计多端。罗斯福两眼炯炯有神，面带倦意和病容。不知为什么斯大林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坦率吧。例如12月1日，在最后一次同斯大林谈话时，罗斯福一副憨厚的样子，老实地说，他现在不愿意公开讨论波兰的国界问题，因为明年他可能再次提名竞选总统。而美国有“六七百万波兰血统的公民”，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愿意失去他们的选票”。斯大林喜欢他的坦率，虽然元帅自己很少遵循有啥说啥的原则。

在“三巨头”当中，罗斯福最年轻。会议开幕时，他第一个发言，称会议的参加者是“新家庭的成员”。丘吉尔补充说，几位领袖聚会在这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罗斯福和丘吉尔看了看斯大林，心想：会议伊始，他会讲些什么呢？



1943 年，罗斯福(左)、丘吉尔(中)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吃午餐



1943 年在德黑兰，斯大林亲吻着丘吉尔赠送的斯大林格勒剑

"我想,我们是历史的宠儿,"斯大林出人意料地说。"历史把最大的力量和最有利的条件交给了我们。我希望我们能想方设法在这次会议上有着合作的精神,充分地利用我们的人民赋予我们的力量和权力。现在就让我们干起来吧……"

在第二战场这个主要问题上,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1月30日,在代表团团长共进早餐的时候,罗斯福牢记着斯大林在头两天会谈时一再提出的问题(要求),他一面打开餐巾一面微笑着向斯大林说道:

"今天我和丘吉尔先生根据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5月间开始'霸王'战役,同时部队在法国南部登陆……"

"这项决定,我很满意,"斯大林在回答时尽量使心情保持平静,"但我也想告诉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我们的部队也在作准备,到……登陆战役开始时,要给予德国人强大的打击……"斯大林拿出的"土产"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由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1943年12月1日签署的三国宣言中说:"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面在这里分手。"在讨论南斯拉夫、土耳其、芬兰、日本、战后德国以及进行战后合作以保障持久和平问题时,斯大林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德黑兰,就像后来在克里木和柏林那样,波兰问题在"三巨头"谈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在宣布闭幕以前,丘吉尔宣读了一项看来已经同罗斯福协商过的建议:

"波兰国土和民族家园应当位于所谓寇松线和奥得河线之间,东普鲁士和奥波尔省应当划归波兰。"

斯大林答复说:

"如果英国人答应把上述领土(柯尼斯堡和梅梅尔这两个不冻港。——本书作者注)交给我们,我们就同意丘吉尔先生的提法……"[10]

当然,在"三巨头"会议上所谈的问题中,有许多是严重违反道义原则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武力和理智的协调一致,过去在国际关系当中是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人类只有在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时,才会幡然悔悟,开始掌握新思维。民族的和领土的修正,永远是危险的。而今天并不亚于过去。

在克里木会议(会议是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被摧毁之前三个月召



雅尔塔会议上的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开的)上,就波兰的未来交换看法的时候,斯大林阐述了他早已考虑成熟的意见,他说:“波兰问题不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一个安全问题。说它是道德问题,就是因为俄国人过去对波兰犯过许多罪孽。说它是安全问题,是因为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在历史上,波兰经常是侵略俄国的敌人所通过的走廊……为什么敌人直到今天还那么容易通过波兰呢?首先因为波兰是个弱国。波兰走廊不能只是依靠俄国的武力从外面硬性地加以封闭。为此需要波兰强大起来。这也就是苏联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波兰的原因。波兰问题是一个关系苏维埃国家存亡的问题。”[11]

在讨论“波兰问题”时,斯大林暗示,他更为看重的是政府问题,而不是国界问题。他很痛快地表示他同意寇松线,同意在这条线上的某些地区向波兰让出几公里,至于政府……那不行。斯大林在这里决不退一步,尽管在战争开始时他表示过合作的意愿。他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少将在1941年8月18日如何根据他的指示签署苏波两国最高统帅部的军事协定。协定规定,苏联一方不仅要承担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波兰军队的费用,而且还要在伦敦的波兰最高统帅部下面设立苏联军事使团[12]。而现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却把波兰的合法政府称为“卢布林政府”,尽管这个政府在华沙控制着全国的局势!“三巨头”的三次会晤都提出

了“波兰问题”。但是，斯大林采取了一次坚定的立场后“就顶不住了”，不过他并没有投降。正是由于他的坚持，罗斯福和丘吉尔才同意扩大波兰在北部和西部的领土。

在战争后期和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大量军事性质的和外交性质的事务一下子就压到了斯大林的肩上，这是他没有意料到的。当然，莫洛托夫在这里给予了不少帮助。他的助手维辛斯基、卡夫塔拉泽、迈斯基以及其他人也被吸收进来。但是，最高统帅牢记着与盟国签订的协议和本国的利益，所以常常是亲自作出决定。当丘吉尔过多地插手东欧事务时，他发火了。于是苏联军队开到了东欧。斯大林认为，莫斯科有解决未来事务的优先权。自然，也要同朋友们，同那些过去和现在都在帮助消灭法西斯的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协商一致。

斯大林再次确认莫洛托夫是坚决执行他的意志的人。他的指令、指示对这位人民委员来说比党章还重要。战后，1945年11月的一天，莫洛托夫对大元帅述说，10月15日哈里曼差点把他“逼降了”，但是他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领袖”不解地看了一眼人民委员，于是人民委员就把他同哈里曼的对话讲了一遍。原来斯大林打算去度假，这是战后第一次度假，而美国大使却在这时一再请求他接见。于是斯大林对人民委员说：

“你自己接见吧，我不见了。告诉他没有必要。”

“就这样，”莫洛托夫说，“哈里曼和使馆的一等秘书佩治来找我了。我们进行了谈话，内容我都记在日记上了。”（下面我把这次谈话，差不多是全文，都引出来。——本书作者注）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雅尔塔会议上


哈里曼：“我收

到了总统给大元帅的一封电报。他责成我把电报亲自交给斯大林,并亲自同他讨论一些问题。"

莫洛托夫:"斯大林现在外出休假,时间大约一个半月。我将把总统的要求转告斯大林。"

哈里曼:"总统知道斯大林在休假,但还是希望斯大林能接见我。事情关系到伦敦会议。我可以去随便什么地方。"

莫洛托夫:"斯大林大元帅现在不处理公务,因为他在休假,离莫斯科很远。"

哈里曼:"总统希望斯大林能接见我。"

莫洛托夫:"我将报告斯大林。"

哈里曼:"总统认为大元帅理应休息。"

莫洛托夫:"我们都认为斯大林应该得到真正的休息。"

哈里曼:"在检阅体育队伍时,我注意到斯大林的样子很健壮。"

莫洛托夫:"斯大林确实是一个健壮的人。"

哈里曼:"在检阅体育队伍的影片上,斯大林大元帅看上去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莫洛托夫:"所有的苏联人看到斯大林精神很好,都很高兴。"

哈里曼:"我很想得到这个影片。"

莫洛托夫:"当然,您一定会得到的。"

哈里曼:"这次拜访的用意已经讲了,另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莫洛托夫:"我一定转告给目前正在充分休息的斯大林。"

哈里曼:"没有必要讲问题的重要性了。"

莫洛托夫:"是的,我明白。"

哈里曼:"我希望作为一个朋友去见斯大林……"

莫洛托夫:"我一定转告斯大林。但是大元帅正在休假。"

哈里曼在他的《晋见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一书中写道:"我应当承认,对我来说,斯大林始终是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不可理解的、最神秘莫测的和最矛盾的人。最后的断语应当由历史来下,而我也要为历史保留这一份权利。"[13]当哈里曼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也许他也

回忆起上述这段插曲。

为这次令人惊异的、看起来空洞的对话作记录的巴甫洛夫不仅记下了莫洛托夫的顽强劲头，而且也记下了哈里曼的顽强劲头。无论什么样的会议，无论什么样的总统请求，都打动不了莫洛托夫的心，因为他把"领袖"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莫洛托夫就是这样执行他的指示的。这里根本谈不上灵活性。这是斯大林教育出来的。斯大林在听这位人民委员一个人讲了半天之后突然说了一句：

"莫非杜鲁门有什么重要事情，哈里曼当时真的想要转达吗？"

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相互使了一个眼色，他们不明白斯大林是开玩笑呢还是真的可惜放过了一个机会。

波斯克列贝舍夫准备好了几包文件，其中有一些材料涉及获得解放的国家，上面还有斯大林发布的号令。材料可真不少！前不久，斯大林寻找一份他需要的文件时，都为材料之多感到吃惊。他对柳提在赫尔辛基玩弄的手腕记忆犹新。柯伦泰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说，芬兰人本来准备退出战争，可是1944年6月26日，在里宾特洛甫来到赫尔辛基之后，柳提突然发表公开声明说："我以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名义声明，在没有同德意志帝国达成协议之前，决不同苏联签订和约；在没有同德意志帝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也决不允许我所任命的任何一个芬兰政府和个人去进行停战或媾和的谈判，或是以此为目的的谈判。"[19]

斯大林迅速作出了反应：在卡累利阿战线尽快实施进攻战役。他早就懂得，强大的打击任何时候都能使敌人更快就范。结果果然如此，尽管战役进行得不像斯大林预期的那样顺利。在战争后期，他对那些辜负了他的信任的人要求得更苛刻更严格了。不错，芬兰人早在1944年9月4日就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对苏联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但是，斯大林很自信，他要对那些本来应该使曼纳林更快就范的人作出相应的评价、符合他自己特性的评价：

致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

卡累利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认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左翼的最后一次战役打得不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部队领导不力，指挥失当；同时大本营注意到，方面军的干部队伍中混进了一些不尽职的和

没有能力的人。除此之外，有些指挥员是芬兰籍军官，他们当然不会狠揍那些跟他们属于同一民族的对我军作战的芬兰人，因此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所属部队的信任……

卡累利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应当加强对部队的指挥，把那些游手好闲之辈和不能领导军队的人清除出去……

解除库兹涅佐夫上将的卡累利阿方面军副司令员的职务，令其听候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长的分配；皮加列维奇中将由于没有保证方面军司令部得到有力的领导，解除他的方面军参谋长的职务，令其听候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长的分配；解除谢苗诺夫少将的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的职务，令其听候……[12]

方面军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促使敌国退出了战争，而最高统帅还是不满意。斯大林明白，已经战胜了希特勒及其邻近的仆从国。但是，他现在依然忠于盟国的义务。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苏联和英国（它代表联合国）的代表同芬兰进行了谈判。于1944年9月19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斯大林在回顾近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事件时，十分吃惊：没有什么事不需要他——最高统帅亲自过问的！例如，下面是他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盟国对罗马尼亚管制委员会副主席苏萨伊科夫以及驻华沙的萨蒂洛夫下达的训令：

要　件

近来经常发生外国（包括英美两国）飞机在我军占领的领土上降落的情况。有害的宽容、不必要的轻信和警惕性的丧失，这一切都有助于敌对分子利用飞机降落的机会，把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恐怖分子、破坏分子和间谍派遣到波兰领土上来……[13]

下面是另外一份由最高统帅签署的文件：

要　件

致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

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

抄送元帅铁木辛哥同志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于8月31日10时把军队开进布加勒

斯特。部队不在市内停留，通过市区后就开始执行大本营第220191号训令所规定的任务，尽快占领克拉伊奥地区。在部队通过布加勒斯特时，要多出动一些飞机到市区上空。

2.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把开进布加勒斯特的第46集团军摩托化部队调往朱尔朱，任务是占领多瑙河渡口……

3. 注意部队通过布加勒斯特时的秩序和纪律。

约·维·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4年8月30日20时15分[12]



安东内斯库(1882–1946)
罗马尼亚将军，独裁者

1882年6月14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皮特什蒂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犯。二战期间，参加德、意、日法西斯同盟，1944年8月23日被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起义推翻，1946年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要知道安东内斯库在这月初还呆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他企图在加拉茨—福克沙尼一线组织防御，后来又180度大转弯去投靠英美军队。但是，罗马尼亚独裁者想阻止苏军进攻而等待盟军干预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爱国力量趁着红军胜利进军的时候，于8月23日推翻了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专政。在签署停战协定后，马上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有些地方的“机关”已经开始搜捕法西斯间谍。最高统帅立即作出反应：

致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
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
和捷夫琴科夫同志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禁止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逮捕，今后未经大本营批准，不得逮捕任何人……[13]

我想,谁会去请他批准呢? 请读者自己去分析吧……

要 件

致铁托元帅

抄送托尔布欣元帅

您要求托尔布欣元帅把保加利亚军队从塞尔维亚撤出去,只留驻在马其顿。此外,您还向托尔布欣元帅指出,保加利亚军队把从德国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拿来分配是错误的。我认为必须就这两个问题向您通报如下情况:

1.保加利亚军队是按照同您协调的总方案并应您在1944年10月12日第337号电报上提出的请求在塞尔维亚境内作战的,他们给了苏军重大的帮助……由于南斯拉夫境内还驻有德军的重兵集团,我们现在不可能把保加利亚军队撤出塞尔维亚……

2.关于战利品问题。按照战争的常规,战利品由谁缴获就归谁所有……

阿列克谢耶夫,朋友(斯大林)

1944年10月18日19时10分[19]

斯大林在翻阅他签署的文件时发现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可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 安东诺夫真是好样的,他已经驾轻就熟起草许多国际性的电报了,这样莫洛托夫就无事可做了,例如:

要 件

致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看了你们4月4日第024/ Ж报告,大本营命令:

1.对卡尔·伦纳要信任。

2.通知他,在恢复奥地利的民主制度的事业中,苏军统帅部一定给予他支持。

3.通知他,苏军进入奥地利境内,目的不是侵占奥地利领土,而是赶走法西斯占领者。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5年4月4日19时30分[20]

斯大林继续慢慢地翻看他最近才签署的文件。需要问问安东诺夫，大本营在战时发出了多少训令和命令？这哪是全部？还有国防委员会、政治局、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呢？历史学家留下的活儿可是不少……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检查一下他的书信、号令、训令……不应留下任何会有损于他在战争年代活动的东西。尽管他记得大部分“成问题”的命令都是口授的。

这一整包都是《匈牙利文件》……这是库兹涅佐夫上将同匈牙利军队的维列什·雅诺什上将商谈组建几个匈牙利兵团一事给斯大林的报告。这里还有第9近卫集团军司令员格拉戈列夫上将下达的关于把匈牙利第2和第6步兵师编入本军团的命令抄件。还有斯大林下达给红军的粮食供给部部长巴甫洛夫中将关于把大批食物移交给布达佩斯供给事务政府专员的命令，接下去是匈牙利临时政府主席米科洛什·贝拉的电报：

致斯大林元帅

自从英勇的红军把布达佩斯市从万恶的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布达佩斯的劳动人民再一次体会到苏联的巨大援助，它大大改善了令人一直感到痛苦的公共供应……根据匈牙利临时政府的



1945年2月1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获得解放

决定,我向伟大的苏联元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敬礼……[18]

斯大林把米科洛什的电报放在一边,心想:过去霍尔蒂为了使盟国先进入匈牙利领土,什么样的手腕都耍了,结果是一无所获。他忽而投靠希特勒,忽而投靠盟国,最后又投靠他斯大林,结果却被德国人逮捕了。傀儡的命运从来如此,最终只会遭到唾弃。德国的最后一个盟国垮台了,这还不算完。斯大林还坚持要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不仅退出法西斯同盟,而且要向德国宣战。盟国不能对斯大林说三道四,因为在苏军进驻的国家里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行动,最高统帅都通报了反希特勒同盟各国。

下面是他最近几天刚签署的一份文件:

致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

和铁木辛哥元帅

由于敌人已在乌克兰第4方面军面前退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1.方面军主力向西展开,在伊格拉夫、乌拉宾格、加尔恩的总方向上实施突击,然后向伏尔塔瓦河推进,解放布拉格。

2.用方面军右翼部分兵力继续在奥拉莫乌茨方向上进攻。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5年5月2日19时[19]

这里是一份在胜利之日由贝利亚带来的文件。是呀,斯大林也有自己的烦恼……诚然,斯大林在两天后签署了一项训令,事前他曾下令要在训令中反映盟国公民和原苏联战俘的命运。

要　件

致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司令员

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司令员

致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

戈利科夫、赫鲁廖夫、戈卢别夫等同志

为了有组织地接待在德国西部地区被盟军释放的原苏联战

俘和苏联公民并维持其生活，还为了移交被红军释放的原盟国战俘和盟国公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各个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地带建立收容营，安置原战俘和准备遣返的苏联公民并维持其生活，每个营容纳1万人。建营数字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15个；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30个；乌克兰第1方面军30个；乌克兰第4方面军5个；乌克兰第2方面军10个；乌克兰第3方面军10个。部分收容营可以设在波兰境内。

收容营建立起来后，对原苏联战俘和被释放的公民的审查工作分头进行：原战俘由反间谍机关"除奸部"负责；一般公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三家代表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任主席）负责。审查时间不超过1至2个月。

被红军释放的原盟国战俘和盟国公民移交给盟国统帅部的代表，具体做法由各军事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下达号令……

约·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5年5月11日24时[69]

斯大林一估量，约莫为100个营……有多少被俘虏被关押的人活下来呢？总共有多少人呢？现在，当他——一个胜利者——为全世界所瞩目的时候，是不愿意想这种事情的。将来他会委托贝利亚公布官方数字，给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去用。这会儿他又碰到了一份1942至1943年间不记得是哪一天他亲自口授的文件。在战争后期，他亲自口授密电的时候很少；没有必要那么紧急地去干预，何况该怎么办，安东诺夫都研究过了。总参谋长呈报的文件草稿往往正是最高统帅想看的。就好像他知道斯大林在想什么。好了，现在这份训令，他记得就是亲自口授给什捷缅科的：

致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司令员
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在我军同美军或英军会见时，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遵循以

下几点：

1.在举行会见的地段的高级军事首长首先应同美军或英军的高级军事首长建立联系，共同确定分界线。有关我们的计划和我军战斗任务的任何情报都不得告诉任何人。

2.自己不要主动承担组织友好会见的任务。在和盟军会见时，态度要和蔼。如果美军或英军想同我军搞隆重的或友好的会见……[119]

联欢、会见和晚会泛滥成灾，已经开始使斯大林发火了。现在朱可夫又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偕同维辛斯基飞往莱茵河畔法兰克福。朱可夫在他的电报里请求斯大林允许他把红旗勋章和“战斗功勋”奖章奖给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10名军官……[120]起先是他们奖励美国人，后来又是自己受奖……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可战后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斯大林考虑的是，要筹备召开三个同盟国首脑的柏林会议，解决一些与确立战后和平有关的复杂问题。再说战争还没有结束……斯大林不会像他的伙伴们那样，迟迟地不开辟第二战场。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作过要对日开战的保证。德国投降两三个月之后[121]，他就将无条件地兑现。

只是到了今天，6月28日，他斯大林才签署了几份打印有“绝密要件”字样的训令，内容是：到8月1日时，要准备好一切必要措施，“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特别令实施一场进攻战役”。在这几项下达给远东方面军司令员、滨海集群司令员和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中，提出了歼灭日本关东军的任务。“所有的准备战役的实施都要严守机密。给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任务时，要当面口授，不得有送交方面军的书面训令。”[122]。斯大林已决定飞往东部，除华西列夫斯基以及梅列茨科夫、普尔卡耶夫、伊万诺夫、马斯连尼科夫和希金外，其他军事领导人都让总干部部长提名。会打仗的人现在有的是……



第10章

迷信的鼎盛时期

最残酷的暴政，就是在法制的庇护下和正义的幌子下实行的暴政。

——孟德斯鸠

（法国启蒙思想家）

5

月9日，斯大林收到了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的速记记录。根据文本判断，一切迅速完成。虽说并不如此，当时出了一点故障。这个情况，谢罗夫从柏林打电话告诉过他，后来贝利亚也作了报告。照他们说的，投降书的签字仪式拖延了2至3个小时，“原因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斯米尔诺夫大使工作疏忽大意，他把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德国人投降的文件的正文漏掉了四行，而盟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拒绝签字。同我们的原文核对以后，漏掉的地方得到补正，关于投降的文件正文没有遇到任何异议”。[①]斯大林当时讨厌我们这里到处司空见惯的这种纪律涣散状态。

最高统帅读着速记记录，竭力有意识地想象着签署投降书时的气氛。可怕的战争如此漫长，战争的结束却如此短暂。主持仪式的朱可夫的最后发言，在斯大林看来甚至太平淡了：“我向英国空军主帅泰德、美军上将斯巴兹、法军总司令德拉特·德·塔西厄祝贺对德战争的胜利结束。”[②]如此平凡单调的结局……不过，事情还没有达到结局的地步。面临着同盟国进行关于建立战后和平体制的艰难的讨价还价。同日本的战争不用花很多时间了。但是，保卫主要的胜利成果——持久的、稳定的和平是多么重要啊！

斯大林懂得，他的威信（在战前只是在国内，是的，也许还在共产国际，是无可争议的）现在已经具有国际性、世界性了。西方列强的首脑们在个人会见和大量通信中，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备加赞扬。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指出，“您显示了酷爱自由、高度勇敢的人民摧毁野蛮的恶势力（不管这种恶势力多么厉害）的能力。值此我们取得共同胜利之际，我们谨向苏联人民和军队以及他们的卓越领导表示祝贺之忱。”[③]丘吉尔一如既往，发出一封更富感情色彩、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信件。夫人克拉拉·丘吉尔受英国首相的委托，5月9日在广播电台宣读了这封信件。信件中说道：“您从您的国家赶走了侵略者，粉碎了纳粹暴政，取得了辉煌胜利。值



1945年5月8日午夜11时30分,苏方在柏林接受德国投降。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投降的有苏方代表朱可夫元帅(左一)、美方代表斯帕茨将军(左二)、法方代表德拉特尔将军(左三)

此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我谨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坚信,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英国人民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在这里,在我们的岛国,我们今天常常想念您,我们谨向您致以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祝愿,祝您幸福,万事如意。我们希望,在我们一起通过了阴暗的峡谷、饱受一切牺牲和苦难之后,现在我们能和衷共济,相互支持,在胜利的世界的明媚阳光下继续前进……"[4]这在当时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就是这同一个人不久就在富尔顿讲出了完全另外的话。

被斯大林认为是一个过于拘泥的傲慢的人戴高乐,也承认斯大林在胜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他在贺电中强调指出:"您使苏联成为反对列强压迫者的主要成员之一,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能够取得胜利。伟大的俄国和您本人理所当然地受到整个欧洲的感激,整个欧洲只有作为自由的象征才能存在和繁荣昌盛。"[5]胜利之后大家就是这么说的……而战争前夕又说了些什么呢?今天有多少份祝贺啊!贝鲁特、蒋介石、铁托、保加利亚摄政王、麦克齐·金、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约瑟夫·奇夫利、穆罕默德·诺克拉什、费林格、米克洛什·贝洛、卡尔·曼纳林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发来贺电。斯大林推开一叠贺信,习惯地拿起烟斗,习以为常地走动起来——向办公室的一方走20步,再向另一方走20步。

在失去平静的世界里,一切都动起来了——人民、军队、他们的领

导人。甚至半瘫痪的罗斯福也乘坐巡洋舰、飞机到远方奔走。只有斯大林在过去了的一场战争中活动最少:1943年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坐飞机飞往德黑兰,1945年初启程到克里木会晤丘吉尔和罗斯福,1943年8月秘密巡视前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领袖”不喜欢穿越它的版图,他想知道一切,但只是从这里,从自己的办公室里知道一切。他觉得,从克里姆林宫,他学会了眺望远方,就像从厄尔布鲁士山之巅眺望远方一样。习惯于孤独生活(克里姆林宫—近郊别墅),加强了斯大林的“神秘性”。我不知道,假使当时有电视,他将作何表现呢?像勃列日涅夫那样,他想要在银幕上不断闪现么?但是那时斯大林宁可让人们谈他,写他,想他,而尽可能少地看到他。合他意的是一个很狭小的个人交往圈子:政治局的委员们,有时有几个人民委员、军事将领,很少有国外活动家。

很快他就面临着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国外之行。斯大林通过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斯大林在6月26日于莫斯科接见了他)建议盟国毫不拖延地在柏林举行首脑会晤。斯大林感到,在战争的年代,他疲惫不堪,越来越难以克服。65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疾风骤雨中度过的,现在就好像有重锤挂在他的两条腿上一样。他断然决定在东方的战争结束以后考虑到南方好好地长期休息一下。他相信,故乡高加索将使他产生新的力量。战前,斯大林通常在夏末到南方度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并从索契继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45年7月16日零晨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尔多沙漠中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图为原子弹爆炸时形成的蘑菇云

杜鲁门和丘吉尔同意

在柏林会晤，但把会晤日期拖延到1945年7月15日。斯大林还不知道，美国总统提出开会时间的出发点是美国准备试验原子弹。（苏联也开展了这个领域的工作，这个工作委托给贝利亚主持。早在1945年3月，斯大林就召见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总局局长戈利科夫上将提出报告：物理学专家可否从军队退役，把他们派到斯科别利岑物理科学研究所或其他科学中心。贝利亚还在更早就报告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系统内，他建立了几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吸收了一些“曾被关进集中营的”学者。）但是，当杜鲁门在波茨坦通知斯大林已在阿拉莫戈尔多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时，斯大林外表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参加过柏林（波茨坦）会议的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 丘吉尔焦躁不安地等待着杜鲁门同斯大林谈话的结束。当谈话刚刚谈完，英国首相就赶紧问美国总统：
>
> “怎么样？”
>
> 美国总统回答说：
>
> “斯大林没有向我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明确解释的问题，他只限于对通报表示感谢。”[⑥]

与会者猜测，斯大林是否理解这一通报的意义？他们不知道，关于必须尽量加速核领域的工作的密码电报就在这一天晚上送到了莫斯科贝利亚那里。但是，这将是7月24日在波茨坦的事情。而这时斯大林已准备启程。

“领袖”一下子就改变了乘“道格拉斯”号的飞行计划。贝利亚依据专家的意见试图证明，飞行将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独裁者是坚定不移的。他直到现在还以恐惧的心情回忆起1943年底飞往德黑兰时飞机在群山的上空好几次消失在气潭之中的那一瞬间。最高统帅抓住安乐椅扶手，面带惧色，好不容易才苏醒过来，久久不敢看坐在对面安乐椅上的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是否注意到了他的束手无策状态？而伏罗希洛夫自己好像也在体验着类似的感觉。因此，这次决定乘车赴柏林。贝利亚研究好了一条专门路线——比通常的更朝北一些。专列配有装甲车厢、专门警卫队、专门护送车。

我比较详细地谈这一点，是因为护送“领袖”赴柏林的行动，也许准备得比许多战斗行动要慎重得多。斯大林要求经常报告会议的准备进程以及对他沿途的保证，他对许多细节表示关注，多次下达指示。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了护送和保证“领袖”生命安全的行动。启程前两个星期，大元帅案头摆着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斯大林对待自己本人的态度。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即将举行的会议（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接待和布置的准备措施的筹备工作已经结束。准备好了62幢别墅(共10000平方米和斯大林同志的一幢两层楼的单独住宅：有15个房间、露天凉台、顶楼，共400平方米)。单独住宅有一切保证。有一个联系枢纽。建立了野禽、家禽、鱼肉食品、干鲜果品以及其它食品、饮料储备。在离波茨坦7公里处建立了3个带有动物和家禽饲养场、蔬菜基地的辅助设施；有2个面包房。全体工作人员都来自莫斯科。准备好了2个专用机场。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7个团的部队和1500名专业保卫人员组成警卫队。警卫队组成3圈。单独住宅的警卫队长是弗拉西克中将。负责会议地点警卫工作的是克鲁格洛夫。

准备好了专列。路线长达1923公里(苏联境内1095公里，波兰境内594公里，德国境内234公里)。由内务人员委员部17000名战士、1515名专业保卫人员保证沿途安全。铁路线的每一公里有6至15名警卫人员。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军队的8节装甲列车将在沿线来回巡视。

为莫洛托夫准备了一座2层楼的房子(11个房间)。为代表团准备了55所别墅，其中包括8个单独住宅。

拉·贝利亚

1945年7月2日⑦

我只略去了某些细节。很难找到如此安全措施的先例。而“领袖”在自己从20年代起实行的“禁欲主义”中走得多么远啊！斯大林的荣誉



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

越增长,他的年岁越老迈,他对自己的生命就越担心。在出发之前,斯大林询问贝利亚,有时一天问好几次,时而问启程是否保密,时而问列车的装甲板厚度如何,时而问波兰境内的列车运行进度……他是否记得,就是这条从莫斯科到柏林的路线,苏联士兵是在敌人的炮火下步行通过的呢?从准备工作的规模来判断,他未必记得。

7月17日中午12时在波茨坦同杜鲁门会晤,在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说道:

"请原谅我迟到了一天。我由于同中国人谈判耽搁了。我想飞来,但是医生不让。"

"完全理解。很高兴同斯大林元帅认识。"杜鲁门回答道。

斯大林迟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伟大"领袖"是可以而且必须给予等待的……这种心理手法斯大林用过不止一回。波茨坦谈判的英国代表团成员怀特回忆说:"……斯大林总是迟迟到会,我们也就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着他的到来。"⑧

晚上"三巨头"开始分享欧洲胜利的果实。这比长期保持联盟要简单一些。他们都感觉到,他们的奇怪的同盟也许已到了最后的日子。诚

然,8月又一次使人想起了这种联盟。

斯大林也好,他的对手们也好,还不能知道,过了几十年之后,世界将传遍把全人类的价值作为优先地位来加以考虑的"新思维"。那时,这看来还是一种绝对的空想……盟国面临的不只是分享胜利的果实,而且要考虑新的力量布局。

胜利的果实和代价

护送斯大林的长长的车队驶到了一所不大的灰色住宅前,它与前德国皇太子威廉的采齐林戈夫宫相距约7至8分钟的路程。从7月17日



采齐林戈夫宫设计风格属于英国的国宾馆式,是普鲁士王子的居所。1945年盟军巨头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曾在此宫殿举行著名的波茨坦会议

开始,在两个星期当中,三国首脑对战争作了总结,确定了德国的未来,对东欧各国的命运进行了争论,探索了解决"波兰问题"的道路,分享了德国舰队,确定了赔款额,商定了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和结束对日战争的大致期限,并且对许多其他事项交换了意见。开了13次政府首脑会议、12次外长会议,探讨了几十个问题,讨论了100多种文件的草案。

斯大林回到了自己的两层楼单独住宅,翻阅莫斯科发来的密码电



1945年，在柏林会议期间的最高统帅斯大林

报，有时通过政府专线向那里打电话，走近窗子，坐在安乐椅上，看看花园、美丽的湖泊、凋零了的松树。斯大林站在这块产生了巨大的战争机器的土地上想些什么呢？他与这个战争机器进行了长达四年、消耗极大的殊死斗争。也许，他想起了，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一种思想体系，他本人多年以来就已经是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献身者了？也许，他想起了1924年1月党的中央全会，那时就季诺维也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进行讨论时他声称，“不赞成对拉狄克因为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实行镇压[⑨]？”然而，斯大林谴责了拉狄克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同盟的方针，实质上，他不明白，他在国际事务上的一条错误路线就是由此而开其端。也许，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他们就不会让法西斯主义的多头蛇抬头……而镇压暂时还为时过早，镇压时期那时尚未到来。想到拉狄克时，回想起了1928年此人在托木斯克流放时说的双关语笑话。斯大林并不原谅他这个笑话。有人转告总书记，拉狄克在自己一伙人中说：“我们同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有分歧：他希望我个人长眠大地，而我希望相反……”诚然，拉狄克在他流放期间，很快改变了主意。在1928年9月，他给斯大林打电报，抗议继续逮捕和流放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并要求考虑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把他从阿拉木图接回。而过了半年，他在自己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信中却谴责了托洛茨基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言论……

年代越久，回首往事就越经常。拉狄克早就不在了，可还是回

想起了他；他曾经在20年代初研究过“德国问题”……也许，斯大林由于同杜鲁门和丘吉尔长时间辩论感到疲倦而想起了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给以帮助的台尔曼？在1939年底，莫洛托夫报告了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处当时的参赞科布洛夫的电报。科布洛夫通知说，台尔曼的妻子到全权代表处他这儿来过。她获悉同德国签订的“友好”条约后，请求莫斯科设法把她丈夫从法西斯监狱里拯救出来。关于自己她说“她没有任何出路了，因为她没有生存手段，真的是在挨饿”。科布洛夫对她声称，正如电报中所说的，“我们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她的两眼泪汪汪，她问道：“难道他为共产主义而做的全部工作都白费啦？”科布洛夫向她重复了自己的回答。参赞通知说，台尔曼的妻子“征求我们的意见——她可否向戈林发表声明；我回答说，这是她自己的事。台尔曼夫人非常伤心地走了”[10]。



台尔曼(1886-1944)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86年4月出生于汉堡。17岁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1年参加第三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领导汉堡起义。1933年被捕于柏林，入狱长达11年半，始终忠于革命事业。1944年被秘密枪杀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著作《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给一位难友的复信》均在狱中写成。

斯大林记得，那时他看看莫洛托夫说道，想一想吧，也许需要用马克帮助台尔曼的妻子？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解决办法来对待台尔曼，尽管他从法西斯监狱得以给莫斯科转交了几封信请求帮助。斯大林不想亲自向希特勒表示请求，不想使“友好”条约“黯然失色”。虽然，他向德国派出一个反法西斯小组，能够救出的就不仅仅是台尔曼。大概科布洛夫是对的，他声称，“这是罗莎·台尔曼个人的事情”。斯大林一如既往，没有受到任何良心的谴责。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回顾过去的良心……诚然，他一想到罗莎·台尔曼，就回想起了在胜利的战争协议签订之后，贝利亚马上就给他呈送了一份与德国无产阶级领袖

有关的文件。是的,是的,他想起来了,是有这样的文件。

致国防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驻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全权代表察纳瓦同志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小组发现了台尔曼的妻子罗莎·台尔曼,她从集中营逃跑出来并且躲藏在菲尔斯滕贝格市,台尔曼的女儿费斯特·伊尔玛已被红军部队从新勃兰登堡市的集中营里解救出来……

罗莎·台尔曼说,她最后一次见到台尔曼是1944年2月27日在博伊滕市的监狱里,有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在场。台尔曼说,他不断受到刑讯,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信仰……

拉·贝利亚

1945年5月11日[11]

斯大林读过报告后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对被解救的台尔曼亲属要创造相应的条件并给予必要的帮助。也许,有什么事情使"领袖"行动迟了……不过,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在战争结束时发生了啊! 比如谢罗夫,贝利亚的副手之一,报告说,在波兰第1步兵师作战的前线地区,从奥拉宁堡的德国集中营里救出了西班牙共和国前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巴列罗;他极端虚弱,请求告诉家里,他还活着……[12]还有一个例子,克鲁格洛夫报告说,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曾对被俘的亲属霍亨佐伦少校和德国工业家克虏伯之子冯·博伦·翁德·霍尔巴赫中尉逃跑一事给予协助……[13]难道他能够注意或者能够对所有这些千变万化的姓名——过去的和现在的、显赫的和普通的——作出反应?! 让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去干这些事情吧。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取决于他:从政治上结束战争。他掌握了军事上的胜利,没有权利在政治舞台上丢掉这种胜利。今天的事情更使他感兴趣。虽然,尽管战后感到疲劳,斯大林还没有从经历过的事情中"凉下来",没有从胜利的凯旋中完全清醒过来。

他从椭圆形的阳台上看到,在湖畔,在他的官邸的小花园的入口附近,在强迫居民迁出了的静悄悄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站满了哨兵。他认为,战争最终使他变成了一个军人。他一直到死都没有丢开元帅

服。顺便说一下，赫鲁廖夫和政治局委员们有一回给他领来三个小伙子，身着的军服有一半是用金带、金色彩条、金线花边制成的，只要是能琢磨到的地方，到处都是……

“这是什么呀？”斯大林纳闷地看了看进来的人们。

“这是苏联大元帅服的三种设计方案，”红军总后勤部长赫鲁廖夫回答到。

斯大林又一次恶狠狠地看了看镏金的样品，并且骂着把所有这些人赶出了办公室。他穿上这种制服将会像谁呢？像高级饭店的看门人或者像马戏团的丑角？缺心眼的家伙！诚然，斯大林没有忘记，赫鲁廖夫很快就执行了他关于拟定“胜利”勋章图样的指示。在最高统帅1943年10月25日审查的第一个方案中，勋章的中央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侧像。最高统帅不喜欢人们看腻了的数以千计的方案中的两个领袖的形象，在这里，他的侧面，即斯大林的侧面，只有根据突出的高加索人的鼻子和小胡子才能认出来……准备凯旋的未来的大元帅建议在勋章的中央摆上克里姆林宫墙和斯帕斯基塔，以浅蓝色作背景。勋章用白金制成。不要舍不得钻石。斯大林还在设立最高统帅勋章以前就决定，荣膺这种勋章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11月5日斯大林批准了勋章图样，而8日就通过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设立最高统帅勋章的命令。斯大林叹了一口气：甚至勋章没有他也不能制成……



胜利勋章

斯大林从过去、从久远的和不久的过去重新回到当前，又关注起今天的事情了。他听着自己的谈判对手发言的翻译，习惯地在公文纸上勾勾画画。通常在他面前摆着几支彩色铅笔、一只钢笔。有时他几十次机械地写着某一个词，同时全神贯注于它们内在的含义和本来的含义：“赔款”、“战败国赔款”、“赔款的部分、份额”……有时，正如比弗布鲁克勋爵于战争初期在莫斯科谈判时所注意到的，斯大林“在公文纸上画了多不胜数的狼，并且用红铅笔涂上背景”[19]。当翻译翻完时，他在

一大群狼中又加了一只消失在残酷时代的血色黄昏中的狼……

斯大林明白，粉碎法西斯主义使苏联变成超级大国，而使他——这个国家的领袖变成当代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心里也许想的是最伟大的领导人)。他的西方对手是“民主制”的宠儿、产儿。罗斯福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的任期结束后，即使他还活着，也会离开白宫。而丘吉尔前来与会是信心百倍的，他相信他的党将在大选后获胜。他记得，在7月17日同杜鲁门会见时，杜鲁门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总统是否见过了丘吉尔——时说道：

“是的，昨天早上见过了。丘吉尔确信他会在大选中获胜。”

“英国人民不可能忘记胜利者，”斯大林表示同意[9]。

不料一切发生逆转：7月26日宣布，保守党人遭到失败，丘吉尔在波茨坦也由英国新领导人艾德礼取代。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大元帅认为，这些“腐朽的民主制”自己削弱自己。他所创立的制度排除了这种“频繁变动”。他知道，只要他的健康允许，他将一直处在权力的顶峰。(而他对自己的健康满怀信心，尽管曾出现过度疲劳的征兆。要知道，他是高加索人！)斯大林知道，在被历史之风吹拂的顶峰上，只有他一个人的位置。

斯大林老早就像法国的“太阳王”一样，把自己同国家、社会、党等同起来了。要充分相信他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国家越强，它的领导人就越高。战争把苏联推到了世界最高的界限上。而对斯大林来说，这也是他的最高点。从战后头几个月起，他的命运的曲线就开始迅速地接近于世界性荣誉、威严和神圣崇拜的顶点。

斯大林认为胜利的果实不仅是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把苏联变成最强有力的国家之一。大元帅已经感觉到反法西斯同盟这座大厦的潜在推动力很快就要把它彻底摧毁。但是他不能设想，所有这一切会来得这么急速。只有明察秋毫的眼睛才能看得出，在采齐林戈夫宫桌旁就座的是可以称为“朋友—敌人”的盟友。在他们第一次会晤时杜鲁门说的一句话并没有把斯大林引人迷途：他，杜鲁门，“希望成为斯大林大元帅的朋友”。苏联领袖在讨论战争赔款问题时特别感觉到了这一点。美国人在波兰问题上离开了自己的雅尔塔立场，并且站到了力求作出最不利于苏联的决定的英国人方面。在苏联，被占领的大片领土上，大量的工业企业都被消灭了。美国和大不列颠却没有经受到这一

点。斯大林强调指出，苏联，像波兰和南斯拉夫一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义上有权要求赔偿这些损失。但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要求置若罔闻。只是在最后一次即第13次会议上，斯大林才被迫接受这些对他不利的条件。他可能得到还要少得多的东西。但是大元帅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奥得河和尼斯河边界时却实行了报复。斯大林好像把波兰往西方"移动"了，他希望在同德国接壤处有一个强大的斯拉夫国家。

总统和首相喜欢大谈特谈东欧，而不愿意谈西欧，斯大林为此感到不安，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斯大林在会议上提出佛朗哥法西斯专政问题时，他没有得到任何理解，而杜鲁门和丘吉尔却要求支持南斯拉夫铁托的敌手。西方对手在谈判中惶恐不安地谈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状况，但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例如在希腊，靠盟国的援助正在爆发国内战争。有时候斯大林感到，坐在桌旁的不是盟友，而是企图更多地拿走他们一起烤制的馅饼的老对手。他没有错：战争问题（亚洲问题除外）已经成为过去。占首要地位的是政治——极其虚伪而残酷无情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对手们所持的立场大不一样，以致不可能期待



1945年举行的波茨坦会议

有比如说像在雅尔塔那样的一些结果。战争、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战略目的使人们接近起来。一旦这些目的达到了，提到首要地位的从来就是政治的、阶级的利己主义。优秀的翻译也不能使反法西斯同盟的领袖们用共同的政治语言即盟友的语言讲话。

但是，整个说来斯大林对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不过，英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都是如此。1945年夏总算得到了过一两年后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们能够对德国的非军事化达成协议，在若干其他基本问题上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杜鲁门尤其坚持公开确认苏联对日采取行动的义务。苏联代表团的领导人也没有逃避盟国的义务：

“苏联将准备在8月中旬采取行动，并且一定履行诺言。”

斯大林不愿意在开辟自己的“第二战场”方面像英国和美国那样拖延太久。同时，他力求不对盟国有所妨碍。例如，在对日战争开始的前夕，斯大林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一个任务，即不仅要解放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而且要从钏路市到留萌市一线往北占领北海道岛的一半。为此预计向岛上调遣两个步兵师、一个歼击机师和一个轰炸机师。当苏军已到达萨哈林南部时，斯大林在1945年8月23日下令准备投入第87步兵军以实现北海道登陆战役[16]。然而，在8月25日，当南萨哈林的解放完成了的时候，投入兵团的命令并没有下达。斯大林寻思：这个步骤能给予他什么呢？大元帅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次“登陆攻击”可能导致同盟国本来就已明显恶化的关系的尖锐化。终于他下命令：往北海道的部队不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伊万诺夫将军传达了总司令的命令：“为了避免造成对盟国关系的冲突和误解，坚决禁止向北海道岛方面派遣任何舰队和飞机。”[17]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

代表团首脑最后一次会议是在8月1—2日的夜里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的最后一句话是：“也许，可以认为会议是成功的。”几分钟以前，三位领导人签署了致丘吉尔和艾登的贺电，接着，主持会议开幕和闭幕的杜鲁门宣告：

“我宣布柏林会议闭幕。我希望下一次会晤不久将举行。”

“愿上帝保佑，”斯大林回答说[18]。

大元帅还不可能知道，命令日本投降书（受大元帅的委托，将由杰

列维扬科将军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在今后漫长岁月里会成为前盟国之间达成的具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最后一份文件。他还没有猜想到,五角大楼很快就会抛出对苏联领土进行核轰炸的“扣球”、“赛车”计划,而《柯里尔》杂志则将叙述“同红色俄国”并同接踵而来的苏联占领进行的“未来战争”的详细剧本大纲。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情。而眼下,同盟国的首脑们,不论愿意不愿意,在波茨坦不仅就政治上结束欧洲战争,而且就欧洲进一步的分裂,硬性地划分不同的世界采取了重要步骤。反希特勒同盟度过了最后的时刻。西方首脑们着急了。丘吉尔已经看到,用他的话来说,从吕贝克到的里雅斯特降下的“铁幕”是如何分割欧洲。[19]斯大林也好,杜鲁门也好,丘吉尔和艾德礼也好,都还不知道,他们不久就都会走上的那条相互仇恨之路,将把他们未来的继任者引入核的历史死胡同;在这种死胡同中,政治家们既然终于感觉到了实际消灭地球上的生命的威胁,就应该超越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利益之上,重新重视全人类的价值,就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一样。

对法西斯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的主要创造者是苏联和其他反希特勒同盟国家的各国人民),对苏联人来说,也有苦果。胜利更加确立了斯大林的一贯正确和对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所起的救世主的作用。伟大的胜利最终把斯大林变成了人间的神。

苏联人民在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自由。但是,从斯大林主义到自由还遥远得很。还要几十年。祖国的公民们在返回自己被毁坏了的家园时,也像他们的远祖在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一样,寄希望于美好的转变。自由之风、人民欢庆之风、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胜利之风,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希望。人们要生活得更好。没有恐惧,没有催赶。不,斯大林照旧受到尊敬、颂扬、景仰、吹捧,但是同时人们相信,不会再有暴力了,不会再搞没完没了的运动了,不会再经常严重短缺最必需的东西了,而这种短缺已经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

恰恰相反,胜利却使斯大林坚信一切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这种体系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对内和对外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他很快就让人们懂得了,在国家的内政方面,一切都将保持不变。必须按照他斯大林作出的指示工作,恢复被破坏

了的国民经济。在《联共(布)中央就1946年2月10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告全体选民书》中,连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民主、人民权力、普通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仍然是那些老生常谈,比如:“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群众结成联盟”,“苏联人能够根据多年的经验相信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不应该有哪怕一个选民不行使自己的崇高权利……”[20]。最后这句话已经是作为警告说出来的。这一点苏联人都知道!

斯大林本人一如既往,赞同《告选民书》。斯大林创立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小齿轮按“领袖”要求的速度确定不移地转动……像用传送带一样,送来一个接一个的决定:关于研究党史《简明教程》的决定;关于《锤子报》(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公社报》(古比雪夫)、《库尔斯克真理报》工作不力的决定;关于制止“随意出卖集体农庄土地”(禁止建立职工的副业和个人菜园)的决定;关于国家出版联合公司工作不力的决定;关于保证妥善保管国家粮食的决定等等,等等。

在很多文件上都有斯大林的签署。他像过去一样,极度相信指示、命令、指令具有神奇的力量。如果说战前斯大林的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制度还只是在酝酿、调整之中,那么在胜利之后,它不仅迅速地得到了恢复,而且积蓄了力量。斯大林在战后采取的实际方针,就是实行全面的官僚制度的方针。许多主管部门都开始带上了肩章(铁路职工最先带)。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新组织,其主要任务差不多都是“监督指示和决定的执行情况”。为了死死地把集体农庄庄员“固定”在农村,吊销了他们的身份证。继续实行流放和驱逐一直到40年代末,贝利亚的主管部门也不是无事可做。

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被彻底变成了“伟大”教条的无所用心的注释者。令人厌倦和使人愚昧的赞美“领袖”的仪式又成了日常的生活习惯。甚至同亲近的人讲讲心里话,照旧也是极其危险的。“来自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的监视者,在日丹诺夫的领导下扼杀了思想自由。变本加厉的官僚主义又开始迅速地培植出对社会最为危险的果实:劳动者对一切无所谓,漠不关心,只准备去执行;许多人道德败坏越来越厉害,表现为人格两重性(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党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影子。或者相反:国家成了党的影子。谁也不能有不同于官方意见的个人意见。普希金的话说得那么早,又好像有了现实针对性:“……没

有舆论,这就是对任何义务、正义、权利和真理漠不关心……这就是对思想和对人的尊严无耻蔑视。”[2]与口号背道而驰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开始产生出官僚主义精英,虽然这看起来很反常。

斯大林就是这样把胜利的成果用来“供内部使用”;他有意识地、坚决地保存制度。他无能力进行真正的社会创造,就像在20年代一样。为了支持并提高自己的本来就已非常高的“英明领袖”的地位,他不定期地,但是相当经常地撤掉、干掉、换掉一些人,时而是州委书记,时而是部长,时而是元帅,时而是其他活动家,指责他们或者是有非政治倾向,或者是滥用权力,或者是玩忽上级指示,或者是对人关心差。斯大林就这样在人民心目中成为“仁慈的沙皇”,而类似的步骤把他的威信抬得越来越高。即使在今天,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风格:据说,斯大林是不会容许拉希多夫精神和丘尔巴诺夫精神的!然而,如果仔细想想,那么,尽管存在一切外部的反常现象,“斯大林以后”时期许多领导人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区域性的、上级任命的以及部门的无限权力和领袖至上的萌芽,落在没有恐惧和“强手”的培养基里,也就在那里生长起来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杠杆失灵的情况下,在道德文化素养低下的情况下,在完全没有公开性的情况下,没完没了地采用行政禁令的制度变得毫无效率了。已经很明显,对斯大林来说,必须从肉体上,然后再在一定程度上也从政治上离开,因为保存制度只是加深了现在和未来的危机现象。过些年以后,人们可能会说: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使道德败坏。

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大大巩固了独裁和对独裁者的顶礼膜拜。对人民来说,他成了救世主、伟大胜利的创造者、无与伦比的统帅。但是,这种盲目的信仰同时也使长期失去真理和正义的人民软弱无力了。

我相当长时间地谈到斯大林战后极其恶劣的行为之一,就是斯大林竭力保存政治制度,使它一成不变。斯大林从来也不能像列宁那样:“我们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实行改变。”他的教条主义头脑,在评价以他这位领袖作为核心的既成制度时,不能理解,他这种保存的企图使千百万人继续相信的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遭到了深刻的腐蚀。

与这些消极的过程并存的是,人民的希望、意志、热情在跳动,在生活,在斗争。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使苏联人民坚信社会主义是不可

抗拒的，1917年10月作出的历史抉择是正确的。尽管有许多障碍和困难，发生过歪曲和罪行，人民仍然是自己的精神方面、自己对美好未来的信仰的主要保护者。在空前的短时间内，人民得以从废墟中站起来，恢复了国家的经济潜力。当1945年底斯大林收到关于战争使国家蒙受的经济损失的综合统计资料时，他可能对祖国躯体上的创伤和伤痕知道得比谁都多，可是他却又问了一遍沃兹涅先斯基：

"没有夸大吗？"

"可能只有缩小。在短时间估计出全部损失的深度和规模是不可能的……"

他记得1945年5月21—22日召开的方面军司令员和各兵种司令员讨论红军复员和改组问题的会议。当时最高统帅对元帅们和将军们说：没有军队，而更确切些说，没有今天还在军队里的人们，我们是治不好自己的创伤的……斯大林手上拿着一份文件，偶尔看一看这份文件，慢慢地、以低沉的声音对全场说："复员应该首先涉及防空部队和骑兵部队。复员不应该涉及坦克部队和海军。步兵复员应占其编制的40%至60%，不涉及远东、外贝加尔、外高加索的部队……按低价向每个退伍战士出售战利品，并且按在军队服役多少年就支付多少年的薪饷……"[22]斯大林谈到军队的复员，他想，应该如何更快地把这支力量投到沃兹涅先斯基向他一再谈到的过程中去：必须振兴国家。一切都处于极限状态——力量、潜力、忍耐。人民过着苦不堪言的穷日子。贝利亚报告了赤塔州、塔吉克斯坦、鞑靼以及其他地方都在闹饥荒。斯大林手里拿着汇报，翻开一页：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钦柯报告说：

> 在列宁纳巴德州……发现有20人极度虚弱致死，有500人因吃不饱而浮肿。在斯大林纳巴德州—拉米特区、帕赫塔巴德区、奥比哈尔姆区以及其他区，极度虚弱致死的超过了70人。也有身体亏虚和浮肿现象。这样的事实在库尔干秋别州、库利亚布州、哈尔姆州也都有发生。当地给这些区提供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23]

在赤塔州有"食用饿死的牲畜、树木、树皮"的事实。通报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个农妇带着几个儿子杀死了一个小女孩，并且把她当作



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百姓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

食物……还有这样的情况……”[24]斯大林不再往下读痛苦的汇报了。贝利亚看出了“领袖”不满，赶忙说道：

“在新的收成以前分配了若干数量的面粉。得忍一忍！”

前面是对日战争，而沃兹涅先斯基的报告证实了：面临着大量的工作要做。政治局候补委员比“领袖”周围的其他人更深刻地搞清楚了国内进行的大规模的、深刻的经济过程。斯大林老早就在仔细观察他，并且感受到矛盾的感情。是的，在他周围的人当中，这多半是一个最聪明的领导人，但是他不喜欢他的独立见解，有时是尖锐的见解。不过，也许，斯大林寻思着，没有他的聪明才智，要在废墟上振兴经济将是困难的。1947年2月，在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建议选举沃兹涅先斯基为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读着沃兹涅先斯基关于破坏规模的调查报告和国家调查德国侵略者罪行非常委员会的报告第一稿时，对某些数字思考良久：有1710个城市和市镇被破坏，有7万多个村庄被烧毁（“领袖”甚至没有想一想，这些村庄中有好几千个应归罪于他），有32000个工业企业、65000公里的铁路被炸毁，不能用，有近10万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数以千计的机器拖拉机站成为一片废墟……斯大林思考着这些可怕的数字，回想起了，在赴柏林的路上，透过防弹玻璃的窗子，他是怎样凝视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伤痕累累，堑壕、掩体、火灾遗址遍布的。列车到达大站、大城市都不停靠；被毁的建筑物框架连同许多空洞

洞的窗框、被炸毁的工厂、烧焦的板棚一闪而过。在幸免于难的村庄中,常常碰到烧得精光的房子,就在这里,俄式火炉的烟囱把自己冰凉的手伸向天空。甚至7月繁茂的绿草也不能掩盖可怕灾难的痕迹。

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国内有2500万人无家可归,挤在土窑、板棚、地下室里。早自30年代初以来就如此薄弱的畜牧业完全被破坏了:几千万头牧畜被赶走或被杀掉。沃兹涅先斯基写道,根据初步的统计数字,入侵带来的直接损失,数额达7000亿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换句话说,国家损失了国民财富的30%[25]。人民的生活水平处在最低(可以想象的最低)水平上……

这些能发人深省的言论斯大林已经很少感兴趣了:他总是认为,没有巨大的牺牲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不可能粉碎法西斯主义,现在也不可能恢复强大的国家。没有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动员状态、特殊"国内战争"状态、同困难和内部敌人作斗争状态的社会意识的支持,就不能解决最高任务,斯大林坚信这一点。例如,波斯克列贝舍夫不久前放进了文件夹的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证明了他是对的。1945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报告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趁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日临近而大肆活跃的情况。在报告的末尾请求:增派兵力帮助喀尔巴阡军区和利沃夫军区。难道敌人仅仅在这里?在被占领区、在俘虏中、在被囚禁的人们中有多少?斯大林相信,从前线回来的有不少"十二月党人"。

斯大林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上给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部写上了选派增援部队到乌克兰西部各州的指示[26]。还有一个类似的报告——"关于建立同拉脱维亚的匪患作斗争的歼击营"的报告。这个报告由布尔加宁签署;顺便说一下,布尔加宁建议这些歼击营的薪饷由地方预算支付[27]。在那里也有牺牲。战争结束了,而牺牲者不计其数。请看梅尔库洛夫和克鲁格洛夫的报告:在立陶宛,选举前夕,"反苏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活动十分猖狂"。下面是一个长长的单子:

1945年12月15日,在沙乌利亚伊县,州选举委员会成员米图扎斯被带进森林枪杀;

1945年12月16日,在拉济雅伊县韦塞伊乡,选举委员会主席列武里斯被匪帮杀害;



被德国盖世太保活埋的苏联百姓

1945年12月17日，在罗基代县，匪帮杀害了选举委员会主席基凯里斯；

1945年12月20日，在乌克梅尔格县陶扬乡，地段选举委员会成员、乡苏维埃主席加布利拉维丘斯被杀[29]。

新的牺牲者的名单是很长的。在波罗的海沿岸制止流血，还要过好多年。但是，同战争中的损失相比，这个百分比很小很小。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考虑到为胜利付出的人的代价，但是，权衡来权衡去，大概他认为，这也是"政治问题"。

胜利的代价究竟如何？死了多少人？斯大林很快就要在选举前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必须告诉人民为胜利付出的这个代价。在战争期间，最高统帅没有考虑过这种代价；国家的人力资源是用不完的。但是，当向斯大林格勒退却时，他估算了一下：在被占领的领土上还有7000万至8000万人。

从1946年1月军人和沃兹涅先斯基为斯大林准备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关于我们的损失只能说个大致数。这种流血的统计，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是做得非常差的。沃兹涅先斯基在个人的报告中指出：只有过几个月之后才能比较准确地估计出损失，不过，根据现有的大致轮廓，死亡近1500万人。斯大林默不作声，因为根据总参谋部的报告，在战场上

被打死的、因伤致死的和失踪的共750万人。1946年斯大林在演说中依据的就是这个数字。他不愿说出更大的代价，因为那时一下子他的统帅形象就要黯然失色了。他不能这样做。

我们胜利的代价实际上究竟如何？赫鲁晓夫在1956年给瑞典首相塔·埃兰德的信中第一次使用了2000万以上这个数字。现在也在使用的这些统计数字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概算。我认为，赫鲁晓夫的估计中正确的只有一个词——以上。2000万以上。历史学家现在正在做确定准确的数字这个工作：人民应该知道，人民往胜利的祭坛上献出了多少个自己的子女。

根据一系列军事档案中现有的统计数字材料，其中包括关于我国战俘（例如，德国人非常精确地清查登记了在集中营关押和加以消灭的那些人）的材料，分析一下调查的结果，根据兵团的数目以及这些兵团在战争进程中人数的变化，估计到关于在最大战役中的伤亡统计数字，以及注意到如维罗多夫、弗拉西耶维奇、克瓦沙、索科洛夫这样一些著名的研究者们经过科学论证的意见，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不言而喻，我不认为这些结论是惟一正确的和最后的。）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年代，现役军人、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和平公民的死亡数字，看来在2600万至2700万人上下浮动，其中约有1000万人在战场上阵亡和被俘后遭杀害。那些加人了第一战略梯队的人（和战略预备队中的大部分人）的命运尤为悲惨，他们承受了1941年战争的主要重担。这个梯队的兵团和军团的个人构成的基本部分，首先是基干部分，都牺牲了，而大约有300万军人被俘。在1942年，我们的损失稍小一些。



1945年4月下旬，苏联红军在柏林附近的劳动力集中营里救出了一批苏联妇女

最含混不清的和政治上模棱两可的类别是“失踪者”。这里既包括那些参加了战斗、但未“列人”队列名单和伤亡战报的人，也包括那些

当了俘虏、当了游击队员、命运把他们抛到异国他乡的人。是的,在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惊惶失措、被收买并且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当了伪警察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是绝对的少数。绝大多数失踪者的命运是极端悲惨的:默默无闻地战死,被俘后遭杀害,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里受到没完没了的审查,冒着在那里常年呆下去的危险。

假如斯大林能够对自己作点自我批评,那么,把自己的损失和德国人的损失简单作一对比,就会使他得出一个结论:"领袖的统帅天才"的光辉也是在不小程度上建立在不了解人的基础上的。根据我的测算,无可挽回的损失的比例是3.2:1,我们的损失大。

当然,应当估计到与有计划地消灭和平居民,特别是消灭斯拉夫人、犹太人、其他各民族的人有关的纳粹分子的野蛮政策。这是造成苏联人民天文数字牺牲的主要原因之一。要知道牺牲者中的大多数是和平公民。但是,即使不考虑灾难性的战争初期,那么后来,我们的战斗人员的损失也比德国人高许多。不,也许从1943年开始,苏联士兵和指挥员已经学会了打仗。而且学得不坏。但是,对斯大林来说,占首位的原则,就是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训令和命令中阐述的原则:达到目的"要不惜牺牲"。对于一个摆脱了任何批评形式的人来说,人的生命(成千、成万、成百万人们的生命)的价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付出的代价非常非常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胜利总是具有无法估量的损失的痛苦色彩。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使斯大林感到难受。自我牺牲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也要求自我牺牲的胜利。这个历史事实的确凿性本身,不仅强调指出了苏联人民伟大的坚



德军每到一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希特勒曾下令:那些"种族低劣"的犹太人、吉普赛人、某些斯拉夫人都应予以消灭。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估计说,光斯拉夫人就应被消灭掉3000万人

忍不拔和忘我献身精神，而且提醒人们：斯大林之成为斯大林，是人们允许的。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不应该看成仅仅是“归根结底……”

……战争是打赢了。终于可以深深地吸一口高加索的空气了。贝利亚忙碌起来，虽然这次送“领袖”的行动比到柏林简单一些，但是仍然……我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副长官日丹诺夫给梅尔库洛夫的报告中摘引几个片段：

> 关于因特殊时期的到来我们在索契所采取的措施（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
>
> ……对索契安全局登记过的反苏分子正在进行积极的考察和观察。逮捕照常进行。
>
> ……从戈洛温卡河到普索乌河的森林公园区正在仔细搜查。书报检查中心扩大了。身份证制度更加严格了。对汽车运输的监督加强了。从火车站到别墅建立了184个岗哨。全线受到保卫。制造了发电列车。弗拉西克同志每天得到情报……[20]

“各族人民的领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自己的祖国都为自己的性命提心吊胆。有一部分路程是坐汽车走完的。同斯大林一起去休假的，同平时一样，有弗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伊斯托明纳、为数众多的办事人员、警卫队和其他“服务员”。顺便说一下，正是在这次外出之后，斯大林下令修建一条通往辛菲罗波尔的现代公路干线。途经奥廖尔、库尔斯克、其他城市和乡村时，好几次走出汽车，同人们谈话……对战争时期也许是处于最困难状况的妇女儿童的自我牺牲精神不胜惊讶。城市都躺在废墟上，而当斯大林到达南方时，人们对他说，在苏呼米近郊，在新阿丰附近，在里察、冷溪，在其他地方，贝利亚主管的部门正在拼命地盖新的“国家别墅”。对在休假路线上同人民的交往，对妇女们效忠的呼声、喜悦的眼泪，男人们大胆的保证：“情况很好，斯大林同志！”，老人和孩子们的惊奇的眼光：“这就是斯大林？”等等，斯大林很快就厌烦了。

的确，他知道，为了得到广泛的欢迎，他最好从陵墓的观礼台上向人群频频挥手，从新闻电影的镜头上微微含笑，每天只是以肖像、塑像、半身像的形式出现在人民面前。斯大林仔细研究了群众心理学；他



斯大林——纳粹德国的最大克星

猜想，在这些会见的时候，人们在内心深处会产生失望情绪。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原来是一个个子不高、躯体不匀称的人；身躯短而手和腿较长。在上衣里面，是用元帅服裹着的明显的肚子。稀疏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相当富有朝气的有麻点的脸，这个苍白的面容就像是一个坐办公室的人所应该有的一样。牙齿不好看，也不洁白，只是一双有生气的灵活的黄眼睛流露出人身上的潜在的毅力、威严和自信心。在库尔斯克，一个妇女甚至敢于摸斯大林的衣服袖子：以至于很明显，牢牢树立在意识中的形象同她这会儿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了。斯大林很快就感觉到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有快乐、欢欣，而且对大元帅这位“一切时代和各族人民的领袖”其貌不扬有点儿暗暗的失望……对“领袖”的简单的问题，也给予同样简短的回答——赞叹声，在这些赞叹声中，好像有惊奇，有神化的惰性和对奇迹的期待。但是奇迹……不曾有过。人们没有期待斯大林发表演说，而只不过是“死盯着”他，人们不相信，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领袖”本人。人成了世间的神，就不能不在亲身接触时使人们感到失望。原来他也是这样一个同其他的人一样的人，而一切神奇、英明、先见之明、壮士之举，都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臆想出来的。在人们还没有直接同所有这些神化的本质特征的体现者发生接触以前，一整套神话、刻板模式、传奇故事都“起着作用”。

斯大林坐在高级轿车里颠簸着，有时看看放下了窗帘的窗子，一次又一次地确信：令人捉摸不透的、很少向人民讲话和露面的领袖具有自己的优越性。他再也不允许有这样的轻率行为。他往后也应该把一切现存的幻觉同神的遥远度结合于自己一身。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应该仍然是这样一个人，是他建成了社会主义，粉碎了一切人民的敌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且很快就治好了创伤，号召苏联人民去建设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不，他的力量在于神秘莫测，在于能够在人民胜利、忙乱和精神苦闷的时代，用新的运动把人们团结起来。就是

他,只有他,能够像传道书一样,确定“打杀时期和治疗时期、破坏时期和建设时期”何时到来。斯大林本来就应该尖锐地感觉到,只有他建立起来的制度需要他。别的都不行。有些人白白等待着变革。必须巩固制度,加强国家的威力,把所有不准备这样干的人都干掉。他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他的历史正确性的有力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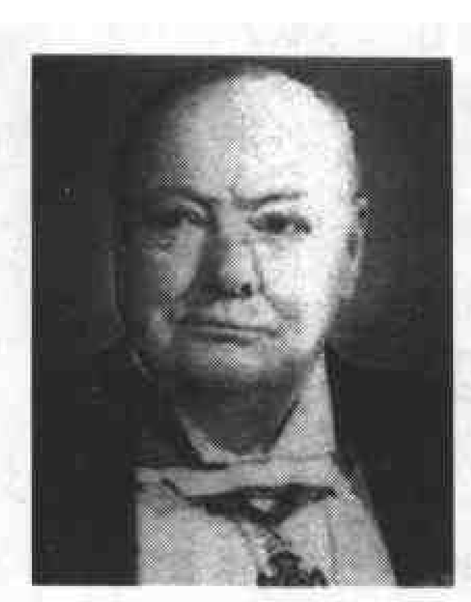
可能我为斯大林想得太多了。但是,我是以文献、证据、思维逻辑为根据这样做的。他的工作、步骤和决定都以一个明确的含义说明:独裁者不打算做任何根本改变。可以而且必须改变人,但是决不能改变主要的东西:把斯大林抬到权力顶峰的总的牢固制度。

过去了的战争虽然也使斯大林完全感到震惊,归根结底也使他确信,从历史上看他是正确的。独裁者懂得,他处在光荣、赞扬、权威和崇敬的最高点上。他彻底摆脱了良心、不严肃的“民主”游戏一类的“偏见”,使人们失去了可以称之为社会选择能力的东西。斯大林坚信,他现在即战后希望保存下来的制度,最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所梦寐以求的那种制度。一切都程序化了,指示好了,安排好了,确定好了。人们将把被战争破坏了的社会主义大厦重新建立、修复起来,他也要再度提出“赶上并超过! ”的口号。

斯大林不无根据地认为,战后世界上发生了向左转的总动向。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把群众团结起来了,使民主力量活跃起来了,使反动势力受到了扼制。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引起了对苏维埃国家的深切同情。甚至于许多白卫分子、流亡知识分子、完全“落魄的人们”,也都开始倾心于苏联了。来自巴黎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分子的“信号”尤其使斯大林感到兴趣。要知道,他与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直接交往。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命令派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主管宣传的书记沙里亚出差巴黎。斯大林久久而聚精会神地读了他的由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提交的报告。格鲁吉亚人的名字凯吉亚、阿尔雪尼泽、策列铁里、契恒凯里、戈别契亚、塔坎什维里以及其他名字,使“领袖”回想起了已经久远了的革命、斗争、残酷划分派别的年代。

沙里亚报告说,格鲁吉亚流亡者为返回祖国向他转交了古代手写文献、金银制品、古钱珍品和出土文物珍品。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沙里亚会见了诺伊·若尔丹尼亚、叶弗根尼、盖奇科里、约瑟夫·戈贝奇亚、

斯皮里多内·凯吉亚。在会见开始时若尔丹尼亚声明，他坚持自己关于苏联没有民主，没有言论、出版、选举、个人首创性自由的意见。然而后来，他声明(斯大林在这些字上加了着重号)："斯大林打赢了战争。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人。出于政治分歧而否定他的伟大会是愚蠢的。历史还将更多地谈到他的伟大。历史将把当代人还不知道的他的活动的那些方面揭示出来。"(恰恰就是在这里，诺·若尔丹尼亚是完全正确的。——本书作者注)[30]许多过去的政治对手都表示了返回祖国的愿望。斯大林读了简报，可能想：胜利者永远是正确的！



铁幕演说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个人的身份访问美国。他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特学院向3000名听众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以"铁幕"一词而闻名于世。

丘吉尔认为苏联追求的是"极权主义的无限扩张"。因此，丘吉尔呼吁英美两国建立特殊的关系，利用所有的军事力量，共同对付苏联。

丘吉尔的演说遭到了苏联的严厉指责。斯大林发表谈话，声称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是在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使世界上苏联的拥护者和朋友明显地增多了。在胜利的影响下，展开了国际关系中的深远过程……殖民帝国开始瓦解了，世界听到了民族解放运动脉搏的频频跳动。在东欧各国，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人起了决定性作用。斯大林已经感觉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领袖"不无根据地认为，共产主义运动"重整旗鼓"的时刻已经到来。

诚然，这种重整旗鼓的势头很快就被"冷战"扼杀了。冷战的信号就是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富尔顿发表的演说。苏联的内部问题也尖锐化了。在1946年，国内大面积遭到严重的旱灾。日用必需品严重不足的箍圈紧紧地束缚住了胜利者的国家。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成了政府力量同反对派新军发生不大看得见然而很激烈的冲突的场所。尽管斯大林下了一系列"迅速粉碎匪帮"的个人指示，肃清游击战策源地的工作却拖了很久。在西乌克兰，还在1951年就不定期地爆发了同没有缴械的匪帮的冲突。

经济上的困难也加重了精神上的困难。对改革的直觉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又重新推迟到了不确定的未来。斯大林在大剧院发表的竞选演说中号召紧张地劳动，并且要表现出耐性。苏联人民有的是耐性。这也是为伟大的胜利付出的代价的组成部分。

斯大林“秘密”内幕

读者知道斯大林喜欢保守秘密。大大小小的秘密都要保守。但他最爱保守的是保持权力的秘密。这样的秘密可不少。它们往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我们现在才开始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没有道德、缺乏魅力、政治上又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怎么能够迫使整个伟大的人民都爱他呢？他怎么能成功地“化”人民的悲剧为个人的胜利呢？为什么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且不仅在我们国内，相信他呢？对造成这一现象的秘密，斯大林是了解的，喜欢的，并且很珍惜。

现在，写斯大林的人很多。许多作者都想把斯大林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分开，这是很自然的。当年托洛茨基着手写《斯大林传》一书时，就试图这样做过。苏联作者的无数文章也明显有这种意图。我也有过类似的考虑，但是我终于得出结论：这样做不可能不损害历史的真实。在评价30年代和40年代时，把斯大林和人民“各归各”，分开来看，难道这样做行得通吗？难道人民和党与自己的领导人分得开吗？难道人民和党不曾颂扬过自己那位操持着这个大国一切事务的“领袖”吗？

看来斯大林最大的“秘密”正是隐藏在这里。他成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尽管30年代末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国家仍然处在过渡时期，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把斯大林同社会主义“分开”还是可以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允许”由一个与崇高理想不相称的人来领导。胜利者把自己和人民完全分开，正如根据他的“蓝图”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列宁的模式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样。在这个社会中产生的许多积极的东西之所以变成了现实，首先不是由于斯大林倡导，而是由于违背了他的意愿，由于我们称为“十月革命的电荷”

即十月革命的社会惯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但是要把斯大林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截然分开是办不到的。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用强制的办法解决无数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上，他很清楚，如果不改变社会意识，他就不可能长期处于这一制度的中心。他提出的关于“新人”的思想同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性的协调发展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是如何操纵人民的社会意识的呢？当然是借助于庞大的机构。除了培养意识的某些积极因素，还必须向人民灌输“领袖”本人的一些思想。斯大林影响这一过程的“秘密”，乍看起来，是相当简单的。

有一次我同原中央委员会书记谢皮洛夫交谈，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如下情况。斯大林常常邀请一些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谢皮洛夫说：我知道他会突然邀请一个大作家、演员、记者、导演去他那里。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领袖”屈尊亲自召见他！在这些重要接见时常常会提出一些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订货。虽然不是强加于人，但却是不容讨价还价的。一天晚上我接到通知，要我拨某一个号码打电话。我感到困惑不解，但还是拨了电话号码。接电话的竟是斯大林。

“谢皮洛夫同志！您有一点时间吗？能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是，当然可以……”我不记得当时我还说了些什么，但是电话筒已经不响了。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但是电话铃立即又响了，通知我说，过几分钟有车来接我。我莫明其妙地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走廊走，护送我的是斯大林的书记处的一位一声不响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一层楼、每一个拐弯处都一动也不动地站看克里姆林宫警卫队的值勤战士。

谢皮洛夫回忆说，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斯大林开始从远的说起：新时期要求有新的经济学。领导干部，即如他所说的“生产指挥员”的经济学知识水平很低。必须十分迅速地编写一本普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据我当时的理解，这件事是委托我和另外两位知名学者去完成的。还提出了似乎早已经过周密考虑的建议：扩大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完善计划工作，使计划成为“铁的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一些贯穿“强制性经济”精神的要求。谢皮洛夫继续说：斯大林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感到很不自在。他仿佛看到我的内心深

处。他的目光使人坐立不安……

斯大林提出了订货要求。期限是死的。把我们三个人"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幢别墅里。苏斯洛夫每周末打电话来，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读到书稿？斯大林同志等着要……这一点你们可要记住！

这是对剧本、影片、书籍、教科书采取私人订货的种种办法之一。斯大林亲自提供作品的数据。这个"秘密"很简单：斯大林按他所需要的方向亲自对社会的精神发展过程施加影响。多次见过肖洛霍夫的文学批评家什克林写道，1942年5月24日是肖洛霍夫的生日，在这一天斯大林突然邀请作家去他那里。斯大林同作家两人共进晚餐时谈了很久，最后他终于说出了邀请肖洛霍夫的原因：

> 现在正在打仗。打得很艰苦，十分艰苦。谁能在胜利后鲜明地写出这场战争呢？《静静的顿河》是值得称赞的……这本书刻画了勇敢的人，有梅列霍夫、波德捷尔科夫、还有许多红军战士以及白匪军。但是没有写出像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的人物。作家同志，打赢战争靠的正是这样的伟大统帅。在您的命名日，我祝您健康长寿，祝您写出一部新的天才的、包罗万象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要像在《静静的顿河》中那样真实、鲜明地刻画出参加眼前这场可怕的战争的人，既有英雄士兵，又有天才统帅。

斯大林影响社会意识的一成不变的"秘密"在于使社会长期保持紧张气氛。由于"国内



肖洛霍夫（1905–1984）

前苏联作家

1905年出生于顿河维新克镇克鲁日林村的一个磨坊主家庭。1918年读中学时因国内战争爆发辍学。1922年来到莫斯科，1923年加入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1924年加入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同年发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胎记》。1926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经过十四年的创作，他的四卷本小说先后于1928、1929、1933和1940年四次出版。主要以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葛利高里·梅列霍夫这个出身于哥萨克中农家庭的复杂形象，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1965年，"用于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获诺贝尔文学奖。

战争"还有潜在的可能性，确切地说，由于同"人民的敌人"、"特务分子"、"信念不坚定者"、"世界主义者"、"蜕化变质分子"、"破坏分子"进行不停顿的斗争，由于这种形势所造成的气氛，斯大林关于提高警惕性的指示和号召随时都能找到适宜的土壤。斯大林察觉到战争结束后在人民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某种难以察觉然而却是实际存在的期待变革的情绪……战争似乎使人们得到了精神解放。于是，"领袖"便向日丹诺夫下令：

> 对缺乏思想性的东西必须进行打击……文学作品中明显存在背离创作的阶级原则的倾向。请您查一两种杂志。最好是在列宁格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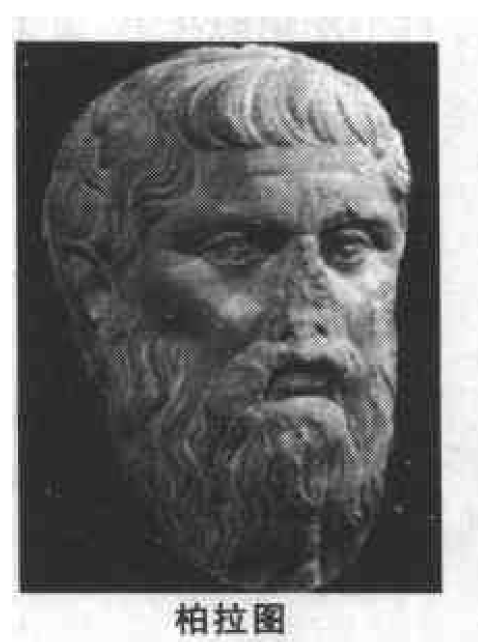
在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声名狼藉的决议后，日丹诺夫来到涅瓦河畔的这座城市。他宣布："这个问题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倡议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斯大林同志本人对这两个杂志的工作是了解的……并且建议对这两个杂志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问题进行讨论，他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作了原则性的指示，决议就是根据这些指示作出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亲自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本身就是"一大历史事件"……斯大林在决议中点了一批其作品"与苏联文学格格不人的"作家的名字，竭力使猜疑、恐惧和"迫害异端"的气氛在战后社会中卷土重来。他知道，凡是经常受到来自国内和国外敌人威胁的地方，都需要坚强有力的领袖，需要"铁腕"和果断的领导。一切独裁者的这个古老的"秘密"斯大林自己早已发现。如果社会上不存在敌人和异端分子，也没有斗争，那么还需要独裁者吗？

斯大林还知道操纵社会意识的另一个"秘密"，这就是必须向社会意识灌输主要不是基于理性认识而是基于迷信的种种神话、陈规旧套和天方夜谭。党史《简明教程》和"领袖"的各次讲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宣传这些神话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陈规旧套。早在本世纪初，社会学家若·索列尔就提出了一种理论，说什么不具有高智力水平的人群最容易相信不需要加以解释的非理性的神话。索列尔写道，神话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这种幻想、理想和目标的"直觉"概念[31]。对神话是完全不

需要弄懂的;需要的只是相信。人们经常受到教导,必须养成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新人"的绝对价值,相信上面的决定的习惯。一次又一次的隆重集会、示威游行、宣誓、致敬信,把政治神话奉为准则,奉为经典,把它们变成世界观的一部分。以真理为依据的信念被信仰所取代。在这方面斯大林的收效很大。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相信他这位"领袖",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最完美最先进的社会,相信这个政权没有任何弊病。如果没有一整套经常精心培育和灌输的神话,那么一个人能发挥巨大威力这一"秘密"就不可能存在。

不言而喻,我丝毫无意于完全否定相信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的积极意义。然而我也丝毫无意于把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独一无二的东西。仅仅建立在神话之上的意识会失去经常不断进行社会创造的能力这种最重要的东西。下面这种社会类型的人之所以形成,其根源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人除了一些积极的特征外,其特有的毛病就是冷漠、消极、绝对相信"指示"、相信一切问题可以而且必须由"上面"来加以解决,具有依赖心理、缺乏首创精神。按照斯大林的处方形成的这种意识把色彩斑斓、多弦的世界看成只有黑白两种色调。这样的意识把个人自由这个范畴摆在次要的位置。具有这种意识的人总是等待别人来"领导",来"指引",来"鼓舞"。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专权的恶果,是斯大林赖以实现其"领袖"统治的"秘密"的恶果。

我不认为斯大林曾经读过柏拉图的对话录。至少我没有发现足以表明他读过这位希腊



柏拉图

(公元前 427–前 347)

希腊哲学家

跟从苏格拉底研究哲学,其学说发展程序是由真知识以达于德行,以无知之知的精神为基础,以真实的不灭理念为中心,形成理想主义哲学。他的最高理想: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他的代表作《理想国》,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柏拉图的学说是综合性的,其《理想国》一书,书中讨论到优生学、节育、家庭解体、婚姻自由、独身、专政、独裁、共产、民主、宗教、道德、文艺、教育(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以及工、农、航海、医学等职业教育)加上男女平权、男女参政、男女参军等等问题。

哲学家的名著《理想国》的痕迹。但是，毫无疑问，斯大林实现个人专权的许多“秘密”是以自古以来许多独裁者利用的一般“准则”为根据的。

独裁者，或者如柏拉图所说的“暴君”，通常是作为“人民的公仆”出现的。独裁者的特点是，“在最初的日子里，一般说在初期，他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要人们相信他根本不是暴君，对个人和社会都作出很多许诺……”。暴君生活在人民之中，而他获得力量的秘密在于他具有化敌为友或化友为敌的本领。“当他同一些敌人言归于好而消灭了另一些敌人、使他们不再搅扰他的安宁时，我认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经常使公民卷人一个又一个战争，使他们感到需要有一个统帅……”。柏拉图仿佛看到了许多世纪之后发生的事：“假如他怀疑某某人有自由思想或者反对他的统治，那么对这种人他就要以投敌为借口而加以消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暴君必须经常利用战争来使大家不得安宁。”首先是利用内部“战争”。下面让我们给自己提出关于独裁者的永恒的“秘密”这个问题，并从柏拉图的著作中寻找答案：“某些曾帮助独裁者登上高位的有影响的人物，开始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在私下议论时向独裁者表示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不满，至少那些较为大胆的人已开始这样做。”我在读对话录时往往忘记这些对话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60年代至40年代写成的……难道柏拉图的话同我们所了解的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的情况是不谋而合的吗：“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暴君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光，最后变得一个朋友不剩，一个敌人也不剩，尽管有的人还有一点用处。”[22]

我们还可以继续摘引柏拉图有关“暴君”和“暴君式的人物”的对话。然而看来上面摘引的几段已经足以说明，在各个不同时期独裁统治虽有其独有的特点，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只有“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此外别无他途。独裁者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进行严酷的筛选；他们不容许存在不同意见，竭力在人民中间保持紧张气氛，使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到众多的敌人身上。战争和恶势力的威胁是绝对需要的，这样才便于突出领袖的救世主作用……斯大林没有读过柏拉图的著作，可是他在读俄国沙皇的传记时发现了这些“秘密”。

为了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出版过一本巨型精装纪念册，类似苏维埃时期斯大林生前和死后出版过的纪念“伟大的”领导人

的画册。斯大林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罗曼诺夫大贵族家庭出身的所有俄国皇帝和女皇，他却有闲暇去翻阅这本厚厚的书。斯大林翻到记述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去世的那几页时停了下来，读了下面一段记载："……2时35分，当皇帝从米哈伊洛夫宫回来、行至叶卡捷琳娜运河时，朝他扔来的一枚炸弹将他炸成重伤……大公向陛下的右侧俯下身去，问他听不听得见，陛下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听得见。'后来大公又问他自我感觉如何，皇帝说：'……赶紧回宫……把我抬回宫去……我要死在那儿。'这就是行刺现场目击者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3] 斯大林合上了这本厚厚的书，可能他这样想：如果你强大，那就不是他们干掉你，而是你干掉他们……他比他的战友中的任何人都懂得：任何政权，甚至其社会和政治性质完全背道而驰的政权，都有某些共同之处。这个政权必须是强有力的。独裁政权更应如此。斯大林深谙其中的道理。

斯大林也深刻领会了作为他所有的"秘密"的基础的一个思想：必须使社会不断保持最激烈的斗争状态。对这个斗争他得心应手。在他看来，整个革命前的生活就是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一场摧毁专制制度的基础的斗争。20年代形成的局面是：他把这一斗争变成了从思想上诋毁几乎所有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所有哪怕只是理论上可能觊觎一二把手地位的人，并从政治上加以消灭。斯大林把为选择国家的发展方法和发展道路所进行的斗争变成了确立自我的斗争。在30年代，按照他的意志所进行的斗争，其目的在于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实际的敌人，而主要是消灭一切潜在的敌人。他在这场斗争中获得很大成功，我想，如果千百年后地球上还有居民，那他们一谈起野蛮行为就不仅会联想起帖木儿、成吉思汗和希特勒，而且会联想起斯大林的名字。他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写过《我的奋斗》。但是他的整个一生和活动，确实是一部他的奋斗史，他同一大批一大批敌人斗，这些人与其说是真正的敌人，不如说是假想的、假设的敌人。

在他所有的敌人中，最现实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多半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曾试图与法西斯分子保持假"友好"的关系。同希特勒主义的搏斗不仅几乎葬送了他的个人前程，而且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但是这场搏斗终于把他推上了权力和荣誉的顶峰。他登上了个人权力的最高峰，但是他不能不懂得，这不仅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和

思想正确,而且首先是由于他所选择的方法对头。这种方法就在于进行永不止息的斗争。至于进行什么斗争,这并不重要,同派别分子斗争也好,为实现工业化、集体化斗争也好,为反对世界主义者以及攻克"布尔什维克"必须"拿下"的许多其他"堡垒"而斗争也好。归根到底,对"领袖"个人来说,这样的斗争就是为了确立自我,为了流芳百世,为了神化自己。

斯大林随时都记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对他来说是基本思想。在地主和资本家被消灭后,他又找到了一个必须消灭的"阶级",这就是富农。最后,明摆着的阶级敌人没有了,斯大林便发明了一个关于阶级敌人永远存在的公式。1937年召开不祥的2至3月中央全会前一星期,斯大林深夜坐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苦苦思索,要寻找一个定义和结论,说明社会内部的斗争是"永不停顿的"。在他将要发表的讲话中,有一句关键性的话经过三番五次的删改,这证明斯大林对这句话是琢磨了很久的。最后,正如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所表明的,独裁者说出了他十分需要说出的一点。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论点:"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社会,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接着,在他的讲话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敌人,"我们今天粉碎他们,过去粉碎他们,将来也同样要粉碎他们"。[39]

把希望寄托在被片面理解为对抗性的、残酷的、不可调和的无休止的斗争上——这就是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主要"秘密"之一。斯大林即使是在制服了伟大的人民之后,仍然安不下心来。1948年1月,"暴君式的人物"(借用柏拉图的说法)召见了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作了指示:要考虑"具体措施"再建立一批新的劳改营和特种监狱。在祖国辽阔的国土上,在难以发现的人们的情绪中,斯大林发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表现人们不满情绪的事例越来越多,出现了偷越国境事件,一些作家保持沉默,似乎是在对没有尽头的、越来越严密的独裁统治表示抗议。

"请在2月份汇报决定草案,对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俄流亡者需要创造特殊的条件……"斯大林最后作结论说。

“斯大林同志，立即照办，立即照办……”贝利亚这个恭顺的走卒一连重复了几次。

读者也许以为我把日期搞错了。我没有搞错。1948年斯大林又重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我想，他是在寻找“新的敌人”——新托洛茨基分子、新孟什维克、新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克鲁格洛夫行动迅速。2月中旬，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给斯大林一份文件：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现送上部长会议根据您的指示而拟定的关于建立制度严格的劳改营和监狱来关押特别危险的国事犯以及将其流放到苏联的边远地区服刑的决定草案。

请您指示。

B·阿巴库莫夫

C·克鲁格洛夫[36]

决定草案说，“托洛茨基分子、恐怖主义分子、右倾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俄流亡者”等等，都必须遣送到在科雷马、诺里尔斯克附近、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卡拉干达以及其他地方新建立的几十个劳改营中去。同时还下令根据被判刑人员的交代开展“清查尚未抓获的罪犯的肃反工作”。在对待囚犯问题上，草案指出“不允许缩减隔离期限以及其他待遇”。此外，内务部*建议“如有必要推迟释放囚犯，须按照法律规定补办手续”。话说得很耐人寻味：“按照法律规定”推迟释放服刑

梅列日科夫斯基
(1866-1941)
俄国作家、哲学家

出生于一个宫廷官吏家庭，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文史系。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是俄国象征主义的首倡者之一。著作《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是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宣言，并攻击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是“功利主义的庸俗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主要描写基督教与多神教的永恒斗争。研究著作《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2卷)以宗教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强调两个作家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不以暴力抗恶和驯顺忍受等思想。1920年流亡国外，大部分时间侨居巴黎，所写诗文激烈反苏。1939年至1941年在法国同纳粹合作，1941年死于巴黎。

*1946年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的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都改称为部。

期满的人！

斯大林批下“同意”二字，只是在他的肖像上又添上一笔。对他来说，斗争、暴力、不自由，已经成了斯大林式的“创造活动”的工具。任何绝对化总是危险的。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导致斯大林否定了许多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诸如社会公正、人道主义、人身自由等最重要的价值观，都遭到践踏。斯大林个人专权的“秘密”就是蜕化变质的秘密。假如被“领袖”消灭掉的托洛茨基还活着，他会再重复他说过的话：“斯大林引导人们走向热月。”

当这个世界不只是靠福伊希特万格和巴比塞的帮助而逐渐对斯大林有所了解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确信，斯大林的主要“力量”，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就在于把阶级斗争这一现象绝对化。许多人甚至开始感觉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他那本抨击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基督的敌人的王国》中，比其他人都更早地看到了这种绝对化的致命危险。这里要提一下他在十月革命三年后写的一段话：“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好还是坏，是高尚还是可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些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不管是刽子手还是牺牲品，都对阶级斗争有所了解，而这却是马克思所不了解的，也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所有聪明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这个思想他们只是在头脑里有过；而我们已经把它融化在血液里，凝聚在骨髓里，由于搞阶级斗争，我们的鲜血在流淌，我们的骨头在断裂。”[38]确实，正是斯大林想尽一切办法使过去“只是在头脑里有过”的思想成了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如果他听不到、感觉不到因这一思想而牺牲的人在抽搐，他是不会感到平静的。

当战后欧洲甚至全世界明显地出现普遍向左转的动向时，可能有人会觉得历史证明斯大林是对的。许多人开始认为阶级斗争这把铁犁很快又会重新切割大地。在这种情况下，看来谁也不曾试图从全球角度来思考问题；核武器启示录这柄达摩克利斯剑还看不太清楚。“冷战”之风还没有冻结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社会积极性，看来问题并不会以殖民体系的崩溃为限。

战后时期斯大林的各次讲话，内容仍然是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一如既往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斗争以及为振兴农业而斗争。而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战后第一年农业歉收。由于我国的欧洲部分收成

极差,又加上停止从美国进口粮食,情况变得非常危急。但是,这些矛盾并没有使斯大林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一直推迟到1947年秋天才取消了购货票证。我国并不是第一次发生饥荒。斯大林记得,在转折的1943年农业同样歉收。但是美国人支援了前线,而和平居民又一次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坚强地度过了难关。1944年4月,有一天贝利亚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波格丹诺夫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默默地放在斯大林面前。最高统帅没有时间读报告,但是晚上他翻了八页报告。波格丹诺夫写道,1943年的歉收造成巨大的困难,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挨饿而得了浮肿病,许多人奄奄待毙,特殊移民更是如此。虽然使斯大林感到更为不安的是另外一些问题,但是他的目光还是停在了波格丹诺夫所举的具体事例上:

> 集体农庄庄员科瓦廖娃(西哈萨克州卡缅斯克区)的丈夫在前线牺牲,她有四个孩子,生活特别困难,拾树上掉下的果子和垃圾……
>
> 集体农庄庄员费多索娃(阿拉木图州安德列耶夫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两个儿子在前线牺牲,丈夫三次受伤,现仍在前线,她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帮助,因此以猫肉狗肉充饥……
>
> 在东哈萨克州济良诺夫斯克区23个集体农庄中进行调查的110个前线战士的家庭中,大部分长期领不到食物;许多集体农庄的儿童都得了浮肿病,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很难救活了……
>
> 在西哈萨克州泽列诺夫斯克区"12月5日"集体农庄,庄员们在疫畜埋葬场挖出马尸,然后分而食之……
>
> 在西哈萨克州沿乌拉尔区的"工农红军15年"集体农庄,女庄员加斯捷莉自杀后留下的一张纸条上写道:"我自杀了,因为走投无路,得不到任何援助……"[37]

于是他干脆把报告撂在一旁,因为操心的事已经够受的了……而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呢?他仍然按照习惯的方式思考: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在继续收集苦果,难道大家不明白吗?在大量文件中,即在报告粮食情况严重的电报、报告和汇报中,我没有发现一点斯大林积极反应的迹象,表明他曾有意给予一点帮助。

我读到许多介绍饥荒情况的文件,对此报刊、广播从未作过报道。1945年3月,向斯大林报告了赤塔州的严重情况,他仍然没有作出反应。不错,莫洛托夫曾指示给赤塔州再调拨一批面粉 。而在那一年,那里每公顷才收到……1.3公担谷物。贝利亚报告说,例如在别列伊斯克区布托里诺村,孩子们偷吃猪食……拆看由赤塔州寄往前线的信件的书信检查员确认,在莫戈图斯克区人们在吃瘟鸡;在斯科沃罗季诺村人们捡死马肉充饥;在乌列托夫斯克区所有的滨藜、荨麻、佉草、冰草根都吃光了……还有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一个叫杰米坚科的妇女,她的七个孩子都因挨饿面得了浮肿病,在绝望之余她杀死了才一岁半的小女儿,拿她的肉当食物,来救其余孩子的命……[39]

写到这些情节,我的心情非常难过。战争对人民来说是十分可怕的。我感到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不能直接算在斯大林的账上。然而他一生中都是麻木不仁的。在他看来,人们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大群"群众"。按照"领袖"的想法,"群众"受苦受难是严酷的必然性,仅此而已。在他看来,伟大的目标要求作出巨大的牺牲,这是很自然的。斯大林总是认为(也不仅是他一个人),忠于革命的激进主义就意味着在攀登既定的顶峰时要残酷无情,因为到那时他将要,或者至少是(如果他活不到共产主义)他的思想将要统治一切!要是把精力都耗费在生活琐事上,那就会陷进忙乱的日常事务中。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领袖不应该多愁善感。但是,他不会把这一点公开讲出来。这也是他的一个"秘密"。相反,却要让大家都知道他"关心"每一个人。

许多人在长时间里认为斯大林实现独裁统治首先靠的是他享有的极大威望,靠的是他对人们在精神和道义上的统治。但是,斯大林自己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中拿握的暴力机关以及早就被斯大林变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修道会"的党——这才是他的主要工具。这已经不单纯是贯彻他的意志的"传动带",而是他所建立的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权力工具把社会主义和"领袖"等同起来了。他之所以有力量和影响,其"秘密"就在这里。然而他还有个人的秘密。

看来,斯大林没有写过日记,他作笔记也很谨慎。许多文件都按他的指示销毁了。在他的厚厚的几册来往书信(其实是别人给他斯大林写信写报告,而他只是口头或书面作"同意"、"上报结果"、"考虑不妥"

等等的简短批示)中,有时能读到他写的批注:"请销毁这些文件。**约·斯大林**。"[89]现已查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执行他的某些指示的报告有的已经销毁。有权阅读国外材料的人不多,斯大林是其中之一。这些材料采用政治讽刺手法把斯大林描绘得既凶恶,又可笑。对斯大林来说,阅读这些文件的译文起了积蓄仇恨的作用;他对国内外数不清的敌人"积聚了"一腔怒火。

例如,1937年8月斯大林接到报告得知一位"落魄的"诗人加林—米海洛夫斯基为谋生想在流亡国外的白俄办的刊物上发表一部长诗《普希金和斯大林》。这个报告中还附了以"领袖"和伟大的俄国诗人对话形式写成的长诗稿。斯大林当时又气又恨,翻阅了仍然采用旧字母的老式打字机打出的一页页手稿,他翻到长诗的最后几行时停住了:

"斯大林(醒来,揉揉眼睛,环视四周并翻阅普希金的文集。独自一人。)

不,这显然不是普希金写的:
我把那几行诗徒劳地查找……
看来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在我午睡时跑来打扰……
但是'上帝的肚子饿了'!
在我睡梦中正好送来了
烤羊肉串和红葡萄酒,
还有一个新的名字……(大声叫道):
喂,仆人们!把我常用的午餐端来,
还有国家政治保安局昨天的那个名单,
有一个名字我忘了写上,
是该死的普希金把我弄糊涂了……
(满意地搓着双手。)
同志们,我就是这样工作,
国家大事常在心中萦绕,
我的生活像伏尔加河奔腾的波涛……
'罗斯不是你,而是我,'普希金应该知道[90]!"

他记得，当他在1937年读了托洛茨基那篇特别使他震惊的演说《我控拆》后，仇恨的怒火同样在他胸中燃烧。托洛茨基的这篇演说是在纽约赛马场发表的："为什么莫斯科这样害怕一个人的声音？不过是因为我知道事实的真相，因为我没有理由掩盖事实的真相。我准备向国际调查委员会提出说明真相的文件、事实和证明。我宣布：假如这个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我犯有哪怕是一点点斯大林指控我的那些罪行，我愿意向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动投案。这一点我向全世界宣布……但是，假如委员会认为在莫斯科进行的审判是有意识、有预谋的挑衅行为，那我就要求指控我的人们站到被告席上。"[50]

斯大林经常保存这样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才把它们交给波斯克列贝舍夫。许多文件都是波斯克列贝舍夫销毁的，还有一些保存在档案馆的密室里。对斯大林来说，这是他同他所仇恨的人，同他所反对的人，同向他发起进攻的人在单独打交道。斯大林能"积聚"仇恨，他也能把它"排放掉"。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感到了这一点……

有一个时期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叶皮舍夫讲过，斯大林有一个厚厚的黑布封面的笔记本，他有时用来记些事情。这未必是为了备忘，因为斯大林的记忆力"像计算机一般好"，尽管在晚年他的记忆力已开始减退。可能这些笔记的内容永远是个秘密。叶皮舍夫估计斯大林有可能保存过一段时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茨基给他本人的一些信件，但我不知道这种估计有什么根据。不，斯大林不像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那样天天写日记。皇帝写了36年的日记，一天也不缺，精制的山羊皮封面的本子密密麻麻地写了50本！我



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

想，斯大林不屑于像一个女中学生那样记日记，这种日记尽记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根据独裁者的性格判断，他会记一些有关今天和明天的活动情况以及有关人员及其未来命运的重大事情。尽管我作了一切努力，还是没有弄清“领袖”的个人笔记的内容和这些笔记的下落。能直接见到斯大林的只有贝利亚、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只有他们才知道有过这些笔记。但是斯大林最信任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在他去世前不久已经遭到贝利亚的诬陷而从斯大林的身边排挤掉了。总之，在“领袖”去世之前，他身边的三个人中只剩下一个贝利亚了。

当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早晨把医生带到中了风的斯大林跟前时（在此之前的12至14个小时他没有得到抢救），斯大林身边的那个魔鬼立即明白，他已经完了。贝利亚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留在奄奄一息的斯大林的身边，而自己却直奔克里姆林宫。今天谁敢说，这个新富歇*不是首先去开斯大林的保险柜的呢？如果他是这样做了的话，那他会把“领袖”的个人笔记本拿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斯大林的其他文件？

贝利亚不会看不到，在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中，斯大林对他的态度一天不如一天。斯大林自己不会不去猜测贝利亚的用心。也许，大元帅留下过指示甚至遗嘱吧？当时人们对“领袖”是惟命是从的，看来他的亲信们是会执行他的意志的。贝利亚有理由担心并且抢先采取行动。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因为斯大林的警卫都是他的人。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据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是，斯大林

* 富歇（1759—1820年）曾任法国警务大臣，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钻营家。

的保险柜里除了党证和几叠没有什么价值的文件外，实际上空空如也。贝利亚销毁了斯大林的神秘的个人笔记本(如果这个笔记本原来放在保险柜里的话)，为自己登上最高地位扫清了道路。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弄清楚斯大林的这个“秘密”——黑色笔记本所记的内容了。叶皮舍夫确信，贝利亚在正式打开保险柜之前就把它“打扫干净了”。看来他非常需要这样做。

斯大林有一个习惯，对他出于各种原因感兴趣的一些文件，如一些信件、密码电报和证明材料，他都要把它们放进一个专门的公文夹里。例如，1946年初贝利亚把希特勒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的影印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曾经多么希望活捉希特勒啊！)他花了许多时间来读元首遗嘱的译文，久久地反复读着某些句子。

> 我决心在结束我的人间生活之前娶一位姑娘为妻……她甘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起死去……我们希望立即就地火化。
>
> ……我许多年来收集的画，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在多瑙河畔我的故乡林茨城建立画廊。
>
> ……我不想落到敌人的手中，他们为了让他们中毒很深的群众取乐，定会由犹太人出面组织大会。
>
> ……我死得心情愉快……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复兴，前途光芒万丈……[⑳]



希特勒最后的照片之一，摄于1945年3月20日，40天后他自杀身亡

斯大林比他的战友们更了解宗教含意，遗嘱中有一句话特别使他恼火：“我决心在结束我的人间生活之前……”难道希特勒还希望过阴间生活吗？是想上天堂吧？斯大林十分惋惜的是希特勒逃脱了国际法庭对军事罪犯的审判，但是这些文件和另外一些从柏林给他送来的文件一样，使他有可能更清

晰地看到他这些年来与之作殊死斗争的那个敌人的一个预示着不幸的侧面。他会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也要把他斯大林同被他消灭了的那个敌人作比较，并且还要寻找两个独裁者身上固有的共同特征呢？这也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揭开的秘密。

在公文夹里还放着另一些看来是斯大林翻阅过的文件。这些文件保存在他的全宗里。我仅列举其中的几份。在公文夹里有一封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生1935年10月27日写给斯大林的信，这些新专家在信中抱怨说把他们迁出了宿舍，可是像巴格拉季昂公爵小姐那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却仍旧住在宿舍里[63]。公文夹里还有取缔前政治苦役犯和流刑移民协会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彼得斯和波斯彼洛夫写的报告说，在这个协会中"主要是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抱成一团，打得火热。在基洛夫遇害后有40至50名该协会的成员被捕……"报告接着写道：他们的杂志《苦役和流放》重点写的是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拉吉舍夫、奥格辽夫、卢宁和其他人。还有论尼采和克伦斯基的文章；杂志还报道了民意党人是如何制造炸弹的（据说，这十分可疑）……协会中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保护被苏维埃政权逮捕的协会会员……"[64]斯大林读了这个报告后，这个协会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在公文夹里还有阿库洛夫为建议在彼列科普和琼加拉建立纪念碑而写给"领袖"的信。斯大林的批示是："存档。暂缓办理。目前没有资金。"此外还有卡普列尔从监狱里寄来的要求派他上前线的一封信；贝利亚写的关于南斯拉夫将军斯捷法诺维奇提供有关斯大林儿子命运的情报的报告（这位将军被俘后有一段时间曾与雅柯夫关押在一起）；克鲁格洛夫关于1945年12月从布拉格运回"俄国在国外的档案"的报告[65]；雅哥达、拉狄克、左琴科、日丹诺夫、谢罗娃给斯大林的信，以及其他许多文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已经归入个人档案；另一部分看来已经销毁。在"个人书信"夹中，除了一些公文，还有不少直接写给"领袖"的信件。读一读这些文件也使我们有可能撩开独裁者用来掩盖自己的"秘密"的帷幕一角。在斯大林建立的封闭社会中，自然既不可能有任何公开性，也不可能让人民了解什么情况。人民了解情况越少，领导起来越容易。日丹诺夫、苏斯洛夫以及他们的门徒是负责掌握这个"最低限量"的。

还有一个今后未必能够得到彻底揭露的秘密，这就是斯大林的妻

子之死。官方公布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说法早已尽人皆知。但是看来其中没有一种是有说服力的。我只是谈一点想法。有一份写给加里宁的引人深思的文件,这就是请求赦免监禁在索洛夫基劳改营的亚历山德拉·加甫里洛芙娜·科尔恰吉娜的报告。报告是1935年10月22日用紫色铅笔写在几张学生用的练习簿的单页纸上的。

从这封长信中看出,党员科尔恰吉娜曾在斯大林的家里当过五年佣人。她是由于一个名叫西涅洛博夫的犯人招供而被捕的,此人以前曾在克里姆林宫工作过,他说科尔恰吉娜曾经说过阿利卢耶娃似乎是斯大林本人枪杀的。科尔恰吉娜在信中否认了这件事,但不能令人信服,她只是引证了官方关于她的女主人"心力衰竭"的说法。在报告中提到的布尔科娃、西涅洛博夫(材料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和父名的缩写)、与科尔恰吉娜同居的警卫人员格洛梅以及没有提姓名的党支部书记,都曾向女佣人打听,为什么报纸上没有指明死亡的原因。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许多人对官方有关死亡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而且正如科尔恰吉娜所述,在阿利卢耶娃去世的那天晚上,看来斯大林是紧跟在妻子后而回到克里姆林宫的住所的。很可能这些话传到了斯大林那里,他因此非常惊恐,于是他决定不仅要把科尔恰吉娜撵走,而且将她逮捕,这样叫所有对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都保持沉默。就是要他们保持沉默。

在1935年底和1936年初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旨进行审判的。科尔恰吉娜给加里宁写信说,侦查员科甘的种种威胁,迫使她承认指控她的罪名,随后不经审判她就被放逐到索洛夫基劳改营。附在信后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全权代表卢茨基的结论说:科尔恰吉娜"因政府图书馆、克里姆林宫管理处以及其他单位中的反革命恐怖主义小组案件受审"。那位"全苏领导人"的批示简明扼要:"驳回。米·伊·加里宁。1936年3月8日。"[69]

还需要补充一点,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阿利卢耶娃不是自杀,而是斯大林开枪打死的,当时他由于极度愤怒,不愿再忍受性格倔犟的妻子的任性才开的枪。考虑到"领袖"的道德面貌,这种说法并不令人觉得是不可能的。当斯大林把自己的朋友、政治局中的同志、国内战争时期的战友以及亲属送上践踏法制的断头台上时,他的手从来没有颤抖过,思想也不曾波动过。当然也不能排除下面这种可能性:阿利卢耶娃


斯大林长子雅可夫,二次大战时在德国狱中

不单是已经受够了丈夫冷酷无情的态度，而且是要用这种悲惨的方法抗议她所了解的一切。

在斯大林的不少私人秘密中，有一个是同他的长子雅可夫有关的。根据一系列证明材料，可以有理由认为，曾经作过一两次努力，试图帮助上尉雅·朱加施维里从俘虏营中逃跑。关于这一情况，多·伊巴露丽也特地写到过。与其说斯大林想救儿子，还不如说他想使自己不受危害。他担心法西斯匪徒会把雅可夫"压垮"并且利用他来反对父亲。但是，德国人关于朱加施维里的事逐渐提得少了，后来就完全不提了。大概在1945年3月5日，当内务人民委员向斯大林作了如下报告后，他才完全安下心来：

国防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年1月底,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德国集中营中解救了一批南斯拉夫军官。其中有一名南斯拉夫宪兵部队的将军斯捷法诺维奇,他讲了下面的情况。

雅可夫·朱加施维里上尉、法国前总理莱昂·勃鲁姆的儿子罗伯特·勃鲁姆大尉以及其他一些人曾关押在吕贝克市的"X—C"集中营。朱加施维里和勃鲁姆关在同一间牢房。斯捷法诺维奇大约有15次去看望过朱加施维里,向他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但朱加施维里拒绝了。他有骨气,很自豪。他看见德国军官从不起立,因此多次被关进单身牢房。朱加施维里说,德国人的报纸上所散布的关于他的传闻全是谎言。他确信苏联必胜。他给我写了莫斯科

的地址:格拉诺夫斯基街,3号楼84室。

贝利亚[47]

斯大林和贝利亚为解救雅可夫(或者为了不让他“说话”)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必要了。但这件事也属于那些永远保守的秘密。

在“领袖”生命走向终端、他的体力渐渐耗尽时,他想得越来越多:历史学家在他辞世后将得到什么东西呢?他给他们留下什么样的“足迹”呢?他留下哪些文件和书信呢?看来,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才在自己70寿辰前一年半的时候,指示马林科夫认真检查档案,弄清楚还有哪些涉及列宁和斯大林他本人的材料没有找到。斯大林对列宁不太感兴趣,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但是斯大林这个人特别狡猾,他知道“靠着”列宁来“清点”档案,无论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引起误解和怀疑。这件事也不难办,因为几乎所有的主要档案都归内务部管。过了8至10个月,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提出了报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内务部档案管理机构正在对保存在档案馆内列宁和斯大林写的文献原件进行系统的清理和登记。

1948年一年中逐页检查了190000件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分别保存在以下38个最重要的档案库里: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部、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消息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以及其他单位的档案库。

经过对上述190000件文献资料的逐页检查,清理出1203份手稿及列宁和斯大林手写的原件的抄件,并已转交给马列主义研究院……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今年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的58000件公文案卷进行检查。

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1949年1月28日[48]

据某些资料来看，马林科夫不止一次向斯大林报告过关于这些“检查”的结果。我想，远非所有的文件都交给马列主义研究院收存了。斯大林非常关心的是，历史上只保存他“准许”保存的东西。因此，在档案馆里许多原件已经没有，而复制件上又没有他的批示，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也纯粹是斯大林的“秘密”。其中有许多的确是不容易揭开的。

战争刚一结束，一些军人向他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打算赠送给苏联“俄国在国外的档案”，他指示安排接收工作和检查全部文献。1946年1月3日，仍然是那个克鲁格洛夫报告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下有九车皮文件（邓尼金政府的档案、佩特留拉的档案、阿列克谢耶夫、萨文柯夫、朱留柯夫、切尔诺夫、布鲁西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俄国活动家的个人档案资料）已运到莫斯科[49]。在这些材料中也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国内战争史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参加接收文件的有科学院的专家尼基京斯基、博哥亚夫连斯基、明茨、苏托茨基，但是领导整个这一工作和向斯大林报告关于档案资料的内容和今后处理办法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官员。有许多文件长期放在斯大林的书柜里和保险柜里。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对“俄国在国外的档案”进行整理后，发现了原沙俄将军布鲁西洛夫的手稿。布鲁西洛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西南方面军司令，进行了有名的史称“布鲁西洛夫”突破的战役。1920年起他在红军中任职，担任过工农红军的骑兵监，1924年起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特别重要的



布鲁西洛夫(1853–1926)
俄国骑兵上将

1872年毕业于贵胄军官学校。参加过1877–1878年俄土战争。1883年毕业于骑兵军官学校，后担任该校教官、校长等职。1906年起历任师长、军长。1912–1913年任华沙军区司令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集团军司令。1916年3月起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曾经组织指挥俄军西南方面军夏季进攻战役，创造了在漫长战线上以一点为主同时实施多点 正面突破的新经验，因此而闻名于世。1917年二月革命后，拥护临时政府将帝国主义大战进行到底的政策。同年5月任最高统帅。十月革命后拒绝领导反革命白卫军。1920年参加红军，历任工农红军骑兵监等职。著有《我的回忆》一书。

任务。《我的回忆》一书的手稿是他1925年在卡罗维发利治病时完成的(布鲁西洛夫在第二年去世),很清楚,这一手稿并不打算在苏联公开发表。

布鲁西洛夫在手稿后附的一张便函上写道:"……大家都清楚,我在苏联是什么也写不成的。我把这些笔记本交给国外的友好人士代为保存,请他们在我死之前不要发表……如果在欧洲的人们希望拯救制度、家庭和祖国,那他们应该理解我所犯的错误并且不要再重犯这些错误。我国的政治党派总是争吵不已,没完没了,直到把俄国毁掉!"[59]

这张便函记录了俄国爱国者的茫然失措的心情,他虽年过70,但还是理解不了和接受不了十月革命。对于斯大林来说,这张便函又一次"证明"他不信任专家是对的。

斯大林能把一切都变成秘密。甚至1938年7月填写的涉及高层领导人家庭情况的几张登记表都送给独裁者过目。斯大林用铅笔在表上划来划去:

……贝利亚,妮娜·捷伊穆拉多芙娜,格鲁吉亚人,科学工作者,儿子谢尔盖,14岁。

卡冈诺维奇,玛丽娅·马尔科芙娜,女儿玛伊娅和儿子尤里。

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

热姆丘任娜,波琳娜·谢苗诺芙娜;女儿斯韦特兰娜·维亚切斯拉沃芙娜·莫洛托娃和丽塔·阿龙诺芙娜·热姆丘任娜。

安德列耶娃—多拉·莫伊谢耶芙娜·哈赞,女儿娜塔莉娅·安德列耶芙娜……

斯大林用红铅笔划上一个个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记号,他"清点着"身边的亲信。斯大林在他自己的统计员哈里东诺夫的名字下面划上一条粗线。秘密,机密……如果没有这些秘密,他建立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斯大林的整个生活几乎像被裹尸布那样密不透风地包裹着。他经常在监视着他的所有战友。他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不能犯错误。沃兹涅先斯基敢于大胆直言,但他在一个什么问题上越过了可以允许的无形界限,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关于这一点,"领袖"的战友们都很了解。贝利亚经常报告对独裁者身边亲信进行监视的结果。而斯

大林自己也对贝利亚进行监视,但这方面的材料并不很充分。报告的内容都是口头的,也就是说是绝密的。

斯大林喜欢翻阅党的工作者、国家工作人员、外交人员以及军队工作人员的花名册,常常在一些人的姓上划下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记号。这些记号可能表示选不选进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是晋升贬职还是同级调动,有时甚至表示最糟糕的下场。看来作出这些决定的原因和理由是根据一个人对"领袖"的忠诚程度、以及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某些标准来确定的。

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要领导人要保守个人秘密是困难的。在民主社会中没有必要这样做。在斯大林时代,政治局成员的家庭情况、个人爱好、对这样或那样的大小问题所持的态度,都属于国家的绝密材料。领导层的情况严格保密,若明若暗,以及由此带来的神秘色彩,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由"亲信"、"战友"、"志同道合者"构成的环境。在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武器库中,随时可以抛出关于可能发生的"阴谋"、"暗杀"、"恐怖活动"种种说法。斯大林确实害怕遭到暗害,怕得要命。他认为在社会上会有(必然有!)类似民意党人、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他们孤注一掷,一心搞恐怖行动。斯大林一辈子都在提防暗害。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领袖"对自己强迫伟大的人民保持沉默、鸦雀无声的能力估计不足。那些了解如何朝着列宁指引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独裁者已经把他们消灭干净,而新的一代——代年轻人接受了斯大林的蛊惑宣传后则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是斯大林为他们建设的那样的社会。斯大林身边的亲信了解"领袖"的这种病态的恐惧心理,并且病态地担心会招致可能危及他们自身的嫌疑。斯大林所有的战友都了解这个"秘密"。

一个社会实行封闭是从领导开始的。斯大林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的私生活中只有很小的一点点情况得以公之于世。在我们国内为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印制、塑造了数以千百万计的肖像、雕像和半身像,人民盲目崇拜他,把他奉若神明,但是对他却完全不了解。斯大林善于保守自己的权力和个性的威力的秘密,而只给人民看那些让他们欢欣鼓舞的东西。其余的一切都被一条看不见的裹尸布遮盖着。

周期性发作的暴行

时间对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是同一把尺子。对领袖们也不例外。肩负着岁月的重担，斯大林的声望在不断提高。实际上他已经名扬天下了。无论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意志、他的非凡的智慧和意图都不敢等闲视之。还在斯大林70寿辰前很久，政治局就根据马林科夫的倡议研究了为隆重祝寿而安排的一系列措施和步骤。不仅建造新的纪念性建筑物，以斯大林的名字为一些联合企业和工程项目命名，使"领袖"流芳百世，而且还要组织无数的劳动汇报。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来信"全宗里，有人民委员（部长）、工厂厂长和州委书记们的大量汇报和报告。但最多的是贝利亚的请示报告。贝利亚还在战争时期就开始用自己主管的人民委员部所取得的"劳动成绩"来取悦斯大林。例如，1944年1月26日他写了如下报告：


格鲁吉亚哥里市的斯大林纪念馆

国防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业建设工程处已经完成了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厂热电中心的第一期建设，功率为25000千瓦的1号涡轮机和1号锅炉已投产使用。中央热电站于1943年3月在一片荒原上开始动工，仅用了短短的10个月就全部完工。特此报告。

附上建设者的汇报和复电草稿,请指示。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51]

贝利亚的汇报经常不断。给人的印象是,他主管的部门的工作比其他部门的都好。在斯大林70寿辰之前一年中,克鲁格洛夫给“领袖”写了无数诸如此类的报告。

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内务部向您,斯大林同志报告:彼乔拉煤矿矿工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第三年的任务而奋斗,12月19日(“领袖”69寿辰前两天。——本书作者注)完成了全年的采煤计划……彼乔拉煤矿矿工要在今年年底向国家提供超计划煤20万吨。

苏联内务部长 **C·克鲁格洛夫**[52]

在我国成百上千个企业中都有这样的“矿工”在警卫队的监视下干活。斯大林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因为新社会的建成要求残酷无情的淘汰。一切不配称为“新人”的人都必须在劳改营中接受长期改造。甚至当法西斯军队已经兵临城下、莫斯科已在敌人的远程大炮射程之内,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几十个兵团和部队本来大部分都应该开赴前线,却仍在看守着大批犯人。朱可夫和其他军事领导人本来不必把手头仅有的兵力都集中起来去堵前线撕开的缺口,也可不必把军校学员、民兵、守卫军事仓库的小分队、警卫连……都调到突破口去。而在这个时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却在看守着“人民的敌人”。但是,似乎斯大林害怕他们并不亚于害怕法西斯军队。

从文件中看出,正是斯大林首先提出要把犯人变成供应无权的廉价劳动力的经常性来源。应该指出,斯大林在1938年8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鼓励违法行为,甚至允许将服刑期满的犯人留在劳改营里不释放,这个讲话立即形成一项相应的法律文件,千千万万人因此身受其害[53]。布古鲁斯兰县的一位退休工人卡巴耶夫在同我交谈时说,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个航空工厂的工程师,1936年因莫须有的“从事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而被捕,并被判刑五年。后来不经任何审判又给他加刑六年。1947年他回到当时已被流放到布古

鲁斯兰县的家里，但他同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不久他再次被捕，坐牢，不经任何审判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就在那里他离开了人世。他的一生是被摧残被蹂躏的一生。而这样牺牲在专横之下的人又有多少呢？谁说得出来？谁清楚呢？

贝利亚在斯大林的完全同意和赞许下，逐渐在监狱中建立了利用知识分子，即工程师、医生、建筑师、工程人员、工艺学专家、学者的一整套制度。还在战争时期犯人们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双手作出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增强国防潜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有因此获得自由的事例。下面举个例子。1944年2月，贝利亚写了如下的报告：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2至1943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专家处所看押的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十六厂完成了以下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工作：

1.根据格卢什科提出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使飞机加快速度的Ⅰ型远程侦察机液体喷气发动机样机。

2.根据多勃罗沃利斯基提出的设计方案，在联结M—105型系列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МБ—100型起飞功率为2200马力和МБ—102型起飞功率为2425马力的大型号飞机发动机……

鉴于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撤销表现特别突出的在押专家的刑事处分并予以释放是适宜的……请指示。

贝利亚[53]

下面是35名犯人的名单：阿尔季舍夫斯基（判刑10年）、别加什（10年）、别列日诺伊（25年）、博德尼亚（20年）、布拉金（10年）、维特卡（10年）、弗拉基米罗夫（10年）、沃尔弗（10年）、格卢什科（10年）等人……这种做法继续了许多年。斯大林相信，智力在被监禁的条件下也可以卓有成效地为大众谋福利。

“领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初衷。他想亲自决定一切。对他处理的日常事务进行分析的结果证明，权力的集中进一步加强了。凡是稍微



美国在比基尼进行水下原子弹试验爆炸后的恐怖场景

重要一点的问题，没有斯大林的同意就解决不了。骇人听闻的中央集权制像一道铁箍束缚了首创精神，扼杀了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性，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停滞。诸如新建设项目，主要是重工业企业的建设，硬性币制改革，利用大量德国和日本俘虏的劳动力，削减莫斯科防空部队的人数，建立林业部……关于T—54型新坦克的研制进程、关于拨给科研所1克镭、关于苏联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外科医生代表大会、关于维也纳苏联文化馆开幕式、关于美国在比基尼进行的原子弹试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的情报——所有这一切斯大林都要亲自处理。再如布尔加宁和戈利科夫打小报告，说朱可夫元帅"为所欲为"，说他竟在晚会后特地下令表彰鲁斯拉诺娃和其他莫斯科剧院的演员……斯大林把文件撂在一旁，没有批示。又如，苏联部长会议东正教教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波夫关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下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举行例会的报告……"领袖"认为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还要再次强调指出，斯大林每天要解决好几十个问题，有大的也有小的，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他确实成了他所建立的制度的俘虏。但是他不可能不这样做，也不愿意不这样做。只要有人未经斯大林或者哪怕是他的某一个亲信的赞同就比较独立地作出决定，那么随之而来的反应就十分严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就是一个例子。他未经中央作出专门决定就贸然同意在这个涅瓦河畔的城市举行全俄商品交易会。他的这一行动成了证明列宁格勒领导人"反党"的一条"论据"。

斯大林精疲力竭地翻阅着无数的译电稿、报告、报道，他颇为满意地看到，在他70寿辰即将到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重建了所有被破坏的企业并开始兴建数百个新企业。经济恢复工作进展很快。在同沃兹涅先斯基的最后一次谈话时他又一次强调：注意力的中心要放在重工业上。农业、消费品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财力和技术力量，要像过去一样首先用在工业上。但是，工业中出现的增长基本上也是数量上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上的增长。农业在这一时期呈递减趋势。斯大林未必知道集体农庄庄员既领不到身份证，也得不到任何物质刺激，他们干活只是害怕受到多得不计其数的惩罚和沉重负担(必须挣够最低数量的劳动日；向农户征收的税越来越重，对每一只大小牲畜甚至每一株果树都要收实物税或货币税；减少宅旁园地等等)。他们是无权的阶层，既不可能反抗，又改变不了现状。集体农庄的收成(通常是很低的)统统被收走，而得到的是少得可笑的、象征性的报酬。年轻人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拥向技工学校，或者到许许多多新的建设工地和伐木场去出卖廉价劳动力。集体经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切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播种，到轮到谁当主席——都由上面决定。

从20年代末起开始的"自上而下的"农业"革命"，说明了发号施令和行政强制带来的危害极大。中央委员会就农业问题通过了不计其数的决定，但是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上层作出的，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杠杆来设法强迫人们劳动。实际上这种劳动是不自由的。维辛斯基主编的《苏联工作人员手册》引述了中央各种决定的大量摘要，其中指出禁止什么，限制什么，防止什么，要对农村采取哪些"社会保护"的惩罚措施[55]。尽管这本手册是战前出版的，但是直到今天，几乎它的所有基本规定都具有原来的惩罚作用。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一切都依靠人民不遗余力地苦干，依靠千百万人的英勇献身，他们总是耐心地期待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生活，就会发现，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是靠强制手段开辟的。斯大林则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集体农庄的农民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开农村。数量很多的劳改营总是人满为患。说话稍不留神，就可能失去自由。来自上面的指令、命令和指示往往是荒唐的，是不容许讨论的。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7月10日的决定[56]建立起来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继

续在积极发挥作用。凡是被怀疑持不同意见或从事某种政治活动的人,仍然会受到严惩。每个月都有大量的内容非常相似的报告送给斯大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8年12月24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已经侦查的260人的案件。其中分别处以不同期限徒刑的有:

25年——8人

10年——8人

7至8年——48人。

有29人处以12年苦役。特此报告。

苏联内务部长 C·克鲁格洛夫[57]

12月30日特别会议的"工作"量没有变化,只是被判处服苦役的人减少了一半,只有15人[58]。所有的决定都得到专制统治者的赞同。这可是他苦心经营的产物。服苦役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实行的。

读者不必大惊小怪。按没有公布的1943年4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规定对法西斯杀人犯、叛徒、占领军的帮凶实行一种特别的惩罚——服苦役。通常由战地军事法庭判决10至20年不等的苦役。但是战争结束后,特别会议却行使起战地军事法庭的权力,对特别会议作出的判决不得上诉。而掉进这个磨盘里的不仅有伪警察,而且还有不过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和可疑分子。不错,战后不久某些部门确实曾向斯大林提出过修改特别会议判决权限的建议:

"鉴于战争已经结束……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以判处10年以下刑期的权限是适宜的。"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这个超法庭的镇压机关存在的时间比它的主要创建人的寿命长不了多久:1953年9月特别会议终于被撤销。这是暴君死后社会第一次轻松地呼出的一口气。

在苏联人民表现出舍己为人、奋不顾身、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同时,频繁地出现周期性发作的暴行——经济、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暴行。"领袖"认为这是常规。在不计其数的有关特别会议的会议报告上(在这些会议上从未有人被宣告过无罪),他总是一如既往地签上"约·斯大

林”。许多人,确切一些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斯大林什么都了如指掌,一清二楚。但是他看见的是他愿意看到的事。他从来不愿意(哪怕是有过念头)看一看在他的劳改营呆过的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的完全绝望的眼神。在他们的眼里他会看到使他的世界公认的声望黯然失色的真正不祥的阴影。但是,斯大林依然念念不忘他那过去的想法: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这样他的声望就会更高。


老年人缅怀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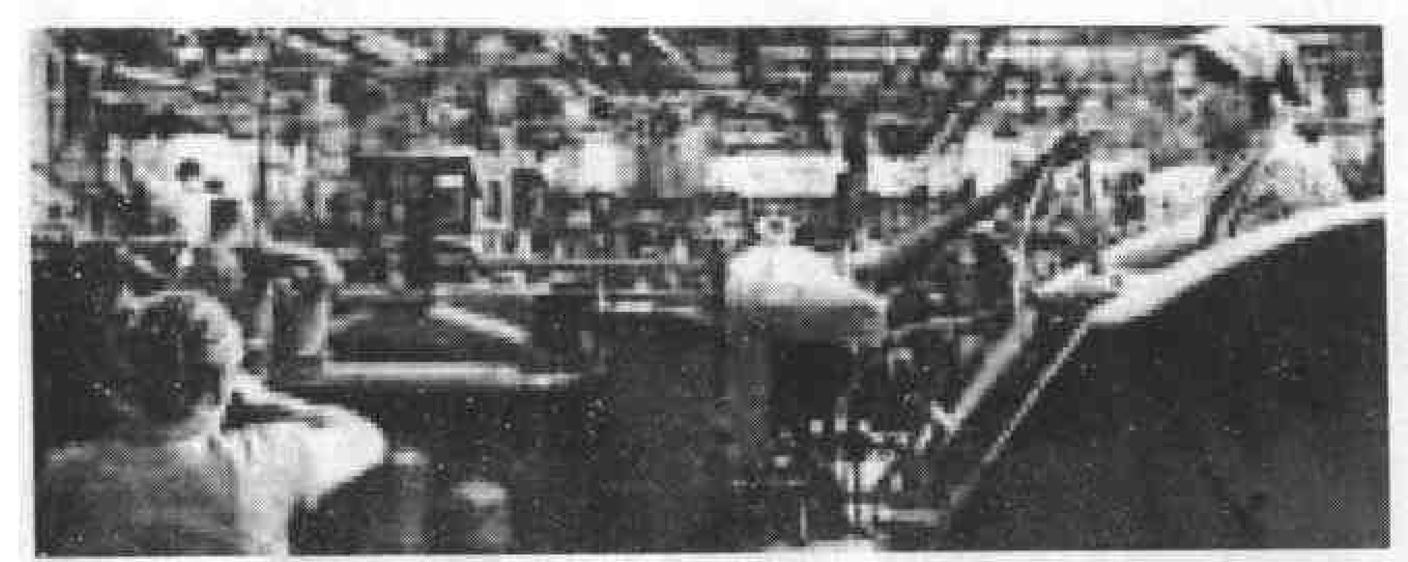
“领袖”在自己70寿辰的那一年采取了一项行动,至今还受到上了年纪的人们的好评。他竟然在农业实际上崩溃和轻工业不景气的条件下决定(以后的几年也是这样办的)大大降低消费品的价格。

尽管斯大林在前一天晚上就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1949年3月1日起降低消费品的国家零售价格”的决定,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较晚地用完早餐后,洋洋自得地打开3月1日的《真理报》。他看见长长的一列数字。他的视线停留在下列几行字上:“从1949年3月1日起降低大量日用消费品的国家零售价格,平均幅度如下:

面包和面粉	——10%
黄油和炼过的油	——10%
肉类灌肠制品和罐头	——10%
烧酒	——28%
化妆品	——20%
毛织品	——10%
自行车	——20%
电视机	——25%
钟表	——30%

餐厅、食堂、茶馆以及其他公共饮食业的价格也相应降低。”

斯大林把报纸搁在一边,开始沉思起来。人民生活很苦。内务部的



妇女们在高速自动化工厂的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每年超过6万台拖拉机从这里被制造出来

机构报告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人们仍旧忍饥挨饿，穿得很破。但是他确信，人们的温饱程度超过一定的起码标准，只会使他们堕落。何况要增加供给量也不可能;需要巩固国防，发展重工业。国家应该是强大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今后也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后来每年居民都盼望下达新的降价规定。每年他们都如愿以偿。斯大林的威望更高了。人们不愿意看到，在商品奇缺的条件下，降价政策在提高物质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工资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实行的降价，这实际上是冻结了工资。这种政策也还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社会宣传。从某些可比指标来看，大概可以肯定地说，50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才略高于1913年。我根据自己的统计作出的结论也可能有错误。但是，有一点感觉是难以回避的，这就是长期以来所作的种种试验，由于受到可怕的战争的极大“干扰”，在实际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给予人民的东西太少了。

当然不能不说，苏联人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大大加强了;在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特别是规定了发放退休金，实行法定的带工资的休假，对战争中牺牲人员的家庭发给抚恤金，对多子女的母亲实行补助以及其他种种福利。但是，所有这一切是最起码的社会经济保障，它反映了普遍贫困这一现实。在农业急剧衰退的状况下，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带来的决不是令人乐观的前景。

在关于过去那段时期的热烈争论中，有人常常提出“秩序”、“纪律”、“尊重法令”等问题作为替斯大林“辩护”的论据。有人说，现在堕

落到了什么地步：卖淫、吸毒都出现了！关于卖淫的事我不了解，但是其余的诸如酗酒、流氓行为、偷窃甚至吸毒等不良现象，当时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过。只不过所有这些都被看成是“绝密的”犯罪统计资料。可能这些恶习存在的规模比现在要小一些，但是，我再说一遍，当时甚至也有过吸毒的现象。1948年1月，克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报告说：

> 1947年11月伏龙芝州内务局（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获悉：伏龙芝市由尼格马特扎诺夫、哈比布林、希斯姆特季诺夫、盖努利娜等（在文件中没有名字和父名的缩写。——本书作者注）等结伙倒卖鸦片。没收鸦片17公斤……[59]

又如，培养工人干部的制度被认为是国家取得的无可争辩的成就。当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与此同时：

> ……1946年内务部机关抓获了10563名从工厂学校、技工学校和铁路中学外逃的学生……由于上述原因发生了偷窃、抢劫等许多犯罪行为。中学的生活条件也不尽如人意：不讲卫生，室内很冷，经常没有照明……
>
> C·克鲁格洛夫[60]

兵营制度、暴力行为、行政方法，不仅不可能消除犯罪，而且也不可能减少犯罪。尊重法律、人际关系的高度文明和社会环境的民主化可以有效地抵制犯罪的畸形现象——对此斯大林未必同意。

由于个人专权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即一方面是一个人的绝对专政，另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的不自由；一方面是全面确立官僚制度，另一方面是迫切需要社会积极性；一方面是强制要求思想一致，另一方而是对群众创造性的自然需要——这些矛盾使未来的危机日益严重。对这些问题斯大林要么是不想懂，要么是不能懂。这“一束”矛盾好像点缀着胜利者的荣誉。他越来越固执地捏紧意识形态的杠杆，而不是经济杠杆，没有看到人们的革命热情在慢慢地然而却是不停地消退。斯大林像以往一样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竞赛上，从而束缚了群众的创造积极性；他越来越多地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即采用威胁手段、行政

命令手段。为斯大林70寿辰祝寿的活动，使得对他的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发生了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同暴力联在一起的。这是独裁者个人专权的规律。甚至在实现宏伟的社会经济纲领的条件下，他也需要在内部，哪怕是在一个地区范围内进行“国内战争”。在战胜法西斯后，斯大林把这场“国内战争”的震中转移到了列宁格勒。

今天我们了解到，1946年那个关于列宁格勒的《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毁灭性的决议是根据“领袖”的提议作出的。在这个决议公布后，接着卢科夫导演和尼林编剧的影片《灿烂的生活》、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都受到批判，剧院的上演剧目也遭到打击。斯大林感到在文学艺术界出现了虽然还不太明显的企图越出党、也就是越出他所规定的参数范围的做法。“领袖”认为这威胁到思想一致，进而有朝一日就可能对个人专权构成威胁。他那以不可动摇的一整套公设为支柱的精神世界是不能同这种自由思想调和的。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迫害成了进行意识形态清洗运动的一个信号。列宁格勒在战争年代经受过非人的考验，至今尚未恢复元气，现在又被当成了思想上异端邪说的发源地。这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要让人们懂得：如果连以列宁命名的英雄城市都不放过，那么其他人就更不会放过。

在日丹诺夫的档案全宗里有一封维拉·左琴科写给斯大林的长信。

敬爱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恳请您把这封信交斯大林同志一阅，

左琴科(1895–1958)
前苏联作家

1895年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1913年入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1915年世界大战期间自愿入伍。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因病复员。1921年步入文坛，同年加入“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二三十年代左琴科的幽默作品风靡一时，很快成为苏联享有盛誉的幽默讽刺作家。由于文学成就卓著，于1939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

1923年出版第一部幽默故事集《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的故事》。随后发表了许多中、短篇讽刺小说《贵妇人》、《狗鼻子》、《澡堂》、《产品质量》、《蓝书》等，描写革命后社会生活中遗留的旧痕迹和种种陈规陋习，嘲笑了自私、落后、官僚主义等现象。他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和《猴子奇遇记》先后受到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批评。此后一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58年在列宁格勒病逝。

如果读信会使他感到疲倦，那就请把这封信的内容扼要地转告他……

致以衷心的敬礼！

维拉·左琴科

1947年9月8日

在这封信中，特别是开头有几行文字，在当时几乎是必须写的，但今天读起来，却令人感到难受。"……一想起这个世界上还有您在，我的生活中就有了最大的欢乐，您健康长寿是我最大的心愿。"作家的妻子继续写道："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的确使我感到震惊……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要知道大家都喜爱左琴科。他得到人们（高尔基、吉洪诺夫、莎吉娘、库兹涅佐夫、马伊斯基）的承认。根本不可能有从列宁格勒逃跑的事……他1944年的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创作描写游击队员的书……在他的作品中根本不可能有诽谤和恶意找茬的问题……"这位勇敢的女人实际上驳斥了对她丈夫的一切诽谤和指控。她为作家辩护时，真诚地坦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变态—神经衰弱……古怪的躁狂症。他很担心像果戈里一样精神失常。他开始用自我剖析来治自己的病……似乎治愈了。他因为患病而获得了讽刺的才能，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但是他不会服从别人的意志，不会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行动……"[⑩]

根据一切情况来看，斯大林读了这封信，因为信上的着重记号正是用他给日丹诺夫写信用过的那支铅笔划的。"领袖"不能不感到，不接受他的估价的，决不仅是作家妻子一个人。令人惊异的是，斯大林对左琴科及其家庭只限于精神上的折磨，没有进行更多的迫害。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击了列宁格勒之后，过了两年又对它在政治上进行了惩罚性的严厉打击，许多人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一些新的大规模镇压行动的"预演"，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1949年2月中旬，"领袖"派马林科夫去列宁格勒，并且预先给他作了指示。形式上的理由是在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期间违反了党内生活准则。这种事情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的。尽管在选举州党委时有几个人对州的领导人波普科夫、巴达耶夫、卡普斯京、拉祖京投了"反对"票，计票委员会主席吉洪

诺夫在报告选举结果时却仍然宣布所有这些同志都得了满票。于是计票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便马上向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尽管斯大林本人早在1934年就严重地弄虚作假，捏造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但是这一回他作出的反应却十分严厉：

"说明列宁格勒领导人的活动的危险信号已经够多的了，再也不能不作出反应。马林科夫同志，您去走一趟，把一切情况了解清楚。贝利亚同志那里还有一些材料……"

"好的，斯大林同志，我今天就乘夜车出发。"

斯大林所说的是这样一些"信号"。据说州党委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的支持下，根本不把党的中央机关放在眼里。有些什么事实呢？1948年1月在列宁格勒组织全俄商品交易会。这件事没有经过中央机关作出专门决定。马林科夫作为斯大林的一名勤奋的门徒，在列宁格勒州委常务局和市委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把列宁格勒领导人的"错误"罗织成一长串罪名。在肃静无声的大厅里，人们心情沉重地听着马林科夫声色俱厉地历数对他们的一个又一个的指控。他认为交易会问题是反党小集团行为，是列宁格勒党组织与中央委员会分庭抗礼的表现。但是主要的东西还在后面。马林科夫遵循莫斯科确定的路线，抓住波普科夫说得不恰当的几句话，提出了一条根本性的指控，即居心叵测地企图建立俄罗斯共产党。大家都明白了：马林科夫的讲话是大难临头的先兆。

坐在大厅里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前任州委书记、不久前才调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库兹涅佐夫一星期前已被撤职。在马林科夫作了报告之后，州和市的整个领导班子自然就被解除了职务。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每一个怀疑对象都被牵进了迅速炮制出来的"案件"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大逮捕。马上就揪出了像卡普斯京那样的"间谍"、波普科夫类型的"蜕化变质分子"、库兹涅佐夫那样的反党方针的"策划者"。

1949年3月，又有一名列宁格勒人——沃兹涅先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这位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上的真正统帅、科学院院士、禀性耿直坦率的人，开始使斯大林感到太危险了。贝利亚手下的克鲁格洛夫、阿巴库莫夫、果格里泽确实是凭空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审讯开始了，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他们供认从事反党反国家的活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大肆抹黑的主要执行者之一的马林科夫，满

意地搓着双手说:斯大林的指示落实了。他“彻底地”搞清楚了。而且他和他的亲密伙伴贝利亚,都曾公开表示不喜欢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是争夺党的领袖职位的潜在对手(因为“领袖”衰老得很快)。在国内又好像1937年那样开始“迫害异端”。所有的人又都提心吊胆地等待出现最糟的事情,这并非没有根据,尤其是那些在不同时期被派往各共和国和各州去工作的前列宁格勒工作人员“都已被清洗出去”。

是什么东西引导斯大林去策划这一罪恶行动的呢?为什么在他自己70寿辰的前夕想采取这种行动呢?为什么1946年8月从意识形态方面打击了列宁格勒之后,过了两年多又作了一次更令人恐怖的惩罚性的打击呢?采取这次罪恶行动的一切动机只有独裁者一个人清楚。但是,我根据文件和对保存在各档案馆中的当时的材料的分析,可以作出以下推测。

斯大林决不宽恕任何有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的人。沃兹涅先斯基也好,库兹涅佐夫也好,比起其他人来,口头上和书面上对他的颂扬都少,而他们的独立见解却比其他人多,这经常引起斯大林的警惕。有一段时间“领袖”犹豫不决,没有听信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诽谤。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对这两个列宁格勒人有很高的评价,考虑到专制统治者年事已高,这两个人有可能被看作第一把手潜在的继承人。这一点是斯大林身边的奸党决不容许的。他们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前夕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实际上没有发现“敌人”,而且可能是包庇了他们。贝利亚不止一次地捎带着抱怨说,沃兹涅先斯基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管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明显地削减这些部门的任务,而对贝利亚负责的林业部却增加任务。当时斯大林对这一切都不在意。但是,有一次沃兹涅先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使他有点感到不快,当时沃兹涅先斯基举出一系列颇有说服力的论据来反对再向集体农庄庄员征收新税;在中央委员会主管干部工作的库兹涅佐夫打算较严格地控制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他的这一意图也使斯大林不高兴。库兹涅佐夫还说过对“基洛夫案件”的侦查没有揭露出罪行的真正策划者。这些话斯大林也听说了。

“领袖”从来就坚持一点:即使是最有价值、最有用的人都要符合完全可靠和对他本人忠诚这一主要标准。对这两个固执的列宁格勒人,他

已不仅产生了怀疑,而且发现他们是潜在的对手。例如,斯大林记得,当他读沃兹涅先斯基的手稿,并且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时,他不能不对这位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分析给予应有的评价。

在沃兹涅先斯基领导下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局局长的谢明指出,沃兹涅先斯基具有非凡的毅力,并在制订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方面具有良好的素养。在实行极为严格的指令性经济的条件下,这位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试图尽可能更广泛地吸收劳动者参加安排计划,实施监督,确定每个企业的发展远景的过程。他从不休假,连节假日也不休息。他大概是我国高层领导中继布哈林之后的第二位大经济学家,看来也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位。

尽管在逮捕以前,斯大林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和另外几位列宁格勒人所写的报告,说明他们完全无辜,"领袖"却几乎没有犹豫过。的确,开头他想派沃兹涅先斯基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任院长,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让列宁格勒的"一班人"统统去喝"约瑟夫的苦酒"吧。1950年9月进行的审判是按他的指示进行的。被判处枪决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罗季昂诺夫。过了不久,其他的许多列宁格勒人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他们是:巴达耶夫、哈里东诺夫、库巴特金、列温、巴索夫、韦尔比茨基、索洛维约夫、布尔林、伊万诺夫、尼基京、加尔金、萨福诺夫、丘尔辛、邦达连科,总共将近200人[3]。

在利捷伊大街军官之家大厦举行的审判大会上,参加旁听的人没有听到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讲过表示忏悔的话。他们在死后,过了许多年,才有机会表明自己的心迹。旁听过审判的人知道,库兹涅佐夫在最后一次发言时说:"我过去是布尔什维克,今后也还是布尔什维克;无论给我什么判决,历史将宣布我们无罪……"

苏联最高法院在沃林主持下于1954年4月终止了"列宁格勒案件",从这个案件中抽出了1950年9月提出的指控。这个指控说:"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卡普斯京、拉祖京、罗季昂诺夫、图尔科、扎克尔热夫斯卡娅、米赫耶夫(在文件中没有名字和父名的缩写。——本书作者注)承认犯有以下罪行:1938年结成反苏集团后,在党内进行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使列宁格勒党组织脱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使之成为与党和党中央委员会作斗争的支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列宁格勒组织的党员中煽起对联共(布)中央采取的各项

措施的不满情绪，散布诽谤性的言论，暴露出叛卖性的意图……同时大肆挥霍国家资金。从案件的材料中可以看到，所有被告在预审时以及在庭审时都承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63]1954年1月29日当时仍然在押的图尔科谈了这些供词是怎样取得的：

> ……我没有犯过任何罪行，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自己有罪。我招供是因为每当我否认自己有罪时就遭到不断的毒打。侦查员普京策夫在审讯时开始经常打我。他朝着我的脑袋、脸上打，还用脚踢。有一次他把我打得耳朵流鲜血。侦查员经常在这样的毒打之后把我关进单人牢房，并且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认罪，就要整死我的妻子和孩子，判我在集中营服20年苦役……因此我才在侦查员提出的材料上签了字……[64]

这是根据独裁者的意志和想法奉为神圣的久经考验的老方法。在这一次斯大林的暴行发作时，有三位有亲属关系的布尔什维克一起牺牲了，这就是政治局委员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的兄弟，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和他们的姐妹，党务工作者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沃兹涅先斯卡娅。一大批优秀的爱国青年惨遭杀害。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案件”破绽百出。玛·阿·沃兹涅先斯卡娅的主要罪名是，她“在20年代赞同‘工人反对派’的观点”。顺便提一句，为她平反的理由也很可笑：“沃兹涅先斯卡娅赞同‘工人反对派’的观点一事查无实据……”[65]如果说查有实据呢？当时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这是斯大林式的审判。

所有的人都是在列宁格勒被枪杀的。谢明肯定说，根据某些材料来看，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在宣判后还在监牢里关了三个月（可能“领袖”犹豫了，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一起在国防委员会工作；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要数他的这位副手）。谢明告诉我：12月的一天，根据某个人的命令，穿得很单薄的沃兹涅先斯基被装在一辆货车内押往莫斯科。在路上他也许是冻死了，也许是被枪杀了……

列宁格勒的大镇压后，暴力的浪潮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还不断冲击着人们，使他们销声匿迹。遭到厄运的不单是了解被判决者的知情人，而且还有“机关”工作人员。斯大林有时由于他一个人才明白的原因确

实也曾表现过"宽大"。1949年10月克鲁格洛夫向斯大林报告说：

"施克托罗夫中将从1943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从1948年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任职。列宁格勒领导人被捕后施克托罗夫又调回列宁格勒。然而，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称，他没有把不可靠的人从该州的内务部各机关中清洗出去。施克托罗夫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怀有敌意的前列宁格勒州领导人手下工作的。"[60]他建议撤换施克托罗夫，调菲力波夫接替他的工作。

斯大林同意撤换，但又指示给施克托罗夫另行安排工作。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通常任何类似的建议报告带来的结果绝对是悲惨的。

"领袖"不容许他的祭坛是空着的。斯大林习惯使用暴力。被判刑的人毫无怨言，党和人民俯首帖耳，这一切都在鼓励他这样做。有一次他估计过：甚至在"清洗"最高潮时（30年代末）直接被清洗的也只占居民的3%至4%。这的确不值一提！而在清除了污泥浊水之后，群众变得既听话又听使唤！当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在"领袖"的声望越来越高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激烈爆发的新暴行。这种周期性发作的暴行是难以解释的。国家在很快地医治创伤。国内局势稳定。没有出现过任何反对派的活动。人民确实团结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政治领导的周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牢固的。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虽然斯大林的声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仍然要采取暴力手段。这种暴行的大发作时而席卷某一地区，时而波及某个社会集团或部门。斯大林凭借暴力维持最高权力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不使用暴力他就难以为继。这就是他特别重视国家安全机关和内务部机关的原因。

贝利亚、克鲁格洛夫、谢罗夫、阿巴库莫夫以及这些部门的其他"活动家"，经常向他报告劳改营管理总局的情况，劳改营是提供无偿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一次马林科夫去见斯大林，向他作例行报告，竟然使"领袖"采取了一次"人道主义的行动"。他把苏联内务部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多勃雷宁写的一份材料放在大元帅的面前。从这份材料中看出，在"领袖"70寿辰这一年一共有妇女503375人关押在劳改营和教养院中。

"应该研究一下关于释放那些身边有七岁以下孩子的妇女的问题……"。

斯大林把材料上的各个栏目仔细地看了很久,终于同意了马林科夫的建议,因为马林科夫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劳改营管理总局每年要花16600万卢布来供养孩子……这就是斯大林之所以采取"人道主义的行动"的原因,根据他的命令身边有七岁以下孩子的妇女从即日起按各自的居住地点参加强制性的劳动!但是,正如斯大林所命令的那样,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刑的妇女不在此列[67]。

有一次(这是1951年9月的事)正在苏联访问的英国妇女代表团(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向邀请她们的有关方面提出请求,希望准许她们参观妇女劳改营。主人们自然不知所措了。电话打到内务部有关的局。那里当然是作不了决定的。又请示上一级的负责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谢罗夫。谢罗夫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权决定。又请示部长克鲁格洛夫。还是同样的结果。又去找苏斯洛夫。连他也不能决定。他又找到了马林科夫。这位政治局委员在向斯大林请示后,才签字同意……当然,劳改营经过准备、清扫、整理,还对所有的人下了指示。70%的妇女(身体看上去差些的)被带到劳改营以外的地方去干活。英国客人遇到的完全是"有觉悟的公民",她们来这里是临时凑数的。代表团甚至在一本急急忙忙拿出来的"来宾留言"簿上题了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无拘无束地同我们接触。到处都干干净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宝贵的试验……"[68]

马林科夫有时也向"领袖"通报那些为了不引起斯大林不安而不让他知道的消息。但斯大林从来没有感到过不安。1949年9月,当"伟大的节日"快到来的时候,马林科夫在研究了一些日常事务后,又把一份文件摆在斯大林的面前。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8月12日在滨海边疆区米哈伊洛夫区孙中山国营农场的地里发现了该国营农场女工德米特里延科的三个被打死的孩子的尸体:米哈伊尔11岁,帕维尔9岁,叶列娜8岁。

行凶的是母亲Л·А·德米特里延科(生于1917年)。她供认,她杀死自己的孩子,是因为1946年她的丈夫Д·Д·德米特里延科

(1912年生)被判刑(按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法令)*后,特别是当她任教的学校把她解雇并又将她撵出住宅后,她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从4月起她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行政当局不给她任何物质上的帮助……

C·克鲁格洛夫[69]

读了这个报告,使人难受极了。痛苦到了极点,这不仅是德米特里延科一家的痛苦,而是我们祖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的痛苦。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对这个母亲由于极端失望而采取的丧失理智的行动作何反应,这很难说,因为在文件上没有批示。正常的人如果处在他们的地位是会不寒而栗的,但是他们对人们的疾苦却无动于衷。

在所有的国家机构中,惩罚机关实际上一贯不受监督。正是斯大林使这些机关摆脱了国家的监督,一个人单独领导这些机关。大概只有在战争时期他花在军队工作上的时间才比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上的时间多,在其余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是他主要的关心对象。尤其是,在30年代末,在战争刚一结束和直到他去世以前,斯大林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比对党的工作管得多。"给斯大林同志的来信"全宗特别证实了这一情况。大部分文件——报告、报道、电报、作战汇报、总结报告、有关特别会议召开的各次会议的情况、开办新劳改营、为这些机构培训干部等等的报告,都涉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的工作。大概贝利亚、克鲁格洛夫、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以及其他人每人每天都要签署几份送给斯大林的文件。所有的文件"领袖"都要看,但只是在一些文件

* 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2年8月7日的决定,凡在铁路和水路运输线上偷窃货物以及偷窃集体农庄的财产者,一律处以极刑——处以枪决或者"从轻"判处剥夺10年以上的自由。

上作批示:"同意"、"重新研究"、"报告执行情况"、"凡拖延不办者要严加惩处"、"不要用自由主义者",等等。在斯大林看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他的权力、权势和意志。他习惯于暴力行动,一有机会就要采取暴力行动,把暴力行动看成是个人专权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战后在他的倡议下"惩罚机关"才越来越得到加强,而为了使人民和"机关"始终处于"动员和警惕"状态,就必须经常展示出"敌人"、"恐怖主义分子"、"叛徒"还存在的证据。

为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他的个人专权而牺牲的人有多少呢?又有多少人由于暴君的意志和由于他所建立的镇压机器而无辜牺牲了呢?我想,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一个绝对准确的答案。苏联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进一步研究与30至40年代以及50年代初期的镇压有关的材料。这个委员会将能提供最完整的答案。斯大林专政的"秘密"变成了历史性的秘密。目前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各种评价,其中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被处死的苏联人的总数作出了各自的估计。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姑且这么说)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850万到900万农民被镇压。1937至1938年的镇压牵涉到450万至550万苏联公民。但是在这两次大"浪潮"之间的时期内,雅哥达和叶若夫主管的部门也没有闲着不干活;那时大约有100万公民被捕。在战后,特别是在40年代末,即使考虑到1947年已经废除死刑,劳改营的数量、流刑犯、被流放的人数仍明显地增加了,这就是第三次"浪潮"。被卷进去的有550万到650万人。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的确如此。但是在斯大林去世前,即使根据贝利亚提供的材料,各地劳改营关押的犯人中,有25%至30%"是因反革命活动"而被判刑的[70]。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我的估计可能过于谨慎,但这是根据我所看到的文件作出的。我完全承认,许多情况我没能了解到。

看来这是世界上任何时期的独裁者所干过的历史上最可怕最骇人听闻的暴行。斯大林始终坚持他自己当年曾说过的信条:"……对于敌人,哪怕他们曾经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要

把他们的整个家族,全家都消灭掉。对于所有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是的,是在思想上)图谋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的人,我们要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消灭掉。"这似乎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官说的话。而这些话却被当成一整套纲领,加以贯彻执行。席勒说得实在好:"罪恶的种子长出的是罪恶的苗!"

战后社会在社会政治方面不单是"处于停滞封闭状态",而且具有官僚主义和警察性质的某些新的黑暗的特征。斯大林能把不相容的东西结合起来,这就是一方面千方百计鼓励千百万苏联人表现出来的干劲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他们当时相信绕过前面的山口马上就会出现光辉灿烂的顶峰。另一方面,不断用单独的或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威胁人们。但是……人们相信斯大林。正因为这样,沃兹涅先斯基在被捕前夕还在赶写自己的新著《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几章。甚至在领导班子中文化素养最高的人之一的沃兹涅先斯基,也认为斯大林领导下的这个社会正在接近"光辉的未来"。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认为沃兹涅先斯基同时犯有四条罪状(58条第1款第1项、58条第7款、58条第10款第2部分、58条第11款),还认定他因"编写和出版政治上有害的著作"而负有罪责[②]。由于这位科学院院士受到"领袖"的怀疑,哪怕他写的是有关共产主义的著述,他的学术创作也是"危险"的。这就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出自己的解释的独裁者的逻辑。

权力,权势,残酷无情,相信真理的惟一体现者,这些因素逐渐变成前进的主要推动力,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理智、人性、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忠诚以及自由本身,都被置于一旁,那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的事。在任何一本哲学教科书、大部头专著里都找不出论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章节。一切都被暴力和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的恶劣影响所掩盖。别尔嘉耶夫是1922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被驱逐出境的一位有独到见解的俄国思想家,他痛心地看到,追求权力的思想是如何践踏其他一切价值观念的。早在1930年他就这样写道:"按照俄国人的心理类型,在俄国的共产主义中,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成分取得了胜利,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救世主成分取得了胜利,即作为人类的解放者和组织者,作为最高真理和最高正义的体现者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取得了胜利。然而这种救世主思想却是一种好斗的、进攻

性的和克敌制胜的思想，是正在上升的势力的思想。旧时代俄国的救世主意识中被动、消极、忍耐的成分在这里完全被排除了。救世主无产阶级全然不是受难者，不是牺牲品，而是取得了胜利的世界的组织者和权力的聚光器。”[72]

对这位俄国哲学家的这些结论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他看到了权力总是占据首要地位，看到了只是把希望寄托在权力上，斯大林及其志同道合者越来越指望权力发挥作用，这就准确地看出了他们所选定的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许，如果斯大林在这一时期不践踏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不使其成为追求权力的思想的牺牲品，那么这个方向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缺陷。“领袖”一贯忠于这一思想，但是这个思想有一个特点，即在社会的环境中它变成了时高时低、连续不断的暴力行动。每次高潮到来之前，年迈的“领袖”都要大发雷霆。

年迈的“领袖”

斯大林的70寿辰临近了。他知道，在政治局、在其他较低层的权力机关有多么忙碌。但是，这已经很少引起他的注意。他，看来对光荣已经腻味了，但对权力却没有腻味。他召见了马林科夫并且警告说：

“不许在那里又用什么勋章来使我感到幸福了！”

“但是，斯大林同志，这样的纪念日……人民不会谅解……”

“不要拿人民做托词……我不想争吵……不要一意孤行！您理解了我吗？”

“当然，斯大林同志，但是政治局的委员们认为……”

斯大林打断了马林科夫的话，暗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命令把准备好了在大剧院举行的他的庆祝会方案送来。而他谈起“勋章”并不是偶然的。

1945年6月胜利阅兵和为祝贺各方面军司令员举行招待会之后，一批元帅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建议，以祖国最高奖赏——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来表彰“领袖的特殊贡献”。同时请求者们查明，斯大林



1945 年 6 月，在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


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二级苏沃洛夫勋章

三级苏沃洛夫勋章

60寿辰时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而在战争的年代，他被奖给三枚勋章——一枚是第3号“胜利”勋章（第1号勋章和第2号勋章早先授予了朱可夫元帅和托尔布欣元帅），一枚是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是红旗勋章。而这一枚勋章奖给他，正如命令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在红军中任职多年”。

军事首长们同政治局委员们谈话以后，那些人就花了一昼夜半的时间和他们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问题，并且在6月26日一下子就发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两道命令：关于授予苏联元帅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和关于奖给他第二枚“胜利”勋章的命令。同一天，即1945年6月26日，通过了设立“苏联大元帅”称号的专门法令，而到了次日，即6月27日，这个称号就授予斯大林了。这大概是不听“领袖”话的惟一情况。早上斯大林习惯地在早餐前翻开了《真理报》，并且大发脾气。没有同他商量嘛！没有问过他嘛！他曾警告过马林科夫……奴才们也连连称是……到了克里姆林宫后，他马上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加里宁、日丹诺夫请来，对他们进行了申斥。所有人当中最害怕的是加里宁（因为这种一意孤行的事发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和马林科夫，他没有能够抑制住战友们效忠的感情。但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明白：愤怒是故意装出来的，是闹着玩儿的。

斯大林已经上升到了如此之高的荣誉顶点，以至于这些为一般凡人所设的奖赏已很少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奖赏对他来说，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奖赏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对他来说，奖赏却有“相反的”意义：

把他放进了许多受奖人的行列。归根到底,一个有如此权力的人可以给自己身上撒满奖章并……从而使自己完全失去荣誉称号!勃列日涅夫就不懂得这一点。不过,看来他似乎不懂得的不仅是这一点……

斯大林不能回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读过(好像是在《思想》杂志上),在拿破仑看来,可以授予一个人一个"扣子"(皇帝临终时这样轻蔑地谈到了勋章),而为此就要求他付出生命。难道这些在报刊上被称为他的"战友"的人们不懂得,他的伟大的度数已经不能用任何一些普通的勋章来衡量了!可能,他的亲信们也不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们知道另外的东西:"领袖"需要新的推动因素和理由来宣传他的谦虚、简朴、没有任何虚荣心。贝利亚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抓住了这一点。斯大林身旁的魔鬼在自己的文章《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鼓舞者和组织者》中写道:"我们领袖的天才是同他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特别的个人魅力、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决不宽容、富有同情心和慈父般关心人结合在一起的。他具有非常明确的思想,安详的伟大性格,对任何大吹大擂和华而不实的做法表示**蔑视和决不容忍**。"[⑬]大概,贝利亚比其他人更好地研究了自己的保护人的癖性和意图。他知道,斯大林把别人的谦虚仅仅理解为听话。

喜欢读论统帅的书的斯大林,可能会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人们建议他参加竞赛时说过的话来说:"我是会参加的,假如同我并排跑的是皇帝!"天真的"全苏联的班长",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勤勤恳恳地执行自己仪式上的角色,没有感觉到,那些其他人可以得到的奖赏,对他斯大林来说,已经不是奖赏了。"领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申斥:

"解脱出来吧,随你们的便,而勋章我不接受……听着,不接受!"

他久久没有接受。战友们曾两次三番试图说服他同意授予奖赏。他们还吸收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去劝说"领袖"。一切都白费。差不多过了五年,斯大林本人有一次在别墅吃晚饭时忽然谈起老早那次奖赏的事,而且在肖像画上,在照片上,"各族人民的领袖"老早就已经佩戴上两枚英雄勋章和两枚"胜利"勋章了。1950年4月28日"五一节"前夕,什维尔尼克终于向斯大林授予了1945年颁发的勋章加上因70寿辰颁发的列宁勋章。什维尔尼克和戈尔金1949年12月20日签署了

命令,命令说:"鉴于约·维·斯大林同志70岁生日并考虑到他在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事业中,在我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特殊贡献……特授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列宁勋章。"[74]从什维尔尼克手中接过一枚"金星"奖章和一下子三枚勋章,斯大林忧郁地指出:

"你们使老人满意了……这并不增加健康……"

在这些话的后面，出现了纪念寿辰前夕向他袭来的新的可怕事情。斯大林打算晚上到别墅去,最后给波斯克列贝舍夫作了某些吩咐,就离开了自己的桌子并想去穿上衣服,好像他突然"扭了一下",眼前直冒金星……斯大林立刻又苏醒过来。吓破了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肘: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去叫医生……您这会儿不能走……需要医生……"

"别忙……"

头晕很快就过去了。斯大林拖延了几分钟。喝了茶。后脑勺隐隐作痛。但是他不让叫医生。他已经不相信医生,宁可相信主宰卫生部第四总局的贝利亚……鬼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再说他也不愿意广为传播他有病。现在就到别墅去,喝一杯波斯克列贝舍夫老早就劝他喝的浓茶。过去总是见效……现在也会见效的。

政治局决定大规模地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任命什维尔尼克为庆祝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在他的桌子上就摆着一份由波诺马连科、阿巴库莫夫、帕尔费诺夫、葛罗米柯、格里戈良签署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庆祝生日的"费用"估计总数约650万卢布。什维尔尼克仔细研究之后,在下述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 批准接待前来参加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代表团和筹备赠给斯大林同志的礼品展览会的预算,支出总额为5623255卢布,按照附件……[75]

委员会由许多著名人物组成。我随便举出几个人的名字:亚历山德罗夫、巴基罗夫、布琼尼、瓦维洛夫、卡伦别尔津、库西宁、波斯克列贝舍夫、法捷耶夫、什基里亚托夫、肖斯塔科维奇,当然喽,还有政治局

的委员们。确定了谁在什么时候为"斯大林同志"接受礼品——什维尔尼克、李森科、安格林娜、波克雷什金以及其他人。在最高层次上批准了经过缜密研究构成的应邀者及夫人出席 "领袖"70寿辰隆重庆典的名单。

但是也准备了令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礼物。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打算设立"斯大林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法令草案已准备好了。

关于设立斯大林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

为了庆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70岁诞辰并鉴于他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和保证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性胜利的事业中给苏联人民作出的特殊功绩,设立斯大林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尼·什维尔尼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亚·戈尔金

1949年12月

这里还有颁发勋章的条例草案、对它的记述以及关于设立"庆祝约·维·斯大林70寿辰"纪念章的法令草案。内行的法令炮制者们计算出,一枚纪念章的价值将合7卢布64戈比,而100万枚纪念章将需用24吨铜和6吨镍。还拟就了关于设立"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法令[76]。

由艺术家莫斯卡列夫、库兹涅佐夫、杜巴索夫设计好的13种勋章图案送呈"领袖"审阅。有一个图案照搬了列宁勋章,只是用一个留有小胡子的人的侧身像代替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的侧面像。还有金旗形式的勋章;带肖像的旧式勋章;"领袖"的像用红旗簇拥的勋章;他的侧身像放在由麦穗构成的椭圆形中的勋章;在金底座上穿着元帅服的勋章……想像力并不丰富:金子、旗子、穿制服的人[77]。

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出现一枚大概对那个时期来说是最有威信的勋章。但是,在最后一刻,"领袖"执拗起来,虽然过去曾给予初步的同

意。审阅了模型和图案，读完了法令草案(而在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紧张地看着自己的保护人，也许在想他们当中谁是荣膺这枚勋章的第一人)，斯大林突然说道：

“我只批准关于设立国际奖金的法令。”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而这类勋章只有在死后才设立……”



194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庆贺斯大林70大寿

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表示不同意。但是，斯大林扬起了手，让周围的人们安静下来：

“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时候……”

我想，独裁者认为，越过了某种界限，可能会达到相反的效果。每走一步，每到任何一个地方，在国内只有他：照片登在杂志和报纸上，在每一页，几十次地提到他的姓名，又是塑像，又是浅浮雕，又是纪念像，给大街和联合企业、集体农庄和城市命名……在死后关于他将增加点什么呢？显然是勋章……

顺便说一下，在死后，在治丧委员会里谁也不记得斯大林的这个愿望了……

……在庆祝寿诞这一天，斯大林像平常一样于上午11时起床，他自我感觉正常。昨晚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一个意思不大的插曲。而今天，却是不轻松的一天。在庆祝会后，在政治局将要整整一个晚上听取没完没了的为了对他表示尊敬的歌功颂德和吹捧赞扬之词。大家都将作一番竞赛：谁将找到新的修饰词，谁将阐明“伟大领袖”的新的功绩。整个12月份，《真理报》发表的都是关于全国筹备庆祝寿诞的文章、汇报、采访。歌功颂德的浪潮与日俱增。斯大林来到克里姆林宫后，长时间地研究了报纸，详细地阅读了一大堆为了庆祝他的70寿辰而完成了任务的生产汇报。报告从所有的共和国、边疆区、州雪片般飞来。但是，大概也有不少从劳改营管理总局所属的无数组织送来的庆祝性的

报告。在那里，人们也完成、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欢欣鼓舞，等待着大赦。诚然，打报告的不是“囚犯”，而是代表自己的被监护人的内务部官员。

斯大林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翻着公文，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难道整个这种屈膝长跪的爱都是冲着他的吗？这是什么呢？对历史性场合的玩弄？幻想般的走运？或者的确他是一个最少有的天生奇才？斯大林撇开了这些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的想法，颇有点洋洋得意地心里暗自指出：主要之点在于他的精神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为坚强。谁也不能像他那样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走向目的……

他连连翻阅报纸的每一页，几乎完全都是对他的献词，他已经好多次碰到了同他的生日相重的非纪念性材料。在保加利亚，对“国事犯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提起诉讼；差不多同时在苏联，对犯有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罪的前日军军人集团提起诉讼。报刊只是对他的具有全世界影响的荣誉的反应：他知道，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而且不仅是在我国）过去和现在都举行了庆祝他的生日的大会。

差不多在庆祝大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大剧院就坐无虚席了。经过



莫斯科的少先队员们在斯大林 70 寿辰时向他献花



1949 年，毛泽东、斯大林、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自左至右)在斯大林 70 寿辰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坐

慎之又慎地挑选和“筛选”的人们挤满了披着节日盛装的大厅。开会前半小时，斯大林也进来了。在主席团的房间里，受到掌声欢迎的大元帅同陶里亚蒂、毛泽东、乌布利希、泽登巴尔、科普勒尼希、伊巴露丽、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西罗基、拉科西、约兹维亚克、金科奉、马尔捷尔、培西以及苏联同志们亲切打招呼。

当主席团走上舞台，大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在前一天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看了主席团客人排座次的方案，但是斯大林当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他不希望坐在中心。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全会和各种会议上，他常常坐在第2排，借机强调自己的“谦虚”。这会儿，这样做是不可能了，要知道他是过生日受祝贺的人呀！斯大林把自己的位置向主席的右边稍稍“移了移”，用铅笔指出，他的右边应该坐着毛泽东，而左边坐着赫鲁晓夫。

什维尔尼克简短的开幕词多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在他致开幕词之后，发言者一提到“领袖”的名字，表演就开始了。大厅里整个晚会都响彻着这样的声音：“天才”、“天才的思想家和领袖”、“天才的导师”、“天才的统帅”……只有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也许这里而有

隐密的含义？许多发言者在讲坛上一个接着一个。发言的有各加盟共和国、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使者，有青年、创作组织的代表。这是“各国人民热爱”的集中表现。快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主席团里许多人都累了。从很久以前那个日子拍下的照片和新闻影片镜头上可以看到，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由于无数次起立和鼓掌而明显地感到疲倦，他们在想自己的什么事情。可能，一个人在想沽名钓誉的计划，另一个人在想长期失宠贬黜，第三个人在想……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沉思的理由。斯大林已经很难集中精力倾听和深人领会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排山倒海式的歌功颂德之词了。“领袖”如果知道柏拉图的对话录，可能会认真想一想，他是否已经实现人类的永恒梦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消除了主要的破坏之源：贫富对抗[28]。

的确，在他的国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富人和穷人了。他不愿意在这些时刻甚至回答自己：有没有不幸者呢？有。成千上万。几十万。如果更确切些说——几百万。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伪警察、自私鬼、盗窃者、外币黑市投机商、普通小偷和强盗。但是，也许，有一半以上只是在凯旋统帅及其“机关”看来显得危险的人们。

在这次庆祝大会前几天，斯大林批准了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差不多每月举行的例行特别会议的结果的报告。报告附有与“祖国叛徒家庭成员案件”有关的100多人的记录。所有这些人都“判刑流放到苏联北部地区”。法律是严峻的，而法律是“依法”生效的。因此，谁说斯大林是无情的呢？为什么在西方直到现在还唱“臆造出来”的关于他残酷无情的托洛茨基老调呢？难道不是他刚刚在不久前赞同了克鲁格洛夫的呈文，其中写道：

> 在内务部的劳改营和教养院里，现在同被判刑的母亲一起关押着不到四岁的14170个孩子，以及7220个孕妇。这些孩子的数量比劳改营和教养院现有的“婴儿宝”的**限额**（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超过两倍以上。因此，我建议释放这些妇女，由她们在住地以劳改取代监狱监禁……[29]

斯大林听着没完没了的赞扬的言词，有时疲乏地往后仰靠在椅背

上：荣誉的负担使“领袖”感到劳累，但是他已经不能不要这种荣誉了。当大元帅受到诗的赞美的时候，他显然振奋起来。雅库布·科拉斯代表白俄罗斯发言，他读了自己的一首长诗，里面塞进了斯大林的整个生平，诗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

你是胜利的旗帜。你是自由的象征。
你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幸福。
我们的导师，愿你万寿无疆。
各族人民歌颂你，
我们伟大的父亲和领袖。

最妙的是，他没有屈服于诱惑而向马林科夫让步：马林科夫坚决支持一批作家们建议发表朱加施维里的早期诗作……“领袖”不应该受眼前引诱的支配。他从哪里能够知道，过了30年，一个也将成为总书记的人，没有写过任何一行“自己的”著作，居然会获得列宁文学奖金！

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的诗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诗人下面的话能够使斯大林感到特别高兴：

在最可宝贵的世界上，
让春天使您光荣的皓发
青春常驻，绿叶鲜花扶疏，
身体健康长寿！

我想，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在这些话里也表现出我们共同的迷恋、对偶像而不是对理想的信仰。大家都好像陷入了宗教性的神魂颠倒，齐声赞美“领袖”。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化身。人们信仰“领袖”，也就是信仰好像是他所体现的理想。这种吹捧的程度同贬低人民的程度正好相等。

“领袖”的很强的记忆力，把下面这些人说的话储存到了“计算机似的”网络里。毛泽东的话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里亚蒂的话是：“我们保证今后也忠于您的学说”；金科奉的话是：“伟大的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救星万岁”；马尔捷尔的话是：“您是天才的理论家

和伟大的革命家”；乌布利希的话是：“荣誉和光荣属于您，天才的舵手”；拉科西的话是：“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把斯大林同志称为‘生身的父亲’”……当契尔文科夫呈献一封由保加利亚500万（！）劳动者——几乎是全国所有识字的成年人签名的感谢信时，全场活跃了。

70岁的“领袖”第二天出席宴会前，还来得及在克里姆林宫里读了外国国务活动家发来的几十封电报。在一旁站着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注意地观察，“主人”的老年双手是怎样把这些电报一张接一张地丢在一边的。读完了，站起身来，而且已经走出办公室，忽然扭头把脸转向自己的助手：

“关于柑橘，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您写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料到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发窘，但很快作出回答。

“苏斯洛夫和马林科夫推荐的。他们在宣传部读到了；苏斯洛夫本人看了。”

斯大林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走到了出口处。出席长时间的宴会，又是讲话又是没完没了的干杯，也是需要力量的。而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提出的问题，是与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助手的长篇文章《敬爱的父亲和伟大的导师》有联系的。这篇文章有一段说道，斯大林不仅帮助米丘林派粉碎了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而且指出，应该怎样在实践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斯大林同志许多年来在黑海沿岸地区对柑桔作物进行了栽植和研究”，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学者革新家”。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着写道，还可以“举出斯大林同志在农业领域进行革新活动的另外一些例子。例如，在黑海沿岸地区种植桉树的事业中，在莫斯科近郊培植瓜类作物的事业中以及在推



旗帜中的斯大林

广多蘖小麦的栽种方面，斯大林同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斯大林深夜看过的礼品展览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也有以前即这次寿诞以前赠送给斯大林的陈列品。斯大林走过一厅又一厅，在各共和国、州、企业赠送的一片旗海旁边停留了下来。他站在一两面旗旁，举起了一幅：“高举列宁—斯大林的旗帜！它给我们带来胜利！”“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往下又在30面旗帜旁边停了下来，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赠送的。题词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山石岭自治市把礼物敬献给人类的救星斯大林大元帅”，“献给无产阶级的明灯斯大林大元帅”，“世界各国人民的救星斯大林万岁！”，“感谢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日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穆岭市俄罗斯居民”。还有荣膺苏沃洛夫红旗勋章的第26斯大林步兵师的旗帜……一片金光闪闪的红布海洋。



庆祝斯大林70寿辰宣传画

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油画、版画、水彩画。作者是：布罗德斯基、瓦西里耶夫、戈利亚霍夫斯基、杰尼、多尔戈鲁科夫、克鲁奇纳、巴夫洛夫、索柯洛夫、舍斯托帕洛夫以及其他著名的大师。还有托姆斯基、肯尼格、叶东诺夫的雕塑。用眼睛瞟过留着小胡子的人的无数面孔，斯大林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安置在一个非理性的、颠倒过来的世界里，面是把这种普遍受迷惑的状态理解为对他的天才的赞扬。

“领袖”以从容不迫的步子在无数的花瓶、纪念册、小匣子、小雕像旁边走过，又朝着陈列的大量武器——几十种赠送的手枪、步枪、冲锋枪走去……走过礼品展览会，就像走过队列一样，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就像世间的神所应该的那样，把自己老迈的身子送进高级轿车里，以

便又离开众人单独回到有雉堞的宫墙里面去……

整个12月份，报纸和杂志满版都是祝词、纪念文章，效忠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个贬低伟大的人民的过程。斯大林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是的，也许考茨基这位老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在对待斯大林个人方面是对的。早在1931年，专制的大厦刚刚安装就绪，他就不无讽刺地问道："斯大林为了走向波拿巴主义还要做些什么呢？你们以为，只有到斯大林加冕登极之时，事情才会达到自己的本质的地步吗？"[⑩]只要越来越全神贯注地观察一下过去的事情，你就会相信：为了实行全面的官僚制度，实在是需要哪怕是"第一执政"，如果没有皇帝的话。实行装门面的形式主义民主的官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君主专制型的政治人物是不能实现的。

人们因人民所做的一切而感谢斯大林，谈论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伟大幸福"，百般渲染他的一切美德和善行。甚至皇帝们也没有把自己的人民贬低到如此地步。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贬低行为，而且加以引发。年迈的"领袖"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化身，而是他的病影的化身了。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谈到70岁的独裁者，是因为在恺撒主义的这种最高峰即鼎盛时期，他的历史性的失败的特征已经昭然若揭了。

庆祝活动之后，斯大林开始"衰老"得更快了。他血压一直很高。但是，他不愿意看医生；干脆就是不信任医生。他过去还有点听从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劝告，采用他的处方，但是慢慢地贝利亚向斯大林暗示，"老头儿可疑"，并且企图让新的医生来治疗"领袖"的病。但是斯大林已不想要别的大夫了。当他获悉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他臭骂了一顿，但他没有进行干预。在除掉院士之后，斯大林终于戒了烟。在其他方面，他还是过着那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很晚起床，夜间工作。尽管血压过高，他继续按照西伯利亚的老习惯去浴池洗澡。吃午餐时，和往常一样，小量地喝点芳香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避开药物。按照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劝告，有时服用一些丸药，吃东西以前喝半杯凉开水，预先向里面滴几滴碘酒。斯大林害怕把自己、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他不托付给医生，就像不托付给任何人一样。

独裁者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

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走近了的老年,越来越经常地迫使他回首往事。在老年,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最美好的享受。老年的独裁者们也不例外。

在孔策沃,与一幢大房子并列又为他建了一幢稍小一点的。在一个房间里安装了一个壁炉。斯大林常常走出办公室,在壁炉旁坐上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观察童话里的城堡是怎样从烧得通红的木炭里出现和倒塌的。壁炉火苗的血红色的闪光是怎样反映在他的软靴皮筒上的。以前斯大林很少陷入无聊的思考。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向往过去,回首往事。近些日子,他吩咐洗印两张放大的他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的照片;一张装在小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另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那是不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呢?间接的还是直接的?现在知道了很多斯大林做过的事情,我几乎坚信,他并没有感到后悔。他只能再次度过那曾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寒冷的11月之夜。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从思想上却可以到永远过去了的时光里去游历。独裁者已经不能只是采取行动。回忆的时候也来到了。他一切都获得了,但是他感到,他越来越接近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境界。无论对谁都是如此。对领袖们来说也是一样。

也许,他在晚年懂得了,他战胜了所有的人,他仍然输了吗?也许,他的个人胜利的历史性的注定失败使他害怕了吗?也许,他亲自处死的数以千计的他的同志、朋友、战友们的亡魂拨动了深藏在他的灵魂里的良心之弦吗?在用因热气而流泪的双眼凝视着化为灰烬的木炭时,他看见了什么呢?在知道这个人写了、说了和做了些什么时,我不能相信他能够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大概只有时间的毫不留情使他受到压抑,因为时间对刽子手也好,对牺牲者也好,都是同样残酷无情的,不过也有区别,就是它对一些人永远投以蔑视,而对另一些受难者则特别予以永恒的哀悼。

他,作为一个人世间的神,环顾了一下"第七个创造日",能够说,一切都达到了:创立了强大的国家,使伟大的人民听话了,战胜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博得了千百万自己的同胞的由衷爱戴。但是,为什么苦恼忧愁并没有离开他呢?也许,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革命?或者他确信,

他的长期的流血的社会实验不能够最终用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对抗私人的投机活动？也可能，他看到了自己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不认为如此。这不像斯大林。他干脆就是怕死。因为一辈子都怕谋杀、搞阴谋、搞破坏活动。他怕在死后他的全部罪行会举世周知。他因苦心经营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而害怕。他不希望使这种产物成为别人的。因为在那里，对他来说将会没有位置了。正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在生命的最后年代，斯大林常常对自己的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崽一样完蛋！"在这里他没有错：他的世界、他的秩序、他的神像存在得并不久。

年迈的"领袖"害怕了。他晚年变得通红的脸（显然是由于高血压），尽管特别善于把必需的假面具绷到自己头上，也不能掩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包藏着恐惧的深深的疲惫。他的女儿在塑造父亲的心理肖像时写道，在走向自己的尽头时，他感觉到自己心灵空虚，"忘掉了一切人的眷恋，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变成了真正的迫害狂的恐惧心开始折磨着他——坚强的神经终于衰弱了。但是，迫害狂并不是病态的胡思乱想：他知道并且明白，人们都在恨他，而且知道为什么……"[⑩]。在不时发生的头晕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他对高加索人特别长寿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次。

以前他几乎从来不想自己的孩子们。实在是顾不上这些。他实质上也并不知道他们。当他听到大儿子的名字时，总是生气；这种心情随着雅可夫的死而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瓦西里他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远不是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但是他感觉到，他的意志薄弱的儿子的在职，只不过是由于门第和暂时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些上层靠山——"朋友"的缘故。他们为中将想出了一个职务——"莫斯科军区战斗部队空军司令员助手"，而后来就委派他执行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责。在1948年6月，布尔加宁就说服他——斯大林任命儿子为司令员。斯大林明白，把瓦西里"拉"上去，是为了使他满意，但是他只是挥手表示不耐烦地说："随你们的便！"假如斯大林有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可能会说：孩子们还没有锻炼出来。但是，斯大林从来就没有使自己受到内心的审判，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虽然他号召别人这样做："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

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发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2]

女儿，她已经完全不再听话了。在她离开了又一个丈夫以后，父亲就吩咐分给她一套房子，并且事实上已不再关心她了。她有时乘车到他的别墅去：听听他老年人的唠叨，要些钱花。完全靠国家保证生活的斯大林，从自己的代表薪俸中拿出一叠钞票塞给女儿。在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一次也没有花过一个卢布，没有进过一家商店。他不知道，人们靠微薄的工资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勉强度日的。对于他来说，钱老早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然而，为斯大林服务的为数众多的奴仆，都知道钱的意义。

有一回，已经是50年代初了，当时斯维特兰娜开始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斯大林想关心一下她在写什么样的学位论文。人们报告他说，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在苏联长篇小说中发扬俄国现实主义的进步传统》。斯大林哼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在注明日期是1954年（父亲已经去世以后）的申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的论文内容提要中，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为了揭示问题，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论点。具有那个时代精神的正统著作，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女儿世界观在未来的突然改变。不过，关于女儿，他比精神正常的父亲们了解的东西要少得多。

老年人都爱孙子。他们把没有耗尽的对子女的全部的爱都给予孙子们，给得是如此充满激情，就好像他们最宠爱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决于每一次的会见、谈话、活动。斯大林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看来，对权力的爱，在他那里不仅胜过了父亲和祖父的感情，而且胜过了对母亲的眷恋。斯·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的母亲没有过分地溺爱他，并且一直活到儿子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母亲对他说：

“真遗憾，你没有成为一个东正教神甫！”

很难不同意母亲说的。

到了晚年，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动怒和偏执。他周围的人们和女儿

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交谈者。我重说一遍，他老年时的智力已经完全不能表现普通人的感情。我再从他女儿的书《仅仅一年》中引用一段话。他的女儿正确地指出，他在把人们处死的时候，就马上不再与不幸的人来往了，好像把他们忘掉了。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⑥

是什么东西使他生气呢？最可能的是权力过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亲身体验过一切。在执行者们完全顺从的情况下，他也同时相信，甚至绝对权力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了使农民"幸福起来"，他赞同了多少决定和法令，可是他经常得到的报告却是，农业产量没有增长，畜产品产量下降，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日，由于削减宅旁园地而发牢骚。他是否明白，他的权力较之生活、经营管理、经济的客观规律来是无能为力的呢？很难说。这种无能为力只是使他生气。也许，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开始明白：历史不仅裁判失败者，但是有谁知道，历史也可以裁判胜利者呢？而也许，在最后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气所以没有离开过他，还因为他越来越相信创造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是徒劳的？要知道，他是想永远成为一个伟人的。他一生都发誓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心里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从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中"净化出来"。他们过于经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却是把决心创造革命奇迹、能够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这种精神灌输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去……

独裁者整个一生都认为，无数的牺牲，是为了忠于伟大的理想，为了决心最大限度使这种理想接近实现而必须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人、群众对于他来说成了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他已经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认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极端变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觉歪曲了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许的。卓越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早在世纪之初就很好地谈到过这种轻率的革命的俄国激进主义："它在自己的想象中作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

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我想，布尔加科夫非常正确地看出了革命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俄国激进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激进主义乃是为了伟大的思想而轻视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这种一执行就应受到谴责的极端主义的彻底贯彻者。布尔加科夫关于这一点写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预见性："我实现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摆脱通常道德的束缚，我允许自己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拥有对别人的生死权，如果这对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话。在每一个极端主义者身上都深藏着这样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拿破仑。”[69]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着的不是"小拿破仑"。这是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之一，对于这个专制君主来说，极端主义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尽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拥有的"对别人的生死权"并不能决定他心里想的许多事情。可怕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闯进他的心灵。他赶走这种预感，按照早已有之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处理数不清的日常事务。而这些日常事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国际事件上，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个人参加的印记。

冷风吹来

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综观斯大林在胜利后度过的将近八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这八年是极其不平常的。在国内，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人力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威力。

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当局独家垄断了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他们是不会放弃从这种局势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的。1946年2月，斯大林在竞选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是热爱和平的，但是西方



1946 年 2 月，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大会

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对大洋彼岸的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样子来改造世界"等等。

1946年3月6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大元帅。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专心阅读起来。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生人)在场。这位前首相的演说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同这位前首相会见过四次的斯大林，虽然从来就不相信丘吉尔，但是认为丘吉尔有一个智慧渊博的头脑，他这次演说的强硬态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尽管在开始演说时丘吉尔也给予了斯大林极好的评价，他说："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又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 的希望。丘吉尔向世界宣布：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这位前首相这里说的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战争一结束，斯大林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意识形态"幕也罢，这个幕是确确实实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民主制"的影响的。多年来，在苏联，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鸿沟，使得智慧日益贫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更加贫困了……

但是，丘吉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警告说："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地方……有一支共产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在活动……这个第五纵队对基督文明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显然，这位伟大的英国人在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他甚至患上了间谍恐怖症，迷上了"迫害异端"的运动。美国总统对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则到处鼓吹，要在世界范围内捍卫"那些作为英语世界的共同历史遗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伟大原则"。

斯大林放下了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3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临人间，但很快又遭到了严寒的强烈袭击。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然后，"领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里。平常政治局的委员们只是在斯大林离开以后，才一个个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来到以后，这两位国家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他们不知道，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给华盛顿拍去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美国代办对斯大林在2月发表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⑯]。而时刻处于斗争中的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这份公开的挑战书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它的实力也远远大于苏联。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50%，美国的装备增长了3倍，运输工具增长了6倍，农业生产增长了36%，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

问题了。

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变成了废墟。1946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几乎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都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但是,这种战火有点像泥炭沼泽地发生的大火,在浓烟滚滚的下面,隐藏在深处的大火正在等待着适宜的空气吹来,伺机喷出火舌,吞噬掉周围的一切。目前,在苏联的历史上,这还是一个很少得到阐明的题目。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经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些武装队伍在赶走德军以后继续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斯大林曾数次指示贝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灭"这伙匪徒"。但是,他还不知道,这种斗争在战后,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将延续几乎整整五年之久。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很快地就上报了这种斗争在3月份(也就是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月份)的结果。现摘引上报给斯大林的这份冗长文件中的几段话如下: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6年4月12日

1946年3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共歼灭了匪徒8360人(击毙、被俘、自首的),缴获了迫击炮8门、机关枪20挺、自动步枪712支、步枪2002支、手枪600支、手榴弹1766枚、印刷机4台、打字机33台……被俘的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区向导费多鲁克,无神论联盟分区顾问乔尔内伊、戈林,副区长瓦尔瓦里切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方交通长官克拉夫楚克等人。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红军的官兵有200多人牺牲。

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消灭匪徒145人,自首的有75人,逮捕的有1500人,缴获机关枪44挺、步枪289支、手枪122支、手榴弹182枚、复印机12台。约德普斯基、诺列依基斯等匪帮均被消灭。一个月内,共和国中有案可查的匪情122起。积极分子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红军的战士牺牲215人……[80]

随后报告中还报道了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斯大林在报告上签字后对贝利亚和克鲁格洛夫说,正规部队和歼击营的无效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钢铁工人正在生产钢铁的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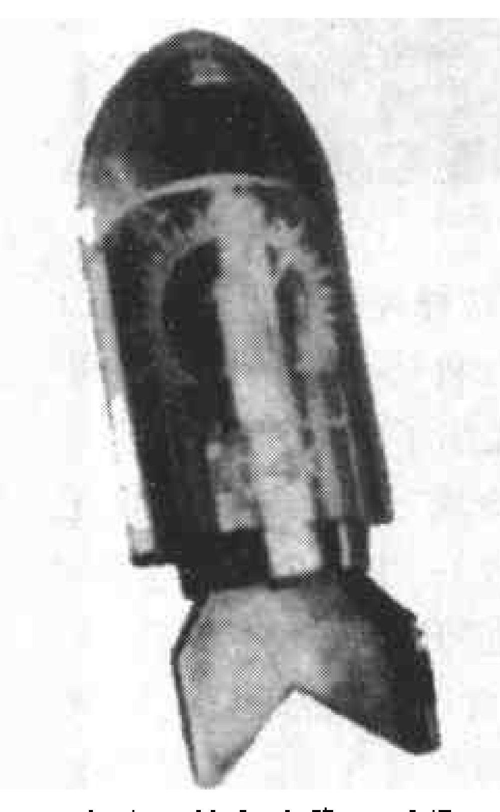
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这次西方的露骨挑衅。在联合国里，苏联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会内享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步。他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堡垒。斯大林认为，大肆宣扬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使得"马歇尔计划"也不可能接受了。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而且只有按照这一计划用对苏联经济实行实际监督的代价才能换取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会议（1947年6月27日至7月2日）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嘴说："我们不要这种经济援助。"看来，"领袖"真的猜中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因为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⑥]总之，持久的"冷战"开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识的法国政治学家马尔库在他的《冷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从1946年起，几乎10年来，"冷战"一直在不断地"升级，紧张空气使人窒息，它像惊涛骇浪一样，难以抑制，它服从于自己的内部逻辑，不承认健全的理性"[⑧]。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斯大林认为的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的逻辑。经过巨大的努力，到1952年，苏联的钢铁、煤炭、水泥的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石油、电力的生产也有了迅猛的增长。斯大林不停地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规律"。在重工业、科学方面的过分努力也为在核领域内猛冲狠打创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负责所有这些绝密工作，并要求他每天都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向他汇报。

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创建第一座铀反应堆。但后来工作被停止了。只是从1942年起，这项工作才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资金，加

速实现这一计划。在斯大林的全宗里还保存有许许多多关于紧张的"核竞赛"的报告文件。确切些说，这就是要赶超走在前面的对手。请看下面一份报告：

"受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的委托，1946年10月上旬，我们就地检查了库尔恰托夫和吉科因的专项工程建设情况……"[⑱]报告接着说道，采取了加快这一建设的措施，直接参预该项工程的员工要扩大到37000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克鲁格洛夫、别尔乌辛、库尔恰托夫**。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克鲁格洛夫和扎维尼亚金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报告说，为了加强原子衰变产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10年和10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专家C·A·沃兹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一罗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费施曼、吉里扬、波波夫、特卡乔夫、戈留诺夫、巴什洛夫等人[⑲]。



苏联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位

1946年12月，苏联学者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于1947年11月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1949年夏天，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1953年进行了热核装置试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献给了经济和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独裁者的威力现在只能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来维护。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国防工程的建设。许多部长执行政府任务常常是从"习惯的"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上书贝利亚：

拉·巴·贝利亚同志：

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1000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

M·赫鲁尼切夫

1946年7月23日[⑳]

还有更无耻的，请看：

拉·巴·贝利亚同志：

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5000人的劳改营，拨给30000米缝制帐篷用的帆布和50吨带刺的铁丝。

亚·扎杰米德科

1947年3月22日[92]

请想一想，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社会政治变成了多么无耻的东西，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劳动营里囚犯"的命运和生活只能同他们的人数、带刺的铁丝网和头顶上的帆布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简单明了、无耻到了顶点的请示报告，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滑向深渊的悲惨的深刻反映。我认为，后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殉难者的名单——无辜牺牲者的长串名单，而且还需要这样一些彻底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证明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顶峰。

经过了40多年，在这一文件公之于世以后，我有了一次与前燃料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扎杰米德科进行交谈的机会。我请他看看这份注明日期是1947年3月22日的文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部长都在这样一些文件上签名），问道：

"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份送给贝利亚的报告呢？"

"过去就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曾借助囚犯大军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今天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讲了一个在建设中实行强迫"工艺"的情节。

一天夜里两点钟，有人叫我和副部长一起到贝利亚那里去。贝利亚的那双眼睛从夹鼻镜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凶狠的目光，他低声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报告项目的验收工作？（有一个特殊车间在一家联合企业里建成了）"

"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工……"

"谁没有完工？"他没有等待回答，就对叫进来的一位助手说："把联合企业的经理找来。"

过了三四分钟，就听到电话线的极远的另一端传来了顿巴斯的声音。贝利亚根本不听讲话，就对着话筒说了起来：

"您好,我是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今早8点钟以前一定要完成安装任务。晚安。"

可以想象出,对那个经理和那个联合企业来说,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宁静的夜晚"啊!贝利亚转身又向助手命令道:

"把管理局局长找来。"

"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

"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8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

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

"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

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

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

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

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24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1943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1947年9月22至27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1.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2.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

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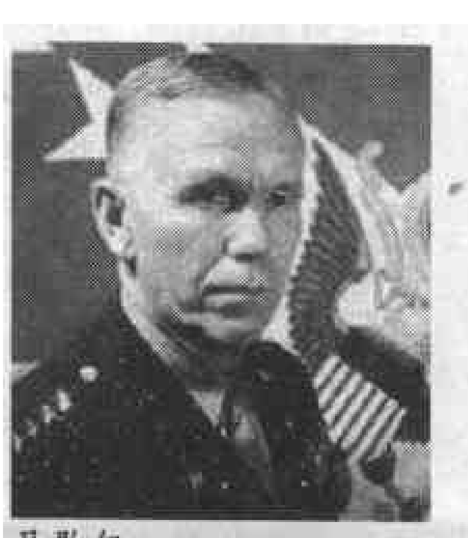
安·日丹诺夫[93]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作“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新组织会在1949年11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94]。但是，命运又作了一次戏弄：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了几年，就由于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掉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还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

马歇尔计划

《欧洲复兴计划》的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的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1947年6月5日，国务卿G.C.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故名。他呼吁欧洲国家采取主动，共同制订一项经济复兴计划，美国则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1947年7月–9月，英、法等16国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它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对西欧的联合和经济的恢复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缓和了美国国内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马歇尔



1945 年 4 月 11 日于莫斯科，铁托在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上签字

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终都坚持他的这些错误；在他生命垂危的几天里，仍然对社会民主党抱着极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态度，结果不仅不断地削弱了进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广泛开展的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召开的会议上，约定下一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会谈从未在那里举行。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1945年4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谈，决定把能够装备12个步兵师、2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⑥]。看来友好关系只能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结果就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独裁者认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间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发号施令一样。冲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耻的个人专权。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三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以下几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以下两位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内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了内部的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以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胆敢反对这位独裁者。对此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一股藏在内心深处的怒火极力要迸发出来。

当斯大林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来:

"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⑯]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5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25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

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人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1948年6月15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92]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



铁托（1892－1980）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

1892年5月7日出生于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入奥匈帝国军队，1841年担任民族解放游击队总司令，带领抵抗力量抗击德意侵略者。1945年3月在盟军配合下，率领人民军和游击队共80万人向侵略者发动反攻，5月中旬解放南斯拉夫。1974年被选为南斯拉夫终身总统。1980年5月4日病逝于卢布尔雅那城。

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⑱]。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1949年11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元帅会晤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1929—1933年、1937—1939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1955年5月底到6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

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槛上,而且这次是自己相互厮打。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能容忍又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

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不错，也有过这样的时机，地平线上闪现出一道狭窄的亮光，预示寒风可能会渐渐削弱。1949年2月1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尔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么，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

次日，斯大林复电说：

“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前往华盛顿，我早就有此愿望，我过去曾经在雅尔塔同罗斯福总统谈过，在波茨坦同杜鲁门总统谈过。遗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做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旅行，特别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⑩]斯大林建议会晤地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敖德萨、雅尔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他也清楚杜鲁门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会谈对他们毫无意义。总统认为，在美国有可能迫使苏联讲出他愿意听的话。但是，我想，杜鲁门会逐渐相信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是不愿被人操纵的。1949年6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鲁门夸起海口来》的社论，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个只能听到士兵皮靴的踏步声和武器丁当作响的寂静而又不安的世界里，突然之间意想不到地响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唤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微弱。1948年，来自两大“阵营”的和平主义者聚会在弗罗茨瓦夫，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动家们。这些比其他人觉醒早一些的人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最初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潮流”还表示怀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他懂得，拥有原子弹武器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怕攻击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这就需要利用世界舆论来反对那些想用核武器来解决当代基本矛盾的人。1950年，和平的保卫者们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征集签名的运动。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行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不到一年的工作之后，就宣布了全世界签名的有5亿多人，他们要求制止战争！斯大林、苏联官方的宣传机构都表示支持和平共处的思想。我有时觉得，斯德哥尔摩运动

是形成人类全球意识的发源地、开端，而人类全球意识的实质就是承认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现在我们离这一目的要比那时近了，但是迈出这第一步是多么重要啊！

1949年4月，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的"普来耶尔"大厅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两千多人，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盛会的进程，并把它看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同莫洛托夫亲自拟定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法捷耶夫、爱伦堡、华西列夫斯卡娅、考涅楚克、图尔森—扎杰、沃尔金、费多谢耶夫、科斯莫杰姆扬斯卡娅、马列谢耶夫。当《真理报》于4月1日报道了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大会发言结束时直接用俄文在讲台上唱起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中的咏叹调"从边疆到边疆……"的时候，斯大林不能不感到非常激动（如果他还能够激动的话），斯大林能够不感到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施加真正影响的纪元开始了吗？

世界和平大会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著名人士，科学家、作家、诗人、宗教人士等等，出面组织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有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爱伦堡，智利诗人聂鲁达，拉美作家阿拉贡等等，宗旨是团结热爱和平的人民，揭露好战分子的阴谋，阻止战争的再次爆发。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为大会特别素描了一只飞翔的和平鸽，献给大会，这只和平鸽成为了大会的会标。

在两个世界进行的这场搏斗中，当冷风冻结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理智以后，眼看着就可能把防止世界发生战争的屏障吹倒的时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

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社会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胜利结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于10月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并排刊登了毛泽东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幅稍小些的照片。社论中



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引用了中国革命领袖的如下一段话："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社论接着写道："斯大林同志早在1925年就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力量现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它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执政者，谁要是看不到和低估这一力量，他一定会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天才预言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中国事件的进程。当斯大林得知有一位新任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到北京之后就声称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他知道如果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占了上风，苏联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斯大林最初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甚至有一个时期认为，千百万饥饿的群众揭竿起义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当斯大林得知蒋介石和毛泽东于1945年10月在重庆就国内问题进行谈判之后，他才相信共产党人的立场是更为现实的和进步的[10]。

斯大林曾经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的全集里共发表了将近10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粗浅的。例如，他断言："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进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⑱]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也阐述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观点，但他总是以政治教导者自居。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这里和下面的着重标记都是本书作者加的）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学好军事……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等等[⑲]。也许，斯大林对共产党人能取得胜利所表现的特殊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军事战绩，而是因为1945年1月蒋介石在演说时表露了他要捍卫反民主的制度[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给予了中国革命不少的援助：转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和军事技术，还提供了其他的援助。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乘胜前进，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在美国进行敌视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倒向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后，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扩展开来。邀请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典礼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顶点。

斯大林抱着很大的不信任的心情等待着同中国人民的领袖会晤。虽然他过去讲过和写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其实他是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不了解中国人民民族心理上的许多特征的，他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同他会见过多次。他们的大部分谈话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图为毛泽东在斯大林70岁寿辰宴会上

来。因此,当时担任翻译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对弄清这些谈话的实质、内容和方针,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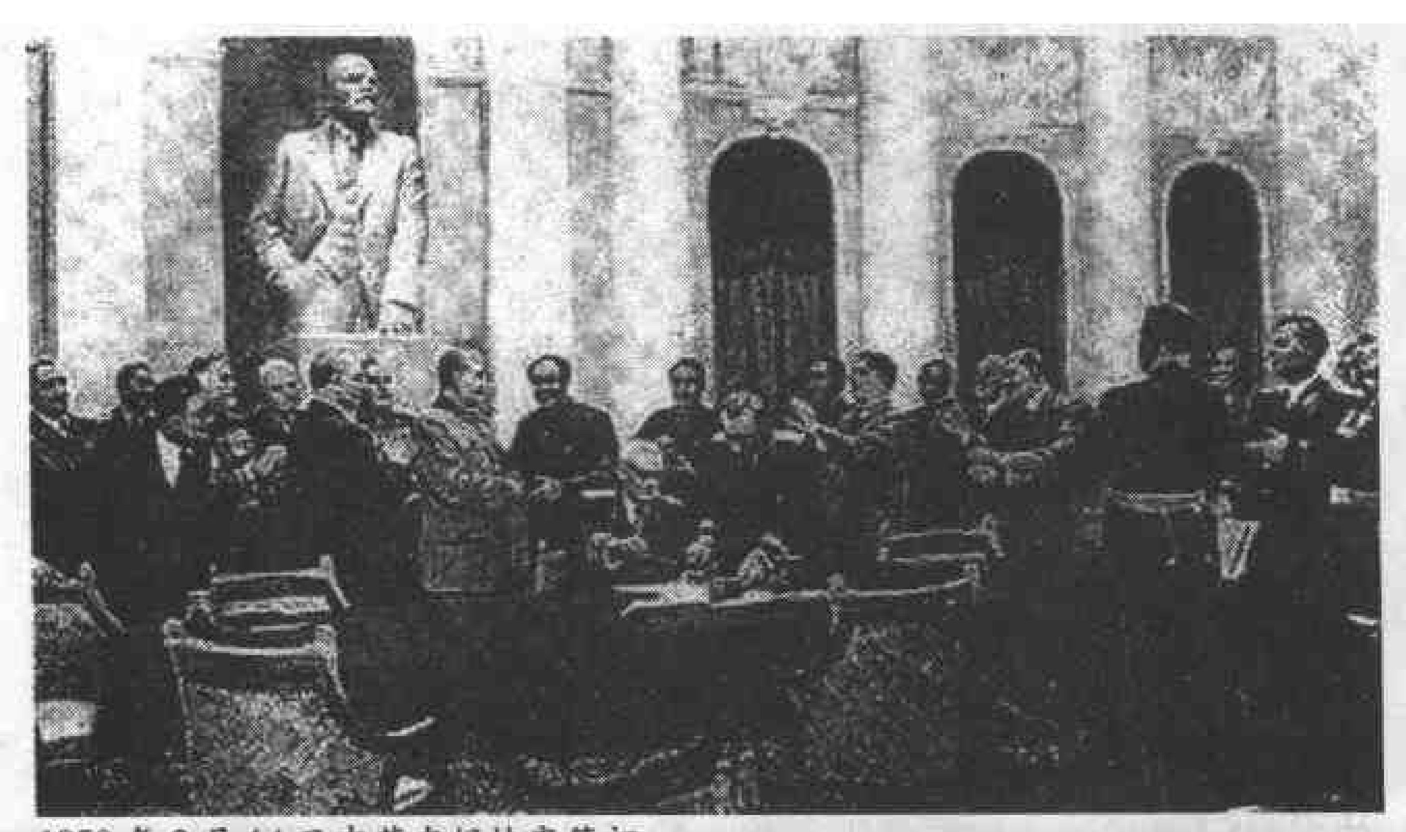
应当认为,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也都是不寻常的。毛泽东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国境,没有参加过共产国际的机关工作,就是同其他共产党的代表也接触很少。甚至可以说,这些曾经多次面对面坐在谈判桌旁的人,其思维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虽然他们不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但是他们就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来说,却是迥然不同的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二人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是很微弱的。毛泽东在必要时能够从《春秋》一书中引经据典,而知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现在却喜欢重复自己的东西。在某一点上,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

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而这位交谈者却突然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的迫切问题,诱导着这位苏联领袖,步人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去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他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⑩]。苏联领袖同意中国领袖的话,并同毛泽东齐声说,我们一起要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斯大林倾听着这些充满哲理、词藻华丽的中国民间传说。正像费德林回忆的那样,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忙。交谈的两个人悠闲自得地品尝着精美的佳肴,有时呷上几口干酒,不慌不忙地谈些有关国际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事务。在晚宴进行当中,也讨论了准备中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费德林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还讲

了一个同国民党人斗争的故事。有一队士兵被包围了，他们不投降，随着指挥员一起喊："不怕困难，经受考验，视死如归。"斯大林思考了好久，想弄明白"归"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个场合"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死的鄙视，是还原到自己最初的状态，也就是物质不灭吧。斯大林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交谈者，也是认真仔细的听者，他指出这位指挥官不仅具有无畏的精神，而且具有智慧[⑯]。

两个大国的两位领袖就是这样地交谈着。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斯大林慢慢地消除了成见；他是长期不相信毛泽东的。看来，当时有关毛泽东仇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干部、中国领袖对战争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处于危急局势时故意采取冷漠态度等等的报道，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随着中苏的不断接近、北京的反美立场和它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的加强，斯大林对待中国领袖的态度也在不断改变。我想，这位苏联领袖对毛泽东也一定留下了非常复杂的印象。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中国领导人从斯大林的具有无上权威、态度从容不迫和绝对自信中，一定会感到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和坚定的目的性。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友好条约，削弱了"冷战"之风的危险影响。可是就在友谊的纽带把两大民族联结起来的那一年，紧张局势又达到了顶点。我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协定签订

认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以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竭尽全力来捍卫50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种友好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揭露个人崇拜、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采取了特殊的、有时简直是否定的态度。两个巨人的握手言欢在历史上并未持续很久。上帝保佑,如今两国领袖又握手言欢了,但愿它永世长存。

蒙受冷风袭击的国家,不仅有西方国家,而且有东方国家。战后,美苏两国在朝鲜的部署,注定了半岛南北不同政体的建立。1948年5月10日,南朝鲜进行选举,成立了立法和执行机构,接着,于同年8月25日,北朝鲜也进行了选举。这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国家,把朝鲜民族人为地一分为二了。苏军撤出北朝鲜后,美军也撤出了南朝鲜。每一方都认为半岛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遗憾的是,除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件之外,苏联的、中国的和朝鲜的一些其他文件并未公之于众。但是十分清楚,冲突的发生是由于每一方都想在整个朝鲜的国土上保持住自己的统治。我从一系列间接的来源得知,斯大林对半岛局势不断加剧所持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从一开始,他就尽量避免苏联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的几次会谈中,他们讨论过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知道,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离开波茨坦协定已走得相当远了。要没有痛苦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对美国那种在朝鲜实行监护、"自由"选举的主张,他也是疑心重重的。要知道在驻有美国军队的南朝鲜,居住着更多得多的居民。1945年划定的38°线,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它只是美苏两国驻军的临时分界线。后来,当38°线成了国家的分界线时,就显示了它在地理上的不公正性,因为这条线严重地损害了北方人民的利益。

战争的摆锤激烈地摆动了好几次。分界线上高度紧张的局势在不断地升级。从1950年6月25日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就开始了军事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他们攻占了汉城,一直打到洛东江。看来胜利在望,这对美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他们刚刚失去了他们在中国的阵地,再也不能允许把他们从另一个国家赶出去了。9月,美国军队事先得到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苏联代表没有参加投票,也没有能够利用"否决"权),组织大批陆战队在仁川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鸭绿江

登陆，从釜山军事基地转入反攻。攻势非常凶猛，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并没有在38°线上止步，他们攻占了平壤，到10月底，就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现在形势已经反转过来了，当时看来，美国人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在许多地方美国军队还打到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方。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直接援助的建议的，尽管这会加强战争升级的危险。美国人打着联合国的蓝旗作掩护，而中国人则出动了"志愿军"。

应该说，朝鲜的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有将近30个师向前推进以后，形势又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不仅解放了38°线以北的领土，而且向南推进了100公里。到1951年盛夏之时，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美国的军事威信显著下降。斯大林感到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其危险的时刻到来了。美国人是不会忍受失败的，他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个最后的手段，大概这是在1945年以后出现的最明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坚决要求轰炸中国东北，杜鲁门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吹来的已经不是冷风，而是极地的风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不能让美国人打败。这就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这两年的谈判过程中，朝鲜半岛上的激烈战斗从

未停止过。美国空军握有制空权，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着陆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也明白双方除了走向妥协别无出路。在这里他也没有估计错误。但是，只是在他死后几个月，即1953年7月才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分析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层伪装)之后，我得出一个似乎与交战双方的具体民族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结论。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一次表明，在当前依然划分为集团的世界里，在东西两方的利益发生了危急冲突的情况下，出现逼和局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方出现第一次逼和形势就是在朝鲜，第二次则发生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但是，在第二次出现无路可走的局势下，理智很快地就表现出来了。至于斯大林是否来得及思考朝鲜的教训，是很难说的。而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大概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使用凝固汽油弹，威胁要进行原子弹轰炸，在远离国土数千公里之外驻军，长期不承认中国，在越南进行冒险，这些都表明，只用诉诸武力的办法已经过时了。苏联是在很晚的时候，即在阿富汗进行冒险之后，才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朝鲜战争以后，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并不是无限强大。在朝鲜冲突中，斯大林比较谨慎。他是在冲过南斯拉夫的“冷水浴”之后才恢复了他平时的谨慎态度。也许，他在同铁托交锋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教训，那时他头脑一热，就干出一大堆错误，对这些错误付出的代价不是今天也不那样容易确定吗？

个人崇拜，在“领袖”70寿辰时达到了顶点，它是由于1945年的伟大胜利，在个人荣誉和暴力颂扬的一片赞美声中以别出心裁的方法达到的。在把制度凝固起来的同时，在辽阔的祖国上空以及在国外，都刮起了阵阵的冷风。



第11章 恺撒主义的遗物

恺撒不该对祖国的不幸搞庆典……

——普卢塔克

（古希腊传记作家）

有一次，在翻阅有关1812年卫国战争的文件集时，我久久不能把目光从库图佐夫给妻子的一封信上移开。

> 1812年8月19日于格扎茨克港
>
> 谢天谢地，我很健康，我的朋友，并且满怀希望。士气非常高，优秀将领很多。说实在的，没有空，我的朋友。上帝保佑，祝福孩子们。
>
> 忠实的朋友 **米哈伊洛**
>
> **(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

既简洁又高雅，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力量和气度。只有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尚的信。斯大林从来没有这种高尚的道德。在他看来，人际关系只限于阶级斗争和政治。

在由许多卷构成的厚厚的《同斯大林同志的通信》档案中，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通信。人们只是向"领袖"报告。他作出反应。常常是口头的。有时只是把报告、通报转送给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赫鲁晓夫或其他什么人。在他的《通信》中，没有我们可以归于书信体的东西。他不善于给同志和请求人写那种简短的、直到今天还激动人心的书信。他的所有批示都是干巴巴的，千篇一律："同意"或"不同意"。保留下来的斯大林的书信只有几件，这些书信，除了给女儿的两件外，没有一点点人情味。每天送给他的大量文件，他匆匆翻阅一下，就转给执行者去解决具体问题，或者简单地向波斯克列贝舍夫表示一下他对报告的态度。在战后的各种批示中，连一点怀疑、思考和犹豫的影子也不见了。即使有过这种情况，他也只是口头上讲讲。这位"铁腕"人物想在历史上也保持原来的样子。

斯大林偶尔在他的"黑皮笔记本"里作一些难以捉摸的记号，他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代替《传略》写一部讲他自己的宏伟巨著的念头。下述

看革命，他是直接面对革命，他看见革命的巨大高潮，他也看见革命的


捷尔任斯基雕像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曾指示“清点”档案，他曾就党史问题和阐述“列宁的学生们的作用”问题当着日丹诺夫、布尔加宁、波斯克列贝舍夫的面断断续续公开讲过他的考虑，并且多次找亚历山德罗夫、米丁、波斯佩洛夫（他的正式传记的作者）谈过这些问题。现实常常使他回想起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经常想到上世纪末，想到革命后的斗争，想到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命运曾由他亲自主宰。他从前的战友的亲属，有时也使他想起过去。有时贝利亚对自己的工作作了例行报告之后，把一些作为“人民公敌”被枪毙或被送到暗无天日的劳改营的党的著名活动家的亲属名单，摆到他的桌子上，因为这些亲属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信。“领袖”默不作声，匆匆看一下名单，常常一句话不说就退给贝利亚。贝利亚心领神会地看一眼“领袖”，把文件收进公文夹就走了。“让他们受苦受难吧”——独裁者想道。他的党内同志的成千上万的妻子、儿女、侄辈、孙辈有可能回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他对这种前途很不高兴。这要给当局、给“机关”添多少新的麻烦呀！不，听其自然吧。

是的，他有时还是问到过一些人：

“她需要什么呢？也是请求释放吗？”他以责备的目光看一下贝利亚。贝利亚随手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封用打字机重打的信，写信人的名字引起了“领袖”的注意。

那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的孙女——住在莫斯科波塔波夫胡同的雅德维加·约瑟夫福娜的来信。写信人是为自己的母亲——雅德维加·亨利霍芙娜求情的，她曾被特别会议判刑并已在卡拉干达劳改营关押了好多年。女儿写道，“妈妈病得很重，她患有肺结核、坏血病和布鲁氏杆菌病。她的病情十分严重……”

斯大林立即想到久远的年代，那时他受列宁的委托同捷尔任斯基

一起去东方方面军，去维亚特卡，后来又去彼得格勒，组织对尤登尼奇的反击——噢，上帝啊，这都过去多久了！捷尔任斯基的音容早已从记忆中消失。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亲属，这样的儿女子孙？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雅德维加·亨利霍芙娜？不，让贝利亚去处理这些问题吧。

斯大林没有起码的人的同情心。然而最可怕的大概是："领袖"从来不会、甚至也不愿意替牺牲者、替命运由他的意志主宰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冷漠——最可怕的心灵疾病——在他身上已经永远"冻僵"了人的感情。独裁者看到下一个名单大吃一惊：那些早就不该留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怎么还有这么多活着的呢！

"这个女人也是为什么人说情的？" 斯大林用手指指拉狄克的名字，好像是自言自语，小声说道。

"不，这是他的女儿，是为自己求情的。"斯大林的宗教裁判官解释说。

"我，索菲娅·卡尔洛芙娜·拉狄克，1919年生，给您写这封信，请求您关心我的信……"斯大林回想起，大概没有人曾像拉狄克把他捧得那样高。他很会写文章。例如，对于他这位领袖，他曾讲过很好的话："在十月革命时期，人们不仅在革命司令部看到斯大林，而且常常看到他在战斗的最前线。当莫斯科要被饥饿的绞索勒死的时候，他去筹办粮食；当敌人的包围圈将在察里津收紧的时候，他在那里组织反击；当彼得格勒面临危险的时候，他在那里视察堡垒阵地。他不是通过报告看革命，他是直接面对革命，他看见革命的巨大高潮，他也看见革命的谷底。斯大林就是这样单枪匹马地最终发展成为革命的领袖。"[2]

当时斯大林听了这些话十分高兴。可是后来他把拉狄克同皮达可夫一起送上被告席，这首先是因为他怀疑拉狄克坚决同情托洛茨基。因为有人向他报告，说拉狄克曾给这位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卓越领袖"写过信。而且，托洛茨基也给他写过信[3]，尽管他曾竭力重新取得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他当时甚至把勃柳姆金给他捎来的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拆封就交给了雅哥达……但是要知道，这位流刑犯写信不是给别人，而是给拉狄克……不，他过去是托洛茨基分子，现在仍然是托洛茨基分子。是的，当领袖审批乌尔里希报来的判决方案时，他取消了枪决，改为把拉狄克送到劳改营。后来人们告诉他，拉狄克很快就在那里

死去了……既然如此,拉狄克的女儿还写些什么呢?

……我父亲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作为人民公敌于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10年监禁。过了半年,我和我母亲P·M·拉狄克根据特别会议决定被送到阿斯特拉罕城流放五年。在阿斯特拉罕,我母亲被逮捕,并被送到捷姆尼科夫劳改营关押八年,她死在那里……1941年11月,我被允许离开阿斯特拉罕,但注明"只有权住在哈萨克"。没有必要讲述我遭受的种种痛苦折磨。我的流放期于1942年6月期满……要知道,我也是人;即使我是人民公敌的女儿,难道这意味着我也是敌人吗?1936年我父亲被捕时,我17岁,从17岁起我就被打上了"敌人"的烙印。我是有文化的人,可是在切尔卡尔得不到适合我专业的工作。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身份证。切尔卡尔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伊万诺夫同志对我的询问没有给予任何答复。请您帮助我,让我为父亲赎罪[④]!

这就对了,斯大林想。没有白白流放、驱逐,她开始懂事了。本来就应该这样,所有这些"亲属"都应该关起来,直到他们懂得他们也是有罪时为止。然后就让他们去赎罪!但这是那个现在用两只小眼睛紧盯着斯大林的人的事……

这样的信常常使他想到过去。今天《真理报》上的文章《卓越的布尔什维主义文献》也是这样,这篇文章是为他在1937年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上的讲话又一个周年纪念日而写的。斯大林想,看来,写这篇文章的米哈伊洛夫讲得对:他当时"动员党和苏联人民完全消灭了外国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代理人。结果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国家……"但是,饱经沧桑的斯大林想看到的不是那些曾经共过事、后来又永远消失了的人们的幽灵,而是他所建树的功绩。

在他领导下过了不到30年就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尊重它。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在结果和过程之间常常出现不协调和矛盾。为什么不满的人这样多?为什么他不下命令,就任何一件大事也干不起来?为什么敌人、叛徒、卖国贼不是越来越少?就在这两天他还不得不批准内务部长的请求:"特别劳改营额定人数现在是18万人。内务部请求允许把特别劳改营的容量增加7万人,总

共达到25万人。"[5]要知道,应当关在那里的是没有解除武装的特殊敌人。怎么,敌人的人数在增加?贝利亚总是说,各部申请从特种定员中调拨劳动力的数量极大,尽管这种定员的人数增加了,但要满足这些请求是不可能的。有几百万人进过特别劳改营啊,可是嫌疑分子的人数怎么没有减少呢?西方有人说,他所建立的社会是"极权"社会。他们写道,他是社会生活和政治中一种新现象——斯大林主义的"创始人"。"领袖"最初没有特别重视这一点。大概他自己也认为,是该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时候了;不过一般来说这在现时没有任何用处。时间会到来的。而敌人……他们所以成为敌人,就是因为他们辱骂他一生中所创造的一切。托洛茨基、希法亭、罗森贝格、阿布拉莫维奇断言,斯大林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背叛"。而考茨基在去世前不久谈到,俄国"出现了更加有力的和残忍的主宰者,在无产阶级面前,在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产生了比在民主制根深蒂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障碍还要大的障碍"[6]。从这样一些人的口中能听到什么呢?他们连列宁都不饶恕。

我想,斯大林可能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他一生都崇拜斗争,而且仅仅崇拜斗争。他在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新"杜撰"中所听到的,只是这种永恒斗争的反响、他们的恐惧和仇恨。请看,《真理报》不久前就英国和美国百科全书的最新版本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蒙昧和反动的百科全书》,文中正确地写道,在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目中,"进行诽谤,胡说什么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关心人的幸福"[7]。他们还能写什么呢?这都是些下流文人,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写了些什么,"领袖"这样想。他不知道,在他被看作人间上帝的国家里,有朝一日人们也会提出问题:什么是斯大林主义?它的本质是什么?

历史的反常

坦率地说,当我开始为这本书搜集材料时,我曾以为,人民创造的一切是一回事,斯大林及其罪行是另一回事。这样一来,历史马上就变

得“更简单”、更明了、更容易理解了。但是，越是深入研究过去(分析大量档案材料，同过去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谈话，对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我就越加认定，一切要复杂得多。不仅谴责斯大林一个人，而且谴责他周围一班人和整个庞大的官僚主义阶层、或者如考茨基所说的“新阶级”，这很有诱惑力。这样做有许多正确成分，但也有许多不正确成分。我们有时忘记了，斯大林和与他有关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斯大林不是从另一个政党“投奔”布尔什维克党的，确实没有像现在有时人们所说的，搞什么政变。他建立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总是赌咒发誓，引经据典，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全党都跟着他随声附和。

列宁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他写道，马克思的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8]是的，正是暂时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某种原因而断定，这仅仅适用于剥削社会。斯大林借助于党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列宁的观点。当党内那些头脑清醒的人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官僚主义体系有一个特点：它形成得很快。而且它的生命力非常强。

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不幸，就是我们口头上赞扬辩证法，常常只是同辩证法“调情”，同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结论和公式绝对化。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奠基者本人就曾对此提出过警告。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过，“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真正的科学[9]。

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宁躲避临时政府的密探追捕时，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写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段话：“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10]为什么我要重复这些著名的真理呢？因为列宁去世后人们很快就背离了这些真理。马克思主义开始被有选择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这是最主要的)创造性地运用。

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不仅不能预先想到未来建筑物的小零

件,而且也不能预先想到它的大"部件"。然而,从一开始人们就盲目接受了从前的许多教条。20年代领袖们常说,"工人阶级不可能犯错误","党不可能犯错误"。可是犯了错误……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斯大林"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作出丝毫贡献。他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常常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公式,而不对这些公式作辩证的、创造性的理解。对这些公式的实质,对运用和实现这些公式的性质,曾经有极少数人产生过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斯大林抓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例如,1929年4月他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抨击布哈林时说道:

> 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下面是引用列宁的话)"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保存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11]

可见,从形式上看斯大林抓住了"字句"。人们支持他。他猛烈抨击那些敢于离开"字句"的人。但是,斯大林在"确立"社会主义的时候,首先把经典作家们的论断、辩论和设想变成教条,后来又把这种教条加以歪曲,使之适应于恺撒主义。因此,大概可以这样说:斯大林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靠它的被歪曲的公设和结论吸取养分。由此不应当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要对斯大林主义负责。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社会、自然界、思维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观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对于人们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负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菜谱,像烹调书中开列的那样。这不是政治行动计划。然而斯大林正是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在1933年1月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谈到"在和敌对阶级残余进行斗争方面"的结果时,就是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的:"有些同志把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论点了解为替懒惰和宽大辩护的论据,了解为替阶级斗争熄灭和削弱国家政权这一

反革命理论辩护的论据。不用说,这种人和我们党是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这是应该被驱逐出党的蜕化分子或两面派分子。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⑫]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武断性、机械论和简单化,是后来发生新的灾难的预兆。而斯大林把这些灾难冒充为胜利,用马克思主义旗帜加以神圣化。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奉为经典,然后得出我们今天坚决谴责的那种社会关系模式。不能不指出,早在斯大林以前很久某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就出现了把伟大思想家说过的许多话绝对化的倾向。斯大林只是继承并坚决发展了这种传统的人们中的一个。

我讲这些决不是为了给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行"辩护"。当然不是。但是近几年发表的大量论著常常把一切变态、一切错误和罪行只同一个人联系起来。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我们早就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可是斯大林死了,斯大林主义还活着。我认为,斯大林主义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阐述的思想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极端消极的一种),是有历史根源的。人们向往自由、幸福、平等、公正的宿愿,在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得非常有吸引力。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常常认为,试图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公设本身,就已经是异端邪说、离经叛道、修正主义。于是渐渐形成一种情况:任何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已经形成的东西的观点,都开始被认为是极端敌对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在某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政治学说的性质,这种政治学说与其说是力求使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不如说是力求使条件适应自己的结论。列宁活着的时候(他最后的著作特别说明了这一点),他竭力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行动面对现实,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对在一个农民大国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列宁周围的人虽然智力水平很高,但比起这位天才的智力终究差了一大截。因此,列宁去世后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经典和加以教条主义化的倾向大大加强了。由于我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一个比其他人更加严重地以机械论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斯大林主义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俄国革命者对激进主义的迷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思想而牺牲一切(历史、文化、传统、人的生命)被认

为是正当的。神化僵化的理想,最终变成了轻视具体时期的具体人的需要。俄国的激进主义披上了否定小市民“安乐”和资产阶级文化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外衣。正是斯大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了思想的胜利,什么都可以干!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说过,这是极端的反人道思想,是对人民的社会犯罪! 在这方面可以找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共同点。独裁者把本国的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联系起来。处境完全不同的托洛茨基对他的主要对手恨得要死,他宣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世界革命!反对斯大林!”[13]尽管两位“卓越领袖”之间存在表面的政治对立,他们的激进主义都是在俄国土地上从崇拜思想而不顾现实这种情况中产生的。这种激进主义否定历史均势,否定思想和生活的“平衡”。主要的是:“超过”、“推翻”、“摧毁”、“消灭”、“粉碎”、“揭露”、“谴责”……斯大林赖以生存的革命激进主义,从方法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在创造新的假文化。在这种假文化中被赋予重要意义的是他的思想。我认为,不指出这一点,对斯大林主义这一历史反常现象的分析是不完全的。

看来应当回忆一下十月革命前夕和稍后随着革命发展而发生的那场斗争的一个方面。我决不想为孟什维克辩解,虽然孟什维克自认为是工人政党,但他们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烙印。然而,不能不看到,他们曾相当顽强地反对那些从内部把马克思主义非人道化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激进的理论原则。孟什维主义归根结底在政治方面毫无结果,列宁出色地指明了这一点。但是,孟什维克对斯大林的批评却有助于了解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方面。

孟什维克流亡者的领袖们(马尔托夫、阿布拉莫维奇、唐恩、尼古拉耶夫斯基、多林、施瓦尔茨、尤戈夫),在很长时间里曾试图进行所谓两条战线的斗争:保卫俄国革命的理想,同时批评革命的蜕化变质。直到1965年,孟什维克都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通报》。领导机构(称为“国外代表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前者死于1947年,生前越来越倾向苏联;后者死于1963年,一直坚持顽固的反苏观点。列宁逝世后,迅速瓦解的孟什维克集团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斯大林的反民主方法”。流亡者中一些注定只能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生活的最有远见的人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离开了列宁。例如,孟什维克在

称赞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讲了一个有趣的思想:经济中的新路线也应当伴之以政治中的重大改革,这样波拿巴主义倾向在苏联就不能发展[14]。孟什维克认为,日益增长的恺撒主义倾向的根源在于"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党越来越变成一小撮人的工具。他们认为,个人作用的加强引起了蜕化变质的危险。阿布拉莫维奇认为,只有允许多元化的党才能保证民主的发展。不能不同意这些清醒的论断。

孟什维克怎样评价斯大林呢?他们认为,在苏联消极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有两种是很明显的:反革命和假革命。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认为,斯大林走了第二条道路,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拒绝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的传统。然而革命后孟什维主义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和思想力量。它的影响越来越小,直至全然消失。到后来,曾长期充当孟什维主义公认的领袖的唐恩同孟什维主义决裂,开始出版《新世界》杂志。他期望,苏联战胜法西斯后能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去。唐恩在去世前不久写的论述布尔什维主义起源的巨著中很有远见地指出,俄国的悲剧在于斯大林没有能够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标记"。但是,唐恩表示了乐观主义想法,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既不始于斯大林也不终于斯大林,他说:"社会主义应当有自由,而且一定会给人们带来自由[15]。这些在俄国革命史上落到不受重视地位上的人对列宁有过亲身了解,他们直接看到过俄国革命,看到过自己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看到过布尔什维克的兴衰,所以他们有时能够(诚然是作为旁观者)冷静地判断斯大林主义。在进行历史分析时,他们的一些思想和看法是值得认真注意的。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所有人数众多的"反对派"、"派别"、"倾向",尽管它们常常带有许多可疑的和错误的东西,然而终究是提出社会抉择的各种辩证形式中的一种。也许我的说法又会被有正统思想的人看作异端邪说,但是我认为,由于取消了革命的多元化,历史性的社会改革变得死气沉沉。例如,我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及其领袖马尔托夫、叶尔曼斯基、阿斯特罗夫等人并不是革命的敌人。1917年底形成为政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完全是这样。后来那些教条主义和恺撒主义的一元论者的根源之一不就是在这里吗?他们只承认一种意见、一个意志、一个惟一的真理。由于党的多数信守严格的正统路线,曾有多少关于民主、新经济政策、农民、贸易、国家建设和党的

建设的思想未能实现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统统被塞进固定模式的黑白视觉之中。要知道，当初似乎曾出现过革命的多元化的趋势。请看1917年12月9日人民委员会会议第23号记录中的一段话。

> 主持人：弗·伊里奇·列宁。出席的有：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叶利扎罗夫、格列博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明仁斯基、乌里茨基、斯大林、邦契-布鲁耶维奇、博哥列波夫。
>
> **听取**：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加入各部（记录中是这样写的，显然这里指的是各人民委员部。——本书作者注）问题。
>
> **决定**：建议社会革命党人在下列条件下加入政府：
>
> (1) 各人民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要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
>
> (2)任命施泰因贝格为司法人民委员。关于审判的法令不得废除；
>
> (3)任命特鲁托夫斯基为城市和地方自治人民委员。他在自己的活动中要执行中央和地方的全权原则；
>
> (4)阿尔加索夫同志和米哈伊洛夫（卡列林）同志作为不管部部长加入人民委员会。具体从事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工作……

还任命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柯列加耶夫、伊兹迈洛夫为人民委员。然后讨论其他问题。这时斯维尔德洛夫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当晚已经作为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条写了这样的话："公布如下事项：从12月9日夜里到次日，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就政府组成问题达成完全协议。七名社会革命党人加入政府……"[26]在记录上签名的是：**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尼·哥尔布诺夫**。当时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走革命道路的。改革的实践本身需要社会主义多元化，可是这种多元化刚刚产生，很快就被残酷无情地消灭了。

对于走这种强制性的单维发展道路，斯大林是合适的人选。我们知道，也曾有过其他的方案，但不曾有过能给其他方针提供现实可能性的真正斗争。例如，布哈林的不少思想是很受欢迎的，虽然他后来不

得不被迫放弃了其中许多想法。我这样说决不是断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是经过“程序设计”的。不,我再说一遍,不是这样。我只是想强调指出(我认为这很重要),斯大林主义是在把19世纪中叶就已经作出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结论加以教条化和绝对化的条件下,在没有其他革命选择的情况下产生的。消灭社会主义多元化,这是垄断社会真理和政治权力的开始。把同盟者或建设性的反对派变为敌人,渐渐导致用普遍的官僚主义代替革命的民主。对思想多元化毫不宽容,起初被看作革命的“美德”,可是到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建设新世界的创造性思考。

在党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这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危险。当它已经成为执政党时,把被奉为经典的原理具体化,就变成了灾难。斯大林在这个基础上走得更远:他歪曲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在许多方面已导致了社会的蜕化变质。由此可见,我再说一遍,斯大林主义是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它把强力和暴力奉为实现政治和社会目的的万能手段。斯大林主义是单维的世界视觉,它赞成利用任何激进手段来达到那些归根结底是变了形的既定目的。斯大林主义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在人民和官僚制度之间,在真正的文化和文化代用品之间,在社会主义理想和理想的实现之间,引起了深刻的矛盾。斯大林主义不仅表现了民权制度变形的过程,而且表明民权制度已经蜕化为恺撒主义的一个特殊变种,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反常现象。

大概可以说,每一次革命毫无例外都有发生热月政变的危险。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旧制度复辟,局部变形,逐步退化。斯大林主义是一种表现为民权制度蜕化变质、遭到歪曲和变为“统治人物”个人独裁的热月政变形式。

这种对理论和实践的歪曲,最充分地表现在异化上。我们从前认为,异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发生。我想,事情并非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构成异化特征的这样一些方面:丧失支配自己活动的权利;劳动产品同生产者相异化;同应有的生存条件相异化;相互异化,人失去自己的社会内容[⑦]。实际上,斯大林主义也意味着人同政权相异化,同参加国家、生产和其他社会过程的管理相异化。由此可见,斯大林主义首先是劳动者同支配自己的权力、同国家管

理相异化的独裁形式。如果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正像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说的那样，异化是自然现象，那么对进行革命以消灭许多异化形式的社会主义来说，这就是反常现象。



马克思于1844年在巴黎的住所。马克思于此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资本论》的先声，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当作是《资本论》的蓝图，或者甚至是拟好草图、已经勾勒出来的《资本论》……画家做了这种钢笔画的素描，以一种新生的动势画出来，而且正是这样倏忽出现，就比它们所包含的著作更雄伟。在这本手稿迷人之处，它们的逻辑不可抗拒之处，以及它们的辩证法令人信服之处，都有这种耀眼的重要东西……"

——路易·阿图塞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它的形成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列宁周围的人对他的遗嘱"置若罔闻"。大概当时斯大林第一次感觉到，权力的奥林匹斯山对他来说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现实。第二个阶段同1925—1929年时期有关：在革命震荡减弱之后西方资本主义趋于稳定，与此同时，官僚主义体制开始产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被排除。再一个阶段是集体化和在中央取消温和路线。在这个阶段，采用大规模暴力行为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对各种可能的发展道路选择取得最终胜利。到下一个阶段，在1934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穿着软皮靴来参加他本人作为惟一领袖的"加冕礼"了。再往后，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在自己的混凝土般的正统性方面"变得更硬"而已。只有战争才使他多少收敛了一些，因为不仅斯大林主义，而且斯大林本人都受到死亡的威胁。

斯大林主义不可能允许进行根本改革。因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思想本身都渐渐停止发展了。我再强调一遍，**斯大林主义是劳动者同他们依靠革命所取得的政权相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伴随着这种现象，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造成了种种严重后果。

要给斯大林主义下定义,大概可以指出它的一些本质特征。特征之一是无选择性。革命后丰富多彩的种种革命"处方"遭到无情的砍杀。在两种或几种方案之间进行选择,常常不是由生活本身决定,而是由内阁的战略家们决定。斯大林在这里是不可超越的专家。他永远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革命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选择方案的方法论秘诀很简单:凡是不符合斯大林的观点、方针和目的的,自然都被宣布为反列宁主义的、反革命的、怀有敌意的。这渐渐变成了国家的准则。斯大林决定问题,通常并不认真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思想或方案,除非是他自己提出的。他一旦选择了指令性管理模式,那就只能完善,决不能修改和代替。我想,我们今天赋予"多元化"这一概念的东西,简直会使他发疯,会被认为是对革命事业的真正背叛。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是客观规律性。连理论观点也被纳入这一公式。例如,当《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了斯卢茨基的文章《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时,斯大林突然爆出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13]。杂志编辑部本来只想研究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的相互关系史、各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相互关系史。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可是斯大林从这个事实中发现了"重新审查"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对一般机会主义的观点的企图。斯大林还是老做法,他在顺便给罗莎·卢森堡、沃洛谢维奇及其他几个人扣上几顶帽子后,便广泛地利用了这样一些"论据",如:"无稽之谈","卑鄙的市侩式的论调","贫乏","托洛茨基主义的走私犯"。即使一点点想看到局部的不同选择的尝试,也都立即遭到禁止。

当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时,他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观:不允许其他任何选择!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个人的选择都不允许!特别是个人的!他最终不仅消灭了托洛茨基,而且消灭了所有列宁周围的人。当战后贝利亚开始向斯大林窃窃私语,说领袖死后库兹涅佐夫想得到总书记职位、沃兹涅先斯基想得到部长会议主席职位时,反应非常明确。斯大林很聪明,他知道,除他之外的其他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种党的集体核心。斯大林通过政治阴谋诡计,通过削弱中央委员会的权利,把中央委员会变成了顺从的应声虫委员会,他越来越少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行动的是它的机关——党的官僚主义者的办事机

构。在独裁者活着的时候,除了斯大林的权力,其他任何一种选择都被排除了。

到最后,斯大林主义开始体现为否定一切不符合"领袖"本人概念的东西。造成我们今天严重形势的深刻根源之一,就在于思想、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的无选择性。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或社会的病态。它是全人类价值观念的对立物,是独裁主义的登峰造极。斯大林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一切可能的选择,并不是误入迷途。他这样做是自觉的。"领袖"懂得,其他可供选择的思想或观念会立刻提出把他排除的问题。

斯大林主义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世俗宗教……在这里,只可以、只需要信仰、赞同、解释斯大林提出的公设。为此还应当把党看作一个由一人主宰的教团。从30年代初开始,我未能发现对斯大林的教条公开表示不同意的任何痕迹。为了确立思想一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早在1927年就通过了法典,法典第一章叙述了臭名昭著的第58条及其18项"变体"[19]。国家应当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不会引起怀疑。但是,当不同思想实际上被看作"反苏宣传或鼓动"并受到最严厉惩罚的时候,那么,忠于(口头上或行动上)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概就成了适应环境和求生存的惟一方法,虽然这也常常无济于事,因为无法无天的利剑已经悬在人们的头上。人人都必须无保留地相信斯大林的理论、号召、结论、评价。由于对社会意识的控制,千百万人都相信"领袖"所说的一切,或者应当作出相信的样子。而他所说的常常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例如,1933年1月7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时,对于许多指标,他把愿望冒充现实。他讲到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时候,只字不提死了几百万人的大饥荒,他只把超额完成计划归结为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和5000个国营农场(在这方面的确是"超额完成"两倍!)。他断言,"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富农阶级虽然还没有彻底消灭,但是已被击溃……"[20]大家都相信,需要这样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真理!虽然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从此以后,斯大林主义只允许来自上面的革命,它把一切改革都看成是"最高政治领导"的成果。在真正的社会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仿


高举斯大林肖像的游行队伍

造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从此以后，积极性完全变成了有组织的：在共青团和工会的全苏代表大会上喊什么口号；提什么“倡议”，在哪里提；在竞选大会上由谁讲话和讲什么；游行队伍中应当有什么人的肖像和有多少肖像；一个区向“突击工程”派多少“志愿人员”，什么时候写报告和报告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在上面”决定的……人们渐渐习惯于让别人替他们考虑一切。他们只需要奉命“赞成”、“鼓掌”、“支持”。当然，许多事情的组织因素想必是永远需要的，但是这应当同公民的积极性、社会责任感、真正的主动精神、社会创造能力等密切结合起来。

报告的组织者开始认为，让囚犯向“领袖”报告自己的成就也是正常的。例如，1952年1月3日，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报告斯大林，“苏联内务部木材工业劳改营完成了政府在采伐、加工和向国民经济供应木材方面规定的任务”[20]。部长还把开采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情况报告“领袖”（同监狱企业“劳动者的报告”一起）。就连劳改营管理总局也定期向斯大林报告“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斯大林主义组织一切，规定一切，一切都来自上面。

也不能不指出，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现象有个人专政的不成文“法”。这些“法”外表上既简单又朴实，但是斯大林非常注意它们的执行情况。首先，党和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团体的任何一项原则性决定非经过他不能通过。举例来说，连向作家提出的“口号”也要请示“领袖”。1936年1月2日，谢尔巴科夫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

> 我兼任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已经15个月。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打扰您，请给以帮助和指示。现在科涅楚克、斯韦特洛夫、莱温、亚

诺夫斯基、列昂诺夫、阿夫杰延科都写了不错的新作品。"沉默的"老一辈大师法伊科、吉洪诺夫、巴别尔、奥列沙开始说话了。出现了新的名字:奥尔洛夫、克隆、特瓦尔多夫斯基。但是整个说来,文学界的落后状况并未解决。批评也无济于事。一位作家(维诺格拉多夫)受到粗暴的批评后说要自杀。而批评者叶尔米洛夫回答说:"让这样的人去服毒自杀吧,没有什么可惜的。"

这就是文学界的现状。现在文学界需要一个能把作家们动员起来的具体的战斗口号。斯大林同志,请帮助提出这个口号。

亚·谢尔巴科夫[22]

突出支撑专政的主要要素也是专政的一种不成文"法"。从斯大林的档案、文件和通信中可以看出,至少从30年代中叶起,他就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军队。对这些部门的重视大大超过对中央委员会工作的重视;在这些部门,渐渐由马林科夫掌管一切,当然是按照"领袖"的指示办事。在斯大林的个人档案和通信中,大部分文件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克鲁格洛夫、梅尔库洛夫、谢洛夫以及他所依靠、支持和鼓励的部门的其他领导人送给他的。在他的档案中保存着贝利亚送来的许多为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作人员申请军功勋章的报告。例如:

国防委员会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4年12月20日

在卫国战争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劳改营和劳动教养院中实行战时编制的警卫队,胜利完成了隔离和看守关押在人民委员部各劳改营、劳动教养院的犯人的任务。我请求授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管理总局警卫队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以苏联勋章和奖章……[23]

下面列出了几百名"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的名字,申请分别授予他们战斗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和二级勋章、红星勋章以及其他军功奖章。

斯大林对自己的内部支柱慷慨地授予高级军衔。贝利亚成了苏联元帅，被授予各种高级军衔的不止贝利亚一个人。1945年7月7日，斯大林支持贝利亚的报告，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一次就有七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些人是：阿巴库莫夫、克鲁格洛夫、谢洛夫、科布洛夫、切尔内绍夫、高戈里泽、帕甫洛夫[39]。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表现突出的作战将军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国防委员会主席如此“密集的”厚爱。

专政的另一个不成文“法”是在机关的高层人员中保持一种经常的紧张状态。他不定期地、然而相当经常地撤换中央或地方的这一或那一领导人，好在这样做的理由总是很充分的：未完成计划，没有及时揭露“在州内活动的一伙破坏分子”，姑息纵容“低级文化作品”，在书中、文章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等等。谁也不敢担保，最高统治者明天或晚些时候不会把自己从人民委员、州委第一书记、元帅、某部门领导人的高位上赶下来。因此许多人忘我地工作，处于经常的紧张状态，不断地望着上面，对下属则毫不宽容。

斯大林认为，权力永远应当不仅引起人们的尊敬，而且引起人们的恐惧。作为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他在自己的战友中间也实行一种



散会后，走出会场的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

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例如,他们未经批准没有权利在他们中间某人的办公室、寓所、别墅聚在一起(两人,三人,更不用说几个人)。这被认为是可疑的,是不允许的。只有贝利亚例外,他同马林科夫很亲近,常常同他坐一部汽车出入别墅。只有在斯大林本人那里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自然要得到他的邀请)。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领袖”不喜欢长时间单独一人工作。他常常召来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并且他们常常在他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谈话(经常是独白)的题目总是由“主人”自己定。情况似乎是这样:他一边思考,一边喃喃自语,并不太想听到什么人的建议和反对意见,也许莫洛托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例外,但是他绝对需要的是阿谀奉承的支持,一致同意,赞成,对“斯大林同志”的想法表示钦佩。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机关工作环境”,是心理上的兴奋剂,他已经习惯于把这作为决策的某种例行方式或仪式。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领导和管理形式,首先依靠的是受“领袖”委托由各种不同的个人和组织准备的大量报告和材料。但是,准备这种材料最多的自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例如,战后不久斯大林对科学院发生了兴趣。贝利亚报告说,科学院院长常常生病,他的研究工作效率不高,还需要了解其他院士的情况。斯大林要求提供简要说明学者们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很快摆到了他的桌子上。有趣的是,准备这个材料的不是科学院主席团或者党委,而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局……我摘引几段对院士的评语,这里故意删去了一些人的名字。

院士Б.——黑色冶金学方面的大专家。由于妻子太吝啬,很少与同事们交往;

院士谢·伊·瓦维洛夫——物理学家。年富力强。其兄尼·伊·瓦维洛夫——遗传学家,1940年由于在农业中进行破坏活动被捕,判刑15年,死于萨拉托夫监狱;

院士B.——仅仅在数学家中有威信。单身,酗酒;

院士维·彼·沃尔金——副院长。有20多人(斯捷茨基等)指控沃尔金是托洛茨基分子。至今没有受过奖赏,不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院士H.——可燃矿物研究所所长;有情报说,领导研究所不力,常生病;

院士Э.——据人民公敌供词是反苏组织的参加者。在探矿领域进行过破坏活动。很注意个人享受;

院士特·杰·李森科——非党群众,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农业科学院院长,两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对下面的话不能不表示同意。——本书作者注)李森科院士没有威信,其中也包括科马罗夫院长。人人都认为,尼·伊·瓦维洛夫是由于他面被捕的……[25]

名单很长。斯大林就是根据贝利亚主管部门提供的这种材料决定重大问题的。类似的"文件"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起决定性作用。可以看出,斯大林所喜欢的部门的权力大到何种程度;他们甚至对院士们的专业知识作出评价。

周围的人好像连在思想上都不怀疑"领袖"的任何决定的正确性。对独裁者的著作和结论进行"科学"评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要肯定:斯大林是天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历史规律的表现。有人断言,斯大林受到时代本身的"召唤",他,而且只有他代表劳动者和整个社会进步的愿望。莫洛托夫就这一点直截了当地写道:"如果说列宁去世后苏联人民胜利地解决了自己内部和外部的战略和策略任务,并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如此强大同时又如此合乎全世界劳动者心意的国家,那么这里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首先属于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

在斯大林主义这个被歪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主题:历史自动地为社会主义工作,社会主义的一切措施从来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是预先注定的。斯大林十分注意否定: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剥削,消灭阶级和一切政党(布尔什维克党除外),否定任何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除外),同时也否定列宁的所有战友和自己潜在的对手。是的,不否定生活中过时的东西将一事无成。但是,是否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呢?实现工业化,更不用说实现集体化、消灭阶级、普及文化,是否就可以说"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呢?

斯大林在无限丰富的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只承认黑白两色，他的这种二元思维从视野中抹掉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人。斯大林主义把人看作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关于苏联人"生活变得更美好，生活变得更愉快"这种重复来重复去的空话，掩盖不住我们回顾过去所看到的那种状况：个性受到压制，集体主义被绝对化而损害了个人的和谐发展，强迫培养"新人"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

我们决不怀疑苏联人民空前的献身精神，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对于在理论上代表新世界的价值观念的忠诚。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说：在历史过程中，斯大林把人民看作他的思想、意志和指示施加影响的客体。斯大林主义把人民群众贬低为实现"领袖"意图的一部庞大的机器。对这个极为复杂的活机体的各个部分施行无耻的、残酷的肉刑，把千百万优秀的人民代表处死或送到无数的斯大林劳改营中长期隔离起来，被认为是正常的。臭名远扬的劳改营管理总局变成了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可怕的象征。斯大林从来没有问一问人民：他们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或那种"历史性的"决策。"代表"人民向他报告的是他最信任的人：贝利亚豢养的坏人们。捷尔任斯基去世后过了10年，他的宠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它被置于国家和党之上。而这意味着政权的变质。一切都被纳入斯大林观点的轨道，按照他的观点，执行国家主要职能（除了其他职能）的是"为逮捕和惩罚外国谍报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些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

我认为，斯大林主义把政治对经济、国家对社会占首要地位弄到了荒谬程度。我们称之为命令式官僚主义体制的深刻根源就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比其他人更早地领会了这一点），谁站在上面，谁就成为社会的主宰者。是主宰者，而不是同志。发展经济不按照经济的内在规律行事，而按照政治指示去做。这样的体制十分需要在社会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有一个庞大而强有力的官僚主义阶层。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绝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们可以随意作决定，根本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物质的可能性、这种或那种技术和经济方案的适时性。只要回想一下斯大林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大陆到萨哈林岛的海底隧道、北乌拉尔到叶塞尼河的干线的建筑情况就够了。这些

工程没有经过应有的经济论证就不声不响地开工了，到后来都下了马。被弄到荒谬程度的政治绝对主义，使得对任何政治决策（包括经济、技术、科学、农业等领域的决策）的哪怕是装潢门面的批评都成为不可能。政治变成了神秘的、万能的怪物，谁对它的正确性哪怕是间接表示某种怀疑，谁就有被它吃掉的危险。斯大林主义是政治对经济、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文化的绝对专政。斯大林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党专政，然后又演变为一个人专政。在“统治人物”专政下，国家和社会的一切设施仅仅起一种由他支配的机关的作用。

讲到这里，我要立即回答一些批评者，他们认为，这些议论说明我不懂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我当然不反对政治，我反对的是把政治绝对化。政治将永远起重大作用，因为只有利用政治才能调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民权制度。但是，只有把非暂时性的民主价值观念作为政治的基础，政治的真正作用才能表现出来。这种民主价值观念不仅能够和谐地调整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同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密切配合。

斯大林主义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病态。它不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但是，许多事情不仅仅是由于党本身、党的领导人的主观性错误和理论水平不高发生的，而且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关于这些情况我在前面也已经说过。斯大林主义没有导致社会完全变质，未能最终使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完全变形。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但是没有泯灭。这种信念中有许多东西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人们相信，艰难、镇压、困苦——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到达乐土而付出的历史费用。从托洛茨基开始，就从上面起劲地向人民灌输这种思想。斯大林拿这种圣洁的信念进行罪恶的投机；他多年以来有意识地利用这种信念来确立自己的独裁地位。斯大林主义最大的罪行之一，就是斯大林竟敢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的化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达到了目的。人民忍受得住，是因为他们有信念。斯大林主义给社会包上了一层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铠甲，要挣脱出来必须经过长期而困难的痛苦过程。斯大林主义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特别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损失。勃列日涅夫主义和现今生活中其他许多严重弊端，在斯大林主义中有着久远的根源。治好斯大林主义留下的创伤是一个长期

而痛苦的过程。


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大林主义最庸俗、最常见的表现是斯大林现象，是一个人的政治专横。它，斯大林现象，首先表现为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论。意识的二重化，即人们说的是一回事，而看到的和做的是另一回事，是斯大林现象的最流行的形式。早在1956年就写了《斯大林时代》一书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指出，这种二元论早在斯大林青云直上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斯特朗写道："斯大林宪法甚至在起草的时候就遭到了破坏……苏联宪法是被它的作者斯大林破坏的。"[26]斯大林大谈人们的权利，可是他自己又践踏人们的权利。斯大林是无耻的实用主义者。斯大林1933年2月19日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激昂慷慨地说要"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开的处方很简单（它后来也曾被多年使用）："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那么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27]可是他怎样对待那些真正善于"为自己劳动"、忘我劳动的人呢？所有这些人，不加任何区别，不允许加人合作社，在经济上不准"参与"农村的新过程，统统注定要遭到"消灭"。一个月以前，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讲话时是这样描绘形势的："富农被击溃了，可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共产党员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自己跑进坟墓去，那么富农是不会很快就被彻底消灭的……"[28]

无耻的实用主义：消灭"生活富裕的人"和号召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这就是作为世界观特征的二元论。斯大林常常说的是一回事（供"大范围使用"），而做的是另一回事。他喜欢讲"文明的和愉快的"生活，可是却对整个整个社会阶层采用野蛮的恐怖手段。斯大林现象逐

渐在单一思维、不动脑筋、墨守成规、无主动性、疑虑和偏执中巩固下来。最可悲的是，许多这样的现象不单单是斯大林的主要权力工具——机关的装饰和外部表现，而且成为许多人的气质和处世态度的一部分，这些现象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

斯大林主义对列宁去世后历史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问题作了故意歪曲的回答。斯大林主义的建立在暴力、命令、单一思维、历史的无选择性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阻碍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和到来。斯大林主义最大的恶疾就在于不是把人本身放在社会目的的中心，而是把国家作为吹捧一个人的机器放在社会目的的中心。列宁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在斯大林的"改革"中被取消了。没有个性的机关占据了人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早就有人察觉到这一点。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站到反苏主义立场的维克托·谢尔施在《一场革命的命运。1917—1936年的苏联》一书中写道：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人在其中毫无意义"的国家[29]。今天我们看到，从前被我们看作异端邪说的类似论点是接近于真理的。鲍里斯·苏瓦林在《斯大林》一书中指出："列宁去世后只过了五年，由于党、国家和一切机关迅速官僚主义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概念按其实质来说已经失去了许多东西。"[30]这些人了解斯大林主义的内情。由于不愿接受斯大林主义，他们采取了与社会主义截然相反的立场。但是，他们分析斯大林主义现象的个别论断不是没有远见的。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认为崇拜国家暴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黑格尔早已指出："命运比惩罚有更大的作用范围……"[31]不过斯大林并没有战胜黑格尔……"领袖"从来也不会想到，他的产儿——斯大林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教条主义的木乃伊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先是教会小学、后来是教会中学的很有天分的学生，他理解教条式的神学的公设比别人快。与我们形成的概念相反，神学同任何一门知识一样，带来了不少有益的信息：历史的、社会

的、道德的。朱加施维里在神学中感兴趣的是知识"匣子"本身,知识的系统化,甚至某种程度的和谐。他好像对许多教义的内容并不太相信;他常常觉得这些教义很幼稚,不过其中又有某种东西为走向世俗生活搭起了桥。这"某种东西"就是知识和信仰的相互联系。

在这位年轻的教会学生当时读过的克利门特·亚历山德里斯基、吉里尔·耶路撒冷斯基、格里戈里(尼斯的)和其他神学家的著作中,他最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思想:没有无知识的信仰,也没有无信仰的知识。信仰和知识相互联系的公式在他的意识中通常是这样出现的:信仰先于知识;知识跟随着信仰。仿佛记得神学老师提示过:"任何一个人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教条主义者,因为在他确信自己的努力落空之前,他一直相信存在真理的可能性。要知道,真理就在于信仰。"——老师是这样概括的。

未来的"领袖"由于某种原因比其他人更喜欢霍米亚科夫的《神学文集》和基辅神学院院长西尔维斯特的《正教教义神学初探与对教义的历史说明》。这两本书断言,圣经中包含着教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应当相信的真理。

这一切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条"已经不知不觉地溶化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就是在革命前也未必能够讲清楚上帝意识、所罗门的寓言故事、约翰的启示录或者犹大的使徒行传。这一切都被时间无情地带走了,甚至有时不能相信,他曾经有过可能当神父。然而某种捉摸不定的东西留在了意识中。斯大林始终相信,存在着某种具有不容争辩的真理意义的学说。我们大概也相信这一点,甚至确信不移。但是斯大林自从变成了后来他变成的那种人以后,喜欢把这些真理绝对化,特别是当真理属于他的时候。我很怀疑,他相信他肯定的一切。但是其他人相信。今天我们对这种情况了解得很清楚。

前面我已经讲过斯大林思维的教条主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作为斯大林主义基础之一和作为它的最重要属性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渐渐把社会学、后来又把社会带进了理论和精神的死胡同。斯大林具有巨大的本领,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或那一原理失去生机并使之变成僵死的、被歪曲的真理的木乃伊。在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大师。

例如,斯大林一有机会就宣传他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观点。斯

大林利用列宁关于在我国存在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的思想，在他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多次引用他自己下的定义的种种“变体”。最后，他引用了一个基本定义：“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有免除武装干涉行动、因而就是有免除复辟行动的完全保障，因为稍微严重的复辟行动，只有在外来的重大的援助下，只有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才有可能发生。”[52]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式绝对正确、无懈可击，斯大林需要说明，他的论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多么不正确。为此他引用了季诺维也夫的话：“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应当了解为(1)消灭阶段，因而也就是(2)取消一个阶级的专政，这里指的是取消无产阶级的专政……为了更确切地弄清1925年我们苏联的问题是怎样的，必须分清两件事情：(1)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证的**可能性**——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2)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53]

接下去斯大林的全部议论，都是企图证明季诺维也夫是缺乏信心的人和投降主义者。经院哲学家们会羡慕斯大林能如此敏锐地找出那些不符合他的正统思想的弱点。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当时认为，认识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宗教活动是在上帝意志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的，还是上帝意志也服从的宗教理智是这种活动的基础。对于什么更高，是内在的理智之“光”更高，还是“天惠之光”、“圣经之光”更高，经院哲学家们可以争论几十年。斯大林没有屈尊去弄清这种“小事”；他要寻找所有不相信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但是，谁都没有反对他的创造，谁都没有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可能性，于是微小差别、细枝末节对总书记来说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斯大林显得非常敏感，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头脑的教条化。斯大林发现，抓住反对派的过失不放，总是能给听众和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斯大林在这里也是这样做的：

“碰碰运气，茫无前途的建设，在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但这是嘲弄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不过，读者可以相信，季诺维也夫只是表示怀疑，而且他很快就不再怀疑了。他过分地把俄国革命的命运同国际形势连在一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投降，”斯大林接着激动地说，“这

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

可是季诺维也夫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这样的话！他只是讲了作为潜在能力的可能性和它的对立面。但是斯大林走得更远：

“1917年10月夺取政权本来是不应当的，——这就是从季诺维也夫论据的内在逻辑中得出的结论。”斯大林作了这样的概括。

党对“新反对派”的一些错误结论进行过批评，但这并不能成为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连同他的同伴）置于政治街垒另一边的理由。斯大林不能（也不愿意）理解，许多不准确、有时甚至错误的意见是在激烈论战和争论中讲的，是季诺维也夫由于希望燃旺渐渐熄灭的世界革命火焰而提出的。是的，季诺维也夫完全投身于共产国际的工作，常常把自己的评论绝对化。对斯大林来说，这些“失常”不仅是进行同志式批评的对象，而且成了“打击”、“摧毁”、“消灭”的借口。

早在20年代中叶，不同意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就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敌对行为”。到后来，即使一点点不同意独裁者的迹象也会带来悲剧。可以把这叫作理论独裁；不过，尼采早已把这种人称为“精神暴君”。他在一部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讲了许多颇为有趣的思想。尼采写道，“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人拥有真理，但是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还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34]。

给社会思想打上独裁烙印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是好斗的、固执的、残酷无情的教条主义。在这里给他帮忙的是他的思想侍从日丹诺夫、苏斯洛夫、波斯佩洛夫、米丁和教条主义的其他骑士。苏斯洛夫在这方面表现了特殊的敏锐性。这位真正的思想裁判官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还能在理论研究中长期维持停滞状态。苏斯洛夫到处设置思想障碍，把斯大林主义保护起来，他是二元论和理论伪善的发动机。例如，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1962年）上讲话时宣称：“教条主义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最危险形式。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在伪装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下，给革命理论和实践、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损害。企图用一大堆引文作掩护来逃避现实，意味着不善于或不愿意估计新的历史环境，在不断变化的新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原则……”[35]苏斯洛夫之流的斯大林门徒们，都是善于看风使舵的能手；他们残酷无情地压制新思



发达社会主义的设计师：勃列日涅夫（左）、苏斯洛夫（右）

想、革新精神和认识新过程的尝试，通过向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献媚来掩盖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倒行逆施。

斯大林主义把真理变成木乃伊，使教条主义带有这样一种特征：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或那一原理。毫无疑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他们的结论，像任何理论一样，都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要知道，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⑥]经典作家所表述的某些原理，应当看作是仅仅适用于提出这些原理的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即使那些可能过时或不完全符合我们今天观点的结论，我们也必须尊重和了解。要知道，现在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要停止出版经典作家比如说讲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著作。但是，斯大林却亲自决定，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理论遗产中哪些可以发表，哪些不能发表。在斯大林的档案中，保存着许多请求准许发表列宁的这一或哪一书信、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手稿片断的报告。下面举两个例子。1939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米丁写信给斯大林说：“我请求准许在下一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附上的弗·伊·列宁给伊涅萨·阿尔曼德的两封信。”批示极简单：“不反对。斯”[⑦]。

然而研究院不总是得到这样的许可。日丹诺夫、米丁和波斯佩洛

夫把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送给斯大林,他们对发表这篇文章是否适当拿不定主意。"领袖"仔细研究了恩格斯的文章,并在文章上作了内容如下的边注:"卑鄙龌龊的侵略行径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过高估计俄国对外政策的作用";恩格斯"攻击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决定使它失去欧洲社会舆论的任何信任"。然后他作了总的概括性的结论:"既然如此,是否还值得把恩格斯的文章刊载在我们的战斗性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作为普遍指导性的文章,或者至少是作为极有教益的文章呢?因为显然,把它刊载在《布尔什维克》上就是默然给它作这样一种推荐。我认为是不值得的。**约·斯大林** 1940年7月19日。"[38]

因此毫不奇怪,列宁的许多文献被扣压了几十年而没有发表。斯大林直到去世一直把列宁的许多观点和思想"禁锢"起来。教条主义只承认直接证实其论点的东西,而拒绝与它相对立的东西。黑格尔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教条主义,"狭义地说,就是保留片面的理性定义,排斥对立的定义"[39]。即使斯大林常常喜欢使用的"左的辞句",也不能掩盖他的保留他需要的马克思理论原理和隐瞒他认为可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路线。对于教条主义的思维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

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300多版,印数约4300万册!这本把各种教条木乃伊汇集在一起的书,对全国成年人来说就像《古兰经》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成了必须阅读的东西。但是历史早已证明,意识是最不依赖权力的领域。异端、怀疑、异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意识施行暴力、企图严厉控制或禁锢意识而产生的。本世纪初,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按照斯大林的意愿曾被长期从我国社会思想史中抹去)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了一个很动听的标题:《指导思想》。他在文章中对彼得堡大学教授卡列耶夫发表在《历史评论集》中的文章进行了科学的批评。卡列耶夫不仅企图向历史学家指出应当如何写历史,如何研究历史,而且指出应当如何理解历史。索洛维约夫以他固有的敏锐思考力指出,作者企图对如何理解过去提出建议是没有道理的。但卡列耶夫怎能比得上斯大林!斯大林的"指导思想"对所有的人来说,至少在口头上,都是绝对必须接受的!这里我要

指出，绝大多数人已养成了盲目相信"领袖"这种如此变形的意识：他们只会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理解历史。

下面我将竭力说明《简明教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真正作用。我想首先请大家注意，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把党在国内同无数"敌人"进行斗争的意义绝对化，从而对过去造成了一种歪曲的形象。当然，党内斗争是存在的，而且常常很激烈。这是辩证法规律。但是，斯大林在党的历史上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斗争和各种可耻行为：孟什维克的阴谋诡计，取消派的投降主义，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行径，他原来的战友们政治上的两面派活动。照斯大林的意思，甚至可以认为，除了他本人和他的一些拥护者以外，党的整个老"近卫军"，用他的话说，都是"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的一群恶棍"。《简明教程》12章中的一些小标题很能说明问题。在"领袖"看来，历史就是一些人进行无休止的敌对活动，斯大林率领另一些人采取坚决、英明的行动："孟什维克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反政府阶层知识分子的蜕化"，"托洛茨基派加紧积极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消灭富农阶级"，"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余孽的被消灭"……

一批历史学家——克诺林（固然，他没有完成"大业"就被捕了）、波斯佩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1937年4月16日政治局决议全力以赴赶写这部著作。成为它的基础的是斯大林制定的党史分期提纲以及他确定的所谓党史的实质是"布尔什维克同反布尔什维克流派所进行的斗争"这一定义[40]。后来斯大林陆续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出版于1938年。斯大林不仅亲自写了党史教科书中的哲学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直接参与该书的校订。这本书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经验和理论的全面总结，也就是苏联模式的理论化。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特点一是突出领袖个人，开始时为列宁，后来则为斯大林，因而也就将联共（布）直接称作列宁斯大林的党；二是突出斗争，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特别是第二方面更是全书九章重笔浓墨加以渲染的，从1893年到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实际上成了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间断竞争的历史；三是突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内涵既包括思想方面的，也包括经济方面的，还包括政治方面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曾被苏联、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共产党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这样的评价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收到这部著作的各章和几份样本。“领袖”几乎使每一章都坚决地向这样一个基本思想“靠拢”:党的历史是党内斗争的历史。领导这一斗争的是列宁的忠实战友和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尽管斯大林很忙,需要处理其他事务,但是从他在未来这部著作的各种稿本上写的评语来看,他本人对“历史”下了很大功夫。他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他长期影响千百万人意识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斯大林看了《简明教程》又一个修改稿(在他批准那个后来有几千万人学习的稿本之前,曾有过几个稿本)之后,他自己也不能不感到,党的历史看起来就像骑士的角斗场,他的“骑士团”同无数敌军在那里接连不断地搏斗。斯大林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设法避免将来可能有人批评他的历史观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可以排除),于是口授了几个论点,经过编辑加工后文字如下:

>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机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41]

这就是斯大林的“阵线”观点和特别的军事术语。

在《简明教程》各章标题后面,是一部木乃伊化的历史,是一张长长的教条清单。所有这些教条归根到底都应当强调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一切都“在上面”决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后来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指示),这个习以为常的说法的含义就是:毫不怀疑地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权力永远正确。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即使专制君主们也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动脑筋”。

在《简明教程》中,叙述现实的事件和事实常常夹杂着干巴巴的斯大林概念木乃伊。下面只是其中的几种。

这种教条主义木乃伊中的一种，是把革命的飞跃绝对化，贬低改良的作用。“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唯意志论和强制决策作辩护，它们预先就授权“领袖”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激进措施。例如，过渡到“消灭的政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斯大林的“革命的”、飞跃式的唯意志论，被《简明教程》推崇为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改良”、“进化”这些名词本身都成了被历史廉价出售的敌对异己思想的同义语。

另一个教条主义木乃伊是断定苏联的经济是当今世界上最完美的经济。《简明教程》宣称，我国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说到生产过剩的“荒谬现象”，斯大林的确是亲自插手，力求使这种现象永远不在我国发生。但是，“持续不断的”短缺，使人难堪的商品匮乏，产品质量低劣，生产只追求数量指标等现象，却上升为规律性。

类似的教条主义木乃伊可以列出很多，我只想再指出一个。斯大林成功地（这在《简明教程》中曾一再强调）给人们造成一种强烈印象，不，说得更重一些，使苏联人形成一种世界观，认为一切挫折、失败、困难全都同大量“人民公敌”的活动有关，从1937年起才终于开始坚决而广泛地摆脱这些人。《简明教程》毫不吝啬地给老共产党员、“列宁的近卫军”、十月革命的创造者们扣上各种各样的大帽子：“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人类渣滓”、“托洛茨基-布哈林派恶棍”、“白卫小丑和虫子”、“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分子奴仆”，等等。这部人人必读的教科书教导千百万布尔什维克和非党群众说：“必须使党员不仅知道党是怎样反对和战胜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知道党是怎样反对和战胜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右倾分子、右的‘左’的畸形儿等等。不应该忘记，熟悉和了解我党的历史是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惕性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⑩]“马克思主义知识百科全书”的主要创作者，需要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紧张状态中，想到敌人随时可能进攻，对周围的人、同事、同行经常保持警惕：“敌人没有打瞌睡！”

除了1937年在《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⑪]这封信中向《简明教程》作者们提出的一般参数外，斯大林还力求使这部“著作”具有最大

限度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性。只要一有可能，就在文中"加上"托洛茨基。例如在一个片段中写道："**现在**，通过**1938年**反苏'右倾分子-托洛茨基联盟'审判案查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是经过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同意的，是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总计划的一部分。"引文中着重标出的字是斯大林亲笔加进去的[48]。

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培养、训练人们用斯大林的眼光来观察周围世界。而斯大林几乎在祖国每三个公民中就看到一个"可疑分子"、"两面派"、"暗藏的敌人"。同时我要指出，《简明教程》在国内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不仅仅因为宣传机关根据斯大林指示的精神把它变成了全社会多年阅读的"主要著作"，而且因为它的极为浅显的、提纲挈领的叙述方法很受许多人欢迎，这些人越来越习惯于别人替他们"想问题"，并且满足于这种贫乏的精神食粮。

这些教条主义的木乃伊十分通俗易懂(第4章第2节除外)。人们不需要研读原著，查阅参考书，而主要是不必进行紧张的思考：一切都按照政治壁龛安排就绪，所有登场人物都涂上了相应的颜色(这种颜色在这里只有两种)，在每个地方都作了明白无误的评价。作者们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每一章后面都加上了政治指示式的《简短的结论》。人们只需要背熟这些"嚼烂了的原理"。这本书变成了在全党和全国积极培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工具。这样一来，反真理木乃伊就从书本转移到社会和个人意识中去。从这时起，整个政治教育和党内教育系统就长期以《简明教程》为基础，而它灌进千百万人意识中的却是严重变形的一些列宁主义片断。毫不奇怪，直到今天"领袖"还有如此众多的信徒！《简明教程》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人(学者、知识分子)以外，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不了解真正的列宁和他的著作。而《简明教程》("领袖"本人很快就开始被认为是它的作者)却实实在在"塞满了"斯大林引文。例如，《简明教程》最后3章总共只有70多页，却有60多条(！)斯大林的评语、引文和"结论"。《简明教程》的作者本人也把自己变成了它的主要"角色"。斯大林1938年10月1日就这部"著作"的出版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他的主导思想：如果没有列宁的学生们(当然，"领袖"指的仅仅是他自己。——本书作者注)的"同心协力"，他不

相信会有苏维埃政权。他建议同"斯大林同志对所有主要问题都作了说明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一起学习《简明教程》。斯大林把《简明教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歌之歌"。他考虑到会议参加者的成分,没有放过机会提出警告,我们"没有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培养好;他们被外国谍报机关网罗去了。这是外国谍报机关的猎物"[⑮]。斯大林教导宣传工作者如何利用"宣言",同时让他们警惕那种最终只能落入"外国谍报机关"罗网的自由思想。从这时起,《简明教程》变成了斯大林语录,按照这本语录来考察每个人的正统性和政治可靠性。

这种教条主义的、按内容来说反历史主义的精神食粮,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和原始化。斯大林为培养一个庞大的头脑简单者阶层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些人中不断地招募钻营分子、告密者、勤勤恳恳的办事员、不动脑筋的执行者。正是由这个阶层来补充官僚机构、惩罚机关和各级干部队伍。据个人档案材料证明,马林科夫"亲自"审查过几千名被派去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历届全会上自动当选)、被派到内务机关和各部机关的人。思想和理论成熟的标准,是"机关"方面没有揭露"丑闻"和钻研斯大林的"案头必备书"。一些人被召到莫斯科谈话。或者是肥头大耳的马林科夫本人(他摆出大人物的架子,懒洋洋地坐在沙发椅上),或者是他指定的官员,在提出的问题中一定会"添上"《简明教程》或斯大林其他著作中的一两个问题:

"哪种倾向是主要的、最危险的倾向?(这是个陷阱,不是每个人都能记起,斯大林曾教导说:主要倾向是停止与倾向作斗争的倾向。)"

"斯大林同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干部决定一切'?"

还有其他类似的"深奥问题"。

《简明教程》提供的思想弹药足足用了10多年。战争以前这本斯大林语录所以能够控制社会意识,不仅因为宣传工作者卖了力气,而且因为,我再说一遍,千百万人认为这一本书对整个时代作了极为简明扼要的论述。多数人不懂得,《简明教程》所描绘的时代面貌是完全失真的。在全国培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是通过整个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路线最得力的传播者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死后是苏斯洛夫。

斯大林很早就注意到日丹诺夫。当然,关于他的许多情况"领袖"是后来知道的,那是1925年,这位下诺夫哥罗德州党委的年轻书记进

入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斯大林把高尔基(这时下诺夫哥罗德已经改名)边疆区党委书记请到克里姆林宫谈话。33岁的壮小伙子给总书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斯大林询问了高尔基市的情况、人们的情绪以及市民对驱逐托洛茨基、从党内开除并流放一大批托洛茨基拥护者的看法。顺便还问到,日丹诺夫的亲属现在还有什么人住在他的故乡马里乌波尔市,他是否同沙德林斯克保持着联系,内战时期他在什么地方开始做党的工作。日丹诺夫对于总书记如此探询自己的情况很吃惊,他简单明了地报告了一切,对边疆区开始的集体农庄运动的前景作了乐观估计,说边疆区组织的布尔什维克正努力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然后就告别了。斯大林在他的神秘笔记本里记下了什么。此人有一双机灵的眼睛,有文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利用这种机会提出各种要求(机器、人力、追加拨款)。年轻书记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前景和突击发展工业的必要性所作的估计,非常符合斯大林本人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日丹诺夫回到高尔基市后,询问将在哪里举行就要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原来是在索尔莫沃区。他来到那里,在会上作了报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谈话时从斯大林那里得来的结论和指示。他特别提请党员注意,不是所有的托洛茨基拥护者都已经解除了武装;他号召保持警惕[66]。第二年,日丹诺夫就已经在第16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的升迁更快。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后,日丹诺夫领导了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同时成了联共(布)中央书记。从1935年2月起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从1939年起是政治局委员。他同斯大林私人关系很密切;有一段时间甚至结了亲,他的儿子尤里娶了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然而这门婚事未能持久。斯大林对日丹诺夫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很满意。1944年根据最高统帅提议日丹诺夫被授予上将军衔。当时在政治工作人员中只有极少数人获得这样高的军衔。

战争结束时斯大林在军事外交领域考验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日丹诺夫,1944年同芬兰签订停战协定后,他主持了同芬兰有关的工作。在日丹诺夫的档案里保存着一些给斯大林的电报。下面是其中的一份:

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特急"

今天,1945年1月18日,我拜访了曼纳林。会晤是单独进行的,持续了近两小时。曼纳林说,在我们两国关系中,经过多年敌对状态后,实行根本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确信,如果没有良好关系,对苏联的军事防线是没有用处的。据曼纳林说,1939年他本来不想打仗,对1941—1944年战争也是这样,早在战争爆发前他就怀疑不会有好结果。他表示同意在海岸防御方面进行合作,而在陆上将独自保卫国家。他问,有无示范性条约。我说,好像有,如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条约。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

答复这位政治局委员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莫洛托夫。复文很强硬:

您太冒进了。同曼纳林签订类似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那种条约,这是以后的事。先要恢复外交关系。您不要用激进的建议吓唬曼纳林。您只需要把他的立场弄清。

莫洛托夫

第二天日丹诺夫又向斯大林报告:

我又拜访了曼纳林。我说,签订类似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条约是"以后的事",要在恢复外交关系以后。曼纳林回答说,他理解:芬兰是个受监督的国家,暂时不可能有其他类型的对苏关系。可以看出,他感到失望。

接下去是有关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一些具体问题[⑩]。斯大林批准了苏联方面的建议,这时他很可能想到,战后也可以利用日丹诺夫解决国际问题。顺便指出,正是日丹诺夫后来受斯大林委托处理过共产党情报局的事务。

为什么我要离题讲这许多话？这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时时刻刻都在考验他寄以希望的人。有时要考验很长时间,甚至一辈子。他对任何

一个重大失误都不宽容。日丹诺夫始终没有辜负斯大林的信任，但是，如果他不是在1948年8月只活了52岁就突然死去，说不定列宁格勒旋风也会把他卷进去？他的儿子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丹诺夫认为，在父亲去世以前，斯大林对他已经开始冷淡，就像起初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稍后对莫洛托夫一样。但是，说斯大林对日丹诺夫态度冷淡，这只是根据一些间接证明作出的一种推测。

日丹诺夫从1944年起直接在联共(布)中央工作，表现出他是强硬的、残酷无情的思想和文化监护人。教条主义不单单是通过神化"领袖的理论天才"培植起来的，它还通过种种禁令而在人们的意识中巩固起来。这些禁令包括：电影院、剧院可以演什么，不可以演什么，作家、音乐家可以创作什么，不可以创作什么，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每走一步都会遇到无数"禁忌"。日丹诺夫很善于设置"禁忌"，以此证明不辜负斯大林的信任。战后的精神生活还没有来得及从1937—1938年的状态中解冻，很快就又冻僵了。这里出现了大量的教条主义木乃伊。

1979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历史故事和回忆录汇编，书中记载了一位目击者的印象，他于1946年8月在斯莫尔尼宫听过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问题的报告。我在这里引出这位只署姓名缩写Д.Д.的作者的回忆片断。

> 报告人由一大群人陪着从听众席右后方进入会场。他手里拿着公文夹。在灯光照射下，头发闪闪发光。他容光焕发，就像刚刚睡过好觉、洗过澡。全体起立。掌声四起。报告人走上讲台。是下午5点。照惯例提议由文学界著名人士组成主席团。甚至有人发出一点笑声，因为作家们忘记提议自己的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参加主席团。报告人微微一笑，小声说了几句俏皮话。会场很快安静下来。报告人沉默片刻就开始讲起来。几分钟后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整个会场变哑了，变僵了，冻得越来越结实，过了三个小时变成了白茫茫的一个大硬块。报告使人惊呆了。人们默默地离开会场[48]。

这就是日丹诺夫，斯大林的高级精神监工之一，斯大林的思想木

乃伊的守护人。

党内许多了解苏斯洛夫的真正作用的人，把他叫作“灰色的红衣主教”。他和马林科夫是机关工作的两位主要祭司。斯大林在他70寿辰庆祝会后对苏斯洛夫(以及什维尔尼克)作了充分的评价。“领袖”认为，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好。庆祝会思想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苏斯洛夫负责。我想，苏斯洛夫本人的言论，比如说关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言论，可以最好地说明他的为人。我指的是他们去世或下台以前和以后的言论。我不打算引用这些截然相反的、简直就像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发表的言论。总而言之，在涉及“领袖”时，苏斯洛夫是毫无原则性可言的。他只崇拜掌权的人，而又残酷无情地践踏死去或下台的人。

他瘦瘦的身躯，满面病容，经常穿一套旧衣服，然而他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享受。苏斯洛夫有一种表达得很明确的“栏路杆”式的思维：不准，不许，不让，不容。不仅中等水平的人怕他，就是同他不相上下的人对他也有点害怕。从1947年起，35岁的苏斯洛夫作为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不仅在斯大林时期，就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这个人对于在我国社会科学中灌输教条主义也卖了很大力气。可是，党的这位主要思想家，尽管在中央工作几十年，也未能提出多少有点意义的新思想或新概念。此人一生都是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守护人，后来虽然形式上抛弃了斯大林，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把斯大林的旧神话保存下来。正是苏斯洛夫直到斯大林去世始终是斯大林的著作以及《简明教程》最热心的宣传者之一。尽管作了种种努力，《简明教程》这部著作却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思想力量”。

战后逐渐清楚了：这部“杰作”再也不可能影响人们的思想了。社会科学不仅开始停滞了，而且大面积地坏死。斯大林借助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注射了新的强心剂。斯大林对于特别是前一部著作引起的许多来信作出反应，他按照自己的习惯把他的一些答复公之于众。斯大林在《答同志们》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49]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对此不能不表示同意。然而斯大林的新著作，实际上同他从前写的所有著作一样，是极端的和绝对的教条主义著作。顺便指出，这些新著作是大学者们替他代笔的，他只是使它们具有了典型的斯大林外貌。

说句公道话：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是通常亲自动手写文章、拟讲话稿、著书（最后一些著作除外）的不多的领导人之一。现在我不想谈它们的内容。是的，有人怀疑他在一些场合在《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借用了其他人的思想、论点。但是我再说一遍，斯大林通常都是亲自写自己的著作的。后来这个传统被破坏了：赫鲁晓夫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别人写的东西"配音"，而且发音不总是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更是这样。例如在美国，人们都知道为总统准备讲话稿的拟稿人的名字。看来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但是，什么时候有人开始出版自己的多卷本文集而自己连这些著作都没有读过呢?！我想，拿勃列日涅夫来说，他自己不仅什么都没有写过，而且从来没有读过自己的放在雄伟巨著封面里面的文章。他不懂得，所谓"他的"多卷本文集是为他的虚荣心和低能用文字竖起的一座座纪念碑。

斯大林去世前曾试图"复活"已经僵化的社会科学，但为时已晚。命运为这件事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说到《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当时宣传机器还来得及围绕这部著作组织适当的热闹场面，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小册子、系列讲座，使人们注意到斯大林的"英明"不减当年。固然，宣传者们很难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迈的"领袖"到了这把年纪还研究语言学这门比较狭窄的科学领域。当然，只有专家才能觉察到，"领袖"批评马尔院士相当令人厌恶的观点是明显的失策，因为这些观点在语言学家中间也不受欢迎。而且许多人都知道，小册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写的。斯大林顺便分析了一些方法论问题（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性、语言和思维等等），他的这些尝试也常常显得不仅肤浅，而且幼稚。斯大林闯人这个十分专门的科学领域，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使社会科学明显地活跃起来，对提高他的"理论家"声望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

斯大林对于发表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了比较精心的准备。"领袖"在这里也和在前一本小册子中一样，仍然忠于那种教义问答式的原则：一问一答。讲了经济规律问题、商品生产问题、价值规律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从形式上看，这部著作是由于1951年11月的讨论会和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对一些经济问题发表的意见。我已经提到过，这部未定稿是谢皮洛夫和一个不大的学者小组写的。斯大林当时已经老了，这本1952年年底即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出版的大约

100页的小册子是由别人代笔的。是的,有病的“领袖”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对文字进行了几次认真的“修饰”,同时对作者们口授了一些愿望。但是,小册子的许多论点带有独裁者教条主义思维的明显的个人烙印。例如讲到集体农庄生产时,他仍然固执地把愿望当作现实。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斯大林对农业的完全外行和绝对无知。请读者自己判断吧。由于他的坚持,小册子中加了这样一段话:“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⑩]难道斯大林不知道,集体农庄仍然什么也“不能支配”,斯大林农业政策把农民变成了不自由的阶层,这个阶层的生活已经濒临毫无出路的境地。

对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照例也是按照传统的老调进行分析的。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使早已干枯的木乃伊复苏的尝试,可是在进行这种尝试时只不过增添了新的错误,或者只是重复早已讲过的话。的确,真正的作者们似乎(有意无意地)给斯大林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们所表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被斯大林蔑视为改良主义者的考茨基说过的话……考茨基和斯大林一样,不是用利润给规律下定义,而是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来给规律下定义。

我已经指出,斯大林是非常蹩脚的预言家。他的大多数预言都没有实现。他最后的著作又一次证实了这种估计。斯大林在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问题时,实际上重复了只是在30年代是现实的和正确的那些论点。衰老的“领袖”对世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那些年代的水平上。他斩钉截铁地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他还顺便提出了一个更加可疑和错误的论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可能性现在大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战争的可能性。

斯大林“按共产国际方式”考虑问题,他显然不懂得维护和平运动的作用,他说:很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实际上,斯大林没有感觉到处理世界事务的新方法正在产生。也许,他(要知道,他是“天才!”)不便于说

原子武器(现在苏联也掌握了)的发展很快就会超过原来制造原子武器所拖定的目的。斯大林不能在考虑未来的思绪中看到战争的界限和限度,超过了这种界限和限度,战争就不再是明智的、合理的政治手段。大概我对斯大林的"要求"太苛刻了……但是,我再说一遍,要知道,人人都把他看作天才啊!而他却重新把这些反真理的木乃伊搬了出来,这些东西也许在15年以前多少有助于回答例如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仍然存在一类的问题。他提出的结论可以使"冷战"风刮得更冷:"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斯大林仍然忠于自己:要创造,就必须消灭。

教条主义喜欢在静止和不变中观察世界和人的认识,在永恒的停滞中考察理论原理,这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许多灾难。在理论、社会生活和历史中,唯意志论占了统治地位。大概没有任何一门科学、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没有发生教条主义的变形。

历史是斯大林竭力传播他观察往事的准则的一个特殊领域。至于党的历史,那么这就是"两个领袖",后来就是他自己,继承者,"今天的列宁"。在党的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揭示斯大林在粉碎许许多多"派别"和"反对派"事业中,在工业化和集体化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和战胜法西斯过程中的作用。在党的历史中,正像《简明教程》、《斯大林传略》以及其他歌功颂德的著作所证明的那样,渐渐形成了这样的情况:任何人也不能同"领袖"平起平坐。在"私人"历史学家的帮助下,连列宁也被推到了一边。党的历史变成了斯大林一人建功立业的历史。伪造、隐瞒、歪曲真相开始被认为为了"最高利益"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事情。

对苏联历史也进行了重大修改。日丹诺夫的信(1944年8月)以及他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历史领域科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决议草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这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培植的种种教条主义模式的性质。日丹诺夫在他的意见中对瑟罗米亚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塔尔列三位教授进行了严厉批评,因为他们在俄国一些沙皇的政策中找到了某种积极的东西。信的作者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不应当有成吉思汗、拔都、帖木儿、伪德米特里的像片。他认为,为《17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奴隶制和奴隶》一书而将斯大林奖金授予雅科夫列夫是错误的。但是,当要评论斯大林赏识的沙皇特别是伊凡雷帝

(日丹诺夫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信的调子就变了:"伊凡雷帝对当时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和有教养的人物,他在贵族帮助下巩固了他的绝对权力。他进行的多次刑讯和处决也像雷帝的整个活动一样是进步的(信的作者是多么有'远见'。——本书作者注),这有助于加速历史进程和把俄国变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⑬]

斯大林依据教条主义概念随意"剪裁"运动和发展的一些阶段与界限。我想,如果斯大林再活五年十年(即使想一想这种情况也十分可怕!),他大概会宣布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是既成事实,就像他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建成一样。他认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之后,所需要的只是"完成"上层建筑。这种看法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一个还存在许多极为困难的问题、正在进行血腥清洗、人人都一样贫穷、事事都讲集中的国家,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追求的理想。由于这样一些论断,自然就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歪曲观点。斯大林把居民的需求超前于生产的现象奉为规律,以此暗示:最起码的必需品经常短缺和不足是社会主义的规律。法学领域的教条主义观点同对法制实质的简单化理解有关。按照斯大林的意思,所谓法制,仅仅是对任何破坏苏联法律的行为都必须进行处罚、镇压和惩处。法律文化问题,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各级政权对权力代表机关汇报工作,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

整个说来,社会科学只能被迫苟且偷安。那种肤浅的注解风气,不仅扼杀了科学的灵魂,而且大大限制了科学影响的"范围"。我再说一遍,从30年代末起,只能对斯大林本人说



伊凡四世(雷帝)
(1530–1584)
俄国政治家、统帅

伊凡四世1530年8月25日出生于科洛缅斯科耶镇,大贵族执政年代(1538—1538)在宫廷受教育。他开始执政后,于1549年建立重臣会议。伊凡四世的政府竭力巩固专制政权,强化国家中央集权。执政时期,制订了第一部军队条令—《贵族会议关于屯扎和守备勤务决议》。

1560年重臣会议解散后,伊凡四世实行独裁统治。

1584年死于莫斯科。伊凡四世在位期间完成了俄罗斯国家中央集权的过程,确立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他的活动特点是具有远见和坚定的目的性,并具有进步的性质。但为了达到国内政治目的,不适当地采取了残酷的竞争方法。

过的话进行注解。从初出茅庐的社会科学家到科学院院士,所有学者的“研究”题目都大同小异:斯大林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发展哲学的意义;斯大林论国家和法的理论;斯大林对发展军事科学所作的决定性贡献,等等。我在各图书馆发现,1945到1953年写的类似题目的书和小册子大约有550种（!）(看来这还不全)。科学思想受到了肤浅的教条主义的压制。可以设想,有多少真正的天才变得憔悴了,干瘪了,枯竭了!他们没有可能拿出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新书、新发现来大显身手。教条主义的木乃伊阴森可怕,受它压制的人太多了。我还没有弄清斯大林主义给社会精神潜能造成的全部损失。

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给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带来了很大危害。遗传学的发展耽误了许多年,控制论受到排斥。这是因为人们在评价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科学知识的新领域和新思想时,是从庸俗政治立场,要不就是从显然完全外行的立场来看问题的。寻找世界主义者的做法更加注定科学必然陷入隔绝状态,陷入教条主义的停滞状态。《世界主义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1950年4月18日《消息报》)一类的文章,打消了同国外研究机构保持学术联系的任何兴致。外国学术杂志上提到苏联学者的名字或者邀请苏联学者参加国际会议,都成了相当危险的事情。

把斯大林的种种“辩证法”公式机械地搬到生物学发展问题中去的做法,正如杜金采夫在《白衣》中中肯地指出的那样,等于科学的自杀。但是,如果说得确切些,这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科学,有发展前途的科学,可能被甩得很远很远。

在这种情况下, 李森科一类的人物抓住斯大林的实用主义要求(即“科学中需要立即产生的实际效果”),很快浮到了水面上来。当时报刊上出现了毁灭性地抨击“奴颜婢膝的”苏联摩尔根学派的文章。例如,生物学博士格鲁先科的文章《魏斯曼学说的反动实质》辱骂苏联遗传学家杜比宁、菲利普琴科、柯尔佐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吹捧李森科院士,说他在《关于生物学状况》报告中指出了我国摩尔根学派的“贫乏的实践活动”。在斯大林看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实际上仍然是属于炼金术,即同理解新事物有关的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的领域。他认

为,科学中主要的事情是组织。他常常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有关科学成就和发明的一些报道,只要这些成就和发明是他所不理解的。“领袖”相信,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系统也可以进行科学创造。斯大林认为是危险的和不能转上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轨道的人,都被残酷无情地消灭掉,或被送进无数的劳改营。这里有几百名很有才干的人,其中有:加斯捷夫、瓦维洛夫、涅夫斯基、戈尔布诺夫、泰奥多罗维奇、叶尔曼斯基、穆拉洛夫、柯尔佐夫、图莱科夫、纳德松、图波列夫、米亚西谢夫、佩特利亚科夫、科罗廖夫、克列伊苗诺夫,以及其他许多人。

保全了性命的学者们在特种“机关”、在劳改营的实验室进行工作,这些机构受苏联内务部第四特别科监视。在这里,斯大林从极端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对待科学;他已经不太注意囚犯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重要的是快出成果。当取得成果时,斯大林有时也发“善心”——缩短刑期,个别时候甚至解除关押予以释放。贝利亚主管的部门常常向斯大林报告在押学者的工作成就。请看下面两个报告:

约·维·斯大林同志

内务部第四特别科的囚犯专家小组在囚犯专家斯达霍维奇教授和温勃拉特教授、泰费尔工程师领导下,对制造国产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进行了长时间研究。小组根据自己理论研究的成果提出了制造“ТРД-7Б”型发动机的建议。请审阅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C·克鲁格洛夫

1946年5月18日[52]

约·维·斯大林同志

囚犯专家阿布拉姆松(判刑10年)1947年为汽车发动机研制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节油汽化器装置。经ЭИС-150汽车试验可节油10.9%……建议为阿布拉姆松和机械工程师阿尔则瓦尼泽以及设计工程师茨韦特科夫减刑两年。

请您决定。

C·克鲁格洛夫

1951年2月8日[53]

斯大林表示同意。但是，他是否知道，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场合，工程技术思想所"依据"的并不是他的"光辉"思想，学者和工程师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不过是渊博的知识和没有被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垃圾弄脏的真正的创造发明？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也不能不涉及对列宁著作的研究过程。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利用斯大林的引文来评论列宁的这个或那个论点，就不能理解列宁。在高等学校首先检查学生如何对斯大林的著作作摘要。我记得，当我在奥廖尔坦克学校学习时，在一次课堂讨论后教员把我留下来。这是一位年纪已经不轻的中校。学生们都喜欢他，因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很"和善"。在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这位中校(已经过去好多年，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把他检查过的我的原著摘要还给我，像父亲一般小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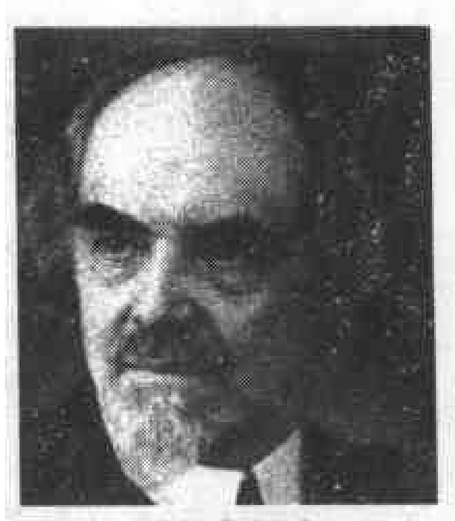
"摘要很好。一看就知道，你不是照抄，而是首先思考。但我劝你：对斯大林的著作作摘要要完整一些。懂吗，完整一些！还有，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名字前而写同志不要用'TOB'一类的缩写；而要写全——'TOBAPИЩ'。你懂我的意思吗？"教员关心地望望我。

"是，中校同志，我懂了！"

晚上，和我同屋的一位同学对我说，苏共党史教员也同他和另外几个同学进行了同样的谈话。原来一个委员会要来，据说在邻近的学校里对这种"政治上的幼稚"(像我摘要中表现的那样)极为"注意"。

即使现在也还可以问问在那些年代度过青春的成年人，他们是怎样研究斯大林著作的。许多人还记得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它们的章节标题：《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党》……当时许多人甚至非常赞赏这些肤浅教条的简单明了。在技校、中专、学院，在生产单位，在党内、工会内、共青团内，到处都背诵这些教条。问题甚至不在于所有这些启示录都已经简单化到极点。谁能怎样写就怎么写。主要问题在于，斯大林把这些教条主义木乃伊，把这些枯燥无味的、被歪曲的真理，保存了几十年，把它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ABC。可是，当时(真是历史的讽刺！)斯大林已经自认为是辩证论者，他痛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种种"教条"，并且给这些"教条"编了号："第一个教条"、"第二个教条"、"第三个教条"……

人们越是背诵斯大林的教条，就变得越是顺从。斯大林的教条木乃伊，是把人们变成中国人称为红卫兵的那类人的手段之一。人们渐渐习惯于片面的演绎法：从一个公式引出另一个公式，如果需要，还可以引出第三个公式。人们常常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而是在公式、定义、斯大林著作的引文中寻找对这一或那一过程的解释。官僚制度千方百计培植思维方式的教条主义，这种官僚制度也变成了斯大林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别尔嘉耶夫
（1874—1948）

俄国思想家

1874年3月6日出生于一个基辅的军人贵族世家。1894年考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1895年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898年因参加俄国第一次社会民主运动而被捕，后被学校开除，并于1901年被流放于沃洛格达。他的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的标志，1917年参加作家协会，1918年，他着手发起成立了“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并成为主席。1921年因涉嫌“策略中心”案而被捕，经捷尔任斯基审讯后被释放，后又被驱逐出境开始流亡生活，1922到1924年侨居柏林，并在那里创建了宗教哲学学院。1924年他的《新的中世纪》一书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跻身于欧洲最主要的哲学家行列，后移居巴黎，194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称号。

9 全面的官僚制度

在着手对斯大林主义的另一类遗物——官僚制度进行分析之前，我想请读者读一读从别尔嘉耶夫的《俄国之命运》一书摘引来的一个片断。这位杰出的俄国哲学家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一些人被自由所陶醉、另一些人则对“基督的敌人”心怀恐惧的气氛中写完他的这本书的。别尔嘉耶夫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很多方面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下面我就引一大段他的原话：“民主政治也可以像独裁政治一样剥夺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如此，它把民主政治原则变成了真正的专制制度。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也同样很少给个人以自由，同样不考虑个人的独立自主的存在。有一次，在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上有人发表了这样一种见解：如果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的话，它可以剥夺

个人的看来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例如思想自由的权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乃是至高无上的神物，一切都应当成为它的牺牲品。我们到处都碰到专制制度——国家专制制度和社会专制制度的遗产，它不但在独裁统治下大行其道，就是在多数人统治下也照样畅行无阻。"[58]别尔嘉耶夫不仅看到了个人独裁实行暴政的危险，而且也看到了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危险。我认为，他的这些见解含有合理的内核：就社会主义而言，这种危险正在成为现实，多数人正在帮助领袖人物在国家政权中造就一个"多数人意志执行者"阶层，一种集体官僚主义应运而生。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不能没有一个机构。凡是在这个机构不与体制的经济活动效果相联系、不直接依赖于这种效果的地方，凡是在这个机构不是通过民主的方法建立、并且缺乏对它的监督的地方，就必然要出现官僚主义。最初，人们觉得好像"多数人意志的执行者"不会构成多大危险。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谈论建立新的机构时就说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个机构"必须清除一切官僚主义"[59]。但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年的情况已经表明，官僚主义本身所蕴藏的危险，要比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的严重得多。我们知道，在一些关键时刻，列宁对官僚主义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认为它将是对新制度的威胁。例如，他在1919年1月就曾对一桩具体的官僚主义表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对饥饿的工人帮助不力，将受到严厉制裁，直至枪决。"[60]

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特别是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导致了行政机构的增加。战时共产主义要求对生产、分配和执行进行全面的监督。这就占用了很多人力……在国家结构中产生了新的成分，新的环节，它们往往是中间的、起协调和连接等等作用的环节。早在列宁在世时，行政机构就已经开始恶性膨胀，为保证自己的运转而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那个时期，斯大林，如果要说他是什么专家的话，那就是行政机构工作方面的专家。由于担任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多年担任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各色各样的委员会的委员，他比别人更早地感受到行政机构和党的机构的力量和缺陷，感受到它们的能力所在。

斯大林在当上总书记后，就责成一个机构拟定各人民委员部中的职位等级，这些职位后来逐渐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官名录。例如，民族事

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主任勃列扎诺夫斯基曾经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于1923年2月起草过一个叫作《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部职位等级划分》的文件。全部职位分成四类(民族问题领导人，行政经济管理工作领导人，政治、科学、教育工作领导人，科学文献出版机关领导人)。等级表中规定党员工作人员的级别为：最高级和高级、中级、低级；还规定了非党人员可以担任什么职务(总共两三种)。在得到斯大林批准后，等级表把膨胀起来的机构精确地划分为若干层次(就像沙皇官吏有许多等级一样)，从而割断了人民委员部同实际的民族问题之间本来就已经是微弱的联系[69]。实际上，斯大林在一担任总书记职务之后就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庞大的无所不在的官吏大军了。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党的水平不高。它本身也成了全面的官僚制度的牺牲品和工具。党内列宁的民主原则的丧失，加速了社会的官僚化。党未能抵挡住这位未来“领袖”的恺撒式的专制倾向。它渐渐变成了这位专制君主的工具。写到这种情况，我们感到沉痛，但事实就是如此。否则，我们今天就用不着讲革新和改革了。今天党需要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需要寻求新的民主的途径来挽回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需要为扩展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多元化创造条件。党应当从过去吸取很多教训。它在20年代本来是应当竭力防止斯大林日后的独裁的。

斯大林集中掌握了特殊的权力，在利用官僚机构方面不愧为大师。正是由于他的插手，下述种种办法才很快制定出来并逐渐成为苏维埃官僚制度的传统做法：各地方要向上级呈交数不清的汇报和报告；上级要下达各种指令和指示；建立干部花名册并把任命权集中在中央手中；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领域加强保密，以至于发展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依靠不断增加新的部门来解决新产生的问题；建立层次繁复、叠床架屋的各种监察机构；扩大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镇压职能；等等。斯大林比别人更早成为“官僚政治的行家”。甚至从通常的观点看，他也是很快就掌握了官僚主义者常用的手腕——使人们同他们难于接近。尽管早在1922年中央全会就规定了总书记应当接见求见人的日子和时间，斯大林却很快就把他不感兴趣的这种事情扔在了一边。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叶努基泽曾经收到过一个名叫马林诺夫斯卡娅(文献里没有名和父名。——本书作者注)的妇女的一封信。她

是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因故被解职。她在信中写道：

阿维尔·萨弗罗诺维奇：

……我是一个被解职的人……人们都对我投以怀疑的目光。了解我的人有谢列布里亚科夫、谢马什柯、李可夫，他们都不在。斯大林同志我**无法见到**（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阿维尔·萨弗罗诺维奇，请帮我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处境吧，我不会哄骗您的……

马林诺夫斯卡娅

1924年12月19日

我的电话是2—66—93[59]

这当然仅仅是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一个方面，一个远非主要的方面，但他的隐面不露、难于接近、高不可攀，早在那些年代就表现出来了。甚至可以说，他，正如我们今天所认清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制度的产物，是官僚制度的恶果。当时，官僚制度需要斯大林式的领袖，而斯大林也需要铁腕的官僚机器。


1923年的列宁

列宁患病后，在他发出的一系列指示，特别是在他生前的最后一些书信中，曾试图对官僚制度（它后来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巅峰时期发展成了全面的官僚制度）的恶势力开展严肃的斗争。列宁不单单是为官僚在数量上的增长焦虑不安，用毫不客气的字眼来称呼它（“官僚蝗虫”、“官僚老鼠”），而首先是担心人民的政权被官僚机构所取代。列宁曾经设想：用什么办法去遏止和限制官僚主义的影响呢？

他很强调管理机构的社会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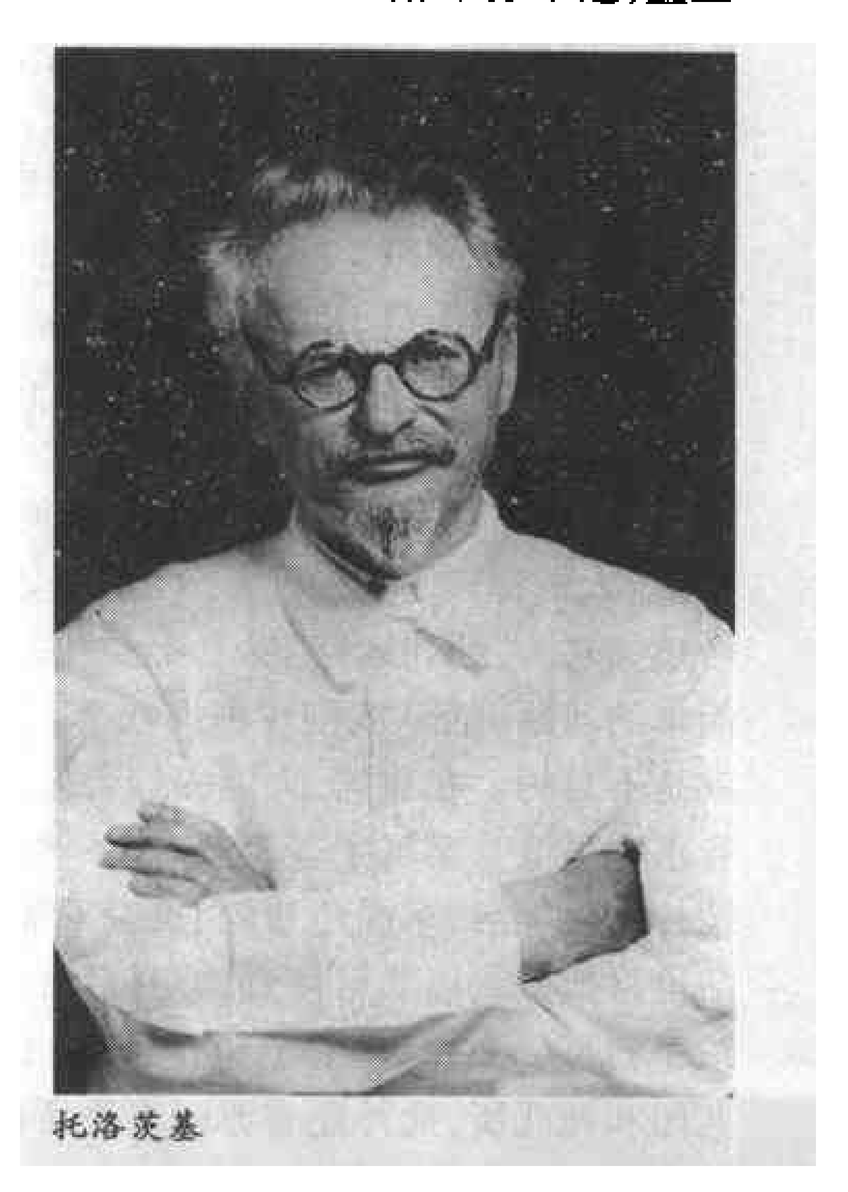
分问题，坚决要求增加工人和农民的成分。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办法。它不能包治百病。我们当今所有的官僚，打个比方说，都是"同自己的人民骨肉相联"的，他们中间并没有剥削阶级的代表，没有像过去所说的在其社会出身方面令人担心的人。列宁还曾寄希望于清党，清除那些"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59]的分子。可以想象，如果有人告诉列宁，过六七十年以后，在他所缔造的苏联，将产生拉希多夫行为、丘尔巴诺夫行为、库纳耶夫行为等等这类现象，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纯洁"机关的队伍"始终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这不是主要的。列宁主要是要保证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让劳动人民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对执行机构实行监督，要扩大公开性，提高全民的总的文化水平。不能让人民受机构的摆布，相反，要让机构受人民的支配。列宁沉痛地写道："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60]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够的。

我想可以这么说，在20年代后半期，曾经出现和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观点。一种观点（以布哈林为代表）认为应当采取有节制的发展速度（既包括工业化速度，也包括合作化速度）；第二种观点则要求工业和农业都实行史无前例的跃进。斯大林最充分地代表了这后一种观点。这种跃进当时单靠经济方法难以实现。因此不得不采取行政强制手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培植、造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阶层。既然解决这些任务主要是靠在农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强迫命令也就可以说是注定难免了。可以认为，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当然，不包括镇压），在一定阶段是必要的。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列宁就曾经说过："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61]

我要着重说明，我只是在考察种种可能性，并不是表示同意这种办法。但斯大林残酷无情地摧毁了自己的政敌的抵抗，选择了强制手段。这样就自然很快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非经济强制手段造就了一个"阶层"，它并不直接依靠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治立场。官僚制度又自然地把影响群众的意识形态杠杆和政治杠杆提到了首位，而把经济手段只放在其次的第二位、第三位。社会主义很

快就丧失了本来就不多的民主。应当指出，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从一开始就奉行了没有民主的专政。托洛茨基在1922年曾经这样写道："在内部社会关系动荡不定、外部局势变乱迭起、险象环生的情况下，如果俄国革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绳索把自己捆绑起来，它早就被割断喉咙，躺在大路边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他当时未加论述，他认为只有当革命的火焰在其他国家点燃之后，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实现。托洛茨基接下去说，因此，"在我们枪决敌人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是在奏鸣民主的竖琴。诚实的革命政治决不允许蒙蔽群众。"[6]那些"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当时如果不是这样，显然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政权的）的布尔什维克，普遍主张用强制手段解决极端复杂的问题。当时，激进主义是革命性的表现。历史违背列宁的意志和未来的利益，选中了斯大林这位"讴歌"和"创作"官僚制度和恐怖政策的理想的候选人，这是俄国革命的最大不幸。

20年代，当列宁周围的人都健在的时候，对官僚主义也斗争不力，这不仅是由于纲领狭隘，而且是因为对斗争实质理解肤浅。不过，直至今日，通常对官僚主义也只是理解为办事拖拉、墨守成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样文章。当时，甚至许多革命领袖人物对官僚主义也就是这么理解的。托洛茨基1926年5月28日在第三次全苏工农通讯员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先是对此阐述了一种似乎是正确的看法："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是存在的，而且很严重。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文化，由于人们笨拙无能，由于一系列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6]后来他又把官僚主义归结为传统的阿谀奉迎、看风使舵、因循守旧这些十分狭隘的现象，等等。这当然是对


托洛茨基

的,但是官僚主义的内在实质——民主政治被不受群众监督的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所代替,却没有揭露出来。

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逐渐成为一种全面的官僚主义。这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所有国家机关、党的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全都要按照它的不成文的法律行事。这些机构的官僚主义仿佛汇合成一种普遍的东西,它到处传染,无孔不入,顽固不化,难以克服。每个机构,每个系统的分子,每个个人,只能按上级的命令、决定、指示办事。在这个体系中,支配一切的是"指示"、"指令"、"决定";违反这些东西就可能遭到惩罚、判罚、放逐;它鼓励的是奋不顾身的执行者和高度警惕的官僚;归根结底,这一切都采取集体官僚制度的形式。全面的官僚制度不考虑经济上是否适宜。它只崇拜机构的无限权威。直到不久以前,我国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蔬菜供应情况不好了,就成立一个蔬菜产品部。报上对食品、工业品包装不好提出了批评意见,就成立一个包装科研所。工业产品质量下降了,就在工厂技术检查处上面建立一套国家验收制度。精简管理机构的决议愈多,管理机构增长得愈快。但是用行政手段来同行政制度作斗争是没有用处的。不采取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方法,是医治不了官僚制度的。而且它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从数不清的称号、官阶、官衔、等级,直至高层权力集团的神秘莫测的职位等级。这里,你往往只能看到无边无际的集体领导制和数不清的官阶等级,而找不到具体的"负责人"。斯大林和他周围的那些人长时期地、精心地、坚持不懈地、全力以赴地培植了这一套制度。

应当说,官僚制度,在逐渐形成的同时,也以这种精神"培育了"全社会。人们都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许多人至今还把它的"顺利运行"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否认我们在国内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所取得的许多成就是不对的。在我国,人们能够普遍就业,得到有保障的社会保证(尽管水平很低),实现了普及教育(虽然质量不高),广大群众享有基本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免费的、虽说不能令人满意的医疗保证,生活必需品价格低廉,以非常便宜的房价居住由国家分配的不大舒适的住房,孩子们可以免费(实质上免费,收费是象征性的)入少先队夏令营、幼儿园和托儿所,此外还有苏联人民所获得的其他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成

果。政府多次降低食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行动受到人民广泛的称赞。尽管这一切不过使人们稍稍超出普遍贫困的水平，但这种逐步而持续前进的趋势本身还是使人们受到了鼓舞。

我决不想用斯大林领导的“成就”来解释这一切。但苏联人忘我的、艰苦的劳动，不可能不获得一定的成果。当时的社会中，还不像斯大林死后二三十年这样腐败成风，一批批领导人营私舞弊，道德败坏。当时总的气氛使人感到整个社会精神健康，生活安宁。全面的官僚“制度”似乎使广大人民群众还感到满意。这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斯大林时代已经成长了几代人。他们不知道“别的”社会主义，对于隔着厚厚的意识形态帷幕的“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生活情景，他们也同样毫无所知。绝大多数人真的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相信这些工人在不断地“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他们听到的全是讲西方国家中如何乌烟瘴气，污七八糟，苏联几乎样样都比“自由世界”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而且还得到强大的宣传机器千方百计的培植。

不能不指出，全面的官僚主义对于那些在没有自由、遭受欺骗、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培养起来的人来说倒是合适的。是的，是合适的：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切都安排好了、规定好了。不单是工作、固定工资，甚至对于什么事情要表示兴高采烈，什么时候播种，种什么东西，“向上级”打什么报告，等等等等，都替你规定好了。这种官僚制度无所不管：它给这部或那部作品、给历史上和当前的各种事件作出最终评价；独家判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从一开始就知道“领袖”的某项决定或讲话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平均式的分配。全面的官僚主义无论对刻板的执行者、所谓的“小螺丝钉”，还是对各级领导来说，都是同样合适的。这种制度促使人们形成一种平均主义的、简单的世界观。重视社会声望的做法，除了种种积极作用之外，往往对人们采取平均主义的态度，而不管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如何。愈来愈看重的不是劳动的最终成果，而是职务、地位、工资的高低、是否上了“官名录”。牛津大学教授亚历克斯·德·琼斯在他写的《斯大林和苏联的建立》一书中发表了一个正确的见解，他认为这位独裁者为整个统治制度建立了一个十分完整的金字塔，他写道：“……任何人都没有可能去纠正自己的上级领导。每个领导人对自己的下属来说都是一个小斯大林。每个人都对下级颐指气使，对同级斜眼相看，对上级则一概阿谀奉

迎。”[69]

使斯大林的恺撒式的统治得到巩固的不仅是不断发展的极权主义趋势和沙皇制度的传统，人们普遍的盲目信任，他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走向未来真正的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也对此起了促进作用。斯大林的名字逐渐变成一种近乎神秘的东西：它使人们产生既害怕又爱戴、既畏惧又忠诚、既屈从又崇拜的感情。在这种气氛中运转的官僚机器更进一步把人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

也常听到一种不同的意见，说斯大林时期“秩序井然”、人们“对明天充满信心”，“无条件地执行计划”，“生活水平得到尽管缓慢然而却是明显的提高”，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依靠经常不断的惩罚、制裁和镇压来维持的这套兵营式的官僚机构，是能够支持经济结构、生产和所有国家机构按批准的、“上级下达的”计划运行的。我想，就是在今天（这只是抽象的议论），如果在人们、领导者、企业的头顶上悬着一把斯大林式惩罚的达摩克利斯剑，那么计划也会无条件地执行，即不惜任何代价，确切些说，不惜以抛弃人的尊严，使人们终日诚惶诚恐、噤若寒蝉、盲目服从这些可怕的后果作为代价。但是今天谁还会同意这样做呢？

斯大林官僚制度的最恶劣的产物，就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惩办机关，它直到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实质上只向一个人汇报工作。问题甚至还不在于这些机关所体现的暴力，而在于它们渗透到了国家组织的每个毛孔和细胞，打入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部门。斯大林几乎断送了捷尔任斯基的一切优良传统。不过，在捷尔任斯基时期法制就已经常常被“革命需要”所代替。

我国历史最可悲的地方，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很多情况下被迫采取的革命激进主义，往往只是诉诸暴力。应当强调指出，这常常是必要的。可是诉诸暴力的做法终究使暴力不知不觉地成了一种常规，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一种合法的行为。甚至连列宁也不免（在许多场合）要求采取恐怖手段。1918年6月20日，俄国共产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出版和宣传鼓动事务人民委员弗·沃洛达尔斯基（莫·马·戈尔德施泰因）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一个星期之后，列宁给彼得格勒的季诺维也夫、拉舍维奇和其他俄共（布）中央委员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才听说，彼得格勒工人想用群众性的恐怖手段来回答沃洛达尔斯基被害事件，而你们（不是您个人，而是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或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却加以阻拦。

我坚决抗议！

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我们甚至在苏维埃的决议中也威胁要采用群众性的恐怖手段，而事到临头，我们却压制群众的完全正确的革命主动性。

这样做不——行！

恐怖分子会把我们看作胆小鬼。现在正是极端军事时期。必须支持那种为了对付反革命分子而采取恐怖手段的群众性的热情，彼得格勒尤其如此，它的榜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敬礼

列 宁[65]

列宁认为只有在情况危急的"极端军事时期"才能采用的手段，后来却被当作了"革命的常规"。即使在革命成果已经得到巩固之后，恐怖手段也未被送进历史博物馆。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对自己的人民滥施镇压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尼古拉一世

在俄国，民主传统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但警察传统却颇受偏爱。尽管斯大林所建立的东西当然不能与专制制度的"浅薄无知"相提并论，但毕竟……人们常说：法庭和法律是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所必需的。但我认为，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并不像那些没有权利又遭受不幸的人更需要法律。俄国秘密警察的传统大概要追溯到1826年，在这一

年，尼古拉一世建立了皇帝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当时的执行机关是宪兵独立团，该团团长主管第三厅的工作。从那时起，政治书报检查机关便闻名于世了。尽管有了政治书报检查机关，但绝大部分来自国外的书籍还是畅行无阻地到了读者手中。1845年的关于国事罪和破坏管理秩序罪特别法典为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奠定了法律基础。在第267条和第274条中特别谈到：

> 凡犯有以极力(企图。——本书作者注)否定和怀疑最高当局之无上权力、或粗暴指责法律所确定之管理形式和王位继承制为内容(尽管并没有直接和公开策动反对最高当局的暴乱)，编写和传播手抄本或印刷品、发表公开演说等罪行的人，要受到褫夺一切公权并放逐到工厂服4—6年苦役的处罚……[66]

作一番比较是颇有意思的：81年后，即列宁逝世以后，在192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写道：

> 凡进行以煽动他人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为内容的宣传鼓动……以及传播、编写或藏匿有上述内容的书籍者，要剥夺自由并严加隔离，期限不少于6个月[67]。

除了尼古拉一世时期还没有的“宣传”、“鼓动”的用语以及“不少于6个月”这种相当含糊不清的词句外，思想几乎是一样的。

专制政权很重视军队和警察的作用。尽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惩办机关的人数并不多。例如在1895年，警察司有161人，宪兵团有大约1万人，还有几万名警察。但当局赋予警察，特别是政治警察的权力却非常大。警察司头目(1902—1905年)洛普欣曾经写道：“俄国居民要服从政治警官的个人裁决。常常根据警官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定罪。”[68]专制政权广泛采用流放和服苦役的方法对付那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例如，临近20世纪时，在西伯利亚约有30万名各种类别的流放者，还有11000名判处服苦役的犯人[69]。不错，只有5%至10%的流放者和苦役犯是“政治犯”。相当大一部分流放者——有时达到一半——不在流放地，即由于制度不严而跑掉了。

当时的警察制度并非铁板一块：比如说，出国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要写一份申请书给省长，再花上一笔数目不大的手续费，就能到国外去。例如，在1900年，去国外呆过几个月的俄国人约有20万之多。因此，那些推翻沙皇制度的主要人物能够身居国外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熟知警察司的弱点，于是，在建立（革命以后）新的安全体系时，这些人便主张制定更加严格的规章制度，来判定每一个具体的人是否忠实于苏维埃国家。

可见，已经取得政权的革命政党，由于民主传统太差，不能阻止官僚制度的迅速发展，同时又有从它所推翻的沙皇专制制度那里“承袭”下来的警察经验。所以，十月革命后不久便开始对新制度的反对者普遍实行那种超出革命法纪范围的镇压措施，这是并不奇怪的。这种状况对于布尔什维克曾经为之顽强奋斗的自由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危险。一条通向未来专制君主之路正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开辟。

在加里宁的书信中有一份1922年3月9日政治局会议第110号记录摘要。温什利赫特在会上向政治局报告了同抢劫活动作斗争的问题。政治局在听取了他的汇报之后决定：“采纳温什利赫特的如下建议：

授权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惩办**（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1) 被揭发出来的武装抢劫分子以及被抓获的携带武器的刑事犯和惯犯；(2) 将从事秘密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并把他们监禁在那里……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70]

不经审判就加以惩办……这种情况愈来愈多。请再看这样一份文件：

莫斯科，卢比扬卡街2号

第243511号

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叶努基泽同志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请求**不经审理**（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判决以下两案：

1.巴宾案件，此人就是“扎里斯特”右派集团中的孟什维克分子鲁宾，根据刑法第62条定罪。

2.阿布里科索娃等56人案件，这是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组织，根据刑法第61、66和68条定罪。

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行动处副处长安德列耶夫同志将就这两个案件写出个人报告。

雅哥达

杰里巴斯

1924年4月5日

文件下面有一段附言：“检察长卡兰扬对第二个案件有不同意见。**雅哥达**。”[19]当时还可以有不同意见……

那种在革命和国内战争环境下还能解释得通的非常措施，即不经审判就加以镇压，在和平条件下并未完全废除，虽然列宁作了一切努力，可他死后这种措施几乎成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本质特征。单凭对新制度的态度就足以指控为“敌对行为”。这是官僚制度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最先掌握的一条要领。在安全机关的一代代新的工作人员眼里，实际上，每一个苏联公民都逐渐成了新制度的潜在的敌人。这种看法不断地带来各种后果。这些后果很少见诸报刊，但在任何一个城镇、工厂、高等院校、人民委员部中，当人们得知又一个“反苏维埃分子的巢穴”被揭露出来时，不知为什么，他们内心就感到更加压抑，彼此不再往来，对周围的人心怀疑忌，并且随时准备拥护领导的新的“指示”和“路线”。遭受惩罚的潜在危险（往往是现实危险）不断在精神上折磨着人们。

斯大林收到过许多有关人们的政治情绪、监视可疑分子和揭露新的反苏维埃集团的报告。例如，下面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摆到斯大林桌子上的一份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的摘录，报告的题目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反苏维埃集团》。

(1)莫斯科发生的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工程技术人员反苏维埃集团案，集团成员有：捷列姆别茨基、比留科夫、巴边科夫（后面还有许多姓名。——本书作者注）。他们正在实现他们的反苏维

埃的主张。这个集团确定的任务是:在希特勒军队逼近莫斯科时举行暴动。此案正由特别会议审理。

(2)莫斯科大专院校学生反苏维埃集团(五个人),其成员有:梅德韦茨基——化学工程学院学生;威廉斯——科学院院士威廉斯之子,莫斯科大学学生;大学生加斯捷夫——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分子阿·卡·加斯捷夫之子;还有一人也是莫斯科大学学生,他的母亲和哥哥已被镇压……他们在散布反苏维埃言论。从这个集团的成员那里没收了一些有反苏维埃内容的诗……

(4)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旧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中学反苏维埃集团,成员有:科夫达,原该校学生,到过敌占区;杜赫诺,九年级学生;博格瓦,九年级学生。他们成立了一个什么"为正义而斗争"小组。他们得到了具有反苏维埃情绪的教师雅科维奇和亚罗夫的支持。调查工作仍在继续……[72]

后面还列举了几十个类似的"反苏维埃集团"。如果连这些由于精神上无忧无虑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激情尚未泯灭的15—16岁的中学生也被视为对制度的威胁,那么其他"集团"就更不用说了……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不伤害人是不行的。

许多似乎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都被交给各主管部门处理,我再说一遍,当时对斯大林来说,这些部门比党还重要。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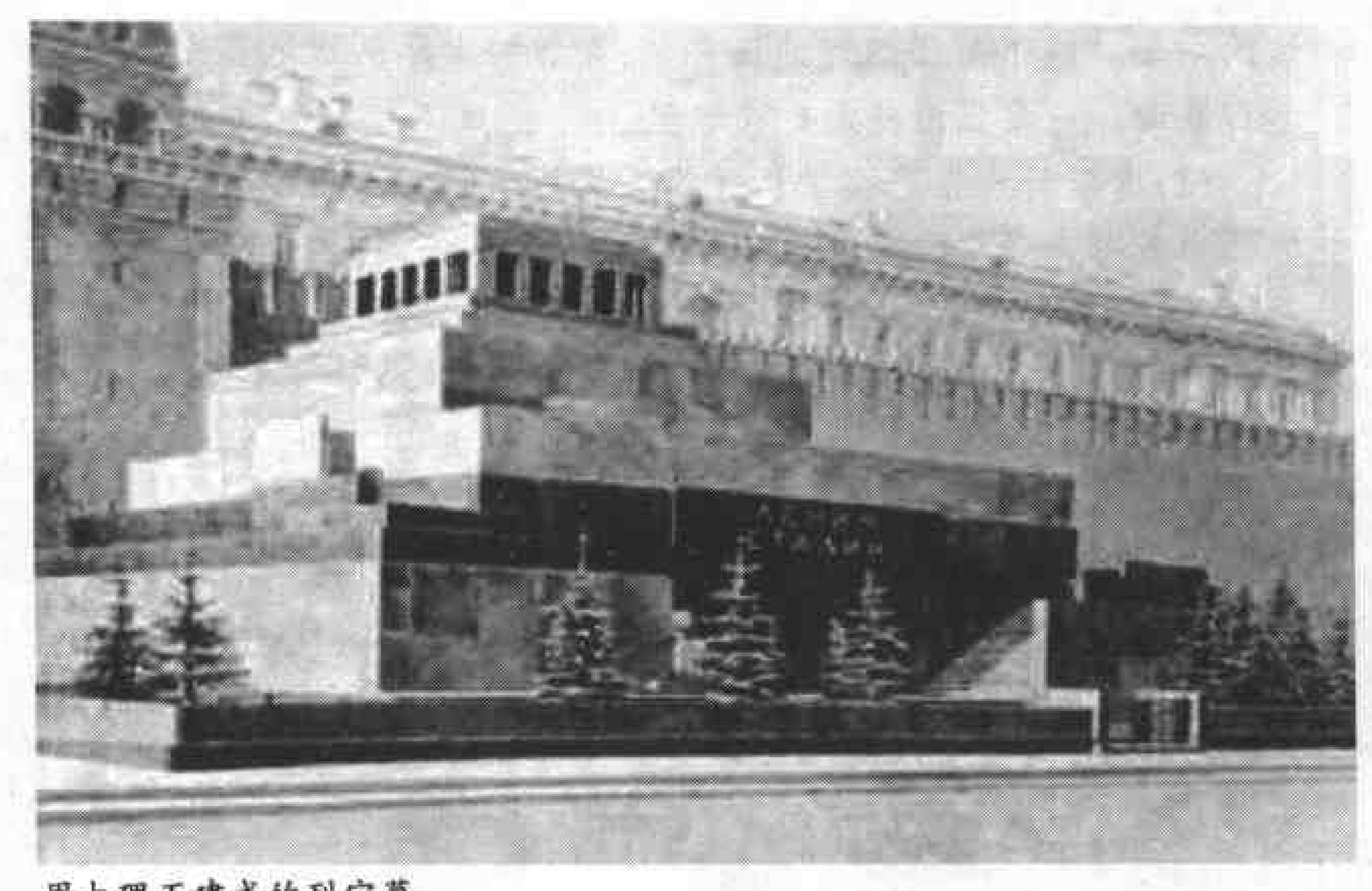
列宁陵墓向瞻仰者开放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谨呈请您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自1945年9月16日星期日起开放列宁陵墓的决定草案。

拉·贝利亚

B·梅尔库洛夫[73]

1945年9月8日

从秋明运回的列宁遗体(战争时期列宁遗体曾放在那里)已由一些"机构"作好了往陵墓里安放的准备。官僚制度决定了悼念列宁一事要由贝利亚主管的部门"操办"。而这个部门的分内任务(这些任务常


用大理石建成的列宁墓

常“超额完成”)并未因此减少。例如: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拉·巴·贝利亚同志

内务部就1946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关于保证国家粮食不受损失的措施的第163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报告如下,执行结果:1946年12月有13559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一个月之内!——本书作者注),1947年1月有992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C·克鲁格洛夫[23]

当斯大林认为情报并不重要时,他就会在文件的上角随便地划上一个“勾”,要么写上一个拉丁字母“V”……然而,既然“敬爱的领袖”想详细地知道自己的人民的一切情况,克鲁格洛夫(他不愧是贝利亚的门徒)便给斯大林送来各种各样的报告——从“反苏维埃集团”的活动到神圣显灵:

"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今年8月初的报告,在利沃夫州俄罗斯拉瓦地区的居民中流传着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个云游的女修道士看到了'圣母'显灵。据说就像一朵云彩飘然而降,接着便消失了,可是地上留下了血迹……"[25]对于毕业于中等宗教学校却又信仰无神论的"领袖"来说,这个报告自然无关紧要,于是他在报告上划了个"勾"。这种消息毫无价值……

国家官僚制度经常把数百万人关在铁丝网内,并把他们变成新社会的"创造"力量。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提倡并一贯坚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量广泛地利用犯人的劳动。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具有原则意义的事情。"领袖"曾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是内务部建设一些非常重大的工业工程和道路工程。就连建造原子武器也主要由这个部来承担。完成工作的期限常常定得很紧,在今天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而当时这些任务往往都按期完成了。因为执行者心里清楚:他们是一群人质。我举一个例子。

在斯大林于1945年7月下令加速制造原子弹以后,曾采取过一些紧急措施。以后又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项:

致马加丹 远东建设总局局长

尼基绍夫同志

1945年10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责成您组织勘探铀矿的工作。这件事情极其重要。

务必采取一切措施大力寻找铀矿原料,**今年内**(黑体是我用的。——本书是作者注)就要组织开采矿石并生产出浓缩铀……请每两周报告一次为完成任务所采取的措施……

拉·贝利亚[26]

我已经提到过,实际上,当时各个部都纷纷向内务部要劳动力,有的要几千人,有的要几万人。犯人不仅为建设道路和桥梁、采煤、提供木材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开采铀矿、建造原子反应堆、高楼大厦和大型水电站作出了贡献。1952年我曾有幸随共青团工作者小组到过古比雪夫水电站工地,当时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掉。工程的规模令人吃惊。从坝顶上往下看,到处都有几百名穿着灰色工作服和白桦皮靴的人在

来来往往、穿梭不停地忙碌着。当我们从其中一拨儿人旁边走过时，一个瘦高个小伙子直起身来，用不太高的、但又能听得清的声音对我们说道：

“请告诉外面的人们，我们是怎样在斯大林时代的伟大工程中劳动的！”

我们彼此对看了一眼，但是当看到旁边站着几个哨兵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老实说，犯人的高雅谈吐令我吃惊。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曾看过一本用软封面装订的书——《斯大林时代的伟大工程》[77]。这本书是由科学院院士托普奇耶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文特尔、奥勃鲁切夫、涅姆钦诺夫、沙罗夫及其他一些科学家合写的，劳改营的图书馆里一定也有这本书。然而，对的总是对的：许多许多工程，甚至大部分“伟大的斯大林工程”都是由犯人建造的。我认为，极权社会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可耻的。

我再援引一份文件：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拉·巴·贝利亚同志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根据1949年7月30日部长会议的决定，苏联内务部承担了设计和建造伏尔加河古比雪夫水电站的工作，并于1955年完工。目前工程正按计划进行……

根据1950年8月16日部长会议的决定，苏联内务部还承担了设计和建造斯大林格勒水电站和向里海沿岸低洼地区北部输水干渠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

C·克鲁格洛夫[78]

1951年2月2日

斯大林喜欢这种报告，并作了简短的答复：“请定期报告工程进展情况。”

官僚制度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毛孔，也渗透到了创作领域。连贝

利亚和克鲁格洛夫主管的部门也搞了几次创作征选活动。但这里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进行的。官僚主义的指定机构已经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不过，首先要向"领袖"报告。



为纪念斯大林建造的雕像

致斯大林同志

部长会议已责成内务部内部征选伏尔加-顿河水道建筑方案（建筑装饰）。应邀参加征选的建筑行家有：波利亚科夫、杜什金、福明、普里马克（内务部国家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

结果，波利亚科夫同志（第6建筑室）的方案被评为最佳方案，并被作为基础方案。在此基础上，内务部国家水利工程建筑设计院根据评审委员会的意见拟定出了新的方案。在伏尔加-顿河运河入口处矗立在伏尔加河高高的河岸上的塑像，将体现出斯大林同志的极其伟大的作用。为此，我们打算再搞一次内部征选塑像设计方案的活动。

请求您予以同意。

苏联内务部部长 **C·克鲁格洛夫**

内务部国家水利工程

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列·波利亚科夫**[⑩]

1951年3月20日

对于再一次为自己塑造永久性纪念像，斯大林要经过慎重考虑才会同意，因为他要下令为此调拨几十吨有色金属。

……我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的伊尔别伊斯科耶区的阿古尔村长大的。远处是白雪皑皑的萨彦岭,绵亘起伏的山脉一直延伸到叶尼塞河和坎河河畔,延伸到阿古尔村边。到处都是十分茂密的原始森林。这里曾经是古老信徒派教徒、即老西伯利亚人居住的地方,他们是在一个半到两个世纪以前从俄国西部省份迁徙到这里来的。1937年,或许是1938年,我们这个偏僻的阿古尔村陆续来了许多军人!随后便是一队又一队的犯人。原始森林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一些地方逐渐成了"禁区"。在半年时间里,不仅在阿古尔,而且在原始森林中的其他村庄——凯斯、蓬切特、下萨哈尔、上萨哈尔、索洛马特克……都出现了劳改营。铁网高墙内,简易棚、岗楼和警犬依稀可见。居民们很快便发现:那些疲惫不堪的人总是一队接着一队不断地向这里走来(这里距铁路100多公里),好像劳改营是橡皮做的……后来人们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村外到处都是长长的壕沟,而且越来越多,夜里常有人用平板大车或雪橇拉来一些盖着帆布的尸体扔到沟里。许多人是在劳改营里受折磨而死的。森林里常常枪毙人。当时住在阿古尔的鲍里斯·弗兰采维奇·克列休克(他的当铁匠的父亲和他的哥哥都被枪毙了)讲过:他曾同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去"采松球"(采松子),突然,不远处响起啪啪的枪声,"就像有人在撕一块很大的粗麻布……"。我们向响枪的地方跑去,看到灌木丛后面有几个背枪的人正在把被打死的"囚犯"往坑里拖,被打死的大约有20人……我们急忙从那里跑开了……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人用手死死地抓住地上的枯草,看起来,他当时还没被打死……

母亲曾是一所七年制学校的校长。我已经讲过,经领导允许,有两名犯人常到母亲这里来整理图书:粘粘书皮,搞搞装订。我们一家人生活很困难,自从父亲被抓走并被枪毙、我们被放逐到这里以后,生活尤为困难。由于我们住在滨海边疆区,往东已无处可放逐了(难道能放逐到日本吗?),我们便被送到西面,送到这个阿古尔村。学校里没有老师,于是就让革命后大学毕业的母亲来当老师。就这样,当附近没人时,母亲有时便同一名犯人(他的姓名我不记得了,当时我才10岁)交谈,每次都谈很久。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弄清其中的奥秘。一次,这个"囚犯"从棉囚服怀里掏出一个

破布包,并急忙把它打开让母亲看。当时我就在不远处一所用来作图书馆的又矮又长的房子里。出于好奇,我踮起脚从母亲背后向"囚犯"手里张望。他拿着一张不大的、嵌在厚纸板上的照片(以前的照片都是这样的),照片下面有人名缩写的花体字母和外文。这个不幸的人小声地对母亲说:

"当时我们侨居国外。在瑞士。这个坐着的人是列宁,旁边是我和妻子,这两人是德国共产党员。"

我不禁怀疑地看了一眼这个蓬头垢面、瘦骨嶙峋、有着一双充满忧郁的大眼睛的男人:这个人竟然认识列宁?!他一面小心地把照片包在破布里,一面又向母亲解释着什么。后来,这个已解除看管的人又被准许到学校来过两三次。以后就再无音讯了。也许是死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也许像那些人一样,在树林里……

这些童年的印象永久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每当我读着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的那几行诗句,就觉得这是对我的家庭的命运的写照。然而不仅仅是我的家庭,不是的。这是对经受过斯大林那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之害的许许多多人的命运的写照:

当我传唤对已往事物的记忆,
出庭于那馨香的默想的公堂,
我不禁为命中许多缺陷叹息,
带着旧恨,重新哭蹉跎的时光;
…………
于是我为过去的惆怅而惆怅,
并且一一细算,从痛苦到痛苦,
那许多呜咽过的呜咽的旧账,
仿佛还未付过,现在又来付偿见[30]

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便去世了,她还很年轻,还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妹妹、弟弟和我。我们把母亲安葬在离关押犯人的地方不远的一个乡村墓地里。当时只能把墓坑填平,不能高出地面。这些荒野里的无名墓坑是那场骇人听闻的民族悲剧的见证。这些墓坑虽

然沉默无言，但我们至今似乎仍可听到来自地下的呼声……我想，在设有这些劳改营的地方，能活下来的人肯定不多。我们家除了父亲以外，还有两个叔叔（都是普通农民）由于一时不慎而公开说了些当时许多人想说的话，也被送进了劳改营，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有的人现在看了我写的这些东西后会幸灾乐祸地说："满腹怨气的孩子"，"出身于被镇压的家庭"，"公开的报复"。不是，决不是。斯大林死的时候，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尉坦克手。当时我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其实，当我的亲人被抓走时，我还什么都不懂。而且后来也从未把这个不幸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别人告诉我们："父亲已经死了。"母亲时常偷偷地流泪。然而，只是在1952年7月，我才第一次感到什么是"有了记号"。军校食堂里丰盛的毕业午餐结束后，身着吱吱作响的武装带和金色肩章的新任命的尉官们纷纷把自己简单的行装收拾进钢制手提箱，我们将要永远分手，奔赴指定的部队。在同朋友们告别前，我们排的一位同学走到我面前，把我拉到一旁，说道：

"你要发誓，永远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当然，"我惊奇而又不解地看着这位同学的脸。

"三年来我一直在'监视'你，并不断把你说过的话向上报告，总之，我一直在盯你的梢……请原谅，我不能不这样做。"

"你说了些什么呀？"我仍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两眼盯着他问道。

"既然你已从学校毕了业，而且又成绩优异，就说明没有什么不好的……好了，祝你一切顺利……请别记恨我。你要知道，人家还会……"对方看了一下我的眼睛。

我没有指名道姓，只是因为他现在也许仍在某个地方工作，而我又曾向他保证……

看来，我过多地离开了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的思考。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说明一点：对历史发泄旧恨是毫无意义的。同样，嘲笑历史也是毫无意义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是改变不了的。但应该了解和记住历史。比如说，我父亲才37岁就死了……

克里姆林宫的人是否知道在阿古尔、索洛马特克、凯斯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呢？他们知道。知道得非常清楚。在贝利亚的档案材料中，保存有大量的申诉信：有的反映个人的痛苦经历或请求给予帮助，有的要求弄清、过问和公正评判某个人的"案件"。下

面就是寄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的许多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大概是由一位善良的人从劳改营带出来然后寄出的。“从那个地方”给“领袖”寄这种信往往很少寄到。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 我要谈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第283号劳改营第14号劳改分队和第26号矿井的情况。犯人的处境令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倒像是天堂了。从前的战士和游击队员同旧警察和德国走狗关在一起。谁也不知道将被关押多久，倒不如被枪毙了好。拷打犯人是常事。我们穿的是长满虱子的破衣烂衫。伙食极差。饭里常可发现死耗子。卷心菜是用马拉脱粒机加工的，因此里面常有马粪。押解人员经常毒打犯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从那些凶狠的人中挑选出来的……
>
> 这封信中所说的没有半句谎话。但要是署名的话，就会立刻被送去服苦役……[68]

斯大林把这封信转给了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在信上作了批语：“转贝利亚同志和切尔内绍夫同志。”而贝利亚只是在上面签了个名。这一切已经说明了问题。还没有人知道怎样做更难一些：是勇敢地去战斗还是长久地受折磨？苏联人的非凡的忍耐力令人吃惊。也许黑格尔的论断是对的，他说：“可悲的消极性……使人对自己的苦难逆来顺受而不会以全力同这种苦难抗争。”[69]当斯大林和他手下的人杀害几百万人的时候，人们却顺从地任其摆布，这种奇特的现象使人触目惊心。一些无辜的人在别人的逼迫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有罪，或者至少相信：“这是一些具体人的过错，但不是斯大林的过错。”

斯大林式的官僚制度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没有法律可言。不，各种法律、法令、指示还是不少的。只不过有许多法律是不合法的。要严厉追究的往往是社会上那些普通人（而且不仅仅是普通人）的责任。而对于他们的权利……在研究档案文件时，我为人们对斯大林式的官僚制度的违法行径所作的颂扬感到震惊。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家金字塔的上层偶尔也有人企图进行软弱无力的反抗。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莫洛托夫的个人档案中有一份引人注意的文件。该文件是苏联司法部部长雷奇科夫在1947年5月呈报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的。文件中说道：

> 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以及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和总检察长的命令(1940年3月20日第058号令)，凡曾涉嫌反革命案件又被**宣告无罪**的人不应立即释放，而要**返回监禁地**(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只有在接到内务部的同意释放的通知后方可获释。这一规定使那些已被决定释放的人又要在狱中待几个月。
>
> 比如，1946年4月5日，由于苏联总检察长的反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撤销了塔曼步兵师军事法庭关于指控女公民利特温年科犯有叛国罪并将其判处枪决的判决(滨海独立集团军法庭改判为劳改10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没有罪证为由终止了这一案子。1946年5月6日，这项裁决被送往关押那个女犯人的内务部西伯利亚劳改营。随后，文件被送往内务部第1专案局征求意见；该局又将文件转给了塔夫利达军区。案件一直拖了几个月……
>
> 这样的事不算少。这使法院的威信受到损害。我请求撤销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总检察长1940年3月20日的第058号令。
>
> 苏联司法部部长
>
> **H·雷奇科夫**[3]

斯大林对这份文件的反应无从得知。莫洛托夫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征求戈尔舍宁同志、克鲁格洛夫同志、阿巴库莫夫同志的意见。**维·莫洛托夫** 1947年5月17日。""被征求意见的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同意撤销那些荒唐的决定。然而，在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主义执法机构中，这样的事情是很少见的。官僚制度已逐渐地使人们习惯于相信当局的任何做法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真正的法如同法的意识一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全面的官僚制度得以存在的一个条件。斯大林和他扶持起来的制度使人们养成了忍耐、沉默和屈从的习惯。官僚制度不压制人的意志就不能实行统治。领袖的意志是"钢铁般的"，而其余所有人的意志则是软弱驯顺的。否则，人们就不会一直(尤其是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忍耐下去了。斯大林比别人更明白这一点。黑格尔曾这样写道："……勇气强于可悲的忍耐，因为即使它将被战胜，它也能



法捷耶夫(1901-1956)
前苏联作家

1901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接近布尔什维克,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曾出席过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1927年起开始专门从事文学运动,担任"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苏作协领导工作,1956年自杀。其主要作品:早期有中篇小说《泛滥》、《逆流》和长篇小说《毁灭》,都是他亲自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1941年卫国战争时期,任《真理报》和新闻通讯社记者,1944年出版特写集《封锁时期的列宁格勒》,1945年创作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堪称为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二战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49年10月曾率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并发表随笔《在自由中国》。

预见到这种可能性……"[⑱]是的,这位德国哲学家并不知道什么是劳改营管理总局。就是在俄国,在最可怕的恶梦中,也从未有人能想象得出这个人间地狱。要知道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在30年的时间里所杀害的人要比罗曼诺夫王朝300年历史上的所有俄国沙皇所杀害的人多许多倍。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信暴力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他不懂得保尔·瓦莱里的至理名言:"暴力的弱点在于只迷信暴力。"他不知道刀把子绝非总比笔杆子强。从历史上看,"涌泻"于笔端的令人信服的正确思想曾不止一次地使利刃失去寒光。然而斯大林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人们当时不太考虑这些。甚至有许多人不曾想过、也不曾知道藏在全面的官僚制度帷幕后面的一切可怕的情景。也许,当法捷耶夫在斯大林死后不几天发表长篇文章《斯大林的人道主义》时,他同样一无所知。法捷耶夫笔下的那些话只能是奴隶们受到震慑或是我们的心灵的盲目无知的产物。但当时说过这种话的人也许成千上万。这些话在今天听来给人一种受到莫大侮辱的感觉。这位天才作家的意识也被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所束缚,他写道,我们可以认为斯大林是"世界上有过的那些人道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法捷耶夫肯定地说:"他是一个伟大而又普通的人,他的名字表明他是一个内心刚强不屈的人。这位人类的良师和各族人民的父亲已经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但他的事业不可战胜,永世长存。"法捷耶夫于1956年5月自杀身亡,大概是他的良心和一种幡然醒悟、追悔莫及的痛苦使他感到难以忍受?

在历史上,整个民族遭受蒙蔽的事情屡见

不鲜。十字军远征、宗教战争、民族主义的狂虐以及对专制君主的狂热的信仰——这一切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这也是由于人们的头脑一时糊涂。然而，一时的糊涂是不会长久的。当人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专制君主便会死亡。尽管这个过程常常是十分缓慢的。

斯大林肉体上的死亡比他自己所期望的来得要早。在这一点上他同大多数人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他在政治上的死亡来得实在是太迟了。斯大林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而历史性的死亡也许终究也不会来临。人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同他的名字有关的一切。

人间上帝必有死

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半逐渐改变了自己多年以前形成的生活制度。耄耋之年、充满斗争和震荡的年代、非凡的荣誉和回忆（正是回忆！）愈来愈重地压在"领袖"肩上。现在，斯大林在上午11点（像往常一样）起床后，常常不去克里姆林宫，而是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到自己的住处，他叼着凉冰冰的烟斗，走到窗前，久久地望着黑压压的树林边缘上那寒冷的铅灰色天空，望着林园里光秃秃的树及其上空盘旋的一群乌鸦。有一次他突然想到，尼古拉二世在散步时有一个打乌鸦的爱好。斯大林记得《红色文献》杂志曾刊登过俄国这最后一个沙皇的日记片断，他想读读这些日记。

第二天，贝利亚（全部国家档案都由内务部掌管）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起带到办公室数十本羊皮封面的笔记本。斯大林用格鲁吉亚语同贝利亚谈了几句什么，就让他们走了。他慢慢地翻阅起来，有几次全神贯注地埋头阅读。令斯大林吃惊的是：在50本厚厚的笔记本里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看来，专制独裁者重视记事的连贯性（36年中没有中断过一天！）甚于记事的内容。天气、谈话、台球、阅读、命名日、接见、同阿利克斯的关系、狩猎……关于狩猎，大概比其他事情写得都多。一本注明日期为1895年的笔记本总结了沙皇的狩猎成绩："我在全部时间里打死3头欧洲野牛、28只鹿、3只山羊、8头野猪、3只狐狸=45。"[⑩]沙皇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821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贫民医院医生的家庭里。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不久就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846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穷人》。《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玛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喜欢用枪射杀："散步时打了一只乌鸦"(1904年11月8日)。皇帝用乌鸦"练习打靶"，打得很准。斯大林翻阅着笔记本，已经几乎没有兴趣了——内容千篇一律。斯大林想道，俄国跟着这些沙皇可真是不走运，也许他们射击的方向不对。

关于他斯大林，人们在他死后会说些什么呢？人们喜欢审查已经熄灭的生命，殊不知消逝的时间是不能改变的。难道有人敢在他身上寻找什么虚假的、错误的东西？不，这是不可能的。过去，"俄国处在黑暗中"，现在成了一个强大的战胜国。一切都整顿得很好。再有一二次神奇的飞跃，国家就能迫使所有的人接受自己的制度……

波斯克列贝舍夫不止一次看到"主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餐厅的窗前或是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脸朝着林园。领袖明白，尽管他是伟大的，但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必有一死，这时他在想什么呢？

斯大林取得了对人们的绝对支配权。有时他感到自己的统治权是无限的。如果他通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就会想起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大宗教裁判官"一章。

天才的俄国作家在大判官的内心独白中表达了思想、自由和独裁者即上帝在尘世的全权代理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关系和辩证法。我知道，在此作某种直接类比是冒险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能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独裁者践踏了"自由"，也就可能玷污伟大的思想。

作家沉思着，由于思想，千百万人将"把我们奉若神明，因为我们领导着他们，同意照看自由和统治他们——对他们来说，最后成为自

由人该是多么可怕啊！……因为这些可怜的生灵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找到自己或其他人可以崇拜的东西，而且是要找到使大家，并且一定要**使大家一起**都相信、都崇拜的东西。这种共同崇拜的要求，自古以来都是每个个人的和全人类的最大痛苦……我告诉你，人的焦心之苦，莫过于找到一个人，以便把这不幸的生灵生来就具有的自由天赋尽快托付给他”。

我不敢担保斯大林曾读过这些话。但是，我想，他知道，他能够用思想代替上帝，而且大家也都相信这种思想。在那追求思想许诺的快乐、幸福、喜悦的历史热潮中，为之进行街垒战的自由不知何故很快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人们认为他就是那个可以托付“自由天赋”的人。他可真知道如何支配自由。我斗胆接着引用大判官的独白：

我们将赐给人们“安详宁静的幸福，那种生来软弱无力的生灵的幸福……他们会变得胆怯，会恐惧地望着我们和紧偎着我们，像小鸡偎着母鸡一样……是的，我们要迫使他们工作，但在闲暇时间里，我们要给他们安排儿童游戏般的生活：要让他们唱儿歌、搞合唱、天真烂漫地跳舞。哦，我们也允许他们犯罪，他们软弱无力，他们会像小孩一样爱我们，因为我们允许他们犯罪。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切罪过，如果是得到我们的允许而犯的，都可以赎……那样，他们就不会对我们保守任何秘密……”[⑱]

大判官的这大段独白与喜欢在自己暮年思考过去生活的苏联独裁者的想法也许相同。但是，他未必会赞同塞涅卡的格言：“人死后将一无所有。”这位古代思想家断言：“人死后将一无所有，而且死本身就是微不足道的。你会问，我们死后会在何处？在那未出生者安息的地方。”

怎么会这样：“人死后将一无所有？”而他那不朽的荣誉、事业、伟大成就？！斯大林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他想起一句拉丁语：“Vitál lámpada trádunt”——“是在传递生活的光源”，不是给个别人，而是给整个时期、时代以致永恒……

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斯大林常常在遐想时喃喃自语地或默默地诵读宗教经文，像隐喻、成语、圣经格言一样引用。我想，晚年他可能在思想中把自己的一生同圣经说的作过对比。要全部记起是很困难的，但传道书中说得大概不错：“……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

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空虚。……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的确，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他的战友们将互相厮打呢，还是他们全都被他的带夹鼻眼镜的助手吞没？这需要认真考虑。但是何必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这样悲观？难道他不是从以老寿星闻名的高加索山上下来的吗？他的所有对手早都化成灰烬了，而他依然站在权力的最高峰……要少听这些医生的，更多地信赖民间医学。

独裁者凝视着冬天那光秃秃的白桦树冠，如果他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就会重复伟大作家的话，给自己提出一个"理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回答不仅要合理、清楚，而且要恰如其分，也就是说，要使我真诚相信它，像必然相信永恒的存在一样必然相信它。"托尔斯泰谴责说，有些人把自己的个人幸福看作生活的意义，于是"他的生活和活动都只是为了他一个人幸福，而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生物也都只是为了他一个人美好而生活和活动……"[⑩]。如果这些话是针对斯大林而言，他一定会愤怒：难道他想要实现什么只是为了自己？难道人民不知道他在生活上是多么俭朴，不知道他曾如何无情地把一个想从战败的德国带回一些额外东西的著名歌唱家及其当将军的丈夫发落到科雷马了吗？难道人民不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大家的幸福吗？

独裁者早已不能不哪怕是小声地、哪怕是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只有一种永恒的、永无止境的、贪婪的爱。不，不是对死去的妻子们，不是对那几个他与之秘密同居的女人们，不是对他如此长久而仔细地校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对他使之流了那么多血的人民，都不是。这30年来，他爱的只是权力。难道这种奇异的权力，这种他大笔一挥或是轻松地挥动一下枯瘦的胳臂就可以显示出来的权力，不是用来造福于人民吗？无耻地大肆吹捧早已使"领袖"确信，他的智慧和铁腕使人们得到幸福。难道不是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关于改善人民的"物质福利"、加强国家实力的思想吗？例如，昨天他就收到了关于开始实现他的又一个思想的报告：

呈约·维·斯大林同志

鉴于您，斯大林同志，关心水电站设计工作情况，苏联内务部现将所做的工作汇报如下。为了执行您的指示，对乌拉尔河的乌拉尔斯克至契卡洛夫段（全长500公里）进行了广泛的水文、地形、地质勘察。审查了关于水电站和大坝在戈里岑镇和克拉斯内亚尔镇地区的两种布局方案。预定年发电量为3.9亿度。水库容积为77亿至110亿立方米。最后设计方案将于1953年4月1日完成。

苏联内务部长　C·克鲁格洛夫
1952年12月11日[⑧]

他当然不知道，1953年4月他将已不在人世，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大林计划将不能实现。但是按他的意志修建的众多的人工海沿岸将完全电气化这种思想难道不好吗？诚然，他有一次想到，这无数的人工海会淹没大片平坦的地区，淹没其最好的农业用地，把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浸泡在深水中……但是他丢开了这种不由产生的念头。

这些早晨的时光常常把斯大林带到某个昏暗的久远年代，带到本世纪初。那是他记忆中的丰盛筵席。无声的模糊的黑白两色的回忆镜头使一些面孔从深渊中显露出来：他的胆小的卡托、严厉勤劳的母亲、邵武勉、加米涅夫，当他和加米涅夫1917年乘坐寒冷的列车从阿钦斯克前往彼得格勒时，后者曾把自己暖和的短毛袜送给他……这里和短袜有什么关系？他突然想起列宁第一次支持他的情景，想起这如何使他确立了自信。但是历史学家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哎哟，这是多么严重的罪过！谁竟敢隐瞒这个异常重要的事实？就连他在20年代的纷争中，在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作斗争时也没有利用这件事实。明天就责成贝利亚找到这些文件……应当在他的以


参加革命初期的斯大林

后即将出版的全集的各卷中再次提醒人们，是列宁自己选择了他，不是命运，不是机遇，而是革命领袖……

的确，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在历史上被忽视了。时值1917年12月。在种种严峻问题的压迫下，革命胜利后的欢快情绪逐渐消失。12月23日举行了人民委员会例行会议，会议由列宁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施略普尼柯夫、乌里茨基、维诺格拉多夫、普罗相、施利希特尔、明仁斯基、阿克雪里罗得、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特鲁托夫斯基、阿尔加索夫、德宾科、邦契-布鲁耶维奇、卡列林、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科兹明。会议像往常一样研究了许多问题：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草案、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停止支付息票、“琐碎事务委员会”、取消全国残废人事务委员会并将其全部事务转交“全俄残疾军人联合会”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关于给列宁3至5天休假、德宾科同志2天休假、普罗相同志1天休假以及关于列宁休假期间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代理人问题。”

决　定

准予休假。指定斯大林同志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为副主席。[⑧]

斯大林记得，他代替列宁召开了两次或三次人民委员会会议（当时，为了讨论无数的问题，政府几乎天天开会）。其间哥尔布诺夫提出准许报刊局记者采访人民委员会会议的问题，普罗相报告了同邮电部门的怠工作斗争的情况并建议实行“邮递员”劳动义务制；斯大林自己作了关于顿河流域情况和哥萨克群众发生动摇的报告；根据阿尔加索夫的请求批准了给参政院印刷所拨款的问题；斯维尔德洛夫好像也作了什么报告……[⑨]托洛茨基没有参加“斯大林的”会议。尽管这都是很早的事了……但是，列宁能无故让他代替自己吗？在领袖的眼皮底下有多少卓越的革命者啊！为什么他过去在自己的斗争中没有利用这个论据？去它的吧，论据。现在，胜利者需要它只是为了他的“历史传记”。

斯大林甚至很难假定列宁让他代替自己时并不认为这件事有特别意义。人民委员会成员中几乎没有少数民族边疆区的代表，这常使领袖感到不安；逃到南方的黑帮分子不断大喊大叫说列宁组织了一个

“犹太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赞同)让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临时代理主席是很自然的。而斯大林却认为权力机关所做的一切,除了显而易见的意义之外,还有着有利于他的隐晦的意义。

……斯大林听到有人进来,打断回忆,转过身去。但这不是波斯克列贝舍夫那习惯的身影。由于贝利亚的坚持,斯大林终于在1952年11月同意把波斯克列贝舍夫解职,就像稍后对弗拉西克一样。昨天贝利亚(他逐渐感到贝利亚越来越可疑了)谈了波斯克列贝舍夫一些情况,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可能同医生案件有牵连,因此需要对他进行审查”。让“他去审查”吧,就像不久前“审查”列宁格勒全体领导成员及其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提拔的干部”一样,就像“审查”有关洛佐夫斯基(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他十分了解。当时他主管苏联新闻局)领导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件一样,就像“审查”不久前发生的“医生下毒”案件一样。谢天谢地,他尽量不要这些医生的帮助。历史上有多少帝王、总统、领袖不知不觉地被御医送上了西天……谁敢说?主要的是不要信任这些人,大概贝利亚正在亲自处理他们。

这里再插一笔。我已经说过,斯大林在他死前不久,在贝利亚不断进谗言的情况下,同意了解除自己两个最忠实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的职务。“领袖”在生命的晚期不相信任何人。是的,一个人也不相信。他也不相信贝利亚,但是当贝利亚长期地、不断地给他灌输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的坏话后,他不能不听从。下面的文件证明了斯大林对贝利亚的不信任。

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中将是1952年12月16日被捕的。贝利亚亲自审问了他,参与审问的还有科布洛夫和弗洛济米尔斯基。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被指控“纵容下毒医生”,结识“间谍”施滕贝格,以及滥用职权(“使用公家财物”)。当然,主要不在于这一套公式化的指控。前中将1955年5月从流放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信中说道:

> 政府首脑(弗拉西克在信中这样称呼斯大林。——本书作者注)战后在南方时曾当着我的面表示对贝利亚很气愤,说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不称职……说他已发出指示,解除贝利亚的国家安全

部领导职务。他问我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工作如何，后来又问了戈格利泽和察纳夫的情况。我对他讲了我所知道的情况……我后来确信，我同政府首脑之间这次谈话，他们确实知道了，我就是因此而遭到惩罚的……

不难想象，贝利亚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对他的态度。但是，他怎样得知弗拉西克单独一人对"领袖"说的话呢？也许是斯大林自己告诉他的富歇的，也许是贝利亚对"主人"搞了窃听？！

弗拉西克在他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接着写道：在贝利亚提审他后，"我明白，等待我的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我再次确信他们欺骗了政府首脑……他们要求提供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证词，科布洛夫又提审我两次，弗洛济米尔斯基也在场。我拒绝了，说我没有任何有损波斯克列贝舍夫名声的材料，我只对他们说，政府首脑曾一度非常不满意我们机关的工作和贝利亚的领导，我举了政府首脑对我说的那些事实——关于工作中的过失，他对贝利亚的指责……因为我拒绝提供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证词，他们对我说——你将会死在监狱里……"

这里要补充一句，昨天的"同事"对弗拉西克采取了一整套取供"措施"。弗拉西克写道，对我进行了"不能容忍的侮辱"。"我当时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使我无法忍受。我的神经活动失常，出现全震荡，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和健全的思维……我甚至不能够阅读他们编造的我的口供，只是在喝斥和威胁下，带着刺骨的尖手铐，我被迫签署了这份对我来说是可怕的诬陷材料……这时他们才给我下了手铐，答应让我睡觉，而我从来没有睡过觉，因为在监狱里拷问是接连不断的……"[9]

这就是"宫廷"风尚。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没有一个人、绝对没有一个人能不受怀疑。贝利亚感到"领袖"对他态度冷淡，他预料事件随时都会出现转折。但是，斯大林在等候机会，思考着什么，表面上仍像以前一样。也许黎塞留说得对："善于掩饰是帝王的技能吧？"

还是让我们回到前面的叙述上来吧。

一位代替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新办事人员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包文件。替换波斯克列贝舍夫十分困难，斯大林已经三个月了还不能作出最后的选择：谁能成为像失宠的助手那样忠实的仆从呢？

斯大林朝桌子点了一下头，马林把一包文件放在桌子上，这些文


马林科夫

件都是“领袖”秘书处(根据他的指示秘书处现由马林科夫主管)准备的，斯大林没有回答问候，说道：

“让马林科夫给我打个电话。”

“立即照办，斯大林同志！”

两三分钟后听筒里响起了他的宠臣那诚惶诚恐的随时准备执行“主人”的任何意志的声音。

“晚上我要上大剧院……请严密检查一下。不要再送文件了，明天晚上，您、赫鲁晓夫、贝利亚，”斯大林停了一下，补充道，“还有布尔加宁，到我这里来。”

“好的，斯大林同志！我一定全面检查，文件我来处理，马上把您的指示转告上述同志……一切照办！”

斯大林没有听完马林科夫那连珠炮似的话，就挂上了听筒。突发性衰弱、轻微的眩晕尚未过去。虽然他从索契回来刚一个半月，但是并没有通常那种轻松愉快、容光焕发的感觉。斯大林看完文件，就研究起报纸、杂志、翻译的外国文章和书籍。晚上，斯大林在一打卫士的护送下前往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剧院经理(他就是警卫长)、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雷宾在包厢旁迎候他。斯大林在空荡荡的包厢(从前他有时往往叫上莫洛托夫或日丹诺夫)一角坐下，冷漠地看着舞台，他对这部剧的舞蹈艺术和音乐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了如指掌。没等最后一幕演完他就走了。不安的忧虑困扰着独裁者：日益加剧的衰弱使他担心。他不是神秘论者，但他一生多次看到过转瞬即逝的个人危险场面。斯大林感到，其中之一现在就伴随着他，而且看来是现实的。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起得比往常晚了一会儿，他感到慢慢恢复了正常，精神好起来了。他阅览了来自朝鲜的情况报道，以及对“下毒医生”沃夫西、埃廷格尔、Б·Б·科甘、М·Б·科甘、格林施泰因的审讯记录。散了一会儿步。晚上，按他的吩咐，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到了别墅。他们一起吃了晚饭，像往常一样讨论了(可以说是决定了)很多问题。布尔加宁详细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斯大林再

次确信，朝鲜的形势已是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在谈判中“争到底”，但最终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

贝利亚说的时间很长。他感到斯大林对他的态度在慢慢改变；比他更狡猾的“领袖”似乎开始怀疑自己这个刽子手不忠实。因此贝利亚今天十分卖力。

“柳明不容置辩地证明，这伙人（沃夫西、科甘、费尔德曼、格林施泰因、埃廷格尔、叶戈罗夫、瓦西连科、舍列舍夫斯基等）早就在暗暗地缩短高级领导人的寿命。日丹诺夫、季米特洛夫、谢尔巴科夫（受害者名单我们正在进一步弄清）都是这伙人害死的。例如，日丹诺夫的心电图被偷换……隐瞒他患有心肌梗塞，让他行走、工作，结果很快把他引上了绝路……而最主要的，这全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乔因特’的间谍活动。线索已伸向深处：涉及党和军队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被告已招认……”

斯大林想起“医生案件”其实是从维诺格拉多夫教授开始的。维诺格拉多夫在他1952年最后一次给斯大林出诊时，发现他的健康状况明显变坏，就建议他最大限度地放弃积极活动。斯大林大发雷霆。此后维诺格拉多夫便被禁止再给他出诊，而且不久就被捕了。国家安全部开始积极研究斯大林对医生的不满，有一个叫柳明的侦察员决定利用这个“案件”向上爬。事件发展很快。“机关”觉察到斯大林的愿望，就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具有公开反犹太主义性质的“医疗阴谋”案。要不是情况有变，一定会进行审判，一定会又有很多受害者，而且谁知道这件血案会搞到什么地步？只是由于暴君的突然死亡，这场新的悲剧才没有落到必然的斯大林式结局。

在那个最后的晚上斯大林曾两三次询问侦察进程。最后他又一次向最近过分殷勤的贝利亚问道：

“维诺格拉多夫的情况如何？”

“这个教授不仅不可靠，而且舌头长。他在自己的诊所对一位医生说，斯大林同志的高血压犯了好几次，每次都很危险……”

“好吧，”斯大林打断了他，“您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医生们都招认了吗？告诉伊格纳季耶夫：如果取不到医生的全部口供，我们就要砍下他的脑袋……”

“都招认了。在季马舒克和其他爱国者的帮助下，我们正在完成侦

察并将请您批准进行公审……"

"准备吧。"斯大林说道，然后就谈起别的事情。

几个人一直坐到3月1日凌晨4时。斯大林在夜间谈话快结束时动起怒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的不满。赫鲁晓夫也受到了责备。只是对布尔加宁他没说一句话。大家都在等着"主人"站起来，好各自回去。斯大林讲了很长时间，好像是说领导层中有人认为可以靠吃老本生活下去。他们想错了。斯大林的话是不祥的预兆。他的交谈者们不能不知道，在"领袖"的这种愤怒后面隐藏着某种新的意图。也许是：清除所有"老的"政治局委员，把自己的无数罪行推在他们身上。斯大林明白，命运不会给他很多时间了。但是，连他也不能知道，他这愤怒的长篇大论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沙漏计时器已经空了。从漏斗里掉下最后几粒沙子……斯大林打断了自己的思想，话未说完就冷淡地向大家点了一下头，回自己房间去了。大家一言不发地走出来，迅速各奔东西了。天还很黑。马林科夫同贝利亚乘坐一辆汽车。

雷宾在同我谈话时回忆说，3月1日中午"服务人员"开始不安起来。斯大林没有出来，也没有叫一个人。而没有他的传唤，不能进他的房间。人们越来越惶恐不安。但是，18时30分，雷宾接着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办公室里亮起了灯。大家松了一口气，等待着铃声。斯大林没有吃午饭，没有看报刊和文件。这一切都不同寻常，很奇怪。但是，时间在流逝，依然没有传唤，雷宾毫不掩盖他本人对斯大林的同情地说。已经20时了，接着21时、22时，斯大林的房间里寂静无声。人们的不安达到了极点。助手和警卫人员中开始争论起来：应当到领袖房间看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值班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图科夫和餐厅服务员布图索娃开始商量由谁去。23时斯塔罗斯京拿着邮件去了，如果"主人"对违反既定制度表示不满，就以此作借口。

斯塔罗斯京穿过几个房间，顺手把灯都打开，当他打开小餐厅的灯时，一下跳到一旁，他看到斯大林穿着睡裤和衬衣躺在地板上。斯大林勉强抬起手，把斯塔罗斯京招到跟前，但一句话也不能说。眼里流露出恐惧、害怕和哀求的神情。地板上摆着一张《真理报》，桌上放着打开的一瓶"波尔若米矿泉水"。看来，斯大林在此已躺了很久，因为餐厅的灯没有开。随着斯塔罗斯京的喊叫，受到震惊的仆从们都跑进来了。他

们把斯大林抬到沙发上。他好几次想说什么,但是只能发出某些不清楚的声音。脑溢血不仅使他丧失了说话能力,而且后来也使他失去知觉。也许斯大林这时想起了列宁的悲剧?列宁曾患了很长时间的可怕的哑症。

据雷宾讲,警卫和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伊格纳季耶夫,他建议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打电话。可是哪里都找不到贝利亚。而没有贝利亚,马林科夫不敢采取任何措施。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在危急时刻却因为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而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救护。"领袖"成了自己制定的制度的人质。正像后来弄清的那样,没有贝利亚的同意,不能给斯大林叫医生。在无数的规定中就写有这么一条。最后,终于在政府的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正同一个新的女人鬼混的这位斯大林身边的魔鬼。夜里3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来了。贝利亚带着明显的酒味。马林科夫穿着袜子走近垂死的斯大林,不知为什么把他的新皮鞋塞到腋窝下(想必是怕响)。斯大林躺在沙发上,喉咙里发出临终前的嘶哑声。贝利亚没有叫医生,却冲着"服务人员"骂起来:

"慌什么!没有看见斯大林同志正在酣睡!全体人员都出去,不要打搅我们领袖的睡梦!我还要和你们算账!"

马林科夫不太坚决地附和着他。雷宾坚定地说,人们形成一种印象,斯大林中风之后已经躺了6至8个小时而没有得到医疗救护,谁也不打算救护。雷宾最后说,好像一切都是按照贝利亚满意的方案进行的。战友们赶走了警卫和服务员,禁止他们给任何地方打电话,然后就忙乱地走了。只是到了上午9时左右,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才又来,随后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医生也来了。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在自己的书中回忆说:"在父亲躺着的大厅里聚集了许多人。第一次看到病人的陌生医生(看护父亲多年的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坐牢了)忙成一团。给后脑勺和脖子贴医蛭,拍心电图,透视肺,护士不断地打着什么针,一个医生不停地在记事簿上记录着病情的发展情况。一切都按该做的那样进行。所有的人都在为抢救这个无可救药的生命忙碌着。"所有的人都带着庄严、悲哀、为国担忧的神情,虽然谁也没有怀疑这就要完了。大面积的中风已使"领袖"失去知觉。但是,贝利亚不时走近医生,大声地(为使所有的人都听见)问道:

“你们能保证斯大林同志的生命吗？你们懂得你们对斯大林同志的健康所负的全部责任吗？我要警告你们……”

脸色煞白的教授、医生、护士悄悄地说着什么，忙乱着，他们感到，“领袖”一死，最可怕的事情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贝利亚脸上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所有政治局委员，包括马林科夫，都害怕这个败类。暴君的死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大流血。由于发布无数指示和佯装关心而感到疲倦的贝利亚，在确信斯大林实际上已处于划分生死的无形界线的那一边后，就把国家政治领导人丢在临死的“领袖”跟前，匆匆到克里姆林宫去了几个小时。我已经说过一种看法，认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在加紧进行一场他早有预谋的政治大投机。他匆匆赶往克里姆林宫可能是想从斯大林的保险柜中拿走独裁者的文件，因为其中可能有(这是贝利亚担心的)涉及他的指示。斯大林也许会留下遗嘱，而在他的威信极高的当时，未必有什么力量敢与死者的临终遗愿相对抗。

几小时后回来的贝利亚更加自信，公然指使沮丧的战友们：赶快准备关于斯大林患病的政府公告，发布病情通报。由电台广播和报纸登载的政府公告中说道：

> 3月1日夜间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他的住宅里(实际上他是在别墅里。——本书作者注)患脑溢血，溢血侵蚀了对生命起着重要作用的脑区。斯大林同志失去知觉。右臂右腿瘫痪。丧失说话能力。心脏活动和呼吸严重失调……对斯大林同志的治疗始终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斯大林同志的重病将使他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参加领导工作。

第一次公告之后又在3月5日2时和16时发布了两次公报。医学界巨擘特列季亚科夫、库佩林、卢科姆斯基、科诺瓦洛夫、米亚斯尼科夫、塔列耶夫、菲利蒙诺夫、格拉祖诺夫等人(在发生暂时尚未了结的“医生案件”之后，贝利亚力求只让一个民族的院士和教授给斯大林治病)都不掩饰：灾难就在眼前。魔鬼在医生耳边凶狠的嘟嘟囔囔也改变不了他们的结论：“心脏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急性紊乱，心脏后壁发生病灶变化”，“严重虚脱”，“状况继续恶化”。他们还不知道，周期性的脑血

液循环障碍早已在脑组织特别是在额叶区造成了许多小腔室(囊肿)。专家们今天认为,这些变化造成了斯大林精神领域的紊乱,助长了专横的性格,加强了他本来就有的暴君意向[⑩]。但是,我认为这是通常的老年人的现象。尽管斯大林精神上极为反常,但是在我看来,他还不是应当由精神病医生来照管的那种人。他的"病"是社会性的,就是专制和暴政。看来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得病的不仅是领袖,而且是整个社会。

在垂死者的床边正要结束的是一幕悲剧,这个悲剧只是在几年之后才能够暴露出同这个人一生有关的人民悲剧的内幕。当时人们觉得,他的死是人民的悲剧,而几年之后人们将明白,他一生的罪行才是人民的悲剧。瓦西里几次跑到大厅,醉醺醺地喊道:"混蛋们,父亲是被害死的!"女儿像木头人似的站在一边,由于睡眠不足和不知所措而疲倦的政治局委员们坐在圈椅和沙发上。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和其他几个人流着眼泪。贝利亚几次走近斯大林大声问道:

"斯大林同志,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贝利亚的举止就像一个大帝国的王储,能够支配他的任何一个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个他为之服务的和给了他不受监督的权力的人,贝利亚已经不感兴趣。对他来说,斯大林已成为过去。他的全部心思只是想着最近的未来。"领袖"的死就在眼前了。我认为,对独裁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叙述得最好的是他的女儿,她当时始终守在垂死者的身边:"临死的痛苦挣扎十分可怕。大家眼看着他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有一个时刻——我不知实际上是否这样,但感觉如此——看来是在最后一分钟,他突然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所有站在周围的人。这是一道令人恐惧



1953年3月5日9时50分,斯大林病逝

的目光,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愤怒的,也许是对死亡和俯身站在他面前的陌生医生充满恐惧的。这目光在瞬间把所有的人看了一遍。接着——这是一个令人不解的和奇怪的动作,我至今也不明白,但是不能忘记——他突然举起左手(这只手可以动),也不知是向上指某个地方,还是威胁我们大家。手势虽然令人不解,但是威胁性的,也不知他是对谁和对什么事……随后,灵魂作了最后一下挣扎,离开了肉体。"时值1953年3月5日9时50分。

在立即沉寂下来的、面对永远神秘的死亡呆若木鸡的战友们面前躺着他们的统治者、偶像、法官、主人、恩人,躺着一个刽子手。大部分人都感到既悲伤又轻松。一个除了盲目的爱、常常令人产生非理性的恐怖的人走了。他的任何一个战友都可能成为多余的人,就像不久前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遭遇一样。许多人都被一个念头搅得心神不安:斯大林留有遗嘱吗?如果有,是什么内容?他一定会谈到继续他的事业的那些人……

一些人擦干眼泪,带着发自内心的悲哀,用通红的眼睛仔细瞧着严厉的、立刻有点发白的熟悉的面孔。斯大林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尸体旁,把头贴在他的胸前,像村妇一样嚎啕大哭。她照顾斯大林近20年了,一直陪伴着他,陪他去南方,甚至在战争年代陪他参加了三次国际会议中的两次。但是,这个人间上帝的死所引起的麻木状态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突然一下子忙乱起来,同时说起话来并蜂拥地奔向出口: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国家大事,其中除了葬礼,首要的就是把事务交给谁,如果死者本人没有作出安排的话。大餐厅,就是斯大林常常在这里坐在壁炉前或桌旁同四五个邀请来的战友进行小范围讨论的大餐厅,一下子空了。从此永远不会再在这里讨论诸如颁布新法律,任命部长、大使,颁发斯大林奖金,建造新的劳改营,建设电站,强制迁移整个民族,决定许多人的命运的问题了。暴君专权的整个时代结束了。不过,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究竟结束了没有?也许,斯大林的全部"事业"都遗交给贝利亚了?许多斯大林的亲信在乘着长长的黑色高级轿车驰往克里姆林宫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当时亲信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立即反对"领袖"的临终遗愿呢?未必……当时未必有。三个月之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谢皮洛夫回忆道:



“主人”已经不在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

当时我任《真理报》主编。全国都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莫斯科的消息,斯大林怎样……5日早晨电话响了,是苏斯洛夫的声音:“请赶快到‘角落’(在克里姆林宫里日常习惯这样称呼‘领袖’的办公室)来。斯大林同志去世了……”接着电话就放下了。

在办公室里决定了葬礼的安排问题。谢皮洛夫说道,政治局委员的行为举止都映入了我的眼帘。他们在长桌前坐下。谁也没有坐斯大林的首席圈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相对坐在主席席位两边,两人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情绪。他们不客气地打断战友们的话,说得比别人都多。贝利亚简直是喜气洋洋。赫鲁晓夫说得很少,显然有点精神压抑……卡冈诺维奇也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了些什么……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莫洛托夫冷漠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面部表情呆板,好像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毫无条理的会议上没说一句话……

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感到:3月5日不仅可能成为领袖的末日,而且可能成为新的“宫廷”时代的开始。

第二天，举行了不同寻常的三个机关——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席会议。没有发现斯大林死前留下的任何指示。自“领袖”患病后只有贝利亚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去了一次，之后他就命令封闭房间。需要决定权力的继承问题。对于民主制度来说，这是通常的程序：一切都按宪法规定的准则办事。在民主虚无缥缈的地方，在国家震中是斯大林这样的人的地方，这永远是未知数和神秘莫测的东西。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但是决定已在会议前的小范围内预先作出了。

斯大林的一个职位——部长会议主席决定交给马林科夫，他在最近两三年是“领袖”明显的宠臣。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被确定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其他有关国家领导重新配置的问题中应当着重提出的是：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重新合并。扩大后庞大的内务部再次由贝利亚领导。他从前就是这两个部的实际领导人，而现在除了保留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看来是真正的第一）的职位，还掌握着这个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不受监督地立于所有其他部门之上的部门的管理杠杆。从一切情形看，贝利亚不仅打算保住他在斯大林生前的地位，而且打算加强他的部在决定内政外交问题时的作用。实际上他以后可以借助他掌握的机关取得政权。莫洛托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布尔加宁任军事部长。在掌管立法权的人事方面也作了重大的变动：前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被派往“工会”，他的职位由战后在“领袖”跟前失宠的伏罗希洛夫接替。

党的最高机关也发生了重大变动。“领导核心”在这次难忘的会议前夕，即在斯大林死后不到12小时的夜间聚集在一起，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和其他战友的附议，决定大大缩减政治局委员人数。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2年10月）之后，政治局开始称为中央主席团。斯大林晚年大概想最终摆脱自己多年的战友们——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他计划逐渐解除他们所有人的职务，但是他的时间不多了，斯大林感到了这一点。像往常一样，他的非常敏锐的头脑想出了一个意外步骤。他建议（当然，在老政治局里所有的人都立即同意）把主席团委员增加到25人，候补委员增加到11人。书记增加到10人。这样，他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老战友们“溶在”他想在以后指靠的新人当中了。我想，如果斯大林

不被中风撂倒，他会找到指控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及其他一些人的借口来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并顺便把许多(正像年迈的"领袖"感到的)有损他的历史肖像的事嫁祸于他们。但是，这些官场老手已把"领袖"琢磨透了。在他死后几小时他们就决定，为了"保障连续的和正确的领导"，第一件事就是使那些新提拔的干部离开主要权力杠杆。

联席会议批准了"核心"的建议，把主席团人数缩减了一半多，委员减为10人，候补委员减为4人。除了老的"斯大林近卫军"——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只补充了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三人。有几位活动家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参加主席团不到五个月，就从这最高的政治天空消失了，永远不再在那里露面了。他们是：安德里阿诺夫、兹韦列夫、卡巴诺夫、马雷舍夫、梅利尼科夫、米哈伊洛夫、波诺马连科、普扎诺夫、捷沃相、切斯诺科夫、尤金。勃列日涅夫暂时也未能在这个党的最高圈子里站住脚(他被解除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派去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少先队员凝神仰望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1934年后谁也没有正式当选过中央总书记一职。所有的人本来就清楚，斯大林是头号人物，是国家、社会和党的"统治者"。在他死后，没有一个人具有这样的威信。近几年来受"领袖"之托主持中央工作的马林科夫，再说一遍，只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会议含糊地决定(似乎是给一段试用期)："认为有必要使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抓苏共中央委员

会的工作,并因此解除他的苏共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

全国都沉浸在正式宣布的四天哀悼中,对权力的重新分配中的这些"细节"并不介意。但是,许多人都清楚,这些负有代替斯大林的使命的新政治人物只不过是"领袖"的影子。在那些日子里人民贪婪地捕捉着几乎早就像两滴水珠一样相似的电台和报纸的报道。人们理所当然地拥护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把盛放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放进红场的陵墓中,同列宁的水晶棺摆在一起,并建造一座名人墓——苏维埃国家伟人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待名人墓建成后,将列宁的水晶棺和斯大林的水晶棺以及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的遗体移居于内"。一切都显得很自然。

给统治者做尸体防腐和制成木乃伊的古代风俗(克鲁普斯卡娅曾坚决反对这样做,而斯大林却极力坚持)也显得很自然。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很多东西。甚至对于在尘世间同他们一起生活着上帝这种事也习以为常。但是,这个上帝像所有凡人一样死了,这使他们难以接受。苏尔科夫在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伟大的告别》一文中描写道,"一连三天,不分清晨和傍晚,满怀爱戴和悲痛心情的人群汇成一条长河,蜿蜒流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源源不断地注人圆柱大厅。"[8]他只是没有写(不过也不会允许他写),已故的"领袖"仍然始终如一:死去的他也不能容许祭坛空荡。人们聚集得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莫斯科大街的一些地方发生了可怕的拥挤,使不少人丧了命。



斯大林葬礼

新的军事部长布尔加宁向苏联军队发布了命令,其中接二连三地使用"伟大的"、"天才的"、"永垂不朽的"词语。在安葬时刻,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各英雄城市和其他一

些城市鸣礼炮30响。索科洛夫斯基、布琼尼、戈沃洛夫、科涅夫、铁木辛哥、马利诺夫斯基、梅列茨科夫、波格丹诺夫等元帅以及各位将军都佩戴上大元帅颁发的勋章和奖章。全国都沉浸在深深的哀悼之中。悲痛是由衷的。千百万人并不知道，葬礼是他们摆脱一个最可怕的暴君的开始。



斯大林追悼会。在陵墓检阅台上的有：陶里亚蒂、伊巴露丽、契尔文科夫、拉科西、肯尼、杜克洛、哥特瓦尔德、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周恩来、尤金、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什维尔尼克(自左至右)

前来参加葬礼的有周恩来、乔治乌-德治、哥特瓦尔德、贝鲁特、拉科西、格罗提渥、泽登巴尔、契尔文科夫、吉科宁以及世界各国许多其他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人类明白，这个去世的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将会得到不一般的评价。但是，在那几天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给自己政府发去的紧急报告，主要是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对这个大国的意义的评价和对未来的预测。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看斯大林的继承人在隆重的葬仪上说些什么。只有四个人作了发言：赫鲁晓夫(治丧委员会主席，宣布追悼大会开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政治分析家认为这件事实表明，正是这四个人是新领导的核心人物。

发言者实质上用同样的话语强调人民和国家完全忠于斯大林的方针。马林科夫称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他表示相信苏联“有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条件”。贝利亚自然提醒说，我们在沿着斯大林的道路前进时，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党和人民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的阴谋诡计。现在我们应当更加提高警



在红场陵墓，斯大林躺在列宁旁

惕”。莫洛托夫在回答“怎样算是忠实的和无愧的斯大林追随者？”这一问题时，力求说明进一步巩固新领导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的主要方针。战友们实质上是在宣誓，一切都将像斯大林生前一样。几位国家首领在追悼大会上的讲话没有丝毫差别。只有贝利亚在没有得到领导队伍的头把交椅（我不怀疑他曾深思熟虑过这样的计划）的情况下，决定全力支持他最亲近的人——马林科夫。贝利亚在发言中宣称，“任命列宁的天才学生和斯大林的忠诚战友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为保证对整个国家生活进行连续的和正确的领导而作出的非常重要的决定之一”[49]。

追悼仪式后已故“领袖”的遗体被移入陵墓，但是陵墓关闭了八个月不让瞻仰，因为要继续作防腐处理。根据设想，木乃伊应当永久放在这里。现在，在列宁的身边躺着一个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篡夺了对其伟大先驱的事业的理解权和解释权的人。但是，列宁身着他那黑色西服，没有一枚勋章（谁也不能想象伊里奇胸前会挂满勋章），而斯大林却挂满了白金做的条形勋章，但是，历史在评价这两个人的真正作用

时，从来不看这些"区别标记"。谁会知道，1961年10月31日夜里斯大林的干尸将永远离开陵墓?

第二个星期，报纸和电台在继续发表和播送川流不息的真诚的悲痛的唁电。我想，甚至那些以反苏著名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也真诚地把一个强国(如今不考虑它的立场就不能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发展的整个时代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苏联报刊找不到恰当的形容语来表达斯大林对现代文明所起的作用。《真理报》写道，他的手"掌握着人类历史的方向盘"。不过，我要说，有时也看到一些材料，从其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另一种意思。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贝希尔在其《献给永垂不朽的人》一诗中写道：

> 大地的胸膛在有力地呼吸，
> 列宁播的种子破土而出。
> 人民说："看，斯大林履行了誓言，
> 　　　　大家开始收割吧！"
> 斯大林再次使人心里明白，
> 在一次伟大的胜利的早晨
> 他曾满怀悲痛缅怀牺牲者，
> 而在人民中间——这是无声的哭泣。[59]

永久的黑暗吞没了"领袖"。但是，形体的死亡并不伴随政治的死亡。他走了，合意的战友们(不合意的都被他消灭了)在为他送行时悲痛万分并赌咒发誓忠于"他的事业"。表面上什么也没有改变。人们仍像以前一样思想。官僚机器转动着笨重的齿轮，依然无情地发布着各种命令和指示，进行着"干部的培养、了解、配备"工作。在每一个隆重的会议上照旧收到许多寄给"最最"的贺信。但是，同样是这些在讲话和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总要谈及斯大林的"天才"的人慢慢改变了调子。蒙在眼睛和心灵上的罩布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过了不到一个月，"医生案件"被终止，而柳明这个贝利亚阴谋的主要执行者，像以前惯常做的那样被枪决了。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胆大的战友们便施行了"宫廷手术"，先是排除、接着就消灭了贝利亚。斯大林死后一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切普措夫的主持下终止了"列宁格勒案件"，认为这是



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开除出党，同日，贝利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职务也被解除。此时，距斯大林逝世还不到4个月，几个月后，贝利亚即被枪决

"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长及其同谋者制造的一起假案"。按照1953年3月死去的暴君的意志处死的A·A·沃兹涅先斯基、尼·阿·沃兹涅先斯基、M·A·沃兹涅先斯卡娅及其数十个"同案犯"得到平反昭雪[9]。下一年，《真理报》报道说，在列宁格勒进行的军事法庭的公审中，伪造"列宁格勒案件"的罪犯（阿巴库莫夫、列昂诺夫、科马罗夫、利哈乔夫）被判处极刑——枪决，其他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监禁。主要的罪犯这时都已经死了。

在正式谴责个人崇拜之前还显得牢固的、凝结的、永恒的、铁板一块的东西开始慢慢消散、溶化、遭到侵蚀、消失。托马斯·曼简洁表述了一条像宇宙一样古老的真理：生前的荣誉未必是真实的，它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斯大林是在从自己的荣誉和伟大的顶峰走下来的时候死的。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知道和感到了这一点，但是"领袖"死时苏联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中。体制僵化：一切代表大会、集会都徒具形式，因为它们的结果事先都由独裁者预先决定好了。意识形态把文化贬低到只能起指定的和顺从的"教育者"这种模拟器的作用。虽然在核领域有了突破，但技术上却愈来愈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农业更加衰落。社会科学就是拼凑引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则受到李森科学说以及反对控制论和遗传学运动这样的蒙昧主义的影响。官僚主义制度几乎控制着社会中的一切。虽然官方宣传不断宣扬"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但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却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它随时可能遭到自己最高首领的暴力打击。克里姆林宫的老头子怀疑地看着习惯于服从、执行和希望的人民的热情逐渐减退。

他对他建立的官僚主义阶层表面上充满活力、实际上效率很低的活动很不满意。他感到:运动不是在加快,而是在减缓。危机日益成熟。

国际事务中的情况也不妙。同铁托的冲突向所有的人表明,斯大林并不具有无限力量。他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处于瘫痪状态。“冷战”映出了可能发生的新的世界冲突的阴影。但是,斯大林不明白,世界即将发生新的变化。需要有承认全人类利益先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新立场、新抉择。斯大林完全不适应这种进化。如果斯大林不是1953年发生中风,他每活一年,都只会加深国家的严重的政治危机。命运作了另外一种安排:“领袖”的死为克服后来人们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创造了新的条件。正像维吉尔所说:“凡事都有定期。”现在这个日期来了。劳动群众在斗争中争取到的伟大权利和自由被严重削减并且不能越出斯大林的轨道。但是,斯大林并不能使所有事物都发生变形;许多事物虽然肢体不全,但都生存下来了。不能因有危机(这种危机我们只是在数十年之后才完全看清)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还在朱加施维里刚刚步入少年时代时,有一次宗教学校的神甫讲授福音书的基本教义。索索睁着一双大眼看着神甫,后者力图使他相信,耶稣不恋尘世权力,他认为,与其虚有其名,毋宁受难与死,因而成了一名被驱逐的云游教徒。只是在到达各地之前几小时,他才自称为救世主。上帝与人结合后成了神人,并遭到一切因追求真理而被驱逐的云游教徒的命运……

少年时期的朱加施维里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拒绝了尘世的权力?如果它掌握这个权力,就能够不仅改变被驱逐的人的命运,而且改变所有它认为需要的人的命运……朱加施维里不相信圣经公设,然而,从少年时起他就对权力有一种执著的看法,认为权力能够给人相近于上帝的力量和意志。

斯大林的一生与死证实了许多永恒的真理。历史的深渊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深浅。但是死者跌落下去的回声可以成为善或恶的呼唤和证明。我们愈是了解斯大林,就愈是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成为历史上最可怕的恶的化身之一。无论多么美好的意图和计划都不能为惨无人道的行为辩护。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再次表明,如果政治不与人道主义结合,甚至美好的、高尚的人类理想也能走向反面。再说一遍,斯大林忽略了人这个主要因素。在“领袖”看来,一个人永远只

是群众的组成部分，而这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斯大林的一生与死证实，作为个人专政表现形式的独裁在历史上是非常脆弱的。它会随着独裁者的死而灭亡、消失。斯大林永远不能也不愿明白，真正自由的社会不是一个人居于顶端的金字塔的底座，而是每个人都能自主参加选择本身命运的联合体。

斯大林的一生与死表明，缺乏政治与道德的协调，最终总要导致垮台。我国事件的历史摆锤把斯大林托到了最高峰，也把他抛入了最低谷。斯大林的一生与死清楚地表明，一味相信暴力威力的人只会犯下一桩又一桩的罪行。独裁者用他的"荣誉、智慧、远见、受尊敬"搭起的布景迟早会倒塌。斯大林以自己的一生和死表明，他对完善统治的追求不过是虚幻的梦想。他控制人们的意识、把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执行者的能力是一种可怕的警告——不受监督的、绝对的、集中于一人手中的权力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这种历史警告我们还没有予以充分注意。现在还没有建立禁止神化国家和社会第一把手的可靠保障。斯大林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是一种永恒的警告……历史判决斯大林有罪。死亡不能使他得到开脱。

斯大林的遗产

在本章中已经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我坚信这一点。但是斯大林可以这样来重耕这块土壤，给它施肥，使它上面开始生长出至今仍然同我们的生活不能分离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社会的、道德的畸型儿。然而我想再强调一次，出现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过错。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巧妙伪装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对立面。我坚持这种观点，因为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了好似要在《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根源的呼声。我们知道，在同样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斯大林培育出的果实，其中有许多会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很早就向往"正义和幸福时代"的人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在红场上安葬"领袖"时说：斯大林"给

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要像眼珠一样爱护它并不断使它发扬光大”。一想到魔鬼有可能使它“发扬光大”，就感到非常可怕……

我深信，要是列宁能多活哪怕5—10年，许多事情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不是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这是对“头脑和手中拥有”伟大思想的力量的信任。遗憾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诞生的这种伟大的思想目前却不能充分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都是空想。只不过是斯大林的业绩迫使许多人对这种思想能否人道主义地实现产生了怀疑。因此，在谈到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时，必须说明一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笼罩在他们的伟大思想上的那层病影方面是无过的。由于斯大林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被浅化了。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这个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30年来让千百万人逐渐习惯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维的视力，使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的堆砌，而这些教条不仅导致了理论的“浅化”，而且还导致了革命的“浅化”。列宁若能想象一下党的第一个总书记给他的事业带来的那些灾难，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气得发抖。饶勒斯在阐述法国革命史时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努力奋斗和战斗过的革命和民主的伟大领导人，在我们面前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要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似乎他们应当演完全剧，似乎历史在他们之后不再前进，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们的事业必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伟大的。”把评判斯大林变为评判列宁，像今天有人有时试图做的那样，是对列宁的侮辱，因为列宁，按照饶勒斯的说法，“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个没有按照列宁意志来率领这些后代人前进的人，就是那个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从而犯了最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这个主要罪行派生的。这个断定决定着斯大林“遗产”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热拉斯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9]斯大林的“遗产”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千百万人的痛苦、不幸和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所追求的“进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牺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领袖”不是皇帝，而任何

一个皇帝大概都不曾拥有像斯大林这样的无限权力。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帮助他开始时立住脚而后站稳脚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因素，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俄罗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8]。对俄国大作家的这个绝对的论断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历史的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

在给这个在苏联（难道只是苏联?!）人民历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伤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画最后几个线条时，有必要指出，**在本来意义上的斯大林遗产方面**并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那些我们珍惜的、对我们永远重要和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看来，获得如此之多的个人“胜利”的斯大林，到头来却遭到了彻底的历史性失败。为了评价斯大林的“遗产”（其遗物现在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某些结论和估计。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开幕时党仍然称联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会相隔整整13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了。中央委员会的生活在战后变得更加平淡无味。实际上，这个在代表大会之间领导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代扮演了党的办公厅的角色：任命干部，向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党组织发布指示，通过一些精神内容彼此惊人相似的决议。这些决议的大多数是有关农业方面的：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破坏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措施；关于妥善保存国家粮食的保证；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建设；关于小集体农庄的合并扩大以及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的任务；关于在农业中宣传和运用科学成就与先进经验的安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振兴衰落农村的尝试。

在近处的一座斯大林的别墅里，“领袖”身边坐着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样一些“大农业家”，长夜交谈之后，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些把农业越来越赶进死胡同的强硬而顽固的死板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斯大林感觉到，农村是在用长期的、无意识的、消极而又坚定不移的报复行动来回答他对庄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时，他就

常常采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正是在他积极支持下，李森科才步步高升，并根据他的建议，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于1946年9月再次(像战争前夕一样)通过了关于清查和取消“个别集体农庄庄员、组织和机关用于副业的非法占有土地”的决议。文件说，违犯者将“作为法律破坏者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送交法院惩处”。正是斯大林建议(这当然也写进了决议)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建立以副部长为首的农业宣传领导机关……这完全没有必要。对一意孤行的、杜撰的决定，首先是行政压力性质的决定，农村的反应是无声的冷淡。

好多年过去了，中央委员会一直没有开会。在讨论了还是那些“提高农业”的问题的1947年二月全会之后，下一次全会直到1952年8月才举行，这次全会就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报刊关于这两次全会的报道，甚至采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几天(?!——本书作者注)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布)中央例行(?!——本书作者注)全会。”谁作了报告，问题讨论得如何，这个“最近几天”是什么时候，读者只能去猜测。官僚主义离开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的，然而没有代表大会，斯大林也不想在党的领导方面进行大的变动。他知道，代表大会将会根据他的脚本进行，并完全按照陈规通过他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的良心早被赶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说一遍，党成了他的一个团体。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决定给继承人留些长期反复咀嚼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匆忙出版的新的两卷“本人的”著作。看来，日益衰老和病魔缠身的“领袖”想同时为除掉他的许多多年的战友打好基础，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会后可以成为合适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遗产”的评定提供的新东西不多。但同时却不乏有趣的材料。马林科夫在1952年8至9月期间曾几次向斯大林汇报了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以及其他文件和发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草稿，但它们很少使斯大林感到兴趣。大家竞相搜寻新的修饰语、“领袖”的功

勋、美德、才能。斯大林没有作书面批语，而是在接见奴颜婢膝的马林科夫时简短地讲了几点意见，它们听起来就像无可争辩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讲话上。按照他的提纲，苏斯洛夫带领一个人数不多的班子准备了几个讲话方案。斯大林亲自对讲话作了最后的精细加工。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就确定代表大会在……晚上7时开。他让党的最高集会服从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数不多，但是出现了新现象：所有成员都集中坐在主席团桌子的左侧，斯大林一人独坐在右侧。身旁身后都无一人。"伟大的领袖"甚至不愿意和党的一些最高领导人混坐在一起。当代表们的发言无休无止地提到他的名字时，就被无数次的热烈欢呼、起立、有节奏的喊声所打断。斯大林注视着似乎都是些正常人的过分狂热的情绪，看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双眼充满忠诚、热爱和真诚的毕恭毕敬的神情。"领袖"由于听那些滔滔不绝的、用心良苦的过誉之词而感到了疲倦，在大会休息时就离开了，并且好久没有露面。他好像只是在开幕和闭幕之日出席了全部会议。有两三天根本不露一面。我想当时问题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对这些没有斗争、没有疑难、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的集会早已不感兴趣了。但别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会对他来说只是镶在他的独裁政权上的"民主"花边。而且这时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活着的很少了。需要补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知道，有时不得不按照陈规办一点事情……整个代表大会同大家为斯大林是否讲话感到焦虑的心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领袖"在集团中的作用。

在社会意识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个活神仙——人世间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预见的集中体现。普遍受蒙骗的状况是那么严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种思想都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形式。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几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谈以及常常是同现实生活结合得不好的简单论点当作上帝的启示一样接受下来。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之前，代表们对"领袖"是否会向他们说点什么这一点心中无数。在闭幕会上，当大家看到斯大林从主席团桌旁站起来，沿地毯铺的小道走向讲台时，整个大厅都站起来向他长时间地

欢呼。斯大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着军装而是一身"党"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勋章,他善于在人们意识中保持一位"谦逊"领袖的形象。他的讲话简短。打断讲话的掌声大概占去了更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有一句话(!)谈到国内和党内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现在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即他说的新的"突击队"的建立,我们的"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斯大林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十分可疑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根据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旗帜似乎被抛弃了。他号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举起"这些旗帜。斯大林像在旧日"共产国际的"20年代一样,又对"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的胜利"表现出坚定的信念[99]。斯大林的单维的思维似乎停滞了。没有一点新东西。难怪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很快就在当月《真理报》上出现了题为《社会党叛徒在米兰聚会》的论社会党国际例行代表大会的文章。什么"头目"、"奸细"、"罪犯"、"叛徒"——这就是文章的用语。在共产主义运动、劳动群众争取自身社会权利的斗争以及整个国际关系方面,斯大林遗产的特点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理解进行根本转变的必要性。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对共产党人的显然落后于世界已开始发生变化的陈旧传统立场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罢了。

我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几位代表交谈过,最富有洞察力的人当时觉察到,斯大林已经在明确地考虑他死后的事,例如他的遗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了异乎寻常的长篇讲话。在辛辣的言语中带有责备的口气,他好像是表达了以下的疑虑:他的战友们能继续执行既定方针吗?能在内部困难和帝国主义面前不投降吗?能在新的考验面前表现出勇气和坚定吗?

今天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自己最后的公开谈话中责备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好像是在暗示,在他的"老近卫军"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就是害怕他的主要"遗产"——强大的、阴森的、长久不变而且定了型的国家……会落入不可靠的人们手中……"领袖"明白,他的名字、事业和思想只有在他所建立的体制范围内才能保存下去。任何别的体制将会否定他的主张。极权国家实际上是独裁者在整个漫

长岁月里创建的，是按斯大林硬性规定的方法行使职能的，这就是：高度集中化，实行独裁的民主环境，以强迫手段作为发展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直到他死以前一直认为，要保证这种国家的物质基础，就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和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是的，先前的“资本主义”概念上的剥削不存在了，人们在自己的贫困方面和高度依附于机构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了“忘我劳动”的机会。当十月革命积蓄的巨大力量尚未开始枯竭的时候，苏联人常常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但是，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套精心设计的办法的日益广泛运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社会被动性、漠不关心和因循守旧的心理。大量使用强迫劳动和放逐，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对任何一点点异己思想的表现进行不断惩治的威胁——用这些办法来“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当然不但不能谈论自由，而且连想一下也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党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党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党，而是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团体的同义语。斯大林到死都喜欢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几代人都是在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观方面，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观点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阶级观点。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纳人一个死板的公式之中，作为这个公式基础的是如下一个定理，即：阶级斗争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人道主义的观念、全人类价值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本身被宣布为异端的、资产阶级的观念，好像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连一句也不能提。对党员来说，阶级意识就是对所有异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见的人和事采取强硬的不调和态度。阶级观点和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化，为强硬、暴力、不容忍作辩护。阶级观点把斗争提到首位，而妥协、共处、一致和合作则成了次要的东西。这在对外政治事务中导致了对抗，而在国内则为暴力、恐怖辩解。各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的绝对化成了政治思想战的通用理论。

斯大林经常称为“军队”的党的团体逐渐变成了分支林立、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斯大林留下来的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列宁的特点。顺从而自动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思想,使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党的党员变成了一群执行者。斯大林的“创作”印记在这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清晰可见。因此,不能不承认,不仅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要为斯大林主义承担责任,而且党也要承担责任。

最后,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遗物时不考虑独裁者为惩办机关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就看不到斯大林“遗产”的全貌。经过斯大林的筛选,在这些机关占据领导岗位的都是“领袖”无条件信任的一帮人。叶若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阿巴库莫夫、卡布洛夫、谢洛夫、德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为斯大林安全献身的人,都对国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劳动者和著名活动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请看下面的实例。

贝利亚周围的一班令人恐惧不安的人马中的一员干将——谢洛夫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秘密报告中(已经是战后了)写道:“我已经报告了关于驻德国的占领军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中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不客观态度。捷列金开始搜集各种‘事实’来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代表,并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们汇报给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说,有51列车战利品发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我们有大量事实说明,捷列金将军在企图损害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名誉。我的结论是,捷列金将军非常仇恨内务人民委员部……”[68]斯大林自然是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事实”。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并被送进政工人员进修班,这时“机关”内部则对“案件”进行准备并把结果呈报给斯大林。经过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难而且常常是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参加过全部战争的人,因进行“敌对活动”被捕了。军事委员会的判决书说:因进行反苏宣传,根据1932年8月7日的法律并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12款判处在劳改营剥夺自由25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斯大林之死才给捷列金打开了劳改营的大门。同惩办机关代表发生极小的磨擦、向他们白一下眼和些许表示不恭,都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东西。列宁研究法国

大革命时，在大震荡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权。它还不完善并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宁在人民政权中看到了历史上从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顾法国革命时，对倒退运动的不可逆转和存在残忍扑灭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惊。对他来说，“热月”一词是旧事物复辟、反革命和叛变的标志，是对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进行欺骗的标志。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词的地方使用“热月”一词并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领袖”则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说的那种断送了法国革命的危险性上。这种危险性是具体的，即“人民公敌”的存在。这个对苏联历史来说是令人痛苦的名词，是从18世纪传到我们的悲惨的现实中来的。对斯大林来说，“人民公敌”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甚至是潜在地对独裁构成威胁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在巩固独裁上，自然是冒充为“巩固社会主义”。为此，需要一个他亲自创建、领导和监督的庞大惩办机器。

在人民、国家和党之上布满了可怕的惩办机关网。暴力的绝对化，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建立一个监视每个在威胁面前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公民的庞大体系。“领袖”把阶级斗争的思想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使它变成了理解“最高真理”的工具。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生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

但是“领袖”显然过高估计了他建立的社会的稳固性。他死后，真正过了不多的几个小时，继承人就开始背叛了他的遗训。从1953年3月起，就开始了十年的苏联改良主义时期，它触及了生活的一切领域。这十年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特别是同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关的那些改良不应估计过高。这一时期的全部改良的突出特点是改良尚不完善、不彻底、言犹未尽。但是最主要的已经作了：结束了盛行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恐怖状态。自由获得了实现自己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遗产”开始腐烂时发生的。

今天我们观察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仍然好像在鸟瞰历史。我想再过几十年，苏联人民史册上的这些黑暗的篇章从更长的时距上将被认识得更加深刻得多、牢靠得多、准确得多。过去的事离今天太近，它还

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只是冰山的顶峰。在描述了它即顶峰之后，我不企求显现冰山的全貌。

我再说一个近乎异端的思想。可能是极其异端的思想。其主要之点如下所述。读者记得，本世纪初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了轰动一时的抨击性预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当时把它评为独特的反革命宣言（而且现在我想许多人对这个作品也未必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缺乏才能，然而倾向神秘主义，他预言般地写道："不要怕任何诱惑物、任何诱惑力和任何自由，不但不要怕外部的、社会的自由，而且也不要怕内部的、个人的自由，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要怕的只有一个——奴隶性和最坏的奴隶性——市侩气和最坏的市侩气——下流气，因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而是新的实在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绘的还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10]

* 这里的"下流人"原文是"XAM"，也可直译为"含"。据《圣经》故事说，含是挪亚的次子，因耻笑其父赤身醉卧而受到人们的谴责和诅咒。后来，含这个名字便成了下流人和卑贱无礼者的同义词。——译者

批评家们把奴隶理解成无产者，想来是徒劳的。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抨击性小册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里谈的是"精神的奴隶性"。按他的说法，独裁者、"由官阶表构成的万里长城"、"东正教的形式主义的死板实证论"和"黑帮分子"都能在精神的奴隶性中存身。实际上，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奴隶性和下流气是反自由的同义语。可能，作家并不想看得那么远，不想看到超出存在的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他只是天真地希望仅仅借助于"宗教界舆

论"和知识界的复兴来拯救俄罗斯，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践踏自由总是造成出现"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威胁。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的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斯大林用他的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腥的、非常可怕的人。害怕出现下流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但是不无合理的思想：他相信人类智慧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民主、法律、文化结成紧密联盟同施行暴力的、官僚制度的和教条主义的下流人对抗的话，这种下流人就不可能存在。

我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辩的。而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些，是因为越不尊重民主、法律和文明，总是越明显地出现反自由的下流人的怪影。这一真理对20世纪初来说曾是正确的，我想到了21世纪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思想的长久性。有可能，我今天读他的作品的方法与本世纪初人们在血淋淋的阶级会战的慌乱中的读法不同。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全人类的真理存在着，它们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它们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对人类智慧的无限力量的信念以及对人们不可遏止地追求社会正义、道德正义的信念上。斯大林的"遗产"是绝对不能列入这些范围的。

"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在取消了自由的独裁制度下表现得最凶狠。而看起来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权力集中在很少的几个人手中，最后又把它交给一个人。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危险性。他在革命后立即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抗议时写道："……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一切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使所有委员会充满了这些亲信，不费力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到那时我们就真的不会有党内的多数和少数了，因为我们那时就会实现波斯国王的理想。"接着，普列汉诺夫提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当谈到青蛙为自己请国王时写道："……如果我们的党真的赏给自己这样一个组织，那它的队伍中很快就不会有聪明人和老练的战士的位置了；其中剩下的只有青蛙……于是中央鹤就无阻碍地一个接一个地吞食这些青蛙。"[⑩]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央鹤"吞食的决不是青蛙，它认为自己存在和活动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创建和发展人民政权，而在于强化独裁政治。甚至当斯大林自己感觉到衰老和疾病很快就要毁掉

他的时候，他再次检验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可靠性。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他突然谈到了衰老和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必要性问题。他预先知道，整个这出戏会如何收场。当然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对于"解除"斯大林的职务问题连想也不可能想。这样想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假定一下让斯大林离开书记岗位而保留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很快就会从这个高位去屠杀同意他下台的人。但是这是我说的假设，根本不是真的。斯大林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一点。然而在死前的几个月，他还是决定再次对周围的人和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忠诚进行检验。新的中央委员按照斯大林的意见经受了这种斯大林式的检验。

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对于人本身，对于人作为社会现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从来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人（而缺少这个方面就不能理解斯大林"遗产"的实质）只是作为同盟者、敌人、执行者、"螺丝钉"的人。不错，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曾对"高级人物"、名人、有"贵族血统"或出身名门的人发生过兴趣。在这种场合，斯大林对他表现了真正的兴趣，发出了相应的命令或者直接享受能支配这些人的命运的快乐。现举二三例于后。

监禁在莫斯科郊区"特别设施"中的保卢斯元帅，同苏联当局在转授和总结军事经验方面进行了合作。他曾几次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返回祖国，尤其是因为他对苏联的态度向好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好几年过去了，斯大林没有释放俘虏。终于在一天早晨，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内务部长的报告：

呈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向您报告，1952年2月25日夜，原德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发生了短时间丧失知觉的昏厥。同保卢斯一起居住并为他服务的有他的私人传令兵、战俘舒利捷以及私人厨师、战俘若尔日。由于长期的俘虏生活和解决他的遣返问题毫无消息，元帅开始出现神经错乱。我认为，对保卢斯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研究是适宜的。

C·克鲁格洛夫

1952年2月29日[10]


自从苏联的俘虏营被释以后，保卢斯就定居在德累斯顿的“白鹿山庄”。经过长期患病之后，这位元帅于1957年2月1日在那里寿终正寝

斯大林最终同意拟订遣返保卢斯的程序。这个在他手中掌握了十年的人，是表明“他”的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的象征。对于这样一个象征，他实在难下决心与其分手。

当斯大林获悉，1945年11月在萨克森靠近罗塞尔城堡的村庄里发现了威廉二世的妻子赫尔米娜·冯·普赖琴，他认真想了一下说：“要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

稍早一些，有人报告斯大林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发现了西班牙共和国前总理卡巴莱罗，他的身体状况极其虚弱。斯大林在30年代末同他有过交往。仅仅作了如下指示：“通知在西班牙的家，他活着。”不管怎样：总理、君主、统帅是“他圈子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也可以予以关照。

斯大林也曾过问满洲皇帝溥仪的命运。在击溃关东军以后，皇帝和他的家人及仆从被送到赤塔，而后又转送到哈巴罗夫斯克。显然，对他进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原满洲皇帝于1949年中期给斯大林的信就是证明。我现在从这封信中摘引几段。看来，这封信使虚荣心很强的“领袖”感到满意，当然，如果他没有觉察到“机关”又“努力做了工作……”的话。

呈斯大林元帅：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幸。我一直对您怀有深沉的

爱慕和敬佩之情,因此,我想告知关于自己想留居苏联的愿望。过去日本军阀限制我的个人生活。我不能了解苏联的真情……40年来我第一次读了您的书《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现在我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真正最民主和最先进的国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苏联政府废除了死刑。这是苏联在维护人道方面的新纪元……

过去我请求留居苏联。至今尚未答复。我想在这里工作。愿您永远健康和幸福。

爱新觉罗·溥仪[69]

斯大林读了译文,好奇地看了整页的象形文字很久,并突然对贝利亚说:"我们大概得把皇帝转交给中国人吧?"皇帝的命运——还可以屈尊作出个人的决定。而最好是整个解决一下在清单上开列的人们的命运吧。这是一些长长的清单,没有尽头的清单……

斯大林在社会中取消了任何的选择余地,使自己的遗产成为单维的消极的东西。他大概没有猜想到,他的历史性失败来得竟是这样快。他在最后几个月中,把自己的一些简短批示留在放置他不大看的那些文件的角落里时,他举起左手掌对着脸,好像是遮挡阳光。习惯!在一幅早期的照片上,斯大林也是这样的姿态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没有刮脸,穿着破旧的皮靴和污迹斑斑的旧大衣,头发蓬松,而一只手在眼前遮住光线……现在他是大元帅,大概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独裁者。可是这个手势——不,不是让"领袖"避开阳光。他是无意识中想使自己避开即将来临的历史性失败。

历史性的失败

赫鲁晓夫走上了苏共二十大的讲台。大会的代表们听了他的报告,无不为之震惊。主席团的场面模糊不清了,似乎有两个人在台上独唱:一个是赫鲁晓夫,另一个是十分熟悉(但现在变得陌生了!)的幽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灵。1956年2月25日，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他那有名的“秘密”报告时，“二十大”的代表们只能产生以上这种印象。约1500名代表紧张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死一般的寂静有时被愤怒和惊叫声所打破。赫鲁晓夫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在赫鲁晓夫的左右随时都有个幽灵在显现。第一书记用他特有的语调不知不觉地、同时又非常迅速地塑造着“各族人民领袖”的崭新的形象。很快，会场中心似乎只剩下一个舞台，台上有两个人在表演：一个是党的新领袖，约三年前死去的那个独裁者的一位前忠实战友；另一个是谁都十分熟悉的已不会说话的“领袖”，他在此处真正的历史舞台上已完全改变了面目，成为血腥而恐怖的暴君。这是一个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常的时刻。

似乎，赫鲁晓夫是把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召来了。看来，别尔嘉耶夫是对的，他在莫斯科，在自由宗教文化学院演讲时说过：“面对过去往往给人以某种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感觉，面不仅仅是属于那种经验过的现实，它像梦魇一般从四面八方压迫我们，我们必须战胜它，才能达到某种新的高度……”[⑩]确实，在作这个报告以前几个小时，谁也不能设想，党在多年的停滞和蜕变以后，居然还能达到这种“新的高度”。尽管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周围其他的人一样，要对那些违法行为和恐怖行为的年代负责，但那天在代表大会上他确实建立了真正崇高的历史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刚死之后，党的领导中就已经开始了不大明显的摆脱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过程。在贝利亚被捕并处决以后，进程的速度加快了。这一行动使新的领导能够更深入地大规模地审查斯大林在暗中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这对他的许多战友来说过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召开“二十大”(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的日期决定后不久,在党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斯大林时代滥用职权的罪行。第一书记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并非如他想让别人相信的那样是出于“良心的召唤”。问题在于:就在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被放在陵墓中列宁身旁之后,党中央和政府以及国家的各级机构都不断收到大量来信,写信的都是曾经被长期关在铁蒺藜“圈”内的人,是家属和亲人,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抗议和希望的浪潮,哀求的浪潮,人们相信被践踏的正义一定能得到恢复。

赫鲁晓夫吩咐在群众来信的基础上作出一个综合报告,这些报告结合已经宣布撤销的“列宁格勒案件”,结合一些来中央告状的犯人的已经重新审查过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许多控诉都是罪恶的捏造。情况已经很明显,在一两年之内,根据第58条各款被判刑的许多人将服刑期满,这些人必然会被遣送回家。他们身上已留下永恒的创伤和困惑,他们将要求惩办罪犯。这时,斯大林和贝利亚均已死去,再也没有人敢把他们送到劳改营监禁和流放了。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已感觉到,党和国家正面临着非常复杂和重大的抉择。成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激烈反对。但布尔加宁、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及当时尚在动摇的马林科夫使赫鲁晓夫占了优势。委员会成立了。领导人为波斯佩洛夫,他曾长期担任《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还担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下令,允许该委员会去查阅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应该说,波斯佩洛夫工作非常努力。不过,他像几年以前一样努力,那时,他和亚历山德罗夫、加拉克季昂诺夫、克鲁日科夫、米丁和莫恰洛夫等人一起编写《斯大林传略》。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波斯佩洛夫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全体成员作了报告。第一书记终于明白了,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将有关斯大林的谎言、神话和传说彻底揭穿,他自己就会在政治上完全毁灭。

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谈到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并问他的同僚:怎么办?委员会的结论如何向大会代表们传达?由谁来传达?让波佩洛夫来传达,好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很长时间内表示坚决反对,有时态度还十分激烈。这些激烈的争论虽然并未作记录,但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反对报告的几位同志也有他们的“强有力

的"论据:有谁强迫我们把这些"丑事"抖出来吗?偷偷地改正不是更好吗?赫鲁晓夫本人是否清楚,公布委员会的结论会引起什么后果?最后,还有一点,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就没有(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去那些破坏法制的行动?这一切危险难道都不应估计到吗?但是赫鲁晓夫胜利了。2月13日,中央通过了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们作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尽管赫鲁晓夫本人对这种做法也不止一次地犹豫不决。但他记起了遭到监禁的人们的来信,想到过去那些丧失理智的年代,他愈来愈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行为、破坏法制以及可怕的暴行所造成的后果不可长期隐瞒下去的。人民迟早会了解真相。必须争取主动并把可怕的真相告诉全党。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把真相告诉人民。

当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似乎即将像通常那样胜利结束,以便在其他同样呆板的、"有组织的"、立即被报刊称为"历史性的"代表大会中占一席之地时,一件主要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宣布,将召开秘密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布尔加宁请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言。这是赫鲁晓夫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曾经是一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对"领袖"表示过反对意见,这时却突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数十年来形成的偏见。正像后来才弄清楚那样,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步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过去在同僚中只是一位不显眼的执行者,但一当上党的最高领袖,他却成为一位处事果断、有时不免冲动的政治家。除了那次秘密报告以及内政方面采取的一些不寻常措施,在赫鲁晓夫的履历表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不平常的步骤,如为了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恢复关系,跑去见铁托,在古巴安装核火箭,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匈牙利事件时采取坚决行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建立友好关系,对毛泽东毫不妥协,支持越南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位第一书记具有复杂而矛盾的个性。正如这些事件所证明的,赫鲁晓夫身上其实并不具有坚韧不拔、勇于负责的精神。但是,这里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分析问题,而且常常前后不一致,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政治能力显然估计过高。有时,他采取的步骤看来干脆就是未经深思熟虑并且缺乏远见的。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体系所共有的老毛病,即把第一号人物的作

用绝对化。斯大林以后的政治体制照样不能避免恺撒主义,颂扬领导者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不出现新形式的崇拜。赫鲁晓夫的活动只是证明了不具有真正民主属性的体制所固有的弊病。

不过,我不得不离开本题。但非此不足以说明党的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即斯大林主义首次受到可怕的打击。这是建设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达30年之久的"领袖"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我不想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论点再作赘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对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及他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后果有多深远。

……总之,那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有两个主角:疯狂的赫鲁晓夫和幽灵般的斯大林。会场上寂静无声。只听到第一书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共15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构成部分,但又都是独立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薄弱的。例如,报告人在阐明关于个人崇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这样一些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时,却突然又谈论起"人民的敌人",接着又回过头谈起列宁和党内的反对派、集体领导等比较一般的问题。有几个主题一再重复,如恐怖行为的责任、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恐怖行为等等。在《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中,还阐明了斯大林与战争、同南斯拉夫发生的冲突、贝利亚及其他一些专题。

赫鲁晓夫开始时平心静气地说:"这个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有人已经写过许多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内战争和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期大林的个人崇拜究竟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一定的阶段成了给党的各项原则、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造成一系列严重而极其粗暴的歪曲的根源的。"会场上坐着那些代表第一次(!)获悉原来还有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早在20年代初就对斯大林作过评价。这是一种启示:真相将最终从禁锢中摆脱出来。赫鲁晓夫虽然还在痛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以及"布哈林分子",但是他首次说

出了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即列宁时期与反对派的斗争只限于“在思想基础上”进行。

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重点不是这些思想。他的发言的精神在于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赫鲁晓夫着重指出：“显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偏执、粗暴和滥用权力。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往往采取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方法，他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并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

当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编造出来，所谓“人民公敌”又是怎么一回事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正确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敌”的概念，就可以对那些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人，对那些只是被怀疑有进行敌对行为意图的人，以及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进行最残酷的镇压。会场上的人听了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来十分熟悉的穿元帅服的形象已逐渐变成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了。

在作报告的三四个小时之内，赫鲁晓夫看来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首先，报告人从斯大林头上摘掉了“领袖”的桂冠。赫鲁晓夫特别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个人统治的残忍和滥用权力

强调提出，斯大林是一个不够格的领导人，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国家和农业的情况"，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根本不考虑"党的工作者的意见"。第一书记本人熟悉农业，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他给了斯大林的幽灵以最猛烈的打击。赫鲁晓夫告诉大会代表们，斯大林在最后的几年中酝酿了从农业中增加税收400亿卢布的想法！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才会产生的幻想"。赫鲁晓夫证明"领袖"不内行，乱作决定，从而撕下了长期以来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错误的外衣。

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1944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1941年10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

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英明，更无远见。报告人同时还确认，暴行、犯罪和恐怖行为的主要责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还坚决地谴责了"领袖"的个人专权，认为这是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在公共意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对专横暴虐、目无法纪以及极权统治的一次极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进攻。

赫鲁晓夫不愧为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斯大林确信，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付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却又在历史面前获得了赦罪符。

赫鲁晓夫希望，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在党内讨论一下就足以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反常现象。对于这点，报告人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作了坦率的声明，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因此，我们只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报告。我们得有个界限，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我想，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这位革新者作出了决定性的突破，但却未能理解："秘密思维"，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维，是从那个幽灵身上继承下来的。赫鲁晓夫所说的"得有个界限"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异端告诉人民，特别是不能让世界公众知道。他在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障》，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来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长并定型的一切。赫鲁晓夫在"领袖"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违抗过"领袖"的意志，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正如斯大林其他战友的行为一样，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他

们都只习惯于执行，而不习惯于思索。赫鲁晓夫自己就记得，那些并不重要的、纯属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请示，他也无法作出决定。那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来个粗暴的拒绝或者嘲笑的反问。怎么办？还是请示为妙……

呈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目前正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作战的歼击营请求国家拨给以下物资。计

制皮靴用粗呢	104300分米
制靴面用油性软革	774分米
制靴底用皮革	20380分米
…………	
制内衣用棉布	196000米
线	525筒

尼·赫鲁晓夫
C·克鲁格洛夫
1946年9月18日[⑩]

不难想象，如果领儿筒线还必须向"领袖"打报告，那么，在政治问题上战友们恐怕什么都得经过批准。很自然，对斯大林主义首次进行了强有力打击的赫鲁晓夫，不可能立即去掉自己身上所有可耻的东西。

赫鲁晓夫的全部不彻底性，模棱两可，吞吞吐吐，在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⑪]中得到了反映。这份文件不同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虽然也想揭露产生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但却更明显地暴露了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妥协。决议中还断定说，只是"在斯大林的晚年"，才犯了"严重错误"。在揭露形成反列宁路线现象的"客观条件"时，决议在很多地方引用的都是斯大林本人的论点："在列宁逝世后，党内一些敌对派别就活动起来了，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站在拒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立场上，实际上

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接下去又说:"当时不得不对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们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逻辑证明这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在对个人崇拜这一丑恶现象进行说明,不如说是在对它进行辩解,赫鲁晓夫复活了"列宁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好像这个核心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情况远非如此。

决议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接下去就是断语,这个断语也可能是客观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不想说,早在列宁向党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决议对此根本不提,**认为在造成个人独裁方面,党并无责任**,还认为必须指出:"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本书作者注)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本书作者注)。"原来,这不是人民的悲剧,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剧……决议接着指出:"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作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

人们在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同斯大林的幽灵进行决斗,他作了首次打击,但这一打击却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却被获得的胜利吓坏了!难怪中央委员会和官方刊物对"秘密"报告要保持完全缄默,似乎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使之免受一场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但是,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以及党的舆论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了解到报告的内容,就难免会"走漏风声"。1956年6月初,报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在最后承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官方和党的机关刊物30多年来都仍然装着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现实问题的样子。直到1989年春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才发

表了这个报告。多年对人民封锁该文件这件事证明斯大林主义可惜还活着，只是改变了面貌。可是，正是党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义的，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进行到底。革新已经开始，总该有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产党员对待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态度，目前已是1989年中期，可是这样的文件尚未出现。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那已经是不加掩饰、公开进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并未消灭。接着，就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延误。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敢完全复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却接受苏斯洛夫和其他战友的劝告，走了另一条道路：给历史造一个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斯大林现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万人遭到折磨并被枪决的事，也不存在什么劳改营管理总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的资料。

波斯佩洛夫这类人（他们过去乐于写文章为斯大林吹嘘，也乐于为他写历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编写的历史大纲是极为简单的：似乎并不存在斯大林这个人。是党在领导一切（即使不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话，那也是夹在其他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领袖之中，他是众人之一而已，只不过是犯了"一些错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思想领域却长期受到了冷落。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在悄悄地进行反攻。

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还存在。新人起来了，他们却仍在利用这个制度的机制。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索尔仁尼琴以及别的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解冻时期"所写的书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几年官方对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及50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镜"。

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

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污蔑苏联的活动，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⑲]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当然，也还有人作出了别的反应。

1979年，在斯大林诞辰100周年时，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书，详尽地描述了他与这位“人民领袖”五次会晤的经过。书中并没有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何不喜欢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论据，却只是十分气愤地、感情冲动地表示对谴责领袖至上这种思想本身感到不高兴。霍查写道：“赫鲁晓夫及其同谋者在他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企图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贬低他。”[⑳]


纪念斯大林诞辰一百周年雕像

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消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的。有人震惊，有人迷惘，但理论思考活跃了，有人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也有人变节了，这一切都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来一次革新与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同时产生了。所有这些对莫斯科“二十大”上所发生事件作出的极为矛盾的反响已成为现实。我想，赫鲁晓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会产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后果。

赫鲁晓夫和已经死去的“领袖”的幽灵终于成了1500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面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各种观念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至今尚未结束）。一方面，是正统的、僵硬的、官僚主义的、强制的、不妥协的、单维的，为了思想的胜利，甚至不惜去证明犯罪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主的、人道的，观念上是多维化的，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产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有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妥协与共存。当然，赫鲁晓夫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那种概念的观点。但我敢说，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事业,但毕竟使我们不仅有可能理解时代,而且有可能深入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过头来看看别尔嘉耶夫,他也许比别的许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哲学的奥秘。人们正是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才能透过万古长青的生活三棱镜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谜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对它们有所了解。别尔嘉耶夫写道:“每个人按其内在的本性来说,都是一个大世界,也是一种微观世界,其中反映并存在着整个现实世界和全部伟大的历史事实。”[13]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时间的层次,试图理解一去不返的东西,也就同时有可能看到你想为之画像的那个人的思想、意志和热情的结果,时而是非常微弱的、时而是大喊大叫的“痕迹”。“发掘”往昔的、已经不再喧嚣的、可怕的东西的遗物对此会有所帮助。斯大林主义的遗物需要长时间地加以认识。有时,除了分析具体事实,我还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哲学的方法,这种历史哲学在这里就像是向后看的“预言”。人们只有理解了过去,才能作出面向未来的“预言”。

代结束语

历史的裁决

1945年初，当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化的时候，贝利亚在一次晚间汇报时不声不响地把一张字迹写得很工整的纸头放在斯大林面前。旁边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打字机打印的文本。斯大林知道，汇报给他的不是"一纸"空文。"领袖"留意地看了看贝利亚，就埋头读起来了。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们是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孙子伊里亚·伊里奇·托尔斯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我们及我们的家属在南斯拉夫领土上被红军部队从德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我们作为侨民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3年，请允许我们回归祖国，以便参加战争。

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到我们的侨居是错误的和有罪的，请求给我们权利，让我们有可能参加我国人民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为祖国的幸福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地区帮助红军进行战斗工作，我们的心已经同红军融合在一起了，现在我们只希望把自己的力量和生命奉献给自己的祖国。

我们希望，您作为一个人，能够感觉到和理解到我们的意愿是真实的和诚挚的，并请不要拒绝我们。

致

深深的敬意！

伊里亚·伊里奇·托尔斯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

1945年1月20日于南斯拉夫新贝切伊[①]

斯大林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贝利亚，最高统帅心里想："这就是贵族的傲慢了：……参加'我国人民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就算是承认政权而不承认他这位领袖，那也不错……贝利亚打断了斯大林的思路，性急地说起来：

"……这个伊里亚过去是个地主，1916年毕业于沙皇军队的海军中等武备学校。国内战争中站在白匪一边战斗。在高尔察克被击溃后逃到哈尔滨，又从那里经过日本和意大利逃到南斯拉夫，从1921年起一直居住在南斯拉夫。1933年起是反苏组织'青年俄罗斯党'的党员，战争前夕是该党贝尔格莱德分部的领导人。1939年以前曾为刊登文章造谣污蔑苏联领导的白卫报纸《俄国事业报》撰稿，宣传君主制思想。他的生活十分贫困，当过会计，同儿子一起做过鞋匠，制作过木偶。现在儿子尼基塔跟红军的一支部队走了……"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问道："那另一个托尔斯泰呢？"

"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第一中等武备学校受过教育。1917年以前是德国前线的志愿兵。后来站在白匪一边。随弗兰格尔的军队逃到了君士坦丁堡。在南斯拉夫靠当建筑工人过活，在菜园子里打过短工，在马其顿的烟草仓库里干过活……"

"那是否有反苏活动呢？"

"这方面的材料暂时还没有。在德国人统治时期因同情苏联曾被关进集中营。"

斯大林没有说话。他依稀记得国内战争那血流成河的情景。他抱着一种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想法："现在会有多少这种悔悟认错的人呢？历史已向所有的人证明了他的强大和正确……这些旧时代的余孽……"，贝利亚好像知道"领袖"在想什么，他插话说："在南斯拉夫大概有不少各式各样失势的人：白卫军官、哥萨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是这样……我认为，应当把这兄弟俩送收容营审查……为什么我们要把他们作为例外呢？"

但是斯大林再次沉默片刻后，竟出乎意外地没有同意自己的刽子手的意见：

"随他们去吧。把这封信转交给莫洛托夫。让他们回国。让历史去审判他们……"

仅仅过了两个半月，就对托尔斯泰兄弟俩的申请最后作了批示：

"应当准许这二人回苏联。**维·莫洛托夫**。1945年4月3日。"[2]而到了10月,伟大俄国作家的两个孙子的全家已获得了苏联国籍。

"让历史去审判他们……"这是斯大林的很不平常的声明。他习惯于自己进行审判。"领袖"早就确信历史会审判所有的人,只有他除外。在独裁者看来,他似乎凌驾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上。虽然他明白,过去吞噬了许多人,而最终将吞噬所有的人,但是过去未必会这样对待他。他这个基督教徒虽已成为无神论者,但知道这个伟大的宗教是赞美复活的。但是他不需要复活。他相信,不必人为地唤起对他的回忆。至于审判……既然斯大林看问题武断,自认为无所不能和至高无上,他早就作出了推论:历史对他不会进行审判,而会学习他,推崇他,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要知道,他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强大的国家,坚如磐石的党,在他领导下取得如此之多胜利的团结一致的人民。不,斯大林连想都不会想到历史会对自己进行什么审判。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建立了丰功伟绩,只会得到极大的报酬。

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将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他逝世两年之后,《苏联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集《百科辞典》在一个很长的辩护性条目中指出:"斯大林是弗·伊·列宁的忠实的学生和战友,是他的不朽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是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3]但是,这种下意识的辩护习惯没有能坚持多久。

今天我们都知道,对斯大林的公开审判自1956年2月开始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就是在个人专权时期,也有人当时就公开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斯大林的政策。这里举几个例子。在军事档案中有不少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汇报都证明,1937—1938年间的血腥恐怖活动不仅博得了盲目的赞许,而且也使人张皇失措、意志消沉,有时还激起反抗。下面我从军政委戈沃鲁欣、师政委沃尔柯夫、旅政委克鲁格洛夫的政治汇报中摘录几段(这些汇报没有注明名字和父名,当时的情况常常是这样)。

第101炮兵团尉官非党人士什克罗巴特说:"我不能相信斯大林所说的雅基尔和图哈切夫斯基是人民公敌。"

红军战士祖布罗夫说:"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绞刑架不够用,而现在子弹不够用。但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杀光。"

炮兵学校教师特鲁欣斯基说:"斯大林本人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吗?”

舰长基里洛夫说:“我不相信布哈林等人是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无非想更换党的领导。”[3]

在汇报中这样的事实可以举出不少。通常一遇到这种情况就通知说:把某某“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侦察”。一表示困惑,稍有反抗,马上就遭到镇压。

我记得,早在战后,在40年代末,具体时间不记得了,我们在农村的一个邻居普罗柯浦·莫恰洛夫曾悄悄地对我的叔叔说:

“斯大林粗暴地对待集体农庄……真想不到,把农村糟蹋成这个样子,已经好几年了,只是过节我们才能吃上面包。什么都抢,光知道征税……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像我这样的人当时也不知道人们能够而且应当生活得更好。而另一种生活——不受穷,不会长时间地缺吃少穿,不受这样那样的限制,不被动员——我们根本不知道。人人都穷,大家都按一种模式生活,这已成了正常现象。能够审判斯大林的,是那些见多识广、因而能够同自己今天的生活对比的人。我还确凿地知道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许多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学者直接地和含沙射影地表示了对斯大林的意见。这些人的思想没有完全被玷污,他们的良心没有变坏。为什么人们进行社会性的、精神上的反抗,消极的而有时甚至是强烈的反抗,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历史的裁决首先要由人民作出,因为人民跟随这个粗暴地修正了伟大思想的人走了30年。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斯大林的政治面貌会不断变化,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厉害。我已经指出,可能我不能画出这个暴君的全像。也许我只是尝试着勾出一个草图,让别人利用它把像画完。但是,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评说和刻画斯大林,这意味着考察、探究一个时代,即这个人曾在其上留下很深的带血的压痕的那个时代。仅靠一本书未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不管怎样,我认为,在对数千份文件、斯大林的往来信件、独裁者的决定和指示、他的战友和与他交往的人的回忆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有权在画像时再“抹”上最后的“几笔”。为了做到这点,我将尽力对一些问题作出答复,希望我的分析能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作出自己的历史裁决。

斯大林是不是革命者?看来,他曾经是。但他是什么样的革命者和在什么时候是革命者呢? 地下工作、流放、坐牢的年代,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革命的真正领袖列宁的影响,这一切使这个人形成了一些当年许多人都具有的特点: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性;坚信现实可以按照信念来改造;喜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阶级标准绝对忠诚,对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持虚无主义态度。由于自己在十月革命中不大引人注目,斯大林并没有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素材。他在革命中当配角,尽管他也算是革命领导的一员。但是,有一些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材料证明,斯大林有时也能作出独立的决定,对于这一点列宁不能不给予重视。例如,在1917年11月28日由列宁主持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有托洛茨基、斯图契卡、彼得罗夫斯基、明任斯基、格列博夫、克拉西科夫、斯大林、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其他一些人),除讨论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讨论了这样的问题。我来摘引一段会议记录:

会议听取了:

2.关于逮捕人民之敌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本书作者注)内一些最著名的中央委员并将他们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法令草案(列宁同志提出)。

会议决定:

通过并批准(除斯大林一人外全体一致通过)[5]。

斯大林的这种行为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或许斯大林是想以此显示自己?文件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表明,斯大林在发展成为一个革命者时经历了一个相当奇异的演变过程。他并非一直都是吸血鬼。起初,这种演变是相当健康的。怪不得列宁同意推荐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稍后,在对他下评语时,又称他为"杰出领袖"之一。我在前面说过,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提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是加米涅夫。不过官方的报道不是这样。例如,梅赫利斯在1949年4月9日的《真理报》上公开断言,斯大林成为总书记是"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但梅赫利斯这个人太令人厌恶,他的话难以叫人相信。

今天我们知道,最高职位很快就使斯大林发生了变化。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权力比任何爱克斯光机都更能使人"现形"。斯大林开始变了。这个不大引人注目的人身上潜伏的许多坏习气迅速暴露出来。斯大林"现了原形"。在斯大林被任命之后还不到一年,列宁就发现,这位革命领导人之一在政治上和道德品质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在列宁逝世之后，呆在总书记职位上的那个人很快就不再是革命者，而变成独裁者了。在30年代初，他已成了第一执政官，成了恺撒。用饶勒斯的话说，从此"革命之光将在特米多尔（即1794年7月27日法国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专政、结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政变。——译者)的黑暗统治下若隐若现"[6]。从暴君的身上已经很难认出过去的革命者了。1917年11月28日,当斯大林反对列宁关于把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的提议的时候,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他快到70岁的时候,即1949年9月,竟能平心静气地、毫无意见地批准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的一大"包"判决材料:

9月2日——判处30人服20年苦役;

9月10日——判处52人服20年苦役;

9月16日——判处31人服20年苦役;

9月24日——判处76人服20年苦役[7]。

随后的几个月也都是如此,是命运驱使独裁者这样做。可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罪犯。难道斯大林现在不像一个屠杀自己人民的残酷无情的刽子手吗?如果在画像时不添上这很有代表性的一笔,岂不会有歪曲本人形象的嫌疑吗?这个人以革命者开始,以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告终,他的30年演变的两极就是如此。

斯大林曾是个激进分子,但他从来也没有过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奔放的想象力。甚至在以列宁为首的、领导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所有领袖都期望燃起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烈火的时候,斯大林对待这种观念却十分冷漠。他不大相信这种观念。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上提出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有权进行"红色干涉"的建议,认为"红军的传播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革命的传播"[8]的时候,斯大林带着讽刺的意味笑了笑。党的第一个总书记一听人说起欧洲的革命性(其实亚洲也一样),就深表怀疑。他更为满意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大概可以说,无论斯大林或者托洛茨基都具有小资产阶级

革命性。但是,托洛茨基要求进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心里认为这是空想。他的革命性不是向横的方面发展,而是向纵的方面发展。

斯大林有很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时候一到,他就要安上一道"铁幕"。国外人员来访(即使是出于公务上的需要)在斯大林时期以及后来几乎都被认为是可疑的事情。如果说在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防疫线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那么后来想方设法这样干的已经是斯大林了。这首先是因为他害怕现实。例如,如果不让苏联人民同真相隔绝,又怎么可以使西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神话不被戳穿呢?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革命的词句。对于这位独裁者来说,如果革命不是他所"批准的",那革命本身现在也成为可疑的了。

斯大林作为国务活动家表现怎么样呢?斯大林只是在1941年5月6日才担任国家最高职务,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诚然,他在开始飞黄腾达时,曾一下子占据两个重要职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斯大林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他认为是空想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议论上。他也谈到过这一点,例如,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但那仅仅是在一个关键地方:国家未来的消亡将要通过它的大力巩固和加强来实现。"来自上面的革命"——在十月革命后他只承认这样的革命——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不带民主特征的"铁血"政权。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存在着必要的抉择的情况下,人民通过自由表达意志,可以而且应当把委任统治权授予新选出的人民代表。斯大林刚一掌权就决定搞终身制。在国家机器中,他把机关看得高于一切,他最重视的是内务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甚至把党变成了一个变相的特种机关,或者说,搞国家意识形态的修道会。

斯大林一眼就看出,可以用国家来行使一种特殊的权力,这种权力能使自己永远合法。他没有赤膊上阵,庸俗地说"朕即国家"。但甚至在1941年以前他还不是政府首脑的时候,他就已经对立法权和行政权拥有绝对特权。党和国家这部机器对斯大林来说成了保证权力由个人独占而不与人分享的手段。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柏拉图的《国家篇》,不过,假如他读了这部著作,就会感到十分惊奇:他居然是按照古人的做法行事的! 柏拉图写道:"法律一经制定,就要宣布它们对被统治者是公正的……谁触犯了,就要按违犯法律和公正治罪……一切国家确

认公正的标准都一样，就是要对现政权有用。要知道，政权就是强力。因此，有人正确地认为，所谓公正，不论走到哪里都一样，就是要对强者有用。[9]”

为了使人民清楚地了解只有国家才能确定公正和不公正的界限，必须对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采取无情的态度。按照老的习惯，天天都从写给斯大林的大批信件中选出几封有代表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他的机关。但是，斯大林几乎从不给人以口实，让人以为国家“犯了错误”。例如，有一次他的助手往文件夹里放了一封十二月党人的曾孙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彼斯捷尔的亲属的来信，信上说他已经坐了10年监牢，他没有手，请求可怜可怜他……要知道，彼斯捷尔的名字对俄国来说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斯大林毫不在意地把这封信搁在了一旁。还有这样一封信：

> ……我的四个儿子，过去的勋章获得者和功勋运动健将尼古拉、亚历山大、安得列和彼得四兄弟于1939年3月21日被逮捕并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判处每人剥夺自由10年。
>
> 请恩准我的几个儿子到前线去战斗。
>
> 斯塔罗斯京娜·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芙娜
>
> 1944年3月12日[10]

斯大林把这封信也搁在一旁，让贝利亚去审理。贝利亚了解他这位“领袖”的方针：国家不会平白无故地惩治什么人。

为什么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整个官僚制度加强了？问题在于，在独裁者统治时期，不管斯大林如何声明，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处于痛苦的过渡阶段，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官僚制度恰恰只能加深矛盾，使问题变得更严重，而不能解决它们。权力问题、文化问题、社会思想问题、人权问题，由于官僚制度作祟，许多年来只是在表面上得到解决。在国内方面，国家千方百计地推动官僚机构的发展，因为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监视人员、督促人员、监督人员、检查人员、设计人员、定额人员和视察人员。外部政治形势也促进了官僚制度的加强：革命运动遭到的失败越大，战争的威胁越厉害，似

乎就越有理由采取“拧紧螺丝帽”的办法。这样,官僚制度长期控制着人的思想,控制着党和人民,终于成了国内主要的胜利者。在官僚制度的庙堂内,它的主要祭司就是“伟大的斯大林”。实际上,“各族人民的领袖”成了整个官僚制度的化身。斯大林式官僚们的冷酷和淡漠使十月火山口喷出的革命熔岩冷却了。需要经过许多年,历史才会给予清算。

社会主义和个人独裁是不相容的。而斯大林竟把两者综合在一起。这一事实本身就为历史裁决提供了材料;独裁者——这就是数百万人没有自由而只是一个暴君享有自由。应当承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敌人比布尔什维克更早就发现和指出了这一点。早在1932年,巴黎就出版了亚历山德罗夫的小册子《斯大林是独裁者吗?》,该书试图回答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和暴君的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作者写道,斯大林“并没有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而他所建立的忠实于他的铁血班子却把王权——领袖地位奉献给了他,在这个班子中,为首的是党的一批举足轻重、事事都赞同他的新领袖”[①]。谈到这里,我要强调指出,对于与斯大林有关的过去,党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产生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仅是国家和社会,而且还有它们设置的一切。

斯大林始终相信国家机器的作用,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稍有表现,他都要投以怀疑的目光。任何想要建立一种在机关的指令中没有明文规定的、而是自己搞起来的、最无恶意的群众组织的尝试,都会被他看作是敌对行为。斯大林能够把个人专权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诚然,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实际上已成为专制制度了。

斯大林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 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作者,而是时代。如果是我,那我就要说:斯大林不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在他那封建议调换总书记的信中已直接声明了这一点。党的代表大会没有听从领袖的告诫,而是掉以轻心。然而,斯大林给自己作了重要的结论。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总书记开始了对党本身进行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到20年代末,这个党已经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列宁的党不同的党了。斯大林实际上成了另一个党的领袖。这种改造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在党的成分上。如果深入地回顾一下党的历史,那就可以看到,它是各种集团亦即当时人们所说的各种“派别”、“倾向”、“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历史。我认为,无论过去或是后来都把不

同思想的存在过分戏剧化了。争取统一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争取只让一种思想存在的斗争。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党内就需要有管制思想的官员和等级森严的各级工作人员。由于不可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又要为执行所通过的决议而斗争,这就使革命政党面临着蜕化的危险。产生了上级任命干部的做法,确立了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权力(它的后面往往就是斯大林的意志);民主集中制蜕变成了官僚集中制。在这种情况下党真正变成了磐石一块。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是极小的创造潜力。列宁在他1922年3月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党员发展过多表示担心,他坚持要求对接受党员要规定更严格的条件:"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因为所有材料都表明现有的一些党员的修养水平很差。"[12]

然而,由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努力,接受党员的条件更加放宽了,党急剧地发展起来,正如总书记1925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报告的,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13]。到1928年时,已有三分之二的党员是在1921年以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加入党的,而革命前入党的共产党员只剩下百分之一多一点。革命的前卫已经显不出来了。

不少没有受过必要的政治锻炼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低下的人加入了党,他们把入党看成是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方法。同时对接受"专家"(过去的工程师、教师、军人)入党却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党员的整个水平,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成熟性明显地降低了。对新的党员特别注重的是他们是否决心执行中央的"指示",赞成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的"方针"。列宁逝世以后,在五六年当中,党在成分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变得更加"驯服",开始具有庞大的特种机关的特点,正像我已经指出的,很像个搞意识形态的修道会。在党发生巨大变化后,斯大林就更加适合于对它进行领导了。

此外,到30年代初,列宁时期党的领导层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照斯大林的说法,已经在他的帮助下"从车子上摔下来"了。党的新领袖如果不大大改变党的各级机关和组织的成员、结构和职能,他就不能成为国内和党内的专制君主、恺撒、独裁者(这个问题不知为什么我们谈得很少)。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当"列宁近卫军"的最后一批成员终于开始着急和醒悟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完结了。实际上在各个岗位上

都已安插了总书记亲自提拔起来的人，因此，对于“斯大林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说：他是斯大林化了的党的领袖，这个党已失去了列宁武库中的很多东西。剩下来的只是没有民主的集中制，没有创造性的纪律，不能容忍异见，不容许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党中央机关早在20年代中期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各种职务的党员干部的任命。斯大林对这一活动领域实行了特殊的控制。例如，在40年代，主管干部工作的马林科夫在决定党的工作人员的提拔、任免时，都定期向“领袖”报告“斯大林近卫军”的中层和上层的变动情况。翻阅一下马林科夫的全宗、他的通信、他给斯大林的报告就可以看出，通过这一渠道不断输送材料来加固庞大的官僚体系，从而把党、国家机关、苏维埃、安全机关以及其他组织综合为一个整体。在马林科夫的全宗中有长长的被推荐者的名单：施坦科、马祖林、潘菲洛夫、A·И·伊万诺夫、帕尔费诺夫、奥柳宁、布雅诺夫、H·M·伊万诺夫，以及许多其他的名字[13]。后来，这些人都根据“领袖”的旨意幸运地得到了提拔。

斯大林所以能成为党的“领袖”，是因为他把社会变成了单维的。我们的敌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例如，有个叫库登霍夫-卡列尔吉的侨民1932年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欧洲》一书中指出：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秩序，“……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意志，一种世界观，一个党，一种制度。整个苏联就是一个独家经营的种植园，全体居民就是一支独一无二的劳动大军”[15]。这话怀有恶意，战败者常常这样说；但是，他所发现的社会单维性，在那些年代看起来是力量的体现的单维性，后来已经受到了侵蚀。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裁决，它在今天证实了这一点。多样化和多元论比斯大林所十分喜爱的万马齐喑的和死气沉沉的单一化更有助于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精神领域和道德观念方面实行创新。

斯大林从来不是个预言家，虽然他相信空想。他只是直视自己面前的东西，像通过永备发射点的射击孔一样。他取得胜利（以及人民进入悲剧）的秘密之一就是他能逐步用官僚大军来代替革命者的队伍。如果说只是斯大林建立了官僚制度，那是不对的。他们是互相需要的。没有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整个官僚制度就不可能得到蓬勃发展。他片面地理解了过去，不然，他就可以明白他飞黄腾达的另一个秘密。任何

的革命都会产生反革命:强大的或者软弱的。十月革命也产生了反革命反动派。为了扑灭它,当时就需要有对付它的第二次革命浪潮。这次浪潮延续了很长时间,它把许多新人托到自己的浪峰之上。这次浪潮把斯大林托举得最高。总书记在这个浪峰上坚持了下来,同时还把自己的潜在对手一个接一个地推到水下最深处。当革命退潮最终到来的时候,斯大林就高出于其他人而出现在岸边,伴随他的是一大群官僚,他们牢牢地控制了正在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的所有要害部位。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官僚制度的铅一般沉重的臀部压到了革命的头部。"[10]从此社会主义建设就被看成是行政任务,而不是社会任务。

我再一次提请读者注意斯大林作为革命者、国务活动家、党的领袖的特点。前面我曾试图揭示这个人作为理论家、战略家、外交家的各个侧面。这一切总和起来,希望能有助于哪怕是勾画出一个复杂人物的肖像的草图。关于这个人,一直在无休止地进行争论,还伴有激烈的谴责、痛苦的困惑以及想把过去的偶像的伟大形象多少保全一点点的尝试。总有一天,根据历史的裁决,通过共同的努力会将这个人的政治肖像绘制出来。

在进行了以上的分析之后,今天可以作出结论说,斯大林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这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政治至上观和政治谬见来观察整个周围世界的。斯大林认为,以数百万人的不可名状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有可能达到空想的"人间天堂"。实际上,斯大林的政策的出发点是:过去的全部历史只是"真正的历史"的准备阶段。在他看来,遥远的未来的几代人将会达到乐土,他们的幸福会证明过去和今天活在世上的所有的人没有白白地经受生活的磨难和痛苦。斯大林决心牺牲人民的过去和现在以实现虚无缥缈的未来。但是,正像别尔嘉耶夫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过去是个幻影,因为它已经不存在,而未来是个幻影,因为它还没有到来。斯大林从来不能在政治上克服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脱节现象,他认为,今天仅仅是个"史前期"。

斯大林疯狂地赶时间("我们落后了100年,应当用10年时间跑完这段距离")。他决心消灭数百万人,以便"提前完成"集体化计划;他认为,为了"在最短期限内"达到完全"一致",使自己的数千名党内同志化为乌有是很自然的。看来,斯大林相信绝对者,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今天的无数罪行来为未来的几百万同胞"造福"。他的"创造未来"的政

策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管它用什么样的善良愿望作为迷彩。为了使这一政策得以实现，斯大林认为今天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几百万同胞的未来。下面就是为实现斯大林过去所作的决定而发出的一个文件的摘录：

"内务部报告说，以1950年1月1日为准，登记在案的移民和特种移民（连同家庭成员）为2572829人。在哈萨克斯坦为894423人，其余的大致被平均分配和安置在中亚细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278636户有自己的住房；625407户有自己的菜园和家畜。1949年有1932个移民因从安置地逃跑而每人被特别会议判处20年苦役。按照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的命令，所有这些人要分散到各个居民点去，永远住在那里……"[17]"永远"住在那里……这种劫难竟和……社会主义相容？真像是在遥远的沙皇时代：流放、苦役、失踪。诚然，两者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看来，别尔嘉耶夫说得对（我还得引用他的话），他在自己的著作《俄国革命的灵魂》中说道："没有一个民族像俄罗斯民族这样能把如此不同的时代连结在一起，能把20世纪同14世纪结合在一起。"[18]但是，把中世纪的残暴行为带到20世纪来的不是人民，而是斯大林。斯大林所带给我们的悲惨的历史经验同人民的行为和精神是截然对立的，人民是要除掉斯大林主义的。仔细分析一下苏联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我们就能格外清楚地看到这种倾向。

现在还有一些人仍在说："我们是呼着'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口号投入战斗的"，"难道可以否认人们爱戴他？"不，不能否认。人们真的爱戴他。但是，他并不爱人们！不仅如此，他还狡诈地欺骗千百万人，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自然也就要相信他。我认为，这是全体人民"一时受蒙蔽"，是一种极为反常的情况。确切些说，这是巧妙地利用千百万人对社会公正、幸福、繁荣的无比向往来达到最可耻的目的。群众的热情、英雄气概、自我牺牲精神帮助斯大林建立了由他一手操纵的制度。专制君主把国家变成了"斯大林强国"，在这个国家中，只有他的思想、指示和意志才具有"历史意义"。

我们还要多花一些时间再一次回过头来探索一下使领袖至上主义以及极权统治这一特殊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竟被斯大林冒充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得以确立的深刻原因。由于缺乏各种合理的抉择，确切些说是由于取消了各种抉择，斯大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机

会。无可怀疑,斯大林比其他战友更早地懂得了"政权"如何能掌握在惟一的一个人手中的"秘诀"。他在读洛津斯基的《古代世界史》一书时,还在20年代末就在几处很能说明问题的词句下面划了着重线(我早就确信,专制君主划了着重线的都是他个人认为重要的地方)。在介绍奥古斯都(屋大维)那一章中,他用铅笔标出了下面两个词:"第一公民……最高执政官。"在研读介绍恺撒的那一部分时,斯大林划出了"领袖——胜利者"这一用语。在《俄国历史教程》一书中,斯大林给下面一句划了着重线:"成吉思汗屠杀了许多人,他说:'为了胜利者的安宁,需要战败者的死亡。'"是的,他是个胜利者(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打错了算盘",这一点要很久以后才看得清楚)。但是,为了他的"安宁",竟需要死那么多人,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额外添上的几笔可以充分使人确信: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的论敌就不如他。为什么领袖至上主义没有遭到应有的抵制呢?问题不仅仅在于我在本书前面就已谈到的那一系列原因。问题还在于缺乏**革命民主制**,或许只有革命民主制才能够防止斯大林的专制。

当然,一个顶上立着一只乌鸦的、用人的颅骨筑成的金字塔,即韦列夏金在他的《战争的光荣结局》中所画的那个金字塔,是可以成为斯大林个人专权的象征的。但这个象征过于简单化了;金字塔里面隐藏着活下来的人民,他们确实被自己的希望和信念欺骗了,但对他们来说,过去时代的悲剧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而对这段历史既不能报复,也不能嘲笑。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否定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斯大林主义掺进我们生活中的东西要交给历史审判。审判将是长期的、痛苦的,但却是可以澄清问题的。列宁说:"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19]列宁的话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

是的,我们正在逐步克服斯大林主义这一祸害。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我认为,不能以此为根据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甚至在遭受巨大的历史性挫折(对人民来说则是个悲剧)之后,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也为时过早。我们着手进行的革新还不能有根有据地回答: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是什么?今天的一些措施和办法目前看来还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宜之计,是不治本的和不彻底的。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

自己的历史经验——挫折和成就。我们确实没有很好地向其他国家人民和其他社会学习。或许,要通过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中一些崭新的做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需要有新的社会主义构想,指望一次例行的全会或哪一位国务活动家的发言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天真的。只有使社会民主化,才能逐步使人民投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活动中来;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像所希望和所期待的那样解决问题。我国人民十分伟大,不会稍有所得就感到满足。除掉了斯大林主义,它就有权期待更好的命运……

人民的记忆是常青的。实际上,记忆永远是"复原"往事的基本形式。我认为,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谈得那么多的永恒性,无非存在于记忆之中。正是记忆最终会对时代、事件、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使时间能保持联贯。依靠记忆,我们今天就比斯大林在世时更多地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依靠记忆,我们就能够通过悔过净化灵魂;为了使心灵从斯大林主义造成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记忆能帮助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数百万受害者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某些人可能会说:本书作者在画像时只选用深色和暗色。我对斯大林没有特殊的成见。而在10年前,当我开始为本书收集材料时,我还未能想象到,我将观测到的会是多么卑鄙的灵魂和多么不道德的行为。在查阅了档案,会见了一些尝受过斯大林的地狱之苦的人之后,那些被蛮横残酷地夺去生命的人的无声呼唤往往久久地在我的耳际回旋。我不能把本书写成另一个样子。

我们的省悟是逐步演进的,它经历了几个阶段。我认为,当那些在"领袖"的直接庇荫下生活过的人不存在的时候,即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人们说起斯大林时会更"平心静气"一些。可能"平心静气"这个词用得不当。他将作为摧残人类文明的一个大暴君而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但时间的流逝会使疼痛感减轻。时间不仅是个最好的编辑和传记作者,而且是个医师。使我们永远都会感到震惊的是,在残酷无情的专政条件下,人们竟是那样顽强地保存着(并非仅仅是出于恐惧!)自己对正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信念,保存着作出牺牲和长期忍受痛苦的能力。遗憾的是,过去的烟云吞没不了暴君,但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使遭受暴君迫害的人不要被人遗忘。

我知道,对于一个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将永远留在史册上的人物(如帖木尔、成吉思汗、希特勒以及其他暴君和独裁者),如果不经常依靠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数据,会是无法理解的。我是尽量这样做的。但是,我认为,历史作出的裁决的主要内容将与道德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呢?

无论多么重大的政策,如果不讲道德,都是冒牌的珍品。斯大林是个残酷的政治家,他在整个一生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一点也不考虑起码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对于独裁者来说,人是个工具,是个统计单位,是一大片不成形的物料中的一块。由于对道德采取罪恶的轻视态度,"胜利者"遭到了恶报;他的历史性的失败早已注定,势所必然。我认为,这将是诸项历史裁决中的一项。

斯大林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鲜明地揭示了一个古老的道理:非正义的第一个受害者始终是真理、真实性。斯大林(这可能是他最大的罪行)歪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并把它们偷换成自己编造的神话。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列宁主义,是犯了思想罪。斯大林以自己的整个一生和自己的行为证明,谎言是无缝不钻的祸害,一切灾难都从谎言开始。暴力、个人专权、官僚制度、教条主义、恺撒主义——这一切都被谎言美化了。无论何时,只要同谎言沾边,就可能出现灾难。我认为,这也是历史裁决中将要提到的一点。

在试图给斯大林画政治肖像时,我痛切地感到,我们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于轻视自由才发生的。自由曾经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追求的目标。但是,争取到自由之后,普通人却不能享用它。斯大林否定了自由,他的理由是,自由是危险的。自由只有在真正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就会有名无实,实际有的只是思想上的盲从、对个人的神化和束缚头脑的陈规旧套。斯大林甚至不喜欢谈论自由。认为自由只有一个来源——社会来源。然而,社会自由只有同精神自由结合起来,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

我在本书中经常谈到良心,甚至可能是过于经常地谈到良心。像斯大林这样的人认为良心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怪"。这里谈的不是独裁者的良心,他根本没有良心。但是,参与斯大林的一切罪行的人常常知道他们是在干坏事。极为不幸的是,想凭良心办事的人太少了。很多人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中,用柯罗连科的话说,良心都"麻木

了”。结果,伟大的人民竟允许把良心赶进禁止使用区,让伟大的宗教裁判官有可能长期干自己的肮脏勾当。我们没有丧失一切,仍保持了对崇高理想的信念,并且能够进行悔过、得到复活和新生,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使自己的良心从可耻的不自由这一束缚下获得了自由。我这本书的主旨是:良心发现的时候随时都存在。甚至在数百万人的悲剧跟一个人的胜利同时俱来的时候。自由不是可有可无的。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相信这一点。

我要用我在本书绪论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本书:“人们的裁决可能变幻无常。历史的裁决是永恒的。”

注释索引

第八章

①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0卷宗,第257—259页。

②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5全宗，第725588目录，第39卷宗，第297页。

③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101卷宗,第23、35、37页。

④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6全宗,第2951目录,第2951目录,第239卷宗。

⑤同上,第243卷宗,第129—130页。

⑥Ф·哈尔德《军事日记》1971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27页。

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725588全宗,第36目录,第19130卷宗,第197页。

⑧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1卷宗,第1—2页。

⑨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881474目录,第12卷宗,第246—253页。

⑩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0卷宗,第260—262页。

⑪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071目录,第1卷宗,第6—8页。

⑫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08全宗,第2513目录,第71卷宗,第203—204页。

⑬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725588目录,第36卷宗,第239页。

⑭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28卷宗,第1页。

⑮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881474目录,第12卷宗,第175—190页。

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卷宗,第47页。

⑰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卷宗,第25页。

⑱《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9期第75页。

⑲尼·别尔嘉耶夫《人的使命》巴黎“现代论丛”出版社1931年版第15页。

⑳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4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39页。

㉑尼·洛斯基《俄国人民的性格》1957年法兰克福版第70页。

㉒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701323目录,第38卷宗,第53页。

㉓E·塔尔列《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1812)》1938年莫斯科版第117页。

㉔1941年7月3日《真理报》。

㉕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7卷宗,第290页。

㉖同上，第1卷宗，第1744页。

㉗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5全宗，第30802目录，第32卷宗，第22—23页。

㉘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11627目录，第954卷宗，第65页。

㉙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卷宗，第224—225页。

㉚同上，第91卷宗，第11页。

㉛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11454目录，第179卷宗，第1页。

㉜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1855目录，第7卷宗，第27页。

㉝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1卷宗，第36页。

㉞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1卷宗，第40—42页。

㉟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70卷宗，第65—71页。

㊱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725588目录，第36卷宗，第10页。

㊲尼·亚·别尔嘉耶夫《俄国的命运》1918年莫斯科版第187页。

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2卷宗，第252页。

㊴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725588目录，第36卷宗，第295—298页。

㊵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725588目录，第36卷宗，第308—310页。

㊶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08全宗，第2513目录，第71卷宗，第131—221页。

㊷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11454目录，第179卷宗，第144—145页。

㊸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8卷宗，第V项，第231—232页。

㊹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11454目录，第179卷宗，第320—321页。

㊺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324页。

㊻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5全宗，第11285目录，第205卷宗，第1—78页。

㊼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21—24页。

㊽同上，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0卷宗，第12—13页。

㊾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卷宗，第315页。

㊿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08全宗，第2526目录，第5a卷宗，第443—448页。

(5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6目录，第36卷宗，第82—84页。

(5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28—30页。

(5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96—99页。

(54)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卷宗，第470页。

(5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29全宗，第161目录，第103卷宗，第93页。

(56)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全宗，第3028目录，第4卷宗，第1—27页。

(57)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11627目录，第954卷宗，第61页。

㊽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7全宗,第11250目录,第29卷宗,第37—38页。
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1976年莫斯科版第33页。
㊿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133目录,第7卷宗,第139—140页。
6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卷宗,第431页。
6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19全宗,第679目录,第3卷宗,第17—21页。
6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2卷宗,第175—176页。
64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0卷宗,第37页。
6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67全宗,第1201目录,第100卷宗,第263—264页。
66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67全宗,第1201目录,第100卷宗,第134—135页。
67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104—107页。
68同上,第120—123页。
69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554目录,第91卷宗,第226页。
70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72558目录,第35卷宗,第8页。
7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72558目录,第35卷宗,第33页。
7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72558目录,第35卷宗,第16页。
7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1卷宗,第136—137页。
74同上,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7卷宗,第362页。
7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8卷宗,第121—129页。
76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8卷宗,第332页。
77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26全宗,第1目录,第113卷宗,第63—75页。
78朱可夫《回忆与思考》1983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257页。
79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8卷宗,第80—82页。
80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8卷宗,第212—214页。
8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0卷宗,第47、49页。
8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69全宗,第14065目录,第6卷宗,第117页。
8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2卷宗,第175页。
84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5卷宗,第26页。
8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6目录,第24卷宗,第7页。
86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141—143页。
87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910目录,第11卷宗,第16—19页。
88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08全宗,第10163目录,第27卷宗,第8页。
89斯大林《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1950年莫斯科版第35页。

⑩《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3年伦敦版第18卷第563页。
⑪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11627目录,第954卷宗,第62页。
⑫同上,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70卷宗,第155页。
⑬同上,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16页。
⑭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6目录,第24卷宗,第8页。
⑮迪特·盖恩斯《希特勒的国防军在苏联》1985年梅茵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1页。
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317页。
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3目录,第135卷宗,第1—2页。
⑱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3全宗,第11454目录,第179卷宗,第1—2页。
⑲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3卷宗,第445—446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8全宗,第11389目录,第2卷宗,第164—166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2卷宗,第18—22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1640目录,第26卷宗,第296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A全宗,第11309目录,第163卷宗,第15—45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7卷宗,第201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6目录,第195卷宗,第249—253页。
⑳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42卷宗,第3项,第102—103页。
⑳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8卷宗,第5项,第102页。
⑳同上,第1目录,第2010卷宗,第1—13页。
⑳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2010卷宗,第67—69页。
⑪参见《政治教育》杂志1989年第4期第58—63页。
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4卷宗,第1项,第1页。
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4卷宗,第1项,第158页。
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3页。
⑪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8全宗,第2目录,第966卷宗,第5页。
⑪约·霍夫曼《弗拉索夫军史》1986年罗姆巴赫版第3页。
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4卷宗,第1项,第9—12页。

第九章

①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1卷宗,第23—24页。

②同上,第30卷宗,第24页。

③朱可夫《回忆与思考》1983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97页。

④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回忆录》(军事科学著作)1974年莫斯科版第391页。

⑤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3卷宗,第247—248页。

⑥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2642目录,第233卷宗,第285—286页。

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4卷宗,第18页。

⑧同上,第6卷宗,第47页。

⑨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4卷宗,第62页。

⑩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45—52页。

⑪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95页。

⑫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1卷宗,第75—81页。

⑬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5卷宗,第70页。

⑭同上,第68—70页。

⑮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目录,第16卷宗,第19页。

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5卷宗,第51页。

⑰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6卷宗,第20页。

⑱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3卷宗,第209页。

⑲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2卷宗,第208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26卷宗,第78—80页。

㉑《斯大林文选》中文版上册第291页。

㉒《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317页。

㉓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26卷宗,第94—102页。

㉔同上,第114—122页。

㉕同上,第156—157页。

㉖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1目录,第96卷宗,第21页。

㉗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中文版上册第616页。

㉘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3目录,第133卷宗,第1—4页。

㉙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4卷宗,第86页。

㉚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03目录,第109卷宗,第6—29页。

㉛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86全宗,第1目录,第1卷宗,第2—56页。

㉜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13卷宗，第163—164页。
㉝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34卷宗，第37—38页。
㉞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5卷宗，第41页。
㉟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287页。
㊱乌斯季诺夫《我的俄国》1983年波士顿—多伦多版第146页。
㊲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316页。
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2卷宗，第175页。
㊴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6目录，第9卷宗，第128—129页。
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379页。
㊶列·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文版第2卷，第141页。
㊷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3卷宗，第210—212页。
㊸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0卷宗，第7、8页。
㊹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0卷宗，第9页。
㊺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0卷宗，第336页。
㊺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0卷宗，第339页。
㊼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159卷宗，第87页。
㊽尼采《查拉图斯拉如是说》*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51*页。
㊾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7卷宗，第178—180页。
㊿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71—72页。
(51)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下卷第99页。
(5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1711目录，第2卷宗，第6—7页。
(5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2卷宗，第396—397页。
(54)朱可夫元帅《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1988年莫斯科版第81页。
(55)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49全宗，第1544目录，第112卷宗，第144页。
(56)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1988年莫斯科版第198页。
(57)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全宗，第7目录，第2卷宗。
(58)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264目录，第230卷宗，第15页。
(59)朱可夫元帅《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第245页。
(60)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8全宗，第11627目录，第988卷宗，第81页。
(61)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13卷宗，第223—230页。
(62)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8卷宗，第103页。
(63)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3412目录，第63卷宗，第46—47页。
(64)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9卷宗，第115页。
(65)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83年莫斯科版第470页。
(66)И·И·加戈洛夫《安东诺夫大将》1978年莫斯科版第87页。

⑰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2目录，第62卷宗，第546页。
⑱《拿破仑选集》1941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320页。
⑲鲍·米·捷普洛夫《个人的差异问题》1961年莫斯科版第275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96—A全宗，第2011目录，第26卷宗，第103—113页。
㉑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231页。
㉒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0卷宗，第27页。
㉓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13卷宗，第7页。
㉔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5卷宗，第223、340—347页。
㉕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41卷宗，第271—272页。
㉖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4卷宗，第82—84页。
㉗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6卷宗，第428页。
㉘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0卷宗，第324页。
㉙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6卷宗，第66页。
㉚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3卷宗，第455页。
㉛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7卷宗，第11页。
㉜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A全宗，第2642目录，第32卷宗，第145—147页。
㉝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5卷宗，第6页。
㉞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31页。
㉟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5全宗，第178612目录，第86卷宗，第132、140页。
㊱同上，第345—347页。
㊲同上，第198页。
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165—166页。
㊴《三盟国首脑德黑兰会议(文件汇编)》1978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52、53页。
㊵同上，第54页。
㊶H·A·别尔嘉耶夫《俄国的命运》1918年莫斯科版第181页。
㊷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4卷宗，第329—333页。
㊸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4卷宗，第317、122—126、275页。
㊹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178全宗，第1目录，第38卷宗，第93页。
㊺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36全宗，第2675目录，第170卷宗，第108—311页。
㊻《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47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40页。
㊼同上，第41页。
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1941—1945)》1976年莫

斯科版第1卷，第19页。

⑨同上，第29页。

⑩《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206页。

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1941—1945）》第69页。

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版第4卷，第428页。

⑩《亚历山大·卡多甘先生的日记（1938—1945）》1971年纽约版第471页。

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通信集（1941—1945）》第74页。

⑩同上，第75—76页。

⑩《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236页。

⑩《斯大林文选》上册第317页。

⑩《斯大林文选》下册第347页。

⑩《三盟国首脑德黑兰会议（文件汇编）》第2卷，第89—92页。

⑩哈里曼和阿贝尔《晋见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第12卷纽约兰登书屋版第536页。

⑪《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文件集》1970年莫斯科版第22页。

⑫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11309目录，第101卷宗，第338—341页。

⑬哈里曼和阿贝尔《晋见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第12卷纽约兰登书屋版第536页。

⑭卢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芬兰》1957年布卢敏敦版第216页。

⑮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6卷宗，第87—88页。

⑯同上，第18卷宗，第74页。

⑰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6卷宗，第239—240页。

⑱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6卷宗，第119页。

⑲同上，第183页。

⑳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8卷宗，第93页。

㉑苏联科学院各民族历史研究所档案馆第190全宗，第232目录，第7卷宗，第105页。

㉒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8卷宗，第133页。

㉓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8卷宗，第142—144页。

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8卷宗，第110页。

㉕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48—A全宗，第3412目录，第63卷宗，第187—188页。

㉖《三盟国首脑克里木会议（文件汇编）》1979年莫斯科版第273页。

㉗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18卷宗，第177—190页。

第十章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6卷宗,第5项,第1页。

②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233全宗,第2380目录,第44卷宗,第1—3页。

③《苏联对外政策》1947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598页。

④同上,第597页。

⑤《苏联对外政策》1947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602—603页。

⑥《安·安·葛罗米柯回忆录》第1卷1988年莫斯科版第221页。

⑦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7卷宗,第6项,第124—130页。

⑧《波茨坦会议》1975年版第136页。

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第17全宗,第2目录,第109卷宗,第32—33页。

⑩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1241卷宗,第61页。

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6卷宗,第5项,第4页。

⑫同上,第95卷宗,第4项,第323页。

⑬同上,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5卷宗,第2项,第277页。

⑭哈里曼和阿贝尔《晋见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1946)》第12卷纽约兰登书屋版第92页。

⑮《三盟国(苏美英)首脑柏林(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文件汇编)》1980年莫斯科版第42—43页。

⑯同上,第61页。

⑰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66全宗,第178499目录,第9卷宗,第34—37页。

⑱《三盟国(苏美英)首脑柏林(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文件汇编)》1980年莫斯科版第299—300页。

⑲《丘吉尔文集》(六卷集)第2卷第256页。

⑳《苏共决议汇编》第9版第8卷第7—16页。

㉑《普希金书信集》(两卷集)1982年版第2卷第291—292页。

㉒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2642目录,第15卷宗,第1—9页。

㉓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6卷宗,第5项,第147页。

㉔同上,第103卷宗,第3项,第149—160页。

㉕《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选集》1979年莫斯科版第584页。

㉖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104目录,第16卷宗,第22页。

㉗同上,第2目录,第54卷宗,第97页。

㉘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4卷宗,第1项,第1—7页。

㉙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223卷宗,第235—238页。

㉚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7卷宗,第139—142页。

㉛若·索列尔《关于暴力的思考》1907年莫斯科版第58页。

㉜《柏拉图文集》(三卷集)第3卷上册1971年莫斯科版第384—386页。

㉝《俄国帝王家族》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155—156页。

㉞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全宗,第2目录,第612卷宗(第3分册),第8、10页。

㉟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99卷宗,第197页。

㊱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的敌人的王国》1921年慕尼黑版第16页。

㊲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4卷宗,第1项,第270—277页。

㊳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03卷宗,第4项,第149—160页。

㊴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99卷宗,第1页。

㊵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5881全宗,第1目录,第807卷宗,第89页。

㊶《第四国际》杂志1937年第3期第5页。

㊷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4卷宗,第1项,第143—151页。

㊸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3316全宗,第2目录,第1682卷宗,第3—7页。

㊹同上,第1613卷宗,第3—18页。

㊺同上,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4卷宗,第1项,第1—2页。

㊻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3316全宗,第2目录,第2016卷宗,第1—10页。

㊼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3卷宗,第276—278页。

㊽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55卷宗,第1项,第87—88页。

㊾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4卷宗,第1项,第1—2页。

㊿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01卷宗,第79—81页。

㉛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64卷宗,第1项,第62页。

㉜同上,第201卷宗,第265页。

㉝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67目录,第1卷宗,第5页。

㉞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5卷宗,第2项,第384—385页。

㉟《苏联工作人员手册》,维辛斯基主编,1939年莫斯科版。

㊱《行政法案。重要决定汇编》1936年莫斯科版第11页。

㊲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01卷宗,第268页。

㊳同上,第276页。

㊴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99卷宗,第192页。

㊵同上,第172卷宗,第1项,第85—92页。

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1全宗,第3目录,第121卷宗,第122—132页。

㊷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107目录,第261卷宗,第13—15页。

㊸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107目录,第261卷宗,第12页。

㊹同上,第13页。

㊺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107目录,第261卷宗,第28页。

㊻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36卷宗,第3项,第268—269页。

㊼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55卷宗,第1项,第118—119页。

㊽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319卷宗,第192—198页。

㊾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57卷宗,第3项,第388页。

㊿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9、199卷宗,第57—77、366页。

(71)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9、199卷宗,第30页。

(72)尼·别尔嘉耶夫《俄国宗教心理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1931年巴黎版第31页。

(73)《布尔什维克》杂志1949年12月第34页。

(74)1949年12月21日《真理报》。

⑮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65目录,第739卷宗,第1、9、12页。

⑯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63目录,第218a卷宗,第9页。

⑰同上,第65目录,第2186卷宗,第1—15页。

⑱《柏拉图文集》(3卷集)第1卷1971年莫斯科版第209页。

⑲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76卷宗,第2项,第232—233页。

⑳卡·考茨基《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主义》,载于《社会》杂志1931年第8期第1册第101页。

㉑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968年纽约版第109—110页。

㉒《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7页。

㉓斯·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第110页。

㉔《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载于《路标》(文集)1909年莫斯科版第39、45页。

㉕《凯南回忆录(1925—1950)》1969年纽约版第583—598页。

㉖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5卷宗,第2项,第287—296页。

㉗《杜鲁门回忆录》1955年巴黎版第2卷第117页。

㉘利·马尔库《冷战》1987年巴黎版第193页。

㉙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51卷宗,第8项,第99—112页。

㉚同上,第2目录,第176卷宗,第2项,第235—254页。

㉛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49卷宗,第6项,第35页。

㉜同上,第176卷宗,第2项,第360页。

㉝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5目录,第54卷宗,第14—15页。

㉞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3目录,第92卷宗,第47、55页。

㉟《贝尔格莱德的行动》1964年莫斯科版第85页。

㊱密·德热拉斯《同斯大林会谈》1962年纽约版第169—176页。

㊲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3目录,第105卷宗,第1—8页。

㊳同上,第106卷宗,第5—7、17—19页。

⑲《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16—517页。

⑳苏共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223卷宗,第291页。

㉑《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92页。

㉒同上,第8卷第326、329页。

㉓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223卷宗,第301页。

㉔《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

㉕1988年10月23日《真理报》。

第十一章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2180卷宗,第120—121页。

②卡·拉狄克《肖像和评论》1934年莫斯科版第2册第19页。

③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326全宗,第1目录,第113卷宗,第72页。

④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2180卷宗,第50—51页。

⑤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9卷宗,第1项,第169—170页。

⑥卡·考茨基《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前途》载于《社会》杂志第2卷第437—438页。

⑦1948年11月18日《真理报》。

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70页。

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1页。

⑪《斯大林选集》(下册)第143页。

⑫《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0页。

⑬苏联国家档案总局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199全宗,第1目录,第134卷宗,第8页。

⑭1925年1月17日《社会主义通报》。

⑮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来源》1964年纽约版第400—440页。

⑯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130全宗,第1目录,第3卷宗,第32—33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91页前后。

⑱《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1年第6(113)期。

⑲《刑法典(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典)》1938年莫斯科版第

26—32页。

⑳《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4页。

㉑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337卷宗,第1项,第1—4页。

㉒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88全宗,第1目录,第474卷宗,第4页。

㉓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3101全宗,第2目录,第68卷宗,第5项,第193页。

㉔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7卷宗,第6项,第276页。

㉕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7卷宗,第6项,第283—292页。

㉖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64页。

㉗《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3页。

㉘同上,第206页。

㉙维·谢尔施《一场革命的命运。1917—1936年的苏联》1937年巴黎版第323页。

㉚鲍·苏瓦林《斯大林》1977年巴黎版第422—499页。

㉛黑格尔《宗教哲学》(两卷集)1975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127页。

㉜《斯大林选集》(上册)第437页。

㉝同上,第439页。

㉞尼采《人的,仅仅是人的》1910年圣彼得堡版第331页。

㉟《共产党人》杂志1962年第3期第42页。

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8页。

㊲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222卷宗,第19页。

㊳参看《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56—662页。

㊴《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卷第70页。

㊵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3212卷宗,第27页。

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第396页。

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第361页。

㊸《关于历史研究》(文集)1937年莫斯科版第28页。

㊹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目录,第5300卷

宗,第28页。

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58全宗,第120目录,第313卷宗,第7—15页。

㊻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1目录,第268卷宗,第5—10页。

㊼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3目录,第54卷宗,第1—4页。

㊽《历史的见证(文件汇编)》1979年巴黎版第449—450页。

㊾《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59页。

㊿《斯大林文选》(下册)第582页。

(51)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77全宗,第3目录,第27卷宗,第134—163页。

(52)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6卷宗,第2项,第205页。

(53)同上,第302卷宗,第1项,第29—31页。

(54)别尔嘉耶夫《俄国的命运》1918年莫斯科版第227页。

(5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10页。

(56)同上,第48卷第455页。

(57)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58全宗,第1目录,第9卷宗,第3—4页。

(58)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567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9页。

(5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97页。

(6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97页。

(61)同上,第460页。

(62)《托洛茨基文集》第12卷第261、267页。

(63)同上,第21卷第94页。

(64)亚历克斯·德·琼斯《斯大林和苏联的建立》1986年伦敦版第305页。

(6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09—210页。

(66)《对刑事犯和应改造者的惩治条例》1845年圣彼得堡版第65、69页。

(67)《俄罗斯联邦法典汇编》1927年莫斯科第4版第665—668页。

(68)阿·亚·洛普欣《俄国警察的现状与未来》1907年莫斯科版第26页。

(69)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1981年马萨诸塞州剑桥版第417页。

(70)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65目录,第239卷宗,第12页。

(71)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567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18页。

⑫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223卷宗,第338—357页。

⑬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8卷宗,第7项,第380页。

⑭同上,第168卷宗,第1项,第337—353页。

⑮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70卷宗,第3项,第344—345页。

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132全宗,第2642目录,第40卷宗,第3页。

⑰《斯大林时代的伟大工程》1951年莫斯科版。

⑱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302卷宗,第1项,第21—28页。

⑲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302卷宗,第1项,第39—41页。

⑳《莎士比亚全集》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第11卷。!

㉑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2180卷宗,第533—534页。

㉒黑格尔《宗教哲学》第1卷第129页。

㉓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72卷宗,第1项,第325—326页。

㉔黑格尔《宗教哲学》第1卷第129页。

㉕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601全宗,第1目录,第217卷宗,第181页。

㉖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1987年版第1—2册第266、267、271、272页。

㉗《列·托尔斯泰全集》第24卷第14页;第26卷第369页。

㉘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337卷宗,第1项,第80—81页。

㉙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130全宗,第1目录,第1卷宗,第50—51页。

㉚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130全宗,第1目录,第1卷宗,第52—53页。

㉛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107目录,第127卷宗,第1—6页。

㉜Я·Д·拉波波尔特《在两个时代交迭之时(1953年医生案件)》1988年莫斯科版第208—209页。

㉝1953年3月9日《真理报》。

㉞1953年3月10日《真理报》。

㉟1953年3月18日《真理报》。

⑯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7523全宗，第107目录，第261卷宗，第28—34页。

⑰德热拉斯《同斯大林谈话》1962年纽约版第207页。

⑱梅列日科夫斯基《即将上台的下流人》1906年皮罗日科夫出版社版第29页。

⑲1952年10月15日《真理报》。

⑳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05卷宗，第3项，第324—327页。

㉑梅列日科夫斯基《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第36页。

㉒《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3卷第90、92页。

㉓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337卷宗，第1项，第26页。

㉔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36卷宗，第3项，第180—181页。

㉕尼·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识。人类命运哲学的经验》1969年巴黎版第27页。

㉖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32卷宗，第4项，第167—169页。

㉗《苏共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898—1971)》1971年莫斯科第8版，第7卷，第203、205、209、210页。

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25—128页。

㉙恩·霍查《同斯大林在一起(回忆录)》1979年地拉那版第21页。

㉚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识。人类命运哲学的经验》1969年巴黎版第31页。

代结束语

①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03卷宗，第3项，第400页。

②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103卷宗，第3项，第399、408页。

③《百科辞典》(三卷集)1955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307页。

④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33987全宗，第3目录，第993卷宗，第164、179、180、217页。

⑤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130全宗，第1目录，第1卷宗，第20页。

⑥饶勒斯《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巴黎版第448页。

⑦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36卷宗，第3项，第

145、161、166、194页。

⑧《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196页。

⑨《柏拉图全集》莫斯科版第3卷第1分册第107页。

⑩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1目录，第8180卷宗，第567页。

⑪亚历山德罗夫《斯大林是独裁者吗？（历史的武断的分析）》1932年巴黎复兴出版社版第25页。

⑫《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7页。

⑫《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1—52页。

⑭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56卷宗，第1、2、3项。

⑮P.库登霍夫-卡列尔吉《布尔什维主义和欧洲（斯大林及其同伙）》1932年柏林—里加拉梅出版社第32页。

⑯列·托洛茨基《苏联是什么样的及其往何处去？》1936年巴黎版第76页。

⑰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269卷宗，第141—146页。

⑱别尔嘉耶夫《俄国革命的灵魂》1923年巴黎版第4页。

⑲《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19页。